承德文史文库

主编：周金生 张爱萍

中国文史出版社

总顾问：柳宝全　刘志兵

总编审：李俊基

责任编辑：俞兴茂　张爱萍　郝洪喜

封面创意：白　演





ISBN 7-5034-0942-8/K·0646

定价：480.00元（全四册）

承德文史文库

（卷一）

中国文史出版社
承德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京)新登字第107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承德文史文库/《承德文史文库》编委会编.一北京:
中国文史出版社.1998.10
(大型承德史料丛书)
ISBN 7-5034-0942-8

Ⅰ.承… Ⅱ.周… Ⅲ.文史资料一河北一承德一文库Ⅳ.
K292.2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98)第21727号

承德文史文库

主　　编:周金生　张爱萍
出版发行:中国文史出版社
社　　址:100811　北京太平桥大街23号
印　　刷:河北省隆化县印刷厂
装　　订:河北省隆化县印刷厂
开　　本:850×1168　32开本
印　　张:124　　字数:3111千字
印　　数:1—1000册
版　　次:1998年9月北京第1版　第1次印刷
定　　价:480.00元

总　序

刘志兵

承德，山川俊秀，历史悠久。这里所发生过的一些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活动经历，在中国近、现代史中占有独特的地位。伴随着二十世纪末的金辉，承德以其改革开放不断发展的崭新面貌和得天独厚的历史文化遗产饮誉国内外。可以相信，展现在我们面前的将是与新纪元的曙光一并喷薄升腾的光明和希望。

面对世纪之交的夕辉与晨霞，承德人更多了一份思考：历史是一条割不断的长河，没有承德的昨天，就没有她的今天和明天。只有深入了解、知晓她的昨天，从中探求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才能使承德的发展之河更加波澜壮阔，源远不绝；才能比较客观、明晰地认识自我，更深情地热爱家乡，更投入地建设家乡。

基于此种共识，经过各界人士的共同努力，《承德文史文库》终于同广大读者见面了。这对于承德人民的确是一件可喜可贺的事情。

早在 1959 年，人民政协在敬爱的周恩来总理亲自倡导下创建了文史资料事业，并以坚持爱国统一战线的原则和“三亲”（亲历、亲见、亲闻）为特色，于史学殿堂独树一帜。我们承德市政协亦于八十年代初开始致力于当地史料的挖掘、整理、出版工作。寒暑廿载，成绩颇为可观。

《承德文史文库》这套大型史料丛书的问世，进一步展示了广大文史工作者多年辛勤劳作的成果，是对我市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和文化积累令人瞩目的贡献。

《文库》共4卷，分为政治军事、民族宗教、名胜古迹、文化教育、人物、社会民情、工商经济7编，计320万字。全书以朴实的文风，流畅的文字，重点反映了自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以来至1965年底发生在承德八县三区和部分老热河区域的重要史实。考虑承德历史的特殊情况，在部分所选文章时限上亦有所拓延。

承德地处要塞，拱卫京畿，昔日为热河省首府。历史上乃北方游牧民族与中原农耕民族反复争战、交融之重地。由此而形成的以中原文化为主，多民族、多层次的文化底蕴无一不在承德先人的遗迹中放射着智慧的光芒。这文化的光芒和民族间剧烈的矛盾冲突演绎到清代康乾时期得到了空前的释放和近乎完美的调合——古朴、凝重的避暑山庄，金碧辉煌的外八庙建筑群至今仍为这个释放和完美作着最好的诠释。由那时起，承德这座美丽的山城亦缘此而诞生。

然而到十九世纪中叶，恰恰是这所昔日的皇家名苑，竟随国事的江河日下而被永远烙印上一段奇耻大辱。多少年来，多少仁人志士为洗雪这耻辱，为求得全民族的自由解放，在承德这块热土上一代又一代前仆后继，英勇斗争，谱写了一曲曲催人泪下的正气歌。于是，痛苦与美好，没落与辉煌，血泪与欢欣交叠在一起，荣也山庄，辱也山庄！

《承德文史文库》便从避暑山庄拉开了帷幕。翻开这部长卷，承德百余年盛衰兴废，悲喜更迭展现在我们面前：从散发着阴霾之气的晚清王朝的政治舞台到军阀兵燹、硝烟弥漫的军事战场；从各民族间的争战、融合的周而复始，到为求得中华民族的解放而同仇敌忾，宁死不屈；从满目疮痍的旧热河的凋敝到一个充满活力，欣欣向荣的人民政权的诞生；从文坛巨子到三教九流；从古行宫驿站的最后一抹斜阳到避暑山庄外八庙的重放异彩……百年沧桑，虽不能尽述其详，却足以补史之缺，续史之无矣。

最为可贵的是，这部汇集了500余篇文章的史料丛书多系当事人写当时事，或经深入挖掘、考证所得的第一手资料，真实客观，有较强的感染力，堪称一部内容丰富、史料翔实，独具风采的“活”的承德近现代史。我相信，所有关心热爱承德的人都会抱着极大兴趣来阅读这部书的。

编辑《承德文史文库》是一项面向社会，面对历史和未来的系统工程。它的出版，得到了全国政协中国文史出版社和河北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的大力支持；得到了我市市委、市政府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也得到兄弟市县，持别是老热河的朝阳、赤峰等市政协、史志部门和我市文化文物界、文学界、新闻及民族宗教工作部门的热情支持帮助。我市八县三区政协和有关部门在提供稿件、征订、发行等方面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尽管参加编辑的同志们以严谨的态度从事这项工作，付出了很多辛苦，然书中疏漏之处仍在所难免，诚望

广大读者批评指诊，亦望文史资料工作者能及时总结经验教训，提高自己的编辑业务水平。

古语云，弃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时代总是在不断地前进，人类总是在不断地返顾、审视自己中逐渐走向成熟。今天的一切将成为历史的过去。愿此书能为去者刊铭，为来者鉴往。是为序。

谨以此献给承德解放五十周年，献给二十一世纪新纪元。

（作者系承德市政协主席）

政治军事编

目录

(卷一)

乌兰布通之战和多伦会盟

袁森坡

本文记述的是在承德成为清代的第二个政治中心，即避暑山庄及外八庙兴建之前，康熙皇帝亲自指挥的具有重大意义的两个历史事件。

乌兰布通之战

乌兰布通在原热河，现内蒙古昭乌达盟克什克腾旗的南境，南距木兰围场30里，距承德400余里，位于西拉木伦河①的上游萨里克河畔②，是一座类似红坛子的赭色的山峦，汉语名为红山，蒙语称为乌兰布通(红瓮)。清初，这里是康熙经常出巡的要道，是出古北口，经围场、内蒙古乌珠穆沁、喀尔喀车臣汗部、直抵尼布楚的必经之地，地理位置相当重要。

痛击噶尔丹叛军的乌兰布通之战发生在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阴历八月一日。这次战役有着复杂的历史背景。

噶尔丹是清初我国厄鲁特蒙古准噶尔部的民族分裂主义头子，是一个凶恶狂妄的野心家。他是准噶尔首领巴图尔珲台吉的第六子，早年在西藏当喇嘛，康熙十年(1671年)，他夺取了准噶尔的统治权以后，对邻近部族发动了一系列的兼并战争，首先吞并了厄鲁特各部；康熙十六年(1677年)，他进攻青海和硕特蒙古，杀掉了鄂齐尔图车臣汗，从而控制了青海和西藏③；康熙十七年(1678年)又征服了天山南路的维吾尔族和巴喀什湖以西的哈萨克族。于是，噶尔丹"恃其强盛，四出剽掠④，随即把进攻的矛头指向蒙古高原，阴谋鲸吞喀尔喀蒙古。

噶尔丹在疯狂兼并，阴谋叛乱的同时，对清中央政府采取了阳奉阴违的态度。表面上，噶尔丹向清政府纳贡称臣[5]，"跪受敕书及赏赉诸物"[6]，并一再向清政府表示："我并无自外于中华皇帝"[7]，"我与中华一道同轨"[8]，"向在中华皇帝的道法之中，不敢妄行"[9]。然而实际上，噶尔丹早已走上了背叛祖国的道路。从康熙十三年(1674 年)到康熙二十二年(1683 年)，噶尔丹几乎每年都派遣使者前往沙俄[10]，"企图同俄国订立军事同盟以便得到俄国给予'军队和枪炮'的援助[11]"。康熙二十七年(1688 年)，噶尔丹借故制造事端，率兵 3 万，"扬言借俄罗斯兵且至"[12]，发动了对喀尔喀的土谢图汗和宗教领袖哲布尊丹巴胡土克图的掠夺战争。他由杭爱山大举进攻喀尔喀三部，从背后向正在乌丁斯克及色楞格斯克一线与沙俄侵略军浴血苦战的土谢图汗部猛扑过来。噶尔丹的进攻，凶恶地配合了沙俄侵略军，瓦解了我国喀尔喀蒙古各部抗俄斗争的阵线。

当时，喀尔喀蒙古北部边境的形势是极其微妙复杂的。十七世纪四十年代，沙俄扩张主义侵略势力达到我国黑龙江流域后侵占了我国大片领土，骚扰我国边境达数十年。康熙二十四年、二十六年，清政府军队在雅克萨先后两次反击战中击败了俄国侵略军。俄国政府不得不同意于次年举行边界谈判。当时沙皇派来远东与中国谈判的沙俄首席谈判代表戈洛文，为了巩固尼布楚和雅克萨的后方，以便在谈判中对中国进行讹诈，正全力镇压贝加尔湖地区蒙古人民的抗俄斗争。喀尔喀土谢图汗在人民抗俄风暴的推动下，也"派了一支四千人的军队由他的弟弟巴图尔指挥，去对付俄国人……色楞格斯克和乌丁斯克都被包围了，戈洛文的处境日益危急。"[13]正当俄国侵略军十分狼狈的时候，噶尔丹发动了进攻，使形势急剧逆转，喀尔喀蒙古陷于腹背受敌的困境，不得不撤回前线军队。沙俄文件记载："卡尔梅克的博硕克图汗(即噶尔丹)进攻蒙古地区是同沙皇陛下的军队联合行动的。"[14]，"有大批俄国军人，并

有大量火器大炮协同他作战。"[15]在噶尔丹与沙俄配合夹击之下，喀尔喀蒙古各部被击败了。

1688 年，由于喀尔喀蒙古各部的处境日益险恶，不断发出的紧急军报像雪片一样飞向北京。同年六月，理藩院尚书阿喇尼报告：喀尔喀三部"各弃其庐帐、器物、马驼牛羊，纷纷南窜，昼夜不绝"[16]。七月，哲布尊丹巴请求清政府"速赐援救"，随即率众奔向蒙古苏尼特旗[17]。八月，理藩院侍郎文达等人报告："土谢图汗与噶尔丹于八月初三、四日等相遇于鄂罗会诺尔之地，鏖战三日"，结果大败，"乃越瀚海奔至哲布尊丹巴所。"[18]噶尔丹这时气焰更为嚣张，他不仅拒绝了清政府多次给他下达的停战议和的命令[19]，而且猖狂地要挟清政府，说什么"泽布尊丹巴来投天朝，或拒而不纳，或擒以赴之"[20]。并且凶恶地嗥叫："我尽力征讨五六年，必灭喀尔喀，必擒泽布尊丹巴也。"[21]

噶尔丹血洗和鲸吞喀尔喀蒙古以后，内蒙古首当其冲，立刻暴露在叛军的铁蹄和屠刀面前。早已密切注意北方形势的清朝政府，立即下令内蒙古全线戒备[22]。康熙二十八年(1689 年)，清政府迅速与俄国政府签订《中俄尼布楚条约》，明确划分了中俄的东段边界，以便集中力量解决噶尔丹的问题。

在《中俄尼布楚条约》签订以后，噶尔丹与沙俄继续勾结。康熙二十九年(1690 年)，噶尔丹进攻内蒙古前夕，密派达尔罕宰桑带着他的信件，去见沙俄伊尔库次克总督伊斯良斯基和戈洛文，要求戈洛文率军"驰赴约定之地会合，以便并肩作战"[23]。为了换取俄国政府的支持，噶尔丹派赴沙俄的使者居然否定《尼布楚条约》，许愿割让雅克萨一带中国领土给沙俄。因此，平定卖国贼噶尔丹的叛乱，是和沙俄侵略势力在特殊条件下进行斗争的继续。清政府看到了情况的复杂性，一方面由理藩院行文俄国，指出俄国必须遵守《尼布楚条约》，不得与噶尔丹勾结，维持中俄双方的和好；另一方面，则积极备战，决心用武力讨平叛乱，消除威胁中国统一的大患。

气焰嚣张的噶尔丹，以为有沙俄支持便有恃无恐，率军沿克鲁伦河下游推进。同年六月，越过了呼伦池，又深入乌珠穆沁。六月二十一日，在乌尔会河打败了清政府理藩院尚书阿喇尼率领的蒙古骑兵，到达克什克腾旗达尔湖以南。这时，沙俄使节、哥萨克军官尼古拉·吉比列夫带来了戈洛文给噶尔丹的复信。信中"保证以俄国军队的相应行动，支持厄鲁特部对土谢图汗的进攻"[24]。于是，噶尔丹更加肆无忌惮，继续向南大举窜犯，逼近乌兰布通。

面对噶尔丹挑起的分裂叛乱，清政府在康熙二十九年三月至六月，连续进行了大规模的军事调动：对内蒙古和喀尔喀军队进行了动员，在宁夏(今银川市)、归化 城(今呼和浩特)、遵化屯戍了军队；调盛京(今长春市)及吉林乌喇驻军驰援科尔沁；令察哈尔(今张家口)军队防护御马场，命令兵部和直隶总督整理供军事运输和通讯联络的驿站。七月上旬，康熙任命福全(康熙之兄)为抚远大将军，率清军主力出古北口；任命常宁(康熙之弟)为安远大将军，率军出喜峰口。七月十四日，康熙率军出古北口，准备亲临前线，组织围歼。

康熙二十九年(1690 年)的七月，古北口外阳光灿烂，天朗气清。这时，清军分两路从今承德境内的宽城、平泉一线和滦平、承德市附近向北大规模运动。喜峰口外的青龙河、瀑河上下，骑兵、步兵、火器营的鸟枪兵和炮兵逶迤不绝；古北口外的滦河、伊逊河两岸，紧随在清军后面的辎重队、骆驼队弥山盖野，人流滚滚。七月二十日，康熙抱病到了伊逊河边笔架山下的波罗和屯(今隆化县城)。他虽因途中患了重感冒而中途停驻[25]，但对这次战役却充满了必胜的信心。他认为，噶尔丹虽然虚张声势，口出狂言，说什么"今虽临以十万众，亦何惧之有?"[26]但毕竟是"迫于内乱，食尽无归，内向行劫"[27]的一股流匪。因为这时噶尔丹的老巢已被其侄策妄阿拉布坦占据，回部、青海、哈萨克皆隔绝叛去，被噶尔丹裹胁的部众纷纷投向清政府。叛军貌似强大，实际上给养匮乏，孤军深入。因此，康

熙决心限期剿灭噶尔丹，以清沙漠。清政府命令理藩院和兵部紧急整理驿站，直达军前；命令福全在吐力根河驻扎以后，“军机事宜，不时报闻”，并急调常宁率军速与福全会师。在波罗和屯稍南的地方，他指定福全为常宁、苏努、阿密达、阿喇尼、索额图等诸军会师以后的统帅，并任命了进攻时首队、次队、两翼、火器营，以及居中策应的将领。同年七月，从今隆化县经围场到十二座连营的大道上，康熙与前线联系的驿马来往飞驰，急如流星，扬起了股股烟尘。

七月下旬，清军主力在吐力根河一线集结。从吐力根河到波罗和屯的300里的运输线上，清军的驿站、补给站前后相望，满、汉、蒙、回各族民工役夫为支援前线而日夜赶运军资器械、粮秣牲畜。12座连营的清军，粮草充足，各路大军斗志高昂，士饱马腾。

七月二十九日，噶尔丹沿萨里克河南下，屯军乌兰布通。“贼骑数万陈山下，依林阻水，以万驼缚足卧地，背加箱垛，蒙以湿毡，环列如栅，士卒于垛隙发矢铳，备钩距，号曰驼城”[3]。八月一日黎明，清军列队由南而北，向乌兰布通推进。雪亮的战刀，在晨曦下闪耀，飘舞的龙旗遮蔽了远山的山影。正午，乌兰布通已经临近，清军阵前设鹿角枪炮，列兵待进。进攻开始，鸟枪兵一齐射击，子母炮和铁心炮的炮弹呼啸着飞向“驼城”。步兵杀声震天，奋勇冲击。噶尔丹也竭力督战，“于栅隙中注矢发铳，兼施钩矛”，抗击清军。清军右翼进击，为河泥所阻，回至原处而立。左翼在康熙的舅舅佟国纲、佟国维率领下，沿萨里克河河畔冲锋。叛军用俄罗斯的滑膛枪打死了佟国纲，左翼的形势也很不利。这时，只见随同作战的前锋参领格斯泰骑着一匹雄骏的白鼻马，挥舞战刀，旋风般地直入贼营，左右冲击，一往无前。佟国维乘势“由山腰绕贼后横击之，步骑争先陷阵，遂破其垒”[4]。叛军只好利用夜色的降临遁入险恶处。这一仗，噶尔丹被打得大败，驼城内血肉横飞，尸骸狼藉。清军也受到严重损失。

乌兰布通之战虽然未能全歼叛军，使噶尔丹借假和谈的缓兵之计得以暂时逃脱，但仍然可以称之为前清时期影响较大的一次

重要战役。乌兰布通之战的胜利，不仅沉重地打击了民族分裂主义头目噶尔丹之流的嚣张气焰，而且对于巩固北部边防，维护这一地区的正常秩序，提高清政府在各边疆少数民族心目中的威望，都起到了重要作用，在清代的军事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多伦会盟

乌兰布通之战以后，清政府深知噶尔丹的野心不死，“必将窥伺中原，不至殒命不止”。于是，康熙一方面在木兰围场行围习武，在士气和战斗力已经有显著提高的基础上，继续秣马厉兵，教营伍，练攻战，激励将士，申明赏罚，决心待机大举征伐，追歼叛军；另一方面则大力加强了对内蒙古，特别是对喀尔喀蒙古的管理，举行了具有重要影响的多伦会盟。

多伦会盟以前，内蒙古各旗早已置于清朝理藩院的严格管辖之下。在乌兰布通之战前后，内蒙古遵照清政府的统一调动，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当喀尔喀三部南迁时，内蒙古提供了大量的生活资料和水草丰美的牧场，从鄂尔多斯到科尔沁的沿边 26 旗还出动了 2.1 万骑兵，防止噶尔丹的追袭，保护喀尔喀数十万人的安全。当清朝理藩院尚书阿喇尼率蒙军在乌尔会河迎战失利时，内蒙古鄂尔多斯、科尔沁等旗和察哈尔蒙古的骑兵，分三路向阿喇尼增援；许多内蒙古的优秀儿女都血染征袍，在索约尔济河侦察噶尔丹的动向时，阿鲁科尔沁旗栋疆台吉属下的 300 名勇士都英勇陷阵，捐躯疆场。因此，清政府在战后要通过会盟的形式赏赉内蒙古的王公贵族，对他们的业绩和功勋加以褒奖。

喀尔喀蒙古是我国蒙古族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到 17 世纪初叶，清朝入关以前，喀尔喀三部即已统一于清政府的管理之下。但是在多伦会盟以前，由于清政府一直在为巩固统治权而连年进行战争，对喀尔喀三部的管理较为松懈。喀尔喀贵族这时却忘记了沙俄的阴谋和噶尔丹的野心，他们为了扩大自己的财富，而“互吞属

裔”，“内相侵夺”，闹得“兄弟不睦”，纷争不已。清政府曾派大臣调解他们的争端，“令将互相吞噬之人民尽行给还”[⑩]。可是，土谢图汗（察珲多尔济）认为扎萨克图汗（沙喇）私交噶尔丹，于是轻率起兵，杀了扎萨克图汗。噶尔丹以此为藉口，大举向喀尔喀进攻。

对于土谢图汗擅杀扎萨克图汗的放肆行为，清政府进行了严厉的申斥。但是，对于喀尔喀蒙古南迁的饥寒交迫、濒于死亡的数十万人民，则采取了坚决保护和拯救的措施。流离死亡的惨痛教训和在内蒙古所受到的关怀与救济，从正反两方面教育了喀尔喀人民，进一步增强了喀尔喀蒙古对祖国的热爱，对清中央政府的向心力。清政府了为加强中央集权，巩固北部边防，也需要加强对喀尔喀蒙古的管理。多伦会盟就是在这种形势下举行的。

康熙三十年（1691 年）四月，多伦诺尔草原春风送暖，牧草如茵。遵照清政府理藩院的规定，喀尔喀右翼诸王会集到上都河和黑棚一带，左翼诸王会集到上都至吐力根河一带，在距离多伦诺尔 100 里以外，等候康熙的到来。

四月三十日，康熙率上三旗军队和古北口绿营兵溯滦河而上，下五旗军队出独石口经上都牧场，齐集多伦诺尔。清政府“布营设哨”以后，令喀尔喀蒙古部众移近 50 里，按照万水朝宗，众星捧月的布局，与内蒙古各盟旗的帐幕一起，环绕康熙的行营屯列。

五月二日，清政府在网城南门前设置了帐殿，列仪仗，置乐队，召见蒙古王公。康熙就座以后，理藩院官员引内蒙古贵族列于左队，引喀尔喀蒙古贵族列于右队，在雄壮威严的乐曲声中谒见康熙。随后进入酒席，“演舞奏乐，众技毕陈”。

次日，康熙再次召集土谢图汗察珲多尔济、已故扎萨克图汗沙喇之弟策妄札卜、车臣汗吴默赫、哲布尊丹巴等 35 名大贵族“赐宴”，以宴会的形式举行了会盟。康熙在会上答应了喀尔喀蒙古贵族“敦请与 49 旗同列”的要求，决定与内蒙“49 旗一例编设，其号亦与 49 旗同”[⑪]，“照 49 旗编为旗队，给地安插”[⑫]。在封号上革除

了喀尔喀蒙古贵族旧有的济农、诺颜等号,除留下车臣汗、土谢图汗的名号外,一律改为清王朝的封爵,策妄札卜封为和硕亲王,其余贵族依次授与郡王、贝勒、贝子、台吉等爵位,奖励那些在平叛战争中“效力行走、侦探消息、以马匹助用”的有功人员。在清政府恩威并施的方针下,多伦会盟收到了预期的效果。康熙在其撰写的《多伦汇宗寺碑文》中说:“于康熙庚午之秋,大宴赉于多伦诺尔,48家名王君长,世官贵族,靡不毕集,拜觞起舞,稽首踊跃”。这虽然有统治者自我陶醉的成分,但在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了当时的盛况和情景。

康熙三十年五月四日,清政府在多伦闪电河边宽阔的牧场上,举行了盛大的阅兵。八旗满洲官兵,古北口绿营兵,排列火炮,“各依次列阵,鸣角、鸟枪齐发,众大呼前进,声动山谷”。显示出清王朝震慑分裂势力和进行统一战争所必需的强大军容。在军前对土谢图汗的擅杀扎萨克图汗,“令其具疏认罪”[③],然后宣布赦免,使喀尔喀两翼和好如初。

在赐宴、会盟、阅兵以后,清政府认为不仅要从行政制度上加强对喀尔喀蒙古的管理,而且要利用蒙族对于喇嘛教的信仰,作为一种统治手段,把喀尔喀蒙古和内蒙古各部各旗的力量,牢牢控制在清政府手中。因此,清政府答应了蒙古贵族们“愿建寺以彰盛典”的要求,选择了多伦这个“川原平衍,水草清溢,去天闲刍牧之场甚近,而诸部瀚海龙堆之东西北者,道里至此亦适相中”的地方,调拨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兴建了一所巨大的喇嘛庙,康熙根据蒙古对清中央政府“恪守侯度,奔走来同,犹江汉朝宗于海”的情况,给寺题名为“汇宗”。在喀尔喀蒙古原来集会的厄尔德尼召(光显寺)被噶尔丹掠夺,库伦夷为焦土的情况下,汇宗寺的建立,很快就成为寄居内蒙的喀尔喀蒙古朝拜的宗教中心。在喀尔喀返回故土和库伦庆宁寺建成之前,哲布尊丹巴胡土克图在这里主持宗教活动,同时每年率蒙古贵族去木兰围场朝见康熙。康熙“或间岁一

巡、诸部长于此会同述职"[12]，把汇宗寺当成他在多伦驻留时召见蒙古王公的行宫。乾隆在承德《普宁寺碑文》中追述道："昔我皇祖之定喀尔喀也，建汇宗寺于多伦，以一众志，"就反映了康熙建汇宗寺的目的和作用。

多伦会盟是清政府巩固北部边防，防止沙俄侵略，为进一步平定噶尔丹叛乱而采取的重要步骤。会盟解决了当时北部边疆存在的两大问题：第一，进一步发展了内外蒙古与清中央的关系，对噶尔丹卖国叛乱势力从政治上给予了沉重的一击，使其日益陷入孤立。第二，适应了我国多民族国家历史的发展，在喀尔喀蒙古三部实行了盟旗制度，编喀尔喀蒙古为左、中、右三路，划分为 34 旗，在行政管理上与内蒙古同例。又实行了清朝的封爵制度和法律制度，明确宣布："国法具在，凡事必须依所犯之法治罪。"由于这些制度的实施，清中央政府对喀尔喀的管理大大加强，并且调整了喀尔喀三部的关系，以及与内蒙古的关系。这一切，对清代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和发展，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注释：

①西拉木伦是蒙语，汉语名潢河。

②严格地说，乌兰布通峰下的河流叫哈尔汉河，俗名泡子河。

③《皇朝藩部要略》卷 9，《厄鲁特要略》。

④敦福合译：《圣驾亲征噶尔丹方略》钞本。

⑤《清圣祖实录》，卷 38，十一年正月庚午。

⑥《清圣祖实录》，卷 111，6 页，二十二年七月戊戌。

⑦《清圣祖实录》，卷 137，25 页，二十七年十一月甲申。

⑧《亲征平定朔漠方略》卷七。

⑨同⑤，卷 147，二十九年七月壬寅。

⑩〔法〕加恩著，江载华译：《早期中俄关系史》第 731 页。

⑪〔苏〕沙斯京娜：《十七世纪俄蒙通使关系史》162 页。

⑫魏源：《圣武记》卷三《康熙亲征噶尔丹记》。

⑬〔美〕约瑟夫·斯比塞著，王立人译：《耶稣会士徐日升关于中俄尼布楚谈判日记》52页。

⑭、⑮苏联科学院远东研究所等编：《十七世纪俄中关系》第2卷307页、360页。

⑯《清圣祖实录》卷135，二十七年六月庚申。

⑰《清圣祖实录》卷126，二十七年七月壬申。

⑱《清圣祖实录》卷136，26页，二十年八月丁卯条。

⑲1688年(康熙二十七年)四月，康熙遣内阁学士拜礼，在这之前遣噶尔丹的贡使陶赖哈什哈；七月遣侍卫阿南达；次年四月，遣理藩院尚书阿喇尼等赴噶尔丹军营，令其停止进攻，会盟议和，均被拒绝。

⑳《清圣祖实录》，卷136，4页，二十七年七月甲戌。

㉑《清圣祖实录》，卷136，19页，二十七年八月己酉。

㉒《清圣祖实录》，卷125，二十七年八月丁卯；卷127，3页，九月壬申。

㉓苏联科学院远东研究所等编《十七世纪俄中关系》第2卷，623页。

㉔〔苏〕兹拉特金：《准噶尔汗国史》281页。

㉕、㉖《清圣祖实录》，卷147，19、22页，二十九年丁未、辛亥。

㉗《清圣祖实录》，卷146，8页，二十九年五月癸丑。

㉘张穆：《蒙古游牧记》卷3，翁牛特条下注。

㉙《清史稿·佟国维传》。

㉚、㉛《清圣祖实录》卷151，三十年五月，丁亥。

㉜《大清一统志》卷409，御马场。

㉝《蒙古游牧记》卷7，喀尔喀总叙小注。

㉞《清圣祖实录》记载，康熙三十年、三十一年、三十二、三十三、三十四等年，哲布尊丹巴、土谢图汗等大批喀尔喀王公贵族每年都去木兰围场觐见康熙。

英使与清政府的第一次外交活动

刘玉文

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仲秋,英国国会通过国务大臣邓达斯提议,选派前任马德拉斯省总督马戛尔尼勋爵出使中国。为使访问获得满意效果,出访到达时间刻意选在中国皇帝万寿圣节前夕。此外,馈赠礼品亦十分丰富,多达600箱。

马戛尔尼以4艘轮船组成访华船队,于1792年9月26日自英国朴茨茅斯港出发,历经9个月的海上航行,风雨无阻,于乾隆五十八年五月初六日(1793年6月13日)到达南中国海澳门。这时,两广总督郭世勋由于接到北京的"廷寄",遵乾隆皇帝旨意,给予英船补养。五月十三日(6月20日)英国船队自澳门启航,"径往天津"。七月十七日(8月23日)使团及庞大的礼品运输车队到达北京。七月二十八日(9月2日)英国使团由大清皇帝特简钦差、长芦盐政征瑞陪同,自北京启程,前往皇帝北巡的驻跸所避暑山庄。八月初五日(9月9日)使团抵达热河,下榻于热河文庙[①]。

一.英使在热河的行踪

英国使团抵达北京,候旨停留7天之后,除留下4名工匠,负责组装礼品中不便运输到热河的大型仪器外,其余队员全部到热河。其中有正使马戛尔尼,副使斯当东,副使儿子托马·斯当东,文、武官员本生、文代娄门、巴尔斯、额鲁、白林、安德逊、丁维提、伊登勒、马庚多斯,随团医生巴朗,军乐队员5人,杂役11人,船员40人,总共69人。[②]

英国使团自八月初五日(9月9日)到达热河,至八月十七日

(9月21日)自热河启程返北京,共停留13天。现将其主要活动简述如下:

乾隆五十八年八月初六日(1793年9月10日),使团大部分成员在避暑山庄内的万壑松风、延薰山馆,安设馈赠中国大皇帝的礼品,"钦差征瑞相机照料"。[3]

八月初七、初八日(9月11日、12日)两天,使团正、副使及副使之子、总兵官本生、文书文代娄门、副总兵官巴尔斯6人,拜会清朝内阁大学士、首席军机大臣和珅府邸和征瑞在热河的临时行辕,晤谈祝寿事宜,"英吉利使臣不谙礼法",使团杂役"经引领照旧安设贡礼。"[4]

八月初九日(9月13日),英国使团及缅甸贡使,由征瑞等人陪同,"游观市井、坊庙、购物件"[5]。

八月初十日(9月14日),大皇帝在避暑山庄万树园赐宴。参加者除了英国正、副使臣、副使之子和其余使团官员13人外,还有朝廷王公大臣、蒙古王、贝勒、台吉和缅甸的正、副贡使。入宴之前,皇帝赐送"英吉利国王玉如意,来使成员缎疋有差。"[6]

八月十一日(9月15日)。

辰初(上午7时)大皇帝自避暑山庄"出惠迪吉门拜佛"。随扈王公大臣、蒙古首领、来贺贡使"于惠迪吉门前排班恭送"。蒙古王公为一班,英国使臣为二班,朝廷王公大臣为三班,缅甸贡使为四班。恭送礼毕,赐游避暑山庄湖区。游观路线是:从惠迪吉门入山庄,"于山口骑马,由北岸行走,至卧碑马(码)头坐船,至烟雨楼瞻仰,毕。至西岭晨霞马(码)头下船,进沧浪屿看金鱼,毕。至如意洲前后瞻仰,顺便看仪器(英国使臣馈赠的礼品,安设在延薰山馆,笔者注),毕。坐船至月色江声前、后殿瞻仰,毕。坐船至万壑松风马(码)头下船。由郁李坡行走带出,令其归寓。"[7]

未初(下午1时),英使应邀拜会和珅、征瑞。和珅向英使宣布皇帝诏谕,令英吉利国贡使即刻回北京,而后从珠山(舟山)离境。

酉正（下午6时），英国正使马戛尔尼紧急求见和珅，表达英国使团"愿随其他恭祝万寿人等一体，依仪行恭贺礼。"[8]和珅代为转奏明大皇帝。

八月十二日（9月16日），由于英使表示依大清礼仪祝寿，乾隆皇帝对英使的态度亦作相应改变。

巳时（上午9——11时），和珅、征瑞同到英国使团驻处，宣谕大皇帝新颁诏谕：

"……昨因英吉利国使臣不谙礼节，是以即令回京。……今该使臣等经军机大臣传谕训戒，颇知悔惧。本日正、副使前来，先行谒见军机大臣，礼节极为恭顺。伊等航海远来，初到天朝，未谙体制，不得不稍加裁抑。今既诚心效顺，一遵天朝法度，自应仍加恩视，以遂其远道瞻觐之诚。"[9]

八月十三日（9月17日），乾隆皇帝83岁万寿圣节正日。辰正（上午8时）"上御澹泊敬诚殿，……英吉利正使马戛尔尼、副使斯当东、副使之子托马·斯当东及缅甸国贡使三人，行庆贺礼。英吉利正使呈表文祝寿。"[10]

八月十四日（9月18日），卯时（上午5——7时）"赐观戏者毕集德汇门"，然后入山庄福寿园清音阁看戏。中午，皇帝于"卷阿胜境殿，赐随驾王公大臣、蒙古王、贝勒、台吉及英吉利国正使马戛尔尼、副使斯当东、副使之子托马·斯当东三人宴。"当晚在"万树园大幄次，观火戏。并赐……英吉利国正使马戛尔尼、副使斯当东、副使之子托马·斯当东三人小食。"[11]

八月十五日、十六日（9月19日、20日），英使向和珅、征瑞两次提出"希望自由贸易"等项要求，并递交"文本"，由和珅转奏明大皇帝。[12]

八月十七日（9月21日），英国使臣的要求被大皇帝温词拒绝，并传谕令英国使团尽速离开热河去北京，"恩准"使团一行从陆路，经直隶、山东、江苏，走运河离境。[13]中午，英国使团自热河启

程，3 天后到达北京。

二、英使访华的目的及结果

英国使团来华为皇帝祝寿之后，相继 3 天通过和珅、征瑞，向大清朝皇帝提出一系列要求，表明了英使访华的真正目的不在祝寿。要求不是一次提出的，而是断断续续提出，足见英使对清朝的恐惧、畏难心理。由于当时承担翻译的索德超，译文能力有限，谨据档案记录大皇帝颁谕诏书内容，综其大概，有下列六项。

要求之一，开辟英、中正式官方贸易。在此之前，康熙二十二年（1683 年），由于台湾收复，朝廷对长期实行的“海禁”有所放松。不过与英吉利等国的贸易，仍然是“民间散商交易”为主的状态。为此英使提出正式贸易要求。当时英国是对华贸易的主要国家，通过东印度公司，年交易额平均 1000 万两白银，相当大清朝每年课征、田赋收入的四分之一。[14]

要求之二，增开通商口岸。英使提出在北京、天津、宁波、珠山（舟山）设通商口岸，改变只限澳门一处交易的状况。当时英国或其他国家来华贸易，很大一部分没有纳入清朝政府的管理之内，外国偷泊的商船与沿海商民进行所谓“随处岸泊，就地易货”。[15]无疑这是一种“走私”贸易，不仅不便利来华贸易者，也减少大清政府的贸易税收，只能有利于地方腐败官吏从中敲诈勒索。

要求之三，在广东、福建、浙江沿海，“租借岛屿或一小块地方”，供英商居住与屯货。

要求之四，为改变和减少英商对华交易逆差，“请求减、免货物入口关税”和“船泊税”。

要求之五，欧洲传教士来华传教自由。

要求之六，借口方便贸易，请求于粤海关之外，增设缴税海关。

对于英使提出的要求，乾隆皇帝于使团自热河返回北京途中，和英使团离北京前夕，两次以颁给英王敕谕的形式作出驳斥。针对

提出的派人留京贸易和增开通商口岸的要求，敕谕指出“与天朝体制不合，断不可行”[16]。对于租借土地，则严正指出，“天朝尺寸皆归版籍。疆址森然，即岛屿沙洲，亦必划界分疆，各自专属”，“此事尤不便准行”[17]。对于要求减免英国商品税以及自由传教，乾隆皇帝也概不让步，坚持“照例公平抽收，与别国一体办理”；“任听夷人传教，尤属不可”[18]。

从乾隆皇帝在热河发出的两道长篇“敕谕”，可见：

第一，英使的要求全部被拒绝。“敕谕”措词虽然温婉，高宗两次说明英王、国会“未能深悉天朝体制”，力求冲淡因拒绝要求给对方带来的不快。真正维护了大清朝的领土主权和国家尊严。

第二，清帝对商品经济、世界贸易、主权国家间的外事往来，对外关系等一系列问题均不理解，表现出以自给自足自然经济为特征的封建内陆、封闭型国家的社会观念。

第三，清帝因长期自我封闭，闭目塞听，形成对外事务无知无识，妄自尊大的闭关锁国心态，以及对主权国家的使臣也不切实际地视为“贡使入朝”，“天朝统驭万国”。

三、英国使团馈赠的礼品

英国远隔重洋，遣使专程祝寿，希望对英国敞开封闭的国门。礼品的选择以新奇为标准，借以显示英国的发达、强大，引起中国皇帝的欢欣和重视，从而实现目的，加速资本原始积累进程，改变对华贸易逆差地位。

英使带来的600箱礼物，多达数十个品类。从现藏《内务府档案》和《内阁上谕档案》中，看到“红毛英吉利国王谨进天朝大皇帝贡件清单”，开列礼品名细为：

1　布蜡尼大利翁。（品名系音译。从记述内容推测，是有关天文、地理最新研究成果的模拟演示器。由英国人赫兹尔制造。“因图架及座高大，洋船不能整件装载，拆散分开，装成十五箱”）。[19]

2　天象仪。

3　天体运行演示仪。

4　大型地球仪。

5　水文、地理、气象、测量、里程计算、演译仪器11件。

6　气象、气温、风向、风力仪器、仪表及金属支架和百叶箱木构架。

7　巧益架子。(根据记录描述,可知是单杆、双杆、跳马、鞍马、吊环和室内身体锻炼器械)。

8　沙发转椅。

9　"陂刺的纳"。(根据记载及性能描述,可能是太阳能聚焦镜炉)。

10　胶版印制图像、图画多种。有英王全家像;有中世纪英格兰城市、乡村、城堡、别墅风光图画;有古代欧洲著名战事图画;各种海船图片和海洋风光图画。

11　玻璃镶金彩吊灯一对。

12　金线织壁毯、壁挂"数疋"。

13　大地毯"数疋"。

14　金色全套马具。

15　黄色轿车两部(一为夏用"凉车";一为冬用"暖车"。)

16　狩猎和军事器械若干("长、短自来火枪","刀、剑等项")。

17　铜质"西瓜炮数门"(不是以燃放火药推出铁砂的散弹炮,而是推出炮弹,以爆炸达到杀伤和破坏作用的现代火炮)。

18　金质和银质的"战舰模型"。

19　铜质、铁质、钢质的量具、刃具和小型机械。

20　各种西洋丝织、毛织、棉织物。(有多罗尼羽纱、羽呢、呢绒、毛毯、细洋布等等)。

据和珅的儿子丰绅殷德传达英国使团随员巴尔斯的话,"礼品单"中第1、2、3、4、6、9、11等件,"安装亦须时日,运到热河装毕,

将过万寿之期。而西瓜炮亦很沉重。"于是皇上令"英吉利匠役四名，在圆明园正大光明殿澹怀堂安装"，其余礼品"送往热河祝寿"[20]。

祝寿礼品，足以显示英国产业革命以后，科学技术成就和工业生产水平；表明英国对大清帝国的重视，以致不怕泄露最新科技情报。

礼品中的编织物大量使用金线；轿车与马具一律使用明黄颜色；馈赠大批科技仪器、模型和新奇工具、机械等等，都说明英国人从西洋传教士白晋、张诚、闵明我、刘应等人著作里，了解到中国皇帝专用的色彩和喜欢的物品。但是，英国人并不知道乾隆皇帝不同于康熙，对自然科学与现代技术不感兴趣，由于皇帝本人不能摆脱以天朝自居的重负，对礼品中的仪器、仪表、机械、兵器、军舰模型，并不重视，也没有让人研究利用，只作为显示"天朝威仪"的摆设。大型仪器安设于圆明园的澹怀堂、远瀛观、大水法、淳化轩；小型仪器安设于紫禁城宁寿宫；暖车安放静宜园；凉车安放清漪园；图画收藏于内务府造办处；4 门西瓜炮收藏于内务府武备院。其余地毯、编织物、千里眼(望远镜)、自来火枪、金银枪、连火枪、小火枪、大火枪、夜望镜、无柄红毛刀、马鞍等，收藏于热河万壑松风、芳园居[21]。

乾隆皇帝虽然没有研究这些礼品，却本着"薄来厚往，用示怀柔"的一贯思想，向使臣、向英王"加赐彩缎罗绮文玩器具诸珍"，而且"赐予优倍于他国"。[22]

四. 英使访华带来的信息

马戛尔尼访华之前，英国已经 5 次遣使访华，均遭失败。特别是乾隆五十二年(1787 年)凯恩卡特访华，竟以舟覆大洋的悲剧而告终。在马戛尔尼访华 23 年之后的嘉庆二十一年(1816 年)，阿美士德再次访华，仍是无功而返。英国人不远数万里，不避风险，不计

荣辱，连续遣使中国，在时间上着意选择，态度也颇谦恭。这一事实本身即是一个值得注意的信号。

在英国方面，伴随新生的资本主义制度在欧美相继出现，以科学技术和工业生产为后盾的海上强国英吉利，为开辟世界市场，取代荷兰、西班牙、葡萄牙，攫取海上霸权，赢得经济利益，正在不遗余力。他们已经把视线从欧洲转向亚洲，从印度投向中国。马戛尔尼访华的失败是相对的，使团取得了"要求"以外的成功。他们在沮丧的归途中，要求在南中国海出境，于是走运河横穿中国大陆。由于陪同官员和沿途地方官员的腐败，放松了对使团的监控，他们了解到中国的国情、民情和军事虚实。随团武官本生，特别注意观察清军的士气、装备、队列编制；目测和记录了包括古北口、天津要塞在内的沿途地理、地形、地物、山岳、水道等等[③]。

同时，为了在英、中关系恶化，中断贸易时能够掌握茶、丝生产技术，改变对华茶、丝依赖，使团随员安德逊特别注意搜集"茶树移栽技术"；随员了维提在宁波、定海等地购买了大批"茶、乌臼、漆树苗"，参观并搜集了"养蚕和缫丝作业技术"，获取了大量"商业情报"和"茶、丝生产技术情报"。另外，还搜集到英国在其它领域缺乏的"生产技术资料"和"商贩、买办心理分析"[④]。

在中国方面，顺治与康熙前期，清帝的主要精力在于统一国内的战争、稳定占领区和恢复国力。康熙中期之后，历经雍正、乾隆、嘉庆三朝，长达一个多世纪，应该是放眼世界，调整自身，学习先进，弃旧图新的关键时代。这一时期国内推行的民族政策是成功的，康熙对自然科学和生产技术的态度开了一个好头。不过仅停留于自身学习兴趣而已，缺乏冲破传统，全面提倡和推广应用的决策。而雍正、乾隆、嘉庆三朝实行有过于明代的闭关锁国政策，忽视以科学技术和工业生产为实力的综合国力的提高，使清帝国落伍于世界发展潮流，从而失掉了在未来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的发展契机。

面对18世纪世界殖民主义扩张、掠夺时代，经济贸易只能是以两种形式出现：不是互惠贸易，以国力强盛为保证；便是经济劫掠，弱肉强食；国与国之间的接触是不可避免的。而且经济掠夺与主权、领土侵犯是并行的。固守“祖宗家法”，不思变革，盛世过后，直至道光及以后遭受来自英、法、美、俄、日等国的侵略则是难以避免的。中华民族这一惨痛历史教训，不仅归咎于封建皇帝的个人素养，也集中地反映了一个封闭型社会的整体保守观念。

注释：

④⑤⑪⑯⑱⑳：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档案》乾隆五十八年五月十一日、八月初八日、八月十四日、九月初三日、八月二十一日；参见许玄凤《1793年英使马戛尔尼来华考》页24。

①⑦⑫⑱：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上谕内阁档案》乾隆五十八年八月初一日、八月十一日、八月十二日、八月二十一日。

②：北京故宫博物院、一史馆藏《宫中档案》乾隆五十八年八月初九日、八月二十三日、二十四日。

③⑥⑧⑨⑩：《乾隆起居注册》乾隆五十八年八月初六日、十三日、初十日、十一日、十二日。

⑭⑮：夏燮《中西纪事》卷3“互市档案”第7、第10。

⑰⑲㉑㉒：一史馆藏《内务府档案》乾隆五十八年八月初四日、八月初七日。

㉓㉔：〔法〕阿兰·佩雷菲特著《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第57章、第31章、第13章。

咸丰皇帝热河纪略

周晓梅

避暑山庄是一部清史的百科全书，通过它，可以窥见一个王朝的兴衰。避暑山庄已经历295年的风吹雨打，它曾沐浴在"康乾盛世"的光环中，聆听康熙（玄烨）帝"独在遐陬理外疆"的诗句，也曾随着乾隆（弘历）帝的指点，描绘"车书恒此会遐方"的宏图。然而，避暑山庄留给人的绝不仅仅是盛世的光环，令人刻骨铭心，永志不忘的还有那使中华民族蒙受耻辱的一幕。

英法入侵 皇帝逃难

清代前期和中期，处在中国封建社会的末期，经历了康乾盛世，我国的农业、手工业和商品经济的发展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封建专制体制逐渐严密，国力强大，版图辽阔巩固，达到了封建王朝所能攀登的高峰。但是，与英、法等西方列强比较，则相形见绌。到1840年鸦片战争时，在外国资本主义的武装侵略下，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咸丰六年（1856年），英法侵略者为进一步打开中国的市场，攫取更大的特权利益，在沙俄和美国的支持帮助下，以"亚罗号"事件为触发点，又一次发动了新的侵华战争，即第二次鸦片战争，这对于江河日下的清王朝无异于雪上加霜。结果，对外战争失利，于咸丰八年（1858年）五月，签订了不平等的中英、中法《天津条约》。咸丰十年（1860年）六七月间，英法联军又一次把战火燃烧到京津地区。刚刚度过29岁万寿节的咸丰帝，再也没有兴致让外边戏班进宫侍候戏了。

天津失守，咸丰帝更慌了手脚，急忙令原大沽口守将僧格林沁

退守通州(北京通县),命大学士瑞麟带兵1万火速去通州设防,又钦派侍郎文俊和武备院卿,前粤海关监督恒淇去天津与英法求和。求和不成,英法联军又由天津北上,直逼通州,定于七月二十七日攻城。咸丰帝急令怡亲王载垣赶赴通州,与大学士桂良和兵部尚书穆荫一起,再次向英法求和。七月二十九日,英方派巴夏里和威妥玛到达通州与载垣等在东岳庙会谈,达成了一个协议。英法联军在协议的迷惑下,加紧了攻城的准备。咸丰帝在议和不成又怕紫禁城被攻的情况下,只好硬着头皮抵抗,于八月初三日下诏宣战。八月七日,八里桥一战清军溃败。咸丰在西郊的圆明园里,知道败局已定,顾不得几天前颁布的亲统大军与敌决战的"上谕",于八日匆忙启銮,以巡幸木兰为由,命郑亲王端华、户部尚书肃顺、军机大臣穆荫、匡源、杜翰等人护驾,带着皇后钮祜禄氏、懿贵妃和5岁的儿子载淳,从圆明园乘舆仓惶逃往热河。同时,令僧格林沁和瑞麟移师海淀;又颁给六弟恭亲王奕䜣"钦差便宜行事全权大臣"的头衔,留他与英法"督办和局[①]"。当时,奕䜣28岁。

咸丰于紧急中逃难却没有忘记到热河后生活上的享受,他为自己想的十分周到。在逃出圆明园的第二天即发出上谕:"热河行宫及一切供应,着春佑即饬该总管及地方官妥办,打扫预备,是为至要[②]"。对于安全问题,连下三道谕旨:先是令吉林、黑龙江马队1500名赴热河护驾;又将僧格林沁已调至保定的西安马队"迅速赴热河护驾,毋得迟延";再600里加急调内蒙古东三盟迅即派出蒙古官兵守护古北口[③]。不仅如此,他还为驻跸热河备足了银两。除将北京户部存银及圆明园12万两颁赏兵丁银全部运往热河外,又下令直隶布政使文谦将路经直隶的各省解京银两,全数截解热河。经过8天的奔波,咸丰于八月十六日抵达热河。路上驻跸了南石槽行宫、两间房行宫、密云县行宫、巴克什营行宫、常山峪,喀喇河屯行宫。从此,热河避暑山庄成为全国瞩目的"议和"指挥中心。

躲在热河　指挥签约

自从 1820 年 9 月 2 日(农历七月二十五日)嘉庆帝死在避暑山庄烟波致爽殿以后，直到咸丰逃难驻跸前，清朝皇帝没有光顾这座塞外最大的行宫。40 年的冷落萧疏给这座园林蒙上多年的尘封积垢，当它再次张启宫门迎来昔日主人的后裔时，给它带来的只是耻辱和心酸。

咸丰十年(1860 年)八月十六日，咸丰到达避暑山庄，住进烟波致爽殿，并于当日按祖制到松鹤斋绥成殿祖宗牌位前行礼。随后谕奕䜣："现在事机紧迫，间不容发，朕亦不为遥制，即著恭亲王等相机办理，总期和局速成和约已换，国书已递，朕即可及早回銮，镇定人心[④]"。此时英法侵略者的目的却不在签定和约。

英法侵略者攻占圆明园后，法军司令孟托邦函告法国外务大臣："予命法国委员注意，先取在艺术及考古上最有价值之物品。予行将以法国极罕见之物由阁下以奉献皇帝陛下(拿破仑第三)而藏之于法国博物院[⑤]。"疯狂的劫掠仍不能使侵略者满足，他们要给清政府留下"赫然严厉"的深刻印象，并销毁他们劫掠的罪证，竟决意要焚毁这座举世闻名的园林建筑和中外罕有的艺术宝库。"只有焚毁圆明园一法，最为可行，……至于此举足以使中国及其皇帝产生极大的震动，余尚有理由，圆明园乃是清帝所最宠爱的行宫。如焚毁足以稍戢其骄佚。今宫中宝物既已荡然无存，大军所到，非在虏掠，乃在初肆罪恶者能警惕耳"[⑥]。大火燃烧了两昼夜不息。九月初二日，咸丰在避暑山庄接到圆明园被焚的奏报。奕䜣和躲在热河的咸丰已被侵略者的气势汹汹所吓倒。奕䜣觉得议和已无任何希望，只能答应他们的全部要求。咸丰在将议和不力的僧格林沁、瑞麟等官员革去爵职、官职，以示惩儆的同时，又害怕英法联军以同样的方式对待紫禁城皇宫，便一再催恭亲王"迅即入城，与该夷将本年所议续约画押盖印，并将八年天津和约互换，令其退出京

城，再商定驻京章程，方为妥善。[7]"九月初二日，咸丰在避暑山庄接到圆明园被焚的奏报。九月初三日，英使额尔金又向奕䜣发出最后通牒。内容是：给英国的30万两恤银必须在签约前交付；在签订续增条约的同时，交换天津条约批准书，并限于九月初七日上午十时以前用书面答复。否则，英军就要夺取北京城内的皇宫，并将紫禁城全部烧毁。面对最后通牒，为了保全紫禁城，清军打开了安定门。昏庸无能的清政府，在城内本来拥有10万八旗、绿营及城外各省援兵近12万的优势情况下，却在兵力不足2万的英法联军面前，步步妥协退让。九月初六日，咸丰寄出密谕："该夷狂悖情形，实堪发指，惟业已入城，一经驳斥，必将决裂，只可委曲将就，以期保全大局。该夷既订期初十日换约，计谕旨到时，和约已换。换约后如何情形，务即迅速驰奏[8]。"

此外，由于太平天国在南方的活动，使本已匮乏的国库出现亏空，临时调集的八旗月饷和援兵口粮筹办无术。无奈咸丰只好调用密云县收存的僧格林沁粮台饷银18.9万两，归热河古北口粮台，以资接济。[9]"这更加重了清政府的后顾之忧。为了尽快摆脱内忧外患，咸丰和奕䜣完全接受了英国提出的条件，定于九月初十日换约，又因英方演习礼仪，推至九月十一日。

咸丰十年(1860年)九月十一日，奕䜣率领大学士贾桢、周祖培、尚书赵光、陈恩孚、侍郎潘曾莹、朱晋等人，在护卫和善扑营兵丁各十几名的保护下入城，在礼部大堂设宴。日午，额尔金、巴夏里等人乘八人抬大轿，鼓乐前导，自安定门入城，双方签订了《中英北京条约》，除了全部承认《天津条约》所订条款之外，又增加了公使常驻北京，赔款各增至800万两，将九龙司割让给英国。第二天，仍在礼部大堂设宴，以同样的方式与法国公使葛罗签订了《中法北京条约》。恭亲王在向咸丰帝奏报签约的同时，"自请议处"。躲在承德避暑山庄的咸丰帝认为："恭亲王办理抚局，本属不易，朕亦深谅苦衷，自请处分之处，著毋庸议[10]。"中英换约后，还有一个棘手的

问题等着咸丰解决，即北京条约中赔款白银800万两，先期付予英方100万两如何筹措。咸丰指示于宗人府所存万年吉地(陵寝)工程银两拨给40万，其余60万即饬令附近省分凑拨。如果限期内不能凑齐，就由内库先行垫拨。现避暑山庄烟波致爽殿及博物馆里陈列着的当年咸丰御笔朱红的“准”字奏折复制件，正是这段屈辱的历史的见证。

在中英、中法《北京条约》签订后，俄国公使、御前侍从少将伊格那提耶夫借调停战争有功，立即提出就俄国事务重开谈判的问题。这与咸丰八年五月(1858年)沙俄趁清政府与英法联军交战失利之际，强迫黑龙江将军签订《中俄瑷珲条约》一样，俄国没动用一兵一卒，一举侵吞了黑龙江以北60多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还强行规定乌苏里江以东的我国领土为中俄共管。但事情并未到此结束，沙皇俄国还有更大的野心。当伊格那提耶夫向清政府提出准予任命全权大臣，以便会商有关俄国的事务时，恭亲王即答复说，公使的愿望他早已得知，已让刑部尚书瑞和、侍郎麟魁，成琦等人尽快办理此事，并安排与俄国使节见面的日期。原来，在中英交战之时，恭亲王受到俄国使节的保护才安全进入北京城内。所以，对俄国抱有感激之情。咸丰对在中国与英法谈判时，俄国极力说合的态度是：“俄酋既愿从中说合，不必拒绝，设能如其所言，于抚局不无裨益[10]”。10月29日，恭亲王前往使馆拜会了伊格那提耶夫，就他帮助中国与联军议和一事，转达清帝的谢忱，并表示歉意说，因纷繁事务的羁绊，致使他未能早日拜访公使。第二天，伊格那提耶夫对恭亲王进行了回拜，双方议定于11月2日下午二时在俄国公使馆进行换约。这一天，中俄双方参与谈判的全权大臣们都来到俄国公使馆。不同寻常的交接仪式特别隆重。中方大臣瑞常将一个黄缎包裹的小匣高举过头，走下轿来。他这样一直进到使团的内室，郑重其事地把小匣递给伊格那提耶夫。封藏在小匣内的是新签订的条约和咸丰的上谕。上谕说：“恭亲王奕䜣等已将俄国政府拟

定之条约十五款开单呈览。瑞常等受恭亲王之命，会同俄国公使伊格那提耶夫将军，逐层商酌定议，尚属妥协，即著照所议办理[12]。”11 月 8 日，咸丰在热河又颁发谕旨：“事势至此，不得不委曲将就，免致狼狈为奸[13]。”11 月 14 日奕䜣在《中俄北京条约》上签字。从而又使中国丧失了黑龙江以北 60 多万平方公里及乌苏里江以东 40 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还增辟新疆的喀什噶尔为通商地点，准许多处免税自由贸易，等等。《中俄北京条约》的签定不仅割去了 100 多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而且还强行划定了中俄西部边界的走向，为沙俄进一步割占中国西北大片领土制造了条约根据。连俄国人自己也承认：“如果仅仅根据中国大学士桂良于 1858 年告知普提雅走伯爵的清帝的上谕，那么我们对这片土地实际上是根本无权过问的。[14]”

就这样，沙俄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以所谓“调停人”的面目出现，趁火打劫，要挟勒索，并以武力相威胁，再加上腐朽腐败的清政府的软弱无能，沙俄轻而易举地侵占了大片中国领土。恩格斯曾指出：俄国“从中国夺取了一块大小等于法德两国面积的领土和一条同多瑙河一样长的河流。[15]”人们不会忘记，从 1840 年以后，在帝国主义的侵华史上，沙俄是侵占中国领土最多的国家。而这被迫同意签订条约的“准”字也是咸丰从避暑山庄烟波致爽殿发出的。尽管咸丰帝的心里很清楚，他的父亲道光帝由于签订了丧失国土的《中英南京条约》，按祖制死后陵前不设功德碑，不享受郊祭之礼。但此时他顾不得身后事了。据清代官方的记载，咸丰曾将“军旅未平，民生涂炭引为己咎，于诗篇之中三致意焉[16]”。但是，这种认罪似乎来的太晚了。

对外投降　对内镇压

与对外国侵略者忍让，妥协投降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清政府对国内农民起义采取了坚决打击，残酷镇压的政策，彻底地暴露了封

建地主阶级的反动本质。咸丰在避暑山庄期间，签发的最多的御旨就是关于镇压太平天国捻军起义的。

咸丰十一年(1861 年)四月中旬，咸丰签发了一道谕旨，特别奖赏镇压捻军有功的曾国藩、左宗棠等人。而对热河附近朝阳农民李凤奎起义则更是残酷打击，不遗余力。咸丰十一年(1861 年)三月，朝阳县腰而营子李凤奎率领蒙回民众举旗起义，攻下朝阳城后，在凤凰山的南甸子招兵买马，得到劳苦大众的热烈响应，义军由几百人迅速发展到数千人，连破热河重镇凌源，赤峰，小部人马准备进攻热河。咸丰闻讯，立即调集热河哲里木盟驻防兵数百，奉天骑兵 1100 人，黑龙江调驻古北口增援兵 1500 名及陕西等地官兵 1000 人进行东西夹击；同时，为加强热河的防范还把古北口陈放的四五千斤炮位 5 尊，三千斤以下炮位 4 尊，运至热河，听候拨用。李凤奎起义终因寡不敌众而失败。

卖国求安　恣意享乐

咸丰是避暑山庄历史上一次居住时间最长的清帝。在领土被宰割，主权被攫取的国难之中，他仍然过着醉生梦死、纵情声色、恣意享乐的生活。咸丰在避暑山庄的 11 个月中，度过逃难中的中秋节，冬至节、除夕，元旦、上元节、清明节、端午节、万寿节及皇后的千秋节(皇后生日)、七月十五中元节。

皇帝的万寿节，为清宫盛大节日之一。避暑山庄曾承办过乾隆皇帝的 40 个万寿节，可咸丰的万寿节却与之有着天壤之别。悬挂在如意洲乐寿堂后抱厦外檐下的“乐寿堂”匾，是咸丰 30 岁生日的纪念。匾为木质漆地，阴刻楷体填石绿字，素净的白地及简陋的做工，似乎兆示着大清国气数已尽的国运。咸丰的生日是六月初九日。前一天，咸丰在福寿园赐王公大臣、贝勒、贝子等食品。万寿节当日，咸丰派遣官员祭太庙后殿，祭清代各陵及东岳庙、城隍庙之后，便来到了松鹤斋绥成殿，向康熙、雍正、乾隆、嘉庆、道光的牌位

行礼，而后，来到澹泊敬诚殿，接受皇子及文武百官的庆贺，随后在福寿园赐宴。对于要求赴热河为其上贺表的外国使节，留在京师照例筵宴。凡赴京的科尔沁台吉、公主子孙及在热河当差的内扎萨克蒙古王公，均免予颁赏。这是清帝万寿节中很罕见的一次。

咸丰万寿庆典的一项主要内容是演戏，而听戏也是咸丰在山庄的主要娱乐活动。咸丰喜欢皮黄（京剧）。咸丰十年（1860 年）十一月初一日，咸丰下了一道谕旨，将升平署内学（太监充任艺人），外学（民籍教习，学生组成的戏班子）分三拨从北京调至避暑山庄[17]。在烟波致爽、如意洲一片云、勤政殿演戏。咸丰十一年二月初一日，咸丰朱笔亲自点了《荆钗记》、《长生殿》、《占花魁》、《寻亲记》等 10 本，要求夏天排出来随时听调。有时他还亲自谱曲，由内学演奏这些曲目，三月二十一日，“烟波致爽中和乐伺候吹打御制清曲秋江上月、海宇升平、新水令。[18]”五月初五日端午节，咸丰在烟波致爽听花唱（化妆唱），剧目是“青目”、“追信”、“探监法场”、“拾镯”、“南天门”、“尼姑思凡”、“尼姑庵”等。有时从下午 2 点（午正）一直听到晚上 10 点（戌初）。这种极耳目之娱穷声色之好的侈糜生活，一直延续到咸丰病入膏肓之时。七月，《升平署日记档》载：“七月十五日，如意洲伺候。”七月十七日寅初，御膳房伺候。上传冰糖煨燕窝，未及用，卯时崩[19]。从此结束了他短暂而悲哀的帝王生涯，成为历史上第二位（也是最后一位）死在承德避暑山庄的清朝皇帝。

咸丰死后，清政府各派政治势力之间为争夺最高统治权的斗争日趋激烈，并且从暗斗转为明争。最后，由叶赫那拉氏（慈禧）勾结恭亲王奕䜣等人，在避暑山庄策划并导演了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辛酉政变”。

注释：

①《清文宗实录》卷 327，咸丰十年八月上。

②文物出版社《承德避暑山庄》第 223 页。

③④《清文宗实录》卷 328，咸丰十年八月中。

⑤自《圆明园》园史简介。

⑥觉明著《圆明园罹劫七十年纪念述闻》载 1930 年 12 月《大公报》文学副刊第 151 期。

⑦《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六十五。

⑧⑨⑪《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六十六。

⑩《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六十七。

⑫《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六十八。

⑬《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九十八。

⑭见《一八六 0 年北京条约》

⑮《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 37 页《俄国在远东的成功》

⑯《清文宗实录》卷 356，咸丰十一年七月

⑰⑱《清升平署存档事例漫钞》、《咸丰十年、十一年恩赏日记档》

⑲《满清外史》。

辛酉政变始末

姜相顺　王国华

辛酉政变，发生在咸丰十一年(1861年)，时距清朝第7代皇帝咸丰(奕詝)病死于热河(承德)仅73天。幼帝生母慈禧太后恃子而骄，不甘心大权旁落，对"目无君上"的顾命肃顺等八大臣"擅自主持"朝政不满，于是勾结咸丰帝六弟恭亲王奕䜣，以及北京一带的武装力量胜保等人精心策划，周密布置，于农历九月三十日发生政变，将咸丰帝死前委任"赞襄政务"的户部尚书肃顺等八大臣一网打尽。肃顺处斩，载垣、端华赐令自尽，余皆被革职，废除遗命的"顾命"制度，继而以"垂帘听政"制度代之，慈禧太后从遗命赞襄一切政务的八大臣手中夺取了清朝最高统治权力。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北京政变。咸丰十一年(1861年)按干支计算为辛酉，所以又称为"辛酉政变"[①]。

热河较量

咸丰十年(1860年)，正值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英、法组成了新的侵华远征军进攻天津，又犯通州，向京师进逼。昏庸腐朽的咸丰皇帝被列强枪炮吓得失魂落魄，京、津一带数倍于敌的劲旅反击外国侵略者失败后，他不顾清宫中臣僚的反对，在肃顺一伙的怂恿下，临时指令六弟恭亲王奕䜣留守北京。于同年八月八日带领皇后钮祜禄氏(慈安)、宠妃叶赫那拉氏(慈禧)等13名妃嫔以及5岁的幼子载淳等以"秋狝木兰"为名，作为"亲征"之举仓惶离开北京，于农历八月十六日逃往热河避暑山庄。

咸丰20岁即位，从他父亲手中接过来的就是一个无法收拾的

烂摊子。在他即位当时又爆发了震动全国的太平天国运动，官军屡败，弄得他精疲力竭，终日忧思，喜怒无常。接着又爆发了第二次鸦片战争，随后侵略军打进了北京，火烧圆明园。日甚一日的内忧外患，使他"宵旰焦劳"寝食难安，终于落到"思虑伤神，渐形气弱"的地步。再加上他是深宫内苑绮罗丛中娇养的皇家"贵"子，体质特弱，难抗热河冬季的严寒。在肃顺等人的怂恿下过于声色之中，迷恋制曲、排戏、看戏，恣意享乐。终使他染病在身。到热河半年余，旧疾未除，六月间又患腹泻。六月九日是他30岁的寿诞之日，更要耗费一番，不得不勉强支撑接受臣子们的朝贺，并赐王公大臣宴。但欢庆未终，咸丰帝就支撑不住，由太监扶掖还寝宫。从此，咸丰皇帝就缠绵病榻卧床不起。虽然召来名医高手，无奈病入膏肓，就是灵丹妙药也无济于事了。到七月十六日半夜时分咸丰帝"病疾大渐"，他深知这是回光返照。临危的咸丰帝，考虑皇位问题，由谁辅佐？慈安忠厚无能支撑；慈禧虽能，野心勃勃，江山难保。最后打定主意，召集了随他逃亡的心腹近臣，即3个御前大臣和5个军机大臣入寝宫，令其承写朱谕、起草遗诏，立他年仅6岁的唯一长子载淳为皇太子，并且任命这位大臣为赞襄政务大臣，嘱托他们"尽心辅弼，赞襄一切政务"[2]。

这位顾命王大臣是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肃顺和军机大臣景寿、穆荫、匡源、杜翰、焦佑瀛，其中掌握实权的是两位亲王和一位协办大学士，肃顺是其中的主宰。

同时规定"御赏"、"同道堂"两印为以后下达诏谕的"符信"，"御赏"章为印起，"同道堂"章为印讫[3]。

第二天咸丰帝驾崩，8位顾命大臣"按着遗命"辅载淳即位，定年号为"祺祥"[4]，同时把朝政抓在手里。

当时政治中心，遂歧为二：一在热河以肃顺为中心，一在北京以恭亲王奕䜣为中心。而肃顺不以恭亲王为意，以为载淳帝为其所拥立掌握便可放心从事。

而野心勃勃的慈禧面对大权旁落八大臣之手，更不甘心。尤其是对咸丰帝临终前授命八大臣"辅弼赞襄一切政务"，同时规定"御赏"、"同道堂"两印为以后下达诏谕的符信的决定非常气愤。

"御赏"、"同道堂"两印，原本为咸丰皇帝随身携带的私章。在清代皇帝中盛刻这类私用小玺，一般不用于政治活动，但在特定场合也有使用。真正用于颁发上谕和敕令的只有咸丰遗留的"御赏"和"同道堂"二枚印章。咸丰帝生前把它作为皇帝权力的象征，赐于皇后钮祜禄氏和独生儿子载淳，目的在于防止皇权落入大臣和妃嫔之手。

6岁的载淳继承了皇位，对此慈禧并未满足，因遗诏中规定八大臣"赞襄政务"，实权控制在肃顺等八大臣之手。"御赏"和"同道堂"印由儿子和慈安掌握，唯独她无干预权，野心勃勃的慈禧怎能善罢干休呢！于是一场你死我活，夺权与反夺权的斗争正在孕育着。

七月十七日咸丰帝死后的当天，肃顺等以咸丰帝授予他们的合法权力，以"赞襄政务王大臣"的名义，将"御赏"、"同道堂"印章使用的办法同时咨文内阁和地方各衙门，接着又给内阁发了咨文。咨文的内容是：赞襄政务王大臣交内阁：本日，本王大臣等拟旨缮递后，请皇太后、皇上钤用图章发下，上系"御赏"二字，下系"同道堂"三字，以为符信。希贵衙门于发抄后，敬谨收存，按月恭缴本处。

从咨文内容可知赞襄政务王大臣负责处理一切军政事务，起着襄助皇帝执政的作用。为显示皇帝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凡发至内阁和北京内外各衙门的咨文，必须钤用皇太后和皇帝掌管的"御赏"、"同道堂"两印章才能有效。"御赏"章由皇太后钮钴禄氏慈安太后掌管，"同道堂"由皇帝载淳掌管。而由贵妃一跃成为皇太后的慈禧是无权过问两印章的管理和使用权的，也就是说慈禧没有干预国家政事的权力。

这对蓄谋已久，咸丰帝死后想篡权的慈禧来说，是个政治上的

极大打击。但她并不泄气，年仅27岁的慈禧心中暗想：要想夺得政权，唯一的办法，只有先利用幼帝之母的有利条件巧取"同道堂"。

从咸丰帝死的七月十七日起至九月二十三日离开热河回京止的66天中，除暗斗外，慈禧公开与肃顺斗了三个回合。

第一回合是慈禧尊为皇太后问题。幼主继位后，按清朝家法，母以子贵，懿贵太妃应尊为皇太后。但肃顺硬是不准，依然把她与其他妃嫔一样对待，视为"太妃"。当皇太后(钮祜禄氏)指正时，肃顺借故拖延一天，有意把两宫太后分出高低、先后。第一个回合，肃顺胜了。两宫并尊，却非同日，懿贵妃毕竟晚了一日，即七月十八日才得封为太后。又因为她住在避暑山庄烟波致爽殿的西暖阁，很自然地被称为"西太后"。这样，住在东暖阁的另一位太后就是"东太后"。至咸丰十一年(1861年)九月一日，东太后上徽号称"母后皇太后"、"慈安皇太后"，"西太后"上徽号称"圣母皇太后"、"慈禧皇太后"。

肃顺对两宫太后互有扬抑(这也是他最后被杀的上谕中的罪状之一)。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他知道慈安太后秉性忠厚、胸无大志、不懂朝政、尽可以恭敬，不足为虑。因之每每对慈安太后表现出敬重之至，保持君臣之礼。对慈禧太后则不同，在肃顺看来，她是非常像宋朝的章献刘皇后那样要大权独揽的，对她不能等闲视之，每欲裁抑。在慈禧看来，这是肃顺故意和她过不去。肃顺对慈禧一直是严加防范，对于西宫太后与什么人接触、说什么，极为注意，甚至在宫里安插奸细。

按清朝的祖制，太后无过问国事即所谓"听政"的制度。因此，当西太后提出钤印作为谕旨曾经过目的凭证时，肃顺表示"两宫太后只能钤印，不能更易谕旨的内容，而且章奏不先呈览"。慈禧太后坚持章奏呈览，以及用御赐两印代替朱笔，可谓针锋相对、互不相让。因此，辅政大臣首次发给内阁大臣的咨文也就是七月十七日的咨文，用的是白片。该咨文注曰："今因用印不及，先行白片，后补印

文可也，须至咨者”。无印章的咨文至今保存，原因就在慈禧拒不钤印。后来，辅政大臣只得让步妥协，决定一切章奏送皇太后阅览，谕旨由辅政大臣拟进，皇太后阅后钤印。所有应用朱笔处，均以印章代之。这样慈禧终于夺得了第二个回合的胜利。

咸丰十一年（1861 年）八月六日，山东道监察御史董元醇递折，疏请皇太后权理朝政并另简亲王辅政。肃顺等人对董元醇的奏折十分恼火，于咸丰十一年（1861）八月十一日便拟旨痛驳："我朝圣圣相继，向无皇太后垂帘听政之礼……所奏尤不可行"[5]。肃顺等人坚持皇太后钤印发下此旨。慈禧对此十分恼火，拒不钤印，折旨俱留中不发。奏折"留中"本是君上的一种偶而为之的特权。肃顺等人目中无两宫太后竟逼要"留中"的折子。年轻多谋的慈禧太后对此更不相让，于是慈禧立即召见辅政八大臣，定要辅政大臣按照她的意志拟旨方可下达。而肃顺则当面驳斥慈禧"奉命赞襄幼主，不能听命太后。请太后看折，亦系多余之事"[6]。这是借皇帝之口，训斥太后。接着，辅政大臣之一的杜翰更是直接顶撞："有若听信人言，臣不能奉命"[7]。

争执良久，慈禧仍执意不肯钤印。到次日晨，因见驳斥董元醇的拟旨仍未用印发下，肃顺等人最后干脆"搁车"，决定停止办事（指上谕、奏折搁着不看），以示抗议。到了中午，西太后担心若不钤印发旨，事情可能有变，于己不利，于是采取以退为进的手法，盖印发旨，同意批驳董元醇。慈禧暂时让了步，第三个回合，辅政八大臣暂时胜利了。

但事情并没有完结。慈禧对肃顺咄咄逼人之势，深怀其忧。她明白，如果不能取得政治上的权力，就只能听凭顾命大臣一手遮天了。这样发展下去，肃顺一伙必"挟天子以令诸侯"，幼帝在他们肘腋之下唯有俯首听命而已。依慈禧之地位，她不甘心大权旁落，受制于人。慈禧认识到，要收回权柄，必须除掉肃顺等人！

这是事关重要的大事，必须求得慈安太后的同意和支持。慈禧

和慈安自从随咸丰帝逃往热河以后，慈禧面对热河行宫的形势，对慈安更加尊重。慈安当时 25 岁，慈禧 27 岁。慈安虽比她小两岁，但毕竟是皇后。按清朝家法，皇后有统辖六宫之权，位于己上。她深知慈安此时地位举足轻重，必须求得她的支持，否则不利政治上的需要。

精心密谋

慈禧在窃取同道堂印章夺得干预权后，行动仍不自由，实际上被软禁。慈安开始整天只是哭哭啼啼。经过慈禧劝说引导，才心情好转。从此，二人联合起来共同对付肃顺等人。在当时情况下，慈安是慈禧预谋除掉肃顺党羽的亲密伙伴，两人常常“俯巨缸面语，计议甚密”。肃顺等人虽对她们有所警惕，但未料到她们会先对咸丰帝遗命“赞襄政务”大臣开刀。

同时，慈禧曾暗中命心腹把历史上幼帝在位，太后临朝称制的故事收集整理，共 8 例作为垂帘之议的理论根据。但是，顾命大臣不管怎样跋扈专擅，地位是合法的。只有顾命辅政，并无女主垂帘之旨。慈禧认为，贸然提出垂帘的主张，可能会招致大臣的反对和不满。应该先大造舆论，争取支持，然后周密布置，才能使肃顺等人就范。否则会被反咬一口，后果不堪设想。

关键时刻，醇郡王奕譞奔丧前来热河。两太后首先召见醇郡王奕譞献策。奕譞是慈禧的人，他建议推荐奕䜣，谓此事“非恭亲王不办”。这正合慈禧之心，就决定与恭亲王联合。并命奕譞起草肃顺等人罪状诏旨，由慈安藏之内衣中。此后，奕譞以慈禧妹夫之便，随时出入宫禁，往来北京与热河串通情报。恭亲王奕䜣果然不负厚望，站到了两宫太后一边。

八月一日，恭亲王不顾载垣等人的反对，来到热河避暑山庄祭奠咸丰皇帝。据吴庆坻在《蕉廊脞录》载：“恭邸八月初一日至热河，值殷殿叩谒梓宫，伏地大恸，声彻殿陛，闻者无不下泪。祭毕，太后

召见，恭邸请与内廷偕见，不许。遂独对，一时许方出。宫灯（以“肃”字形似宫灯，指肃顺）辈颇有惧心，见帝亡之日以后，八位（指肃顺等八位赞襄政务王大臣）见面（指受慈安、慈禧召见）不过二三次，时亦甚暂。今则见面一时许，足见有自主宰”。两太后欲召见了恭亲王，虽然遭到辅政大臣的极力反对，慈禧仍然想方设法单独召见了奕䜣。双方为了各自利益达成了协议，同时密谋和策划了政变的步骤。

恭亲王所以要与没有实力的孤儿寡母联合，这是因为他们都面临“顾命”制度的威胁。“顾命”制度使慈禧大权旁落，也使恭亲王受到肃顺的排挤。而推翻“顾命”制度，女主“亲理大政”，恭亲王“辅政”，各有所得。

肃顺是咸丰帝重用的关键人物。肃顺本为郑亲王端华之弟，咸丰帝即位后，肃顺日渐倚重，久而益专。在咸丰逃亡热河以后，更是国家大事“一以委之”，可谓官运亨通。

恭亲王是清宣宗道光皇帝第六子，是咸丰帝奕䛮的六弟，精明强干，对肃顺揽权是个潜在的威胁。在咸丰帝逃亡之前的一段时间里，肃顺一伙与手握重兵的僧格林沁严重龃龉，同时与另一位手握兵权的胜保成了仇敌。特别是朝廷中反对逃亡的祁俊藻、翁心存、彭蕴章、潘祖荫等一大批文臣武将，已经形成了一支重要力量。咸丰帝逃亡热河时，命恭亲王奕䜣留守京师，受到了留京臣僚的支持。肃顺等人以为逃亡热河可以挟天子以令诸侯，却为恭亲王奕䜣扩充势力创造了有利条件。

肃顺深知京师形势对他不利。因此，肃顺趁机中伤，挑拨兄弟关系，更加重了咸丰帝与恭亲王的不和和猜疑。在《北京条约》签订以后，恭亲王等大臣多次要求咸丰帝返回京师，都被肃顺以种种理由阻挠。

更值得一提的是，咸丰皇帝临终将恭亲王摒弃于顾命大臣行列之外，加深了恭亲王与肃顺的矛盾。

咸丰帝死的当天，肃顺等人为阻止恭亲王奔丧，发出谕旨："着派睿亲王仁寿、豫亲王义道、恭亲王奕䜣，醇郡王奕譞、大学士周祖培、协办大学士尚书肃顺、尚书全庆、陈孚恩、绵森、侍郎杜翰恭理丧仪"，特别要求陈孚恩"接奉此旨即火速前来行在，豫亲王义道，恭亲王奕䜣，周祖培、全庆着在京办理一切事宜，无庸前赴行在"[8]。

肃顺等人，既不让恭亲王参与顾命；又不让奕䜣到热河奔丧，目的就是防止恭亲王与慈禧勾结、夺权。而结果恰恰相反，反倒加速了恭亲王与慈禧的联合，并引起大批重要官员对他们的不满和愤慨。

两宫太后与恭亲王于咸丰十一年八月一日在热河行宫精心密谋策划后，兵分两路，共对强敌。

慈禧根据多方情报和热河行宫错综复杂的政治局面，命奕䜣先行回京布置落实。奕䜣害怕肃顺一伙对他行刺，兼程而行，路经州县皆不轻居。恭亲王回京后，首先进行组织准备，除布置亲信分头联络人员外，自己也亲自游说。立即得到清宫内务府等重要部门的支持，得到官宦权贵如大学士周祖培、大学士桂良、兵部尚书沈兆霖，特别是军事要员胜保和僧格林沁的支持和赞同。

胜保字克斋，任兵部侍郎。在道光朝已官至内阁学士，咸丰二年(1852 年)奉召言事，降为四品京堂。太平军克武昌，又奉命驰往河南，归钦差大臣琦善差遣，后以军功官至钦差大臣。继以攻高唐之太平军不克，被遣戍新疆。咸丰六年(1856 年)召还，七年(1857 年)授副都统，帮办河南军务。八年(1858 年)复为钦差大臣，督办安徽事务。咸丰十年(1860)，因多次攻击肃顺等再罢钦差大臣，降光禄寺卿，召回京。适英法侵略军逼近京师，命胜保出战，败于八里桥，后统兵万余人，形成了京畿最雄厚的武装力量。

僧格林沁，博尔济吉特氏，蒙古科尔沁旗人，是道光皇帝遗命的顾命大臣之一，在咸丰朝亦受宠信不衰，一直掌握着清军之精

锐，担负着京津之警卫。

这两位手握重兵的军事统帅，特别是科尔沁郡王僧格林沁的向背是决定局势的关键人物和力量。他们成为拥戴慈禧和恭亲王发动政变的重要武力支柱，同时他们也是弹劾肃顺八大臣，拥护"太后垂帘"的重要代表人物。

咸丰帝死后胜保惟恐有变，明知顾命八大臣已下谕旨，不准各地统兵大臣赴热河吊丧，他还是上奏"吁恳兼程北上，叩谒梓宫"。

肃顺等八大臣甚为恼火，但他们对手握重兵的胜保不得不持慎重态度，被迫承认既成事实，于八月七日发出"寄谕"："准其前来行在，叩谒梓宫，即赴军营。"[9]。

咸丰十一年(1861)八月七日，在批准胜保到热河吊丧的同一天，肃顺等特意致函僧格林沁，主动促使他具折奏请叩谒梓宫，企图拉拢僧格林沁。以此既对胜保、奕䜣和两宫太后进行威胁，同时也可借此试探僧格林沁对赞襄政务王大臣持何种态度。而僧格林沁立即表态，他是拥护慈禧、慈安，反对载垣、肃顺等赞襄政务王大臣的。

九月二十八日，继董元醇之后，胜保又以"请皇太后亲理大政并简近支亲王辅政折"弹劾肃顺一伙。在倡导"垂帘听政"上，态度更加明朗坚定。

关键时刻胜保的长篇慷慨陈词，如晴天劈雳击在载垣、端华、肃顺等八大臣的致命处。同时，也是对身在热河行宫的两宫太后按着密谋行事的有力支持。

当时化名"樵客"之军机章京，曾与被他称为"竹翁"者进行密谋。根据其地其时错综复杂的斗争状况，他们认为"能将爷柯收回(指掌握禁军兵权)，为上策。否则早回(指慈禧、慈安等返回京师)为宜"[10]。两宫太后对此建议寻机落实，以削弱辅政大臣的权力地位。当载垣等人于九月四日以事物繁忙、要求减少他们的部分职务时，两太后立即同意了他们的请求，发出了谕旨，夺取了禁军兵柄。

这样，政变的准备基本就绪，就等回銮之后发动了。

咸丰帝 27 天丧期已过，由于肃顺等八大臣的阻挠，他的灵柩尚未运回京师。当两宫皇太后提出回銮京师时，又受到肃顺等人千方百计地阻挠。他们的目的是仍把太后与北京隔断，说"皇上冲龄，北京无备，若回銮，臣等不敢赞一辞"。西太后怒曰："倘有意外，与你无关"，并命"肃顺奉先帝梓宫而行，于九月二十三日出发，两宫太后另从间道出发，以怡、郑两亲王为扈从"。经过一番较量后，肃顺等人无法抗拒太后意旨，只得同意返京。于八月十八日以"赞襄政务"王载垣、端华、景寿、肃顺、穆荫、匡源、杜翰、焦祐瀛及仁寿等联名上奏拟请皇上"由间道先行启跸回京"折。九月二十三日起程，约在九月二十九日到达京师。

两宫太后在允准此上奏后，立即秘密与北京勾通情报，并同时命在京大学士贾桢、周祖培等再请垂帘。

慈禧所以命肃顺随灵柩后走，而让载垣、端华跟随两宫太后和小皇帝由间道先行，其目的是将 3 个要员一分为二，为防路上有变，同时便于个个击破。

一切安排就绪以后，慈禧虽精神紧张，但为了稳定局势，麻痹肃顺一伙，故装镇静，以便利用回銮的有利时机，在辅政大臣无准备的情况下，达到夺取政权的目的。她首先让妃嫔先行。妃嫔向慈禧、慈安辞行。慈禧，慈安处于十分紧张之中，是福是祸全无把握，向妃嫔们哭泣着说："若遭不测，自脱。"接着又说："吾母子，不知命在何处，尚得返京相见否？"[1]

九月二十三日，按着预定计划，咸丰帝灵柩由热河行宫启行，小皇帝在热河承德丽正门外恭送咸丰帝灵登舆。然后，即由间道先行回京。(等咸丰帝灵柩到时，小皇帝再往东华门外跪拜迎接)。慈安、慈禧与小皇帝同行，由载垣和端华护送。这样，两太后和小皇帝先期回到北京，准备迎接灵驾。所有梓宫沿途一切事宜由仁寿等办理，灵驾由肃顺护送。

九月二十九日，两宫太后回銮到北京后，一方面向诸王大臣哭诉载垣、端华、肃顺等对她们欺侮之甚，借此进一步大造反对肃顺等“赞襄政务”王大臣的舆论，争取同情，一方面立即与恭亲王密商政变事宜。

政 变 经 过

咸丰十一年（1861 年）九月三十日这一天，北京宫廷内外，刀枪林立，一场惊心动魄的政变就要发生了。慈禧宣布的第一道上谕就是在九月十八日于热河行宫时秘定由醇郡王奕譞拟的“谕内阁解赞襄政务王大臣任，并派奕䜣等商议皇太后垂帘听政事宜”折。折内列数八大臣罪状，并宣布“载垣、端华、肃顺着即解任，景寿、穆荫、匡源、杜翰、焦祐瀛着退出军机处。派恭亲王会同大学士、六部、九卿、翰、詹、科、道将伊等应得之咎，分别轻重，按律秉公具奏。至皇太后应如何垂帘之仪，着一并会议具奏。”[12]

随之，根据慈禧特旨召见恭亲王奕䜣率桂良、周祖培、文祥等大臣入朝待命。八大臣之首载垣不识时务，对此横加阻拦，不准奕䜣等人入宫待命。慈禧气愤已极，立即于同日下旨：“前因载垣、端华、肃顺等三人种种跋扈不臣，朕于热河行宫命醇郡王奕譞缮写谕旨，将载垣等三人解任。兹于本日特旨召见恭亲王，带同大学士桂良、周祖培、军机大臣户部左侍郎文祥，乃载垣等肆言不应召见外臣，擅行拦阻。其肆无忌惮，何所底止！前旨仅予解任，实不足以蔽辜。著恭亲王奕䜣、桂良、周祖培、文祥即行传旨：将载垣、端华、肃顺革去爵职拿问，交宗人府，会同大学士、九卿、翰、詹、科、道，严行议罪。”随后恭亲王奕䜣命早已布署好的侍卫，将载垣、端华逮捕，囚禁宗人府。同时又下一道谕旨：“着派睿亲王仁寿，醇郡王奕譞将肃顺即行拿问，酌派妥员押解来京，交宗人府听候议罪。”[13]

当时肃顺护送文宗梓宫正在途中。奉命捉拿肃顺的睿亲王仁寿，醇郡王奕譞等人马将肃顺包围于卧室之中。他闭门咆哮，目无

君上。兵丁破门而入，将肃顺绑缚，亦送宗人府监禁。这时已当阶下囚的肃顺怒目呵斥端华和载垣："若早从吾言，何至有今日！"而载垣咎肃顺曰："吾罪皆听汝言成之也"。载垣、端华、肃顺等遗命的"赞襄政务"八大臣，只辅政了 73 天，就一败涂地。

继董元醇、胜保之后，也是在三十日这一天，在慈禧的授意下，大学士贾桢、户部尚书周祖培、刑部尚书沈兆霖等联名上奏"为事关国家大计请皇太后亲操政权以振纲纪"，急倡太后垂帘。接着借古讲今为慈禧垂帘找理论根据。

政变的第二天，慈禧对这次政变中立下汗马功劳者和拥护两宫者一律加官进爵。这一天第一道上谕首推恭亲王奕䜣，授为议政王、在军机上行走；又一道上谕是宗人府令着恭亲王补授。十月初二日又继续赏爵恭亲王奕䜣补授总管内务府大臣，同日又上谕授恭亲王奕䜣管理宗人府银库等要职。

在稳定了大局，嘉奖了有功人员后，慈禧又开始对政敌肃顺等八大臣进行公开宣判。

十月六日，宣布赞襄政务王大臣罪状之后，肃顺被处斩，载垣、端华被令自尽，其余辅政大臣被撤职。

据《清室外纪》中载："肃顺之死，犬来吮其颈血，头悬数日。其同党怡、郑二王均赐自尽。怡王对其家人言身后殓葬及处分家产之事，死时穿白丝袍，郑王亦对其家人有言，但战栗不能成声。以白绸为环，下置低几，侍者扶二王登几，以帛套颈而撤其几。二王家人则环哭于旁。怡王不久气绝，郑王身肥重，帛断堕地。第二次又上始绝。宗人府之人，乘机向二王家人索贿万金，始得移尸成殓。"[19]

对肃顺之死，清宫宦官李慈铭正在家养病，听说肃顺囚车过其门前，亲视当时情景，他在日记中写道：是日肃顺弃市。肃顺白服，缚甚急，载以无帷小车、亲属无临送者"。对此薛福成的记述更为详尽："肃顺以科场、钞票两案无辜受害者尤多，都人士闻将杀肃顺，交口称快，其怨家皆驾车载酒驰赴西市观之。肃顺身肥面白，以大

丧白袍布靴仅接置牛车上，过骡马市大街，儿童欢呼曰：‘肃顺亦有今日乎?’或拾瓦砾泥土掷之。顷之，面目遂模糊，不可辨之。将行刑，肃顺肆口大骂，其悖逆之声，皆为臣子者所不忍闻。又不肯跪，刽子手以大铁柄敲之乃跪下。盖两膝已折矣。遂斩之”[15]。

慈禧太后为“稳定大局”，不仅处死了政敌肃顺、载垣、端华三人，还将景寿、穆荫、匡源、杜翰、焦祐瀛等革职。此外，受牵连致罪的还有吏部尚书陈孚恩、侍郎刘昆、黄宗汉、成琦、太仆寺少卿德克津太、侯仆京堂富绩、座钟处太监杜双奎等等。对肃顺家产于十月初五日一律予以查抄没收。

十月八日又下谕旨：“优礼嘉奖恭亲王奕䜣，摆功之后，论功行赏”。“着亲王世袭罔替”。“而该王辞谢倍力，声泪俱下。两宫皇太后未忍重拂其意，不得已姑从所请，将世袭亲王罔替之旨暂从缓议，俟朕亲政之年，再行办理[16]。同日立即谕内阁“着诸臣与恭亲王精白一心同襄郅治。”

十月九日，谕内阁上谕明确宣布：“朕奉母后皇太后、圣母皇太后懿旨，现在一切政务均蒙两宫皇太后躬亲裁决，谕令议政王军机大臣遵行，惟缮拟谕旨仍应作为朕意，宣示中外。自宜钦遵慈训，嗣后议政王军机大臣缮拟谕旨，着仍书朕字。将此通谕中外知之”[17]。

咸丰十一年(1861)十月九日，这位年仅6岁的载淳登基，以明年为同治元年，并布告天下。

东西两太后于十一月一日在紫禁城养心殿举行了垂帘大典，在东暖阁实行垂帘听政。从此，两宫临朝称制于上，拉开了慈禧统治中国48年的序幕。

注释

①《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1辑，《辛酉政变》56条。

②《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1辑，《辛酉政变》3条。

③《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1辑，《辛酉政变》6条。

④《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1辑,《辛酉政变》11条。

⑤《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1辑,《辛酉政变》23条。

⑥《越缦堂日记补》辛集卷下。

⑦ 吴庆坻《蕉廊脞录》。

⑧《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1辑,《辛酉政变》5条。

⑨《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1辑,《辛酉政变》20条。

⑩《蕉廊脞录》

⑪《越缦堂日记补》辛集卷下。

⑫《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1辑,《辛酉政变》33条。

⑬《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1辑,《辛酉政变》35条。

⑭卜兰德:《清室外纪》124页。

⑮《庸庵笔记》

⑲《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1辑,《辛酉政变》61条。

⑯⑰《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1辑,《辛酉政变》64条。

本文除已标明的公元纪年外,均为农历。

热 河 兵 变

伊利民

民国2年(1913年)1月15日夜,热河驻防满蒙古八旗官兵发动兵变。虽然规模不大,却引起不小的震动。

兵 变 经 过

民国2年1月15日夜,由驻防热河街的步兵第三营云骑尉伯胜等策动全营数百名官兵兵变。少部分官兵畏惧,与本营叛军枪战,队长胡照里被叛军枪杀,其余大部分兵分四路进攻要害目标。一路进攻设在石洞子沟的兵营武器库。因事先与武器库头目庚亮(原满洲正红旗人,曾任前锋、蓝翎长)联络好,武器库不攻即占,叛军拿走枪100枝,子弹15万发(库内还存有子弹200万发)。一路进攻电报局、电机被毁、电话中断。一路攻巡警总局、右司及财政局。一路攻都统署。顿时,枪声四起,火光冲天。第三营营房、兵备处、巡警总局同时起火。热河都统昆源在都统署指挥差弁二三十人,利用夜幕的掩护拼命抵抗,数十名巡警也不时地反击。双方互有伤亡,与此同时,昆源悬重赏弁兵调集庄头营子军队支援。卫队卫兵张思第、侯福二人骑马突围过来,奔至东部的庄头营子,拿出都统的命令,同步兵一、二营及马队的官兵速到都统署等处增援。

进攻右司的叛军即刻攻击,抢掠部分财务。攻都统署的叛军组织进攻三次,昆源亲督卫队,前线指挥,毙获叛兵多名。后短兵相接、巷内战斗异常激烈。这时,援军的马队先期赶至,步兵一、二营也快速到达,都统署内守军顿时精神大振,频频出击。在驻防一、二营、马队和巡察、卫队的联合夹击下,第三营中又有部分官兵倒戈,

向叛军开枪，叛军迅速退逃。因天色较黑，守军未行追剿。

黎明时查点战果，叛军死30名，被擒获20名，守军也有伤亡。16日早晨开始，在热河各关隘、路口军队严格盘查过往行人，军队昼夜戒严。

几天后，残余叛军在树梁庙内休息，庙内僧人密告热河都统署，都统署派兵抓捕，残军官兵见局势不利，早已各自散去，自谋生路。

兵变一二日后，热河街局势趋稳，学校开课，店铺开业，一切照常。

1月下旬，新任热河都统熊希龄到任[①]，即刻出谕告示，谕旗籍官吏，军队管带，商民人等安居乐业，免滋事端。此后几日，捕获参与兵变者10多名。其中，送往北平的人，其一为驻防军的协领。经北平当局审问，承认对其谋权、组织兵变的指控，在菜市口被斩首示众。另一人为庚亮，为正红旗满洲人，为兵营武器库头目。本人矢口否认参与兵变，后因证据不足被释放。据叛军头目之一的德亮供，当时曾有烧毁武器库、军械所、攻监狱的打算，考虑到事成之后自有用途，故未采取行动。时隔不久，热河都统下令将捉捕到参与兵变的10人全部正法。

至此，参加这次兵变的三营400多名驻防官兵，小部分官兵倒戈，30人阵亡，10人被捉捕后斩首，大部分叛军官兵逃往外地。

兵变原因

热河当时的建制是蒙汉分制、旗县并存，下辖17旗15县，是为汉、蒙、满、回多民族居住地区。自清代后期以来，外强相继侵入中国，国力日衰。此时的热河，因封建地主官僚及蒙古王公贵族的横征暴敛，各族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民国初年，热河境内形势趋于紧张，物价上涨，人民生活日益困苦，满蒙王公贵族，各级官吏及满蒙八旗官兵虑其前途生计亦惶惶不安。民国元年1月上中

旬，热河局势骤紧，军队骚动，都统昆源也掌握此情，但未采取措施。同时，热河在理教势力强大，其骨干分子韩玉奎、宫梦祥与驻防第三营云骑尉伯胜密谋起事。正月初，韩玉奎、宫梦祥被捕，1月14日押往北平。驻防第三营部分官兵觉得事已败露，从而铤而走险，发动了兵变。

民国3年(1914年)，热河驻防八旗被裁撤。几年后，参加兵变的官兵陆续返回承德。但有的也长期移居外地。如庚亮被释后流落至辽宁新宾县城，当过大车店记帐先生、教过学。民国7年(1918年)3月8日返回承德，将其家从狮子沟街迁至承德县两家乡横道子村，现其家族已繁衍到60人。一名镶黄旗 满族人，兵变后，逃匿至兴隆县农村，开始经营小买卖，后从事农业，并在那里安家落户。

注释

①《辛亥革命以后十七年职官年表》记载：1912年4月6日任熊希龄为热河都统。

——编者注

袁世凯挟制熊希龄解散国会的经过

郑廷玺

1913年5月间，我的老友、热河高等检察厅检察长汪兆彭因公来津，告我："熊希龄都统求贤若渴，尤其对矿业人才罗致更殷。我已向熊都统推荐过你，熊希望你能速去。"我立即答应，就经由北京改乘骡车驰往热河。

我到热河承德的次晨，就由汪兆彭陪我见熊，晤谈甚欢。熊约我次日下午5时去避暑山庄，在庄内的"万壑松风"参加宴会。届时，熊已先至，对我说："今日有许多外宾来此游园，约你来担任通译并检查护照。"我遵嘱办理。不久熊即正式委我为热河行政公署实业厅技士兼秘书处秘书。自此，我每日处理出入文电书札，日约400余件。公毕，则随熊划船、游于避暑山庄内的水心榭、观莲所等处，感情日深。熊就有时与我谈往事，有时谈大局，有时也略谈心事。

关于袁世凯与熊希龄的关系，据我所知，袁对熊一向器重。当徐世昌任东三省总督时，袁特荐熊为东三省盐运使。1912年3月10日，袁世凯在北京任临时大总统，由唐绍仪组阁，即以熊任财政总长。唐阁变更，袁又以熊任热河都统。

热河地区，在清初原仅设热河厅，后改承德府，设都统。民初，改特别区，仍设都统。那时热河地区与都统管辖范围，大致说来，除热河道外，还有蒙古喀喇沁、敖汉、翁牛特等旗。区划与治权，并未完全明确。熊一到热河都统任，爱上了这个区域与避暑山庄，就大

力革新。在公署组织上，首先将热河都统公署改为热河行政公署，下设秘书处、财政厅、实业厅、教育厅等，一如大行政区。熊自己舍弃都统公署旧址，迁入避暑山庄办公与居住。

避暑山庄，风景幽美，极若西湖，其中大的建筑有：万壑松风、驯鹿坡、勤政殿、戏楼、文津阁、水心榭、观莲所、澹泊敬诚、四知书屋、五代五福堂，万树园、芳园居、烟雨楼、买卖街、六合塔、铜殿、造办处、裱画处、船 坞等，都与北京宫殿相仿。熊在山庄居住时，曾派其亲信杨显曾（公署总务科长，熊的同乡）清点庄内的宝物，微闻因此颇涉“瓜田李下”之嫌。1913 年 7 月，袁调熊为国务总理，表现上似乎出于善意，暗地里却有阴谋。

听说熊希龄曾将避暑山庄的古物，例如乾隆喜用的折扇，慷公家之慨，送与姜桂题，作为私人馈赠。姜素忠于袁，暗将所得古物转交，并作密报。熊希龄曾以庄内古物，年久失所，恐有被前任经管人员偷换情事，向袁世凯报请运京，袁并未有所表示。迨熊阁组成，袁即派前司法总长许世英赴热查办避暑山庄失宝案。许世英明查暗访，搜集材料，汇成文书，呈报袁世凯，构成袁世凯挟制熊希龄破坏国会、解散国民党的圈套。

1913 年 10 月 6 日，袁世凯以军警数千人冒充“公民团”包围议会，强迫选举其为正式总统后，即着手筹划解散国民党，取消国民党籍议员之资格。

11 月 3 日上午，袁世凯约熊希龄至总统府议事。熊方到，即有外国公使来谒袁（时间抵触，当系袁预为设定）。按礼节，袁须先会外宾，然后再与僚属谈话，即嘱熊暂时退入袁之办公室内稍候。熊入内室，并无一人，只见袁办公桌上放着许世英查报避暑山庄盗宝案卷，显然袁意在于“取瑟而歌，使之闻之”。熊悄悄地略加窥探，知其关系自身，面色立变苍白，神态极为不安。外使走后，袁立传熊到外室谈话，见熊形态，便以极为关怀的口吻对熊说：“秉三，你昨晚别是因公忙没有睡好觉吧？不然，为什么面色这样不好看，精神很

显疲惫呢？"熊婉言谢过。袁随即严词厉色地说："国事不好向前推进，都因国民党凡事故意刁难掣肘，真令人痛心。我国现在是责任内阁制，如不将国民党这个障碍铲除，内阁既不能顺利执行职责，总统的权力也就不能行使了。根据目前形势，我们要把国家治好，非立即解散国民党不可，取消国民党籍的议员资格。我的意见如此，秉三，你看怎样？"熊处此情势之下，内心恐惧万分，但迫于袁的威慑，只好听命袁的摆布。袁见熊无异言，即将已准备好的大总统命令摆出，熊即俯首签署。熊签署方毕，袁立即传令已预在邻室等候的阁员们进来，顺序副署齐备。翌日，解散国民党、取消国民党籍议员资格的大总统命令即行发表。是日，大批军警出动，勒令所有在京的国民党籍议员及其家属立即离境。当时全城闹得乌烟瘴气，车站及交通路口，都充斥着议员及其家属仓惶离京的景象。

以上事实，是 1917 年秋熊希龄在他北京寓所中亲口对我说的，言下颇为伤心。

（胡蕴辉整理）

熊希龄“盗宝”案真相

肖建生

1914 年元月中旬，北京《新社会日报》、《群强报》等报刊突然登出国务总理熊希龄盗取热河行宫古玩的消息。因为事情牵涉到被人称为“第一流人才内阁”的总理，不能不令人震惊，国内外舆论为之哗然。事过一月，熊希龄辞去国务总理兼财政总长的职务。长期以来，这个案子一直蒙上神秘的色彩，其中真实内幕鲜为人知。其实，这个震惊中外的国务总理盗宝案，乃是袁世凯精心制造的一桩罕见的大冤案。它不仅直接造成“人才内阁”的垮台，而且给近代的中国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危害。

1912 年 12 月，袁世凯任命熊希龄为热河都统 1913 年 1 月下旬到职。热河首府就是现今的承德，那时是一个特别行政区，离北京 250 公里。那里有一个清朝皇帝的行宫。自康熙后，皇帝每年必往热河避暑。1860 年英法联军攻进北京，咸丰皇帝仓惶逃往热河，第二年死于行宫之中。自咸丰死后，这个行宫归热河都统管辖。热河行宫陈列了许多美术品和宝物，每一任都统到任，都以检查为名，私取行宫古玩，以贿赂北京当局。在庚子(1900 年)以前，这本是公开的秘密。民国成立后，禁例更弛，热河城中的市场上，时常有古玩出售。这原是行宫管理人员私自带出去卖的，也有被盗出去的。热河都统明知也不能禁。发展到后来，情况更为严重，在北京的不少古玩店，也大量出卖热河行宫的古玩。

熊希龄任热河都统以后，看到行宫古玩盗卖严重，加之避暑山庄房屋因年久失修，破败不堪，使一些古玩损坏十分严重，为保护这些珍贵文物起见，熊希龄连续两次呈文袁世凯，要求修整避暑山

庄和整理陈列的文物，并建议将文物装箱运往北京，作价卖给民国博物馆收藏，以保存国宝。袁世凯批准了熊希龄的建议。于是从1913年5月开始，对避暑山庄一面加以修理，一面对陈列的文物，委设清理员彻底清查，每类查毕，即行分别装箱，入库存储。其字画之伤折者，则为之裱褙。书籍之伤损者，则为之装订。镶嵌之脱落者，则为之胶漆。清理完毕之后，由北京内务府派人查验，然后陆续运往北京，共200多箱。

在修整避暑山庄和清理文物的过程中，由于经费紧张，且无从筹措，熊希龄在经袁世凯同意之后，派人从宫中的古文物中，选了10多件稍贵重的瓷器运往北京、上海变卖，得到一笔巨款，充作修整避暑山庄的经费。然而熊希龄做梦也未曾料到，正是这件事情，使袁世凯找到了陷害他的口实。

1913年7月31日，袁世凯任命熊希龄为国务总理的命令正式发表。9月1日，熊希龄内阁正式组成。9月11日，内阁名单发表。袁世凯于10月6日被国会举为正式大总统，熊希龄为中华民国正式总理。由于内阁成员熊希龄、张謇、梁启超、汪大燮等人都是当时著名的宪政专家、实业家、教育家，故熊内阁被称为"第一流人才和第一流经验的内阁"。熊内阁发表了《政府大政方针宣言》，表达了实现宪政、挽国家于危亡进而致国家于富强的强烈愿望。然而，熊希龄没有料到，袁世凯任命他为国务总理，并不是要他来把国家搞好，而是要利用他来解散国民党和国会，进而为复辟帝制铺平道路。按照《临时约法》规定，总统的命令必须要总理副署才能生效。所以，袁世凯要想解散国民党和国会，必须得到熊希龄的同意，显然，熊希龄是不会同意的。

袁世凯于是千方百计寻找熊希龄的弱点，制造罪名。而热河行宫盗宝案则成了袁世凯对熊希龄实行政治讹诈的一张王牌。

袁世凯当上正式总统后，于11月3日下午约熊希龄到总统府议事。熊希龄刚走进袁世凯的办公室，就有外国公使来见。于是，

袁世凯说："请总理在办公室稍候，我去去就来。"其实这是袁世凯事先安排好的一幕戏。总统的日程都是事先定下的，不可能出现外国公使和总理撞车的情况。

熊希龄一个人在办公室坐着，看着墙壁上的画。过了一会，他把目光落到办公桌上。桌上放着一迭案卷，他不知是什么东西，走过去随意翻了翻。不看则已，一看大惊。原来这是司法总长许世英追查热河行宫宝物被盗一案的报告和材料。报告中含沙射影地将熊希龄牵扯到盗宝案中去了。一个堂堂国务总理，盗窃行宫宝物，如果传将出去，其后果之严重，令他如临深渊。他知道自己掉进了陷井，却难以申辩。

原来，袁世凯任命他为热河都统之后，又派人到热河暗中监视他的行动。当熊希龄提出修整避暑山庄和整理行宫古玩的建议后，袁世凯表面上给予支持，背后又指使清内务大臣世续暗中监视此事，世续将熊希龄在北京、上海变卖的一些瓷器与其它被盗卖的古玩搞在一起，大约 200 多件，并列一个清单，要求袁世凯进行追查。袁世凯派许世英秘密调查此事。许世英根据袁世凯的意思，在调查报告上故意闪烁其词，暗示熊希龄有盗宝嫌疑。袁世凯接到许世英的报告后，故意压下不发。待他平定南方国民党军事力量(即二次革命)、熊希龄组阁完成、国会举他为正式大总统之后，才突然打出这张王牌。熊希龄等人当然都蒙在鼓里。

过了一会，袁世凯满脸堆笑地回来了，对熊希龄说："让总理久等了，请坐。"熊希龄诚惶诚恐地坐下。袁世凯却捧着个瓷杯漫不经心地喝他的茶，好一阵不发一言，只盯着熊希龄看。熊希龄从袁世凯寒冷的目光中，感到惊恐。好久，袁世凯才将茶杯放在桌上，要熊希龄跟他到外室谈话。两人对面坐下后，袁世凯故意看着熊希龄问："总理因公事繁忙没有睡好觉吗，脸色怎么这么难看呀？"

熊希龄默默无语。

袁世凯这时忽然脸色铁青，严词厉色地说："现在国事不好向

前推进，都因国民党刁难掣肘，总理认为怎么办好？”

熊希龄无言以对。

袁世凯恶狠狠地说：“我打算立即解散国民党。取消国民党议员证书，总理认为怎么样？”

熊希龄闻言如五雷轰顶，只怔怔地望着袁世凯，浑身冷汗淋漓。袁世凯不容熊希龄作更多的思考，便从抽屉里拿出早已写好的大总统命令，放在熊希龄面前，还把笔递到熊希龄的手上，熊希龄脸色苍白，迟疑着。

“总理签吧！”

“大总统……”

“签啊！”在袁世凯连连催促之下，熊希龄迫于无奈，终于便用发抖的手，在大总统解散国民党，取消国民党议员证书的命令上签上了名字。袁世凯接过命令，拍拍板壁，事先等在隔壁的内务总长朱启钤走过来，也签了名。

11 月 4 日，袁世凯的命令发表，当天派出军警数百人包围了国民党北京支部，次日又包围国会，连夜追缴国民党议员证书、证章 350 多件。这样一来，国会不足法定人数，只得于 11 月 13 日，由参议院议长王家襄、众议院议长汤化龙联名发出通告，宣布国会于 11 月 14 日停止议事。国会无形中解散了。12 月 15 日，袁世凯下令在居仁堂召集政治会议，会上通过了解散国会案。1914 年元月 10 日，熊希龄又副署了袁世凯解散国会的命令，使袁世凯在通向帝制的道路上迈进了一大步。虽然这个国会并不能代表全国人民的意志，但它毕竟还是辛亥革命留下的成果之一，在形式上还是号称为代表民意的立法机关。现在，袁世凯连它也要一脚踢倒，共和制度到了最危急的时期，不能不引起全国人民的极端忧虑和愤慨，而解散国会的命令是由熊内阁副署的，这就不能不遭到全国人民的遗责。

熊希龄在副署了袁世凯解散国民党和国会的命令之后，依然

隐忍屈从，没有提出辞职，主要是希望袁世凯在满足一定政治欲望之后，能够让内阁按宪章法制履行自己的职能，能够一展自己的才能，发展中国的经济和文化教育事业。但此时袁世凯已不再需要熊内阁了，于是决定公开打击熊希龄、逼迫熊希龄下台。

国会解散后几天，北京《新社会日报》、《群强报》、《神州日报》等袁世凯的御用报纸，都在头版用大量的篇幅，刊登了"熊总理为热河都统时，将前清行宫内之古瓷器、书画取去 200 余件，现被世续查明，已请律师向京师地方厅起诉"的消息，各报还发表了评论。消息说，根据京师警察厅逮捕的犯人常惠川交待，民国二年七月间，常惠川在北京万福居饭店与熊希龄的当差刘鼎卿晤面，商量出卖行宫古玩事宜。刘鼎卿自言热河宝器归他出卖，有数十箱已运上海，还有一批正待出售。随即，刘鼎卿介绍熊希龄的杨姓管帐和秩姓幕僚与常惠川接洽。当常惠川问及为何出售这么多行宫古玩时，刘鼎卿答称为熊希龄都统跑腿，为熊都统所指派。刘鼎卿还说，热河宫内出品不少，系归官卖，好者运京，次者就地抛售。熊希龄都统赴京任职，带回宝物 80 箱，卖银 30 万两，均由刘鼎卿等人经手，还说熊都统的杨秘书也卖字画、瓷器……这些材料均来自许世英有关热河盗案的调查报告。

熊希龄看到报纸公开登载他盗宝的消息，十分震惊。但他此时还不知是袁世凯的阴谋，以为报纸是受派系利用，或者是许世英对他的攻击。因为整理热河行宫古玩和出售几件瓷器作修整避暑山庄的经费，都是经过袁世凯批准的。他根本不认识刘鼎卿其人，也没有一个姓杨的管帐和姓秩幕僚。热河行宫古玩历年来被盗甚多，均在他任都统之前，与他毫无瓜葛。报纸所刊登的一切均系谣言。于是，他两次呈文袁世凯，驳斥许世英在调查报告中对他的指控，另一方面，两次致函内务总长朱启钤，令其转给京师警察厅追究其事。但京师警察厅都将熊希龄的信转交了地方检察厅，地方检察厅却没有传讯报社，而以"事体甚小，且以警厅一纸信函，未便起诉"

为由，将熊希龄的信退了回去。一个地方检察厅竟对堂堂现任国务总理如此不留情面，这使熊希龄大为震怒。于是连续两次以内阁名义发出命令，封闭《新社会日报》等报刊。这两则命令均经袁世凯批准。可奇怪的是，命令下到内务部就卡了壳。内务总长朱启钤根本就没有执行。尽管熊希龄频频催促，朱启钤依然以种种借口搪塞拖延。与此同时，报纸上关于熊希龄行宫盗宝的新闻愈来愈多，大有蔓延全国之势，使熊希龄的处境十分难堪。至此，熊希龄方才醒悟，如果没有袁世凯的背后指使，社会上是绝对不敢如此诬陷现任总理的。

熊希龄在愤慨之余，直接找袁世凯当面交涉。袁世凯一再劝慰熊希龄不要计较那些谣言，并郑重保证一定严查此事。临别之际，袁世凯拉着熊希龄的手，语调非常恳切地说："熊总理受事以来，日夜辛苦，为国家呕心沥血，国人共见。当此国家艰难之际，熊总理应以国家为重，不以区区流言为怀。总理廉洁奉公，老夫心中十分明白，你尽管放心，一定会弄个水落石出！"熊希龄见袁世凯态度如此诚恳，又对袁世凯抱有一线希望。其实，袁世凯在演戏。

恰在此时，由熊希龄秘密派出的国务院调查员朱谦明在侦察中发现，北京东珠市口天聚昌绸缎店有热河行宫的贵重物品出售，该店伙计于伟卿等人长期在热河收货。于是，朱谦明会同警察厅，前往热河将于伟卿、胡庆年、辅德富等人抓获。熊希龄接到报告，立即呈交袁世凯，要求严加审讯、彻底追查。

与此同时，天津前招商局总办朱翼辅的儿子朱作舟（与熊有亲戚关系），为替熊希龄雪不白之冤，也在秘密查访。他与天津著名盐商王竹林关系极好，因而言谈中论及此事。王竹林说："要了解盗案并非难事，我有一好友叫丁季铨，是延清堂古玩店的掌柜，中间的内幕他一定清楚。"于是王竹林悄悄前往丁季铨处，打听内情。丁季铨告诉王竹林，延清堂乃是前清内务府大臣增俊所办的古玩店。言下之意是告诉王竹林，延清堂的事不要查问。但丁季铨却同时透

露，北京城中还有三和公、永宝、访古、隐秀、韵古等古玩店，都私自出售过行宫古玩。王竹林于是将这一线索告诉了朱作舟，朱作舟又马上报告给熊希龄。熊希龄闻讯立即派人前往各古玩店秘密侦探。

有一天，侦探假装前往三和公古玩店购买地毯。挑好地毯后，侦探说吃过早饭拿钱来取货，临走时在地毯的北面悄悄留下一个记号。之后，一检查，这块地毯就是热河行宫的物品。侦探于是再往三和公古玩店询问，掌柜心虚，便断然否认。于是双方冲突起来。侦探便将情况报告了警察厅。警察厅命令将店里的3个伙计带到厅里。店里掌柜见抓去了3个伙计，便要商会保释。商会总理冯悯田劝这个掌柜，承认是出于无心收买，但这个掌柜脑子一下子没有转过弯来，于是投案承认是热河行宫的古玩。警察厅便将三和公古玩店查封了。同时，将永宝、访古、隐秀等古玩店的伙计、掌柜一起抓到警察厅。

经过审讯，有人供出其中一个姓刘的人是要犯。姓刘的是个什么人呢？原来就是丁季铨的妹夫。警察厅立即派人去捉拿刘犯，但刘犯却事先闻风逃走。刘犯还有个小孩。警察见他父亲逃走了，便将他带到警察厅。一审问，少年供出了父亲的盗宝秘密。警察不太相信，便问这少年赃物在哪里？少年说在舅舅家中。问他舅舅是谁，他回答说是延清堂古玩店的掌柜丁季铨。警察知道丁季铨还是一家银行的买办，于是派人埋伏在他家的周围。丁季铨回来后即被逮捕。

丁季铨被捕后，警察厅审问他关于姓刘的是谁，丁季铨说不认识此人，没有这个亲戚。他此时还不知道他的外甥已在警察厅说出了情况。于是警察厅便将这少年带来对质，丁季铨才无话可说，于是被拘禁。之后，被迫供出赃物埋在某教堂里。因为丁季铨兼银行买办，所以与教堂也熟，与洋人也来往较多，于是租了教堂的房子，专门埋藏宫中“禁物”，警察便将此事报告了内务部。通过内务部与某国公使及教堂交涉，得到许可后，便派人到那里将埋藏的古玩全

部起出。

熊希龄得到报告以后，立即呈文袁世凯，要求将于伟卿案与丁季铨案一并审讯，彻底侦破，从而使热河行宫盗宝案大白于天下。这应该是一件很容易办到的事情了。因为热河行宫的古玩，都有专人经营，并备有清册可查，北京内务府也有底册。如果清内务大臣世续硬要追究此事，也不难弄清其中的内幕。但奇怪的是，世续此时却抱消极的态度，他认为清朝将大好河山都送与他人，区区几件古玩又何足计较？所以置之不问。内务总长朱启钤也以“警察缺乏知识，不识古玩优劣，即使追查也搞不出名堂”为由，也未再予以过问，有关商人加紧把行宫古玩偷运出境、卖与洋人，以销去证物，于是再也不予追查了。尽管袁世凯当面向熊希龄表示一定严查，但只是表面文章。

事情竟这样不了了之，其结局令人惊异，可见其中有某种秘密的原因。世续在熊希龄组阁之后，曾坚决要求追查古物的下落，可是破案之后，却又无动于衷，其态度来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弯，这的确耐人寻味。显然他是受了袁世凯的指使，还有内务总长朱启钤、司法总长许世英，都是袁世凯的心腹，自然唯袁世凯之命是从了。熊希龄又能奈之若何？这位第一流人才内阁中首屈一指的人才，毕竟不是那沉毅狡悍的一代枭雄的敌手。

虽然此时世续表示不予追究，但袁世凯的御用报纸，却依然在不断刊登熊希龄与盗案有关系的文章，使这个案子布满疑云。熊希龄有口难辩，有冤难申。他此时已完全明白了袁世凯的用意，这是在逼他下台。于是，他接二连三地递上辞呈。袁世凯随即批准了他的辞职要求。熊希龄辞职后，报纸上有关盗宝的文章果然不见了，显而易见是袁世凯精心策划的一个阴谋。关于这个案子，刘厚生所著《张謇传记》记述，熊希龄声名狼藉被赶下台之后好几年，人们还不知其中奥秘何在。有一天深夜，熊希龄的好友叶景葵与熊希龄闲谈，问起这件事，并用埋怨的口吻责备熊希龄为什么要帮助袁世凯

解散国民党和国会，熊希龄沉默了半晌，才长叹了一声，向叶景葵吐露了其中的秘密。叶景葵又是刘厚生的好友，故又将这个秘密告诉了刘厚生，方知熊希龄是被热河行宫盗宝一案牵累了。熊希龄死后，刘厚生才将其中的秘密披露于世。在中国历史档案馆里，至今还保藏着有关热河行宫盗宝案的材料。

周恩来总理生前曾多次谈熊希龄，对他作过客观的评价。1956年，湘西凤凰县县长吴焕右到北京参加民族工作会议。一天下午，吴焕右在小组会上发言谈湘西民族问题时，恰好周总理在座。周总理听他是凤凰口音，就问："你是凤凰人吧？""是的"。"你们凤凰有个人跟我做过一样大的官，你知道吗？""知道，他叫熊希龄。""对，"周总理点点头，介绍说："熊希龄做过北洋政府的内阁总理，因为他是湖南凤凰人，所以，当时人们尊称他为熊凤凰。他有湖南神童之称，他组的内阁被称为第一流人才的内阁，在中国近代史上是一位风云人物。不过，他当总理的时候，为袁世凯副署过解散国民党和国会的命令，这是他一生很大的污点。你知道熊希龄为什么要解散国民党吗？"吴焕右摇摇头："不知道。"周总理说："熊希龄解散国民党，是受了袁世凯的胁迫。当时有一个很有名的案子，叫热河行宫盗宝案。因为熊希龄当过热河都统，所以袁世凯把盗宝的罪名加在他头上，逼他签字。这一段历史很值得研究，从中可以看到封建政治的黑暗。"

关于《热河改革政治意见书》

邓一民

在编写《热河革命史稿》中，得此材料，甚觉珍贵。本文未署作者姓名，但从文中称谓及所陈述内容上看，显系热河都统熊希龄所作，是写给当时的国会的，这是毫无疑问的，但《熊希龄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10月出版)未刊此文。我以为绝不是因该文不重要而不选，而是编者没有收集到，这就更增加了该文的珍贵性。

该文没有写作时间，经我研究考证，写作时间应为1913年5月。主要根据是：(1)文中有"本都统到任三月"句。熊希龄于1912年12月22日被任命为热河都统，1913年2月下旬始到任。"到任三月"，自然是1913年5月了。(2)文中还有"去年开鲁一役"句。1912年11月10日开鲁失守，3日后即收复，"开鲁一役"即指此事。由此可以推定此文作于1913年。(3)文中还有"令于七月以后改组"，"俟于七月改组"等句，由此也可以推定为1913年7月之前。

熊希龄任都统不过四五个月之久，对热河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情况，就有如此透彻的了解和精辟的分析，改革计划又是那么宏伟壮观，切实可行，实在是难能可贵的，无愧为"熊凤凰"。假如照此改革下去，那么，热河这个地方也许不是后来的那个模样了。可惜，历史是"没有假如"的。今读此文，只能空为兴叹了！

熊希龄的一生，在政治上有若干过失，也作过许多好事，特别是晚年从事抗日救亡和社会福利事业，对国家民族有贡献。但他确是位毁誉参半的悲剧人物。我这里用他写的《壬子热河行宫感赋》(调寄《楚宫春慢》)词，来凭吊我先辈的这位父母官，以寄哀思。

云山万叠，似环绕宫城，争献颜色。流水小
桥，无限凄凉呜咽。试上平原一望，尚想见当年
游猎。败堞危楼，写尽了一代兴亡，只有杜鹃能
说。　　行踪至此，凭吊处惆怅，荒烟残月。心
在故乡，风景依旧无别。独立怆然泣下，忽送到
一声羌笛。北顾关山，更念白草黄沙，遥听征人
消息。

热河政治改革意见书

热河屏蔽北京、控制蒙部，为长城以外第一重镇。前清时代，纯用旗制，积习相沿，未经改革。晚近之间，虽稍稍办理新政，然因陋就简，名存实亡。风气之固蔽[①]，庶政之废弛，仍与当年无异。民国成立，宣布共和，一切旧制依然如故。适值库伦负固[②]，蒙匪纵横[③]，开鲁失守[④]，热河兵变[⑤]，人民惊惶莫或宁处。欲改弦以更张，须熟思而审计，不得不于缓急轻重之宜，利害得失之故，酌核先后，以定措施，兹将热河情形详晰陈之。

查热河蒙汉杂居，历年已久，其中风土人情，较与东三省、察哈尔迥不相同。都统兼管民政，权力亦与各省督抚相等，历史辽远，无庸赘述。而其最为困难者，则蒙汉制度之复杂问题是也。承滦丰隆围[⑥]五县，纯属汉邑，财政司法均可一律。朝建赤平建阜绥开林[⑦]九县，均属蒙汉杂处，地方行政自治，往往窒碍难行。而蒙旗之中情各不同，其大要又分为二：卓盟[⑧]开通最早，习俗已与汉民无殊。昭盟[⑨]地广人稀，仍然游牧旧习。有此原因，欲合蒙汉两族而实行统一行政，独立司法，扩张财权，皆为现在之一大障碍。

本都统到任三月，诸务丛脞，改革虽多棘手，而进行仍不敢怠。拟分为治标、治本两策。治标重在维持现状，故以严办盗匪为先。盗不清则民不安枕，商不出途，孰肯输纳饷税以办新政？现计九旬之

中，按照军律正法巨盗至一百三十余人之多。

其次，则整顿吏治。热河宦途贪庸，政事黑暗，非治吏不足以清盗贼之源。惟到任未久，情形未熟，难以操切从事，逐渐整顿，分别直枉，业将贪酷之知事、税员，如孙汝锴、王永清等拘拿交讯；不职之刑司知事，如苏阿林、王文翰、王翰清、陈建中等撤任候查；办理不善之委员，如秦锡光、夏复曾、杨祖荣等交惩戒委员会判断。

又其次，则整理军政。热河军队主客夹杂，主军分为巡防、常备两种，向来饷糈微薄，操防废弛。去年开鲁一役，抽调陆防各军，骚扰畏怯，民怨沸腾。所扎各防，零星散布，号令不一，责成不专，尤为兵家所忌。到任之后，即划定防守区域，移并换防，以期专一。其操防不力之中、北路统领、管带等分别撤换；其失守县城，纵兵殃民之陆防营长、管带车殿元、董书麟、文荣，连长玉华，排长常喜等，均经拿解热辕，交军法会审，以示惩警。

又其次，则裁并财政机关，节减无用经费。热河岁入不过五六十万两，而管理财政机关有四，紊乱套搭，积弊丛生。到任后即将热河道、园庭[10]、右司、各库归并于财政局库，凡属兼差，一概裁撤，又将各州县代征之盐酒各税，并入各该处税捐局，其一县而有两项税局者，皆令归并，以期划一而省浮縻。

又其次，则改组自治，清查学务，创办团练。热河自治，有名无实，其甚者新旧冲突，聚讼时闻，而警学商各界，亦均有彼此难容之势，故因[11]召集各代表共商蒙汉并选，一议乃决，令各属自治，一律改组，以收蒙汉联合之效。至于学务一端，各属乡间学塾，大半徒有其名，县治虽稍具规模，然亦未能进步。现派员分往各属，切实调查，以为整顿之基础。团练在今日尤为热河当务之急，现正按照省议会议决《民团简程》范围内，妥筹办法，将各属旧有保卫乡警等名词一律取消，即于热河设立团练总局，承朝赤[12]设立支局，其余各县设立分局，由各地方公推局长办理其事，限期成立。团练果能有效，则以保卫地方，腾出分防各营，集合训练，一举而两善备焉！

此热河治标政策之大略也。至于治本之术，重在规划将来，故以改组官厅为先务。两百余年之积弊，以都统衙署为一藏垢纳污之薮，非摧陷廓清难以维新。在京之时，即先提议官厅改组案，设两路观察使、六厅、两专员[17]，以期行政机关之完备；而一切冗复局所，分别裁汰归并，以期财政支出之节省。各属县知事，则照直省核实经费，令于七月以后改组，其分防佐贰未能骤裁者，则电商直督，改为警察分事务所。所定制度，除两路观察使外，皆较各省而酌示变通，故各省各司均系简任，热河则降格，仅以荐任之员选充，廉俸薪上亦均核减，只求实事有济，得收行政上之便利，而绝不敢稍近于铺张之习，致无以对吾民。此本都统对于热河官厅改组之意见也。

惟是官厅改组，不独有便行政，且为预备改省[18]起见，故请之中央速设榷运局国税分厅，以为一劳永逸之计。并派测量员分赴各属，绘具热河全图。将来行省区域，拟南以长城为界，北以内兴安岭为界，西以多独[19]两厅为界或稍有损益之处，东则拟请政府将奉天锦州府划归热河管辖，盖取其形势环绕自长城以迄于海，足以蔽榆关而卫北京，又有葫芦岛以通海口，兼擅海陆商务之胜。一俟筹划详密，再行请愿国会。此本都统对热河改省之意见也。

改省之事，必须利便交通。故于到任之初，即请交通部添设林开两处电线，又请勘设由京城、热河、赤峰、开鲁、洮南、新城，直达松花江岸之干线铁道。其支线则由赤峰、朝阳、锦州以抵葫芦岛之海湾。两线若成，则热河血脉流通，军商皆有可恃。而铁道未成之前，又不得不利用河流运输，故特雇用日本土木工程技师来热，测量滦河并及道路，以为修治之准备。此本都统于热河之交通计划之意见也。

交通利便，然后经济活泼。热河钱币紊乱，小民受累，贸易吃亏，无论何种商店，皆有发行钞票之权，以致现银缺乏，经济界危险异常。以前官银号[20]办法，亦不过与钱店相同，并无丝毫利民之事。而官场假用堂名，亏挪货借，流弊无穷。现经严令清查，不准与官场

个人往来，其亏欠银项之王永清，亦交林西县拘办。其内容非改组更张不足以收成效。拟借款百万，以为资本，设立热河银行，将从前所发钱帖概行收回，纯用银元，以为改革本位之预备。此本都统对于热河 金融整理之意见也。

军务一端，治内御外，皆关紧要。热河接壤外蒙，尤为国防所重，然以热河之财力，万不能肩此巨任。将来拟以兴安岭之内外各旗，由中央派遣精兵一师，择要驻防，而设一总司令官，以专责成。赤峰以南，则将现有陆防各军，编制一混成协，以资镇慑。开鲁、林西两县，荒地尚多，即经匪乱，益知非兵不足以护垦，拟设屯田兵两营，分驻两县，新辟之荒既足以寓兵于农，又足以捍卫移民。此本都统对于热河军政布置之意见也。

热处关外，民智幼稚，风气蔽塞，吏治腐败未能澄清，自治机关未能完备，凡内务范围内之官治民治，较关内各省为劣，故特设立普通文官考试委员会，以免任人之有私；设立官吏养成所，以免躁进之误事；设立高等惩戒委员会，以免黜陡之不公。吏治既修，人才既有经验，而后内务行政方可扩充。举凡警务、学务、自治、公益事务及调查户口、测量舆图各大端，均可次第施行，并取材于官吏养成所之佐治人才。此本都统对热河内务行政之意见也。

无米之炊，巧妇难为。热河地瘠民贫，向为受协省分。自革命后，直隶两年协饷皆不全给，北京财政部亦多方稽延，固定者已不可恃，而改革一切岁出之款，必较昔日加增，则整理财政所宜亟也。综言其要，约分两端：一为核约支出，即上文裁并各项局所，实行新工簿记，不得有丝毫浮滥。二为加增收入，收入之中又分两项：一曰经常。如盐务改为官运商销，年可增收银 36 万两，另有详细公文咨部。酒捐、契税、货物税、杂捐司法手数料（原文如此——编者）等项，年可增加收银十万余两。二曰临时。丈放庄头田亩，可曾收银百余万两；清放东乾沟、海留图各等处荒地，可增收银数十万两；而升科纳税尚未与焉！此本都统对于热河财政整理之意见也。

教育为强国之本。热河开化较迟，故学校亦不发达，现虽有法政专门及中小男女学校，然皆未臻完备，且教员亦甚缺乏，各属乡学尚多背读四书五经之旧习者。拟设男女师范学校各一所，为养成教员之准备，并于热街先设图书馆，将园庭所藏古书各留一部，兼购新译诸书，以便观览。各属劝学所改为教育会，以资教育研究。其两等小学则用考核干涉主义，使各职教员尽心于教授管理之法，且注重体育兵操，以养成各学生军国民之资格。此本都统对于热河教育规划之意见也。

实业为富国之本源。热河山多田少，交通未便，民生日穷，盗贼繁滋，良由于此，非从实业下手不可。故拟设农林学校，以化瘠土为膏腴，变牛山为丰蔚，庶几一亩之值可增数倍；次于围场以北草水便利之荒地，设立牧畜试验场，以期军马及牛乳、羊毛之进种改良。又于热街设立工业试验场、贫民工艺厂，使人民生计之有所执业。且以热河矿产最富，特设金矿总局，专归国有，兼办收买赤金，为将来改币制之准备。联合蒙汉设立热河矿务总公司，收买矿地，承办各矿，以免利权之外溢。此本都统对于热河实业办法之意见也。

蒙古两盟 17 旗，犬牙相错，汉蒙杂居已久，不免时有恶感，则以风俗、语言、文化的不尽相同之故，联合政策必须使之同化。故拟设卓、昭两盟中学校各一所，17 旗高初两等小学校各一所。教育日新则民智自有进步，岂有再分畛域之事？又以前清苛例，蒙人不得为行政司法官吏，以致词讼案件判断不公，书吏需索，蒙民含怨已深，而与汉官隔阂愈甚。今拟于各属设立某某旗务公所，选取娴习政治之蒙人为所长，遇事使与汉官接洽，其有蒙人聪敏练达者，设法委用行政各官；俾有政治常识蒙民之苦于苛敛摊派者，设法劝导王公更改旧例，庶几可达五族一家之目的。此本都统对于蒙旗商榷之意见也。

司法独立为共和之要素。热河高等审判厅久未成立，以致积案二百余起，未经判决，殊非慎重民瘼之道。故到任后，即先商司法部

设立高等审判分厅，其余地方初级两厅，以次筹设，各属审检所亦俟于七月改组后一律实行。然监狱若不改良，则亦文明之缺憾。热河前设罪犯习艺所，使贫民与罪犯一同习艺，实属不合，而围场习艺所则以病犯移入尤为可哂。现拟将贫民并入前驻防工艺厂，不分旗汉，令习工艺。另派妥员专办模范监狱，以期实事求是。此本都统对于热河司法事宜之意见也。

外交之事，热河本不甚繁，以传教游历为多，赤平商务均属代理洋行之所为，近更有垂涎于热河矿产者，调查侦探，希图合办，络绎而来，以致外交事物渐见增加。惟热河逼近外蒙，又有日俄协约定为势力范围之说，思患预防不可不力持开放门户主义，以为维系热河政策。现拟创办铁路先利交通，不独运矿运货，振兴商务，而热河山岭深幽，避暑山庄又为前清园庭胜境，沿途均有温泉，外人喜来游览，将来铁道成后，游费亦为输入大宗。此本都统对于热河外交政策之意见也。

以上十二端，均系热河不可不办，不可缓办之重要问题。虽明知本地之财难以负担，然热为北京屏藩，应由国家筹谋远大，接济扩充，以固边圉而保领土，不得视为一省一隅之事。此热河治本之大略也。

本都统德薄能鲜，力小任重，又为瘠壤所限，实有力不从心，迫不及待之叹。兹承贵会咨询，用陈管见，以备采择，幸垂鉴焉。

注释：

①固蔽：应为固弊，积久相沿的顽固弊端。

②库伦负固：库伦即今蒙古人民共和国首都乌兰巴托。外蒙原为中国领土，在沙俄帝国主义策动与收买下，外蒙反动王公、活佛杭达多尔济、哲布尊丹巴等于1911年12月3日发布所谓“独立宣言”，并将清朝驻库伦办事大臣三多等驱逐出境。外蒙的“独立”立即激起中国人民的强烈反对，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多次电告外蒙的王公、活佛，要求他们立即取消独立，勿被

沙俄利用。

③蒙匪纵横：外蒙傀儡政权成立后，继续煽动内蒙古和黑龙江某些蒙古族反动王公叛国投俄，并于1912年底，派军窜入内蒙，妄图侵占我国整个蒙古地区。在我国人民包括蒙古族人民的激烈反对和强大舆论压力下，当时的中国政府调集军队，进行了反击侵略和平息叛乱的战争，终于击退了进犯内蒙的俄军与叛军，收复内蒙全境。

④开鲁失守：1912年8月，内蒙哲里木盟科尔沁右翼前旗郡王乌泰，联合哲盟10旗5000多人发动叛乱，并发布了所谓《东蒙古独立宣言》，以响应外蒙傀儡政权的南侵活动。9月中旬，乌泰叛乱被平息，乌泰等少数人外逃库伦。与此同时，热河扎鲁特左旗的协理台吉官布扎普等，纠集乌泰余党和部分土匪共千余人发动叛乱，于1912年11月10日攻陷开鲁，百姓惨遭屠杀。不久，这次叛乱也被政府军平定。

⑤热河兵变：指1913年1月热河八旗兵暴乱，详见拙作《热河十都统》，分别载于1985年6月22日《承德群众报》、《承德文史》第二集。

⑥承滦丰隆围：即承德、滦平、丰宁、隆化、围场县。

⑦朝建赤平建阜绥开林：即朝阳、建平、赤峰、平泉、建昌、阜新、绥东、开鲁、林西县。

⑧卓盟：即卓索图盟，现今阜新、朝阳、北票、平泉等地。

⑨昭盟：即昭乌达盟，现今赤峰、林西、乌丹、经棚等地。

⑩园庭：即避暑山庄。

⑪“因”字似不通，应为“此”字，或为衍字。

⑫承朝赤：即承德、朝阳、赤峰。

⑬熊希龄拟定之《热河官厅组织暂行章程》，至1913年5月10日始获批准。两路观察使为朝阳观察使，巡视朝阳、阜新、建平、绥东等县。赤峰观察使，巡视赤峰、开鲁、林西、围场等县。六厅为内务厅、财政厅、教育厅、实业厅、蒙旗厅、军务厅，另外还设有总务处。两专员即为外交专员、司法筹备专员。

⑭热河改省之议：热河当时为一府，即承德府，归直隶省管辖，但又设立与省督抚权力相同的都统，以示其在军事上之重要。热河改建行省之议，最早起于前清，并屡腾于政界，御史左绍佐、总督岑春煊、巡抚程德全、热河都统诚勋、廷杰，皆有热河改建行省之议。熊希龄到任后即与绅士艾知命等商议改建行省，并向国会正式提出《热河改建行省议案》，但未获通过。1914年改设热

河特别区，1928年始建热河省。

⑮多独两厅：即多伦厅、独石口厅。

⑯林开：即林西、开鲁。

⑰官银号：即热河官银钱号。热河都统廷杰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初，奏请开办热河官银钱号，并获宫珠批，遂于同年十月十八日在承德成立，总经理郑宝铃。有资本银100455两，开业后甚为兴隆，获利已丰。到民国元年（1912年），已获利22812.3两。后来逐渐败落，终于1917年合并改组为热河兴业银行。

冯玉祥滦平倒戈前后

鹿钟麟　刘骥　邓哲熙

一

北洋军阀直系首领曹锟以贿选手段篡窃大总统地位之后，北京政府即完全被直系所把持，吴佩孚利用中央权力，借口统一军权，以推行他的排除异己、武力统一的政策。当时，直系的势力范围已由黄河流域发展到长江流域。吴佩孚为了实现他的武力统一的迷梦，更进一步地策动川、黔等军攻掠四川，勾结陈炯明、沈鸿英等牵制广东，而对于东北的张作霖，则派兵把守赤峰、朝阳、山海关之线，以阻其进入关内。这时的吴佩孚，已经是意气骄盈，野心勃勃，大有雄视中原、威加海内的气概。

但是，与此同时，不利于直系的种种因素也在日益发展。在直系内部，由于吴佩孚的飞扬跋扈而各怀异心，逐渐分化成为津、保、洛三派。津、保两派，在拥曹抑吴的谋划之下，暗中活动，处处对吴掣肘。以后，津、保两派又因吴景濂与高凌蔚争夺内阁总理的问题，也发生了矛盾。直系以外的各方面，在曹、吴的压迫下，也在积极地寻求应付和反抗的对策，如直、奉战争失败后的张作霖，锐意整顿军备，企图卷土重来。局促于浙江的皖系卢永祥，因处于直系势力的包围之中，亦亟谋自存和发展的出路。而在广东领导国民革命的孙中山先生，还在曹锟就任贿选总统的时候，就已通电声讨曹锟，反对贿选政府，并且与张作霖、卢永祥取得联系，共同进行倒直运动。孙、张、卢虽然政治主张不同，但在当时情况下却有着一个反对直系的共同目的。因此，通过孙科、张学良和卢小嘉在沈阳集会的

所谓三公子会议，形成了孙、张、卢反直阵线的三角同盟。

吴佩孚的武力统一政策虽然遭到各方面的反对，但是他的穷兵黩武的野心并不因此而稍戢。他为了先发制人，把反对势力各个击破，首先策动陈炯明等进攻广州，并勾结英帝国主义唆使广州商团叛变，以牵制孙中山先生的北伐，同时指使齐燮元、孙传芳夹攻浙江卢永祥，以肃清在东南仅存的皖系残余势力。1924 年 9 月 3 日，浙江战争爆发，张作霖因与浙卢有同盟关系，立即通电声援卢永祥，并将所部编成战斗序列，待机出动。吴佩孚也由洛阳到北京部署军事，第二次直、奉战争已到一触即发的时刻。

正在这个紧急关头，在孙、张、卢三角同盟之外，在直系势力范围内也形成了冯玉祥、胡景翼、孙岳等联合反吴的三角同盟，并且以迅雷不及掩耳的行动于滦平倒戈，发动了北京政变。

冯、胡、孙的结合并不是偶然的。由于他们的处境有着类似的遭遇，在政治上有着共同的要求，一旦在时机成熟的时候，就很自然地采取了一致的行动。

冯在北洋军人中是一个比较进步的人物。他立志要做一番救国救民的事业，对当时北洋军阀的腐败情形常常流露不满情绪。同时，他的领袖欲也相当强，以致遭到北洋军阀上层人物的歧视和猜忌。又由于他有着倔强的性格，对他的上级时有违旨抗命的行动，更为当权人物所嫉恨。在皖系当权时，他曾受到徐树铮等人的排挤；到了直系当权的时候，又遭到吴佩孚的压制。但冯对吴并不肯俯首听命，在扩编队伍、催索饷项等问题上时常发生抵触。吴在洛阳庆祝五旬生日的时候，各方称觞祝寿，馈赠惟恐不丰，阿谀惟恐不至，而冯独以清水一坛为礼，喻为君子之交。吴虽莫可如何，而心实憾之。在第一次直、奉战争中，冯以援助直系击败奉军而得任河南督军，在发表冯为河南督军的同时，并发表宝德全为河南军务帮办。宝德全在冯与赵倜作战时，宝曾通电对冯大加攻击，并在郑州以北袭击冯军后路，势甚危急，幸胡景翼部由陕西开到增援，始将

其击退。吴既知宝与冯嫌隙甚深，其所以荐宝为河南军务帮办，其用意在对冯发生牵制作用。不意冯甫至开封，即将宝枪决。当吴来电诘问，冯则复以并未与宝见面，并诿称已被乱军打死。但冯尚未到职时，吴即将其与自己有关的私人开列名单，向冯推荐担任督署各重要职务，仅留秘书处长一职由冯任用。冯对他的左右说："这样办，还要我这个督军干什么！"于是将吴所推荐的人选悉予拒绝。在第一次直奉战争时，因京汉路军事吃紧，冯曾派李鸣钟旅北上应援。战事结束后，吴即拟将李旅扩编成师，留驻保定，企图使其脱离冯的节制，以削弱冯部的力量，卒以冯坚决反对而未果。吴本视河南为其主要根据地之一，冯督豫后，曾拒吴更换省长，并且拒绝由地方拨款，这当然引起了吴的极大不满。特别是冯在河南将他的第十一师大加扩充，积极训练，更成了吴的一块心病。所有这一切，都是吴所不能容忍的。因此，冯督豫还不到半年，北京政府即在吴佩孚的提议和威逼之下，将冯调任为徒拥虚名的陆军检阅使，移驻于北京南苑。冯迫于形势，不得不遵命北来，当时吴拟将其第十一师的 5 个补充团留在河南，冯幸得陆军总长张绍曾的支持（张任第二十镇统制时，冯在其部下任营长，张对冯的支持，一是因旧日关系，一是张拟利用冯的实力作为政治资本），方得全部北开。在冯北调的时候，吴本许以每月由河南协饷 20 万元，但事后并未履行诺言，而北京政府又不能按时拨付军费，曾积欠达 11 个月之多，致冯部饷项陷于极端困难的地步。冯当时曾经把他深刻的感触写下了这样的话："吴佩孚此次将我调职，其用意即要置我于绝境，使我们即不饿死，亦必瓦解。"当然，吴对他所施加的压力，他是决不甘心的。他在当时极为不利的条件下，积极扩充队伍，严格加强训练，将他的军队训练成为当时战斗力最坚强、纪律最严整的一支队伍，这是在他治军的整个历史上的黄金时代。

当他在埋头练兵的时候，也同时注意了与各方面联系。原来，冯在滦州起义的时候，已开始和南方的革命力量发生关系，以后又

结识了许多国民党人士，由于受到他们革命宣传的影响，对于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国民革命日益加深了向往的心情，特别是他读过孙中山先生手写的建国大纲之后，对于革命的奋斗目标又有了进一步的认识。1923年孙、张、卢三角同盟形成，孙中山先生曾派人将联合张作霖、卢永祥的情况告知冯氏，并促冯早日发动倒直行动。这年12月，马伯援(冯的教友)拟有广东之行，冯即委托马伯援代表向中山先生致意，他说："目前直系兵力数倍于我，如冒险盲动，必遭失败，待时机到来，我一定有所举动，请将此意转达中山先生。"这时，冯的政治态度已日益倾向于革命方面，并且看到反直阵线已经形成，更加增强了推翻直系军阀集团的决心。于是，他除了积极训练部队以加强军事力量而外，并且积极地争取同盟，与素有联合的北方将领孙岳、胡景翼等取得秘密联系。

冯与孙岳的关系，从滦州起义前订交开始，在长时期中往来无间，他们不但私人交谊甚厚，而且在政治上也有着共鸣。孙岳早年就参加了同盟会，辛亥革命时任第三镇中校参谋，时与南方暗通消息，并与滦州驻军军官王金铭、施从云和冯玉祥等密谋起义，因吴佩孚(第三镇少校副官)的告密，被第三镇统制曹锟撤职，孙即南下，曾任第十九师师长；不久，被袁世凯免职，江西都督李烈钧委以江西庐山垦牧督办之事(以后冯与李的关系即系经由孙的介绍)，黄兴任讨袁总司令时，以孙为北伐军第一路总司令。其后孙一度去陕西，与陕西国民党人胡景翼深相结纳。及曹锟为直隶督军，以旧日关系，委以军官教育团团长，直皖战起，复兼任直隶省义勇军总司令，战事结束后，因受吴佩孚的压仰，仅畀以第十五混成旅旅长兼大名镇守使①之职。孙对吴的骄横专擅，早已心怀不满，与冯见面时，常常牢骚满腹，对国家的前途和个人的遭遇，感到悲观失望。冯和孙不但遭遇相同，而且又是志同道合的好友。冯为了争取反直的军事力量，所以首先把他的意图向孙岳谈了出来。这就是在当时具有重要意义的一次会议——"草亭秘议"。

1924年9月的一天，孙岳亲至南苑为冯氏新建的昭忠祠的落成而前往致祭。当他在官兵义地中凭吊的时候，对冯感慨地说："民国虽成立不过十多年，这里已经躺下了这许多战士。"冯说："他们为国捐躯，落得一个忠字，也算不朽了。"孙说："都是忠义好汉啊！都是精魂忠骨啊！"冯便笑着和孙打趣道："他们死了，能得忠骨之称；孙二哥，将来你百年之后，人们应该怎样称道于你呢？"孙也笑着答道："那不用问，像我目前这样干法，在真正的革命党看来，还不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走狗？"冯说："你即统兵数千，坐镇一方，为什么甘心作人家的走狗？"冯的话引起了孙的哈哈大笑，他便对冯说："我算什么，还有那带着三四万人的，不也是作着军阀的走狗而无可如何吗！"说着话，他们已走到义地中间一座草亭里面一同坐下。冯即正色对孙说："目前闹到这局面，我想稍有热血良心的人，没有不切齿痛恨的。我所统辖的队伍，虽然名为1师3混成旅，但实际不到3万支枪。在这样的情况下，自然不能鲁莽从事；但我们必须努力，把这一批祸国殃民的混账东西一股脑儿的推翻。不然的话，如何对得起自己，如何对得起这些牺牲的官兵，更如何对得起我们创造民国的先烈！"这一席话，使得孙马上振奋起来，他以十分诚恳而又坚决的态度对冯说："你若是决定这样干，我必竭尽全力相助。此外，还有胡笠僧(即胡景翼)也定然愿和我们合作，我可以负责去接洽，他们现在都郁郁不得志，对曹、吴的做法早已深恶痛绝，何况他们都是老革命党，更何况他们和你我有如此的交谊，合作是绝对不成问题的，眼看直奉就要开火，我们有的是好机会。现在先布置一个头绪，待机行事，必有把握。"在当天夜里，他们又详商良久，决定由孙亲往与胡景翼接洽。

胡景翼在青年时期就参加了同盟会，与孙中山先生早有直接关系，辛亥革命时期曾起义于陕西耀州，在日本留学时，因受孙中山先生的鼓励和督促而回国进行革命活动，护法之役，在三原宣布独立。冯任陕西督军，胡曾写信对冯表示，"只要你能带着我们救国

卫民，任何办法都乐意接受。”冯感其诚意，乃将其所带之靖国军改编为陕军第一师。胡因敬佩冯之为人，与冯交谊日笃。胡常对人说：“我们的军队多是各方收集来的，纪律不好，在未经严加训练以前，不急于补充过多的枪械。”在政变前胡曾派军官二百余人到南苑冯所办的教导团学习，并且把他与苏联洽妥的一批军械转让于冯，处处对冯表示好感。在第一次直奉战争中，胡随冯出潼关援直，及冯调陆军检阅使，胡部即驻防于彰德、顺德一带。吴佩孚拟调胡率部南下攻广东，因胡不愿对南方作战，迟迟不肯开拔，以致引起吴的不满，在饷项给养等问题上多方与胡为难。胡处此困苦的环境中，乃密谋有所举动。适孙岳来与密谈在京和冯会商经过，胡闻之大喜，立即派岳维峻去北京见冯，表示绝对服从冯的命令。冯当即对岳提出三点意见：“第一，吴佩孚要打倒异己，对奉战事已到一触即发的地步，这种战事，我们誓死反对。第二，我们须利用形势，相机行事，将来若果成功，必须迎请孙中山先生北来主持大计。他是中国唯一的革命领袖，应当竭诚拥护，否则我们就是争权夺利，不是真正的革命。他的建国大纲真是太好了，如果把这个细细的读一遍，才知道真正的民国是怎么回事，真正的革命是怎么回事。第三，纪律是军队的命脉，有之则生，无之则死，我们即拿定了革命的决心，此后即当严整军纪，真正做到不扰民、不害民和帮助民众，否则我们决不能成功。”岳表示对这三项意见完全接受，即返回防地向胡复命。数日后，胡景翼借口到北京就医，亲来与冯密谈，表示了与冯合作的决心。至此，冯、胡、孙的三角同盟亦告形成。

冯等的秘密结合进行得十分严密，不但外间对此毫无所闻，甚至冯对他的部下也还保守秘密。只是有一次冯以试探的口气对邓哲熙说：“看来战事是不可避免的了，各旅长对于目前的局势是怎样看法呢？”邓说：“他们的看法是：在目前的情况下，如果没有张作霖，我们就没有出路。”冯说：“对，对，他们的看法完全对！”至于采取怎样的办法以打开当前的局面，他却没有说明。

当时，冯已感到自己缺乏政治上的人才，而一旦推倒曹、吴，势必要有一班懂得政治的人来收拾这个大局。因此，他除了希望孙中山先生北上主持大计外，也在留心物色在政治上有资望、有办法而又能与自己合作的人物。这时，北京政府教育总长黄郛与冯过从甚密，冯即告以“不久将有大事发生，届时将请中山先生北来主持一切，并且一定请你大力赞助。”黄说：“只要你有办法，我一定跟着你干！”又过了些天，冯将要向热河出发的时候，想把他的计划再告知国务总理颜惠庆，争取他一致行动。试探的结果，颜却模棱两可，使冯感到失望。本来他还想争取王正廷的合作，由于和颜谈话不得要领，他感到这些外交家过于圆滑，难于说出真心话，访王之意因亦打消。当时政府中知冯秘密计划的，仅有黄郛一人。

二

1924年9月15日，奉军分向朝阳、山海关进兵。曹锟急召吴佩孚到京主持对奉作战任务，吴于17日抵京，18日北京政府发布了张作霖的讨伐令。同日，曹责成吴佩孚组织讨逆军总司令部，并任命吴为讨逆军总司令。

吴佩孚以讨逆军总司令的身分召集高级将领发布的命令：“我自任讨逆军总司令，王承斌为副总司令兼直隶后方筹备总司令；彭寿莘为第一军总司令，沿京奉铁路之线出发；王怀庆为第二军总司令，出喜峰口，趋平泉、朝阳；冯玉祥为第三军总司令，出古北口，趋赤峰。……”

冯所担任的这一路，交通不便，地方贫瘠，不但行军困难，且给养也无法筹措（吴曾下令不设兵站，各军给养完全就地筹措，实际上第一军是有兵站的，第二军虽无兵站，但行经之地尚较富庶，惟独第三军困难最大）越是往北进展，人烟越是稀少，困难也就越多。显然，吴是有意识地借着这次战争把冯部调离京畿。并把这部分力

量消耗在荒寒瘠苦的长城以外。当时吴却假惺惺地对冯说："古北口这一路地势险要，攻守不易，非劲旅不足以胜任。"当然，吴的不怀好意，冯是十分清楚的，这就迫使冯对实现倒吴计划下了最后的决心。从这时起，冯就在政治上、军事上进行了多方面的接洽和布置。

在军事方面，首先对北京城防布置了内应，在吴佩孚发布命令后，冯即向曹锟建议："十三师（王怀庆师）开赴前方，北京防务空虚，最好把孙禹行（孙岳）的十五混成旅调来拱卫首都。"曹以冯如此关心首都治安，就很高兴地同意了冯的建议，立即调孙岳率部到京，任以北京警备副司令之职。孙在一次集会的场合遇到冯，对冯耳语："你特意把我搬来，是不是要我给你们开城门？"冯则报之以会心的一笑。

这时，奉军向朝阳进攻的一路首先与直军接触，朝阳守军以事先毫无戒备，仓卒应战，即陷于不利的地步。接着，山海关方面的战事亦日趋激烈。从整个形势看，奉军不但在兵力上占优势，而且在战略上也抢了"先着"。冯用兵向主兵贵神速，先发制人，可是这次他却采取了延宕办法。他在 9 月 18 日被任为第三军总司令，一直拖到 9 月 21 日，他的先头部队才开始出发。冯将其所部分为数个梯队，先头部队为张之江旅，次为宋哲元旅，次为刘郁芬旅，次为李鸣钟旅，最后为鹿钟麟旅，至 9 月 24 日始开拔完竣。另以步兵一营留守北京城内的旃檀寺，派蒋鸿遇为留守司令兼兵站总监，办理后方一切事务。在这以前，曾由河南招募新兵万人，分编为三个补充旅，以孙良诚、张维玺、蒋鸿遇分任旅长，借口留在后方训练，并未开拔。一切布置妥当后，冯始向怀柔出发。开拔各部，每日行军路程只二三十里，全不像开赴前线作战的样子。冯的司令部移动得也很慢，9 月 24 日从北京南苑出发，当日到怀柔，28 日到密云，10 月 1 日才到达古北口。冯到古北口之后，以筹措给养为名，便又停留下来，他一方面督饬沿途各县加紧修筑公路，预作班师回京准备，

一方面令鹿钟麟每日朝着北京的方向练习行军，或50里折回，或60里折回，有时是徒手，有时又是全副武装，并且一边走着一边在路旁演习，有时刚刚支起帐棚准备露营，忽又收拾起来赶回驻地。这样做的用意是，不仅训练部队做好急行军的准备，而且使沿途居民对行军动作习为常见，不至使尔后班师引起外间的注意。

胡景翼被任为援军第二路司令后，即将军队集结在通州待命。吴佩孚令胡率部由喜峰口进军热河应援王怀庆，冯则派刘治洲、田雄飞等与胡密商，决定暂缓开拔，以待战局的变化。

冯在古北口期间，一方面从各地收集作战情况，留心观察整个战局的发展变化，一方面并进行了秘密的政治活动。冯当时考虑到，为着加速吴佩孚在军事上的溃败，必须进行多方面的工作。同时他也考虑到，孙中山先生能否北来以及何时北来，尚不可知，而大局的变化就在目前，且自己又向以军人不干涉政治为标榜，在推倒曹、吴之后，势必要有资望较深的人物出而维持局面。恰好这时段祺瑞的代表找上门来，于是冯与段之间就很自然地取得了联系。

段祺瑞自从直皖战争失败下台后，即寓居天津。他本是一个不甘蛰伏的政治野心家，遇到时局动荡不安的时候，就会寻找机会，以图再起。段知冯与吴素有芥蒂，直、奉战争爆发后，就派遣他的亲信贾德耀（与冯曾同在第七师任旅长）到古北口与冯送来一封亲笔信，大意是不赞成内战，并希望冯对贿选政府有以自处。这封信既有着试探的性质，也有着鼓动的意思。冯接信后，曾与贾进行数度密谈。最后，冯向贾表示，俟计划实现后，将请段祺瑞、张绍曾等有重望的人物出来维持大局，并请贾德耀偕同田雄飞赴津见段征求意见，同时往访张绍曾表示推重之意。数日后段派宋子扬向冯表示同意合作，惟张绍曾则因与曹、吴关系甚深，而与段又向有抵触，故对此表示消极。接着冯又派刘之龙与段接洽合作办法，段谓山西的阎锡山、山东的郑士琦已接洽妥当，届时定能采取一致行动。

在与段取得联系的同时，冯和张作霖也取得了谅解。冯的部下

张树声与张作霖的驻京办事人员马炳南为夙识，张得到冯的同意，即陪同马炳南至古北口见冯。马说："只要推翻了曹、吴，奉方的目的即已达到，决不再向关内进兵。"冯也坦白地对马表示："我已经和北京方面几位将领有所接洽，只要你们的队伍不进关，我们的计划必能顺利进行，推翻曹、吴是不成问题的。"并说："将来事成之后，拟请孙中山先生来主持大计，这一条你们是不是赞成？"马答以"完全不成问题，一切听你的主张，我们没有不赞成的"。冯又重复地说："一是请孙中山先生北来，二是你们的队伍不进关，只此两条就成，希望赶快回去转达此意，切勿食言，现在是怎样商定的，将来就怎样实行。我这里已经布置妥当，不久就有主和息争的通电发出。"马亦向冯表示，希望冯部在热河方面的军事行动从缓，以便奉方抽出兵力加强山海关方面的主攻力量。冯亦同意了他的要求。马炳南当即由天津搭轮船到大连到沈阳向张作霖报告，并遵张命报告杨宇霆。杨将张作霖致张绍曾、靳云鹏函各一件交马炳南入京面投。张信大意是只要达到和平，奉军可以不入关内。冯阅后很为满意，当即用一张旧东昌毛头纸写了一个很大的"成"字，下署"玉祥"二字，并约定如两军相遇，均应向天空鸣枪；冯军缠红布白日光臂章，奉军缠黑布白日光臂章，以资识别。吴佩孚对于冯的秘密活动虽毫无所闻，但他对冯并不是没有戒心的。他为了监视冯的行动，加派副总司令王承斌指挥二、三两路的军事，并督促冯部迅速向赤峰方面前进。冯知道王承斌因吴佩孚解除他的第二十三师师长兼职，早已心怀怨望，所以王到古北口与冯会面时，冯为了争取他的合作，即将秘密计划完全告知与王。王对冯的主张表示同情，但不愿与冯采取一致的行动，同时也声明决不将冯的秘密泄漏给吴佩孚，仅只取得了相互之间的谅解而已。王承斌在古北口停留二日即转赴承德。吴佩孚除了授意王承斌监视冯的行动外，还密嘱胡景翼对冯予以注意，如果冯有异动，可就近解决之。胡将此事密告与冯，并盼冯提高警惕。吴对冯的防范，不但未起丝毫作用，反而益加坚

定了冯的决心。

10月11日，冯由古北口进驻滦平。这时直军彭寿莘的第一路正面，因遭遇到奉军的精锐部队，屡战不利，于10月7日被迫放弃九门口，山海关形势十分危急，吴佩孚乃于12日离京亲赴前线督战。在喜峰口、平泉方面，王怀庆的第二路，一经与奉军接触，即溃不成军（王怀庆的第十三师原是直隶巡防营的底子，官兵腐败不堪，而且空额极多，王又不认真训练，故毫无战斗力），经吴令催胡景翼部驰往增援，始得相持于长城以北之线。而冯玉祥的第三路，因进军迟缓，始终未与奉军发生接触。特别是冯、张取得谅解之后，奉军即将进攻赤峰方面的兵力抽出大部转移到山海关方面作战，从而加重了对直军第一路的压力，因此，整个战局已使直军日益陷于不利的地步。

冯从北京出发前，即已布置蒋鸿遇向总统府及有关方面搜集关于吴佩孚的行动和前方战事的情报随时向冯报告。在得到直军放弃九门口和吴佩孚亲往前线督师的消息时，冯即分析了当时的情况，认为吴在军事上已到了崩溃的前夕，实现班师回京的时机已经成熟，随即派参谋长刘骥持亲笔函回京与胡景翼、孙岳两部联系。刘与胡部岳维峻、邓宝珊及孙部何遂会于通州，告以冯决定即日班师回京，请他们早作准备。冯与胡、孙两部联系妥当之后，为了慎重从事，又给吴发了一个电报，一方面报告先头部队已抵承德以及沿途筹措给养的困难情形，一方面也探询了山海关方面的战况。旋接张方严（吴的参谋长）电，大意为："此间形势紧急，不有意外胜利，恐难挽回颓势"，并催促冯部迅速前进，且有"大局转危为安，在此一举"之语。接着蒋鸿遇亦电冯报告："前方战事紧急，吴已将长辛店、丰台一带所驻之第三师（吴的精锐部队）悉数往前方增援。"冯根据这些情况，断定时机已至，不容再缓，乃于10月19日召集张之江、鹿钟麟、李鸣钟、刘郁芬、刘骥、熊斌等举行紧急秘密会议。在这次会议以前，冯尚未宣布过他的秘密计划，但是他的将领和幕

僚从这次行军种种布置中，早已猜透了冯的心事。在会议开始时，冯对他的部下说："你们大家跟我这多年，历尽了艰难困苦，国家闹到这个样子，我真不知道会把你们带到什么道路上去。"鹿钟麟起立说："我们大家患难相从，甘苦与共，原不是为了你我个人私利，既然是为了救国救民，我们一定永远跟着你干，任何危难，在所不计。"

鹿表明态度后，冯这才正式宣布了班师回京、推倒曹、吴的计划，各将领一致拥护冯的主张。于是，对于班师回京的步骤和办法进行了缜密周到的讨论和布置。接着，胡景翼的代表邓宝珊也由平泉赶到，并参加了会议。计议既定，冯即发布命令，命鹿钟麟率部兼程返京，会同孙良诚、张维玺两旅开往北苑，再与蒋鸿遇旅会同入城；命李鸣钟率兵一旅急趋长辛店，以截断京汉、京奉两路的联络线；命已抵承德的张之江、宋哲元两旅立即出动，限期回京；通知胡景翼将开赴喜峰口方面的部队迅速撤回通州，以防阻吴军的回击；通知孙岳秘密监视曹锟的卫队及吴佩孚的留守部队，以防发生意外；同时，下令封锁京热大道，遇有从热河去北京的人一律予以扣留，以防走漏班师回京的消息。北京宪兵司令兼前敌执法车庆云，是吴佩孚派驻承德专为监视冯军行动的主要负责人，为了防止他的破坏活动，冯乃命张之江派兵将其暂时扣留。

一切准备就绪后，10 月 21 日开始行动，各部皆以最快速的行军向北京进发。先头部队的营幕和炊具均留置沿途不动，以便后续部队到达时缩短吃饭和休息的时间。因此，数万之众，一路行来，真如流水一般，不但行军迅速，而且对沿途居民毫无惊扰。先头部队鹿钟麟部于 22 日即到达北苑，各部行程一般都达到一昼夜 200 里左右，创造了步兵行军的空前速度。

冯本人亲率刘郁芬旅于 21 日从滦平回至密云，对进入北京的种种措施又进行了严密的布置。22 日行抵高丽营，黄郛由北京赶来相会，共商政府过渡时期办法。经商定，由黄负责组织摄政内阁，

并对迎请孙中山先生北上的问题进行了筹划，冯还将预先拟就的主和通电请黄作了修改。谈至深夜12时，黄即赶回北京进行组阁准备。

鹿钟麟到达北苑与蒋鸿遇等会商后，即对各部分配了工作任务，先派兵一团以接运给养为名，押大车数百辆鱼贯入城，所有武器皆掩蔽在大车之内；进入北京之后，先到旃檀寺留守处集合，至夜12时，即分别占领了电报局、电话局和车站等交通、通讯机构。鹿钟麟率部于夜12时行抵安定门，孙岳因已于事先接到通知，即令守兵大开城门迎接入城。鹿走在队伍的前面，每到一定的地点，鹿即派出一支队伍，并告以行动时间和任务。鹿由北向南一段一段地前进，队伍也一支一支地向四下里分散，一直走到天安门前，鹿即将司令部设于太庙(即现在的劳动人民文化宫)。这时，全城的防务已经很快地布置妥当，城内各重要交通路口均用大车加以封锁，将总统府及有关机关的电话线完全割断，总统府卫队由孙岳派兵包围，接洽缴械，另由鹿派兵一营守卫总统府。从这天起，曹锟即被监视在中南海延庆楼内，不准其与外间接触。

冯玉祥这次举行倒戈，因计划周密，行动迅速，故能于一夜之间，不放一枪，不耗一弹，就在夜幕沉沉、鸡犬不惊的情况下完成了监视贿选总统和控制整个北京城的任务。在这个宁静的深夜中，像这样一件非常的举动，不但居民毫无知觉，就是曹锟和政府负责人也都还在梦中。直至第二天清晨，城内居民看到通往要道遍布佩带“不扰民、真爱民、誓死救国”臂章的士兵，才知道发生了重大的事变。当时在街谈巷议中常常听到这样的话：“冯玉祥用兵神速，真称得起飞将军自天而下。”

注释：

①《辛亥以后十七年职官年表》记载：大名未设镇守使，设道尹。孙岳在1923、1924年任冀南镇守使。

——编者注

第二次直奉大战中的热河战场

公孙訇

(一)奉军攻占阜新、朝阳

战争开始，奉军首先发动对热河的进攻。按照奉军的作战部署，兵分南、北两路。南路由北镇出发，经朝阳、凌源进入喜峰口。这一路虽然行军较远，交通运输比较困难，但是从战略上考虑，无论防守及进攻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因为如果直军以重兵出朝阳便要严重威胁锦州，将使奉军主力在锦州以南陷于绝境。奉方为解除直军对锦州的威胁，确保主战场山海关方面的战争顺利进行，便决定投入较强的兵力分别集中在义县和距锦州以北数十里的大窑沟二地，然后向朝阳及凌源发动进攻，并将攻克凌源作为战争初期的战略目标。北路奉军预定计划由通辽出开鲁，然后经赤峰南下承德，向喜峰口以西各口展开进攻。这一路山道崎岖，荒无人烟，行军艰难，因而奉方以骑兵作为主力部队。

根据这一战略部署，张作霖便分别调动李景林、张宗昌的奉军第二军担任热河南路的主攻任务，命李景林的第一师在义县集结之后进攻朝阳，张宗昌的第三混成旅在大窑沟集结进入热河。先由张宗昌的部队截断朝阳与凌源之间的交通，然后再由该部协助李景林向朝阳进攻，并命第五军司令吴俊升、副司令阚朝玺、第六军司令许兰洲、副司令吴光新率领所属骑兵部队进攻开鲁、赤峰，与李景林的部队协同作战。

李景林、张宗昌所率领的奉军第二军部队训练有素，作战能力很强，而李、张又都是久经战阵的奉军悍将。

李景林：1886 年生，直隶省枣强县人。早年毕业于保定北洋武

备学堂，后在黑龙江巡防营任职，1914 年任黑龙江陆军暂编第一师参谋长，1918 年任援陕军司令部参议，次年又任参战军第一师步兵一旅第一团团长，1921 年任奉军第七混成旅旅长，1922 年升任奉军暂编陆军第一师师长，1924 年 9 月第二次直奉战争中任奉军第二军副军长。李景林属于奉军中所谓新派中陆大派的骨干，因为在第一次直奉战争中的最后阶段，他在山海关抗击直军的战斗中发挥了很大作用，所以受到张作霖的重视，成为奉军的主要将领。

张宗昌：1881 年生，字效坤，山东掖县人。早年曾随同母亲到关外谋生，在东北修建过中东铁路，后来又当了土匪。1911 年武昌起义爆发后，他曾率百余人回到烟台参加山东民军，后转赴上海投奔了陈其美，任光复军骑兵独立团团长。1913 年二次革命时，他在徐州临城倒戈投靠冯国璋，先后任旅长、军官教育团团长。1917 年，张宗昌以暂编陆军第一师师长之职，跟随张怀芝假道江西与护法军作战。张怀芝在湖南失败，张宗昌的部队在赣南被江西督军陈光远之弟陈光逵解散。张宗昌走投无路，于 1922 年只身投靠张作霖。张作霖编了一个营的宪兵让他带领。在这之前，由于张作霖撤掉吉林督军孟恩远的职位，孟的外甥高士傧勾结吉林胡子卢永贵反抗张作霖。张作霖委派张宗昌率部消灭这股力量。作战中，张宗昌拉拢胡子中的山东同乡瓦解敌军，结果以少胜多大胜而归，从此受到张作霖的重视，升任吉林省防军第三旅旅长兼绥宁镇守使。1922 年冬，苏俄革命政权挫败了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白俄的一部分残余势力逃到东北境内。由于张宗昌稍通俄语，流亡的白卫军便请求他给予收编。于是张宗昌不费任何气力地从白俄手里获得 8000 多支步枪及 20 门大炮，白俄军的谢米诺夫也当上了他的顾问。张宗昌又将白卫军中有技术的官兵组成工兵队，在作战中打前站。从此，张宗昌的实力大增，成为奉军中一支勇猛剽悍的部队。

直系在热河方面部队的部署是：龚汉治的直军第四巡防营的

5000 人驻守朝阳一带，米振标的毅军约 2000 人驻赤峰一带，张林的热河第一混成旅约 3000 人驻守林西、朝阳。另外还有热河游击队 7000 人及热河巡防营的千余人分别驻守在开鲁、绥东、平泉等地。这些军队统归王怀庆指挥，他们纪律松弛，官兵腐败，装备陈旧，是直军中最薄弱的一支。战争之初，直方在热河方面制定的战略是分五路对奉方进攻，一路进攻新立屯截断新民；一路攻取九关台进占义州；一路经女儿河，进据锦州；一路出梨树沟截断山海关后路；一路由林西、赤峰的毅军迅速东进至开鲁、绥东及阜新的后援，同时策动地方武装扰乱奉军后方。但是，这些军事部署由于奉军的先发制人，迅速攻人热河而成了纸上谈兵。在奉军的猛烈进攻下，直军很快处于被动地位。

1924 年 9 月中旬，李景林所部的一个旅迅速开进义州、九官、台门与米振标的 4 个营接触，直军很快溃败，奉军进入阜新县境内。9 月 16 日，李景林部第一师所属胡毓坤团在午前 7 时向阜新县城发起猛攻。阜新是热河重镇，为辽宁通向热河的咽喉，直方有守军三四千名，并且筑有较坚固的防御工事。胡指挥士兵将直军迅速击败，直方死伤有 200 余名，奉军遂抢占阜新县城。阜新县属地朱力各歹(蒙语译音)，形势险要，与阜新县城相犄角，直方有千余人在这里防御。李景林部窦团自 9 月 16 日拂晓向该地攻击，酣战至午后 3 时，直军被击退，奉军迅即占领该地。

9 月 19 日，奉军进攻三义栈及朝阳寺。两地均为高山峻岭，地势险峻。朝阳寺山为啦吗洞山南行之山系，距朝阳县城 120 华里，山前有庙，俗称朝阳寺，山峦峭立，易守难攻。直方有从热河开来的一个混成旅在此包围奉军第二军第二梯队的张团，并向奉军发起猛攻。奉军拚死抵抗，苦战 2 昼夜，结果直军负伤 400 人，战死 200 人，仓惶地向朝阳县城退却。奉军接着攻占了朝阳县界的南岭及距朝阳寺 70 华里的大板。这时，大凌河左岸的险要地带都被奉军占领，奉军便集中力量进攻朝阳。

当时，直军驻防朝阳的有朝阜边防司令兼十二师二十六旅旅长刘富有，热河第一混成旅旅长张林所属骑兵2个团，朝阳镇守使兼巡防八营统领龚汉治所属步兵一营，炮兵一连。这些军队分布在朝阳县的要害地区。当奉军进攻热河的消息传出后，张林曾建议召开会议先作预防，而龚汉治却"骄狂自若"，不作任何准备。9月19日，奉军的2个旅由锦朝铁路开到朝阳境内的邹家屯，而这时刘富有还滞留在北京。张林主张出兵北票进行抵御，龚汉治却将早先抓来的车辆以运送军饷为名私行扣留，做好了逃跑的准备。20日，直奉双方接触，只有张林孤军作战，刘富有由凌源率军到朝阳，对战事漠不关心。当时，毅军由赤峰的乌丹城、建平的新邱开到两个营，次日驰往前线。奉军用迫击炮向直军猛轰，直军二十六旅败退。刘富有闻讯便"于夜半召集守城军人，护车辆出城西奔"[1]，张林的部队陆续撤退到朝阳县城，二十六旅已"大半溃散"，朝阳县长闻风而逃，朝阳的"文武官员俱已逃散，所有商民锁闭门户，扶持老幼拥挤出城，奔走哭号，声震原野"[2]。张林见"孤城难守，乃率全队出南门西去"。9月23日，奉军占领朝阳县城。

(二)奉军攻占凌源、赤峰

奉军占领朝阳之后，分兵两路，一路直攻建平，一路攻取凌源。李景林由距朝阳县城30里的大青山长驱直入向建平发动进攻。9月25日，直方毅军由建平方面潜行东进，遭到奉军的中途袭击。双方激战2小时，直军死伤500余人，奉军在28日占领兴隆沟，直军向叶柏寿方向退却，奉军进至扎萨营。

由朝阳溃退的直军分置三路防线，张林部占领饮水泉、陈家沟之线，二十六旅以步兵五营占领马架子西方高地，一营分置于叶柏寿，热河巡防第八营约500人占领中官营附近高地。奉军命窦团向叶柏寿前进，胡团向中官营前进。

奉军胡团于9月28日早7点至中官营高地，当即投入战斗，午前10时，直军退却。胡团尾追至马架子西方高地时，遇有直军

步、炮兵千余名，即行攻击，直军退至东南方的北沟进行顽强抵抗。午后5时，窦团到达黄土梁以西地区，绕击直军后路。胡团以第三营包围直军左翼发起猛攻。直军即向叶柏寿退却，午后7时，奉军窦团抵叶柏寿，驻守叶柏寿的直军溃败。而马架子的直军败兵也向叶柏寿溃退，中途遭到胡团的截击。29日上午，张宗昌命令第二梯队吴光新、李爽垲部在陈家沟向直军展开攻击。该地的直军约在一个混成旅以上，他们凭河拒守，双方鏖战七八小时，最后直军后退，奉军便乘势攻克建平县城。

奉军张宗昌部向凌源发动进攻，直军在官营子进行抵御。张部邢士廉旅打败直军，俘获直军第十三师五十一团2个营长及兵士270余名。直军在凌源的驻军一触即溃，奉军迅速将凌源攻克。

张宗昌攻克凌源之后，即向凌源西南50里的茶棚进攻，其先头部队10月1日即与直军的后援部队接触。

由王怀庆和董政国率领的后援部队，在一星期前奉命向凌源进军。但是，由于指挥失策，各部队蜂拥争先，致使车辆拥塞，行动阻滞缓慢，又加上冷口以北山路狭窄，且"已先有四混成旅，二十三师经此路者，不下5万人，车数千辆，出口即入山沟，车行阻滞，经过车川沟数处大山，均需用滑杠始能通行，每过一车，须半小时"。[③]当援军抵叨尔登时，凌源已经失守。王怀庆与董政国面商等各自后援部队到达一部分就与奉军展开决战，并立即于9月30日及10月1日布置防线。董政国的第九师三十三团、三十五团在茶棚以北布防，三十四团在窟窿山对桃花池方向设立警戒，三十六团在叨尔登为预备队。王怀庆的五十团及第三大队在三十家子迤西方向设立防营，司令部就设在茶棚。10月1日午后开始与奉军接触，4日拂晓，奉军向直军防线发起攻击，直军右翼九师三十五团先行撤退，茶棚直军遭到包围，仓惶后撤。左翼第十三师五十七团及第三大队也抵挡不住奉军的进攻，在撤退时官兵均失联络，以致三十家子全线溃乱。退却时，一大队离前线六七里路，还没有接战

便闻风而逃。官兵逃散极多,军用物品丢失无数。王怀庆在茶棚失守后与董政国的第一军第三路分开,移驻平泉道上的樊杖子,再移于安大石一带;基本与奉军张宗昌部脱离接触。奉军乘胜前进,不想在玉麟山遭到董政国部的阻击。玉麟山为一条自西北斜向东南的山脉,青龙河流经其间。两岸有两个主峰对峙,峰高坡陡,很难攀登。两峰之间的河谷宽约 200 米,是自凌源南下冷口的必经之路,易守难攻。张宗昌投入了全部力量进攻,包括白俄部队的炮兵。直奉两军在此地鏖战七八昼夜,枪炮声响成一片,简直无法分辨出单个的子弹声音。打仗紧张的时候,张宗昌连护兵、、马弁、车夫都派出加入战斗,双方死伤惨重。最后张宗昌因获得了直军方面的军事配备地图避实击虚,取得了胜利。随后,奉军又在叨尔登民团头子张鹏飞的带领下,进马圈子、大杖子,直赴冷口。

奉军吴光新部在攻克建平之后,随即向赤峰前进。直军在漠里河发起反攻,吴光新与李景林的部队对直军实行夹击。10 月 5 日李景林派一团入猛攻直军,并派疑兵一队驰向西北方向,另外抽调部分军队袭击直军右翼。直军迎战 2 个小时,向后撤退。奉军也已疲惫,计划休整后再前进,不料由赤峰左方突有直军 1500 百余名骑步兵各半向奉军猛冲,奉军几乎被击溃。恰值许兰洲 2 营赶到,从直军左翼发动进攻,局势才得以扭转。双方激战 2 小时,奉军分兵三路围攻直军,直军陷入重围,被迫突围向赤峰撤退。7 日拂晓,王怀庆所属 2000 余人向奉军攻击,双方激战 4 小时,胜负未分。这时,奉军开来 2 架飞机,直军被迫后退。奉方飞机向赤峰投掷炸弹数枚,商民纷纷向城外逃散。奉军遂于 10 月 8 日占领赤峰,俘获毅军统领 1 名、营长 2 名,击毙统领 1 名。

赤峰失守,热河的重要地区就基本上被奉军占领。直军二十六旅已经全部溃散,米振标的毅军及龚汉治的直军巡防八营也陷于崩溃。

对于直军在热河方面的节节败退,吴佩孚得知后大怒,10 月 3

日，下令免去刘富有帮办热河军务及第十三师第二十六旅旅长兼第三军前敌总指挥等职，以陶经武任指挥，崔维藩继任旅长，免去龚汉治兼职，以张林继任。10月6日，又免去王怀庆第二军司令职，令张福来接替。

奉军之所以在热河战场迅速取得胜利，除直方守军力量薄弱，战斗力差之外，便是在这个时期张作霖与冯玉祥已经暗中勾结。

冯玉祥第三路军的任务是由古北口、喜峰口向平泉进军，会合第二路军进攻奉军的侧翼。9月20日，冯向曹锟辞行。次日，冯玉祥与陕军胡景翼的部队开始由北京出发。冯部第十一师旅长鹿钟麟及第七混成旅张之江的部队开向热河，二十五混成旅宋哲元的部队进抵密云。冯的司令部24日开始出发，当日到达怀柔，28日才开到密云，10月1日到达古北口。冯玉祥到达古北口之后，以筹措粮饷为名停止前进，并与胡景翼相联系暂缓进军。胡景翼的第一师徘徊于喜峰口、平泉之间，对直军在热河方面的失败坐视不救。10月11日，冯玉祥的参谋长刘骥还和段祺瑞的代表贾德耀在滦平与奉军代表签定不打内战的协定。奉方于是一面令张宗昌在凌源、青龙一带牵制董政国的军队，一面将热河方面的部分军队秘密转移到山海关战场。直军谭庆林部乘奉军调走，赤峰防守空虚之机，分三路向赤峰发动进攻。驻守赤峰的奉军战斗不支，向建平退却，直军于10月15日收复赤峰。王怀庆对这次反攻大加宣场，声称"此次我军攻克赤峰，声威大振，敌锋经此大挫，不难次第荡平"④，并赏银洋3万元振励军心。但是，这已根本无法挽回直军在热河方面的败势了。

注释：

①②朝阳县志(民国十九年编)卷34。

③《北洋政府档案》(一00二)300页

④《北洋政府档案》(廿六)101。

李大钊与热河地区早期革命斗争

马熙群

革命先驱李大钊，毕生精力致力于穷苦人民的解放事业，在“五·四”、建党及大革命时期，于中国的北方不但竭尽全力传播马列主义、组建国共两党地方组织，还进行过无数次革命斗争的实践。热河地区人民的早期革命斗争在李大钊的培养、帮助和指导下，从小到大，由弱变强，在一定时期还搞得轰轰烈烈，农运方面的工作曾名列北方各省区之前茅。直到李大钊遇害数年之后，由李大钊播下的革命火种仍然没有熄灭，而且越烧越旺。

一、培养革命骨干

要开展革命，就要有革命的骨干力量。在中国共产党建立前后，李大钊着意培养了在五四运动中表现非常活跃的韩麟符、陈镜湖等一批热河进步青年。

民国初年，赤峰青年韩麟符、建平青年陈镜湖等人先后到天津求学。1919 年五四运动爆发时，他们积极投身到这一爱国斗争中。韩麟符经常在群众集会上登台演讲，慷慨激昂，起到了很大的宣传鼓动作用[①]。陈镜湖加入了天津直隶省立一中的“学生救国团”，积极投入到了天津市的群众请愿、示威游行和街头宣传等活动中去。不久，由韩麟符、陈镜湖、于方舟、王天麟等人为骨干组建起“新生社”，并创办了刊物，名为《新生》。李大钊对这一进步青年的团体极为重视，并进行了耐心的帮助和引导。1920 年初，在李大钊的建议

下，“新生社”改组为“马克思主义研究会”[2]为天津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建立奠定了基础。1920年，韩麟符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3]陈镜湖于1923年在天津南开大学文科班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并担任团的组织工作。[4]同年，李大钊亲自介绍韩麟符、陈镜湖、于方舟等人加入中国共产党。[5]热河特别区是东蒙的一部分，建党初期，李大钊就十分关心重视民族问题与内蒙地区革命运动。他曾指出：应该把研究民族问题当做研究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内容。[6]李大钊亲自主持成立了“民族问题研究小组”，吸收韩麟符为小组成员。热河的进步青年遵照李大钊的指示，经常去内蒙或与内蒙古的同学通信，了解蒙古当时的一些问题。韩麟符写出《内蒙古及热察绥三区近况》，发表在党的刊物《向导》第75期上。陈镜湖也在同期发表《洛吴对内蒙之新政策》一文，揭露军阀与王公贵族勾结，奴役广大劳苦群众的罪行。他们在文章中向内蒙古同胞大声疾呼，“从速觉悟，不要忍受非人类的生活，当快与军阀及王公奋斗，夺回自己应有的权力”。

1924年国共两党实现了第一次合作。根据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精神，李大钊安排中共党员韩麟符、陈镜湖等以个人资格加入国民党，并作为直隶代表出席了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上，韩麟符、于方舟等共产党人被选为国民党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执行委员[7]。会后，韩麟符、陈镜湖等人在李大钊与中共北京区委的指派下，回热河开展革命活动。

二、组织建党

1924年11月，孙中山先生北上，并发表了《北上宣言》，提出了召开国民会议和废除不平等条约两大主张。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下，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个声势浩大的国民会议运动。为了推动这个运动在热河地区的开展，李大钊指定陈镜湖、杜真生（热河早期共产党员，后叛变）为孙中山北上的特派员宣传[8]。他们在热河

首府承德以秘密串联、召集座谈会、发动群众集会等多种形式宣传三民主义，反对军阀割据，反对帝国主义瓜分中国。在北京国民会议促成会代表大会期间，孙中山先生因积劳成疾而不幸逝世，噩耗传来，陈镜湖、杜真生在承德组织了大规模的悼念活动，并被群众推举为热河代表，到北京参加孙中山的祭奠活动。

全国国民会议促成会代表大会开过以后，李大钊看到热河特别区建立党组织的条件已经成熟，遂决定热河同察哈尔、绥远一起建立党的地方工作委员会，并委任陈镜湖为中共热河工委的负责人[③]。中共热河工作委员会是热河特别区第一个共产党的组织。

陈镜湖、杜真生等热河地区早期的共产党员，本着中共三大提出的"中国共产党不能公开活动的地方扩大国民党"的精神，在热河地区开展了扩大国民党组织的工作。首先，他们在承德南营子大街三条胡同上口的一个大院内组建了国民党热河部[④]，陈镜湖、杜真生均为党部执行委员，然后又进一步发展扩大国民党的组织，发展新党员。到 1926 年热河特别区已建国民党县党部 8 个，发展国民党党员 3500 多人[⑤]。

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国民党除积极倡导三民主义外，也努力开展反帝反封建的活动，而热河的国民党党部中的主要负责人同北方各地一样，多为共产党人，所以在他们的领导下，革命活动搞得轰轰烈烈。

在 1925 年五四爱国运动 6 周年之际，中共热河工委以国民党热河党部的名义在承德演武厅广场组织了承德市各界代表参加的近千人的纪念大会，声势悲壮，振奋人心。会上陈镜湖登台演讲，他慷慨激昂，在一一列举帝国主义妄想瓜分中国的罪行之后，带头高呼："打倒帝国主义！""收回租界地！"等口号，并在热河这块贫穷落后的塞外山城中第一次喊出："打倒土豪劣绅！""平均地权！"等穷苦百姓的心声。演讲结束时，他竭尽全力地高喊："猛醒吧，睡狮！觉悟吧，中国！"在场听众，声泪俱下。集会之后，陈镜湖等共产党人带

队游行，手擎小旗的群众游行队伍浩浩荡荡，威武雄壮地穿过承德繁华街市，当队伍来到二仙居、西大街等处时，部分同学登上高桌向市民讲，另有一部分同学生到各商店查烧商号的日货[12]。这些活动，对热河群众，特别对青年学生产生了很大影响。

1925 年 5 月 30 日，上海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中共热河工委根据李大钊和中共北京区委的指示，在热河迅速掀起了声援的浪潮。在首府承德，各界群众又一次走上街头，他们手挽着手行进在大街上，并高声唱道："叹！上海繁华世界已成屠杀场，工人流血学生死，残忍似豺狼。劝我国民急速起，誓死雪国耻，舍命救同胞，义气高千丈！"[13]参加游行集会，人数之多、范围之广都是空前的。

三、试建革命武装

李大钊早在建党初期就十分注意抓枪杆子，并主张建立工农武装，实行暴力革命。他曾指出：欲改良社会，非打倒帝国主义和军阀不可，而打倒帝国主义和军阀"只有一个方法：就是来到中国共产党的旗帜下，实行'暴力革命'。"他还强调："唯有枪才能对付枪，唯有暴力才能打倒暴力。"[14]李大钊这一革命斗争思想在当时的热河地区曾进行了多次的实践。

1923 年，在李大钊身边协助其从事民族工作的韩麟符，为了打开革命斗争的局面，决定遵循李大钊"实行暴力革命"的主张，在热河地区组建地方武装，以反抗反动军阀的黑暗统治。他派出 4 个"司令"到热河：赤峰方面郑丕烈，朝阳方面陈镜湖，建平方面杜真生，还有一名张资平，郑丕烈在赤峰曾组织 1000 多骑兵，在赤峰二道街中间路北一大院内设立司令部，门前插军旗，在群众中影响很大[15]。这次军事斗争，在各方反动势力的包围下，没有取得成功，但它毕竟是在共产党指导下进行武装斗争的一次初步尝试。

1924 年，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后，李大钊根据国

共合作的新形势，将一些杰出的共产党员派往倾向革命的西北军中，以加强、壮大驱逐反动奉系军阀的军事力量，扩大党在武装部队中的作用和影响。热河早期党员陈镜湖、杜真生等人前往西北军宋哲元部队中，被委以支队长等要职。中共北京区委负责内蒙古工作的韩麟符曾制定出《热河之工作计划》，拟定对热河所有农民武装、警察、军队及土匪近 3 万人，"供给军火，可以归于我方"，编为国民自卫军。并拟在克什克腾旗达赖诺尔湖以北的韩大庙一带"创设国民自卫军之根据地。"[16]目的是为建立北方工农红军打下基础。以上计划及其行动虽然有些幼稚，可它是中国共产党直接抓武装部队建设的又一种形式的尝试。

1924 年 10 月 5 日，直系军阀第三路军司令冯玉祥来到热河首府承德，与副司令王承斌密商北京政变等事宜，并于 22 日回师北京，取得了政变的成功，冯部也改称为国民军。这时，由李大钊派往西北军中的共产党员陈镜湖被委以热河民军司令。为了壮大热河民军的实力，陈镜湖曾带人到热东一带招收骑兵，很快建立起一支由共产党员掌握并领导的千余人的武装力量[17]。

1925 年冬，李大钊在张家口主持召开了农工兵大同盟成立大会，热河早期共产党员韩麟符被选为同盟会副书记（书记为李大钊）。陈镜湖、郑丕烈（热河早期中共产党员，后叛变）为同盟会中央执行委员。会上，韩麟符做了军事报告，并被指定负责军事工作。会后，李大钊认为应该建立一支同盟会自己的武装，这一想法得到共产国际的支持。不久，在苏联的军事援助下，李大钊派出 30 多名共产党员为骨干，单独组织起内蒙古特别民军 3 个纵队（相当于 3 个团）[18]。第一纵队司令由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由李大钊提议、经共产国际同意而组建的）中央常务委员乐景涛担任；第二、三纵队司令分别由热河早期共产党员陈镜湖、郑丕烈担任。特别民军成立之后，李大钊亲自来到热河附近的多伦，检阅了这支由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发起、组建和领导的革命队伍。这支队伍，军纪严明、不扰民、

不害民、官兵一致、军民一致，深受当地人民的拥护和爱戴。

1925 年 12 日，当冯玉祥向奉系反动军阀发动进功时，内蒙古特别民军配合冯部给奉军以很大的打击。第一纵队攻下了热河的经绷、林西、乌丹一带，将石文华部击溃；陈镜湖率领的第二纵队协助宋哲元进攻热河首府承德，赶走了奉系军阀派驻热河的都统阚朝玺。之后，又转战千里，鏖战西南晋军；郑丕烈率领的第三纵队于冰天雪地之中，转战于热北、热东各地，攻克了建平、赤峰、朝阳、开鲁等重镇，逼得奉军节节败退。由于特别民军战绩显著，开创了热河地区的大好局面，北京政府任命宋哲元为热河都统，宋解除了原奉系军阀的种种禁令，使得热河地区革命斗争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任何反动势力都不会轻易地退出历史舞台。奉系军阀在热河的黑暗统治被推翻之后，便勾结直系、晋系两大军阀，联合起来从四面围击冯玉祥的国民军。陈镜湖、郑丕烈等共产党人率领内蒙特别民军同冯部一起奋力抗击，终因寡不敌众，损失惨重。不久向西突围，参加五原誓师之后，攻西安，出潼关，下河南，与广州北上的北伐军会师郑州。

内蒙古特别民军西撤时编入了冯玉祥的部队，民军的几位共产党员在冯蒋联合后冯"礼送共产党出境"时，先后离开冯部，返回热河。由此，使得卷土重来的奉系军阀大为恐慌。热河都统汤玉麟于 1927 年 1 月 7 日令热河警务处，不惜重金悬赏缉拿他们："查热境人民，前被国民军招收官佐士兵颇多，近来国民军势败力弱，纷纷逃散。近闻该团团长郑丕烈、第二纵队司令陈镜湖、参谋长杜真生，均系建平县人，副官文舞轩系平泉县人，现已潜回热河境内，希图为患将来，急应分别悬赏侦缉，以免扰乱地方……。拿获郑丕烈、陈镜湖两名者，各给赏洋 1000 元；拿获杜真生、文舞轩两名者，各给赏洋 500 元。"[1]同年 4 月 6 日，李大钊等 60 余人在京被奉系军阀张作霖逮捕，中共北方区委机关遭到破坏，韩麟符拟定的《热河

之工作计划》被反动军警查缴，使热河的革命组织及活动蒙受了巨大的损失。

李大钊去世之后，他在热河地区点燃的武装斗争的烈火并没有熄灭。不久，中共北方局负责人蔡和森指派郑丕烈返回热河发动农民武装暴动，以响应南昌起义之后的全国总暴动，郑回到热河之后，在一个月中发动了1000多农民武装，在建平、赤峰两县交界处开辟了300平方里的游击区[29]。由于他们频频出击，使反动统治者十分恐慌，建平县警察所所长张麟阁在向上级呈报中惊呼："前国民军团长郑丕烈潜迹赤建交壤之地，搅乱商民。"热河都统汤玉麟遂派大兵前来镇压，终使这次农民武装斗争又归于失败。之后，在热河地区，由共产党员参加或领导的群众斗争好象大海的怒涛，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一刻也没有停止过。

中国共产党在北方组织建立革命武装的几次尝试都失败了，没能搞成像南方武装斗争那样轰轰烈烈的局面，这主要是由于北方封建军阀势力过于强大和北方共产党组织力量弱小的缘故，特别是李大钊于1927年被奉系军阀杀害，也是北方武装斗争没能继续发展起来的一个重要原因。可是，李大钊和中共北方区委所进行的武装斗争的尝试是伟大的，是中国革命史上的光辉篇章。

四、工农运动的新发展

在李大钊的指引和帮助下，热河地区的工农运动经历了一个由自发到有组织、有领导、有目标的开展过程。

1、热河人民的自发斗争

热河地处塞外，地广人稀，气候恶劣，土地瘠薄，加上蒙古王公、封建军阀、官僚劣绅的压迫和奴役，使得热河的百姓，特别是绝大多数的农牧民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又因热河是连接东北与华北的枢纽，进出关之咽喉，具有非常重要的战略地位，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连年的战火更使热河人民雪上加霜。自清末民初以来，

各任的统治者为了增加税收，不惜剜肉补疮，大面积种植鸦片，人们本来衣食无着，成千上万的人又染上吸毒之弊病，故面在穷途末路之时，铤而走险者不计其数。由此，热河百姓又增加了一层灾难，那就是大小"杆子"，数百股土匪所造成的"匪患"。自古有"官匪一家"之说，热河也不例外，由 1912 年至 1926 年的短短 14 年的时间，热河便有熊希龄、姜桂题、汲金纯、王怀庆、米振标、阚朝玺、宋哲元、汤玉麟等 8 人出任过都统，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为中饱私囊，变换手法，搜刮民脂民膏。1924 年奉系军阀阚朝玺出任热河都统时，向日本借款 100 万元，又发行纸币达 2000 万元，之后兵败撤走，只好声明作废，热河人民蒙受重大损失[②]。各届军阀摊派到人们头上的军费开支以及土匪的明抢明要更使百姓苦不堪言，在忍无可忍时，民众不得不聚众造反。自清末以来，热河境内先后有马傻子农民起义、李凤奎起义、金丹教大起义、义和团运动、赵子馥聚众造反、高振英武装抗捐等较大规模的武装反抗 10 余起。开始，人们因饥荒而聚众到富户门前"坐卧乞食"，矛盾激化之后发展为"分食大户"，最后往往因封建统治阶级的镇压而爆发起更大规模的武装反抗。但是，由于奋起反抗的农民武装，没有先进阶级的领导，更没有革命理论的指导，尽管多次发展到数千人的队伍，有的坚持斗争七八年之久，最终都以遭反动统治者的残酷镇压面失败。

2、李大钊为热河农运播下了革命的火种

早在五四运动前夕，李大钊就号召青年到农村去，发动、教育农民，建立民主政治。1919 年 2 月，他在《晨报》上发表的《青年与农村》一文中就明确地指出："中国农村的黑暗，算是达于极点，那些贪官、污吏、恶绅、劣董，专靠差役、土棍做他们的爪牙，去鱼肉那些老百姓。""他们若是不解放，就是我们国民全体不解放；他们的苦恼，就是我们国民全体的苦恼；他们的黑暗，就是我们国民全体的黑暗；他们生活的利病，就是我们政治全体的利病。"他主张必须教育农民，"去开发他们，使他们知道要求解放，陈说苦痛，脱去愚

暗"，唤起他们的觉醒，以推翻封建势力对农村野蛮的统治。1924年3月8日，中共北京区委正式成立了领导农民运动的机构——农民运动委员会，该会由李大钊亲自领导。热河地区的几名早期党员在李大钊的教育和指导下，始终把发动农民的工作放在重要的位置上。每次集会演讲时，他们都要为广大劳苦农民呼吁："打倒土豪劣绅！""实行耕者有其田！"……。

1925年冬，李大钊在张家口主持召开的"农工兵大同盟代表大会"之后，热河农民代表返回各地开始组建农民协会。时隔不久，1926年1月李大钊创办了中共北方区委党校训练班，热河又派数十人前来受训。在集训中，李大钊亲自给学员们讲土地与农民问题。他指出，农民是中国革命极为重要的力量，"中国浩大的农民群众，如果能够组织起来，参加国民革命，中国国民革命的成功就不远了。[22]"他强调："在乡村中做农民运动的人们，第一要紧的工作，是唤起贫农阶级、组织农民协会。"1926年3月，在李大钊和中共北方区委的安排下，又派出热河马德元等4人赴广州参加毛泽东主持的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23]在那里，他们聆听了无产阶级革命家毛泽东、周恩来、彭湃、萧楚女、恽代英等人的讲课，并到当时农民运动蓬勃开展的海陆丰等地参观学习，进行了农民问题的调查研究，大大丰富了从事农民运动的理论与实践。两个培训班中的农运骨干，返回热河之后，热河的农运活动如虎添翼，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创办起县农民协会9个，区农会13个，乡(村)农会56个，共发展农会会员5423人，热河地区农会组织之多、会员之广，在全国各省区占第12位，在北方仅次于山西省，位居第2位。[24]

热河的农会创建之后，在揭露反动军阀黑暗统治，组织宣传群众保护农民利益上做了大量的工作。朝阳六区的农民协会，设在北票镇北街，由铁匠营的一个穷秀才王在庭出任农会会长。为团结农民，开展活动，区农会成立了俱乐部，用讲演和文艺等形式宣传革

命道理，使广大穷苦农民明白了只有团结起来，才能抵制反动阶级的黑暗统治。区农会还以一批知识分子为骨干，派他们下乡去宣传和组织发动群众参加农会，大大地扩大了农会的影响。由于农会工作开展的很活跃，农民把农会干部看成是“娘家人”，无论有什么困难都找到农会，请其帮忙。高杖子村贫苦农民高老九，由于受人诬告，在朝阳县衙吃了官司，有冤无处伸，便找到区农会。会长王秀才听了高老九的陈述之后，义愤填膺，挺身而出。他面见县长，慷慨陈词，终于替 高老九洗刷了冤情。贫苦农民耳闻目睹，了解到农会真正的是农民自己的组织，所以参加农会的人越来越多。

3、活跃的工人运动

热河地区的产业工人较少，工运多集中在北部。由于李大钊的故乡，唐山地区的工人运动搞得如火如荼，革命的烈火由京奉路向北发展，波及到热河北部重镇北票。1925 年 4 月，北票路矿工人举行了联合大罢工，火车停驶，煤矿停产，到处贴出“打倒帝国主义!”、“给工人长工钱!”等标语。面对矿警的枪口和刺刀，工人毫不示弱，以石块回击，一直坚持斗争 35 天，终于取得了胜利。

1926 年 10 月至 1927 年 3 月，上海工人举行了 3 次武装起义，最终在周恩来等人领导下取得了成功。热河北票矿 1500 多名工人闻讯后，在工人领袖阮关荣的领导下，捐款 1000 多银元，支援了上海兄弟，表达了热河工人阶级的胸怀。[㉓]

北票煤矿的矿长是英国人，叫莫勒，他日工资 1300 多银元，而工人每天只赚 2 元 6 角钱。由于他大量榨取工人的血汗，工人们时有反抗。莫勒见势不妙，便想携带大批财物回国，2000 多工人将他的专车团团围住，要求发放拖欠的“煤金”，一直坚持 3 天，直到取得胜利才放他离开。热河工人阶级的觉醒，将热河地区的工农运动推向了一个新台阶。

五. 热河革命斗争后继有人

任何革命运动都不会是一帆风顺的，热河地区的工农运动也是如此。1927 年 4 月 12 日，蒋介石发动了震惊中外的反革命政变，大批共产党人惨遭杀害。北方反动的奉系军阀遥相呼应，于同月 28 日将李大钊等 20 多名革命先驱杀害，热河的国共两党组织也被奉系军阀摧毁，党的负责人被迫转移到天津，热河的革命斗争转入了低潮。在这革命的紧急关头，中国共产党于武汉举行了全国第五次代表大会，热河早期党的负责人陈镜湖、乌子真做为正式代表出席了大会。同年 9 月，中共北方局在天津召开扩大会议，确定了工作的总方针：实行土地革命，打倒一切旧军阀，土豪劣绅阶级和资产阶级，发动与组织农民战争，建立工农兵苏维埃政权。热河早期党员郑丕烈返回热河原籍，按中共顺直省委要求组织地方暴动，因为省委这个"北方暴动计划"本身就是脱离实际的冒险行动，致使热河地区的农民暴动同其它地区一样，时间不长便因反动军阀镇压而夭折了。

1928 年 4 月，经中共中央批准，在顺直省委领导下，建立了内蒙古特别支部，委员 7 人，韩麟符任书记，负责指导热河、绥远、察哈尔三特别区工作。这时，白色恐怖笼罩着整个中国，韩麟符、郑丕烈等人在极其艰苦的环境下，在三特区恢复发展党的组织。在他们积极活动下，热河地区很快建立起中共赤峰、建平、朝阳 3 个支部，共有党员 20 名，并推选热河早期共产党员白海风(喀喇沁右旗人)到莫斯科出席了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为了使热河地方党组织能够掌握一支自己的武装的队伍，韩麟符、郑丕烈亲自到朝阳县的朝阳寺(今北票上园乡)一带活动。他们首先创办了一座"诚修学校"，并对穷人的孩子免费入学，由此广交了一些知心的农民朋友。之后，他们又以抗捐、保境安民为口号，公开地组织起农民的自卫武装——联庄会。同时，他们秘密串联，先后在土宝营子、

靰鞡草沟、后砬子沟、喇嘛东山、新荒地村等地同农民"结义"(当地人叫"磕大帮头"),联络组织了大批的骨干力量,并秘密运来了一批武器,准备进行武装暴动,不幸的是这些活动被盘踞在热河的军阀汤玉麟所派出的特务发现,汤派出大批的武装前来镇压,将一场策划已久的暴动扼杀在摇篮中。韩麟符、郑丕烈虽然在事先得知情况及时转移了,但一批当地的农运骨干最后终遭逮捕被投入监狱。[29]

1928年7月,中共顺直省委认为韩麟符"犯了军事投机及组织上的错误",撤销了他的职务。之后,又将内蒙古特支分解为热、察、绥三个临时县委,热河县委负责人由郑丕烈担任。同年10月中共中央决定组织内蒙古革命委员会,由杨洪涛、郑丕烈负责,归中央直接领导,负责热、察、绥三特区党的工作。

1929年1月,内蒙古革命委员会杨洪涛等10余名领导干部被捕。2月,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共内蒙古特别委员会,郑丕烈任书记,仍负责热、察、绥的工作。

1930年6月到1931年2月,顺直省委和内蒙古特委相继遭敌人破坏,韩麟符、郑丕烈、杜真生等70多名干部被捕。中央指示满洲省委重建内蒙特委,以热河为中心开展内蒙古工作。原特委委员陈镜湖、刘刚二人在交通闭塞的热河山区与党的组织失去了联系,便徒步穿越蒙古草原,到莫斯科找到共产国际,才与上海党中央接上关系,后在满洲省委指导下重新组建内蒙古特委。陈镜湖、刘刚于1931年10月2日在滦平县金沟屯召开了"内蒙古各旗县党部代表联席会议",会议整顿了组织,总结了前段的工作,提出"目前最紧急的中心任务"。此时,内蒙特委下辖县党部5个,旗党部3个,特支3个,共有党员93个,会议选出特委委员7人,陈镜湖(这时改名为李铁然)为特委书记兼组织委员。特委机关设于滦平县金沟屯。

热河地区党的组织时刻注意密切联系群众,并适时地参加、指

导当地的农民暴动武装，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凌源县张明久聚众砸盐卡，抗捐抗税，成立"保安总会"，入会者达 5000 多人，有枪 2000 余支[⑦]，有多名共产党员参加了这支农民暴动的队伍。这次农民运动的规模之大，范围之广，连当时的热河省当局亦称："民国以来所罕见。"到后来，反动军阀派大批武装前来镇压，在力量相差悬殊的情况下，其中几名共产党员积极活动，让大家埋藏武器，化整为零，待机而动。这次农民暴动失败后，中共内蒙特委书记陈镜胡(李铁然)写给中央的两次报告中均提到此事，从中还总结出党指导农民运动的一些教训。

1933 年 3 月，热河被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之后，李铁然除安置部分中共党员坚持当地斗争外，带领部分中共内蒙特委的同志由热河的围场县转到张家口，并参加了那里的抗日同盟军的组建工作。

热河地区早期革命斗争的烈火，经李大钊点燃之后，虽经几起几落，但越烧越旺。尤其是他亲自培育的热河早期共产党员，他们在热河地区不但起到了启蒙作用，而且深入学生、士兵及最下层的劳苦农民中宣传、发动、组织革命武装，为热河地区培育了大批的骨干力量。由此，在后来的抗日战争及解放战争中，热河人民均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注释：

①吕职人：《关于韩麟符同志历史一些回忆》，天津文史资料委员会存。

②王凤钧、胡广志：《塞北早春播火人——记革命先驱陈镜湖》，载《星火春秋》第 18 页，该书由中共建平县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于 1986 年 5 月编印。

③⑤⑥《罗章龙先生谈韩麟符》，载《昭乌达盟地区党史资料》第 5 期，该刊由内蒙古自治区原昭乌达盟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 1983 年 5 月印刷。

④黄凤岐：《朝阳史话》第 191 页，该书由辽宁人民出版社于 1986 年 6 月出版、发行。

⑦《中国国民党第一、二、三、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汇刊》，广东档案馆存。

⑧《杜真生生平简介》，载《星火春秋》第 157 页。

⑨ 刘景恩、李久荣：《陈镜湖烈士传》，中共朝阳地委党史办公室《党史资料简报》第 27 期第 12 页。

⑩《热河革命史稿》第 28 页，文化艺术出版社，1988 年 11 月出版。

⑪ 原赤峰市政协委员韩述愈所撰写的《韩麟符传》。

⑫《热河革命史大事记》第 10 页，文化艺术出版社，1988 年 11 月出版。

⑬ 据原贵州省委统战部长、政协副主席兼党组书记惠世如给本文作者的来信。

⑭ 中共北京地委：《敬告国人书》、《敬告劳动者书》，1922 年 10 月 10 日。引于《热河革命史稿》第 33 页。

⑮据原赤峰市政协委员韩述愈的回忆。

⑯《热河革命史大事记》第 9 页，文化艺术出版社 1988 年 11 月出版。

⑰ 邓一民：《中国共产党在热河的早期活动》，载于《河北党史资料》第 9 期第 49 页。

⑱《革命楷模陈镜湖》第 36 页，白山出版社，1989 年 6 月出版。

⑲ 辽宁档案馆热河公署全宗一类目录第 24 卷。

⑳《郑丕烈自传》，存于四川省宜宾市公安局档案馆。

㉑《热河革命史稿》362 页，文化艺术出版社，1988 年 11 月出版。

㉒《李大钊在河北》148 页，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

㉓据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资料室档案记载。

㉔ 1927 年 4 月《国民党热河党部的报告》，载于 1928 年出版的《中国劳动年鉴》。

㉕《热河革命史大事记》第 14 页，文化艺术出版社，1988 年 11 月出版。

㉖《星火春秋》第 4 页，辽宁省建平县党史办 1986 年 5 月编印。

㉗《热河革命史稿》第 25 页，文化艺术出版社，1988 年 11 月出版。

山海关之战及热河沦陷前后

何柱国

榆关浴血抗战经过

1933年元旦早上，我在北平得知榆关情势紧张，断定战事即将爆发，乃奉命立即赶回榆关前线。我记得当时是乘坐一个专为我而开的火车头赶回去的。我上车后，因战事早已料定，而作战计划也早已决定，并早已向官兵们作了布置，所以并没觉得紧张忙乱。只是想起了一年多以来的忍气吞声和无可奈何的为难情景，总算等到了今天，除打仗以外，再无其他事情牵挂，顿时如释重负，满身轻松，不禁哼出了“慷慨赴死易，从容就义难”的诗句。到了秦皇岛，前方战火已甚猛烈，我除了下令坚决抵抗之外，一切皆照预定计划进行。主要是坚定不移地把主力布置在北戴河至界岭口一线。不过，石河也有所准备，而榆关方面则尽可能实行阻击。战事从1日夜半开始，激战至3日下午2时，榆关终于失陷。

当时战斗的具体经过是这样的：

日方兵力，除榆关所驻部队及伪警之外，又由绥中增来步兵约3000余名，野炮、野战重炮约40余门，飞机8架，铁甲车3列，坦克约20余辆，兵舰两艘。战斗开始，日军即用炮火及铁甲车、兵舰、重炮同时向我临榆县城南门城楼、鼓楼、东南角楼、第一关各处猛烈炮击，并用飞机向我阵地及城内各处轰炸。又以石河桥配备之敌，牵制我六二六团西关之兵力。二里店、吴家岭之敌牵制我军北水关、角山寺之兵力。

我军六二六团兵力，以第一营守南门，第三营守天下第一关，其余少数兵力随团长在西门应援。石河县我守军兵力共计2257

名，第二营在孟家店及角山寺等地，策应守城部队，共计 1346 名。

自 1 日晚 10 点 50 分起，敌军屡次进攻，均被我军击退，枪声彻夜不止 。我又派铁甲车驰往石河西岸掩护工人，修理被炸铁桥，并骑马奔驰各地，布置军事，指挥作战。至 3 日午前 10 时，敌军以海陆空三军的火力由南关向南门主攻。我方城内实际只有两营兵力，犹猛烈还击，战况悲壮，燃烧爆炸，硝烟连天；南北城楼，以及商民住宅，炸毁尽净；我方人马伤亡过半，南城门及东南城角、西南水门一带，战斗尤为激烈。正午，南门及东南城角，均为敌人攀登占领。我预备队自西门向南门增援反击。第十一连又自“天下第一关”向东南城角逆袭，遂将敌人击退。午后 2 时，敌复增加强大兵力，再度总攻我东南城角，卒城被轰成巨大突破口，敌坦克及步兵跟踪挺进，我军屡堵屡仆，北门至东门立陷无险可守状态。是时，我方营长安德馨以下，二连刘连长、三连连长关景泉、四连连长王宏元、五连连长谢镇藩等人，尽皆战死，其余官兵也伤亡殆尽。团长石进安振臂一呼，率预备队与敌坦克作殊死巷战，一连连长赵璧连也负重伤，排长以下官兵又伤亡过半，四门均破，只有十几人在团长率领下，由北小门退出，榆关终于失陷。

在这短促的战役中，我九旅以不足一团的兵力（实际只有两个营）。事先，受辛丑条约规定之限制，不能预筑防御工事，与日本海陆空密切配合之强大敌人拼搏，竟毙敌 400 余人，安营长全营官兵覆殁在血泊之中。人民群众死伤在一千几百人以上，未能逃出的妇女、学生，几乎全部被日军屠杀。房舍被焚，财物损失，不计其数，残堪浩叹也！

总之，榆关失陷，对于我这个守将来说，是责无旁贷的。“天下第一关”这个天险，沦于敌手，我固引为终身遗恨。当时我的任务是保卫平津，拒敌于滦河以东之线。所以在临榆失陷之后，我没有进行反攻，只是指挥外围零星战斗，按预定计划，严阵以待准备与敌人作殊死拼搏，以保卫平津。但事出意外，敌人侵占榆关之后，没有

以主力继续前进，而是试探性地向九门口及石门寨打了两个小型战役，遭到一定的伤亡之后，改道由热河一路进关，而放弃了由山海关一路进关的战略，以其主力直趋热河，很快侵占了冷口、喜峰口和古北口，并且长驱直入造成了进逼通州、唐山、威胁平津。这种局势的造成，显然是狡猾的敌人预知我已有充分准备，如从山海关一路西进，必然要遭到我军痛击，而不敢轻易地长驱直入。

热河沦陷

日军占领榆关后，转攻热河，攫取长城各口。当时热河主席汤玉麟，外号“汤二虎”，是张作霖“拉竿子”起家的把兄弟，一贯骄横跋扈。他是1926年由辽宁边防镇守使调任热河都统，统带一个步兵旅到热河，横征暴敛，民不聊生，怨声载道。张学良曾有意派张作相去接替他，张作相知汤之为人，不愿前往。东三省失陷后，热河在军事上，为战略必守之地，在全国舆论的压力下，南京政府乃宣称：日军如进攻热河，决予抵抗。1933年2月中旬，蒋介石派财政部长宋子文、军政部长何应钦，内政部长黄绍竑，参谋次长杨杰、参谋部厅长熊斌等到北平。这些人来，名为与张学良商讨保卫热河长城各口及华北的防御计划，其实是逼张学良下野的。

2月17日，由张学良陪同宋子文、何应钦等到热河进行了一次视察。热河省会承德是清皇帝行宫之所在，宫殿富丽，风景优美。他们第一天是观赏风景，第二天汤玉麟开了一次欢迎会。会上宋子文讲话说：“中央计划不惜牺牲一切，保卫热河。”继又在清宫清音阁，召开一次军事会议，张学良、宋子文联名电告日内瓦中国驻“国联”代表团说：“决心抵抗日军之进一步入侵。”张学良又与张作相、万福麟、宋哲元等20余名将领发出通电，表示决心抵抗，呼吁国人支援。当时估计，热河至少可以支持3个月。张学良、宋子文等回到北平后，拟定了热河保卫战的初步计划，成立两个集团军，第一集团军辖3个军团。第一集团军总司令由张学良自兼；第二集团军

司令张作相，辖孙殿英一个军团、汤玉麟一个军团和张廷枢的第十二旅、冯占海等义勇军。张学良在北平顺承王府又召集一次军事会议，分配作战任务，宋子文等中央大员也参加了这次会议。张学良把热河地图铺在地板上，手执铅笔，勾划防线。当他划至冷口、喜峰口一线时，抬头向宋哲元说："明轩，你把守这一线。"宋却说："我的兵力单薄，装备也差，担当不了这一线任务。"张说："你放心，我派何柱国支援你。"宋仍是不肯接受。宋哲元原系西北军，曾与奉军内战几年，前嫌未消，故借辞推诿。所以，热河之战败得那样快，各军不能团结一致，这也是重要因素之一。2月22日，日军以锦州为大本营，用3个师团兵力（约10万人），分三路进攻热河，一路由绥中攻凌源，一路由通辽攻开鲁。张作相临时受命，兵力还未集结、仓促应战，将无守志、兵无战心。如开鲁一线，敌军撂了几个炸弹，出动了几辆坦克，守将崔兴武旅不战而降；万福麟第四军团守凌源一线，闻风而溃，朝阳随之弃守。日军长驱直入，于3月4日，以128骑的先头部队，突入承德。汤玉麟逃奔察哈尔，万福麟逃入喜峰口，张作相逃往古北口，热河就这样沦陷了。

长城各口之战况

热河失陷，长城各口之战即开始。张学良下野，何应钦继张学良任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代理委员长，黄绍竑任参谋长。他们仍然秉承其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既定方针，处理华北军事、外交事务。在外交上他们加紧活动，争取国际联盟制裁日本；在军事上对长城的古北口、喜峰口、独石口、冷口采取一些军事防御措施，想依靠这两千多年的防御工程——万里长城，阻止日军入侵华北，保住平津；将原守长城各口的东北军撤下来，调到北宁线天津以东整顿布防；以傅作义部防守独石口，以中央军徐庭瑶的第十七军的黄杰、关麟征、刘戡三个师进驻古北口；喜峰口防务由西北军宋哲元的第二十九军担任，孙殿英部守多伦，以牵制日军后方。这种布防分明

不是进攻，而是坐着挨打的阵势。3 月 4 日，日本关东军占领承德后，即分兵南下喜峰口，原退集喜峰口的万福麟部东北军，即撤入口内。3 月 9 日，喜峰口被日军占领。调往喜峰口的第二十九军宋哲元部的主力，尚在遵化，只有先头部队冯治安一个师于 9 日黄昏时到达喜峰口乘敌不备，用大刀进行夜袭，杀死很多日军，当夜夺回喜峰口。这是长城各口之战唯一的一次胜利。日军另一个师团向古北口进攻；关麟征的部队尚未到达，原驻古北口的东北军王以哲部曾往抵抗，但节节败退。于 3 月 11 日古北口被日军占领。待关麟征到达，虽然反攻，也未夺回。敌已迫近长城，若被突破一口，即牵动全线。我防守石门寨这个阵地就十分重要。如冷口有失，敌人就可以直下滦州，喜峰口不守，敌人就可以占丰润、下唐山，后路就被敌人截断。军分会总部考虑到此种情况，于 3 月 12 日，命令我部撤至滦河的西岸，破坏滦河铁桥，靠滦河部署阵地。这一措施，当时曾受到报纸舆论的谴责，认为这是屈服于敌人的压力，被迫撤退。何应钦在招待记者谈话时，特为此作了解释，说明系战略转移，非屈服于日军压力。

当时，我所防守的北戴河至石门寨这一线阵地，虽然形势突出，有被敌人截断退路之虞，且又适奉命向滦河以西转进之时，但在 3 月下旬至 4 月初旬，敌人先后向我石门、石门寨、界岭口、青山口、响水、里峪沟、海阳镇等阵地多次猛攻时，仍能经过大小战斗 20 余起，有的敌人被击退，有的是反复战斗。尤以界岭口、石门寨两地最为激烈，致敌我双方均有惨重伤亡。这时，我主力奉命撤至滦河之后，总觉得我的主力始终未得与敌人一拼，心有未甘。于是又有拉回北戴河一线之事。最后，蒋介石又派我的老师黄慕松前来，苦劝我服从撤退命令，说我那样屡进屡退，阻碍了中日的和平谈判。这样，我才再度撤至滦河西岸 。防守多伦的孙殿英 3 万人，经不起日本的威迫利诱，于 3 月上旬，不战而放弃多伦。长城各口除喜峰口尚在固守中，其余各口都被日军占领了。当时，我的部队

撤至滦河西岸，日军即进占抚宁、昌黎、卢龙等地与我军临时对峙。因敌人占领冷口及滦河上游迁安，我滦河西岸阵地侧背已受到威胁，于4月14日，我指挥轻骑一部向石门敌人进行一次袭击，克复石门，并占领安山车站。但敌人的主力，却继续进攻喜峰口之侧背，唯一固守的喜峰口，在危殆中。

先是于3月下旬，蒋介石自南昌飞来北平，在居仁堂开了一次会，我们这些将领都参加了。蒋除听取何应钦、黄绍竑汇报外，他指示："只能以现有的兵力，尽力抵抗，调兵增援是无法办到的。"他这时正在集中力量"围剿"苏区。他在北平停留了一天，就飞回南昌去了。此行不是为了如何加强对日作战，而是对何应钦面授机宜的。此时，何应钦根据长城各口之战失利的情况，下令宋哲元部撤出喜峰口，转至三河、平谷以东；何柱国、万福麟，王以哲部撤至宁河、宝坻之线；傅作义部于昌平、怀柔方面亦步步后撤。总之，由于蒋介石屈于对日求和，以致防备空虚，日军步步进逼，迫近顺义，距北平只有25余公里，平津已在日军三面包围之中，最后以签订屈辱的《塘沽协定》而告终。

往见汤玉麟和在顺承王府见闻

李树桂

往见汤玉麟

1932年夏初，驻防在北平清河镇整训的东北军独立第七旅王以哲部，接爱军委会北平分会代委员长张学良将军的命令，向密云县古北口开拔，并以一部进入热河，对热河汤玉麟所部进行警戒和战斗准备。旅的先头部队，越过古北口，进入热河境内，即奉令停止，选择阵地。前卫营已与驻巴克什营子的汤玉麟所部某团隔河对峙，战事大有一触即发之势。当时部队开拔急迫，动向机密，局外人知道的很少。我因在第七旅旅部任少校参谋，曾亲自参与其事，故知之较详，记忆犹新。

原因是这样的：日本军国主义者继1931年"九·一八"后占领东北全境后，正极力巩固刚建立的伪满洲国，积极准备向热河及华北进犯。而撤退到华北北部地区的东北军，也在整训和频繁地调动，准备对日军进行抗击。这时，在张学良将军周围的人，像万福麟、王以哲，认为热河省长汤玉麟政治腐败，动辄以功臣元老自居、不服节制；且有私通日伪的嫌疑，所以他们主张撤换汤玉麟。另一些人，像张作相、王树常等认为，传闻不可轻信，外敌压境，激成事变，反弄巧成拙，主张留用。于是，张学良将军采取了兼顾两方面意见的策略，以观动静。在王以哲的建议下，张学良将军同意秘密调集3个旅，以第七旅为前导，向热河进发，以防热汤（指汤玉麟，下同）有变。热汤闻讯，也调兵布置，以示有备。因而战事犹如箭在弦

上。

第七旅到达古北口的第二天，过午，旅长王以哲把我找去，交给我一个特殊任务，叫我陪着刚从承德来的汤玉麟总部参谋唐精武去承德一趟。并说："唐参谋是奉热汤的命令，对我旅的意图、动向，探风摸底来的。我仅敷衍了他一下。你跟他去关系重大。汤玉麟可能要亲自盘问你。"接着，就把应当回答的话，大概地告诉了我，还面授机宜说："你主要的任务还不在此，最重要的是去搜集热汤勾结日伪的确凿证据，发现他周围人的矛盾。如果有人与你勾搭和提供这方面的情况、材料，要热情接洽，严守秘密。顺便将古北口——承德的兵要地理和重要的地形侦察一下，如能绘具要图，回来一并汇报。"参谋长梁同淇又详细将进攻计划及战略上应留心注意之点予以指示。

当天下午，我随同唐精武参谋出发，一路边谈边探询地势。傍晚到达承德，受到热河军部责任参谋崔广森的热情招待。崔是东北讲武堂四期同学，又在陆大八期毕业的，所以洽谈颇欢。

翌日早饭后，崔参谋传话："请不要远离，汤大帅 10 点钟召见你。"届时由副官领我进入省政府内豪华的会客厅，在沙发上就座后，看到墙上悬挂着张作霖的巨幅戎装照片，以及张和汤的合影，特别引人注目的是另一面墙上，挂着一幅很大的猛虎下山图，虎视眈眈，虎威逼人。我不禁想起汤的绰号叫"汤大虎"，所以他才爱虎成性吧！

片刻，传来一连串"大帅下来啦"的喊声。门帘启处，汤玉麟领着 4 个人阔步而进。这个被张作霖视为股肱的双枪将，原来是一个长相粗鲁、派头十足、中等身材、50 岁开外的矮胖子。一番客套和礼节之后，汤本人坐在铺有虎皮的正座沙发上，其余依次就坐。我首先起立说："报告大帅，我是第七旅的少校参谋李树桂，受旅长派遣，前来和贵军联络，并代表旅长给大帅请安来的。"汤微笑点头会意，让我坐下。汤立即问我："你在王鼎芳（王以哲的字）旅几年啦？

都干过什么?第七旅什么时候开到古北口的?"对汤提出的问题,我都一一如实地作了回答。接着,他直截了当地问:"你们第七旅进入热河有什么任务? 是谁的命令? 为什么不在事先通知我一声呢?"我答道:"古北口是保卫平津的战略要地,你老知道,第七旅本来是张副司令(对张学良将军的通称)的警卫旅。此次是奉副司令的命令,进驻古北口附近,一部分进入热河境内,不过是一般的调防和部队演习。因出发匆忙,没来得及事先报告你老一声,所以旅长特派我来向大帅解释,请大帅原谅。"他又问:"听说万福麟在密云、怀柔一带的两个旅,也正在向热河进发,不知是否真实?"我答道:"听旅长说过,只是换防,并不是向热河方向来的。至于详细情况,我还不很了解。"他点了点头,但脸上却有一种不完全相信的表情。接着他提高嗓门,似乎发牢骚的口吻说:"我汤某虽是个粗人,可是忠义二字,尚知珍惜。少帅对我有时怀疑,不加信任,我不怪他。我知道,他妈的,都是那些坏人从中挑拨的。他现在是主持华北和东北军的军政首领,我是地方官又是军长,能不服从他的指挥吗? 我汤某人若有三心二意,不仅对不起他,也对不起故去的老帅呀! 我和老帅是八拜之交,出生入死的弟兄,我怎能背信弃义,反叛他的家业,敢和少帅作对呢? 我汤某人良心未泯,又怎能和日本人勾结,出卖祖宗的坟墓呢? 我知道王鼎芳是少帅的心腹,第七旅来热河没什么!他妈的,万福麟是个什么东西! 什么事都坏在他的身上! 有本事他去收复黑龙江! 如果他的部队敢来,想在热河找便宜,我豁出这条老命和他拼了! 你回去向王鼎芳说明我的意思,请他报告少帅,我汤某是个忠臣,绝不会和他有异心,也绝不会与日本人串通,阳一套,阴一套,不听他的命令。我是坚决支持和拥护他到底的……"我连连点头应道:"是,是。"并起身说道:"请大帅你老放心吧! 这些话,我保证一定能转达给副司令的。"他很高兴,又问了些北平的近况和第七旅的人事、装备等情况,约一个多小时才让我下去。并说:"你在这多玩几天吧!就说我留下的。"又对旁立的副官说:"这是我

的客人，给我好好招待。”于是我在承德就多呆了两天。

这两天，我受到十分特殊的款待。每日三餐，都由高级官员联名请客，宴席丰盛自不必说。第二天浏览了内外八景。限于时间，仅能走马观花，就草草结束了。

第三天，我以上街访友、买东西为由，逛了半天市容，深入茶坊、酒肆，探询风情及舆论。下午将几天见闻及接触的人、事作了笔录、绘图。晚间到参谋处闲聊，借以了解热军的实力和配备状况。

第四天上午，由参谋处派车及陪送人，同返古北口。当即向旅长、参谋长汇报往返详情，交出报告、略图等。

在顺承王府向张学良汇报

回到古北口旅部的第二天一早，旅长找我去，交给我一封亲笔信，叫我饭后即去北平，到张副司令住处面报热河之行的情况，并指示汇报要点。于是我带随从骑马驰往北平。一路上马不停蹄地奔跑，下午到家，稍作休息，5 点钟前，直驱顺承王府，先向副司令的承启官交出旅长的信，并说明须当面汇报。少顷，院里喊话：“古北口王旅长的来人，立即接见！”我被带到一间不大的小客厅，刚坐到下首沙发上，就有喊声，“副司令到！”掀起门帘，就见身穿便服的张学良将军只身进来。我立即站起立正，敬礼，问声：“少帅好！”他微笑致意，以手示意让我坐下。他坐在上首沙发上，拿着王旅长的信就看起来。我过去曾多次见过他，但那是在讲武堂、高研班以及阅兵大典或巡视北大营时，都是集体的，又相距较远，这次单独会面，还是首次。我看他精神很好，只面型稍较前瘦削了些，眼角略显出有些疲劳的样子。他看完了信，问我：“你就是亲去承德面见汤省长的李参谋吗？”我欠身应道：“是的。”他说：“那好！你就把经过谈一下吧！要简单扼要些！”于是，我便一五一十地谈了起来，他始终不动声色地静心地听着。当我谈到汤省长大发牢骚时，他两眼直视，十分注意，但始终没插一句话。直等我全部谈完，才问道：“汤省

长接见你时，都有谁在场？长相怎样？说了些什么？"我都作了详细的回答。显然，他对汤玉麟周围的人，是非常熟悉的。他从茶几的小抽屉里拿出铅笔来，把部分人的相貌、年龄、职务、观点等，都记在王旅长信封的背面。接着，他又问我："依你所见所闻，汤省长的备战情况怎样？"我说："据崔参谋说，他们正在改一架重机关枪，准备防空。但从各级官员到士兵来看，备战的行动是看不到的。尤其是高级官员仍在歌舞升平，花天酒地。"他似乎还想说什么话，忽然看了看表，对我说："就谈到这里，你回去吧！今天这些话，除王旅长外，不要向任何人讲。"我立正应声"是"，就敬礼转身退出。

张学良将军由诸方面的情报和迹象，参证我的汇报，确认汤玉麟并未与日伪勾结，还能服从指挥，为抗日的大局着想，因而继续对汤予以信任。不久，王以哲调北平军委分会任第一处处长，我也调到分会一处一组任少校组员。独立第七旅的番号，由南京国防部改为第一〇七师，师长职务由张政枋接替。

在顺承王府值班所见

1932年末，热河边境及长城上的各大口，屡遭日军的挑衅和骚扰。热河境内不断有汉奸、日特造谣滋事。日军大部队集结的消息，也不时传来，战事已迫在眉睫。张学良将军为了随时明了前方情况，令第一处在顺承王府官邸设一地图参谋室，以便就近查询，王以哲令我和本组上尉组员惠德安负责布置。我俩携带必需的地图、用品，到顺承王府东院一大间会议厅内，忙了一天一宿才布置就绪。外间是办公的地方，内间开辟为地图室，一面大墙上，张挂百万分之一的东北四省全图，另一面短墙上，张挂1/5000的热河省全图，以红笔勾画日军驻地、动向、兵种、兵力及部队序列，以蓝笔勾画我军情况。另剪成许多红蓝纸的小三角旗，以大头针当旗杆，写上部队番号，分别钉地驻地上。在屋内中间的大条案上，铺好热河省东部地区详图，用兵棋队标摆在部队位置上，能随时按情况变

化而移动。地图外面，用一层白绸布帘遮蔽。每天根据情报，将部队移动、变化情况，进行标注与调整。此后我每天都到此地上班，和张将军见面的机会就多了。因和他的内室很近，只要他在北平，几乎天天必来。有时傍晚偕同其他高级将领来，有时只身来，在地图面前研究敌情变化和部队调动。从他的面部表情，可以十分明显地看出他的心情和战局的变化是息息相关的。随着局势的恶化，他的忧虑神态，越发表露在眉宇间。

1933 年初，日军悍然进犯我山海关、九门口，何柱国军予以还击，长城抗战开始。1 月 3 日，山海关失守，张学良将军一面令何柱国率残部据滦河继续抵抗；一面将长城内的第二线部队之一部调热河布防，归新任命的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张作相(汤玉麟为副司令)指挥。但诸将领互相猜忌，行动迟疑，部队尚未调齐，日军即以三个师团、一个旅团及伪军一部，配备飞机、大炮、装甲车等，兵分三路，于 2 月下旬大举向热河进犯。开鲁、朝阳、凌源相继失守。形势骤然恶化，北平军委分会的气氛立即紧张起来。这时王以哲处长令我和惠德安值夜班，两个处长值白班。在这紧张繁忙的日子里，张将军陪同宋子文到承德视察，返回后几乎每天黄昏都到地图参谋室来，或查询战况，或问交办事件的结果。有时一宿来几次，全神贯注于热河战事。

败讯接二连三地传来。3 月 4 日，承德陷落的当天，消息是近黄昏时传来的。我俩刚到班，王处长还没走，当然他已知道战局的不利。这时，张将军恰好来了，一进门就对王处长说："老鼎，你看，汤玉麟不战而逃，万福麟临阵违令撤退"，他表情万分震怒与愤恨，一面用拳头擂着桌子，一面喊道："可耻！真可耻！纯粹是个孬种！这两个混蛋，一定要依法严办！"我还是初次看到他发这样大的脾气。次日，张将军就下令通缉汤玉麟，随后又任命东北军的宿将刘震东为热河挺进军总司令，让刘领导和组织溃逃的热河军进行反攻的准备。张将军还对王以哲处长说："如果刘震东不干，我就亲领

你们去收复热河。”后来，刘震东果然潜入热河，组成了抗日救国的部队。

有一天晚上，我正在顺承王府值班，张学良将军照例来查问情况。然后问我在沈阳还有些什么亲人，“九·一八”后是否逃出来了等等。我回答说只有妻子在友人帮助下逃了出来，还有些亲人都在沈阳，听说日本人到处抓军官的家属当人质，还奸杀抢掠，他们的生活很凄惨……不知是我哽咽和悲哀的声调，还是话的内容触动了他，他转身在房间里踱起步来。我看得出，这不是那种悠闲的或考虑问题的踱步，而是压抑着一种强烈感情的踱步。良久，他停步看着我说：“我们任何时候都不会忘记东北父老，我将不惜一切打回老家去！”这句话使我极为感动。“九·一八”时，他因为执行蒋介石的命令，蒙受了“不抵抗将军”的耻辱，现在，他决心要收复失地，以雪前耻了。

但是，没过几天，蒋介石就以热河失陷为由，逼张学良下野，让他到国外养病去了。随后，王以哲被任命为第六十七军军长，我同时被调升为军部中校参谋，星夜驰赴古北口前线。从此我就离开了北平军分会。

朱庆澜与辽吉黑热

民众抗日后援会

朱德君

回顾起“九·一八”事变这段历史，不禁回忆起“辽、吉、黑、热民众抗日后援会”，并深切怀念这个组织的创造者和领导者——我的父亲朱庆澜。

我的父亲朱庆澜，字子桥（1874——1941）。原籍浙江省绍兴县，生在山东省历城县（现济南市）。5岁丧父，14岁丧母。家贫无以为生，即在黄河修复工程某地段当河工。他长大后因身高力大，体格魁梧，乡邻亲友都劝他投军。19岁时去东北，投到当时东三省总督赵尔巽部下的新军。因不畏豪强，安定地方，屡建功勋，受到当地人士的颂扬和清廷的重视，在赵尔巽的培养提拔下，升任到统领及营务处总办等职。

辛亥革命前夕，他在四川担任第十七镇统制。武昌起义时，他响应孙中山先生的号召参加革命，公众推举他为四川省大汉军政府副都督。民国成立后，调到北京政府，曾授镇安右将军、卓威将军称号，先后担任总统府高级军事顾问、黑龙江省督军、省长（护军使、民政长）、广东省省长，东北特区行政长官（哈尔滨特区）兼中东铁路护路军总司令等职。晚年致力于社会赈济事业。

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时，我父亲正在上海办理长江水灾赈济事务。我家住辽宁省锦州市，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疯狂进军，锦州很快受到战火威胁。为此我父急电我母亲赶快带领儿女弃家出走。我们在战火中乘坐闷罐车，冒着危险，弃家离锦，逃到北

平。因为没有房子，只好住在北平后门外烟袋斜街什刹海旁的广化寺。就在这个寺内，我父亲组织了“辽、吉、黑、热民众抗日后援会”，那是1933年春天的事。当时我在天津南开中学读书，虽然没有直接参加这一抗日组织活动，但因经常回家，耳闻目见，知道一些情况，兹回忆记录下来，以资参考。

“九·一八”事变时，我的父亲正在上海，上海各界人士纷纷要求我父亲带头号召各界抗日救亡，因他当时在国内有相当声望，更为东北广大军民所熟知，我父亲认为兴亡有责，义不容辞，他对东北父老兄弟也有着更亲切的感情。当时国民党南京政府并不支持抗日救亡运动，但他仍积极邀集各界爱国人士在上海开会集议，筹建抗日后援会。出席会议的有：黄炎培、史量才、李子宽、沈钧儒、邹韬奋、陶行知、许克诚、杨卫玉、查良钊、陶菲卿等近200多人。会议一致认为要把全国力量集合起来，请我父亲致电各方，呼吁集合群众，团结抗日。当场由陶菲卿起草，以我父亲名义分别致电蒋介石、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和毛泽东、朱总司令等人。文电中有：“藩篱既失，堂奥不保，懔大厦云将倾，……团结始能御侮，众志定可成城……”等语（此电在当时各报上均刊登，但对中共领导人的名字，被新闻检查人员删去，并有人用书信和电话对电文列人毛泽东、朱德总司令名字表示反对和恫吓）。在南京的元老派于右任、邵力子、叶楚伧等见到电文，联名致函我父亲，信中有：“救灾既见荩筹，救国复闻谠论，爱国精诚，寰瀛仰敬……”等语，表示赞同。

经过缜密研究，认为平津靠近东北，消息灵通，工作较为便捷，我父亲决定和查良钊前往北平，建立辽、吉、黑、热民众抗日后援会具体工作机构。在上海则由我父亲老友张习（字佩年）和陶菲卿负责驻沪办事处各项工作。

在上海筹备期间，原西北军将领吉鸿昌刚从国外归来，我父亲得悉后立即派查良钊前往看望，并约吉前来会面。查原是冯玉祥旧部，和吉鸿昌将军早就相识，他介绍吉与我父亲会面，陪同吉鸿昌

和我父亲见面的还有吉出国时帮助通译的同伴凌勉之。他们交谈了对抗日救国运动的看法和具体步骤，决定共同抗日，分头进行。我父亲先去北平，吉鸿昌将军表示随后就来。

当时，辽宁西部残留的东北军和纷起反击日寇的民众义勇军，在日军大举扫荡之下已陆续撤到热河和山海关里，辽宁省代主席米春霖撤到北平，留在张学良身边任办公厅主任。当时张学良仍以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身份驻在北平，掌握华北军政大权。我父亲于1933年春，由米春霖（米原为我父旧部，关系密切）陪同会见张学良，提出本着抗日救亡大义，要在北平设立民众抗日后援会，取得张氏同意和支持。当时南京政府行政院长宋子文迫于全国抗日浪潮及各方压力，勉强以政府名义拨送卡车若干辆。从而"辽吉黑热民众抗日后援会"在北平正式成立，我父亲担任会长，于1933年春开始活动。

抗日后援会的任务是对东北各地抗日义勇军和各地方抗日部队的粮饷、枪械、服装、医药等款项的援助与运输。在该会成立初期，我父亲曾与张学良、张作相等同去热河承德慰问前方部队，并鼓励当时热河省主席汤玉麟坚持抗日。

筹备支援抗日部队款项是主要问题。我父亲曾两次通电全国呼吁全民抗日救亡，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同仇敌忾，力保国土。全国各地及海外华侨得知北平成立抗日后援会，人心振奋，群起赞助。有的以函电或派人与后援会取得联系，积极响应和支持，有的慷慨解囊，踊跃捐助，有的参加办理募捐事宜。后援会也采取各种各样方式进行捐募，如办理义卖义演。记得有些人把现款、首饰、珠宝等，捐献给后援会，用以支援抗日。海外爱国侨胞更是热烈响应，踊跃捐助，汇款回国。其中以暹罗（今泰国）中华总商会捐汇最多，爱国华侨中以陈嘉庚捐款最多，（陈早年与我父交往甚密）。国内以上海民族资产阶级人士捐款较多，如上海纺织业巨子穆藕初就是积极参加者之一。广大劳苦大众更是节衣缩食，往往以斗米之资捐

献后援会，爱国赤诚，感人至深。

抗日后援会的工作人员不多，也不发工资，只根据当时生活水平给些生活费。至于前来参加的爱国知名人士多为义务职，不予生活费。组织机构大体分为以下几个部门：

（一）总务组：管理对外联系，搜集与掌握各地日本侵略军的动态和我义勇军布置及作战情况；对内收发文电，采购物资药品事宜。

（二）财物组：负责掌握捐募款项的收入与支出，与银行的往来款项，审查与拨付各义勇军及地方武装申请款项的各项手续。

（三）救济组：有关抗日救亡运动的各项宣传，慰劳抗日将士及伤兵，组织医疗队，医治抢救及运送伤兵归来就医。

（四）军事组：了解敌我双方军事动态及与抗日部队的联系。

（五）运输组：由70余辆大卡车及有骆驼队组成一个交通大队运送武器、服装、药品等物资到抗日前线，接运伤兵及工作人员。作战地区往往不通火车，这支运输大队即成为主要交通工具。

（六）电台：会内设有专用电台，可直接与前线和国内各地收发电报，联系消息。

（七）军队：后援会有直属武装部队约一个团，团长姓王，驻在北平西苑营房。营房门口插有会旗，无帽徽。后因派赴张家口支援冯玉祥、吉鸿昌部队时，路过庞炳勋驻地，被庞缴械改编（庞于1933年在蒋介石阴谋策动下进驻下花园，对察哈尔抗日同盟军施加压力，企图消灭抗日武装）。后援会有会旗，是方形黄地、蓝圆心，圆心内有两把利剑交叉，并有4个黄星代表辽、吉、黑、热4省，运输队插此旗为标志即可通行。

后援会的主要工作人员有：（一）查良钊，字勉仲。原是西北军系统的人，曾任北京师范大学校长、第二集团军军事教育部长、省教育厅长、河南大学校长。抗日战争时期，在昆明西南联大任训导长。他是我父亲办理赈济西北旱灾时冯玉祥派来协助工作的代表，

后来他是我父亲的得力助手，负责总务组。(二)杨慕时，字彬甫。也是西北军系统的人，曾任京汉铁路局局长、甘肃省财政厅长、察哈尔省财政厅厅长，也是在陕甘救灾时跟随我父亲的，在后援会负责财务组。(三)卢广绩，字乃赓。东北系统的人，原沈阳市商会会长，协助并负责财务组工作。(四)许克诚，暨南大学教授，是蔡廷锴的朋友，负责华侨募捐工作。(五)陶茀卿，原是冯玉祥的秘书，曾任河南省教育厅主任秘书，河南大学秘书长，代表鹿钟麟和查良钊一起跟随我父亲同往陕甘办理赈济救灾，以后长时期担任我父亲的秘书长。(六)屠伯启，任电台台长。(七)车向忱，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负责人之一，负责救济工作。

此外还有姚凌九、张仙舟、赵钟琪、朱樟等人分担秘书、会计、事务、运输等工作。还有爱国知名人士何遂(字叙甫)、宁武(字梦岩)、孙志江、李春华、王化一等人也参加。我还记得名记者范长江当时担任写新闻稿件、对外发布消息工作。

其后由于工作需要，后援会的组织相应扩大，除上海设有办事处，在古北口、承德等地，也都置了办事机构，以便与各地义勇军、地方部队取得联系。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系统的各界爱国人士高崇民、阎宝航、王化一、卢广绩、彭筱秋、车向忱等人组织了“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这个组织得到张学良的支持，从事抗日活动。他们与后援会互相配合，互相支援，其中如卢广绩、王化一、车向忱、彭筱秋等都参与后援会活动，造成很大声势。

1932 年 10 月，冯玉祥移驻张垣(今张家口)，与孙良诚、吉鸿昌、高树勋等筹组抗日武装。1933 年 3 月，热河被日寇侵占。当时东北义勇军抗日部队 10 万余人，先后撤入察哈尔，方振武部也由晋南开察，他们正式组织了抗日同盟军，冯玉祥为总司令，方振武为北路军总司令，吉鸿昌为前敌总指挥，原东北抗日部队邓文、李忠义任副总指挥。但光有人还不行，粮饷、武器、服装、筹措的钱款

系中心关键。当冯玉祥派人来要求援助以便高举抗日大旗时，我父亲立即从捐款里提出10万银元，派管理财务的杨慕时亲自面交冯玉祥，以备冯、吉组织抗日部队，购买军粮、服装、武器之用，并将运送银元、物资的大型卡车多辆，一并留交使用。

后援会在爱国人士支持下，积极与东北各地义勇军，地方部队取得联系，派人深入黑龙江、吉林一带，与马占山、苏炳文、丁超、李杜、王德邻、李春华等部接洽，给予财政、物资和精神上的支援。他们也派人进关递送军事情报、汇报战况并提出军事要求。派来的人形形色色，有老人、有青年、有男，有女，有农、有商，也有和尚、尼姑、道士等。东北义勇军和抗日部队前仆后继，浴血奋战，使日本侵略军腹背受敌，不但东北人心大振，而且一度牵制住日本侵略军不敢南犯。

日本侵略军占领辽、吉、黑三省之后，即着手进兵热河，东北若干抗日部队和义勇军也被日军压迫到热河境内，热河形势日趋紧张。为此后援会在承德设置办事机构，不断支援接济退驻热河的吉林冯占海部队和开鲁的刘桂堂部队以及义勇军部队。在日本侵略军大举进攻热河时，由于张作相奉命援热不力，我父亲曾与张在电话上吵了起来。

在1933年喜峰口战役中，宋哲元的二十九军抗拒日本侵略军，利用夜袭斩获颇多，人心振奋，后援会连夜派员劳军，并给予物质接济。

在北平地区，随着抗日运动的热潮，后援会成立了广泛的慰劳军队的组织，包括社会各个阶层。当时妇女界也动员起来了，由我母亲徐雅杰，宁武夫人杨树先，米春霖夫人张诗箴等在北平主持护理伤员工作，并动员广大妇女到各医院和佛教各寺院慰问由抗日前线送回来的伤兵，送去慰问信，赠送慰问品，有的还讲演鼓励，使伤兵得到极大安慰和鼓舞。

随着抗日浪潮越来越高涨，当时著名地质学家丁文江曾在《独

立评论》刊物上写有《朱庆澜将军》一文，介绍我父亲筹组后援会和支援义勇军抗日情况，广泛宣传。关心抗日人士曾把这篇文章印成单行本，广为发行，起了很大的宣传鼓动作用。

我父亲的爱国赤诚不但表现在工作上，面且表现在生活上。他对东北各省大好山河沦陷敌手，东北父老兄弟姐妹在敌人铁蹄下过着亡国奴生活，有切肤之痛。在那几年，每逢 9 月 18 日那天，为纪念国难，我父亲整日不进饮食，用以鞭策自己不忘“九・一八”，表示抗日到底的决心。全家也半日不举火，大人小孩都不许吃饭。这个不忘国难的教育，在我们子女的心灵中是终身难忘的。

抗日后援会宣传群众、积极抗战的作法是蒋介石的“不抵抗”的投降主义政策所不容的，特别是国民党南京政府对我父亲大力支援冯玉祥、吉鸿昌领导的抗日同盟军，并和他们密切合作，恨之入骨。他们也惧怕由于我父亲关系，东北军和西北军在抗日救亡目标下联合起来造成威胁从而对我父亲组织后援会的活动不断进行打击和破坏，他们所采取的破坏手段是卑鄙之极的。

国外爱国华侨积极为抗日捐款，由于他们不信任国民党南京政府，面便直接将捐款寄到北平抗日后援会，或是由上海办事处转汇北平。有一次暹罗中华总商会的捐款 10 万元汇到国内，竟被南京政府反动集团暗中从银行攫取。后因原汇款人未收到后援会的复信和收据，辗转反复查询，才戳穿了这件丑事。

再有一次是 1933 年春天，正当日本侵略军入侵热河的时候，南京政府行政院长宋子文来到北平，同张学良商议，让我父亲带粮饷、医药、慰问品去热河第一线慰问部队。当时日本对热河省主席汤玉麟及其部下威胁利诱，收买招降，官无战心，士无斗志，热河已呈崩溃之势，此行凶多吉少。我父亲接到任务，基于义愤，不计个人安危，决定带运输队装载慰问品动身前往热河。但在动身前一天晚上，张学良的办公厅主任米春霖突然来到广化寺我家中，首先向我母亲表示：这次去热河有危险，承德局势有变化，要我母亲坚决阻

拦我父亲去热河，放弃慰问计划。言下之意流露是受张学良暗示而来。当时我父亲听说是为了怕危险不去，大发脾气，表示为抗日救亡，万死不辞，非去不可。那天晚上，我家客人来了很多，都劝阻我父亲取消这次慰问，直到黎明，才劝住了他。后来事实证明：汤玉麟部队果然遇敌溃散，未作抵抗，汤玉麟带着细软逃往天津租界。日本侵略军如入无人之境，128 骑占承德，成为中日战史上的空前耻辱。

国民党蒋介石集团还从破坏我父亲名誉下手，给后援会制造问题，借以困扰瓦解抗日救亡的支援力量。他们怂恿吉林抗日部队李杜等人到南京政府控告我父亲。控告内容是：（一）支援抗日义勇军的款项分配不公，对马占山、王德邻等接济的多，支援他们的少。反对派藉机大肆造谣，搅乱视听。其实李杜部队人数少，马占山部队人数多，影响大，后援会是按实际情况付给接济，而李杜却想得到同款项接济，未能满足他们要求，从而有些怨言。（二）扬言后援会用款不当，有人借抗日救亡机会，贪污发财，要求南京政府查帐，对我父亲进行人身攻击。蒋集团借机宣布：要派出一个审查团对后援会进行财务审查。我父亲的朋友于右任、张继等同南京政府立法院长孙科商量，决定由立法院派人处理，绕过蒋、何、孔、宋魔爪，这一阴谋才未得逞（事后听说，当李杜明白是被人利用时，也很后悔）。

当时立法院选该院军事委员会负责人何遂为处理这一问题的负责人。何遂是军人出身，当过军长，系孙科系的立法委员、与李宗仁、白崇禧、黄旭初等桂系关系密切，是我父亲早年同事、旧交，本人也参与后援会抗日救亡运动。经过调查研究，给立法院写出一份报告，指出外间流言和控告系由于内部人事不和而引起的误解和闹事，有人故意扩大人身攻击和要挟，以达到多要钱目的。这样一场风波才不了了之。当时，上海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的潘序伦、徐永祚两位会计师审查帐目后，以会计师名义在上海《申报》、《新闻报》

以启事形式声明：市井流言，实属无稽。

不消说，日本帝国主义者对后援会和我父亲也是恨之入骨的。由于屈辱求降的《塘沽协定》，1934 年北平已成为日本军人特务公开活动地区。在那黑云压城的日子里，北平什刹海、后海广化寺附近常常有日本浪人和形踪可疑的人出现。这些人不断来往于后海德胜门内原清摄政王的府邸，在后门油漆作（后援会所在地）附近还时常出现两个日本军官，从而引起后援会有关人员的警惕。为了保护我父亲的安全，决定迁移住址，不再住广化寺家中，而移到永康胡同 3 号我父亲好友庄惕生家中（当时这个地址是保密的）。由我父亲老友张仙舟负责组织保卫工作。很长时间，我们子女在广化寺家中见不到父亲回家。

我父亲在受南京政府的诬陷打击和日寇的暗害威胁下，内心极为愤怒，一气病倒。原小肠疝气旧病复发，不能起立行走。经大家劝慰，送到上海治疗、休养，北平后援会机构从此失去主持人。更主要的是由于张学良出国，何应钦到北平掌握华北军政大权、投降卖国，接连签订《塘沽协定》和《何梅协定》，对抗日救亡运动采取高压政策，后援会也顿成瓦解之势。部分骨干人员携带卷宗、帐册去上海办理结束。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组织，仅经历了 2 年的时间，就这样被扼杀了。

以上事情，有的是我亲眼看到的，有的是我父亲事后讲给我听的。由于时间过久，记不太清，也可能有出入之处，都是片断，未能反映抗日后援会全貌，更希望有关同志给予补充更正。

万福麟在热河的溃败

王理寰

1932年夏，日寇准备夺取热河，东京特派高原卡见等来华，向热河主席汤玉麟诱降，并煽动内蒙王公喇嘛组织内蒙自治军，作为进攻热河的别动队。驻北平的东北军将领曾集体到热河边境视察地形，准备抗击日寇，并向热河汤玉麟指示机宜。在华北第一方面军总司令张学良指挥下的华北第四军团（军团长万福麟）开始动员。向热河边境前进的部队为丁喜春独立八旅、缪澄流独立十六旅、孙德荃独立十九旅、王永盛独立二十九旅、于兆麟独立三十旅。我当时任东北军独立第二十九旅六八四团少校团附，率部参加了叶柏寿之战，熟悉王、于两旅作战情况，现将经过情形简述如下：

独立二十九旅原系东北军十五旅梁忠甲的旧部，梁死后归王永盛率领改为二十九旅。独立三十旅原系东北军十七旅韩光第的旧部，韩死后归于兆麟率领改为三十旅。这两旅是在1930年夏解决石友三部队时入关的，“九·一八”事变后，分驻北平近郊和宣化、怀柔、密云等地。这两旅的旅长均与万福麟有密切的关系：王永盛是万的内兄；于兆麟是万的义子。他俩平时既有互不相下之意，战时又有彼此争功之心，所以谁也不能指挥谁，谁也不会援助谁。表面虽然是一系军队，而实际上凡事漠不相关。不团结是我军战败的原因之一。

这年10月间，万福麟率这两个旅由喜峰口步出关外，进入热河。军团部和二十九旅大部驻平泉县（即八沟），二十九旅以一个团（六八四团，团长刘纯和）驻三十家子。三十旅驻凌源城和叶柏寿，在城东面就山上南北之线构筑防御工事，右翼与十六旅相连，左翼

经朱利科村与守赤峰的孙殿英部队相接。构筑工事由10月初旬开始，经过3个月之久，因隆冬地冻和岩石坚固，锹镐用坏若干，士兵两手震破出血的甚多，而工事尚多不堪用。军团部曾组织阵地视察组（我是参加视察组者之一）到叶柏寿视察。于旅阵地仅按北平军分会指示防线构筑直线式的工事，未能按当地地形地势置防和作纵深配备。于兆麟强调上级指示不能更改，因于与万的关系，视察组内也有随声附和的，结果这个视察组毫无作用而归，军团部也是以不了了之。朝阳至叶柏寿170华里，叶柏寿至三十家子148华里，三十家子至平泉236华里，平泉至承德104华里。在这样的距离徒步行军，都需2日至4日以上。这种配备，分散兵力，既不能增援，又不能固守，处处露出弱点，被敌一摧即破。并且师以上的指挥官的位置均距第一线200里以上，交通不便，通信器材不足，前后方通一次电话需要若干时间。这对于作战已经不能及时应付，更谈不到兵力活用和互相呼应了。对群众没有联系，没有宣传，故对敌方行动毫不察悉，敌不找我，我不找敌。这也是失败的因素。

1933年2月，日寇以通辽、绥中为根据地，集中兵力分三路进犯：北侵开鲁，南寇凌源，中犯朝阳，总计日军，伪满军约在10万人以上，附有飞机、坦克车、装甲车、山野炮等精良武器，并有运输汽车800余辆。我方也分三路应战。北路开鲁方面为第九军团孙殿英部战斗地带，有孙部两个师、义勇军冯占海、李海青、刘振东、邓文等部和热河军崔兴武（战斗开始即投敌）部，2月末即将开鲁、赤峰丢掉。第四军团左翼已受敌人的威胁，中路董福亭旅守南岭、北票，因董旅团长邵本良投敌，董军溃退。邵本良在投敌前曾到密云县二十九旅六八四团，蛊惑第二营营长张执军同时投敌，被张拒绝并将邵赶走。南岭、北票失守后，朝阳也相继失陷。日寇直趋凌源，三十旅在叶柏寿首先应战。当时敌人为川原旅团组成的快速纵队配合骑兵第三旅团，有飞机9架，装甲车30余辆，陆空联合向我阵地猛攻。激战3昼夜，于旅伤亡甚众，三八八团团长失踪。于兆麟

向军团部求援，军团部令二十九旅六八四团向凌源东叶柏寿增援三八八团，归于兆麟指挥。三十家子距叶柏寿148华里，六八四团由3月9日早上急行出发，花费了13小时的时间，徒步抵达叶柏寿的左侧朱碌科村，已在夜里10时左右，连夜向叶柏寿东方高地，即三八八团的主阵地增加。本人以少校团附的职务，奉团长刘纯和的命令，先带各营长、副营长到三八八团阵地接洽换替阵地的一切问题。到达高地后，看见仅有少数士兵在阵地内警戒（敌人夜间不攻击）。当向第一连中士赵某询问情况，他答：连长、排长均于白天阵亡，士兵亦伤亡殆尽，其余情况不知。我告知他们，二十九旅六八四团来此增援，赵等极为兴奋。但全阵地无法接洽，仅按于旅长命令上的指示，把三八八团阵地验好，开始布置队伍，以一、二两营为第一线，第三营为预备队同团部位置于左后方朱碌科村南端，十一时许方始布置完竣。10日拂晓，飞机3架在我上空侦察2周，投掷炸弹，地上步兵亦即开始进攻。我第一线两营予以抗击，激战2昼夜，双方各有伤亡，战斗激烈，但敌未得攻进我阵地一步。12日夜间阵地前方有大喇叭声音传来，高叫“皇军邵本良部队到此，欢迎六八四团第二营张执军参加皇军”，始知此路敌人进攻，系由邵逆本良引路，当被第一线我军击退。13日上午8时，左翼发现敌骑兵向我左侧进攻甚烈；正面敌人除原有人数外，又增加坦克车、装甲车共30余辆，山野炮20余门，飞机9架，由上午8时起集中火力向我团猛攻。我官兵亦奋不顾身，猛烈迎击，自早至晚，几次冲锋，伤亡甚众（连长伤亡已过全团连长的半数），所有阵地大部都被摧毁。午后4时许，右翼于旅不支，向平泉撤退，敌人以一部包围六八四团，主力向西追击于旅。于旅和二十九旅主力在平泉汇合继续抵抗。此时丁喜春、孙德全、缪澄鎏各旅全线动摇，退入关内，万军团亦由平泉撤退到喜峰口（以后交宋哲元部队接替）。六八四团在13日下午被围后向于旅告急，但电话已失去联络，方悉于旅已退走，并未给六八四团命令。到13日夜12时许，全团开始反攻，突出重

围，撤到八里罕店子。14 日正午敌人骑兵追来，受我严重的打击后退走。14 日夜我团退到八里罕以西，才脱离敌人追击的范围之外，敌人主力已集中向喜峰口方面追击我主力，我团决定撤到多伦，再转道张家口。

15 日下午 2 时许，我团由八里罕店子西进到烧锅营子村西，逢孙殿英部某师孙旅，在烧锅营子村西 3 里许两山之间，通往多伦大道上构筑防御工事，禁止通过。我团即宿于烧锅营子村，晚间团长刘纯和派我到孙旅联络，拟次日早西去，我到孙阵地前，以手电信号和口令通过步哨，递次转到孙旅旅部，说明联络的情形，并交出证件。孙旅长（名忘记）最初很客气，说明天拂晓请刘团长和师参谋长袁克征来，大家谈谈。袁系旅长来到叶柏寿视察阵地的，我团被围转进时同来，我回团报告，于 16 日拂晓，同刘、袁两人到孙旅旅部。孙旅长说："现下张学良已下野了，听说准备出国。你们是没主人的军队，希望参加我们一起来抗日。请刘团长和参谋长暂在旅部休息休息，你们队伍暂由王理寰团附去带领，由左侧高山下转到大拉火沟口停止待命，齐团长与袁参谋长再回团不迟。刘团长当时暗示我以颜色，并说"理寰你快去带队，到达指定地点火速给我们俩送信来，无论什么时候你不要离开团。伪军太多，注意警戒，不管他是伪军，是日本军，来了就打"。我当时明白这是以团长和参谋长为质，立即出了孙旅旅部，急急回团部。将出孙军阵地外壕，敌人飞机 2 架即到孙旅阵地上空盘旋，然后以炸弹数枚指示炮兵射击目标，相继炮弹射来，均落孙旅阵地内，枪声四起，顿现混乱。我以快跑的速度进入烧锅营子村，村内四处火起，枪炮弹到处乱飞，到团部后三个营长已联络不上，中校团附不知去向。我随即指挥团部官兵到烧锅子村后山北侧集结，又以第九连中尉排长张广德（代理连长）在山顶上射击敌人背侧，使敌人不得前进，掩护全团官兵集结山后。随后又增加第七、八两连上山。激战到午后一时许，敌人主力攻孙旅阵地，右侧亦发现骑兵威胁，炮火增加，并坦克车数辆摧

毁孙军阵地，孙军不支，向独石口撤退。我团亦即撤到头二把火沟，到午后4时，团长及袁参谋长亦相继回团。17日，经刀把梁、王爷庙、围场，十九日抵多伦城与挺进军刘翠飞部队相遇，一起撤至张家口。热河战役至此告终。三月底集中北宁路线、廊坊和武清县，重新整编。万福麟因热河战败，撤换了王、于两个旅长，二十九旅改编为一百二十九师，任周福成为师长；三十旅改编为一百三十师，任朱鸿勋为师长，归万福麟的五十三军指挥。

汤玉麟放弃热河的实况

唐精武

我在当时为汤玉麟幕僚之一，今天提供这段资料，心情无限沉痛。

一

自1928年底东北易帜后，热河的最高军事机关，即为东北边防军热河驻军司令部（简称驻军司令部），汤玉麟任上将司令，李赞廷任中将参谋长；另设有热河驻军训练监部，汤自兼统监，孟昭田任中将副监，负实际责任，汤次子汤佐辅任少将副监，邵百龄任参谋长。

当时，热河驻军所辖部队如次：（一）原来汤的基本部队东北陆军第十一师，由于国民党政府统一番号，改为陆军第三十六师，汤玉麟自兼师长，索景斌任少将参谋长；（二）东北陆军步兵第二十二旅；（三）东北陆军骑兵第十七旅；（四）东北陆军骑兵第十九旅；（五）热河省保安骑兵第一旅；（六）热河省政府特务队（即警卫队，相当一个团）。

另有在"九·一八"事变前不久，经汤收容的山东悍匪刘桂棠部数千人，驻于热边鲁北、天山一带，尚未经过点验，即因发生"九·一八"事变，就视同义勇军一体，未予正式名义，也未作正规军使用。以后，日军攻入热境，刘首先认贼作父，投降日军。

陆军第三十六师，因系汤自兼师长，又系其基本部队，故师司令部与驻军司令部设在一处，混合办公。在使用上，都是由驻军司

令部直接命令到旅，不再经过师司令部。因而外间以为当时汤军，已以旅为单位，殊不知尚有个形同虚设的第三十六师司令部。三十六师辖有步兵第七旅、第三十八旅、第五十一旅等3个旅，骑、炮兵各1团，工辎兵各1营，属于甲种师的编制。步兵第七旅及其所属的第三十五团、第三十七团均驻于承德附近，第三十八旅及其所属的第五十八团、第八十三团分驻于平泉、凌源，旅部在凌源。步兵第一一一(或一〇一)旅及其所属的两团，分驻隆化、滦平，旅部在隆化。骑兵团驻朝阳；炮兵团驻承德；工兵营驻承德故宫，分担驻军司令部警卫；辎重兵营驻承德附近。另有驻军司令部汽车队，驻承德，有两吨半至五吨道济牌卡车二三十辆；驼载大队，驻承德庄头营子，有骆驼四五十头。

东北陆军步兵第二十二旅及其所属的2个团分驻围场、丰宁，旅部在围场锥子山。骑兵第十七旅及其所属三个团分驻林西、经棚、开鲁，旅部在开鲁。骑兵第十九旅及其所属的3个团均驻赤峰附近，旅部在赤峰。热河省保安骑兵第一旅全部均驻丰宁县一带。热河省政府特务队(队长崔子衡)，驻承德故宫，分担驻军司令部的警卫，事实上即成为驻军司令部的直属部队，共有步骑混合的4个大连。

以上系“九·一八”事变前，热河驻军的分防情形。总兵力约有3万余众。

热河驻军训练副监中将孟昭田，号翼青，山东人，北洋练兵行伍炮兵出身，奉天陆军讲武堂毕业。历任东北陆军第十一混成旅的团长，东北陆军第十一师步兵第三十八旅少将旅长，升任热河陆军骑兵第十一师中将师长。在汤出征晋北时，代理热河都统；热河驻军调整编制后，骑兵师编制撤销，改任热河驻军训练监部副监，负实际责任。热河对日作战时，闻曾发表为骑兵军军长，未及拨编部队，即告失势。在汤与孙殿英火拼时，借故离去。孟才力平常，自持较严谨，虽同样贪吝，不惹人注意。多年依附汤玉麟，一切唯命是

从，交接圆滑，与汤左右相处融洽，遂成亲信。

步兵第七旅旅长张从云，河北人，北洋练兵行伍出身。老奸巨滑，昏庸贪婪，以逢迎汤为能事。承德失守后，怕死辞职。该旅两团长：一原系年龄最老的河北人邵连胜，另一为辽宁人顾占一。在对日作战前，均调参议；另由营长于立志与刘育才升任，但皆醉心名利之徒。张从云辞去，刘升旅长，在热察边境，刘受收买，率第三十七团投孙殿英。于亦逃窜，后被汤击毙，部队截回，由参谋张惠民任团长，编入混成旅。

步兵第三十八旅旅长崔福亭，辽宁人，与汤在绿林时代即患难相从。在将领中比较前进，治军较严，练兵较勤，对抗日意志坚强。最后任汤军副总司令仍兼带原部改为步兵第一旅，在编归第二十九军时，病死张垣。该旅两团长：其一原为邵本良，早在1928年间，撤职离去，后由单某(忘其名)接充。另一原系汤之三弟汤玉山，"九·一八"事变后不久，辞职养病，由董长子中校团附董翰卿升任。董翰卿系东北陆军军士教导总队第三期，东北陆军讲武堂第六期毕业，由排长干起，编归第二十九军后，仍为宋部阮玄武旅的团长。

步兵第一一一(或一0一)旅旅长刘香九，吉林富户，东北旧将领，系汤老友。1927年间，始任汤军旅长。世故很深，官气十足，纯为一自私自利之辈。撤离热河时，竟未随行，不知何往。该旅两团长：其一系吉林人吴嘉宾，撤退热察边境时，亦未随行，不知率队何往。另一系河南人窦连玺(原为刘山胜部热河陆军第一混成旅步兵第一团团长)，官久致富，惯于投机，撤至热、察边境后，首先率队投归孙殿英。

骑兵团长汤玉书，汤之五弟，东三省陆军讲武堂毕业，素有轻微精神病，暴戾贪淫，胡作非为。热河失守后，扩编为骑兵第一旅旅长，编归第二十九军时解职，挂名为察哈尔省政府参议拿干薪。

炮兵团团长汤玉铭，汤之四弟，东三省陆军讲武堂毕业，贪污好色，猜嫉骄横，只知升官发财。热河失守后，扩编为混成旅旅长，

编归第二十九军时解职。挂名为察哈尔省政府参议。

工兵营营长汤宝福，汤之族侄，东三省陆军讲武堂毕业，贪污腐化，庸碌无能。承德失守后，弃职而逃，残余编入特务团。

辎重兵营营长夏某（忘其名），汤次妾之兄，贪腐营私，唯利是图，承德失守后，弃职而逃，残余编入特务团。

步兵第二十二旅旅长富春，黑龙江旧将领，官气极深，骄纵荒淫，系汤换谱弟兄；1927年间，拨归汤军，即退还兰谱，改递门生帖，丑态百出；在热军中为妻妾之最多者。撤退热察边境时，率队投归宋哲元，部队编散，退为闲职。该旅两团长：其一为热河承德人孟尚培，久在黑龙江部队，另一为富春之外甥郜云森，均贪庸无可取。

以上与第三十六师，均视为东北军嫡系，其武器为当时最精良者，长枪一律是德造捷克式步骑枪，短枪是德造20发毛瑟手枪（即自来得），每连有捷克式轻机枪9挺，每团有八二迫击炮及麦克沁或哈奇开斯重机枪各一挺，炮兵团有克伯伯野炮24门，三八式野炮12门，重迫击炮一个连，均骡马挽驾。

东北陆军第十七旅旅长崔兴武（新五）辽宁人，清末在马政大臣标下为骑师，惯骑射，后在毅军由哨官起家，1925年间，投张作霖，编为旅长。崔孤陋刚愎，颇怀野心，1926年间，拨归汤军，因受汤遏抑而不满，貌合神离。"九·一八"事变时，曾有积极抗日的表示，故抗敌后援会曾不断对他加以慰勉和支持，但终以本质恶劣，利禄熏心，在日寇攻入热境时，竟背叛祖国，投为伪军。该旅三团长：其一系辽宁人孙凤阁，为崔基本亲信骨干。其二尹宝山，热河平泉人，原系窦连玺团营长，1927年间，经汤派升刘山胜部骑一旅第五团团长；崔解决刘部后，汤命拨归崔旅。其三热河蒙族人李守信，由土匪投毅军为官，渐至团长，此人骄悍昏庸，爱财色，慕虚荣，闻降敌后，即以之代替崔兴武，并扩充为伪蒙古自治军。

东北陆军骑兵第十九旅旅长石文华，为热河毅军游击马队常万里旧部，常死代领其众，1925年间，投张作霖编为旅长。1926年

拨归汤军。此人昏淫贪婪，外戆内诈，对汤乃依附利用，实早即同床异梦。撤退热、察边境后，被收买投孙殿英。该旅三团：其宋、苏两团长，均游击马队旧部，也无非平庸贪婪之辈；另一团长赵求贤河北人，原刘山胜部骑一旅第四团团长，出征晋北时，暂拨石旅，旋刘部被解决，编归石旅。赵贪吝奸诈，惯于投机，热衷名利。

热河保安骑兵第一旅旅长赵国增，热河人，由土匪投入热河游击马队为官，该部向系谁当热河都统，就奉谁为长官，十余年来，数易其主，习以为常。至汤时，因与汤玩友建平地主宋子衡勾结，得编成旅，宋曾任团长。赵劣性很深，不但贪污荒淫，而且通匪窝匪，纵兵殃民，为滋扰之最甚者。因宋时为疏通，更多行贿赂，汤竟姑息优容。撤退热、察边境后，投归孙殿英。该旅原只两团，因时有更动，已记不清。在投孙后，该部团长黄永和，又率骑兵约四个营，奔回汤军，经汤编为骑兵第三旅旅长，编归宋军时，率队他往，不知所终。

以上各部队，均装备有日造三八式武器。

热河省政府特务队中校队长崔子衡，辽宁北镇人，系冯凌阁亲信，荐充汤卫士长多年，1928 年成立特务队，调为队长。此人家奴习染很深，而荒淫贪污亦甚，只顾名利，不计其他。赖有少校参谋王太文调任该队队附，负责督训，且系全部集中驻在军司令部所在故宫内，故军纪训练均为良好，装备全属当时德造新式武器，成为汤军一小支新锐部队。在撤退途中，改编为军部特务团，最后扩编为步兵第二旅，编归宋军时，崔调察省府参议拿干薪。

驻军司令部有 750 瓦特无线电信总台一部，并备有由 500 瓦特以至 50 瓦特收发报台多架，已记不清如何分配于部队中。

驻军司令部汽车队中校队长谭玉符，队附黄幼霖，均天津人，原为汤部尉级驾驶员，后均致富。承德失守后，都溜之大吉，原有卡车 30 余辆，离热后随军者仅 10 余辆。

驻军司令部骆驼队队长耿某，密云人，始终随汤，为军械处运载枪枝弹药。

汤军在讨郭(松龄)援沈之战讨冯(玉祥)沽源之战,讨阎(锡山)晋北之战诸役,由于汤之蛮干,都侥幸奏功,竟自诩为能战劲旅,渐益骄纵。自晋北回师后,嚣傲更甚,高级将领,仅与孟昭田不吸鸦片烟,中级以上部队长,极大多数种毒(鸦片)、贩毒、吸毒。至于侵吞饷糈,冒领缺额,种种舞弊营私,不一而足。由于生财有道,率多富有,成为巨富者也大有人在。于是买田宅、修庄园者,比比皆是。亦有不少更于京、津各地另置别馆,洋楼大厦、汽车妾婢,极尽豪华,吃、穿、嫖、赌犹为余事。主官既竞图享受,治军练兵,则委之佐助人员,一般(尤其骑兵各部)敷衍故事。汤玉麟平日即不亲视部队,更绝少慰劳与犒劳,当然上下的情感有限彼此的信任不坚。似此种情形,其军队之战志战力,不问可知。

二

由于张作霖父子的优容庇护,汤玉麟盘踞热河,已俨然乌桓小诸侯(热河为古乌桓)。一切从心所欲,意尚未足,时盼能换一肥腴之区。自东北易帜后,才感到大局已定,别无发展,乃思保此地盘,以图久远。但又昏狂麻痹,妄以为将勇兵强,骄满自恃,不惟不知及时修明政治,也不积极精练所部,坐使其3万余众,日益趋于腐化衰败的末路。日寇突然发动“九. 一八”事变,晴空霹雳,使他震惊已极,患得患失,惴惴不安。汤极迷信,其左右一少校郝副官,原系江湖术士,被汤收用,专供占课决疑;后更信奉道院扶乩。此时日惟求占问卜,听命于天。幕僚向汤建议,以日寇正急于东三省的整个占领,一时尚不致对热用兵,可先作必要的防守,然后听命蒋、张,从容布置。他听说国联将派调查团来华,事态或不致扩大,决定即令第十七旅旅长崔兴武率全旅进驻开鲁一带,三十八旅旅长董福亭率全旅进驻朝阳一带,各置主力于重点,扼守边境,并令骑兵赵国增旅进驻建平附近待命。不久,又通过张学良,由汤部参谋崔广森

化装外报记者随国联调查团到沈阳，将汤母及妾接至其天津私寓，以解其内顾之忧。

此时，东北已涌现大批汉奸，如汤的盟兄张景惠及张海鹏等都通过日寇纷纷派人来热诱劝。与汤素不相识的日本浪人高原也化装亲来诱惑。高原在归途行至朝阳附近，被汤军某部爱国官兵数人跟踪截击杀死。与此同时，平、津各地爱国团体，中外记者并有外国使馆武官，也纷纷到热访问、慰勉。尤其朱庆澜已组织抗敌后援会，不断由该会的张果为、何清明等到热，分往前方部队慰劳鼓励。朱庆澜也亲来与汤面谈，并允以物资支援。南京参谋本部也派参谋黎明、于凯来热视察。最后，张学良也陪同宋子文亲到承德晤汤，面授机宜。一时抗日备战之声四起。

汤玉麟为大势所迫，他所信奉的道院，本系朱庆澜所办，个中人都是朱所援引，朱既主张抗敌，当亦附和，且谁也不敢公然扶出不抗日的乱语。占课的郝副官更不敢断出不抗日为大吉。加以汤左右一小部分爱国少壮军官与一些想借抗敌为名来升官发财的投机分子，都从旁边极力怂恿，至此汤乃不得不表明抗敌备战的决心。但是他的"恐日病"和患得患失的心理，一直在作祟。表现在言行方面，就不像过去参加军阀混战那样慷慨激昂，而是疑惧不安。所以，各方面热心爱国的人士都积极地奔走呼吁，竭力给他声援打气。因为交往频繁、参谋长李赞廷，索景斌都住在北平私寓，就近接洽肆应，随时用电话向汤汇报商讨，并通过张学良，派热河驻军司令部中将参议金鼎臣(原系督战队司令)与热河省建设厅厅长李树春前往南京，向蒋介石报告请示，并与有关部院，商请接济。

汤既下决心备战，就采取了以下各种措施。

(一)承德防空高射布置。1932 年夏季，日寇不断派遣飞机，侵入热河上空低飞侦察，机中的人物历历在望。日机虽不常轰炸，但动辄用机枪扫射，人畜每遭伤害；热河驻军既未配置空军，也无高射部队，毫无空防之可言，惟有听其任意窜扰，莫可奈何。幕僚中有

人想起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曾有将重机枪改装高足架，用以射击飞机的事例；又经检读兵器学教程中，也指出重机枪可以改装高射，仅另制一高足架，用时换装，效力尚好。经军械修配厂仿制试射可行。于是，一方面赶制高足架备用，一方面派参谋唐精武、项绍伯督同炮兵团附廖汝承、步兵团附朱某（忘其名）、特务队附王太文、工兵营附孙某等，在宫内"四面云山"、市郊"北山"、"酒仙庙后山"等高地，选定适宜地区，分配部队，构筑坚固掩体，配置重机枪，编成对空射击网，施行对空监视警戒。此一措施的主要的目的，还是在表现备战的积极行动，造成更浓厚的抗敌气氛，用以提高军民的情绪，巩固汤的战志，至其高射的效果，尚属次要。

（二）购发新式武器。在备战抗敌的大前提下，首先由第三十六师少将参谋长索景斌等，在天津德商手中很快地买进一大批德造捷克式自动步枪、轻机枪、步骑枪、手枪等，当即发给各步兵旅与第三十六师的直属部队及省府特务队，收回原有的三八式枪。因所余数千支不够分配给骑兵，暂且存库，另将库存及收回较新的三八式枪，换发给骑兵各旅。因购进新武器需用巨款，曾拖欠部队两三个月薪饷，而经手者却大揩油水。

（三）派遣义勇军将领。曾任营长的耿继周、李佩声等，愿回东北收容旧部，编练民众，组织义勇军抗击日寇，必要助守热边。经汤允许，介绍于抗敌后援会，加以资遣。后耿、李各有数千人，曾在辽、热边境，给日寇以相当打击。

（四）编练蒙古骑兵。经幕僚建议，派世袭蒙古镇国公、东北讲武堂毕业、汤部副官乌臻泰为驻军骑兵教导总队总队长，令先在其家乡平泉及赤峰一带，编练蒙古骑兵，并不约束其编制及驻地（一团乃至一旅、数旅均可）。

（五）组训保卫团。热河地方自卫武力，每县有一保卫团，省设团防总局总办以为督率。后该局撤销，经费业务并归训练监部，但并未整饬。至此始着手组训，划两三县为一督练区，设督练处，由少

将督练长(外间称司令)及必要的幕僚组成,负责督练。各县保卫团长,原则上系县长兼任,另派军官为副团长负实责。原意一个督练区可编一个旅,但战事开始,都未能参加抗敌。

(六)拟订作战计划。系由参谋崔广森(当时作战科长)主稿,经与参谋本部参谋黎明,及军分会幕僚杨正治(后为万福麟军团参谋长),王东升等研讨制定。大概是:(1)以正规军为主,义勇军为辅,妥予配合协力,固守热河,尤须确保承德。(2)以鲁北、开鲁、绥东、阜新、朝阳寺为前进警戒阵地线,以开鲁、朝阳寺为主要警戒据点。(3)以乌丹城、赤峰、建平、朝阳为主阵地线,极力构成纵深阵地带。(4)作战部队应各自适应情况,分别采取牵制、阻截、袭击、破坏、包抄等战法,消耗敌兵力,毁损敌战力,然后捕捉战机,予以各个击破,或竭其全力一举包围而歼灭之。听说这一计划草案,经军分会幕僚携回,又加以研究补充修正,原则上无大出入,即为尔后华北对日作战军第二方面军作战指导方案参考准据。

(七)构筑野战工事。约在1932年初冬,开始构筑野战阵地工事,由参谋邱鍾岳负责计划并全权指导。当即率同参谋唐精武、张惠民、王鸿儒、炮兵团附廖汝承等,前往赤峰附近现地督导。工事构筑计划,早由邱预先拟好,因形势紧迫,急于施工,来不及召集有关人员详细研究,仅告以担负由赤峰以南至建平以北这一段野战阵地工事构筑的督导任务,并由地方政府征集民工,从事工作。最初,赤峰附近一小段工事,是具体督导,以为示范,不久即分段负责。他指示的原则是赶筑据点工事,然后再逐步补充加强。但因天寒地冻,工程进行很慢。又自1933年初起,人员都先后调回,最后只留邱一人,据闻初步工程大体完成。

三

1932年,在承德对空射击部署初步完成后,某日晚我等欲向

汤汇报，那时汤的办公室内，已经拥聚许多人，议论纷纷。汤正在大发雷霆，而又非常急躁。说话最多的是旅长张从云和驻军司令部副官长鍾大马棒(是绰号、忘其名)。代行参谋长职务的参谋崔广森正在解释分析。其余的是炮兵团长汤玉铭和张旅的团长们，还有军政部门的厅处长，也都在各执一辞。有的说："在北平早就听到有人说，他们向副司令建议，主张把热河拿给万福麟，副司令没加可否，我还以为是无稽之谈。这样看来，是事出有因了。"有的说"我昨天由北平回来，在途中看见这个部队，是用备战行军的姿态，向古北口外推进，我就有些疑心，这的确是值得注意的！"有的还很肯定地说："副司令既没有命令指示，说明这个部队用途，此种行动，一定是有阴谋的，我们可以不客气地对待他！"有的更愤懑地说："九一八"事变的当时，他们不敢对日本放一枪，偷偷地撤进关来。今天却来此找事，真是欺人太甚，不能容忍！"张从云本来昏庸，一向只是对汤奉迎讨好，不管大局的利害，他在胡说乱嚷之后，竟然卤莽坚决地大声说道："不必多谈，兵来将挡，他既不仁，休怪我不义。先下手为强，我们有力量，把他们打回去吧！请大帅下命令，先叫窦团就地拒止，我马上集合全旅，赶往增援，协力进攻，一定能把他打跑！"他们越说，汤就越狐疑，越气恼。

究竟是为了什么呢？事情是这样的：当天下午七时许，汤玉麟接到滦平驻军团长窦连玺的电话报告，说是王以哲旅(时东北军已以大旅为单位)全部已于当日午后五时左右进出古北口外，一部深入热境宿营，其先头部队与我巴克什营驻军一连仅隔村边河岸，似仍有继续前进模样，事前未奉命令，请示是否准其通过等语。本来在"九一八事变后，汤就时以热河地盘的得失为虑。当时，谣言繁兴，说是南北许多人都主张另换人主热，使汤专主军事，张学良正在考虑主席人选。还有人说万福麟正在极力活动，要来热河代替汤职等等。这些传说已使汤非常烦恼，今又得此报告，他认为事先并未接张学良通知，王旅此种行动，恰在谣言四起之时，蛛丝马迹，绝

非偶然。当即召集在承德的武官团长以上，文官厅处长等，共商对策，故有此一番纷乱。且大多数都认为"来意非善，不可轻恕"，加以张从云的胡言乱语，激使汤玉麟暴躁如雷。

参谋崔广森等几个少壮幕僚都因为年轻望浅，发言非常慎重。更以兹事体大，也不敢乱作主张。但当这战机一触即发的时候，也不容不有所申述，遂即婉转地向汤建议说："固然副司令没有命令，王旅的行动突兀，可是他还没有称兵的行为，我先动手，师出无名，胜既难辞其咎，败更无以自存。目前不应听信传言，轻举妄动，可以命窦连玺团秘密戒备，该部若再前进即着窦团派驻巴克什营附近之部队，善言劝阻，一面派员并致电王以哲，以慰问为名，前往观察动态，并用言语试探，更用电话向副司令报告请示。倘若王以哲竟敢用兵图热，我再加以讨伐，比较稳妥。"经此一说，汤的情绪已渐缓和，汤遂问派谁去好，幕僚们说派唐参谋去。于是就决定派我，偕中校副官吴玉华及电话兵一名，携带话机与被复线（以备随时随地，将线搭接沿途电话线上通话之用），乘坐汽车连夜驰往古北口外会晤王以哲。路过滦平县并向团长窦连玺传达戒备命令，随行的副官吴玉华并不出面见王，准备倘若我被王以哲扣留，或遭遇意外时，就由吴立刻用电话通知军部，并即驰回报告。临行时，张从云老气横秋地对我说："老弟，王鼎芳他不敢把你怎样，用不着对他太客气了！"我对他笑了笑，也没说什么就走了。

在古北口外镇市中，找到设在一座旧庙内的旅司令部，由王以哲亲自接待，态度颇为亲切。经我委婉说明，王才声称他是奉命开来验防并无他意，并决定停止演习，以免误会。

我辞别出来，王又再三嘱咐向汤善为致意。我回到窦团于连连部，立即用电话向汤报告与王晤谈的简单经过，叫他放心。次日，我与副官吴玉华、同王旅的李参谋即乘汽车回承德，路过滦平稍停，通知窦连玺并嘱多与王以哲旅联络。到承德后，先由我单独向汤报告经过，汤很满意。立即接见了李参谋，嘱咐参谋处妥为款待。随

后又派汽车把他送回古北口旅部，至此，一场轩然大波，幸告平息。

四

1933年初，孙殿英第四十一军，已奉命增援开进热河，控制于围场、赤峰间。汤军也开始调动，刘香九、富春两步兵旅正在集中，准备向前线推进。大约在3月2日，参谋长索景斌忽要我帮同前去设置前敌指挥部。我因离部队很久，对于作战部署、军队调动，非常隔膜。在与索匆匆谈话中，得知当时情况的概略是：(一)已发表张作相为华北对日作战军第二方面军总司令，汤玉麟为副总司令兼第五军团军团长，本方面军指挥第五军团、第四十一军孙殿英部，新编的第某军(冯占海的义勇军)，及退至热边的东北义勇军各部，担任守备热河。(二)本军董福亭旅正将朝阳寺至朝阳的防务，移交万军团某部队(是三十旅于兆麟部)，交代后即向建平转进。(三)本军的守备地区为赤(峰)、建(平)、朝(阳)三线(记不甚清，似还说刘、富两旅已进入阵地，董旅转进后，看情况，使暂控制休息，或立即延伸增加，至时再决定。炮兵团正向阵地推进，张旅等为总预备队等等)。(四)以朝阳寺、朝阳、凌源、平泉、承德、古北口之线，为第四(万)军团与第五(汤)军团作战地境线，线上属第四军团。

谈至此，索要接长途电话，他说："好吧！咱们明天车上谈吧，你准备休息去吧。"因此，对于本军骑兵的使用，以及如何与孙殿英军配合作战，怎样划分地境线，都还没谈到。当时我写了个条子给参谋姜龙韬，要他与秦参谋准备一切出发事宜，并要他通知白参谋填一张敌我态势略图，详驻本方面军作战指导和兵力部署，最迟出发前给我。

3日清晨，索派汽车将我接到他住宅，方知日寇乘万军团部队在朝阳方面接防后部署未稳，即攻下朝阳寺，同时寇军两师团、一混成旅团、一骑兵旅团约3万余人大举全面入侵热河。开鲁方面情

况尚不详知。万军团立足不住，全部动摇，风卷残云，节节退却，且不照规定撤守承德，竟于放弃平泉后，仓惶撤入喜峰口。承德危急万状，汤军后续部队已正向隆化往前推进，承德仅余汤偕幕僚及特务队（卫队），其中一部分也正准备出发。形势万分危急，不得已当派汽车传令急调正向隆化行军的张从云旅，飞速间道折回，据守承德东方10余里的红石峦高地。汤要索亲到红石峦对张从云旅详细指示，务必确守，以待重新布置。索与我到红石峦侦察后，遂用当地民工，扼险构筑迫击炮，轻重机枪掩体，并对山路加以阻绝。至下午四五时，张旅全部先后到达。索即对营长以上讲话，说明情况、指示机宜、勉励固守。时已迟暮，汤有电话来召，索即偕我回部。闻本军已电前方部队变更部署，并用电话请张学良令古北口驻军飞援承德，以期挽救。晚9时许，接张旅电话已与敌发生激战，初颇稳定。至4日拂晓前，电话不通，情况混乱。天亮后，市郊已发现敌踪，形成混战。汤玉麟无死守决心，乃率幕僚与卫队退走，遗弃辎重颇多，时在是日上午8时许，日寇随即占领承德。

在撤退中，参谋长李赞亭、索景斌等借故逃往古北口，奔北平。汤则率其残余，南至丰宁县，随后，除崔（兴武）旅、富（春）旅，及刘（香九）旅旅部与吴嘉宾团外，其余连乌臻泰新编的蒙古骑兵、教导总队也都赶到附近。时张从云辞职，已由团长刘育才升任该旅旅长。此时，参谋本部联络参谋黎明赶来，他和孟昭田及一些少壮幕僚，均主张选拨精锐，乘机侧击，反攻承德。汤不得已，勉强同意，当指定刘（育才）、乌（臻泰）两部步骑联合约4000余众为前驱，大部随后，出博诺坳，经张百湾猝击日寇侧背，迅即袭占承德，然后与古北口出击的友军协力，彻底歼灭该敌。正准备间，适孙殿英军正向察境急退，孙来晤汤，次晨方去。汤又忽然变卦，决即撤退，苦劝不听。全军遂由丰宁县经大阁镇、大滩，撤至察省沽源县一带。既无命令，又无敌情，竟自轻弃国土，实不知其是何心肝。

汤军撤至察境，军分会予汤玉麟以撤职留军、戴罪图功处分；

另派何遂为副军长，并代行军长职权。不久，汤又将何遂迫走。汤也曾与冯玉祥勾搭，接受其第某路（似系第一路）总司令的委任，但迄无若何行动。此时黎明重来，再倡反攻之议。正行动间，石（文华）、赵（国增）两骑兵旅、及旅长刘育才率步兵第三十七团投归孙殿英（窦连玺团早被收买投去）。汤、孙两军曾在沽源附近，狼尾巴山下火拼混战。汤军击退热伪军索景清支队，进占热河丰宁县的大阁镇。混战时与乌臻泰部失去联络。

那时我已担任了汤军的参谋长。同时东北义勇军郑天狗、耿继周、李佩声等先后率众来归，赵国增旅的团长黄永和也率部逃回。汤玉麟改编所部，任副总司令董福亭兼步一旅长，崔子衡为步二旅长，总参议耿继周兼步三旅长，汤玉书为骑一旅长，李佩声为骑二旅长，黄永和为骑三旅长，郑天狗为别动队司令，汤玉铭为混成旅旅长，参谋长唐精武兼教导旅长（未及调集编训）。

汤军回据大阁镇一带，实予伪军以莫大威胁，因为他遇敌虽怯，但击伪还强。于是，热河伪军司令官汉奸张海鹏又派人屡来勾搭，并赠以大批伪钞物资，力劝汤袭占察省以图自存，敌伪军当暗中竭力支援。时汤部成分多为义军改编，且董福亭旅抗日意志坚决，始终不渝，即使汤欲降敌殊难顺手。恰于此时，方振武、吉鸿昌倡议讨何（应钦）抗日，邀汤参加并请晤谈。汤军将领多对何（应钦）不满，汤恨何尤深，故一拍即合。汤即偕我前往约定的地点（独石口外通往大滩道上的一个村落），会见方（振武）吉（鸿昌），刘桂棠也派有代表高昨非前来参加。当时决定先攻下北平，驱逐何应钦，然后再联合各方共赴国难。方、吉自任前驱，刘（桂棠）任第二路，汤任第三路，立即依次进出延庆，急速袭取北平。分手后，方、吉即率队出发，刘桂棠部进驻赤城，汤军遂又撤出热境，进驻独石口内至云州间。

不料，刘桂棠竟又受何（应钦）收买，饵以察北警备司令职位，背信毁约，不但阻挠汤军前进，坐使方、吉失败，且突然袭击云州汤

司令部所在地。于是，汤、刘两部遂即混战于云州赤城间。经宋哲元派沽源警备司令张允荣就近劝解，双方才又停战，时已在1933年冬季。

汤派我与张允荣同往晤宋哲元，时宋已赴平，我即赶往相晤。宋代汤向何（应钦）疏通，不得要领，劝汤暂且自筹军费。此时，汤部官兵艰窘已极，衣食不济，实难长此困守。且大军环伺，既不敢再窜口外北面降敌，亦不容流窜为匪。汤乃万不得已，忍痛将军队交宋（哲元）改编（编并时，郑天狗、黄永和均率众他去）。经宋代为请准军分会给以名义，并由宋按月拨给津贴，退居养老。于是，此一贪淫恣睢而又祸国殃民的军阀竟得安然下台。

热河失守前后

周达夫

1931年“九·一八”事变，东北三省沦陷后，日本侵略军继续向热河方面进犯。第二年(1932年)年初，热河形势也日趋紧张。省主席汤玉麟向南京国民政府请求增援。表示准备抗战。原来蒋介石在举国一致要求抗日的舆论压迫下，不得不装出一副共赴国难的样子，当即派行政院长兼财政部长宋子文和驻北平的陆海空军副司令张学良，一同赴承德，了解情况，研究对策，并给汤玉麟打气。这是蒋介石唱的一出抗日戏。他的实际行动却是另一个样。

跟随宋子文去承德的，有上海市工商联合会会长黄炎培和一个有澳大利亚国籍的英人名叫端纳尔(Doner)的蒋介石顾问。黄炎培随行的目的，是为了了解热河形势，如果打起仗来，上海工商业者应起一些什么作用；端纳尔的目的，是搜集中国抗日真实情况，向外国情报机关作宣传。端纳尔与蒋、宋、张的关系是有历史的，是相当密切的。另外还有朱庆澜——字子桥——将军。他是东北老一辈名宿，在南洋一带华侨中很著声誉，当时在北平，主持辽吉黑热后援会。随张学良去承德的，还有陆海空军副司令行营秘书处副处长周达夫。张、宋诸人赴承德乘坐的是小型载重汽车，在承德的行宫——避暑山庄住了一宿。张学良此行目的，是进一步了解热河驻军的兵力、武器、弹药、粮饷等实际情况，和汤玉麟商谈如何补充和增援的办法。当时热河驻军共有5个师，军火、被服、粮饷十分缺乏，战斗力尤其差，如战事爆发，迫切需要南京和北平大力补给和增援。

张、宋等一行，从热河古北口回北平，途中遇大雪，山路崎岖难

行，在古北口停下来，过了一夜。在古北口电告蒋介石，说明热河的现实情况，转达热河方面的急切要求。张、宋回抵北平后，即集合东北军、西北军和蒋系的所谓中央军两个师的指挥官，举行军事会议。会上决定了战斗编组，赋予各军、师战斗命令。

当时各军的战斗位置是，北平至山海关一带，为何柱国指挥的第五十七军，于学忠指挥的第五十一军，王树常指挥的一个军。北平以北昌平、怀柔、张家口地区，是宋哲元部的西北军和商震指挥的一个师。东北军的3个步兵师和蒋派来增援的步兵第二师（师长黄杰）、步兵第二十师（师长关麟征），位置在北平、古北口间。以上各军的兵力、武器、被服、粮饷、均严重不足，并无开进热河增援抗战的条件。

张、宋将热河及关内驻军情况，向蒋作了汇报后，蒋介石派来军需人员，发给各军士兵每人短裤一条，雨伞一把，这对多雪的北方战地，并没有什么作用，未免太儿戏了；至于军饷就根本没有指望。关于热河的一切要求，南京方面更是一味推托，复电叫热河"相机处理"！战争爆发后，宋子文为支持张学良，自动把财政部的税警总团从连云港开往北平，增援长城线上的战斗。不料竟被蒋介石命令河南省主席刘峙，在郑州把兵车给扣留下来，严令税警总团返回连云港。蒋介石大喊大叫的"抗日"，实质就是这样一回事。

"九·一八"事变后，汪精卫却东渡日本，与日阀勾搭去了，开始唱他那个臭名昭著的"一面交涉、一面抵抗"的调头。不久回国，向蒋介石提出参与政事的要求。他们两个竟把国家大权私自平分开来，蒋介石抓党（国民党）权、军权，汪抓政权。在"九·一八"事变的第二天，蒋又从南昌——正在江西"剿共"，电示张学良，避免与日军冲突，采取不抵抗主义，免贻日方以口实。一切听从政府，由外交途径解决。热河抗战开始，蒋一变其不抵抗说法，大作抗战文章。向在日内瓦开会的"国际联盟"提出控诉，用以欺骗国内外的舆论。东北军也好，西北军也好，中央军也好，和日军一接触，很多都溃不

成军。丢掉了热河，退进了长城，战事逼近北平郊区。蒋介石坐不住龙霄殿急忙专程北上，同张学良晤面，乘机迫张交出兵权，以制造对日谈判条件，好保住他偏安一隅的局面。

1933 年 3 月初，蒋介石不顾在江西“剿共”的军事繁忙，乘专车沿平汉路北上，电邀张学良和他保定见面，张学良带领平津卫戍司令王树常、秘书处副处长周达夫，兼程赶赴保定。蒋、张会谈的内容很简单，蒋对张说：“目前对敌斗争是紧要的。但现在国内出了问题，就是汪精卫出来了。你、我、汪三人不能同时在台上，必须有一个下去的，你看谁下去好？”张已领会蒋的意思，是叫他下去，慨然对蒋说：“只要对国家、对人民有好处，我下去可以，马上下去，并且出国去。”张学良的表态正中蒋的心怀，就这样决定。张学良返抵北平，立即请章士钊给他拟下野通电。电稿成，送给张学良看。张说：“写得很好”，即令周达夫去前门车站见章。并谓：“听说章先生搭这次车赴天津，可告知他，我就要出国了。”还送给章先生天津一家公司 2 万元的股票，表示敬意和酬谢。

张学良辞职离开后，蒋介石就派两媚日派来平，一是何应钦来接张学良的事，他先后和日军缔结了《塘沽协定》和《何梅协定》。二是黄郛到北平成立个华北政务委员会，导演出以殷汝耕、陶尚铭为首的两个冀东专区。

日军侵热与张学良下野

王卓然

一

1932年，日本帝国主义夺取东北三省后，又谋进取热河。它的办法首先是利诱，企图使汤玉麟自己上钩。如利诱不成，就作出威胁姿态，想不战而取，要汤玉麟自己投降。若再无效，才以武力夺取。“九·一八”事变第二天，汤玉麟在沈阳的一部分家属携带细软，跑到沈阳小南关的法国天主堂避难。日本驻沈特务机关，原想派宪兵到汤家去“保护”，作为拉拢的开始。听说他们已经跑到天主堂，就叫一个台湾籍汉奸谢履西(也就是以后做伪满外交大臣谢介石的族弟)到天主堂向汤家人说，他是汤家二少爷的朋友，可以保护汤的全家生命财产安全，并可护送他们到天津。日本租界内的住宅。就这样，由汤玉麟的妹子带着全家大小和细软东西，在谢履西的陪同和日本宪兵队的保护下，乘南满火车去大连，搭船到天津到1932年4月伪满政权在长春建立后，就特命汤玉麟为热河省长兼热河军区司令。据说当时的汤玉麟还未失掉绿林豪气，大骂来人说：“张雨亭是我拜把子弟兄，你们害死他，我没有那么混蛋。去作你们的官!”又由邮局退还了伪满的委任状。

这年冬天，日军占领了锦州，进窥热河的门户北票，于是用伪满名义通知汤玉麟派代表到北票开会。日方代表有武部六堂，外加关东军参谋长代表和锦州日本驻军代表各一人。汤玉麟派公安管理处处长张舜卿前往参加。会上日方向张提出了三条要求：第一、说汤是满洲国委任的热河省长兼军区司令，必须派亲信负责的人

为代表常驻长春，加强联络。第二、为了满、热一体的关系，要汤同意把铁路由北票延长修建到承德。第三、为了加强联系，要汤同意日本军部在承德设无线电台。这三条由张舜卿电告汤玉麟，并直接电告在北平的张学良。张学良复电令张舜卿断然拒绝。

日寇这时企图用中国人打中国人，编组了不少伪军，一部分是招募土匪、另一部分是强拉农民。内中不少爱国人民，不甘心为虎作伥，常把日军的军情通知我方；有的还倒戈投诚。就因这种关系，一个日本军官松井大佐坐飞机侦察，被我义勇军用步枪打下，落地后松井被俘。经报告北平张学良，张命就地处死。指挥伪军的寺内长雄大佐，发现了伪军与我军有联络，松井因而致死，乃借召集会议为名，集合伪军旅团营长数十人于新立屯，令日兵用机枪包围，全部被活埋惨死。

当时统治热河8年的汤玉麟，别号"汤大虎"，这个绰号可以代表他的性格。头脑简单、性情粗暴，固然是他的本色；而不学无术，贪污虐民，却是他的本质。他自己兼任三十六师师长，用他的三弟玉山作该师五十八团团长，四弟玉铭任师属炮兵团团长，五弟玉书任师属骑兵团团长。他的大儿子佐荣任禁烟局局长，，二儿子佐辅任省政府委员兼财政厅厅长。这简直是把热河变成汤家的私产。热河的禁烟局根本不是禁烟，而是指派老百姓种烟纳税。热河种烟也是请得南京蒋政权许可的，名义是筹措军饷，实际上禁烟局每年收多少烟税和怎样开支，全是汤氏父子的秘密，别人没法知道。至于军饷，还是常常拖欠数月不发。据说汤氏父子有这样一句信条："雄兵百万，发饷就散。"这样养兵，怎能卫国保民！汤玉麟常怕人民"造反"，特别是在朝阳地带。那地方百姓为了自卫，在羊山和二十家子等几个山村，盛行红枪会的组织。汤为了镇压，派他五弟领骑兵团驻守朝阳。假禁烟之名，对老百姓横征暴敛。老百姓纠集红枪会数千人围攻朝阳，时朝阳有个中学校长是地方有名的举人，名沈鸣诗，平时对汤家父子兄弟的暴政，常表不满。此时传言，说沈与围城

的红枪会有关系，汤老五为了镇压示威，“杀一警众”，把这位沈校长深夜抓来，不容分说，立地枪决。但是朝阳之围仍是未解，反而加甚。老汤看着没办法，真是众怒难犯，才把他的五弟调走，派了被民众信仰的杨子仁的儿子杨仲山去当县长，城围始解。据说杨子仁以前曾在朝阳作了几年县长，清廉爱民，深得人民的爱戴。后调充热河烟酒公卖局局长，因病死去。他的儿子杨仲山此时是滦平县长，老汤调他去朝阳解围，他挺身而出，向老百姓说：“我是杨子仁的儿子，请你们大家回家安心种田，有什么不平事，我都可以负责解决”。这说明热河政治的黑暗，可惜像杨子仁父子这样好官当时太少了。

二

日寇图谋热河和汤玉麟不可靠的情形，天天载在报上，惊动了上海爱国人士，主要是上海的一些民族资产阶级。以黄炎培为首的上海地方协会内，有穆藕初、刘鸿生、钱永铭等，与东北爱国人士杜重远共同努力，推动了当时代理行政院长兼财政部长宋子文，要他紧急设法挽救热河和华北危局。

宋子文为了表示关心热河防务，增加自己政治资本，于 2 月 11 日偕秘书周象贤、顾问端纳飞到北平，与张学良商议热河防守问题。杨杰以军事专家身分先到，代表上海爱国人士的黄炎培、穆藕初等也先到。他们会同当时北平爱国人士朱庆澜、熊希龄及东北的杜重远、王化一等积极组织东北热河后援协进会，于 2 月 16 日下午假东城外交大楼举行成立会，出席人还有张伯苓、蒋梦麟、胡适、周诒春、张嘉森、章元善、汤尔和、丁文江、阎宝航等 60 多人，公推张伯苓为主席。宋子文与张学良亲临致词。会上通过章程并决议：(一)通电全国人民报告热河后援会之成立，要求全国一致起来援助；(二)通电全国军政官兵，请一致团结御侮，并推朱庆澜等数

人为常务理事，又决定朱等次日同宋子文等去热河，察看情形，进行援助。

2月16日晚8时，张学良在顺承王府官邸召集有关将领会议，分配防务，作去热河的准备。宋子文、杨杰均出席，还有万福麟、宋哲元、商震等将领十数人。张学良将热河地图铺在地板上，手执红蓝铅笔俯伏地上勾划防地，仰面向宋哲元说："明轩你可把守这一线(指长城、冷口、喜峰口一线)。"宋哲元当时厉声拒绝说："我的兵力太薄，装备又差，怎能担当了这么一个大面。"张说："不要紧，你的右翼有何柱国，他可以支援你。"宋又很不客气地说："何柱国是败军之将，靠不住，我怎能信他，我不干！"张听了这样不客气的回答，极感难堪，约有几分钟没有抬起头来。后来说："再商量吧！"杨杰在旁，看见这种情形很着急，用手拉胡若愚到外边说："你劝汉卿不要勉强宋哲元，因为作战时，如将领不服，心中有问题，是很危险的。"

至于宋哲元为什么说何柱国是败军之将呢？因为在锦州失守后，何柱国任临永警备司令，山海关为临榆县治之所在，是关内外的门后，何的责任即守卫山海关。日军在1933年1月1日借词向山海关进攻，用猛烈炮火打毁城的东南角，守城的何部第九旅营长安德馨浴血抗战，壮烈牺牲。但接着第九旅即撤出山海关，致使华北门户洞开。宋哲元的那番话，实系有意挖苦。

当时张已与宋子文商定发表张作相为保卫热河的统帅，任第二集团军总司令，汤玉麟任副司令。张作相原是张作霖、汤玉麟的老"把兄弟"，对于张学良是父执，素有"浑厚"之名。他原是吉林省的省主席，"九·一八"事变时，他正在锦州原籍为父治丧。张学良怕汤玉麟疑心，用他以安汤心，以利指挥，也算煞费苦心。受张作相指挥的部队按编制应有六七万人。但张作相也是不学无术，既无威以制人，也无智以服人，无信心、无决心，也毫无准备。在热河危急的当头，被临时"拉夫"上台，统率腐朽的封建军阀雇佣兵，去抵御

日本帝国主义训练出来的法西斯强盗，胜败之数已注定了。

2月17日晨4时许，宋子文与张学良、杨杰偕同随员卫兵数十人，分乘汽车、卡车30余辆为一路，朱庆澜、黄炎培等乘车十余辆为一路，浩浩荡荡向热河进发。据说事先汤玉麟闻讯，怕对他不利，大骂说："小六子(张学良小名)是不是勾结宋子文等来打我的主意！"经左右人说："宋子文是代表中央，张汉卿是华北直接指挥的长官，因热河防务吃紧，前来观察，阁帅(汤玉麟字阁臣)可趁机向他们要些钱，要些东西是有利的，应当表示欢迎。"汤这才无话，于17日下午率文武官员数十人至郊外20里处广仁岭迎接。宋、张、朱等于当日下午5时到达承德，分别宿于都统公署和地方机关。张学良这时因有烈性毒品瘾，去热河的路上每走30里，停车一次，必注射毒品针，到热河已疲劳不堪。当晚只与汤玉麟稍谈，定次日举行会议。

承德是清朝皇帝行宫之所在，有避暑山庄，风景美丽，有里八、外八景之称(即行宫内外各有八处地方，景色宜人)。18日晨，宋子文偕秘书侍从等，先看内外风景，中午是汤玉麟同地方各界预备的欢迎午宴，计主客共60余人。主客当然是宋子文、张学良、张作相、杨杰和后援会的朱庆澜、黄炎培、穆藕初、杜重远等，还有一个天主教法国人司敏铎也参加。宋子文首先说话，表示南京与全国皆非常关怀热河的安危，要大家保国卫土，所需饷械，他当负责，并与张学良随时接头办理。他说的是广东调的官话，在坐的人多有听不明白的，于是由杜重远起为翻译说明一遍。张学良接着致辞，勉励大家誓守热河，准备反攻，以雪"九·一八"之耻。继由汤玉麟起来答辞，表示"决心"与日寇周旋。这样这个礼节上的欢迎会历时2小时完毕。按理张学良、张作相应带一些高级参谋人员与汤玉麟举行一次详细会议，就抵御日寇作一些知己知彼的估计，和攻击防守上的安排。但这样的会没有开，就把由北平带来的两电稿由承德发出。一个是由宋子文、张学良署名，致日内瓦中国驻国际联盟代表团的。

大意说中国政府和人民决心抵抗日寇的侵略，现集中兵力，保卫热河，请向国联和全世界声明；另一电由张学良、张作相、汤玉麟、万福麟、宋哲元等27名守卫热河有责的将领，向南京及全国通电，表示决心抗战，呼吁全国一致支援。张作相听说发出这样一个通电，叹气说："一点没有准备，发出这样一个电报，岂不是惹祸吗？"他的意思是说日本人看见这样一个通电会恼火起来，加速进攻热河。宋、张于下午3时带领全部随员离开承德，夜宿古北口，于19日下午1时许返抵北平。

在2月22日，距宋、张热河之行仅4日，日军即大举攻热，由日本关东军司令率领约3个日本师团，以锦州为大本营，分兵三路：一路由绥中攻凌源，一路由锦州攻朝阳，一路由通辽攻开鲁，并配有张海鹏和于芷山的伪军。防守主将张作相原计划配备的兵力有一半以上尚未到达防地，根本未构成一个防御体系；又加士气低落，真是将无决心，兵乏斗志。日本人用飞机扔了几个炸弹，用机枪扫射了几下，又出动几部坦克车。就这样，开鲁一线，汤部的崔兴武旅即首先投降，万福麟的第四军团守凌源一线，闻风溃退，朝阳亦即不守，三条阵线同时溃败。复有平时受日军收买的汉奸作为向导，因此日军如入无人之境。汤玉麟于3月4日晨先撤出热河，日军于4日午后1时以128人先行，由承德商界代表迎接入城。汤玉麟带领他的文武官员及家属退走时，从未看见过一个日本兵，更不用说有什么抵抗了。这样，压在当地人民头上的封建军阀大山又换上了日本帝国主义大山。中国人民是不甘心的。以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为代表的新生力量，和以民族资产阶级为后盾的热河后援会，此时在唤起民众支援抗战上，曾起了很大作用。例如张学良曾接受他们的建议，把汤玉麟捉住正法，以振士气而励人心。但汤玉麟畏罪逃往察哈尔，竟得幸免。

三

热河失陷后，全国舆论哗然，同声谴责南京的军事和外交。张学良更被国人攻击得体无完肤，于 3 月 8 日电致南京辞职，略谓“……自东北沦陷之后，效命行间，妄冀戴罪图功，勉求自赎。讵料热河之变，未过旬日，失地千里。……要皆学良一人诚信未孚，指挥不当，以致负政府督责之殷，及国民付托之重。戾愆丛集，百喙莫辞。……应恳迅赐命令，准免各职，以示惩儆；一面迅派大员接替，用伸国纪。转还之机，在此一举。……”此时全国舆论攻击的矛头主要落在蒋介石的身上，他派军政部部长何应钦先用视察名义来北平，自己也作北上督师、筹划反攻的虚伪宣传，偕宋子文北来。先止于石家庄，与阎锡山、徐永昌等会晤，并电约张学良在保定会晤。3 月 8 日晚 12 时，张学良轻车简从，偕端纳、汤国桢、王卓然等由西便门登上早备好的一列专车，并对王卓然说：“我与蒋先生约会在保定见面，我要与他商讨反攻热河。主要条件是必须补充枪炮弹药。我想要求补充一二千挺轻重机枪和二三百门迫击炮。再就是要充足的弹药，能加些高射炮更好。若是中央有决心抗日，应向日本宣战，动员全国力量与日本一拼。我是有决心亲临前线的，干死了比活着受全国人唾骂好得多，人反正有一死，你晓得我是不怕死的，就怕南京假抵抗，真谋和，那我就没办法了。你看我想的是不是？听说南京有一些亲日和恐日派，正同日本人拉拢讲交情。我已于今日发出辞职电，南京可能牺牲我，以平息国人愤怒。同时外交上，因为国联靠不住，要与日本谋和。你看我想的对不对？”次早(3 月 9 日)5 时到达保定。蒋、宋等原约定同时到达，此时尚未到来，车站上也无消息。张学良亲到站长室向石家庄要电话，宋子文接电话说：“蒋先生有一项重要意见，要我先来保定与你商谈。因为太重要，电话中不便谈。我即来，见面再详细商量。”张放下电话回到车

上，面色阴沉。端纳忙问："替·未(T.V、宋子文英文名简称)怎说的？他们怎还不来？"张说："我的预料果然不差，替·未先来传达蒋先生重要意见，这里大有文章。我估计绝不是共谋反攻热河，更谈不到全面向日本宣战了。老王(王卓然)你好好说给端纳听。"于是大家猜测纷纷，并共劝张上床休息，静观事变。

约10时，宋子文的专车到保定。张立时登车与他接谈，约二三十分钟，张匆匆下车，神情紧张，我与端纳趋前急问，他说："蒋先生认为热河失守之后，我守土有责，受到全国人的攻击。中央政府更是责无旁贷，他首当其冲。正如同两人乘一只小船，本应同舟共济，但是目前风浪太大，如先下去一人，以避浪潮，可免同遭沉没；将来风平浪静，下船的人仍可上船。若是互守不舍，势必同归于尽，对自己对国家皆没有好处。我已干脆告诉了宋子文，当然我先下去，正好趁机会休息休息，要他急告蒋先生不必烦心。"张与我们谈话时，宋子文已去车站向石家庄打电话给蒋。大意说："汉卿态度很好，一切服从委员长的命令和安排，请委员长速来见面。"下午4点，蒋的专车到保定，进入张的专车站台另一边。张的卫兵吹接官号。张学良戎装立正，行军礼恭迎。车停后，张与宋子文立刻登上蒋的专车进行商谈。蒋不待张开言，首先很庄严地向张说："我接到你的辞职电报，很知道你的诚意。现在全国舆论沸腾，攻击我们两人。我与你同舟共命，若不先下去一人，以息全国愤怒的浪潮，难免同遭灭顶。所以我决定同意你辞职，待机会再起。子文传达你慷慨同意，这是好的，好的。一切善后问题，可按照你的意见办理。有什么问题与子文商量，他可以代表我。"张唯唯说："我感谢委员长的苦心。我身体不好，精神萎靡，东北丢失，我早就想引咎辞职。这次热河之变，我更是责无旁贷。免去我的本兼各职，正所以申张纪律，振奋人心。我想日军必很快进攻华北，以遂其并吞整个中国的阴谋。国联列强各怀心事，决不可靠。我看委员长应考虑动员全国与日本宣战。目前应急调中央劲旅与东北军配合反攻热河，以阻止日军前

进。"蒋闻张语连说"是的是的"。这样相谈不过十几分钟，张看蒋似不愿多谈，即行退出。张退回自己的专车约有 5 分钟，蒋偕宋来到张的专车回拜，无非用好言安慰张，并劝他次日(即 10 日)即飞上海，免部下夜长梦多，并说到上海后赶快出洋治病，出洋名义和手续，当妥为安排。约有 10 来分钟，蒋即出来。张随下车，送蒋上了他的专车立于车门之外。蒋连说："汉卿，再见吧，再见吧。"并且目视宋子文说："子文你留在后面，多与汉卿谈谈。"话说完，蒋车即向石家庄开行。

蒋去后，宋来到张的专车，张吩咐预备晚饭，即与宋商谈善后。大致是将东北军编组为四个军，由于学忠、万福麟、何柱国、王以哲 4 个人分别统率，北平军分会由何应钦任代理委员长，原参谋长鲍文樾调为办公厅主任，并调中央军第二师黄杰和第二十五师关麟征开赴古北口，以抵抗日军的前进。至于张建议动员全国全面开战，以关系太大，留待中央从长计议。宋的专车和张的专车挂在一起。到夜 10 时半抵长辛店，宋车与张车分开。宋辞回自己专车，连说"汉卿，一两天内上海再见"。他也就开回石家庄向蒋会面报告。

四

宋子文走后，我们的专车即向北平进发。我在客厅，正与端纳闲话，忽然副官谭海跑来说："王老师，副司令大哭，你快与端纳过去劝劝。"我急同端纳进张的卧室，见他正伏枕大哭，非常沉痛。端纳说："Young marshal，be a man，brave andstrong。"意即"要作一个大丈夫，勇敢与坚强。"我说："副司令，你不记得老子的话吧，福兮祸所伏，祸兮福所倚。你正好借机休息恢复健康。若是真要责成你反攻热河，你的身体精神皆不胜任，那时失败，不如这时痛痛快快一走，把病治好了，留得青山在，不患无柴烧。"我与端纳正待他的反应，他突然一跃而起，仰天狂笑，急拉端纳和我坐在他的床上。

此时汤国桢与谭海皆在旁呆立。他说："我是闹着玩，吓你们呢！我刚才听替·未说蒋先生对日本仍以外交为主，并想用黄郛到北平来主持政务，专办对日外交。使我想起一个笑话，让我们开开心。话说有一个财主，土匪夜里来抢，持刀要杀人。财主跪地求饶，边叩头边说要什么都行，就请饶他一命。土匪一眼看见财主的老婆还好，说'这样办吧，我玩你的老婆，罚你跪在旁边叩头，头叩得好就饶你的命。'财主连声答应。及土匪尽兴席卷而去，财主老婆起身整衣哭骂财主说：'那有你这样无耻的人！我被贼作践，你应拼命救我，怎么还在旁边跪着叩头？'财主说：'你别哭，你那知我们还占了他便宜呢！'妇人大哭说：'老婆被贼奸污，你有什么便宜好占？'财主说：'当你们最紧张的时候，他顾不得看我，我少叩了很多头，岂不是占了便宜！'"张说完对我说："老王！你好好翻译给端纳听，问他若有这样便宜交涉，他干不干？我看这位财主最好当外交部长，好与黄郛唱双黄。"端纳很仔细地听我翻译后，也说了一个讽刺故事，他们彼此一笑。这时谭副官进来报告说：已到西便门车站，请副司令下车。于是我伴张学良驱车回顺承王府，到达时已午夜 12 时。张学良在下汽车时，我问他："蒋要副司令马上飞上海，你想想我可帮你做些什么准备工作。"他沉思一下说："老王，你看我放弃兵权和地盘，像丢掉破鞋一样，别的军人能办得到吗？但是中日问题，蒋先生以和为主，还不知演变到什么地步。人骂我不抵抗，我也不辩。但是下野后，天知道我这不抵抗的罪名要背到那天呢？我记得仿佛林肯有几句话，说人民是欺骗不了的，你替我查查原文，最好能马上译出送给我。"我进屋翻参考书，查原文是这 3 句话，译文是："你可欺骗全体人民于一时，或欺骗部分人民于永久，但不能欺骗全体人民于永久。"我送交他时，已是午夜 2 时，他还在阅读文件。

日军侵热期间热河纪行

王化一

1933年1月前后，在蒋介石不抵抗政策的影响之下，东北义勇军的情况愈趋不利。马占山、李杜、苏炳文、王德林等先后退出国境，他们的残部和冯占海部撤退到热河边境开鲁一带。辽宁省东边唐聚五和其他几位将领都逃到北平。辽南的义勇军遭受日军疯狂“扫荡”，也难于立足。敌人在占领锦州以后，更大举向榆关进犯，热河危急，平、津震动。

1月6日，我在燕京大学报告榆关及东北各地情况，1000多师生高呼抗战口号，响彻云霄；当场即有叶楚生等几十名学生报名参加义勇军，赴热河抗敌。同时北平爱国分子在常演日本影片的中天电影院投掷手榴弹，在各商场散发抵制日货传单。爱国妇女发起慰劳会，征集到大批捐赠的物品和现金。受共产党领导的爱国青年纷纷在街头和各校宣传讲演，号召抗战，反对不抵抗政策。当时华北人民爱国的情绪有不可遏止之势。

在北平和东北义勇军直接有关的两个团体“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以下简称救国会)、“辽吉黑热民众后援会”(以下简称后援会)都集会讨论应付紧张局势的措施。两会的重心都集中到热河问题上，均认为情势发展下去，热河将是重点。1月4日，救国会常委会决定：(一)劝促张学良率全体东北军出长城反攻，请他更换热河主席汤玉麟；(前此救国会负责同志一再请张去汤，张已有所决定，并拟以万福麟代替，但为张作相、王树翰等人劝阻。救国会的意见以胡毓坤、王以哲、黄显声诸人为宜)。(二)发动东北义勇军配合国军反攻，各军团总指挥一律到前方去；(三)呼吁全国爱国人士团结

起来，一致督促南京政府抗战。会后即推王化一向张学良面陈救国会意见，并交给张具体办法11条。后援会于1月6日夜间由朱庆澜在何遂宅内召集何遂、严宽、富占魁、高仁绂、王化一、何绍南、查良钊、杨斌甫、李端浩、刘竹波、姚凌九等开会，决定：(一)后援会进驻热河，支援抗战部队，北平仅留办事处；(二)向国内外发出抗战号召，募集捐款；(三)联系十九路军蔡廷锴、翁照垣诸人(在座有人提议联系冯玉祥，有人反对)；(四)设置电台，添购、募集交通用具等。

当时全国人士都注视热河情况的变化。1月14日，黄炎培偕杜重远(救国会常委，住上海)、李组绅、章元善等来北平，他代表上海各界爱国人士了解北平各方情况，商量合作办法；一再和救国会、后援会负责同志及各方人士会谈，大致得到几点结论：(一)救国会、后援会团结一致，并和上海各爱国团体加强联系；(二)大战一起，所有军权(指义勇军)交中央和地方当局(指张学良)统一指挥，各团体专负募捐、后援责任；(三)也讨论了交通、医药、救护等问题。黄炎培于1月22日返上海，2月10日又偕穆藕初、颜福庆、杜重远、杨志雄诸人再度北来，代表上海各界对督促政府重视热河及支援抗战等问题，起了相当作用。

这时热河情况越来越紧张，敌人暂时放松山海关而对热河采取攻势。张学良于1月24日在南京和蒋介石见面，旋即秘密回平。蒋介石迫于全国舆论和张学良的一逼，不得不应付一下，因遣宋子文北来，编组两个方面军，第一方面军宋哲元，第二方面军张作相，宋子文的税警团由温应星率领也北上参战。2月2日晚8时，朱庆澜(后援会)、张作相(第二方面军)、王以哲(军分会)、王化一(救国会)同往见张学良，商讨热河军权统一、义勇指挥权移交军分会，和如何进行后援工作各问题，深夜始散。张学良当时很兴奋，一洗往日消极情绪。

2月11日，宋子文到北平，连日和张学良会商。16日午后4

时，由上海平津各界人士、各团体在外交大楼组织“东北热河后援协进会”，张伯苓主席，黄炎培报告成立的意义和组织办法，以及人选各问题。宋、张两人在会上都初次正式发表抗战言论，希望全国一致，共赴国难。会后商定共同赴热，推动汤玉麟抗战并实地视察情况。

在这个阶段，辽南义勇军第二军团选出精锐骑兵300余名，由郑子风、王化民两支队司令率领到达热河阜新，接取弹药服装。紧接着辽南地区遭受敌人严重压迫，义勇军支持不住，化整为零，四散潜伏；并选精壮骑兵约2000多人，由副总指挥李纯华和各司令领导穿过敌人封锁线，也跟踪到达阜新。我当时是救国会军事部长兼任东北义勇军第二军团总指挥，因此，救国会、后援会两团体决定派我赴热河一行，慰问、补充到达的部队和视察热河实际情况，杜重远以救国会政治部副部长名义率学生宣传大队（宣传队的组织和宋子文有关，杜同宋有联系）一同前往。

2月17日晨2时，我率救国会军事部和第二军团到北平的一部分人员，杜重远率救国会政治部一部分人员和学生宣传大队共80多人，同朱庆澜、黄炎培、穆藕初及后援会一部分员工，分乘卡车8辆向热河进发。车子多半破旧，道路坎坷不平，颠簸过甚。但因行将抗战，人人精神振奋，忘却疲劳，且歌且行，勇往前进。朱、黄、穆诸先生均年届花甲，更不服老，矍铄愉快，给青年人以很大鼓舞。途中，孙殿英军队自山西经河北徒步来热，三五成群，络绎不绝，但纪律尚好，半途开小差的很少。午后4点抵承德郊外，汤玉麟率文武官员迎接（朱庆澜在前清末年服务于东北军界，极有威望，旧东北军首领对他深为敬佩）。宋子文、张学良、张作相等也于6时到达。2月18日，宋、张、汤等会谈后，汤玉麟于午间举行盛大宴会。席上，宋、张发言和16日在北平的谈话大致相似，不过多加些鼓励汤玉麟的话。汤的简单答辞乃事先准备好的，照稿一念。饭后，全体合影。下午，宋、张即行返平。

我一面和朱庆澜等商讨后援计划，一面深入了解热河情况。热河电台台长吴子堃详告热河军事政治的黑暗情形说："汤玉麟视热河为私产，一切不许外人过问，两个儿子最坏：大儿子汤佐荣任禁烟局局长，公开要每县包缴鸦片烟若干两，名为'寓禁于征'，售者、吸者、运者均须纳税行销各地，为热河最大的税收；次子汤佐辅任财政厅厅长，想尽名堂抽捐抽税，从人民身上敲骨吸髓。县长、税捐局长、警察局长按缺的肥瘦，报效的多少，评价出售。军队完全为镇压人民和防止抢他地盘的工具；真实的人数、枪枝（新购的枪弹存放库内不发，敌人进城完全放弃）不及定额的一半，多数吸毒；军饷层层苛扣，最后军队驻在那县，给养即向那县摊派。上下交征利，老百姓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痛苦已极。甚至有人喊出宁愿日本鬼子来，不要汤氏父子继续下去。目下尚有两名日本浪人藏在汤的地下室内，督造白面。张副司令（张学良）如果还要热河，就不能要汤，要汤就必丢掉热河。日本人熟悉热河情况，汤玉麟想要做汉奸，日本人都不要他。"吴子堃的这一段谈话和我听到一般人所谈的大致相符。

19日午后和杜重远同往吊唁汤妻之丧，借便同汤谈了很久。他谈话的要点：（一）表示他两年来同日本人"虚与周旋"的苦衷和抗战的决心；（二）张作霖撵走段芝贵，攫取奉天督军[①]的详细情况，他在当时如何卖力气为张作霖打天下；（三）他因为反对张作霖重用王永江，同张作霖闹翻了脸，他反出奉天的经过，以及后来如何恢复感情重回东北的详情。言下大有张氏父子对他不起，愤愤不平的情绪，好象他已经知道张学良要撤换他的秘密消息。在汤的客厅里摆着一只猛虎的标本，墙上挂着汤手持机关枪骑在虎背上的照片，他坐的椅子上蒙着一张虎皮。据说和张作霖同时的"草泽英雄"，都相信他们自己是天上星宿降世，来辅助张作霖的。吴俊升是黑熊投胎，平时家中养着几只熊，吴本人走路行动也模仿熊的动作；张海鹏自己说是张飞转世。一遇到关羽庙，便进去叩头，向关羽

泥像喊二哥。而汤玉麟说是猛虎投生，因此他很爱老虎，坐着谈话时候两手握拳前扑桌上，也表示"虎威"。如此头脑，如此政治，热河如何不失。我们本来注意他谈的第一点，借此机会鼓动鼓动他，但他轻描淡写的几句话便溜过去了。而对以后两段却谈得津津有味，足足讲了3个多钟头。

20日和杜重远会见了孙殿英，同孙一起洗澡、吃饭，随便聊天，了解他的情况和军事力量。他说他自己是"流门户"，没有几个真心朋友，都是想在利用他。我们鼓励他下决心，因为有消息说他和刘桂堂都暗中同日本勾搭，匪性难改，唯利是图，但他很会讲话，表示得很坚决。

这一天，我们也会见了汤的参谋长李赞廷。他分析了热河军事情况，他既想为汤掩饰，又流露出"毫无把握打起来必败"的消极情绪。第二天（2月21日）汤的参谋处科长崔荫轩（广森）来告知，晨间朝阳寺南岭我董福廷旅已同敌人正式接触，热河战幕已揭开。崔是陆大毕业，和我有小同乡关系，请他将战事情况随时和我保持联系。因此当时战事消息，得到的比较详实。

22日，我们由承德出发赴朱碌科村（属建平县），后援会交通队凑集了6辆卡车，载运炮弹、宣传队以及随行人员等。这6辆车子只有2辆车子有灯，3辆车子有喇叭，车轮破旧，零件不全；行起路来，三里一停，五里一修，司机无一不吸白面。过红石梁车子上不了坡，我和杜重远、李纯华带头倡议每人背一箱炮弹，减轻重量，始得过岭。下午3点由承德出发，晚9点才到老爷岭，只行90里路。次日午后4点到平泉，寓县公署。县署破烂不堪，连窗户纸都不完全。县长吴某因战事关系屡次呈请辞职，今天接到批准公文，欣喜若狂，清理行装等移交新任。在此会见了东北军第二十九旅旅长王永盛（万福麟部）和他的部属，我们一行有共同的看法：兵有决心，将无斗志。

24日晨，我们临时副官长高鹏，想了一个"好"办法，给每位司

机买了一包白面。这办法立即生效，不但途中障碍减少，而且速度加大。午后4点即达到凌源，只有1部车子抛锚丢在后面。义勇军第二军团各路司令、支队司令、总指部负责人员均由朱碌科到此。夜间召集一次会议，让他们先返朱碌科。25日，我们在凌源同南京政府参谋本部高级参谋、美国大使馆参赞、张学良的顾问端纳，随东北军第三十旅旅长于兆麟（万福麟部）赴叶柏寿阵地走马看花似地巡视一下。看见一条完全暴露的战壕，没有覆盖和掩蔽物，掘出来的碎石块即放置壕沟的两侧。那位高参指出这些碎石块更给敌人炮火增加杀伤力量。于旅长不服气，正在争论时候，敌机飞临上空投弹，并俯冲扫射。我们急忙跳入沟内躲避，也有人躲到附近树林中去，争论也自然地结束了。

杜重远带宣传队在凌源展开工作。我在夜间前进到朱碌科第二军团的临时总指挥部，途中军队、难民不绝于道，一片战时景象。6日晨，召集各司令会议，决定在此参加战斗，同第三十旅联系。10点前进到四家子（属朝阳），检阅到达的全体官兵，对他们讲话，并召集附近老百姓开会，号召军民合作，互相帮助。朝阳寺炮声已清楚可闻。

为避免敌机轰炸，夜车返凌源参加军事会议，途经榆树林子遇着热河赵国增旅长。他一个人在一家民宅内的土炕上据枕高坐，两张炕桌并在一起，上边摆满了鸡鱼酒肉，独自大吃大喝，见我们进来，下座相让。外面人心慌乱，百姓奔逃，十室九空，不知他从那里弄来这些酒肉，还能有心吃得下去！同他约略谈谈，他说"我这旅不过三四千人，平时毫无准备，怎能干过日本，看吧！"闻之令人愤慨。

到凌源同于兆麟、彭振国（义勇军第一军团总指挥）、唐聚五（义勇军第三军团总指挥）、李纯华、于百恩司令等开会，讨论敌我情况，及配合作战计划。开鲁已失，朝阳危殆，情势万分紧急，决定李纯华率第二军团参加作战；推我即刻返回北平，向张学良报告实际情形，请火速增援，并开展全面抗战。28日返抵北平，即往见张

学良，详陈在热所见所闻，及凌源开会的意见。肯定汤玉麟支持不了，前线兵力单薄，应火急作准备，并应当由山海关出击。和在热西布防，以防敌人趋林西、经棚、多伦而袭击察哈尔。张说东北军陆军开往前线，中央业已派来增援部队，他命我催促张作相立即出发。即晚会见张作相，研讨一下前方情况，他决定夜里即动身。

我向救国会、后援会负责同志汇报了情况，张学良拨给我一部分警卫用的枪械，于3月3日晨冒大雪再度出发。几天里前方情形已发生重大变化，沿途由热河不断地逃来官吏眷属和难民。在密云遇到冯庸(后援会给他第七军团总指挥名义，率一批“冯大”学生于一周前去热河)，他丢下队伍，只领三五名学生逃回。他说热事已不可为，劝我无须再往。午抵古北口，先打电话给崔荫轩，询问承德情况，崔告以前方军事非常紧急，汤准备出走。急电询北平军分会，王以哲说万福麟由前方来电报，报告凌源赤峰均打胜仗，我告知他事实多不相符。午后4点，张作相自热河退回古北口，住商务会内。他对我说：“各军抵抗的力量很弱，汤部节节溃退，万的报告不见得真实。指挥不统一，运输不便，给养困难，情况一天数变，我印包还未打开，卫队(张廷枢旅)也未跟上。不能赤手空拳作战，只好退回，拟请示汉卿(指张学良)，转返北平。”我即以此情况电告张学良。他说已命宋哲元军队加速赶往凌源、平泉一带增援，我请他注意各方消息的真实性。

义勇军第二军团和其他部分已完全隔绝，消息不通，只有暂停古北口，以电话局为临时住所。晚间崔荫轩告知汤的行已装分批陆续出发。4日晨，得各方情报，敌人先头部队已过凌源、平泉直趋承德，另一部由朝阳过建平趋赤峰，可能绕过围场、隆化袭击承德之背。午前问崔荫轩，他说承德以东红石砬已接触，承德街上已呈现混乱，大商店和士绅已有人准备迎敌，汤马上离此去滦平。崔于说完这次电话以后亦即离开承德追随汤玉麟西上。我同承德电话局夏君(可能是一位电话员)约好，保持随时联系，直到不能通话时为

止。午后2点左右，夏君说敌人飞机由上午一直不断地在上空低飞，11点前后敌人先开进装甲车，然后骑兵也到达，但人数并不多，街上有人在放鞭炮欢迎。他最后说了一句"日本人进院来了"话即中断。这位电话员富有爱国热情，令人敬佩。

敌人攻下朝阳后（董福亭旅在朝阳抵抗甚力，是汤部较好的将领），以少数快速部队，长驱直进。汤、万两部，望风奔溃；再不严肃军纪，将有土崩瓦解之势。我一再将情况向张学良报告说："平津的安危，东北军整个的命运，热河关系最大。万福麟谎报军情，逃入喜峰口；汤玉麟不战而退，遁往滦平；华北局势，危殆万分，非杀一二统兵大员，不足以维持军纪。对于汤、万，必须给以严厉处置，以平民愤，以振颓风。我根据救国会同志们的意见，如果汤来，我先杀汤，杀错了你再杀我。"张说："我同意你们的意见，但你不要冒失搞出乱子来。"晚4点以后，汤由滦平来电话，求转达张学良，要来古北口转回北平。我转告张，张说制止他回平，叫他带队反攻，如果不听命令，即以军法从事。入夜，张又来电话，说："汤如一定要来北平，放他进来好了，即按着你的意见处理，我派人送一个密令来，务必审慎。"我命随来人员即作准备，随来的第二军团几位义勇军司令和他们的警卫，都是转战辽南的有名好汉，缜密计划一下，相信足以制服这个穷凶极恶残害人民，临阵脱逃的汤大虎。因为张廷枢部属在古北口外截夺了汤的驼运队，逃回去的人向汤报告；又因张学良有命令叫他带队反攻，他感到回北平来凶多吉少，就转赴鞍匠屯，并撤走了他在小红石峦布置的500多名军队，同孙殿英会合西走。张学良于7日派王以哲来古北口，携来处置汤的密令，嘱我严守秘密不得泄漏。事后，据万福麟的宣传部长杜超杰说，万在退入喜峰口后，电张学良要求回北平一行，张气愤地说："要你率部反攻，你要回来，拿头来见我！"因此，万一时不敢回平。张当时确想杀一儆百，振作一下。

万逃汤跑，张作相空手退回古北口。倘敌人由承德乘胜追击，

轻骑疾进，在这无阻拦的道路上一日夜可直捣北平。我请张学良火急布置古北口防务，以备突袭。张在电话中叫我传达，命张廷枢作古北口警备司令，因为这时到古北口的只有他的一个团。（据赵毅同志说，前此张已任命他作古北口警备司令）说电话时，张廷枢即在电话旁边，我叫他直接接电话，他不接，由我来回传话，无论张学良怎说他也不肯担任警备司令。张于是叫我临时负责古北口警备事宜，他马上就正式派人接替，并命第七旅听我指挥，立即催在密云的王志军团开赴口外。3月4日早4点，王团到达青石梁、小黄土梁布防（在口外50多里），赵镇藩团随后亦即开到，即时到右翼黑石峪布防。左翼白马关由张廷枢派一个团前去。第七旅官兵开赴前线时慷慨激昂，斗志甚坚。隔日，第七旅旅长张政枋甫出病院即赶来前方。北平救国会负责同志重视这一任务。动员全部力量，同军分会、后援会密切联系，支援古北口的防御，送来地雷和食物及慰劳品甚多。张学良知道我对军事是外行，由电话中指示机宜。

张作相到古北口的下午（2月4日），他随行的高级人员劝我说："正式军队都毫无办法，义勇军起不了多大作用，你没有职责，何必在此作无谓的牺牲，可以回北平。你不回去，辅帅（张作相字辅忱）怎好先走？"我说："我受救国会、后援会两团体的指示，大敌当前，不能见危而退。辅帅可以回去，张副司令不会对他怎样，打败仗他负不着责任。"6日晨，张作相患病，得张学良同意，返回北平。

7日王以哲自北平来，他重任军职；告以蒋介石已北来，蒋嫡系军队第二师黄杰、第二十五师关麟征两师即到古北口，东北军何立中、黄显声各旅亦开拔前来，宋哲元军已抵喜峰口。敌人方面亦集结重兵，长城沿线将展开激战。张已任命胡毓坤为古北口警备司令，明天带宪兵来此督战。我把古北口附近作战情况，向他详告，因负责有人，当晚回北平。

8日晨，我冒雪到北平，即赴顺承王府（张住处）。张尚未起床，就卧室中报前方情况。张赠给我平日自用的左轮手枪，以示慰劳。

他说“蒋委员长业已到保定，约我即往晤谈，我拟请集中兵力，同敌人一拼，如蒋不同意，我即辞职出国。”并说“南京方面对我们散布了很多破坏的谣言”，他促我仍回古北口。

当天晚上，我得到后援会、救国会同志们决定，仍回前方，任务是：（一）在前方主持援助各部抗日军队事宜（二）收容整理散在热河的义勇军；（三）协助古北口防务。次日再返古北口，接纳了自热河退回的后援会技术队、救护队，安置在石匣镇。我设临时办事处在石匣王汝勤宅内。在古北口同王以哲、黄杰、关麟征等会商宣传、救护、民伕、运输等有关支援各项问题。随时以电话同北平两团体商讨，黄杰同意救国会政治部派大批青年到该师作宣传工作。

这时王志军团由青石梁撤退，十二旅白团（团长牺牲）由十八盘撤退。战事移近长城，国民党嫡系军队参加战斗，炮火益趋激烈，伤员陆续到达。救护工作因运输工具不足发生困难，北平各界人民大批慰劳品送到前方也很迟滞。我于深夜由古北口返石匣，过南天门路上遇运送伤员卡车陷入冰辙中。口外炮声震耳，途中车马拥塞，寒风刺骨，车中伤员既冷且痛，呻叫不绝。当将车中伤员抬上我乘的中型卡车继续运送，我徒步返石匣，到办事处患重感冒，发高烧，于昏睡中被朱庆澜将军和救国会同志送到北平协和医院医治。病中得悉：蒋介石为了完成他“攘外必先安内”的对日不抵抗政策，不惜屈膝投降，卖国求存。保定之会晤后，迫使张学良下野。蒋介石就这样借着热河战事，结束了张学良统治华北的局面，然后派来了何应钦、黄郛签订塘沽协定卖国条款，抽回对外兵力到江西去对共产党进行第五次“围剿”。

注释：

①《辛亥以后十七年职官年表》记载：1916年免段芝贵将军，4月17日张作霖署将军，7月6日张作霖改任督军。

——编者注

日伪军侵热作战经过

富瑛善　刘　玢

一、日本陆军省调查组关于热河讨伐的报告①

讨伐前夕的反满军情况

汤玉麟正规军	2万
汤玉麟自卫军	1.2万
冯占海军	1.5万
邓文军	0.6万
李海青军	0.3万
刘震东军	0.2万 15.4万
冯庸军	0.3万
其他杂军	1.3万
孙殿英军	2万
沈克军	0.8万
张学良正规军(步兵5师、骑兵1旅)	3.3万

第一线抵抗阵地以开鲁、兴隆地区至朝阳一线为主，由义勇军负责；第二线是由赤峰经凌源至北章营子、干沟镇一线，这是主要的抵抗地区，配备主力；第三设于承德附近。

山海关方面，张学良的2.4万名正规军(3个步兵师、2个骑兵旅)部署在最前线；第二线滦河右岸地区部署杂军，即商震所率1.6万人和4万宋哲元军，计8万大军；第三线，即北平附近有张学

良的 2.5 万军队，还备有 20 余架飞机和 10 余门高射炮。

日满军的情况：

1. 从开始行动到占领赤峰、承德

关东军与满洲国军密切配合，从 2 月上旬开始着手各项准备，至 2 月下旬各方面均进入行动。

茂木部队于 23 日从通辽附近出发，24 日到达开鲁，驱逐李海青军。26 日傍晚，以部分兵力击退下洼附近的冯占海义勇军约 1 万人，并占领该地。

主力从兴隆地区继续西进，追击匪贼。3 月 2 日拂晓到达赤峰以东高地，击退占领该地之敌。上午 11 时，太阳旗已飘扬在赤峰上空。

坂本部队的大部兵力于 23 日主力从通辽出发，部分兵力从彰武出发，冒着暴风雪和零下 20 余度的严寒进行强行军。27 日其先头部队到达下洼，未事休息，驱逐数千敌军。2 日傍晚，其挺进部队进入赤峰。坂本部队之一部，即松田支队，于 23 日从朝阳寺出发，经朝阳，3 日占领建平，4 日同在黑水附近占领阵地的约两千兵匪展开激战，敌军向西方溃逃，5 日进入赤峰与主力汇合。

西部队之一部于 21 日先发制敌，占领北票，继而以 3 列纵队向义州县，锦州方面进发。途中，排除了在朝阳东南方高地设有阵地的张学良正规军的顽强抵抗，于 25 日进人朝阳。经过休整，于 3 月 1 日出发。其间，川原部队于 3 月 2 日占领凌源，3 日进入平泉。未经喘息，继续西进，4 日晨到达承德郊外。上午 10 时击溃承德东侧高地之敌，下午 2 时 50 分入城。在此之前向古北口方向败退的敌军，遭到我方空军的袭击，受到歼灭性的打击，向南方及西溃逃。

服部部队于 2 月 26 日从绥中开始行动，以二列纵队前进，因途中山岳重叠险峻，又有近月以来敌军修筑的阵地，战斗相当艰苦。最后突破沙帽山、白庙子的堡垒，继而夺取北章营子。其先遣部队即米山部队于 2 日中午到达凌源，继而南进，击溃石桥子之

敌，向冷口前进。鲇江部队在北章营子同主力分手，在该地以南喇嘛洞附近，同数倍于我，拥有优势的张学良正规军交战数日，借以掩护主力部队的行动。

满洲国军中，由张海鹏军率领的洮辽军子 2 月 25 日在开鲁升起满洲国旗，从 3 月 1 日开始继续行动，扫荡各地匪贼，9 日其司令部进入赤峰。

其他，李寿山军、程国瑞军、丁强军等也都追随皇军之后，一面扫匪一面前进。

2. 进至万里长城一线

由坂本部队组成的高田支队 4 日离开赤峰，途中击溃敌军，6 日占领围场，配合茂本部队扫荡附近一带匪贼。9 日在卡伦附近发生激战，孙殿英军遭到严重打击，向西方溃逃。

此外，残敌集中的乌丹城也于 9 日傍晚被我占领。

占领承德的川原部队的部分兵力，于 4 日傍晚进入滦平，从 7 日起，与川原部队主力共同进攻长山峪(在古北口东北约 7 里)附近的坚固的敌军阵地，经过激战，追击至长城线古北口，10 日下午 2 时 30 分占领该地，随后，又击退拥有优势的张学良军和中央军。12 日，古北口一带要地全部被我军占领。

服部部队于 9 日傍晚夺取了喜峰口。然而，这一地区敌军仍不断反攻。

在此之前，米山部队快速南进，驱逐石桥之敌，4 日已在长城冷口升起太阳旗。继而向长城董家口方面转进，10 日占领该地。

中村部队作为军的总预备队在奉天待命，2 月末转移至绥中附近，较一般部队稍晚，从绥中开始作战行动，以二列纵队向干沟镇前进，9 日攻陷该地。然后立即南下，猛攻长城的界　口，15 日将该地攻克。

关东军司令部以武藤大将为首的领导机关，于 3 日到达锦州，亲自指挥前线，鼓舞士气。后因我军已进至长城一线，作战即将告

一段落，于11日傍晚返回新京。

到16日为止，热河方面作战伤亡情况如下：

战死118名

负伤217名

合计389名

讨伐中反满军情况：

(1)热河省内

张学良的4个师正规军和汤玉麟军的2个师固守在从赤峰经凌源至干沟镇附近一带，素以热河省内的中坚阵地自诩。但鉴于第一线的义勇军李海青、冯占海、冯庸等已经溃败，深感震惊。曾在北方的孙殿英、石文华、高春军等基本在热河西部边境；凌源以南的军队已退往承德、冷口一带。汤玉麟见此情景，战意全无，弃承德望风而逃，不知去向。张学良、蒋介石等得知后不禁愕然，一时茫然不知所措。便将热河失守之责转嫁汤玉麟，下逮捕令，要处以极刑。

热河省内败军比比皆是，热河西部边境的丰宁附近有汤玉麟军，赤峰西北方地区冯占海、孙殿英败军集团，据说通过多伦从华北接受物资补给。由于积雪即将融化，同后方联系困难，今后的扫匪任务将十分艰巨。

(2)华北方面

张学良连续收到热河战败的消息，企图进行最后的努力，下令确保长城一线。但是，杂军为了保存自己，都不想做日满军的进攻目标。如宋哲元只以部分兵力应付，主力仍固守长城以南的玉田及三河一线。

山西军之一部与其说是抗日，莫如说是趁火打劫。他们从张家口进入古北口或接近热河西部边境的多伦一带，企图扩大地盘。

需要注意的是中央军正在向华北进发。已有两个师北上，其中一个师已用于古北口方面。蒋介石的目的，一是为了对华北诸军进行督战；同时，也是为了对付华北的各种动摇与混乱。

二. 富璇善补充交待材料

（1954 年 6 月）

1933 年 2 月到 3 月下旬伪满讨热作战的全期经过：

作战期间，1933 年 2 月中旬到 3 月下旬，在热河省内对汤玉麟军的作战。参加这个作战的部队：主力：张海鹏部第一支队、第二支队、第三支队、第四支队、索支队（也称暂编第三支队）、炮兵第一、二大队。这个计划（侵攻热河），是由伪满军政部高级顾问战犯佐佐木到一作的，有伪满军顾问日寇佐久间亮三参与及指导实施。2 月中旬，伪满讨热军到达开鲁以后，张海鹏及日寇佐久间亮三令我给第一支队长王永清下一个命令，令他协助日寇茂木骑兵团进攻林西，这个命令，由我交中校参谋宋道仓办的。及至日寇第八师团占领朝阳、建平，第六师团占领赤峰以后，伪满作战前敌司令部率各部队向赤峰推进。这个命令，也是由日寇顾问佐久间亮三把命令要旨交给我，由我交中校参谋宋道仓办的。当伪满讨热作战前敌总司令部到达赤峰以后，伪满讨热军第一支队同日寇茂木骑兵旅团，在汤部石旅（?）没有抵抗退出的情况下，占领了林西（以后第一支队受日寇佐久间亮三命令援助李守信进攻多伦）。于 3 月中旬，当日寇第八师团占领了平泉、承德向热河省西南部长城线上进展，第六师团及茂木骑兵旅团占领了宁城、围场，向南进展到热河省南境的时候，日寇金川耕作顾问，对我指给一个命令要旨——第二支队为先遣，急速进到承德，第三支队进驻隆化，第四支队进驻丰宁，索支队进驻滦平鞍匠屯。这个命令案是由我办的，以张海鹏和日寇佐久间亮三名义给各部队下达的。伪满讨热作战前敌总司令部及部队，于 3 月下旬大概到达指定位置（仅第四支队是后到达的）。又在伪满军讨热作战全期间，我派一名参谋，经常与顾问部联络，从而使日寇顾问熟知部队的状况，也给它们用兵上的便利。

三、刘玢等对佐佐木到一的检举书

（1954年4月17日）

关于佐佐木到一在热河地区的具体罪行：

1933年2月初，佐佐木到一命令编成讨热军，向热河进兵。计划是佐佐木作的。由伪顾问佐久间亮三带到锦州下达的。

1933年2月中旬，由张海鹏和佐久间亮三两个人的名义，命令骑兵第一支队长王永清协助日寇茂木骑兵旅团进攻林西。

同年3月上旬，张海鹏和佐久间亮三命令各部向赤峰推进，接管日寇第六师团占领的地域，并担任当地的警备。

同年3月中旬，张海鹏的佐久间亮三命令第二队进驻承德，第三支队进驻隆化，第四支队进驻丰宁，索景清支队向滦平县西方鞍匠屯推进。

同年5月下旬，佐久间亮三命令日寇武田中尉指导第一支队协助李守信攻多伦，同时又命令伪顾问生田吉五郎指导第二支队侵犯沽源。

关于讨热军的组成如下：

讨热作战总司令张景惠

最高顾问多田骏（少将）、高级顾问佐佐木到一

讨热作战前敌总司令张海鹏参谋长李盛唐

军事顾问：佐久间亮三（少将）、金川耕作（大尉）、北部邦雄（大尉）、生田吉五郎（大尉）。下有6个支队（支队下属3个团）、两个炮兵大队和1个骑兵独立团，是一支庞大兵力向热河进攻。占领热河之后，又策谋以伪第五军管区司令官邢士廉、参谋长卢静远、支队长滕井重郎（靖安军司令）、顾问皆藤喜代志（中佐）、伪第五教导队长朱家训、军事教官相马中佐、教导步兵第五团长姜学博、军事教官德江少佐、教导骑兵第五团长富璇善、军事教官平川森中尉、靖

安步兵第一团长山崎积组成热河支队，协助日军进犯察哈尔省与华北、晋北地区，并进行了积极行动。

侵占热河的后果：

在军事压力方面：讨热的伪军协助日寇第六和第八师团实行武力进攻，帮助日寇警备占领的地域和镇压人民。

在政治上：对人民施行有毒素的宣传；建立伪政权——伪热河警备司令和伪热河省公署。张海鹏任伪警备司令兼省长，使热河成为伪满的领土。

在经济上：成立伪满经济行政机构，对热河全省人民进行榨取和掠夺，为日寇侵略服务。

（本文摘自中央档案馆等编《九·一八事变》，中华书局、1988年8月版。）①该报告材料摘自敌伪《热河讨伐经过概要》一文。

热河沦陷与川岛芳子的安国军

(日)楳本舍三

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判决中,关东军热河战役有如下一段叙述:"……由于日方在日内瓦已有所保留,因此,仅需寻找某种借口,即可实现将热河并入满洲国的计划。起初是演了这样一出戏,以关东军石本军属于1932年7月17日,在北票、锦州旅途中'失踪'为由,立即认定是被中国义勇军绑架,乃由关东军派兵前往热河搭救。进入热河省的该军部队带有火炮,虽曾占领境内一村庄,但被击退未能完成任务。在此次战役中,日军飞机曾向朝阳市区投掷炸弹。另外,日军飞机于1932年8月中,曾于热河省上空持续进行示威飞行。1932年8月19日,又以交涉释放石本事为由,派一参谋前往北票与热河省境之间的南岭村,并有步兵部队随同前往。当于归途中遭受射击时,则以自卫为名进行应战。犹如事先所策划,后援部队开到立即占据南岭。南岭战役后,不久,即发表了热河省乃满洲领土的声明……"

据日本战败后获悉,热河战役乃是由以和平主义贩子闻名的远藤三郎中将,当时是少佐作战主任一手策划发动的一次战役。

当时关东军的干部阵容是,司令官武藤信义大将,参谋长小矶国昭中将,副参谋长冈村宁次少将、第一(作战)课长斋藤弥平太大佐,作战主任远藤三郎少佐,航空主任冢田理喜智少佐,兵站主任中野良交少佐,第二(情报)课长喜多诚一大佐,第三(政务)课长原田熊吉中佐,第四(宣传)课长坂田义郎中佐。

战役进展情况是:1月2日,占领山海关;1月8日,张学良所部进入热河、山海关;1月20日,满洲国政府讨伐热河;2月23日,

日满军讨伐热河;3 月 4 日,占领承德;5 月 3 日,张海鹏上将任热河省警备司令。

当时的日军参谋总长闲院宫元帅,次长真崎甚三郎大将,仰承天皇陛下旨意,曾指令,一兵一卒亦不许跨越长城一步,但派出机关置中央方针于不顾,一意孤行,一时关东军成为内外谴责的中心,成为战争的罪魁祸首。

芳子属下的一般土匪,其中也可能包括张学良部的残兵败将,正为满洲建国、建军而疲于奔命。这支号称 5000 兵力的队伍,实际是芳子的亲兵,自封为安国军。据说是多田骏任命芳子为安国军司令的,实际上有些虚张声势。追随芳子左右的,仍然是堀田、岩野、大村等一伙人。芳子自称金壁辉。身着带有三颗金星肩章的军装,佩带一支手枪,跨下一匹战马,通常被人称为金司令,可谓英姿飒爽,不可一世的巾帼英雄。

正如她向堀田透露的那样,建军的目的在于培养干部,组织一支新军。她深知杂牌军招募几万人,也不过是白搭钱的乌合之众。插身热河局势的举动,也可能是受人启发,但作为一个年轻女性,不能不说她独具慧眼。

芳子在满洲被称为安国军上将金司令,在事变爆发的三四年中,反满抗日武装盘踞在热河、通化地区,多达 30 余万人。与此相对应,由日本人、中国人纠集起来的武装集团也蜂拥而起。其中闻名内外的如甘珠尔扎布的独立军,伊达顺之助、川岛芳子的热河民团安国军等,均属风靡一时,昙花一现的武装集团。据说建国初期,治安欠佳,几乎占人口的百分之一是土匪。为此遂有上述自发的“自卫团”、“军队”等非正规军的出现。日本的旧军人大尉、中尉或准尉之流,乘虚而人,自封为少将或大佐指挥此类土著武装,大有战国时代的群雄割据之势。

其中以靖安游击队的指挥官素质最佳,其后相继改编为靖安军、靖安步兵团,成为日后满洲国军的骨干。为培养军官而建立的

中央训练所，不久又改建成为军官学校。

在满洲事变前后，一批不满于日军现状的豪杰之士，或充当顾问背后操纵，或赤膊上阵，大打出手，纷纷投入中国旧军阀的怀抱。

金璧辉——川岛芳子，在日满两军进驻承德前夕，携带满洲国军政部最高顾问多田骏少将的安国军司令委任状，突然出现于朝阳。

芳子在会见驻朝阳领导宣抚工作的关东军参谋田中新一中佐、岩畔豪雄大尉时，提出资助安国军军费20万元的要求，其后又曾向古海忠之提出10万元的要求，由于此项巨额筹款相当于现在一二亿日元，非同小可，尽管有军政部顾问从中疏通，结果均未实现。当时作为总务厅主计课长的的古海忠之，担任热河作战办事处处长，在锦州设有本部，朝阳、承德、赤峰分设3个班。据了解，芳子的安国军作恶多端，欺压百姓，烧杀掠夺，民怨沸腾，不仅干扰关东军的军事行动，而且也给后方政治宣抚工作带来很多麻烦。

当古海返回新京，小矶参谋长接到报告后，立即亲赴朝阳，将川岛芳子逮捕送往奉天软禁起来。安国军被解散，以后甚至禁止她出入宫廷府。至此，芳子一心想将整个满洲土匪以及满洲国军都置于自己统辖之下的美梦，宣告彻底破产。

如果说，前此芳子是以复辟清朝作为其最高理想，并为其实现而英勇奋斗；那么从1933、1934年开始，芳子便逐渐丧失了作为清王室公主的品格与风度。这个利欲熏心的女人，日益堕落蜕变成为妖女、魔女了。当满洲国逐渐形成为一个近代国家成长起来时，芳子的梦也只能以梦告终而永远不能实现了。

1935年春，川岛芳子应爱国社岩田爱之助天行会头山秀三之邀，前往东京国技馆看大相扑。身穿浅粉色友禅和服，束着红地金银丝腰带，梳着文金高岛田式发髻，花枝招展，引人入目。芳子时年已30，看来还二十几岁的年纪。聚集在芳子周围的是一些右翼头目岩田爱之助、林逸郎、头山满之子右翼新秀头山秀三等人。

1937年春，芳子曾在东京住院治疗因落马摔伤的脊髓炎症。据长岛正三郎回忆，在下关迎接芳子下船，她身着白羊毛衫内衣，外穿茶色西装与茶色大衣，梳短分发，头戴黑贝雷帽，这种有如歌舞团的女扮男装演员，一派贵公子风度，令人为之愕然。不过，从这个身高不过五尺，小巧玲珑的女人身上，几乎完成察觉不出她是怎样成为胆大包天、出生入死、神出鬼没、变幻莫测的间谍分子的。

在满洲有关川岛芳子的传闻不胫而走，一时成为新闻人物，这使芳子高兴万分，似乎颇为满意。

1930年至1936年，日本国内形势也并不稳定。如1935年相泽中佐杀死永田军务局长事件，1936年，震撼日本的"二·二六事件"。芳子对此表示异常关心，不过，在满洲没有给她提供活动舞台，在日本更不可能获得这种机会。

1933年，芳子曾玩弄手腕，投奔堀内文次郎中将，立即获允借其宅邸一处，结果有30名壮汉住进寓所，然后又与堀内中将合影，使堀内成为其护符和靠山，此事曾遭到堀内中将长子睛文的反对。

总之，芳子曾以她非凡的公主风度，广为笼络日本各阶层人士，举凡政治家、军人、文化人、学者、浪人、商人、艺人等，均奉其为英雄，麇集周围，趋之若鹜。

（摘自赵连泰等译《东洋魔女川岛芳子》，吉林人民出版社，1986年2月版）

川岛芳子：原名金壁辉，清肃亲王善耆之女。自幼为日本浪人川岛浪所收养，后堕落成为罪恶昭彰的日本间谍。

——编者注

捉石本青史留名

——李海峰抗日事迹

王瑞林　刘树桐

李文玉，字海峰。1889年生于现在的北票市上园乡跑达沟屯一个中农家庭里。曾在长皋村任过巡官。"九一八"事变后，他爱国心切，破产举家抗日，浴血奋战在辽西、热东，战功卓著。虽然最终失败了，但他的铮铮骨气，抗日爱国之举，受到广大爱国志士的热烈赞誉。

兴义军抗日救国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不久，辽吉黑三省相继失守，日寇又对热河虎视眈眈。热河的军阀无视国家危亡，大肆搜刮民财，逼得百姓倾家荡产，陷于水深火热之中。1931年10月，李海峰毅然起兵，他联合刘龙台的马子丹组织起有30多人的民众队伍，宗旨是抗日救国，抗捐罢税。

李海峰和马子丹为壮大队伍，首先动员富户有枪出枪、有马出马、有粮出粮。同时也号召穷人们参加抗日队伍。月余之间，队伍就扩大到200多人。1931年11月间，东北军十九旅的一个营和一个机枪连约五六百人，在宋子泉营长率领下奉命向关内撤退。撤到刘龙台山双山口北河套安营。李海峰和马子丹带队围攻。各村联庄会员也到附近山头助威，向他们呼喊："中国大地不可丢，调转枪口打日寇！""不打日寇也可以，丢下武器放你们走！"营长宋子泉是位爱国军官，由于当时受军命的约束，不得不违心地率领队伍撤

退。但沿途又看到人民抗日队伍蜂拥而起，促使他又想留在东北抗日。当听到义勇军的喊话后，心情十分激动，所以他果断地向士兵们下达命令说："大敌当前中国人不能互相残杀，全部放下武器，就地待命！"就这样，双方一枪没放，东北军就地解散，其中一部分人参加了抗日队伍。李海峰和马子丹从这支队伍中得长短枪四五百支，轻机枪 12 挺，重机枪 8 挺，大炮 2 门，从而充实武器装备，整顿扩大了抗日队伍。马子丹任司令，郭子章、王占一、李海峰分别任一、二、三团团长。

1931 年 12 月 31 日，马子丹、李海峰率部配合毕占一部攻打朝阳，惩办贪官周铁铮。马、李部负责攻打北门。拂晓前发起攻击，经过 3 个小时的战斗，义军攻进朝阳。不久，汤玉麟从承德调来大批援军又夺回朝阳，义军撤退。马子丹和李海峰带队伍退到稍户营子。由于这些战斗损失较大，马子丹撤回到刘龙台，李海峰撤到三宝营子。从此，他们独树旗帜，重整抗日队伍。

1932 年 3 月，李海峰同朱霁青取得联系。朱派来 30 多人充实了李海峰队伍，并把李海峰的队伍改编为东北国民救国军第四军第一师，李海峰为师长。

后李海峰率部在朝阳寺、三宝营子、牤牛营子等大凌河畔地区袭击敌人，阻击日军西进热河。

捉石本威名远震

日本军国主义占领东三省后，关东军司令部立即决定"调头把圣战指向热河省"，并命令驻锦州第八师团要千方百计地抓紧"搜集各种资料"。因此，日军加紧活动。1932 年 1 月 7 日，嘉村旅团占领义县；3 月 21 日，日军第三装甲列车进犯到南岭；3 月 24 日，日军飞机侵入北票上空；4 月 5 日，日军由架设轻重武器的两列铁甲列车开路，强行将客车由锦州开往北票，并单方决定自此正常通

车，不久，日本关东军嘱托石本权四郎潜入北票进行策反活动，并在北票明目张胆地建立起“关东军司令部北票联络所”。石本任“联络所”的所长，悬挂日本国旗，气焰十分嚣张。日本关东军司令部曾吹嘘“石本权四郎是满洲事变前单身潜入热河，首先在热河的北票插上日本国旗，易于完成作战计划的魁首”。

石本权四郎到北票以后，一方面派遣许多密探潜入各地，搜集政治、经济、军事情报；另一方面频繁地接触以汤玉麟为首的大小热军头目，利用各种卑鄙手段进行策反活动。

日军对热河的野蛮侵略行径和石本权四郎的间谍活动，激起了李海峰极大的愤慨。李海峰说：“明其道不惜家产，正其主义不怕杀身，我要把‘天’捅个窟窿，摸摸日本关东军这个王牌！”决定设计捉拿石本权四郎。

1932 年 7 月 17 日，李海峰探明石本权四郎“携带某种特别重要任务”返回锦州的消息，立即做好战斗部署。他命令参谋傅兆田带 50 人埋伏在离南岭车站东 10 多里的破庙子附近，此处是铁路通过的夹槽沟，沟长坡陡，地势险要，便于动手。为使火车及时停车，傅等用榆木轱辘将铁轨撑开。同时，李海峰还命令连长杨录带领 12 人，腰掖短枪，身藏利刃，扮成农民模样，进入南岭车站，等候上车。

石本乘坐的列车从北票开出后，义勇军的侦察员也尾随上车。午后 1 点多钟，火车进南岭车站。救国军侦察员在车上向杨录发出暗号，杨录等 12 人立即登车，按事先计划，分工做好一切准备，有的坐在石本权四郎的对面。石本权四郎是个中等个头，方圆脸盘，高高的颧骨，托出两只圆溜溜的眼睛。他查觉情况有些异常，狡猾地带领警卫离开客车座席钻入车长室。然而，车长室内也有救国军的人在那里等候他们。当时气氛极为紧张。

火车行至破庙子，车头因脱轨而被迫急刹车。同时铁路两侧开始鸣枪，车上的杨录等人听到枪响立即动手。此时，石本权四郎见

势不妙，急忙潜入群众中企图逃走，并要掏枪还击，但还未等动手他就被杨录抓住。石本权四郎身边的两个护卫也被另外几位义勇军战士缴了械。旅客们面对这突如其来的行动惊慌失措，秩序顿时大乱。杨录等人高声大喊："旅客们：不要怕，我们是抓日本鬼子的，缴获敌人的枪支弹药，旅客们的钱财我们一点也不要！"旅客们的目光立刻投向石本权四郎身上，石本权四郎被救国军拖下车。下车时石本权四郎手抓车门，一位旅客手拿斧把砸他的手，他"噢"的一声撒开手，摔到车下。傅兆田和杨录等人将石本权四郎拖起，押着他奔上喇嘛洞山，暂押在喇嘛洞山庙里。在庙里义勇军扒掉石本权四郎的西服，令其穿上中国老百姓的服装，不久，绑上他双手转移到三宝营子监禁。

石本权四郎被李海峰捕获以后，驻锦州日军将这一情况紧急报告了日本关东军司令部。关东军又立即向日本国民广播石本权四郎被捕的消息。日本军国主义在对国内外宣传中，称李海峰逮捕石本权四郎为重大事件，即"朝阳寺事件"或"石本事件"。

日本军国主义为什么如此大造舆论呢？除日本军事进攻热河的需要外，还因为石本权四郎是军国主义的死硬分子。

石本权四郎，于1880年9月15日出生在日本东京一个官僚家庭里，1902年毕业于明治学院。石本权四郎从小就受到军国主义的法西斯教育，立志长大"不想留在猫额头大的日本这个岛国里做事，而是着眼于向宽广的海外扩展"。所以，他毕业后立即进入近卫师团当志愿兵，不久提拔为士官勤务。

1904年，日俄战争时、石本权四郎随军进攻俄国租界地旅顺。当时，俄国占领的旅顺东冠山炮垒是比较坚固的，用石本权四郎的话说："……说不清越过死亡线总攻击多少次，敌人（俄国人）死守炮垒不能轻易让给日本人……日本人进攻损伤是会相当大的"。因此，10月29日，在发起总攻击前夕，石本权四郎给其在日军主帅乃木身边服役的长兄石本贯太郎写了一封绝命书信。

信中云："我军终于决定明天进行总攻击，我的小队是突击东鸡冠山炮垒。我期望我定能第一个先登上去，决不辱没家名，请放心。我的行李中有各种物件，这些东西请兄用吧。""我的骨灰请用卷我肌身的日章旗包起来，送到东京，这是我临终的请求。"

这封信虽言语不多，但把自己在异国土地扩张的野心和武士道精神完全暴露了出来。10月30日零晨，总攻开始，石本权四郎疯狂地冲击，先后身中四弹，最后"从堑壕跌落到山峪，鲜血不断地流出，一声不响地瞑目了"。但是他没有死，他这种行径得到国内日本新闻界兴趣，有的采访报道，有的写诗颂扬，最后，他还到东京在御殿受到了常宫与周宫两殿下特赐"沐浴谒见"。两殿下当看到石本权四郎拿出战斗负伤穿过的血衣时被感动，甚至流出眼泪来。并依据战功叙勋他六等功五级，并赐予金鸡勋章。石本权四郎受宠若惊，在伤势痊愈后，再度侵入中国，编入第三军，在铁岭之西北边缘法库方面战斗。

1905年，石本权四郎在奉天参加了反对清帝退位，进行复辟活动的宗社党[①]，他参加宗社党。实际是为日本在中国寻找代理人进行间谍活动，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扶持清朝重立，以死来担当这个任务"，并"活跃第一线"。后因宗社党首领邵荣勋被刺杀而停止活动。

1931年"九一八"事变，在日本军国主义大肆向东三省进攻之际，石本权四郎认为"对天皇做贡献就在此时"，即刻赶到日军特务机关提供种种情报，并亲自率领参加宗社党以来15年间以个人身份苦心经营并亲手训练的部下600余人，夜袭新民城，成为日军进攻辽西的开端。

1932年4月15日，石本权四郎被关东军司令部招为嘱托，并依照日本侵略者计划，从锦州进入热河加紧活动。

石本权四郎不仅是个日本军国主义的死硬分子，也是日本军国主义长期潜伏在中国的"中国通"。因此，石本权四郎被李海峰逮

捕，对日本军国主义是个沉重打击。对此，汤玉麟和热军认为惹了大祸，便惊慌失措地令驻南岭两个连队追踪李海峰部队，为日本讨要石本权四郎。而在中国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广大爱国志士无不拍手称快。北平、上海、广州等各进步报刊上都陆续报导了这个大快人心的好消息。上海有的报纸还刊登了石本权四郎被捕后的狼狈不堪的照片。李海峰活捉石本的事迹震动了国内外。2个月时间，他领导的队伍也不断扩大，很快发展到1600多人。李海峰由于作战勇猛、指挥得力、战功卓著，被活动在吉林的东北义勇军总司令之一的王德林委任为东北义勇军西路总司令。1932年9月4日李海峰宣布就职，并发表了就职通电，“在王总司令领导之下，竭诚团结，继续抗日，以不屈不挠之志，努力奋斗，不达收得失地目的，暂不中止。”

斗敌顽大义凛然

石本权四郎被捕后，关东军司令部对李海峰使出各种诡计，施展各种压力，但他们绞尽脑汁都是枉费心机。

日本关东军依靠自己现代化装备对李海峰使用武力。在石本被俘当天，日军驻锦州第八师团就从锦州派出携有轻重武器的装甲列车，又从义州(县)派出中村少佐指挥的步兵第三十一联队，分别向热河省前沿阵地朝阳寺进攻。午后4时，装甲车开到朝阳寺隧道口，因铁路被义勇军事先破坏，日军装甲车脱轨。随之，义勇军从山上向日军进行了猛烈地射击，迫使日军装甲车退到义州。

7月18日凌晨，第八师团长西义中将又派高桥支队从锦州出发进攻朝阳寺，支援三十一联队中村少佐。同时，又令参谋吉岗带领一个小队乘装甲车到朝阳寺，并于19日邀见了北票参议邵子峰，向他递交了备忘录，给汤玉麟施加压力。此后，日军不断调动武力向义勇军进攻。10月7日，日军派出以早川大佐为首的步兵第

三十一联队从锦州出发，经义州、朝阳寺两个据点分三路向三宝营子“围剿”。一路经稍户营子，另一路经张宝吐，再一路由水泉、房申沟从正北和东西三面向三宝营子包抄。上有飞机狂轰滥炸，下有山炮、轻重机枪射击。凌晨4时，义勇军发现敌情，立即进行还击。由于敌我兵力相差悬殊，义勇军从西南方向突围。在突围中，石本权四郎也被押着转移。为防止泄密和日军的偷袭，监禁石本权四郎的地址不断变动。在这次日军袭击之前，义勇军把石本权四郎转移到离三宝营子10多里以外的房申沟南边仅3户人家的钱宝珠家。狡猾的石本权四郎听到飞机声和枪炮响，就嚎叫着赖在地上打滚。义勇军把他的耳朵用荤油灌住，堵上嘴，蒙上眼睛。当飞机低空掠过时，就将他藏在沟壑的灌木丛中。飞机过后，再把他搭在马背上驮着，跟随义勇军突出包围圈。附近村庄群众大部分跟随义勇军向外突围。没有来得及走脱的妇婴和老人被日军杀死15人，烧毁房屋129间，其它财产损失惨重，当局的调查报告中说：“当时炸伤炸毙居民男女百数上下，炸毁房屋百数多间，焚烧柴草粮食财物等项价格难数计，其三宝营子遭祸惨重。而四周距离村民悉已避不归……”。

李海峰指挥义勇军从三宝营子突围后进入巴图营子，宿营于牤牛营子。日军进攻一无所获，以失败告吹。为防止义勇军的袭击，立即将部队撤回朝阳寺。为打击日寇的嚣张气焰，李海峰于10月19日，集中全部兵力参加由朱霁青指挥的攻打义州(县)的战斗。

日军在用武力野蛮“围剿”的同时，还不放过对李海峰诱降。7月22日，石本权四郎的长兄石本贯太郎在关东军司令部的授意下，从锦州急忙赶到朝阳寺，住在朝阳寺喇嘛庙内。他利用各种手段收买汉奸探寻石本权四郎被监禁的地点，并利用朝阳寺当家喇嘛马洪志通过小三宝营子亲友白老四向李海峰说情，表示“愿出重金赎回石本权四郎”。后来日本翻译荆子勋被派来到李海峰处谈判。荆劝李海峰说，投靠日本皇军，以后可以封官晋爵。李海峰听

后勃然大怒，拍案站起，严厉地说："你们把我李海峰看成什么样的人，我不要钱，也不要枪炮，更不要官，只要日本归还我国土，否则别想叫石本权四郎活着回去！"

石本贯太郎与荆子勋同李海峰谈判几次，阴谋都未得逞，最后，石本贯太郎从朝阳寺临走时颓丧地说："与匪贼们强硬地联络交涉，可是交涉又成了空。"

驻锦州日军第八师团西义中将又利用已投敌的毕占一到三宝营子找李海峰，劝李释放石本。毕占一见李海峰一身正气，就将话题转入陈述"驱汤灭周"旧情上来，但最后还是露出本意，装作像久别重逢的老朋友那样挚诚，直言不讳地向李海峰劝说："日本人要石本，肯向你出钱，你就应该放他，看咱们这几杆枪能抵得住日本人吗？鄙人之见，以后成其大事，莫不如早日投降日本。"李海峰听他讲完一段诱降的话后，就用古往今来的英雄史实申明中国人应该有自己民族气节。当日深夜，李海峰急速派人送信给热军，驻朝阳热军派一连兵带一辆大车迅速来到三宝营子。清晨，毕占一又会李海峰，见李海峰还是不肯答应放石本。他怒气冲冲地说："文玉，如果放出石本，我们永远是好朋友。否则，我消灭你也是容易的！"李海峰哈哈大笑说："国有国耻，人有人格，你已经投降了日本，当了可耻的汉奸走狗，谁还和你是朋友！"并下令下了毕占一和随从的枪，将毕占一逮捕交给热军。热军将毕占一捆在车上，带回朝阳。

日军为威胁李海峰交出石本权四郎，每天从锦州出动几架飞机盘旋于朝阳寺、三宝营子、牤牛营子上空，投放大量红绿传单，并将每张传单叠成三角形，在三角内放一块硬币，诱骗群众拣传单造舆论。传单中威胁说："李海峰不同日本亲善，逮捕石本权四郎，如再一意孤行，铧子山以南 50 里顿成焦土，鸡犬不留……"李海峰对日寇每天的威胁极为蔑视。同时，为防止不测，加强了对石本权四郎的看管。李海峰责令儿子李才、李铎、李和及侄子李荣直接负责

监押石本。

石本权四郎虽然被严加看管，但他仍不老实，曾多次对李海峰进行策反活动，说："只要你答应放我，我可以给你金条，给你日币，要多少都可以！"李海峰见之只是轻蔑地一笑。回答说："中国人视黄金如粪土，需要你们给的是，还我东北三省！"石本权四郎诱骗李海峰不成，又在看守人员身上下功夫，非要同他们磕头结成生死兄弟。他还许愿说，只要放出他逃走，以后保证给他们讨上漂亮的日本姑娘。但同样遭到看守人员的痛斥。

1932年12月3日，日寇驻义州宪兵队长矢家部宗太郎妄想通过信函哀求，要回石本权四郎。

并派王洪宾持信前去与李海峰谈判说："如放出石本权四郎许以赎价日币57万元。"被李海峰严辞拒绝。李海峰凛于民族大义，气节不移，斗志不衰，继续同日军作战，进行着宁死不屈的斗争。

凭倭酋慰英灵

日军进攻热河是蓄谋已久的事，自占领锦州以后，经过一年的策划，日军已做了充分的军事准备。而军阀汤玉麟口喊"誓与国土共存亡"，实则在承德已准备逃走。热军董福亭旅驻守朝阳，同日军对峙南岭，但团长邵本良叛变投敌，整个战局岌岌可危。李海峰在11月末从牤牛营子转战到朝阳，他对无家可归的义勇军战士不时地发出忧伤的感叹。他愤愤地说："日寇侵略热河省，又不知有多少无辜百姓将惨死在这群野兽们的屠刀下，我李某何不先处决侵热魁首石本权四郎，以上告苍天，下慰九泉英灵！"

1932年12月15日，朝阳上空乌云密布，北风怒号，沙石飞扬。李海峰在日军侵略情报告急情况下，骑马赶到十家子河套，命令义勇军战士戒严由朝阳通往北票的大路，并通知附近十家子禁止村民游动。9点钟，石本权四郎被6名义勇军战士押送到河套的

沙滩上。这个以侵略中国为己任、终身从事间谍活动的家伙，仰起头，像饿狼一样发出一阵嚎叫。李海峰让朝阳华林照相馆技师给嗜恶成性的石本权四郎照相后，下令处决了石本。

日军占领了朝阳后，1933 年 2 月 25 日，石本权四郎的胞兄石本贯太郎火速来到朝阳，立即和几个军曹坐着汽车到处寻找石本权四郎的尸体。附近村庄老百姓都知道石本权四郎被处死掩埋尸体的地址，但是，从大人到小孩谁也不肯告诉敌人。石本贯太郎和几个日军无可奈何，跑到附近庵堂中抓来一位老尼姑，又到十家子抓来一位村长，分别对他们拷问。石本贯太郎穷凶极恶地举起皮带对准老尼姑脸猛抽，尼姑瘦骨嶙峋的身子紧缩，承受着彻骨痛疼的毒打，几次被打倒，又趔趔趄趄地爬起来，但始终没有告诉给日本鬼子。村长也是不讲，石本贯太郎被气得七窍生烟，"咔喳"一声抽出战刀，摁在村长脖子上，刀刃划破肌肉，鲜血直流，但他得到的回答仍是"不知道"。

3 月 14 日，日军通过华林照相馆在十家子河套找到掩埋石本权四郎尸体的地址，吉冈向关东军司令部发出找到石本权四郎的电报，并逮捕原义勇军战士韩文和，将韩文和拉到埋石本权四郎的地方。在挖掘尸体之前，石本贯太郎嚎叫着用双手举起战刀向韩文和头部劈去……。日军陆军医院的院长金久保冬雄对石本权四郎尸体进行了检验，写了"死尸鉴定书"。

注释：

①《辞海》(1989 年版)宗社党条记载：宗社党，1912 年 1 月由良弼等组成，反对清帝退位。

——编者注

“中国地”与“王老凿”

秦奎一　董济民

仅住着100多户农家的热河省朝阳县石明信沟，在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史中却留下了光照史册的灿烂一页。

一

石明信沟位于今朝阳市南90华里，柏山中段，属于常在营子乡管辖。沟长十几华里，沿沟分布着韩杖子、孟杖子、二道沟、西南沟等几个自然村落。伪满时期，沟内住着100多户人家，仅几百口人。这么个普通的山沟，在辽、吉、黑、热东北四省的辽阔疆域中，是一块名符其实的弹丸之地。但石明信沟人民在日军侵华的期间，坚决不接受日伪的反动统治，他们凭借山高沟险，林密石多的地理优势，与日伪当局浴血苦战了13年之久，直到1945年“八·一五”祖国光复。领导这一抗日斗争的人，就是在辽西和热东地区颇有名气的“王老凿”——王文福。

王文福一家，世代居住在韩杖子村，历代务农。伪满时期，王家已形成10股20多户，全家族共有150多口人，在沟内人口居首，其他外姓人，也大都与王家连亲。王文福是一个目不识丁的农民，他是长门长子。由于他性情暴烈，办事死“凿”，因此，在青年时期，人们便送绰号叫他“王老凿”。他们亲兄弟4人，人们也就习惯地称呼他们为“二老凿”、“三老凿”、“四老凿”。

在20年代，王文福就当上了当地组织的联庄会会首。他三弟王文祥，原在黑龙江闯绿林，“九·一八”后，在当地参加了民众抗

日武装,受挫后回到家乡。他把自己所见所闻的日寇倒行逆施的情况讲给家人听,这对推动王文福积级参加抗日活动起了很大作用。王文祥又在家乡参加了民众抗日武装。1932 年 6 月,一股日军侵入朝阳县南部,遭到了王震、赵清泉等领导的民众抗日武装的袭击,被击毙 23 人,剩下的 8 名日寇在向锦西溃逃途中,又遭王文祥率领的民众抗日武装的袭击,日军被击毙 2 人。

1933 年 3 月,日军侵占了热河省以后,原在朝阳地区内活动的各路抗日义勇军队伍、民众抗日武装,有的随东北军撤退,有的就地解散了,也有一部分武装留在原地坚持敌后斗争,以游击形式打击日本侵略者。这时,王文福的武装退守石明信沟内,闭山自守,采取了一种特殊形式的反满抗日斗争。其特点是:从不主动出击日伪军警,但坚决拒绝日伪的反动统治,日伪当局的一切政治、法律在石明信沟一律无效。日伪军警来讨伐,来的少便兵戎相见;来的多,便退却山林,以避敌锋,敌退我回。就这样,王文福领导石明信沟民众与日伪统治者顽强地斗争了 13 年之久。

二

13 年间,日伪军警曾多次对石明信沟进行血腥的讨伐和“围剿”,其中较大规模的就有 5 次。

1934 年 6 月 1 日(农历四月二十日),刚刚站稳脚跟的日本侵略者便对石明信沟民众大兴问罪之师。这天拂晓,300 多名日伪军闯进了石明信沟。天刚亮,人们发现日伪军进了沟,纷纷向沟里逃去。由于沟深林密,多数人逃出了虎口,但也有些人被日伪军杀害。王文福的三弟王文祥就是在这次日军“围剿”中被杀害的。他的堂弟王文儒来不及逃走,藏在秫秸垛内,也被日军搜出后枪杀了。

同年 12 月 17 日,日伪军又一次出动重兵,对石明信沟进行更大规模的烧杀和抢掠。

这天早晨,日军骑兵突然闯进石明信沟,将居住在沟门的王景

山、温志祥第21人抓走。沟里群众闻讯立即转移。第二天，千余名日伪军警进入沟内扫荡，并把头天抓去的等21人带回，企图引出“王老凿”。敌人进到孟杖子屯时，把在山上的宋石头开枪打死。日军看“王老凿”不出来，气急败坏，把抓到的21人蒙上眼睛，堵住嘴，推到河套当中，全部用刺刀挑死。日军在沟内又反复搜剿抢掠了6天，抓住了十几名群众。有的人在押解途中逃出了虎口，未跑了的全部惨遭杀害，后被放火焚尸。日伪军这次“进剿”，共在沟内烧杀抢掠了7天，沟内群众共34人遭杀害。同时，日寇还把韩杖子、孟杖子、西南沟3个自然村的200多间房子也全部烧光，并抢走了所有财物。

日伪军警撤走后，王文福立即带领家族及沟内其他群众回到沟里，重整旗鼓，重建家园，仍是拒不降敌，坚持我行我素。

从此，日伪当局对石明信沟更加视为眼中钉，在年年都派兵“进剿”石明信沟的同时，也间或施展“招安”手段，多次派人对“王老凿”劝降，并封官许愿。“王老凿”皆不为之所动。

1935年冬，日伪军200多名骑兵又一次“进剿”石明信沟，把群众预备过春节的物资和食品一掠而光，抓不到人就放火烧了群众搭的简易住房。

每次日军进剿石明信沟时，都有汉奸分子勾引或带路，但沟外的有些群众佩服王文福的骨气，事先从沟外给他送信。

在石明信沟第一次被“围剿”后，王文福曾联合另一支由李树珍领导的反满抗日武装，攻打了与日寇相勾结的山嘴子东沟大地主张文广的张家大院，以示警告。

1938年11月26日，30多名日军分乘2辆汽车突然闯进石明信沟，这时，沟里群众正在秋收。王文福闻讯后，跑到山头上一看鬼子来人不多，便开枪打死了2名日军。双方激战到下午，日本兵怕天黑后人少吃亏，傍晚时乘汽车撤退了。在这次战斗中，王文福的三儿子王俊峰不幸身亡。

1939 年 7 月 19 日，日本军官鸠枝率领 100 多名伪军和警察，对石明信沟又一次进行“围剿”，王文福率领沟内民众武装顽强抵抗，打退了敌人的进攻。

日伪军的连年讨伐和“围剿”并未达到消灭“王老凿”和压服石明信沟人民的目的。他们从 1940 年开始，便对石明信沟施展了更加毒辣的阴谋。以“集家并村”为名，把该沟划为“无人区”，以武力强迫一些群众搬出沟外。对那些无法赶走的人，敌人就在沟周围设警察分驻所，以图用封锁围困的办法，使“王老凿”就范。可是敌人的这一招又失败了。

那些设在石明信沟的伪警察分驻所，久而久之都成了“两面”警察所。有些伪警察看到了王文福和石明信沟人民坚持反满抗日的义举，唤发了他们的民族良心，从心里同情石明信沟民众；也有的警察预感敌伪政权的不稳固性，为了给自己留条后路，不愿死心为日本侵略者卖命；还有一些伪警察受了王文福的小恩小惠，有的警察分驻所长竟认王文福为干爹。因此，这些担负围困任务的警察，却成了王文福的耳目。沟外一有风吹草动，王文福便了如指掌了。

王文福为了在经济上打破日军的封锁，在此期间，先后在沟内装起 14 架轧棉花车子，进行自种、自纺、自织。又开设了 3 处油坊，还有鞋铺、帽铺等作坊。这条沟便形成了一种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

这些事都是违犯日伪经济法令的。沟外在日伪统治下的群众，正愁着有棉花无处轧，有豆无处榨。“王老凿”开了轧花厂和油坊后，沟外群众纷纷翻山越岭进沟轧花和榨油。那些被强迫迁出沟外的群众，又悄悄搬回沟内居住。由于大部分伪警察都与王文福有联系，因而，那些到石明信沟轧花和榨油的人畜车辆，常常在警察眼皮底下通过，略施小贿即可，只瞒过日本人的耳目而已。这不仅加强了沟外群众和石明信沟民众的联系，也增强了沟外群众对“王老

凿"的信任。沟外许多群众赞誉石明信沟为真正的"中国地"。

石明信沟民众的反满抗日斗争,被日伪当局视如眼中钉、肉中刺。他们绞尽脑汁,从1944年开始对石明信沟民众又一次施展了阴险毒辣的两手。

1944年下半年,由日本军官亲自出面,由伪吐默特右旗旗公署总务科长何石葛都仍(蒙古族)引路,进石明信沟对王文福劝降。王家对来人以礼相待,给茶喝,给饭吃,但表示不能投降。吃饭时,王家人不陪客,由王文福的儿孙佩戴武装送饭送菜。日本人一再表示友好,拿出带来的布匹和衣物要送给王文福,王家拒收,弄得日本人很尬尴。"王老凿"对日本人表示:你们来做客,当客人接待;你们要打,我们就打。气得日本人灰溜溜地回到了朝阳城。日伪当局招降不成,更加羞恼。从1945年开始,对石明信沟进行了更大规模的讨伐。

1945年7月5日,由伪吐默特旗公署警务科长日本人大道义行率领800多名日伪军警对石明信沟进行讨伐。由于早有人给王文福送了信,沟内群众都早已撤退了。日伪军警进沟后抓不到人,便见物就抢,见房就毁。敌人搜出4名70多岁的老人,其中年已76岁的韩守昆老人,被活活用战刀砍死,并放火焚了尸。还驱赶大量沟外居民进沟砍柴伐树。把王家的棉花车子全部砸碎、烧光。将所存棉花全部拉走,还放火烧了所有的住房,并把残墙断壁推倒,挖出地基,又把沟内的所有石碾石磨全部砸碎,把水井填死。一直烧杀抢掠了8天,直到片瓦无存,遍地废墟,日寇认为沟内已再不具备人的生存条件时,才带着几名被抓群众,于7月22日撤走了。

敌人走后,"王老凿"带人又回到沟里,又一次开始在废墟上重建家园。石明信沟人民就这样在浴血苦战中度过了13个春秋。

三

王文福领导石明信沟人民的反满抗日斗争事迹,不仅传遍了

辽西和热东地区，甚至远传到了冀东抗日根据地。因此，冀东党组织派到热河敌后开辟工作的几支武装工作队，都承担有与"王老凿"联系、联合反满抗日的任务。

1944 年 3 月，活动在热东地区建平县北部的"锦热边远征工作队"，由队长周治国（当时还兼任承平宁联合县办事处主任）、指导员周哲民率一支小分队（共 8 人），曾克服重重困难专程拜见了"王老凿"。

先由王文福的四弟王文玉出面会见，随后王文福也和周治国、周哲民同志见了面。周治国向王文福出示了证件、公开了身份。双方开诚布公地交换了意见。周治国、周哲民同志向王文福宣传了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讲解了国内外形势，肯定了他们反满抗日的功绩，也鼓励王文福要坚持抗日到底。这使闭锁深山的王文福深受教育。王文福也向小分队同志谈了他这 10 多年的遭遇和今后的想法。双方约定在今后的抗日斗争中，相互支持。

小分队在石明信沟住了几天后，由于走露了消息，便决定立即返回建平。分手时，王文福要给小分队经济资助，被周治国同志婉言谢绝了。王派人从山路把小分队送出了石明信沟。

1945 年，冀东区党委第十六地分委根据区党委的指示，组织了 4 个武装工作队挺进敌后开辟热辽地区。其中由周鸣岐领导的朝（阳）建（平）新（惠）武工队和由华裕民领导的朝（阳）锦（西）义（县）武工队，都曾与王文福主动取得过联系。

周鸣岐领导的朝建新武工队于 1945 年到建昌县东部时，派韩德发等二同志到石明信沟找"王老凿"，共商抗日大计。王文福表示欢迎武工队进驻石明信沟共同抗日。周鸣岐带队伍向石明信沟进发时，由于受日伪军重兵"追剿"，未能如愿。

在周治国、周哲民、周鸣岐、田丰同志回忆录中，都记述了他们与"王老凿"联系共同抗日的情况，并对王文福的抗日义举也都做了恰当的评价。

四

“八·一五”祖国光复后，王文福又率领群众抄了朝阳县南部一些铁杆汉奸的家，深得群众拥护。

1945 年 9、10 月间，我军进驻了辽西和热河地区，相继建立了中共朝阳地区工委和朝阳县党政机关。随后，对“王老凿”的队伍进行了改编。把他的武装改编为朝阳县公安大队，任命他的大儿子王俊山为公安队队长。王文福也被任命为朝阳县政府联络科科长。对他能坚持反满抗日 13 年的义举，给予了高度肯定。

后来，王文福这支队伍派驻在朝阳县木头城子区期间，因屡次违犯纪律，还不接受区委、区政府领导的劝告，于 11 月末被我主力部队缴械。1946 年初，我军进行战略撤退后，王文福又回石明信沟拉起了队伍。而后，几经周折，由于多方面因素，王文福率领队伍于 1946 年夏季，完全投靠了国民党。从此，走上了反革命道路。

1948 年辽沈战役结束后，我军在锦州城内把“王老凿”和他的大儿子王俊山抓获，投入了朝阳监狱。1949 年秋，王文福父子均病死于朝阳狱中。

王文福虽然最后走了反革命道路，成了国民党的殉葬品，下场是可悲的，但他那坚持反满抗日苦战 13 年的民族气节和顽强的斗争精神是应该肯定的。他的抗日业绩，至今仍在热辽地区广大民众中传诵，是永远不会泯灭的。

汤玉麟率部参加抗日同盟军经过

周觉民

1933年7月，我在抗日同盟军三十五军任副军长。当时，我们军部驻在热河省丰宁大阁镇（现属河北省）的新营子。日本委派的东亚同盟军总司令部，则驻在大阁镇内。两军阵地仅一水之隔。抗日同盟军与东亚同盟军本大相径庭，为什么能近在咫尺而相安无事呢？原因是东亚同盟军总司令汤玉麟原是抗日同盟军三十五军军长耿继周的老上级，并且汤、耿两部的官佐大都是东北军的老人，所以两军相处并无敌对的迹象。但在这年6月，汤玉麟部先有石文化、刘玉才两个旅全部官兵被孙殿英收买过去；后又发生汤部独立团团长徐立志率全团弃暗投明了抗日同盟军，为吉鸿昌部所收编，因而引起承德日军头子们的注意，认为汤部不可靠，遂于同年7月下旬令汤玉麟移防承德。与此同时，北平军分会何应钦亦派代表涂司中前来大阁镇，诱汤投何，移防延庆，进击抗日同盟军。汤如应允，即委汤为军长，并立拨40万元开拔费。汤犹豫不定，感到左右为难。

面对这一情况，汤遂与耿继周密商，拟率所部向抗日同盟军投诚。当时，他们二人秘密拟定了一个计划草案，由耿派我部副官主任马毓秀携带来张家口交我转呈冯玉祥。

马到张后，我即将此事告知佟麟阁和吉鸿昌。我们3人于7月17日一同前往抗日同盟军总部面晤冯玉祥总司令。冯看完这个计划草案后，对我们说："汤阁丞（汤的号）本是我几十年的老友，虽然直奉战争时，我们曾打过几次仗。今天他能考虑弃暗投明，同我们一道合作，不把大部精良武器和率领下的4万东北健儿交给日本

人或蒋介石，为他们所利用和驱使。看来，汤阁丞还是一个有良心的人，将来他如同我们团结一起，将大大加强抗日的力量。至于他提出需要解决的防地、军粮问题等等，这是必须解决的问题，一俟时机成熟，自当替他办好。”

过了两天，抗日同盟军总部副官处王作舟给我来电话说，冯先生叫你立即到总部有事商谈。我到后，冯玉祥同我说：“现委汤玉麟为抗日同盟军十二路总指挥，另外的问题于复信中说明。你现在回去准备一下，明天我派人同你带几件东西到大阁镇去，面交汤玉麟和耿继周。”

第二天早晨，冯玉祥派参赞葛云龙，率领校级官佐10人，并开来2部卡车，里面装着万余双袜子、1万元法币、10余袋面粉等，我们遂一同前往大阁镇，当晚到达新营子我们军部，便与汤玉麟和耿继周晤面。我们说明情况后，汤玉麟说：“多谢你们远道而来，蒙冯玉祥厚意赐我这些宝贵物品，实在感激不尽。我本是一介武夫，早年与张作霖、吴俊升们搞了几十年，如今独我落到这种地步，为全国人民所不齿。谁知我在沈阳有价值700余万元的私产被日本人没收，总想委曲求全将这些财产收回一部分，但是日本人条件太苛，使我难以接受。另外蒋介石经常派人向我利诱，被我多次拒绝，没上他们的圈套。今后，在冯先生的领导下，愿和诸位携起手来，站在抗日立场，替中国人做点好事。”接着耿继周发言后，随即散去。当晚，耿继周又对我说：“目前日本人催促汤移防甚急，因为老汤拿不定主意，前几天我叫他派旅长董福亭去承德，暂时同日本人敷衍一下。我明后天和你们一同去张家口，当面和冯玉祥商谈如何解决这些问题，最好是移防察省。不然，早晚之间我们即会遭到日本人和蒋介石的暗算。”

我们在大阁镇住了两天，耿继周和我于7月20日同去张家口。当晚，冯玉祥即接见我们。见面后，冯对我们说：“这次你等煞费苦心，将汤玉麟邀来同我们合作，这是一件重要的事。否则，汤部

孤立热河，前途很是危险。汤玉麟写给我们的信中，谈到张家口粮少人多不是久居之地，目前察省周围又被蒋军包围，最好在西北另谋出路，挑选一部分队伍到那里去，他日有机会即可东渡黄河，南下武汉，抗日反蒋，实与我军有利。这些想法，都是汤玉麟深谋远虑，也可以说汤玉麟真是我的良友。怎奈阎锡山早已派李服膺率军沿途阻挡我们西行的去路，且孙殿英现驻大同，态度不明，我若对阎锡山诉诸武力，引起内战，既影响我们抗日同盟军的声誉，也会受到全国广大群众的责难，这是我们必须认真考虑的，好在汤玉麟不久即可来张，再与他从长计议好了。”冯说完后，耿继周进一步说明汤玉麟目前的困难处境和有关防地之事，冯听后说：“汤玉麟需要万全县做他炮团和指挥部的驻地，俟我与方振武等商量后再定。这几天，蒋介石的军队源源开来察省，刘桂堂披着我们抗日同盟军的外衣，其实充当了蒋的内应。我急盼我们热河大军提早开来防区，以备万一。”

7 月 29 日，耿继周即离张返回大阁镇。临行时曾对我说：“汤部准备于半月前后开入指定防区，请你与抗日同盟军总部随时取得联系。”岂知过了几天，张家口东站忽然由北平开来一列铁甲车，传说宋哲元已来张垣。我因不明真相，即前往晤察省主席佟麟阁和抗日同盟军总参谋长邱山宁。始悉宋哲元此次来张，是为了请冯先生赴泰山休息。因事关机密，不便再往下问。当时我的思想就紧张起来，推想冯公出走，我们大军一来将如何安排？等到 8 月 6 日夜里，冯玉祥派副官处王作舟找我到抗日同盟军总部谈话。见面后，冯玉祥即问：“你们前方部队出发没有？”我说：“上次耿继周回大阁镇临行时对我说，汤、耿两军准于半月前后开到目的地，大约还有几天时间，即可进入察境。”冯听后叹了口气，并说：“本来张家口是个小地方，自从我们抗日同盟军在此成立以来，不到半年时间，一切吃穿都是我国海外侨胞和国内一些社会名流、爱国志士捐助而来。如今蒋介石反对我们抗日，并派来大军把张家口四面包围，截

断我们的经济和粮食来源。因此宋哲元特来劝我下野休养。我若不走，在我领导下的10万大军何以善其后？不得已只好暂住泰山休养一个时期。至于汤玉麟和他的军队驻防等问题，已向宋哲元详为介绍，将来可由宋哲元妥为安置。你们个人的位置，也一定会有很好的安排。来日方长，将来我们大家还得携起手来，重新在抗日的旗帜下团结起来，等汤玉麟来到此间，可以代为致意。"到了8月14日，冯玉祥即乘车离开张家口往泰山而去。

冯玉祥离张家口不久，汤玉麟所部即源源开到沽源、张北、万全各地，我三十五军则集中于龙关、赤城、云州独石口一带，与汤军联防。过了几天，二十九军赵登禹师亦开来张家口，汤玉麟和耿继周亦来到此地。一天中午，汤玉麟难过地对我们说："我一不去承德投日，二不接受何应钦的收买，完全是想借以洗清自己汉奸的罪名。"

长城抗战前热河形势一瞥

赵 毅

汤玉麟对抗日的态度

1932 年夏，日本帝国主义者为巩固其在满洲的伪政权，更进一步地向华北扩张，主要矛头指向热河。

热河省主席汤玉麟（外号汤大虎）是张作霖的老伙伴，在东北军中，素以骄横跋扈著称。1926 年郭松龄反奉后，汤由辽宁省东边镇守使升任本职，带步兵一旅到热河。到任未久，就大肆扩编队伍，并任命其二儿子汤佐辅为财政厅长，大儿子汤佐荣为禁烟局长，横征暴敛，大开烟禁，以充军饷为名，借饱私囊。“九·一八”事变后，汤家父子（号称汤家老少三虎）已知其统治热河的寿命不会太长，更变本加厉地对地方搜刮，将热河造成了人间地狱。这时，张学良鉴于热河关系重要，有了撤换汤的动机。而南京政府正欲趁火打劫，派人去热。前任黑龙江省边防副司令万福麟也蓄谋得此地盘。张学良犹疑未决，征求吉林省边防副司令兼吉林主席张作相的意见。张作相与汤玉麟有悠久历史关系，深知汤为人蛮横，绝难接受命令，请张学良加以考虑，以致张学良未能斩钉截铁地作出决定。事为汤玉麟所悉，大为愤懑，表示坚决反对，阴谋与伪满勾结（实际早已有所联系）。张作相得到消息，深恐因此造成东北团体的分裂，乃于 1932 年 9 月初密派我代表他，到承德而向汤婉陈利害，进行劝解。张作相嘱咐我说：“汤六爷（指汤玉麟）脾气很坏，你可代表我劝劝他，并告诉他三点：第一、大元帅（张作霖）领导我们几个人创立了东北家业，现在我们服从副司令（指张学良）就是服从先大元

帅，也才算对得起死者；第二、叙帅（指张景惠）已上了贼船，千万不可再跟他走；第三、关于中日问题，要静观时局的演变，听候中央政府交涉。”当我向汤玉麟转达这些话后，汤接受了张作相的意见，才使这一情况得到缓和。汤曾表示：他是国家疆吏，守土有责，誓死抗战，决不丧失国家寸地。并说，张学良不配撤他，尤其是对万福麟切齿痛恨。他当时的思想情况还是心怀携贰，摇摆不定，对抗战并无丝毫精神准备。

士气的低落和民众的困苦

当日寇向热河进攻前夕，汤玉麟共拥有步骑兵 5 个旅，分布于热河境内。在承德附近控制有步兵 1 个旅，卫队 1 个团，炮兵 1 个团，工兵、辎重各 1 营，及交通大队（汽车约一二百部）、通信队等，总计官兵 3 万余人，力量不算太小。但官兵平素无组织，无训练，专以欺压百姓为能事；中上级官佐大半染有吸毒嗜好，又经年累月不发军饷，士兵服装寒暑倒置，给养柴草由地方摊派。因此，不仅人民怨声载道，就是他的老兵老将，也常愤慨地说：“我们追随汤大帅这多年，替他打下了天下，竟置我们饥寒饱暖于不顾。弄得我们连叫化子都不如，叫我们当官胡子，甘受人民的责骂。他的少爷们反而住在租界里，高楼大厦，娇妻美妾，过着豪华富贵生活。他不管我们的死活，实在使我们太寒心，还能替他打什么仗？”士气虽然如此，汤氏竟佯作不知。

汤玉麟统治热河达五六年之久，可说是压根儿针鼻大的好事都未作过。除苛捐杂税、残酷剥削、大开烟禁外，复将全省土地划分下、中、上、上上四等，强征地亩税。每垧税率按 5 元、10 元、15 元、20 元征收，均按现大洋折合，并一再预征，由民国 20 年竟有征到后 30 年和后 40 年的。人民缴纳不起，怕吊打坐牢，有些人将地契文书，贴在门窗或树上，向四方逃荒而去。劳苦人民在隆冬三九的季节，多数糊不上窗纸，八九岁的男女孩子都赤光光的浑身一条布

丝都没有。我于1933年1月赴开鲁慰劳冯占海义勇军的途中，在建平县北约五六十里处汽车抛锚，投宿太平沟老农张平家里。他给我们烧水熬粥(谷子糊涂)，我们看到他的贫困情景，多给他几元大洋饭费。张平老汉感激得流泪，急忙命他十几岁的孙男、孙女向大家叩头，还低声地说："官长，您不是汤大帅那里的吧?"并问："若是日本鬼子打过来，是不是要比现在还厉害?"我们答："要厉害得多啦!"张老汉听后含着眼泪告诉他孙子说："你赶快长吧，好参加打鬼子去，免得再过这样天天挨饿受冻的穷日子。"可见汤玉麟对热河人民的残酷压榨到了什么程度。

义勇军的活动情形

1932年底，在吉林省的义勇军冯占海等部，因李杜及马占山等大部已退到中苏边境，陷于孤军奋斗，不堪敌伪军的压迫，遂突围退到热河。当时驻在北平的张作相闻讯后，于1933年1月29日又派我到承德见汤玉麟，商洽冯占海部义勇军防地问题，并前往慰劳。这时汤对冯占海等义勇军退入热境本无好感，恐怕动摇他的统治地位。但是，迫于全国舆论对义勇军的支持，而且已经开进省境，只好作个顺水人情说："辅忱(张作相的别字)是我的老友，他的部属就是我的部属，冯占海又是他的晚亲，我一定要尽地主之谊，加以照顾。不过据报冯的义勇军纪律太差，可不能由现在的驻地再向南推进了，否则我个人纵然能原谅，我的部下和老百姓却绝对不会答应的。"我们于1月24日经平泉、凌源、叶柏寿、建平等地到达开鲁南下洼子冯占海的驻地进行慰劳。同时，黑龙江省的义勇军邓文、李海青、檀自新、霍刚和辽南的义勇军李春华等部，亦先后拥入热河，连同冯部号称数万人，实则枪马俱全的官兵不到2万。惟番号繁多，组织庞大，都是骑兵，马多于人。就食各地，征夫拉丁，要粮索草。已久经榨取的贫瘠地区，骤增这些军队，人吃马喂，当然更苦了老百姓。这些义勇军因就食于地方，只好吃光甲地、转移乙地。各

方爱国团体人士，虽捐赠些金钱物资，究属少数，经过层层克扣，转发到士兵身上的更属有限。自然一切供应，都压在人民头上，逼得到处都是哭声。

热东义勇军的情况更为复杂。因热东地势险阻，人民质朴勇悍，且多藏有枪支。"九・一八"事变后，各方爱国团体鉴于南京政府的不抵抗，乃宣传鼓动，建立义勇军，纷纷拥到热东（朝阳、凌南、凌源、平泉等县），倡导建军。当时除北平抗日后援会所领导的冯庸、何绍南、唐聚五等部外，还有乘机渗入的中国青年党，与第三党和地方的恶霸匪棍，都打着义勇军的旗帜，大肆招兵买马，扩充实力，派别纷歧，番号林立，割据区乡（主要县城、镇市仍为汤部防地），作为建军基地。"三十一伙，百八一群"，按户搜枪要马，派粮草，拉丁夫。人民既须照例交纳地方政府的苛派，又要负荷义勇军的供应需求，双重担子都压在人民头上，已到了罗掘俱穷的地步。当我赴开鲁途经凌源县时，县长张某谈到地方情形时说："一天从早到晚，来县署索要给养的义勇军单位总有几十起。县府无法供应，只好下条子于区镇乡保，他们再转向民户摊派。今天作县长，真是作孽（实际上他正好借此中饱，早已罪孽深重了）。"久被残酷剥削的人民，当然无力负担。有人说，义勇军在激励人心方面确实有着推动作用，可惜名义虽正，而货色不纯。我由下洼子慰劳冯部，归途在叶柏寿路遇北平军分会委员高维岳（前察哈尔都统），彼此交换所见所闻，他慨然说："这样情形将怎么得了，还能抗战吗？"他又说："当我离开承德时，阁忱（汤玉麟的号）曾向我说：'你们看我热河的军政，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若两眼同时看，那就错了。'看这还像话吗？"我于 2 月初回到北平后，张学良听到我新由热河归来，立在顺承王府召见我，询问热河情况。我扼要报告热河现在已形成了一挂爆仗，一旦有事，只要一个炮仗响，整挂爆仗就噼噼啪啪地都燃起来了。他听了后点点头，立即让我去天津将热河情况详细告知张作相并赶快想想办法。我将这种情形报告张作相后，张作

相说："他们都没有办法，我一个光杆子，又能出什么力呢？"接着，张作相由天津被邀到北平，对热河的问题磋商了几次，仍然没有结果。

宋子文、张学良到热河视察

1933年1月间，日寇向山海关开始进攻。华北将领张学良、阎锡山等虽联名声言抵抗，可是不到几天工夫，驻在榆关的守军何柱国便于2月1日奉命撤退。这就为日寇进攻热河创造了有利条件。日寇占领山海关后，分别集结兵力（约3个师团另1个旅团）准备向热河进攻。

当时全国各地工人、学生和广大人民，痛愤日寇的得寸进尺，纷纷向南京政府要求抵抗。南京政府在这种情况下，被迫不得不装出抗战的样子，宣言热河为北方的屏障，地居天险，政府已有准备，至少可守3个月。并派陆军大学校长杨杰带同陆大教官贾蔺田（东北籍）等数人到北平，协助作防御计划。杨杰到北平未久，就向张作相透露了政府并无抗战决心，一切作为全是欺骗的诡计。但是他说只要华北将领大家能携起手来，好好打一下，政府纵然不同意，到那时迫于全国广大的抗战情绪，也就不能不跟着干。事为蒋介石、何应钦所闻，对杨杰大为愤恨。

同时，代理行政院院长宋子文2月11日忽然北上，在平阴谋策划后，于17日偕同张学良赴热河视察，借以敷衍舆论，树立其个人威信。当日同行赴热的，除随宋子文北来的上海资本家穆藕初、钱永铭及东北人士杜重远等外，还有张作相、朱庆澜、孙殿英（孙部已奉命入热）及张学良的随从人员。到达承德后，宋子文在热河省政府各界欢迎会上曾装腔作势地向热河守军将领等说："日寇野心无已，欺侮我们太甚，你们只管打，子文敢断言中央必为诸君作后盾。诸君打到哪里，子文跟到哪里；诸君打到天边，子文跟到天边；诸君打到海里，子文跟到海里（因宋子文不能讲地方话，是由杜重

远翻译的)。"洋宰相一席豪言壮语,就算决定了热河的抗战大计。他在承德停留一日,即同张学良等返回北平,悄然溜回南京了。宋子文此行目的,据杜重远密谈,宋年富力强,别具野心;他的来热视察,系利用张学良,借抗战之名,增加其政治上的威望,纯是为他自己打算,并无真正抗日的准备和决心。

当宋子文2月11日抵北平后与张学良密议对热河抗战,曾作了初步决定。军事部署是成立2个集团军,每集团军各辖3个军团:第一集团军由张学良自兼总司令,指挥东北军的主力和黑龙江两个旅,万福麟担任一个军团长(另两个军团当时未成立);张作相为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兼一个军团(并未成立),指挥的部队是孙殿英一个军团(实际是孙的一个军),汤玉麟一个军团,和冯占海新编的六十三军及各义勇军,后增加张廷枢(张作相的儿子)的第十二旅,并规定由山西阎锡山拨两个骑兵旅(一兵未派)。两集团军作战地境线的划分是:由凌南、凌源、平泉到承德的公路迤南归第一集团军,迤北归第二集团军。

这样重大的军事决定,事前张作相并无所知。16日,宋子文、张学良由承德临回北平之前,张学良才匆忙地告知张作相,嘱其暂留承德一宿,与汤玉麟协商作战计划(张作相为人老成服从,只好硬着头皮接受指示)。当晚与汤在热河省政府举行一次军事会谈,参加的人有朱庆澜、孙殿英、赵毅及汤、孙的几个参谋人员等。首先张作相请汤将其所部分别集结编成两个军,以便运用灵活。汤谓他的所部都是齐头弟兄,除他本人指挥外,谁也不能指挥谁,坚决反对变更建制。继而是提出补发军饷、被服、械弹等一系列要求,这都是张作相无权解决的问题。汤玉麟竟咆哮起来说:"他妈的!这样抗战,不是骗人吗?要啥没啥,还能打什么仗?"这里要顺便一提的是孙殿英的态度。孙殿英为人狡黠,别具野心,他的部队开入热河,系因蒋介石一再计议将其南调,他才请缨援热,避免南下,并阴谋伺机抢夺汤玉麟的家底。孙殿英在未到热河之先,已拜汤玉麟为

"干爹",16日正值汤的某姨太太丧期。宋、张甫离承德,孙殿英就急忙穿上孝服守灵。以这样沆瀣一气的孙、汤关系,他当然要支持汤的要求,以致会开到夜半,毫无结果而散。

张作相一筹莫展,万汤等不战而溃

张作相于17日赶回北平,立即接到北平军分会的正式命令,并由宋子文拨款20万元,权作热河抗战经费,限期组织作战机构,出发承德。张作相仓促东拉西凑,勉强将司令部编成(按编制还不足1/2),由军分会请发了一部无线电台和几部卡车、电话机线等,便于27日驰赴承德。而日寇已于21日开始分路向热进攻,汤玉麟驻朝阳的董福亭旅因其团长邵本良投敌,以致不战溃退;开鲁的崔兴武骑兵旅已态度不明,北票、朝阳、开鲁于25日同时沦陷。这时承德风声鹤唳,乱成一团,富室巨商,军政眷属,纷纷向平津逃窜。汤本人于3月1日也开始向平津征雇大批汽车,抢运私产,向天津租界输运,置军事于不顾。2日军分会派上校参谋王仲升到承德传达命令,由电话与万福麟联络才知道万福麟将所指挥的东北军全部撤进喜峰口各要隘。按当时万福麟指挥的东北军有5个旅及炮兵数团,兵力尚不单薄,虽因北票、朝阳的失陷,形成了腹背受敌的形势,但如果顾及全局,尚可支持一时。当时张作相曾与万福麟通电话,请其勿遽撤退,万福麟不理,电话中断,以后即失去联系。直至朝阳至承德的大道完全敞开,致使日寇如入无人之境。热河的失守,万福麟也应负极大的责任。

当时张作相的第二集团军总司令部是个空架子,设在承德,与各军的电台尚未联系好。甫到赤峰的孙殿英观望不动,冯占海等义勇军因开鲁陷落,已节节西退。而增派的第二十旅,先头才开到古北口;所指望的只有汤玉麟所部,但他又无视紧急局势。因此,张作相立陷于进退维谷、一筹莫展的境地。

3月2日,侦悉日寇先头部队(步骑炮联合的快速部队)配合

飞机多架，已抵凌源，向西挺进。这时，汤玉麟在承德附近尚控制有步兵和炮、工、辎、卫队团等约2旅之众，承德东数十里处黄土梁子有险可守。张作相一再催汤玉麟在该地布防，汤亦鉴于形势危急，才命令其部队出动。但军队出发中途，官兵哗然要求先发3个月军饷，才能开拔到第一线。商会和各地方少数团体闻到这种消息后，就密派代表赶赴前方向日寇表示欢迎。汤玉麟和张作相尚在梦中，毫无所闻。热河陆军训练监孟昭田（外号孟大狗）将这种真相密告张作相，张才知大势已去，于2日晚先将其司令部人员狼狈撤退。

3日晨，张作相在承德的旧将军衙门里还未离开，而城内人喊马嘶，枪声四起，啼哭逃难之声，不绝于耳。当时在张作相身旁的只有总部参谋长安玉珍、参议赵毅、秘书处处长德寿、十九路军的何高参和副官、卫士数名。张作相坐在木椅上，口吸叶子烟锅，满眼流泪。大家问他我们现在究竟应该怎么办？张作相说："我要绕道找占海的部队去。"大家说：马无一匹，枪只几支，如这样涉险，不如先到古北口，等十二旅开到，再作计议。他的副官与卫士遂将张推上汽车逃回古北口。汤玉麟本人于4日晨亦率领其残兵败将，离开承德，向滦平逃命。计自热战开始，到承德陷落，前后不到10天，而日寇仅128骑即占领承德。汤玉麟所谓誓死抗战，就落到一个这样的结果。

长城抗战概述

黄绍竑

蒋介石迫张学良下野

1933年初，日本帝国主义为了完成建立满洲国的侵略计划，开始向热河进攻。1月1日，日军进攻山海关，何柱国部队予以还击，是为长城抗战的开始。

日军进攻热河的计划是：（一）由绥中沿北宁铁道向山海关正面进攻；（二）由朝阳、凌源、平泉之线进攻；（三）由开鲁向赤峰进攻；（四）由林西向多伦进攻。（三）、（四）各路皆会师承德，然后再分兵进攻长城各口。

张学良既放弃了东三省，犹冀保留热河、河北，苟延残喘，静候南京国民党中央同日本交涉。山海关的炮声响了，他知道再不抵抗，连热河、河北都保不住，就把驻在长城以内的东北军调入热河布防。那时他名义上是北平军事委员会分会（以下简称北平军分会）的代理委员长（委员长仍是蒋介石），可以指挥华北各省军队。但华北军队如阎锡山集团、冯玉祥集团，在1930年内战的时候，都是由于他帮助蒋介石而致失败的。他怕阎、冯宿怨未消，不听指挥，不肯协助。东北军单独抗战是无把握的，他唯一的办法还是求援于蒋介石。

蒋介石却想利用这个机会，进行引诱两广参加"剿共"的阴谋。这年1月21日，他叫我同训练副监徐景唐赴广州，同陈济棠、李宗仁等商量，要两广出兵江西帮助"围剿"，他好抽调中央军北上抗日。在此稍前的时候，陈济棠驻沪代表杨德昭曾经谈过：如果中央

决心抗日，则广东愿意负江西“剿匪”的责任。蒋介石就抓住这个机会，使两广军队到江西参加“剿共”。不料陈济棠揭破了他的阴谋。我和徐景唐到了广州，陈召开军事会议，所有两广的高级将领及高级党政人员都参加。他们表面上不肯说不出兵，面是用要求军费和械弹来拒绝。陈次日邀我单独到他家里谈话，他说：“季宽，我们是十几年共过患难的老朋友，我们要讲真话。老蒋要我出兵江西，系唔系（是不是）想利用共产党把我们的军队钳着，好抽出他的军队来搞我们呀？我想一定是的，他的抗战是假的。你睇（看）系唔系？”我笑笑不答，也就是表示同意。他又说：“不但日军占领北平，就是占领南京，我也不肯调兵到江西。”我回到南京把这种情形向蒋介石报告了。蒋就以此为借口，仅调尚未参加“剿共”的中央军黄杰的第二师，关麟征的第二十五师，刘戡的八十三师北上，敷衍张学良。其实未参加“剿共”的中央军还多，如胡宗南的第一师，驻在河南闲着没事。我当时在报上发表两广团结抗战，都是一些自欺欺人之谈。

2 月下旬的某日，蒋介石召见了我，要我去当北平军分会参谋团参谋长。我说：“我与汉卿（张学良）未曾见过面、处过事，而且军事也非我所长，恐怕将来要误事。还请委座另行考虑吧。”其实我心里对参加抗战是愿意的，但我以内政部部长的地位去当张学良的参谋长，心里总有些不愿意。蒋明白我的意思，他说：“北平军分会仍然是我的名义，你就是我的参谋长；而且敬之（何应钦）同去，他以后要在那里主持，你不但要在军事上帮帮敬之的忙，尤其在政治上要帮帮他。”我知道他已决心要张学良下野，由何应钦来代替。我和何应钦还合得来，就答应了。

接着，财政部部长宋子文、军政部部长何应钦、外交部部长罗文干、内政部部长黄绍竑、参谋部次长杨杰、军政部厅长王伦、参谋部厅长熊斌、还有宋子文的朋友银行家胡六（胡筠庄）的老婆胡六嫂，一行人浩浩荡荡专车北上。表面上看，好似南京国民党中央很

重视长城抗战，全力支持张学良，内容却各有各的作用。宋子文表面上似乎是作财政上的支援，其实是用来对张学良说私话，并为他出国作布置；此外还走一些英美外交路线，不久就回去了。何应钦表面上似乎是作军政上的支援，其实是要取张学良而代之。罗文干则是要与北平各国外交团打交道，看看风色，为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外交方针摸摸底，不久也回去了，由次长刘崇杰代替。我虽然是参谋长，但主要是供以后各方面政治上的奔走，因为蒋认为我还有些"肆应"之才，可以做"安内"的工作。专车到了徐州，不敢经天津到达北平，恐怕天津的日本兵知道了出来为难。其实日本人对这些人去北平，是欢迎的。专车由徐州转陇海路经郑州，再转平汉路北段到北平西站下车。大约是 2 月 23 日的早晨，张学良并没有到站迎接。我同何应钦住在中南海的居仁堂；宋子文另有他的秘密住所。

当日下午 2 点多钟，我同何应钦去顺承王府拜访张学良，听取前方的情况。他骨瘦如柴，病容满面，精神颓丧。他把热河及山海关方面的情况告诉我们，那时听他的口气，对战局好像还有把握。座谈久了，他就要到里面去打吗啡针。这是我第一次和这位"少帅"见面的情形。我们每日下午都得到那里商谈，我心里想：这样的情况怎能长久相处下去。闲了没事，也和一些北平上层人士接触，都为这位少帅的精神体力和指挥威望担忧，恐怕要误了国家大事。

日军于 2 月 24 日向热河进攻，先后占领了开鲁、凌南以东各地，继续向赤峰、建平、凌源等地进攻。热河主席汤玉麟闻赤峰、建平、凌源等地失守消息，即在承德作撤退准备：先把所有的汽车装载他私人的财产，向古北口撤退，因而影响了前方的士气。号称险要的平泉以北，承德以东的黄土梁子主要阵地也自动放弃不守。日军既占领黄土梁子，即分兵两路：以一部南向平泉攻喜峰口，以主力西向承德攻古北口。日军于 3 月 4 日占领承德，汤玉麟已于一早退逃滦平。张学良闻讯大为震惊，当即下令通缉汤玉麟。张学良那

时对我们曾作出要亲率王以哲等军去恢复热河、与日本鬼子拼到底的豪语，但迫于舆论，不得不向南京政府引咎辞职。

驻在南昌专心致力"围剿"红军的蒋介石，知道热河失守，张学良引咎辞职，即于3月6日乘飞机到汉口，改乘火车到石家庄，宋子文也同来。何应钦和我接到电报后，就先到石家庄去迎候，同行的还有山西阎锡山的代表徐永昌。蒋介石在车上召见了我们，听我们把情况报告之后，问我们对于张学良的辞职的意见。蒋介石在南京早已决定要何应钦来取张学良而代之的，现在为什么还要问呢？因为对于东北军的底子还没有摸清楚，还有些顾虑。我们说：第一、如果还让张学良干下去，不但全国舆论不满，而且北方军队如山西阎锡山的军队，西北军宋哲元的部队，以及商震、孙殿英等部队都会不服。我们以后就指望这些军队继续抗战，中央军是不能多调出来的。第二、张学良虽有亲率未曾作战的东北军去收复热河与日本鬼子拚到底的表示，但以他的精神体力是做不到的；而且拚下去也不会有好结果。第三、即使准张学良辞职下野，东北军也不会有什么顾虑。蒋介石根据我们的报告，就决心准张学良辞职下野，由何应钦来接替。

张学良知道蒋介来石家庄，也打电报去，想和何应钦等一同去石家庄迎候。但蒋介石还没有得到何应钦和我的报告，主意没有打定之前，不便就与他见面，就复电说："前方军事吃紧，调度需人，不必就来，有必要时再约地见面。"蒋介石同我们见面商量的次日，就约张学良到保定见面。张学良先到车站迎候，蒋介石后到，在蒋介石的专车上见面，仅有宋子文一人在座。何应钦和我在另一专车上，没有参加，怎样谈的，我们都不知道。他们会谈仅仅个把钟头，张学良就很颓丧地辞了出来。蒋介石走后，我们和张学良各乘各的专车回北平。次日，张学良就发出辞职下野的通电，不日离开北平到上海去了。

何应钦的作战部署

何应钦继张学良任北平军分会代理委员长，负华北军事的责任，我当了参谋长，都在居仁堂办公。参谋团设在府右街南口右侧的大楼，除由南京带来几个高参——侯成、陶钧、徐祖诒、徐佛观等外，其余都是东北军的原班人马。何委东北军参谋长鲍文樾为军分会办公厅主任。原任张学良参谋处处长的金元铮（前清贵胄，陆军小学、保定军官三期毕业）是满族人，恐怕他靠不住，就加设了一个作战处，由徐祖诒任处长，也在居仁堂办公。何应钦和我秉承南京政府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既定国策，倚靠两千多年来秦始皇遗留下来的万里长城作为防御的唯一工事，想守住长城各口——独石口、古北口、喜峰口、冷口，阻止日军进入关内。独石口方面的防务调傅作义部队担任，傅作义本人进驻张家口。古北口方面把溃下来的东北军王以哲等部撤下整理，而以由南方调来的中央军徐庭瑶的十七军（辖第二师黄杰、第二十五师关麟征、第八十三师刘戡）担任。喜峰口方面的防务以宋哲元的第二十九军担任。冷口方面的防务以商震所部第三十二军担任。由长城撤下来的东北军整理后，调北宁线天津以东及冷口以东担任防御，同时令孙殿英部坚守多伦以东地区，作敌后的威胁，使日军不能不有一些后顾。这是完全防御性的到处挨打的作战计划，根本谈不到进攻和收复热河、收复失地。

日本关东军占领了黄土梁子，即分兵一部（大约一个旅团）南下占领平泉，向喜峰口进攻。东北军万福麟所部直溃口内，日军先头于3月9日占领喜峰口。调往该方面的增防的原西北军二十九军宋哲元所部主力方到达遵化，先头冯治安师黄昏后到达喜峰口。冯部乘敌人不备进行逆袭，黑夜里不用火器射击，而用大刀砍杀，用刺刀混战，杀死杀伤敌人不少，也有所虏获，把喜峰口夺回，这是长城抗战唯一的胜利。捷报传来，振奋全国的人心。大刀队的威名

几乎把现代的精良火器都掩盖了。日军遭此意外的挫折，重新部署进攻，该方面一时成为对峙的状态。

日军主力（约一个师团以上）占领承德后，即向古北口进攻。东北军王以哲部节节败退，企图固守古北口，等待中央军徐庭瑶部的增援。徐庭瑶军先头关麟征第二十五师，于3月9日夜到达古北口城，而王以哲已被日军击败，急于退走，11日就把古北口关口丢了。关麟征亲率所部增援，企图夺回古北口，不幸中弹受伤，不能达到目的；乃据守南天门阵地。黄杰的第二师到达增防后，该方面也成了对峙的状态。刘戡的八十三师也调到该方面，由参谋次长杨杰任总指挥。

这时我们觉得榆关方面防守石门寨的何柱国军过于突出，不能不顾到冷口万一被敌人突破，敌人就可以占领迁安下滦州；喜峰口万一被敌人突破，则敌人占领丰润下唐山，截断榆关方面何柱国的归路。为了缩短战线，把何柱国军调驻滦河西岸，破坏滦河铁桥，依靠滦河作为防御。同时增强冷口方面的防御兵力。我们于3月20日给何柱国撤退的命令，平津日本报纸次晨就清清楚楚刊登了出来。这当然是由于汉奸或电报密码泄漏出来的，可见我们作战的计划，敌人是清清楚楚的。国内报纸则攻击这次的撤退是受日本的要求。因此何应钦不得不向记者声明："我军此次对于滦东的军事调动完全是为了战略上的关系，绝无政治上的关系。"

孙殿英所部大约有3万余人，在3月以前即进达赤峰、围场地带，支援那方面的东北义勇军。日军进攻热河，同时以骑兵一个旅团附飞机坦克向孙部进攻，孙部溃退多伦以东地区。何应钦原要孙固守多伦以东的山岳地带，以减轻日军对长城进攻的压力。但孙经不起日军的压迫，于3月上旬放弃多伦，继续向沽源溃退。孙部军纪极坏，沿途骚扰不堪，外间并有谣言，说孙已接受伪满的委任，并没有与日军接触，就向后撤退。何应钦大为惊疑，因而对他的军饷、给养扣而不发，他的驻平办事处处长找我诉说经过，我想这样总不

是办法，于是自告奋勇，到沽源多伦前方去视察以明真相，好作处理。我乘火车到张家口，会同傅作义坐汽车向沽源前进，路经张北县与傅部师长陈长捷见面。在沽源以北的平地脑保(蒙语、泉水的意思)碰到孙殿英。他向我叙述经过说："多伦在地图上虽是个大地方，但人烟稀少，给养困难，而且四面都是荒漠平沙。虽有些山，但是与南边的山完全两样，寸草不生，山势平延，很难阻止敌人坦克车的冲击和飞机的轰炸。即使没有敌人到来，我这 3 万多人也不能久驻那里，既没有兵站补给，又没有积蓄，一切都要就地想办法。所以军纪太坏，事实就是这样，我是承认的。至于说我不见敌人就溃退，请部长你去看看我那些伤兵是哪里来的呢？又有人造谣说我受了满洲国的委任，部长你知道，全国都知道，我孙殿英挖了小溥仪的祖坟，即使我去投他，他肯容我吗？岂不是把我这麻子脑袋往刀上送？我孙殿英虽然是土匪出身，混了几十年，也还知道一些民族大义，即使至愚也知道自己与小溥仪有不共戴天的仇恨。那些造谣的人无非是想栽我，请部长转报何部长，并且妥为处理。我一定服从命令，绝无二心。"我心里想他后面这段话，倒是实情，他所以不投伪满的关键就在这里。于是我答应即发欠款 40 万元和面粉 4 万袋，并指定他在沽源、独石口、界岭口一带向东面北面布防，好抽出傅作义部队作为机动使用。

消极抵抗，节节撤退

北宁线方面自何柱国军退守滦河西岸，日军即进占抚宁、昌黎、卢龙等地，与我军隔河对峙。喜峰口方面因宋哲元的二十九军防御相当坚固，敌人避免正面攻击的牺牲，找到冷口方面的弱点。那里原是东北军缪澂鎏师担任，后来商震部的黄光华师增加上去，虽然努力抵抗，但经不起日军的攻击，冷口遂告失陷。日军占领冷口后，分兵占领滦河上游的迁安，威胁滦河西岸阵地的侧背，主力则绕到喜峰口的后面，向防守喜峰口的二十九军形成前后夹击的

姿态。因此，防守喜峰口的宋哲元军不能不撤退。北平军分会乃令何柱国、王以哲、万福麟等军撤至宁河、宝坻之线，宋哲元军撤至三河、平谷以东地区。敌人继续前进，先后占领遵化、玉田、丰润，向我军压迫。我为了布置津东防御去天津走了一趟。据说溃退的东北军纪律很不好，见到女人，不论老少都要奸淫。因此津东难民纷纷逃集天津。我在天津还去拜访了亲日分子张志潭(已由南京任为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委员)问他们对日本人有什么活动。其实汉奸石友三、张敬尧已在天津北平开始活动了，与他多少有关系。我在言语之中表示要他顾全大局，听候中央处置，不可单独行动。他表示这个仗打不下去了，首先军队纪律太坏，人心恐慌，甚至有些人宁愿欢迎日军到来，他的话可说是代表了他自己，也代表了某些人。我在天津想与前方联络，但联络不上。因为那条线(即宁河宝坻之线)并不是预先构筑好的阵地，而是临时征些民工挖了一些土壕，更未架设通信网。前方情形十分混乱，眼见那线也守不住。我转回北平把情形报告何应钦。

古北口方面是敌人进攻的主力。自古北口失守，我军就坚守南天门。南天门地形险要，不能使用很大的兵力。日军以全力进攻，战事很剧烈，进展甚慢。徐庭瑶的中央军3个师，起初是关麟征第二十五师在第一线，被打得残了，黄杰的第二师顶上去，换下二十五师，第二师又被打得残了，刘戡的第八十三师又顶上去，换下第二师。由南天门经石匣镇、经密云，节节抵抗，节节撤退，就是这样挨打了两个多月，是长城抗战作战的时间最长、战事最剧烈的地方。3月间因喜峰口二十九军大刀队一次的胜利，上海妇女界组织妇女慰劳队到喜峰口慰劳二十九军，对古北口方面则没有去。我对她们的代表王孝英、沈慧莲说，古北口方面的战事比喜峰口方面激烈得多，她们都不相信。可见当时报纸把大刀队捧得天那样高，把对日抗战最激烈的部队都给忘了。东北军方面更没有人理睬。

徐庭瑶军退到密云附近，既无险要的地形，部队又皆已残破，

不能作有效的抵抗。北平军分会事先把傅作义的部队调到昌平附近向怀柔、顺义出击。但经日军的攻击,作战不利,退守顺义、怀柔以北山地。日军进至顺义附近,距北平仅 50 多里。而京东方面的日军既占领三河进迫通州,宝坻日军进迫香河,对北平形成三面包围的姿势。这是 5 月 24 日的情形。当日军迫近顺义的时候,日军飞机 9 架飞过北平上空,飞得很低。机上的太阳敌徽及驾驶员的面目都看得清楚。那时既没有防空警报,也没有防空洞设备。我和何应钦听到了机声,才跑出居仁堂到假山下去躲避。我们的高射炮队也咯咯放了几响。但敌机并未投弹就飞回去了。事后,英、美外交人员深不以我们的高射炮的射击为然。他们说:"日机不是来轰炸的,向他们射击,就会引起他们的轰炸或扫射。"但敌机不轰炸、不扫射,只有天晓得。也许他们外交人员事先知道吧。

这个期间,德国总顾问费而采,也同在北平参加我们的作战的计划。他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总参谋长鲁登道夫的作战处长。他每天都到居仁堂听听情报、看看地图,或同我们谈谈。但我觉得他只有一般的战略见解,尤其对中国部队的情形根本就不清楚。东北军自滦西撤到宁河、三河之线,又被敌人突破。他问我,那方面既不是敌人的主力,东北军的番号又那样多,为什么守不住?这个很容易答复的问题,弄得我很难答复,只好耸耸肩膀。5 月 24 日上午,他仍然到居仁堂,见办公室的作战计划地图都揭下来了,就大惊失色。我们把情况告诉了他,请他回南京以保安全,随后就调回国去了。

北平被包围,何应钦乞求停战

南京政府既抱定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方针,除了消极的军事抵抗之外,交涉的活动是积极的。外交部部长罗文干、财政部部长宋子文 2 月底来北平就是做这个活动的。罗、宋回南京后,又派外交部次长刘崇杰来继续进行。他们希望通过英国驻华大使蓝浦森、

美国驻华大使詹森，由英、美出面调停，把上海停战协定重演。但英、美在华北的利益关系并不大，不似上海那样积极，蓝浦森只是向日方要求维持辛丑条约，秦皇岛附近不发生战事。

南京政府不但在外交方面对英、美进行活动，作交涉的准备，同时也在内政方面调整华北的人事，为以后的妥协作准备。蒋介石曾要我兼任北平市市长，我没有同意；又叫我征求地质学家丁文江的意见，要他当北平市市长应付日本人，丁文江也不同意。5 月 3 日，南京行政院设立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以黄郛、黄绍竑、李煜瀛、张继、韩复榘、于学忠、徐永昌、宋哲元、王伯群、王揖唐、王树翰、傅作义、周作民、恩克巴图、蒋梦麟、张志潭、王克敏、张伯苓、刘哲、张厉生、汤尔和、丁文江、鲁荡平为委员，并指定黄郛为委员长。从这个委员会名单来看，包括有代表国民党中央和华北地方各方面的人物，也就是想用这个委员会作为第一步"华北特殊化"，与日本进行直接交涉。黄郛是亲日派的头子，用他来当委员长，很显然是对日本表示妥协。黄郛被任命后，并不即时就职，而是在上海和北平与日本人秘密接洽，等待时机的到来。

军事上，到了 5 月 24 日，日军追近顺义、通州、香河，北平成了三面被包围的形势，日机复在上空飞翔。前方的部队正在溃退，无法收容整理。后方又肯定没有增援部队，即使蒋介石肯调援兵，也是远水救不了近火。北平只有刘多荃东北军的几个团和蒋孝先的中央宪兵第三团。白天我到城内各地去看看城防的布置，到晚上 8 点多钟才回到居仁堂，看见办公室里已经不像往日的样子，我的铺盖也已经捆好了。我问何应钦怎么一回事？他说："前方情形你是知道的，军分会现在决定撤到长辛店以南，打算 11 点钟上火车，火车已经预备好，在西便门外跑马厂小车站上车。你回来得正好，我们等你作最后的商量。在那里有黄郛、张群、李择一、王伦连我一共 6 个人。我问撤退有没有请示得到蒋的许可？何说："时机太紧急，来不及请示。"我说："北平呢？"何说："交给徐庭瑶防守，他的司令

部设在广安门外的白云观。"我说："敌人已占领顺义以南地区，还来得及由前方调回来布防吗？"何说："这就很难说了，只好尽力地作去。"

黄郛自被任命为行政院北平政务整理委员长之后，就在上海、北平与日方进行秘密接洽，他什么时候到北平我不知道，这次何应钦邀他来参加会议，自然有作用。黄郛说："由驻北平日本武官方面得到的消息，如果中国方面肯派军使向关东军要求停战，便可停止对北平的进攻，用外交的方式结束此次战事，并希望在夜里两点钟给他们答复。否则关东军即向北平进攻。黄郛、李择一自不必说，张群的意见是同黄、李一致的，但他不说话。王伦则主张守北平，并且要立刻调炮兵到天安门、中华门，向东交民巷轰击，先肃清城内的日本驻军，不管他日本人也好，美国人也好，英国人也好，一概把他轰完，横直也不过丢了一个北平，使英、美旁观者吃一些亏，然后他们对日本有所责难，谁叫他们同日本人住在一起呢？他这些激奋的话，大家都不赞成。何应钦没有主意，仍然想撤退。我说："调兵增援肯定不可能，前方部队正在溃退，未必就能调来北平，从容布防，而我得到的消息已经有人从事伪组织，动员某些部队参加。如果我们军分会一撤退，伪组织可能就立刻出现，敌人就利用伪组织作为对手与它签订协定，作为这次战事的收场，将关东军撤回关外，并不占领平、津，而平、津已成为一个特殊化的第二满洲国。这样河北就非我国所有了，损失岂不是更大。因此，我主张一面布置北平的城防，一面派军使去商量停战，万一停战不可能，然后把北平交由徐军长作背城借一。我们那时候仍有从容退出的时间，现在又何必这样急呢？"大家都以我的说法为然，但何应钦仍以未曾得到蒋介石的指示为顾虑，因为事情太重大了。那时北平和牯岭长途电话还不通，打电报去请示万万来不及，我说："委员长要我们来主持这方面的事，我们要为他负一些责任。古人说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况且现在是君命来不及的时候呀，我们应该把责任负起来吧。

如果以后委员长不同意，我们愿共同受国家法律的处分就是了。”我说完这番话，张群支持我的意见。何应钦才决定派军使去与关东军商量停战。由黄郛、李择一去答复北平日本武官。王伦见这样决定，遂愤愤地上楼睡去了。后来王伦在中南海骑马，堕马触树，脑破身死。他在那时算是北平军分会参谋人员中主张抗日最激烈的分子。

5 月 24 日晚上的秘密会议开到 1 点钟以后，才决定派军使到顺义关东军第八师团司令部与西義一师团长商量暂时停战办法，其实就是战败之后作城下之盟。派什么人当军使呢？这是一个忍辱负重的差使，既要有相当的官阶，又要有相当的仪表，最主要的还要会讲日本话。于是选派军分会作战处处长徐祖诒(燕谋)去充这个角色。他是日本陆军大学毕业、精通日语、相貌魁伟的少将，是很适合上述要求的。他当初不肯去，恐怕到那里受凌辱及以后还要受全国人民的责难。经我们多方的劝勉才答应了。他同北平日本使馆武官于 25 日晨 5 点钟乘汽车由东直门出城，抵达顺义某一个村子关东军第八师团司令部，同师团长西義一商量停战办法。路程不过 50 多里，个把钟头就到了。我们就好像热锅里的蚂蚁一样，静待他的回音。我们的行李已经捆好，不再打开，我只好到北京饭店去睡觉休息。

大约 12 点钟的时候，徐祖诒回来了。他说：在顺义某个村关东军第八师团司令部里作了接待军使仪式，并签定请求停战的“觉书”后，西義一师团长就提出了暂时停战办法，内容概要是：(一)华军撤至延庆、昌平、高丽营、顺义以北等地，通州、香河、宝坻、林亭、芦台以南一带，以表示华军停战的决心，请日军不再前进。(二)于 5 日内日方(指关东军)派遣代表与华方军事当局(指军分会)讨论停战条款。(三)正式谈判地点须在日军占领地内。这个结果的下一步文章就更多了，首先是派谁当正式谈判代表，他的地位要比徐祖诒高一些，又要懂得日本话。我们再三商量，决定派参谋部厅长

熊斌充当。另加上一个军分会总参谋的名义。熊斌也是日本陆军大学毕业生，过去同日本人有过一些往来。熊斌当时也不愿意充当首席代表，经我们勉励他作马关条约的李鸿章，何应钦并许了交换条件才答应的。其次是要派人到庐山向蒋介石作报告，因电报不能弄得很详细。于是推我于25日下午4时专车回南京转庐山（当时报载黄绍竑28日回南京是错误的）。

我在25日午后6多钟到了天津，在河北省政府主席于学忠处匆匆吃了一顿饭，我把前方情形及临时停战的办法告诉了他。他自然是同意的。随即专车南下。事先约好山东省主席韩复榘在济南车站见面，半夜里车到了济南，韩复榘已经候在那里。我们在车上谈了20多分钟，无非是把情形告诉他，他更是赞成停战。济南以后一直都没有停过车，那条路上就是我那个专车行走，其他的车都停了。第二日午后3点多钟到达浦口，走了22个钟头，据说是那时候津浦路最快的火车了。本想即乘飞机到南昌，但时候已经晚了。27日上午9时，乘军用飞机到南昌，在行营参谋长贺国光家里吃了一顿午饭，随即乘火车于下午3点多钟到了牯岭。事先蒋介石已经把汪精卫、孙科等南京要人召集到庐山来，在庐山饭店那里等候我的到来。我把以前长城各方面的战况和前天晚上（即5月24日晚上）军分会所作的决定作了详细的报告。最后我并代表何应钦面请越权专擅的处分。早在我的意料之内，因为我们是本着中央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方针处理的，他们完全同意，没有一句责备的话。蒋介石说："好！好！你们处理得对。以后的问题我另有电报给敬之（何应钦）。季宽先生你很累了，你去休息休息吧。"至此我的千斤重担算是放下来了。索性住在庐山休息一个时候。《塘沽协定》于31日在塘沽签字，怎样情形我就不知道了。长城抗战就此结束。

喜峰口抗击日军的回忆

陈芳芝

国民党第二十九军宋哲元部在喜峰口的壮举，在我中华民族抗战史上写下光辉的一页。当时，我任第二十九军第三十八师张自忠部二二八团团附，参加了这一战斗。那一幕幕英勇悲壮的战斗场面，至今难以忘怀。

第二十九军宋哲元部是西北军冯玉祥的旧部，多年来在冯玉祥的爱国教育下，懂得了“亡国奴不如丧家犬”的苦处，特别是在中下级军官中起的作用更大，官兵抗日的情绪十分高涨。另外，还有一个原因，这个部队是杂牌部队，受到蒋系部队的歧视，中下级干部中大多数觉得“气难忍受”，认为只有抗日才是第二十九军的出路。于是在1933年初，日寇又图侵略我热河和华北地区之时，各将领向宋哲元建议，请缨抗日。

1932年12月中旬，宋哲元奉命率所部由平定、阳泉开往京东通县香河地区集结待命。出发前，二十九军所属第三十八师师长张自忠在阳泉车站集合营长以上军官开会，首先说明日寇在长城以东集结兵力，企图侵略我热河省和华北各地区，我部奉命开往前方，要各部队迅速做好准备，候车皮拨到，即刻出发。

1933年3月，日军开始向热河进犯。东北军驻热河的汤玉麟部被日军击溃。日军继续分兵两路向古北口、喜峰口推进。第二十九军宋哲元部奉命增援汤军阻止日寇南下。3月初从通县、香河、蓟县出发，行军两天一夜，到达长城要隘遵化以东三道坪附近。这时敌人铃木、服部2个旅团，已进犯到喜峰口以北地区。军长宋哲元立即命令第一三二师赵登禹部和第三十七师一部，急行军占领

喜峰口，阻止日寇前进。当第一三二师到达喜峰口以西时，日寇已进入喜峰口附近，与我军遭遇。我军即向日寇展开猛攻，血战七昼夜，反复冲杀，终于将敌击退。与此同时，进犯董家口、潘家口的日寇，被我第三十八师张自忠部击退。日寇被阻于长城以北地区。随后日寇经过几次增援向我军反扑，均被我军击退，未能前进一步。当时第三十八师和第三十七师在遵化县合组一个指挥所，张自忠对冯治安、赵登禹说："人生在世总是要死的，打日寇为国牺牲是最光荣的。只要有一兵一卒，我们决心与日寇血战到底。"

3月中旬，日寇增援后，又向我军阵地(长城各口)猛扑。第一三二师和第三十七师在喜峰口等地与日寇激战五昼夜。第三十八师张自忠部在董家口、潘家口等地与敌战斗亦很激烈，尤其是第二二五团刘振三部与敌人战斗最为激烈。第一营营长杜安邦阵亡，官兵伤亡过半，战况非常危急。团长刘振三急电师长张自忠请援，张自忠回电说："我们困难，敌人比我们更困难，一定要坚持到最后五分钟。有一个人打一个人，只准前进。不准后退，官顶不住枪毙官，兵顶不住枪毙兵。要与阵地共存亡。"并说，已命二二三团增援，增援部队到达后，两团可集中力量向敌猛攻；并已命二二二团向董家口右侧地区进攻，二二四团董升堂部出潘家口向敌迂回。下午，第二二三团和二二五团从西面夹击敌人，经过一昼夜激战，敌人伤亡惨重。第二天天黑之后，日寇向后撤退。我第二二四团当晚迂回到潘家口东北约20里，向日寇后方炮兵阵地猛攻，激战五六个小时，消灭敌军300余人，击毁敌军大炮3门。在天明前安全撤回原阵地(长城之线)。

3月下旬，日寇又集中兵力向我阵地猛扑。并派两个联队向我左翼迂回，侵入遵化县北20余里的罗文峪地区，企图占领遵化，截断我军后方，将我军消灭在遵化以东地区。张自忠依据这一情况，立即集合第二二八团(预备队)少校以上军官共商对策(当时我任少校团附)。并命各部队迅速做好战斗准备。张自忠当面对我们说：

“日寇在长城地区被我军打得落花流水，未能前进一步。现又集中兵力向我军阵地猛扑，并派两个联队向我军左翼迂回，敌人的便衣队已窜入遵化北20里的罗文峪地区。你团要迅速出发，抢占罗文峪长城之线阻击日寇西犯。到达罗文峪后，首先集中兵力，将敌便衣队消灭。并要不惜一切牺牲，消灭该地区所有敌人。”

我团上午10时出发，不到两个钟头就来到罗文峪南五里的地区。据侦察报告：敌便衣队已占领罗文峪东北的大山头（长城北），祁团长当即命令一营营长崔振伦带队跑步前进，抢占长城阵地后，速派2个连向敌便衣队猛攻，激战一个多小时，将其击溃。第二二八团到达罗文峪后，又命第二营营长刘文修带队占领第一营右侧长城之线，阻击敌人南进。第三营随团部为预备队。

第二天上午，敌人出动十多架飞机向我阵地轰炸和扫射，掩护步兵向我军反扑。经过一昼夜的激战，被我军击退。三月初，日寇增援后，再次向我军阵地反扑。我军连续击溃敌人的多次反扑，敌人伤亡重大。第二天，敌军五六百人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向我军左翼扑来。祁光远团长命第三营向左翼增援，攻击日寇的右侧背，战斗非常激烈。祁光远向张自忠报告请援，张自忠即命第二二八团坚守阵地，同时命令各部队向日寇展开进攻。随后，命副司令员给我打电话，叫我快到师部去。我到达师部看到张自忠与三十七师师长冯治安、参谋长张越亭等正在看地图，张自忠看到我说：“你带着五连和一排重机关枪快到前方去，多带子弹，由师部给你派一个运输连运弹药。”并叫我转告祁团长、各营长和官兵们，要沉着勇敢杀敌，说明我军已开始全线向敌人猛攻，第二师刘汝明部已向蓟县以东石门地区进发，袭击敌人右侧背等情况。张自忠又对着我说：“陈芳芝，你怕不怕？”我说：“不怕，打日本鬼子还怕死？”他说：“打日本人死了是最光荣的！”我说：“请师长放心，我们一定跟敌人拼到底。”张自忠说：“好！你准备好了快出发。”我离开时，张自忠和冯治安说：“祝你们胜利！”

我回到留守处，迅速将弹药装好就出发了。到达罗文峪后，见到祁团长，我传达了张自忠师长的指示，祁团长精神振奋，斗志更加旺盛。他告诉我很多官兵受伤都不下火线，并叫我向各营营长传达张自忠师长的命令。一营营长崔振伦、二营营长刘文修，都表示坚决与日寇拼到底，请师长、团长放心。我给三营营长王合春打电话传达师长的命令时，日寇正向我阵地进犯，其左翼已迂回到第三营营部附近。过了几分钟，第三营副营长朱治金从前方回来，打电话向团报告战况，敌人从上午4点钟开始，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一部敌军迂回到我营部地区，经我营长亲自带着第九、十一、十二连向敌人勇猛冲杀，血战半天，敌伤亡300余人，弃尸100余具，惨败溃逃。我获战利品甚多，我营完全控制了长城之线。在战斗中，王营长不幸光荣牺牲。我将王合春营长阵亡和击溃日寇的情况报告了祁团长，祁团长流下了眼泪。他一面派人带担架将王营长的遗体护送遵化，一面给朱副营长打电话，告知我们的援军已到达，要坚持到最后胜利。他还告诉朱副营长，由我带着第五连去支援他们，并由我指挥三营。接着又向师参谋长李文田报告了战斗部署和王营长阵亡的消息。我到第三营后，同朱副营长到了第一线，看到前方士气很旺盛。十连上士班长阴秀山和上等兵寿占国一一指给我们敌兵的位置。当时有3架敌机在我阵地上空侦察和扫射，掩护步兵向我阵地进犯。我根据亲眼看到的战斗景况，判断日寇还会增援，再次向我阵地反扑。我一面让朱副营长给团长报告敌情，一面让各连准备冲锋。并令第五连连长冉德明将部队带到长城下凹部待命。我亲自告诉官兵，不瞄准敌人不准放枪。半小时后，日寇集中炮火向我阵地猛轰。敌步兵在炮火掩护下果然向我阵地扑来。经过2小时激战，我各连的轻重机枪在长城上掩护步兵向敌人猛冲，第五连从敌人左侧杀了上去。经过半小时的激战，将敌击溃。日寇伤亡惨重，弃尸50余具。这样的反复冲杀，经过了3天3夜，血战在长城前线。同时，喜峰口、董家口、潘家口地区向我军进犯之敌也

都被我击溃。在这次战斗中，我军给予日寇王牌军铃木、服部两个旅团以沉重的打击，消灭了敌军 2 个联队，取得了重大战果，创造了华北抗日史上第一次光辉的战绩。第二十九军连连接到全国各爱国团体的贺电和捐款。各界代表和记者纷纷到喜峰口、遵化、罗文峪等地区慰劳部队，采访胜利消息。

4 月中旬，第二十九军奉命撤到通县地区集结，第三十八师也撤至通县东南胡家村。部队撤退时，官兵都不愿离开前线。后来才知道，原来这是卖国贼蒋介石实行不抵抗政策的结果。大家对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极为痛恨！

二十九军在喜峰口的抗战

何基沣

1933年的春天，二十九军在喜峰口抗击日军。这是从“九·一八”开始，日军在蒋介石不抵抗政策的纵容下，唾手吞并东北进占热河以后，意外地在中国北部所遇到的有力的还击。我参与了这一战役，担任二十九军前方指挥所的工作，亲历其事。现在把此役经过情况，概述如下。[1]

一

1930年冯玉祥与阎锡山的反蒋战争失败后，冯所率领的西北军完全解体；只有一小部分退入山西南部，通过张学良的允准，被改编为第二十九军，由宋哲元任军长，驻防山西阳泉、辽县、沁县一带。二十九军初编时辖三十七、三十八两个师。三十七师师长冯治安，下辖3个旅，旅长为赵登禹、王治邦、李金田。三十八师师长张自忠，下辖3个旅，旅长为黄维纲、佟泽光、张人杰(二十九军军部还有一些直属部队)。在离开山西开赴平东一带接防的时候，全军约有2.2万余人，除留守阳泉一部分外，开到前方的约1.5万人。二十九军在器械方面是较差的。全军约有1/3的枪械是西北军在反蒋战役溃败后遗留下来的，多数是汉阳造和三八式。还有约1/3的枪械是由甘肃调出来参加反蒋战役的地方部队所携用的，大都是老毛瑟枪。再有约1/3的枪械，其中一部分是二十九军在编军以后，由自己的修械所陆续制造的，另一部分是从孙殿英那里买来的土造枪。枪械陈旧而复杂，弹药补充困难，有些也无法补充，如老毛

瑟枪的弹药，各兵工厂早就不制造了。全军只有野、山炮十几门，重机枪不过百挺。后来从北平领到一些轻机枪，每连配备了两挺。步枪上没有刺刀，自己制造不了，就利用西北军原有的特点，打了些大刀，发给士兵用。枪弹奇缺，则多造手榴弹，以资补救。至于饷项方面，因为领不到全饷，每年能领到10个月的饷，就算不错。所以，官兵们一般只能拿到六七成饷。以上就是喜峰口战役前二十九军的情况。尽管如此困难，由于西北军有着刻苦练兵的传统精神，在军长宋哲元"枪口不对内"的口号下，以阳泉驻防不到2年的时间里，居然把这一支残破的部队，练得很有规模。同时，西北军练兵一向以日本为假想敌。所以，当二十九军奉命开赴平东防御日军的时候，全军士气异常旺盛。在这以前，十九路军在上海抗战时，宋哲元曾派我率领一个参观团到淞、沪一带，参观作战情况，并将参观所得的材料，印发全军研讨，着重说明日军可以打败和能够打败的经验。这对于官兵们在战斗精神方面，起着一定的鼓舞作用。

二

1933年1月3日，日军占领山海关。热河吃紧，平、津震动，华北当局急调二十九军移防平东。于是，宋哲元以华北军第三军团总指挥的名义，指挥所部由山西开往通州、三河、蓟县、玉田一带；总指挥部初设通州，继移蓟县，后来设在遵化。由于国民党政府始终坚持不抵抗政策，华北当局对抵御日军的整个部署，丝毫没有准备，而只是千方百计向日本谋求妥协。因此，二十九军在1月20日部队陆续到达平东的时候，竟没有继续奉到准备作战的指示。2月25日，日军开始进攻热河。守军不战而退，不到一个星期，日军就以百余轻骑占领了承德。这时，华北当局手忙脚乱，命令二十九军以一部分兵力出冷口御敌。宋哲元奉令后，命我率骑兵2个营到冷口执行警戒掩护任务。另命王长海团开到建昌营，以为策应。

3月4日，我们到了建昌营，即遇沈克所率领的一〇六师遭到日机追击轰炸，从冷口向南溃退。枪炮辎重，遗弃遍地，零乱不堪。我们就在冷口布防，扼守要隘，并帮助沈克收容溃兵。到了6日，二十九军奉令防守冷口迤西至马兰峪止，长达300余里的长城各口，其中包括董家口、喜峰口、罗文峪诸要隘，而将冷口交由商震的部队接防。于是，我们就离开了建昌营。7日，我们到了三屯营（三屯营在喜峰口南60里）。二十九军在这里设有前方指挥所，师长张自忠、冯治安也已经到了这里。第二天下午，奉令接喜峰口的防务。喜峰口在遵化东北110里，距离热河的平泉190里，这时原由万福麟部驻扎，万部在热河的凌源、平泉遭到溃败，乃退保宽城、喜峰口一带阵地，士气沮丧，不堪再战，遂商由二十九军接防。我在9日下午和副师长刘自珍到达喜峰口。口里口外驻有万部一个旅，我们和他们约好，我们的队伍在天黑以前，一定可以到达一部分，等我们的部队到了阵地，他们就撤至口内休整。我和刘自珍视察了阵地，决定把先头部队一个团放在口外约20里的孟子岭，来确保喜峰口的安全。4点钟左右，我们刚从山上下来，前方炮声大作，从望远镜里看到万部纷纷由孟子岭方面退下。旋接报告，敌人服部、铃木2个旅团的步骑炮联合部队，中杂伪军一部跟踪南下，铁甲车10余辆开到孟子岭附近。万部抵挡不住，望风而逃。傍晚，敌人占领口上高地，居高临下，控制了口门。这时，我三十七师特务营赶到，立即投入战斗。敌人炮火猛烈，该营又在洼地，营长王宝良率部争夺高地，中弹阵亡。王长海团随即到达，天已昏黑，双方在山上山下混战。夜间，我军由喜峰口的两侧，夺取高地，才把敌人压住，稳定了口上的战局。我将战况反映给在三屯营的冯治安，冯叫我立即到喜峰口南约20里的滦阳城指挥。我到滦阳城，已过午夜，宋哲元由蓟县总指挥部来电话，询悉前方战况后，指示说："一定要坚守喜峰口，我已经调赵登禹、王治邦、佟泽光3个旅去增援，他们离你处约有百里左右，跑步前往，预计天明以前可以赶到"。

10日一早，赵、王、佟三旅先后到达滦阳城。此时，喜峰口我军一部分部队向后退下，赵登禹立即带队上去，将敌人堵住，赵的腿部受了弹伤。王、佟两旅分向左右两翼增援，战至上午11时，东面王旅告急，西面刘景山团告急，陆续派队援应，转危为安。10日一整天，在喜峰口附近激战，几处高地，得而复失，失而复得，来回拉锯，杀声震天。我军士兵，多数都不愿携带步枪，因为背着步枪上下山地，行动不便，他们只愿多带手榴弹、提着大刀，便于杀敌。由于两军的士兵白刃相接，距离很近，因而日军的飞机、大炮，无法使用。11日拂晓，敌人发动进攻，企图抢夺我军占领的山头，我军沉着应战，潜伏不动，待敌进至相距百米以内，突然出击，以手榴弹大刀冲杀，敌不得逞，遂以飞机大炮，更番轰击。这2天多的战斗，双方的死伤都很重。晚间，我与三屯营张、冯两师长通电话，大家都感到如此拼杀下去，敌人器械精良，对我甚为不利，应当运用我军的特点，利用夜战、近战，出其不意，予以袭击。遂请得宋哲元的批准，决定采取迂回夜袭的战术，把第一线正面交给王治邦旅固守，抽下赵、佟两旅分两路包抄敌人。一路由赵登禹(赵在10日攻击敌人时，腿上被炮弹片擦伤，这时自告奋勇，裹伤出发)率领董升堂团及王长海团，从左翼出潘家口，绕至敌右侧背，攻击喜峰口西侧高山之敌；一路由佟泽光率领李九思团及仝瑾莹团，从右翼经铁门关出董家口，绕攻敌左侧背，攻击喜峰口东侧高山之敌。王治邦旅俟赵、佟两路袭击得手，即行出击。部署既定，夜半，两路分头出发。赵旅出潘家口，距目的地较近，拂晓前即到达敌特种兵宿营地区。这一带地方和喜峰口内外，在8日这一天都下过雪，到处还结着冰，官兵深夜在冰雪中急行军，情绪非常高涨。董团到达三家子、小喜峰口，王团到达狼洞子及白台子敌炮兵阵地。敌人万万没有想到我军竟敢雪夜袭击“皇军”，他们正在高卧，不及还击，多数被我军砍杀。夺获敌人的大炮、坦克车，无法携回，都予以炸毁(只携回炮镜和轻武器等)，辎重粮秣悉予焚毁。此时，驻在老婆山的敌人看见火光冲

天，知道有变，驰来应援，敌我两军，遂相混战，适佟亦已到达，将敌击退，仍由原路而回。此役毙敌甚众，击死敌指挥官1人。我军伤亡也很重，官长阵亡者计团附胡重鲁，营长苏东元，连长2人；受伤者团附1人，营长2人，连长7人。敌既受创，12日喜峰口沉寂了一个上午，下午敌机4架到喜峰口、撒河桥等处轰炸，投弹20余枚，我军略有伤亡。董家口方面在12日晨，有敌来犯，被我军击退。这一带的战事，从9日下午开始，经过7昼夜的激烈战斗，我军坚守阵地，未被突破。此后，两军对峙，不时有些接触，战事重心由喜峰口移到罗文峪方面去了。

罗文峪在遵化北18里，东北距喜峰口110里，其地适在喜峰口与古北口之间的长城凹入处，倘被敌占，则喜峰口的左后方受到威胁，势必无法站脚，不战自退。因此，我方在这方面驻有刘汝明师担任防务，并与原驻口外的东北军李福和的骑兵第五旅一部取得联系，互为策应。不料，当日军由热河向罗文峪挺进的时候，李部骑兵望风而逃，擅自向西撤退，也不通报我军。幸而当地民众激于爱国热忱，连夜向罗文峪我军报告日伪军南犯的消息。与此同时，我军在罗文峪口外，抓获一名佐官级的敌探，在他身上搜出文件，知道敌人从朝阳、平泉、滦平一带，抽调第三十一联队、第八联队协同一部分伪军，经由兴隆县东北50里的鹰手营子进犯罗文峪。我军得悉情况，严阵以待。16日拂晓，敌人先头部队沿半壁山向罗文峪进攻，企图夺取三岔口高地；我军祁光远团跑步绕出黄崖口，予以截击。经激战后，敌始退去。第二天，敌大举向罗文峪、山渣口、沙石峪进攻，炮火猛烈，并有飞机助战。我军诱敌迫近，突出阵地，猛掷手榴弹，肉搏冲锋，反复冲杀，战斗竟日，阵地得失数次。我方复调李金田旅增援。傍晚，敌向鹰手营子方向退去。此役敌伤亡甚重，有少佐指挥官一名被我军击毙。18日晨，敌步骑炮混合部队约1个联队，猛攻罗文峪、山渣口、沙石峪。刘汝明师长亲率手枪队督战，以机枪、手榴弹抵御，待敌接近，挥刀砍杀，活捉其骑兵大尉1

人，余众仓惶退去。至午时，敌复向山渣口进攻。步兵在猛烈的炮火掩护下，向我阵地两侧挺进。我军李金田旅长率李曾志团，祁光远团长率王合春营，先后驰至增援。战至天黑，将敌击退。敌损失甚巨，我李曾志团长受伤，王合春营长阵亡。是夜，我军派李金田旅长率兵一团由沙石峪口绕攻敌侧背，连越7个山头，摸至敌的机枪阵地。相距约四五十米时，被敌觉察，向我军猛烈射击。适祁光远团由左翼绕攻敌后，亦已到达，合力攻人敌阵。此时，正面我军见敌后业已打响，急令全线出击，前后夹攻。战至天明，敌全部撤退，罗文峪北10里以内，已无敌踪。

罗文峪战后，敌人又从喜峰口西边进攻了几次，均未得逞。4月初，敌从喜峰口东面绕过滦河，到达撒河桥以东距三屯营约10里之外。经我军迎击，敌始退去。此后，二十九军在防区里筑成坚固的阵地带，敌从任何地点进攻，都须付出较大伤亡的代价，而二十九军自作战以来也有很大伤亡，全军官兵伤亡共达5000余人。因而，战事逐渐形成胶着状态。4月11日，敌人从商震所部第三十二军防守的冷口攻人；接着，迁安又告失陷。二十九军在喜峰口腹背受敌，不得不转移阵地，随即奉令撤至通州以东沿运河布防。在撤退的一个夜间，蒋介石驻北平的代理人何应钦以电话向二十九军参谋长张维藩询问前方情况。张答："我军已经按照命令，到达指定地点，严阵待敌。惟右翼防地的商震部队，联络不上，现在我军右翼距通州约20余里的地方发现敌人。"何闻讯大惊，以为敌兵迫近，北平危急，立命备车南逃；旋悉，战争形势没有继续恶化下去，始罢。不久，蒋介石政府与日本签订了《塘沽协定》，震动一时的长城抗战，就此结束。

注释：

本文有几处经过张维藩、戈定远两先生的补充，他们曾参加喜峰口战役。

回忆长城抗战

郑洞国

日军大举侵入热河后，举国哗然。南京工人通电抗日，平津等地各界也纷纷电请南京中枢对日宣战。南京国民政府此时正调动大军专力准备在南方各省对苏区发动第五次“围剿”，只是迫于日本帝国主义的步步逼迫和全国舆论的压力，乃在对日问题上采取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方针。仅派中央军第十七军匆匆增援华北前线。

我所在的第二师于2月下旬接到命令：全师火速集中洛阳，28日开赴华北前线，限3月8日前抵达通县待命。

我第十七军先头第二十五师抵古北口前线时，长城战事正酣。日军占领承德后，以1个旅团兵力南下喜峰口，另以主力1个多师团进攻古北口。我第二师于3月上旬准时到达北平，补充了部分枪械弹药及粮秣、服装后，即奉命由通县向古北口前线进发。我率本旅走在前面，师部及第6旅随后跟进。

部队进入顺义县境，即听到前线炮声隆隆。在通往密云的道路上，不时有些东北军的溃兵稀稀拉拉地撤下来。从他们口中了解到前线的一些情况。我求战心切，命令部队一再加快行军速度。

快到密云时，正巧我的军校一期同学、时任北平军事委员会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将军（原北平军分会代理委员长张学良将军刚刚引咎辞职，由何氏继任）的少将高参严武也从前线下来，一见面就向我说起前线情况如何如何坏，劝我不必上去了。我素闻此君胆小，缺乏实际作战经验，心想我们千里迢迢为抗日而来，哪有一闻炮响就向后转的道理！遂不理他，率领部队继续兼程赶路。

3月12日午夜后，本旅赶到距古北口以南约30华里的军部

所在地石匣镇。我顾不上休息，即去军部领受任务。徐军长正与几位幕僚借着微弱的灯光察看地图，一脸倦容。见我进来，他走过来同我紧紧握了握手，算是打过招呼了。随即引我到军用地图边，很简洁而又语气沉重地说："现在前线的情况很紧张，第二十五师已经打残了。有情报说日军正源源向古北口增兵，估计不久日本人的进攻将更为猛烈，现在命令你部即刻出发，务于天亮前接防第二十五师的阵地。"接着军部作战参谋又向我扼要地介绍了一下前线敌我态势，以及作战中需要注意的问题。走出军部，已是凌晨1时许了。我回到部队，马上集合全体官兵，作了一个简短的动员，即下令以强行军的速度向南天门疾进。虽然部队经过整日行军相当疲劳，但士气非常高昂，没有一人叫苦，也没有一人掉队。一路上安静极了，只听见"沙沙"的脚步声和轻微的武器碰撞声。部队排成整齐的纵队，犹如一条长龙，在夜色中沿着蜿蜒起伏的山地，悄悄地但又飞快地向前跃进。

凌晨四时前，我们就赶到了南天门。第二十五师代理师长杜聿明将军在阵地上热情地接待了我。他简洁地向我介绍了第二十五师的作战情况和日军的动态，还亲自带我借着微弱的月光巡视并交接阵地，直到凌晨5时，才与我紧紧握手道别，率部撤到后方休整。

第二师接防南天门阵地后，敌人正忙于调动兵力，调整部署，战场上暂时沉寂下来。这时，日军因在喜峰口方面屡受我第二十九军打击，无隙可乘，遂移兵古北口，企图集中优势兵力一举击破中央军，以达到向南京国民政府施加压力，逐步控制华北的企图。自4月15日起，日军将滦东兵力逐渐向古北口方面转移。除原来的第八师团等部外，又相继增加了第六师团主力、第三十三旅团，并附有强大的空军、炮兵和战车等部队。而前线我军只有一个步兵师(第八十三师稍后开到)。据说徐庭瑶将军曾向南京中枢和北平军分会请求增调兵力，但得到的答复是：要以现有兵力竭力抵抗，不

要指望再增加援军云云。徐氏无法，只好下决心用仅有的这点兵力死守下去。

南天门阵地，右自潮河岸的黄土梁起，左至长城上的八道楼子止，正面宽约10华里。的中段以4·21高地为据点。本旅奉命担任第一线防御(第六旅一部守备八道楼子阵地)，第6旅为预备队。鉴于前一阶段的作战经验，我们乘战事间歇，加紧构筑阵地，阵地编成系以抵抗巢为核心的纵深配备，并修筑阵地内的交通，以利炮兵的活动。南天门阵地后方，还构筑了6道预备阵地。同时，各师还自发地组织别动队，迂回敌后袭击敌人。如4月5日，本师别动队在色树沟以短枪、手榴弹伏击敌人，毙敌骑兵第八联队军官1名，士兵数十名，并炸毁军车数辆。第八十三师的一支别动队，也袭击了古北口北关，给敌后方以深重打击。4月11日，我各师别动队在敌左右两翼与敌激战，并将偏桥通承德的公路破坏，使敌后方补给断绝多次。敌人对我军小部队骚扰活动颇为头痛，当时日文报纸曾说我军在运用苦鲁巴金战术云云。

4月16日至18日，日军出动飞机相继轰炸了第二师师部驻地石匣镇和第十七军军部驻地密云县城。我判断这可能是敌人发动大规模进攻的前兆，遂命令部队日夜加强戒备，准备迎接即将到来的一场血战。就在这时，我南天门左翼险要制高点八道楼子(该处有古时8座碉楼故名)却不慎失守了。八道楼子位于我军防线西段大拐弯处，是一个光山秃岭的制高点，地势极为险要，为南天门阵地左翼重要支撑点。且因八道楼子高出群峰，凭楼俯瞰长城的古北口镇，了如指掌。谁占据此处，谁即可以火力控制古北口全镇，为兵家必争之地。军部原命令第二师派一营兵力防守八道楼子，但黄杰师长一时大意，认为日本兵穿皮靴，无论如何是爬不上这几座碉楼的，所以只决定派第六旅第十一团的一个连防守。而这个连的官兵也以为地势险要，放松了警戒。4月20日夜，日军以一个大队的兵力由古北口一个姓李的汉奸(原任保长)带路偷袭过来，仅一夜

之间，这八座碉楼就全部被敌人占领了。黄杰师长闻讯大惊，急将八道楼子失守的情况向徐庭瑶将军报告，徐将军极为震怒，在电话中严责黄氏说："你们怎样失守，你们就负责怎样收复！"黄师长乃下令第6旅组织反攻，但均无效。次日又命令我率本旅第八团并指挥第六旅十一团继续反攻。我指挥部队由八道楼子东面500米以外的光秃秃的山坳上，在无地形掩蔽、又缺乏炮火支援的情况下，向敌人发动了一次次仰攻，整整激战了一日，可惜仍未能成功。眼见一批批勇敢的弟兄冲上去，又相继倒在敌人密集的枪弹下，我五内俱焚。最后，我认为这样硬攻牺牲太大，而且没有成功的把握，只好请示上级忍痛将部队撤了下来，并于22日夜间将阵地变换到田庄小桃园之线。

4月23日晨7时，日军利用八道楼子瞰射之利，以陆空联合向我南天门阵地中央的重要据点4·21高地发动大规模猛攻。敌人的飞机、大炮、战车一齐出动，以密集的炮火覆盖我军阵地，接着以步兵群一波接一波地轮番向我阵地进攻。我军官兵均镇静地伏在工事中不动，待敌接近至我前沿阵地二三十米处，突然以轻重火力集中扫射，打得敌人人仰马翻，死伤枕藉。日军士兵受武士道精神毒害，且训练有素，作战很顽强，一批被打倒了，另一批又嚎叫着涌上来，几度冲上我军阵地，与我军官兵在工事中拼杀扭打。我急命预备队上去增援，方把敌人压了下去。战斗中，我军因火力不够，也吃了敌人不少亏。我军火炮很少，且性能亦差，往往需发射三发炮弹方能命中目标。但这里一发炮弹刚刚出膛，即为敌炮兵发现，马上招来排炮轰击，只好频频更换火炮位置，不敢集中排列连续射击，故而大大限制了火力的威力。敌人因在火力上占绝对优势，愈加骄狂，每次进攻之前，都以飞机大炮向我军阵地狂轰滥炸，阵地上几无一寸完好之地，官兵死伤甚重。最讨厌的是敌人的飞机，从早到晚在我们头上盘旋轰炸，不断造成伤亡，并威胁我军补给线。当时我军没有防空武器，一些官兵愤极，就用肩膀扛着轻机枪朝着

向我阵地俯冲的敌机射击,迫其不敢低飞。23日这一天,我军一共打退了日军4次疯狂的进攻,阵地前横七竖八躺着不少敌人溃退时来不及拖走的尸体。本旅牺牲也很大,一共死伤三四百名官兵。

4月24日晨六时起,日军再度发动全线猛攻。敌人仍然采用老办法,先对我军阵地施以轰炸,摧毁我防御工事,再以兵分梯队轮番猛攻。我军官兵沉着应战,击退敌人多次进攻,未失一寸阵地。战至午后,敌人不断增加兵力,攻势更为猛烈。第六旅第十一团官兵伤亡过半,阵地被敌人突入,双方展开肉搏战,情形极为危急。黄杰师长急命补充团前往增援,卒将敌人打下去。

日军屡攻屡挫,恼羞成怒。4月25日以前所未有的猛烈炮火对我南天门阵地实施报复性轰击。从晨至晚,敌人的炮击几乎终日未绝,不少士兵的耳朵都震聋了,但未见敌人步兵攻击。

此时第二师已与日军血战5昼夜,伤亡甚大、疲劳不堪,遂奉命于4月25日夜间撤出阵地休整,由第八十三师接替南天门阵地的防守任务。

次日拂晓,第八十三师接防甫毕,敌复集中炮火向4.21高地猛轰,防御工事全被击毁;继以步兵猛扑,经该师第四九七团顽强抵抗,激战至下午,因伤亡太大,终于放弃了这一重要据点。

4月28日晨5时,日军集中火力向我南天门附近的372高地及425高地射击,其步兵分三纵队向我猛冲,同时以战车掩护骑兵威胁我左右两翼。第八十三师第四九七团及补充团的一营,与敌激战竟日,营长三员均负重伤,伤亡惨重,阵地工事完全被敌毁坏。因此于是晚变换阵地,占领南天门以南600公尺的预备阵地。

自4月20日至28日,中日军队在南天门一线血战了8昼夜。中国军队以劣势装备和兵力顽强抗击几倍于我的装备精良的日本军队,给敌以重大杀伤,粉碎了日军"一星期内攻下南天门华军阵地"的预言,使战线仍胶着在南天门附近,实为"九·一八"以来所少有,殊出敌预期之外。但我们自己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又有两

千名将士血染沙场。

这时，日军已攻占冷口及其以东长城各要口，接着多伦又告失守，整个战局对我愈加不利。

古北口方面，自4月29日以后，日军虽停止大规模进攻，每日仍以炮火向我阵地零星射击，时常以小部队向我袭击。

5月10日晨，日军重新发动进攻。大约500余名步兵在猛烈炮火掩护下，向我东头峪阵地进攻，被第八十三师第四九三团击退。翌日凌晨一时，日军第三十一、第三十二两个步兵联队约5000余人倾巢出动，向我稻黄店涌泉庄及其以南高地，用密集队形夜袭，战斗非常激烈。第八十三师的第四九三团及补充团损失极大。凌晨5时，日军战车6辆冲至上甸子，威胁我军侧背。晨7时，日军又出动飞机8架在我阵地上空往复轰炸，协同其步炮兵攻击，双方形成混战状态。至上午8时，敌集中70余门火炮协同两千余名步骑兵，猛扑我左翼笔架山阵地，第八十三师第四九四团拼死抵抗，鏖战至午，团长魏巍负重伤，中校团附汪兴稼阵亡，官兵伤亡达2/3。由于第八十三师各团均伤亡巨大，无法支持，遂导致全线崩溃，不得已撤至后方10华里的准备阵地。该师师长刘戡将军，以部队在一昼夜间遭到如此惨重损失，被迫撤离阵地，悲愤难当，企图拔手枪自杀，幸被部下及时救下。

这时，第二师正奉命开往后方整理补充。5月10日夜间，我率第4旅已行至密云，忽接上级十万火急命令，说前线军情紧急，要我师各旅迅速回师增援。正在北平郊区休整的第二十五师也接到了同样的命令。

接到命令，我顾不上多想，急命部队掉头向南天门方向跑步前进。5月11日上午11时左右，本旅首先赶到阵地，接替了第八十三师的防务。我们喘息未定，日军即出动四五千人兵力，在飞机大炮掩护下向我磨石山、大小新开岭、香水岭一带阵地大举进攻，并以战车十余辆，冲至白水(河)附近，截击我后方的交通。此刻我后

续部队尚未上来，本旅仅剩不足两千名的战斗员，兵力单薄，且经连夜行军相当疲劳，在敌人疯狂进攻下，各处阵地均频频告急。我感到情况极其严重，手中又无兵可派，确实已到了生死关头，只有拼命了。遂脱掉上身军衣，穿着白衬衫，提着手枪，带上身边仅有的一个特务排，亲自赶到最前线往复督战，以示必死的决心。经过一天血战，总算守住了阵地，赢得了后续部队增援上来的宝贵时间。

5 月 11 日夜间，敌人又夜袭我小新开岭左翼 405 高地，被我军击退。次日，敌复增加兵力发动全线进攻，第二师各团伤亡惨重，遂撤至后方 7 华里的新阵地。此时第二十五师第一四九团覃异之部尚在西北岭及下会之线与敌激战，支持至 13 日始撤至后方 6 华里的新阵地。

5 月 12 日下午 3 时，日军攻占我大小新开岭一带阵地后，乘胜向石匣镇攻击，与我第二师在摇(遥)亭南香峪之线激战。傍晚，敌战车十余辆冲至南茶蓬(棚)我炮兵阵地，炮兵第四团第九连官兵全部伤亡，炮 4 门被毁。同时我在潮河西岸的炮兵亦遭敌重炮轰击，毁炮 3 门。由于我炮兵受严重损害，火力间断，敌之战车更加活跃，激战至 13 日午，我军防线渐呈动摇之势。徐军长急命守潮河右岸的第二十五师，抽出一个旅向左翼延伸，占领后方 8 华里之新阵地，掩护第二师撤至黄岗峪(黄土坎)不老屯之线。13 日午后 1 时，第二十五师第七十三旅向左翼移动(此时该师第七十五旅仍在城子村小漕村原阵地与敌激战)，该旅第一四六团未及占领阵地，即遭到优势之敌攻击。敌战车亦已越过石匣镇 3 华里许，冲至我南山口(山安口)附近阵地。午后 4 时，敌炮兵向石匣镇集中轰击，掩护其步兵前进，石匣镇遂陷敌手。第一四六团在南山口(山安口)与向南追击之敌激战，死伤甚大，当日午夜退守后方 6 华里新阵地。

5 月 14 日拂晓，敌步骑炮联合约 2000 余人在飞机掩护下向我潮河右岸阵地攻击，其战车 20 余辆由潮河滩上突进，与我第二十五师激战达 3 小时，后向石匣镇方向退去。同时我第二师在黄岗

峪(黄土坎)不老屯之线亦与敌小部队交火。

连日以来,第十七军各师又相继死伤4000余人,损失兵力过半,如不补充,实无法再作有力之抵抗,遂奉令以第二十六军于5月14日夜进入九松山预备阵地。第十七军除第二十五师一部担任石铁峪五座楼之线警戒任务外,皆调密云整理补充。15日,各师开始移动。17日,复奉命调回怀柔、顺义之线,第八十三师奉命担任北平城防。

第十七军在古北口、南天门一带,前后与日本侵略军恶战2月余,毙伤敌5000余人,自己也伤亡了八九千人,是当时长城抗战作战的时间最长、战事最剧烈的地方。虽然由于敌我力量悬殊而失败了,但还是使敌人初步认识到,中国军队是不容易对付的,中国人民是不好征服的。

我军撤退以后,当地一位姓王的道士,约集一些百姓,冒着生命危险,偷偷将我阵亡将士的忠骸掩埋在长城脚下,最集中的一处,在古北口镇西南,当地人称为"肉丘坟",那里埋葬着500余名壮烈殉国的抗日官兵。54年后,即1987年夏天,我和我的老朋友、原第二十五师第七十五旅第一四九团团长覃异之同志,重新来到古北口,凭吊了当年的旧战场和经过当地人民政府修缮了的原第十七军抗日烈士合葬墓。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沧桑岁月,山河依旧,而当年参加过这一悲壮抗战的人,已存者寥寥,我们两位也都是年逾八旬的老人了。追思往事,怀念战友,真是感慨万端!覃异之同志当时曾赋诗一首,颇能表达我们这些幸存的抗日老战士的心怀,诗曰:

> 五四年前血战地,
> 白头老将又重来。
> 长城依旧雄华夏,
> 倭寇而今安在哉!

当年喋血卫神州，
八载鏖兵报国仇。
古北口前怀战友，
中兴喜讯告坟头。

第十七军在古北口方面失利前后，在滦河以东的中国军队亦相继撤守乐亭、迁安间滦河西岸，再向通县北运河西岸撤退，使我喜峰口守军过于孤立，第二十九军遂奉命撤守通县城附近北运河西岸。日寇步步进逼，整个战局由此急转直下。这时北平方面正酝酿停战谈判。5月31日，国民政府同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这个协定实际上承认了日本帝国主义占有我国东北三省及热河，并划绥东、察北、冀东为日军自由出入区，这样就进一步便利了日本控制、吞并华北的企图，由此使我国面临着更加深刻的民族危机。

古北口抗战纪要

杜聿明　郑洞国　覃异之

一．所谓"中央军"的调动

1933年1月，日寇侵占山海关、九门口以后，2月分兵三路进攻热河。中央政府的不抵抗政策，遭到全国人民反对，南京工人通电抗日，平津等地工人、学生电请对日宣战。蒋介石在全国舆论的压迫下，不得不调一部分所谓中央军北上抗日。驻在徐州蚌埠一带的第二十五师（属十七军建制）奉命于2月26日开始输送，限3月5日以前在通县集中完毕。驻潼关、洛阳一带之第二师奉命于2月28日集中洛阳开始输送，限3月8日以前到达通县待命。在湖北花园孝感一带的八十三师，于2月下旬集中汉口，3月上旬开洛阳（据说是为了对日寇保密，故在洛阳绕道），3月20前后到达北平附近，3月25日集中密云。独立炮兵第四团、炮兵第七团、骑兵第一旅、重迫击炮第一营及其他直属部队等，均在3月下旬至4月上旬间，先后开到密云。以上各部队均归第十七军军长徐庭瑶指挥。（战争末期八十八师的一个旅曾开至北平待命。）

当时北上抗日部队在全国人民要求抗战呼声的鼓舞下，敌忾同仇的情绪很高，人人磨拳擦掌，准备效命疆场。就是一向热心"剿共"的徐庭瑶，本来奉命到江西上饶担任赣东北"清剿"指挥的任务（该军第四师正在上饶一带"剿共"），也请求北上抗日，可见要求抗日已成全国人心之所向。蒋介石为了欺骗人民，提出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方针。他既无抗日决心，更谈不上抗日的准备工作。正因为这样，部队平日训练都以"剿共"为目的，对抗日所需要的对空和

对战车以及近代的筑城作业等的训练，根本不加注重。甚至二十五师 2 月 25 日徐州出发，3 月份的伙食费还没有领到。该师临时在地方上借了 10 万元，部队才能开动。当时北平，尤其古北口一带，仍然是冰天雪地，而二十五师到达时，尚是赤足草鞋；至于大衣等防寒服装，则更谈不到了。当时北平各界所组织的抗日后援会，尤其朱庆澜先生等所领导的后援会，竭尽全力为二十五师捐送皮大衣等防寒装备，该师官兵对人民支援抗战的热忱非常感动。更荒唐的是第二师的轻机关枪还在仓库里，未发到士兵的手上。据说第二师师长黄杰怕损失了，不好补充。各部队的工作器具很缺乏，尤其在长城一带的山地，多半是岩石坚土，工具消耗又大。幸赖朱庆澜、车向忱等所领导的抗日后援会及时捐赠，全军官兵受到极大鼓舞。后勤部队卡车很少，勉强可供运输弹药之用；粮秣运输全靠骡驮和牛车，一日行程不及 80 里。为了防空，行动都在下午 5 时以后至翌日晨 6 时前，其余时间必须在树林中隐匿。由石匣往返北平一次，需六七日，给养时有中断之虞。

二、二十五师接防古北口前后

二十五师接到动员北上命令后，师长关麟征先遣七十三旅旅长杜聿明乘快车赴北平，向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以下简称军分会）代委员长张学良请示机宜，并了解日寇进攻情况。

杜聿明大概是 3 月 1 日到北平，住前门外李铁拐斜街中国饭店。在上午 10 时前后，打电话给军分会，要求见张学良，军分会交际处说张今天不会客。再打电话到顺承王府，张的左右也说张今天不会客。经杜一再说明是奉“蒋委员长”派来的（其实是杜假借的），张的左右才答应“向少帅请示后答复”。直到下午二时，尚未接到通知。杜有些着急，再用电话询问。张的左右说：“少帅今天开会，恐怕今天不会客。”杜无可奈何，只好等着，直到第二天（2 日）才得到通知，约杜午后 4 时在顺承王府会见。

张学良见杜时，对二十五师的编制、装备、训练以及日常事务生活等情况，问得非常详尽，但对于日寇侵占热河，东北军抗战的情况以及我军抗战计划、战略战术与经验教训等则毫无指示。杜聿明急于了解这些情况，就问张："热河的情况如何？"张答当天尚未得到电报，但说日军并不多。杜又问我军现在何处作战？张说在承德附近。再问：对二十五师计划如何使用？张说先到通县休息休息再说。最后杜问对日作战应注意些什么？张说日军飞机很厉害，要注意防空，详细情形将来同王以哲军长研究研究。张又假装镇静地对杜说："东北军打得很好，日军吃了很大的亏，中央军来更有办法。"但什么办法，张并未对杜说出，即连喊副官倒茶，似乎怕杜追问下去，难以答复。杜见此情况，即行辞去。在当时的印象是：张学良对小事（日常事务）聪明，对大事（抗日战争）糊涂。

以后杜为了了解情况，曾到军分会去，见各处人员表面镇静，实际极为慌乱。参谋处的主要负责人，办公时间都不在，据说是料理私事去了（实际上准备逃走），仅有些看守办公桌的小参谋，一问三不知。就这样，杜在北平好几天，未得到热河敌我双方的真实情况。据说就是张学良本人也不十分了解。

3 月 5 日，二十五师在通县集中完毕。这时第十七军军部尚在蚌埠，该师归军分会直接指挥。6 日，奉张学良战字第五〇一五号命令，该师即进驻密云待命。7 日，该师正向密云前进间（密云距通县 140 华里），中途奉张学良急电，大意是敌已侵入平泉、承德，其先头似达滦平；第一〇七师在青石梁、曹路口、巴克什营构筑工事；第一一二师在古北口加紧构筑坚固阵地，阻止敌人等语。8 日下午后 6 时，该师全部到达密云县城。晚间，各部队正在就寝中，于晚 10 时奉到张学良齐戌电："据报敌人今晨向我古北口外阵地开始攻击，刻正对战中。着第二十五师迅速向古北口前进，与在古北口之王以哲军长极力联系。"该师奉命后，即于夜 11 时出发，于 9 日午前 8 时到达石匣镇。为避免日寇飞机轰炸，休息至晚 8 时，继续

向古北口前进。此时，部队暂归七十五旅旅长张耀明指挥。师长关麟征和七十三旅旅长杜聿明乘汽车先到古北口与王以哲联络，了解情况，以便决定作战部署。

关、杜二人的汽车从石匣镇北开数里，即见东北军车马人员，狼狈不堪地向南奔驰，步骑炮兵及行李辎重毫无行军序列，道路为之阻塞。车行如牛，深夜12时前后始到古北口。当时一〇七师正由热河撤退下来，古北口街道，人喊马嘶，杂乱异常。这时，王以哲和一一二师师长张廷枢在王的司令部大声争吵。张说："你的队伍能走，我的队伍就不能走，是什么道理？"王说："没有命令你就不能走。"张说："听谁的命令？你能走，我也能走。"他们双方站在门口的卫兵都怒目相对，好像真要厮杀的样子。关、杜到后，争吵犹未停止。据王以哲说，有诸兵种联合之敌，兵力未详，已逼近长城，刻正与我占领长城一带阵地的一一二师对战中。但关、杜二人当时未闻有枪炮声，似乎当日长城沿线并无战斗。事实上也是在翌日（10日）午后3时敌人才开始向古北口攻击。但此时王以哲要二十五师接替长城一带一一二师的阵地，关麟征则要一一二师在第一线担任防守，第二十五师在古北口南城占领第二线阵地，并说："如果一一二师阵地被突破，二十五师一个反攻就把敌人打回去，恢复阵地。"（显然关是说大话耍滑头，企图利用别人掩护自己。）关并请王以哲坐镇古北口指挥。王则既不同意二十五师占领第二阵地，又不欲在古北口指挥，而想急于交防撤退。双方争执，相持不下。在争执间，关曾问杜的意见，杜认为东北兵士无斗志，王、张二人意见不和，既不可能强留，即留亦不能力战。如我们坚持占领第二线阵地，第一一二师将弃长城而撤退，反不如以二十五师接防古北口将军楼第一线阵地，让第一一二师占领古北口以西、河西镇以北长城及八道楼子之阵地，使双方阵地正面缩短，互有依托；而第一一二师不担任正面，尚可能多留几天。因之向关建议，可以照王以哲的意见，接替古北口长城一一二师防务，但一一二师必须担任河西镇及

八道楼子防务，与二十五师协同作战。当时关以杜未支持他的意见，内心非常不满。他坚决不同意接替长城第一线阵地，仍与王相争不已。王见二十五师先头部队已到达古北口遂令一一二师守长城第一线，令第二十五师占领古北口南城东西两侧高地，并向两侧高地延伸，布置第二道防线。王下令后，即匆匆退去，第一一二师亦同时退出古北口，仅留一团步兵在长城第一线阵地。

10日上午6时，二十五师七十三旅已占领古北口，南城东西两侧高地及龙儿峪阵地（即第一一二师右翼之第一线阵地），并加紧构筑防御工事。该旅的一四五团在右地区，一四六团（欠一营）在左地区，并以一四五团的一营在右翼第一线占领龙儿峪阵地。一四六团的一营为旅预备队。七十五旅集结于黄道甸附近，师部及直属部队位置于古北口之关帝庙。

三、战斗经过概要

古北口之战

3月10日午前7时30分，七十三旅甫署完毕，敌机1架即来古北口上空盘旋侦察，约1小时后投弹而去。午前9时，敌机5架又来盘旋轰炸。以后每小时1队敌机，往返轮流轰炸，竟日未稍停止。我军既无对空作战的有效武器，又无对空作战的经验。古北口长城一带高地都是坚硬的岩石秃山，构筑工事及掩蔽都极为不易，在潮河支流上游有少数树木，亦为敌人投弹目标。因此，在敌机低空更番轰炸之下，我军未战之前已有相当的伤亡。这可是日军侵略我东北以来惯用的战法，企图以飞机轰炸吓退我抗日军民。日寇见我军被轰炸后屹然未动，遂于午后3时以炮兵掩护步兵向我二十五师最右翼龙儿峪阵地及一一二师右翼将军楼阵地开始攻击。敌人攻击阵面虽广，但并未实行强攻，很显然，这种攻击是威力搜索的性质，作明日实行总攻击的准备。根据当时的情况判断，敌人可能从我最右翼的龙儿峪阵地进攻、企图突破我军一翼后，沿潮河支

流大道包围古北口守军的后路。关麟征和杜聿明决定即将七十三旅一四五团的主力，增加到龙儿峪方面，左翼与一一二师的将军楼连接，右翼延伸至龙儿峪以东500米高地之线；并调七十五旅(欠一五〇团)集结于古北口东关相机策应。另派七十五旅一四九团的一营，于通司马台大道警戒我军的侧背。午后6时，敌以威力侦察的目的已达，退回原线。我军乘夜间调整作战部署，准备迎接明日的激战。

11日拂晓，敌即开始总攻，以飞机及炮火掩护其主力向我龙儿峪及将军楼阵地攻击。至10时许，将军楼我一一二师阵地被敌突破。当时守古北口正面的一一二师部队，既不支援将军楼的战斗，亦不固守古北口正面，仅于河西镇留步兵一团收容该师退却，古北口守军亦自动撤退。敌人占领古北口关口后，即乘胜以主力向我二十五师右翼龙儿峪阵地包围攻击。我守该地的一四五团，受敌两翼包围，伤亡惨重；而占领将军楼之敌以猛烈的步炮火力封锁潮河支流上的交通，该团与旅部的交通电话，均被截断。同时古北口南城的战斗亦很激烈。当时关麟征决定要杜聿明指挥古北口南城正面的战斗，他亲率特务连赴右翼前线，指挥七十五旅主力，拟恢复将军楼阵地以支援左翼一四五团的战斗。出古北口东关不远，即与敌人的战斗前哨发生遭遇。关麟征亲率一四九团拟强占潮河支流北岸(干沟)高地，走到山腰，即遭敌人的潜伏侦探狙击。双方短兵相接。关虽首先被手榴弹击伤，仍继续指挥一四九团与敌搏斗。双方相继增援，战斗极为惨烈。我军终于将敌人击退，占领高地，并与一四五团取得联系。是役一四九团团长王润波阵亡。据关麟征说，在他身边的士兵由于不会使用手榴弹，未拉引线即行掷出，结果并不爆炸，否则他是不会受伤的。他认为这是一次惨痛的教训，所以后来他要求二十五师士兵，每人都要投几个手榴弹才算及格。

关麟征受伤后，即调七十三旅旅长杜聿明为副师长代理师长职务，一四六团团长梁恺调为七十三旅旅长，继续作战。午后6时

许，河西镇一一二师的一团又擅自撤退，二十五师即派七十五旅的一五〇团推进至河西镇占领阵地，以巩固我军左翼，同时以骑兵连由北甸子经汤河向敌后迂回，以威胁敌之左侧背。激战竟日，二十五师仍保持原阵地。

11日晚，杜聿明与七十五旅旅长张耀明综合研究当时情况，认为敌我兵力悬殊，二十五师除在河西镇之一五〇团伤亡较小外，其余均伤亡惨重，目前第一线又与敌人胶着，欲抽调兵力缩短战线，势不可能；倘明日敌增兵从我任何一翼迂回，或我某一阵地被突破时，均无兵力以挽回战局。为迟滞敌人前进，以待我后续部队到达计，决心以仅有的两连预备队及师部特务连，即晚在古北口以南高地及南天门一带占领预备阵地，在不得已时掩护师主力逐次转移到预备阵地，与敌作持久战斗。

12日拂晓，敌增加重炮及飞机向我全面攻击，主力指向一四五团，同时以大部兵力向我右翼延伸包围，战况较前两日更为激烈。官兵虽死伤相继，仍与敌顽抗，连续击退敌人3次攻击。在12时前后，仅有的电话总机及无线电报机均被敌机炸毁，前后方失去联络，消息不通。后援不继，前方部队各自为战。同时，向我右翼包围之敌有增无已。午后2时，敌已迂回到古北口东关附近，驻在关帝庙的司令部已被敌机关枪封锁，又无预备队以应付迂回之敌。此时，杜聿明与张耀明仓猝离开司令部，到古北口南高地的预备阵地指挥。预备阵地与各部队间的电话亦被炸毁，阵地已被敌人截为两段。午后3时左右，杜聿明在指挥所看到第一线部队，自右翼起且战且退，已逐渐崩溃，由古北口东关，沿潮河支流谷道中，渐有官兵溃散下来。不久，两旅阵地（除一五〇团河西镇阵地外）完全崩溃。沿潮河支流溃退的大部队，成为敌人瞰射轰炸的有利目标，因而伤亡更为惨重。七十三旅旅长梁恺负伤，各部队长对自己部队都失去掌握，未能按照预定计划转移阵地，河西镇的一五〇团仍在原阵地，与敌隔河对战。

在这里有一件事是值得补述的：一四五团派出的一个7人军事哨因远离主力，未及撤退。大部队崩溃后，该军事哨仍在继续抵抗，先后毙伤日士兵百余名。后来，日军用大炮飞机联合轰击，始将该哨歼灭。日军对这军事哨的英勇精神非常敬佩，曾把七具尸首埋葬起来，并题“支那七勇士之墓”。

12日午后6时左右，杜聿明转移到南天门时，看到溃退下来的部队混乱异常。此时南天门阵地上，除师特务连及少数部队占领阵地外，其余部队都失去掌握，甚至有少数零散官兵，一直向石匣、密云逃走。不久，张、梁两旅长先后到南天门，才派出参谋传令，分头收容各旅官兵，逐渐占领阵地与敌对峙。入夜，杜聿明为了缩短防线继续抵抗，乃重新调整部署，令七十五旅的一五〇团由河西镇撤退左南天门以至高地占领阵地，南天门以左地区归七十五旅守备，南天门以右地区归七十三旅守备。师指挥所设于南天门。

12日晚，第十七军军长徐庭瑶已到达密云，徐与杜通电话后，决定命令第二师星夜向南天门急进，接替二十五师防务。13日上午5时前后，第二师郑洞国旅(第四旅)已到南天门，未及休息即接替阵地；第二十五师交防后，撤回密云整补。

二十五师是1933年1月1日由第四师的独立旅扩编而成，2月下旬即匆匆北上抗日。该师除迫击炮外，山、野炮全无。是役仅以四个步兵团独挡优势之敌。既无坚固阵地可凭，友军又不协力抗战，加以官兵政治训练很差，虽有抗日爱国的热忱，而无对日作战的经验与技术，以故伤亡极重。计激战3昼夜，全师伤亡4000余人。但敌自侵入热河以来，又一次遇到顽强抵抗的中国军队，敌军伤亡不下2000人，不得不承认这一战役为“激战中之激战”。自3月13日至4月20日，将近40天中，敌人未敢轻于冒进。一方面固然在玩弄外交阴谋，另一方面对于下一战役不能不集中更大兵力，作更周密的进攻准备。

从这次战役，也可以看出，不同派系的军队在一道作战，是很

难团结互助的。关麟征要利用张廷枢作掩护，而张则在战况吃紧把自己的部队撤走，使关部吃很大的苦头，所谓“弄巧成拙”。即使同在一个派系内，也各有各的打算，如王以哲与张廷枢争吵是一例。同样的道理，蒋介石对于他的中央军也是不轻易给别人指挥的。最初他派杨杰担任古北口方面的第九军团总指挥，杨曾提出“后退配备的战略”，即打算在九松山(现在的密云水库附近)一带构成一个口袋阵地，诱敌深入，一举歼灭。这个计划与当时那种“节节抵抗，步步挨打”的战略相比，在积极性和主动性方面说，要高明得多。可是就敌我双方军队素质与装备的悬殊以及当时华北的具体情况来看，杨杰的战略是行不通的；更重要的是他的这种战略思想，与蒋介石“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方针是背道而驰的。所以何应钦对他大为不满，请求蒋介石赶快把他调走，由徐庭瑶兼代第九军团总指挥的职务。第九军团最初只指挥第十七军，后来萧之楚的二十六军(实际只有一个四十四师)也归该军团指挥。

南天门之战

古北口之战以后，日寇为了进一步对蒋介石施加压力，以达其逐步控制华北的阴谋，决定首先集中兵力击破蒋介石的中央军。自4月15日起，即将滦东兵力逐渐向古北口方面转移。除西義一第八师团外，又有坂本政右门第六师团主力，中村第三十三旅团(混成旅团，内有满蒙伪军及满韩联合军约6000人)，并附有强大的空军、炮兵、坦克等部队。

南天门之战，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4月21日至28日。

在战斗开始之前，4月16日敌机轰炸第二师师部驻地石匣镇，18日又轰炸十七军军部驻地密云县城。20日夜，南天门左翼制高点八道楼子(该处有8座碉楼，故名)突然失守。当时黄杰大为震惊，据说他将八道楼子失守的情况向徐庭瑶报告时，徐在电话中严责黄杰说：“你们怎样失守，你们就负责怎样收复。”有人开玩笑说：

"因赌博失守，难道也要用赌博来收复吗？"黄杰严令第六旅旅长罗奇反攻无效，又派第四旅旅长郑洞国率第八团并指挥第六旅的第十一团继续反攻。因为敌人居高临下，仰攻徒遭伤亡。决定于20日夜间把阵地变换到田庄小桃园之线。23日午前7时起，敌人利用8道楼子瞰射之利，以陆空军联合向南天门阵地的中央据点四二一高地猛烈攻击。进攻4次，均被击退。24日午前6时起，敌继续攻击，尤以午后的战况最为激烈，守该地的第十一团伤亡颇大。后派第七团前往增援，卒将敌击退。25日，敌继续以炮火向该地射击，终日未止。第二师苦战5昼夜，伤亡甚大，疲劳不堪。于25日夜间，由八十三师刘戡部接替南天门阵地的防守任务。26日拂晓，八十三师接防甫毕，敌复集中炮火向四二一高地猛攻，防御工事全被击毁；继以步兵猛扑，经该师四九七团顽强抵抗，激战至下午，团伤亡过大，终于放弃了这一重要据点。28日上午5时，敌集中火力向我猛冲，同时以坦克车掩护骑兵向我左右翼威胁。八十三师四九七团及补充团的一营，与敌激战竟日，营长3人均负重伤，阵地工事完全被敌毁坏。于是，变换阵地，占领南天门以南600公尺的预备阵地。八昼夜的血战，敌人伤亡之大，为"九·一八"以来所少有。而战线仍胶着在南天门附近，殊出敌预期之外。当时何应钦曾当面告诉各师长，在南天门至少要打2星期，才能维持政府在国际上的"面子"。实际上他是要争取2个星期的时间，以便向日寇进行"让步"的交涉。

第二阶段：5月10日至14日。

4月29日以后，敌虽停止大规模进攻，每日仍以炮火向我阵地零星射击，时常以小部队向我袭击。

5月10日，敌步兵500余人，在炮火掩护下，向我东头峪阵地进攻，被八十三师四九三团击退。11日凌晨1时，敌三十一、三十二两步兵联队约5000人，向我稻黄店涌泉庄及其以南高地用密集队形夜袭，战斗非常激烈。八十三师的四九三团及补充团损失极

大。午前5时，敌坦克车6辆冲至上店子，威胁我军侧背。午前7时敌机8架在我阵地上空往复轰炸，协同敌步炮兵攻击，形成混战状态。午前8时，敌炮70余门协同步骑联合兵2000余人，攻我左翼笔架山阵地。四九四团竭力抵御，激战至午，团长魏巍受重伤，中校团附汪兴稼阵亡，士兵伤达2/3。由于该师伤亡巨大，全线崩溃，不得已撤至后方5里的预备阵地，复以第二师接替八十三师的战斗任务。

八十三师师长刘戡以该师一昼夜遭到惨重损失，被迫撤离阵地，感到非常悲愤，曾企图拔手枪自杀，被参谋处长符昭骞、作战科长吴宗泰二人抢夺了手枪，自杀没有实现。

11日午后，敌乘第二师郑洞国旅占领阵地未完毕之际，复向我磨石山、大小新开岭、香水峪一带阵地大举进攻，并以坦克10余辆冲至白河涧附近，截击我后方的交通。继又增加兵力，乘夜猛攻我小新开岭左翼四〇五高地。12日，敌复增加兵力，全线进攻。第二师各团伤亡惨重。遂撤至后方7里的新阵地。此时二十五师覃异之团（一四九团）尚在西北岭及下会之线与敌激战，支持至13日，始撤至后方6里的新阵地。

12日下午3时，敌攻占我大小新开岭一带阵地后，乘胜向石匣镇攻击。第二师在遥亭南香水峪之线与敌激战。激战至13日午，全线崩溃。徐庭瑶令守潮河右岸的第二十五师抽出一个旅向左翼延伸，占领后方8里之新阵地，掩护第二师撤至黄土坎不老屯之线。13日午后1时，第二十五师七十三旅向左翼移动（该师七十五旅仍在城子村小漕村原阵地与敌激战），七十三旅一四六团未及占领阵地，即遭到优势之敌攻击。此时，敌战车已越过石匣镇3里许，冲至我山安口附近阵地。午后4时，敌炮兵向石匣镇集中射击，掩护其步兵前进，石匣遂陷敌手。连日以来，十七军各师死伤又达4000余人，如不补充，实不能再作有力之抵抗，随即奉令以二十六军于14日夜进入九松山预备阵地。十七军除二十五师一部担任石

铁峪五坐楼之线警戒任务外，其余调密云整理补充。15日，各师开始移动，17日，复奉命调回怀柔、顺义之线。八十三师奉命担任北平城防。

四．何应钦同刘戡的一场争吵

长城古北口抗日之战，前后2个多月，敌人在军事上击破蒋介石的中央军之目的已达，政治上控制平、津的阴谋正逐步实现。我们从何应钦与刘戡的一场争吵中，可以看出当时恐日投降派的嘴脸。

刘戡部八十三师由南天门撤下来之后，不久即调到北平担任城防。此时军政部调来2个工兵营归刘指挥，构筑北平的城防工事。刘派参谋处长符昭骞负责指挥构筑工事任务。日本的一个宪兵连要求看中国军队新构筑的防御工事，刘戡坚决反对，并且表示如果日军一定要看，他就下命令对日本人开枪。为了此事，刘戡和符昭骞一道去见何应钦。何对刘说："工事一定要构筑，日本军人要看就让他们看，绝对不许打。"刘说："我绝不让日本人看我们的工事，倘若他一定要看，那我只有以死来拼。"何说："你为什么不在古北口死，要到北平来死？"刘愤慨地把桌子一拍说："我到北平来是奉你的命令来的，我并不是怕死，我坚决反对这种汉奸的作法！"桌上的茶杯也打翻了。茶水洒了一地。何应钦没有办法，只好说："假使你是军分会的代委员长，我是师长，我以这种态度来对待你，你作何感想？"刘没说话便走了。何把符留下来，并对符说："要抗战，首先要军队服从命令，目前华北的情形就不是这样。命令要宋哲元的部队集中通县，他们却到廊坊去。要傅作义部队集中高丽营，他们却到长辛店去。像这种情况，如何谈得上抗战。所以我甘冒天下之大不韪，与日本人谈判停战。"其实他在"一面抗战，一面交涉"的方针下，早就和日本人进行不惜丧权辱国的交涉了。

（密云县档案馆供稿）

《塘沽协定》亲历记

张熙光

1933年3月，日军攻占热河后，随即大举进攻长城各口。在此据守的中国军队抵抗不支，战事已接近平津。坐镇北平的国民党军政大员纷纷南下，人心惶惶，平津岌岌可危。国民党政府面对日军侵略，不谋如何团结军民进行抗战，却准备以外交途径平息战事，以求苟安。遂起用亲日派黄郛，授以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委员长，与日方进行交涉，其目的是与日方达成停战协议。

黄郛北上途经天津时，曾有记者问他如何应付这个局面，黄答："明知华北局势严重，不易解决，是个火坑，但谬承中央委托，我不跳火坑谁跳火坑？"慷慨激昂，大有舍我其谁之意。5月17日，黄抵平后，立即组成了早已事先安排好的谈判代表团。我记得团长是熊斌，成员有陶尚铭、殷汝耕、苏玉琪、钱宗泽、徐祖贻、张熙光等。代表团中除钱宗泽（平山路局长）、徐祖贻（北平军分会参议）和我外，其余都是黄郛带来的，他们都是日本通。当时，我任第五十一军上校参谋处长。日军侵略华北，河北省首当其冲，而谈判地点塘沽又是河北省辖区，谈判事宜固属黄郛包办，但也必须有河北省政府代表参加。那时河北省政府没有军事机构，省主席于学忠（兼第五十一军军长）在征得北平军分会和政委会同意后，派我以河北省政府代表身份参加这个代表团。

代表团出发前，代表们得知日方代表团长是冈村宁次，都喜形于色。他们认为冈村比较温和。谈判期间，中方代表团驻在塘沽车站列车上，日方代表团驻在塘沽日本驻屯军的兵营里，会场设在日本兵营内。谈判的主要内容是：停战后日军停止在既达地带，我军

须退至遵化、兴隆、迁安、卢龙等以南地区，以避免冲突。两军中间地区为"真空地带"，此区的治安如何维持，等以后再协商解决，我方沿海地区的军事设施即行拆毁等等。这些提案统由日方提出，中方改动 3 处个别词句，没有变动实质内容，然后就草草签署了。在谈判期间，日方以战胜者姿态出现，处处占着主动。在会场内，日方新闻记者有摄影、记录的权利，而中国记者却不能入内。我曾将每日议程详抄转送河北省政府，省政府再转给各报社刊登。对此，日方曾一度提出抗议，谓未经双方同意即在报端发表，是泄露秘密，有碍协商的进行。如由此发生不利协商的后果应由中方负责。而实际上日本报纸在此之前就已经登载了。尤其令人气愤的是，在中方代表团提出要修改一些词句时，日方代表团长冈村宁次竟不以为然，并狂妄地说："你们不必在这些文字上计较，这次是皇军想和你们谈判。如果不想谈判，我们可以一直打到北平去，你们明白吗？"这场面使我们很尴尬，简直无地自容。中方代表之所以蒙受耻辱面默不作声，主要原因是怕把关系弄僵，回去无法复命。

现在看来，塘沽协定纯粹是城下之盟，是丧权辱国的丑剧。而当时黄郛却说这次谈判很成功，认为从此以后华北局势就可以稳定了。因此，代表团回平后，他曾大加款待，末了，还送每个成员一笔"犒赏费"，我记得给了我 500 元。

回忆我任伪蒙古军总司令

李守信

1936 年 5 月 12 日，嘉卜寺伪“蒙古军政府”成立后，当时德王任伪“蒙古军”总司令兼第二军军长，我任副总司令兼第一军军长。

伪“蒙古军”第一军，是由我的“察东警备军”改编而成。它来源于驻防热河的“毅军”旧部、围场县的民团和朝阳一带的胡匪以及土默特左旗与科尔沁部的马贼。除了我是蒙古人外，官兵中还有百分之十左右的蒙古人，基本上是以汉人为基干的。编为刘继广（山东人）的第一师，尹宝山（林西人）的第二师，王振华（辽宁人）的第三师，人们统称为“蒙古军”的“汉师”。因德王的第二军搭不起架子来，就向关东军请求，由伪满统治的蒙旗给补充兵员。可是，日本人恐怕蒙古人团结起来，他们不好驾驭，并且有意让我同德王发生矛盾，不使我们和衷共济，特从我的家乡卓索图盟和我长期驻防的昭乌达盟，借来 6000 多人马，派德王的警卫团长宝贵廷前去接兵，于 7 月间带到嘉卜寺附近。这 6000 多人，大都是土默特左、右两旗的蒙古人和朝阳、阜新两个县的汉人。蒙古人比汉人超过 2 倍，军官多数是蒙古人。这批人就编成四、五、六师，后来也编入第一军，人们统称为“蒙古军”的“蒙师”。

我的 3 个“汉师”和 3 个“蒙师”，都是胡匪的“合杆”（合伙）性质。在热河人的大团体中，有好多各自独立的小团体。按照“合杆”规矩，宝贵廷当了第四师师长。宝贵廷在伪蒙时期，一直在德王和我之间来回摇摆。他是住过新式学校的蒙古上层，我始终不把他按嫡系对待。

从热河来的 6000 人，土默特左旗的是由该旗的统领伊恒额率

领；土默特右旗的是由该旗王爷沁巴乌尔济的四哥宝音乌勒吉（七星台庙的活佛，人称“四佛爷”）率领。热河各盟旗以土默特部的蒙古人口最多。所以，这 6000 人当中，土默特部的蒙古人、左旗设治的阜新、右旗设治的朝阳的汉人，占 5000 多人。伊恒额跟我结拜，宝音乌勒吉和我是同乡。所以，我把土默特（左）旗的蒙古人和阜新县的汉人编为第五师；土默特（右）旗的蒙古人和朝阳县的汉人编为第六师，由伊恒额和宝音乌勒吉分别任师长。将土默特左旗的蒙古人田英和朝阳汉人李鸣运充任了五、六两师的副师长。田英出身于马贼，参加过哲布尊丹巴的“蒙匪”；李鸣运出身于胡匪，后来参加过“毅军”，和我是多年的老朋友、老同事。这次前来投我，都带着自已的“杆子”。于是，五、六两师很自然地就成了我的羽翼。他们都服从我，而不听德王指挥。在 1936 年秋天，日本关东军派板垣前来检阅前，3 个“汉师”在张北附近驻防；3 个“蒙师”在嘉卜寺附近驻防。以后，我和德王因争权发生了冲突，日本在张北给我另外组织了一个“蒙古军”张北行营司令部，我就把五、六两师和一、二、三师集中在一起，留下宝贵廷的第四师，担任嘉卜寺的城防，以保护由我的人组成的总司令部，并表示我和德王没有完全决裂。“七七”事变后，傅作义派石玉山攻占嘉卜寺时，宝贵廷没有跟德王逃往多伦，也把队伍带到张北附近。

“蒙古军”中真正的“蒙师”，是德王跑到多伦以后成立的七、八、九师和警卫师。这时，德王“蒙政会”时的保安总队，已于年前在百灵庙被傅作义打垮了，他是以自已的警卫团改称为警卫师，由锡盟阿巴嘎旗王爷雄诺敦都布为师长；以察哈尔部的东四旗和四个群（相当于行政区划的旗）的兵编为第七师，由镶黄旗总管穆克登宝为师长；以从科尔沁旗一带招募的兵和从锡盟各旗征的兵，编成包悦卿和包海明的第八师和第九师。二包都是“东蒙”的知识分子。包悦卿曾任绥境“蒙政会”财经委员会主任委员；包海明是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的学生。所以，这 2 个“蒙师”和我的那 3 个“蒙师”有显

著的区别:它们是蒙古上层把牧民、奴隶组织起来的军队,里边很少有"小队"和马贼出身的人。至于第七师的察哈尔部官兵,差不多都会说汉语。有的军官、老兵并且参加过哲布尊丹巴的"蒙匪"和当过马贼。特别是那个警卫师,是我利用热河的蒙古人先给德王组成的警卫团,里边几乎全是马贼。因此,后来由警卫师缩小为伪蒙政府的卫队时,德王把老兵拨给八、九两师,另招了西苏尼特旗的新兵,这四个所谓"蒙古师",没有一个是德王所理想的蒙古军队。锡盟、察哈尔部里的兵,都掺着汉人。

1937 年 9 月,"蒙古军"配合日军进犯绥远以前,我同德王由于形势所迫又言归于好,不过仍是各带各的兵。我带的 3 个"汉师",因第二师长尹宝山,在商都作战和协同东条英机攻占张家口时不听指挥,并且把收抚刘桂堂的井得泉团逼到马占山那里,所以被日本最高顾问田中玖撤了职,调充了伪德化市的副市长,由该师团长陈景春升任师长。陈和另一个团长朱恩武,都是热河围场县的大地主。围场的土匪很多,地主武装力量相当雄厚。像"东北军"里边的荣三点、白凤翔,便是围场的胡匪头子。跟"国民军"有关系的姚景川,便是围场地主武装的首领。我的第二师原先有两个围场人,陈景春升任师长后,他一方面领上队伍向绥远出发,一方面打发人回家招兵。到了归绥不久,便把井得泉带走的缺额补齐,这个师越发成了由围场民团组成的团体了。我带的 3 个"蒙师",在进犯绥远前,也有变动。第六师师长换了德王"乌滂守备队"干部训练班培养出来的青年军官乌云飞(卓盟喀喇沁左旗人)。因为原来的师长宝音乌勒吉是个活佛,他参加"蒙古军"是想过官瘾,恐怕上火线枪炮打死。听说队伍到商都解尹宝山第二师之围,便装病向我请了长假,。我为了表示和德王重新合作,便叫他的学生乌云飞担任了师长。实际上是由副师长掌握一切,乌云飞和宝音乌勒吉都是有职无权的傀儡。

德王的 4 个师在进犯绥远前,由伪满的"兴安军"给介绍扎青

扎布来担任第八师师长。扎青扎布的父亲人称戴扎兰(戴是汉姓，扎兰是官衔)和我是磕头弟兄。他从多伦来张北见我，便以此种关系跟我表示近乎。所以，德王虽然号称有 4 个师，除了扎青扎布倾向我，和包海明又极端亲日，他只能把握住穆克登宝的第七师，他连警卫师也难掌握住。因为德王成立警卫团时，我用"偷兵"办法，从伪满"兴安军"中叫出五六百旧部，只要我说一句话，仍能把编到"警卫师"的马贼，叫到我的第一军里边。德王所谓的 4 个"蒙师"，合在一起，也不如我的一个"汉师"人多。我是以 8000 多人分编为 3 个师和 1 个炮兵大队，每个师的人数都在 2000 人以上，而德王的每个师平均才五六百人。并且我把日本人先后给我拨到的 11000 多枝新枪，都装备了自己的 3 个"汉师"和 3 个"蒙师"，四五十门野炮和山炮，也完全掌握在我的炮兵大队长丁其昌手中。德王的四个师，有一半是旧枪，自动武器很少，更无重武器。从装备上看是不能和我相比的。

从占领绥包远后，穆克登宝的人马便所剩无几，遂把第七师的番号给了正黄旗的保安队，由该旗总管达密凌苏龙担任了师长。此人胡须很长，编着一个辫子挂在耳朵上边，非常老奸巨猾。提起这位"长胡子"在东五县家喻户晓，能号召起这一带的民团、土匪。原来他在政治上反对德王而倾向傅作义。绥包沦陷前夕，就是他给他的义子石玉山补充 500 多匹战马，壮大了石的"骑四师"，把嘉卜寺的伪"蒙古军政府"捣毁。绥包沦陷后，他投敌了，还是不听德王的话，自此德王在"蒙古军"中，越发没有可以依靠的力量了。加之日本人不让德王独揽军政大权，所以"蒙古联盟自治政府"成立后，德王担任了政务院总裁，由我担任了"蒙古军"总司令。由乌古廷任参谋长，再没有安插副总司令。这时补英达赖任了"巴彦塔拉盟"的盟长，卓特巴扎布并以"察哈尔盟"盟长兼了张家口"蒙疆联合委员会"的总务委员。

伪"蒙古军"初到绥远的时候，总司令部设在包头。准备由包头

再往西进犯，去占领后套和阿拉善旗与额济纳旗，对伊盟形成三面包围以后，再去占领鄂尔多斯部（伊克昭盟）七旗。因为日军恐怕战线拉得过长，决定了以包头为前进的终点。于是，我们由进攻变成了防御，遂把总司令部移到归绥旧城。同时，归绥成了伪蒙的“首都”，也有必要让总司令部和政府驻到一个地方。至于各师驻防的情况，刘继广的第一师驻在包头，陈景春的第二师驻在归绥，王振华的第三师驻在集宁，宝贵廷的第四师驻于包头黄河对岸的达拉特旗大树湾，伊恒额的第五师驻于四子王旗，乌云飞的第六师驻于张北的公会一带，达密凌苏龙的第七师在正黄旗原地不动，扎青扎布的第八师驻于武川西部的乌兰不浪一带，包海明的第九师驻于百灵庙。德王在多伦由警卫团改称的警卫师，到了归绥改为伪蒙政府的卫队，驻在归绥新城保护机关、仓库，已不列入“蒙古军”的序列。以后总司令部和第一集团始终没有离开绥包两地。

我任“蒙古军”总司令的初期，也就是1937年10月到1938年底这一阶段，一共拥有1万2千骑兵和两千炮兵的主力，加上七、八、九3个师，可以指挥调动1.8万多人。所以这一阶段，是“蒙古军”的全盛时期，也是我的黄金时代。却也因此而使日本感到不安，并引起德王的嫉妒，都想削我的兵权，于是向我施展偷梁换柱和抽筋剥皮的手段。在“汉师”方面，我进入包头以后，为了迅速恢复地方秩序，便让驻防包头的第一师师长刘继广充任了伪包头市的市长（日本人和德王都知道我的第一师，是由“毅军”的底子给打的基础。纪律和战斗力比其它的师要好、较强。所以先从我的第一师下手），脱离军队去当文官，使我失去一员战将。我不得不派炮兵大队长丁其昌去担任第一师师长。丁其昌担任师长到1939年秋天。这年9月1日，伪“蒙疆联合自治政府”成立时，即把丁调为治安部长，同时把刘继广调升为伪政府的最高检察厅厅长，都由包头弄到张家口，和第一师完全隔离。把丁其昌调为治安部长，还为以后把3个“汉师”改编为“治安警备队”做了借口。因为我手下的人才很

少，选不出率领这个基干师的将领，遂由该师行伍出身的团长郭秀珠升充了第一师的师长。

第二师和第三师驻到归绥、集宁附近以后，一天比一天腐化堕落。二师师长陈景春是围场县的大地主，在率领民团参加崔兴武的"东北军"十七旅以前，曾参加过宋哲元的"国民军"，故社会关系和头脑里的思想比一般行伍和胡匪出身的军官复杂。他在归绥驻防期间，除了贩运烟土致富，还想在政治上另找出路。故和抗战部队派过来的人乱拉关系，特别是和驻在后套的国民党军委会热河特派员姚景川（围场人）来往非常频繁。他怕事情暴露以后，身家性命难保，便在 1939 年脱离了军队，给德王担任了伪蒙政府参议府的参议，由团长朱恩武升任了师长。第三师大都是收编的胡匪，我为了使这个师走向正规，在察北开始组织时，即让曾给崔兴武任过参谋主任的"东北讲武堂"毕业的王振华担任师长。王在 1938 年夏天傅作义反攻归绥时，因团长慕新亚投降马占山而被撤，我又调总司令部的副参谋长刘星寒去接充第三师的师长。刘是我的朋友刘子布（曾给常万里和石文华当过营长）的儿子，又是第六师副师长李鸣远的女婿，并且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我是用他来顶替乌古廷的。由于刘不像乌古廷那样巴结日本顾问，担任师长不久便以暗通抗战部队的嫌疑，被张家口日本"驻蒙军"军部撤职，调到归绥的一个日本"株式会社"中领取干薪，后来他出走到重庆投奔国民党蒙藏委员会的乐景涛（克什克腾旗蒙古人，和刘子布是朋友）没有找到适当工作，北返到陕北府谷哈拉寨，参加了马占山的"东北挺进军"。我因再派不出人去充任第三师师长，即使把人派去也要被日本人顶回去，遂把该师胡匪出身的团长宋鹏九，提升成第三师的师长。所以 3 个"汉师"在 1940 年夏天改编伪"治安警备队"以前，师长全换成了新人，各团也不是原先的那班人马了。

日军从伪"蒙古军"四、五、六 3 个师抽兵的借口，是伪满要人充实"兴安军"，预防苏联进攻热河，时间是在 1938 年年底。这时武

汉沦陷，抗战的形势正处于低潮阶段。并且德王也有心拆我的台，所以他不表示强硬态度，我只好把士兵交出，于是我的三个蒙师马上成了空壳。德王想把这3个师的番号操到自己的手中，由锡盟和察哈尔部征兵补充缺额。先给了宝贵廷五六百人，但迟迟不给五师和六师补兵。五师师长伊恒额和六师副师长李鸣远，对于前途感到悲观失望，都向我递上坚决不干的辞呈。德王借此叫乌古廷举荐韩凤楼（被蒋介石宪兵第三团在北平暗杀的百灵庙"蒙政会"保安总队长韩凤林的哥哥）为第五师的师长，第六师也被乌云飞完全抓起。由于宝贵廷对我并不忠实，我已没有了可靠的"蒙师"。伪"蒙古军"在进入归绥不久，便成立起军官学校，由原伪满"兴安军"的脑门达赖（汉名高庆春，1936年即从伪满到了西苏尼特旗，任伪"蒙古军"上校）担任校长。后来德王要叫他的人抓军官学校这个教育机关，于是乌云飞和脑门达赖对调，乌云飞担任了军官学校校长，脑门达赖担任了第六师师长。四、五、六师被德王操起来之后，每师只给补充了五六百新兵。宝贵廷的第四师在大树湾驻防和黄河南岸的国民党军队经常接触，伤亡、逃跑所剩无几，在1940年春天"五原战役"以后，即和第六师合并，宝本人调回总司令部担任了教育部部长。此外的那三个蒙师，除达密凌苏龙的第七师一直没有变动，第八师在武川被八路军和傅作义的游击部队打垮，扎青扎布阵亡以后，和包海明的第九师合并。包继乌云飞担任了军官学校校长，调总司令部参谋处处长乌力吉敖喜尔充任师长，乌云飞离开军队充任了伪蒙政府参议府的参议。这样，伪"蒙古军"的6个"蒙师"从1940年开始就把四师和八师的番号取消了，只是七师的人数不减，其余3个师合计不足2千人，成了布置在大青山后的边防军了。

3个"汉师"改编为"治安警备队"，在1939年9月1日成立了伪"蒙疆联合自治政府"，把第一师师长丁其昌调为治安部长时，即已内定，不过当时没有人公布。到1940年夏天"五原战役"结束之

后，张家口的日本“驻蒙军”军部才给我下达了这一命令，把3个师改为3个集团，团改为大队，连改为中队，排改为小队。为了改编工作顺利进行，由原来的每师3个团，改为1个集团下辖4个大队，将师的直属部队完全取消，共是12个大队。集团长的手中没有了兵。第一师师长郭秀珠不愿扔枪，屈就了大队长。把第一集团长的空地位，让给了总司令部的参谋处长郭光举。这3个集团中的第一集团和第二集团分驻在绥远各县，集团部仍分设在包头和归绥。第三集团开到察南，集团部设在怀来，都被化整为零。“治安警备队”名义上受治安部长丁其昌指挥，实际上由驻在地的日本部队或特务机关操纵，成了各自为政的12个小单位。因此，军官尽吃空额，把原先3个师的6000多人，变成每一个大队只有300多人。日军和德王把我的“蒙师”的兵抽走，等于去了我的左胳臂，将我的“汉师”整个编走，等于去了我的右胳臂，所以这两件事完成以后，紧接着就改组我的总司令部。结果负责的汉人全被挤出，炮兵大队也被张启祥操起，给我只扔下一个警卫连。郭光举就是因为在各处之上增设了管理各处的参谋、教育和总务三部，参谋处长之上有参谋长和参谋部长，他才下了部队。他担任了“治安警备队”的第一集团长，遗缺补了乌力吉敖喜尔。乌力吉敖喜尔出任第九师师长。这是在1942年到1943年这一阶段的简要情况。

从1940年“五原战役”后，到1945年日本投降前，“蒙古军”有名无实了。并且我除了在暗中掌握“治安警备队”，已把“蒙古军”的事，让日本顾问和参谋长乌古廷去折腾。可是日本人对我仍不放心，对乌古廷也有所怀疑。在德国快要垮台、太平洋战场日军节节失利的1945年春天，先把乌古廷撤职，调宝贵廷为参谋长；后将我由归绥叫到张家口，将我跟绥远的部队隔离开来。在此期间，突然让“治安警备队”归还“蒙古军”建制，把3个集团编成6个“汉师”，加上4个“蒙师”，以及一个姓白的汉人和伪萨拉齐县长某纠合起的两部分人，共凑成12个师。“汉师”是按一、二、三、四、五、六排

列，“蒙师”的七、九两个师未动，因为“治安警备队”已由3个集团很快改成了6个师，姓白的汉人和伪萨拉齐县长的队伍还未编制就绪，日本就宣告投降。

日本投降后，苏联和蒙古人民共和国出兵解放察北，八路军把张家口、大同至归绥之间的铁路切断，傅作义也从后套跑了出来，于是“蒙古军”的10个师没有集中到一起。“蒙师”里边除了第九师由乌力吉敖喜尔率领，参加了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军队，韩凤楼、脑门达赖和达密凌苏龙所带的3个师，完全被苏军和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军队缴械。“汉师”驻在绥远的3个师，都被宝贵廷抓起，连同张启祥的炮兵大队以“新十路军”的名义归降了傅作义的“十二战区”。大炮让傅作义的4个军瓜分了。骑兵最后缩编成了一个旅，由安恩达率领，跟上董其武起义了。驻在察哈尔的3个师，因刘继广离开部队多年，郭秀珠回包头探家，全倾向了宋鹏九。宋掩护着马汉三的一部电台，把我派去协助他的丁其昌顶回，指望国民党另给他编制队伍。“十一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叫他先在解放区扰乱，以致马匹大部饿死，士兵大部逃跑。结果，3个师只剩下180多骑兵和300多步兵。听见我带上刘继广和郭秀珠出关给蒋介石组织“东北民众自卫军”，他在南口附近无法存留，便跑到热河开鲁找我，我给他编了一个师。开鲁解放时，我只身脱逃。刘继广因未去开鲁，其余都被八路军俘虏。“蒙古军”可以说是从热河开鲁起家，最后还在热河开鲁完全覆灭。它祸害了察、绥两省，连前带后共计十五六年。

我任伪第五军管区
中将司令官的回忆

赫慕侠

1943 年 8 月间，伪军事部大臣通知我，叫我当第五军管区司令官。我明知道热河是个麻烦地区，但又不能不来。

自“九·一八”事变后，东三省相继沦亡。日寇于 1933 年派服部旅团长和伪军张海鹏部（在张学良将军统治东北时期，张任洮辽镇守使）以及伪安东地区警备司令兼第一旅长李寿山及其副司令张宗援等（李张两人都与军阀张宗昌有关系），与敌伪伙同进占热河。热河都统汤玉麟溃败逃至天津。

敌伪占领热河后，张海鹏就留热河，当伪第一任第五警备司令官，后改第五军管区司令官。其次继任的是：王静修、邢士廉、吕衡、吴元敏，最后是我，日寇顾问根东大佐。

关于伪第五军管区司令部的各处人员姓名仅能记忆的分述如下：

伪参谋长日寇林少将。在抗战胜利不久前，被调充蒙古军第二骑兵师长，其后任为伪少将栾彪。

伪高级参谋日寇南清一。此外大崎中校，赵国祺中校（溥仪妹夫），其次苏畹天少校等都是参谋。

伪高级副官猿渡中校，管人事的副官马场少校。

伪军需处长上校李盛林，日寇增田中校。

伪军医处长日寇某。

伪兽医处长日寇某。

伪军械处长上校李甲辰，李调充团长后，换日寇某。

军法处长日寇某。

无线电台长日寇某。

伪第五军管区直属4个旅：

伪第五旅长戴元少将。

伪第八旅长于泽浦少将。

伪第二十五旅长陈明山少将。

伪第三十三旅长曹瑞徵少将。

热河省属于日伪的西南防卫地区。我初到热河时，日伪的西南地区防卫司令官，是一个少将旅团长。后来调换一个中将师团长，驻承德离宫内。热河毗连长城线，八路军经常向热河境内进攻，因此，敌伪划分战斗地区及集中兵力防守。

青龙、兴隆、赤峰，归日寇守备地区。

滦平、丰宁，归伪第五军管区守备地区。

滦平地区属于第八旅的防地。旅部驻滦平。其左翼由白马关起至右翼大水峪止，属于第三十四团的防地。接连第三十四团防地起，其右翼至千户村属于第三十五团的防地。

丰宁地区属于第五旅的防地。旅部驻丰宁。其左翼由丰宁起，属于第七团的防地。其右翼至白草地，属于伪第一团的防地。

伪第八旅与伪第五旅防地，在长城线上，属于第一线。

平泉地区，属于伪第二十五旅防地。伪旅部同第十二团驻平泉。伪第三十三团驻承德。

赤峰地区，属于伪第三十三旅防地。伪旅部同第三十三团长冯玉绅和李甲辰团长均驻赤峰。

伪第二十五旅与伪第三十三旅属于第二线，八路军如突破第一线进入热境，则第二线的部队，立即增援。

伪第五军管区司令部驻承德，居中联络，指挥伪军各部。

伪军驻防地区，毗连长城，为八路军攻击重点。因此，在青纱帐

起时，深沟高垒防守。在秋冬季节，出动"扫荡"。但历年受到袭击，损失颇大。仅举几个战例，用以说明事实。

八路军截击伪军战例

1943年冬，驻千户村的伪军第三十五团长王景南率领该团主力，向八路军根据地"扫荡"。在行军中，后卫赵营长以下四五十名伪军被八路军截击。因当天下雪风大，前卫和本队，还没有听到枪声，赵营长等就被俘虏。士兵被释放，把赵营长带走。因赵营长在平日作恶多端，民愤极大，因此被镇压。

八路军伏击伪军战例

黑龙江伪第三军管区，派来增援部队第四旅长王家善所属第四十团，驻青龙地区。在1943年冬，因途中被伏击，该团的武器、弹药，被服粮秣等，被八路军掠获，兵舍被焚烧。日寇顾问说王家善通八路军。不然，为什么遭到这样的损失？其实，该团因为移防的关系，向老百姓要车拉东西。这个情报被八路军获得，所以在道路两侧，埋伏兵力，等到伪军车辆通过其间，伏兵四起，就被掳获。

1945年8月上旬，伪第五旅所属的步兵第七团第一营长日军太田少校，率领该营主力，进至赤城附近，掩护秋收，自营长以下，被八路军包围伏击。该营长生死不明。他的老婆抱着他的灵牌回到承德。

日寇与伪军协同袭击八路军战例

1944年夏季，伪第五军管区日寇顾问根东大佐对我说，驻北平的防卫军要求伪军派出一部兵力，协同日军袭击长城内八路军根据地（地名记不住了）。我同意了，并派千户村的伪军第三十五团长王景南带领该团一部兵力参与袭击。王景南回来说，他们为了不暴露企图，利用夜间行军。将接近根据地时，抛开大路前进。在拂晓时，到达目的地。后被练兵场上的八路军发现，但没有抵抗，由地道撤走。日寇与伪军搜获了一部遗弃的武器。王景南部分获了二、三十支步枪。

伪军追袭八路军战例：

1945年春，八路军第十三团师军率领战士约300余名，由古北口地区越出长城以外，一直抵进到热河围场。因围场境内，没有建筑集团部落，居民散居各地，是一个很容易发展革命力量的好地方。可是伪第五军管区鉴于以上情况，不利于伪军，因此迅速组织战斗司令所，进驻围场。同时，由各伪团抽编五六个游击队，每队兵力300余人。我同根东顾问带领幕僚等进驻围场战斗司令所，指挥部署追袭，并出动飞机侦察。以五六倍的兵力，轮番长追，迫使师军无暇顾及发展革命工作，遂化整为零。伪军从此不见八路军踪影，遂收军各回原防。

岸谷隆一郎，原是通化省伪警察厅长，是个中国通。因为在通化，他主张把省伪武装警察队，集结到通化危害了抗日将军杨靖宇，因此有功。以后就把他调升伪热河省次长。他又建议，把在通化集结的武装警察队调到热河省来，与八路军对抗。在1945年春季，冀热八路军全面向热河挺进。伪警察武装队在兴隆、青龙地区与日寇协力，把挺进来的冀热八路军抗拒出境，并越长城占领遵化。说这是"拒敌于国门之外"。在抗日战争胜利后，因为他们驻在遵化，没受到苏军冲击。被华北伪治安军收编为第二师，陈天玺为师长。

华北伪治安军署长门致中与国民党的军长孙连仲是连襟的关系，因此摇身一变而为国民党的第九路司令。

热河被苏军占领后，岸谷隆一郎和他的老婆与两个女儿全家自杀。

在苏军未人热之前，驻承德的日寇联队长偕同伪第五军管区的顾问根东大佐，要求我在承德附近要点构筑阵地，抗拒俄军进人市内。当时，我拒绝了日寇的要求，本军不参与对苏作战。他俩人面无欢色而走。从此，在伪司令部的日系伪军官，均退出伪部。

8月19日，苏联后贝加尔方面军的先头部队进入承德。我派

伪参谋长栾彪出迎。未等与苏军军官联系，栾彪所乘的汽车，就被苏军夺去。这时，伪第五旅长戴元、伪第八旅长于译浦和伪司令部的其他军官都在伪部听候消息。不多时，苏军进入伪部，被解除武装。当天下午把我们17个人送到苏军一个团部。在夜间，因伪兵纷纷逃跑，苏军开枪射击。

20日下午，把我们17个人用汽车送到离宫(避暑山庄)内，看到日寇的联队长和他以下的军官们，同时也见到伪军的顾问根东大佐，以及伪部的高级参谋南清一等等，均在离宫内当了战俘。因此，触起我的回忆来。过去，我已参加过抗日团体，当第二十五路军司令。因意志不坚，随同廖弼宸回到于芷山部下，做了叛国之徒。今又被苏军俘虏，前途不问可知，绝无好结果的。因此，顿生决心，非脱出离宫不可，不管死活也要冲出去。遂通知同来的17个人，准备夜间逃出离宫，再作后图。时值第五旅长戴元，正发高烧。我和他两次同事，能忍得把他扔掉吗？但此时不走，犹待何时？遂告知戴元，我决心逃出离宫，你先养病，我已托人照顾你。你是中国人，有机会时，什么时候都可以逃跑。当时戴元表示决定跟我走，决不呆下。我在前领路，他在后尾掩护。过了几道卡子，跑到离宫墙下。用绳子和裹腿等，绑在墙头上，沿绳而下，逃出了离宫。

后来，戴元在国内第三次革命战争时期，毅然决然在营口起义。并两次参加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战争，立下了汗马功劳。现在本溪市任政协常委。年近八十，正以"老骥伏枥"的精神，为四化建设贡献毕生力量。时常给我来信，劝勉我努力学习，为国家多做贡献。我正向他学习，但我对他是望尘莫及的。我只是在劳改政策下受到特赦，重新做人的。

话再说回来，我们17个人出了离宫到五家，找到步兵第十二团长张祥恩，我留五家，戴、于两旅长各回原驻地，尽力掌握部下，再行联络。其他的人，逃出离宫后，则溜之大吉。

我们逃出离宫，我应负首恶之罪。因为当时第二次世界大战，

是苏联斯大林大元帅领导苏联红军解放东北的,他是中国人民的伟大朋友,又是盟国之一。我逃出离宫,就等于越出监狱逃跑罪行一样。我应有这个认识,表示忏悔。

逃出离宫后,电话不通,无法与各部队联络。又时值雨水连绵,交通不便。派人联络,一去不返。五家离承德不远,听到热河孙伪省长(孙柏芳)和李葆华、徐明远三大汉奸均被八路军镇压。我原来就怕,这回更怕。因此不敢接近八路军。

又听说,国民党派刘多荃为热河省主席。我过去在日本留学时,因他弟弟刘刚由东京赴上海看病时,我曾托刘刚带过口信,如果反攻时,我绝对响应,决不做亡国奴。因此,盼望他来,就在五家等候。但第十二团的兵籍,都是吉林出身的,他们哪有心思再当兵呢?因此,天天发生逃跑事件。张团长看看维持不住,就与驻平泉的八路军联系,愿意缴枪回家。这时,我又接到八路军工作队给我来信说,要和我见面谈谈,我同意了。但等候一天没来,第十二团就上平泉去。因此我没敢停留,随着十二团就走了。到平泉后,我没敢出头,跟我的副官潘义铮到北平找他的叔叔去,因他叔叔开个工厂到那里避避风再说。经过锦州到唐山,潘义铮和我说,华北这方面,通通原封没动,你的同学姜鹏飞还在唐山,那好,你就去他那里,说我来了。姜就派副官把我接到他的司令部里住下。他和我说,他已接受了蒋介石任命他为军长,还把委任状挂在墙上。他又说,伪第五军管区的第三十四团、第三十五团合并起来,王景南团长当了第一师长。汪营长、温营长被索司令收编为一个旅,汪营长当旅长。

我在唐山住了些日子,八路军进攻唐山,我就去北平了。

(本文摘自赫慕侠回忆录)

伪满第五军管区内幕

刘 放

伪满洲国的最高军事统帅机构是军事部，它统辖十一个军管区。地处热河西部的第五军管区就是其中一个十分重要的军管区，它统辖十二个团，分布于长城沿线，扼关内外通道之咽喉，窥北平(北京)、天津等大城市，在军事上、经济上有其非常重要的地位。伪满时期，这一带被称为所谓“西部国境”，是日伪与抗日武装力量对峙、较量的重要场所之一。在这里，日寇杀我同胞，掠我珍宝，胡作非为，罄竹难书。

我自伪满军校毕业，就来此处任职。曾充当过伪第五军管区司令部参谋处处副、军管区司令部部副之职。身临其境，耳闻目睹，了解到一些事情。因年代已经久远，仅能将记忆深刻的一部分写出，难于反映当时历史全貌，也恐怕是在意料之中。

张海鹏与伪第五军管区

1931 年“九·一八”事变之后，原东北洮辽镇守使张海鹏，于同年 10 月 1 日，抢先脱离了张学良，宣布“独立”。在日本人唆使下，他派兵大举进犯黑龙江，在嫩江江桥，同抗日将领马占山部展开激战。是役，少将徐景隆触雷毙命，先锋部队三个团溃逃。张海鹏非但没有因此而悔悟，反而变本加厉地投靠日本侵略者。1932 年 2 月，他以“前敌总司令”的头衔，率所部伪军配合日本侵略军进犯热河省。到热河后，他的军队于 1933 年 5 月被改编为伪热河警备军。张海鹏任伪热河警备军司令兼伪热河省省长，掌管了热河省的军政大权。他为了达到其独霸一方的目的，拼命地发展私人势

力，他重用报字“天下好”的土匪头子王永清，任命其为司令、旅长；他任命他的大儿子张俊哲为旅长、支队长；他的四儿子张俊卿（外号四虎子），也被任命为支队长、骑兵团长。此外，在各级军官中，安置了许多死心塌地跟着他的旧洮辽军人。当时，伪热河警备军的重要头目及其所属部队配置情况大致如下：

王永清：陆军中将、赤峰地区警备司令兼第一混成旅旅长，驻屯于赤峰以北及以西的敖汉、奈曼，翁牛特、喀喇沁等蒙旗，直至乌丹。刘文清：陆军少将、骑兵旅旅长，驻屯赤峰及附近县旗。张俊哲：陆军少将、第二混成旅旅长，屯承德、平泉、滦平、凌源等地。鹏飞：陆军少将、第三混成旅旅长兼朝阳地区警备司令，屯朝阳、阜新、凌南、青龙、隆化等地。索景清：陆军少将、第四混成旅旅长，屯围场以西及丰宁一带地区。

日本关东军之对于张海鹏（当时为陆军上将），只不过是利用其充当打手、走卒而已，绝不会任其自行发展私人势力。日本关东军在凡有伪军的地方，就有相应的、一对一的日军驻屯，名曰“共同防卫”，实则暗中监视。同时，控制伪军的武器弹药，不配备给伪军重武器。自从占据热河之后，日本侵略者立即着手抢修警备道路，于各军事交通枢纽处屯兵，控制了军事交通命脉。他们一面疯狂镇压人民的抗日活动；一面向伪军派进顾问、教官。陆陆续续地在各个基层安插了日系军官，对军内的要害部门进行控制和掌握，建立了指纹档案，对参与携械潜逃和武装哗变的伪军，进行残酷的镇压。并且，实行人事大调动，打乱原建制，削弱带兵军官的权限，还不断地把由日伪培训的新军官充实到各基层部队。这样，到 1934 年，伪热河警备军已经不再是张海鹏所把持的私人军队了，而成为日本人严密控制的、受伪军事部（顶头上司是日本关东军司令部）指挥的部队。

日本人对张海鹏私人势力进行限制，其中之一是借机免了张之四子张俊卿骑兵团长之职。理由是张俊卿胡作非为，影响太坏。

本来，张海鹏这支由汉奸、胡子组织起来的队伍，向来是军纪松弛，烧杀抢掠不当回事。张俊卿身为骑兵团长，又是“前敌总司令”的公子，有些胡作非为的事情，亦不足为奇。日本人所以要撤他，不过是想借此来限制张海鹏的私人势力罢了。

日本人采用的另一个方法是调虎离山。当张海鹏领兵进人热河，局势稍为安定时，他就以“参议”的身份经常被召进伪首都新京议事。在他脱离部队期间，部队的诸项事宜，均由日本人代裁代定。张海鹏最初来新京，以开国元勋自居，自鸣得意。后来看到日本人对于他张海鹏的人毫不客气，该撤的撤，该调的调，他苦心经营多年的部队，已经越来越不听他使唤了，这才发觉自己上了当。于是，在司令部常常无端地发脾气，破口大骂，连日本人也骂。日本军官虽然表面上对他“哈伊”(是)，实际上根本不把他司令放在眼里。因此，他耍脾气也毫不济事，只不过是放放怨气而已。

日本人对张海鹏其人了解甚深。早在他刚进承德不久，就带领他的幕僚去大佛寺参拜大佛。他向佛爷祷告：“大佛啊大佛，保佑我皇上登大宝，一定给大佛塑金身。大佛寺虽然不能重修，也要沾补沾补。”消息很快就传到关东军司令部。所以，在关东军司令部认为张海鹏的利用价值已经不大的时候，就给张海鹏找了上好差事，当伪满皇帝的侍从武官长。从指挥千军万马的部队长官，到进参议院、进将军府，最后当上侍从武官长，职位似乎越来越高，实际上是被夺了兵权；这一点，张海鹏心里明明白白。但是，他吃的是汉奸饭，不听命于日本关东军怎么能成呢？

1934 年 7 月，伪满机构改革，热河警备军改编为第五军管区，张海鹏被调离热河。临走的时候，他要求带一名副官，日本人没有答应。1935 年 9 月，在他进入将军府之后，伪军政部才将第五军管区参谋处中尉卢汉飞调给他当副官。

1934 年，我同其他同学一道从伪满中央陆军训练处毕业，被派到热河警备军的各基层部队任职。刚到承德，就受到张海鹏的接

见，时间在 1934 年 3 月 10 日。这是我头一次见到这位显赫一时的人物。他年约 70 出头，肥硕的块头，高个子，头发和山羊胡子已经全白，讲起话来瓮声瓮气的。在此之前，我曾经听说这位司令肚子里墨水不多，讲起话来却喜欢咬文嚼字，并且从来不拿讲稿。不知道底细的人，冷丁还看不透他到底怎么样。当时，他给我们讲话的大致内容是：

尔等离开学堂门来到边防前线，投笔从戎，为国干城，行为可嘉。从今尔后，尔等就是我的部下。热河军主力是旧洮辽军，随我转战南北……我的官，我的兵，个个勇敢善战不怕死，是我多年忠诚的部下。过去张小六子（指张学良）都惧怕三分，。尔等到部队去，要服从指挥，精诚团结。本司令官秉正待人，论功行赏，执法如山。3 月 1 日，皇上已经登基了，我平生宿愿克遂。所遗憾者，乃未能保护皇上回北京故宫登基。我年已古稀，很难再事戎马之劳，实不安心。从此建设王道乐土，顺天安民，乃军人之天职，望尔等……”

张接见后，我们 13 名同学即被派往驻在朝阳的第三混成旅做见习军官。

会 见 鹏 飞

朝阳是伪热河军第三混成旅旅部所在地，是朝阳地区的军事指挥中心。旅长鹏飞，是满族人，复姓马，祖籍辽宁省人氏。1928 年（民国 17 年）他在吉林督军张作霖属下充任吉林保安队统带部帮统，与当时任吉林督军署参谋处长、后任伪第三军管区中将司令的关城山（我的表兄）结交甚密。同年 9 月，他们两人同去当时属于吉林省管辖的双城县检阅新编练的部队，曾到过我家。当时我正在哈尔滨读书，虽然未见其人，但表兄经常谈起他。所以对他，我也就早有所闻。此次被分配到热河，表哥便给我来信，让我找鹏飞，请他遇事多关照。说来也凑巧，我们 13 名步骑炮三科同学，正好被分配到鹏旅。我们到朝阳的第 2 天晚上，我拿着表哥的信去司令部见鹏

飞。鹏飞让我坐下，他两眼朝我上下仔细打量了一番，就直接了当地对我说："关团长（指我表哥，当时是伪吉林第2教导队步兵团长）来信我收到了。你们分配是由总司令部顾问早就内定好的，见习军官必须下连。你是步兵科毕业的，要到步兵团去。可是步兵团全驻扎在山岳地带的凌南、青龙两县，交通极其不便；朝阳有一个营，连队也是驻扎在山里的二十家子、羊山、七道岭。我考虑你可以到七道岭去，因为这些地方相比较，七道岭距朝阳最近。假若你是骑兵，我可以把你留在朝阳或者我的卫队里；炮兵也行。但你是步兵，我就毫无办法了。我这个当旅长的，无权变更啊。"我问道："七道岭在朝阳哪个区？""三区。"一听到三区，我的脑袋轰隆一声，犹如平地一声闷雷，面有失色。他笑了笑，说："怎么样？对我怀疑吗？""不，我听说朝阳三区在热河是最野蛮的地方。"他回答说："是的，那是个出名的地方，你到热河后想必也有所闻。不过你不要过虑，你们的营长叫王兴周，是黑山人，张作霖的同乡，而且是至亲。他人很有办法。连长程光复，在洮南军官教育班当过教官，头脑敏捷，大胆敢为，是个正派人。他们都是我所信任的。你可放心大胆地去，不会有亏吃的。至于青龙，地方太远；凌南是胡子队改编的，他们很排外，更不适合去。还是到七道岭去吧！不必犹疑了。"出了旅司令部。晚间躺在床上，久不能寐。鹏飞的一席话，深深地震动了我。我开始领悟出他不想见我们这些由日本人训练出来、由日本人派到这里来的青年军官的道理了。他是旗人，素有复辟的愿望。他追随张海鹏，大概就是出于他与张有同样的想法和目的。但是，日本人之利用溥仪，只不过是让他当个傀儡而已，绝不会让他恢复清廷。鹏飞从自身的经历中和无情的事实面前，头脑开始清醒了，因而对日本人怨恨不已。一方面自责，一方面发愤，其心理之矛盾，难于言表。

跋扈的洮辽系军官

我们步兵科同学共8名，由旅司令部派出的一辆大卡车送至凌南步兵第三团报到。第三团长叫王永生，是个收编的匪首，报字"占东洋"。他出身绿林，非洮辽军旧人，因此，比较受排济，许多事都要听命于团附关柏山的。在我们8名见习军官来见王永生团长时，关柏山团附在场。王团长倒是蛮热情，比较客气。关团附却恰恰相反，极其冷淡。他面带讥讽地对我们说："我们是作战部队，士兵打仗全是小老虎，什么学术两科全不懂。这个兵可不好带呀！带不好，他会不听你的，弄糟了，还说不定给你定心丸吃！"然后，他问我们："你们谁打过仗？"我们大家齐答道："都没有。""哼！我就担心你们这些白面书生要够呛！你们下去之后，可得好好见习、见习，干好了才能转实官。"随后，关团附又说："好，明天就到各营报到。一营的留下不动，二、三两营的明天早晨就走。"他转身又喊："高副官！去雇骆驼，叫他们明天早晨走。"高副官连忙说："天晚了，怕雇不上了。"关团附眼睛一瞪，狠狠地说："胡说！咱们是军用，你不会强征？"王团长插嘴说："不行啊，没有护送队，他们单独走太危险。"关说："等队伍，没日期！下面还等人用呢！这也是锻炼锻炼！"大家嘴上不说，心里可恨坏了这个关团附。同学王福庆(据说此人后来在抗美援朝战场上牺牲)插嘴道："临来时旅司令部王参谋长指示，我们三月份官饷要在团部领取，赴任旅费得领，给予通报得办。"关团附不吱声了，停了一会儿，又说："那就限三天之内办完。"回到住所之后，大家纷纷议论起这位团附，说这一位真够厉害，团长都没开腔，他团附就发号施令，真够霸道的。当晚8点左右，高副官来了，他说，"奉团长之命来看看大家，吃、住上有什么困难，有什么要求？"大家见团长派人来看，免不得又对团附发了一通火。高副官连忙示意大家不要说，他低声对大家说："诸位从学校新来此处，有所不知，他是三团的活阎王，专横跋扈，团里他说了算。你们要是先见

见他团附就好了，你们来就先见团长，他感到吃醋啊！团长，单人匹马地来到三团，是光杆司令。团附是洮辽军旧人，眼界宽、吃得开，遇事总要高团长一头，压制团长。这个团可排外啦，新来的人，照例，关团附都先来个下马威，好让诸位不要小看这位团附。请诸位知道就行了，别往心里去。”有人问高副官，王团长怎么不带些亲信来呢？高副官答道：“自从我们开进热河，一步步安定下来之后，部队就开始大换班，从连长、营长到团长都调动，谁调转也不许带人。王团长是后过来的降队，就更不在话下了。旧洮辽军虽然全打乱了，但是人多，所以，办什么事，还是洮辽系军官吃得开。”

王静修其人其事

1934年，热河警备军改编为第五军区管。是年7月，任命王静修为第五军管区中将司令官。王静修，沈阳市北古城子人。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说一口流利的日语。“九·一八”事变前，系黑龙江军马占山的部下。“九·一八”事变后，也曾追随马占山抗击过日寇。1931年1月，他在代表马占山与日军铃木美通谈判时，竟如离弦之箭，一去不归，堕为可耻的汉奸。他最初任伪中央陆军训练处中将处长。可能是由于他的特殊经历吧，在日本人面前，他是一个典型的碌碌无为、唯命是从的木偶式人物。但是实际上，王静修绝非如同他表面上装出的那样呆傻。王到第五军管区不久，就让日本人秘书岛村搬进自己的办公室。王静修每天上班，就把自己的名章交给岛村。各处处长及其他工作人员送来文件，要“司令官”审阅批示时，王静修总是说：“给岛村吧。”而这位岛村，丝毫也不客气，就为“司令官”代裁代行，并且以此而洋洋得意。王静修自愿当傀儡，凡事无论巨细，他总是一推了事，不负责任。如有什么事去请示王静修，他总是问：“顾问看了吗？”回答：“看了。”“按顾问的意见执行吧。”有一次，情报参谋张士洪拿几份有关东边道抗日联军活动的情报，来见王，王说“让岛村看吧。”当岛村看后向王静修复述情况

时，王却说："你看就行了，不必说了。"张参谋回到参谋处刚刚坐下，王静修来了。对张士洪说："方才那个文件我看看。"于是他坐在那里仔仔细细地看。类似这样的事很多，往往你亲手送到他办公室，他却不看；然后，过一会儿他就会跑到参谋处来，打听情况。因为参谋处全是伪满军官，没有一个日系军官，可能在他看来，在参谋处干点什么比较方便。他的这种表面上当甩手掌柜的，实际上事无巨细均予过问的作法，引起了参谋处长王维藩的不满。王维藩背地说："司令何苦呢？作事应该真面目。"有一次，王维藩拿一份待发的作战命令请示司令官。王静修又说："给岛村看看吧。"王维藩当着岛村的面说："这是军事机密，除直接责任者、主管上级外，不能让任何人知道，这是军机保护法明文规定的。"一句话，弄得岛村面红耳赤；王静修只得接过去亲自过目、签字。王维藩回参谋处后，向警备科长高联毓说："真够呛！把一个岛村抬举得不知天多高地多厚了。"高联毓笑了，没有作声。不一会儿王静修进来了。他问王维藩："方才的作战命令下达了没有？"王回答："下达了。"接着说："阁下，有些重大事情不能靠岛村。他不过是个文官，不懂军事，出了问题他也不敢负责，那咱们可担当不起！"王静修说："他有特殊使命，日本人嘛。"王反驳说："送阁下的文件，尤其重要文件，都是经过顾问审核过的。何必顾虑重重，他算个啥？"王静修笑面不语。

从那以后，王告诉参谋处全体军官：再核稿或签阅时，要交司令官本人，不理岛村。从此，凡属带有"秘"、"秘密"、"极密"、"机密"字样的文件，岛村也不敢公开受理了。常常表白："司令官阁下看完的文件，我代为盖章；因为阁下实在太忙了。"而王静修此后也多少问大事了。有一次报纸上刊登"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成立，殷汝耕任行政长官"的消息。大家在参谋处办公室里议论纷纷。有人说防共就意味着中日调和，抗日是遥遥无期的；也有的持否定意见。谈论正热烈时，王静修进来了。大家请司令官发表高见。他坐下后说："殷汝耕的自治政府是日本人伸向关内的一个触角。它正是日

本广田外务大臣所主张的三条，即：停止排日、默认满洲独立、防共的具体体现。它加强了日本在华的政治、经济、军事的实力。看吧，有朝一日我们五军还要有人被派到北平去呢。看来这个形势是俺们所没有想象到的。”不久，顾问部骑兵上尉田中巽被派到冀东政府保安队当军事教官去了。以后，陆续地又去了很多日系军官。从此，五军区顾问部成员与冀东自治政府往来频繁；这一切，当然是带有政治色彩的。1936年，第五军管区主任顾问步兵大佐关原六，带许多日系军官及中国人翻译进入北平，在西城区设立一个“关公馆”。关原六大佐是五军区的主任顾问，又是承德特务机关长；此人进入北平要干些什么？不言自谕。这个时候再回过头来看王静修的讲话，参谋处的军官们开始认识到王说的是很有些预见性的。平时什么事也不过问的、粗心大意的“司令官”，看问题倒是蛮准的。

平时，在军官集会，特别是有日本人多的场合，他讲话往往携带翻译。他说一句，翻译一句。并经常向翻译问：“我方才说到哪啦？”要翻译提示一下再讲。他不摆司令官的架子，一点也不讲究吃，大有农村庄稼院老头儿的味道。他善于接近部下，跟谁都谈得来，也跟士兵唠家常。动不动还给士兵做做模范的基本动作，如射击、刺枪、劈剑等，并讲解动作要领。每天早晨，他早早起床，由承德去滦平；或乘汽车，或骑马，往返一趟40公里。经常找司令部的青年军官陪同。若青年军官起得没他早，就要受他一顿教训。对于他的举动，部队官长可有些受不了。滦平驻军，每逢司令官来滦平营苑时，总免不了要列队迎接；但往往营苑士兵尚未起床；他人马已到。除了经常同士兵一起教练、上课、劳动之外，他还经常下厨房，这摸摸，那看看，问吃得怎么样，吃得饱不饱等。时而，见到小兵，也提问“军人誓文”、“军人敕谕”、“内务规则”、“生活情况”等方面的条例。一般官兵对他印象不错，士兵们说：“他若是个班长、司务长可就好啦！”

王静修对青年军官很重视。当时，军管区司令部里最年轻的军

官有 3 人。即：杨小先(伪满作家慈灯)、申绍志和我。我们都是参谋处处附。因参谋、副官二处都是幕僚军官，所以几乎天天和这位司令官接触。他非常欣赏孔孟言行及曾文正的书籍，并经常用这一套向我们说教。他跟人谈话时，很注意对方的一举一动，讲起话来很有分寸。他用词的意义有时很明确，如说："俺们"，是指中国人；"他们"是指日本人；但有时又很含蓄，使你非得仔细捉摸不可。

王静修唯一一项大胆决定是成立第五军管区军官教育班。这个教育班，顾问并不同意办；但是在他授意下，参谋处长王维藩很果断地办起来了。原计划轮训初级军官，分步兵科、骑、炮兵科。计划各办多次，原意是把全管区初级军官轮训完了为止。但是这个教育班是短命的，仅仅训练一期步兵军官就被迫解散了。原因是，他办军官教育班的目的是要提高伪满军部队各科初级军官的军事素质；并亲自接触与熟悉这些军官，树立他的统帅威信，企图在必要时能使这支部队为他所用，指挥自如。这当然是为日本人所不容。于是，就制造种种藉口，勒令解散了。

1934 年 7 月，新编的第五军管区，实际上王静修是第一任司令官。它统辖锦州、热河两省警备区，划分为锦州地区警备司令部与承德地区警备司令部。其所属组织系统及配置地区与指挥官分布如下：

第五军管区司令部(承德)：司令官王静修中将、参谋长卢静远少将、司令部附索景清少将、主任顾问关原六大佐、顾问千叶一郎大尉。参谋处处长王维藩上校、副官处处长刘肃华上校、军械处处长吴国贵上校、军需处处长魏崇岳上校、军医处处长赵怀仁上校、兽医处处长杭承祖上校、军法处处长王冠英上校。

第五教导队(大虎山)队长鹏飞少将、第五通信队(承德)队长枝佐(日)、自动车队(承德)队长谷富少校、承德陆军病院院长许思明上校。在承德还有一个陆军监狱。

承德地区警备司令部(承德)：司令官王永清中将、二十六旅旅

长王永清中将(兼)、步兵第八旅(驻丰宁)旅长冯秉臣少将,骑兵第七旅(驻赤峰)旅长刘永清少将。

锦州地区警备司令部(锦州市):司令官田德胜中将、二十四旅旅长田德胜中将(兼)、二十五旅(驻朝阳)旅长张俊哲少将。

王静修在任期间,正是伪军进入整顿阶段,兵员数量逐步减少,兵员质量逐步提高,一切上了轨道,各种法令建立并实施。每年2月、9月是人事定期变动期。在这两个月内,专办晋级、增薪、调转、退职等。一切均见诸于政府公报。此外,还以团为单位确定军旗授与等等。由于王静修平日善于装呆卖傻,所以取得了日本人的信任后晋级陆军上将。1936年调至伪第一军管区任司令官。但是,日本人不可能让他永掌兵权,当了一段司令官后,就转到参议府任参议,直至1945年"八·一五"光复。

一次逮捕事件

1935年秋季的一天,一群气势汹汹的日本宪兵突然闯进参谋处办公室;副官处日系教官饭冢中佐也在其中,一个宪兵拿出笔记本呼唤"王竹修,陈章斌!"王、陈两人刚刚站立起来,几个宪兵就一拥而上,把他们带上手铐,不由分说就逮走了。次日清晨一上班,参谋处长王维藩满面怒容、一言不发地坐在座位上,他破口骂道:"真他妈不像话!居然搜到我的头上了!"原来,昨夜10时许,日本宪兵曾去王住处进行搜查,折腾了好长时间。王维藩为中国人,在日本宪兵的搜查面前是敢怒而不敢言;王维藩的妻子武田秀子,是日本国内著名的舞姬,它肯受这份窝囊气?当晚就去日本驻承德特务机关长关原六公馆,质问顾问为什么要搜查他家?声言要回日本国找陆军省算帐。关原六自知武田是有来头的,只是推说不知道搜查一事,好言劝阻武田,武田才不言回国。此后,日本宪兵再也不到她家去了。可见武田非寻常人物。当初,王维藩作为东北军一名中尉,被张学良选中,派往日本步兵学校留学。他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后,

又被送入日本军事最高学府日本陆军大学深造。"九·一八"事变时，他在日本陆大就读，成绩十分突出，为校方所器重。当时，日本陆军省当局为了搜罗汉奸、卖国贼，乃在中国留日学生中大做其工作，诱以高官厚禄，劝他们到东北来，参与伪满洲国建国建军工作。开始，王维藩只是不从，先是要求回中国(指关内)，后来看气候不对，他就不敢再言回中国一事了，而改为执意留在日本，绝不回来。但这并未使日本陆军省放弃对王的争取工作。通过种种关系，日本当时著名的舞姬之一、武田秀子同王维藩结识了。武田以她如花的容貌、婀娜的体态、优美的舞姿，曾经打动了千千万万的日本人；许多名门贵族、富豪子弟纷纷向她求婚，但都未成功。武田自从结识王维藩以来，常常同王维藩在一起，为王消愁解闷。当时，陆军省正在动员王维藩去东北，王如同重负在身，整日忧心忡忡，闷闷不乐。他离开东北多年，人非草木，思乡之情，在所难免；况且久无家庭温暖，今遇武田秀子，时间不长，王就坠人情网。经武田秀子的极力说服，王维藩终于打消了原来的想法，同武田秀子一道回到了东北。武田这个日本著名的舞蹈家，遂成了王维藩的妻子。武田曾经对别人讲过，她是为了她的国家才抛弃别人对她的追求而嫁给王维藩的。这显然是陆军省当局出面做的工作；否则，武田不会对关原六说要回日本找陆军省算帐。

王维藩回到伪满之后，看到日系军官的专横跋扈，看到伪满军官在部队中的傀儡地位，如梦初醒，开始感到自身已沦为汉奸。所以整天是牢骚满腹。在他的参谋处里，没有日系军官。因为他对日系军官非常苛刻，许多日系下级军官，不敢来参谋处，派来也不赴任。在日本，能到陆军大学学习的军官并不多，加上日本的学阀风气极浓，所以日本一般军官见到王维藩胸前挂着陆军大学的徽章，表面上都要敬他三分。而王维藩的满肚子不快，则专找日系下级军官发泄。他是陆大的高材生，提出的一些军事上的古怪的问题，日本下级军官当然无法回答。于是，他就当着众人的面大声责骂。一

般的日本军官对他是敬而远之，不敢朝他的面。久而久之，许多日本人都向日本特务机关告王维藩的状。因此，此次王家被搜，恐怕与他平时对日本人训来骂去的态度有关。更直接的原因可能在于：在参谋处逮捕的王竹修、陈宣斌两人都是王维藩参谋处的人。而王竹修做为王维藩、武田秀子二人的英文教师，经常出入于王维藩公馆。大概是因为这个吧，日本宪兵乘机搞了王维藩一家伙。有的说，这回主要是杀杀"大学王(王维藩的绰号)的威风，好派日本人进参谋处。这种猜测是有道理的。平时，他当着司令官王静修的面，训斥岛村，岛村秘书对他很有意见。他也不把饭冢中佐放在眼里，因为饭冢中佐没进过陆军大学，一辈子也不会晋级将官。遇事，王维藩总不以饭冢为然，在日本人眼里，王维藩太傲了，因此要整治他一番。

十几天之后，王竹修、陈宣斌二人手带手铐，脚拖脚镣，步履艰难地被日本宪兵押到参谋处。他二人已被折磨得不成样子，特别是陈宣斌，两只眼睛已经失去了往日的光彩，直勾勾地瞪着，嘴巴张开。看样子，神经似已错乱。他们进屋以后，直奔西墙，陈用手一指说："在这！"两个穿白帆布工作服、拿行军镐的人就刨了起来。约二十几分钟功夫，墙全刨空了，除了刨碎的砖和灰土之外，一无所有。宪兵又逼问他俩："到底在哪？"王竹修冷冷地说："他(指陈宣斌)是严刑所逼，信口胡说的。"日本宪兵又问："你们跟谁有联系？"两人闭口不言。于是，将二人带到王维藩身旁问道："是他？"王维藩眉头紧皱，低着头，闷不做声。看来，是压了一肚子火。王、陈两人一边摇头，一边大声说："不是，不是。"紧接着，科长、参谋，所有军官、属官、军士、文牍、录事、雇号、打字员、勤务兵，都一个接一个地统统过了一遍，逐个问"是不是他？"他俩全是一个回答："不是、不是！"其中有一个叫曹文鹤的雇员，是新来乍到的。王、陈两人都不认识他。经过他时，略为迟疑了一下(可能是因为新来的，眼生)。日本宪兵以为这回可算找到了同党。于是对曹说："你同我们走一趟

吧。"曹文鹤平时胆小怕事，从来没经过这样的场面，吓得面色如土，连话都说不出来了。王维藩说"他是新来的。"日本宪兵连理都不理，连拖带拽地把曹文鹤给带走了。当所有的被一一问过之后，未听到王、陈二人回答出一个"是"来。日本宪兵气坏了，大声逼问他俩人："你们到底跟谁联系的？快说！"王竹修依然冷冷地并大声答道："关原六！"关原六是日本当时在承德的特务机关长、军管区主任顾问。大家一听王这样回答，无不暗自赞叹他是一条铁汉子，被打成这个样子，还敢取笑宪兵，真说得上是个英雄。气得日本宪兵哇哇怪叫，直骂"八格！"连推带搡地把两人押走了。此次，军法处的一名雇员，军需处的一名录事，也同时被日本宪兵逮走了。

一周之后，曹文鹤被放回来了。他消瘦了许多。对于他到宪兵队的情况，闭口不提；别人也不问及，恐怕问他，他也没胆量说。不过很明显是吃了一些苦头。

王竹修，河北省人氏，北京大学政经系毕业生，曾在承德当过中学教员。在汤玉麟坐镇热河时，做过都统署秘书，在伪第五军管区参谋处当属官。平时言谈之中，不自觉地流露出一些爱国情绪。他通晓英语，学识丰富，为出身于日本名牌大学的王维藩所器重，常请他去家中教英语。在他被逮之后，司令部议论纷纷，有的说王竹修是国民党承德党部的人，是汤玉麟留下来的，他看中了王维藩，想要争取王维藩；还有的说日本人为了整王维藩而株连了他，他成了替罪羊。

陈宣斌，沈阳人，也是个大学毕业生。在五军管区参谋处当文牍。他的英语也不错，也曾教过王维藩处长和武田秀子英语。

王、陈二人后来再也未见到，据说可能被日本宪兵整死了。

古 北 口

1936年春的某一天，千叶顾问率领司令部全体官佐到古北口进行战地见习。千叶顾问领着全体官佐观看了几处当年作战遗址。

伪大同2年(1933年)3月7日,日本侵略者向驻守在古北口的中国军队发起了进攻,燃起了这场战争。千叶顾问当时做为一名中队长(连长)参加了这场战斗。此次,千叶顾问就是以当时的战争为例,给我们讲述实地作战的有关情况。在走了几个地方之后,千叶把我们带到古北口西南一个最高山的山脚下。他用手指向山顶说,这是A高地,攻克古北口时,此处战斗最为激烈。当时,中国方面占有优势兵力,前面是黄杰、关麟征的部队;古北口外还有王以哲的部队。中国方面居高临下,可攻可守,从地形上来说,这里真算是一道天然的屏障。从日本皇军方面来说,兵力较少,后续部队增援有困难,加上人地生疏,部队不能分散使用,所处地势也极为不利。日本皇军占优势的一面是武器装备。战争开始后,中国方面从这个A高地上和那边的B高地,以及C高地上,组成了交叉的火网。火力密织猛烈,阻止日军前进。日军冒枪林弹雨,强行攻击,伤亡很重。日军方面派出飞机轰炸,大炮远程支援,配合密切,一日之间,BC两高地中国守军相继瓦解溃逃,唯独A高地仍未撤出。此高地扼古北口之咽喉,如不占领,则无法进入古北口。关东军司令部一再电示,必须攻下A高地。为此,日军派出一个联队(相当1个团)在飞机与炮火的掩护下进行强攻。战斗打响之后,所有步兵炮均集中使用,各种轻重武器掩护强攻。远程大炮和飞机发挥了很大作用。但是,守在高地上的中国军队很顽强,他们火力虽然很弱,时常被压得抬不起头来;可是,一旦冲锋的日军将要冲上近前的时候,他们就像是突然醒来一样,把冲锋的部队压下去。这是我们头一次遇到这么顽强的中国部队。他们的友邻部队早已撤走了,他们孤军作战,抵抗着日军飞机大炮。夜以继日地轰击,和一个联队的七次冲锋。为了避免不必要的牺牲,每一次冲锋,日军都大声向中国军队喊话:“举白旗不杀!”但是,中国军队毫不理会,只是用子弹、石块回答我们。经过两天两夜的连续轰炸与冲锋,高地上的石头山被削去一大块。在我们发起最后一次冲锋时,我的一个中队最后只剩

下7个人了。10日下午2时,我们冲进A高地中国阵地时,只见有4名受伤的中国士兵端着枪,互相对准胸膛自杀了。除此之外,再没有发现一个活着的中国士兵。目睹那壮烈的场面,全体日军无不肃然起敬。在攻击的时候,我们一直以为山上的中国军队很多;上来才知道,只有一连人;而且,没有什么像样的工事,除了一个碉堡之外,就是简单的战壕。但是他们居然能在飞机大炮的轰击和10倍之敌的冲锋面前坚持两天两夜!打扫战场时发现,每个中国士兵的子弹袋都是空空的,一个个士兵的嘴唇都是干裂的。看来他们是已经坚持到弹尽粮绝,连饮水也没有了。此次战斗,中国军队的一个连队在A高地上全军覆没;日本军的一个联队,在A高地前也损失了230人。部队长说:"无论中国军队还是日本军队,在A高地的战死者,统统是民族英雄;他们各自为着自己的民族而牺牲,应该受到尊敬。"于是,我们把中国军队的战死者和日本军队战死者的尸体合葬在一起,并在坟墓之上立一石标,上书"民族之魂"4个大字。千叶又用手指着自己胸前的军功章说:"这就是在这场战斗之后授予的。"讲完,千叶领大家参拜了中日合葬墓。

此次古北口战役介绍,对我们伪满的一些年轻军官震动极大:同为中国人,同为军人,古北口那一连中国士兵抗击10倍于己的侵略军最后壮烈殉国;相比之下,我们真是惭愧得无地自容。

听到西安事变的消息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了。当报纸上首次出现这一消息时,在伪第五军管区工作的日系军官个个喜形于色。一天上午9时许,副官处通知:10点钟司令部全体官兵在将校集会所集会,由顾问形势讲话。千叶顾问掩饰不住内心的喜悦,一开始就说:"大家都知道这个好消息吧?张学良把蒋介石关押起来了。"接着,他分析了事件发生后的形势,指出中国必定会发生大内乱。主要根据是:一、国共两党打了十年内战,仇深似海。此次张杨扣押蒋介

石，必有背景。就是说，张、杨一定跟共产党有来往。张领兵进关之后，蒋介石虽然表面对他不错，但实际上处心积虑地要消耗他的力量。调他与共产党作战，是一箭双雕，坐收渔利。对此，张学良不能不知道，所以扣押了蒋介石。共产党也一定要伸手，讨还血债，杀掉蒋介石，因此国共两党之争不可能停止。二、何应钦是日本留学生，同日本关系好。蒋介石被扣，何应钦必能领导国民政府内的亲日派，大有作为一番，压倒英美派势力。何一定会向张、杨宣战。三、傅作义、阎锡山这些地方派，难免不会乘机发展自己的势力，因此，整个中国，必定会形成一个军阀混战局面。届时，日本将全力支持何应钦，消灭张学良。如中国内战爆发，日本有平息中国内战，奠定大东亚秩序之义务。

千叶讲话之后，日系军官一个个乐在眉梢。下班之前，纷纷邀请伪满系军官去家里吃饭。紧接着，何应钦出兵潼关，派飞机轰炸。日系军官们总是抢先看报纸，注视着局势的发展。千叶更是洋洋自得，陶醉在他那一篇形势讲话之中。周恩来飞抵西安。日本人纷纷说："看吧，蒋介石的死期到了。"12 月 24 日，蒋介石接受和平条件，表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国共两党再次合作。消息传来，日系军官们沉默了，失去了往日的兴高采烈情绪；千叶直摇头，表示不可思议。日系军官们接到了上面的指示：做好打仗的准备。战争给广大日本人民带来的痛苦是巨大的。因此，在日本人中间实际上广泛地弥漫着一种反战情绪。这种情绪在国共合作之后表现更明显了。

卢 静 远

卢静远，湖北省人氏。他本来是前清的举人，被送到日本士官学校炮兵科学习。回国后，在袁世凯政府里当官。伪满初期，他担任吉林警备军第二教导队士官候补生连连长。后升为吉林警备军司令部参谋处处长。以后，又调至第五军管区任参谋长。这位参谋长，六十多岁，老迈昏庸。他个子不高，走起路来像在戏台上作戏一

样，踱方步。他同郑孝胥一样，是个清廷复辟派。辛亥革命使他的举人头衔失去价值。因此，十分怨恨革命党人，怨恨孙中山，更怨恨共产党。他经常咒骂："什么党？党，魔鬼一流也！阑珊夜行，忽遇黑墙挡路，谓之党；遇白衣骷髅，谓之鬼；遇鬼神附体，谓之魔。党字口下有黑，是不光明之谓也。"等等，他整天钻在之乎者也之中。部下送去的批发文件，对内容他从来不动，只是在文言虚字上下功夫。文件经他一改，满纸是之乎者也。有几次，他糊里糊涂地把上边下发的文件也给改了，在上面加了不少的之乎者也。气得王维藩处长拿着文件去找他："你是怎么搞的？这是上边发下来的文件！"他接过来一边看一边说："唉呀呀！可不是。搞错啦，搞错啦！"还有一次，王维藩把一份作战命令交给他审阅。谁知道命令拿回来后，又是满纸的之乎者也。王维藩十分恼火，当着大伙的面直骂卢静远。并且，还到司令官那里告了他一状。王维藩常说卢静远不懂军事，十分瞧不起这位参谋长。卢静远倒是蛮有海量，对王的尖刻言词，仅是红红脸而已。后来，卢静远到汪精卫那里，做了伪新民会会长。在伪满洲国，日本帝国主义者搜罗了不少卢静远式的人物，卢仅是其中之一。

伪满第五军管区始末

王振兴　王　荣

伪第五军管区是伪满洲国设在热河省的地方军事机关。由于热河是连接华北与东北的咽喉要地，伪满时期被称为“西南国境线”，是日伪军与抗日武装进行激烈斗争的重要地区之一。因此，该管区是日伪一个十分重要的军管区。12年间，曾协助日本侵略军镇压热河人民的抗日活动，“讨伐”八路军，“扫荡”抗日根据地，进行“集家并村”，制造“无人区”，抓捕抗日军民等，犯下累累罪行。

沿革概况

伪第五军管区是日伪在热河以张海鹏洮辽军为基础建立起来的

张海鹏，(外号张大麻子)，辽宁盖平人。1868年生。绿林出身，后随冯麟阁归顺清朝，张当了清兵“管带”。民国时期入奉天讲武堂。先后任东北军二十八师五十五旅旅长，四旅旅长。1927年任洮辽镇守使兼骑兵三十二师师长。“九·一八”事变后，在日本侵略者引诱下，发表独立宣言，自封为蒙边督办。日本关东军以金票26万元，大盖儿枪1万支，军衣1万件为条件，招降了张。张趁此机会，积极扩充势力。通过收编土匪、招兵买马，在原4个团基础上扩大到4个骑兵支队(相当旅)和一个步兵团。总兵力达1万人。1932年，日伪授张上将衔。

1933年2月，日军进攻热河，张亲自请命愿作讨热先锋，被任命为“讨热军前敌总司令”。张除留下第一支队和步兵团留守洮南，亲率第二、三、四支队和手枪连(日军派一个炮兵队归张指挥)组成

北路军，配合日军第六、第八师团进攻热河。关东军为了控制张，派日军少佐佐久间亮三为总司令部顾问。各支队也都派日本军官为指导官。张率部到通辽后，收编了“天下好”匪队，任命匪队头子王永清为第一支队长。不久又收编了索景清部（多是汤玉麟旧部和土匪），编为暂编第三支队。此时，兵力已达1.5万人。这是日军第一次使用伪军到前线作战。

3月4日，日军占领承德后，成立了伪热河省公署和热河警备司令部。5月15日，任命张海鹏为警备司令官兼热河省长。李盛堂任参谋长。洮辽警备军改编为热河警备军。此时，其内部发生一件变故：二支队长刘茂义不甘受日本指导官辖制，率部逃回洮南，被日军缴械。张为了发展个人势力，把留守的第一支队和步兵团调到热河，积极重用洮辽军军官，将支队改编为4个骑兵旅，1个步兵团和2个炮兵大队。骑兵第一旅旅长王永清，第二旅旅长张俊哲，第三旅旅长鹏飞，第四旅旅长傅铭勋，步兵团长冯秉忱，炮兵第一大队队长李文，第二大队队长刘本善。部队配置情况是：骑兵第一旅驻赤峰、敖汉、奈曼、喀喇沁等地。骑兵第二旅驻承德及平泉、凌源。骑兵第三旅驻朝阳及阜新、凌南、青龙。骑兵第四旅驻围场、隆化。索景清部从围场移驻滦平。步兵团和两个炮兵大队驻承德。不久，又改编成4个混成旅和1个骑兵旅。此时仍是旧募兵制，马匹多数为私有。

1934年3月1日，伪满洲国溥仪称帝，开始对伪满军进行大整编。日本关东军采取种种手段，加强对伪满军的控制。对张海鹏只是当打手加以利用，是绝不会允许他发展私人势力的。在热河形势稍事安定以后，就经常把张以“参议”身份召到“新京”（长春）议事。关东军在警备司令部内设有顾问部，派关原六大佐为高级顾问。警备司令部及部队的各种事务均由日本顾问决定，对张的亲信进行调离或撤换。张对此虽很不满，经常发牢骚骂大街，甚至跟日本顾问拍桌子，但无济于事。7月，任命他为伪皇帝最高侍从武官

长，明升暗降，拿掉他的军权，调出热河。

7月，伪满把东北三省和热河划分为10个省。成立了五个军管区。热河警备区改为第五军管区。辖热河、锦州两省。王静修任司令官。

王静修，热河省承德县人，后迁居沈阳市。1877年生，1910年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步兵科毕业。先后任东北讲武堂黑龙江分校教育长、黑龙江国防军务处参谋长。"九·一八"事变后，作为马占山的代表，与日军谈判解决冲突。结果一去不复返，投降了日军。1932年任中央陆军训练处长。授中将衔，又任伪军政部次长。1934年秋任第五军管区司令官。1937年调任第一军管区司令官。此人善于装呆作傻，惟日本顾问之命是从，一切事情都听关原六的。因此，深得日本人信任。后来晋升为上将，进了参议府。

1934年8月，日伪决定在军管区下设地区司令部。第五军管区辖热河和锦州两个地区警备司令部。热河地区警备司令部驻承德，司令官王永清。锦州地区警备司令部驻锦州市，司令官田德胜。与此同时，对军管区机关和部队都按伪满军政部的标准编制表进行了改编。打乱原建制，人员大调整。陆续往伪满军内安插日本军官和由关东军培植的亲日军官，控制军内的要害部门。至此，热河伪军已经完全不是张海鹏的私人军队了，而成为受关东军严密控制，受伪军事部指挥的部队。伪第五军管区的主要机构和官员是：司令官王静修（中将）、参谋长卢静远（少将）、司令部附索景清（少将）、主任顾问关原六（日，大佐）、顾问千叶一郎（日，大尉）、参谋处长王维藩（上校）、副官处长刘肃华（上校）、军执处长吴国贵（上校）、军需处长魏崇岳（上校）、军医处长赵怀仁（上校）、兽医处长杭承祖（上校）、军法处长王冠英（上校）、第五教导队长鹏飞（少将）、第五通信队长枝佐（日，少佐）、汽车队长谷富（日，少佐）、承德陆军医院院长许思明（上校）。

此期间对伪军整编后，兵员有些减少。热河编成3个混成旅，

1个骑兵旅，分属于热河、锦州两个地区司令部。锦州地区警备司令部辖混成二十四旅，旅长田德胜(兼)，驻锦州，打虎山及阜新。混成二十五旅，旅长张俊哲，驻朝阳凌源。热河地区司令部辖混成二十六旅，旅长王永清(兼)，驻承德、平泉、隆化。骑兵第七旅，旅长刘文清，驻赤峰，围场。第五教导队驻承德。在承德，锦州各设伪军医院。承德有伪陆军监狱。

此时第五军管区总编制1.3万人，实有兵力9200人。

1934年至1937年7月间，是日本侵略者对热河进行殖民统治的确立和加强时期。第五军管区的主要任务是配合日军"讨伐"热河各地的抗日武装，镇压群众的"反满抗日"活动，收缴民间武器等。1937年6月，邢士廉接替王静修任司令官。

邢士廉，辽宁沈阳人。1885年生，日本陆军士官学校骑兵科毕业，为张作霖所重用。历任江苏、安东等地剿匪司令，浙江禁严司令①、东北军二十师师长、北京卫戍司令、大元帅府侍从武官长、辽宁省政府委员、讲武堂教育长、边防军司令官公署顾问等。"九·一八"事变后，投靠了日军。历任伪军旅长、地区警备司令官、中央陆军训练处长。1937年6月任第五军管区司令官。1939年3月后调离，因他效忠日本帝国主义有功，1942年任伪军事部大臣。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本实施了全面侵华战争。为了把热河变成它永久巩固的殖民地和全面侵华基地，日军进一步强化了对热河的殖民统治。在此期间，华北国民党军队对日军稍事抵抗后既全部退走，而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和游击队，则深入敌后开展游击战争，开辟冀热边抗日游击根据地。因此，成了日伪军的主要作战对象。为了防止关内的抗日武装向热河发展，第五军管区除担任全面的后防勤务外，还派混成二十六旅和骑兵七旅驻扎在长城沿线，并不断从各军管区抽调伪军到热河增援。

1939年3月，地区司令部撤销，锦州划归第一军管区。伪第五军管区只管热河省。5月，司令官易人，由应振复接替了邢士廉。

应振复，辽阳市人，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1918 年任东北讲武堂教官。1920 年后，相继任陆军第八师参谋长、炮兵团长、东北陆军十六旅旅长、二十七师师长、东北特别区地亩局局长。"九·一八"事变后，投降日本。1932 年授其少将衔，任伪中央陆军训练处步兵部部长。1934 年升为中将，历任吉林宪兵训练处处长、伪满洲宪兵团长。1939 年 5 月任第五军管区司令官后，曾多次与西南防卫司令部策划并派伪军在长城沿线与八路军作战。1942 年初调离。

1940 年，实行伪国兵法。第五军管区内设兵事处，当年征兵 1500 人，全部编入热河伪军。该管区辖 1 个混成旅，旅长王克镇。1 个步兵旅，旅长冯秉忱。1 个教导队，队长赵秋航。

1941 年，我冀热察挺进军和冀东部队大规模开辟热西和热南地区，建立抗日游击根据地，使伪满军不断遭受打击。第五军管区在加强长城沿线防线的同时，不断派部队到热河内地进行"讨伐"，并参加境内的"治安肃正"，配合日军搞"集家并村"制造"无人区"。为此，伪满军事部除把第五军管区部队由 2 个旅增加到 4 个旅外，还不断从各军管区调集伪军到热河作战。日本关东防卫军为加强对第五军管区的控制，在 1941 年伪军改编时，军管区机关的要害部门都配有日本人，伪军内团以下单位军官有 2/3 由日本人担任。部队出操口令一律使用日语。文书也一律使用日文。对司令官也频繁调换。1942 年初，吕衡任司令官，接替了应振复。

吕衡，辽宁台安人，1899 年生，东北讲武堂步兵科第六期毕业。历任陆军中校参谋，东边道镇守使署上校副官。日军侵占东北后，投降了日军. 1934 年授伪少将衔，1935 年任第二军管区参谋长。因其镇压抗日联军有功，1941 年 3 月升为中将，任第七军管区司令官。1942 年初调任第五军管区司令官。在此期间，他曾多次参与日伪西南防卫委员会制定的"讨伐"抗日武装计划，并派兵在长城沿线及热西、热南地区与八路军作战。1942 年 8 月离任，由吴元

敏接替。

吴元敏，湖北荆县人，1886年生，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历任军事咨询府第三厅科长、少将咨议、延吉镇守使署参谋长兼东北陆军十三旅参谋长等职。"九·一八"事变后，投降日军。1932年任伪吉林警备司令部参谋长，1934年任司令官。不久，晋升中将，先后任第二军管区参谋长、司令官、伪治安部参谋司长、第四军管区司令官。1942年8月任第五军管区司令官。在任期间，他曾调派和指挥伪军在长城沿线及承（德）平（泉）宁（城）、凌（源）青（龙）绥（中）、丰（宁）滦（平）密（云）等抗日游击根据地进行扫荡，"围剿"八路军和游击队。并参与在全省进行"集家并村"，制造"无人区"。1943年8月，赫慕侠接替了吴元敏。

赫慕侠，辽宁凤城县人，1890年生，东三省陆军讲武堂第五期毕业。先后任陆军第八师中校副官长、上校团长、于芷山部卫队团团长。1933年，随于芷山投降日军，任伪满第一教导队少将队长兼奉天省警备军混成二旅旅长。由于其效忠日军，得到器重。1936年送日本陆军大学学习，1939年毕业。先后任第一、第八军管区参谋长、伪治安部参谋司长。1942年升为中将。任第七军管区司令官。1943年6月，因"五顶山事件"[②]被停职审查。日本人认为赫对日"忠心无二"。同年8年，调任第五军管区司令官，令其带过立功。赫到任后，除配合日军在长城沿线同八路军作战外，还指挥伪军积极在热河内地承德、平泉、宁城、围场等地"追剿"八路军和游击队，摧毁抗日根据地。

1943年以后，随着战局的发展，伪军中的反战情绪日增，伪军中逃亡、哗变和枪杀日本军官的事件不断发生。关东军对伪军越加不信任，为达到既限制伪军的战力，同时又要利用伪军的劳役这样的双重目地，便对伪军再次进行整编。把伪满军重武器收回，而扩编辎重队和工兵队。第五军管区原有1个辎重队，又增1个辎重队，1个工兵队。本管区及外调进伪满军总兵力已达4万人。占全

伪满总兵力 15 万人的 1/4。

组织机构

1、伪第五军管区组织机构

1942 年至 1945 年 8 月，伪第五军管区组织机构

司令官：吕衡、吴元敏、赫慕侠。

参谋长：吴国贵(少将)、戴元(少将)、林保治(日，少将)、栾彪(少将)。

主任顾问：小原真一(日，大佐)、江岛虎之助(日，大佐)。

顾问兼特务机关长：生田(日，中佐)。

经理顾问：水谷(日，少佐)

参谋处：

处长：河野满(日，大佐)、南清一(日，大佐)。作战参谋：田中原道(日，少佐)、大崎一(日，中佐)。情报参谋：田中巽(少校)、赵国棋(中校)。教育参谋：王寿山(少校)、苏畹天(中校)。后勤参谋：久米(日，上尉)。

处附：思想对策：滕井(日，上尉)。宣传：大野(日，上尉)、吉岗孝(日，上尉)。情报：杨小先(上尉)。

副官处：

处长：傅多士(上校)、猿渡(日，中佐)、狩元(日，中佐)。人事副官：徐培元(少校)、马场清(日，少佐)。庶务副官：春田(日，少佐)。

兵事处：处长：马超龙(上校)。军械处处长：王智闻(上校)、李甲辰(上校)。军需处处长：冯凌阁(上校)、李盛林(上校)、增田(日，中佐)。军医处处长：刘兴仁(上校)。兽医处处长：王经九(上校)。军法处处长：王冠英(上校)。通信队队长：工滕(日，上尉)。汽车队队长：近滕(日，少佐)

2、所辖部队

1940 年以后，伪满军实行新编制。步兵和骑兵分甲乙两种团。

甲种步兵团辖3个营,1个迫击炮连。共约1800人。乙种团辖2个营,1个迫击炮连。共约1300人。甲种骑兵团约800人,乙种团约600人。

1941年以后,我冀热边和热察边地区的抗日斗争不断向热河内地发展。日伪当局不断加强军事部署,不断从各军管区往热河调集部队。这些部队一部分直接编入第五军管区序列,一部分归该管区指挥,一部分由西南防卫司令部指挥。第五军管区所辖伪军由2个旅增加到4个旅。兵员每团由1500人增加到1800人。总兵力由1.55万人增加到2.8万人。

1942年整编成4个旅。除步兵八旅原建制未变外。又新编成3个旅:混成第六旅、步兵二十五旅、步兵第五旅。

1942年冬至1943年春改编为:步兵第五旅、步兵八旅。混成第五旅、混成第八旅。再次改编后仍为4个旅:步兵第五旅、步兵第八旅、混成二十五旅、混成三十三旅。1945年,全部改编成步兵旅。另编成辎重队2个,工兵队1个和独立炮兵营。

此外,1941年至1944年从伪满各军管区调到热河27个团另5个营。其中编入第五军管区2个旅3个团2个营。归该军管区指挥的1个旅5个团。归西南防卫司令部指挥的15个团3个营。

至此,在冀热辽地区的日伪军已达7万余人。其中热河伪满军4万多人,日本关东防卫军一O八师团1万余人,华北派遣军1.5万人。

参加制定"讨伐"计划及对八路军作战

日军侵占热河后,热河人民纷纷组织抗日义勇军,打击日伪军及伪组织。因此,从1933年到1937年,伪第五军管区的主要任务是配合日军,"围剿"抗日义勇军,收缴民间武器。1935年5月至7月,第五军管区司令部对热东抗日义勇军的活动发出8次通报。5月派骑兵五团及六团一部对刘振东领导的抗日义勇军进行"讨

伐”。同年8月上旬，派步兵四十四团在北票“讨伐”蓝天林领导的抗日灭满救国军。蓝率部在蒙古营伏击、毙伤俘伪军150余人。8月中旬，派驻赤峰的伪步兵四十二团、兴安警备团配合日军松井部队到朝阳县大黑山、三道梁子一带“追剿”蓝天林部。9月，派骑兵三十九团、四十团、步兵三十三团配合日军到热东地区“围剿”蓝天林、刘振东、高体乾、王国瑞等抗日武装，达3个多月，致使各部抗日义勇军受挫。在敌人大搜捕中，抗日军民300余人被杀害。1937年至1938年秋，日伪在朝阳、喀左、建昌等地实行“治安肃正”。由日军2个中队、伪军二十五旅、伪警察队500余人，组成扫荡部队，对“老梯子”、“老北风”等领导的抗日义勇军；李天德、郭文连领导的反满抗日仁义军；邓文山领导的“平康德”反满抗日军，进行反复“围剿”。日伪军所到之处，以“民匪分离”为借口，进行烧、杀、抢、掠，制造了许多惨案，使抗日义勇军各部受到严重损失。

在热南地区，1933年冬，承德县爆发了孙永勤领导的民众军（后改称“抗日救国军”）起义，发展到5000余人，活动在承德、兴隆、青龙等县及长城沿线地区，给日伪军及日伪组织很大打击。1934年至1935年上半年，第五军管区派混成二十六旅，配合日军对孙永勤抗日救国军进行反复“围剿”，致使起义军失败。在此期间，宁城、平泉、围场、赤峰等地曾多次发生红枪会抗日武装暴动，第五军管区均派兵配合日军进行镇压。

1937年“七七”事变后，中国由局部抗战转变为全面抗战。是年8月，国民党第二战区第十一军军长兼八十四师师长高桂滋，率部开到丰宁西南部长城沿线。伪治安部命令由伪靖安军步兵一团，炮兵队和第五教导队步兵五团，骑兵五团，独立汽车队共6千余人编为热河支队。靖安军司令滕井重郎少将任司令官。第五教导队队长朱家训少将任副司令官。8月16日至21日，与中国军队作战19次。17日在丰宁黑达营子一战，伪军遭重创。18日，支队司令官滕井在视察阵地时，被爱国志士、第一机枪连班长李玉峰击毙之

后，在 20、21 日作战中，敌指挥部被捣毁，副司令朱家训被击毙，骑兵五团在清风坨被歼大部，步兵五团二营被全歼，营长张正被俘。从此，热河支队垮台。是年 8 月下旬，又把伪第三教导调至滦平，归第五军管区指挥。9 月改称"石兰部队"。在长城内外与抗日部队作战 22 次。双方各有伤亡，抗日部队伤亡 160 余人。年底，高桂滋部撤走。

1937 年八九月间，毛泽东，中共中央提出发动以雾灵山为中心的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决策。1938 年 6 月，八路军第四纵队从平西挺进冀热边，在丰宁、滦平沿长城线攻克许多日伪据点，后又打下兴隆县城。7 月，爆发了以冀东为主体的冀热边人民武装抗日大起义。这一切，都使日伪当局惊恐不安。关东军集中兵力"围剿"，伪第五军管区积极予以配合。军管区主任顾问、日本驻承德特务机关长关原六，在北京设立了"关公馆"。从事与日本华北驻屯军联络工作。军管区除派混成二十六旅、骑兵七旅、驻扎在长城沿线参加作战外，又调甘珠尔札布率伪兴安省两个骑兵团，到热河"围剿"抗日部队，作战达 45 次，从而使抗日部队遭受严重挫折。9 月，冀东抗日起义失败，八路军第四纵队西撤后，留下包森、陈群、单德贵三个支队。抗日联军余部也组织起多股游击队，继续坚持冀热边地区游击战争。1939 年 2 月至 6 月，第五军管区又派两个旅协同日军在冀热边发动 5 次大规模扫荡，作战 230 余次，使抗日武装力量再次受到损失。1940 年 5 月，八路军冀察挺进军十团团长白乙化率一营和直属队挺进丰(宁)滦(平)密(云)地区以后，日伪军两次集中兵力进行扫荡。仅九十月间，日伪军就出动 4000 余人对丰滦密游击根据地进行为期 78 天的大扫荡。同时，伪军 1500 人也对大海坨地区进行扫荡，与我挺进军十团和游击队作战 37 次。1941 年五六月间，日本关东防卫军和华北驻屯军联合对冀热边地区进行大扫荡。第五军管区集结伪军和警察讨伐队 2 万余人参加。5 月，挺进军十团三营在水头村遭伪军伏击，教导员江鹤等 7 人牺

牲，营长翟飞等5人负伤。6月，伪步兵三十四团和第一特设支队在青龙、兴隆扫荡，我十二团及地方游击队伤亡200余人。

1941年秋，西南防卫司令官安滕忠一郎召开防务会议，拟定了秋季"肃正工作"计划，要求"进行情报、作战、后勤三位一体的讨伐"。第五军管区也划分为3个讨伐区配合讨伐。例如对丰滦密地区进行的毁灭性大扫荡，使丰滦密抗日根据地遭受重大损失，被杀害的干部和群众430多名，被抓捕1100余人。1943年1月，西南防卫司令部拟定了"围剿"光头山游击根据地计划。调集了日军独立守备七大队，十七大队。第五军管区混成六旅旅长杨子清坐镇平泉指挥，伪军十二团、十三团两个营、骑兵四十四团一部、步兵十团、炮兵五团、第七军管区赫奎部队(800人)，承德宪兵讨伐队，还有十几个警察讨伐队共1万余人，对光头山地区实行四面包围，分进合击。2月6日，又对在承德县三沟东沟开会的冀东十一团二连，十二团一连和远征工作队发起攻击。激战两昼夜，才突出重围，给抗日武装造成重大损失。

1943年2月，西南防卫司令部决定在长城沿线制造"千里无人区"。在热河的丰宁、滦平、兴隆、承德、青龙、平泉、宁城、凌源等县及建昌、喀左、隆化、围场、喀喇沁等县部分地区的抗日游击区，全面实行"集家并村"，制造"无人区"。第五军管区命令五旅、八旅、二十五旅负责调查和修筑据点及堡垒，并继续扫荡八路军和地方游击队。据伪军事部参谋司《情报月报》载，热河伪军这一年共扫荡240次，作战186次，造成抗日武装伤亡948人。在兴隆和青龙两县，第五军管区就动用了伪军十二团、三十四团、三团、八团、十七团、二十四团共8000余人，配合日军和警察讨伐队，搞"集家并村"，推行"三光"政策。在兴隆县，把11万多人(占总人口81%)赶进199个部落，烧毁房屋7万余间，有3000余人被杀害。青龙县有16.6万人被赶进358个部落，被毁掉1219个自然村(占全县73%)，被杀害7234人。同年，第五军管区配合日军集中兵力对承

平宁地区进行反复扫荡，采取"拉大网"、"梅花桩"、"接力战"及"剔抉剿灭"相结合的战术，使承平宁抗日游击根据地遭受很大破坏。

伪第五军管区的覆灭

1944年下半年，日本帝国主义虽败局已定，但仍妄图死守热河、察哈尔，在热察边地区推行"固边推进"政策，把热河划分为三个作战地区：（一）丰宁地区，担任热河西南省境和察哈尔赤城地区作战；（二）古北口地区，担任南部长城内外作战；（三）建平地区，担任热中、热东地区作战。从第一、二、四、六、八军管区抽调1个混成旅，5个步兵团，1个骑兵团增援热河。1945年夏，又以驻兴隆之黄方刚之二十四团为骨干及三团，八团编为步兵十二旅，黄升为少将，任旅长，兼兴隆地区防卫司令官。但都不能挽救其失败命运。随着冀热辽、冀察地区的抗日武装力量的不断发展壮大，便有计划地对日伪军实行了主动出击。在冀察地区，1945年3月3日，十二军分区政委段苏权指挥十团3个连和延庆县大队，在吕后庄伏击伪军三十五团1个营，全歼尖兵排，击毙伪军30余人，俘100余人。3月下旬，十二军分区司令员詹大南、政委段苏权指挥十团和警卫连，在南梁一战，毙伤日军70余人，伪军300余人。5月至7月又发动两次战役，逼退伪满军第一道防线。特别是7月下旬，设伏龙门所一战，歼灭伪军六团一个营，击毙日本少校副团长兼营长太田茂以下50余人。俘副营长王国士以下270人。

在冀热辽地区，6月下旬，向热河派出3路挺北支队，主动出击。三路挺北支队一齐动作，打乱了热河日伪军的阵脚，东拼西调，疲于奔命。赫慕侠、根东亲自到围场坐阵指挥，也挽救不了其覆灭的命运。

1945年"八·一五"，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冀热辽地区八路军和游击队纷纷出击，敦促日伪军投降。8月18日至22日，挺北第一支队在苏蒙联军配合下先后解放了丰宁、围场、隆化等县城。8

月19日苏蒙联军进占承德，俘掳了第五军管区司令赫慕侠、参谋长栾彪、五旅旅长戴元、八旅旅长于泽甫等17名将校及高级顾问根东、高级参谋南清一等。驻青龙的伪军四旅二十四团跑进关内投降了国民党，十七团走到绥中，在苏军协助下缴械投降。驻平泉的伪军十二团，在团长张祥恩带领下向冀热辽十一团缴械投降。驻兴隆的伪军二十四团、三团及八团、十一团各一部在我十四军分区司令员舒行、政委李子光争取下，由伪兴隆地区防卫司令黄方刚率领起义。驻滦平、密云之伪军三十四团、三十五团，被滦昌怀县支队在卢庄歼其一部，残部由伪三十五团团长王景南带领逃往北平，投降了国民党。驻丰宁大阁的伪军第五旅，被挺北第一支队在苏蒙联军配合下缴械。驻赤峰的伪军三十三旅，在苏蒙联军到赤峰时自行瓦解，跑回东北。其他流窜到各地的伪军，也都被我地方武装歼灭或收编。至此，伪第五军管区彻底垮台。

注释：

①《辽宁文史人物录》邢士廉条记载为"受任淞戒严司令。

②1943年5月2日，日本关东军驻伪满最高顾问楠木笹隆中将和伪军事部大臣邢士廉到富锦县视察秘密军事要塞——五顶山阵地。第七军管区司令官赫慕侠、靖安军司令官姜藏等陪同。在下马时，带马兵常隆基向楠木左胸开了两枪，把勋章和钢笔打碎，楠木当即倒地(未中要害)。又向邢开了两枪，未打中，然后骑马逃走。后在日伪当局严密搜捕下，投江自杀，此事件在日伪军中引起很大震动。

——编者注

伪热河省的警察讨伐队

沙万川

伪热河省地处伪满洲国西南国境线上自1940年起就是敌我双方激烈争夺的地带。做为日本帝国主义的鹰犬——伪警察讨伐队，起到了日寇所起不到的作用。他们在"围剿"抗日军政人员上是穷凶极恶的，他们在执行"三光"政策上是极端残酷的。

伪满初期(1933——1938年间)，日寇在伪热河省南部派有重兵驻守。当时长城沿线的青龙、兴隆、滦平、丰宁等县也只设警察署、所。偶而有抗日武装活动，便临时抽调警察组成讨伐队或警备队赶赴出事地点，执行警戒任务，维护当地的治安。

随着抗日形势的发展，抗日武装力量不断发展壮大。1938年建立承(德)、兴(隆)、平(泉)联合县；1941年4月建青(龙)、平(泉)联合县；1943年5月成立承(德)、平(泉)宁(城)联合县和承平宁工作委员会。这就使敌人慌了手脚，他们开始调集和组建伪热河省、县、旗警察讨伐队。

讨伐队成立背景

伪热河省警察讨伐队是在日军指挥下以汉奸、叛徒为骨干，网罗地痞、流氓、土匪、烟鬼及少数无业青年为基础组织起来的。他们的核心领导人物是岸谷隆一郎、姜全我、陈天喜和杰川。岸谷在伪满洲国成立后，1931年就任伪通化省警务厅长，是"围剿"抗日联军的元凶，1943年调任伪热河省次长(解放后夫妇共同自杀于承德)。姜全我原名姜义原，是奉系东边道镇守使。"九·一八"事变后，投靠日本，充当"围剿"抗日联军的急先锋，任伪满洲国通化省

长，后任热河省长(1944年病死)。陈天喜又名陈尔玉，绰号陈大炮，辽阳人，二十年代末期留学日本，伪满洲国成立后任通化县辑安(现集安)县县长，后任伪热河省警察讨伐队“一心总队”本部司令。杰川(日人)在通化时就组建伪警察讨伐队，后任“一心总队”本部副司令。

伪热河省讨伐队是在日本帝国主义者“围剿”东北抗日联军中形成发展起来的。从日本关东军的铁蹄踏入沈阳那天起，东北人民就展开了不屈不挠的斗争。中共满洲省委根据周恩来同志《用民族革命战争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精神：一方面动员革命工人和知识分子到抗日义勇军和山林队中做工作；一方面指示各地党组织创建在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下的抗日游击队。1935至1936年由游击队组建了东北抗日联军。当时共有十一个军，人数达3.5万人。东北抗联的发展和壮大，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勃勃野心与侵略计划构成严重威胁。关东军为了巩固东北这块侵略基地采取了增兵讨伐的办法。1936年初，日军竟增至十二个师团、四个混成旅和一个专驻间岛的“朝鲜派遣军”师团，外加铁道守备队以及伪满军的兵力。敌人对抗日游击区采取：定期、定点、定人的大讨伐。他们集中兵力纵横扫荡，来回拉网，所谓“篦梳式”、“踩踏式”办法对付抗联及广大群众。实行了军事上、政治上(招降)、经济(封锁给养来源)上全面的大扫荡。日本总兵力约30万人。在这种情况下，抗联中的一些不坚定分子叛变投敌。他们组成日伪警察讨伐队掉转枪口来残杀自己的同胞。在此期间，日本帝国主义在伪中央警察学校(长春)、伪奉天警察学校、伪通化地方警察学校培养出一批警察讨伐队骨干分子和中层讨伐队骨干。在此基础上，招募一些兵痞、地痞、土匪、流氓和一些无业游民而组成了警察讨伐队。

伪热河省的警察讨伐队

伪热河省的警察讨伐队也可以说是伪满洲国的讨伐队。原因：

(1)别的省份没有;(2)它受全满洲国战事的支配,哪里战事最吃紧就把它调到哪里去。伪热河省的警察讨伐队,基本上可分省、县两级。在通常情况下,省级讨伐队由省警务厅调遣;县级讨伐队归县警务科指挥。但县警务科也有权调用驻在本县的省级讨伐队。省、县两级讨伐队,彼此没有隶属关系。讨伐队的名称是根据大队长名字的前两个字而命名的。讨伐队的名称时有变动,那是因扩大编制或被打垮后重新编制的缘故。

一、程斌讨伐队。它的大队长叫程斌,曾用名程志平。男,汉族,生于吉林省伊通县。长春市自强中学毕业。1930 年入长春市大恒表店当学徒。1931 年"九·一八"事变后,由东光介绍加入盘石县抗日救国会并参加了义勇军。1932 年春于伊通县三道河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秋,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十二军南满游击队第四小队长。1933 年 9 月,任东北人民革命军独立师政治部保安连政治委员。1934 年任柳河县游击队政治部主任。1935 年秋,任东北抗日联军第一师师长。

1936 年 7 月,抗联一军一师西征失利,重返桓仁县(现辽宁东部)老虎岭子一带活动。1938 年春,一师进入本溪县老和尚帽子山区开展游击战争。此地山高、林密,地势险要。一师虽然和军部及杨靖宇司令失去了联络,但部队在程斌领导下仍同日寇进行了顽强的斗争,给敌以沉重打击。这时日寇调集以黑骑游击队为主的大批人马,对一师进行了疯狂的讨伐和"围剿",与此同时加紧实行"归屯并户"和"集团部落",使一师同当地群众基本上中断了联系,致使一师给养发生极大的困难。程斌感到在此地难以坚持下去,便带领部队向宽甸一带转移。在这一带的深山里,日寇的扫荡、讨伐更紧,加之人地两生,立足困难,斗争无法开展。面对这种情况,程斌决定率师重返本溪老和尚帽子根据地。

早在 1937 年 3 月,日寇长岛工作班就将中共柳河县委瓦解破坏,逮捕了原县委书记冯剑英(又名崔凤官,朝鲜族)。冯贪生怕死,

在敌人威逼利诱下叛变投敌。在他的阴谋策划下，长岛工作班于同年5月派员潜入一师的根据地——桓仁、新宾、宽甸、本溪、凤城等山区。他们对我采取袭击手段、逮捕和瓦解。同年12月21日，原一军军事部长被捕，后叛变投敌。1938年2月13日，原一军政治部主任安广勋也被俘叛变。这些叛徒为效忠日寇而献计献策：程斌事母至孝，1938年夏，长岛工作班沙山伍长和叛徒胡国臣等人抓住了程母张氏和程斌的哥哥程恩。并将程母及程恩的照片印到传单上，到处张贴、散发，以此做为人质要挟程斌投降。

程斌见到日寇传单后，既担心母兄的生命，又感到部队处境险恶，他对斗争前途产生了怀疑和动摇，投敌想法渐渐成熟。

1938年6月27日，程斌召集六团政委李刺苏和保安连政委李向前（又名金钟汉，朝鲜族）开会，以研究去碱厂找给养为由，试探二李对投降的态度。李对程的投敌意图进行了抵制，说："就是三天三夜不吃饭，我们也要革命，投降敌人是可耻的！"程斌做贼心虚，在李站起来往回走的时候，程突然开枪将李打死。然后又向李向前开枪，将李脖子打伤，李带伤逃走。

6月28日，程斌写了一封亲笔信，转交长岛工作班，策划投降事宜。下午2时许，程斌召集班长以上干部会。程斌开门见山地说："这些天的情况你们都看见了，军部已经联系不上了；日本人已经把汽车路修到老和尚帽子山上了；现在山下到处是日本人的帐篷，他们对我们追逼的很紧；我们是没有希望了，我要领着你们投降去！我是一定到满洲国去了，见见我的母亲。自古忠孝不能两全，我为国已尽忠了，现在我要为母尽孝。你们要不愿意去，我自己去。"

抗联一军一师150人在程斌挟迫下背叛革命，投降日寇。程斌等投敌时携带平射炮1门，炮弹30余发，机枪5挺，长短枪174支，子弹6200余发。

就在程斌召集干部投降以后，30多名坚决不投降的战士在祁

排长和宣传科长常靖带领下，离开一师，继续坚持在本溪县境内同日寇进行斗争。7 月中旬，祁排长同十几名战士在对敌人战斗中壮烈牺牲。

程斌投降后，被编入长岛工作班。在本溪经过 20 多天的初步整训即开赴通化庙沟，驻南大营进行改编和训练，正式编入伪通化省警务厅富森警察队。从 1938 年 10 月开始，程斌在日寇直接指挥下开赴辑(集)安、临江等县讨伐杨靖宇将军及其领导的抗日队伍。程斌由于过去在抗联一军中任重要职务，不仅了解杨靖宇将军的战略战术，而且了解关系到抗联生存与斗争的军需供应方面的机密。因此，程斌的叛变给杨靖宇将军及其领导的部队造成极大的威胁和严重的危害。

1938 年 7 月末，富森接任工作班长兼警察大队长，程斌任副警察大队长。1939 年 8 月，程斌任伪通化省警察大队长(警佐衔)，当时驻防地在临江县八道江。在此期间，程多次参加讨伐抗联军队，他主动向其主子献计献策，并亲自带队破坏我抗联建立在密林中的一些被服厂、医院、修械所及粮食、武器、弹药的秘密储藏点。使抗联蒙受巨大损失。

1940 年 2 月 23 日，杨靖宇将军牺牲后，伪通化省警务厅长岸谷隆一郎让程斌确认牺牲后的杨靖宇的尸体。经他认定后，日寇才将杨靖宇的头颅割下，在临江县举行“讨伐场靖宇庆功大会”，程斌也率队参加了这个会议。

1941 年 8 月，程斌大队调到伪热河省增援日寇扫荡。驻守地主要在滦平鞍匠屯一带，也时常去青龙、兴隆等地参加讨伐八路军，后编入“一心总队”，常驻遵化。他们协助日寇实行“三光”政策，杀害百姓，烧毁民房，制造“无人区”。关于程斌和姜全我之间还有一段趣闻，就是姜全我曾把自己女儿嫁给了程斌。

二、曲焕队。队长曲焕文，字梦华，伪通化省临江县六道沟东马鹿泡人。他家是个大地主。20 年代末，他先在伪锦州交通大学读

书，后转到沈阳冯庸大学学习。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他在伪满临江县六道沟村当村长。他任伪村长期间，积极效忠日寇，受到伪临江县参事官谷川章(日本人)的赏识。1933年提升为六道沟伪警察署长。1938—1940年冬任临江县警察大队长。在任讨伐大队长期间，因讨伐有功，伪满洲国治安部曾授予他“警察最高赏”的奖励。1943年升任伪隆化县警务科长(警正衔)。1944年调“一心总队”，任警察大队长。在此期间，他率部在长城内外对八路军大肆讨伐，“围剿”屠杀抗日军民。

三、刘其讨伐队。大队长刘其昌，字瑞符。原奉天(辽宁)省辽中县中兴堡同合屯人。他生于1890年，幼年时期家境比较贫困，1906年前后在家放猪。1907年至1909年手领瞎子出外算卦。1909—1911年在本屯私塾边做饭，边读书。

1912年，他跑到奉天当募兵，从此开始了兵痞生涯。次年，随军到河南，直至1924年在于学忠部由普通兵任司书。1921年在奉军五O团先任传令兵后升为班长。同年12月考入军校，1922年回到五O团任中士班长。1924年任少尉排长。1925年在冯玉祥国民军第四军任连长。1926年第四军归吴佩孚管辖时任连长。1927年5月，到北京投张学良部下任警备五团三营五连长。1934年日本占领东北和热河后，他逃回老家辽中县。1935年，他投到日伪辽中县警察队，为日本帝国主义效劳。1936年3月1日，转到东边道“围剿”抗联部队，因“围剿”抗联有功升任少尉排长。1938年，辽东县警察队改编为抚松县警察游击队，刘任小队长。1939年，刘其昌被编到唐振讨伐队，任中队长。1940年，刘其昌升为唐振讨伐队的副队长。在“围剿”杨靖宇的部队中，除日军外主要是唐振队和程斌队。杀害杨靖宇的直接部队就是唐振队，直接杀害杨靖宇的凶手就是三中队的苏子奎。刘其昌在“围剿”抗日联军中立了大功，得了日本的最高奖赏。特地让他到日本参观40天，他回国后，就成立了刘其讨伐队，晋升警佐。

1941 年，刘其队由东边道调到热河讨伐八路军。哪里有抗日军队，他的部队就到哪里。刘其队的驻地主要有：滦平、青龙、兴隆、喀喇沁中旗（平泉、宁城）、玉田、遵化一带。据他自己供认：3 年间，他率部杀害我干部战士 760 名。高桥以及 17 名三区队抗日战士就是由他的两个中队“围剿”而杀害的。1945 年，刘其队也调入“一心总队”。

四、王熙队。队长王熙让，辑（集）安县人。副队长金夏泰、又名金正月，朝鲜族，是抗日联军的叛徒。这个队有抗联叛徒四五十人。王熙队 1942 年调入热河省驻地有：凌源、平泉、宁城、遵化，他们曾多次讨伐我八路军及帮助日寇实行“三光”政策。1945 年编入“一心总队”。

五、梁润队。队长梁润武，1944 年由通化调入“一心总队”。

六、吴太队。队长是吴太福，1944 年 9 月调入“一心总队”。

七、姜大队。队长是姜大祥，1942 年由通化调入伪热河省。常驻：青龙、蘑菇岭、建昌营一带，1944 年编入“一心总队”。

八、唐振队。队长唐振东，土匪出身，伪通化省抚松县人，不识字，性凶残。他手下的士兵多是土匪。调入伪热河省后常驻喜峰口、界岭口、义院口，后编入“一心总队”。

九、李兴队。队长李兴绍，通化人，1942 年调入热河，常驻青龙县。1944 年编入“一心总队”，接替原石振（东）大队长的职务。

十、王超队。队长王超山，它是原通化省警察讨伐队。1943 年调进热河省。1944 年编入“一心总队”。

十一、孙德队。队长孙德英，1942 年由伪通化省调到热河，常驻青龙县杨树窝铺、钟响沟一带。1944 年编入“一心总队”。

十二、胡国臣工作队。胡国臣是抗联一师的叛徒，投降后在长岛工作班长期做特务工作。编入“一心总队”后，仍做特务工作故名工作队。

除此之外，调入热河而没编入“一心总队”的还有：范文队，队

长范文喻，伪间岛省长白县人，1940 年 7 月 1 日任伪延吉县游击队队长，1943 年调到热河，常驻喀喇沁中旗；桑文队，队长桑文海，伪间岛省(延边)临江(靖宇)县人，1943 年调入热河，常驻丰宁、滦平一带。

省讨伐队的兵员一般是 250—300 人。武器配备：轻机枪 6—8 挺；步枪 209—262 支；手枪 36—49 支；自动短枪 2—4 支。这种兵力、武器配备情况，从建立到瓦解大致如此。

伪热河省的旗、县讨伐队

一、青龙县讨伐队。青龙原伪满洲国西南边防。1939 年冀东军分区就向这里派出了武装抗日队伍。特别是 1941 年袭击凉水河后，日寇惊恐万状。1941 年冬，从东边道调到县警察讨伐队，前后计有 13 个之多。这些讨伐队有的就在青龙长期驻防，有的是做应援工作。

1943 年，伪青龙县警务科正式组建青龙县警察讨伐队司令部。司令由警务科长池尾(日本人)兼任，副司令张金祥兼巡防队队长；作战主任金彬；经理业务张敏；业务朱云甫。

伪青龙县讨伐队司令部成立之后，把调集在青龙的各种杂牌军改编成 13 个警察队。即：1、张金队、2、于友队、3、张雪队、4、赵福队、5、李凤队、6、李兴队(罗景队)、7、朱胜队、8、姜振队、9、罗振队、10、李墨队、11、杨东队 12、张炳队(赵辅队)、13、刘福队。

二、兴隆县讨伐队

兴隆和青龙一样，是敌我斗争最激烈的地带。从 1940 年到 1945 年日本无条件投降，有 20 多个讨伐队驻扎在这里。兴隆的讨伐队都是从外地调入的，而且时有变动。1943 年驻扎在该县的讨伐队，主要有：

1、邢昌队、2、马玉队、3、郭建队、4、李勇队、5、宋庆队、6、金殿队、7、孙德队、8、唐振队。

在兴隆讨伐队中都有相当一部分日本人，副大队长由日本人充任，通讯设备悉由日本人管理。讨伐队一般装备：三八式步枪、轻机枪和掷弹筒。

三、伪承德县的警察讨伐队

伪承德县的警察讨伐队是在1942年（伪康德九年）由县警务科着手组建的。当时对外名义是警察训练所。1943年（伪康德十年）正式建立了5个讨伐队。即：1、王禹讨伐队、2、李旭队、3、那文队、4、朱景队、5、兰学队。

除此之外，还有由伪承德警务科警防股长黑岩（日本人，警佐衔）成立的临时讨伐队。它的兵力从各警察署临时抽调，有时达400人。黑岩队凶狠残暴，在执行"三光"政策上是无人可比拟的，仅上谷村被他杀害的就有20人。当地人都以黑岩来吓唬哭闹的孩子，一说"黑岩来子！"孩子就不敢哭啦。他的翻译贾庆功（大连人）也是一个残忍的家伙。

四、伪滦平县的警察讨伐队

滦平在伪满边防来说，属于第二防线。日伪统治比较稳固，因此，在这里招募一些人成立了警察讨伐队。伪滦平县讨伐队由警务科长酒井次郎（日本人）直接领导。该县讨伐队共有8个。它们是：

1、刘宗队、2、姜振队、3、胡新队、4、孟庆队、5、柴如队、6、彭明队、7、房德队、8、田嵩队。

兵力、武器配备情况与其他旗县的警察队大致相同。

五、伪满喀喇沁中旗（平泉、宁城）的警察讨伐队

随着抗日形势的发展，所谓"第二线"的伪喀喇沁中旗，也有了重大的武装抗日活动，这里除有刘其、王熙、范文等省的讨伐队外，在本旗也建起了警察讨伐队。在喀喇沁中旗建立的讨伐队有：纪东讨伐队、韩全讨伐队和长期驻在宁城的道路警备队。

一、纪东讨伐队。该队1936年（伪康德三年）开始组建，1938年（伪康德五年）正式建成。队长纪东阁又名纪云陵，生于1907年，

原籍平泉北洼子店人,后移居平泉小校场。纪东阁不识字,由于积极效忠日寇,由警士升到警佐,当时称“建国警”。他娶两房女人:大女人姓王,西窝铺人;小女人姓李,凌源人。小女人是他任宁城警察署长时在宁城高级小学挑选的。

讨伐队部当初在平泉街小校场,1942 年(伪康德 9 年)7 月搬到平泉卧龙岗西窝铺王殿甲东院。

二、韩全讨伐队。队长韩全福,蒙族,原籍宁城北洼子庙,后迁居大城子东五家。

韩全福在民国年间就在喀喇沁中旗王府保安队,后任班长。1943 年日军占领宁城,中旗王归顺日伪。日伪成立喀喇沁中旗保安队时,韩全福任骑兵保安队长。

1944 年伪警务科决定成立蒙古警察讨伐队,韩全福任队长。队部设在三座店。部队的兵员大部分是在当地招募的。

三、道路警备队

喜峰口—平泉—八里罕—宁城(小城子)—赤峰的公路,叫做赤喜公路。以八里罕为中心,西到黑里河,东到天义均有道路可通。日寇为确保道路畅通,在八里罕建立道路警备队。

队长先是阎荣发,后由李跃章接替。李跃章警佐衔,平泉小寺沟人。

伪热河省只有以上五个旗县有警察讨伐队。

伪热河省、县讨伐队的末日

自 1944 年 9 月成立“一心总队”以来,以陈天喜为首的总部一直驻在遵化县城。1945 年 8 月 13 日,他们在收音机里听到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的消息。在陈天喜、程斌、曲焕文、吴太福等策划下,发动哗变,将“一心总队”本部八十多名日本人全部处死,严密控制队伍以观时局变化。

1945 年 8 月 15 日,我八路军第十五分区警卫团杨政委前往

“一心总队”本部驻地商谈受降问题。这时，陈天喜一面派人到唐山与国民党联系；一面命程斌与八路军假意谈判。程斌对杨政委实行软禁。

陈天喜、程斌等在投靠谁的问题上的对策是：国共双方都愿意收我们，但要看投谁有利。几经策划，陈天喜等决定投靠国民党。原因：(一)七八年来同共产党八路军积怨太深，旧账难平；(二)国民党军是正统的军队，八路军是“共匪”，不如国民党名正言顺。因而，将杨政委关押狱中折磨致死。

1945 年 9 月，陈天喜等率部投靠国民党军，所部被编为东北行辕直属第三纵队，陈天喜任总司令，程斌任副总司令。讨伐队中小头目各有所差，驻守在遵化县城。陈天喜、程斌令其部下拆房扒庙，修筑工事，与我对抗 4 个月之久。陈天喜、程斌拼死顽抗，仅在我军进攻遵化的一次战斗中，致使我军损失 1 营兵力。在城内残杀区村干部和无辜百姓 20 余人，并将尸体投入井中。我军解放遵化县城时，在国民党飞机掩护下，陈、程率残部逃往唐山。陈明仁将其残部收编为第六师。陈天喜为师长，程斌为上校副师长，继续向我东北解放区进犯。

1946 年 6 月 6 日，国共双方“停战协定”正式生效。6 月 7 日，陈天喜、程斌率部下 1700 多人向我军占领的法库县城进犯，俘我人员 30 余名。当日 11 时侵占法库县城。因程斌侵占法库有功，当即提升为少将副师长。当“三人军调小组”前往法库调查事实真相时，程斌等多方设置障碍，并伪造 6 月 6 日已进占法库的证据。他收买了一个作风败坏的女人(姓夏的天主教徒)与两个加拿大的传教士做伪证，以逃脱破坏停战的罪责。另外，程斌还组织特务匪徒化装成老百姓向“三人军调小组”控告我军，制造混乱，破坏调查正常进行。他们还布置国民党员、三青团员以招待员名义监视我方代表行动。在调查事件中，对我方代表百般刁难。他们接到东北行辕密令：将 100 多名将军上兵化装成八路军，待与“三人军调小组”谈

判失败后，乘“三人军调小组”返回沈阳之际，在途中将调查组人员全部杀死，烧毁汽车，企图嫁祸于我方，以掩盖国民党第六师侵占法库的罪行。

1948年2月，陈天喜调往长沙，程斌调任五十三军任高级参谋。11月，沈阳解放。程斌见蒋军土崩瓦解，遂带其母张氏、妻尤贤以及两个孩子乘飞机逃往北平匿居。暗中同国民党长沙市警备司令部办公厅主任陈天喜勾结，准备乘机逃往长沙。

北平和平解放后，陈天喜下落不明。程斌隐瞒其罪恶历史，伪装进步，于1950年2月混入我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后勤部军械处工作。

1951年4月28日，程斌在北京市东单牌楼胡同11号被我逮捕归案。经北京市公安局审核批复，将其解至热河原地处置。1951年5月12日，叛徒程斌被我热河省人民法院判处死刑，处决于承德市。

曲焕文随同陈天喜、程斌等投靠国民党后，被改编为保安第三队，后改为独立第三师。曲焕文任该师上校参谋长。1947年调任东北“剿共”总司令部上校高参。1948年辽沈战役被俘，全国解放后被镇压。

刘其昌随同陈天喜投靠国民党。1946年任杜聿明部陆军第六师十七团长。同年8月任四十六团团长，1947年4月，国民党进攻长春时，调往德惠作预备队，后退守四平。解放军第一次进攻四平时，四十六团全部被歼。7月，刘其昌被撤职，到军官队任上校。1948年10月，回辽中老家开聚隆昌杂货铺。沈阳解放前夕逃往北平，住隆福寺门牌七十七号。1951年被捕归案，镇压于兴隆县。

唐振东随陈天喜投靠国民党后，跟程斌活动。在辽沈战役中被俘。因罪行严重，1959年解送回他的家乡——抚松就地枪决。

其他如：王熙让、李兴绍、吴太福、王超山、孙德英、梁润武、胡国臣、姜大祥等均在辽沈战役中下落不明。

伪满各县旗的警察讨伐队，在日本投降后，多数被我八路军改编，少数逃散。如青龙县的警察讨伐队副司令张金祥带领他掌管的8个讨伐队，1个骑兵队和1个特务队，以及设在龙王庙、隔河头、双山子、大仗子、汤道河、冷口、大地等地警察署的武装警察2000多人投降了八路军，被冀察热辽军区第十六军分区接收改编为八路军第三纵队(旅)，张金祥任司令员。下设2个团，12个连。第一团长是原讨伐队长李凤阁，第二团长是原讨伐队长赵辅臣。

伪喀喇沁中旗(平泉、宁城)的警察讨伐队大多数遣散，少数为我收编为平泉支队。1945年"八·一五"后，纪东阁、韩全福连同伪警务科长申麟书、伪协和会长王雅斋被我监禁。9月间，在平泉马路口东大桥被枪决。道路警备队长李跃章在任时对我和当地群众没有恶意，得到群众谅解。解放后，回家务农，1977年因病死去。承德县的那文泉也是如此，因病死去。

承德宪兵队及其暴行

傅大中

“西南治安肃正”在1942年至1944年达到了高潮，其中在抗日战争相持阶段的1943年最为残酷。当时受害最重的是承德、滦平、丰宁、青龙、兴隆5个靠近长城的县。这场大规模的武装镇压的最高指挥者，是关东军西南防卫军司令官。主要参加者有日伪军、警、宪、政、协和会五部分，人数在30万以上。这场讨伐中，日伪方面搬用了对通化地区讨伐的经验，并把参与策划通化地区讨伐的主要罪魁，都调到这一地区指挥讨伐。在通化大讨伐中罪恶累累的程斌、唐振东等8个通化警察大队，全部被调到热河，改编成热河警察大队，伪满宪兵总团也临时从各地抽调宪兵编成“西南特务宪兵队”。

承德宪兵队也根据讨伐的需要，改变了机构。除原设的各分队、分遣队继续保留外，1943年1月，又从作战部队抽调数百名“补助宪兵”，与宪补、宪兵补编成3个宪兵游击队，每队120余人，下设3个小队、9个分队。从全伪满挑选政治镇压经验丰富的宪兵干部出任队长，分队长。当时第一游击队长是“闻名”全伪满的日本宪兵中尉长岛玉次郎，他以古北口宪兵分队长身份指挥第一游击队在承德、滦平、兴隆等县活动，主要目标是镇压中共承滦兴县委；第二游击队以承德宪兵分队长生田为首，活动在承兴两县交界的半壁山地区，以镇压中共迁遵兴县委为主要任务；第三游击队以喜峰口分队长三井秀夫为首，重点活动在青龙县内，以镇压中共迁青平县委为主要活动目标。

1944年3月，日军调整了热河的兵力部署。从华北调来一个

师团，接替热河独立守备队，进热河地区进行讨伐。该师团长接任西南防卫军司令官后，根据热河地区的特殊情况，把华北特别警备队的组织活动方式移入到热河，重新改组了热河的宪兵组织。

首先，他将承德宪兵队原有的承德、青龙、喜峰口、赤峰、平泉、古北口5个分队的兵力压缩，使其专门担当军事警察任务。在交通要道，“治安不良”地区的茶棚、宽城、双山、峪耳崖、琉璃庙、白城子、马兰峪、叶柏寿、上谷、凌源等地设立了宪兵分遣队，由承德宪兵队本部统一指挥，配合宪兵特别警备小队活动，这些宪兵派遣队以后都改编成宪兵分遣队。

同时，又将3个宪兵游击队编成8个特别警备小队，每队50人，下设3个分队9个组，全部改成轻装，专门对付八路军的小股部队和中共地下县委的干部。1944年改编后的宪兵特别警备小队配备情况如下：

第一小队：队长 承德分队长笠井神夫中尉兼，主要活动在喀左旗和凌源地区。

第二小队：队长 古北口分队长长岛玉次郎中尉兼，主要在喀中黄土梁子一带活动。

第三小队：队长 赤峰分队长百岛少尉兼，主要在青龙、宽城地区活动。

第四小队：队长 青龙（喜峰口）宪兵分队长佐佐木宪兵少尉兼，在青龙地区活动。

第五小队：队长 青龙宪兵队附高山准尉兼，在青龙县双山子一带活动。

第六小队：队长 平泉宪兵分遣队木下宪兵准尉兼，在喀左、宁城地区活动。

第七小队：队长 承德宪兵分队副仓岗准尉兼，在承德地区活动。

第八小队：队长 不清楚。

1943年6月，承德宪兵队特高课长木村光明，还与西南防卫军参谋、热河省警备厅特高课长、协和会长等人共同策划了对“家理教”的收买活动。历史上由于热河地区是蒙汉民族杂居区，民族矛盾异常尖锐，导致“家理教”、“红枪会”一类邪教团体在这一地区民众中有相当的影响。承德宪兵队为利用这些邪教团体配合讨伐和镇压活动，决定对其进行收买。结果，承德宪兵队将“家理教”的20余名头目都收买成特务班长，责令热河省协和会和警务厅为其提供经费，指挥他们大力发展教徒，以此搜集八路军和中共地下组织的活动情报。

“西南治安肃正”期间，日伪警宪配合军事讨伐，在这一地区疯狂地进行搜捕、抓人，制造了无数起血案，承德宪兵队便是其元凶罪魁。现列举承德宪兵队直接参与指挥的重大血案2例：

半壁山地区的三次大逮捕

半壁山地区位于兴隆县东南部，是八路军晋察冀第十三军分区在冀热边开辟的抗日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早在1939年，这一地区就是敌后游击区。1940年3月，中共迁遵兴联合县委成立后，领导该地人民与日本帝国主义进行了殊死的斗争。在这一地区，村村都有中共的基层组织，大部分村庄都建立了两面政权，少数村庄还建立了抗日武装。抗日民众配合敌后政权征粮、征物，转储物资，坚壁清野，配合主力部队破坏日伪的交通，传递情报，开展游击战争。因此，这一地区也成了“西南治安肃正”中的重点。在1942年、1943年、1944年3个春节，承德宪兵队在日伪军警的配合下，利用中国人民在家过春节的民族风俗，连续进行了3次大逮捕，据统计，有1890名群众被捕，数百人被处死。

1942年旧历腊月25开始的第一次大逮捕，是喜峰口宪兵分队直接指挥的。在此之前，喜峰口分队指挥伪半壁山警察署派出大量便衣特务潜入到这一地区，对抗日家属、区村干部、进步人士、接

近八路军者、积极交公粮的人等进行调查。之后，在大批日伪军警的配合下，将这一地区的各个村庄包围，宪兵按名单抓人，然后送兴隆特别治安庭审判。这次镇压相当残酷，共有五六百人被捕，近百人被处死。余者多被课以重刑，押到东北各地做劳工。第二次大逮捕是在1943年旧历腊月二十九至正月初进行，逮捕的方式和第一次相同。由于这一年是“西南治安肃正”最残酷的一年，因此，这次在半壁山地区的逮捕也最为残酷，有900多人被捕。锦州特别治安庭派出人员在当地设置“临时治安庭”，随抓随开庭审判。不出数日，即有百余人被一审判处死刑，由宪兵和警察就地进行集体屠杀。第三次大逮捕是在1944年旧历腊月二十八到正月初四进行的。在这次大逮捕中，敌人采用了和前两次完全不同的作法，见到中国人就抓，尤其是在靠近长城的靳杖子、冷嘴头、赵杖子等村最为残酷。其中，仅靳杖子一村就有100多人被捕。这次大逮捕，半壁山地区数十个村庄无一幸免，共有1300余人被捕。

据当地调查证实，日本帝国主义在这一地区的屠杀暴行令人发指，被杀绝斩尽的不下几十户，上至六七十岁的老人，下至不满周岁的儿童，以至哑巴、残疾人都无一幸免。由于屠杀，在蓝旗营村造成了“万人坑”，在大莫峪等村造成了“寡妇庄”。1944年以后，这一地区成了“无人区”。

九虎岭惨案

九虎岭村位于青龙县西部的迁青平抗日根据地内。1941年以后，中共冀东党分委领导下的迁青平联合县委经常在这地区活动。在九岭虎岭村中有一个仅有30来户的小庄叫九虎岭庄，1942年7月和1943年1月，曾两次受到日寇的血洗，数次遭到劫难，其中1943年1月的一次最为悲惨。

这年1月，喜峰口宪兵分队宽城子派遣队的密探侦知，八路军迁青平县委正在九虎岭村开会，承德宪兵队长得到喜峰口宪兵分

队长的报告后，鉴于这一带抗日武装的强大，遂立即从承德、古北口两地调集了100余名宪兵，加之喜峰口分队的60余名宪兵，联合组成搜索队，在本部特高课长木村光明的带领下，连夜便装将九虎岭庄包围。由于县委干部撤走，宪兵遂对民众采取了残忍的报复手段，抓捕了19人，将14人当场杀害。其残害的手段令人发指：有的被打碎下颌致死；有的被按在地上挖去双眼；有的被挖去心；有的被塞进冰窟窿；有的用三角尖木棍穿透胸膛钉在地上钉死。宪兵在过堂审讯时，使用的手段更加残酷：有的被烧红的烙铁烙掉了鼻子，有的被烙得露出了天灵盖骨。不仅对成年人如此，对未满周岁的婴儿也不放过。村民刘文振8个月的小孩，被日本宪兵从其母亲的怀里夺去，活活摔死。由于日寇的残暴杀戮，这个仅30来户的小村庄就绝户了7家。

“西南治安肃正”期间，承德宪兵队除直接参与制造了上述几起大惨案外，在最残酷的1943年，还指挥了全热河的日伪警察，两次对中共地下组织和外围团体进行了大逮捕，敌人将这两次活动称之为“剔抉”工作。据伪热河省警务厅长皆川富之亟向伪警务总局长山田俊介的报告：第一次大逮捕是在9月11日到9月27日进行，主要对象是承德东南部和兴隆县东部的迁遵兴联合县委；青龙县西部的迁青平联合县委；青龙东南部的青绥凌联合县委和平泉西南部的承平宁联合县委。由承德、古北口、喜峰口分队和平泉分遣队分别指挥上述4个地区的伪满警察、伪满宪兵、铁警在日伪军的配合下进行。第一次“剔抉”总共逮捕了958人，其中456人被送伪法院判刑。第二次大逮捕是在10月6日到10月19日进行，这次除继续在第一次逮捕的地区重新逮捕外，喜峰口分队还将逮捕范围扩展到了长城以南的迁安县滦阳、铁门关和碾子岭等地区。第二次“剔抉”总共逮捕了292人，其中68人被送到伪高等法院判刑。

“西南治安肃正”中，日本帝国主义采取的是军、警、宪、特、行

政、司法、协和会等机构联合镇压的办法。伪锦州高等检察厅和高等法院配合讨伐，在热河很多地方设立了"临时特别治安庭"，对逮捕的抗日军民随时起诉，随时开庭，一审判决。当时，伪锦州高等法院在讨伐最残酷的青龙、宽城、喜峰口、平泉、半壁山、鹰手营子等地，都开设过"临时特别治安庭"，审判后将判处死刑的人，随时交给当地日本宪兵就地屠杀。

"西南治安肃正"中，日本法西斯为彻底割断人民群众和八路军的血肉联系，疯狂地推行了"集团部落"政策，热河的广大地区被划成"无人区"，严禁老百姓进入。1943 年以后，承德宪兵队还编成了宪兵游击队，在长城两侧的"无人区"进行游动搜捕，发现有人脱离"集团部落"进入"无人区"活动，就当即杀死。下面是日本和歌县人岛津西二郎于 1954 年 8 月 16 日，在抚顺战犯管理所的一段供述。他 1942 年来到中国，1943 年时是承德宪兵队所属长岛玉次郎部下的第一宪兵游击队宪兵伍长，他说："1943 年 11 月 15 日，我们长岛游击队第一小队在河北省密云县兵马营西北方活动，逮捕了 1 名怀疑是八路军联络员的行商，我对其进行了审问。该商闭口不答，小野曹长当即命令我等 7 人对其刑讯拷打，我将这名行商打倒后，用他自带的扁担压在他脖子上，用脚踩着两头，一直把这个人压死。"

"1944 年 2 月 20 日，我们在密云县东南地区活动，夜 12 点左右，见有一农民在耕田，长岛队长认为此人在夜间耕田稀奇，可能是八路军的联络员，故命令将其逮捕杀死，当我持刀去砍杀时，该人已被别人砍倒，正在痛苦挣扎，我又连砍了几刀，将该人杀死。"

"1945 年 6 月，我们在遵化县马兰峪南搜索时，发现了一对新婚夫妇。我指挥部下将他们逮捕，先打成半死状态，然后将男的拉到田中用军刀杀死，女的交给新兵练刺杀。但女的用手抓住刺刀不放，新兵不能刺中。于是，我上前将这个女人摔倒，用军刀砍了她的脖子，将她斩杀。"

在这个宪兵头目血淋淋的供述中，就可想而知宪兵在热河地区的残忍凶暴。

1945 年 8 月日本投降前夕，按计划承德宪兵队和特务机关要被改编成关东军第 3 特别警备队第 6 大队，准备配合关东军第四方面军阻击从外蒙和中苏西部国境进入东北的苏联红军，为关东军主力撤至通化、朝鲜一线后，在苏军占领地开展游击战。但由于苏军迅速进入东北，承德宪兵队还未来得及改编完，就随日本投降而被解除了武装。

日军在承德制造的“国事犯”事件

高滋安

无辜遭罪

我叫高滋安，今年(1984年)80岁，家住下二道河子村。康德5年(1938年)，日本在承德制造一起株连300余人，波及热河省，轰动伪满洲国的国事犯“救国勇士团”假案。给我定的“救国勇士团”团长罪名，冤狱4年多，判处死刑。我是死里逃生，才活到今天。提起日本侵略者，我就气恨难消。

我20岁中学毕业后，靠父亲高占元(他是老中华民国热河省唯一的参议员)的关系，在汤玉麟的热河省财政厅当科员，25岁调承德县当财政局长，一直干到民国22年(1933年)3月4日，日本侵占承德.日本进承德后，我加入协和会，当了会长。伪康德5年(1938年)6月，辞去协和会会长，当承德商工公会会长，于11月中旬，我去新京(长春)经济部办理统一配给面粉手续，回来下火车，在承德车站被两个日本特务抓捕。他们两个押着我用马车拉到承德警察厅(伪康德6年后改为承德警察署)，搜我身，然后把我关在警察厅留置场(就是拘留所，现在西大街小榛子沟口橡胶厂办公楼后院处，容纳100人)。承德警察厅警务科(伪康德6年后改为警务系)科长迟松岩雄(日本人)在留置场问我：“有个叫苏士纲的你认识不?”我说不认识。他说你不说实话该受罪了。半夜，承德警察厅司法科长松田(日本人)把我带到审讯室，也问我认识苏士纲不?我说不认识。他命令手下人把我捆在板凳上，手和脚拴在凳子腿上，捆得结结实实，一顿狠打，边打边问。我不说，灌一大壶凉水，又打。实在受不住只好承认说认识苏士纲，这才把我解开送回留置场。又

过十几天，警务科长迟松岩雄又提审，问我年龄多大，我说 34 岁。问我干啥的，我说是承德商工公会会长。他又问：你为啥做出反满抗日的事？我说没有。他命令几个人把我按倒在地一顿毒打。有一个日本人叫水野的打人特别狠，把我打得喘不过气来，差点憋死。朝我脸上泼些冷水，我才慢慢缓过气来。迟松岩雄又继续问，我仍然说没有。他让人把我衣服扒光，用烧红的火钩子烙我。一边烙一边问。我不说，他们就烙个不停，连打带烙，浑身没好地方，刺心地疼。我实在受不了，就说：你们问啥我说啥。翻译孙阳生按着迟松岩雄的旨意一边问一边写。问我认识苏士纲、张实（又叫张自凡）、黄德太、苏华等 20 多人不？我怕再用刑，不管认识不认识，就说全认识。孙阳生用日语说给迟松岩雄，迟松岩雄点点头，又问：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成立反满抗日组织，多少人参加，叫啥名，在哪儿跟八路见的面，在哪儿开的会，谁是主持人。我都不知道。又打又烙。我受不住，就对孙阳生说："孙翻译官，你们知道啥告诉我，我全承认。"孙阳生说，你们成立的救国勇士团，皇军全掌握，你说实话吧。我就按着迟松岩雄的引供全承认了。我说，孙阳生记。最后我签名按上指纹，才把我拖回留置场。

事后，我才知道抓我的原因。"七.七"事变后，在共产党的号召下，全民起来抗日，日本在满洲国境内到处抓反满抗日的国事犯。我在新京时，就看到东北各报纸刊登的"沈阳事件"中遭杀害的反满抗日人员的照片和消息，其中判死刑者 6 男 1 女。日本驻承德"清水部队"的消息传到外边，说承德街有通八路的间谍，热河省总务厅长远藤（日本人）命令承德警察厅搜捕国事犯。厅长陈景起、副厅长迟雄（日本人）、特务科长西村名次郎按着清水部队和总务厅长的要求，开始在承德抓人。特务科的特务文履谦（日籍朝鲜人，外号文高丽）是副厅长迟雄的心腹，他伙同本科的特务陈书阁、王作孚在承德到处侦探通八路的人。当时西村名次郎和陕西营街长苏华（阴阳仙）关系甚密。苏华想娶大佟沟陈二老爷的女儿做妾，陈二

老爷不干，把女儿嫁给热河税务监督署雇员苏士纲的弟弟苏士英为妻。苏华对苏士纲和陈二老爷两家产生仇恨，要伺机报复。苏士纲的外甥黄德太从北平来承探亲，苏华乘机向西村名次郎报告，说苏士纲家从国外（指长城里）来了八路探子。特务科长西村名次郎奉副厅长迟雄的命令带特务文履谦、陈书阁、王作孚将黄德太抓到警察厅进行严刑审讯。黄德太只认识他外祖父苏勤茂、舅舅苏士昌、苏士荣，苏士纲、苏士英，别人不认识。特务文履谦按着副厅长迟雄的指令事先设计一个反满抗日组织表，一边用刑一边引供。黄德太受刑不过，只得按引供的线索招认。特务将苏勤茂父子5人抓捕，同样严刑审讯，受刑不过，也招认了引供材料，这就是日本制造的轰动伪满洲国的"承德救国勇士团"假案的起因。

残酷毒刑

特务把黄德太抓到警察厅后，硬说他是八路探子，他根本不是，更没有反满抗日活动，特务提出的事，他一概不招认。然后特务给他用酷刑，先是用皮鞭子蘸凉水抽，不招认；灌火油、辣椒水，用杠子压肚子，还不招认；就用烧红的火钩烫脸，烫身上。黄德太受刑不过，就按特务引供的事全招认了，并在供词上按了指纹。承德警察厅把黄德太的供词上报热河省总务厅和驻承日本关东军。在热河省总务厅厅长远藤指令下，成立一个特别搜查班，由日本承德宪兵队准尉板田毋雄任班长，办公地点在宪兵队（现在市公安局院里二层旧楼），特别搜查班员由承德警察厅抽3人，负责承德街，由童瑞九当翻译，承德县警察局（伪康德6年后改为警务科）抽3人，管承德县范围；日本和伪满宪兵队各3人，管满洲军队；日本领事馆3人，管日籍公职人员和侨民。用日产黑色牌100号的轿车做刑车，在特别搜查班长毋雄的领导下，于昭和13年11月17日为期开始了大搜捕国事犯。边抓人边严刑审讯，不断扩大线索。凡是被抓的国事犯都施严刑拷问，由于受刑不过，都将自己认识的人咬出

来。承德街开始抓人时，我正在新京出差，别人把我咬出来，回来在火车站(18日)被抓。承德"四才子"王逸如、张庸安、韩允修、孟仲芹被抓捕。当时抓了300余人，赤峰100名，建平70多名，承德130多名，下板城30多名，滦平30多名，隆化20多名。最大的70多岁，是原姜桂题部退役中将曲中义(别名曲海臣)家住二道街子，在家闲呆，也被抓捕受酷刑；最小的15岁，是一个在上板城街头讨饭的男孩，也当八路探子抓捕受刑。当时日本鬼子抓人简直红了眼，凡是他们认为可疑的一律抓。被抓的人先是关在承德警察厅留置场，那里只装百十来人，后来容不下，全关进承德监狱，重点人砸上手铐、脚镣子。监狱外面用草袋子装上砂子堆成掩体，由日本宪兵架上机枪日夜站岗。抓捕结束，热河省警务厅、承德县警察局、承德警察厅、锦州高等检查厅承德分厅、承德区检查厅、承德地方检查厅和锦州高等法院承德分院、承德区法院、承德地方法院等联合在南营子三官庙院内，将东西配房各隔断7间，在配房南端又盖两间，一共16个房间做为临时留置场。把被审讯的人从监狱用汽车拉到三官庙圈在新隔断的临时监号内。当时给我定的罪名是"救国勇士团"团长，给苏士纲定为副团长。救国勇士团是承德警察厅日本人给起的名字。把我和苏士纲关在南面的两间监号内，每人一间。当时集中了伪满全国高等检查官和高等法官二三十人，设立好几个刑讯室。一开始就是刑讯我和苏士纲。因为我们这些被抓的300余人纯属假案，根本没有这个组织，全是屈打成招。从监号把我押到审讯室，打开手铐和脚镣，我心想，高等检查官可能说理，下决心在公堂翻供。审讯室，除了翻译官和书记官全是日本人。审讯开始，检查官问我几个事，我全说不知道，检查官生气地问，供词不是你招认的吗？我说全是受刑不过胡说的。检查官骂道："狡猾狡猾的"。又上来四五个日本警官，将我按倒在地一阵毒打，我还是不招认。接着，将我十个手指用竹签子夹住两个人拽，同时用烧红的火钩子烫身上，一边夹一边烫一边问，我受刑不过，只得将原来引

供的供词又全招认了。从那以后，再没有审讯我。我一直不服，可也没有办法。把我审讯完，就审苏士纲，让我出庭陪审作证。苏士纲不承认，先给他灌火油掺辣椒水，然后用烧红的火钩子烫，把他打折好几根肋条，最后受刑不过也招认了。审讯完我们两个后，开始审讯别人，都让我们俩出庭陪审作证，不作证就施酷刑折磨。凡是受审讯的人，没有一个不受刑的，个个被折磨得胡说八道，打得体无完肤。当审讯到伪满热河省公署实业厅社会科科长张实(30来岁)时，他很有中国人的骨气。他在日本留过学，回国后在省公署实业厅社会科供职，对离宫外八庙的文物尽职尽责，设法保护。能耐不小，爱国心强，平时在省公署就看不起日本人，表现很傲慢。所以抓国犯时，说他是救国勇士团的秘书，把他抓起来用刑。他对汉奸特别仇恨，他看到翻译孙阳生、特务王作孚、陈书阁在日本人面前低三下四奴颜卑膝的丑态就骂，特务对他更加残酷折磨，灌凉水，跪刺木头，滚雪地，压杠子，坐老虎凳，上电刑，手心钉钉子，火钩烫，灌火油掺辣椒水，割肉撒盐面，竹签子夹手指，由于受刑不过，最后他按着检查官的引供招认了。他日语讲得很好，完全用日语回答检查官的问话。检查官问他你都发展谁加入救国勇士团，他为了除奸，当堂把翻译孙阳生、特务陈书阁、王作孚、日籍文履谦和在实业厅的日本人咬出好几个。检查官当即下令就把在公堂的孙阳生抓起来，随后把张实咬出的几个人全都抓了起来。就这样，起初为制造“救国勇士团”假案卖命的苏华、孙阳生、王作孚、陈书阁、文履谦和几个作恶多端的日本人全成了囚犯。原先他们给别人用惨无人道的刑法，他们自己也全受用了，被打得体无完肤，成了重铐重镣在身的囚犯。在审讯苏勤茂、宏达堂掌柜孙洞臣、还有傅南云、滦平商工公会会长高农山时，在堂上被活活打死了。当审讯文履谦时，让我、苏士纲、张实出庭陪审作证，张实端起放在地上烧火钩子的炭火盆朝检查官砸去，把几个检查官砸伤烧伤了。张实又遭一顿酷刑折磨，拖回监号。他知道自己不会有好结果，在监号上吊

死了。日本在三官庙审讯时，全在夜间。从监狱往出提人，由留置场往监狱送人，也在夜间。日本法西斯的毒刑惨无人道。我们这些无辜人在毒刑折磨下做了无罪囚犯。

花钱买命

经过几次过筛子刑讯，陆续放出不少人，到康德6年初，还剩108人，有人称一百单八将，关在监狱内。根据"罪行"轻重，分别戴上不同的刑具。这些人，全是承德街和各县有名望的人物，酷刑下招供，刑后翻供，对刑讯不服，弄得检查厅很头疼。我们在承德监狱关押半年多，又陆续释放了一部分。最后剩下72名(有人称是孔子的七十二贤人)；于伪康德6年(1939年)6月押转到锦州监狱。我们离开承德那天情景最惨，阴阴的天，早晨掉几个雨点，吃完早饭，看守叫放茅(上厕所)，不大会儿放茅时间到，又赶紧回监号。有的进监号还没坐稳，看守又叫到院里集合。顿时，全副武装的警察、宪兵把我们包围起来，端着刺刀，个个如狼似虎嗷嗷乱叫，把我们这些囚犯两人一个手铐一对一对铐起来，又4个一根绳，一串一串地捆起来。大家都以为要进行集体屠杀。然后由警察拖上汽车，一共几辆汽车我说不清，不叫随便看。汽车上的宪兵架着机枪，上车后，都让低着头坐在车箱里。汽车开出监狱门，我从车箱板空隙看到，路两旁站着很多人，有的放声大哭，尽管警察宪兵像疯狗似地狂吠乱咬驱赶人群，人群就像潮水般地随着汽车流动，哭声越来越大，逐渐连成片。我们这些车上的"囚犯"都预感到这是送葬的队伍。汽车开出监狱大门一直向东走。汽车开到二道街子附近，车上有几个"囚犯"也放声哭起来。当时我也以为是集体屠杀，心中觉得特别冤枉特别凄惨。有的家属在街上叫着名字哭，囚犯没有不落泪的。那种悲惨景况真像杜甫《兵车行》诗中写的那样："耶(爷)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牵衣顿足拦道哭，哭声直上干云霄……君不见青海头，古来白骨无人收。新鬼烦冤旧鬼哭，天阴雨湿声啾啾。"

汽车直向河神庙杀人场(今市教育局后勤那地方,原先有个河神庙,是民国时期的杀人场)开去,有的人就想跳车。当汽车开到小南门回民杨家院门口时又朝南拐下去,顺武列路直奔火车站。这时,我的心才掉了肚。路旁几乎没人了,汽车也开得快了。到了火车站,又是一片人群。日本兵端着刺刀把人群隔在场外,囚车一直开到站台上。警察和日本兵在四周站岗,高处支着机枪,把我们推下车面向北山低头坐着,不许左顾右盼。只听站台外一片哭喊着,非常揪心,面临生离死别,真是"……悲凉千里道,凄断百年身。心事同漂泊,生涯共苦辛。无论去与往,俱是梦中人。"无论是站外的家属,还是站台上的囚犯,皆知此一分,是今生难会面的诀别。我们在车站呆一个多时辰,然后坐票车拉走。夜间到了锦州监狱,砸上脚镣入监房,我的心中才平静下来。康德7年初,锦州高等法院依据检查厅在承德刑讯形成的起诉材料开庭进行一审,将我和苏士纲判死刑,其他人分别判无期和有期徒刑。法庭一审没有用刑,绝多数人都不服判,我当庭就申明不服判决要向最高法院上诉。判后,把我和苏士纲砸上重铐重镣关进死囚牢,等待新京训示。监狱看守把犯人当成摇钱树,对囚犯敲骨吸髓。本来监狱生活特别苦,早晨一碗粥,中午一碗饭,晚上一碗粥,有时给一碗菜汤,有时啥菜也没有。犯人有病不给治,医官下监巡诊,也是一看了事。就这样,看守还经常打骂虐待。师范音乐教员倪治仁、陈永孝、苏士昌、苏华、张贵山、白子厚、孟彦博和殊像寺喇嘛络凤桐等人均被看守打死。不想受罪的人就得给家人写信要钱,家中把钱寄到会计科,个人说明理由,领出一点,暗中送给看守,才能免灾。在锦州监狱3年多时间,我零星送给看守几百元。我的上诉书呈上之后,锦州高等法院通知可以聘请律师。当时无论法官和检查官全是日本人充任,聘请律师也必须是日本的,我花两万块满洲票,聘请一个原在日本高等法院当院长,后因年老当律师的名叫上山的法学家。他看了我的上诉书,又到监狱听了我的陈述,他对案中定我带领队伍在滦平县某地进行

操练的时间和我去日本观光的时间(1937 年 3 月,锦州铁路局组织的锦热两省半费旅日观光团)有出入,产生了质疑。上山律师根据我提供的出国证据,他又回国进行了调查。先后经过 1 年多时间,将我出国护照、照片、指纹等文字证据拿到锦州高等法院。康德 9 年 8 月立秋前夕,经新京最高法院院长批准,最高法院在锦州高等法院组织合议庭,进行二审判决,上山律师在法庭与法官展开了争辩,当庭出示了证据,证明案中定我带队在滦平进行操练是假的,否决了我当"救国勇士团团长"的认定罪。团长没有人,救国勇士团组织也就不存在了。最高法院日本人审判长元林通过翻译说:"你们这些人虽然少有犯罪证据,但是对满洲帝国心怀不满,可是经长期(4 年)教育,脑筋总是有改变的,国家对你们特别宽大,今天放你们回家,要做忠于帝国的顺民……"就这样,日本法官羞羞答答地当庭宣布无罪释放我们这些坐了 4 年冤狱的"囚犯"。有 37 人先后在刑讯室和狱中被折磨死,有不少人被蹂躏成为终身残废。

(彭明生整理)

日军在喀喇沁旗的暴政

乌秀青

1933 年日寇侵占热河，喀喇沁旗沦陷。在日本统治、蹂躏我旗的 13 年中，掠夺了大量的物资，奴役我旗人民，奸淫掳掠，压榨奴役，无所不用其极，使我旗蒙汉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当时我是喀喇沁旗公爷府村的协和会长，耳闻目睹了日伪的滔天罪行。

日伪侵占热河，喀喇沁旗沦陷

1931 年(民国 20 年)9 月，日本军炮轰沈阳北大营，一夜之间沈阳城全被占领，当时喀喇沁旗的上层闻听后，毫不关心，当作新闻笑谈，还是照旧寻欢作乐。张林阁作寿，依然大排筵宴，陈子善出殡，照旧宾客盈门，吊唁如市，不知亡国的危机。日本侵占沈阳后，又分兵进攻安东、营口、长春等地，不到 3 个月，奉吉黑三省数十座城市、3000 万同胞及无尽的宝藏完全被日寇控制。1932 年(民国 21 年)8 月，两架日军飞机在赤峰低空散发传单。传单大意是：日本已占领东北三省，成立了满洲国，用大同年号，不久将出兵热河等等。在这两架飞机低飞时，赤峰驻军崔旅(崔兴武的部队)，不但不敢回击而且将旅部门前牌子摘掉，士兵都隐藏起来。绅商界人士也只矢口空谈国事，不谈如何抗日。在此敌军压境，国难当头之际，喀旗乃至热河却一点防备都没有。日寇建立伪满洲国后，扬言热河是满洲国的一部分。长城各口为伪满的国界。当时，喀喇沁旗秩序很乱，盗贼四起，官匪勾结。骚扰商民。热河汤玉麟接到一份华侨捐献的救国自卫款，中饱私囊。为掩人耳目，派他的副官乌古庭(喀旗人)招兵买马，成立“抗日救国自卫军”。乌古庭奉命来喀旗公爷府

招兵，由他亲属高占奎在喀旗东部招来一连兵，作为亲兵。队部设在公爷府小大庙，挂上“热河××救国自卫队”牌子。自卫队规定，凡能自备枪马，不论什么人都可以参加，队部负责保护，因此经常发生劫马、缴收枪支等事件。有些绅商地主如于景宸、姜益斋、刘雨泽、云逢山、吴边科等投军后，被委任营长、连长、参谋等职。背着匣子枪，好几个马弁，耀武扬威，他们不为了抗日救国，而是为了当官老爷，身穿军服，欺压百姓。日本进占赤峰后，这些人不是逃之夭夭，便是偷跑回家。姜益斋本是公爷府的大绅商，兼有土地、商铺，财产很多，他向日寇交出枪一支，马一匹及许多烟土，便回家不干了。于景宸、云逢山等撤出不远，也都开小差跑回。乌古庭退至沽源，也投降了日本人。

1933 年 1 月，日寇侵占山海关。随后，又向热河、赤峰进攻，2 月下旬，东北军(当地人称吉林队)向西逃跑，由喀旗路过，对旗民大肆枪劫、骚扰。百姓惊慌失措，四处藏躲。还有孙殿英的队伍，才到赤峰就遇日军进攻，一触即溃，分两路往回逃跑。一路逃向围场，一路逃向喀旗，狼狈不堪。日军装甲车、汽车向围场追击，在津生泰烧锅院内，死伤若干南军(孙殿英部)和商人农民。喀喇沁旗这一路没有被日军追赶，可也是丢盔弃甲，溃不成军。公爷府和街里居民纷纷逃避一空，商店都关上门板。

国民党热河省主席汤玉麟，惊慌失措，先用 200 余辆汽车装私产及鸦片运往天津，后抛弃省城承德向滦平逃命。3 月 4 日，日寇 128 骑，兵不血刃占领承德。不久，即占领热河全省，喀喇沁旗随之沦陷。

强化治安，建立统治机构

日本占领热河后，为了集中力量进攻华北和充实后备力量，建立伪满基地，首先维持地方治安。赤峰日本军召集地方有名望的人开会，喀喇沁旗的陈子善、邢宜庭应召到赤峰参加会。他们二人回

旗以后，按日本人的指示，首先在喀喇沁旗成立保安总队，陈子善为总队长。乡镇成立保安分队，张林阁为公爷府分队长。把王府及巡警保甲的枪支拿出来武装保安队。

成立伪旗公署

伪满洲国成立后，溥仪当了傀儡皇帝。为了便于统治，日寇将原东北三省及热河划为20个行省，设立县、旗公署。1934年施行旗制，成立喀喇沁右旗（东部仍是建平县），将喀喇沁右旗公署设在旧王府衙门西院（西仓）。当时贡王之子笃多博在日本留学，邢宜庭代理旗长，陈子善为总务科长，他们的亲信担任科股长等职，参事官是若林。名义上旗治，实际日本人说了算。

旗保安队是地方武装，没有正式建制。为了统一领导，将保安队改编为治安队，统归治安部集中领导。喀喇沁旗治安队为第三连，驻王府大庙八家。队长吴久荣，教官高桥（日本人）。

扩充警察，健全警察机构

1936年（康德4年），在王爷府旗公署训练了一批警察，几个月后分配到各地。这算正规化的警察。警衔分警佐、警尉、警长、警士，他们身着黄呢子服装，头戴大沿帽，再佩上警衔徽章，腰挎洋刀，足登马靴，很是威风。喀喇沁右旗西部设3个警察署：七家警察署（茅荆坝前）、王府警察署、公爷府警察署。6个分驻所在安丹沟、旺业甸、小牛群、龙山、于家营子等地。署长的权力很大。署长上任，地方商民迎风洗尘，调转时也同样大摆宴席饯行。过春节，地主老财，商店老板都去拜年，带着几百元钱，给署长的孩子作压岁钱。如公爷府警察署长郭子良调转时，公爷府绅商送行钱礼就有七八百元。平时警察到商店，吃喝抽大烟，赊欠借取，有借无还。乡村的中小地主也竭力巴结警察。给警察种鸦片，每村都有××警察的烟地，耕种割浆，都是义务。龙山分驻所长吴兴汉，原是流氓，自当所

长后，几年光景暴富起家，在公爷府街修起了四门斗瓦房院。

警察什么都管，清洁卫生、赌博、私贩等。他们无恶不作，常常借故对商民敲诈勒索，任意打骂、扣押。商民畏之如虎。一年查两次户口，每到乡村，白吃白住，大肆骚扰刁难百姓。另外，警察署还把16岁以上的公民集中到警察署照相，填写姓名，发良民证(身份证明书)。照相、填写证书，都按次序，稍一疏忽，连踢带打。老乡说：进警察署走一趟，如进阎王殿一样。

各警察署配备了日本警尉。初任公爷府警察署的日本警尉是三吉正雄，他唆使警察欺压百姓，还经常以搜查烟土为名到老乡家翻箱倒柜，坑害良民，污辱妇女。三吉走后，又来了一名日本警尉千叶，他好喝酒、好打人。有一次去四十家子，吃酒大醉，骑老乡的毛驴过河，将手枪丢失，硬说掉在河里，让警察在河两边堵截行人打捞，每人下水摸20分钟。第二日，在小府山头河边，又截住行人强迫入水摸枪。时值10月，天寒水冷，怎样求情也不行，不下河便打。如此二日，入水的人数达200余人次。最后一名日本警尉叫丸旦，在公爷府警察署连任三四年，啥事都管。村公所以及其它机关，都受他监视。还组织特务，搜集情报，管理鸦片征收，统制物资等。本街许多商民受过他的迫害。如开车驮店的杨珍，有一次代客商推销了2斤棉花。丸旦知道后，把杨珍叫到警察署长室，打了200竹板，押在拘留所。并使杨珍、小贩、买主三方受罚。

实行街村制

1937年(伪满康德5年)，开始实行街村制。喀喇沁右旗西部的七家、旺业甸、王爷府、公爷府、龙山、小牛群六村建立了村公所。每村设正副村长各1名，助理员1名。下设6个系，掌管村政。有行政、财务、烟政、劳务、民籍、义务等事务。当时，每亩地征收苞谷五合，每村都有仓库，集满苞谷。一村有若干甲，每甲有甲长，甲长下有牌长。征收烟税、缴鸦片、收亩捐、派劳工等，村长说了算。大

小官员贪污腐化，作威作福。

总之，自街村制实行以后，喀旗蒙汉人民，担负苛捐重税，受尽日本人的凌辱和地方权贵的剥削，掉入苦海深渊。

实行土地奉上

1939年7月，在新京（长春）国务总理张景惠官邸，召开了18名蒙古王公代表参加的座谈会，强制土地奉上，废除王公世袭制度，土地特权收归国有。喀喇沁右旗的王公蒙租地在老哈河岸的建平县。为了便利整理蒙租地，遂将建平县合并于喀喇沁右旗。同时，改组了旗行政机构。旗长笃多博调任热河省公署参事官。陈子善、张林阁调至省公署。任杨子森为旗长，参泽勉为参事官，田中一郎为总务科长，坂户为警务科长。旗公署添设地政局、劳动科、蒙民裕生会。会后，地政局在全旗展开土地申告，蒙租和解，没有吃租蒙人的文契，汉人单独申告无效。白楂地汉人有耕种权，没有土地永佃权。汉人租种蒙租地出25倍的租款，蒙人所得租款完全存入裕生会，只得微少利息。因此蒙汉双方都受很大损失。有蒙人陈柱亭投机代替蒙人出卖地权，代出红契，从中渔利。地政局人员下乡，受贿行贿，给汉民加重负担。叶柏寿地政局办事处声称失火，将二年多的申告书、和解书一切手续，一火焚之，给蒙汉人民造成极大损失。这时，旗公署迁至平庄（原是一个小村庄，叫李连窝铺），当时设计规模很大，分行政区、工业区、商业区、文化区。旗公署机关都移至平庄，有满洲银行支行、平庄税捐局、邮电局、协和会本部等，赤峰黑水商人也来平庄开市营业。日商开设了日满旅馆、日满饭店。这里骤然成了繁荣城市。平庄地势平坦，叶赤铁路经过此地，交通方便。还修筑了飞机场、飞机库，成为日伪在热河省北部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成立协和会

协和会是伪满行政、财务、司法等机关以外的一个单独组织，目的是为日本的所谓“德政”服务，宣扬日满亲善，日满协和，一德一心，宣德达情。推动各项侵略政策的实现。它的组织自上而下，有中央本部、县旗本部、村分会。除地方上的村分会，以上各部长都由日本人担任。各省、县、旗的省长、县旗长任名誉本部长，实际还是日本人说了算。发展会员时，不分民族，不论职业，只要服从协和纲领，加强亲日力量就可参加。

喀喇沁右旗起初没有旗本部，协和会本部在建平县，本部长为福田（日本人）。后来，派到喀旗一名日本人，名小野，来王爷府旗公署创办协和会。事务员吴希宪（王爷府人）到各村宣传，吸收会员，以村为单位成立协和会分会，村长兼任会长。至1938年旗合并，旗本部迁至平庄，因为村长兼职，事务繁忙，另选有文化、有财产的人担任协和会长。凡伪满的节日或纪念日，协和会都要举办庆祝会。新兵入伍、劳工赴工地也要举办欢送会。若施行新的政策，协和会要做宣传，成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政策的宣传工具。另外每年协和会召开一次旗联合会议。各地选出几名代表，将本村、本旗的要求、建议等作为提案，在会上讨论。不能解决的，提到省联、国联作最后的决定。其名义是上传下达，实际不论哪一级会议，都是按着日本人的指挥棒转，大家发言也不能持反对意见。

当时八路军在冀东搞游击战，热河西南地区的日寇受到沉重的打击。于是日本集中日满军警组成冀热讨伐队，对八路军进行“征剿”。同时利用协和会做反共宣传，协和会还将旗本部青年训练班的青年组成武装协和青年队到前方搞反共宣传活动和情报工作。凡出荷粮谷、牛羊、劳工，协和会在最前列。省县一级的协和会权力很大，到基层就不行了，村公所警察见带协和会章的，骂是带“狗牌子”。老百姓对协和会的印象更不好。

奴化教育

伪满的教育,是奴化教育,以教授日语为主。给学生灌输日满亲善、尊敬日本天皇的思想。每校都有校训,大意都是日满不可分离,一德一心等,师生到校要向日满国旗敬礼。高等学校用日语授课,把同化朝鲜的政策原封不动搬到满洲。如触犯校规即体罚、开除。提倡尊孔,每年春秋丁日祀礼。传授忠君爱国的封建思想。有一次,承德国民高等学校进行口试,教师问学生:你是什么人?学生回答:我是中国人。因没说是满洲国人,即说有反满思想,打骂后将那位学生开除学籍。还有一个中国教师讲历史,说原始类人猿是我们的祖先。就说这是共产党的教育,这位教师被处分革职。另外,每年在承德离宫进行一次教师训练,,轮训各校在职教师,每期6个月。教师报到后,首先排队立正,听日本教官训话,然后按名检查行李。把分头剪成光头,把眼镜手表摘下,脱去鞋,才分配到各宿舍。以后,每日检查一次宿舍,如行李放得不整齐、室内不清洁,即站队训斥,责罚记过。夜间点名,教官拿着手枪在教员头上敲打。有时紧急集合,一鸣口笛,马上集合,如领扣、皮带、裹脚装束不整齐,就挨打罚跪。每天轮班做饭,自己打柴,吃的是霉高粱米。还要二人一班做豆腐,挑到大街叫卖。日本人骂中国人有奴隶性,拿中国人不当人待。受一次训练,教员面容憔悴手破脚裂,如同经过一次地狱生活,痛苦难言。如公爷府教员乌云梯、吴英回来与人相告时抱头大哭。

强 敛 武 器

民国时期,在热河地方,大地主,大商号每家都雇着打手(护院的),备有枪支。凡富裕户都买枪买马(称枪马户)。地方上组织人丁保甲队,街镇成立了商团,都有枪支,还有一些无业流氓和地主子弟,游手好闲,爱马玩枪。商号老板保镖也有枪。如通兴当的左

翰章、拔贡地太恒栈赵国宗出门前后都有四个背盒枪的随从。有一次，公爷府的 45 名商人结伴赴赤峰，乘马挎枪，简直像便衣队。所以，地方上枪支弹药很多。1932 年，伪满洲国成立以后，日寇怕人民起来反抗，所以发布命令，张贴布告要回收武器。禁令以后，再存武器，以通匪论处。一日，公爷府来了一辆汽车，下来 1 名日本军官、6 名日本士兵。在二分驻所院内，军官用日语发命令，实弹守卫。门口 1 人，院内四隅 4 人，1 人持枪在院内巡视，让民众来交武器。因事先早有通知，各甲携带枪支纷纷前来交枪。3 天收回大小枪支两大车，土炮在当地毁为废铁。经过一次武器回收，全旗枪支完全收回，可日本人还不放心，命令治安队在喀喇沁全旗收缴枪支。治安队到处打骂，使用各种毒刑威逼人民。人民实在没法，用高价买枪、买子弹"赎罪"。一听说治安队来了，人们像避瘟神似地四出逃走。

以后，又令警察署，随时收缴枪支。警察借此为名，敲诈勒索，公爷府警察署署长郭子良一到任就来了一个下马威，向张宗英、姜益斋收枪，不缴就给他们灌冷水。最后张宗英用 250 元买了一支破斜匣枪，姜益斋交烟土 20 两、子弹 50 粒，才算完事。

1941 年 11 月，热河警察厅笠原警尉带了 20 名警察，乘大汽车来公爷府警察署缴枪。村长白袭铎见了我说："可了不得，日本警察署打人灌凉水呢，快去用'协和会'的名义求求情吧。"我到警察署一看，院里跪着不少人，有甲长和一些大户，日本人正将本街商人石大头捆在板凳上。旁边放着一桶水，好几个警察拿水壶往人们衣领里倒。11 月的天气特别冷，人们直打哆嗦。我向笠原求情，保 3 天交枪，才算把人放了。后来又将牛头沟门天主堂张神甫传来，不容分说，押在小监狱上刑。因警察署长没携带刑具，笠原还把署长打了两个耳光。第二日，张神甫交了一支橹子枪才被释放。因此甲长、大户们出好枪的价钱，四处买破枪、子弹，七拼八凑完成任务。这一次缴枪，公爷府受到很大损失。

强种鸦片

喀喇沁旗久惯贩运鸦片。流氓奸商不顾亡国,只顾发财,将鸦片运往天津、北平等地。有的是武装贩运。当地有鲍海、姚事彬等四五十人编为马队,全副武装,将鸦片运往河北省乐亭县,交与烟商于乐亭。于与日本浪人和军警有联系,在天津、北京销路很广。所以贩运一次鸦片非常得利。日本侵占热河后,不顾中国人的死活,强迫种植鸦片。1933 年施以小惠,勘丈烟地,私贩私运缓和了一些。1936 年,旗公署设烟政科,各关隘严格查禁,地方强迫种烟,以一村为单位,各甲发配任务。按照农民在春耕以前的申告由烟科或村发给种烟许可证,注明姓名、亩数、段落、产量。再按许可证勘查,不许超过,也不许减少。为了垄断鸦片,不准私人存留,成立鸦片专卖署——大满号,后改为鸦片组合,收购鸦片。到割浆时期,种烟户持种烟许可证到鸦片组合去卖,按烟土的稠稀合成算准两数,填写在种烟许可证上。价格分一、二、三等。缴烟土时查看种烟许可证,卖了几次,是否符合规定的产量,以及是否卖完,还欠多少等。鸦片组合舞私弄弊,以假混真,压等级,加水分。将烟浆晒成烟砖要去水分,警察官、村吏等人,为贪占烟土,便压低等级,增加水分,这些损失,都加在种烟的老百姓身上。因此多数人交不上烟干,挨打挨骂。一年比一年逼得紧。为逼缴烟土,省县旗成立了缴土工作组,不少日本人参加缴土工作,分发到各村缴土。每到一甲,要给预备公馆,大吃二喝,召集种烟户,按名念种烟证,卖几次,多少两,有没有欠烟干的,只许说有,不许说无,还放有各种刑具。只要烟册上有名,下年还得按亩种烟。有一年中秋节,老乡都弄点吃喝准备过节,来了缴土工作组,老乡吓得跑了大半。没走脱的被集中到一起,对面站立,互相打嘴巴,然后向太阳跪着,两手高举一二个小时。后经甲长作保,答应缓期想办法交烟,才放走这些人。

日本人禁止私人贩运烟土,在火车上检查得更严。旅客上下

站，不论男女，身上、行囊都受检查。有些烟商雇佣穷人用避孕保险套每个能装二两熟膏放在肛门内，带到目的地，有的保险套在腹内破裂把人毒死。

我在沈阳参观过一个鸦片制膏厂，地址在市东南关小河沿，面积很大，周围有武装人员守卫，车间有若干锅炉，由鸦片人锅到煮膏、过滤、成膏、切片，完全自动化，一日能出1万两烟膏。包装是手工。有七八百女工，俱是20岁以下的姑娘，着白衣白帽。包装的彩色纸盒，每一大盒20两，内有若干小盒。门口有武装门岗和女检查员。他们有打骂权，每当下班，检查甚严。制出来的烟膏有的出口，在各地设鸦片零卖所，发放吸食证，公开叫中国人吸食鸦片。

制定统制法

1938年日伪颁布各种统制法。包括小麦粉统制法，米谷管理法、劳动统制法及棉布、麻、丝、肉、油、皮革等一系列的统制规定。以上物品皆规定为统制品，任何人不得私自买卖，查出来即为经济犯。各地商人把原存的货物藏起来。赤峰、公爷府的大小铺面都上门板，柜台上布满尘土，货橱内空空如也。有人乘机作投机生意，囤积居奇、哄抬高价，暗中出售。农村更为困难，东洋货也没了，一尺布、一盒火柴都买不着。小商倒闭，饭馆摘了幌子，买卖歇业，工人散伙，失业者千千万万。奸商与当地警察勾结，私买私卖，从中牟利。奉天(今沈阳)偌大城市，全市没有肉菜面食。早市4点钟开市，有一些卖食品的或卖麻、丝、布、旧绸缎衣料的，也不断被警察们打散。赤峰更困难，物品奇缺。有时老爷庙的小胡同，有妇女小孩提筐卖烧饼、香烟等，价格非常贵。一盒烟一元，一个烧饼五角。一见警察急忙逃走，一日不遇警察，是为好运。

由于棉布缺，将日本的破烂估衣片，运来分配给商店出售。农民只得穿日本估衣片，什么颜色的都有，真的成了“日满协和”。各城填成立配给所，每次进货不多，由警察官、村吏员、伪职员配给，

不知剥几层皮，剩下的才分配给农户。因此，物价暴涨，多数人维持不了衣食。从集市上看，人们衣服褴褛，面色憔悴。农民陈树庭，当时没有布做衣服穿，叫他的儿子小栓驮一点粮食到汤道河换布，鬼子捉住说是经济犯，打得昏过去好几回，又押起来。听说要判徒刑，陈树庭卖了一条大牛，将钱送给鬼子的狗腿子，才把小栓放回来。火车上检查得更严，发现带棉布、粮食，就是经济犯，东西被没收，人被扣押。家无食粮，人无衣穿，农民喘不过一口气来，憔悴困顿，未有甚于斯时者也！

粮 谷 出 荷

各种统制法施行以后，1941 年日伪又加紧收购粮食，叫粮谷出荷。以一村为单位，按土地面积将粮食产量 40%到 50%分配到各村，规定价格很低，和白白没收差不多。喀喇沁右旗西部指定的粮站为旺业甸、王爷府、公爷府、大新乡。秋收以后，村公所通知甲牌长根据土地台账，按花名册通知数字，督促如期出荷，刻不容缓。小牛群至公爷府七八十里，大车小驮、人挑马载、披星戴月，络绎不绝，到指定粮站交粮。有的农民没口袋，用被子、门帘、褥子装粮食。有一家没有口袋用棺材装粮，牛车拉着出荷，鬼子见了感觉新奇，哈哈大笑。粮站办事人员摆架子，他们按钟点上班，老乡排不上号，有的等一二天，人吃马喂，住店盘费，有时卖的粮钱不够来回的路费，检查员检验粮食时，一不顺眼，说不合格，扬在地上。过秤员更刻薄，不报斤数，随便报秤，老百姓问问数字，开口便骂，举手就打。公爷府粮站设在通兴当西院，因没有仓库，用大猪圈装粮，夹皮墙都装满粮食。出荷完了，没有人负责保管，风吹雨淋，冬天大墙外被麻雀吃下的糠皮有一尺多厚。

平庄没有粮库，用秫秸在野地里围墙，高粱、谷子、大豆在野地里堆着，糟塌得厉害。锦赤线各火车站，大部分是用秫秸席子围囤，粮食堆积如山。日寇视中国人的血汗不如粪土。出荷以后，大地主

还能剩下些余粮，自给自足；中小地主除去捐税成了缺粮户；其它小耕家，交地主租子，再加上出荷粮，当时就没吃的。饥饿借贷，丰年也成了荒年。

有一年春节前，警察署召集公爷府村的中小地主（我也在内）在村公所开会，日本警尉丸旦说：公爷府村还欠出荷粮两万多斤，怎么办？小户已经没有粮食，连自己吃的也没有了。就得你们大家想办法。会长带头替老百姓交粮，大大的光荣。结果只好大家分摊。丸旦亲自出马，带着我和张翻译，以及警长、村长訚国均，在除夕这一天，下乡督催。到了牛头沟门王瑞家，张翻译连打带骂，将小米和淘好的黄米都装上车，又看见两张羊皮也没收了。就这样连强迫带打骂，在除夕一天内完成了任务。

施行国兵法

伪满洲国成立后，以日本关东军为主力，驻守各重点城市和边境地区。地方治安由警察维持。警察从初期的 10 万发展到 30 万，从军队组成来看，当时伪满的绝大部分官兵，都是原东北收降的土匪，多数有吸鸦片的恶习。为了逐步实现军队正规化，实行募兵制度，精简了许多官兵，设立了伪满陆军军管区。

为了加强军队的正规化和军事训练，充实伪满军队，在 1939 年颁布了“国兵法”，凡年满 20 岁的男子，都服兵役，在全满广泛宣传推行。县旗加强兵役机构，村公所设兵役系，专办兵役事务，如登记国兵适龄册记，注明年龄、民族、家庭状况及财产等。每年一次国兵身体检查。有一年喀喇沁旗国兵检查在王爷府崇正学校进行，由军管区来的检查官是日本上校，检查人员有宪兵、军医，将全旗的适龄青年召来，残废的、不能行走的也抬来受检查，恐怕冒名顶替。各村的村长、协和会长也参加。检查开始，五人一组进室，报告家庭历史、生活状况等，对照适龄登记卡片。然后将全身衣服脱去后由医务人员检查身高、体重、视力等，填写在适龄卡片上。最后由检查

官决定合格与否，如合格即高呼合格。有的人在申告时，不从实报告，身体检查时，故意装聋、装眼力不好等，宪兵就带到另一室特别检查，还要打骂、罚站。有时大冬天裸体在室外站2个小时。合格的国兵本地警察署、村公所负责保护，如故意损坏身体，署长、村长负责。

国兵入伍后，待遇很坏，吃高粱米饭，挨打挨骂。军事训练时，身负五六斤重的武器，上山下梁，一小时行军数十里，其痛苦不堪言状。训练不合格的为"国兵漏"，入"勤劳奉仕"队到矿山采掘、建筑桥梁、修公路，义务劳动3年。

劳工苦役

伪满洲国成立以后，修筑铁路、公路、开设厂矿、架电线，繁重的劳动，除本地百姓负担外，还得从外地雇佣固定劳力。如修锦承铁路、叶赤铁路时，从华北、河北募雇劳动力，到东北从事劳动。后来又开采热河北票，阜新煤矿，扩建抚顺、密山煤矿……劳动力很不足。1938年施行劳动工法。县旗成立劳动科，村公所成立劳动股。在地方征集劳动力。名义是劝募，实际是强迫。有几种人可以免役，即官吏、职员、大地主等有财有势的人。穷苦百姓是劳役的对象。喀喇沁旗的劳工多数去密山、北票、阜新采煤。村长和甲长一商量，指名去当劳工。开始还给几斗米，后来米也没了。警察协同捉劳工，百姓哭叫连天，妻离子散。在矿山干活待遇非常不好，每日做12小时工，把头经常打骂工人。日本人下井监工更是厉害，用刀背砍，用大马靴踢。就这样，每日只发给工人5角钱的工资，就连毒高粱米饭都吃不饱，矿内设备不安全，时常发生伤亡事故。密山是水草湿地，工人宿舍简陋，不讲卫生，经常得传染病，又没有医疗条件，每天都有死亡。公爷府村的大老盖，就是当劳工死在密山，没有一点抚恤金，尸体也没弄回来。一年征好几次劳工。公爷府村一次就征去20余人，家里的人无人抚养，受冻挨饿。以后征劳工的人数

逐渐增多，平庄修飞机场就征来千数人服劳役。

集家并村

自1940年，八路军在冀东给日寇以沉重的打击后，他们万分惊惶，调集大批伪军、警察组织讨伐队，进行了几次讨伐和“扫荡”，但都归失败。八路军的游击队，发展到热河省的滦平、丰宁、大阁等地，袭击了小寺沟车站，活捉了两名搞反共宣传的道德会女宣传员。抗日势力逐步发展到平泉、隆化等地，日寇采取“三光”政策，制造“无人区”，实行“集家并村”。分散的农户，被集中到一个较大的村庄，以破坏八路军的游击战术。他们镇压人民，封锁物资，围困解放区。

1940年到1941年，由日本人和警察组成集家工作队，进行“集家并村”。在据点修筑“部落”，“部落”外一户也不留，房屋拆掉，如到期不拆，有镐头队去拆，有的用火烧，凌源许春璞一家被火烧死6口人。人们被强迫迁入规定部落里。迁居后，贫困户盖不起房子搭个窝棚。东西没处放，堆在外边，再遇夏雨连绵，室内外一起挨雨淋。没有柴，只好烧柜箱等木器。人多房小，拥挤不堪，牲畜猪鸡与人同宿，遍地粪尿，臭气冲天，瘟疫流行，老年人和小孩死亡很多。田地荒芜，生活困难，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部落里有保长，居民白天出去种地，晚上必须回来。出入登记，谁家来人向保长报告。

锦承线上，一过平泉，铁路两旁居民的房屋拆得乱七八糟，东西到处乱扔，菜园、果园都成野地，满目凄凉。1943年，喀喇沁右旗实行“集家并村”，在旺业甸、安丹沟、白石台沟拆房子，另修“部落”。白石沟70多户人家，房子拆得一间也没剩。在旺业甸一带制造“无人区”，不准到茅荆坝、骆驼山耕地采伐。如果没有证明书进入“无人区”，开枪打死勿论。在“集家并村”4年当中，喀喇沁右旗烧房屋15万多间，荒废耕地180万亩。损失大小牲畜1万多头。死

亡人口 4500 人，被捕送往东北做苦工的 8000 余人（以上见热河《群众日报》）。除此以外还施行保甲连坐，加强特务训练，扩充伪军据点，要老百姓看路、当炮灰，当“肉电杆”。日本人凶残到了极点。

日寇的魔爪——宪兵队

宪兵是一种特种兵。伪满时期，宪兵是日本人用来镇压反满抗日人士的工具。当时各重要城市都驻有日本宪兵，铁路沿线也有满洲国宪兵，他们同样欺压百姓。赤峰有日本宪兵处，很多无辜百姓被他们抓起来审讯，所用的刑法很残暴。有子弹头刮肋条、灌辣椒水、灌火油、蹲水牢等，不知多少人死在宪兵手里。有一次我看见二十几个人被宪兵用麻袋把头装上，五花大绑，用汽车载着往赤峰宪兵处解送。在赤峰火车站，每次旅客出站时，数十名日本宪兵，面貌狰狞，怒目而视，见有可疑的旅客，就停止放行。每次都有十几人被检查，挨打或逮捕。山海关、古北口为“国境”，检查得更严，旅客每次都列成长队，将行李、背囊打开等候检查。日本宪兵和伪特故意刁难。去北平更困难，得有本地警察署的出国证，还要到宪兵队、警察局等各关卡登记、挂号、印指纹二三十次。每人只许带伪币 50 元，多则没收。东北和华北本是邻省，可被划成“两国”。中国人在本国旅行也受限制。

公爷府驻过一次日本宪兵，队长叫鸠山。在本街招收了二名特务，搞各机关、乡村及商民的情报。这二人狐假虎威，依势压人，敲诈勒索。鸠山化装成便衣，经常带着他们二人夜间串山沟。有一次晚上到了小柳条沟，老乡王生刨茬子，他们说给八路军放哨，便吊打灌凉水，经村民作保才释放。此外，还驻过一次伪满宪兵队。宪兵处设在商号利汇川门房，队长巴特扎布（蒙古族）带四名班长。各派四人值日，给他们供应蔬菜、鸡蛋、劈柴。商人给准备绸缎被褥、化学麻将牌、留声戏匣。他们喝醉酒就打人。特务比宪兵还可恶。公爷府警察署的特务马之禄、郝玉宗化装便衣，暗带手枪、捕绳，到

处敲诈，随便捕人。警务科的特务吴树栋（小庙子人）到处敲诈勒索。公爷府全村都受过他的害，特别是史东江被他害得家破人亡。八路军工作队的李荣春以前就和史东江有来往。1944 年，李荣春带领十几人来史东江家住，一天夜晚去小庙子捉特务吴树林时，两边开火，打死了吴树林的老婆，关其祥同志负了伤。抬至史东江家，连夜又送至柳条沟史东坡家。吴树林逃至平庄，向警务科报告，5 月来了三十几人的讨伐队，队长李久荣，他们到嘎叭河，捉住史东江和王羊倌（王子良），要就地枪决，村里人磕头求情，才把王羊倌放开，将史东江带至平庄。坂户警务科长亲自审讯，史东江受尽酷刑。7 月，史东江的二哥史东壁去平庄探听消息，刚下火车遇见吴树林，也被逮捕，送至警务科，经过几次审讯，在水牢里押了两个多月，最后被装在皮口袋里摔死。史东江被送至锦州法院，解放后才回来。

“八·一五”光复后日本鬼子的下场

1945 年苏联红军占领柏林以后，给日本帝国主义敲响了丧钟。日寇不甘心失败，还要作垂死挣扎。他们一方面组织航空敢死队与美国交战；另一方面为了死守满洲，仍在那里修机场、挖山洞、筑工事。在喀喇沁旗，每天都有几百辆大车，几千名劳工在那里穿梭不息，给日本人服劳役。

1945 年 5 月，热河省召开了一次有各地代表参加的会议。会上，省次长和铃木警务厅长讲了话，他们色厉内荏地说什么：西欧战争刚刚结束，苏联无暇出兵。日苏订有互不侵犯条约，苏联决不能帮英美打仗。还吹嘘皇军天下无敌，最后的胜利属于皇军等等。

当时的喀喇沁旗，还在受日寇的横征暴敛，百姓仍受日本人的打骂。8 月 15 日，传出了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消息。这时候，伪旗公署赶忙将原来的牌子摘掉，警察、职员都把黄衣脱下。伪旗公署的日本参事官五十岚、警务科长田中等十数人见势不好，携带武器骑

马逃跑，沿路抢吃抢住。当时，伪满军也到处哗变。

警察、汉奸、特务旧日的威风一扫而光。人民喜气洋洋，奔走相告，十几年的非人生活终于熬出了头。各种食物和日用品自由买卖，“违禁”物品也都在市场上出现了，街上呈现了从未有过的繁荣景象。

中国人民经过十几年的浴血奋战，终于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逞凶多年的日本帝国主义犹如丧家之犬，逃之夭夭。但是，他们在中国所犯下的滔天罪行，中国人民世世代代是不会忘记的！

日军对承德文物古迹的劫掠破坏

彭明生　郝洪喜

霸占避暑山庄作兵营

避暑山庄坐落在承德市区的北部，由宫殿区、湖区、平原区、山峦区组成。总面积约 564 万平方米，相当于整个市区面积的 1/2。

1933 年 3 月 4 日日军侵占承德以后，首先侵占了避暑山庄，将整个避暑山庄变为它的兵营。日本关东军第八师团司令部、西南防卫区司令部、日本宪兵队、八八一部队、陆军医院等都曾设在这里。日军侵华期间野蛮屠杀、镇压热河、承德人民的阴谋计划、指令几乎都是在这里密谋、制定、发出。日军占领还砍树木，拆毁古建筑，在山庄内建造日式平房和楼房，在如意湖上架起木桥，在山峦区挖交通壕，把莹心堂当马厩(到日军战败投降时，这里堆积马粪竟有一尺多高[①]，从而使避暑山庄内的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都受到严重破坏。

烧毁卷阿胜境殿

卷阿胜境殿(亦称五福五代堂)位于避暑山庄东宫的勤政殿北面，是东宫重要组成部分，面阔 5 间，含有抱厦 3 间。始建于乾隆十九年(1754 年)，是乾隆皇帝宴请宾客和陪奉母亲进膳之所。该殿面对葱茏起伏的群山，滨临涟漪轻泛的湖水，风景明媚而秀丽。

可惜，就是这一独具特色的建筑，竟然被日军所烧毁。

原来，根据日本军国主义的习俗，在其对外侵略扩张时，每逢占领一地，都要放火烧房屋，以火光来表示庆贺胜利占领。1933 年 3 月 4 日，日军川原旅团先头部队等从德汇门进入避暑山庄以后，为庆祝占领热河的胜利，便首先放火烧毁了卷阿胜境殿[②]。据当时曾经亲眼看见卷阿胜境殿被烧情景的原承德伪协和会会长高滋安（高毓番）等人回忆：日军士兵接到火烧卷阿胜境的命令后，便把几桶火油泼到该殿的各个部位，然后用火点燃。不大功夫，整个殿堂变成了一片火。在场的日军官兵发出阵阵狂笑。卷阿胜境殿这一已历时 179 年的别具特色的古建筑就这样被日本侵略者毁于一旦。

拆毁、掠走宗镜阁

宗镜阁位于避暑山庄内风景秀丽的松林峪与梨树峪之间半山坡上的珠源寺内。宗镜阁俗称铜殿，与北京清漪园（今颐和园）内万寿山的宝云阁（俗称铜亭）同铸于乾隆二十六年（1761 年），被人称之为"孪生姊妹"。该殿高二丈二尺六寸，呈正方形，柱高九尺，径八寸，通体呈蟹青色，在梁、柱、门、窗、匾额、抱柱等处都雕刻着飞龙、沧海、白云、花卉等各种浮雕图案。不但造型精美，而且制做工艺复杂。该殿共用青铜 207 吨，耗工料合银 65660 余两[③]。实为世界罕见之艺术珍品。然而，这一举世罕见的艺术珍品，却惨遭厄运，成了日军发动侵华战争的牺牲品。

1944 年，日军在太平洋战争中遭到惨重打击。连年的不义战争，使日本的经济状况越来越恶化。为了进行垂死挣扎，日伪当局以"金属献纳"[④]为理由到处掠夺铜器、铜件（连铜鞋拔子、铜锁吊也不放过），以解制造枪炮子弹原材料匮乏之急需。因此，所有部件都是用铜铸成的宗镜阁，自然被视为猎取对象。

1944 年 10 月间，根据日本关东军司令官、伪满洲国国务院总务长官武部六藏和日本关东军西南防卫区少将司令官安藤忠一郎

的指令并得到伪热河省次长岸谷隆一郎的支持，日军八八一部队派工兵丧心病狂地拆毁了宗镜阁铜殿。[5]据辽宁档案馆有关《珠源寺起运铜件清档》记载，被拆毁的宗镜阁铜殿共装26大箱、30抬(捆)，约500余件[6]。被拆毁的铜殿由避暑山庄运至承德火车站，然后装上货车，经锦承线运走。自此，巍然屹立在避暑山庄山峦之上，已有199年历史的宗镜阁铜殿惨遭劫掠，再不复返，留下永久的悲叹！

填平西湖作靶场

西湖位于避暑山庄湖区的西北部，与如意湖相连。原西湖湖面约有6公顷。湖中种有敖汉荷花和关内白莲。夏秋之交，湖中的荷花、白莲红白相间，争奇斗艳；岸边，杨柳依依，禽鸟声声，美不胜收。因此，这里有康熙、乾隆时期曾相继建起的远近泉声、听瀑亭、招凉榭、观瀑亭、双湖夹镜、长虹饮练等诸多景点。

可是，出于侵略战争的需要，这一景色宜人之处，却于1943年被日军强行填平作打靶场[7]，位于西湖周围的建筑也先后被破坏，争奇斗艳的荷花、白莲被压埋泥沙之下。经过打靶场训练的日本士兵，却成了镇压热河人民抗日斗争的刽子手。

罗汉堂作军火库

罗汉堂位于避暑山庄西北，建于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建筑面积13000平方米，是仿浙江海宁县安国寺罗汉堂而修建的一座大型庙宇。其中镌乾隆皇帝御题额的“应真普观”大殿由65间殿组成.殿内供有木制金漆的罗汉500尊。每尊罗汉雕法精细，神采各异，形象逼真，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

但是，到1938年，罗汉堂却被日军改作军火库，殿内的500尊罗汉也被“屈尊”移至普佑寺[8]。至此，昔日仿江南名寺而修建的圣洁之地罗汉堂，也变成了为日军屠杀中国人民服务的工具。

对珍贵历史文物劫掠

文物是一个国家在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具有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实物，是凝聚着历代劳动人民聪明智慧、高超技艺的结晶。

日军侵占承德期间，不仅毁坏了避暑山庄、外八庙的园林、建筑，而且以各种借口对山庄、外八庙内的珍贵文物、珍宝古玩进行劫掠，打包装箱，运回日本。其数量难以确查，其中有案可查的包括：

1、抢掠外八庙的各式镀金、银佛像143尊[39]；

2、抢掠避暑山庄、外八庙殿内装饰品120件[40]；

3、抢掠由乾隆亲自主持，挑选60名喇嘛花费18年时间完成的满文《大藏经》一部（原藏于殊像寺内）[41]；

4、抢掠用金字书写、珍珠装饰而成，载有汉、满、蒙、藏4种文字的《丹珠经》、《甘珠经》两部（原藏于普宁寺）[42]；

5、抢掠《古今图书集成》一部[43]。

日军对承德避暑山庄、外八庙的劫掠、破坏，不可置疑地记录了人类文明史上令人发指的一页。这一野蛮罪行的制造者，将被永远地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注释：

①1994年4月采访承德市第一任避暑山庄管理处处长李征夫记录。

②杜江：《承德》一书第17页，中国旅游出版社1988年8月出版。

③阚学仁：《山庄寺庙》一节，《承德文史》第五一六期第242页。

④赵聆实：《伪满"国民训"的反动实质》，《东北沦陷十四年史研究》第一辑第80页，吉林人民出版社1985年8月出版。

⑤彭明生：《破坏文物，罪责难逃》一文，《承德市党史资料通讯》第33期第35页，1985年8月出版。

⑥张占生：1988年5月6日《承德群众日报》。

⑦⑨⑲袁森坡：《风云变幻，山庄浩劫》一节，《承德避暑山庄》一书第

242、243页，文物出版社1980年8月出版。

⑧石林、春江主编：《承德览胜》第56——57页，地质出版社1983年8月出版。

⑪⑫ 李海涛、马秀英：《外八庙历史沿革》一文，河北政协文史增刊《外八庙》一书第275页，1992年6月出版。

⑬袁森坡主编《避暑山庄与外八庙》一书第98页，北京出版社1981年9月出版。

日伪统治时期的热河北票煤矿

战丽珠等

1933 年 3 月，热河沦陷后，北票煤矿由伪满洲国实业部接管，设立北票炭矿复兴委员会，开始恢复生产。同年 10 月，探测台吉、三宝煤田、设立了台吉、三宝开发所。12 月，北票炭矿复兴委员会改组为日满合办之北票煤矿股份有限公司，日本人正式参与经营。1934 年 5 月 6 日，满洲炭矿公司正式成立。1936 年 4 月，北票煤矿股份有限公司被日伪合并到满洲炭矿公司，设立了北票矿业所，下设冠山、三宝、台吉三个采炭所。当时，矿工人数达万人以上。1940 年煤炭产量超百万吨，矿业所积极扩充选煤设备，添置洗煤机械，以提高煤炭质量。1943 年 3 月，脱离满炭公司独立经营，改名为北票炭矿株式会社，直至 1945 年日本帝国主义无条件投降为止。

建立庞大的统治机构

1936 年 4 月，日伪收买了北票煤矿股份有限公司后，改名为北票矿业所，完全由日本人来控制。炭矿矿长长久美，开始强化统治机构，重新建立了总务、劳务、经理、矿务、工作、操炭等六课和冠山、三宝、台吉三个采炭所、一个工厂、一所医院。以上各课的课长、所长、厂长、院长，均由日本人担任。日本侵略者由开始参与经营发展到直接统治的地步。

1943 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发生重大变化。9 月中、美、英在缅甸对日军开始反攻，日军逐渐陷入不利地位。在我国日、伪军所发动的“军事清乡”和“政治清乡”，一次次被我军所粉碎。日本帝国主义妄图挽回其败局，对已占领的我东北地区进一步加强法西斯统

治，大肆掠夺煤炭资源，以供军需生产。1943 年北票煤矿独立经营，改名为北票炭矿株式会社，日本侵略者大力强化其统治机构，以保证其大采炭计划的顺利进行。在社长岸本俊夫的操纵下整顿机构设置。社长直接领导总务部、矿务部及冠山、三宝、台吉三个采炭所。总务总主管行政事务及对外派出机构，下设庶务、经理、资料、附业、生必等五课和一个医院，其中包括冠山、台吉、三宝、朝阳 4 个分院。对外在大连、新京、奉天、东京设四个事务所。矿务总主管生产技术方面的工作，下设劳务、矿务、工作、操炭、工事等五课，冠山、三宝、台吉三个采炭所直属社长领导，综合起来即是：2 部、3 所(采炭所)、1 院、10 课、4 所(对外事务所)、89 个系(包括相当系一级股科、院、场、所)，这是日寇侵占北票煤矿以来设置的最庞大的统治机构。这些系以上的头头完全由日本人所担任。日本人职员待遇无论薪金、实物配给，比满系职员要高出半倍乃至一倍。在 1945 年日本帝国主义无条件投降的前夕，开始缩减机构，撤退人员，煤产量大幅度下降，预示着日本侵略者的末日即将到来。

掠走大量优质煤炭

日本帝国主义对我东北地区的丰富资源，早已垂涎三尺。自日本侵略者入侵北票后，为适应其发动侵略战争的需要，积极恢复北票煤矿的生产，尤其自 1936 年北票煤矿股份有限公司被日伪收买后，煤炭产量逐年增加，三宝、台吉两矿分别是由 1938 年和 1939 年相继投产后，进一步提高了煤炭的生产能力，到 1940 年煤炭产量超过了 100 万吨。特别是到 1941 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帝国主义对煤炭、钢铁的需求不断增长，为解决这一需求问题，日寇炮制一个又一个的急需《物资动员计划》和《生产扩充计划》，用以积极推动战时生产。这些计划公布以后，矿工的劳动条件就更艰难，强制矿工开展“大采炭”、“采炭报国”等运动，同时制定了增产奖金，采取生产周等措施。日本侵略者又规定：“劳工每月勤绩 30

个以上者奖，达不到者不予开支。"根据这个规定，日本人和把头更加不顾工人的安危，随意延长劳动时间，有时长达 16 小时。既使是这样干，还不能满足战时对煤炭的需求。所以，又三天两头搞什么"努力出煤日"的名堂。到了这一天，日本人和把头一齐出动，手拿皮鞭、镐头，强迫工人卖命地干，矿工们愤怒地说："努力出煤日，努力出煤日，日本鬼子发财日，煤矿工人的鬼节日！"日寇就是用法西斯的手段，在 13 年里掠走北票优质煤炭 1051.8 万吨。

封建包工大柜迅猛发展

日本帝国主义将魔爪伸进北票煤矿后，就与封建势力相勾结，积极扶持封建把头势力的发展，在仅有几家的基础上，很快发展到 34 家包工大柜，有封建把头 50 多人。其中，宋玉，倪福廷、倪维章、倪春舫、倪玉山、费先、王令是日伪时期有名的封建大把头，他们拥有六七千名劳工。大柜设有书记长、书记、查头子、催班的共 400 多人，这些人是日本侵略者和把头残害工人、剥削工人的打手、帮凶。

日伪统治时期的封建把头，对矿工的剥削是极其残酷的，矿工叫他们为"土皇帝"、"吸血鬼"。他们剥削矿工的方式和地主利用土地收取地租相类似。他们每个把头按占有劳工多少，出勤工数，向炭矿领取"手续费"，有的把头每月提取高达 3000 多元。除此外，他们还开当铺、卖鸦片、设赌场、开商店、放高利贷，并克扣工人的衣物、胶鞋及应发给工人的配给品。逢年过节，他们还强迫工人给他们送礼，再加上数不清的苛捐杂税，因而每月开支有的工人所剩无几，有的还倒欠包工大柜的钱。

武装宪警横行霸道

日伪统治时期，北票煤矿有两支反动武装，即日本宪兵队和矿警队。日本侵略者就靠他们在矿区内进行法西斯统治，镇压矿工的反抗活动，任意抓捕矿工，用鞭打、通电、活埋等野蛮手段，残害广

大矿工。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侵略者在北票建立了“北票炭矿派遣队”（也叫分遣队）。由锦州日本宪兵队本部直接领导。队长和宪兵都是日本人，还有翻译、特务、密探、狗腿子等30多人。宪兵队与北票地方各反动组织都有联系，有一个相当规模的情报网。其主要任务是：在矿工中搜查共产党地下组织和破获八路军的地下活动；侦察矿工中的反满抗日份子；监视“特殊工人”的动向。宪兵队内设有审讯室，配有各种法西斯刑具。

矿警队和宪兵队狼狈为奸，也是直接镇压矿工的一支反动武装。矿警队是在1933年正式建立。1933年夏季以后，先后由日本侵略者井上、古泽任队长，并在冠山、三宝、台吉三个地区派了警察分队，分队长也都由日本人担任。这时已达200多人。

矿警队专门在明里暗里调查工人中共产党的活动，在矿区的出入口、工地、井口、工村等地站岗，负责对“特殊工人”上下班的押送。他们依靠日本侵略者撑腰打气，为虎作伥，随意抓捕无辜矿工，在矿区横行霸道，肆意行凶，搞得矿工和家属惊恐不安。

劳务系——“老虎系”

劳务系是日本侵略者直接统治工人的一个职能机构，因而他们特别重视劳务系。该系从上到下的头头，都是由日本人担任。在1939年、1943年和1945年曾改称为劳务课。冠山、台吉、三宝三个采炭所设劳务分所。其上有庶务统计班、操入班、着到班、公私伤班、登记班、工村也设劳务分所和防止班。当时这个系共有890多人。它的职权范围是：对所有工人及佣员进行记工、考勤及住宅、独身寮的分配，配给品的发放。防止班还设立哨卡，防止工人逃跑。

1940年后，随着生产规模的扩大和产量的增加，就更需要招骗劳工，所以在劳务课内又建立了3个系。其中一个是招募系，专门领导和组织招募工人的业务，由日本人任系员，配有专职翻译，

统一安排各包工大柜外出招骗劳工和就地接收定期劳工的工作。

劳务系是日本侵略者实行高压手段，统治、压榨工人的一个得力工具。劳务系所有的工作人员，都是日本侵略者精心挑选、培养的。这些人甘心充当鬼子的奴才，是日本侵略者统治工人的一群爪牙，他们个个穷凶极恶，在工村、独身寮和工人上下井时，任意打骂工人，索贿受贿，敲诈勒索，并贪污配给品，还强迫工人为他们送礼。在工村他们还奸污妇女，无恶不作。工人和家属对他们恨之入骨，称他们为“老虎爪子”，把劳务系叫“老虎系”。

大抓劳工，大搞“地盘育成”

日本帝国主义侵占北票煤矿以后，为满足其侵略战争的需要，疯狂地掠夺我煤炭资源。当时，矿工人数较少，加上井下事故甚多，造成劳力严重不足。日本侵略者和把头一齐出动，到处抓骗劳工。开始在北票附近和辽西地区境内抓骗，但仍满足不了需要。进而深入关内各省招骗破产农民，以一骗、二抓、三逼的卑鄙手段，从河北、山东、河南、江苏等省招来了大批劳工。

一骗。所谓骗，就是以花言巧语骗人。说北票炭矿如何好，有饭吃，住洋房，挣大钱，按月开支。就这样，被骗来的单身汉及带家属的农民，来到北票后，生还者甚少。

二抓。骗不来就以武力抓捕。一是日本侵略者在搞集家并村时把无家可归的农民抓来当劳工。二是将日本侵略者清乡、扫荡中抓捕的青壮年送来北票当劳工，即所谓的“特殊工人”。

三逼。强行推广“地盘育成法”。1938 年，炭矿的日本人和当地吐默特中旗旗长沁布多尔济相勾结，炮制了臭名昭著的“地盘育成法”。其中规定北票炭矿周围农村年龄在 18 岁至 55 岁的农民，都必须到北票炭矿义务劳工四个月。

极力推行愚民政策

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不仅从经济上对矿工进行残酷的剥削，而且从政治上对矿工实行血腥统治。他们大搞封建迷信活动，从思想上、政治上对广大矿工实行奴役，妄图巩固他们的统治地位。

日本侵略者在长达13年侵占北票煤矿期间，强制推行愚民政策，从精神上摧残广大矿工，使广大矿工俯首贴耳地成为日本天皇的顺民。不准矿工说自己是中国人，只能说是"满洲人"。如违反了这条训令，就是违法，轻者遭毒打，重者被置于死地。矿工没有自由，矿区到处张挂"莫谈国事"的牌子，如遇有互相交谈的矿工，就被扣上"政治犯"、"国事犯"等罪名，矿工的谈话权利也被剥夺了。

日本侵略者和把头还向矿工灌输迷信思想，用"太上老君"来麻痹工人意志。他们分别在冠山、台吉、三宝等处修建了八处"老君庙"。说太上老君是专司安全的神仙，如不敬他就会灾难临头。逢年过节强迫矿工出钱敬神修庙，他们从中渔利，坑害矿工。

日本侵略者强迫矿工每天早上都要向东遥拜"天照大神"，并胡说什么矿工的美满生活都是"天照大神"赐给的。为此，他们还制定了种种法规，迫使矿工对天皇效忠，违反者绳之以法。

除此外，日本侵略者还沿袭了老牌帝国主义惯用的伎俩，用开"鸦片馆"，"赌场"、妓院来摧残广大矿工，致使一些矿工妻离子散，家破人亡。

重大伤亡事故不断发生

日本侵略者为大量掠夺煤炭以供军需，便丧心病狂地推行"以人换煤"的反动政策。视工人生命为草芥，他们用刺刀、皮鞭、镐头强迫矿工在阴暗、潮湿、闷热的矿井下干长达十五六个小时的沉重苦役。井下没有任何安全措施，他们不检查瓦斯，不维护顶板，断梁缺栓到处可见，工作时煤尘飞扬，淋头水不断，劳动条件十分恶劣。

因此，冒顶、片帮、瓦斯爆炸、透水、火灾等重大恶性事故不断发生，夺去了无数矿工的宝贵生命。

根据不完全统计：从 1934 年至 1945 年的 11 年里，北票煤矿就发生 22 起重大伤亡事故，死亡人数达 485 人，伤残者之多无法统计。其中一次死亡在 30 人以上者就占 7 次，一次最多者死亡 70 人。在 22 次事故中，瓦斯爆炸事故有 12 次。这些数字足以证明：日本侵略者所推行的“人肉开采”政策何其野蛮、恶毒。这正是：“矿山处处放悲歌，矿工血泪流成河，只见矿车天天走，不见矿工几人活”。

矿工生活极度悲惨

枕的砖头木头头，
披的麻袋破布头，
吃的发霉窝窝头，
死了用块破席头。

这首歌谣形象地描述了日伪统治时期煤矿工人的悲惨生活。

当时，工人收入的微薄工资被层层剥皮，难以养家糊口。炭矿规定：常役夫(即外工，包括采煤、推进、巷道维修工)因无固定工资，一律按工率计发工资。工人的工资最高为一成。当时以生产煤炭数量折钱，正常情况“一成”，最少值为 6 至 7 角，最多值为 1 元钱。因此，一个全月上 26 个班的“一成”工人，全月可得工资 26 元(按最高值 1 元计算)，从中扣除每天所发的 0.40 元钱饭费，余下的工资仅剩 15.60 元。其他还要扣除房钱、前贷金、安全灯费、水袜子钱、工具费、邮政储蓄、灯火费、肥皂钱等，七扣八扣也就所剩无几了。有些小工还要倒欠包工大柜的钱。所以，很多工人就得向包工大柜借高利贷维持生活。这还不算，把头还动不动叫矿工送礼，送礼的名目无奇不有。如：日本人和把头家办婚丧事要送礼，逢年过节要送礼，连他们的老婆生孩子、孩子过满月都得送礼。还每月

固定的给放炮的、监工的送 3 元钱的“留须费”,不然就刁难你,给你小鞋穿。

有的工人每月开支即便剩下几个钱,炭矿也不给现金,而是发给“实物引换券”,到指定的他们开的大卖店去买东西。他们从中又剥一层皮。日本侵略者和把头对矿工的剥削,真可谓敲骨吸髓。矿工愤愤地说:“鬼子吃人肉,大柜喝人血。”

当时矿工吃的是用发霉高粱、糠和花生皮混合磨成的所谓“兴亚面”窝窝头;穿的是“广告布”麻袋片,还有的人是用水泥袋纸遮体;住的是大筒子屋、对面炕,四面透风,二三十人挤在一起,和犯人监狱没啥区别。所以,在日伪时期的矿工俗称“窑花子”,冬天没有棉衣穿,升井后在井下被淋湿的破烂衣服马上冻成冰,矿工们不得不跑步回家,因而又有“腊月花子赛如马”之说。

独身劳工在生活上更是苦上加苦,吃饭在独身寮的饭堂里,每天两顿饭,一碗稀粥和一个发臭的窝窝头。粥不够喝,日本人和把头就向粥里掺凉水,所以工人们说:“一进锅房门,稀粥一大盆,勺子舀三舀,还能照见人。”

矿工在井下受伤,到医院不是被截肢就是放置一边无人过问,直到死了被扔到“万人坑”了事。

铁证如山——“万人坑”

日本帝国主义侵占北票煤矿 13 年里,究竟残害死多少矿工?无需准确统计,仅从日本侵略者创造的一处处“万人坑”、“死人窖”的遗迹里挖出来的鄰鄰白骨,就是最有力的历史见证。

北票遗留下来的“万人坑”有五六处,其中台吉南山“万人坑”尚能辨认。此处占地 1.7 万平方米,挖掘出 6500 多具死难矿工的遗骨,据说 1941 年大年三十,就从“报国寮”里拉出 48 具尸体,其中从河南省开封抓来的 27 名劳工就死了 20 人。

沉重的劳役,非人的生活,矿工被折磨得腰折骨断、伤残病弱。

日本侵略者看到从他们身上再也榨不出什么油水了，就把他们一个个地拖进了“隔离所”。矿工们都知道，进了“隔离所”就是入了“停尸房”。所以，他们愤怒地说：“进了隔离所，十有九个不能活！”

1943年，抗日战争进入了相持阶段的第3个年头，垂死挣扎的日本侵略者更加疯狂地残害矿工。他们借口防止什么瘟疫流行，把许多活着的人推进“万人坑”活埋，扔进浓烟滚滚的火坑活活被烧死，制造了骇人听闻的“烧人场”。

“万人坑”奇形怪状的遗骨，令人触目惊心。据不完全统计：从1933年4月到1945年8月，被日本侵略者残害死的矿工就有32000多名。由此可见，日本帝国主义侵占热河北票煤矿的滔天罪行，铁案如山，不容抹杀！

热河“无人区”

刘小朋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帝国主义在热河省制造了沿线长1000多公里的独特防线——“无人区”，将大约2.5万平方公里土地划作“无住禁作”地带；将大约140万世代在这块土地上居住耕作的农民，武装囚禁在无数个“集团部落”之中。4年时间，使其中的10余万和平百姓死于屠杀、瘟疫、寒冷和饥饿。热河“无人区”不同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任何国家与国家、武装集团与武装集团交战的军事防线，它是帝国主义在人民战争的海洋中不能自拔，直接使用武装力量与人民作战的特殊战场。

热河“无人区”的提出

1938年，八路军“四纵”开辟雾灵山游击区后，日本关东军开始从东部地区调动兵力阻止冀东抗日游击武装向热辽蔓延。但事与愿违，1939年9月以后，冀东、热南的抗日武装统一改编为八路军，确立了开展冀东地区独立自主敌后游击战争的方针，以冀东根据地为补给基地，以热南山区为休整、回旋区域的游击战争不断扩大，热河的日本关东军认为人民抗日游击战争已经进入“满洲国”。

1940年4月17日，承德宪兵队长早川唯一在《一一六号报告》中恐慌地报告了这一情况：“敌方为了死里求生以全面游击战相呼应，又对民众及武装团体施展了阴险的手段，而且越来越积极顽强的、或以巧妙的抗日救国宣传和武装威力并用，或以激发民族运动之裂痕为基调而策划动员民众之抗日斗争。军政两方面的工作皆专心极力扩大和加强赤色地盘”[①]。

1940年，“满洲国”为加强“西南边境”的力量，任命“满洲国”总务厅地方处长岸谷隆一郎（日本人）为热河省次长。岸谷隆一郎曾任通化省警务厅长，在“东边道”竭力实行“治安肃正”、“集家并屯”，是“围剿”和屠杀杨靖宇将军及东北抗联的罪魁，有推行“无人区”化的丰富经验。他到任不久，立即请求“满洲国”批准前通化省省长、汉奸姜全我任热河省省长，前通化省警备厅长、日本人皆川任热河省警务厅长，前在通化县任过职的日本人仓胜任热河省协和会长，组成了意见统一、步调协调的伪热河省统治核心，初步酝酿在“西南国境”实行“无人区”化。年底，热河省当局任命省警务厅保安科长葛莹任伪兴隆县长，宣布了《治安维持法》，充实、成立和调入15个县辖警察讨伐队，调来“满洲国”第五军管区直辖混成第八旅步兵三十四团，总兵力共约7000人，与日本关东军配合，开始在兴隆境内实行小型“无人区”化。

1941年，由于苏德开战，日本增加了对东边“国境”的注意，关东军无力加强热河兵力，“集家并屯”和“无人区”化的速度慢了下来，兴隆一个县的行动没能给热南山区游击根据地造成大的破坏。

1941年9月，承德宪兵队本部在《西南防特情报第一号》中再次告急，“中共现在所采取的对日战略，是扩大强化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了坚持抗战，获得最后胜利，积极地动员民众参加协力于抗战工作，在政治方向，拥护抗日政府，支持抗战政策；在经济方面，使之担负军需之供给，确保战争必需的物力，而且在军事方面担负起兵力补充及支援军事活动，以获得武装斗争的胜利。采用以上方针，全面依靠民众，并加以培养”……[2]

1941年10月，西南地区防卫司令官大村少将向“满洲国”提出《西南地区肃正工作实施要纲》，要求“从山海关到古北口的长城线900公里的范围内，将从长城一线起32公里地区定为无人禁耕地区，毁掉或烧掉民房，将村民迁走”，“为容纳上述地区居民，在安全地区建设部落”[3]具体提出了“无住禁作地带”和“集团部落”的

建设纲领。

这时，日本关东军在中苏东北边境上侦察到，苏军由于列宁格勒、莫斯科、罗斯托夫战线吃紧，从远东调回 7 个步兵师、1 个骑兵师和至少 1 个空军师及大约 4 个坦克旅，并从外贝尔军区和蒙古驻军中调回 13 个师和 4 个坦克旅的兵力，深感苏联红军对“满洲”构不成威胁。同时，又由于日军在太平洋战争中势如破竹，占领的土地飞速增加，而保证“大东亚圣战”的补给线“满洲”却遭到八路军人民游击战争的破坏，日本关东军很快就通过“满洲国”批准了大村少将的《要纲》，在热河省设置西南地区特别工作班为具体推进机关，由“满洲国”司法部检察官绪方浩、治安部参事官长岛信义、协和会参事四川博明等人为主要成员，直接听取大村司令官、“满洲国”第五军管区中将司令官赫慕侠的意见开展“无人区”化工作。

同时，“满洲国”在锦州成立了西南地区防卫司令部(后移至古北口、将军关一带)，从通化省调来“围剿”过杨靖宇东北抗联的“满洲国兵”2 万余人，由黄埔军校毕业、参加过广州暴动和东北抗联、后投敌的黄方刚任少将司令官，分兵驻在长城山海关至兴隆一带。黄方刚的部下，有一些骨干是原东北抗联的高级干部，如讨伐队长程斌，就曾经是杨靖宇部的第一师师长，对共产党领导的游击战比较熟悉；其大部分兵员系东北军和原国民党军，受过正规军事训练，参加过“围剿”东北抗联的战斗，武器装备也十分精良。

1942 年初，热河全境已集结了 10 余万日、伪军和警察。尽管其中日本关东军所占比重不大，但从兵员配比上，日本关东军抽调大批有“集家并屯”经验，“围剿”过东北抗联武装的“满洲国兵”加强“无人区”化。足以说明，日本陆军已经看到，冀热边游击战争是一场人民战争，靠正规部队和坦克大炮很难取胜，所以才决定以中国人打中国人，用有游击战经验的讨伐队来对付“匪民合流”的抗日游击武装。

4 月份，伪热河当局在冀热边游击战最活跃的兴隆县初步推行“治安肃正”，除进行“大屠杀”、“大检举”、抓劳工外，开始秘密策划“无住禁作地带”和“集团部落”的建筑方法和地点。

从 1942 年秋至 1943 年春，热河全境开始了分为“无住禁作地带”和“集团部落”两个组成部分的“无人区”化。日本关东军直接使用武装力量“讨伐民众”，制造出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绝无仅有的屠杀战场。

杀光、烧光、抢光的“无住禁作地带”

“无住禁作地带”，就是在高山、峡谷、沟壑、密林等地形复杂的区域，绝对禁止一切居民居住活动。目的是有利于发现任何活动目标，便于进行军事“围剿”，进而以此来割断抗日游击武装与人民群众的联系，铲除八路军、游击队的活动屏障。当时的热河，是一个十分落后的山区农业省份，农民赖以生存的主要对象为山林和河滩坡地。特别由于生产力低下，生产手段原始，农民的活动半径既狭小又不允许重迭。自然经济的状况决定了村民必须是错落分居在沟壑、山梁上，依靠广种薄收来维持生计。

1942 年，伪热河省当局在日本关东军的操纵下，在热河省全境沿长城线划出了 1 万 2 千余平方公里的土地为“无住禁作地带”，强迫近百万世代在这块土地上耕作的农民，必须在数日内迁居到平缓地区。这无疑夺去了他们的生存活路，等于把人们驱向死亡。故此，“无住禁作地带”从一开始实行，就必须施以残酷野蛮、灭绝人性的手段。

杀光：日本关东军曾下达过严格命令，在“无住禁作地带”，只要发现任何有生命的东西，都“格杀勿论”，甚至连一只狗、一只鸡也不能放过。

1942 年冬季，日伪军在兴隆县前干涧村围住 19 个不愿离开“无住禁作地带”的男女农民，先是扒光衣服用木棍打得血肉模糊，

然后塞进萝卜窖中活活薰死。

1943年初，兴隆县中田、上庄、大小黄崖等9个自然村，仅1个月中就被杀死722人。

青龙县花厂峪村全体村民坚持不离开“无住禁作地带”，170户人家的村庄，从1943年至1945年的3年中，被日伪杀害了86口人。

宽城县王厂沟、转水汀、石子沟、关界村、瀑河口等9个自然村被划作“无住禁 作地带”，在1943年4月至11月的8个月中，遭到日伪军7次大屠杀，被杀害男女老少71口，农民刘殿甲一家7口，被抓住6口全遭杀害。其中5口成人被枪杀，一个17岁的孩子被头朝下夹在树上夹死。农民关贞瑞一家老少3辈6口，祖父被挖出双眼后砍死，父亲被枪杀，11岁的哥哥被劈成两半，4岁的弟弟被摔死，母亲被轮奸后豁裂胸膛，唯有他被敌人捅了3刀后倒在死人堆的血泊里才幸免一死。

1941年底，日伪军把滦平县快活峪村划作“无住禁作地带”，初次扫荡长达50多天，杀死不愿离开的群众32人。从这以后，快活峪村一带就再不准中国百姓进人。农民孙怀清回到自己的地里掰了几穗玉米，被敌人看到后打死在田头。农民张家书9岁的女儿张小冬在山上拾柴，被当做靶子打死在阳坡。该村被划作“无住禁作地带”后，像这样在自己的田地里被杀害的群众达14人。更残酷的是，这年10月，日本关东军的讨伐队得知快活峪的卢文清、卢文亮、尚文德等18名群众回村收庄稼打场，于清晨突然将这些人全部逮捕。先用木棍毒打，然后一个个推人大坑里开枪射杀，再向人堆里投掷手榴弹。最后，日伪军还跳入土坑中用刺刀“过筛子”，18人中，仅有5人遍体鳞伤得以幸免，其余13人全部死亡。

兴隆县是日本关东军推行“无人区”化的重点地区，1942年以来，调入日军“山田队”300余人，“满洲国”兵34团、12团、步兵8团、步兵3团、步兵24团约8000人，省属警察讨伐大队10个，约

4500人，加上原县属警察讨伐队7000人，原日本驻军881部队千余人，计2.1万余日伪军。当时，兴隆县仅3万户居民，15.7万余人口，几乎平均每个武装士兵对付一户半人家和6.5口和平居民。日伪军对于不离开"无住禁作地带"的百姓，像是狩猎一样的追逐杀害，然后割下耳朵串在铁丝上回去领赏。1943年以后，全县的"无住禁作地带"，除了坚持山地游击战争的抗日军民，连大小牲畜都被屠杀得干干净净。羊羔峪村张村长养着一只劫后余生的小猪，居然也被逼得进入了战争状态，每当山头报警，它就立即从圈中窜出，乖乖地跟在人群后面往大山里跑。

烧光：为了以最快、最有效的办法断绝"无住禁作地带"居民生存的活路，日本关东军和讨伐队对一切建筑物、庄稼、生活用具等，凡抢不走的均予以烧光毁净。

1943年2月，日本关东军、讨伐队又将宽城县碾子沟村的7个自然村划作"无住禁作地带"，限令分住在10多里地的7个自然村80多户居民3天之内全部迁进"部落"。3天后，日伪军将来不及拆迁的四五百间房屋付之一炬。

兴隆县驴叫村，地处雾灵山腹地，山大沟深，是热河省党组织活动最早的地区之一。群众一直坚持山地抗战，日伪军对此恨之入骨，曾多次进行扫荡"围剿"，每一次都放火烧毁一切房屋。从1942年至日寇投降，驴叫村被焚毁过22次。到后来，驴叫村的房屋全部是石头垒的"马架子"，有柱子没墙，顶上盖茅草，连炕都是青石板上铺椴树皮。

青龙县原有房屋9.6万余间，被烧毁8.7万余间，其中抗日根据地286个村庄的房屋约2.8万间，被烧得片瓦无存，一片焦土。

山区山高林密，日军为了使"无住禁作地带"更加便于控制，在烧毁该地带一切建筑物的同时，还大面积纵火焚烧复杂地区的森林。1943年3月至6月，关东军和伪满讨伐队在兴隆县出动2万多人再次驱赶群众离开"无住禁作地带"。在五指山区、大小黄崖、

狗背岭 3 块抗日游击根据地放火烧山，至使山火连绵，4 个月不熄，数百里地天昏地暗，风烟四起，参天的森林烧为焦木，满山的灌丛化为灰烬。

从开始实行“无人区”化到日本无条件投降，热河全省每逢此季，长城沿线即山火连天。抗日战争胜利后，长城两侧一片焦土，唯有砖石的长城屹立在寸草不生的山脊上。据中国解放区临时救济委员会晋察冀边区分会在抗日战争胜利后公布发表的《日本法西斯八年来在边区的暴行》统计，冀热边区在抗日战争期间被烧毁 330 余万间房屋，其中热南山区的“无住禁作地带”占 205 万余间。至于被焚毁的森林和农作物，则因面积大、数量多而无从考证。

抢光：在“无住禁作地带”，除了杀光、烧光之外，还有抢光。粮食、牲畜、农具、被服等生产生活必需品是第一抢劫对象。据冀东党组织的资料统计，抗日战争期间，冀热边被劫去的粮食超过 103 亿斤，马、牛、驴、骡 6 万头，猪、羊 206 万只，农具 18 万件，被服 320 万件。至于其中到底有多少是在推行“无人区”化时期劫掠的，因战争残酷，无法留下原始记录。但 1946 年 1 月 20 日中国解放区临时救济委员会晋察冀边区公布的《敌伪烧杀抢掠统计表》很能说明问题。仅以富庶的冀中区与贫困的冀热辽区相较，冀中区被抢掠的粮食近 79 亿斤，尚比冀热辽区少 20 余亿斤；冀中区被抢掠的猪羊为 37.8 万只，仅接近冀热辽区的 1/6。冀热辽区若不是因大片土地被划作“无住禁作地带”，绝不会遭到如此疯狂的掠夺。对此，承宽宁平抗日联合县政权有过一个较具体的统计，该地区在实行“无住禁作地带”期间，就有 1.2 万头大牲畜、18 万只羊、22 万头猪被日伪军抢去，有 4.5 亿斤粮食被抢走或烧掉，有 1.6 万余件农具被抢走或毁坏。承宽宁平地区的“无人区”化面积和程度，远不如兴隆、滦平等县。据此推算，整个热河“无人区”中被抢掠的财产就可想而知了。

既然抢光，当然除去以上物资外，其它任何物件也是不能留在

“无住禁作地带”的。石碾、石磨、水井、辘轳、大缸、小罐直至锅碗瓢勺等不能带走的全部被日伪军炸烂捣毁。凡被划作“无住禁作地带”的村庄，满目废墟，遍地残骸，连断壁残垣都被全部捣毁。1944年，兴隆县坚持山地的群众每户只剩有1口铁锅，做完饭后立即埋起来，以防备日伪军“清剿”抢掠。不少人家里连饭盆，饭碗都没有，只好用桦树皮代替。冬季没有棉衣，更谈不上被褥，人们就穿蓑衣，盖黄白草取暖。坚持山地游击战的八路军和游击队就更艰苦了。1942年秋天，冀东西部地分委书记李子光同志在雾灵山“无住禁作地带”开辟工作，已经多天没有尝到盐味了。同志们从山沟里拣到些大芸豆，专为他放了些盐煮了煮。他感到同志们都没吃到盐，随即将芸豆每人几颗分给了大家。吃糠咽菜苦，可有时有了糠菜加工制熟就更难。碾子、石磨、锅、碗都被抢光了，坚持抗战的群众就用石头脱壳捣粮，用日本鬼子钢盔煮饭，在青石板上烙饼，挖土坑当灶，把南瓜掏去瓤做瓢。冀东西部的盘山根据地，1943年被划作“无住禁作地带”后，敌伪挖出4道封锁沟，抢掠了无数次，几乎是片瓦无存。坚持斗争的盘山民兵班早已没有了一颗粮食，只好找一堆白薯秧煮团子吃。一次大雪封山，敌人又来扫荡，盘山班被困在“清凉洞”里。不到3天白薯团子也吃光了，他们就吃雪团啃冰块，一直坚持了7天7夜。这个班的民兵子连海是光着脚进的雾灵山，抗日战争的8年中就没穿一双鞋，直到抗日战争胜利，他才不再光脚。

对于“无住禁作地带”的青苗，敌人更从不放过。从1942年热河全境实行“无人区”化后，日本关东军和汉奸讨伐队即每年几次按节气到“无住禁作地带”去割、毁青苗。密云县从1942年到1945年，日伪军连续在庄稼吐穗灌浆时，驱赶大批敌占区百姓对“无住禁作地带”实行“搜青割青”政策。仅1942年7月，敌人一次割毁“无住禁作地带”的二区、五区、七区1/2的青苗，其中莲花瓣、化石峪、大牛圈、西口外、黄峪口、孟思郎峪等村的庄稼被全部割光。

人间地狱——“集团部落”

帝国主义的战争之所以不能打赢，既不是因为其经济基础不雄厚，也不是因为其军事力量不强大，而是因为他们发动战争的目的是征服人民、奴役人民，当帝国主义真的把人民统统屠杀干净，他们再没有征服、奴役的对象，目的自然也就达不到了。所以，帝国主义对人民的战争，只要不将人民屠杀干净就是失败，反过来，一旦真把人民屠杀干净了，同样也是失败。这客观事实，在使所有握有现代杀人武器的帝国主义者伤透了脑筋。

日本关东军在“满洲国”境西南地带疯狂推行“无人区”化，就是为了要达到奴役、而不是杀光中国人民的目的。

所以说推行“无住禁作地带”，仅是从战术角度出发，以控制复杂地形，割断抗日游击武装和人民群众的接触，不过是“无人区”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实行“集团部落”，则是从战略高度出发，为了直接使用武装力量去“讨伐民众”、“争夺民众”，这才是“无人区”化的核心内容。1942 年 10 月 29 日，热河日本宪兵队队长在《热警情发第 324 号》中，对“集团部落”做了很好的解释：

“鉴于冀察热国境地区当前的形势，其治本上第一要谛，无论怎么说也是匪民隔离”，“所谓集家，是为了把可能成为敌人游击区的国境地区的住民，集结到我方据点及附近地区，使之完全与敌人的活动隔绝，由我方掌握，从而封锁扼杀敌人所谓人力物力的动员工作”，“这是切断其与民众联系的纽带，救命之纲绳。此实致命之打击。”

该报告还对推行“集团部落”做了进一步论证：

“孙子兵法云：伐人之计，上兵伐谋，其次伐交……所谓伐交，即攻伐友援敌人之第三者。在这里说，即对民众予以讨伐，把支持敌人的民众从敌人手中争取过来，而归顺于我方……集家之作最大意义即在于此……④”

在这种战略思想指导下，日本关东军和华北方面军协同动作，将“西南边境”两侧划入“无住禁作地带”的凌源、建昌、宁城、青龙、宽城、兴隆、承德、滦平、隆化、平泉、丰宁、赤城等14个县的1万个村庄，武装合并为2100个“集团部落”，强迫近百万人口聚居在不到过去1/5的土地上。

“集团部落”的规模和设施不尽相同。按日本关东军1935年在“东边道”推行“集团部落”的设计，通化地区“部落”多为100米见方，每个“部落”居住350人左右，平均每人约28.5平方米。故此，该地区的“部落”往往还设有厕所、碾场等必须的生活设施。而热河省在1942年推行“集团部落”时，日美太平洋战争愈发对日军不利，关东军精锐大批南调，日军在“满洲”已经永远失去了1935年的从容不迫。所以，热河“部落”的面积越缩越小，聚居人口越来越多。据凌源县资料记载：每个“部落”长宽均在35米左右，围墙高3米，厚1米，四角为碉堡，最多开3个大门，最外是大约1.5米深的壕沟。这个标准，基本反映了热河全境“集团部落”的模式。按此计算，热河省100余万人口被驱赶进2100个“部落”之中，平均每个“部落”为476人，人均仅占有2.6平方米。当然，在集家并屯严重的县份，很多“部落”的居住人口远远超过了这个数字。凌源县河坎子乡，每个“部落”平均人数达700人左右。兴隆县全县每个“部落”平均人数也达561人。那么，在这些“部落”中，再除去建筑面积，日伪军居住面积，中国百姓的人均居住面积连1平方米都不到了。

同时，热河实行“集团部落”所限的时间，多则十天半个月，少的不准超过3天，被强迁的居民根本来不及拆走原来的住房，更无法运输建筑“部落”的建材。“集团部落”除去四周的围墙和日伪军的住所是精心修建的外，老百姓的房屋几乎全是仅能避风的马架窝棚，甚至很多人家就是在地上挖个小坑盖上茅草。塞外的冬季，长达5个月之久，一遇寒流变天，飞雪漫天，寒风呼啸，气温常降到

零下三四十度，冻死人的事屡见不鲜。夏季，由于人的吃喝拉撒都被限制在很小的范围内，如之所有的牲畜、家禽均混杂其间，“部落”里往往到处都是粪便、污水、泥泞。苍蝇、蚊子、臭虫、虱子、老鼠恣意肆虐，鼠疫、伤寒、痢疾、疟疾、败血病无不泛滥横行。1941 年春，兴隆县羊羔峪的“集团部落”流行瘟疫，1200 人中死了 400 多人，尸体臭在窝棚里没人抬，连日本“部落”长松山也染上了疾病，披着棉被横在驴背上回半壁山治病。1943 年夏季，兴隆县各“部落”流行瘟疫，一次死亡 6000 多人，靳杖子“部落”一天就死亡 40 多人。青龙县老李洞一个“部落”，共计千余口人，一年病饿死 200 多口。该县官厂“部落”2400 口人，两年中病死 530 多人，接近总人数的 40%。

敌人实行“集团部落”，还有一个战略目的就是经济掠夺。按照伪满洲国的“组合制度”，“部落”居民所生产的农副产品全部要交给“组合”，实物税、捐款和日伪军敲诈三大项加在一起达 26 项：

“粮谷出荷”，每亩土地缴粮 1 斗(每斗 30 斤)；

“民生集谷，每亩土地缴 1 斗(1943 年每亩缴 1.2 斗)；

“义仓粮”，每亩地缴 1 升；

“米谷株式会社粮”，每亩地缴 2 斤；

“地亩捐粮，每亩缴 2 斤；

“地亩附加粮”，每亩缴 1 斤；

合计每亩地缴粮 72 斤(1943 年 78 斤)。

除粮食租税外，另有正项捐税：

“民生税”，每亩地 4 角 2 分；

“地亩税”，每亩地 5 角；

“地亩附加税”，每亩地 2 角 5 分；

“门牌税”，每户 1 元；

“协和会税”，每个成年人 2 元；

“牲口费”，驴 4 元、羊 7 角 5 分、牛马骡 5 元；

“出生费”、“死亡费”，各2角；

“宰杀费”猪4元、羊2元；

“材料费；每亩地2角；

“兴农合作社股金”，每户1元；

“义款”，每户6角。

再次是日伪军警的敲诈，因实在无名目可立，则称之以“杂项税”：

“送菜”，每甲3天1次，每次50至100斤；

“送柴”，每甲3天1次，每次500斤；

“送猪”，每甲每月3至10口，每口至少出净肉80斤；

“送鸡”，每甲每月5至20只；

“送礼”，宪兵队长结婚、寿辰，每甲70元，警察中队长以上官员，每甲30元；

“团员费”，每甲经常派2名“自卫团员”到村公所听差，月需150元至200元；

“棍团费”，每甲抽10人受训，月需100元；

“劳工费”，每甲每月抽10人次至300人次不等，月需200元；

“村甲职员费”，每人月需100至150元。

除此，如钢铁、毛皮、蛋、肉、蔬菜、杏仁、核桃等所有物品都包括在支持“圣战”的“捐献”之列。

出于战术要求，“部落”全部建在平缓地带，相隔最远不能超过2小时路程，“部落”外方圆5公里内为“无住准耕地带”，5公里外一律为“无住禁作带”。这样，每个“部落”集居的几百口人根本摊不上多少耕地，加之“部落”要日上三竿才开门，太阳没下山就关门戒严，遇有“敌情”还要几天不准任何人进出，那一点可怜的耕地更是打不出多少粮食。当时热河全省平均亩产已从战前的300斤下降到不足80斤。但是，部落的多种“出荷”依旧照未集家时收缴。例如滦平县琉璃庙“部落”，原有3000只羊，两年后只剩下11只，纳

税额按照 3000 只算。微弱的生产能力要负担如此苛刻的税荷，人民自然被压榨得一无所有了。

"部落"的百姓要活命，只有靠伪满当局的"配给"。当时配给的粮食叫"共和面"，是用苦橡子、高粱帽、豆饼、霉烂的粮谷混合粉碎而成的。做饭的时候粘不到一块，吃到肚子里又排泄不出来，有人就是吃它"撑"死的。"配给"的布是质量极差的人造纤维，一沾水就提不起来，称为"唾沫缎"。按规定每户每年"配给"这种布 7 尺；每人 1 年白面 1.8 斤；每人每天 0.5 斤"共和面"；每人每月盐 7.5 两；每户每月火柴 1 盒；每人每年豆油 4 两。这些物资本来就很难维持正常生活，但不光伪满当局一减再减，而且经过层层克扣，有的"部落"从成立到消亡，根本就没发过 1 寸布，最好的每人一年也就得到三四尺布。到 1944 年以后，很多"部落"里的群众几口人才有一件能穿在身上的衣服，妇女多的人家只好挖"遮羞坑"。大姑娘、小媳妇遇有人来，立即躲到坑里去。赤城县黑达营"部落"中，李连明一家 8 口，夫妻只有一条烂裤子，谁出门谁穿，来人没裤子的就用笤帚遮羞。孩子只能穿树皮、破纸，睡觉盖锅帽、筐萝，冬天睡在锅灶的灰堆里取暖。点火用艾绒，照明用松柴，吃盐用舌尖舔，切菜劈柴用石片，这都是"部落"百姓求生的基本方式。

不仅如此，日伪当局还在"集团部落"中实行频繁的"大检举"。开始，尚给被"检举"的人加上"国事犯"、"思想犯"、"经济犯"、"密输犯"、"反满抗日分子"、"资匪济匪"等罪名，后来干脆是突然出动军、警、宪、特包围某个"部落"，凡是青年全部逮捕，男性或就地屠杀或送东北做劳工，女性则任意凌辱。实际上，后来的"大检举"就是大屠杀。伪热河省协和会特别室特务郝席庵在供词中供称，兴隆县日伪当局曾在该县进行 4 次大规模的检举：

第一次是在 1942 年旧历腊月二十以后至正月，全县逮捕 2000 多人，就地屠杀 400 多人，刑讯后判死刑一二百人，其余送东北做劳工；

第二次是 1943 年旧历腊月二十八日以后至正月初，全县被“检举”5000 多人，也是除屠杀者外，均送往东北做劳工，其中大磨峪“部落”被杀害男青年 72 人，42 户人家有 30 户没了男人，8 户被杀绝，成了热南山区有名的“寡妇村”；

第三次是 1944 年旧历腊月二十八日至正月初四，全县被“检举”2000 多人；

第四次是 1944 年 6 月间，主要“检举”对象为抗日军属、干属，全县约逮捕 500 人，在兴隆刑讯后全部送往东北做劳工。

日伪当局还严令，“部落”里的居民一律“夜不闭户”，驻军、警察、汉奸愿意干什么就干什么，愿什么时候行动就什么时候行动。赤城县千松台李长起一家 7 口人，进入“部落”后挤在一条炕上，特务每天夜晚当着全家人的面强奸他的新婚妻子，谁咳嗽一声也不行，不到一年就把一个女人折磨死了。张家营“部落”，苏生一家 5 口人，儿媳被汉奸霸占死去，儿子被协和会打死。最后，老两口和闺女也死去，一家人全部死绝。

如果说，坚持在“无住禁作地带”的群众，在日伪严密的封锁下尚能过上野人般的生活，那么，“集团部落”中的百姓，纯粹是在人间地狱中煎熬的幽魂。

“集家”与反“集家”的斗争

1942 年秋季以后，冀热边抗日政权在采取军事行动破坏长城两侧“无人区”封锁的同时，还重点在热河全境发动了大规模的反“集家”运动，领导山区人民坚持山地斗争，粉碎敌人“民匪分离”的阴谋。

抗战胜利不久的 1946 年 1 月 25 日，中国共产党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在延安报道了热河军民反集家运动的史实：

“1943 年夏季……敌人野蛮烧杀掳掠毁灭热河广大农村，进行“集家”的时候，全体军民曾广泛开展多次反“集家”斗争的群众

运动，给敌人以严厉打击。

“自1943年到1945年6月，我热南地区，西起丰宁、沿滦平、承德(包括今承德市)、兴隆、平泉、青龙、东至凌源，在这峰峦千里的广大土地上展开了激烈的‘扫荡’与反‘扫荡’、‘集家’与反‘集家’‘割青’与反‘割青’的保卫人民的生死斗争……”

1943年夏季，凌青绥抗日联合县工委将八路军十二团一营改编成的七区队再编成数个武工队，配合地方干部深入到广大村镇宣传反“集家”斗争。日伪当局白天强迫群众修“人圈”，武工队晚上带领群众拆毁它，有的敌人晚上住在未落成的“人圈”里守卫，武工队就组织力量进行夜袭打击敌人。群众在武工队的鼓动和支持下，斗争的信心日益坚定，白天修“人圈”磨磨蹭蹭，晚上拆“人圈”如虎下山，拖延了敌人修建“人圈”的速度。坚持山地的群众更坚决，住房虽被敌人几次烧毁、扒倒，他们几次盖起窝棚马架，就是住在山洞里，也坚持不下山，不进“人圈”。凌源县三十家子的董秀云，3年时间一天也没进过“人圈”。家被烧光，人被几次毒打，就是住在地窖里也坚持给武工队送信送饭。该县沟门子区老杖子村李同林、林贵等12户人家，佛爷洞区果子沟全村的群众，房子烧了住窝棚，窝棚烧了住地窝子，地窝子烧了住山洞，一直坚持到抗战胜利才下山。有这些群众的掩护和配合，凌青绥武工队的活动也日益活跃，不断打击日伪军。凌源、建昌两县的日伪政府不得不宣布，1943年该地区的5次“集家并村”均告失败。

青龙县花厂峪是1942年秋季开辟的抗日游击根据地。1943年，日伪当局将该地10余公里长的山沟全部划入“无住禁作地带”，多次调动大批军警宪特强迫群众进入“集团部落”。但该村850多口人在抗日政权的领导下，誓死不进“人圈”。敌人“集家”，他们进深山；敌人扫荡，他们反深入据点去打汉奸；敌人实行“三光”政策，他们宁愿自己吃草根树皮，却常年为八路军保管着3万余斤公粮、500支步枪和一大批鞋袜，直到抗战胜利，也没损失一

丝一毫。花厂峪人民为坚持反集家斗争，3 年内不光牺牲 80 余口成人，还献出了 8 名未成年的孩子。共产党员米恩林是日伪当局悬赏 2 石小米捉拿的“共匪”，一次他和乡亲们被包围在深山里，为了保护大家不被敌人发现，他狠心把 4 岁的女儿扔在水坑里溺死。第 3 天，他妻子怀中刚满周岁的儿子哭叫起来，他又和妻子咬着牙把孩子压在一块岩石下憋死。共产党员吴尚庚的妻子怀抱着 2 岁的儿子在山洞里避难，正当日伪军搜山时，孩子突然哭叫起来。妈妈怕儿子的叫声暴露了大家，便用奶头紧紧塞住了孩子的嘴。等敌人走过去之后，孩子已经被本该是哺育他成人的乳头活活憋死。其他人家的 5 个孩子，也都是在这种情况下，被自己的亲人忍痛“杀”死的。

兴隆县有五指山、五凤楼山、大小黄崖三片抗日游击根据地，地势险要，群众基础好，曾经先后驻扎过冀热边区党委、行署、地委、专署的各级领导机关，迁遵兴、承青遵、蓟遵兴、承兴密、平三密等抗日联合县政权也先后将这里作为政府所在地。伪热河当局恨之入骨，自然将其列为“集家”的重点。据迁遵兴抗日联合县武装部统计，敌伪仅在 1944 年 1 年中，对兴隆县的“扫荡”就达 438 次，其中大“扫荡”50 次，小“扫荡”388 次。1944 年 1 月 21 日是农历的腊月二十六日，日伪当局就开始了 1944 年的第一次春季大“扫荡”，出动 1 万多军警宪特，携带着帐篷对“无住禁作地带”进行“铁壁合围”。一次屠杀山地斗争的群众 3000 多人，使 1000 多人冻饿死在山上。黑河川一位怀孕的妇女，为了不影响大家行动，孤身一人躲进了深山，在冰上生了一个孩子，为了纪念这段艰苦的日子，她给孩子起名叫“冰儿”。面对敌人的屠杀，兴隆人民象横亘在燕山山脊上的长城一样挺立着，直到日本帝国 1945 年宣布无条件投降，仍有 10600 余人始终没进过“人圈”，有 6000 多民兵没有放下手中打击敌人的武器。

当时，由于抗日游击武装武器少，兵员也与日伪军悬殊太大，

坚持在"无住禁作地带"的抗日军民便采取了灵活多变的战略战术，对现代化装备的日伪军进行了坚苦卓绝的斗争。据中国人民解放军四十六军司令部1960年9月公布的史料记载，1942年，冀热边区丰宝遵、丰玉宁、迁遵兴3个抗日联合县共有各种游击武装1503人，步枪1540支，短枪130支，轻机枪3挺，战马1匹。而敌伪方面，仅兴隆一县就集结了日本关东军、"满洲国兵"、警察讨伐队等正规军事武装2.1万人。只算重武器，按50人1挺轻机枪可达420挺；按每200人1挺重机枪，可达105挺，这还未把各种炮、掷弹筒计算在内。而且，敌方有强大的军事后援，武器弹药消耗掉自有补充，抗日军民则一无后方、更无军备，武器弹药的唯一来源是夺自敌人之手。兵法云：兵力十倍于敌，则可围而歼之。日伪兵力虽数十倍于我，但被打得焦头烂额的往往是敌人。

迁遵兴联合县成功村是县委、县政府的西大门，为了保护抗日政权的安全，这个村组织了4个地雷爆破组，分头把守在村的四面。不管敌人哪路来犯，他们都能先炸他个人仰马翻，既打击了敌人，也向山上报告了敌情。守在村西面的是大名鼎鼎的"五虎"爆破组。其实，"五虎"并非五兄弟，更不是名字都带虎字的几条好汉，而是化名都带虎字的民兵集体。他们说日本兵是"洋人"，虎能吃羊，故此借谐音命名为"虎"。"虎山"李青，是武装中队长，村党支书；"虎明"傅惠，是民兵指导员；"虎义"傅莹，是村财粮委员；"虎春"李常，是青年保国会主任；"虎文"熊斌，是民兵干部。后来又陆续加入了"虎林"、"虎平"、"虎民"，但他们仍叫五虎爆破组。把守在东面的有雷永顺、傅德爆破组。把守在北面的有赵有、赵顺爆破组。把守在南面的有傅发、傅桐爆破组。敌人来"扫荡"，他们先搞"预埋待炸"。敌人挨炸后控雷排雷，他们便看准敌人的行进方向，迅速从山脊上绕到敌前方，临时埋雷搞"飞行爆炸"。敌人排雷失败改走山坡，他们就占据制高点使用"树挂雷"、"张手雷"、"滚坡雷"。爆破组的战术神出鬼没，巧妙地利用地形和武器的特长，使敌人看不见，

摸不着，手里有枪有炮也打不到人，但只要乱闯乱撞就得挨炸，弥补了我方缺枪少弹的不足。有一次，他们还炸死了日本讨伐队队长松泽和他的翻译等4人，名威大振。迁遵兴联合县政府很快推广了成功村的经验，在五指山根据地的各村都建起了爆破组，给“扫荡”山区、制造“无住禁作地带”的日伪军以沉重的打击。

承平宁抗日联合县境内峰峦叠障，河谷纵横，但地势没有迁遵兴联合县那样险峻，开展地雷战、麻雀战有些吃力。活跃在那一带的联合县政权和三区队就充分利用便于迂回运兵的地利打埋伏战。1943年夏季，喀喇沁中旗（日伪时期，宁城、平泉合称喀喇沁中旗，政府设在平泉）新住了一个协和会事务长仁科信夫，讲一口流利的中国话，到任后四处游说，发动各地乡绅、游勇组织起“协和会”、“明郎会”，并建立了1支100多人的协和自卫队，专门“围剿”抗日游击武装，催促集家并村。同年8月份，承平宁联合县工委作出决定，坚决消灭仁科信夫这个狡猾、顽固之敌。他们先派出小股部队引诱仁科信夫率领的“协和兵”转了4天，于8月20日中午集中一个区队、二个基干队的兵力，在平泉长胜沟盘道梁子设下埋伏，一举击毙仁科信夫和日本宪兵队长夏谷，生俘了全部“协和兵”。

1943年秋后，在我抗日军民发动反“集家”斗争的打击下，日伪热河当局修定了“集家”方案，除集结兵力加紧对“无住禁作地带”进行“合围扫荡”外，开始派出大批军警宪特驻扎在“集团部落”之中，并以协和会为骨干加强“部落”中伪政权的统制，强行把“人圈”内的居民编成“灭共义勇队”或“自卫团”，发给每个18至35岁男子步枪1枝，子弹50发；发给36岁至50岁的男子火枪1支，火药2斤；发给青壮年妇女每人扎枪1枝，晚上以军警带队巡逻，遇有情况即敲锣放炮，点火报警，以相互支援来对付抗日游击武装的袭击。青龙县计有500多个“集团部落”，其中有105个建成了武装“人圈”。滦平县计有540余个“集团部落”，武装“人圈”也达多100

多个。

由于我兵力与敌伪悬殊太大，武器装备更无法比较，抗日游击武装根本没有能力进行大规模的攻坚战，本应也随之改变反“集家”斗争的策略，但由于“左”的思想干扰，依然坚持“不进人圈”的做法，给人民群众带来了很多困难。特别在一些群众工作还没有全面展开的新区，遇到老百姓实在坚持不住进了“人圈”，有人就犯了急躁情绪，甚至把这些群众也看做是通敌的汉奸。这种简单粗暴的做法，反而失掉了群众的拥护，给工作带来了很多的损失。派往承德县纠正反“集家”斗争中“左”的倾向的迁遵兴联合县十一区负责人赵尚志，在给战友的信上谈道：“我开了一个东部地区大会，到会者有5人之多”，充分反映了当时的实际情况。故此，一些部队和地方政权不得不离开平川和新区，向深山区和老区撤退。

这种状况很快就引起了一些领导同志的警觉。承平宁抗日联合县办事处主任周治国同志在被迫撤出锦热铁路北部地区后，及时向上级反映了自己的看法。他敏锐地指出，在反集家斗争中，“我们对敌人的计划和力量及敌人的政策考察不够周到。我们所实行的对策都是‘左’的，与群众事实不利，群众响应我们反“集家”斗争，曾遭数次摧残，最后弄成无家可归，我们也无力挽救他们。

“对‘集家’，我们只提出反对，可未先估计到，如不成功，还如何去做……我们的同志还说，进‘人圈’就是投降敌人，谁进‘人圈’以汉奸论罪等‘左’的口号。”

周治国的报告代表了广大坚持“无人区”斗争的领导同志的意见，引起了上级党委的高度重视，这篇报告后来曾在冀热边特委的党刊《坚持》第13期上全文发表，并加了编者按，要求所有的同志都以此为借鉴，避免再犯类似的错误，并号召大家学习周治国同志对工作负责、敢于反映真实情况的认真精神。这种作法，充分反映了冀热边特委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同进也反映了当时冀热边区领导同志很快就发现反集家斗争中出现的新情况。

1943年6月下旬，中国共产党晋察冀分局决定，将十三地委改为冀热边特委，在冀热边区实行一元化领导。

冀热边特委成立后，立即在迁安县东北峪举行了第一次执委会，根据中共中央北方分局指示，全面检查总结了5年来的工作，做出了《对于今后工作的决议》。10月11日，他们又做出了《关于恢复热南地区的决定》，特别指出今后反集家斗争应加强"人圈"工作，争取"人圈"中群众，建立抗日两面政权。

建立"两面政权"

1943年冬季以后，冀热边区各级抗日政权在冀热边特委的领导下，改变了斗争策略，不再强令广大群众拆毁"人圈"或机械地采取不进"人圈"的办法，反而动员老弱病残和儿童在冬季严寒季节暂时进入"集团部落"，只留青壮年和武装民兵坚持山地斗争。同时，派出大批有斗争经验的地方干部和八路军组成武装工作队，深入到群众基础较好的"人圈"和自然村去开展工作，加紧"两面政权"的建设。

1944年6月，冀热边特委十四地委书记李子光派出王泽民、郭子忠，高原3人组成恢复游击区的武工队领导核心，带领20多名地方干部，1个排八路军战士，回到雾灵山东北部的承德柴河川、兴隆柳河川、滦平承（德）古（北口）路南区域重建根据地。他们的指导思想十分明确，中心工作是放手发动群众，团结各阶层爱国人士，建设"两面"政权。他们的活动方法是，白天在深山区组织坚持山地斗争的群众重新武装起来，夜晚进人条件适宜的"人圈"开展工作。武工队每进入一个"人圈"，先把伪甲长、"部落"长、自卫团长三方面伪政权的头目争取过来，然后再广泛发动群众，在宣传鼓动中寻找和发现抗日积极分子及隐蔽下来的党员干部，尽快把他们培养成抗日政权的联络员、办事员，最后以这些人组成新的保、甲，表面上为日伪当局服务，实际上为抗日政权出力。针对"人圈"

中老百姓长期生活困难的实际，武工队还用武装力量保护群众开展“走私”活动，在长城内侧的令官、吉家营、新城子等地设立了粮食兑换站，收购到粮食、布匹、食盐，让住在“部落”中的居民以抗日政权发放的粮票兑换到手，在武工队的保护下运回口外的“人圈”里。1945年，这个地区很多“集团部落”的伪政权组织都倒向了抗日政府，甚至有人还参加了革命工作，“部落”中的人民群众也越发信任抗日游击武装了。开辟承滦兴地带的王泽民武工队，由四五十人发到500余人，“集团部落”反到成了他们活动的营房。

在兴隆县八挂岭一带还流传着一个“万警尉”的真实故事。“万警尉”叫万全，是草场村的共产党支部书记。草场被建成“部落”后，党组织没被破坏，万全当上了“甲长”，一直也没中断抗日活动。日伪当局也曾怀疑过万全的活动，多次进行刺探。一天夜里，一队日军包围了草场“部落”，谎称是李运昌的队伍，只等骗开大门，立即对草场进行屠杀。万全察觉到其中有诈，便机智地敲锣聚众，指挥大家般起石头砸了下去，当场砸伤了几个日军，反而受到了日本军官的“嘉奖”。后来，日伪当局还提升他为伪“警尉”，使草场“部落”成了白皮红心的“两面政权。”1944年以后，恢复这带工作的武工队即以八挂岭附近的“两面部落”为立脚点和样板，广泛开展“两面政权”的建设，在能争取过来的“部落”中建立党的组织和群众抗日武装团体。对那些顽固不化的“部落”，则利用新发展的“关系”为内线进行军事打击，待消灭掉日伪武装和伪政权后，再换上“两面甲长”和“两面自卫团”。到抗战胜利时，八路军武装部队在八挂岭一带已经可以自由出入大部分的“部落”了。该县的199户“人圈”，也有20％变为抗日“两面政权”，60％可以进行秘密抗日活动。

凌青绥是1942年以后开辟的新区，除宽城县王厂沟一带我抗日政权十分稳固外，其它各地基础比较薄弱，有些地区几乎一直处在“满洲国”的统治下。实行“集家并村”以后，该地区的抗日活动受到了更大的影响，抗日联合县政权根据冀东区党分委的指示，结合

在敌占区进行斗争的实际情况，一直把广泛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当做首要的内容。他们采用的办法大多是通过各种关系，先培养一批可靠的联络人，再以这些人为基础，选准敌伪下层组织负责人和各界知名人士开展工作。到 1944 年，已经有一大批敌伪政权的下层组织头目投向了抗日武装，使很多区乡政权、“集团部落”不再威胁抗日游击武装的活动了。建昌县要路沟处在凌源、青龙等县的交界处，伪警察署就是当地的最高军政机构。伪警察署长张松坡原本气焰嚣张，虽然和联合县七区队签定过 7 项君子协定，但只遵守了一段时间就借口撕毁，并扬言要“围剿”抗日武装。联合县政府认为，这股敌人控制着交通要道，消灭了，日伪当局还会再派，不如收为已用。但是，只靠“关系”又很难争取，他们就决定给张松坡点“颜色”看看。七区队派出小股部队引诱敌人出来追击，乘势包围了没有守备的伪警察署，留下一封劝告信后，并没破坏其任何设施就撤走了。张松坡回来后，深感游击武装的战斗力量和斗争策略，受到了很大的教育，马上回信表示绝不再与抗日武装为敌，并撤掉了 2 个警察分驻所。此后，该地区从和尚房子至老爷庙以西和要路沟道南地区，基本上联成了一片，我军指战员身穿军装白天单独活动，也不会受到当地伪组织和警察的限制。

承平宁抗日联合县是较早纠正反“集家”运动偏差的。1943 年冬，就开始派出大批区村干部、党员打入“集团部落”。宽城亮甲台张发沟村办事员、共产党员王彩章，1943 年冬接到命令进入“部落”，先后动员 6 名“满洲国兵”携械投诚，多次为游击武装送粮米、蜡纸、油墨、纸张。平泉水泉胡杖子办事员魏德山，从“部落”中一次次设法往游击队隐蔽点送粮食。后来搞不到粮，他就把自家的羊、狗赶到山上假做放牧送给游击队，帮助战士度过了难关。1944 年 9 月 1 日，冀热边特委发布了《关于减租运动决定》，在秋季，广泛发动以“二五减租”取消“上打租”为中心的减租减息和给雇工增资运动。减租的标准，因战争情况紧张，当时没有统一规定，但总的原则

是根据具体情况，由双方协商自愿决定。

兴隆县解放村雇农宁振荣扛活，以前每年工资 20 元钱。增资后，年工资 24 元，增 20%。抗日政权在执行合理负担中，也做了相应的调整。如战勤工，一般是 15 至 60 岁的男整半劳力出一半工，耕地所有者出一半工。上庄村吴老振常年雇工 20 多人，抗日政府就同意他每年抽出 2 个长工出战勤工，其余的均免。有的富户顾虑敌人割秋，不敢到"部落"太远的地方种地，抗日政府还允许土地所有者把不种的耕地转给贫雇农耕种，由耕种者负担土地所有者的战勤工抵顶地租。到年底，整个冀热边抗日根据地就有一半村庄实行了"双减"和增资，这对开展"部落"以外的"两面村"建设，更是一种内在的强大推动力。据承兴密抗日联合县统计，1944 年底，该县有 151 个行政村，其中抗日"一面村"77 个，"两面村"76 个，其中抗日力量占绝地优势、抗日武装能公开活动的又占 47 个；亲敌"一面村"仅剩下 2 个。总之，1943 年以后，由于冀热边党组织能根据实际的情况，克服"左"的思想干扰，及时改变斗争策略，加强了"两面政权"工作，不仅加速了伪政权统治的崩溃，而且对于团结广大人民群众坚持"无人区"斗争、以至最后取得冀热边区抗日战争的彻底胜利都起到了重要作用。

彻底粉碎"无人区"

1945 年，国际反法西斯战场已经形势明朗，但日伪仍在作垂死挣扎。

春季，日伪当局把配有骑兵、装甲兵的 1500 名伪满洲国军"铁石部队"调进冀东，准备于三四月间，沿长城内侧 20 公里线内，进一步推行分为"集团部落"和"无住禁作地带"两部分的"无人区"，以将 1944 年 7 月划为"特别行政区"的冀东"满洲国"化。

针对敌伪方面扩大"无人区"的阴谋，晋察冀分局《关于 1945 年扩大解放区的方案》中，对冀热辽区的具体情况做了分析，指出

日伪"向南进一步推进，把'无人区'扩大到长城以内其目的则为积极向我进攻……"要求整个晋察冀边区扩大解放区的战役，"在时间上，各地均以冀热辽开辟热河中部及绥中地区的时间为基础。"

2月5日，冀热辽区党做出《关于热辽地区总结意见与恢复开辟热辽工作的决定》，指出："恢复'人圈'是恢复口外工作的中心环节，基本上是瓦解与摧毁其伪组织。"

同年6月，冀热辽区党委和军区组建了三路挺北支队向伪满后方挺进，采取党、政、军相结合的武装工作方法，深入敌后，深入"无人区"地带，待机最后解放"无人区"人民。

第一挺北支队，由十四地委组织部长李越之、十三团团长师军、政委王文率领，携带一部电台，向隆化一带挺进。他们6月27日由古北口出发，过滦平、丰宁，一路血战进入围场，一直在隆化、围场、丰宁3县交界处坚持到抗日战争胜利。

第二挺北支队，由十五地委组织部长宋诚十五军分区司令员赵文进率领，向宽城、凌源一带挺进。他们6月20日由喜峰口出发，经20多天行军作战，突过宽大的"无人区"封锁，进入都山游击根据地，继续策应宁赤工委突过锦承路回到承平宁地区。

第三挺北支队，由十六军分区司令员兼地委书记曾克林率领，向朝阳、绥中地区挺进。他们6月22日由义院口出发，连克白家店、五拨子等据点，解放了一批"集团部落"，很快进入了朝阳、绥中地区。

正当敌我双方在冀热辽区进行反复较量的时候，欧洲战场反法西斯战线已经取得最后胜利。

7月26日，美、英、中三国发表了促令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波茨坦公告"。

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

8月9日，毛泽东同志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宣布我国抗日大反攻到来。

8月10日,八路军总部在延安以总司令朱德的名义发布作战命令,令解放区部队,包括八路军、新四军、游击队和民兵举行大反攻,消灭日伪军,恢复失地。

8月11日,朱总司令发布了第二号命令。

8月13日,冀热辽军区司令员李运昌接到八路军总部命令后,于14日在丰润县左家坞大王庄召开了区党委、军区党委紧急会议,决定抽出8个团、1个营、2个支队共1.3万多人(占当时冀热辽总兵力的2/3),分2个梯次挺进东北。

8月中旬,第一梯队由坚持在冀热辽"无人区"地域的十四、十五、十六军分区部队分中、西、东三路率先进军。

三路大军所向披靡,备受日本帝国主义蹂躏的"无人区"人民无不欢欣鼓舞。"集团部落"中的群众纷纷捣毁"人圈"返回早已荒芜的家园,重整山河;坚持"无住地带"的抗日军民也很快下到平川地区,收缴敌伪武器,镇压汉奸敌特,建立民主政权。热河"无人区"随着日本侵略者的彻底覆灭而成为了历史的过去。

注释:

①见《日本近代史资料》。

②《中国现代史·上册》第331页。

③见《土匪原秘录》。

我所见到的热河省“无人区”

春　风

我堕身于伪满13年，在热河省境达10年。前7年职位是在省公署，任务是经常下乡调查宗教寺庙，古寺古物，学校教育等事。所以省政乡情大都耳闻目睹。后3年任热河省隆化县长，直到解放。日本鬼子的狰狞面目，毒政暴行，多是身受亲尝，其中最残忍、最凶恶的就是在热河省实行的“无人区”化政策。抚今思昔，令人不寒而栗！

“无人区”化的开端

日伪的“无人区”化政策，一般人都以为是在热河省开始实行的，其实来源于通化。由于通化省在“九一八”事变后，有爱国志士杨靖宇，邓铁梅等义勇军，风起云涌，愈来愈盛。致使日伪满军讨不胜讨，一时计穷智竭，莫可如何。适有通化省警务所长岸谷隆一郎（后任通化省次长），是一个满洲通（会说中国话，对满洲事情比较熟悉）。他诡计多端，具有一付假仁义真狠恶的心肠。他一方面组织警察讨伐队，进行讨伐，一方面利用地痞流氓，悬赏缉捕，终于把杨靖宇部下的程斌捉获。程斌曾充任义勇军参谋、师长等职，深知义勇军的底细，心肠非常毒狠，竟将义勇军食粮接应情况，隐身屯处所，一一暴露，并向岸谷献策“清乡断粮就可制义勇军于死命”。此计正对岸谷心头，就在这一带开始了“无人区”化政策：十家连坐，百户同科，一人犯法，各户均受牵连；清理人口，合屯并户，限制谷物出入，禁止人畜上山……岗哨林立，昼夜巡视，无辜居民，每遭诛戮！义勇军见此情况，遂转移阵地。日本鬼子认为得计，喜气洋

洋,提升岸谷为伪满国务院地方处长,让他企划整个伪满洲国的坚壁清野政策。当时热河省情况紧急,他们不得不把这条诡计先搬到热河去了。

当时的热河省情况怎样?他们在通化的简单的坚壁清野能否用得上?事实出乎他们的意料。当时的伪热河省西部有冀热辽军区的八路军,向热河省内进攻。因为是人民的军队,到处可以为家,反对侵略的战争,人人都愿相助。人民军队巧妙地实行了蜂蝶战术,这个战术是聚散无常,变化多端,说聚则遍地飞来,说散则踪影不见。明明是锄地农夫,紧急就变成战士;眼看是放羊童子,扬鞭举手都是通讯的暗号;追之于前,忽然出现于后;围之于中,转眼反被包围于内。在伪康德五年(1938年,下同)春,滦平县红梅寺警察署,买了一车烧柴由一个村姬赶车,一进院就由车内钻出八路军数名,全警察署都被缴械。同年秋季,日本鬼子听说八路军攻打兴隆,动员全省军警都去"围剿",赶到兴隆一看,只见驻守兴隆的鬼子死尸在地,标语满墙。正在撕标语开追悼会的时候,距此300多里的青龙又被攻下。待到青龙,而西北部的丰宁、滦平等县(青龙西北400多里)都告紧急。东突西奔,不知所以。南瞻北望,草木皆兵,欲退不得,欲罢不能,遂使日本鬼子数万军警部队疲于奔命。但是帝国主义者向来不会甘心死亡的,每到穷途末路就向百姓张牙舞爪,这是他们的本性使然。约在伪康德5年,这个万恶的"无人区"化政策,就在这样的情况下,开始在热河实行了。

"无人区"化的具体内容

伪热河省的坚壁清野政策,是从政治、经济、军事三方面进行的。共分四个步骤。第一是清乡,第二是划定"无人区"(也叫无住地带),第三是"集家",第四是"三光政策"。在形式上看,有时各自为政,从本质来看,混然连成一体。是步步紧,步步狠,狼狈为奸,相互为用,具有不可分割的关系。

1、严格的清乡制度

首先是整理街村机构，重新规定村界，按照地形人口，情势险要程度等，规定每个县旗（旗是蒙民、旗公署相当于县公署），为10至20个村，每村设有村长、助理员、司计（会计）、行政（管户籍等）、烟政、弘报（类似特务）等股，村内职员大约不下20多人，小村也有十几个人，重要地带的村公所还设置1至2名日本人，名为村副，实为掌握全村大权。凡事都得通过他，否则就是藐视皇军，违背王道。村长多是当地的土豪劣绅有财有势的人，其他办公人员，或由县旗公署委派，或由本村推选，大都是认为政治可靠、家道殷实，有线索牵连具备牢固联系的人。每村公所内都暗设监视人1名（形同特务）村公所处还有专门对该村公所监视的一二人，定期向县旗公署弘报股和警务科汇报，情节较重的还得直接送交日满当地宪兵队。至于村长和村副唯一的职责，就是定期向上级汇报村民的动向。有书面汇报，定期汇报，紧急汇报，临时口头汇报，各有指定时期，逾期或漏报，即按西南防卫司令部的军法处罚，有功的也按规定行赏。其中最突出的是人口调查（也叫村势调查），这个工作不仅是一般地把户数、人口数、年龄、住址、职业等项了解清楚，还要把每个人都划定类型。第一类是良民，多数是地主富农，守财如命，不能逃跑，恐怕八路军闹革命的人。第二类是次良民，所谓殷实人家，随着地主一边倒的人。第三类是“要视查人”。这一类人包括很广，一般无产业、光棍汉、旧军人、旧职员（指旧中国或伪满退辞的）、部分村长和个别警察等都划为这一类。第四类是由关内或远处新迁来的住户，或临时寄居的人。第五类是形迹可疑，或家中有在关内工作长期不归的住户。分门别类，登记在暗中的簿册，由警察或日满宪兵特务保管，逐区（按特务特殊定的区域，经常变换，外人摸不清）、逐户都有专职监视人员，一举一动都得汇报。

此外，各村还有协和分会的设置，名目是日满协和，伪装着一付慈善面孔，实际上是最阴险最毒辣，杀人不见血的特务机关。在

"无人区"化的政策上,专搞村民思想工作,他们和地主富农勾结在一起,专找穷人的破绽、机关单位行政部门的漏洞、各个阶层的底细,暗中向特务机关汇报。但是表面上却处处要显示出同情群众的样子,如张罗救济粮,发放救济衣,帮助医疗疾病,有时还出头保释犯人等装腔作势地假仁假义,无非借以掩人耳目而已,骗取群众的信任和好感。如此等等,鬼子以为是在政治清乡的基本工作上,作了万全的准备,有了必胜把握了,于是就开始坚壁清野第一步的屠杀政策,进行镇压。约在伪康德5年秋季,就在承德大抓通匪嫌疑犯(指和八路军有联系的人),把省公署的张实科长、王股长,科员以及税务监督署科股长、警察、司法、工业、商业、一般住户等四五十人,都抓进监狱。轻的长期监禁,重的就地枪杀,弄得人心惶惶,恐怖万状!接着各县旗乡村,大事的进行同样的逮捕,凡是他们爪牙认为有嫌疑者,都难幸免。每日有大车小辆或成帮成伙的向承德押送。那时承德有三个大杀人场,是承德有名的三个大杀人窟。第一是鬼子的西南防卫司令部(承德离宫),凡是百人左右的大型集体屠杀,都在这里执行。因为这个地区是旧日离宫,周围城墙二丈来高,方圆四十多里,无论如何烧杀,外人都难看见,免露王道主义的丑态。并且有日军把守,不易遭到意外的袭击。第二个是承德监狱,能关押千余人,备有刑台、绞架、枪杀室、炼人炉,电烙室等,极尽其残,天天都有一二十人的生命葬送在这里。第三为日本宪兵队部,是个专门逼罪问供的地方。他们的刑具颇多,据说有百余种。按抓来人的年龄、性别、犯罪情节使用刑具。一人受刑众人陪场,弄得人欲生不能,欲死不得!一经吐露真情,承认罪状,立即烧杀,尸骨无存,恐怕泄露底细。这就是"王道",这就是"皇道",这就是王道、皇道结合而成的坚壁清野政策一端。

这样做,鬼子认为他们所谓的坏人,就都能斩尽杀绝,高枕无忧了。谁知,越杀八路军的攻势越猛,越清八路军的耳目越多。各地此起彼伏,八路军日见增多。于是,日寇又布置了警察密网,张大

爪子，凡是大一点的村庄，几乎都有警察署和分驻所。这些豺狼的毒辣更非言语可以形容，人民自然遭到了很大的涂炭。可是，他们对于八路军的行动仍然是无法弄清的。不但如此，他们这些警察署却遭到八路军的袭击和消灭。如在兴隆、滦平等县活动的八路军王亢部队，是专能打警察的，好像是接取伪警察枪械的别动队，每攻一处大都是满载而归，伪警察机构倒成了八路军的供应站，使日本鬼子狼狈不甚。于是，就开始了第二个"无人区"步骤。

2、残酷划定"无人区"

啥叫"无人区"?"无人区"也叫无住地带，就是把八路军时常出入地带，或比较难于防守的地方，指定不准有人，名为无人区域。将原有住民，用扫荡方式撵走，房屋不自己拆除就被烧毁，鸡犬不留。设置监视哨所和扫荡部队，经常巡视。原则是见人就杀，见树必毁，蒿草没人头者都得焚烧，几乎使这里成为一片焦土！用意是想用这个办法筑起无形的长城。当然他们是挡不住八路军游击队的。可是这一带的人民就遭到了难以形容的灾难，有家不能归，有房不能住，几辈子血汗积累的庄园，就被这个坚壁清野的政策化为灰尘！流离失所，啼饥号寒，腿快的逃走了，老弱病残、恋恋不舍的，大都尽被杀戮！从热河的西南起，沿长城附近的山区，即凌南、兴隆、滦平、丰宁等县的西部，直至大西北和察哈尔宁县接壤的四海野(俗称樊梨花城)等地方，长约五六百里，宽有一二十里，人口不下10余万，就这样悲惨地葬送在刽子手的手里了。

这时候，我们考查古迹古物一行，经常去到长城一带附近无人地区的地方。大的部落如冷口、喜峰口、古北口、白马关、樊梨花城、辽时的兴州城、韩昌府，辽皇肖银宗的梳妆楼、大阁镇，宋时的八郎村、令公庙，孟良盗骨的红阳洞、白草山，传说的李陵碑、苏武庙等处，无人地带的惨事悲音常常催下人们的酸心泪水。一般的古迹古物、也都在这"无人区"的政策中被摧毁了。如苏武庙中的碑文，姜女庙中的记载，玄阳洞的栈道，红梅寺的红莲遗迹等等，虽属传称，

也是足资验证的珍贵材料，也都同归于尽了。

有一次，我去到热河最西北部的一个接近"无人区"的地方——樊梨花庙，在这接近"无人区"的田间里，锄地拔草的人，都是一些老弱不堪的女人，全不穿衣裤，多数腰中围一块破布或麻袋，好象是不顾羞耻似的。我向当地领我去的人问，他们为什么裸腿露胸呢？天气热吗？他说：不是。他们没有衣服吗？他说：也不是。这是当地的规矩。谁定的这规矩呢？他说既不是前唐定的，也不是大清国定的，说完这些话他向四下望一望说："先生你不知道，这是接近无人区的地带啦，从去年扫荡队来到这里发现耕地的人身藏武器，干粮袋，暗结八路以后，就给我们下个禁令，不许男人到这里种地，女人种地也不许穿衣服，经大家要求才允许围在腰间一块布，这可就笑话了……"我追问再三，他才说："不但这样，有时鬼子来了，还让他们将围布扯掉，任意耍笑、调戏，那些样子可就难说了。年轻女子有的疯了，有的跑了，所以就剩这些老弱锄地拔草了。唉，前几天一个十几岁的女孩子还被他们拉去了呢，先生，你知道咱这仅是接近无人区，那"无人区"比这还惨呢！唉！那说哪了罢，先生！"

在兴隆县的水场，有一位受苦最深的老大爷说："哎呀，你来了，你再晚来两天连我也看不见了。我一家 11 口人，全变成鬼了，给你讲修长城的那个老太太，被火烧死了。我的大儿子被吊在树上点天灯了。我 3 个小儿子 1 个被枪杀，2 个被扔在火坑里。最可怜的是我那两个年轻媳妇，3 个小孙子，1 个将近 14 岁的老闺女！都活活的被鬼子拉走弄死了。我，我还能活着吗？我的祖先是修长城时死的，我的父亲是直奉战争给军队拉道（引路）被枪打死的。我的母亲不是前二年你来时被鬼子搜家时吓死了吗？我还活着干啥？这次是鬼子有意让我看这些情景，好宣传皇军的厉害，所以没把我绑在树上弄死。咳！家家有死人，户户遭火烧。还用我说吗？谁不害怕呀！我过几天就跳长城找我们祖先去……"。这是伪康德 5 年日军扫荡热河西部的情况。这不过是悲惨中的一点点。沿着长城这

一带，人家星散的山沟里，多数是这样。时常尸横遍野，臭味相闻五六里，哀号声音响彻云霄，令人毛骨悚然！

3、凄惨的"集家"

"无人区"这是日本鬼子对待八路军第二道挡箭牌，既能坚壁，尤可清野，似乎是一个得意的阴谋，可是事实恰得其反，不但未挡住八路军，反被八路军攻入热河省的内地，不但未减少八路军的力量，反倒壮大了八路军的队伍。"无人区"的青壮年除死者外，大部都成了八路军的坚强战士。地理熟悉，人情透彻，不仅到处可以为家，还能得知敌人的底细。白日隐避，夜间行军。在伪康德五年末，部分八路军已攻到热河中部，直到东部的平泉县、凌源县、喀喇沁旗等处。连承德街的伪西南防卫令部、日满宪兵队，省公署、警察等机关门口，都被贴了了反满抗日的标语。有时岗哨丢枪，有时手榴弹炸到院内，甚至有时伪军失踪和丢失密件等，层出不穷。把一些鬼头鬼脑的家伙们，都弄成昏头昏脑的东西了。于是，又想出了集家的政策。按照地理环境，把全省各地人民都集中在各个指定的村、屯，用围墙圈起，设置门岗警卫，检查来往行人，以断绝和八路军的联系。

"集家"政策的规定：

(1)为实行王道主义，"保护"人民利益，便于皇军"剿匪"工作，进行全省集家。

(2)凡不满10户或稍多一点的"通匪"地区住民，一律迁移指定部落或地点，不准有任何留恋。

(3)一经被指定迁移的人民，不拘远近，一律限期搬净，过期即有意"通匪"，尽行烧除。

(4)不向指定地点迁移，逃亡山野者，均为不法，枪毙不贷。

(5)所遗田园，须按驻在警防机关指定时期耕种，如有违犯，即行严加法办。

(6)所有指定的集居部落周围，都得修1丈2尺以上的高墙，

开2门或3门，最多不超过4个门，每门修炮台1所，守卫室2间，昼夜设置岗哨，遇有外来串亲等人，均须验证登记，否则不准入内。

(7)为锻炼国民道德，尊守"爱国"思想，凡出入卡门时，须向日满国旗和门卫人员敬礼，必要时得会背国民训。夜间禁止出入，遇有特殊事故，必经保甲长证明事实，门卫批准方可放行。

(8)门卫有检查盘问搜身权限，无论何人，不分男女老幼均不得拒绝。

诸如以上二十余条规定，形同监狱，没有两样。根据这些法则，由伪康德6年起，就开始了严格的集家工作。散居的山乡农民都得向指定地点搬家。祖祖辈辈燕子垒窝一样的一砖、一瓦修盖起来的房屋，眼看着被拆除，被焚毁！爷爷奶奶所栽培的果树，眼看着被砍伐，被烧掉(特别是热河西南果树最多，人多依以为生)。多年血汗化成泡影！有的性急投河跳井，有的悬梁自尽！差不多哪个村庄都有这样惨状.若以全省来说，死者更不知多少了！

"集家"后的部落，都得严格执行保甲制度(伪满除热河外其他都是街村制)。十家连坐为一保，十保相邻为一甲，甲上为村，村属于县。每村设一警察署或分驻所，要塞地方，布置军警讨伐队，或固定的监视据点，备有各村攻守设施，层层节制，步步森严，不异天罗地网。

整个热河全省，到1945年止，除隆化县外(隆化只集家一部分)全部集家，也就是把全省人民都圈在这样的人圈里了。财产的损失，人命的牺牲，真是一个不可估计的数目！至于对人民侮辱的情况，更是不堪设想。每个部落都有一至二三个警卫室，备有刑讯看押的屋子，几乎天天有人被押，夜夜有人被侮辱。就以围墙的卡门来说，那种非人性的搜查，一般妇女都认为是一个鬼门关，天天必须经过，经常受到警卫人员的耍戏。偶一触犯这些豺狼，就被提到关押室内，百般侮辱，莫可言状！被关押的有人被折磨死，有的人忍辱自绝，但这些兽类还不以为足，有时插圈弄套，夺人妻女。试看

警卫人员或讨伐队的头头脑脑,谁不是三妻两妾呢?

可是他们没有想到,越这样做同人民的结怨越深,而八路军的行动就越得劲。结果,把集家变成了给八路军的让路工作,遍野无人可以任意出入,集中攻击的目标非常好找。用粮即到部落攻取,用枪械弹药即向警察署、所提拿。今天这里陷落,明天那处被包围,致使鬼子顾不了头脚。不得已,他们就在各部落大量屯驻日满军警。殊不知,进时容易退时难,多数都被八路军困在部落的核心,周围埋伏许多地雷炸药。仅用少数人提防,他们就不敢越围墙一步,如此圈 人竟成了"圈"己。

4、**血腥的"三光"政策**

"三光"政策是日本鬼子穷途末路的一着,也是热河省坚壁清野中最后的丑态。他们的目的是,宁可把热河省人民杀绝,不让八路军进犯雷池一步。决心是很大的。殊不知历史的发展规律,早已注定了帝国主义者必亡的命运,这些垂死挣扎又何济于事呢?

约在伪康德七八年以后,尤其是伪满末年,驻在热河省的西南防卫司令部和伪热河省军政当局,曾一再奉行日本关东军的命令,伪满国务院的指示,必须把热省的八路军斩草除根,否则就以军法从事。这一严格的要求,就冲起了魑魅魍魉—— 日伪军的凶恶分子挥起无恶不作的屠刀,推行"三光"政策,对群众实施暴行。何谓"三光"?就是使热河全省境地,无八路军的踪影,无通匪的人员,无资匪的财物……,有则杀光、烧光,抢光。所以,人们管他叫"三光"政策。日伪为完成这一政策,把在东边道大显凶相的岸谷隆一郎由国务院地方处长,调任热河省次长。又把他豢养的爪牙警察讨伐队程斌部队、范文部队、鹏飞部队、徐景部队、陈天部队等调到热河。再加上日伪军,不下 10 来万人,组成西南防卫的攻势,他们的分工是以行政警宪深人各村搜根摸底,洗清思想,以日伪军讨伐队,展开扫荡,烧光山野;以司法特务,毒刑论罪,洗净"匪源"。进一部落,清一部落,见一"坏入"杀一"坏人"。何谓坏人? 凡财产少,以劳动

为生，光棍汉，或稍带民族气节的人都属于这个范畴。见着这些人，就得追踪问底决不放松，偶有破绽，即行烧杀。宁可错杀、错烧、错抢，不可不杀、不烧、不抢。少杀、少烧、少抢者无功；不杀、不烧、不抢者有罪。什么罪呢？不是通匪，就是思想需要矫正，要送法院关押或关在矫正院。一经触犯伪条令就不赦免。各地配有日本宪兵队，从侧面监视。无论那个讨伐队，都得走这条杀人放火的道路。特别凶狠残暴的是刽子手程斌伪警察讨伐队，不但尽可能的杀人放火，还借机大肆抢掠，每人都发了一笔横财。有一日本鬼子名叫"阿部军刷"的，是指挥官，别号大鬼头。曾以卖棉被絮钱向本国邮寄。他还有个兽性嗜好，专门搜集妇女花枕、衬衣、裤袄、小娃用物之类的东西，所以人们又都暗地称他为猪八戒。他又是一个极凶恶、极残忍的野兽，他在滦平县烟筒梁一带讨伐时，吃过人心，喝过人血。如是形形色色不止阿部一个人，一般日本鬼子和丧心病狂的伪警察多数是这样。至于大型屠杀的情形，更是有甚于无人区的扫荡和集家工作的凶残，天天以汽车、大车络绎不绝地向承德三大杀人窟送人，日日可闻烧杀不绝的哀音！如宽城县峪耳崖南边一个部落，据特务腿子报告，曾住过几次八路军，这些屠夫就大发雷霆之怒。在一个早晨，鬼子军就把这个部落围住，假称集合讲话，把全部落的30余户200多人口，不论男女老幼，都驱逐到街头，用机枪射杀，接着就纵火焚烧，哀号震天。正在这时，他们又拉来一个老太太和一个小孩，用枪挑到火堆里去了。他们还说："老八路、小八路统统的死了的好……"。其它如汤河口、盘道梁、玄阳洞、茨榆沟、三义岭等沿着长城附近的山沟里劳动人家，更可想见杀了多少，烧了几何！抢去若干！原来鸡犬相闻，人烟在望，这时30里、40里找不到一个人家。到处是烧杀遗迹，破户残梁。草木半生半死，山野尽变焦黑，形成一片阴森凄凉景象！

八路军为减少人民的灾难，一时暂避收兵，不大出动。鬼子们以为得计，喜上眉头，庆祝成功。没想到仅过两个月，东部、北部的

八路军就纷纷出动，部落据点时间陷落，伪警、伪军节节败北。鬼子大慌其神，调兵遣将，昼夜奔忙。正忙于东北的堵击，突然八路军肖克、王亢率领大军，分两路攻来，西部情势又呈紧急。弄得鬼子仓惶失措，慌作一团，垂头丧气。据说，西南防卫司令官稻田降职调转。永幡僚二大队长由于在围场御道口全军被歼，破腹自杀。

这时，推行"无人区"化的元凶——岸谷隆一郎竟提出悬赏缉拿八路军首领的口号。拿获肖克为10万元，李运昌为5万元，王亢为3万元。连级以上干部由2千元至2万元。有私报住处因以捕获者，各赏该金的1/10。穷途末路的日伪军，丑态毕现。

总之，政策之毒辣，莫过于伪满的"无人区"化；受害最深，莫甚于伪满治下的劳苦大众。日本鬼子真算是创造了人类有史以来所没有的劣迹。他们凶恶狠毒，残暴绝伦。我虽在热河亲尝目睹10年之久，恐怕是穷我毕生之力，亦难罄其万一。唯仅撮其梗概，亦可窥见伪满王道政策的本质

承德县"二·一"惨案

郭培忱

1943年2月1日，日本侵略军驻承德宪兵队本部特高课长木村光明调集承德日本宪兵分队、下板城日本军田野大队和伪满承德县警务科警察讨伐队，在承德县鹰手营子、东涝洼、胖和尚沟、南双庙、三道河子、黄旗湾、西大庙、松树沟、牤牛窖、胡杖子、大杖子、两益城、苇子峪、小营14个村庄，抓捕了上千名无辜群众，制造了一起骇人听闻的"二·一"惨案。

鹰手营子等14个村庄，地处万里长城的北侧，燕山主峰雾灵东侧，热河重镇——承德的西南，水陆交通要塞下板城的西北。自1938年始，这里就是八路军的抗日游击区。

鹰手营子等14个村庄的人民为抵御外侮，他们积极为八路军筹粮、做鞋、送信、站岗，主动配合武装部队抓特务，除汉奸，破交通，切割通讯线路，袭击日伪据点。1942年8月，承滦兴县大队在顺地道村凉水泉处，击毙伪承德县副县长米泽四郎和鞍匠警察署长曹振方等日伪军警10余人。10月，西大庙、南双庙、两益城等几个村的群众，配合八路军攻克上板城车站，毁坏了其铁路设施。11月，这里的群众又配合八路军攻克并焚毁新杖子伪警察分驻所。抗日斗争风起云涌，经久不息。

同年，承德宪兵队为扑灭抗日烈火，频繁地对抗日游击区进行"扫荡"，大搞"人圈"，"集家并村"，实行所谓的"治安肃正"。1943年初，我迁遵兴第十三区干部在胖和尚沟村的水泉沟开会，被讨伐队包围。突围中，区文书高峰同志不幸牺牲。他身上携带的各村干部花名册被敌搜去。承德宪兵队特高课木村光明见到花名册，如获

至宝。于是，一场镇压承德县人民的残酷的检举、大逮捕、大屠杀就这样开始了。

1943 年 1 月 31 日(农历腊月二十六)晚，木村光明指挥承德宪兵分队，下板城日本军田野大队和承德县警务科警察讨伐队分成 3 股，在承德县鹰手营子等 14 个村庄实行大检举、大逮捕。

第一股，承德日本宪兵分队 600 多人。当晚，闯进鹰手营子村。他们将全村男女老少集中到姚兴院里看押起来。数九隆冬，人们挤在一起，坐待天明。第二天清晨，日本宪兵用绳索将所有男人绑在一起，朝新杖子村押送。

2 月 1 日，天色未明，承德日本宪兵分队，又分别包围了胖和尚沟、东涝洼、南双庙、苇子峪、两益城、小营村，挨家挨户地抓人。胖和尚沟村李久功被宪兵从屋里搜出，宪兵寻搜院落时，李又钻进了宪兵搜查过的菜窖。日本宪兵又从菜窖里把他搜了出来，刺杀在菜窖旁。李小仓被抓后躲藏起来。第二次搜出后被宪兵用棍棒活活打死。陈老爷儿(绰号)逃跑未成，被打得遍体鳞伤，不能动弹，不久便含恨死去。李万广走在路上，碰到日本宪兵，躲闪不及，也被抓住。胖和尚沟村被抓 70 多人，只有李景贵一人半路借机滚坡逃跑，其余全被押送到新杖子村。

东涝洼村与鹰手营子村相隔 3 华里。全村有 129 人被抓捕，日本宪兵用绳索把他们捆绑起来，押送新杖子村。其中孙甫半路解脱绳索，蹲藏在看电线杆的坑子里，得以脱逃。其余全被押到新杖子村，就连出家老道阎士龙也未能幸免。

同日，被抓捕押送到新杖子村的还有南双庙村 110 余人，苇子峪 80 人；两益城 87 人；小营 45 人。

日本宪兵将被抓捕的人关押在新杖子村东的于家店大院(原是“中信和”商号的店铺)内，店内临街的 5 间房和院内 5 个存放货物的土圆仓里挤满了被抓来的人。还有几个实在挤不进去，日本宪兵就用枪托打着强让往里挤。南双庙村李朋是个驼背，被挤得晕死

过去。宪兵将他拖到院子里，冻醒了还叫往里挤。还有一个姓张的，人们叫他傻禹，也被挤得晕死过去，拖出来冻了好长时间才缓过气来。后来，硬是在棍棒强逼之下才挤进了屋。花名册上的村干部，被关进土圆仓(这种仓是荆条编的，里外抹一层薄泥，系当地农家存粮，放东西用的小库房)。大院里架着2挺机枪，门口四外有日本宪兵把守。一片杀气，阴森恐怖。

2月1日晚，被关押的人们议论纷纷。东涝洼村武装委员马洪祥说："坐着等死，不如和他们拚了。"同村宣传委员刘永芳等村干部悄声对张和稳说："你以借火抽烟为名，把日本宪兵捉住，弄到屋里，用破棉花套子堵住他的嘴……。"那天晚上，日本宪兵增加了岗哨和看守，"虎口脱险"计划未能实现。

2月2日，日本宪兵在院内西厢房里设立了"公堂"。公堂里摆下棍棒、皮鞭，屋梁上悬吊着绳索，地上燃着炭火，火盆里烧着铁条、铁棍和火筷子。残暴的日本宪兵在所谓过堂中，采用了"敲山震虎"的战术，妄图杀一儆百。他们每次刑讯都提几个人，挑选其中一个在花名册的村干部或是看来是胆小的，严刑逼供，借以恐吓其他人。南双庙村党员干部刘树被拉进屋扒下棉袄，日本宪兵要他交出村里共产党员和八路军办事员的名单。连问几次，刘不予理睬。日本宪兵气急败坏，从火堆里抽出烧红的铁条向他脊背烙去，刘被烙昏过去。日本宪兵把他拖出屋外，用凉水泼醒，又拽进屋里审问烫烙。刘全身的肉都被烙烫烂了。同村干部肖汉存、罗万贵和东涝洼村干部刘永芳等都先后惨遭上述毒刑。两益城村干部邢俊伶，被日本宪兵绑在一头高一头低的板凳上灌凉水。肚子灌胀了，就被拖到外边，拴住两脚拇指倒吊起来，用擀面杖从肚子里往外擀水，擀完了再灌。一直灌了5桶凉水。日本宪兵将其折磨得奄奄一息，才又拖回土圆仓。南双庙村刘永伶、刘永明哥俩被拉到屋里，宪兵几次声色俱厉地审问，哥俩一声不吭，宪兵们恼羞成怒，撮了一撮炭火，倒进了刘永伶的裤兜里。东涝洼村齐礼、茅子峪村关振祥、小肯

村房广谦和房广顺，在刑讯时被日本宪兵活活打死。

2月3日，马洪祥和谭风被拉去刑讯。日本宪兵在盆上翻烤着馒头，边吃边对他俩进行审讯。日本宪兵见马洪祥怒目以对，便起身拿起木棍向马劈头打去。马往后躲，瞅见门旮旯里有一把二齿镐。他乘机挨近门旮旯，趁打他的宪兵又去翻馒头，抄起二齿镐，向宪兵的脑袋搂去。二齿镐搂进了那宪兵的脑袋。接着，马洪祥又向坐在炕上的另一个宪兵头顶砸去。屋内挂毛巾的横杆挡住了镐头，没有砸中。马洪祥没等炕上两个宪兵从懵懂中明白过来，扔下二齿镐，撒腿就跑，被守门的宪兵抓住，将其捆绑在窗户框上。晚上，与马洪祥同村的刘福廷和李景云见马洪祥的胳膊被绳子勒进了几道深沟，便背着看守给马洪祥松了松绳子，马洪祥缓一会，对杨万明和张和信等人说："你们不能等死，能跑就想法跑吧！这些日本人是杀人不眨眼的魔鬼。"并示意墙脚有烟囱眼。杨万明、张和信明白了马洪祥的意思，从地下破木上拔下一根铁钉，一点一点地抠那烟囱的砖缝。这时候马洪祥也解脱了绑绳，便和杨万明用脚蹬掉了已经活动的砖块，带领孙仓、王义、赵凤瑞、张洪瑞、谭修、张恩廷、张和信、杨万明等陆续钻了出来。马洪祥钻出去以后，又返回来寻找他的父亲马兴，打算一块逃走。正这时候，日本看守发现了墙窟窿，立即堵死了。马洪祥没来得及再跑出去，被堵在了屋里。

2月4日（农历腊月三十），是我国人民的传统佳节。大检举、大抓捕夺去了人们大年三十的幸福和欢乐，寒冷、饥饿、酷刑之后的伤痛折磨着每一个被抓捕的人。

2月5日（农历大年初一），有的妇女和老人冒着风雪给被抓捕已经4天没有吃喝的亲人送饭。残暴的日本宪兵用枪托殴打送饭的人，把他们打倒在地，把送来的饭菜统统泼洒在地上。

2月6日，日本宪兵将多数人用汽车陆续押运到承德监狱；马洪祥、刘永方和与八路军有联系的伪新杖子警察分驻所代理所长陈继祥等人被押到新杖子村东头杀害。

第二股，下板城日军田野大队200多人，在胡杖子、大杖子、牛窖村和附近几个小庄，抓捕了280多人。

1月31日下半夜，日军即包围了村庄。并在山头，村口设立了岗哨。2月1日天刚亮，日军进村。挨家挨户搜查，将花名册上的人捆起来带走。花名册上的人不在家，就将其亲人抓住带走。大杖子村任连永被抓，过滦河时跳河逃跑。胡杖子村郭廷龙、郭东阁父子在册，因给八路军送粮未归，幸免于难。有几个走路的也被抓捕，一齐押到下板城日军田野大队部。

日军田野大队部，设在下板城村东侧，原来是"庆元恒"商号的外栈(存货处)。牤牛窖、大杖子、胡杖子等地被抓来的人，都关在院子东侧的3间房子里，门口窗外有日军看守，院门口炮楼上还有岗哨，警戒森严。第二天，日本宪兵们把被抓来的人按十来个一拨，提出刑讯。他们首先刑讯花名册上有名字的干部，然后挨个审问另外的人。谁只要承认给八路军办过事，不论是站过岗，还是送过信，管过饭，就连给八路军交过粮的，刑讯后一律不予释放。胡杖子村张国普，大杖子姜海廷、牤牛窖村谢永宽、曲梦铎等村干部，在吊打、烫烙酷刑下，毫不屈服。日本宪兵就在凉水里掺上煤油、头发茬子等物，挨个地灌。灌胀了就用杠子在肚子上压。昏过去的抬到屋外冻。冻醒了再灌，再压。人们虽然被折磨得死去活来，但是谁也没有吐露八路军的秘密和村中办事员的情况。牤牛窖村赵山、关元献，胡杖子村窦岚贵、赵永等十几个人，被日本宪兵敲打骨节后，扒光衣服，排列在营房院内水井旁。日本宪兵从井里往上提水，泼在这些人身上。三九严寒，滴水成冰，这些人身上结满了冰渣。胡杖子村窦岚之，被日本宪兵用通红的火钩子烙，拖到井旁泼水冻，用开水烫，灌凉水、压杠子，百般折磨，他宁死不屈。

第三股，承德县警备科警察讨伐队、日伪警察200多人，在警防股长黑烟(日军)指挥下，2月1日凌晨分别窜进黄旗湾、三道河、松树河、松树沟、西大庙村，抓捕了村干部及为八路军办事的牌

甲长和普通群众 250 多人。他们把抓来的人押到上板城村，分别关在上板城村西烧锅院内和烧锅西院的 4 间房子里。

第二天，黑烟股长组织日军和伪满警察，在两个院内分别对抓捕来的人进行刑讯逼供，残酷地折磨。西大庙村十家牌长李祥和其弟李洪，还有知文邦、杨俊武在刑讯时，前胸后背全让日本警察用成捆的香火烫焦了。暴徒们管这种刑罚叫“穿火背心”。松树沟村杨万全在棍棒下不招供，日本警察让他张嘴，夹起一块火炭塞进了他的嘴里。三道河村杨喜恩，西大庙村李福屡遭刑讯，也不吱声，日本警察扒下他们的衣服，摁倒在地，将燃烧的炭火扣在他们的脊背上。三道河子村王枝，被严刑拷打，王枝拒不招供，并怒斥日本警察。日本警察兽性大发，将烧红的铁丝捅进了他的生殖器。王枝一声惨叫，昏死过去。

2 月 7 日，下板城、上板城两处释放了一些人后，把刑讯逼供后定为有“罪”的人和在花名册的村干部，分别捆绑，用火车押运承德监狱。

全县被押送到承德监狱的共有 376 人，其中新杖子 284 人，下板城 48 人，上板城 44 人。

承德监狱，如同传说中的十八层阎罗殿，阴森恐怖。被押进监狱的人，有的戴着手铐，有的拖着脚镣，南双庙村刘树等主要村干部拖着两副铁镣，脚腕子磨出的血滴流不止，上百人被关在一间屋子里，对面大板铺，一面铺上排坐三行，除了吃饭，大小便也不让出屋，白天黑夜的坐着，不许晃动，不许歪斜，不许说话。板铺上下到处是吮吸人血的虱子，任其叮咬，不许抓打。看守在监房外面看着，谁违犯了，就被叫到监外一顿毒打。南双庙村李自洪，坐得时间太长了，有些支持不住，刚一歪，被看守发现，叫出去打了 5 板子。手掌被打得半个月肿胀不消。每个监房里每天都有被毒打致死或被疾病刑伤夺去性命的。两益城村邢俊伶，向看守提出抗议，要求日本宪兵队撤销一天 24 小时的坐罚，给予室内活动的自由。为此，邢

俊伶被叫到监外，棍棒加身。他面对凶残的看守，毫不畏惧，越打越骂。最后英勇地死在敌人的棍棒之下。在牢里，每天给两顿饭，一顿一勺红高粱米粥，稀得照见人。日本宪兵在这里继续对被监押的人非刑吊打，残酷折磨。有口供的送交“法庭”，没有口供的继续刑讯。刑讯的手段比在新杖子、上板城、下板城更残忍、更狠毒。黄旗湾村孙连举、李景全和南双庙村李香，先后被电刑和吊刑夺去了生命。

3月6日，承德特别治安刑事法庭（法官、翻译、录师等全是日本人）经过1个月的刑讯，便根据花名册的记载把姜海廷、肖汉存、刘树、杨俊武、贾文义、张永恒等28名村干部和抗日积极分子残杀在承德西郊水泉沟“万人坑”内。

同日，还有318人被定“罪”判刑。其中一批被押送到东北下煤窑、开矿山等充当苦役；一批留在承德监狱，重新分配监房，每天也被拉到工厂干苦活。不论是下煤窑、上矿山；还是蹲监狱的，都遭受着非人的折磨。很多人因饥饿、劳累、疾病和看守的无情折磨，惨死在煤窑、矿山或机器旁，有的挣扎着回到牢里，倒在板床上，再也起不来了。每至此，看守就将死尸拉出，扔到水泉沟“万人坑”。送进监狱的376人，在短短的2年时间里，竟有216人被夺去了生命。

日军在承德县制造的“二·一”惨案，先后共有254人惨遭杀害。因主要劳力被抓走残害致死，剩下孤寡病残生活无着，病、冻、饿、愁死者竟达600人之多。南双庙、东涝洼、鹰手营子三个大庄变成了“寡妇村”。

制造“二·一”惨案的日本战犯木村光明，于1956年被押上了被告席。在大量人证、物证面前，他也不得不承认这一犯罪事实。这是日本帝国主义欠下中国人民的又一笔血债。

附：

日本战犯木村光明的供词(摘要)

被害人石臣等 21 人和被害人家属姜国全等 52 人之控拆书，及现地居民姜永等 9 人之书面证词，及查问记录 13 份，已通过翻译用日本语向我宣读，听了无有错误，全部是事实。

我在 1943 年 2 月 1 日以承德宪兵本部特高课长之身份在职中，2 月 1 日即制定过"二·一"镇压计划，曾于承德宪兵队本部召集我下宪兵分队长，游击队长，热河警务厅长，满军宪兵团长，锦州铁道警护队长等布置命令，此一计划决定于 2 月 1 日在全热河地区，特别是以滦平、承德、兴隆，青龙、平泉等各县为重点，在宪兵之指挥下一齐实施了此一计划，对如上述中国人民之抓捕是命令了承德宪兵分队长兼热河第二游击队长指挥当地警察、满军宪兵于承德县鹰手营子村、南双庙村、东涝洼村抓捕了中国抗日组织及和平居民姜国明等 230 余名，监禁在新杖子居民五家内，经过一周间灌凉水、殴打、用烧红火筷烙身体、吊打等之拷问后送到热河特别治安庭，加以迫害，另外又在新杖子拷问和枪决杀害一部分之事实，我应负全部责任，关于我以上罪行请被害人给予严厉处分。

1956 年 6 月 14 日于抚顺

原承德宪兵队本部特高课

长宪兵队大尉木村光明

代笔人：长岛玉次郎

译者：王吉鸿

我所经历的楸木林惨案

白恩潮

我叫白恩潮，今年76岁，我亲眼目睹了楸木林子惨案发生的全过程。事情虽已过去42年了，但每当我想起这码事，就怒火满腔，仿佛当年一幕幕的惨景，又展现在眼前。

我们楸木林子村，地处兴隆县城东南110多里，是一个喇叭状的山沟。日本帝国主义者看这块地形好，就把它和大小河南、沟门子附近的群众，用刺刀驱赶到这里，因这附近的山上长满了楸树，于是就叫楸木林部落。

楸木林人民从1938年起，就在共产党领导下，开展了抗日救国运动。他们抓汉奸，捉特务，给敌人以很大威胁，圈入“人圈”后，还经常夜晚出没到公路两旁割电线、破交通，坚持抗日斗争。

1943年1月，村里来了一个八路军伤病员，为了把他秘密转移到沟门子，借了贫农白泽仲的一头毛驴，由贫农李庆珍、张正顺二人护送，不幸在半壁山靳杖子被佛爷来村特务阚少贵、金明贵截获，送往半壁山警察署，严刑拷打，他们三人坚贞不屈，先后死于日寇魔掌。

兴隆县日本宪兵队长潘大胡子，发现楸木林一带总有抗日活动，这回又捉住了八路军的伤病员，遂下了血洗楸木林的狠心。

1943年2月9日（农历正月初五），天刚蒙蒙亮，四五个日军带着讨伐队长刘其昌和30多个讨伐队员闯进了村。一开始说是开会，把人们驱赶到村口，四周架起了机枪。那天我有事外出刚进村，一看这阵势，就想躲一躲，不料被两个讨伐队员看见，我第一个被反剪双手绑了起来。随后特务们从各家搜来一团团绳子，凡18岁

以上的男人都一个个绑了起来。后来绳子不够了，又一人拴一支胳膊的拴成长串，一个瘸子被拴在最后。顿时，村子里女人哭，孩子叫，哀声四起。人们被讨伐队用枪托驱打着出了村。我走在最前面，因瘸子走得太慢，被一枪托打翻在地，逃了一条活命。

敌人从楸木林绑走 44 人，押到屈占九家的大院，那儿有日寇七八十人早已站着排，举着枪，枪上插着贼亮的刺刀；还有 150 多个伪讨伐队员，在那里四处游动，我进院一看黑压压的足有 1000 多人，听说这是日寇从东边抓来的。院子里放不下了，不少人还被圈到了东跨院。

一个日本人对大伙咕噜了一阵后，翻译说："皇军说，叫你们检举谁是八路军，谁是共产党，谁给八路军送过多少米，多少鞋，多少袜子，说吧，不说，统统的死了死了的有"。院子里死一般的寂静，一个姓常的特务拿出一本帐，站在日本人的旁边嚎叫着，叫着谁，谁就站到前边。姓常的叫了足有三十六七个人的名，没有一个人答理他。敌人恼羞成怒。一个指挥官模样的人手一挥，一群日伪军像恶狼似的一拥而上，白井文被吊在窗钩上，敌人用荆条狠抽，逼问他谁是八路军？谁给八路军送过粮？白井文咬紧牙关一声不吭；白瑞存被打得满地翻滚，脑袋上鲜血涌出，血肉模糊；白玉升被敌人踩着脖子，用镐把乱打；白殿潮被绑在梯子上往嘴里灌凉水；还有的被踩着胳膊腿，往鼻子里灌煤油。尽管敌人非刑吊打，但没有一人招供。

敌人红眼了，拿出了他"三绞废命"的绝刑。"三绞废命"就是在人的脖子上套个绳圈，后边插个棍子，第一绞把人的舌头勒出；第二绞把人的眼珠子绞出；第三绞直到人的七窍流血而死为止。当场就绞死三人，第四个该轮到贫农白瑞林的头上。每绞一个之后就给下一个松松绑，问他说不说？白瑞林一直摇头。就这样，白瑞林也被活活绞死。

天色黑了下来，敌人打累了，也饿了。这时，过来一帮伪警察，

手里拿着镐把,对着我们劈头盖脸地打来,一人两镐把。我一躲,两镐把都打在肩膀上,要是躲闪不及,准得打死。

院内渐渐静下来,我看这阵势,要不逃走,绝无生路。我用脚踩了付老二的脚一下。对着他的耳朵小声说:“给我解开绳子咱们跑吧”。他说:“行吗”?我说:“不跑没命了”。他偷偷给我解开了绳子,我也给他解开了绳子,他又给付玉来解开,付玉来又给路荣贵解开。路荣贵又给崔得生解开,崔得生又给崔永明、崔永亮解开。我们7个人个个憋足了劲,一下跃上墙头,翻了过去,撒腿就跑。没跑出去多远,就听后边响起枪声,崔永明中弹倒地,我们其余6个人总算死里逃生。全村剩下那37人,有的死在屈家大院;有的被敌人拉到兴隆、承德、锦州等地处死,无一人生还。

一个55户的山村,就有30多户没了男人,有的哥俩全死了。然而敌人的屠杀并没有吓倒我们。惨案发生后的第二天,我抗日人民政府派区长王佐民及张友德等同志连夜赶来慰问我们,召开追悼大会,控诉日寇屠杀中国人民的罪行。人们认识到,只有跟着共产党、八路军走,此外别无出路。于是,纷纷投奔了八路军游击队。从此,抗日斗争一浪高过一浪。一次,在我村北部山区,敌人遭我冀东十三团一部的伏击,战士们把仇恨集中在枪上,枪口喷出了愤怒的火舌,打得敌人人仰马翻。有半个多小时,就毙敌80多个,为乡亲们报了血海深仇。

(何连仲、张春生整理)

伪满承德监狱忆述

李佐民　张建光

我们俩人一个原是蓟遵兴联合县秘书(李佐民),一个原是承平宁联合县四区区长(张建光)。1944年上半年我们在与日伪军作战中被俘,从战场转押承德监狱。因为我们的身份没有暴露,只当一般国事犯关在同一监牢里,日本投降后重归革命队伍。现在把在监狱里看到的事整理成文,以佐史证。

监狱概况

承德监狱是伪满洲国西南国境一座规模最大的监狱,素有鬼门关、活地狱之称。它地处承德西大街旱河沿北,占地十多亩,约4/5为地方监狱,1/5为国兵监狱。四周垒石墙,高度丈余,院墙上筑岗楼,居高临下,日夜监视巡察。墙外栽铁刺网,戒备十分森严。监狱内设国事犯、刑事犯、经济犯、女犯、外国人犯等牢房。其中最大的是国事犯监,它的建筑形式呈筒状,两边12个监号,中间是狱卒巡视的走廊。牢房窗户很小,又被密密麻麻的铁条封栏,房间里光线极为暗淡,有的屋终年见不到阳光,潮湿、霉臭气味十分浓重、呛人。每个牢房的面积不大,内设对面板铺。

监狱里有一套完整、严密管制及镇压犯人的组织和制度,监狱长、各科长和各牢房的主管看守都由日本人担任副职,实质副职管正职。特别是对国事犯,每班除有中国人看守还有日本人监视。

对革命者残酷迫害

我们住的那个筒状国事犯监400多人容量,关押的人绝大多

数是搞大检举被抓捕的，也有的是日伪讨伐队在战场上俘来的。内中有八路军的干部、战士，也有与八路军有联系的老百姓，均属日伪当局认定的国事犯。为了加强对被关押者的管制，凡担任过八路军干部的人，入狱后都给砸上脚镣，职务越高戴的刑具越重。

日本侵略者根本不把中国人当人看待，他们任意虐待和屠杀。我们在狱中1年多，亲眼看到同监号里被杀害、被折磨死的国事犯有200多人。他们杀人的办法多种多样。一是集体屠杀，被判死刑的在一二十人以上，就用囚车把人押运到水泉沟砍头或枪毙，这种情况我们亲见五六起。二是施行绞刑。在监狱西南角处设有绞刑室，是个两层小楼，在二楼地板上装有3块翻板(可以同时绞死3个人)，在翻板正上方的房梁上系有绞索绳套，当行刑时把将被处死的人放在翻板上，把绞索套紧脖颈，然后搬动机关，翻板一翻，人被漏到楼下，由于人体的自身重力，活活把人勒死。许多被害者都把气管勒断了，用这种方法处死人是经常的。三是生活虐杀法，监狱里死亡最多的是由虐待造成的，差不多每天都有尸体被抬出去。牢房环境极其恶劣，每个屋子只有30多平方米，而关押的人经常40多，有时到过五六十，拥挤不堪，白天只准坐着，既不许躺着，也不让走动，到夜间睡觉的时候挤得连身都翻不过来。人不得休息；长年累月，身体好的折磨垮了，原来有病的愈加严重。对有病的人不给治，牢房不见阳光，粪桶放在房内，几十人大小便弄得屎满尿流，每天只准往外倒一次。由于潮湿、臭气使人难以忍受，一到夏天，苍蝇、蚊子、臭虫满屋乱飞乱爬，造成传染病流行，许多人死于肠炎、痢疾。许多人染上疥疮，得不到治疗，溃烂致死。这种情况，监狱根本不闻不问，卫生所医官只让患者在处方上按手印，不给药，他们贪污药费。在饮食上，每天只给两顿饭，每顿2两多粮食，常年如此。吃的全是发霉变质的高粱，吃了坏肚子，有不少人拉坏了身体。根本吃不到副食，夏季给点菜汤，也没啥油水，有的难友家属在探监时给送些食品和衣物，又绝大部分被看守侵吞，真正落到

本人手里的也就所剩无几了。未判刑的人，衣着方面监狱根本不管，如果冬天被捕的，他们还有一套棉衣御寒，有许多人穿单衣入狱，到了寒冷季节，既无棉衣又无被褥，常年睡木板，冻饿交加，染病增疾，悲惨死去。天天有离开人世的，看守不发话，死尸就在原地躺着，看守巡监时，才下令拖出去。严冬季节，有时一天死好几个。生活虐杀比刑杀人数多好几倍，有许多人活活夺去生命。

1945 年 8 月 15、16 日的夜里，承德监狱的日本人驱使我们一大帮犯人在监狱西病监的房后挖 3 条长十几米、宽 2 米左右、1 房多深的大沟，准备将狱中的国事犯全部活埋。因为苏联红军飞机在承德上空日夜盘旋侦察，日本侵略者惶惶不可终日，又因为我党地下工作人员采取了相应措施，才使敌人预谋的屠杀暴行未能实施，险遭迫害的国事犯才幸免此难。8 月 19 日，苏联红军攻进承德，打开监狱，解放了全体犯人，我们也获得了新生，重归革命队伍。

我所供职的承德监狱

杨成林

我是伪康德2年(1935年)到承德监狱当看守,伪康德4年(1937年)升为戒护科看守主任,伪康德8年(1941年)因受贿离开监狱。承德监狱是热河省的最大监狱,归新京(长春)司法部直管。监狱长(即典狱长)是满洲人,由司法部任命,他戴的阶级满金一花,属荐任一等官,厅长级,日本人任副监狱长。起初监狱容纳800人,以后逐年扩建,达到装2000人。内设戒护科,负责管理犯人;教诲科,管犯人思想训导;作业科,管犯人生产作业;文书科,负责犯人档案及文书;会计科,专责财务;需用科,专责伙食和修缮;医务科,负责医药诊疗。戒护科、教诲科、作业科和医务科在大墙里办公,别的科设在大墙外。伪康德11年(1944年)承德监狱改称热河刑务署,内中机构由科变为股。监狱内分为已决监,未决监、女人监,外国人监和病监。各监关押刑事犯、经济犯、国事犯、(政治犯,大部分是长城内外为八路军办事的老百姓)。监狱里职员80多名,内有一部分日本人。职衔分为监狱长、科长、看守主任、看守等。穿黄色警察服装,阶级与社会警察一样,只是肩章图案不同(社会警察是黄梅花,监狱警察为白牡丹花),科长衔是两条金杠三个花,看守主任衔是一条金杠一个花,看守衔为黄布板一个花。各科的正副科长大部分是日本人。监狱的外围是高墙电网,每个看守带一把随身的短刀,值勤务时使公用武器撸子、匣子、大盖、套筒等长枪和短枪。固定哨位大门、中门、东见张(骑墙岗楼)、西见张各一个,监号还有流动哨。每班出勤务24小时,休息24小时。看守主任的职责一是传达戒护科长的训令,二是巡逻看守司职情况。犯人的监

号、衣服上的胸号和饭碗号(铝制)是三统一的。对犯人管理十分严酷,打骂虐待犯人是常事。犯人生活很悲惨,国民都吃发霉的配给粮,坐牢的阶下囚更是人下人,他们吃的主要是发了霉的高粱米和混合面,里边有耗子屎尘土,既苦又涩,气味难闻。夏天才能吃到一点青菜。睡土炕和铺板,冬天屋子特别冷,有很多人因病因饿死在监号里。判有期徒刑一年以上的转监,由新京司法部来调令,看守负责押运。我曾经带着几个看守往瓦房店、锦州、营口、本溪、铁岭、抚顺等地监狱送过犯人,让他们去受苦役,为日本人生产物资。很多人在服苦役中丧生。已决犯的衣服和行李由监狱管,未决犯仍然穿自已的衣裳。监狱杀人有专职刽子手,原先用木桩绞人,把犯人绑在木桩上勒死。后来在西南角盖个二层小木楼,隔层板是活的,让犯人坐在二楼隔层板上,脖子套上绳索,一开按扭,隔层板一翻,人吊在下面勒死。所以小木楼的别称又叫"翻板"。经常在监狱绞人,被绞的主要是国事犯。监狱里时常死人,有时由犯人抬,有时用胶车拉,尸体全运到水泉沟老阳坡掩埋。尤其在冬季,有时每天死好几个甚至十几个。1937 年至 1938 年春,日本承德宪兵队率领热河省警察讨伐队先后 5 次到上板城一带讨伐,俘获 140 多名抗日爱国者,在承德监狱关押之后分批拉到水泉沟杀害。

(彭明生整理)

日伪时期兴隆监狱的酷刑

朱呈云

兴隆县地处河北省明代长城北侧，是一个峰峦起伏、沟壑纵横的深山区。日本侵略者于1933年4月21日攻占兴隆县城后，即以长城为界，将其划归“满洲国”的版图。由伪热河第五军管区牵头，抽调日本关东军1个团、满洲军4个团、14个武装警察讨伐大队，共2万余众，开赴兴隆县境，实行惨绝人寰的烧、杀、抢的“三光”政策。他们毁掉村庄2千多个，烧毁房屋7万多间，抢走牲畜2.5万多头，粮物无法计算，制造“无人区”面积1301平方公里，占全县总面积的41.7%。直接杀害无辜群众1万5千多人，其中一次枪杀10人以上惨案28起，有大磨峪、楸木林、黄花峪成为“寡妇村”。抓捕入狱而致死1.5万人，因冻饿和疾病而死的2.5万多人。死亡人数占当时全县总人口的34%以上。有11万多人被敌赶进218个“人圈”里，惨遭法西斯殖民统治。

日本侵略者在兴隆血债累累，罄竹难书，这里将其利用监狱残害无辜群众的野蛮酷刑记述如下：

兴隆县日伪机关授权给各警察署和日伪军，在讨伐地的各大村镇设置临时治安法庭，运用一审的终审权力，将抓捕群众就地宣判，就地处决。这样，日伪统治者从1938年始，即利用“清匪大检举”、“通匪大检举”、“投匪家庭大检举”、“清乡大检举”、“反集家大检举”、“破交大检举”等繁多的名目，频繁“扫荡”，反复“围剿”。到1945年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时，抓捕无辜群众入狱者2万多人。在狱中，敌人施用的酷刑主要有：

断肠空腹。不给被关押入狱者饭吃，施以吊打手法，强迫招供。

如兴特区区长任和被捕后关进兴隆特号监，多次审讯，被打得血肉淋漓。敌人不给饭吃，活活被饿死了。

倒栽莲花，也叫倒头活埋。强迫被捕入狱的人自己挖坑，然后把人的双手用绳索捆绑，头朝地，脚朝上，放在坑内，用土活埋。兴隆县监狱曾在南土门杀人场，把抓到的无辜群众这样活埋的。

军犬狂舞。将被关押入狱之人双腿用绳索捆紧，然后呼来训养的狼犬，一纵一跳地扑到人们身上乱咬。1943 年夏季，半壁山警察署长常大伦在大河西、槐木林抓捕群众 60 多人，关押在临时法庭，指使被训练的几十条军犬将人咬得血肉模糊，直至死亡。

肉滚绣球。把被捕的人衣服扒光，塞进一个内部钉满钢钉的大木箱内，然后盖上盖子，把人在钉笼中活活滚死。

电磨粉身。专门在河边设置一种磨人的电磨，把被捕的无辜群众放在电磨里，磨成肉酱致死。

枪刺布袋。把被捕的人装进布袋内，让新兵用刺刀练习刺杀，称之为试胆量。日本宪兵队队长植松酋薮就多次用步枪刺杀布袋以壮胆，后来直接持刀杀人。

虾公见龙王。把被捕之人手脚捆在一起，像弯曲之虾，投入河内，将人淹死。日伪曾在滦河、洒河，用此法残害无辜群众。

开膛取心。把被抓捕的人，用战刀或刺刀挑开腹腔，取出人心。双庙据点的日本兵中川吃活人心达 50 多个。宪兵股长黑烟悦二也多次杀人取心煮食。

钢针刺骨。敌人审讯时，因被捕入狱的无辜群众不认罪，则用钢针或竹签往人的头顶、咽喉、手指、胸口和致命处乱刺。兴隆监狱经常施用此法把人活活扎死。

木桩勒人。就是把被抓捕的群众捆绑在木桩子上，用绳索活活将人勒死。

电动绞死。把被抓捕的人放在绞刑架台上，扳动电纽，脚下铁板一翻，掉到陷阱内，绞索勒紧死去。

皮鞭沾水。在审讯时，用皮鞭沾凉水把被抓捕之人抽打而死。

灌辣椒水。在审讯时，强行将辣椒水或石油，灌入被抓捕之人腹内。灌入后压杠子逼供，活活将人灌死。这种刑法，在临时法庭和监狱里，到处可见。

活剥人皮。1943年夏，迁(安)遵(化)兴(隆)联合县六区区长刘握枢，区干部依林，被敌抓捕后关在特号监。敌人活剥其皮，将他们致死。

坐老虎凳。在审讯被抓捕群众时，在凳子上安装铁钉子，或通上电，强行让人去坐。

梁上悬人。把被抓捕之人悬吊在木梁上追问。

背炭火炉。在审讯时，让被审之人身背烧得火红的炭炉跑步，活活把人烧死。

铁器烙人。敌人审讯被抓捕之人，往往用烧红的烙铁、火钩子烫人肉体，强迫招供。

此外，敌人在审讯时，拳打脚踢，用木棒打，更是司空见惯之事。

承德街水泉沟“万人坑”

彭明生

承德街是伪满洲国热河省公署所在地，这是低于市高于镇的称呼，一直叫到伪满洲国垮台。水泉沟是承德市市区头道牌楼外西边一条自北而南走向、东西宽八九百米、长约3华里多的沟，因有一眼泉水沿沟流淌而得名。这里荒山秃岭，只有39户100多个居民分住在各沟岔，种地为生。

伪满时期，日本侵略军在承德街设置了许多统治机构，其中主要的有伪满热河省公署、伪承德县公署、日本关东军西南地区防卫司令部、伪满洲第五军管区司令部、日军承德宪兵队及宪兵分队、伪满第五宪兵团、伪热河省协和会等军政警宪特首脑机关。除此之外，还在承德街先后设置了接力式的统辖锦州省、热河省、兴安西省的治安肃正“综合治理”指挥机构，其“职权主谋策划并指导监督该两省(锦州、热河)的日本宪兵、特务和警察机关的治安肃正工作。它所决定的一切事项，有关机关必须执行”(日本战犯三宅秀也供词)。

日本侵略者不仅把承德做为西南国境的政治、军事中心，还做为镇压反满抗日的司法审判中心，从各地抓来的人都可以在承德街终审判决。他们把承德变成了人间地狱。

日本侵略者为了将抓到承德监狱的抗日爱国者迅速处理，他们选定距监狱4华里的水泉沟做为杀人场。日本人信奉太阳神(把太阳神又称为天照大神)，传说太阳神是日本天皇的祖先，所以用太阳做国旗。他们选定杀人场地也采取了迷信手段，把水泉沟东边的几个山头从沟口往沟里编为“天、地、元、皇、宇、宙、宏”七字，每

个山头都圈为公墓，其中第四个山头老阳坡(约 30 多亩)占皇字，就将这个土层很厚的黄土坡划归承德监狱墓地，表示在这里杀人是为日本天皇收回不良臣民。从此，水泉沟老阳坡变成了日本侵略者屠杀抗日人民的刑场。

1933 年 4 月，日军首次在老阳坡杀人。他们先挖一个坑，给被害者蒙上眼睛，令其跪在坑边用刀砍头，将尸首踹人坑内。从此，至抗战胜利的十几年中，日军将从锦州省、热河省、兴安西省和长城以南各地抓到承德的抗日人员，有的直接杀害在老阳坡，还有一大部分在承德监狱虐杀或刑杀后把尸体扔到老阳坡，累计总数约达 3 万人。水泉沟"万人坑"因此而得名。

住在水泉沟小潘家沟口北边平台上与"万人坑"相距不过半华里远的农民高树芝(女，1987 年 73 岁)讲："日本鬼子进承德街那年正月初十，我嫁到老潘家。春天开犁种地的时候，鬼子就在老阳坡砍人。鬼子白天在老阳坡砍人我没少看，有时站在山头看，有时站在院子看，有时坐在炕上看。有一次砍了 48 个。日本鬼子用刺刀逼着我老头子用我们家水筲从河沟子里挑上一挑水，放到老阳坡杀人坑旁边。鬼子把犯人从汽车上拽下来放在北坡躺下，用布蒙上眼睛，然后由两个日本兵架着胳膊拖到坡旁大坑边跪下，刽子手用大战刀砍。有的一刀就把脑袋砍掉了，头和身子都滚进坑里。有的两三刀也砍不掉，就一脚踹进坑里。砍掉脑袋时，一腔子血喷出老高，腥味刮出挺远，熏得好几天吃不下饭。鬼子砍一个人，把刀放进水筲里沾一沾。砍的多了，刀也热了，不沾水就砍不动。挨砍的人也真有不怕死的，一个小伙子是承德县三家的，特别有骨气，唱着歌下的汽车。日本兵要搀他，他不让搀，他说，我今年才 18，再过 18 年还跟你们对着干。他至死不跪，不跪没法砍，用枪打死的。"

原水泉沟农民姜宪清(男，1984 年 82 岁)、王翠清(女，1984 年 76 岁)夫妻证实，有一年腊月十四，日本鬼子从兴隆县"无人区"抓来 3 汽车老百姓在水泉沟全砍了。第二年正有十三，承德县日本人

黑烟悦二带着警察讨伐队从化子沟抓来40多人拉到水泉沟。那天阴天下着小雪，被抓的不少人满不在乎，在刑车上唱着歌。还有一个20多岁姑娘高声大骂，不怕死。那些人全砍死在老阳坡了。过几天，有一个中年妇女到水泉沟烧纸，王翠清上前打听，才知道被砍的人里头有她女儿，她女儿给八路军做鞋被抓来的。因为尸首分了家，全在大坑里混着，找不准尸首，只好烧几张纸，哭一阵子回家了。

1941年，八路军区小队长郭有林同志被俘押在承德监狱。他利用一切机会向难友宣传抗日必胜的道理，看守制止，他就大骂。对号有个叛徒，郭有林天天骂他："不是中国人，给中国人丢脸。"骂得叛徒抬不起头。敌人把戴着重镣的郭有林拖上刑车，郭在汽车上大声向牢房喊话："同志们，同胞们，今天我走上刑场，才二十几岁，没有什么，为祖国，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为了无产阶级解放事业，死了是光荣的。再见了，不久你们就会看到我们的同志打进来解放你们的！"他的声音给难友们留下了力量和希望。他在刑车上喊一路骂一路，一直骂到杀人坑。鬼子气疯了，为了折磨他，扒下他的衣服，砍去他的双臂，但他照样骂，最后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国共产党万岁！"壮烈牺牲。

原迁(安)遵(化)兴(隆)联合县第一任县长姚铁民(又名宋德)同志也是牺牲在承德上万名抗日志士中的杰出代表。姚铁民是1943年春节在兴隆县红石峪战斗中被俘，从青龙留置场转押到承德监狱的。在刑讯室里，他揭露敌人推行"三光政策"的滔天罪行，皮鞭、老虎凳都没能使他屈服。敌人又用高官厚禄收买他，也未能动摇他的革命意志。在狱中，他抓住时机向难友们宣传中国必胜，日本必败的道理，鼓舞难友的斗争勇气。1944年6月，他被杀害在水泉沟老阳坡。

原迁(安)青(龙)平(泉)联合县三区区委书记李光(原名子春光)，1943年底在白道子村开群众会，因叛徒告密，遭敌围攻，在突

捕时被俘。经过敌人多次酷刑刑讯，始终坚贞不屈，后又转押到承德监狱，关进8号牢房，身戴18斤铁镣。虽然经受着各种严刑折磨，丝毫没有动摇他的革命意志。在法庭审判他的时候，他把法庭当战场，揭露敌人的罪行。最后，他同4名难友一齐高唱《狼牙山五壮士》歌，被敌人杀害在水泉沟。

八路军办事员王坤，是承德县刘杖子乡北台村人。1941年参加抗日工作，同年入共产党，担任八路军办事员，送信，转运物资，掩护八路军干部，坚持山区斗争3年多。王坤于1944年8月被捕，受到各种酷刑折磨，始终不屈服，与敌人舌战到底。经过8次刑讯，敌人一无所获，是年9月，他被杀害在水泉沟。

水泉沟农民潘德顺（男，1987年73岁）、李刚（男，1987年55岁）二人证实，有一年滦河修路，日军监工，一个13岁放牛娃报告八路军，八路军把日本军消灭了。日本鬼子找不到八路军，黑烟（日本人）带人把放牛娃抓到水泉沟，铺上旧炕席，开膛挖心，黑烟将其心生吃了。放牛娃被害后几天，日本人又从双塔山白庙子村抓来70多人，是用汽车拉来的，从上午一直砍到中午。

日本人杀人多在夜间干。当时住在水泉沟小潘家沟口北边平台上的十几户姓潘的人家都是日本侵略者残暴罪行的见证人。1984年6月至1987年12月，笔者走访他们的时候，他们提供了不少证据。高树芝、潘德顺、潘德树（男，1987年64岁）潘景荣（男，1987年65岁）、潘振魁（男，1987年64岁）、潘德森（男，1987年61岁）、徐桂英（女，潘德林妻子，1987年59岁）等几家老住户证实，从日本占领承德直到垮台，接长不短在这杀人。据伪满承德监狱看守和在此监狱坐过牢的人证实（旅顺监狱也有文字记载），夜间杀人是日本侵略者掩盖罪行的一种惯用手段。白天在狱中或在野外大批杀人容易激起中国人民更大仇恨，夜间杀人能避众人耳目。原日伪承德监狱警佐刘上元1964年交待，1943年日本宪兵和警察讨伐队由围场县抓来30多人，没判刑，夜间从监狱拉到水泉沟砍

杀了。他亲自参与了这次屠杀。

“卢沟桥事变”后，日本侵略者为了尽快将风起云涌的抗日斗争镇压下去，撕开了伪装的“王道治国”假面具，宪兵的肆意胡为代替了法律条文和检察裁判程序。原日本承德宪兵队副队长、特高课长、西南地区防卫对共调查班组长、宪兵少佐木村光明供认：日本宪兵队的主要职能是对中国共产党及其它反满抗日组织人员的侦察、逮捕和镇压。日本承德宪兵队是日本关东军西南地区防卫司令部的直属别动队。凡西南地区防卫范围的讨伐、扫荡、检举、逮捕、屠杀都由日本承德宪兵队直接指挥和参与。他从 1941 年 5 月至 1944 年 10 月在热河任职期间，指挥部下屠杀有 9223 人（不是完全的数字）。凡是部下检举逮捕的村武装班长以上的抗日分子，一律送交承德判刑（死刑或无期）处理，全是宪兵说了算。法院对被捕入狱的人判刑，不是完全依据法律条文量刑，绝大多数凭宪兵的送审裁定意见书。

宪兵杀人可以任意胡来，日军头目为了培养宪兵杀人胆量，随便拿中国人当靶子练。如 1942 年 4 月 15 日，日本承德宪兵队兵长植松梢薮，奉分队长永山中尉命令，在分队班长内田一平准尉的指挥下，进入承德监狱，将监禁的八路军第十三团某连战士 7 人从监号提出，在院内砍杀。又如，1943 年 3 月上旬，日本承德宪兵分队军曹特高系特务太田秀清，在内田一平准尉指挥下，同 20 名宪兵将承德监狱关押未判刑的 45 名地下工作者拉到水泉沟砍杀。以上 52 名被害者纯系锻炼新宪兵杀人胆量当活靶子而砍杀的。

日本侵略者将被抓来的人关在承德监狱，其残害手段主要有“断食空腹”、“倒栽莲花”、“电磨粉身”、“军犬舞蹈”、“肉滚绣球”、“枪刺沙袋”、“开膛取心”、“钢针刺骨”、“火烧活人”、“虾公见龙王”、“木桩勒马”、“电动绞死”，此外还有刀砍、枪杀、刑杀、虐杀等。其中常用的刑杀方法有上大挂、压杠子、灌辣椒水和火油、坐老虎凳、铁索鞭打、烧红的火钩子烫、竹板夹手指、背炭火炉跑步、身戴

10 多斤铁镣，做 10 多个小时重活等手段将人折磨死。

1942 年 5 月，因叛徒告密，宽城尖山子党支部全体党员被捕。刘天来、刘福均、徐付、刘福仁 4 人关进承德监狱，受绞刑牺牲。

原迁（安）遵（化）兴（隆）联合县六区区长刘握枢同志，唐山人，曾在丰润县车轴山中学任教，从事革命活动。1941 年担任区长后，在六里坪附近山区发动群众，建立武装，开展游击战争。1943 年 3 月，区长刘握枢、副区长胡永安、警卫员区小队班长刘生与区小队十几名战士，到兴隆县八拨子村帮助群众抢种，遭伪倒流水警察署署长常大伦带 100 多名警察（其中有 2 名日本人）包围。双方交火后，区小队和副区长胡永安突出包围，刘握枢和刘生被捕，从兴隆转押到承德监狱。敌人想从刘握枢口中捞到八路军情况，刘握枢半字不露，并且痛骂日寇在兴隆的罪行。

同年秋，敌人将刘握枢、六区干部依林二人一起从监号提出，当着众囚犯的面，凶恶的刽子手一刀一刀活剥二人肉。刘、依在碎割折磨中壮烈牺牲，遗体被抛在水泉沟。

"行刑于密行主义"，日本侵略者采用各种花样翻新的野蛮手段，达到制人死地的目的。承德监狱以"生活虐杀法"，造成了大批被监禁人的死亡。

在监狱中每人每天只给两顿饭，一顿稀一顿干，在夏天给点青菜汤，平时既无菜又不管饱，天天吃发了霉又苦又涩的红高粱，邪味熏人，难以下咽。监狱里的犯人没有一个不染病的，没有一个不患疥疮的。监狱也有医疗室，名义上给犯人治病，只叫病号多按手印，不给药吃，药费被贪污。监狱还成立"故衣组合"，扒卖死犯衣服。尤其对国事犯更加惨无人道，80%人带刑具。不服苦役时，白天都必须脸朝外坐着，稍微一动就遭皮鞭抽、铁棍打。夜里一个号睡 70 多人，挤的没法翻身。病号也不隔离，病死者没经看守允许不准移动。冬天室内冰冷，很多人冻饿而死。春夏秋季屋内臭气熏人，重病号在室内大小便，监号的卫生与厕所差不多。冀东军分区十三

团副政委廖峰(老红军)同志1944年5月18日在蓟县窜岭庙战斗中负重伤被俘,押解在承德监狱。在狱中,敌人妄图从他口中得到八路军和共产党的情况,实施各种酷刑进行折磨。廖峰同志视死如归,坚强不屈,同敌人进行坚决斗争,最后被折磨死,其遗体扔弃水泉沟老阳坡。

住在水泉沟小潘家沟口平台上的那十几户潘姓老人还证实,监狱里死人比在老阳坡砍的多好几倍。从监狱往老阳坡抬死尸,几乎天天有,少时一拨,多时三四拨,每拨两三个,有时十几个,全是在监狱里绞死的、病死的、电死的或折磨死的。刚开始的时候,尸体被放在事先挖好的坑里,铲几锹土一盖就拉倒。后来死人太多了,一个坑放好几个,几锹土根本遮不严,狼吃狗拽到处是死尸。

当时的水泉沟尸横遍地,处处白骨堆,满目凄惨荒凉,啄食腐尸的老鹰、乌鸦和长尾巴连子飞起来遮天蔽日,呱呱乱叫的声音,撕人心肝揪人肺腑,凡有良心的人身处其境无不落泪。高庙、头道沟、鹿棚子沟、柳树底、罗汉堂、狮子园、殊像寺、狮子沟等十几个自然屯和村的二三百条狗,长年在杀人场吃死尸,眼睛全是红的。大白天,狼群在杀人场附近撕拖尸体。农民下地干活,要持护身用具结伴而行,不敢单独外出。杀人场附近住户,经常从屋里和院中往外捡狗叼回来的人头、手、脚、腿和五脏。一到夏天,又腥、又咸、又臭的气味熏得人头疼。小南沟口(现在的水泉沟医院墙外东南角)有眼2丈多深的水井,年年夏天被雨水把骨头冲进井里须得掏井后方能吃水。有时候杀人多了,连河沟里的流水也被染红。

1945年11月,热河省召开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全体代表175人到水泉沟"万人坑"掩埋烈士遗骨。代表们走进墓区,抬腿落脚都会碰着尸骨,满山遍地全是白骨。人人泪下,女代表们放声悲哭,场景十分凄惨。代表们看尸骨太多,无法掩埋,便将净捡7000多颅骨堆成小山似的3大堆,挖了3个大坑,像垒墙那样,将尸骨掩埋。继代表们义葬之后,承德市政府组织群众用了5天时间到水

泉沟掩埋散落在露天的遗骨。因为散碎尸骨太多，难以捡净，直至今日在老阳坡还能见到裸露的残骸。人们来到水泉沟万人坑墓区，只要蹴蹴脚，就能露出50多年前掩埋的白骨。

承德街水泉沟"万人坑"，是日本侵略者屠杀热河人民的罪证，它已经成为向承德市人民进行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的阵地。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日本侵略者所犯下的滔天罪行。

我所经历的细菌杀人试验

张绍恩

日本帝国主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竟残无人道地把热河活人称作"木头"，进行细菌杀人试验，妄图进行灭绝人性的细菌战争。

我叫张绍恩，是日本特务，曾在热河北票炭矿台吉医院做过化验工作。我个人亲身经历和耳闻目睹的事实，足以说明日本帝国主义为了发动细菌战争，先用中国活人做细菌试验，残害死无数的中国良民，这的确是日本帝国主义欠下中国人民的一笔大血债！

1940 年 7 月，我从沈阳医学院毕业。因我在学校就参加了日本的秘密特殊组织，所以在毕业分配时把我作为特殊人员分配到北票炭矿的本部医院工作。这所医院是北票炭矿的中心医院，因医疗设备比较先进，基本是给日本人看病的。我到医院后，日本人把我分配到化验室工作，主要是熟习和了解日本医学派的化验常规，使之能更好的为日本人服务。

为了与日本特务机关取得联系，接受任务，我暗暗地做好了接头的准备。两周后的一天，我拿着学校发的两封特殊信件，递交给北票警察署。过了一会儿，我随着一个翻译官走进警察署的署长室。一个小个子日本人见我走进来，打个手势，叫我坐下。那位领我进来的翻译对我介绍说："这位是黑田先生。我姓赵，叫赵德生。以后我们是会熟识的。"这时，黑田站起身来，对我说："张先生，来了很好，现在分配在那工作？"。我说在炭矿本部医院，将来还要分配到台吉医院工作。黑田拍了拍我的肩膀说："好！您年轻有为，先熟悉熟悉情况，在这个地方好好干……。"随后，他又向我介绍了北

票的治安情况。我要走了，黑田拉着我的手说："张先生，半个月后您到我这再来一次，咱们详细地谈谈吧。"我回到家已经夜幕降临了。

半个月后，一天中午我又去了警察署。一进署长室，就着见黑田正坐在屋里等着我，翻译老赵也在一旁站着。这次黑田再三告诉我："等你到了台吉后，先熟悉一下矿上的情况，当前矿山情况很复杂，你要通过你的业务关系，注意一下八路军和共产党的情况，并要注意在和您接触的人物当中，发现可疑的行动和现象，随时有事向我汇报。"

就这样，我在局本部医院干了两个多月的化验工作，就把我调到台吉分院去了。

台吉医院，实际上是个门诊所。这里没有病床，只有两间观察室样子的房间，有时这里也住几个病人。当时，台吉分院有 1 名日本人当院长和 1 名日本事务长，还有日本护士 3 人。有中国大夫 3 人，护士四五人。其中有男护士 1 人，药房和事务人员各 2 人。日本人院长只给日本人看病，看病的地点在西边房间。而中国人看病只能在东边房间。

我到台吉医院两个月后的一天早晨，院长坂本把我叫到他的诊室，对我说："我打算作两次试验，请您帮忙合作。这两次试验：一个是将斑疹伤寒病人的血注到健康人的身上，观察病情和病人变化，由你帮助我打打针，还做些别的病情观察；另一项试验是把回归热病人的血注入到健康人的臀部肌肉上，然后再观察病情，必要时可作病理的切片。这次试验，由你替我作。必要的病理切片检查，由我自己来作。对这两次试验，将来我要写个论文，请你多加帮忙。"我当时点头答应了他的要求。1941 年冬季的一天下午，忽然，日本院长坂本领着一名士本护日急忙来到我的房间，叫我收拾一下立即跟他走，我跟他们照直走进了一个大院。原来，这个大院是日本人在台吉矿秘密设立的又一个变相集中营——"建国寮"。这

里住的都是从外地抓来的人。“建国寮”的四周都围着电网，日本兵把守森严。一进院，就感到阴森森的。住在“建国寮”的人集体上下班，统一行动，上下班都得有人看管着。

我们进了“建国寮”的一间小屋。坂本院长说：“快换衣服。”我们立即穿上胶皮靴子，戴上帽子、口罩、消了毒。然后，他们把我领到了另一间屋子里去。一进屋，我突然楞住了，只见1个中国矿工被3个日本人架着两支胳膊，硬被捺倒在一个墨黑色的铁床上。那人在呻吟挣脱着，一看就知道这是一个健康人。日本人管逼做试验的中国工人叫“木头”，这屋里已绑来十几名“木头”，被三四个持枪日本兵守着。

试验开始时，他们叫“木头”只穿着裤衩，被绑在柱子上、或床上。那个日本护士先从患伤寒病人身上抽血，每人抽5CC，然后再注射到健康人的血管里。就这样，一次就作了十几个人的试验。在这十几个人中，我作了四五个人，坂本作了两三个人。在回来的路上，坂本院长对我说：“这次试验很危险，在这被作试验的十几个人中，大部分人是要死了死了的”。

一连好多天，我看见坂本院长差不多每天都去“建国寮”，每天早晚去两次，是到观察室去观察被作试验者的病情和看化验结果。

几天以后，坂本院长又一次找我说：“今晚10点钟，你来我那里再帮帮忙吧。”10点钟我准时去了。这时，坂本正在事务室。我进屋后，他拉了我一下说：“走！跟我来！”他把我领到了他的诊室。一进屋，只见窗户遮得严严的，屋正中间放着一张手术床，床上躺着一个尸体，上面盖着一条白单子。我正惊慌呢，坂本对我说：“来帮忙做一下尸体解剖。”说完，我们俩就急忙地换上了衣服，开始了工作。还有个日本护士，在旁边帮忙。在手术中，坂本特别注意这个人的肝脏。只见他取了一片组织，放在了固定的溶器中。然后又把尸体包扎好，就洗手换衣服了。我想，难道这就是所谓的细菌研究吗？作完了手术，坂本对我说：“这个事，谁也不能说”。我哼了一声

就赶紧走了。

第二年春天，我帮他又作了一次试验。这次是在门诊室作的。这天大约9点钟，我进了门诊室，只见屋内有六个人。在这些病人中，有2个是患有回归热病症的，4个是健康的人。首先，坂本欺骗那几位有外伤的健康人说："这是一种新的治疗法，是特别有效的。"开始，我从2名回归热病人的身上，各取10CC的血，分别注入2名健康人的肌肉中。然后，再给那2名病人各打一针606，就叫他们走了。那4名健康人就留在观察室内观察。这次试验，都是我作的一般注射。三四天后，病人才开始发冷、发烧，体温由低变高，可达40度以上。这时，再作血涂片检查。我发现这次试验未发生症状变化。到第5天，我又从被注射人的局部取一小块肌肉组织，再作化验。这才发现，在4个人当中，只有1个人注射后发现了症状。我就取下了有症状变化的人的组织，交给了坂本院长。

那时，为效忠日本帝国主义，我还干过出卖"朋友"的罪恶勾当。那是1941年春。在和我接触的病人中，有一位姓马的工人。这个人是台吉井矿下的放炮工人。他身体不好，经常来看病，一来二去的我们俩就混熟了。他很热情、直率，有什么事都想和我说说，还有时请我到他家作客，并吃顿饭，渐渐地我俩就成为好朋友。

6月初的一天下午，我下了班，吃完饭，顺便又到他家中串门。他的家就住在离台吉医院不远的西南角上。我走进他家的院子，发现老马的老婆和两个孩子正在外屋吃饭。他老婆看我进来，就赶忙地让坐、问我吃饭没有？我说："吃过了。"然后，我就直接了当的问："老马出去了？"他老婆就提高声音说道："在里屋不知干啥呢？"我一进屋，猛然发现老马正慌慌张张地往床下推着什么东西。我看见他神色不对，就追问他说："老马，怎么了，倒腾什么呢？"他说："没啥，一个破广播匣子，修理修理。"我说："那咱们拿出来听听吧"。他听我这么一说，脸色有些变了，一面挡着我，一面用很低的声对我说："老弟，咱俩交情可不错呀，这回事你可千万不要和别人说呀！"

我哼了一声。他又接着说："这事你知道，心里明白，我就感恩不尽了。"我们俩又唠了一阵，我就回家了。

回来之后，我一连几天反复思考着这件事。想来想去，我为了给日本帝国主义效劳，还是决定给他告密了。第二天，我向警察署长黑田作了汇报。后来，我碰到了警察署的赵翻译，他对我说："那事你报告后不到半天，警察署就把那个姓马的抓去了"。又过了两个多月，赵翻译又告诉我，那个人已死在警察署了。

我家住在兴城，1942 年秋我父就来了一封信，要我回去自己开办一所医院。后来，我把父亲来信叫我回兴城的事告诉了坂本院长，又报告了黑田先生，还真得到了他们的许可。黑田对我说："这也好，在哪里不是都一样的效忠天皇。可是你走之前，要再来警察署一趟啊。"

过了几天后的一个晚上，我又去了警察署，黑田和翻译赵德生都在，黑田对我说："接关系的信都写好了。你到那里之后要好好的干，听你的消息。"我一看给我两封信：一封是给兴城警察署的；一封是黑田亲自写给兴城宪兵队浜田个人的。我装好了这两封信，就告辞回家了。直到 1942 年年底，我才把一切关系办理完毕，去了兴城，又在那里干起了为日本侵略者效劳的勾当。我不但亲眼目睹了日本侵略者用中国工人作细菌杀人试验，而且我在日本侵略者的豢养和怂恿下，也充当了帝国主义残杀中国人民的帮凶，成为人民的罪人和历史的垃圾。

注释：

据有关资料记载，日本侵略者占领中国期间，每年要把有五六百名称之为"木头"的中国活人作细菌杀人试验。而日本特务张绍恩的自供材料，只是日本侵略者伙同其走狗残害中国人民的一个小小的缩影。

（马德润整理）

令人发指的累累罪行

(日)植松犹戆

杀人

1942年4月15日黄昏前后,于热河省承德街东侧武烈河下游河畔,我以日本关东军承德宪兵队兵长的身份,奉分队长永山中尉的命令,将在伪承德监狱中的八路军第十三团某连25岁左右的战士7名,由牢房提出,用载重汽车运到武烈河畔,然后命被害者一个个跪在已经准备好的坑前,几名宪兵按照次序,用日本刀砍头,杀害了这7名八路军战士。跪在第3坑前的一名战士,被我用日本刀由背后砍头杀害,我并用脚把被害者的尸首踢进坑里。

1943年3月19日下午6时许,于热河省兴隆县兴隆街西南长城线茅山到黄崖关中间疏散的村庄道路上,日军承德宪兵队第二宪兵游击队生田大尉率领宪兵140名,按特高课长本村光明指示"在赤化地区,必须彻底的扫满荡清,不留一草一木"的方针,将未及躲避宪兵偷袭仍留在村里的病人、老人35名和吃奶孩子4名,共39名中国人全部屠杀。为消灭罪证,烧毁了被害者的尸体。我奉生田队长的命令,分队长水野军曹、高桥兵长、田中兵长、尾崎和我(兵长)5人,将村中星散房屋里的卧病老人和怀抱幼儿的妇女,强制拖出,领到山里狭窄路上,将他们两手用绳子绑上,命他们就地坐下,我用日本十四式手枪2支,枪杀了年45岁至60岁的妇女9名、60岁左右的老翁5名、2岁左右小女孩1名,共15名解放区抗日人民。其余24名,被同伙宪兵全部枪杀,并用附近的高粱秸和蒿草盖在被害者的尸体上,洒上油类,放火烧毁,然后逃离现场。在这次罪行中,我主动屠杀了15名无辜的和平人民和吃奶的孩子,并亲自动手将尚未死的被害者两三名烧死,犯了超过魔鬼野兽

的惨无人道的屠杀罪行。

1943 年 8 月 9 日前后，在热河省喀喇沁中旗七沟村东方——三道河子中间的山间，发现有中国人的零星房屋，我以承德宪兵队七沟派遣队扫荡系伍长的身份，不等派遣队长山田恒雄的命令，主动亲自跳进房屋，用日本马枪射击正在休息的两名 20 岁左右的八路军第十一团侦察战士，1 名在腹部，另 1 名在大腿关节上，受了贯通重伤。还逮捕了惊慌欲逃的户主，他是 60 岁左右的老翁。我用劈柴的斧子砍他的背部，使他受了重伤，陷于濒死状态。然后，我和增援的同伙冲野伍长、竹田伍长等一起，按派遣队长山田恒雄的命令，把濒临死亡的战士和老翁共 3 名，拖到屋里，使他们躺在炕上，用易燃的家具压在被害者身上，随后用高粱秸放火烧房子，将他们一并烧死。当时，被害老翁 18 岁和 20 岁左右的女儿和一个婴儿共 3 名，被我的同伙捆绑，失掉自由。因为我和其他宪兵烧了房屋，杀了人，她姐妹俩在燃烧的房子前，哭泣着反抗宪兵。我想把这两名妇女和小孩也杀害掉，当用手枪正要射击时，因派遣队长的命令而未遂，遂将一名妇女(妹妹)衣服剥去，让其裸体，用棍棒殴打。对抱小孩的妇女(姐姐)也拳打和脚踢，且大声说："对靠近八路军的，就这样处分！"强制把这两名妇女由现场赶走，使她们失掉了房屋和生活中的一切。我们便逃离现场。还从两名侦察战士身上，掠夺了抗日传单 50 张左右，信件、手榴弹 10 数个和布提包 1 个。

1943 年 8 月 19 日上午 10 时前后，于热河省喀喇沁中旗七沟三岔口村入口。当时我是承德宪兵队七沟派遣队扫荡系伍长，奉派遣队长山田恒雄的命令，将上一天即 8 月 18 日夜间被我们宪兵逮捕的居住在三岔口的 2 名中国抗日农民(35 岁左右)拉到该村入口，在 200 余名的村民面前，威吓说："你们看，这是援助八路军者的结局！"我用日本刀，将两名抗日爱国农民杀害了，并强迫村民把尸首埋在村前的田地里。我为了想实验自己日本刀的利钝，主动向派遣队长请求，亲自砍杀这 2 名被害者，犯下了罪行。

1943年9月7日前后，于热河省七沟村东南承德县和喀喇沁中旗的县、旗境界山峪，我以承德宪兵队七沟派遣队的扫荡系伍长的身份，在游击扫荡中，在山麓岩石角发现脚上负伤的八路军战士1名(年25岁左右)，向派遣队长山田恒雄报告，在还未下来命令的情况下，我便用日本马枪对该八路军战士射击2发子弹，被害者的头部被子弹贯穿，当场死亡。将尸体遗弃，逃离现场。

1944年6月14日前后，于热河省平泉街关东军热河特别警备队平泉派遣队后院马厩前，我以代理派遣队长军曹的身分，对部下逮捕的抗日爱国农民刘贵(40岁左右，住热河省喀喇沁左旗三十家子村)使用灌水、过电和殴打等刑讯。被害者顽强地抗拒供述抗日救国会的组织，我又施以非刑，审讯到1个小时半左右时，由于我的残酷刑讯，被害者气绝身亡。

参加和执行集体屠杀

1943年4月17日到同年5月1日前后，于热河省兴隆县茅山村西南长城附近，游击进攻中的承德宪兵队兴隆派遣宪兵约70名，在水山茂通指挥下：4月20日前后，于兴隆县茅山西南长城线山峪，和八路军部队遭遇，进行攻击，用轻机枪和步枪一齐乱射，枪杀了八路军战士30余名和抗日爱国农民10余名。我以步枪手的身份，参加了这一罪行，并用步枪枪杀抗日农民三四名。4月29日，偷袭兴隆县茅山西北某村零散的房屋，轻机枪和步枪一齐射击，枪杀了抗日农民20名。

1943年5月到6月上旬，于热河省喀喇沁中旗南榆树林子村周围的半解放区村庄，由承德宪兵队第二游击队生田大尉指挥的宪兵约150名的游击行动如下：

5月15日拂晓于热河省喀喇沁中旗南榆树林子村北方5公里的山峪村庄，偷袭抗日爱国农民的房屋，轻机枪和步枪一齐射

击，枪杀了正躲避枪弹的农民 15 名，我以扫荡系员伍长身份参加了这一罪行。

5 月 18 日前后，于喀喇沁中旗南榆树林子村热水汤附近，偷袭零散的中国农民的房屋，用步枪射击，枪杀了试图逃难的抗日农民 6 到 7 名，并逮捕了 6 名，刑讯后杀害了。我以扫荡系员伍长身份，参加了这一罪行，协助扫荡分队长池田军曹，主动对被捕者灌水、殴打刑讯，将其杀害。

1943 年 7 月下旬，在热河省喀喇沁中旗七沟村，承德宪兵队七沟派遣宪兵队山田曹长等约 25 名，行动如下：

9 月下旬，于七沟村以东承德县和喀喇沁中旗的县旗境界，以夜间潜伏的方法，逮捕八路军战士，袭击了通过县境的八路军某连战士约 40 名。战斗约 2 小时，打死八路军战士 3 名，逮捕 8 名，约一星期后，送交伪承德热河特别治安庭杀害了。我以扫荡系员伍长的身份参加了这一罪行。

11 月上旬前后，于七沟村西南三叉口附近，偷袭抗日农民的房屋，逮捕了农民 3 名，用殴打和灌水等刑罚杀害了。还逮捕了正在该房屋休息的中共承平宁县政府宣传员、中国共产党员白玉林，当日送交伪承德热河特别治安庭，处以死刑。我以扫荡系员伍长身份参加这一罪行。

逮 捕

1942 年 4 月 17 日到 4 月 30 日，承德宪兵队兴隆派遣队准尉内田一平等约 30 名：

4 月 17 日，偷袭兴隆县兴隆街西南 5 公里的农民房屋，逮捕了抗日农民约 80 余名，殴打、灌水刑讯后，将 20 余名送交伪兴隆法院下狱，余者经刑讯释放。我以扫荡系员增援宪兵兵长的身份参加了这一罪行。

1943 年 3 月 25 日前后，于热河省兴隆县西南茅山村至黄崖

关间，承德宪兵队第二宪兵游击队生田大尉等约150名，为了分离八路军和抗日农民，补充建设对苏军事基地、构筑阵地所需要的劳动力，逮捕解放区的农民。采取守候、偷袭和盘查等办法，将在房屋里的、行路的或正进行耕作的农民，一律逮捕。继续进行一个星期，共逮捕200余名，大部是青年农民。他们被押解到兴隆，后经由承德送往东北某地。我以扫荡系伍长的身份，参加了这一罪行。

1943年5月到6月，承德宪兵队第二宪兵游击队生田大尉率领的宪兵150名，对中共承平宁县政府属下的抗日农民，用潜伏偷袭和其它方法，逮捕了居住在南榆树林子周围村庄有组织的农民约350名(男子，年龄25岁到50岁)经殴打，灌水和过电等刑讯后，将与抗日救国会有关的50余名送交伪承德特别治安庭。我以扫荡系员伍长的身份参加了这一罪行。

1943年10月至11月下旬，驻热河省喀喇沁中旗七沟村的承德日本宪兵队七沟派遣队，山田曹长等约25名，在伪军约200名的增援下，对事先已经查明的七沟村周围村庄抗日救国会会员，连续进行了大逮捕，共逮捕约200名，其中70名送交了伪平泉热河特别治安庭下狱。我以扫荡系伍长的身份，担任伪军(约25名)的指挥班长，亲自逮捕了20名。

1943年11月下旬，于热河省喀喇沁右旗五家村和七家村，承德宪兵队坂元中佐指挥宪兵70名和伪警察30名，逮捕了中共地下抗日组织的农民约150名，在当地就进行了殴打和灌水等刑讯。在百岛伴治郎中尉指挥下，将抗日救国会员约20名送交了伪赤峰热河特别治安庭，其余者命五家村和七家村的伪村长取保后释放。

放　火

1942年4月17日，于热河省兴隆街西南5公里零散的村庄，承德宪兵队兴隆派遣队内田准尉指挥的宪兵约30名，在该地区游击侵略，以八路军部队宿营地为由，放火烧毁了零散的房屋约70

余户。我以扫荡增援宪兵兵长的身份参加了这一罪行。

1942年4月21日前后，在热河省兴隆县西南茅山、黄崖关附近，承德宪兵队兴隆派遣队内田准尉率领宪兵约30名，在该地区游击侵略，将认为有八路军利用危险的农民零散房屋约50余户放火烧毁。我以扫荡增援宪兵兵长的身份参加了这一罪行。

1943年3月19日，游击侵犯热河省兴隆县西南长城线山峪的承德宪兵队第二宪兵游击队生田大尉率领宪兵150名，偷袭了上述长城线山峪零散的解放区农民房屋，先逮捕杀害其家人，随即放火烧毁其房屋，共烧毁了约有40户。我以扫荡系员兵长的身份参加了这一罪行。

1943年5月至6月，驻热河省喀喇沁中旗南榆树林子村承德宪兵队第二宪兵游击队生田大尉率领的宪兵150名，根据承德宪兵队长坂元正"对赤化地区须彻底扫荡"的命令，在热河省喀喇沁中旗一带，对因农耕不便和反对强制并村而未搬家的抗日农民的房屋，放火烧毁，使100余户的房屋化为灰烬。我以扫荡长的身份参加了这一罪行。

1943年9月至11月，承德宪兵队七沟派遣队山田曹长率领宪兵25名，奉承德宪兵队长坂元正的"将七沟村一带不向并村地迁移的抗日农民的零散房屋放火烧毁"的命令，在两个月期间内，将七沟村四周的抗日农民约200余户的房屋，全部放火烧毁。我以扫荡分队长的身份参加了这一罪行。

强 奸

1943年12月中旬，我以承德宪兵队八里罕派遣宪兵队伍长的身份，在热河省喀喇沁中旗八里罕村，为了满足自己的兽欲，命部下宪补汉奸黄希坚，以欺骗和金钱诱惑手段，将居住八里罕村的年30岁左右的中国妇女某，领到八里罕派遣宪兵队，我进行了强奸。

情报工作

1943年11月下旬至1944年2月，我以热河省喀喇沁中旗承德宪兵队八里罕派遣宪兵队长的身份，指挥部下6名，对中共承平宁县政府八里罕地区抗日的中国农民进行户口调查和抗日活动情况调查，并搜集其他一切有关的情报，报告给平泉宪兵分遣队长木下万寿，木下万寿分遣队长于1944年1月21日在八里罕地区逮捕了抗日中国农民约250名，其中15名被处死刑和杀害、病死于狱中。

掠夺

1943年10月中旬，我当时是承德宪兵队七沟派遣宪兵队扫荡分队伍长，在热河省喀喇沁中旗七沟村东南某村庄用手枪鸣枪威吓，逼迫两名放牧的农民逃走，掠夺了留在该地村庄前丘陵上的约50只山羊，送交派遣队长山田曹长。

1944年3月下旬，我任承德宪兵队本部特高系伍长，与本部特高系主任原曹长等几名宪兵一起，以逮捕八路军工作员为目的，夜间潜伏在热河省承德县下板城村入口处，鸣枪威吓，将从河北赶着200头耕牛从事贸易到承德县下板城来的中国农民逼走，掠夺了全部耕牛，并委托下板城村伪村长某将牛卖掉。此事向西南防卫司令官安藤忠一郎作了报告。

1943年5月至6月，驻热河省喀喇沁中旗南榆树子林村的承德宪兵队第二宪兵游击队生田大尉等宪兵150名，从上述村庄的农民手中掠夺了可供150人食用一个月的副食品——肉、蛋、蔬菜，掠夺的东西很多。我当时是扫荡系伍长，参加了抢劫行动。

摘自《东北"大讨伐"》

毛泽东与承德

邓一民

毛泽东虽然没有来过承德，但与承德却有很深的历史渊源。据我所知，在历史转折的严重关头，毛泽东曾经三次把他那深邃远大的伟人目光，投注到承德大地上。

一 项 决 策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开始了日本帝国主义欲灭亡中国的全面侵略战争。在这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严重关头，毛泽东把他那战略家的目光，第一次投注到承德及其雾灵山附近地域，并且提出了发动以雾灵山为中心的冀热边抗日游击战争的伟大战略决策，为冀热辽抗日根据地的开辟和巩固，为抗日战争胜利后八路军迅速占领热(河)察(哈尔)两省和东北，走出了一招妙棋。

中日全面战争爆发后，日本侵略军长驱直入，国民党军队则节节败退，不及一月，平津及华北许多重地相继沦陷，中华民族危机加深。在这种形势下，毛泽东高瞻远瞩地看到，日军在前方狼奔豕突，后方则显得十分空虚，并且随着日军向中国腹地的不断推进，这个矛盾也就愈将突出。因此，毛主席、党中央决定开辟敌后抗日战场，在日军最虚弱的地方给敌以致命一击。这样，毛泽东自然而然的就把目光投向日军的战略后方，所谓满洲国西南边境地区的承德大地，特别是投注于雾灵山附近地区。在卢沟桥事变刚发生后的8月4日，毛泽东、张闻天就致电周恩来、朱德，提出："依现时情况，红军应出三分之一兵力，依冀察晋绥四省交界地为中心，向着沿平绥路西进及沿平汉路南进之敌，执行侧面的游击战，另以一部

向热冀察边区活动，威胁敌后方”。同日，周恩来、朱德复电毛泽东、张闻天，同意发展冀热察的抗日游击战争。5日，毛泽东、张闻天再电周恩来、朱德，重申了开展冀察晋绥敌后游击战争的部署，并明确提出要“派一部远去热河”，发动与开展冀热边区的抗日游击战争。这就是关于开展冀热边抗日游击战争的最早的三封电报。

同年8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陕北洛川举行扩大会议，历史上称为“洛川会议”。会议根据毛泽东关于“红军可出一部于敌后的冀东，以雾灵山为根据地进行游击战争”的提议，正式确立了开展以雾灵山为中心的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决策。不久，又决定派中共河北省委书记李运昌速回冀东，作冀热边抗日武装大暴动和创建雾灵山抗日根据地的准备。1938年2月9日，毛泽东致电八路军总部指出：“雾灵山之中心区域有广大发展前途，且具独立作战区域，派去的部队须较精干，且不宜过少，军、政、党领导人员有独立应付环境之能力，出发前须做充分准备。”还指出：“应准备到适当发展阶段，派高级领导人去雾灵山。”这就不仅是这个战略方针的提出和确立，而是具体实施了。当月30日，八路军总部派出以邓华为司令员兼政委的八路军第十一支队，先行开辟平西根据地，做挺进雾灵山的准备。4月底，又派出以宋时轮为司令员兼政委的第十二支队，由雁北开赴平西，准备向雾灵山区挺进。5月中旬，第十一、十二支队奉命组成八路军第四纵队（亦称宋邓纵队），并于6月初，率5000多抗日健儿，从平西斋堂出发，浩荡东征，700里驱15日，直捣敌后的承德雾灵山区。

在日军南逼武汉，西进黄河，大半个中国沦于敌手的形势下，八路军5000多抗日健儿向日军的大后方挺进，实在是中国抗日战争史上的一大壮举。当时，在日伪重兵把守的京东大地，红旗飘舞，战歌嘹亮：

“战鼓连天响，战号频吹，决战在今朝，我们抗日的先锋军，英勇的武装上前线，用我们的刺刀、枪炮、头颅和热血，坚决与敌决死

战。”

八路军第四纵队一路克昌平，破永宁，攻四海，设伏沙峪，势如破竹，所向披靡。6月17日，激战兴隆。7月，配合冀热边20万人的武装抗日大暴动，使以雾灵山为中心的整个冀热边区，到处成为起义军的天下。日伪军惊呼：“延安触角伸进满洲，打乱了满洲的秩序。”毛泽东则亲自发来贺电，祝贺抗日大暴动的胜利。自此以后，冀热边的抗日游击战争便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

一张地图

1939年初的一天，在延安的窑洞里，毛泽东主席和肖克将军在亲切交谈着。

肖将军说：“主席和党中央派我到冀热察去，我很高兴。别的要求没有，我就要一份热河图。因为我没去过那里，只能找地图，查资料，看材料。”

毛主席问：“参谋部有几份地图？”“有两份，一份二十万分之一的，一份五十万分之一的。”肖克早已与滕代远参谋长把这事了解清楚，就毫不犹豫地回答。

“军委有一份五十万分之一的地图就行了，你把那份二十万分之一的拿去吧。”毛主席爽快地回答。

就这样，肖克将军带着这张毛泽东亲自给他的热河（承德）地图，跋涉千山万水，由延安来到敌伪深远后方的冀热察地区，建立了冀热察挺进军和冀热察军政委员会，由他任司令员兼书记，并领导平西、平北和冀热边广大人民群众，进行了艰苦卓绝地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建立并巩固了包括雾灵山在内的冀热察边抗日根据地。

肖克将军在回忆这段历史时曾说：“1938年8月，冀东大暴动两个多月后失败了。我们要发展冀热察，要从头搞起呀。察哈尔呢？地方虽然大，没有党的组织，没有我们的群众基础，热河也没有。但经过这两三年，平西地区巩固了，平北根据地建立了，冀东有了大

发展，跃过长城，来到热南，又到宁城、平泉、叶柏寿之间，东面到了辽宁兴城的西部。这样就在冀热辽边区形成了大块抗日根据地”。

“这样又经过一年多，又有发展。好！日本投降了。张家口、承德、赤峰在苏军的配合下，我们自己的力量加上苏军的力量，把这里解放了。热河、察哈尔都归我们了嘛！李运昌、曾克林他们首先带着队伍出关到沈阳。我们喊口号喊了好些年了：‘打回东北去！’首先到东北的是谁呀？八路军！李运昌指挥的队伍，是我们冀热辽的队伍嘛！”

“热河、察哈尔是我们的，我们斗争了8年啊！我们冀热辽的斗争，那真艰苦啊！是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和军队打出的天下。可是，蒋介石这个家伙呢，坐在峨眉山上要下山来收复失地。他不去从日本手上收复失地，他要从八路军的根据地收复失地。美帝国主义就帮助蒋介石来抢我们的地盘，抢热河，抢察哈尔。美国有个‘飞虎将军’陈纳德，指使空军运送国民党军队，还有美国的海军也帮助蒋介石运兵到东北。派了一个机械化的十三军，一共4个师：第四师、五十四师、八十九师，还有一九五师，是五十二军的。哎呀！一下子从锦州向前进攻……”

肖克将军带着毛主席给的那张热河地图，不仅指挥了冀热察边的抗日战争，还于1945年11月来到承德，亲自指挥了反对国民党进攻热河解放区的承德保卫战和五月战役，对承德人民是有功的。

其实，毛泽东把他的目光第二次投向承德大地，不光是一张地图，而是又一个重大的战略决策。早在1945年4月召开的党的“七大”会议上，毛泽东英明地预见到日本帝国主义垮台的日子不远了，他高瞻远瞩地提出了争取东北的战略任务。他说：东北是特别重要的，如果我们把现有的一切根据地都丢了，只要我们有了东北，那么中国革命就有了巩固的基地。当然，其他根据地没丢，我们又有了东北，中国革命的基础就更巩固了。

稍有战略眼光的人不难看到，要想控制东北，必先控制作为关内外通道的热河、察哈尔两省。所以，毛泽东把他的目光投注到承德大地上来，也就是很自然的事了。在重庆谈判中，国民党作为一个谈判条件，要求中共军队撤出承德，毛泽东、周恩来当仁不让，不仅不撤出承德，反派出杨（得志）苏（振华）纵队、赵（尔陆）韩（伟）纵队、黄寿发纵队和后来在热河、冀东成立的黄（永胜）朱（涤新）文（年生）纵队、詹才芳纵队等 5 个纵队（相当于军），共十五六万人的大军，聚集承德及其附近地区。当时，党中央还曾酝酿把党中央、中央军委所在地，由延安迁往承德，这是因为承德是当时由共产党控制的两个完整省份的省会城市之一（另一为张家口）。只是后来由于时局的迅速变化未能实现，改派中央工委去了平山县西柏坡。由于这一改变，毛泽东、周恩来在重庆致电刘少奇，指示在承德成立冀热辽中央局，扩大冀热辽军区，由李富春任书记，林彪任司令员，这就把承德摆到了全国战略中极为重要的位置上来了。后来，由于东北局面迅速打开，张闻天、高岗、李富春、林彪等中央领导人，相继经承德山海关去了东北，中央遂将冀热辽中央局改为冀热辽中央分局，由程子华任书记、肖克任司令员。这样，承德先后输送 10 万大军，2 万多干部到东北，胜利地完成了它所肩负的争夺东北的战略使命。

一 条 按 语

不应讳言，全国解放后，承德在许多方面的政绩平平，没有引起毛泽东的特别关注。但是到了一九五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毛泽东突然对反映承德县朝梁子村农业合作化情况的《所谓落后乡村并非一切都落后》的一篇文章发生了极大的兴趣。他面对全国农业合作化运动一波三折的形势，内心不无激动地大笔一挥，写道：

“在中国，对于许多人来说，一九五五年可以说是破除迷信的一年。一九五五年上半年，许多人对于一些事还是那么样坚持自己

的信念。一到下半年，他们就坚持不下去了，只好相信新事物"。他在一口气列出十三种反对办社的理由后说："如此等等，还可以列出许多。总之都是迷信。这些迷信，经过一九五五年十月中国共产党第七届第六次中央全体会议（扩大）的批判以后，统统都打破了。""这件事给了一切共产党人一个深刻的教训：群众中蕴藏着这样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为什么在许多领导机关、在几个月以前居然没有感觉到，或者感觉的那么少呢？以此为教训，那么，今后对于有相似情况的事件和问题，应当怎样处理才好呢？回答只有一句话，就是不脱离群众，要善于从本质上发现群众的积极性。"真是痛快淋漓，入木三分啊！

毛泽东的这个按语，是发表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上的，并没有署名，而是以"编者按"的形式出现的。这本书上的编者按都是毛泽东写的。但这件事没有发过党内文件，所以下边不知道。"文革"中，造反派曾到中共承德县委造反，批判县委领导"扣压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重要批示。"其实，这应该属于不知者不怪的事。

据了解，那篇反映朝梁子村农业合作化情况的文章，是深受承德人民怀念，当时任中共热河省委委员、秘书长的王克东同志经过调查研究后撰写的。标题是毛泽东改写的。我与克东同志曾经多次讨论热河和承德的许多重大历史问题，却忘记了把毛泽东写的这个按语事问个究竟。现在，克东同志已经与世长辞，要弄清这件事就更难了。想来这也是一件很遗憾的事。

谈热河的抗战历史

李运昌

（一）

“九·一八”后不久，热河即在国民党不抵抗政策下被国民党省政府主席汤玉麟丢了。此后，热河省650万人民便过着亡国奴的生活。中国共产党为拯救人民于水火，在热南兴隆、青龙及冀东迁安一带进行地下工作，鼓舞与组织人民进行抗日斗争。1933年长城抗战时，中共冀热边特委即组织人民武装，由李子光、高机先等同志领导，协助抗日部队，进行英勇抗日战争。国民党“敦睦邦交”出卖了长城抗战。订立《塘沽协定》后，冀东成立了以殷汝耕为首的“防共自治政府”，抗日人民曾几次发动游击战争，反抗卖国贼汉奸政府。1934年热河抗日志士黄花川人孙永勤组织数千人起义，转战承德、兴隆、青龙、遵化之间。平泉北青龙一带群众亦组织红枪会举行起义，两次起义虽均为敌伪及卖国贼破坏先后失败了，但给人民一个游击战争的锻炼。

（二）

“七七”抗战开始，热河抗日工作又活跃起来，王平陆同志在1938年元旦组织了冀东抗日游击第一支队，活动在长城线遵化、迁安及青龙、兴隆之间，一度攻克青龙之青河沿，王平陆同志在战斗中牺牲。后该部由彭夫、高振东率领，攻克兴隆药王庙敌伪据点，热河民心为之一振。

至 1938 年八路军邓(华)宋(时轮)纵队，由平西挺进冀东，热河共产党在兴隆组织了 800 余人的起义，到处响应八路军。当八路军攻入兴隆，东进滦河时，因河水暴涨，乃转战滦平、丰宁，屡挫敌寇，连克延庆、永宁、四海，直捣大阁、丰宁等广大地区。滦平沙峪一战歼灭敌 1 个大队，夜袭花盆，消灭伪满军三十五团 1 个营，成立了丰滦兴联合县政府曾任张家口市长的杨春圃就是该县第一任县长。邓宋纵队回平西后，留下陈群、包森、赵立业 3 个支队坚持热河抗日游击战争。

1940 年 3 月及 5 月，肖克将军指挥下之八路军第七团、第十团进入热河，沙塘沟一战，击溃伪满军 1 个营，连克琉璃庙子、白马关、五道营子、八道河子，袭击大阁、虎什哈，建立丰滦密联合县及滦(平)昌(平)怀(柔)办事处，此时平北游击一支队，亦进入黑河，攻克千家店、东卯镇、杨木栅子、二道川等据点。8 月，七团挺进丰宁及围场西部。

敌人见我军声势浩大，说："延安触角伸进满洲国""八路军扰乱满洲秩序"，急从通化、吉林、锦州调集重兵"围剿"。一场恶战之后，我主力一部退平西，十团及游击支队仍在原地坚持。敌伪 6000 人自北向南压缩丰滦密，"扫荡"达 76 天之久。在马家峪，我军与铃木大队之两个中队激战 1 个昼夜，歼其 1 个中队，击退敌人的进攻。同年 9 月，周治国同志领导青平工作团及青平支队深入平泉活动。刘汉臣同志等在都山进行秘密抗日活动，发展抗日会员千余人。从此，热河又燃起了抗日的烽火。

1941 年 6 月，敌寇对冀东大"扫荡"后，冀东区党分委及军分区，决定以"全力开辟热河"。9 月间，派出大批干部，2 个主力团。为避免敌人发觉，部队化整为零，以排为单位活动，冲破数层封锁线，北越长城，踏入热河。包森指挥下之十三团进入承德以南雾灵山以东地区；曾克林指挥之十二团进至宽喜公路地区。部队自携粮款，买粮而食，或发给粮票，定期收回，对人民秋毫无犯，受到热南 40

万群众热烈欢迎，某些下层伪职员也不向敌人报告。在群众拥护下，很快把雾灵山滦河之间打通，接着又开辟了都山与滦河之间地区。如此使都山以西、雾灵山以东广大地区数十万人民首先得到解放，使热南与冀东解放区接连起来，形成冀热边抗日根据地。

（三）

1942 年 5 月，冀东八路军以 4000 兵力进行热河战役。在 1 个月之内攻克敌伪据点 13 处，越过锦热路北，建立承（德）平（泉）宁（城）联合县，当地群众曾组织红枪会，配合我军作战。许多群众见了中国军队都感动得流下眼泪来，哭诉十几年遭受敌伪残害的痛苦。他们说："中国还没忘了我们哪"！青龙钟响沟一带群众组织数百人，进行抗日武装斗争，兴隆黄花川、黑河川、横河川等地还组织了民兵，配合我军作战。

这一年，热河抗日工作得到极大的发展。承德、平泉、兴隆、宁城与凌源、青龙、绥中大块山地连接起来，并与冀东连成一片，构成冀热辽解放区的重要部分，使敌人大为震惊，认为"延安触角深入热河，全热河行政无法行使"；八路军与群众联系好，必须采取"民匪分离"，制造绝缘体消灭八路军。于是，将统治东北对付东北抗日联军的野蛮手段拿出来，由伪满各地抽调倾国兵力在热河实行"集家并村"，首先在长城内外各 15 里，普遍集家，企图造成封锁线阻止冀东八路军北上。敌人在实行"集家"政策时残暴之极，人民痛苦难以形容。

1943 年春，我主力由热河回到冀东恢复被"蚕食"的地区，敌人便乘机以优势兵力"扫荡"热南解放区。由绥中到雾灵山，在锦热路南广大地区实行全面的"集家并村"，造成 700 里的"无人区"。驻承德的日军"西南防卫司令部"及"满军热河军管区"，经常指挥热河及锦州伪满军 2 万余人向我进攻，企图隔离与消灭我军。制造的"无人区"名为"无住禁作地带"，敌将这些地区的人民驱入"人圈"，

原房烧毁，不许存留一人，如一旦发现有人，当即杀死。我军为解放人民，与敌激战，在王厂沟消灭关东军1个中队，我十三团一营教导员薛辉荣战死；并一度攻克宁城，消灭黄土梁子全部敌伪，摧毁附近伪警察所。敌人调集关东军，向我进攻，我军转至外线。秋末冬初，冀东我军曾三路前来增援，在热河进行反“集家”斗争，予敌人以重大杀伤。

（四）

至1944年，热东、热南及辽西峰峦千里的土地上，展开了历史上所罕见的“扫荡”与反“扫荡”，“集家”与反“集家”，割青与反割青的激烈斗争。敌寇所制造之“无人区”及“集家区”东西长700里（从绥中至滦平、丰宁，南北宽250里，面积17.5万平方里），包括8县地区（从长城到锦承路北），伪热河省400万人口，约有105万人被驱入“人圈”。人民大批饿冻而死，青年妇女大多数被奸污，青壮年送东北当劳工。敌人还进行思想检查，稍有抗日嫌疑或与八路军有关系者，即被枪毙。青壮年常逃至山中，而敌人则由山顶、山腰、山下三层一齐搜山，见烟火即前往抓人。因此，许多人为了生存参加我军，反对进“人圈”。有的地方，反对修“人圈”，敌修我拆，连续5次之多。

热河北部我新区之建平、围场、赤峰地区，敌寇亦实行“集家”，我第三区队仍活动于朝阳以西至围场600里的地区。1944年春，敌人以2万兵力向我“扫荡”进攻，我军所至，敌人“集家并村”，我军经过地区，敌人就在那里杀人。我军在冰天雪地之中没有粮食，没有住处，长期在山洞里或松林下睡觉，经常忍饥挨饿。一次大雪，冻坏了二三十个人。有好多干部和战士的手都被冻坏了，脚趾也冻掉了。而敌人依仗汽车（热河有2万里的汽车路）和电讯联络，依靠据点，经常以优势兵力向我进攻，我战士干部伤亡500余人。第三区队长苏然（高桥）同志也在宁城地区反“扫荡”中牺牲了，部队不

得不暂时从承平宁地区撤出来。当时伪满洲国各地开庆祝大会，宣布“热河八路军已肃清”。

我军撤出锦热路北后，敌人即在我军曾经活动的地区进行残暴镇压，组织“挺进队”、“义勇队”、“搜索队”搜山清乡，并进行思想检查。在锦热路南，则成立“人圈”反动武装，只青龙一县就发枪6000余支，并实行“绝粮政策”，困毙“无人区”人民。庄稼未熟时，实行割青，不让人民收粮，以免接济八路军。已完成集家的“无人区”一片荒凉，野草一丈高，野兽乱窜，家猪变成野猪，家鸡变成野鸡，人民无法生存，曾几次暴动。不愿进“人圈”的人，逃至山洞，过着野人的生活为避免敌人捕杀，不见生人（敌特常伪装我军到山里抓人杀人）。在兴隆“无人区”，曾有一家5口人3年未见生人。女人在冰天雪地中生了孩子，起名“冰儿”。在有民兵的地区，如黑河川、羊羔峪、八仙桌子、偏堂等，敌来即打，为保卫家乡群众，不怕牺牲。兴隆西南大水泉村民兵，与敌人顽强战斗，不让敌人进山。为救济“无人区”群众，冀热辽行署和部队每年在冀东募集大批衣服、食盐、日用品，并把老弱迁移到遵化北部及渤海边，留下青壮年坚持“无人区”斗争。

这一年，冀东部队曾几次出口打击热河敌伪。只要一去，热河人民即冒生命危险，在“无人区”盖房挖洞，准备粮食锅灶，欢迎我军，并掩护伤病员。他们和部队住在一起，组织了村政委员会，过集体的生活。敌人烧了房子，他们又盖起来，有的地方（如兴隆驴儿叫村）烧与盖斗争反复达18次之多。由于敌寇强大而残暴，故这一年我军民损失很大。承德、兴隆南部到敌人投降时，只剩千户人家，每家仅剩下青壮年二三人，老年人都在苦难中死了。他们始终坚持斗争，有的老者临死尚嘱咐孩子“无论如何不进‘人圈’，八路军一定有办法。”于是，青年们都变成了民兵，妇女们也拿起枪来战斗。这样使“无人区”成为解放全热河的桥头堡垒，成为热河抗日斗争中的中坚力量。

（五）

1945年，在毛主席"扩大解放区"的号召下，我们的武工队于2月携带布匹及其他日用品进入热河。6月，又组织了大规模的扩大热河解放区的战役。我军由冀东出发，分三路出击：十六分区部队由东路打到朝阳、绥中；十五分区部队由中路打到青龙、宁城；十四分区部队由西路自五龙山打到隆化、围场。从6月20日至30日10天中，攻入、逼退据点及"武装部落"19处；中路部队进抵锦热路上谷车站，包围城市。各部所到之处，首先解放"人圈"，分掉敌人仓库存粮给民众。这一次行动使敌人手忙脚乱，伪满由各地调来大批兵力，向我进攻。我军在6、7、8、月3个月，每天全是行军作战，很少休息。情况的紧张，生活的艰苦，简直令人难以想象。围场我军1个支队战斗到最后，因疾病伤亡减员只剩1个连的兵力，但我军仍克服一切困难，坚决执行"扩大解放区"的任务。这一战役尚未结束，恰好苏联对日宣战。我军在朱总司令命令下，一齐向热河敌伪猛攻，解除伪满十一团、十七团、二十团、八团、二十四团及15个讨伐大队的武装，收降青龙、兴隆全部伪军，并与苏军配合解放全热河省。我军单独解放的县城有：兴隆、青龙、建昌、建平、隆化等。赤峰方面，有共产党员王逸伦从1942年以来即在那里进行地下工作，于苏军进林西后组织游击队，配合苏军解放赤峰。北票是我们组织工人起义，配合苏军解放的。承德、朝阳等地亦均由我配合苏军解放。

总之，热河的解放，我们付出了很大代价。共产党、八路军与人民生死与共，并肩苦战13年。据不完整统计，我军政干部牺牲500余人，战士6000余人。其中有副司令员包森，区队长苏然，团长白乙化、阎正化，政治主任王波，营级干部薛辉荣、吴永福，县委成员陈荣，县长姚铁民、刘全民等。

（作者曾任交通部副部长、全国政协常委等职）

抗战中的冀热察挺进军

肖　克

形势与使命

“七·七”事变后，日本侵略军大举向华北及长江下游各大城市和交通要道进攻，并于 1937 年秋冬占领了其中的大部分地区。不久，敌军一部沿津浦路南下，另一部溯长江而上；还有一部在华南登陆。到 1938 年 10 月，占领了长江中游及南方大城市——武汉、广州。我国正面抗战基本上告一段落。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在中日战争爆发后，很快开到华北；新四军也逐渐从土地革命时期各游击区集中到长江中下游敌占区。他们在国民党军队正面作战处于节节败退的情况下，在沦陷区及敌人的侧后，开展游击战争和运动战，积极打击敌人，恢复和保卫敌后抗日政权，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形成处于敌后许多大大小小的抗日民主根据地。八路军、新四军及其它抗日武装得到了大的发展，迫使敌人不能不回师敌后，调回很大兵力并从国内和东北增调兵力对付我们的游击战争。

由于前述两种情况，抗日战场就发生了重大变化，日本侵略军对我正面战场基本上停止大规模的进攻，对国民党采取以诱降为主的政策，对其后方则进行全面的、大规模的、频繁的“扫荡”。至此，抗击日伪的重点，就逐渐转移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了。

敌后的抗日力量虽然有很大发展，但还不平衡，有不少空隙，也有些地区抗日力量起来以后，由于主客观原因，受到挫折，经过极其艰苦的斗争，才得到巩固和发展。冀热察边区的情况就是这样。在“七·七”事变之前，这里是伪满、伪蒙及冀东伪自治政府统

治的地方，是关内外衔接的枢纽地带，又是我军在抗战中收复东北热河的前沿阵地，是华北战场的最前线。我党从抗战开始，就很注意这个地区的战略地位。1937 年 8 月在我党的洛川会议上，毛泽东同志就提出红军可出一部于敌后的冀东，以雾灵山为根据地，进行游击战争。这年 9 月，刘少奇同志和北方局指示河北省委，指出他们的中心任务是配合八路军，广泛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并具体指出，“尽量去平津周围的农村……配合八路军建立以燕山山脉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不失时机地抓紧准备冀东抗日武装起义”。冀热边特委根据中央、北方局的指示精神，作了大量的发动群众起义的思想准备和组织工作。很明显，我党在燕山山脉即冀热察边地区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和建立革命根据地的思想，是明确的、及时的，是有战略远见的决策。

由于我党及时地确定了要在敌后开展游击战争及建立抗日根据地，所以在忻口、太原和娘子关作战紧张的时候，就由一一五师分出一部分兵力由聂荣臻同志率领在五台山地区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一二0师派宋时轮支队出雁北活动，中共北平市委在北平西部组织抗日游击队，配合党领导的国民抗日军与八路军来平西活动，初步开展平西工作。1938 年 3 月，晋察冀军区派邓华支队进至平西，发动群众，建立了 3 个联合县政府，平西根据地初具规模。5 月下旬，宋支队奉令开到平西，与邓支队会合，成立第八路军第四纵队，6 月上旬由平西向东北活动。他们连克昌平、延庆、四海、居庸关，东渡潮白河，攻入兴隆城，向冀东挺进。7 月，冀东农民在党领导下发动了滦县、昌黎、乐亭、遵化、丰润、蓟县、迁安、平谷等 20 个县 20 余万人的农村大起义。开滦煤矿 7000 多工人也发动了武装暴动，使北宁路中断了半个多月。冀东起义，是由我党领导的以工农兵为主体联合各抗日阶层的武装大起义。规模宏大，声震中外，在中国民主革命的历史上是少见的。

华北山地游击战争很快发展起来了。1938 年春末，军委又发

出“在河北、山东平原地区大量发展游击战争”的指示。接近北平、天津郊区的大清河南北岸，也随着冀中平原游击战争的发展而发展起来了。这样，从“七·七”事变到武汉失守时期，北平四周地区，不时出现八路军及我党领导下的游击队的活动，对敌人控制的北平、天津，构成了很大威胁。不幸的是，冀东这次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大暴动，由于主观客观原因，只有 3 个月就失败了。

冀东大暴动失败后不久，中央军委就决定我去冀东工作。当时，中央正在召开六届六中全会，彭德怀、王稼祥同志同我谈到冀热察游击战争的发展及建立根据地问题。11 月 25 日，军委决定成立第八路军冀热察挺进军，由我负责组建。我随即找李富春同志要些干部，向毛泽东同志请示并要了 1/20 万的热河地图，就和贺龙、关向应、彭真、程子华诸同志同回晋西北。在晋西北，又进一步同他们研究工作并调些干部。1939 年 1 月初，我们一行近百人随一二〇师师部东越同蒲路，到晋察冀军区司令部——河北平山蛟潭庄，聂荣臻诸同志热烈欢迎我们。在联欢会上，他大叫一声：“欢迎老大哥！”情绪之热烈，溢于言表。

挺进军成立

1939 年 1 月初，在晋察冀军区司令部，聂荣臻司令员主持召开了会议，讨论党中央和军委关于成立冀热察挺进军的决定。他还就冀热察挺进军及地方党和政府的有关问题作了进一步说明。参加这次会议的有彭真、贺龙、关向应、马辉之和我等。

会后，我和程世才等同志便向平西进发。想到将在冀热察地区开展游击战争的前景，心情十分激动。记得我还作过一首诗，内容是这样的：“北渡拒马河，百花山在望，建立挺进军，深入敌心脏。放眼冀热察，前程不可量，军民同协力，胜过诸葛亮。抗战虽持久，笑我力正壮。”这的确是当时心情的真实写照。不论条件多艰苦，我们对于冀热察地区的抗日斗争的前途，充满了信心。

1939年1月下旬，我到平西，就和宋时轮、邓华、马辉之、姚依林等同志商量着手组织挺进军的工作。根据党中央、集总①的决定和一二O师、晋察冀军区的部署，1939年2月7日，八路军冀热察挺进军在平西的三坡正式成立。同时，还成立了以我、马辉之、伍晋南、宋时轮（后为程世才）、邓华等五人组成的军政委员会，成立了由马辉之担任书记的中共冀热察区委。挺进军由我任司令员兼军政委员会书记，程世才任参谋长，伍晋南任政治部主任。接着，司令部、政治部、供给部、卫生部、随营学校、兵工厂、被服厂、医院等陆续建立起来了。

挺进军下辖部队的整顿工作也开始了。主力是宋时轮支队和邓华支队。宋支队的前身是八路军一二O师七一六团第二营。1937年9月29日，由宋时轮同志率领到敌后之大同西南，怀仁以西，朔县以北，平鲁以东地区活动。邓支队的前身是晋察冀军区一分区（独立师）三团，两支队奉命进军平西，合编为八路军第四纵队。然后，东进冀东，配合冀东大起义。当起义的胜利成果由于多种因素而未能巩固（主观指导的失误是重要因素之一）之后，主力返平西开展工作。其他来平西整训的有抗日联军，蓟县、遵化游击队等武装。其间，整顿抗日联军的工作是比较费力的。冀东抗日联军是国共合作建立的抗日武装，干部成分较复杂，我们将抗日联军大部和由白乙化同志领导的抗日先锋队合编。抗日先锋队的干部多数是东北流亡学生，党员占很大比例，“七·七”事变前在绥远屯垦。事变后，在山西敌后与八路军协同打游击，是一支军政素质很好的游击支队。王震同志介绍他们来平西，准备打回东北。这两部分合编，使党对抗日联军的改造前进了一大步。

3月间，军政委员会和区党委召开了全区党员代表会议，冀东党和平津地下党也派同志来参加了。我们大家一起学习中央六中全会精神，学习毛泽东《论持久战》等著作。初步总结前一时期工作的经验与教训，初步确定了巩固地向前发展的方针。并且以“巩固

平西抗日根据地，开展冀热察游击战争”，作为军队和全区人民当前的斗争任务。

但是，这个口号还不大具体。如何在这个特殊的地区开展游击战争，我们没有提出具体办法。在那年的四五月间，还曾计划主力再度东进，发动冀东人民举行第二次起义。由于整个抗日形势已进入相持阶段，华北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因而，这个方案未被中央同意。但如何发挥这个地区人民觉悟高，地形好，青纱帐季节利于游击战的机会，我们则一直在考虑。5月，晋察冀中央分局、军区召开会议，讨论冀东问题，决定采取巩固发展的方针，主力不再东进。因此，我们只派出刘诚光等二十多个干部去冀东加强工作。

1939年秋冬，根据集总指示，挺进军取消了支队的建制，将平西地区的部队整编为六、七、九、十共四个大团，冀东地区则编为十二、十三两个团。从当时冀热察这个地区来说，力量不算小，但和冀热察地区敌伪的数量对比，显得悬殊，也较之华北其他抗日根据地为薄弱。主观力量和客观所负任务的需要不相称这个矛盾，此时已在逐步显现出来。在主力不东进，平西地区的发展受到限制，而冀东地区的恢复又已证明其能够长期坚持发展的时候，如何使这两块交错相连的地区协同作战；怎样利用地理上威胁敌伪指挥中枢和便于进入伪满洲国境的条件；怎样配合华北各地以至正面战场创造反攻前进阵地等问题，就提到冀热察挺进军领导的议程上。八九月间，我在区党委和挺进军军政委员会联席会议上提出以巩固平西抗日根据地，坚持冀东游击战争，开展平北新的游击根据地这个三位一体的任务来代替年初确定的战略口号。经过酝酿讨论，大家都同意并报中央、集总批准。我给干部作了一个报告，这个报告后来也在《挺进报》上发表了。在报告中对三位一体任务的内容，相互关系，实现这一任务的条件、可能性和困难，以及需克服的各种错误倾向，作了全面的论述。《挺进报》还一再进行宣传，基本上家喻户晓，深入人心，这个宣传教育工作是做得比较成功的。

巩 固 平 西

平西，当时是指北平（解放后改称北京）以西、北岳恒山东北的宛平、百花山、涿县、涞水以西以北小五台山一带，约12个县。西北万山重叠、千水奔流，东南临平汉铁路及涞易支线，北界平绥路，南到紫荆关，易水滨，纵横三四百里。东南方面，还是一块人口稠密，粮产较丰的小平原。从战略上讲，这里逼近京津，是晋察冀根据地北面的有力屏障，是向冀东和平北发展的前进阵地。因此，巩固平西成为挺进军向东北地区发展的先决条件。

巩固平西，首先要做的是统一这个地区的武装领导和指挥。当时在平西一带，活跃着几个方面的部队。有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和东北流亡学生组织的抗日先锋队，还有冀东大暴动后来平西整训的抗日联军及其它五六支抗日武装，如东南地区的一、二、三路，永定河北岸的第五支队等。他们各不相属，各有防区，自筹粮饷，行动不大协调。这对于根据地的巩固和对敌伪的斗争是不利的。我们和区党委协商，提出"巩固平西"的口号，加强党政组织的领导和政治宣传工作，使所有部队逐渐在这个口号下团结起来，统一归挺进军指挥。我们边战斗，边整训，在执行四个月突击扩军计划中，扩大了主力3000人，成立了平西各县游击大队及房、涞、涿游击支队，边沿区还建立了游击小组。同年11月，我们按照八路军总部统一指导的计划，进行较大规模整编，撤销了原第四纵队的十一、十二两个支队的番号，将第十一支队的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大队和房、涞、涿游击支队改编为第六、第七两个团，把十二支队及平西游击队一部分编为第九团，原已合编的抗日先锋队和冀东抗日联军及平西游击队之一部，合编为第十团，冀东过来的800多人编为十二团，仍在冀东的包森支队编为十三团。部队在整编后，一边战斗，一边进行了三四个月的政治教育和军事训练。普遍召开了政治工作会议，建立了各种制度，加强了党的工作，从而提高了军事、政治

素质和组织纪律性，增强了战斗力。在部队整训的同时，平西党在群众中又掀起了“参加子弟兵”的热潮，进一步充实了部队。这时期，平西全部兵力共达到12000多人。在老部队中，党员比例在30%以上，游击队也普遍建立了党组织。整编后，六团去雁北(划归北岳区五分区领导)，十团去平北，十二团去冀东(十三团原在冀东)，平西只留下第七、九两个团。

在整训主力部队的同时，我们还抓了平西的地方武装建设，扩大、巩固县、区游击队。在工作有基础的村庄，建立村游击小组。各县、区、村还普遍建立了民兵组织。这些群众性的武装组织及其积极活动，在巩固平西根据地中发挥了大的作用。

坚持冀东

冀东地区是东北伸向华北的走廊，当时，也是日本帝国主义侵入中国内地的要冲。日寇控制这个地区后，成立了“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加强了反动统治。他们把冀东作为兵站基地，以便于扩大对关内大规模的侵略战争。

我党对该地区发展抗日武装斗争相当重视，早在洛川会议时，就提出要在这一带建立根据地。1938年2月，中央再次提出要在雾灵山一带冀热边境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根据地。因为，从燕山山脉的雾灵山向四外伸展，直指北平、天津、山海关、承德等敌占的重要城市，威胁北宁铁路和修建中的平承锦铁路。战略地位十分重要。而且，这里的人民具有反抗外族人侵和封建压迫的光荣传统，明清之际多次发动过反抗外族入侵的武装斗争，民国以后又受封建军阀的残酷摧残，奉直军阀在这里3次混战。人民在军阀混战中有自卫的传统和组织。土地革命时期，玉田一带曾经暴动过。1934年，迁安也发生过抗日武装起义。这里民间武器甚多，约20万支枪，并普遍建立了“联庄伙会”、“民团”等形式的武装组织。这个地区人口多，物产丰富，人民政治觉悟较高，党的组织建立得早也较

普遍，和群众有密切联系。因此，毛泽东同志指示八路军总部和晋察冀军区："雾灵山为中心之区域有广大发展前途，且是独立作战区域。派去部队应较精干，且不宜过少，军、政、党领导人员中需有独立应付新环境之能力，出发前应作充分准备。"

根据中央前后几次指示的精神，除地方党就地布置武装斗争外，八路军先后派干部及部队到这个地区工作。1938 年夏，宋、邓二同志率第四纵队开赴冀东，配合冀东大起义。日寇大为震惊，从武汉调小林旅团纠合伪军加紧了对这个地区的进攻。11 月，第四纵队留下的 3 支各百余人的小部队，自西而东的在密（云）平（谷）蓟（县）、兴（隆）、遵（化）、迁（安）3 个地区坚持武装斗争。李运昌同志率领的抗联一部返回滦县、迁安、丰润一带，并到北宁路以南一带活动。针对敌人"围剿"，他们灵活机动，相机袭敌，包森支队生俘日本天皇裕仁的表弟、宪兵司令赤本大佐，取得了不小的成绩。

挺进军指挥机关及冀热察区党委成立以后，冀东大部分干部和部队，先后分批来到区党委、晋察冀中央分局和抗大轮训，受训的干部和来平西整训的部队都先后派回冀东。冀东的领导和斗争力量加强了，武装力量进一步壮大了，县、区、村政权和党群组织都有了不同程度的恢复和发展。1939 年 7 月，冀热察区党委和挺进军又决定成立冀东军分区和冀热察区党委冀东分委，由李运昌、李楚离同志分任军分区司令员和分委书记；并把冀东部队列编为挺进军第十三支队，李运昌任司令员，李楚离任政治委员，包森任副司令员。改编后的部队进到北宁路南的昌黎、滦县、乐亭地区活动。8 月间，挺进军派三十四大队到冀东活动。到 9 月初，冀东部队发展到 4000 多人，挺进军和区党委决定将其整编为八路军的二十八、二十九、三十团。经半年的游击活动，就在冀东北部逐步建立了多块游击根据地。随后，平西主力一部（十团）开赴平北、热河西部，在长城内外发展游击战争。与冀东密切配合，互相呼应。1940 年元旦前后，冀东部队又分为 9 个游击总队，分散活动。一部到丰、玉、

遵地区，以鲁家峪为中心向平原发展；一部以盘山为中心开辟蓟县、平谷、三河地区；一部巩固和发展丰滦迁游击根据地。

1940年春，以盘山、鲁家峪、潘家峪三小块地为基础建立了蓟(县)平(谷)密(云)、迁(安)遵(化)兴(隆)、遵(化)、丰(润)玉(田)等联合县政府。1940年6月，在我盘山部队全歼关东军的武岛骑兵部队之后，敌伪2万余人向我9块根据地开始“扫荡”，我即分兵三路转到热河、滦东和路南去。6月，十二团偕党政干部数十人东返，在鸦鸿桥、三女河、任各庄打了几个好仗。在敌人分散“清剿”时，我军又适当集中打击敌人。在一个多月的反“扫荡”中，共作战47次，毙伤敌1500名，使冀东的东西两块根据地基本相连。百团大战中，冀东部队袭入唐山市，攻袭蓟县城，围困赵各庄和古冶车站，打下一些据点，起了较大的配合作用。不久，在分区和专署统一部署下，7个县又发动了8万人的大破交通活动，予敌人以重创。1941年五六月间，在粉碎敌一个师团另两个旅团兵力的“扫荡”后，我在青纱帐期间又有了较大的发展。这时期我在长城内根据地比较巩固和发展的条件下，为贯彻预定向东北方向发展的方针，于9月组织3000余人打出长城到热河去，创建了雾灵山与都山之间的大块游击区。由于长城外是山区，人烟稀少，经济文化较落后，过去没有党的组织，也没有大革命和土地革命的影响，又经伪满8年的统治，工作比长城内困难得多，但这个方向有重要的战略意义，是冀东也是挺进军向东北地区长期的发展方向。经半年的艰苦工作，我们终于在长城外站住脚了，并在这里成立了晋察冀的“东北工作委员会”。他们在这里收集东北地区情报，争取伪方人员，在伪满建立点线关系，并参加根据地工作。

太平洋战争前后，敌二十七师团南调，伪治安军3万余人进驻冀东。我主力从热南回师，自11月中旬起进行了一个80天的“打治安军战役”。歼其5个团，溃其2个团和一集团军司令部，我2个主力团全部换了新枪。这使敌酋冈村宁次又慨叹：“对冀东八路军

要重新认识！”1942年六七月间，分区又发起以悼念工人大队长节振国、团长陈群、分区副司令员包森、政治部主任刘诚光等同志为动员口号的“复仇战役”。歼敌3000人，成建制消灭日寇五六起，使我主力一部又换了“日式装备”。此时，主力部队连同新建的十一团达5000人，地方武装近2000人，民兵2万人(多数有枪)，控制人口280万，根据地更加巩固了。在坚持冀东抗日游击战争的过程中，我冀东军民越战越强。

越过长城的部队，一部向热南深入，进至平泉、叶柏寿、宁城之间，开展游击战争；一部深入到伪满统治的兴城、绥中(在辽西)，这是中国最早“打回东北去”的部队。

1944年末，冀东根据地已有5万党员，3万正规部队，20万民兵，25个县支队，560万人口，建立了25个联合县，加上热南和辽西广大地区，根据中央、军委指示，建立了冀热辽军区、区党委和行政公署。这就为日后收复热河、解放东北，建立了前进阵地。“八·一五”日本帝国主义无条件投降后，我冀热辽八路军接到党中央和八路军总部的命令，在晋察冀军区的指挥下，配合各路反攻大军和挺进东北的八路军、新四军，收复失地。留在冀东的部队，也举行大反攻，收复15座县城，与冀中、热河等解放区联成一片。冀东军民对中国革命的胜利作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

开 辟 平 北

平北，是指北平北部长城内外广大地区，是敌人经营已久的占领区。抗战进入相持阶段以后，敌人又增强了统治力量。在平绥路东段和平古路沿线，分别驻有日军独立第二、十五两个旅团的大部分和伪满、伪蒙的军队。在张家口，除设伪蒙疆自治政府外，还有日寇所设蒙疆派遣军司令部，在蒙疆广大地区建立战略基地。挺进军对于这个地方在战略上予以极大的注意。因为开辟北平、承德、张家口之间的冀热察三省边界广大地区，将使平西和冀东联结起来，

使三个地区的游击战争互相配合，也可以同大青山的游击战争相呼应。这是坚持长期斗争和将来反攻的重要阵地。

开展平北游击战争，早在1938年6月就开始了。那时，八路军宋邓纵队挺进冀东，留下纵队政治部主任伍晋南率领的一支武装在昌平、密云、滦平一带进行游击活动。在3个月的游击活动中，对敌伪统治下的平北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民情、地理等情况作了带普遍性的调查和了解；一度开辟了昌(平)滦(平)怀(柔)地区，成立了滦昌怀联合县政府，并建立了各种抗日组织。因敌我力量悬殊，不久即被迫撤出。1939年青纱帐时节，挺进军三十四大队向平北发展，首先进入十三陵地区开辟根据地工作。但是，在执行对土匪政策上有偏差，又没有站住脚，只1个月即返平西。这两次开辟平北虽然没成功，但取得了一些经验教训。同时这几次的活动，在平北人民中播下了革命种子，使这个地区的群众对我党、我军有了了解，这些都给以后的开辟工作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1939年秋末，冀热察区党委和挺进军提出创建冀热察抗日根据地的三位一体的任务，确定了平北在冀热察的战略地位，指明了开辟平北的重要性以及开辟平北的困难和克服办法。鉴于平北地区是伪满洲国、伪蒙疆政府统治较久，并建成一套较严密的统治机构的地区，同时又紧靠伪华北政府统治中心北平及日本侵略军的重要战略基地张家口、承德，这是我开辟平北工作的不利条件。但是，另一方面，由于这里地处伪满、伪蒙疆、伪华北三个不同政府的接合部，使我有隙可乘；敌人对这里残酷的掠夺和奴役，激发了各民族广大人民对敌人的仇恨和抗日要求；此外，有平西和冀东人民的斗争相呼应和依托，又是开辟工作的有利条件。当时抗战已进入战略相持阶段，敌人增强了后方的统治。因此，要开辟平北，不仅要正确执行党的各项政策，还要采取正确的战略方针。在军事战略方面，我们吸收江西红军游击战争初期的经验，采取波浪式的发展，在发展中求巩固的方针。在战术上以小部队多点渗透，发动和依靠

群众，隐蔽开辟，站稳一点再找一个新点，逐次展开，先开辟几个小块根据地，随着根据地力量的壮大和发展巩固，逐步连成大块根据地。1940年1月，挺进军和区党委根据中央和晋察冀军区指示的精神，派钟辉琨同志率20多名党政干部和第九团第八连，进到昌平、延庆之间的山区后七村一带，同原有的一支游击小队会合，很快建立了包括5个区的昌(平)延(庆)县政府。此后，继续向怀柔、延庆川、赤城、龙关之间的广大地区发展。经过4个月的努力，基本站稳了。四五月间又派第十团去丰(宁)、滦(平)、密(云)之间开展游击战争，他们和区党委派去的地方党政干部密切配合，开展地方工作和游击战争，很快站稳了脚。这样，平北西部和冀东的游击战争也能呼应了。在十团去平北稍后点，派段苏权同志任平北分区政治部主任，地方党则建立平北工委，苏梅任书记。又建立了平北办事处，张致祥任主任。这样，就组建了平北地区的党政军领导机关。1940年六七月间，派程世才同志率第七团进入平北，准备开创更大的局面。但由于七团是个正规大团，目标大，很快引起敌人的注意。敌立即增兵前来，不断"围剿"，加上根据地小，容不了那么多人，发生了物资供应困难。第七团本身过去较习惯于集中作战，还不熟悉也没有适应该地区的斗争环境和方式，虽然消灭了一些敌人，但消耗较大，最后不得不撤回了平西。这种结果，在思想上，是前期在较顺利的发展情况下，我们有急于求成情绪。在战术上，一次派去兵力太多，敌人在我游击战争处于发展时期已有教训，所以很快警惕，不让我站稳。这是发展中一个挫折，也是我军事指导上的教训。

1941年开始，平北中心区大海坨、龙延怀经常处在反"扫荡"的环境中。我取得阎家坪阻击胜利后转出外线，攻袭刁鹗堡、东山庙、怀柔车站等地。这时期，我们取得了白莲峪、沟门、一撮毛等战斗胜利，恢复了基本地区。10月，敌开始大规模"扫荡"丰滦密地区，在白马关等地受到打击后，伪满又成立了"西南防卫司令部"；

伪蒙疆也配合华北敌伪的"治安强化"运动,大挖"封锁沟",制造"无人区"、"绝缘体"仅在古长城以东的黑河川,就设置 7 个"人圈"。我军则一直活动到沽源县境内,增编一个四十团,又开辟了 2 个县,成立了专员公署。经过近 2 年的苦斗,从初创时几个小块,发展为大块的平北游击根据地,但没有成为冀热察挺进军的指挥中心。至 1941 年 6 月,平北主力部队已有十团、四十团 2000 多人。1942 年 4 月,又从平西派八团到平北,后与四十团合编。这时,又抽调了一批得力干部,开展了组织群众和建设政权及统一战线工作。相继成立了昌(平)延(庆)、龙(关)崇(礼)赤(城)、龙(关)延(庆)怀(来)、丰(宁)滦(平)密(云)、滦(平)昌(平)怀(柔)5 个联合县政府和滦(平)昌(平)怀(柔)办事处。在 240 个村中,发展了 2250 名党员,并建立了民兵、工农青妇等群众组织。地方武装也在不断加强。虽然自 1941 年 10 月至次年 7、8 月,根据地遭到敌人不断地"扫荡",损失不小。但从总的情况看,我们开辟平北抗日根据地的战略意图是实现了。正如 1942 年 1 月 31,日晋察冀中央分局《关于平北二年来工作的指示》中所指出的:平北在两年来艰苦斗争的过程中,已经初步形成了根据地。"

随着形势的好转,根据地日益扩大。1943 年,又建立了滦(平)昌(平)怀(柔)顺(义)和龙(关)崇(礼)宣(化)两个联合县。1944 年,解放区更加巩固与扩大,取消了原县域划分,划成昌平、怀顺、赤原、崇礼、宣怀、龙关、赤城、延庆等县。

1941 年,党中央作出了关于精兵简政的决定,我们遵照上级的决定和指示精神,根据冀热察三个地区的党政军组织都能各自独立领导各地区的战争情况,提出撤销区党委和挺进军这一级机构,充实基层单位和战斗部队。这样就减少了层次,缩小了目标,减轻了人民的负担,更利于持久作战。经中央分局和军区决定,于 1942 年春天结束了区党委和挺进军的工作。经过精兵简政,人民负担减轻了,人民得到了休养生息,抗日的积极性更高。党、政、军、

民的基层组织得到充实，各级机关的工作效率和部队的战斗力进一步提高。这时，冀热察地区的斗争形势发生了新的变化，各地区按照原区党委和挺进军的布署，积极开展对敌斗争，根据地不断得到巩固和发展。到 1943 年，敌人对平西、平北和冀东的分割政策基本上被破坏了，三个地区大体上连成一片。斗争的实践证明，党中央关于精兵简政的决策是完全正确的，必要的。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用精兵简政，来克服"鱼大水小的矛盾，使我们的战争的机构适合战争的情况，我们就将显得越发有力量，我们就不会被敌人战胜，而要最后地战胜敌人。"(见《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 838 页)以后事实证明，这个地区继续得到很大发展，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很大贡献。

挺进军存在的 3 年时间不算长，但由于所处地区与斗争的特殊性，使它具有比较突出的国际影响和历史作用。根据地的建立及建立以后，都和北平、天津这些大城市地下党的工作密切配合。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后，班威廉、林迈可、史平烈等国际友人，就是从北平进入平西根据地去延安、重庆的。

在开辟冀热察抗日根据地的斗争中，挺进军的许多优秀共产党员及干部、战士，如白乙化、包森、王仲华、陈群、刘诚光等同志，为了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地方党、政权、群众工作、文艺工作等各条战线上，同样有很多同志为革命事业光荣地牺牲了。他们的英名将永远铭刻在人民心里。

注释：

①集总指我党领导下的十八集团军总司令部

(作者曾任中顾委常委、国防部副部长，上将军衔)

进军雾灵山

李　炎

进军雾灵山，配合冀东人民抗日大暴动。每当回忆起当年进军途中与日伪军浴血奋战的艰苦岁月，回忆起东进时英勇献身的战友们，回忆起我主力和游击队会合的欢乐情景，以及配合冀东人民大暴动取得重大胜利后军民欣喜若狂的场面时，那些可歌可泣的往事不断浮现在眼前，促使我将这段经历写出来。

（一）

冀东这块富饶的土地，战略位置非常重要。北可威胁伪满，东可控制北宁铁路，西可威胁北平，南可威胁天津，且人口稠密，物产富饶，是兵家必争之地。

毛主席早在 1937 年 8 月的中央洛川会议上就提出，红军可出一部于敌后的冀东，以雾灵山为根据地进行游击战争。又于 1938 年 2 月 9 日致电八路军前方总部：以雾灵山为中心区域，派去干部应较精干，且不宜过少，党政领导人需要独立应付新环境的能力，出发前应作好充分的准备。

八路军总部遵照指示，先派部分干部组成游击队，到平西敌占区进行侦察。随后，一分区政委邓华奉晋察冀军区之命，率新编第三团进军平西（称邓支队）。

1938 年 3 月，邓支队到达平西。宣传抗日，成立救国会，组织武装，开展游击战争，收复了大片失地，建立了抗日政权。由于模范地执行统战政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抗日，部队不断扩

大。4月间，以新三团二营为骨干组成了一个团队，番号三十三大队，大队长肖思明，政委李志远。副大队长陈群，兼一营营长，新编的民团李文斌部编在一营。原新三团改为三十一大队，大队长纪广顺，政委杨科五。至此，以斋堂为中心的平西抗日根据地日趋巩固。驻在西斋堂村的支队领导机关，紧张进行东进准备工作。

5月中旬，根据朱德、彭德怀电令，原活动在晋西北的宋时轮支队也调到平西，与邓华支队编成八路军第四纵队（下称四纵），宋任司令员，邓任政委兼四纵党委书记，下辖2个支队。宋、邓2支劲旅在日寇眼皮下会师，汇成钢铁洪流，实现了党中央的战略决策，开辟了向冀东挺进的跳板——平西根据地。

（二）

为了配合冀东人民抗日大暴动，1938年6月初，宋邓支队分2路陆续从驻地出发，向冀东进军。一路由宋时轮司令员率领三十四大队、三十六大队、骑兵大队和独立营，从南口至北平之间过平绥铁路；一路由邓华政委率领三十三大队、三十一大队，从八达岭至康庄之间过平绥铁路。我随邓支队从青白口乘渡船过永定河，在镇边城一带宿营。镇边城是长城脚下一座较大的城堡，城墙完整坚固，有百十户人家，不少人从事抗日工作，群众基础较好。“七七”事变前，国民党军队曾在此布防，与日军激战，后西撤。部队在此休息几天，作穿过平绥铁路的准备。第三天下午部队出发，首长命令三十一大队一营于次日拂晓前袭击延庆县城。袭击中，一连由延庆南门攻进城里，把敌人打得晕头转向，使敌人慌忙退守鼓楼，战斗中连长李吉高负伤；二连久攻鼓楼不下，天亮前主力已通过铁路，就撤出了战斗。二营担任铁路警戒掩护主力通过后，又攻占了永宁城。三十三大队肖大队长和陈副大队长亲自带一营袭击康庄车站和发电厂，掩护主力通过铁路。袭击中，部队趁着夜暗，占领了车

站，消灭了车站上的敌人，又悄悄摸到发电厂，一排子手榴弹把电厂炸掉，一片黑暗。敌人还没搞清怎么回事，部队就完成任务撤走了。

部队于拂晓前全部通过铁路，进山村休息。天刚亮，村民们开门担水，突然看到街上灰蒙蒙一片(当时部队穿的灰色服装)净是兵，在街道两旁休息，一群骡马也正围着水井边的石槽饮水，真是神兵天降。立即将门关上，不敢出来，误认为我们是日伪部队。但又觉得不对头，这么大的部队秩序那么好，晚上不进老乡的家，不拿老百姓的东西，不大声喧哗，宿营不扰民，和日伪军不一样啊！这时老乡们才陆续出来，干部战士都立即向群众宣传，说明我军是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是正规部队，是打日本鬼子的。群众看着这些说话和气有礼貌，又不打人、不骂人的大部队，相信是好队伍。街上的人就越来越多，有的群众主动端出几碗小米饭让大家吃，但都被婉言谢绝了。一位年过半百的老人伸出大拇指说："这真是好部队！我们有盼头了！"指战员们喝了些水，稍事休息又继续东进了。

当晚支队机关在永宁城宿营，补充了粮食给养。永宁城是一个和县城差不多大小的城堡，位于延庆县以东约 15 公里处，街上店铺不少。部队除进行一般宣传外，支队政治部宣传队还专门为群众演了一场戏，部队和群众共度了端阳节就出发了。行军途中，从支队机关传出三十一大队三营袭击了永宁以东的四海据点，并登上了城堡，缴获 1 挺日本重机枪。以后由于敌人固守碉堡，打了一夜，我军就主动撤出了战斗。由于我主力突然袭击敌人，使其摸不清我军实力及意图，也不敢轻举妄动。所以我军在敌占区白天行军是很放心的。三十三大队一路纵队在山间小路上轻松愉快地走着，战士们情绪很高，队伍中不时传出歌声。

支队在长城脚下一个小城堡内宿营。次日晨部队出发后，我们奉命检查群众纪律，发现一个饲养员未付房东谷草钱，还有一个炊事员未付柴钱。我们给每家房东 1 元中央银行票子，房东非常高兴

地称赞说，军队烧柴喂草还给钱，从未见过这样有规矩的部队。我第一次见到宋时轮司令员就在这次检查群众纪律时。我们办完事正要走，宋支队正在通过。突然一位挎着手枪，穿着灰色军衣的警卫人员说，你们是六支队的吧？宋司令员叫你们去一个人说话，大家推举我去。我在城堡门外见一位首长，坐在一块大石头上。我敬过礼，站在旁边的一位参谋介绍说，这就是宋司令。宋司令和颜悦色地慢慢说："你们是六支队的吗？"我答"是"。"有一个马夫没有给草料钱违犯纪律知道吗？"我答："知道，我们已做了赔偿。"他说"那就对了，以后要经常向部队进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宣传。"

过平绥路东进途中，各部队连续行军作战。邓支队攻延庆、打康庄、战四海、夺永宁，宋支队还一举攻入昌平县城，这几锤子打得敌人晕头转向。所以，我军行动较为主动，想打就打，想走就走。虽然连续行军，但部队士气始终高昂。当部队向怀柔县沙峪行进时，突然接到命令，停止前进，原地待命，以后就听到激烈的枪声。到后来才知道，三十一大队前卫连遇到一个邮差，他说离此约 15 公里有一队日本鬼子向这里前进。邓华政委判断这股敌人可能是增援四海的，对我军突然转向南进可能不知道，就下决心在这里打一个伏击战，歼灭这股敌人。战斗一直到黄昏才把敌人全部歼灭，歼敌 120 余人，缴获机枪 3 挺、掷弹筒 3 个、步枪 80 余支。

沙峪战斗，是东进以来第一次硬仗，是一个漂亮的歼灭战，敌损失惨重，震撼了各县之敌，大大鼓舞了京东人民的抗战信心。但我军伤亡也较大，为了充实连队，保持战斗力，部队及时进行缩编，减少了建制单位。三十一大队 3 个营缩编为 2 个营，三十三大队将一营撤销，将二营改为一营，陈群副团长不再兼一营营长。

这时，编入三十三大队一营的民团李文斌，由于行军作战太艰苦等原因，提出将他的手枪队带回平西，肖大队长报告了邓华政委，同意李带队回平西，并说，我们要模范地执行党的统一战线政策，来去自由。肖思明大队长转达了领导的意思，和李文斌边走边

谈，一直送出 2 公里多。李文斌感慨地说，还是八路军讲义气！一再请首长留步，肖紧握李的手再次道别，李走出很远还频频招手。

次日拂晓，部队继续向东进发，行军路线转向北方，经秋场、大地、琉璃庙而后渡白河，经一夜行军集结在白河右岸作徒涉准备。天气阴沉，黑云密布，无空袭顾虑，邓支队直属部队及各大队在河滩上休息。由于长时间行军作战，干部战士们久未会面，在战斗空隙聚在一起机会难得。他们拥抱，欢笑，彼此畅叙别情，有的干脆摔跤玩，河滩旷野一片欢乐景象。先头部队选出几个会游泳的拉着用绑带接起来的绳子游过河，两岸将几条绳子固定好，便开始扶绳过河，浅处一米多，深处一米五六，可露出头来，因河水流速较急，不时有人被冲倒。

（三）

部队过了白河又向东渡过潮河，进到平谷、兴隆、蓟县三县三角地带集结。随后宋支队一部攻击平谷县城，邓支队三十一大队攻击靠山集，我三十三大队奔袭兴隆县城。

四纵进入冀热边，连战皆捷，声势浩大，敌伪十分惶恐。广大人民则倍受鼓舞，沿途人民奔走相告，心情激动。打开墙子路伪满警察据点后，当地百姓激动的说："好样的！"中国有这样的军队，老百姓有希望了！为了配合冀东暴动，四纵各部队相继发起对长城内外、伪满和冀东某些县、镇之守敌进攻，牵制敌兵力不使向南机动，以保障冀东党顺利地组织暴动。事后得知，冀东暴动时，华北日军主力正在中原会战，冀东警防队也调到沧县、保定一带"围剿"冀中抗日游击队去了，一时也调不回来。此时，晋察冀军区所属各部队也广泛出击。7 月初开始，在平绥线、平汉线 和正太线上分兵数路向敌进攻，先后一度攻克高碑店、定县、新乐等站；攻人平山、西合营等城堡；还一度袭击了石景山工业区，炸毁了电厂锅炉，使北平

一度断电。这就大大牵制了敌人兵力,使之不能增援冀东。

三十三大队进到离兴隆县城10多公里的前苇塘,开始进行攻打县城的准备工作。肖大队长命令一营为主攻部队,攻南击北山上主炮楼之敌,三营为第二梯队,总支书记包森同志带领民工百余人组成担架队和运输队,准备运送伤员和物资。天黑后,一营在群众带领下悄悄摸上北山,于10时发起攻击,半小时后便占领了北山制高点。兴隆县城位于河谷一侧,控制了北山就等于拿下了县城。这时二梯队已进入城区,渡过一条小河后直扑日本宪兵队。歼敌一部,另一部分敌人凭着夜暗和路熟狼狈向城东南逃窜,经2个小时战斗便全部占领县城。部队派出警戒,一营仍在北山构筑工事,准备抗击反扑之敌。次日上午8时,从承德方向开来18辆汽车,满载日军约数百人,企图夺回北山和县城,我大队则坚决抗击。不久,日军派3架飞机助战,轮番向我军阵地扫射、轰炸,掩护其他地面部队向我阵地猛攻。战至中午,我军退出县城,控制北山。敌人仗其陆地和空中优势继续向我阵地猛攻,战斗异常激烈。陈群副大队长被1颗敌弹打伤了手臂,赖輸仁营长被炸弹的弹片击中,光荣牺牲了。肖大队长立即命令一部分部队趁敌混乱进行反冲击,同时又命令其它部队迅速撤出战斗,返回前苇塘。

包森同志带领的担架队冒着生命危险,从一线将伤员和牺牲同志的尸体抬下来。

兴隆县城一战,又歼日伪军200余人,我们像插入伪满境内的一把尖刀,深深地刺痛了日寇,千方百计地寻机报复。我部队在前苇塘开了追悼会,悼念阵亡的烈士们,大家掩埋好战友的遗体,告别了乡亲,于次日晨向西转移。敌人恼羞成怒,除飞机整天跟着我军狂轰乱炸外,还纠集重兵进行"围剿"。

由于四纵尚未与冀东党取得联系,对冀东情况不甚了解,加上活动地区山大沟深,村庄稀少,伪满统治较强,因此生活十分艰苦,一时也难以站住脚。7月上旬,中央电示四纵速向迁安、遵化、卢龙

挺进，突破敌包围圈与抗联会合。我三十三大队根据支队指示，先向西南转移，与敌在燕山周旋。由于支队指挥灵活，部队始终处于主动，敌费尽心机，寻找我主力作战的企图，终未得逞。部队转移到北双洞一带隐蔽休息3天后，敌机才发现了我们，由于阴雨，又是山区，敌机不敢低飞，胡乱投了几个炸弹，便飞走了。我无伤亡，继续向雾灵山前进。雾灵山主峰海拔2100多米，道路崎岖难行，人烟稀少，又值大雨滂沱，指战员们一天只吃一餐饭，腿上无力，脚上无鞋。我的脚和大家一样，都磨破了，化了脓，肿得很大，每走一步疼痛难忍，只得找一些破布把脚包上。行军速度很慢，幸好阴雨行军，敌机不来打扰。到了雾灵山后部队经红梅寺、鹰手营子之间公路到大、小水泉宿营，进行短时间休整。外面不停地下大雨，浑身湿了又无衣可换，只能躺在热炕上烘干。休整了2天，饭也能吃饱，体力恢复不少。这时敌人才得到消息，于是立即纠集兴隆、鹰手营子之敌数百人，向大小水泉扑来。大队留三营牵制来犯之敌，主力经双庙子向半壁山方向转移了。半壁山有个较大的伪警察局，人枪各有四五十。肖大队长派了4个精干的通信员去夜袭，敌人闻风丧胆，听到动静后什么也顾不得了，便仓惶逃窜。此时，滦河因连降暴雨，洪水猛涨，部队被阻于滦河北岸半壁山一带。

三十三大队三营完成任务后向半壁山靠拢，敌人尾随三营到半壁山以西，受到我大队主力阻击，歼敌百余，我大队也伤亡30余人。此时大队伤员已增到百余人，本来兵员就很缺少，还得派部分兵力照料和掩护伤员，拖得大部队走不动，吃尽了无根据地的苦头。大队党委研究决定：伤病员不能继续随队了，否则重伤员拖死，轻伤员加重，部队也要被拖垮。决定将伤病员留下，配备必要的医务人员，由总支书记包森同志率领，再派第十二连掩护，发动群众就在雾灵山一带打游击。大队主力迅速转移，使敌寻找决战的对手又无踪影了。

包森同志是陕西省人，中学毕业，红军老战士，在三十三大队

任大队总支书记，是一个文武双全的指挥员。在半壁山留下来担负这样艰巨的任务，他欣然接受了。留下担负掩护任务的十二连，原是平西房涞涿联合县的警卫连，包森同志当时是县长，他对这个连很熟悉。连队的骨干是广西百色起义的红七军的老战士，其他多数是房山县南北窖、大安山附近煤矿的工人，觉悟高，战斗力强。

包森同志带领200多人困难很大，主要是在敌占区，又没和地下党取得联系，加上伤病员缺衣少药，缺吃少穿。但他终于克服重重困难，依靠群众渡过了难关。他们活动在兴(隆)蓟(县)遵(化)三角地带、潵河两岸和长城内外。一面治疗伤病员，一面宣传抗日，发动群众，组织武装，发展党的组织，开展抗日救亡运动。经过一段艰苦细致的工作，包森部队在群众中扎了根，扩大了部队，先后进行了六道河、九神庙、佛爷来等战斗，取得了不小的战果。到8月底已经由200人发展到上千人。包支队就是赫赫有名的十三团的前身，在雾灵山一带，一提到包森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老百姓一提，便伸出大拇指说，好样的！伪军一听便望风而逃，就连日本鬼子也怕他几分。包森支队的确是冀东威震敌胆的一支劲旅。

主力原拟经罗文峪南出遵化，但因连降暴雨，洪水猛涨，被阻于潵河北岸，乃改变计划，向东进到迁安县境内。此时主力部队特别困难，无衣、无鞋、无弹药，就连每人每天5分钱的油盐钱也拿不出来了。但在这种艰难困苦的情况下，部队不逃不散，仍能坚持行军作战，支部建在连队起了决定作用。党员都能自觉地起模范带头作用，紧紧团结在党支部周围。党员能按时交纳党费，党支部也非常注意发展新党员，及时吸收经过战斗和艰苦环境考验的干部战士加入组织，充分发挥其作用。当时在敌占区活动，因没有建立政权，连队吃粮打白条子，干部战士均无鞋子。当时发现有人把向导的鞋要来自己穿上，违犯了群众纪律，这对争取新区的群众工作不利。因此肖大队长召集各营长、教导员开会，提出干部要以身作则，营以上干部2人合用1匹骡子，卖掉1匹，以解决急需的鞋子和菜

金钱。以后行军,经常见到大队首长把马让给伤病员骑,自己和战士一起步行。不久,主力向西行进,经清东陵以北山区转移到蓟县以北的茅山、黄崖关、下营、穿芳峪一带集结待命,准备攻占冀东北部几个县城以配合冀东人民暴动。

(四)

三十三大队在下营一带作了大量的群众工作,和当地士绅及商界人士进行了接触。伪满统治在这一带影响较小,经济控制也不很严,小镇上设有官盐店,存盐不少,敞开卖盐。各连向老同志借了一点钱,买了一些盐。商店见八路军买卖公平,说话和气,花的是中央票,有的人还拿出银元买东西,他们相信是国民革命军正规部队。交谈中他们总要问,你们军头是谁?答:朱德、毛泽东;他们又问关于土地政策和枪支等问题,部队一一作了正面解释。三十三大队一营住在穿芳峪村,和蓟县地方党派来的人取得了联系,李子光同志派王恕吾、王磊(均为大学生)向大队首长介绍了冀东人民暴动情况,大队首长随即将情况报告了纵队首长。

8 月间,根据纵队命令,三十一大队攻克了迁安县城,三十四大队攻克了平谷县城,三十三大队一营由肖大队长指挥占领了蓟县城。我军东进后,连战皆捷,极大地鼓舞了冀东广大人民,在我党直接领导下,纷纷拿起武器,组织人民武装,掀起了威震全国的冀东人民抗日大暴动。

我三十三大队一部由新任的陈坊仁大队长率领经马伸桥沿州河南下,渡过州河进到遵化县的党峪、尚庄、大官屯一带宿营。沿途遇到很多当地暴动起来的游击队,经常遇到列队欢迎的场面,情绪都很高。八路军在休息和宿营后,干部战士找他们交谈,他们看到八路军多是南方和西北人,却没有一个本地人,装备整齐,轻重机枪都有,纪律严明,真正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确是红军改编的正规

军，大家都伸出大拇指表示钦佩。但游击队和群众对八路军服装破烂不堪、有鞋无袜或鞋袜全无不理解。对八路军只吃小米也不理解，对我军建军宗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不甚了解。部队在遵(化)、玉(田)、丰(润)地区驻地开展群众工作时，住在山头庄，一位房东就说，八路军光吃小米南瓜汤，为什么不向村长要白面猪肉吃？有的光脚走路，为什么不找村长派鞋子？针对群众这种议论，政工人员主动向群众做了解释。政治处住在大官屯村一位姓阎的老乡家里，这家老夫妇有一子一女，和房东一家相处得很融洽。房东认为住的几个八路军很文明，说话和气有礼貌，是有文化的军队，和旧军队确实不同，因此很信得过我们，房东称我们为先生。房东的姑娘出嫁，执意要八路军陪新郎吃饭，没办法只好从命，可见人民群众对八路军是非常信任的。

(五)

暴动成功后，大部敌人撤到县城固守不出。这时根据地出现了暂时的平静，这就给刚开辟的根据地和新组建的游击队一个整顿巩固的良机。

8月中旬，四纵党委和冀热边特委以及八路军和抗联的主要负责干部在铁厂开会。会议由邓华同志主持。会议对冀东暴动后形势作了正确的分析，充分肯定了大起义的胜利。指出队伍多、秩序乱，需要统一领导，统一指挥，整顿部队。同时决定成立冀察热辽军区，下设五个军分区，由宋时轮任司令员，邓华任副司令员。会议还决定成立冀察热辽边区行政委员会，以便统一政权领导。

铁厂会议后，各部队进行整训，并抽调部分干部帮助游击队整训，三十三大队大队长陈坊仁还兼任遵、玉、丰游击支队支队长。

有一天，在县政府所在地卢各寨村召开欢迎大会，欢迎三十二大队的到来。原来三十二大队是由保定地区起义部队编成的，大队

长叫王效国。他们从保定以西某地出发，经过平津保三角地区大平原辗转开到冀东来参加暴动。一路上正逢大雨滂沱，道路泥泞难行，有时在水里跋涉，走了一个多月才到遵化县境内。两支部队在此会合，官兵异常兴奋，纷纷互道辛苦，问长问短，这对群众也是极大的鼓舞。至此，冀东人民大暴动取得了重大的胜利，党中央和北方局还专门发电祝贺。

时过中秋，天气已经冷了，青纱帐已快全倒了，这时我大队接到命令，决定西撤，和暴动部队一块到平西进行整训，明年再来。纵队还决定，留下三十三大队副大队长陈群带特务连（即十三军分区十二团的前身）为第一支队，活动在丰润、迁安山区；以松山峪为中心，留三十四大队干部单德贵（此人后叛变）率一支小部队为第三支队，活动在蓟县、平谷、密云地区，以鱼子山为中心。这几支队伍紧紧依靠群众，广泛开展游击战，狠狠打击了日伪军，为巩固和扩大冀东抗日根据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作者曾任总参军务部部长）

我和北进敌后武工队

王泽民

(一)

我们这支北进敌后武工队是1944年6月组建的。当时,日寇的侵华战争已成败局,正在疯狂地进行垂死挣扎。他们为摧毁我抗日根据地,割断我党我军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调集数万兵力,轮番对所谓"满洲国西南国境线"进行"扫荡"、"清剿"继续惨无人道地"集家并村",扩大"无人区"。为此,这个地区进入更加残酷的斗争阶段。人民群众有家不能归,有地不能种,陷入了苦难深渊里。为粉碎日寇的阴谋,中共冀热边特委下设的第一地区委员会决定组织精干的武工队,进入"无人区",坚持抗日斗争。

一天,地委书记李子光同志把我叫到小黄崖的黄土坡,对我说,"泽民同志,给你1个排,让你与十三团的郭子忠、高原同志向北边敌占区开辟。能开辟多少是多少,北边都是你们的。你们这支队伍叫北进敌后武工队。"子光同志强调说:"你们这支队伍远离地区委,战斗在敌人心脏,要特别注意:第一,不要吸大烟;第二,不要搞女人;第三,不要投敌叛变;第四,要千方百计在'无人区'站住脚,保存和扩大队伍。"当时,我同郭子忠、高原同志还不认识,但他们的名字和事迹我早有耳闻。郭子忠同志是十三团的一位英雄连长,以能攻善打而著称。高原同志是个老革命,曾参加过著名的冀东大暴动,雾灵山东侧花园人。他参加革命后,老婆让敌人"配给"了,女儿让人抢走了。所以,他与日伪有刻骨的仇恨,革命立场十分坚定。能同他们在一起工作,我心里十分高兴。

我们这支武工队是在密云县木河川的北东洼建的队。郭子忠

任队长，高原任副队长，我任政委，原承兴密五区副区长张振东任政治部主任。地委给我们从地方上抽调 20 多名干部，大部分是各区的副区长、副书记、助理员等。十三团给我们抽的那个排，排长王华荣是个老八路，30 几名战士个个身强力壮，一式三八枪。大家见面后，不论是地方干部，还是部队战士，情绪都很高涨。为便于活动，我同郭子忠、高原、张振东等几位同志商量，决定把队伍化整为零，地方干部划为 4 个组，部队 4 个班分别随各组一起活动。后来，武工队活动起来了，4 个组变为 4 个分队，由我们委任了分队长、副分队长。

我们这支敌后武工队主要以雾灵山为基地，活动在雾灵山以东和以北的承德县柴河川、兴隆县的柳河川、滦平县的承(德)古(北口)路南，也就是以原承滦兴办事处失去的地区为基地的长城外线。郭子忠同志暂时调走后，高原同志当了队长，王华荣被提为副队长。我们这支队伍逐步向边外活动，有时活动到滦平县的滦河镇以北的伊逊河川，大庙附近的红旗、小营、通沟、三岔口，古北口以东的长山峪、黄木局子、靳家沟、王营子等，再就是承德县鞍匠、刘仗子、夹马石、和上板城。去这些地区活动都是在夜间，白天要返回窄道沟等地的树林里隐蔽。当然，我们活动最多的地方还是兴隆县以北的柳河川、鹰手营子、马圈子和寿王坟一带以及盘道梁以北的柴河川上游。这些地区的群众基础比较好，是老区。

在日伪残酷统治下的"人圈"里，人民群众生活十分困苦。十几岁的大姑娘没衣穿，一家子盖 1 条破被，夫妇轮穿 1 条破裤子，兄弟轮穿 1 件破羊皮筒的，到处皆是。我们这支队伍出关时带了些土布，作为菜金。进敌占区后，我们每到一个"人圈"，就直奔大房子，不用问，那里边住的不是地主就是甲长，有的还是双料货，让他们给我们派饭吃。开始，我们把吃饭的人数加在一起，一次付给土布。让这些地主或甲长把布分给我们吃饭的人家。后来，我们发现有的地主和甲长从中贪污，老百姓说他们"骑驴"。因此，我们改变了做

法，饭前我们把布分给队员，饭后由队员当场把布留给群众。群众十分高兴。由于当时布匹奇缺，老百姓都欢迎我们到家中吃饭。

越往北开辟，离地委越远。时间一长，我们带的布用光了，派人进关去取，有时来不及。这样一来，吃饭就发生了困难。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采取了派粮的办法：通知"人圈"里的甲长，让他派人到我们指定的地点给我们送，我们打收条。那时，我们派的粮主要是些煮土豆、炒米。为防备万一，我们有时还搞些储备，把这些东西放在雾灵山的山洞，还在山里挖些野菜存起来，以防断顿。冬天，我们主要征派一些小米、玉米、土豆等生食及一些必要的炊具。大雪封山，我怕敌人找脚印"搁剿"，就在山上自己生火做饭。

随着工作的开展，我们这支队伍不断壮大。日本投降前，武工队已经扩大到 10 个分队，共五六百人。这么多人的吃用，光凭向群众征派也是个问题，何况群众又十分困苦呢？为了减轻人民的负担，我们发扬南泥湾精神，在雾灵山的森林里开荒种地。那时，雾灵山的大森林经常起火。这火有时是日寇放的，有时是自然起火。被火烧过的土地，黑乎乎的，肥得冒油。我们在这黑乎乎的土地上种上了一片片的玉米、土豆。隔个十天半月的，我们派些人去打树芽子、锄草。1945 年春，我们种的土豆获得了大丰收，有的一块就有斤八重。这些土豆，我们除了自食以外，还组织队员磨粉，用粉向老百姓换粮吃。一直到日本投降时，我们做的粉条还没有吃完呢。

雾灵山中，有一种榆树，树干是扁的，皮特别粘。我们组织队员们打树皮，把打下的树皮晒干。下山时，我们把这些树皮背给老百姓，群众很欢迎。因为当时老百姓喜欢吃轧饸饹。榆树皮扎的面是必备的原料，没有它，饸饹就轧不出条来。此外，我们还从群众手里借一部分工具，在深山老林里砍明子，有时背下山同老百姓换些吃的，有时背下山救济穷苦百姓。

在雾灵山的深山里，武工队还开出菜园。当时，雾灵山下也有个叫贺龙的，还有于朝义夫妇及于朝义的一个哑巴哥哥。他们坚持

山地斗争，至死不进“人圈”。日伪越“圈”，他们越往山里跑。到山里，他们几个和我们生活在一起，为武工队收拾菜园子、养猪。哑巴还种些大烟，队员们有了病，他就拿出大烟为队员治病。在深山里，我们住的是自己动手搭的马架子。炕是我们开石板子搭的。没有炕席，我们就剥桦树皮。桦树皮这东西真好，铺在身下暖和极了。大雪封山，队员们就在马架子里，把桦树皮订成本，写字学文化。

我们这支武工队不断扩大，队员来源主要有3个。一是密云县的木河川、曹家路、察家店、大沟等老区的青壮年，他们觉悟高，对共产党、八路军有感情，死活不进“人圈”。为避免敌人抓捕，他们找到我们，同我们一起活动，结果参加了武工队。二是一些坚持山地斗争的民兵。过去，他们三三两两地活动，势单力孤，与我们合在一起，力量就大了。再就是原来的一些村干部。这个地区被日伪占领后，党组织和抗日政权遭到严重破坏，一些党员和村干部与组织失掉了联系。我们过来后，他们找上来，参加了武工队。虽然我们这支队伍发展比较迅速，但成份较纯，觉悟较高。所以，在那样艰苦条件下，也没有叫苦的，更没发现一个逃跑或投敌的。1945年春，我们路过长山峪附近的小平台，有个十六七岁的小伙子说什么也要跟着走，当八路军，打日寇。他说他的父母都被日本鬼子杀了，已经没家了。我把他留在身边，让他给我背包儿，当通讯员。这个小伙子高兴极了。当晚，我们破坏由长山峪至古北口的电线时，敌人发现了，派队伍打我们。仗打起来后，这个小伙子被敌人一枪打倒。我趴在他身边一摸，满脑袋是血，已经死了。因为情况紧急，我从他身上解下背包就同部队一起撤了，一口气跑了几十里，到长城附近才摆脱了敌人。我们就在一个靠城墙的小村子住了下来。第二天上午，这个小伙子找来了。原来是敌人一枪把他的太阳穴打穿了，当时昏过去了，等他醒来一看，部队撤走了。他忍着巨大的疼痛，边走边打听，终于找到了我们。由于当时医疗条件差，只是在他伤口上撒了点牙粉。想不到他的伤很快就好了，但在太阳穴两边留下了两

个肉阄阄，所以大家都管他叫“带豆的”。可惜的是，我已记不起这位可敬可爱的小战士的名字了。

（二）

敌后武工队，顾名思义就是战斗在敌占区的武装工作队。它的中心任务是在敌后开展抗日工作。我们这支武工队也是这样。它的中心是认真贯彻党的路线，放手发动群众，团结各阶层的爱国人士，结成广泛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断壮大人民力量，打败日本侵略者，推翻伪政权；围绕这个中心，广泛宣传群众，深人发动群众。我们活动的规律是昼伏夜出。白天躲在深山老林中，黄昏下山，傍晚进入“人圈”。进“人圈”前，我们放好哨，只许进不许出；进“人圈”后，直奔甲长家，让他召集群众开会。队员们兵分两路：一路刷标语。当时，我们身背石灰，走到哪儿写到哪儿；另一路向群众讲演，宣传党的主张，讲解抗日道理，教唱革命歌。我们教的歌子，有描写“九·一八”事变《流亡三部曲》，有描写“卢沟桥事变”的“七月的太阳似火烧，日寇进攻卢沟桥”和“小日本，心不公，一心要把中国征”。还有的歌子是我们根据形势自己编的。如希特勒垮台前，我们用东北秧歌调编了“打起鼓来敲起锣，咱们大家齐唱胜利歌。胜利歌儿年年有，今年更比往年多。墨索里尼、希特勒，骨碌骨碌滚下坡。”这些歌子确实起到了教育群众，鼓动群众，激发群众抗日热情的作用。向群众讲演，主要是针对日寇搞的“奴化”教育进行民族教育，如日本为什么侵略中国，怎样把日本人赶出中国去，等等。同时，我们还大张旗鼓地宣传抗日救国的大好形势。当时，第一地委（后为十四地委）有个《救国报》社滦西分社，办了张油印小报，上面经常刊登些抗日捷报。我们以此为依据，广泛宣传。

在广泛宣传、深人发动的基础上，我们注意从群众中发现和培养骨干，积极而谨慎地进行组织建设。为了更好地开展工作，我们

首先在一些村庄（"人圈"）发展和建立联络员、办事员。这些联络员、办事员的主要任务是提供情报，秘密地帮助武工队办些事情。如盘道梁北陈家庄的联络员贾彬，他不但为我们提供情报，还秘密地为武工队征粮。在发展联络员、办事员的基础上，我们逐渐地开展建党工作，首先把经过考验的联络员、办事员发展成为党员。我们当时发展的第一个单线党员就是贾彬。由于当时的客观条件限制，我们还没能在这些地方建立党组织。所以，对党员采取的是单线联系，联络方法主要是靠关里流行的那种"鸡毛信"。

在政权建设上，我们主要是把原来垮下的抗日政权恢复起来，在"人圈"里建立起地下抗日村政权，秘密地组织群众跟伪甲长斗，发动群众反对伪满，对抗日寇。后来随着工作的开展，我们在一些"人圈"里建立起抗日的两面政权。所谓抗日的两面政权，就是公开身份是日伪的甲长，秘密身份是我们的干部，但归根到底是为我们服务的。如狐狸窝的于甲长，他家虽然是个大地主，但由于我们认真地贯彻了党的统战政策，激发了他的爱国热情，所以他秘密地为我武工队做了大量工作。

《孙子兵法》上说："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特别是活动在敌后，知己知彼十分重要。要知彼，就必须加强情报工作。对于这项工作，我们主要采取了"普遍撒网，重点联络"的方法。所谓"普遍撒网"，就是向各甲长要情报，强制他们提供。他们提供了有价值的情报，我们及时给予表扬。对于个别向我们提供假情报的，就及时向他们警告，直至惩罚。"重点联络"，就是把主要精力放在同情报员的联络上。在发展情报员时，我们花大气力，把工作放在敌伪村公所、警察所上，采取"打进去、拉出来"的方法。针对村公所、警察所的伪职人员大都是当地人这个特点，我们充分利用他们的家属、朋友，千方百计地激发他们的爱国热情。把他们拉过来为我们服务。如曹家路大沟伪村公所副所长叫魏福生（后改名为张建民），是曹家路本村人，高小毕业，中农家庭出身。我们通过他的家属把他争取过

来后，他给我们送了许多情报。后来他在给我们送情报途中，被我冀东十二团误抓，送到十四地委。魏福生向地委书记李子光说明真相，李子光便派人把他送给我们。从此，魏福生当了武工队的文书，后来当了滦平县政府的的秘书。还有大沟警察分驻所一个姓马的警察，绰号"大金牙"，也是我们的情报员，后来正式参加了革命。

与此同时，我们还通过交朋友、攀老乡等方式发展小商小贩和走村串户的手艺人为情报员。这些人消息灵通，便于联络。1945年夏，我们在遥桥峪碰见一个张马尾罗的，一听口音，不是本地人。我走上前一盘问，这个人是我们县人，和我一个村，叫杨玉山，论乡亲我还得管他叫叔叔。他早年逃荒口外，所以我们互不相识。拉上乡亲后，分外亲热，他主动给武工队传递情报。他家在曹家路住，日寇投降时，当了我们的村长，为革命做了不少的工作。

我们这支队伍十分注意群众的疾苦，努力给人民群众以看得见摸得着的物质利益。当时，武工队活动的这些地区，老百姓穿衣十分困难。开始，还有些老百姓背些粮食，翻山越岭进关，换些土布回来。后来，日伪把群众这种交易列为"经济犯"之内，一经发现，就给戴顶"走私犯"的帽子，东西充"公"，人还要受皮肉之苦。因此，老百姓就不这么干了。这样，成千上万的群众没衣穿。一些穷人居住的"人圈"马架子里，靠墙旮旯儿都挖有容下1个人蹲的深坑。我们进马架子前，必须先打招呼，等穿不上裤子的女主人蹲到坑里去才能进去。派饭时，队员们要先在马架子外边等着，等女主人光着身子做好饭，蹲在坑里，才能进去吃。冬天，一些群众冷得挺不住了，就钻到柴堆里取暖，或是拢火烤。许多人大腿上、胸前和背后都烤出硬皮茧。这惨状真是让人听了心酸，见了掉泪！为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帮助群众"走私"，还派武工队队员护送。在"走私"途中，遇到大股敌人，就掩护群众疏散；遇到小股敌人，就对抗它。为了方便群众，地委根据我们的建议，在关里吉家营、新城子等地设立粮食兑换接待站，专门收购口外群众的粮食，根据卖者的需要，付给钱、

布、盐。后来，地委还印了一些粮票，我们在群众家里吃饭或向群众征粮，都付给粮票。然后，我们组织一些商贩到各“人圈”(村)用布、盐、钱等秘密收购粮票，把粮集中起来，再进关换钱、布、盐。这样，“走私”更方便了。我们这种作法很受群众欢迎，确实解决了一部分群众的穿衣问题，同时也便利了情报工作，为我们的活动提供了有利条件。此外，对于极端困难的孤老病残，我们把换下来的旧衣服、鞋袜无偿地救济他们。许多人穿上衣服后，热泪滚滚，感谢共产党，感谢八路军，表示坚决打日寇、救中国。

(三)

我们武工队要在敌占区站得住脚，开展好工作，就必须充分发挥手中武器的威力，狠狠打击灭绝人性的敌人。对于那些效忠日伪的伪村长、甲长及其他坏人，虽然要争取、教育，但也必须用武装作后盾，使他们有所惧、有所从。此外，我们的武器装备，也必须靠消灭敌人来补充。

1944 年夏，我们武工队成立后，刚一出关就受到了挫折。当时，我们听说曹家路附近大沟据点里的敌情有变化，决定由政治部主任张振东带原五区公安助理刘亚如和警卫员张珍去侦察。他们走到雾灵山西南侧莲花池的白草洼，直奔“搬厥梁”。这个“搬厥梁”既高又陡，下面是龙潭沟。当他们 3 个人刚刚爬上“搬厥梁”时，就与从大沟出来“扫荡”的敌人遭遇了。一阵枪响，张振东、刘亚如就被敌人打死，掉到龙潭沟里，张珍负了伤。当时，我们武工队正在大安峪沟西侧，听到枪响，知道发生了情况，就向响枪的地方奔去。我们赶到“搬厥梁”西侧，向敌人开了火，敌人跑了。当时，我们没有发现张振东、刘亚如牺牲，也没有找到张珍。所以，敌人跑后，我们也就撤回大安峪。第二天，张珍找到部队。当大家听到张振东、刘亚如牺牲的消息时，都十分悲痛，立即从遥桥峪、大安峪找来一部

分群众，同我们一起从龙潭沟里找到张振东、刘亚如的尸体，抬到小关梆梆石下的河南边安葬了。

张振东、刘亚如的牺牲，更激起了队员们对敌人的仇恨。大家咬牙切齿，磨拳擦掌，决心报仇。郭子忠、高原、王华荣我们几个领导一商量，决定乘大沟的敌人“扫荡”之机，半路打个伏击。伏击地点选在大安峪沟西侧。那个地方不但山高路窄，崖悬壁峭，而且灌木丛生，便于隐蔽。几天后，我们获得了大沟敌人出来“扫荡”必经此地的情报，就在大安峪沟西侧埋了几颗地雷。原计划地雷一响，排子枪一打，我们趁机一冲，捡个便宜。这一天上午 10 点钟左右，曹家路和大沟的敌人“扫荡”队路经这里。这时，我们早已埋伏在大沟西侧的南山上监视着敌人。眼看敌人接近埋伏区，我们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就在这时，狡猾的敌人停止了前进。我们的心一下子悬了起来，不一会儿，从敌群中走出了几个士兵，看来是探路侦察的。这几个士兵把我们埋的地雷都给起了出来。计划落空了，我们心里十分气恼。敌人起出地雷后，就上了西梁。上梁后，他们认为已经万事大吉了，就大摇大摆地下了梁。西梁一边是夹沟的一个平台，这个地方下不好下，上不好上。我们一看敌人来到了这个地方，心里又是一阵高兴，觉得在这个地方打也不错。队长郭子忠一声令下，我们五六十支长短枪一齐开火，一颗颗仇恨的子弹射向敌群。顿时，夹沟的平台上狼嚎鬼叫，敌人晕头转向，乱成一团。还没等敌人清醒过来，我们就迅速撤走了。隔了一天，我们来到夹沟的平台上，看到这个地方还残留着一滩滩的血迹和一盘盘的子弹。稍一收拾，就捡了 1000 多发子弹。这一下我们不但报了仇，而且补充了给养，发了“财”，真是高兴极了。从此，大沟的敌人再也不像过去那样猖狂了。

盘道梁是我们经常活动的地区。它是兴隆通往承德的必经之路。盘道梁的陈家庄是我们的“堡垒村”，群众基础好。所以，我们经常以陈家庄为基地，在盘道梁与敌人周旋，趁机打击敌人，还经

常埋地雷，截炸敌人的运输车辆，切断敌人的给养。有一次，我们发现从承德方向来了3辆卡车，正由梁下驶来，便马上派出队员，在大路的拐弯处埋好地雷，并把队伍埋伏在大路两旁。刚埋伏好，汽车来了。"轰轰"几声地雷响，汽车轮不转了。指挥员一挥手，队员们个个像离弦的箭，奔向了汽车。3辆汽车上6个押车的伪军还没明白过来是怎么回事，就乖乖地成了我们的俘虏。他们手中的6支三八枪也同时换了主人。这3辆汽车装的都是粮食。我们把粮食带走一部分，其余分给了群众。之后，队员们还用刺刀把汽车轮胎挑坏。类似这样的拦截活动，我们这支武工队常干。所以，敌人一提盘道梁就胆战心惊。

当时，在我们经常活动的地区流行这样两句话："为人不做亏心事，不怕碰见武工队。"的确，我们这支武工队对锄奸、反特、打击卖国贼、惩办为非作歹的坏分子抓得很紧，从来不心慈手软。对于那些欺压百姓的坏人，除罪大恶极、不可救药者外，我们始终立足于教育，争取他们改恶从善，重新作人。当时，日伪在北马圈子有个煤矿，矿当局盘剥工人十分厉害。特别是有个管帐先生，仗着日本人的势力，横行矿里，克扣工人，工人们怨声载道。1945年夏季的一个雨夜，我们踏着泥泞的山路，冒雨摸到矿上，从热被窝里拉出这个管帐先生，让他带着到矿上的牲口棚里牵出几匹骡子。之后，我们连夜把他和几匹骡子押到盘道梁东边的"气不忿"山下。这下子那个管帐先生吓坏了，磕头作揖地求饶。我们教育了他一顿，让他立下保证后，就放了他。后来据了解，这个管帐先生老实多了。矿上其他伪职人员的气焰也都有很大的收敛。

1945年8月末，瓢泼大雨下个不停，到处沟满河平。虽然日本已经投降了，但由于我们远离地委，耳目闭塞，所以还未听到这个振奋人心的消息，只觉得据点里的敌人不出来"扫荡"了。许多情报员反映，几个小据点的伪军人心惶惶，有的没粮食，断了顿，接二连三地开小差，大据点里的日本鬼子和伪军也好似丢了魂。根据这个

情况，我同高原、王华荣商量后，集中了武工队所属的10个分队，五六百人，去攻打刘杖子大据点。这个据点驻着几百名伪军和日本鬼子，炮楼修得十分坚固，四周的山上还修了不少了望台，各了望台都有伪军站岗。我们这支武工队，由于不断接受日伪"运输队"送来的"礼品"，因而装备比较强，每个分队都配备了轻机枪、掷弹筒，但还没有炮。一听说要打刘杖子，队员们劲头都很足，四周坚持山地斗争的民兵也自动参战，许多老百姓持棒拿刀前来助战。所以，参战人员一下子达两三千人之多，把整个据点围了个风雨不透。我们围攻了3天，虽然炮楼还没拿下来，但敌人"麻爪了儿"了，再也吃不住劲了。他们打出白旗，要求谈判。我们同意后，一个伪满军官打着白旗前来和我们谈判。当时，我们要求他们无条件投降，可这个军官却讨价还价。第5天，我们正在谈判中，看见从东而来了一队大鼻子兵。他们不管三七二十一，就向刘仗子炮楼打炮，几炮就把炮楼给端了，接着他们"哇啦哇啦"地冲过来。我们闹不清是怎么回事，赶紧命令队伍撤。结果，我们还有30余人没来得及撤下，也被大鼻子俘虏了。他们把我们这30余人同日伪军押在一起，奔向承德。后来我们才知道，原来日本鬼子投降了，苏联红军帮助我们解放了承德。因我们穿的衣服也是黄色的，苏联红军把我们当成伪军，所以把我们和真正的伪军押在一起听到这个消息，我们尾随着苏联红军到承德市牛圈子沟。进承德后，找到热西办事处，接待我的是办事处主任郑旭。我向郑旭汇报了刘杖子事件的经过。郑旭派人同苏联红军交涉，要回了我们的人员。

在同苏联红军办交涉中，郑旭同志还通知我，说上级决定让我带队接收滦平县，任命我为滦平县委书记兼县长，并出了个告示。行前，郑旭还送给我1支崭新的手枪作纪念。之后，我们这支五六百人的队伍开进滦平县城，以后改编为滦平县大队，我仍兼任政委。从此，我们又开始了新的战斗。

（作者曾任中共承德市委副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等职）

开辟承平宁抗日游击根据地的回忆

周治国

一.深入敌后开辟口外根据地

1940年3月我身染重病,地下党组织通过韩平同志把我送到长城外宽城县的北大岭李翠家养病,在他家精心照顾下,我的病情逐渐好转,便随同他家里的人上山砍柴、采野菜。一来为锻炼身体,二来借机查访一下周围环境和敌人情况。为进一步摸清敌情,我在1940年5月同韩平同志一起到平泉县城进行实地调查。

在平泉县城,我们找到了韩平同志的一个远房家族,名叫韩显发。他是一个专门收买皮毛、猪肠、羊肠并加工出卖的小商人。铺面不大,两间小屋。我和韩显发早已相识,他也了解我的身份。因此,见面后,对我们很热情,用油炒小米饭招待我们。

在闲谈中,我们了解到平泉街上设有一个旗公署(当时平泉县称喀喇沁中旗),一个警察署,伪公职人员及警察约有二三百人。由于平泉地处交通要道,又是关内、外之间重要的商品集散地,因而常有日伪军往来居住。他们在此胡作非为,老百姓非常痛恨日伪统治,盼望中国军队早点打回来。

通过3个来月的调查了解,我感到这一带进行抗日游击战争极为有利。为此,我不等病痊愈,于1940年7月返回关里。在迁西县东荒峪找到了冀东军分区司令员李运昌,向他汇报了我的调查情况。

李司令员听后很感兴趣，他说："我早想把游击活动扩大到口外都山一带，只是没有合适的人去。早在1934年抗日救国军的首领孙永勤的部队就在青龙、兴隆等县活动。当时我冀东党主要负责人王平陆同志曾派人与孙永勤有过联系。后来孙的部队失败，加之我们的力量有限，所以一直未能在都山一带开辟抗日工作。"

他接着对我说："你能借养病的机会，对这一带的情况进行调查，很好。现在组织决定派你去开辟这一地区，你看怎么样？"我说："司令员发话了，我当然要坚决服从，但总得给我几个人，不然也没个帮手，碰着问题连个研究商量的人都没有。"李司令员鼓励我说："现在还派不了合适的人，等以后我们再增派。我看你一个人先去串连、串连，把群众发动起来，抗日的事情就好办了。"我说："好吧！"之后，李司令员亲笔给孙景华、韩凤武、刘凤年各写了一封信，嘱我代交，并写了一个关于我工作调动的通知信，叫我交给三总队领导。

临行时，李司令员还一再叮嘱我："你只身前往敌占区，要紧紧依靠当地广大群众，充分发挥一个党员的火种作用，在满洲国的西大门点上一把抗日的烽火。"

任务就这样定下来了，我感到责任重大，同时也感到困难重重。就我一个人去敌占区，一无亲，二无友，怎么开展工作呢？我跟孙景华、刘凤年、韩凤武又不相识，信又怎么交呢？但军令如山倒，作为一个革命军人应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不应该向党讲价钱。于是，我向李司令员表示：尽最大努力完成任务。

1940年7月中旬，我带着两只手枪离开冀东根据地，奔赴古长城。

我感到，仅凭我一人、两支枪不能完成上级党交给我的任务，必须发动群众。于是，我动员出过去曾跟我打过游击的贫农李怀义，又在擦崖子串连了远房亲属周万余，他们都是精明能干的小伙子，先给我做警卫工作。然后，我们一同到迁西县龙湾村找到了我

表哥刘明。

刘明能说善讲，广为交际，还当过保乡团员，枪打得很准，在当地老百姓中有一定威信。我向他说明来意，他非常高兴参加抗日活动，还帮我在他本村找到了一个当时的上层人物刘墨卿。

刘墨卿是国民党员、知识分子。他的大内弟张祥林（原名张瑞）曾参加过保乡团，是孙、刘、韩的部下，为人耿直、忠厚、善交际、明义气。我觉得由刘墨卿、张祥林两个做为我们开辟口外地区的桥梁比较合适。于是，我通过刘明做刘墨卿的工作，动员他出来参加抗战。

1940 年 7 月下旬，我们一起离开冀东穿越长城，来到口外松树沟张祥林家。这是一个人家不多的小山庄，背靠大山，前临一片较开阔的河套。

张祥林家看上去家境比较宽裕。有 7 间房子，几十亩地，还有几头大牲畜，并雇了一个放牛的。

经刘墨卿介绍，我们和张祥林兄弟见了面。我向他讲明身份，宣传抗日救国道理，谈开展游击活动，打击日寇，恢复河山的一些想法，得到他们兄弟 4 人的积极响应。

通过几天的交往，我们对张祥林一家的情况逐渐有了了解。张祥林为兄弟之长，民国时曾在孙景华部下当过保乡团的班、排长。日本人成立伪满洲国后，农忙时在家作农活，农闲时同大烟商打交道，参与武装保镖活动。这些人枪法准，地理熟，朋友多，如能争取过来对我们在这一地区开展抗日武装斗争十分有利。老二张友是地道的农民，为人忠厚、老实，但也当过保乡团员，枪法很准。老三张显是个知识分子，在本地熊虎斗伪村公所当会计。老四张贺是伪满国高毕业生，尚无确切职业。

他们兄弟几人虽各自经历不同，但都健谈，好交，有一颗爱国心。我们通过亲串亲、友访友的办法，发动群众，使党的抗日救国主张很快深入人心，要求参加抗日部队的人越来越多。

张祥林家先后有 9 人参加了革命，他四弟刚结婚，夫妇二人就双双参加了抗日斗争，最后就连他家一个小放牛的王再生也投身到革命队伍中来。在抗日战争中，他们家有的英勇牺牲，有的被迫害致死。房屋先后多次被敌人烧成一片瓦砾，弄得他们有家难归，但他们并没有屈服，仍坚持抗日斗争。

除张祥林一家外，现在能回忆起来，经张祥林介绍出来脱产参加游击活动的有李长红、李长和、李会友、李庆轩(李贺)、赵振香、李青山、赵振清、宁阁云、周老占等同志。张友也动员出来许多同志。张显在伪村公所内部秘密地串联了苏百熙等人给我们做耳目。在这些游击队员中，李青山原是抗日救国军的一个小头目，对青龙、平泉、承德、围场一带地形比较熟，而且有些朋友。他除将自己的儿子李长青和抗日救国军时的战友刘元存、刘永明介绍出来参加游击队外，还受我之命带领李怀义、陈立民、李长和等同志赴光头山一带串连抗日力量。这样，经张祥林等同志的工作，我们很快组织了一支小游击队。

为了团结更多的人抗日，扩大统一战线，我们积极开展团结在当地有影响的上层人物的工作。孙景华、刘凤年、韩凤武是当时我们统战工作的主要对象。张祥林虽与这些人认识但不十分熟悉，贸然前往恐有不便，最后想到了好友周老占与孙景华是至交，而且家住偏僻，独自一家，周围满是果树，且与孙景华家相距不远。于是，我们和张祥林同志同去周老占家。

周老占原籍是迁西县三屯营人，出身贫苦，以买卖皮革、猪毛为生。因而经常出入长城内外，四处周游见识较广，思想比较开通。特别冀东抗日大暴后，他受震动很大，热心抗战。我们同他一商量，立即得到积极赞同。

在周老占家，我们结识了孙景华。我向他面交了李运昌司令员的亲笔信。内容大意是：你过去曾带领百姓保卫家乡，现在国难当头，匹夫有责，你应该以民族利益为重，不可苟且偷安，应高举义

旗，奋起抗日。今派我部下指导员周治国与你联系，洽商抗日救国事业，望予协助。他看完信后，我又转达了李司令员对他的信任和期望。孙听后大为感动，表示愿意为抗日救国出力，我即委任他为八路军联络员，并托他将另两封信交给刘凤年、韩凤武。

孙景华出身下中农，为人正派，对抗日工作非常积极，仅经他手先后帮助，我们从地主、富农家中动员出埋在地里多年的枪10余支，子弹上千发，并从据点里买出上百斤炸药。刘凤年出身大地主，韩凤武出身也是地主并担任伪村长。他们二人接到信后，因怕日本人知道了掉脑袋，没敢和我们见面，只是托孙景华转告我们，他们二人绝不破坏抗日。后经孙景华多次说服动员，刘凤年才被迫交出大枪2支和一些子弹，韩也交出了2支大枪、1支手枪和1挺机关枪（以上这些枪因埋地下多年，起出来不能用了），刘韩二人态度虽不积极，但总的说来对我们开展统战工作，共同抗日还是有利的。

在统战工作中，孙景华同志做了大量工作，也取得了很大成绩，是一位值得我们学习的好同志。后来，孙景华同志被坏人马旭告发，在峪耳崖被捕。在狱中，敌人对他施尽各种酷刑，甚至用筷子往阴胫里穿，但他并没有因此而屈服，没有供出一个游击队员的名字来，临刑时仍怒斥敌人说："你们现在杀了我，日后周指导员（当时我的身份和名字已公开）回来会把你们都杀光，替我报仇的。"尔后慷慨就义。为了给孙景华烈士报仇，我们将马旭捕获处决了。

1940年八九月，我们深入到都山西部的马尾沟、孤山子、龙凤沟、亮甲台、长沟、山湾子、葫芦峪等村。这时在光头山一带活动的李青山回来汇报说："光头山附近有许多迷信团体如红枪会、黄枪会等，其会员多是些贫苦群众。他们组织之初，是为防犯兵匪抢劫。日本帝国主义侵华后，到处烧杀抢掠，因而他们也有强烈的抗日要求。

听了李青山等人的汇报，我觉得这一带农村比较落后，老百姓

迷信不足为怪。说什么佛法附身就可刀枪不入，由他说，只是真心抗日，我们就要团结。于是，我又令李青山与他们联系，团结，争取他们同我们一起抗日。不久，当地红枪会头目李文彪等率队前来投奔我们。

为了更好地团结他们一道抗日，我们对他们搞的那一套封建迷信活动，不是采取简单的一律反对的态度。这因为：一是他们还没有觉悟，不可冒进，否则会伤害他们，甚至脱离我们。二是当地一些敌伪人员也信奉这些东西，我们也可利用这个机会做工作。当然，对于他们的封建意识，我们也不是采取放任态度，特别对后来加入革命队伍的红、黄枪会成员，则在日常生活交往中进行帮助教育。为此，我们还组织他们进关里进行参观学习，使他们亲眼看到我们部队的学习、战斗、生活。人民群众高涨的抗日热情，使他们中的许多人思想上有了很大进步，抗日劲头更高了。

记得1940年秋，我带李文彪等红枪会队员去冀东根据地参观学习，并顺便买些布匹做冬装。一路上，他们看啥都觉得新鲜，越看越觉得共产党、八路军说得对，纷纷表示要参加八路军和我们一同抗日。在回来的途中，我们走至鸡了峪时，突然被日伪军包围，情况十分危急。我们被迫与敌展开激战，随同我们一起去的红枪会队员表现得非常勇敢。我们打死1名鬼子，打死几名伪军，终于击溃了敌人，杀出一条血路，返回了游击队驻地。

经过一段教育，他们思想上有了很大进步，抗日劲头更高，大部分人成了我们队伍中的骨干力量。在多次同日伪军的战斗中，他们勇敢杀敌，屡建战功。

二、青平工作团及区、村政权的建立

我们游击队活动在迁、青、平一带。1940年11月打下广峪耳崖矿。1941年1月又连续打了城子岭和三道关战斗，消灭敌人100多人，我们游击队已发展到100多人。

1941年4月，冀东区党分委指示在热南成立青(青龙)、平(平泉)工作团。我被任命为工作团主任，我带的游击队正式命名为青平游击队。此后，冀东又相继成立了几个工作团，如同年12月成立的以高敬之为主任的长城工作团。为了加强青平工作团的工作，上级还派葛春生、张阁云、胡成、刘汉臣等同志参加我们的工作团。我们的分工是：周治国任工作团主任兼游击队队长和指导员，负责全面工作，以军事为主；葛春生(现名葛振武)同志任工作团副主任，负责建党、建政工作。

当时建政的重点在平泉县以南，青龙县都山以西及西北地区。因为在成立青平工作团前这片游击区已有了组建区政权的基础，所以到1941年秋冬之季，仅用几个月时间就组建了4个区，在有些村子还建立了村政权。村政权一般设办事员、武装委员、农会主任、妇救会主任及交通员等。对于伪甲长基本没动，而是经过做工作把他们变成两面政权，使之真心向我，假心向敌，应付日伪。

青平工作团四个区抗日政权的范围大体如下：

一区，大约是在1941年4月组建。

东部：北起都山——八道河——南到白洋峪；

西部：北起安达石——峪耳崖——南到碾子峪；

南部：西起碾子峪——擦崖子——东到白洋峪的长城沿线；

北部：西起安达石，东到亮甲台。

二区，大约是在1941年5月组建。

东部：北起安达石——峪耳崖——南到碾子峪；

西部：西起塌山——瀑河口——南到喜峰口；

南部：西起喜峰口，东到碾子峪长城沿线；

北部：西起塌山——宽城——东到安达石。

三区，大约在1941年10月份组建。

东部：北起松树台——汤道河——南到都山；

西部：北起大吉口——党坝——南到安达石；

南部：西起安达石——亮甲台——东到都山；

北部：西起大吉口，东到松树台。

四区，大约也是于1941年10月组建。

东部：北到大吉口——党坝——南到安达石；

西部：北起八家，南到塌山；

南部：西起塌山——宽城——东到安达石；

北部：西起八家——满杖子——东到大吉口。

建政之后，我们利用青平工作团的名义积极开展工作，团结各界一齐抗日。除了依靠广大贫苦群众外，我们还注意发动各阶层，各界（包括敌伪官员在内）一起抗日。我曾三上都山动员老道、尼姑子要他们利用讲经布道，走街化缘的机会替我们侦察敌情。有时我们也到山上做做隐蔽，或了解情况。人家说出家人吃八方，我们呢？连出家人的饭也吃到了。

在统战工作中，我们还注意利用过往商贩为我们工作，以沟通经济渠道，解决物资匮乏问题。伪满时，敌人对商贩活动限制很严，动辄以经济犯论罪。而我们非但不加限制，反而给予必要的保护。对于我们革命队伍中的一些借机敲榨，造成极坏影响的人，则采取严厉措施，予以纠正。如迁西县大堡城子农会主任霍万起经常盗用八路军和区政府的名义，以检查过往商贩有无汉奸特务为名，借机图财害命，影响极坏，后被我抗日政权依法处决。因此，这些商人十分拥护我们，反对伪满统治，椁椤树的杨春廷，亮甲台的何金余、何金宽，大地的刘大富、杜连清，大堡城子的李祥元等商贩都给我们弄过武器和弹药，做过许多有益于抗战的工作。

为了配合开辟地区，我们也展开了武装斗争。5月下旬，在龙湾村打垮了夏岛讨伐队。我们游击队也发展到一百五六十人，经常在迁青平地区同日伪军周旋。

1941年7月份左右，为进一步开辟新的抗日游击区，我青平工作团决定主动打击日寇，然后建立地方政权。我们在15天内就

打了 16 仗。

第一仗从荞麦场打响。一接上火，敌人便咬住不放，天天打，有时一天打两仗。由于这一带是新区，没有群众基础，情报也不及时，不准确，打起仗来是比较被动的。

我们从荞麦场冲出后，向西撤，穿过西梁到平泉大石湖川。这时天已漆黑，我们准备吃点饭，稍加休息。但叫不开门，只好跳墙而过，把门打开。进屋一看，家里没有人，我们划拉一些柴禾，把饭刚做好，还没等吃敌人就把我们包围了，双方展开了激战。在这次战斗中我们牺牲了 3 个战士，其中一个是从山崖上掉下来摔死的。

突围之后，我们撤到椴树洼，敌人尾随而来到，又打了一仗。我们边打边撤，转到大小前坡峪，敌人仍步步紧跟，一步不让。我们撤到安达石同敌人激战一场后，穿过桲椤树，过上、下板城，仍没把敌人甩掉，在此又同敌人接上了火。经过一场苦战，我们决定撤回长城口里，才算最后把敌人甩掉。

15 天来，同志们天天绕村跑，走路打仗，睡不上觉，吃不上饭，找不到井，只好喝一些山河沟里的水解渴。艰苦的战斗生活，使一些同志人关之后，就闹开了肠炎。

回顾这次战斗的教训，我们感到：在敌占区没有群众工作基础，是不适宜部队集中活动的，也不可能随之迅速建立起抗日政权。大部队活动既容易暴露，也不易于分散，加之我们弹药缺乏，补给困难，一但被敌人死死咬住，展开正面战斗，很难取胜。只有分散活动，才能充分发挥我们灵活机动的游击战术的优势。

总结了这个教训后，我们把部队分成一股一股小武工队，一般十几个人，最多不超过二三十人，用以宣传组织群众，建立区政权，除奸、反特，打击敌人。

三、承平宁区、村政权的建立

1941 年冬，冀东区党委决定将青平工作团改为青平办事处。

主任是张真理同志，副主任仍为葛春生同志。同时决定选调我和150多名精干的指战员充实在战斗中伤亡较大的冀东军分区十二团，我任该团一营副营长。青平工作团剩下的百余名战士，一部由刘增孝、苏百熙、李青山、裴文合带领到光头山一带活动，剩下的一部分同志被充实到青平办事处领导下的4个区。

1942年4月初，我接到军分区调令。李运昌司令员对我说："晋察冀边区党委指示我们成立几支远征工作队，现在任命你为冀东军分区第一远征工作队队长，李宝华为副队长，另有区干部崔建舟同志一同随往，并令我从原青平工作团所辖各区挑选了李会友、马玲、张喜福、刘善、蔡荣国、高永生、王再生、钱文春、刘东安、张野溪、张旭等15名战士。

远征队发展方向：向锦承铁路以北尽力发展。任务是牵制敌人，扩大游击区，尽可能与东北抗联取得联系。李司令员还指示冀东军分区宣传科长雷华起草了一份《告东北同胞书》，印刷了几千份，叫我们随身带上，沿途散发、宣传，以扩大我军影响。

1942年5月初，由我们18名同志组成的第一远征工作队离开冀东，远征北上。

后来我听说，我们走后又组建了两个远征工作队。第二远征工作队队长是李满盈同志，方向是承德西部滦平县、隆化县一带。第三远征工作队队长是宋国祥同志，副队长张仲三，后来张化东、周鸣岐、信修同志也去了。方向是青龙县东部建昌、凌源、绥中县一带。第二、第三远征工作队也开辟了很大的一片抗日游击区，但我们这三个工作队互相没有取上联系。我们于1942年旧历5月挺进到平泉，从东南插向西北。几天后在光头山南面圣祖庙里的大营子同李青山、裴文和带领的游击队会合。自1941年冬分手后，他们始终在这一地区坚持抗日斗争，队伍已发展到五六十人，纪洪恩、杜明岐等参加了游击队。我向他们传达了上级党组织的指示，并将他们划归工作队统一领导。

为鼓舞士气，1942 年 7 月，我们攻打了围场县东南的茅荆坝警察分驻所。在这次战斗中，我们缴获大枪 20 来支和一些其它战利品。俘获敌伪人员 10 余人，对他们进行一番教育后，都释放了。

为更好地发动群众和保证对部队的供应，1942 年六七月份，我们首先以三沟、六沟为中心组建了一个新的区政权，定为第一区。第一区区长为崔建舟，有助理员张旭等。

因当时我们开辟的区域较大，而适合做建政工作的干部又太少，因此派副大队长李宝华回冀东汇报了我们的工作，同时要求增派干部。冀东区党分委 7 月份派来了高捐雨、赵洪山等同志，于是，我们又组建了第二区。第二区区长高捐雨，助理员赵洪山等。

区政权建立之后，我们一方面发动群众，一方面开展统战工作。

二区洼子店东沟有个教书人名叫杨润田，同一些伪官吏的上层人物较熟，早年曾参加过抗日救国活动。我们便对他进行思想工作，说服教育他，并找来一些传单、书籍，其中有毛主席和中央其他领导在延安整风时的一些讲话让他看。他看后思想逐渐转变，由消极等待，变为赞成抗日。我们在这生活 10 余天后，一天我对他说："你来的时间不短了，如果杨先生愿意回去的话，我们可以提供方便"，他说："不走了，出来这么长时间，回去敌人也不能放过我。与其引颈受戮，不如和你们干他一场。"我说："好！留下我们也欢迎"。以后，他就跟我在身边，做文书，并利用以往的关系协助我们做了一些统战工作。（解放后，杨润田做了我们的领导干部，曾任热河省民政厅副厅长和承德市政协副主席，1981 年病逝。）

1942 年 8 月，我们开始组建第三区，李会友任主任（书记）兼区长，纪福东、薛荫廷任助理员。

10 月，冀东区党分委从训练班结业学员中又分配来贺文涛、苏振东、贺仲一、赵有哲、包文胜、王茂松、王永等 13 名干部。我们除又组建第四区外，还充实了一、二、三区和游击大队，同时对整个

远征工作队的领导班子也做了一下调整。

第四区区长苏振东(现名王旭昌),组织委员甄斌,农会主任张建光,副主任王文焕等。

以上所建各区,方圆均在百里之上。在这些地区,我们秘密发展了一些党员。他们在发动群众,宣传抗日救国等方面起了骨干作用。各区在基础较好的村子还建立起村政权和抗日救国会等抗日团体。这些村政权多半是通过改造敌伪的牌、甲长而使之成为真心向我的两面政权。在一区我们还开展了征收粮款工作。

除上述工作外,我们积极开展对敌分化瓦解工作。做这项工作,我们根据不同情况采取不同策略。一方面,我们严厉地镇压了一些死心塌地的汉奸走狗。

为了扩大统一战线,我们经常通过伪家属做伪牌、甲长伪警察,伪官吏的工作,让他们"身在曹营心在汉"。比如我们对围场县茅荆坝的警察所就没有打。因为我们那次攻打这个警察所时已对伪警人员进行过教育。你把它打掉了,敌人还会恢复起来,情况不了解,更不便于工作。倒不如通过其家属进行说服教育工作,利用伪警察瞒骗日本鬼子,使之成为瞎子、聋子,为我们提供方便。这样,我们就可以在敌人眼皮底下发动群众,从事抗日活动。对于他们,我们也适当地给以一定的照顾,许以保护其家产和人身不被侵犯。

认真贯彻执行党的抗日统一战线,使我们开辟敌占区的工作得到了顺利地发展。

在建立区政权的同时,我们又秘密地建立了两条地下交通线,以便同关内上级党组织取得联系,接受任务,开展工作。由于当时条件差,没有电台、邮局,通讯联络全凭地下交通线。

交通主要有两项任务:一是地下交通,负责从口里向口外转送干部,军事物资等;二是通信联络,负责往来信件,像古代的驿马站一样,相隔一定距离便有一个,这样一站传一站,哪站出问题,由哪

站负责。

地下交通线有着严明的纪律，每个站及地下交通员都有代号，联络暗号。

经蔡瑞宝、段锡福、张野溪等同志做工作，我们在平泉、宁城、青龙、承德建立起两条地下交通线。

地下交通线的同志们在当时做了大量的工作，为革命出了不少力。当时我们送往信件中有时插鸡毛，标志飞快，有时插火柴，标志火速，不管是鸡毛信，还是火柴信，只要我们信件到，这些同志立即放下自己的事，宁可不吃饭、不睡觉，昼夜兼程为我们传递消息、信件。

当时环境恶劣，特务汉奸到处流窜寻找我们，稍不留意就会暴露，随时都有被捕牺牲的危险。但他们宁可牺牲自己，也绝不向敌人告密，表现出崇高的革命事业心。

四、主力部队的配合及光头山突围战

1942 年秋后，冀东日伪军进行第五次“强化治安”，我主力部队约 1000 余人转移到外线，在一、二、三、四区休整。由于我们统战工作搞得较好，部队没有因暴露而被迫打仗。

以往冀东日伪军扫荡有一定的季节性和时间性，多年都是一两月。这次与之大不相同，敌人一连 3 个月没有开拔，他们还在大搞“三光政策”的同时，又搞起了新花样，施行所谓的“沟壕堡垒”战术。在冀东平原上到处挖沟壕，修炮楼，企图以此来实现所谓的“强化治安”，摧毁冀东抗日根据地。

敌人的这一套战术确实给我们根据地造成很大损失。1942 年底，在长城外的我八路军为了把“围剿”冀东的日伪军引到长城以北，以便迅速恢复被敌人破坏了的冀东抗日根据地，于是发动了热南战役，在几天之内连续打下了平泉北部和西部的黄土梁子、八里罕、三沟、六沟、七沟、毛沟、五家等四五十个警察所和村公所。当时

热南战役不仅在承平宁地区，而且在青龙、兴隆等地区也同时展开。这次行动之后，冀东十一团参谋长高桥同志带领2个连，十二团二营五连指导员阎汉臣同志带1个连受命继续在承平宁地区活动。

我和高桥同志几年没见面了，在此相逢我们都感到非常高兴，互相述说了离别之情，高桥同志还把一本他在边区学习时发的由整风文件汇集而成的书给了我。这本书对于我政治思想水平的提高发挥了很大作用。

主力部队帮助我们打开了局面，把大片隐蔽的游击区变成了公开的抗日根据地，群众和我军政人员都欢天喜地，庆祝解放。

伪热河省对我发动的热南战役大为恐慌，急忙向伪满洲国都“新京”告急，“新京”为了确保“西南国境线”，便从伪满洲的第四、第五军管区抽调了9个满洲旅、1个装甲旅、2个骑兵大队、27个讨伐大队直扑而来。据伪警官讲，加上热河原兵力计达10来万日伪军。

这次主力部队帮助我们打开了局面，由于互通情况不够使我们失去了一些在敌人内部的耳目，尤其是因盲目乐观，对敌情估计不足，加上侦察工作不利，因而对敌即将进行的大规模“围剿”缺乏思想上的准备，使敌人用突然击的办法，把我游击区分割后，用重兵团团包围起来。

1943年春节将临，我们第一远征工作队和高桥、阎汉臣所带的主力部队商议，准备召集各区的干部和游击队指战员到承德县圣祖庙大营子村开个会，总结一下前段的工作，庆祝一下我军热南战役打开局面的胜利。为此，我们还弄了些荞麦面和牛羊肉，准备在春节时和同志们一起改善改善生活。这时，大批日寇和伪满军队已开始对热河地区进行“围剿”，并在青龙、平泉、承德、宁城、兴隆等地派重兵。

由于情况突变，许多同志没能按时赶到，只有三区的干部到

了。第一中队包文胜、崔建舟同志率领游击队走到承德县的小建厂沟时和敌人遭遇，打了起来。经过一场激战，一中队长包文胜，司务长张旭及全中队 40 人，除崔建舟一人负伤幸存下来外，全部壮烈牺牲。

大年三十晚上(1943 年 2 月 4 日)，我们在承德县的大营子正准备包饺子过年，突然有情报，敌人正从大营子东南山，东北山对我驻地实行包围。

情况紧急，我们来不及吃饺子，立即研究决定，高桥、阎汉臣及工作队全体同志由高桥同志统一指挥向光头山方向突围。

这时，天降鹅毛大雪，不久狂风大作，一时间风雪弥漫，搅得天昏地暗，很难分清道路方向，但也给我们带来了一个有利条件。由于气压低、枪炮声显得很沉闷，声响也变得很小，使敌人摸不清我们的确切方位，四面瞎打，有时同我们跑对面，他们还错以为是自己人。一但相互发现，我们就一顿手榴弹，把敌人炸得四处逃命，然后趁机夺路而去。

经过一夜的突围，我们走出有 30 余华里，认为已冲破敌围，便决定在去光头山途中的一个小村庄做饭休息。饭还没做好，又被敌人发现，于是我们边打边向平泉西北部的光头山上撤。

光头山海拔 1731 米，因其顶峰多为石岩，没有山林，杂草也不多，光秃秃的。

入夜之后，光头山上风吼雪飘，没有丝毫减弱。天寒地冷，气温已下降到摄氏零下 40 余度。战士们腹内无食，衣着单薄，连续在风雪中作战奔跑，衣服鞋袜早已湿透。又被冷风一吹都冻在一起，如若盔甲一般，行动起来咔咔作响，每走一步都很艰难，好多人的手脚耳朵都冻得毫无知觉，一触即断。记得有个战士摔了跤，手一着地就触掉了好几个手指头，断了以后连血都不流。

条件这样艰苦，同志们仍旧充满着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战士们不仅精神饱满，而且毅力惊人。记得有个小战士，年龄也就十六七

岁，把脚冻坏了，同志们发现后，要抬着他走。他坚决不肯说："这算什么，比起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爬雪山，过草地强多了。连这个都坚持不了，还算什么战士！"说完，他咬紧牙关，一瘸一拐，顽强地向顶峰爬去。多么好的战士啊！望着这个小战士的背影，我们几个领导同志都感动的流了泪。

天将明，侦察员回来报告说：四面均有敌人埋伏。南面是日本鬼子，北边是讨伐队，东西两边为伪国兵。根据这一情况，我们几个领导人经过分析，感到形势严重。在山上孤军无援，继续坚持，无异于坐守待毙。必须趁天亮前从西北边，即从敌人力量较弱的敌讨伐队和伪国兵之间突围出去。

队伍整队后，身体好的同志一部分担任警戒；一部分每 4 个人一组，各拿白布一角抬着伤病员沿山西北边一条大沟向外突围。

这时雪虽停了，但朔风滚滚把雪卷得漫天飞舞，分不清哪是平地，哪是坑包。老侦察员于得水同志始终走在前面为同志们开道，战士们随后跟上，踏着没膝深的大雪，深一脚，浅一脚地向前走。不时有人掉到沟坑之中，很快又在同志们的帮助下爬了上来。

条件越艰苦，越需要同志们互相关心、鼓励。当时，我有一付皮手套。我觉得带兵的人首先得爱兵，因而，我将手套送给战士戴。战士们怎么也不肯，认为干部往来奔走比较辛苦，应该干部带。这样让来让去，最后决定给冻得厉害的同志相互传递着戴。一付皮手套充分显示了我们党所领导的八路军的官兵关系。正是这种关系，才使我们的军队充满着战斗力。这付皮手套在一九六一年被建平县征集做革命文物，可惜"在文化大革命"中丢失了。

虽然行动艰难，但脚印也被风雪所吞没，敌人难以发现我们的行踪，成了我们天然的保护神。早上 9 点多钟，我们终于穿过了敌人的封锁线，爬上了光头山西北的那座山峰。

这时，从光头山方向传来了隆隆的炮声。不一会，步枪、机关枪也一齐叫了起来。估计可能是敌人发生误会而相互争斗。枪声一

阵紧似一阵，好不热闹。望着光头山上的激战场面，战士们高兴地笑起来，说："打啊！多打死几个小鬼子省得老子费事。"

下山后，我们在瓦房沟的一个小村庄休息了一下。一面布置岗哨，一面告诉老乡切不可走漏消息，并动员各家各户腾房子，准备柴火，找盆子和凉水给战士用。一些关里来的同志缺乏经验，用火烤，热水暖，结果伤势更重，行动也更加不便。老侦察于得水同志虽没用火烤、水暖，但由于他一直在前开路，因而冻伤严重，脚趾已坏死，一碰即掉，被老于顺手掷于院内。偏巧被狗望见，扑将上去一口吞入肚内。此情此景，痛人心田，催人泪下。当我们几个领导同志去各屋看望安慰伤员时，有一伤员向我们建议说："首长，我们遇上这样恶劣的天气，又遭到敌人重重包围，最好把我们安排到老乡家里，不然带着我们行动太不方便了。否则，我们谁也突围不出去，会给革命带来更大损失，完不成党交给我们的任务。"

听了战士们的话，我们几个领导同志眼睛湿润了，泪水情不自禁地夺眶而出。这是多么好的战士啊！在这生死存亡的关头，他们所想到的不是自己，而是革命、战友。经过研究，我们采纳了这些同志的意见，决定区长李会友同志负责带领几个同志把这些伤病员做一下妥善的安排。

第二天，天刚亮，附近村子一些贫苦老百姓三三两两地把 30 多个伤病员都接走了。临行时，留队的战士安慰伤病员要好好养病，再返战场。伤病员则鼓励留队的战士要猛打猛冲，早突出重围，替他们多打死几个鬼子。同志们依依不舍，洒泪相别。

起初，老百姓把伤员多半安藏在家里，后来情况紧张，老乡恐被敌人搜走，又把伤员分藏到炭窑或柴垛里。由于大雪刚过，走路时脚印未除，结果大部分战士被搜山的敌人讨伐队发现。这些战士手无寸铁，又重伤在身，已无抵抗能力，都被逮捕送到承德监狱，后来大部分英勇牺牲了。

在这种残酷恶劣的斗争环境里，我们大多数战士表现出不屈

不挠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但也有少数人被这种环境吓破了胆，跪倒在敌人脚下，成了可耻的叛徒。

第一远征工作队的副队长李宝华，平时就胆小怕死，畏惧困难。光头山突围后，我们决定他就地养伤，他被接到一个老乡家，受到老乡无微不至的关怀。情况紧急时，又把他和另外2个战士藏到一个远离村庄的一个报废了的矿井里藏了起来。并带去他们3人所需的羊皮褥子以防受凉。每日老乡都冒着风险给他们送饭，送炭，从没有误。一个多月后，李宝华伤势逐渐好转，他不是带领另2名战士重返战场，而是私自一人投降叛变，成为中华民族可耻的败类。

伤病员同志安排好后，我同高桥、阎汉臣等同志一起商量认为：在这种恶劣的环境下，不宜大部队一起活动。要坚持敌后斗争，突破敌人包围，还应以小股分散的游击活动为好。于是决定：我们各自将部队带开，深入敌后打击敌人。高桥同志和阎汉臣同志带领主力到赤峰和宁城西南部活动。将三中队剩下的30多名同志和十几名机关的同志由我带领奔往围场县东部山区活动。

分手后，我们边行军，边休息。在围场活动一段后，我将刘永明、刘东安等人留下坚持这一带活动，剩下20余人由我率领又开始向回转，经在十八盘，车轮桥、石拉哈沟、柳溪川转到正月十五左右的一个深夜，在马架子一家姓姚的家住下了。这个人和斐文和认识，过去我们也曾到过他家。

我们吃了点饭刚睡下，就被一声枪响惊醒。枪响后，我们没见在外站岗的张野溪进来报告情况，立刻意识到情况不妙，随即翻身下炕，做好战斗准备。我向外一看，敌人已将我们团团包围。这时门口两个伪军正端着枪，朝里喊叫："八路匪快出来交枪！"我抬手就是一枪，没想到是个臭子。第二枪虽响了，但是个炸子，把我的枪机炸坏了。不过把敌人吓了一跳，不敢再堵门了。我见我的警卫员马振同有一支小马枪，顺手操过来，领着他和王振兴乘机躲到了房

东草棚里。敌人又开始向门口拥来，我用枪打倒了几个。山头敌人见状用好几挺机枪怪叫着向我们这边射来，封住了门口还是冲不出去。这时，马振国、王振兴跃身从墙头跳出，跑了出去。我回头一看，旁边用山柴夹的杖子有一个豁口，便顺豁口钻了出去。外边是一个干河沟，沟很深，我顺沟跑，没受伤，只是跑丢了一只鞋。

躲开敌人包围后，我上了南山，碰见了张野溪。他正焦急地等着，见我来了非常高兴说："我的保卫工作没做好，但当时我也只有鸣枪报警这一条路可选择了，这次敌人来的太突然，事先一点迹象也没有，等发现也迟了"。说完，我们一齐找了一个地方隐蔽了起来。

第二天下午，敌人走了，我们返回了小庄子。我们发现我的小警卫员马振国牺牲了，惨无人道的日本鬼子竟用铡刀将他的头割了下来。望着敌人的暴行，我们怒火满腔。敌人的血腥镇压是吓不倒我们共产党人的。我和战友掩埋好烈士的尸体，集合起被打散的战友，继续在敌人后方开展斗争。

五.反"集家并村"，实行外线作战

由于敌人这次前所未有的大"扫荡"，使我们建立起来的较稳固的地方政权遭到极大损失。日寇为了彻底消灭我们，稳固其所谓的"西南边界线"，开始强行"集家并村"，制造"无人区"，妄图以此来隔绝我们同群众的鱼水关系，断绝我们的后勤供应，使我们没有立足之地。

"集家并村"是日本帝国主义为了消灭抗日武装而采取的一种野蛮的殖民地政策。

"集家并村"不仅给广大老百姓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也确给我们继续坚持斗争增添了困难。我们突围出来后，决定转移到敌人重兵包围的外线。1943 年三四月间，我们在平泉的东北部，平泉至凌源铁路以北、宁城的西南部又秘密地开辟了一片游击区。

1943年4月间，为了解决部队的换季问题，我和李青山、纪洪恩、张野溪等同志研究决定攻打敌榆树林子据点。

榆树林子属宁城县，离驿马吐川60左右里，是敌人比较强的一个据点。有十七八名警察、20左右名自卫团员，计二十七八条枪，附近还有一个伪村公所和一个伪组合。如果我们把这个据点打下来，不仅能补充枪支弹药，而且可以解决部队的用布，用鞋问题。于是，我们派几名战士化妆成卖柴禾的到榆树林子进行侦察。

据侦察：榆树林子警察分驻所大门东北角和西北角共有3个炮楼，平时东北，西北2两个炮楼没人把守，警察分驻所和村公所共用一条电话线直通宁城，没有重型武器。院墙有2米多高，适于袭击。

根据这些侦察来的情况，我们又进行了具体研究：我们共有70多人，虽然武器差，队员又有些新参加进来的红枪会队员，缺乏军事训练，但他们抗日热情高，天不怕，地不怕，作战勇猛。只要我们充分发挥我们的有利因素，还是有取胜的把握的。

5月初的一天夜里，我们包围了榆树林子警察分驻所大院。4名战士悄悄地爬上围墙，钻进敌炮楼。炮楼上1名伪军正抱着大枪睡觉，还没有明白怎么回事就成了俘虏。4名战士低声喝令其将大门打开。队伍飞速冲进警察住的屋子，高声喊道："举起手来，交枪不杀！"北屋有2个警察听到我们叫门声后，非但不开，反而向外还击，当即打伤我1名战士。这一下可把战士们气坏了，掏出手榴弹扔向屋内，一声轰鸣，枪声不响了，警察乖乖地举手投降，当了俘虏。

我们只顾打分驻所，没想到隔壁西边烧锅院内还住着二十几名骑兵讨伐队。这帮家伙是晚上刚刚到的，一个个喝得酩酊大醉。一听枪响，吓得慌了手脚，纷纷跳墙夺路而逃。我战士发现后，立即转身向西院射击。打了一阵，少数被我们打伤，多数落荒而逃，所骑战马均为我有。接着，我们砸开了村公所和伪配给组合，打开了敌

仓库，将其库存布、鞋、毛巾等物尽数用马驮走，向南而去。

当天夜晚，我们为了转移敌视线，把马匹牵送到光头山东北部黑里河川一带，任其自由奔跑。然后，我们又出发奔一肯中，往西继续奔五官营子、三官营子、十八里台、孙营子、万家营子、桃花吐，顺桃花吐南山拉下去，再由黑里河沿奔河东，最后到驿马吐，总算到了比较安全的地带，我们把东西收藏起来。然后弄了一些染料，把白布染成草绿色，再请老百姓帮助我们做成军衣、军帽、子弹袋、背兜等。

这一仗，我们得到许多装备，队伍更加整齐，斗志更加高昂。

六.承平宁工委、办事处的建立

冀东地委(原冀东区党分委)为了坚持和加快发展热、辽地区，给未来恢复东北失地打下基础，于 1943 年 5 月份决定成立承(德)、平(泉)、宁(城)联合县工委和联合县办事处，并派来杨雨民、陈革、宋兴帮、张立文等同志，以及高桥同志所带领的冀东地方主力部队三区队共 250 多人，于 5 月底到达光头山东南部的齐家岱川沟脑旗杆子沟村(“无人区”)。

这里的老百姓有的被杀，有的被赶进“人圈”，已找不到人了。他们就在这被烧毁的废墟上用树枝搭起马架子住下，然后派侦察员在五区找到了我们，我带着十几个干部怀着极其兴奋的心情赶来。

我和杨雨民同志(黄云)是第一次见面。他身材魁梧，面容和善，鼻子上架着一付高度近视镜，使人一望便知是个知识分子。但在他身上没有一点知识分子的架子，说起话来总是那样平易近人、和蔼可亲。

高桥同志早在冀东大暴动时我们就熟悉了，光头山战斗我们又在一起，这次他来，我真高兴极了。

在杨雨民同志主持下，召开了承平宁联合县第一次工委、办事

处联席会议。会上，杨雨民传达了冀东地委的任命。

中共承平宁联合县工作委员会

书记：杨雨民

委员：周治国、高桥、陈革

组织科长：陈革（兼）

承平宁联合县办事处（县政府）

主任（县长）：周治国

秘书：宋兴帮

武装部长：陈革

民政科长：张立文

三区队

区队长：高桥

政委：杨雨民

领导核心分工是：杨雨民负责党政军全面工作；周治国负责建政工作，高桥负责军事工作，三区队经冀东军分区决定为承平宁联合县的主力部队。

杨雨民同志在传达上级指示时，首先讲了当时国际、国内的形势，然后鼓励大家说，你们在这里开辟了很大的地区，牵制了大量的敌人，取得了很大的成绩。看起来你们很紧张，不过敌人也很惊慌。为了解放东北，打败日本帝国主义，我们要继续坚持"无人区"的斗争，发动群众破坏"集家并村"，摧毁"人圈"，恢复区政权，扩大我党力量，并要开辟新区，抓住有利时机打击敌人，用以振奋人民的抗日斗志。

会后，我们立即行动，打下了光头山西面约 50 里的日伪开办的烟筒山银矿据点，缴步枪 20 多支和一大批物资。在 1 个多月的时间里，我们连续出击，组织抗日群众破坏敌人"人圈"墙。拆前时先在"人圈"墙底部掏一个洞，使墙无根基，然后合力一推。围墙便被推倒了，通过这种方法，我们反复摧毁"人圈"多处。

我们的行动给敌人很大的打击。敌人气急败坏，在这个地区又进行疯狂的“扫荡”。由于敌我力量相差悬殊，使一些拥护抗日，不进“人圈”的群众，特别是村干部，积极分子遭到敌人的残酷镇压。仅光头山附近的群众就被捕四五百人。凡被抓去的山区群众均被杀害，没被抓走的山区群众被强迫维修、加固“人圈”围墙。我们夜里拆，敌人白天修，使群众非常疲乏。因而，一些群众又被赶回了“人圈”。

由于敌人大肆强制推行“集家并村”政策，制造“无人区”，使我们食住都遇到了极大的困难，党政军及地方同志无处存身。

1943 年 6 月，我们在承德县大庙村西南榆树底下(小自然屯)召开了承平宁联合县第二次联席会会议。会上听取了同志们关于反“集家并村”斗争的情况汇报，分析了当时的形势，提出了下一步的工作意见。会议决定，县委领导分头带队转移到日伪军重点包围的外线开辟工作：杨雨民、高桥同志带领金荣久、张一宇同志以及三区队向宁城县西部喀喇沁旗及赤峰以西的方向开辟；张立文同志带领张野溪、李学会、周作军等同志转移到宁城县西南部大明塔周围开辟新区；陈革和宋兴帮、王永同志带领一些人在 4 个老区坚持对敌斗争(陈革同志在一次战斗中不幸牺牲)；我带领贺文涛、李会友、丁振江、郭聋子、李青山等十余名地方干部向平泉东部、宁城南部、凌源西北部开辟。

这些地区虽都是敌占区，但过去我们很少在此活动，因而也不为日伪军所注意，对这一地区也没派大批军队进行反复“围剿”，这对于我们在这一地区开辟工作是比较有利的。

经过几个月的艰苦工作，我们又开辟了方圆 400 里的游击区，于 1943 年六七月份组建了第五第六两个抗日区政权。

在新区，群众基础比较薄弱，我们人生地不熟。为了尽快打开局面，我们在发动群众的的同时，尽量做争取上层人物和敌伪人员的工作。如在五区，我们利用李青山同志的关系同杨树岭村协和会

会长丁玉普取得了联系。通过会面，感到此人诚实忠厚，有一定正义感。于是便利用他常去赤峰、锦州、平泉等地活动的机会给我们代买一些药品、纸张、墨水等，并委托他照料一些伤病员。他们家实际上成了我们的秘密交通站，我地下工作者金荣久、张一宇经常在他家落脚。根据他的表现，我后来以承平宁联合县的名义，委任其为联合县的联络员。丁玉普在我们的帮助下，不但自己积极从事抗日活动，而且还积极做其他人的工作。杨树岭据点有个名叫邵春生的伪所长，经丁玉普做工作，主动向我们传递情报，并准备献枪以示其抗日的真心诚意。除他二人外还有如：乔四、马占波、马玉松、马玉堂、武国如等伪甲长也都经常向我们主动提供情报，使我们逐渐摆脱了被动局面，不断扩大抗日成果。

七、帽子山、大沟及大裂山沟战斗

我们在敌后坚持斗争，建立抗日政权、使敌人非常恐慌。为了彻底消灭我们，敌人派来了一个极为狡猾的日本鬼子，热河省伪协和会的头子仁科来坐镇平泉，妄图利用其掌握的特务组织进行反动宣传和特务活动。

仁科原是侵华日军第八十团的军官，为人狡诈，通晓中国语言、风俗。他一到平泉，先剃去仁丹胡，脱下大和服，然后足蹬中国圆口布鞋，身着长袍马褂。一派中国绅士模样。他四处交朋友，认干亲。所到之处竭力宣扬反共言论，高谈中日亲善，要人们"一心一德""维护大东亚共荣圈""支持东亚圣战"，"消灭八路匪"等。凡认识他的人都可以通过他多发"配给品"，少交大烟干。仁科也乐于用这些小恩小惠来笼络人心，收买爪牙，扩充伪协和会队伍。他还指使伪警察署制定了"检举自首""写悔过书""来客报告"等制度，破坏抗日活动。在这个穷凶极恶而又诡计多端的特务头子指挥下，许多抗日干部和基本群众惨遭迫害。仁科不除难有宁日。经过研究，我们决定除掉这个恶魔。

仁科老奸巨猾非他人可比，不容轻视。我们决定以引鱼上钩为策，彻底歼灭之。

为了激怒敌人，以便我们寻找机会消灭敌人，我们先后袭击了承德县郭杖子分驻所，三沟分驻所，凌源宋杖子车站等敌伪据点。

敌人连遭痛击后，恼羞成怒，决计出兵报复，伪协和会长仁科与宪兵队长夏谷两个日本鬼子纠集了伪协和兵，自卫队等几百人向我军疯狂扑来。出兵之前，他们在平泉街召开了有“全县各界人士”参加的所谓“剿匪”动员大会。会上，他狂妄宣布预定于 7 月 26 日再召开一个消灭“八路匪”的庆功 大会。自认为料事如神的仁科没有想到我们正张网捕鱼，静候他来呢。

敌人一出动，我们便从群众那得知，迅速集合起游击队百余名同志，采取“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退我追，敌疲我打”的游击战术，首先避免与敌正面接触，待敌疲惫不堪后，一举歼灭之。

我们由三家子出发和敌人在平泉东部山区宋杖子、榆树林子、宋营子、青山、平坊、茅兰沟、长胜沟、塔子山一带兜开了圈子。我们在上述地区转四五天，有时候转大圈，有时转小圈，仁科带队尾随，紧追不舍，我们之间始终保持 10 来里路的距离。

经过几天的周旋，我们对敌人的兵力、武器配备，组织情况了解一清二楚。于是，我们决定在长胜沟盘道梁子的帽子山埋伏，歼灭仁科。

长胜沟盘道梁子是一条通往平泉的交通要道，山势不高。山脚下，道路旁都是青纱帐。我们隐藏其中，子弹上膛，手榴弹摆布眼前，单等仁科的到来。

盛夏，骄阳似火。青纱帐里尤若一个大蒸笼，热得人喘不过气来，但战士们一动也不动地伏卧着。四周平静如常，只有鸟叫蝉鸣。这一切似乎告诉敌人太平无事，请宽心向前吧！

敌人果真毫无知觉。连续几天的追击，把这伙敌人累得人困马乏，精疲力尽，斗志也松懈下来。敌酋仁科头戴钢盔，身着日本黄呢

子军装，胸前挂望远镜，腰挎指挥刀，足蹬高筒牛皮马靴，大摇大摆地率军由王八山下来，向帽子山攀登。当敌距我还剩 30 余米时候，我即下令"打！"一声"打"字刚出，仇恨的子弹便一齐向山坡之敌射去，接着手榴弹也在敌群中炸开了花。这突如其来的袭击，把敌人打得晕头转向，也顾不上还击，一个个抱头鼠窜。

面对逃敌，我把枪一挥，司号员吹起了冲锋号。随着号声，战士们跃出青纱帐向敌人冲去。鬼子仁科和夏谷见形势不妙，提枪便跑，我军穷追不舍。

仁科和夏谷穿着大皮靴平日显得十分神气，而今天跑起山道显得特别别扭，十分笨重。跑到盘道梁后山，被我手持长矛、大刀的的游击队员张振富，蔡文廷赶上。蔡文廷抖擞精神挺枪向夏谷刺来，夏谷抽身一躲，并回头一枪向蔡文廷打来，子弹顺着蔡的胳膊和身体间夹缝穿过，未能击中。张振富见此情景挥刀从夏谷身后"扑"的一声刺了进去，并将刀使劲一推，然后一拧，最后将刀拽出，只听夏谷"哎呀"一声倒下，战刀"　啷"一声落在地上。

被吓慌了神的仁科顾不上同伴，趁夏谷与我游击队搏斗时，拼命逃跑。张振富、蔡文廷乘胜追来。仁科一见我游击队员又追了上来，吓得哇啦哇啦地乱叫"八格呀路"，并转过身来摸出手枪企图负隅顽抗，他举手一枪，可惜没子弹了。仁科绝望地掖起手枪，抽出战刀好像发疯的恶狼凶狠地向我游击队员扑来。但此刻的仁科已是外强中干，几经拼杀，便无招架之力，被张振富一刀扎破肚子、肠子肚子流洒了一地，还未及吭一声，便呜呼哀哉了。

这时，周围的群众也前来参战，一个个蜂拥而上，将这两个鬼子的尸体连踢带打解解心头之恨。其余的敌人见领头的鬼子被打死，更无斗志，或四散逃命，或举手投降。

这一仗，我们不但消灭了鬼子仁科和夏谷，还俘虏了平泉伪协和会分会会长任四和数十名伪军，缴获军用地图数 10 张，望远镜 1 架，大枪几十支，手枪 2 支，物资一部分。俘虏的伪军经教育后全

部释放。在群众的大力帮助下，我们迅速打扫完战场，又转移到深山里。

坐镇平泉的鬼子正静候佳音，没想到传来的竟是仁科命丧九泉，夏谷也为他乡之鬼的丧讯。经过3天查找，总算找到并辨认出了他们俩人的尸体。

杨雨民和高桥带我主力在宁城一带也获很大战果。他们在三座店消灭一个伪警察分驻所，缴获一批武器和一大批重要物资。而后转移到光头山附近，在黑里河川上游又打了一个漂亮的埋伏仗。之后，他们在平泉大沟伏击山本讨伐队歼敌几十人，缴获机枪2挺，大枪30余支，子弹数千发，以及其它物资。

接连不断的胜利刺痛了敌人，于是又纠集大批兵力对我进行疯狂的"扫荡"，"围剿"，以图消灭我八路军游击队。斗争又进入了艰难的环境中。大约在8月下旬，县工委书记杨雨民和三区队队长高桥同志带领三区队主力由喀喇沁旗和宁城一带转移到我们五、六区活动，并和我们汇合。

9月底，我们被围在凌源西三十家子西北的裂山沟大山上。此时，上有两架飞机侦察，下有日伪骑兵包围，我们被迫与日军展开一天恶战。

在这种敌我力量相差极为悬殊的情况下，杨雨民同志召开了第三次县工委和办事处(紧急)联席会议。会上，同志认真分析了当时的形势，出谋划策。高桥同志建议：为了保存有生力量，除留杨润田等少数地方干部潜入敌后继续隐蔽，做群众工作外，三区队及县工委和办事处的同志转移到关里休整。经过商量，我们一致同意高桥同志的建议，决定率部进关。

1945年8月，我们在边区学习并准备去延安的时候，突然传来了特大喜讯，日本帝国主义投降了！这一天终于来到了！同志们奔走相告，欢呼雀跃，燃起了堆堆篝火，庆贺抗战胜利。

不久，传达了党中央、毛主席、朱总司令的命令，开赴敌占区接

收敌伪政权。我们冀热辽的同志都返回了冀东。

抗日战争胜利后，我被任命为热东地区工委书记。1945 年 8 月末，我在平泉接受任命后，即同热东地区工委和行署的同志一起，昼夜兼程赶赴朝阳，接收热东。同时派出 9 个县及区的党政干部，收编了王老凿等三股武装。

热东人民在党的领导下，从此摆脱了长达 13 年之久的殖民统治，结束了亡国奴的悲惨生活，开始走向光明，开始为建设一个独立、民主、自由的新中国而英勇斗争。

八、几年的经验教训

从 1940 年起至 1945 年止的 5 年时间里，我们承平宁联合县党政军全体同志积极发动群众，秘密发展党员，开展统战工作，宣传抗日救国道理，领导这一地区的人民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抗日斗争，开辟了一块南北约 800 至 1000 华里，东西 200 至 400 华里的抗日游击区，先后建立起 12 个区政权和许多村政权，其范围远远超出了承德、平泉、宁城 3 县。我们在古长城外的青龙、宽城、承德、平泉、宁城、凌源、建平、朝阳、赤峰、喀喇沁、围场等县到处点燃了抗日烽火，歼灭了许多的日伪军，并牵制了大量的敌人，使其不能用于其他正面战场，支援了全国的抗日战争。

在 5 年的抗日斗争中，承平宁地区的党和人民也做出了极大的牺牲。

我们党的许多好同志，我的一些老首长、老战友王平陆、高桥、陈革、刘元存、包文胜、贺仲一、斐文和、赵洪武、纪福东、孙景华、常野、马振国等，以及我现在回忆不起来名字的战士都为了打败日本侵略者，为了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献身于这块土地上。

许多积极支持我们的老百姓也遭到日本帝国主义的残酷迫害。许多无辜的百姓被杀，房子被烧，仅在承德水泉沟"万人坑"就有 3 万多抗日志士被杀。特别是敌人强行"集家并村"后，家园被

毁，土地撂荒，老百姓被迫居住在毫无自由的“人圈”中，衣不遮体、食不饱腹，受尽了人间磨难。

我是亲身参加这一地区斗争的领导人之一，也是幸存者之一。因此，我有义务、有责任对那段抗日斗争进行认真回忆，并写给组织以作为写这一地区的党史、抗日战争史时调查，参考之用。

在写这段历史的过程中，我的心情是极不平静的，特别是回忆起那些朝夕相处、患难与共的战友；那些舍生忘死、支援掩护我们的老百姓；那些风雨同舟、热心抗日的民主人士都为我们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而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我心里就万分难过，不能不使我含泪默祝：死难的烈士永垂不朽！

回顾历史，不仅仅要如实地再现当时的历史发展过程，更重要的是我们要从中总结经验，汲取教训。

我们坚持抗日斗争的承平宁地区，地处伪满洲国的西南部，由于这里紧接冀东抗日根据地，因而是伪满洲国统治最严密、最残酷的地区。然而，就是在这样异常艰苦的条件下，我们还开辟了一块地跨 10 余个县的游击区。取得这一斗争成果的主要原因：

（一）广大人民群众生活极端穷苦，因而具有很强的抗日要求。

日军侵占热河后，他们在政治上采取“以华治华”的政策，除收罗汉奸为其充当走狗外，还强迫大批青壮年为其充当炮灰，勤劳俸仕，当劳工。这种恶毒的政策不知害死我们多少中华儿女，使多少人家破人亡，妻离子散。在经济上，日本帝国主义采取“以战养战”的策略，横征暴敛，老百姓饥寒交迫，终日挣扎于死亡线上。更加恶毒的政策是强迫当地老百姓用良田种鸦片，致使广大老百姓衣食无着，反而染上了大烟的嗜好，从而严重摧残、毒化了人民的健康，成了名符其实的“东亚病夫”。在文化上，日本帝国主义极力推行殖民地文化，不允许中国人称自己为中国人，而要称“满洲人”，并强迫中小学生都必须学习日语，以逐渐代替中国规定的汉语，企图泯灭中国人民的民族意识。

在中国的国土上，中国人种的粮食不准吃，中国人民织的布不许穿，中国人的劳动都为东洋鬼子无偿占有，剩下的仅仅是饥寒贫困。这种非人的生活，让人怎能生存。因此，凡有一丝骨气的中国人都不堪忍受这种亡国之苦。他们有如散布在各地的干柴，一旦有人播下火种，便倾刻而成燎原之势。

(二)正确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开展统一战线工作。

实行革命的统一战线，是我们党夺取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三大法宝之一。毛泽东同志说："抗日需要一个充实的统一战线，这就要把全国人民都动员起来加入到统一战线中去。"(毛泽东：《国共合作成立的迫切任务》)又说："尽可能地造成全民族的反帝统一战线来聚集和联合一切可能的，虽然是不可靠的动摇力量，共同的为共同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斗争。"(毛泽东：《论满洲国的状况和我们党的任务》)实行革命的统一战线，不仅是革命的需要，而且也是夺取抗日胜利的必然。

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后；在广大敌占区阶级矛盾已属次要，民族矛盾成为主要。中华民族的存亡是每个中国人共同关心的问题。当时各阶级和阶层的动态是：(1)广大人民群众坚决拥护抗日；(2)广大上层有识之士也不愿当亡国奴；(3)一部分伪官吏受到教育后，也愿意给自己留条后路，愿意在不影响自己安全的情况下，为抗日做点事情；(4)仍有极少数的死心塌地的汉奸卖国贼。因此，我们在热南和辽西工作时，一方面坚决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另一方面积极开展统战工作，团结上层有识之士，争取伪官吏，建立两面政权，使其真心向我，假心向敌，"吃王莽的饭，给刘秀干活"。这样，我们就掌握了斗争的主动权，从而打击了敌人，保存了自己。在团结抗战的同时，我们对死心塌地的铁杆汉奸，予以坚决镇压，杀一儆百，从而进一步巩固了统一战线。

(三)发扬我党我军英勇顽强，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

武装斗争是抗日战争时期的主要斗争形式。"要奋斗就会有牺

牲，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毛泽东：《为人民服务》）这在敌人统治最严密的满洲国尤其如此，每时每刻都有牺牲的可能。在那种艰苦的条件下参加革命，不同于我们今天和平时期。革命不是享乐，不是猎取高官厚禄，而首先是受苦，是为了千百万人能更好地生存而献身。因此，参加革命队伍的每一个战士都有一种不怕苦，不怕死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那怕赴汤蹈火也在所不辞。这不是文学上的修辞，而是实实在在的事实。

1943 年后，敌人在东北实行“集家并村”，制造“无人区”，使我们衣食住行都很困难。为什么我们还开赴长城外，还在这一地区坚持斗争呢？因为人民在受难，而共产党、八路军是人民利益的代表者，人民受苦难，我们有责任解救他们。正是这一信念，我们的战士才面对屠刀视死如归。

写到此，我不由想起在宁城牺牲的 18 名勇士。

那是 1944 年春的事情。记得在一次激烈的战斗中，我军弹尽粮绝，赵洪武等 18 位战士被俘。日本鬼子一下抓到这么多八路军战士，真可谓赫赫战功。为了从这些战士口中得到我军的情报，一个翻译狐假虎威地学着主子的话说：“皇军说了，只要你们说出你们大部队的去向，或者是声明今后不再去当八路军，就可以放你们回家。不然的话，可别说皇军不客气，一个个都送你们回老家。”望着这个败类，战士恨不得一拳砸断他的脊梁骨，怒视着没人理采。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了，这伙杀人魔王见没人招供不由兽性大发，一场惨绝人性的大屠杀开始了。

他们抓住一个战士吼叫着：“说不说?!”又是无声的回答。杀人成性的日本鬼子端起刺刀，向这个战士刺来。面对死亡，战士开口了。他用尽全身力气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随着口号声，英雄告别了他所热爱的生活世界。其后刽子手们扫视了一下其余战士，只见个个眼里喷着火，毫无屈服表示。这样，战士们一个个慷慨的就义。最后剩下一个参军不久，年仅 16 岁的丙丁火。骄横的日本

鬼子们以为这个小家不经吓，一定会屈服。于是一把拽了过来，凶恨吼道："你的说不说？不说，你的看见的没有，统统的死了死了的有"。"不说、不说、老子就是不说！"杀人成性的日本鬼子连这样一个尚没成年的小战士也不肯放过。小英雄就是这样为了我们民族的解放事业慷慨捐躯。

他们虽然牺牲了，但他们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是永存的，并激励着活着的人去战斗，去报仇。正是在这种革命英雄主义精神鼓舞下，承平宁联合县的广大同志们才用鲜血和生命开辟出这一抗日游击区。

(四)严格地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和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

怎样才能使人民群众真正发动起来，并在我党的领导下投身于伟大的抗日救国斗争中来，这是当时摆在我们面前的第一位的大问题。我出关时，可以说是两手攥空拳，既没有钱财，也没有武器。靠什么打日本，我单身一人是不可能的，再好的钢铁打几个钉？因此，必须发动群众齐参战。要发动群众，必须首先使他们对我党、我军有一个正确的了解。除了宣传我们的抗日主张外，更主要的是用我们自己的模范行动来影响、教育人民，使他们真正感到我们是他们利益的代表者，是他们自己的军队，我们抗日是为了他们自身的解放。因为党和军队是由每个人组成的，我们的一举一动都是对他们最好、最实际的教育。由于我们每到一处都模范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和他们同甘共苦，因此，很快就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抗日的烽火越烧越旺，正是由于人民群众的支持，我们的武装才能越来越大，越战越强；正是由于人民群众的支持，我们才能在艰难困苦的条件下渡过了一个又一个难关。记得我们有一个战士名叫李学惠，一次他不慎枪走火穿过自己的手掌，打伤了老乡的孩子。老乡没有因此而责怪我们的战士，而是劝慰我们的战士不要上火，我这个孩子即使死了，我还有俩儿子呢，要安心养伤，并想法为

李学惠同志医治伤口。

广大人民群众不仅为我们照看伤病员,而且为我们站岗放哨,传递消息,并以自己最大的能力为我们筹集枪支、弹药、衣物,食品等。那时候同八路军有关系是要杀头的。许多抗日积极分子因此而牺牲,被捕,做苦役,房屋被烧,家产被收。1982 年,我到老区走访,见老乡的生活虽有改善,但变化不大,草房依然。可是老百姓对我们仍旧热情周到,不减当年。因为他们知道,党是他们利益的根本代表者。

得人心者得天下。日本帝国主义不管他们有多么强大,有多少现代化的军队和武器,由于他们违背人民的意愿,终将被人民所推翻。正是由于人民的支持,我们才能在敌人的腹地大显神威,开辟了方圆 10 余县的抗日游击区。

在承平宁地区 5 年的抗日斗争中,我们的有些工作也存在一些应当汲取的教训。

比如在工作中,我们有时有急躁冒进情绪。在武装斗争中,有时没有充分做到不打无把握之仗,对当地干部培养得也不够。特别是敌人实行"集家并村"后,我们对敌人这一政策缺乏认识,没有进行认真的研究,没有意识到这是敌人为消灭我军而必然推行的一项长期策略。因此在斗争方法上,只是发动群众拒绝搬迁,进而组织力量拆毁"人圈",没有想到派人打进去秘密潜伏下来,把"人圈"变成我们新的工作基地。结果,敌人越搞越凶,老百姓被迫进了"人圈",使我们无立脚之地,无衣食之源,最后不得不撤离此地,返回冀东抗日根据地。

这些经验、教训虽都是 38 年前往事的总结,但对于我们今天并非没有教育意义。如果我们今天的党员,干部都能像当年那样和人民群众同甘共苦,像当年那样勇于牺牲个人利益,我想我们的党风就一定能好转,我们四个现代化就一定能早日实现。

(作者曾任中共辽宁省委纪检委常委)

我随挺北第一支队开辟热河

张东屏

我是1938年6月参加革命的。开始在“京郊工作队”任队长。那时是秘密活动。任务除宣传抗日道理.扩大抗日队伍外,就是和地主豪绅打交道,筹集抗日资金。

冀东大暴动后,主力部队开赴平北,我被留在冀东,在包森领导下的一个独立大队(共5个大队)任队长兼指导员,活动在蓟县、丰润、玉田一带。名叫大队,实际只是一个空架子,每个大队只有二三十人。那时冀东的环境非常艰苦,日寇唯恐冀东抗日烽火复燃,频繁地出击扫荡,我的一个哥哥、一个妹妹就是在1942年的一次“扫荡”中被日寇杀害于玉田县虎头庄的。

1941年10月,为了扩大解放区和减轻敌人对冀东的压力,成立了“承兴密联合县”,我被派往承兴密,同韩巨民同志一起活动在茅山、陡子峪一带,后又到过滦平的古长城。日本人在那里集家并村,推行“三光”政策,杀了成千上万的中国人。那个时候伪满洲国第五军管区的8个讨伐队轮番“追剿”我们,活动十分困难。伪滦平县副县长柴雄(日本人)还专门雇用一些猎手,好吃好喝招待着,供他们抽足大烟后跟踪追击我们。所以,我们只好“骑着”长城战斗,关里紧了,跑到关外;关外站不住脚时,又回到关里,依靠群众,坚持抗日斗争。

1945年初夏的一天,突然接到通知,要我去平谷县的南沙里开会,就在这个会上组建了“挺北支队”。挺北支队共分三路(即中、东、西三路),我们第一支队是西路。目标是挺进到隆化、围场两县交界处——小桥子一带开辟根据地。大队长是师军.王文,政委是

李越之。我是第二武工队政委。参加人员除十三团的3个连以外，又从十四行署抽调一批区长、区委书记和骨干力量。

为什么要组建挺北支队呢？这是战略的需要。党中央总的战略方针就是扩大解放区，冀热辽边区从关里往外扩展，扩到热河，开辟解放东北的前沿阵地。热河地理位置重要，背靠苏联，是联结华北、东北的枢纽和交通要道。它可以牵制敌人，起到缓冲冀东紧张局势的作用。挺北支队的口号是"只准向北，不准向南"。

挺北支队组建后，于6月25日出发，在古北口附近越过长城，经滦平、丰宁奔围场。由于我们行动迅速，出敌不意，一路上没遇到敌人大部队堵截，只和保安队、警察打了几个小仗，所向披靡。进入隆化境内情况就不同了，敌人从四面调集兵力"围剿"我们。在隆化三道营的嘎拜沟打了一仗后，几乎每天都得打仗。开始，我们在石桌子打了一个胜仗，俘伪围场县警务科长日本人黑田大佐和20余名绅士，经教育全部释放。那个黑田称八路军是有志之士，对释放他非常感激。后来老百姓告诉我们，黑田大佐获释后，曾从围场县搞些布匹分给群众，让给我们做鞋。后来，敌人聚集2000余人，采取"梳蓖战术"，妄图趁我立足未稳之际，一举消灭我们。

大约是我们到达小桥子的7天头上，即农历五月中旬，我们在小桥子召开了支队常委会(亦称东北工作委员会)，参加人员有师军、王文、李越之、张静之和我，会议分析了形势，研究了对策。当时的形势是，敌人已经感到挺北支队存在的严重性。所以，千方百计要消灭我们，而我们的电台还未架起，零件也丢了，同东北抗联、冀东十四分区都失掉了联系；地势又不熟，群众也没发动起来，硬拚只能老百姓吃亏，部队受损。

根据上述情况，会议决定部队"化整为零"，分散活动，暂时避开敌人，放手发动群众。会后，师军率主力2个连队向多伦挺进，开辟新区并设法搞些羊皮等物资，准备冬装。王文向赤峰进发，张静之返回丰宁边境活动(后没站住脚又回到小桥子一带)，我率60余

人，又分成 5 个分队去隆化的大庙、马道、碑梁、郭家屯一带坚持斗争。

从此以后，我们基本上是白天钻山林，夜间下山开展工作。当时的工作，主要是宣传反法西斯战场的形势，开展民族气节教育和做一些敌俘人员的反正工作。

“化整为零”分散活动以后，敌人又“围剿”过几次，但都因我们人少、目标小，易于隐蔽，结果他们的“围剿”都落空了。有一次，我们在碑梁村开展工作，敌人来“扫荡”，我们的人都钻进了树林子。那时，我拉肚来不及就趴到老百姓的大烟地里，一趴就是一天。当夜来到北豆腐房一个贫苦农民家里，他们给我们玉米饼子、炒咸菜吃。这家有老两口、两个儿子，我向他们宣传抗日道理，讲中国的前程，把两个小子说活了心，硬是要跟我们走。因考虑当时的特殊情况，我未应允。这户后来成了“堡垒户”，多次给我们弄粮食，对我们的工作给了很大支持。在马道村，我们常宿在地主的一个看地窝棚里，和长工一起拉家常，讲革命道理，并要求他们帮助宣传。这样，虽然艰苦点，可群众没受损失，我们也觉得心安理得。那个时候伪政府摊派些东西，群众找我们，我们就告诉他们要如数答应下来，而后敌人来拉东西时，我们就打几枪把敌人吓跑，东西照数退给群众，对外就说东西叫八路军弄走了。因此，我们同群众的关系处理的很好。

由于武工队存在，给老百姓撑了腰，老百姓也替我们宣传：“八路军个个飞檐走壁，来无踪，去无影”，“哪个地主，哪个汉奸，他不干好事，晚上好好的，早晨脑袋就搬了家”等等。弄得敌伪人员个个胆颤心惊，都怕落个汉奸的罪名，将来挨收拾。有一次，我们在大庙警察分驻所眼皮底下开会，他们就装没看见。

经过 2 个多月的殊死斗争，我们不仅在隆围边境地带站住了脚，而且还挺进到塞罕坝上下，到处点火，初步打开了抗日斗争的局面。在三路挺北支队中，我们这一路挺进得最远，任务完成得最

好，受到了上级领导的表扬。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那时，我们正在一个偏僻山沟开会，根本不知道这个消息。一天，一个农民跑来对我们说："大道上过马队，还赶着马群，兵都是黄头发、绿眼珠"，我才知道是苏联红军过来了。那会儿，武工队中有人主张原地待命。我说："待啥命?！赶快下山配合苏联红军接管政权。"我们到石桌子一看，伪警察都跑了，在那儿开了个群众大会，打开警察署仓库，把粮食、布匹分给群众。武工队每人弄了一匹马。我当夜写信派李墨生去和苏军接头。信里说明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是抗日敌后武工队。谁知苏联红军看后一笑了之。第二天，赵分队长、于振江、王文林我们4人走在队伍的最前头，刚一出沟口就碰上了苏联红军。因语言不通，他们误认我们是土匪，缴了枪，把我们都捆起来，眼睛用黑布蒙上。其他武工队员见我们被缴械后没敢出沟，到别处隐蔽起来。我们就这样当了"俘虏"，跟随苏军一起经半截塔奔隆化。一天，天下了大雨，我们4人头顶一张牛皮睡在田野里。醒来，发现于振江跑了。这一跑不要紧，苏军更怀疑我们了，临行军前，把我们3人拥到一个小沟里，让并排站着，苏军先向赵分队长问话，没等回答一枪就打倒了。抗战八年胜利了，我们的同志还是牺牲，我心里非常难受。这时苏军又转向我，我突然想起了"布尔什维克"这几个字，就大声说："呀，(俄语我的意思)布尔什维克！""斯大林、毛泽东"。苏军像懂了似的，重复着说布尔什维克，顿时脸上呈现出了笑容，随即解开了绑绳和蒙眼的带子，比划着让我们和他们一齐走。

到承德后，被关押在离宫专门押日本人的监狱里，在那里又遇上了伪滦平县副县长柴雄(日本人)。他问我怎么来的，我说日本投降了，和苏军发生误会，他很不爱听。又说："咱们都是黄种人，日中亲善，应团结起来对付老毛子"。我没再理他，后经与日本受降办事处联系，又转押到苏军宪兵队的日本人宿舍的茅楼里。有一天，我听到一个中国人和苏军谈话，我就大喊："同志！我是八路军。"他问

"领导人是谁?"我答:"李运昌"。他又看了笔记,才把我放出来。那会儿把我折腾的只剩一把骨头架子,体重才 60 多斤。

获释的第二天,我派王文林去火车站弄工人服。因穿工人服活动不受限制。王在车站得知南营子已有八路军,我打了电话,先期释放的刘权派车接我们到八路军办事处。

我在承德八路军办事处工作的时间虽短,但对那里情况复杂、斗争尖锐的印象很深。

承德刚解放,社会秩序非常混乱。一则是伪省长孙柏芳的维持会到处横行霸道;二则是苏军纪律不严,抢夺拉妇随时可见;三是谣言四起,说什么"国民党的刘多荃要来热河当省长,八路军是白跳","苏军不支持八路军,国民党才是合法政府"等等。

为了求得苏军的支持,我找过苏军叫乌洛索夫的政委交换意见。开始乌洛索夫说:"我们上级通知关外没有共产党"。后又说:"和维持会弄起磨擦不好"。我理直气壮的指出:"苏军同意成立八路军办事处,说明承认我们是共产党,共产党无论在什么时候都应壮大自己的力量,苏中两党的目标是一致的",弄得苏军政委没话可说。后来我们从日本人的俄语学校里派去 8 名翻译,情况才逐渐好转。最后苏军终于转向支持我们。我同苏军交涉后,从维持会看管的日本军火库里弄出 800 支三八枪,武装我们的警备队。苏军的一些不法行为我们也敢管了。遇到苏军的不法行为,批评以后交宪兵队,我亲眼看见那时苏军对违纪士兵或割一块耳朵、或削一块鼻子,算是给了处分,个别严重的也还枪毙了几个,从此秩序大有好转。

同维持会的斗争更尖锐、复杂。开始时他们想拉我们,曾派绅士尹锡三送来手表和自来水笔,我们拒收。后来孙柏芳亲自到八路军办事处谈判。我方提出三条:第一要保护好仓库物资;第二要负责保障办事处人员安全;第三不准维持会的人为非作歹。他都一一应承。后来郑旭同志从关里来,接管了办事处的工作。李子光和我

谈话，派我去隆化任县长，我即赴隆化任职。

我是8月末，9月初到隆化的，陪同我一起去的还有李墨生、王文林等人。

我到隆化之前，王文林已派商参谋先行接管隆化。商参谋是一个极端的个人主义者，进城后吃喝玩乐，工作毫无进展。

我到隆化后，第一件事是组织自己的警卫队，把第二武工队的人召集起来，建立了隆化县警卫队（后改公安队），郭振海任队长。接着又找伪县长何俊州谈话，他搞通了思想，把伪警务科的人都召集起来讲话，他带头交出一支王八盒子。在他的影响下，别人也交了枪，什么意外也没发生就把敌人遣散了，并把那个商参谋经批评后交回部队处理。

隆化县人民政府大约在9月初建立，在十字街戏楼开的成立大会。可能是黎清主持大会，我讲了话。同时还发了布告，是由黎清他们起草的。布告宣传了我党的主张，号召工农商各界尽快恢复生产、繁荣经济；警惕敌人破坏捣乱等。任命王治平为公安科长，黎清为教育科长，王玉斌为财政科长，张健为民政科长，李墨生任秘书。全县划6个区，都委派了区委书记和区长。

为了进一步发动群众，县政府成立不久，拟在西河套广场召开群众控诉大会，准备枪毙罪大恶极的伪镇长李鄂孚、李仲三、冀雨三。后这3人被警卫队内部一个叫“小瘸子”的给放跑了。但大会仍如期召开，群众第一次倒了苦水。我表态支持群众的正当要求。会议影响很大。

日伪时期隆化没有中学，解放后群众要求办学。我找下洼子的李衡山商量，拨给20匹马作经费，教室占用了日本人的独身宿舍和炮楼。那个李衡山很负责任，当年冬就开学了。后来又派去陆辉任校长，吴灵涛任教务长，学校办得很好，培养了许多人才。刘毓芳就是其中一个，她被选为热河省首届人民代表。

隆化当时只有一个小煤窑还停产了，工人四处谋生。我派李济

才去抓煤窑的工作，我还亲自去承德市弄些机械设备，煤窑很快出煤了。既解决了机关、居民取暖用煤，又安排了工人生活，群众对此很满意。

商界，我接触了马洪震，那个人很忠诚，靠他去做那些商户的工作，很快恢复了市场的繁荣。

在隆化时我只去过一趟农村，那个村叫河洛营，种了不少水稻，我用马换些大米给伙房用，还询问了种水稻的技术、准备推广。

1946年4月，我调离隆化，到省公安厅报到后，分配去鹰手营子办检查站，和我一起去的有李庚臣。检查站有两个任务：一是不准重要物资流入国民党统治区；二是以开茶馆作掩护，搜集北平、天津一带情报。时间不长，国民党就占领了承德，我又被派往锦西，1951年赴朝参战，归国后留在东北工作。

（李万源、左占峰整理）

（作者曾任吉林省长春市冶金干部学院副院长等职）

回忆热南的一条军事交通线

刘　玉

我所参加的那条军事交通线，是1941年秋建立的。

这年8月初，冀东区党分委在遵化县大张屯召开了第三次扩大会议。总结了夏季反“扫荡”的经验教训，做出了“有计划地、大规模地开辟热南抗日游击根据”的决议。9月中旬，李运昌司令员率十二团、十三团各两个营及地方干部3000多人，分数路越过长城，第一次大规模开辟热南。10月下旬，伪热河省为推行日本宪兵司令部制定的《西南地区治安肃正工作实施纲要》，先后派程斌、刘其昌、石振东、曲焕文、安田、康振英、王喜、马玉等8个警察讨伐大队共3000余人进入兴隆，与伪兴隆县原有的讨伐大队一起，联合“围剿”热南的八路军。为粉碎敌人的“围剿”阴谋，进一步扩大抗日游击区，狠狠地打击敌人，冀东军分区在热南分别建立起数条军事交通线，编织成坚固的军事交通网。我参加的那条军事交通线，就是这个军事交通网中的一条纬线。我们这条军事交通线东起迁西县瀑河口（现归宽城县），西止密云县的曹家路，横跨迁西、兴隆、承德、密云4县，全长200余里。这条军事交通线设有瀑河口、五指山、黄酒铺、驴儿叫、宝地、岔道沟、曹家路等18个交通站。后来，在在1942年秋，随着形势的发展，从岔道沟军事交通站又开辟一条经见财沟、八品叶、桲萝坑……去蓟县盘山抗日根据地的军事交通线。

军事交通线实行半军事化，对外统称“四一”部队，设大队、中队、小队、班和站建制。整个热南军事交通网建制为大队，大队长刘芝。我们这条线 为中队建制，中队长杜长存。领导我们站的是小队

长金友三、班长是李明月。交通员不穿军装，半脱产，由部队按月发给粮票、菜金、鞋袜等。为了保密，每个交通站都编有代号。我们岔道沟交通站的代号是4018，交通员之间的联系凭暗号或手续。

军事交通线有着严明的纪律。我记得，中队长杜长存让我参加军事交通线工作的第一次谈话，主要讲得就是纪律。那是1941年秋的一天上午，我们村的武装班长张奎祥（化名张子丰）带领一位陌生人来到我家。这位陌生人一脸麻子，他就是负责军事交通线工作的八路军干部杜长存。杜长存对我说，我们八路军准备在你们岔道沟设个交通站，经与区里研究，准备让你参加。那年我只有15岁，虽然更多的事还不懂，但打鬼子，救中国这个信念还是坚定的，做梦都想扛起枪，打鬼子，杀汉奸，当英雄。参加八路军的军事交通站，为八路军送信，我当然愿意了。我答应下来后，杜长存马上严肃的对我说，参加交通站、干的是绝密工作，必须严格地遵守各项纪律。第一位的是保守秘密，对任何人，包括自己的父母都不得泄漏交通线的情况。为了防止泄密，首先是不该问的事不许问。如除你们上站和下站外，还设那些站，都有哪些人是交通员，你转送的人的身份等都不能问；二是不该看的不许看，特别是送的信的内容绝对不允许偷看；三是必须把信亲手交给收信人。只要不是收信人，不论他职务多高，与你多熟，均不能交或托他转。当时，我们这些交通员虽然都是些年轻的孩子，但执行起纪律来非常认真，总是一丝不苟的，从没有人违反过。例如我们这条军事交通线都包括哪些交通站，当时我一无所知，直到解放后，我和我的班长李明月谈起时才知道。经我手转过数百封信，但我至今也不知道信的内容都是啥。记得1942年夏季，有次冒着大雨送信，在爬山越岭中磨破了信皮，信纸露出一角，我无意中看到这角信纸上写的都是12345……等阿拉伯数字。我当时不解，现在想那可能就是密码吧。必须把信亲手交给收信人，这点执行起来最难，弄不好还常常引出误会。有一次，我往大水泉给一位部队领导送信。在大水泉西沟，和我比较

熟的那位十三团姓唐的侦察员拦住我，我说我是给部队领导送信来的，他仍不让我去，说部队要打仗，领导正在开会，不能见。我一听部队要打仗，更觉得手里这封信份量重，坚持立刻去见那位领导。唐侦察员与我争论半天，最后还是派位同志领我来到那位领导住地大水泉西横岭的一个大院子前。我一看，院里军人很多，来来往往十分繁忙。当我正要往院里走，门前站岗的哨兵又拦住我，让我把信交给他，由他转交给领导。我说不行，不见到收信领导本人不能交信。这样又争论起来，最后哨兵才放我进院，真使我又急又气。这位收信的领导人大约40多岁，戴着眼镜，对我十分和蔼。收到信后，他一面让警卫员领我吃饭，告诉我部队要打仗，回去路上有危险，让我吃过饭与警卫员一起行动，打完仗再回去，一面忙着处理其他工作。还有一次，我们站的交通员龚庆云，去10多里以外的宝地站送信。当时，宝地站的交通员是徐成田、王贵，这两人正巧不在村里。王贵是龚庆云的叔丈，龚庆云来到王贵家。王贵的媳妇让他把信留下，等王贵回来由她转交，龚庆云不干，惹得王贵媳妇老大的不高兴，觉得这个侄女婿看不起她。当然，这种误会很快被解除了。

信，对于我们这些送信的交通员来说，就是生命。不，它比生命还要重要，我至今还清楚的记着杜长存第一次和我谈话时说的那些话。他说，信比我们每个人的生命都重要，它关系到战争的胜负，成百上千指战员的存亡。所以，每个交通员必须做到人在信在，人死信不失落。他告诉我，两个人送信，要一前一后走，信由后面的人拿着，前者被敌人抓住，后者要千方百计甩掉敌人，完成送信任务。如果是过河，前者被水冲走，后者首先要想着信，能救则救，有危险则不救，以完成送信任务为主。为了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使信落入敌人手里，杜长存、金友三等人还指导我们训练"吃信"。记得1941年秋，我刚参加交通站的工作不久，小队长金友三突然来到我们站，亲手交给我一封信，面后面色紧张地对我和龚庆云说，这封信

很重要，敌人已从北面过来了，咱们赶快跑，在敌人来到前把信送出去。边说他边领我俩向南大岭方向跑去。刚跑到山半腰，他说，不好，岭上有敌人，咱赶快往东山跑。我们三人跑得气喘吁吁，满头大汗，浑身的衣裳都被汗水湿透了，好不容易跑到了东山腰。这时金友三故作惊慌地说，不好，山顶也被敌人占了，得赶快把信吃掉，千万不能落入敌人手里。我马上掏出信，用手撕成小块，边跑边放到嘴里。由于口干舌燥，嗓子里直冒烟，纸在嘴直打饼子，就是咽不下去，急得我脸通红，青筋直暴。这时金友三说，你揪把树叶，放在嘴里裹着咽。我按金友三说的，赶忙揪了把树叶放到嘴里，最后好不容易咽下了嘴里的纸饼子。我咽下后，金友三说，别跑了，这次是演习。你俩表现不错，咽信也是套功夫，要好好练，练好了，才能适应战争环境的需要。打这以后，我和龚庆云经常在一起练习吃信。在练习中，我们发现山上长的"酸不溜"对我们咽信有利，把酸不溜放入嘴后，能引出口水，有了口水咽信也就不难了。因此，我们后来送信都揪几把酸不溜叶子放在衣袋里，以防万一。

我们军事交通线不单单送信，有时也送人，还送报纸。在工作实践中，特别是在送人时，我们从那些有实践经验的被送者身上学到了不少东西。1942 年秋，由杨树沟站转过来的一位负伤侦察员。我带他走到宝地西沟距公路 200 来米时，突然发现公路上有敌人。这位伤员马上对我说，别慌，大步往回走，千万别跑，一跑就坏事，我俩边说边扭身往回走。这时公路上的敌人发现了我们，就向我们喊"站住，这边来"。我俩不答腔，继续急走，敌人一看我俩没站住就追了过来，边追边放枪，一个日本军官还挥着战刀乱叫。这时我俩已来到一个土坎旁，那位伤员告诉我绕着土坎跑，千万别直跑，直跑容易被敌人打中。我们跑回到宝地西沟一个姓谢的地主院旁时，敌人还没被我们甩掉。我想从院外的小路继续跑，这位伤员命令我进地主家大院。我俩立刻从东门进了院，没停步又从西门跑出。出了西门，我俩又跑了一段后就钻上了山。在山上，这位伤员对我说，

咱们休息一下，看场好戏吧。我顺着他手指的方向一看，谢地主的院子乱成了一团。这时，那位伤员对我说，今后遇到这种情况，千万不能绕过院子跑。你进院，敌人就以为你藏在院里，一折腾，就给了你甩掉敌人的机会。

我们这些交通员，当时年纪都很小，人都比较机灵，任务完成的也很好，深受领导的喜爱。党组织对我们这些交通员十分重视，关心我们每个人的进步。1942 年 4 月，我这个刚满 16 周岁的孩子就被吸收为中国共产党的党员。我的入党介绍人，后任河北省交通局副局长的李鉴铭同志说："刘玉是我一生介绍入党的人中年龄最小的一个"。

在那个艰苦的战争环境中，从事交通站的工作，是十分危险的，随时都有牺牲的可能。仅就我们岔道沟、宝地、杨树泡 3 个交通站，就有 3 位战友先后献出了年轻的生命。其他交通站的交通员因没同我直接打交道，所以伤亡情况不清。不过，我想也一定不会少吧。正是由于这些交通员的艰苦奋斗和他们付出了重大代价，才为整个热南抗日游击区的扩大和抗日根据地的建设，为夺取伟大的抗日战争的胜利增了砖，添了瓦。

（王继明整理）

（作者曾任承德市政府秘书长）

热南第一个中共党支部的创建与发展

中共宽城满族自治县委党史办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革命形势急剧逆转，热河的共产党组织被迫转入地下，斗争环境非常艰险。但是，革命的烈火是扑不灭的。1931年7月，热河省南部的第一个中国共产党支部委员会便在偏僻山区北大岭村诞生了。

北大岭村地处承德地区宽城满族自治县峪耳崖镇北部(原热河省南部长城边界附近)。这里距峪耳崖镇5公里，三面环山，一面临水，加之地处闻名遐迩的黄金之乡，使这个塞外山村更添几分姿色。然而在国民党和封建势力的压迫下，这里的人民依然是饥寒交迫，民不聊生。繁重的苛捐杂税，逼得人们卖儿卖女，妻离子散；连年兵荒马乱，抓丁要夫，使多少户家破人亡，流落他乡。水深火热中的人们时刻盼望着翻身解放。

为认真贯彻中共顺直省委"关于加强中心区附近党组织工作"的指示，1931年4月，中共迁安县委派遣共产党员韩平秘密出关，来到北大岭村袁明家，秘密开展党的活动。

韩平和袁明是姑表兄弟。得知迁安县有了共产党组织，已过不惑之年的袁明喜出望外，连珠炮似的问这问那。啥叫三座大山？怎样推翻它？共产党是干啥的？……原来早在1929年5月，迁安县委曾派韩文华(迁安后韩庄人，原黄埔军校四期学员，中共迁安县委宣传委员)来到峪耳崖一带张贴标语，散发传单，宣传革命思想，使袁明受到了一定的启发，可好多的事情并不完全明白。这次，当

着表兄的面，他把闷在心里多年的问题，全提出来，想当面问个清楚。

韩平不慌不忙地笑着说："急个啥！新鲜事多着呢！以后我慢慢地说给你听。"从此，韩平住在他家，给他讲了很多革命道理。本村青年李翠、赵国志见袁明的这位表兄和蔼可亲、见多识广，说起话来头头是道，便常到他家来串门唠家常。共同的生活遭遇，使他们心心相通，彼此信任。韩平逐步向他们讲解革命道理，宣传革命思想。他说："穷苦人只有组织起来进行革命，推翻地主、豪绅的压迫和封建军阀、官僚的黑暗统治，才能过上好日子。""南方有个毛泽东领着穷人的队伍在井冈山一带打土豪分田地，闹得热火朝天。""共产党是我们穷人的党，专门为穷人谋利益……"袁明等人听得心花怒放，好似胸中亮起一盏明灯。从此，3 人参加革命的愿望越来越迫切，渴望早日加入中国共产党。

经过一段时间的思想启迪和全面考察，韩平觉得机会已经成熟，决定将家境贫寒、苦大仇深、立场坚定的袁明、李翠、赵国志 3 人发展为中共党员。一个伸手不见五指的夜里，在李翠家后院柴棚中举行了入党仪式，李翠妻子在门外放哨。袁明、李翠、赵国志 3 人高高举起右手宣誓："严守机密，服从纪律，牺牲个人，努力革命，永不叛党。"铁石般的拳头，紧紧攥定了一个信念：为了穷苦人得解放，为了共产主义事业万死不辞。随即建立了党小组，袁明任党小组长。为便于工作，他化名为东升。

中国共产党北大岭党小组成立后，在中共迁安县委直接领导下，积极开展宣传、组织、发动群众的工作，秘密进行革命串联，培养了一大批思想进步、勇于献身的骨干力量。同年 4 月，袁明带领全体党员及骨干群众进县城砸商会、捣毁白台子配给所，取得抗捐抗税斗争的初步胜利。7 月，韩平再次按县委指示来到北大岭村，听取了北大岭党小组的工作汇报，经过进一步考察、了解，又发展了刘广奎(化名奎山)、许方合、杜春友、刘恒久、刘恒瑞、李迎春、贾

玉宽、张玉山8名党员。鉴于建立党的基层组织的条件已经具备，韩平代表中共迁安县委宣布：正式建立中国共产党北大岭村支部委员会，袁明任支部书记，李翠任组织委员，赵国志任宣传委员。后来该支部进一步发展成为下属3个党小组，共有党员13名的革命队伍。从此，以袁明为书记的热南第一个党支部，像启明星一样在热南大地上空升起。

党支部刚刚成立，"九·一八"事变发生了，东北各地相继沦陷。根据县委指示，北大岭村党支部发动全体党员，利用各种机会走村串户，揭露日本侵略者占我国土、杀我同胞的罪行，激发群众爱国抗日的热情，组织群众开展抗日救亡活动。

1933年2月的一天，天朦朦亮，一个二十几岁的青年人急匆匆地从北大岭出发了。他上身穿着补了好几块补丁的旧羊皮袄，肩挑货担，一副小买卖人的打扮。早春刺骨的北风迎面吹来，让人喘不过气，他没有理会，迈开大步很快消失在远处的晨雾中。这个青年人就是李翠。他受党支部的委派，到外地秘密串连，扩大抗日革命阵线。他越过千山万水，历尽千辛万苦，最后在宁城头道营子与红枪会首领李庄取得了联系。他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取得了很多人的同情，一些人纷纷表示愿意参加抗日队伍。同年12月，兴隆县爆发了孙永勤领导的农民武装起义，党支部及时派人前去与"抗日救国军"军长孙永勤联系，共商抗日救亡之大计。这年4月，国民党第二十九军在喜峰口开展闻名全国的长城抗战，北大岭党支部一方面组织骨干力量协助抗日武装破交通、割电线，一方面发动群众，给革命军送水、送饭、抬担架、救伤员。爱国将领张自忠无限感慨地说："长城线上的父老乡亲给我们一股巨大抗击日寇的力量。"

长城抗战失败后，日本帝国主义开始对热南人民实行极端残酷的殖民统治。北大岭距伪满洲国沿长城划定的"西南国境"仅十几公里，侵略者在这儿烧、杀、抢、掠，无恶不做。面对穷凶极恶的强盗，北大岭村党支部没有屈服，依然积极地开展革命活动。一方面

发动组织群众；一方面积极发展党组织，建立抗日武装。后来，北大岭村成了我党、政、军人员来关外进行抗日活动，开辟抗日根据地的落脚点。党支部的活动范围也逐步扩大，为热南的抗日斗争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日军在峪耳崖设立警察分驻所、宪兵队，并派重兵把守，一面实行军事上的法西斯统治，一面大肆进行经济上的掠夺。敌人刚到，便强占了峪耳崖金矿，并且禁止群众上山采金。世代依赖的经济来源断了线，眼看大量的黄金被日本人夺走，人们义愤填膺。1934 年 9 月，北大岭村党支部在迁安县委书记韩东征指导下，组织发动峪耳崖一带数百名群众，包围了伪警察分驻所，迫使他们做出了让步。从此，敌人再也不敢限制群众上山采金了。

1937 年，中共迁安县委先后派刘汉臣、张玉生等同志多次深入热南山区，开展抗日活动。北大岭村党支部每次都派出党员为他们带路，以串亲访友为掩护，到平泉、承德、兴隆等县及青龙境内的崖门子、山家湾子、东黄花川、亮甲台、碾子峪、东大地、华尖等地宣传我党抗日救国的主张，发展党员，建立党的基层组织。年底，发展党员 30 多名。同时，他们发动群众组建群众性的抗日组织——“抗日报国会”，建立起地方抗日武装，他们用自制的长矛、大刀、土枪、火炮等武器打击侵略者，并带领农民武装参加了 1938 年夏季冀东大暴动，日夜战斗在长城线上。

全国抗战爆发之后，我党、政、军人员在热南活动，常常住在北大岭村，在这里研究部署抗日工作，制定党的方针、政策。党支部积极组织党员和可靠群众站岗放哨，安排食宿，在生活上对抗日军政人员进行精心照料。抗战 8 年，抗日工作人员在北大岭村从未出过危险。1940 年 4 月，冀东军分区三纵队特务大队指导员周治国同志身染重病，组织上派人把他送到北大岭村，住在李翠家养病。为确保安全，李翠全家人不分昼夜站岗放哨，一发现敌情，就把周治国转移至村外的山洞里或密林深处隐蔽起来。3 个月过去了，在李

翠一家人的精心护理下，周指导员的身体很快恢复了健康，重返抗日战场。

这一年12月25日拂晓，人们还沉浸在梦乡中，周治国率领青平游击队40多名战士悄悄地来到北大岭村石门沟隐蔽。和北大岭村党支部取得联系后，党支部立即派出几名党员分头站岗放哨，封锁消息，不让任何人出村。并组织群众烧水做饭，还杀了4只羊慰劳游击队，让战士们好好地休息了一天。晚上10点多钟，党支部首先组织党员、报国会员摸黑把通往峪耳崖金矿的电话线全部剪断，并将电线杆砍倒，切断了敌人的通讯联系，又选派20多名政治可靠、机智勇敢的青壮年协助青平游击队袭击峪耳崖金矿。整个战斗不到半个小时就胜利结束了，共消灭日军21人，俘虏伪矿警30多名，缴获大小枪支44支，子弹4箱，伪满洲国币3000元及大批其它物资。这一仗沉重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使他们惶惶不可终日。

1941年，敌人在长城沿线大搞"集家并村"，制造"无人区"，企图割断抗日军民的血肉关系。北大岭村党支部带领全体党员和群众开展反"集家并村"，坚持"无人区"的斗争。房子烧了搭窝棚，窝棚烧了住山洞。为了打日本，誓死不下山。敌人一次次"扫荡"、屠杀、"大检举"，种种酷刑以至砍头，并没有把共产党人吓倒。1943年11月，北大岭党支部的创始人之一，承(德)平(泉)宁(城)联合县八区基干队队长赵国志，在八里罕战斗中壮烈牺牲，当时年仅32岁；翌年2月，北大岭党支部另一名老党员李翠同志，因叛徒告密而被捕，面对敌人的严刑拷打，他宁死不屈，后在辽宁营口监狱组织越狱暴动中英勇就义。一个人倒下去，千万人站起来。北大岭村党支部的战斗始终没有停止过。北大岭这颗火种，越燃越旺，8年抗战中，从小到大，由弱变强，她像一簇永不熄灭的火炬，给人们无限的信心和力量。

中国共产党
在承德街的第一个党支部

王锡民

一、接受任务，潜入承德

1942年，日本侵略军实行"五一"大扫荡时，我在冀中第九分区担任短师总支书记兼生活指导科长，活动在河北省博野县。敌人在扫荡时，学校已无法再开办下去。我和田皿同志(一队长)，徐华欣同志(三队长)在疏散了学生后，化装去白洋淀找第九地委，向地委汇报了学校反扫荡情况。把党员名单交给地委组织部后，就在白洋淀打游击，等待分配新的任务。到8月份，地委组织部长魏震同志派我和田皿同志去北京做地下工作。我们到北京后，住在我堂兄家中。因一时找不到公开职业做掩护，我就到承德街(现承德市)大堂兄王春和处(他原是我村党支部宣传委员，因敌人在我村建了炮楼，支部书记遭杀害，他来到承德街，开设了一个卖罗圈的店铺维持生活)，在这里情况还好，生活也安定，但我的任务是在北平开展工作，所以住了几天又回到北平。因无法找到职业，生活也发生困难，不可能长期下去，约10月份，我和田皿同志就离开北平，经保定、蒲城到唐县找到区党委，并经九地委书记吴立人同志把我们介绍到区党委组织部，分配在区党委党校学习。不久，又把我调到晋察冀边区党委组织部，由组织部长刘仁同志分配到城工部，派我回承德街工作。在这个时候，城工部长韩光同志先把我介绍到平山县老坟沟城工训练班学习。内容是学习形势任务，党的基本知识，

城市隐蔽工作，打入敌人内部的重要性等等。学习纪律十分严格，学员之间不准交谈，姓名也不准知道。集体上课，课后活动按划分区域，规定只能在本区内活动，不准越界。3个月学习结束后，即走上新的工作岗位。

我是受晋察冀边区城工部东北工作委员会单线领导的。组织通信处是河北省清风店、紫荆店、珠宝斋，在承德街的通信处是热河省承德西大街双盛合罗圈铺。如组织派人来承德联系，我先要问来人："你从那里来"？来人必须按规定的回答："我从王振邦家里来"，才能接头。如回答不对，不能和他接关系。领导还决定，在承德建立党组织后，由我任书记。

在出发前，填了表，照相留存。根据到承德的公开身份化了装，仍使用上次在北平时的旧居住证。1943年3月1日，我经古北口到达承德。

到承德后，为了完成党分配的任务，要有一个便于活动的公开职业，我就成了双盛合罗圈铺的店员。双盛合罗圈铺当时只有4个人：堂兄王春和，堂侄王小计，还有一个师傅和一个学徒。活动范围很小，房东家的社会关系也较复杂，不太可靠。同时，接近群众的机会也很少，很不便于开展工作。另外，我这两次来承德，虽然那时只有22岁，但在服装打扮上都是以大商人身份出现的。长期在这小罗圈铺里也不相适应，这就急需另找一个比较相符的身份同时又能开展活动的职业。但又由于我不会讲日语，初到承德又没有上层社会关系，要找到这种职业身份，困难很多，只有千方百计寻找时机，拉拢关系。一天，承德监狱一个警尉补傅德毓来买水筲（木制水桶），带的钱不够，我看他年轻（只20岁），对人热情幼稚。本着即使他不能给我大的帮助，能有个穿警察服的人来坐坐，别人也许会少找麻烦的想法，我就有意叫他拿走了。以后，我就抓住这个目标不放。经过一段时间的交往，我和他就成了好朋友。

我考察到傅德毓虽然没有大人物的社会关系，但了解到他所

在的监狱里关押着有势力的人，日满商事株式会社三友公司的经理曲雪珠因贪污罪被关在这个监狱里，并且不久就要被释放。我便对傅德毓做工作，要他拉这个关系，于是傅德毓就给曲雪珠很大方便。3个月后，曲雪珠出狱了。曲雪珠为了报答傅德毓的义气，酬谢对他的照顾，就把傅德毓推荐的我，介绍到三友公司当职员。这个职业接触的人很多，接触面也很广，对各行各业的人都有接近的机会。

二、承德街第一个党支部的建立

根据城工部的规定，在敌“五一”大扫荡期间，因敌人的占领而进大城市避难的党员，经审查没有问题的，可给予恢复党的关系。我首先恢了王春和的党籍，这样就有了第一个党员。不久，王春和到税务局去交税，巧遇税务局工作的卢敏政。王春和与卢敏政是老熟人，以前在兴隆时住对门，过去也是同班同学。对卢敏政的过去情况都了解，但对卢敏政现在的情况却不清楚。卢敏政虽然现在敌伪机关做事，但他是个有一定觉悟，要求进步的青年。他和王春和见面的晚上来我处，他知道我是从关里来的，他提出许多问题，他谈得很多，我就尽量让他讲。慎重地经常和他交往，抓紧对他进行考察，通过他的周围了解他的情况，通过他了解他的周围情况。几个月考察的结论是：卢敏政是个好青年，对我党有一定的认识，有一定的政治觉悟，决定发展他为中共党员。1943年秋天的一个下午，在承德街小佟沟南山坡上，宣布卢敏政为正式党员（为了工作，不定候补期）。这样，就有了我、王春和、卢敏政3个党员，成立了承德街第一个党支部。

敌占大中城市地下党组织的任务是团结群众，积蓄力量，进行隐蔽斗争。为了防止组织不纯和敌人的破坏，党组织的发展采取非常慎密的措施，既要发党员又不能太多。因此，有的人虽具备了党员的条件，也不一定马上发展入党。党支部成立后，先后发展的党

员有：教员丁振江和孙玉林，汽车司机张鸿勋、李金表，医院职员杨世昌，西大街补鞋青年李××，三友公司职员龙凤阁，原八路军伤员计顺才，国兵上士李××，修理电台的吴××，其余还有谁已不记得了。

三. 承德街党支部建立后的活动

千方百计将我们的工作打入敌人内部去。1944年，伪承德广播电台招考广播员，我们经过认真研究，广播电台是敌人的要害部门，打入这个部门会有很大的作用。于是决定由卢敏政同志去报考，并被录取。后又在广播电台发展了一个党员，并通过交朋友，拉关系，团结群众，掌握了这个部门的情况。

利用关系控制敌人的活动。承德监狱关押着大批老百姓，还关押着一批我们的人，其中有被捕的八路军指战员和地方干部。这批被关押的人员需要党组织的关怀和照顾。监狱警尉补傅德毓虽然阶级觉悟低，但他有一定的民族觉悟，很重感情。他管监狱的庶务，通过他关心被关押同志的生活，多加给点高粱米，使被关押同志吃得好一点。他还和被关押的一位县长和一位团长建立了联系，有时还替他们传传话。在苏军进承德的前一天，傅德毓告诉我：今天夜里要杀一批人，我要他想办法救这批同志，他虽说很困难，但可以想想办法。第二天他告诉我，几个日本鬼子都很悲痛，昨天晚上我给他们搞了一些老白干酒，都喝得醉的不能动弹了，夜里没有杀人。

傅德毓在郊区有个姓郑的朋友，介绍我认识后也彼此交上了朋友，我也称他为郑大哥。郑在郊区种菜园，环境很好，我把这里作为万一组织被暴露，需要砍线时的临时隐蔽点。

傅德毓为党做了很多工作，但他始终不知我是干什么的，承德解放后他也未找我要求安排工作，后来我才和承德县政府联系介绍他参加党组织。

三友公司原来是统配大米、白糖、煤炭的，后只统配煤炭了。公司内有6个日本人：3男3女。福田是管业务的，我在公司管配达，尽量和他搞好关系，对开展工作有方便。公司有100多个手推车工人和几十个马车夫，经常和我有业务联系。我利用工作关系，在这些人中做了大量的宣传教育工作，取得他们的信任。其他党员同志也做了大量的群众工作，到后来，这些经过党的教育的人员，都成为我们的力量。

日本投降后，因没有得到城工部指示，仍未公开活动。中共热河省委成立后，承德市地下党支部完成了历史任务，党员由省委重新分配工作。

承德解放后，根据我们向公安局提供的材料，枪决了特务头子傅小个子和警察黑刘，使广大受害者出了一口气。

我在承德搞地下工作3年，深深感受到承德周围是解放区和游击区，党的政策的影响是很大的，很深入人心的，各行各业的各界人士大多数是痛恨日本侵略军拥护共产党的。这是我们建立承德街第一个党支部和顺利完成任务的有利条件和可靠基础。同时，也深深体会到，在困难的情况下，要做好工作，首先是打政治思想仗，先要有革命的思想，才能不怕个人牺牲，才能不怕牺牲个人利益。树立了不怕牺牲的革命思想，才有胆量，有办法，才敢于去开展工作。那时，我们党支部成员都很年轻，我只22岁，卢敏政同志比我大一岁，党员的平均年龄只有21岁，又缺乏经验。现在回忆起来，有许多活动是简单、幼稚的，当时就是凭着一股革命思想，一个敢字干下来，并取得成绩和完成任务的。

（作者曾任中共交通部黄埔港务局党委书记）

承德街第一位中共党员的回忆

卢敏政

一、我是怎样入党的

加入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是我一生最高的追求和最大的幸福。在那白色恐怖的年代，我是怎样入党的呢？1943年春，共产党员王锡民受晋察冀中央分局城工部东北工作委员会的派遣，来承德开辟地下工作。他来承德后，根据分局城工部关于在敌“五一”大扫荡期间，因敌人的占领，而进大城市避难的党员，经审查没有问题的，可给予恢复党的关系的规定，首先恢复了从冀中博野来承德避难，在承德西大街开罗圈铺的党员王春和的党籍。这样承德就有了2名党员。不久，王春和到伪税捐局去交税，巧遇在伪税捐局工作的我。我和王春和是老熟人，小时候曾在兴隆住对门，又是同班同学。此后，我和王春和以老同学的关系开始来往。接触一段后，王春和把我介绍给王锡民。那是一天晚上，王春和对我说，我领你去看一个朋友。这样，我们来到王锡民的住地。见面后，我一看是王振邦，就十分高兴。王振邦说，现在我改名叫王锡民了。我听说王锡民是从关里来的，就提出有关八路军抗日的一些问题，王锡民很策略地做了回答。这次谈话，尽管王锡民同志话不多，但都恰到好处，问题讲得明了，又天衣无缝，让人抓不到把柄，使我从心眼里佩服他。从此，我抱着求知的渴望和他经常交往。在交往中，我就把自己所想的问题一古脑地向他提出来，如保定一带八路军多不多？同日本鬼子打仗打得怎样？民情怎样等等。并向他提出让他把我也带到口里参加八路军的要求。在交往中，我经常根据自己的所学、所感、所

想，讲一些怎样推翻日伪的反动统治，改变人吃人社会的道理。王锡民同志经常告诫我，谈话要慎重，对周围人的交往也要慎重。为了谈话方便，我俩大多是相邀到野外或宫墙外、铁道上边散步边谈话。每次相邀他都买些花生之类的东西，事前与我约定：发现附近有人就往我手里塞花生，高声让我吃；或是发现有人就把手里的花生皮远远的扬一下，告知对方。后来有一次我又向他提出到口里参加革命的想法，他对我说：要参加革命，也不一定非到口里不可，咱们俩在这先干着试试。他得到我的同意，就与我商量为革命做工作的办法。最后商定，先了解敌人的组织情况及动向。不久，在另一次碰头时，他又对我说：参加八路军，参加共产党，也不一定非到口里，说不定承德也有，咱们俩找一找，谁遇上了，互相告诉一声，咱们一块参加。后来又一次碰头时，他问我找到八路军、共产党了没有？我说，没有，我也不能到处问哪？他笑了笑说，我就是。经过这段工作和对你的考察了解，我可以介绍你参加，如你自己同意，我就当你的介绍人。我欢喜若狂地说，不用考虑，我早想参加，你快介绍我吧。接着，他向我讲了革命的当前任务和长远任务，党的基本知识，并说参加共产党就要为解放全人类，实现共产主义奋斗终生。还说，参加共产党搞革命，是很危险的，随时都可能流血牺牲。我说，我早把生死置之度外了。最后，他还是要我再考虑一下，并说他还要向组织汇报才能定。我着急地说，我的决心早下定了，你快些向组织汇报吧。1943 年 10 月 25 日下午，他带我上了佟山顶。在山头转了一下，看清附近确实没有人，然后，我们蹲到一个坑子里。王锡民马上向我宣布说，党组织已经批准你的入党请求，我就是你的入党介绍人。他还说，根据工作需要和你的表现，组织决定你为正式党员。之后，他举起右手说，现在由我带着你向党宣誓。我记得誓词是：遵守党的纪律，保守党的秘密，不怕流血牺牲，为抗日的胜利，为实现共产主义奋斗到底。宣誓后，他又向我讲了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党的最高纲领、当前任务和党的铁的纪律等，并嘱咐我

说，保守党的机密是党的纪律之一。地下党的活动方式是实行单线领导，党员之间不发生横的关系。今后，由我领导你，党通过我向你布置任务，听取你的汇报，你交哪些人做朋友，确定那个人作为关系人都要事先向我汇报，并征得同意才能去做。他还说，地下党的纪律要求党员和党的关系人对不该自己知道的情况不准询问。王锡民同志的这次谈话，至今铭记在我的心里。

二、承德街地下党支部是怎样开展工作的

承德街地下党支部认真执行了敌占城市党组织关于"进行隐蔽斗争，团结和组织群众，发展党的组织，集聚力量，配合对敌人的战略大反攻"的工作方针，做了大量的工作，但由于当时的工作环境和地下党的工作原则，所以对我们支部谁是领导人，一共有多少党员，谁是党员，特别是都做了那些工作，我了解的并不多。直到1945年8月15日日寇投降后，晋察冀中央分局城工部派人来承德，决定我们这个支部"不再继续隐蔽"，支部书记王锡民同志才召开了第一次支部大会，我们这些党员第一次聚集一起。

承德街地下党支部是1943年10月25日正式诞生的，截止1945年9月这个支部解体前，先后又发展了10名党员。其中由我做介绍人发展的党员4名。他们是：丁振江，当时在南营子完小任教员，解放后在福州军区工作，已逝世；张洪勋，当时是伪县公署土木科汽车司机，做过济南空军后勤部副部长；孙玉林，当时是电话电报株式会社的技术工人，做过呼伦贝尔盟水利局副局长；吴东升，当时是伪热河省广播电台(放送局)技术员，1944年夏入党，在抗日时期很坚定，为党做了不少工作。日本投降后，认为抗日胜利了，革命也就成功了，再加上家庭人口多，生活困难，经本人申请，组织批准退党了。此外，我们每个党员都交了一些朋友。这些朋友有的已成为了我们的关系人。比如，仅在于家沟西山坡的一个院子里我就发展王永全和林尚阁的父亲这两个关系人。解放后，林尚阁

的父亲经我介绍入党。在交朋友、发展关系人和发展党员中，我注意到从搞武装斗争的需要物色人，如林尚阁的父亲会制火药；张洪勋会开汽车；李小黑、孙玉林会使武器。我对他们进行宣传教育的方式方法主要是有来有往的闲谈或是利用敌伪报纸的一些资料因势利导，再就是介绍进步书籍给他们阅读。实践证明，这些做法是比较有效的。

我们支部还采取打进去的办法开展地下工作。1943 年 10 月，伪热河省广播电台（放送局）招考广播员、技术员。王锡民同志认为广播电台是敌人的要害部门，决定让我去报考。我通过考试被录取后，在电台交了一些朋友，还把该台技术员吴东升发展为党员，较好地掌握了广播电台的内部情况。驻滦平两间房的伪满军上士李小黑，是兴隆县人，我利用同乡关系，与他来往，不久就成了我的关系人。这个关系人被王锡民接过去后很快被发展为党员。1945 年 5 月的一天，王锡民同志同我分析了国际国内形势，认为德国法西斯投降后，日本投降只是时间问题了，决定让我到两间房向李小黑布置工作，让他团结爱国士兵，待时机成熟后，配合我军作战。我通过关系拿到一张去滦平的"通行证"，向李小黑布置了任务。在日本投降后，李小黑曾带领二三十人携枪来承德，被滦河洪水挡住，他又没有经验，所以这些人把枪丢到河里，四散回家了。李小黑也带 2 支枪 1 匹马回到兴隆，把武器和马匹交给了八路军。

当时，我们党支部的党员都很年轻，缺乏经验，但我们能在承德这个白色恐怖的地方坚持下来，并较好地完成了组织交给我们这个支部的任务，我觉得，我们就是凭着抗日斗争必胜的信心和共产主义的理想，凭着不怕苦，不怕死的那股劲。每当回忆起那时的情景，都使我浑身是劲，激励我克服困难，为党做更多的工作。

（继明整理）

（作者曾任中共承德地委组织部副部长）

日本关东军春田中队的覆灭

李中权

1943年春，我冀东平原游击根据地逐渐恢复。李运昌司令员、彭寿生参谋长亲率主力进关，经过丰润之南青坨和马家峪等大的战斗之后，我冀东的形势开始扭转。

然而，敌人却丝毫没有放松对我根据地的进攻。在我冀东基本游击根据地刚刚恢复之际，敌人便举行了大规模的频繁的"扫荡"，我冀东党政军民主要领导机关为了粉碎敌人的"扫荡"，决定分散活动。十三地委和分区司令部机关仍在关内基本地区活动，坚持对敌斗争。为了分散目标，我率领分区政治部和刚成立的尖兵剧社，在分区警卫连连长张进学、指导员朱光的掩护下，从河北迁安县的黄槐峪北上，由喜峰口以东出铁门关越长城，到热南之宽城、瀑河川一带活动。

出关以后，我们活动在喜峰口北之瀑河川地区及宽城到喜峰口公路两侧。这里是敌人已统治达10年之久的所谓伪"满洲国境"。自八路军部队挺进热南后，伪满洲报纸惊呼西南"国境"危殆，应加强西南"国防"，对我冀东八路军的活动戒备甚严。所以，我们一到来就感到敌情很严重。我们一行300余人，目标不小。天天有情况发生，就得天天转移。有时吃饭都成问题。而且部队根本无房子住，全是露营。

5月16日，我们到达了喜峰口以北的热南王厂沟村，群众的房子已被日寇烧光，粮食大部分被抢走，许多抗日干部、群众被害，全村一片凄凉。但许多抗日干部、群众仍在敌人烧坏的破墙上搭起草棚，有的到深山沟里临建住处，坚持和日寇斗争。我们来到后，群

众拿出忍饥挨饿省下来的一点粮食，给我们吃。由于粮少人多，只能做稀饭吃，而且冀东部队1943年前都是高度轻装，从不带碗。除了群众借给少量的碗以外，许多战士都是用树叶当碗吃稀饭，生活很艰苦。就在当天下午，由晋察冀军区派来的干部才山等同志（才山同志来冀东军分区任副参谋长）百余人，由我西部十三团和特务连护送到热南王厂沟，与我会合。在口外物质条件很艰苦的情况下，我们仍设法较为丰盛地欢迎了他们。当晚，我们600余人即宿营于王厂沟。

第二天拂晓，据侦察员报告，东边发现情况，敌人已到棒捶崖，直奔王厂沟而来。我即令：警卫连埋伏于王厂沟之东山，打击进犯王厂沟右侧的敌人和切断敌人之归路；特务连埋伏在王厂沟南面的小山上，打击敌人的主力；机关和新到的百余名干部派专人率领，带至王厂沟西南面的深山沟里，用1个班掩护。

王厂沟位于宽城县西南，孟子岭的西北。它的北面是瀑河，河北岸是大北山。山高峰险，群山矗立，古树参天，可谓千山万壑。南面是瀑河南山。南山、北山只隔瀑河，遥遥相对，把王厂沟的7个自然村环抱其中。所以，这里不仅是一条我军政人员出入长城开辟新区，转向根据地的交通要道，也是敌我必争之要地。

上午7时许，我站在特务连之山上，从望远镜里清楚地见到日本鬼子穿着黄色的呢子军装，个个头上戴着钢盔，约150余人，正由棒捶崖到王厂沟的山梁上走来。有一个指挥官，佩带着指挥刀，拿着望远镜，正对王厂沟窥视，指手划脚地摆弄着。我们部队隐蔽的很好，没有什么目标给敌人发觉。又等了半个小时，敌人并没有从东边大道上直奔王厂沟。这使我们感到奇怪，敌人到哪里去了呢？又等了一会才明白，原来敌人改道瀑河川之滨，绕过王厂沟北山，然后从西边小道上迂回过来。

突然间，我们设伏两个连的14挺机枪和6门小炮（掷弹筒）一齐发出怒吼声，把敌人压在村口中的一条凹路里。机枪子弹、手榴

弹像雨点似地落在敌人头上，整个的王厂沟，瀑河川都颤动起来。我英勇的特务连战士在薛连长、王指导员的率领下，趁硝烟向敌人扑去，展开了一场血战。面对着凶恶的日寇，他们用刺刀穿，手榴弹打，枪把砸……当场打死了60余名。从鬼子尸体上得知，此系日寇关东军一O一师团九联队建制的春田中队。敌人的武器甚好，我们首次缴获到敌人步枪三八双准星、带刺刀的轻机枪和带镜子的九二式重机枪。

敌人虽已被歼大部，但剩下的少数仍在石头砬子里顽抗，另一部北窜至王厂沟北山与警卫连形成对峙。敌人抢占了我警卫连所占领的制高点最北端下面一个山头。这个山头是靠沟口的，警卫连是从沟内抢占制高点的，故未和敌人遭遇。敌人从这个山头上用重机枪射击，警卫连和全连火力进行掩护。二排排长巩玉然率领全排从制高点居高临下，向敌人占据的的山头迅速接近。待二排快接近敌山头时，发现敌人火力很强，连长估计二排攻下这个山头可能困难，又命一排副排长张治国率一排前去增援。但由于二排同志们求战心切，在一排未到之前，他们已发动了两次进攻。第一次冲锋，由于敌人拼命抵抗，用掷弹筒弹当做手榴弹打，再因我兵力较少，故未能攻下山头。因为敌人人数多、火力猛，许多同志负伤、牺牲。最后只剩下四班长和二排两个同志和敌人拼杀。他们的刺刀刺死敌人后，丢在敌人身上(那时是三八枪，刺刀是活的)。子弹打光了，枪托也砸断了，最后他俩就用石头打敌人，四班长牺牲了。二排长巩玉然也负了伤，但他还用石头砸敌人，直拼到一排赶到。战斗进行到下午2时许还没有结束，我即令特务连抽一个加强排，绕到王厂沟东边进至北山，配合警卫连歼灭北山之残敌。在我部队运动过程中，敌曾用重机枪扫射，欲阻击我对北山的增援，但我部队迂回敌侧，使敌未能阻止我部队运动。北山上敌人的太阳旗高高悬起，这更激起了我广大指战员的愤怒。在下午4时许，我北山4个排的兵力同时向敌人发起冲锋，敌我双方投出手榴弹，紧接着进入了白刃

战。最后，春田中队被我全歼。此次战斗，我两个连也伤亡了50多人。薛辉荣连长光荣牺牲(薛辉荣是陕北红军老干部，颇优秀，原为十三团营长，因部队整缩，改任连长，牺牲时仅二十几岁)，张进学连长和巩玉然排长也负了伤。当夜，部队在当地群众帮助下，安置了伤号，掩埋了牺牲同志之后，安然渡过了滦河川到北大山去了。

这次歼灭战，极大地鼓舞了热南人民，它对于配合关内基本地区反"扫荡"起了良好的作用。

(作者曾任北京军区副政委等职，少将军衔)

智擒日本宪兵司令赤本大佐

年焕兴　马兰田

1938 年 10 月，八路军宋邓纵队西撤时，留下三十三大队党总支书记包森率领一连战士和部分伤员、医生、看护员组成第二支队。由包森任支队长，坚持在兴隆瀔河川活动。

这支小队伍人地两生，孤军活动困难极大。但是官兵久经锻炼，包森又有在渭北打游击战的经验，所以既有信心又有办法。他们牢记党中央、毛主席关于坚持游击战争是冀东党的基本任务的指示，灵活、机动地进行游击活动。他们夜间住在村里，天亮前佯称向远处转移，上山隐蔽，晚上再更换村庄宿营。日伪军连连出击，多次接近二支队隐蔽地，以火力侦察，不见踪影，只好收兵。这样，他们既避敌锋芒，又不失战机，接连在佛爷来、三岔口打了两个胜仗。1938 年冬，支队发展到 200 多人以后，一部分向北开辟地区，包森率领 100 多人南跨长城，向遵化境内建立根据地。此刻，冀东革命形势虽然转入低潮，然而有冀东抗日大暴动的基础，二支队在不断地战斗中，迅速扩至七八百人。

1939 年春，敌人在冀东游击区内外增设据点多处。组织大兵力频频"扫荡"，疯狂屠杀抗日人士和抗联家属，又从唐山调来日本裕仁天皇的表弟、宪兵司令赤本大佐，率队驻扎在遵化县城，组织伙会。抽调大批讨伐队，用"入海战术"、"分进合击"等手段，对我遵化北部和兴隆南部长城沿线山区实行惨绝人寰的大屠杀，妄图扑灭抗日烽火。在艰苦卓绝的斗争中，包森认真研究毛泽东同志的军事论著，浏览《孙子兵法》，采用灵活多变的战术，不求一战打开局面，打得了就打，打不了就走，反复游击，积小胜为大胜。他们在敌

人进攻时，就跳出“扫荡”中心，以渗透方式开辟新区，他们充分发动群众和依靠群众，认真执行统一战线政策，以求多助，英勇作战，先后以奇袭、奔袭、强攻等灵活战术，攻克迁西的洒河桥、三屯营、遵化的堡子店、东新庄、平安城，兴隆的黄花川、玉田的辘轆庄等敌据点，并在夏庄子、周桥子、刘备寨、万字峪、梁屯、户部庄等地作战数十次，共歼日伪军数百人，缴枪数百支，战绩卓著。敌人进行了春季“大扫荡”以后，以为我二支队所剩无几，坐镇遵化的赤本大佐异想天开，妄图亲手捉住包森。

3月20日深夜，包森在前山寨村召开了中队长以上干部参加的紧急会议。会上，同大家一起总结了几个月内在敌强我弱、革命暂时处于低潮的情况下，打了大小四五十次胜仗的经验，进一步坚定了贯彻党中央、毛主席坚持游击战争的指示，决定："化整为零，返回平原，积极寻战，坚持山区，主动游击。"会后，各中队积极贯彻这次会议精神，干部战士都分散隐蔽到老乡家里。包森自己化装成老百姓，背个筐子，到各村和大家联系，指挥各游击小组寻机作战，机动灵活地打击敌人。清明节后的一天晚上，支队部贾振远同志、手枪班侦察员马兰田同志、第五中队副队长年焕兴同志和三四名战士来到遵化城北的阎家沟执行侦察任务。

4月26日早上，贾振远、马兰田、年焕兴和三四名战士都化装成老百姓，在村南路边的坝台上帮助老乡干活，有的铡草、有的脱坯。时近中午，从村南面来了3个人，走在前面的一个人穿粗布便衣，走在后面的2个人都穿大褂，像是做买卖的。临近，马兰田发现那个穿粗布便衣的原是他们手枪班战士王振西，已经两三个月没有见着他了，听说他被俘了。马兰田对年焕兴、贾振远使了眼色，装没看见，还是给老乡干活。

越走越近，王振西看出马兰田和年焕兴都打扮成农民模样，敌人认不出他们，就走到年焕兴跟前，用胳膊肘（他右手受伤）碰了年焕兴一下，看着马兰田，用嘴一拱，指着后面的两个人说："这是日

本司令，那是翻译”。贾振远、年焕兴、马兰田和战士们都立即拔出手枪，大吼一声：“不许动”！从坝台上跳下来的两个战士用枪顶住了“司令官”和翻译的腰眼。那个日本司令又胖又矮，穿的大褂挺瘦，伸手掏枪，一个战士一把拽住他的手，撕开了他的大褂，掏出他的小花牌橹子。贾振远缴了翻译的枪。“快走！鬼子的大队人马就在大柳庄。”王振西顾不上说别的。大柳庄离这儿不过3里地，再呆一会，鬼子大队人马就会追上来。大家赶紧押着鬼子和翻译往北走，谁知鬼子司令伊里哇啦地嚷嚷，就是不肯走，年焕兴到老乡家里找来了一根猪毛绳，捆住鬼子的双手，连拉带拽地往侯家寨方向撤。那翻译乖乖地跟着走。

路上，贾振远边走边盘问那个翻译。翻译说，他是遵化平安城人，姓孙，是在“家礼”的。后来给日本人当翻译。正巧贾振远也入过“家礼”。二支队分散隐蔽活动开始以后，包森同志曾几次让他以“摆香堂”为掩护做群众工作。贾振远便和他说起了行话。了解到这个日本人是宪兵大佐，叫赤本，是个司令。翻译还说，以后再也不给日本人干事了，赞扬王振西真诚有智谋，恳求放了他。贾振远觉得这个翻译还老实，就把他放走了，刚放走就后悔了：如果不放走翻译，这个日本鬼子说些什么，可以让他翻译，了解敌人情况。

又走了十几里地，快到侯家寨了，后面响起了枪声，鬼子大队人马追了上来，密密麻麻的有两千多人。赤本一听见阵阵枪声，可来了劲，像条死狗一样，死活也不走了。这可怎么办呢？王振西上前将绳子套在赤本的脖子上，推的推，拉的拉，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把他拖上侯家寨北边的边关楼子。怕被敌人包围，就拖着他往北撤。幸亏山上有开庄一带的民兵阻击日寇的先头部队，几个战士才牵着赤本撤进北山沟。到了晚上六七点钟，年焕兴他们把赤本拖进马蹄峪北边的柳树沟子。那里有几户人家，战士又渴又饿，就跟老乡要点饭吃，也给赤本盛了一碗。这家伙怎么也不肯吃，跪在地上，捧起脖子上挂着的一个小铜佛爷，嘴里还不停地嘟嘟囔囔，像是在

念经。

吃完饭，战士们叫他走，他死活不走。一位小个子战士，从身后往起拽他，不料赤本腾地站起来一踹，把那个战士踹出去老远。这一来可把大家气坏了，南边又响起枪声，敌人追来了。急切间王振西跑到老乡屋里拿来一把斧子，照着赤本的脑袋砍下去。这个血债累累的鬼子司令就瘫倒在地，腿蹬了几下，没气了。战士们把他拉到房子边的河沟里，七手八脚地刨了个坑，把他埋了，还在上面插了个柳条枝作了记号。

埋完赤本，年焕兴对贾振远说："咱们分头走吧"。于是，贾振远，马兰田和王振西往东，年焕兴和其它几位同志往北，分头撤走了。

从赤本被俘的第二天起，鬼子的"扫荡"更疯狂了。贾振远、马兰田，王振西在马蹄峪北边山里躲着，王振西把骗赤本的经过讲给贾振远、马兰田听。

原来，春季大"扫荡"开始后，赤本搞了好几次"围剿"，一直没有把包森围住，就把刚刚捉到的王振西找来，问他："你知道包森在哪儿吗？"王振西回答说："我是包森侦察队里的战士，还能不知道他在哪里"。赤本便说："你们的司令，我很佩服，很了不起，你带我去找他，我要和他面谈"。王振西说："好，那还不行"。赤本很高兴，马上就要集合队伍出发。王振西说："带着这么多人去，一到就得把老包吓跑了"。赤本问："你想怎么办？"王振西说："依我看，你穿便衣，我带着你在前走，让大部队在我们二三里路以外跟随"。赤本觉得有道理，就套上那件瘦大褂儿，带了翻译，跟着王振西走在前面，命令部队跟他拉开二三里地的距离。他满以为我八路军被他们打得不敢大股活动，到处东躲西藏。可以由王振西带路，以谈判为名，先把包森稳住，等他的队伍一到，再来个捉活的。然而，这仅仅是他的一厢情愿。

王振西呢？他早已拿定了主意。非把他带到八路军游击队那

里去不可，叫他自取灭亡。狂妄的赤本果然中了这个调鬼离窟计。

三四天后，贾振远、马兰田、王振西在侯家寨东面的禅林寺找到二支队队部，见到包森同志。一见面，包森同志就握着王振西的手说："你的任务完成得很出色，为人民立了一大功"。贾振远向包森同志汇报了路上的情况后，包森说："任务完成得很好，你们给人民除了一大害，处死也有功嘛！"这时，炊事员让他们 3 个人吃饭，包森同志风趣地说："你们立了功应该吃肉，可这儿是和尚庙，只能吃素了"。说得大家哈哈大笑。包森同志接着说："吃完饭，王振西再把情况详细谈谈，你们俩休息"。

赤本是日军驻唐山的特务机关长、宪兵司令，是裕仁天皇的表弟。他的被俘，在日本国内引起了很大震动。开始，日伪军 2 个师团的兵力全部出动，到处"扫荡"，企图夺回赤本。后来又强迫遵化的商人给包森送信，每个信封上都写着"面呈包司令长官"。他们在信里提出：愿以 50 挺机关枪、数十箱子弹换回赤本。后来又说，如果赤本已死，愿以同样的条件交换尸体，并托人传信给包森，问他要啥条件。日本的著名女特务头子川岛芳子，还专程跑到冀东四处游说，让交出赤本。包森同志识破日寇缓兵之计的阴谋，干脆地答复："只要一个条件，就是你们投降，滚出中国去"。果不出包森所料，日军调遣数千人对遵化全境"扫荡"1 个月之久。

二支队指战员活捉赤本大佐的传奇性胜利，受到广大抗日军民的赞扬，其事迹曾登载于八路军总部编印的《八一》杂志上。这年冬天，晋察冀军区总结冀东工作时，认为二支队在冀东革命形势处于低潮时，还能打许多胜仗，扩大队伍和游击区，是难能可贵的，表扬了二支队。包森同志和他的战友们，又以新的胜利迎接了革命高潮的到来。

（栾福忠整理）

智歼米泽四郎

刘继抗

1942年7月，我奉命率承滦兴联合县大队在雾灵山地区开展青纱帐大复仇活动。当时，县委书记李越之同志给我们这支队伍的任务就是以青纱帐为掩护，打小歼灭战，积小胜为大胜。全大队歼敌1个排。接受任务后，我集合了全大队200余人，准备在雾灵山的盘道梁、冰冷沟一带打几个伏击。但由于人多不便隐蔽，几次设伏都没有成功。所以，我们决定把队伍化整为零，以中队为单位开展活动。我和一中队长张君普同志带一中队和大队部共60多人，继续活动在雾灵山盘道梁和鞍匠、一间房、小白旗一带。

8月中旬，日伪在热南推行什么"民匪隔离"政策，准备在鞍匠、一间房、小白旗这条大川率先割"高杆"(庄稼)，搞"集家"。敌人这一罪恶阴谋，遭到这一带乡亲们的强烈反对。他们对那长势很好、即将成熟的庄稼十分心疼，因此三五成群或三几十人结伙到鞍匠警察署请愿，抗议割"高杆"，毁庄稼，反对"集家并村"。针对这种情况，我们决定把队伍化装成请愿的村民，混进鞍匠警察署，拿下这个敌人据点。为进一步摸清情况，我派大队侦察员大黑、二黑到鞍匠侦察。此外，派一中队长张君普联络地方甲长。乡亲们听说我们要打鞍匠警察署都很高兴，也不断地向我们提供情况。我们搞清敌情后，决定8月26日开始行动。8月25日，我把队伍带到下凉水泉南面的咬舌沟，进行战前的各项准备工作。下午，上凉水泉和附近另一个村的甲长匆匆忙忙地来到我们驻地，气喘吁吁地说：情况变了，从承德来了个大官叫米泽四郎。这个日本人是伪承德县的副县长。昨天他到鞍匠，发现我们一拨儿接一拨儿的来请愿，怕把

事情闹大，说暂时不割“高杆”，不搞集家了。明天他还要到小白旗去。对米泽四郎这个人，我早有耳闻，他是个政治特务，虽为副县长，但独揽全县大权，民愤极大。如果把这块肥肉吃掉，是再好没有的了。我想：从鞍匠到小白旗，只有经一间房、凉水泉这条牛角路，如果在凉水泉或一间房等地设伏，一举吃掉米泽四郎的可能性极大。我把想法告诉一中队长张君普后，他完全同意我的意见。为了保密，我们以不再打鞍匠为由，把队伍带到咬舌沟西南边的一个小村里。26日早晨，我把侦察员大黑、二黑派出，让他们侦察米泽四郎的行踪。中午，这两个人回来向我报告说：“上午11点，米泽四郎乘一辆敞篷汽车过下凉水泉驶向小白旗。车上有20多人，还有一挺歪把子机枪”。我们估计，由于小白旗地处深山，条件很差，米泽四郎不会在那儿多呆，明天上午很可能返回鞍匠。所以，我们就把设伏时间确定在8月27日上午。

战斗方案确定后，我们先后召开了党员大会和军人大会，进行战前动员，发动大家献计献策。战士们一听说要打米泽四郎，情绪都十分高涨。三班长韩德润拍着身上背的那两颗“王八雷”风趣地说：“我这两个弟兄该上战场了，咱们来个地雷战，请这个东洋鬼子尝尝咱八路军的铁西瓜”。会上，我们决定把韩德润背的那两颗地雷分别埋在下凉水泉西门外的小河两旁。因为，尽管这条小河的水很浅，但因没桥，再加上一过小河，河东的汽车路就拐向东北。所以，来往的汽车到小河旁必然减速。车一减速，我们拉雷的时间就容易掌握了。把伏击地点选在这儿，还有两个有利条件：一是河西汽车路两旁都是菜地，尽管没“高杆”，但有黄瓜架、茄子秧、倭瓜秧，便于隐蔽；二是河东路旁铁匠炉旁有个门楼，门楼上堆满留茬，门楼又面对公路，便于观察。

8月27日一大早，我就把部队带入伏击阵地，让张君普和“二黑”每人负责一颗地雷。告诉他们以我枪响为号把雷拉响。我还派通讯员小马带2名战士上下凉水泉东山，命令他们在战斗打响的

同时，剪断敌人电话线。此外，为防止乡亲们受牵连，我还动员下凉水泉的乡亲，在战斗打响后，让各户的妇女把男人、小孩把大人捆起来。待敌人追问时，让他们说是八路军捆的，因此无法向皇军报告。上午9点半，一辆汽车从西向东驶来，我举起望远镜一看，正是米泽四郎乘的汽车。车上除伪警察外，还有两名妇女。当汽车驶到小河旁，我立即抽出"二十响"，对准米泽四郎和机枪射手就是一梭子。接着就听到"轰""轰"两声巨响，趁着升起的烟尘，我们的战士如猛虎扑食一般奔向汽车。还没等敌人闹清发生了什么事，战斗就结束了。我记得，从枪响开始到把俘虏押下车去，前后只不过10来分钟。这次伏击，我们击毙敌人8名，除米泽四郎、鞍匠警察署长曹振芳和汽车司机、机枪射手外，还有4名伪警察；俘敌9人，其中伪警察7人，坏女人2名。还缴获歪把子机枪1挺、子弹2箱、手枪3支、战刀1把、大枪十数支和望远镜、照相机各1架、地图1张。由于当时汽车对我们没有用处，我让战士们倒上汽油把它烧掉了。

伏击战结束后，我们押着俘虏撤到下凉水泉南山。在山坡上我对俘虏进行了教育，向他们宣传了我党、我军的政策，劝他们改恶从善，而后发给回家的路费，把他们释放了。这时，突然发现从鞍匠方向开来几辆汽车敌人，向我猛扑过来。我命令部队迅速撤回雾灵山。

这次伏击，在热河震动很大。地分委书记李子光对我说："你们立了大功，打死一个米泽四郎，震慑了全热河的日伪军。"

米泽四郎被击毙后，日伪当局为悼念这个魔鬼，在其被击毙之地修了个小庙，小庙里的那块碑上刻着"米泽四郎战死之地"几个字。日本投降后，庙被拆了，碑被砸碎了。但人们经过这里时，还是要吐上几口唾沫，以解对这个魔鬼的心头之恨。

（王继明整理）

潜入敌人心脏的一次行动

尹子峰

1942年秋，我在冀东军分区十三团侦察排工作时，参谋长高桥传达首长指示，让我带4名侦察员进承德西大街，到“尊经阁”找一位卖笔墨纸砚的关系人接头，并交待了联络暗号，侦察了解承德县警务科警防股股长黑烟(日本人)和承德警察署司法股警尉傅志成(外号叫傅小个子)的活动规律，准备抓住机会除掉这两个杀人不眨眼的害虫，借以打击敌人，振奋人民。这两个家伙，丧尽天良，灭绝人性，经常到抗日根据地和无人区进行讨伐，搜捕我革命力量，到处残害抗日群众和无辜百姓，血债累累，民愤极大，人人恨之入骨，盼望我们早日除掉这两个祸害，我奉命带着侦察员王福、邵廷智、曹富英、宁佩恒4人乔装成老百姓，携带短枪和化装用的衣服，从部队驻地雾灵山下小白旗出发，沿湖里、陈栅子，过滦河北上，进小贵口，搭过梁，入元宝山沟，经广仁岭，到高庙前大树下打打站，卷支烟抽后，就进入承德执行这项任务。我那4位战友不是本地人，没到过承德，对承德街面地理情况不熟。我是承德县头沟区岗子乡鹰手营子东沟人，参军之前来过承德街几次，对承德街比较熟悉。当时决定由王福同志带领邵廷智、曹富英、宁佩恒从高庙五道沟上山，在南山一带巡视。然后，我们共同到碾子沟下河套汇合，两天之内不见不散。我和战友们分手后，手提一个白洋面袋拆开做的包袱(里面包着化装用的两身衣服、一双布鞋和一支手枪)，戴着苇帘头草帽，穿着家做的白对襟褂子，青裤子，日本产的太阳牌胶鞋。从高庙下来，沿着大道一直向东往街里走。走到西苗圃(即现在承德地区汽车二队)，正碰上大北沟胡家砖瓦窑烧窑工回

家吃中午饭，我就大模大样地跟在六七个窑工后面进了头道牌楼。刚走到安定里(现在承德市第五中学校门口路南)头道牌楼派出所小楼前，一个腰挎洋刀的警察站在门口。此人瓜子脸，大高个，神气十足，两眼不断地搜索着来往行人。放过了满脸乌黑的窑工，他招呼我，叫我过去，跟我要证明书。我虽然在思想上有随时与敌人周旋的准备，但没有料到在街头上就碰到了麻烦。没有证明书，当时我心里有点紧张，可是神态很镇定。就走过去，满面笑容干脆地回答："有证明书，在包袱里呢。"这家伙挺横地说："快拿出来！"说话间，我走到派出所门口，他在门口的台阶上站着。我站在第一级台阶上，把包袱放在第二级台阶上(一共三级台阶)，他又催我快拿证明书，我故意磨蹭时间，借机观察周围动静。我一边解扣一边说："别急，系的死疙瘩，不好解。"我一看四周稀稀拉拉的没啥人，楼里也没有说话声，估计别人都回家吃饭去了，只剩他一人当班，我从包里掏出手枪对准他的胸膛说："给你，这就是证明书！"一搂枪机把他打倒了。因为我们二人距离很近，穿膛的枪声很小，把他打倒离开现场后也没被人发现。我孤身一人，没敢往街外跑，怕野外目标明显跑不脱，便钻进胡同，跳过几家院墙，从大榛子沟口上大道，经过承德县公署(即现在西大街承德市织染厂)和承德监狱门岗，也没人检查。我大步流星地拐进大胡同，通过旱河直奔西柴禾市，过了西柴禾市我就到了沙子梁。由沙子梁往石洞子沟跑的时候，我就听到街里的汽车、摩托车和枪声响成了一锅粥。我在梁上看到日本的和满洲国的宪兵、警察出动了很多人，整个街西头乱了营，看到他们直奔水泉沟和广仁岭方向追下去了。敌人不知道我逃跑的路线，我怕暴露目标，没敢歇气也没敢打枪，一直跑到石洞子沟脑。由那搭过梁，到了碾子沟，我才松了一口气。走出碾子沟来到下河套，他们 4 个比我先到一步。他们在山上听到街里汽车的响声和枪声，就知道我出了事，赶紧朝集合地点跑。他们 4 人正在为我着急呢，看到我平安地回来了，都特别高兴。我把出事的经过跟他们一

说，大家都很担心，怕回去受处分。我们这次的侦察任务就是与承德街的关系人取得联系，捉黑烟和傅小个子，或者除掉这两个害人虫。任务没完成，半路上出了岔子，暴露了承德附近有八路军的目标。我对几位战友说："这没你们4个人的事，我自个干的，给我啥处分我领啥。"接着，我说咱们别再进街了，回去吧。我们过了滦河就回小白旗了。到家把情况向首长一汇报，首长不但没批评，还表扬说："打的有价值，咱们的子弹不能白出去，这种情况不打也不行。"后来听说，这一枪对承德震动不小，群众议论纷纷，敌人惶惶不安。

（彭明生整理）

一个伪警察的自述

刘万春

我是隆化县汤头沟乡沙坨子村人，在伪康德8年(1941)从隆化考入承德警察学校，受训3个月，分配到承德街头道牌楼派出所当警士。我去之前，派出所只有3个人。警长舒之荣和警士高振远一班，黄福林警长和我一班，每班值勤24小时，休息24小时。当时头道牌楼派出所没有所长，主要事务由警察署外勤监督警尉李国臣直管；每班事务由当班警长负责处理。武器装备每人一把随身携带的洋刀，还有两只供值勤人员使用的手枪。那时我的饷钱是22块满洲票。服装是公家发，其余生活费用全是自已负担。我当警察的原因是日本鬼子逼着干的。我们哥6个，我排行老三，家里八九口人，生活特别困难，缺吃少穿，还得当壮丁出公差。我23岁那年，从各甲要团员，不出人就得花3斗小米雇人当团员。我们家拿不出小米，就逼着我去当团员。当团员净受鬼子和警察的夹板气，不是挨打就是挨骂，跑又跑不掉，我一赌气就去报考了警察学校，干上了警察差事。穿上深黄色毛料警察服，挎上洋刀，比当团员神气多了，我想再也不受他们的气了，心里美滋滋的，觉着高人一等。当了警察，我们家也沾了光，不论村长和甲长都不敢随便欺负我们土包子了。我当时也暗暗下决心，一定要好好干，熬个一官半职，给家里壮壮门面。我到派出所之后，警长黄福林告诉我，水泉沟、牛圈子沟经常发生砸明火的事，还有走私大烟的事，让我严格盘查行人，防止管辖区内出事。我是新警察，警长交给的任务不敢粗心大意，值勤的时候，坚守岗位，认真负责。黄警长看我是个有心计的人，他对我的工作还比较满意，有时放手让我一个人去做。我就尽心竭力完

成警长交给的差事。

伪康德9年(1942)阴历七月的一天中午，我和黄警长值勤，黄福林出去警逻(也就是巡逻)。后来听说他到胡家大院去打牌，让我警备(在所里看家)。我在迎门的办公桌里边坐着，看到有一个20多岁农民打扮的小伙子，大步流星地从街外往街里走，他到小楼前朝所里张望。我一瞧，他手里提着东西，不像正经农民，就喊他过来验证明书。这时，他从马路中间往所门口来，我也起坐，绕过办公桌朝门口走。我站在门口的第三级台阶上，他站在第一台阶上。我向他要证明书，他说有，就开始掏。我当时以为他是走私的秘输犯，没想到他有枪，所以我也没往出掏手枪，他的动作很快，还没容我看清楚他掏出的啥东西，他说："给你！这就是证明书。"叭！一枪，一颗子弹从我的左胸偏肋处斜穿进去，由左胳肢窝出来，我一转身倒在了门里边。他第二枪击在了门框上，我爬起来从后门窜出去，就喊住在小楼后边的外勤监督警尉李国臣，没喊几声我就昏迷过去了。

当时打我的那个人的模样，因为时间特别短促，我记得不十分清楚。他中等个，好像戴着一顶草帽，仿佛是长瓜脸，穿的衣服可能是白的，手里提着点东西。

我清醒过来以后，已经躺在第五军治安部医院(地点在现在的承德市五中)病床上了。医官说，子弹是穿膛过，没有留在胸里。我住了40多天院，在医院听说那天出动很多人去追，没有追着，街里实行戒严搜查。派出所增加了人，街头路口设了岗，夜间成宿大搜查，挨家查户口，白天搜山，路上设卡检验证明书，一连搞了10多天，也没抓住那个人。把市民和老乡搞得人心惶惶，人人自畏，不知道承德出了什么大事。打我的那个人是干什么的，我也弄不清楚。那时长官问我当时的情况，我也无法肯定回答。警察署的人对我说，是第五军管区一个看仓库的退伍兵干的，把那个人已经抓住了，让我去认，我没去。不久，又有人对我说是汤二虎一个副连长落

草为寇，在牛圈子沟持枪路劫卖柴人钱款的尤相三干的，也把他抓住了。究竟是谁，当时我也弄不清。后来才知道那是个骗局，上边为了稳定军心，拿尤相三路劫被俘事件做遮羞布，掩盖我被打的事件，以宁事息人，安定民心、军心。

我出院之后，又回到头道牌楼派出所。人员已经有变动，因为我正在休养，没有参加勤务。休养一个月，把我调到驿前(火车站)派出所继续当警士，在那一直干到日本投降，我才跑回隆化老家。

我住院的时候，街面上的传说我不知道。我回到派出所之后，各种各样的说法才陆陆续续、只言片语地传到我的耳里。越来越多的人员讲，说是八路军的侦察员打的我，说他走的时候是从王家花园跳墙跑的。还有的说他会飞檐走壁，长着飞毛腿，跑起来快极了；还有的说他进街把日本军、满洲军的情报带走了；也有的说八路军把警察特务谁做恶、谁行善的名单弄清了。说法很多，全是秘密流传，把八路军说得神通广大。

这件事发生后，对我影响不小，总觉得长官和同事都看不起我。再拼命干，也得不到长官的赏识。我当了5年警察，最高才升到警长衔。有的人一年晋升一级，有的两年晋升一级，我是光干不升，给别人晋升不给我晋升。不管我怎么干，上边也不重用我。

我挨那一枪之后，也不知道八路军给我记的是黑点还是红点。值勤务时，心里总是害怕，担心再碰见八路军挨第二枪。心里害怕，嘴还不敢说，在长官面前还得说什么也不怕。可是在走路或执勤时，总是处处加小心，细细观察周围有没有盯着自己的人，怕遇见藏在行人里面的八路军。那几年我是在担惊受怕中生活的。平时没有伙伴陪同，我很少单人游逛。在警察中关系比较好的同事之间也秘密谈论八路军砸警察署，火烧派出所的新闻，说起来也都挺害怕的。驿前派出所地处街边子，也怕挨砸。日本临投降前一二年，八路军离承德越来越近，外出的日本鬼子和警察讨伐队经常有被打死的。听了这消息，就更加重了害怕的心情。好不容易盼到了日

本投降，我才脱掉了那身黄色警察皮跑回老家，过上安心的日子。

说起挨打这码事，刨根追底，还得说是日本鬼子给我造成的。小日本要是不占领中国，不修“部落”，不要团员，我也当不上警察。不当警察，我就不会挨那一枪。这全是日本鬼子给中国人民造的孽，这仇恨全在日本鬼子身上。说到我自己，也怨我那时年轻走错了路，这一枪深刻地教训了我，为敌人效劳是不会得到好报应的。

（彭明生整理）

一个讨伐大队长的自白

杜清怀

抗日战争期间，曾当宽城县苇子沟讨伐队的大队长张雪涛在他的坦白书上这样写道："日寇侵华期间，我是"三光"政策的忠实执行者，卖命效劳日寇，双手沾满人民鲜血。按理说，我这个十恶不赦的历史反革命，严惩是天经地义的。可是党和人民政府却宽大了我，给我重新做人的机会。人民的饶恕，使我终生不忘。过去所为，我永远向人民低头认罪，时刻反省自己"。是的，事实就是这样，翻开他的那段罪恶历史，就足以说明之。

（一）

张雪涛，又名张会民、董如平、董小舟、王珍。现年 78 岁，满族，初中文化，家庭成份地主，本人出身伪警，系青龙县三岔口乡马圈子村人。1931 年在东北护路军十八旅九十七团当兵，1932 年在吉林警备第七旅十九团当文书上士，1933 年 12 月回家结婚未归队，1934 年经人介绍到伪青龙县警务局当缮写雇员，同年改升为巡官，调到青龙县龙王庙警察署任职。1935 年夏去伪中央长春警察学校学习，1936 年毕业分配到青龙县干沟警察署充当警尉，本年夏季调到伪青龙警务科任司法警尉，冬季被提升为警佐，派到双山子警察署任署长。1939 年夏任伪青龙县警务科司法股长，1940 年任警察训练所教官，1941 年任警务科主任，1943 年任宽城苇子沟讨伐大队队长。1946 年 4 月，加入匪首赵辅臣都山保安警察队，先后任二中队长，谍报队长。1947 年春，东北"剿总"副总司令范汉杰

派人将青(龙)平(泉)地区的讨伐队、自卫队、还乡队统编为热河保安第四团,张雪涛任该团二连连长,1948年秋,任改编后的国民党三十五军一〇一师三〇一团一营营长;1949年1月,在北平被和平解放,同年8月逃亡绥远隐居;1951年又逃亡沈阳、彰武等地隐匿。1960年5月20日,在彰武被我捕获归案。1980年,在落实原国民党起义投诚人员政策中获释。

(二)

"九一八"事变,日本侵占东三省后,于1933年入侵热河,将热河划入伪满洲国,并沿热河南部和西部的长城线上,划定伪满洲国的"西南国境线"。宽城苇子沟一带正是位于都山脚下的长城东段。西南国境线划定后,日军采取一系列的"固边政策",决心确保满洲。进而实现他的侵略全中国,称霸亚洲的"大陆政策"的基本"国策"的目的。1938年6月,八路军第四纵队挺进冀东及长城沿线,开展抗日武装斗争。1941年秋,建立了青(龙)平(泉)工作团。以都山为中心开辟出一大片新游击区,并建立了四个区政权(现宽城全境)。面对抗日游击战争深入发展的态势,敌人惊恐万状,立即调集兵力,加强对长城沿线的封锁控制。除日本关东军一〇八师团的主要力量外,先后又调来伪满军10个旅和省属警察讨伐队20多个,各县也积极扩建讨伐队及各类反动地方武装。仅青龙县(包括宽城全境)就扩建了14个讨伐队。其中11个讨伐队纠集在宽城境内。张雪涛讨伐队(号称张穴队)就是其中一个。该队驻地在宽城苇子沟,大队下设3个中队,9个分队,共230人。张雪涛任大队长。3个队副是日本人,即金山、小池、并木。日本侵略者为了消灭活跃在长城线上的抗日武装力量,开始对这一地区大搞"集家并村"。制造"无人区",实行野蛮的"三光"政策,进行灭绝人性的摧毁,妄图彻底破坏党和人民的"鱼水关系",从而达到"竭泽而渔"的目的。张雪

涛对实施这一目的卖力不小，是个日寇的很好帮凶。

张雪涛在伪青龙县当警务科主任时，于 1941 年农历正月 24 日，带领 20 多名警察到椅子圈进行清乡，由于特务未秀成告密，将我八路军办事员孙景华同志抓捕。张雪涛亲自押送到峪耳崖宪兵队，交给日寇处理。敌人刑讯 8 天，各种毒刑用遍，开水浇、雪地埋、钢针刺、熨铁烙。孙景华同志视死如归，半字不吐我方秘密，并大骂敌人“兔子尾巴长不了”，敌人恼羞成怒，将孙残杀在峪耳崖西河套。

张充当讨伐大队长后，经常对都山前后（包括现今行政区划的青龙东半县、平泉南半县、辽宁建平半县），这一大游击区（敌人划为“无人区”）进行反复扫荡反复“围剿”，见人就杀、见房就点、见物就抢。1943 年 9 月 13 日，张雪涛带领全队到李家窝铺的大厂沟讨伐，将我 5 名抗日工作人员包围，尖兵头目宁永满当场打死我指导员黎明同志，并打伤黎明同志的通讯员（左腿膝部），其他 3 位同志突围。张雪涛命令部下将其伤员带到苇子沟讨伐大队队部，关押 8、9 天后，张又指使部下将我负伤的通讯员绑在苇子沟西河套的木桩上，命令全队 200 多人站在百米远处射击打靶，每人 3 枪，张雪涛用机枪指挥射杀，我通讯员惨杀致死。张雪涛为表彰宁永满讨伐时追杀我方人员有功，在全讨伐大队“庆功”会上，给宁伪币拾元及毛巾、牙具等物。

1943 年 9 月 20 日，张雪涛带领讨伐队去金杖子黄金洼讨伐，在杜江家中抓住去门杖子开会的金杖子村党支部书记金成山和武装班长杜海成，烧了杜江家 3 间房子及砸毁全部生活用品。张雪涛将其二同志带到苇子沟、青龙，先后关押 34 天，天天过堂毒打刑讯，逼二人交出我地下工作人员名单及八路军活动情况。共产党员金成山至死不说。为保存实力，不让敌人全部杀光，金成山每次过堂都一口咬定说杜海成是给我作伴的普通老百姓，与他无关。敌人从杜海成口里也捞不到什么，就放了杜海成。10 月 29 日夜，张雪

涛同其队副井木(日本人)各持战刀,将金成山及先后关押的我六总区通讯员杨青山(化名杨春生)带到郭杖子西河套,用战刀砍杀。特别悲壮的是金成山同志,在二屠夫砍头几刀时,金躯未倒,怒目大骂。高呼"共产党万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汉奸卖国贼!打倒日寇走狗洋奴!"二屠夫又连砍7刀,金成山同志壮烈牺牲。

1943年10月15日,张雪涛带领讨伐队员去东李杖子讨伐,走到北龙潭将我正在宋成轮家开会的六总区委书记高守训(又名高洪途)及干事韩永生、通讯员杨青山包围。在突围中,高韩二同志英勇牺牲,杨青山被捕,后带到郭杖子被杀害。

1944年7月,张雪涛带领讨伐队在佟杖子提捕我9名八路军战士,带到桲椤树庄西头偏坡子梁,张命令分队长邵玉砍4个,张本人连砍5名。

张雪涛在苇子沟充当讨伐大队长时,对这一地区3天一讨伐,5天一扫荡,仅2年多。直接杀害我抗日工作人员及老百姓就有17名(不包括与我方正规部队和地方武装作战时,我方被射杀人员及被张雪涛检举送外地关押被杀人员)。

张雪涛对坚持"无人区"斗争的人民,不仅是血腥屠杀,而且还大搞烧、抢。

1943年7月27日,张雪涛带领讨伐队到朝阳山北沟搜捕坚持山区斗争的"猫山户",烧了16户50间房子。同月30日,又烧第二次不进"人圈"搭起的马架窝铺。

1943年9月13日,将井家庄全庄11户55间房子全部烧毁,抢走毛驴7头。

1943年7月,张雪涛带领讨伐队去老岭搜山,抢我老百姓300多只羊,张雪涛从中挑选40多只好羊送回家中。另外,还带领匪队抢薄荷寨等地农民粮食20多石。

（三）

1960年，张雪涛被我公安机关捕获后，受害群众纷纷检举、揭发、控拆，强烈要求政府处以极刑。烈士金成山的母亲高俊香在控诉书上这样写道："我恨不得一手把他（指张雪涛）拽到跟前，我咬他两口，我把他千刀万刮也解不了我的心头之恨。因为他不仅杀了我的儿子，断了我的后，而且把我们金杖子烧、杀、抢弄的太惨。我要求政府把罪犯张雪涛执行枪决！"

1968年，张犯案件全部审理清楚。由于"文革"中"左"的思想影响，从重判决倾向很大，使此案久拖未判。1971年10月31日，青龙县革命委员会对张犯提出以下处理意见："该犯在历史上虽曾犯下滔天罪行，但经多年反复查证，其确属于北平和平解放人员，后又未发现新的罪行，根据党"对于起义人员中的历史罪恶问题应本着'既往不咎'的原则，一律不作为反革命分子或其他坏分子处理"的政策，对其教育释放。

1981年，《中共中央批转〈关于落实国民党起义、投诚人员政策的请示报告〉的通知》即中发〔1979〕6号文件下发后，青龙县委、县政府认真落实文件精神，坚持"既往不咎"政策，切实做好平反纠正工作，对张雪涛又按政策规定做了适当安置，并每月发给一定数量的生活费。

回忆黄方刚起义

舒　行

38年前，发生在兴隆的黄方刚起义，是一个重要的历史事件。

1945年9月14日，伪满西南防区司令(少将)黄方刚率2万多人，于热河兴隆县起义。这是我军事实力的威慑，我党政策的感召，我方政治工作的威力，国际力量的逼迫以及冀热辽军区党委的正确部署和同志们积极努力的结果。

黄方刚的起义和兴隆县的和平解放，为我进军东北，抢占重要前进基地做出了重要贡献。一个月后，中共中央委员陈云，罗荣桓、林枫等同志率2000多名干部经兴隆去东北，在兴隆住了一夜，表扬了兴隆县军民在抗战中，在促成黄方刚起义中的功绩。

通　信

兴隆县，东临滦河出渤海，南据长城控京津，北靠承德通苏蒙，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

1943年春，伪满洲国为加强西南防务，任命黄方刚为伪满西南边防主力二十四团团长，进驻兴隆县。其团部设在兴隆县城，二十四团有3个营，一营驻黄崖关，二营驻将军关，三营驻黄酒馆。

黄方刚上任以后，企图越过长城，南下冀东平原，不断向我平谷县根据地“扫荡”。

1942年，我担任晋察冀军区十三分区十三团团长，进驻平谷县根据地。

平谷县和兴隆县山连山，水连水，中间隔着一道长城。将军关是沟通两县的交通要塞。我们十三团团部就设在离将军关不远的

鱼子山到南水峪一带。

对黄方刚和二十四团，我们专门进行了调查，了解到一些情况：

黄方刚是东北哈尔滨市太阳岛人，黄埔军校毕业，参加过广州暴动，负伤后到上海医疗，以后派往东北工作，同党失去联系，失足当汉奸。现年 50 多岁。他所带的二十四团，原是东北军的，曾经加入东北抗日民主联军，后抗联受到严重挫折，便投 降日本侵略者，改编为伪满洲军第二十四团，原驻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1943 年奉命调热河省，先开到承德，随即驻防兴隆县。

二十四团进驻兴隆，加强了敌人的力量。日伪愈加猖狂，经常四出扫荡，使得我根据地老百姓不得安宁。

1944 年春节，我长城脚下的北水峪、南水峪、上白羊、罗家沟、鱼子山、北寨等根据地人民，家家户户正在包饺子忙着过年。突然，从北面飞来一颗炮弹，有的弹片崩到锅里，一锅饺子满天飞溅。这次炮击，因我方没有准备，损失不小。我根据地军民对黄方刚怒火万丈，有的气得跳起来指着长城那边大骂："狗汉奸，忘了自己的老祖宗，过年过节吃顿饺子都来破坏！"

我听到群众反映，想到黄方刚的底细，考虑到我们十三团当时所处的环境，从 1942 年蓟县被敌人蚕食以后，我冀东东、西根据地被隔断，十三团就处在间断区域的中部。东面是鬼子的冀东道，西面是鬼子的燕京道，北面是伪满，我们像把尖刀插入敌方。为防避三面受敌，只好稳住北面。于是我给黄方刚写了一封信。信中提及他黄埔受训，广州暴动挂花的一段进步历史，又惋惜他风斜舟转，非心所愿的处境，晓以民族大义，喻以同胞气节，希望他做一个有良心的中国人。

1944 年 5 月 26 日，我接到十三军分区司令员兼政委李运昌同志的电报："口外敌人不断进口袭击，长城线已非安全地带，仍应派出部队到兴隆活动，打击敌之疯狂，并须在平地打开局面，扩大

回旋区。"遵照上级指示，我们于1944年7月扫除了平谷县城的外围据点。9月4日，打下了平谷县城。同兄弟部队一起，经过一个夏天的努力，形成了由山海关到通县、平谷直至密云一大块根据地。黄方刚南下的幻想破灭了。

1944年中秋之夜(公历10月1日)，我率领十三团300多人进攻兴隆县前苇塘据点。经过一夜激战，在内线工作人员的配合下，将刘文选讨伐队全部歼灭，毙日本副大队长增田茂，俘伪中队长李连仲等官兵100多人(伪大队长刘文选去兴隆县城未归)，缴机枪3挺，长短枪100多支。消息传开，吓得日伪百人以下的队伍不敢轻易深入山区。

当我们正在打扫战场时，通讯员送来一封密信，我拆开一看，是黄方刚的来信。信中说，我方很了解他、理解他，说我们的肺腑之言刺中他的痛处，他骑虎难下已身陷其境。但请放心，他会做一个有良心的中国人。愿长城两边的中国人都过一个愉快的中秋佳节。

回到平谷根据地以后，听同志们说，中秋之夜二十四团的炮打得很怪，炮弹都落到离村庄和部队驻地几里以外的山沟里、山顶上。我立即将此情况向上级作了汇报。

联络

兴隆县三面环绕长城，高山耸立，森林茂密，是我冀东党、政、军领导机关、主力部队的重要回旋区，也是日寇重点制造的"无人区"。敌人在这制造199个"人圈"，实际是199座人间地狱。日伪为了对付我军，竟在这里驻扎日本关东军、伪满军4个团、20多个警察讨伐队，还有遍布的警察分驻所和警防所，共2万多人。1944年，黄方刚被任命为伪满西南边防司令兼二十四团团长，以上伪军警统归黄率领。

1945年1月，中共中央决定，冀热边党委扩大为冀热辽区党委，并成立了冀热辽军区。我担任了冀热辽军区第十四军分区司令

员，仍驻平谷县根据地。我军改编以后，即奉中央命令，向长城外的热北和辽宁边境挺进。黄方刚所驻守的兴隆县成了我军北进的绊脚石。当时，兴隆人民正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日夜渴望我们过去。我十四分区各单位召开了动员大会，印发了扩大解放区的战斗动员令，"我们一定要解放兴隆"的口号响彻长城内外。正当我们的各项工作进行得热火朝天的时候，接到了上级的命令："敌（黄方刚）为确保其统治，将兵力集结长城线附近待机，对我军行动有加防之准备"，"根据以上情况，我扩大解放区战役行动重点放在围场、赤峰、绥中、朝阳等地区"，将北进重点由兴隆地区改为围场等地区。

根据上级命令、我分区主力十三团避开黄方刚，从兴隆西面，北进到隆化、围场；兄弟分区十一团，也避开黄方刚，从兴隆东面北进到凌源。

我们北上以后，同黄方刚的军事斗争进入相持阶段。武工队、侦察员的活动比较活跃，内线工作频繁起来。

贾国卿同志（化名韩济民）是被伪军招收去的我武工队员。他是河北遵化县人，20 多岁，有文化，脑子灵活，会待人接物，好交朋友，被分配茅山日伪据点，很快当上了警尉。

茅山据点和将军关据点关系非常密切。有一天晚上，茅山据点的韩济民和张东屏同志（我内线人员）去将军关伪保长蔡兴斋家里。将军关镇内驻扎伪满军一个连。我们去蔡兴斋家意图有两条：一是交个朋友，要其做些伪军的工作；二是想通过他去西山金矿把淘金工人组织起来，给我军提供点资金。意外的是，伪保长蔡兴斋不但不反感，反而满口答应。从此，韩、蔡关系密切。

原来，蔡兴斋是我抗日政府委派的两面保长，是个有点名气的绅士。早在 1938 年，他接受宋邓纵队的委派，给八路军转运物资。1940 年，他接受我地方干部指示，以保长的身份与分驻所的鬼子翻译官建立了关系。1941 年给我兵工厂搞雷管 13500 支，以后又多次保释被捕的我方干部，利用合法身份，进行着出色的抗战工

作。

1944 年以前，将军关驻有宋庆讨伐大队，大队长叫宋庆云，故名宋庆大队。有一次，我抗日工作人员马林同志被宋庆队捉住。我敌工科白涛同志托蔡兴斋从宋庆队保出，并经过蔡兴斋介绍，白涛认识了宋庆云。白涛觉得宋庆云可作为工作对象，就要蔡兴斋在一天夜里带宋庆云到彰作与白涛协商。蔡和宋是老朋友，宋庆云答应经常给我们一些情报，要求出了问题互相多照顾。从此，宋庆云同我方建立了秘密联系。

不久，黄方刚的二十四团二营进驻将军关，换走宋庆大队。黄方刚也来到了将军关。宋庆云和黄方刚是老上下级关系，原来都是抗联的人。宋庆云就将蔡兴斋介绍给黄方刚，3 人成了莫逆之交。某日，在酒宴之后，宋庆云大胆说出自己和八路军的关系，蔡兴斋也乘着酒兴说："八路军是中国人的这个"，把大拇指伸得老高。黄方刚并没有醉，他说："可以这样与八路军交往，日本人不会长久，不如与八路军保持关系，一旦日本失败，可以有出路。"

后来，因贾国卿同志外围拉得太多，快要暴露。贾国卿给我写信，我带两个连去茅山据点接应，见到联络信号，搞了茅山等几个据点，点了几个炮楼，把贾国卿"俘虏"回来了。贾国卿同志回来后，一直在我身边当指导员，他以前负责的各据点的敌工线索和情报工作，都移交给承兴密办事处。地方党组织为了工作方便，仍用韩济民的名义同蔡兴斋、宋庆云保持着联系。

争　夺

1944 年下半年，国际形势剧变。6 月，欧洲的英美联军，在法国诺曼底登陆，开辟了第二战场。英美联军和苏联红军东西夹击，德国法西斯的败局已定。我们乘着大好形势，遵照上级军区《关于争取伪满军参加工作的指示》，对黄方刚的种种趋势作了认真的分析研究，我们力争做好工作。于是给黄方刚去了第二封信。信中赞扬

了黄方刚中秋节的行动。着重讲了当前世界战局，纵观世界潮流，中国抗日必胜。如果待到抗战胜利之日，先生何以见国人？敦促他及时弃暗投明，并愿助一臂之力。望他三思。

黄方刚没有立即回信，但伪满军给我们许多方便。一次，有一大批公粮要运往关外根据地，公粮多，目标大，过不了"防共壕"。我们派干部向伪满炮楼队长联系，说明八路军要向山里运粮，向他"借路"，伪队长答应了。没有多时，他集合炮楼警备队向东出发了。我们乘机全部运过去。

到 1945 年，世界形势更有利于我，日伪政权已日落西山。驻兴隆的日军、伪满军、讨伐队、警察队，由于经常受到八路军和民兵的袭击，加上兵员减少，给养不足，士气越发低落。

由于我军节节胜利和敌伪内部矛盾加深，从 1945 年初开始，一些觉醒的伪满官兵就成班成排地向我山地党政机关投诚反正。

有一次，将军关的我农村工作干部秘密动员伪二营四连 1 个排反正，被伪四连连长发觉，抓捕了那些农村工作干部 6、7 人，送到兴隆县城伪二十四团团部。我方托蔡兴斋去兴隆找黄方刚保释。蔡一找黄，黄方刚说："被抓的是良民，不是八路。"把 6、7 位同志全部释放。正在放的时候，日本少校团附不同意，要送承德宪兵队。黄方刚火了，撕下少将的牌子，打了那团附 3 个耳光。

不久，接到黄方刚给我的回信，说惧的是对国人犯了罪，改换门庭，落个千古罪名。为此辗转反侧，望阁下再助我一臂之力。

看到信，知道黄顾虑重重，要一下争取过来并不容易。

1945 年 7 月 9 日，冀热辽军区党委发出了《对口外工作的指示》："组织群众贸易，向口外贩牛羊，由口里运布匹及日用品，我们应负组织和保护之责"；"在斗争中积极恢复党和发展党，教育和使用真正为抗战而反正的伪军、伪组织人员"；"要切实掌握统战工作，联络具有民族意识的各种团体、人士"。

我们遵照指示，立即着手组织和保护对口外的贸易，加强了对

伪军、伪组织人员的工作，加强了对具有民族意识的各种团体，人士的联络。

1945 年 8 月 8 日，苏联出兵东北，我们感到争取黄方刚的时机近似成熟。于是，我给黄方刚写了第三封信，指出国势已定，先生报国酬志时机已到，何去何从望当机立断，以便我们尽力配合。

形势发展很快，但有变化，并非我们想象的那样对我有利。1945 年 8 月 14 日，苏联和国民党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声明不干涉中国内政，国民党政府可以在苏军控制区设立行政机构和建立军队。8 月 19 日，苏军解放承德。苏军占领城镇，不管地方政治，伪满机关不逃者照常工作。

8 月 20 日，冀热辽区党委发出了《迅速解决伪军》电报指示："国民党正大量维护伪军，与我争夺战果，斗争尖锐，时机紧迫，我必尽一切力量，特别要用打、拉、收、维护、委任各种方法，迅速解决伪军，解除敌伪武装，对受国民党委任以及活动，坚决不承认，按汉奸军队及扰乱治安罪坚决消灭之，直到解除武装受我编遣为止……。"到 8 月底，我们已解决了兴隆县周围 100 多个武装"人圈"的伪军武装。

1945 年 9 月 3 日，早在兴隆县地下的国民党员张化行（即张郁文）、焦莹、张久清等抬起头来，公开派国民党员刘芸田（公匡）、卢仪卿与伪满西南边防司令黄方刚和兴隆县伪县长于佩珊联系，令其整顿队伍，维护军队秩序，等待国民党蒋介石派人接收。并将日本国旗、满洲国旗撕毁，悬挂国民党旗和青天白日旗。军队帽徽也改为国民党的青天白日帽徽，并派国民党员张久清负责兴隆县的一切行政事物工作。张化行、焦莹赴北平——与国民党督导员陈思修（即陈崇新）联系，准备派军队接收兴隆。

国民党争夺黄方刚的手段来得很突然，出乎我们的预料。伪满洲国调走黄方刚的命令，更加出乎我们的意料之外。9 月 3 日以后，蔡兴斋托人带来消息：伪满洲国新京（即长春）来电报给承德，

承德又来电报给黄方刚，说日本宣布投降了，命令黄方刚立即率部队开赴奉天省(即辽宁)听命。这只鸟真的要飞走了。我们立即派韩济民去兴隆找黄方刚面谈，并决定部队向兴隆逼进。

谈 判

1945年9月10日，我率领十三团2个连逼进六道河据点。又电话命令十六团团长陈云中同志立即下雾灵山，带4个连逼进前苇塘敌据点。十六团共4个连，每连200多人，特务连300多人。我承兴县工委书记赵启田同志、承兴县办事处主任王佐民同志率民兵逼进三义村敌据点。苏联红军亦派3架飞机和军队到潮白河一带活动。我方韩济民、郭子忠两同志冒生命危险去兴隆约黄方刚出来谈判。

前苇塘离兴隆县城约10公里，当时由伪宋庆大队驻守。韩济民、郭子忠先奔宋庆云大队队部找大队长宋庆云。那天，正好宋庆云已去兴隆县城伪县长室开会，韩就乘机在大队部挂通了对伪县长于佩珊的电话。韩直接告诉于佩珊说："我是韩济民，我是八路军，奉舒司令员之命，来会见黄少将阁下和你，邀请你们二位共商有关大事。我现在在宋庆云大队部，是我们去县城，还是你们二位到宋庆云大队来。情况甚急，今天必须见面。"于很客气地说："你等一等，请不要放电话。"片刻后说："还是我们去前苇塘吧。"

1小时后，宋庆云骑马赶回来，人马都是大汗淋漓，进门就问："哪位姓韩？"宋见到韩很热情，对话后，立即用电话向黄方刚作了汇报。

这时，我先头部队已赶到前苇塘村边，宋庆云一再要求我部队停止前进。为了有一个谈判环境，韩济民即告诉部队暂时停止前进。

9月11日傍晚，黄方刚与伪兴隆县长兼警务科长于佩珊同坐一辆卡车，骑马随行人员十几人直奔前苇塘。宋、韩、郭在村口接

迎，黄方刚一行在村外百米处停下来。韩、郭怕他们见我军入村开车返回，立即与宋涉水迎上去。黄、于下车接话，寒暄，将黄方刚一行引进宋庆云大队部--大绅士、地主张全五院里。

我十四军分区司令部设在六道河。我十六团团部已设在前苇塘。当晚，十六团团长陈云中同志来电话："黄方刚已到，要求见司令。"我即带2个连队从六道河赶往前苇塘，路上又收到韩济民同志的侦察员给我的便信。我一到前苇塘就见到韩济民，在他的引见下来到张全五家的厅房里，见到了黄方刚。我们早在照片上互相认识了，过去虽然没见过面，但这次相见却像久别重逢。黄方刚见到我竟不禁痛哭，说："我干了不该干的事，我没有脸见中国人，我有罪，我起义，要求司令统一指挥。"

当晚，我们杀鸡备酒，设宴招待了黄方刚一行。

晚上，我们向冀热辽军区李运昌、詹才芳同志发了请示电报，汇报了黄方刚要求起义的情况和我们的想法，说明经我们长期的工作，现已来要求起义。有4个团、14个讨伐队，2万多人；我只有2个团，实际才6个连。兵力、武器悬殊太大，武力解决不了，教其投降不可能，起义后可以合编。请上级尽快电示，以防情况变化，并请立即派人来指导。

9月12日，冀热辽军区回电，同意黄方刚起义，对黄提出的问题和具体要求，坐下来认真谈判，力求双方满意。并要我们注意以下几点：

(一)反复宣传我党的主张和党的政策，使其感到共产党确实是为人民服务的党，真正从思想上认识自己的路走对了。

(二)龙首不摆就好办。不仅要做黄的工作，而且要做黄部首脑机关指挥人员的工作，使其上下一致同意黄起义。

(三)对下级军官和士兵，主要是宣传教育，我们要特别关心这些人，愿走的做好工作走，愿留的做好工作留。

(四)整个过程都要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有情况迅速报

告，务必迅速完成这一光荣而艰巨的任务。

军区决定派副司令员詹才芳同志来指导工作。

9月12、13日，进行了2天谈判。参加谈判的人员，我部是舒行、军分区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黄文、十三团政治部主任郎冲；黄部是黄方刚、于佩珊。谈判进展非常顺利，经过反复宣传党的政策、党的主张，黄方刚进一步认识了共产党才是为人民服务的党。谈判着重解决了四个问题，分三步进行。

首先，解决起义和投降的问题。黄方刚不同意投降，说在鬼子发动河南战役以前疯狂大扫荡的时候，我们就建立了通信联系，表示愿意参加我军，并为我党我军做了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投降”说不过去，实力对比也相差很大，在下面通不过，不好说话。收到军区的电报，这个问题就解决了，一致同意起义。

第二，解决兴隆挂国民党旗帜的性质问题。我们说，国民党的一切委任，我们坚决不承认。悬国民党旗，戴青天白日帽徽，是否已投降国民党？黄方刚说，老百姓对撕毁日本旗，换上中国国旗，就像见到了青天。但国民党没有任何委任，戴帽徽是为了应付国民党的压力，没有投降国民党。各位可以明察。通过谈判，一致认为黄部属伪满部队。

第三，解决二十四团的归宿问题。黄方刚担心的就是二十四团，要求不拆散二十四团，并同二十四团在一起。我们拿出了8月20日晋察冀分局关于争取敌伪军的电报。根据电报中“反正者，保持原级，如能争取别的伪军反正者，即归其统率”的精神，谈判结果，起义后黄方刚仍兼二十四团团长，二十四团建制不变。

第四，是二十四团起义，还是伪满洲国西南防区所有军警人员全部起义的问题。谈判结果：黄方刚为伪西南边防司令，宣布全部起义，参加八路军。

以上四个问题解决以后，谈判第一步圆满结束。

等二步，研究了起义前的准备工作：一是部队作一些必要的调

动。由黄立即电令刘其昌、程彬、范文、石振4个讨伐队，开赴六道河一带，以置于我十三团控制之下；二是伪防区司令部机关人员作些必要的调整，据平时考察，不赞成起义的人员调至基层或暂时控制起来；三是立即电令伪军4个团的团长来兴隆，以便商议起义事项。

第三步，通过了起义的全部方案和具体部署以及起义后各部队的行军路线，全部开赴指定地点接受我军改编，并商量了合编后打日军的计划。

最后，黄方刚要求我去兴隆参加宣布起义大会，说："司令不来，我不好办。"我说："我是一定会去的。"9月13日下午，他们赶回兴隆。临走，我们参加谈判的全体人员，同他们一一握手告别。

起　义

1945年9月14早晨，我带着2个连(二连和特务连)去兴隆。同我一起去兴隆的还有军分区政治部主任黄文同志和十三团政治部总支书记郎冲同志。

当时，有的同志主张大部队开进兴隆。有的说，黄方刚已投降国民党，约我们进兴隆，其中有诈，不让我去。我说："我们要相信黄方刚，对黄方刚接触了解不是一天两天，对人、对朋友应该有一个基本的看法，不能一天三变。"

临走时，侦察科长、作战科长也想去。我说："我们是去做政治工作，不是去打仗。"我们只带了宣传科长去。快到兴隆县城时，我考虑部队太多，特务连有一、二、三、侦、通5个排，决定将特务连留在城外，只带二连进城。

黄方刚、于佩珊及其官佐在西门外迎接我们，并组织了一些部队夹道欢迎。伪满军荷枪实弹，列于城内街道两边，号兵吹起了迎宾号。我们通过欢迎的队伍，直接来到伪西南防区司令部。

14日上午，黄方刚邀我们参加伪满军排以上军官会议。我们

通过一座石牌坊，经过几道岗哨，来到一所礼堂，里面满坐。前面是排以上军官，后面有些穿长袍马褂的官员。会上，黄方刚对我们到会的同志一一作了介绍，会场上响起一阵阵热烈的掌声。然后，黄方刚说："今天，是我们西南防区全体满军喜庆的日子。我们要起义，我们要参加威震中华的八路军……"

在一阵热烈的掌声之后，我在会议上致以祝贺，进行了一系列的宣传教育，总结了"国自伐，而后人伐之"，因而受到日寇侵略这场大灾难的沉痛教训，指出今后共同奋斗的正确方向和伟大祖国的光明未来。

我讲完话以后，起义军官们续继开会。黄方刚派人带我们到各地看看，到处都受到欢迎。

14 日下午，召开伪满士兵大会。黄方刚要我在大会上演说。我宣传科长怕有人对我放冷枪，背地不同意我去。我说服了他们，带两名警卫员进入大会会场。会场在广场上，三面都是方块队形，士兵们枪靠肩坐在地上，黑压压遍地都是伪满军。

在会上，我讲了当前的国际、国内形势，讲了伪满官兵受日军欺压之苦，讲了日寇在兴隆的惨绝人寰的血腥罪行，讲了浴血斗争中优秀的中华儿女，讲了正面打击敌人的英雄，也讲了在敌人内部进行抗日斗争的好事，讲了要做一个热爱祖国的中国人！做一个站起来了的中国人！做一个顶天立地的中国人！做一个具有伟大民族气节的中国人！

会场上响起暴风雨般的掌声。我的两名警卫员的手枪从前面移到了后面。黄方刚、于佩珊坐在我后面，站起来鼓掌。

最后，讲了我党的宗旨，我党的主张，我军的政策，欢迎大家参加革命，参加八路军。

接着，黄方刚宣布起义。命令西南防区在兴隆的一切伪满洲军、讨伐队、警察队、伪职人员，一切服从八路军整编。愿意革命的，就参加八路军。不愿继续当兵的，要立即放下武器，由八路军负责

发放路费，准其回家。会场上人声鼎沸，一片欢腾，“要革命”，“要八路”的欢呼声此起彼伏。

大会结束时，我和黄方刚、于佩珊合影留念。

合　编

9月14日晚，我们给冀热辽军区发了请示电报，汇报了黄方刚宣布起义的时间，提出了改编黄方刚部队的方案。因双方人数相差太多，我们吞不下，吃不了，要求兄弟部队分一点，并迅速派人来接收。上级回电：因我方人员少，干部不够，改编黄部有困难。可将黄部4个团和我部2个团以及黄部14个讨伐大队和我部3个支队合编为两个旅。为便于指挥，团、营、连、排人员编制不变。因军区人手紧张，詹才芳同志已动身去兴隆参加合编。部队的集结地点按原定方案不变。

黄方刚怕下面有的不听指挥，要求赶快合编，说：“夜长梦多，越快越好”。很快，詹才芳同志到达兴隆，将10个讨伐队和我3个支队合编为八路军第五旅。我和黄方刚带我部队2个团和黄部4个团开赴黄酒馆、前苇塘、六道河、二道河一带，准备合编为八路军第四旅。

双方部队开到黄酒馆至二道河一线集结。各部队都宣布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强调一切行动听指挥。当我部主力十三团和黄部主力二十四团开到六道河时，双方团、营、连、排各级干部见面都非常亲热，好像久别的亲人。我十三团许多指战员，生怕黄部官兵拘束，弄些关东烟放在衣袋里，碰到黄部士兵就给他烟抽。二十四团许多官兵，生怕八路军不欢迎，在水壶里装上弥桃酒，碰到我战士就给酒喝。

二十四团山东人多，十三团河北人多，战士们见面都说说笑笑，真是“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

但我们也有的干部思想一下转不过弯，对黄部的人不信任。有

的说："打了多年仗，仇恨这么深，不要以后带枪跑了"。有的说："我们有的是人参军，怎么能把枪交给人家，人家不会跟我们走的"。我们就给这些干部做工作，反复讲清党的政策是党的生命，组织学习争取满军参加工作的有关文件，要大家看到满军的长处：他们年轻，身体好，有文化，有技术。我们一定要争取他们为人民服务。同时，强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一切行动听指挥。同黄方刚部队合编是上级党委的决定，是我们长期做工作的结果。我们一定要敢于到黄方刚部队去工作，一定要欢迎黄方刚部队的官兵到我们部队来工作。黄部和我部一样，现在都是八路军，一定要上下一致，官兵团结，互相爱护，互相信任。

正当我们对这些思想没有转变的同志组织学习的时候，突然下面来了报告：说黄方刚部队有 100 多人带枪逃跑，被讨伐队追回来了。我想，我们一定要关心这些逃跑者，对逃兵处理不好，将会造成更大的逃亡。

于是，我接见了那 100 多名逃跑者，要他们同我们的干部一起学习。学习结束以后，给他们每人发了回家的路费，并加餐、开欢送会。干部们依依不舍地给他们整理行装。他们感到自己是"逃兵"，不打不骂，还得到这样好的待遇，天下哪有这样好的军队，回家哪有这里强，都纷纷要求留下不走了。结果，欢送会又变成了欢迎会。当他们退回路费时，我们一律不收，说以后想走，就不再发路费了。后来，二十四团一营营长常岳山诙谐地说："你们都跑吧！跑的特别照顾，比不跑的待遇更高"。说得这些新八路都哈哈大笑起来。

在合编过程中，以刘其昌、程彬、范文、石振为大队长的 4 个讨伐大队，没有执行黄方刚的命令。黄宣布起义后，他们大骂黄方刚是叛徒，即率领 2000 多伪军赶到挂兰峪东山，与日寇军队会合一起，逃至遵化县顽抗，后投了国民党。

伪满军八团某营，不接受黄方刚命令，不去二道河一带合编，率领 300 多人向鹰手营子方向逃去。刚合编的邢昌讨伐队和满军

原有矛盾，听说伪满军逃跑，邢昌率领原来队伍在土城头将其消灭掉。

由于合编速度缓慢，有的政策执行不好，造成少量伪满军动摇逃跑。满军有一个营 300 多人，由营长宋某率领，开赴六道河方向。未见有人来联系合编，遂向二道河方向逃跑，逃到密云县国民党那里去了。

在黄方刚起义的前几天，兴隆县内的 600 多名日军和其他日本人及其家属即乘汽车窜出兴隆，向马兰峪逃奔。黄方刚曾派部队去追，未追上。当逃至八品叶岭时，被我游击队和民兵阻击。日寇不敢恋战，坠毁部分汽车，仓惶逃去。

由于我党的积极努力，国民党企图接收兴隆日、伪军全部武装的美梦破产了。黄方刚起义后，在兴隆的伪满西南防区的二十四团、十二团、十一团、八团和 10 个讨伐大队以及兴隆县境所有警察所、分驻所、警防所、武装人圈等 2 万多伪军警皆宣布起义。共得各种炮 100 多门、轻重机枪 1200 多挺、长短枪 5 万多支，以及军用仓库的所有物资装备。

我地方政府的李建民、王佐民等同志随军进入兴隆县城后，即稳定人心，维持街道秩序，并下令将大东区、平安堡、半壁山等地的外国传教士驱逐出境。从此，外国传教士、帝国主义的间谍们再也不能在兴隆人民头上为非作歹了。

张化行、焦莹在北平听说黄方刚在兴隆率全军投向共产党，拿着蒋介石接收兴隆的委任状，气得顿足捶胸，大骂黄方刚"身在曹营心在汉，枉挂青天白日旗"。

1945 年 9 月 17 日，合编基本完毕。经黄部和我部协商，双方主力团合并。合编后的编制是：

八路军第四旅：旅长黄方刚，副旅长陈云中(十三团团长)，旅政委覃国翰、副政委王文(未到职)。四旅由我主力十三团(二十四团一营 1 个连放十三团一连编一营；二十四团二营 1 个连放十三

团二连编二营;二十四团重机连放十三团特务连编特务营)、黄部主力二十四团(十三团一连1个排放二十四团一营;十三团二连1个排放二十四团二营,十三团三连1个排放二十四团三营)、我部十六团和黄部十一团、十二团、八团共6个团合并组成。四旅下辖三个团:十团(即十三团)、十一团(即二十四团)十二团(即十六、十一、十二、八团)。每个团3个营、每个营4个连,每个连有100多人,每人100发子弹,每班1挺机枪。我记得曾冠民、曾广珍、王振东、郎冲、孙觉非、俞章、李多树、王纯等同志在十团(即十三团)工作,十一团、十二团团长、副团长、参谋长多是黄部人员。四旅后改为二十四旅。

八路军第五旅:旅长于佩珊,政委曹致福,副旅长黄部人员,参谋长郭子忠。五旅由我部3个支队和黄部10个讨伐大队以及伪警察等地方部队组成,下辖3个团,也是三三四制。后改为二十五支队(旅级),支队长于佩珊。

四旅组建后,准备开往承德,组建热河省军区;五旅组建后,开往前线打击日伪军。

合编后,我军2个团变2个旅,兵强马壮,武器精良,编制满员,士气高昂。如能加强政治教育,灌注新的政治精神,这支新的部队,将如猛虎添翼。

欢 迎

当我正在考虑对这支部队如何进行教育时,9月17日接到上级指示,要我将黄方刚起义后合编的部队拉到平谷县整休,我的思想一下豁然开朗了。

把这支合编部队拉到平谷县整休,这是上级的英明决策。平谷是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摧不垮、打不烂的抗日根据地,其西面和南面有广阔的平原沃野,给抗日军民提供粮食和物资。

我想,军区党委要黄方刚起义部队到平谷来,主要是政治教

育，换个环境，看看根据地的建设和人民群众，呼吸根据地的新鲜空气。于是，我立即电话告诉了在平谷的地委社会部长刘向道同志，并决定 20 日带合编部队到平谷县去，给平谷县委 3 天准备时间。

20 日，平谷县城一片欢腾，像喜事临门，像重大节日。街道上、北门外人山人海，夹道欢迎新入伍的子弟兵。到处是红旗，到处有歌声。街道上贴着大幅标语："热烈欢迎人民子弟兵"，"热烈欢迎黄方刚归来"，"一人参军，全家光荣"。

黄方刚远远看见欢迎的人群，立即下马步行。当我们并排牵着马，走进欢迎的人群时，人们沸腾起来了，不断地呼口号："欢迎黄方刚归来"。黄方刚两眼热泪盈眶，再也说不出话了。后面长长的队伍，群众正在送茶送水，许多群众往战士口袋里塞鸡蛋，塞馒头。有的起义战士感动得咽咽呜呜地哭泣起来，一边走，一边用手擦眼泪。

在平谷整休半个月后，部队开往承德方向，开始了新的战斗。

后 记

这支合编的八路军部队，以后活跃在保卫承德、解放东北、抗美援朝等战场上，为人民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黄方刚建国后任黑龙江省政协副主席、民政厅长、交通厅长、省人民政府委员、国民党革命委员会黑龙江省主任委员。于"文革"后期病故，终年 80 多岁。

（蔡春保整理）

（作者曾任冀热察军区参谋长、中国人民志愿军参谋长等职，少将军衔）

花市分驻所伪警察携枪起义

刘　玉

1941 年，中共冀东分区党委为了开辟长城以北的热南山区，先后成立了青平工作团和长城工作团，在滦河东西开辟了广大的游击区，在兴隆县境内建立了许多抗日区、村政权。为了瓦解敌人，巩固抗日根据地，抗日工作者一方面做伪基层组织人员的工作，使其成为两面政权，一方面对敌据点派出的便衣侦探人员进行教育工作，争取起义抗日。花市分驻所警察被争取携枪起义就是一例。

伪花市分驻所共有警察 60 多人。1941 年 9 月 18 日伪茅山警察署被攻克，100 多名警察起义抗日后，日伪加强了这个分驻所的防务。所长黄立仁是警佐衔，有"三八式"步枪 60 支，轻机枪 1 挺，弹药充足。

这个分驻所对我热南根据地构成威胁，是一颗必拔不可的钉子，可又是地势险要、易守难攻的据点。我县、区及部队领导便决定智取，争取伪警察起义抗日。鉴于该分驻所的警察每天轮流出动便衣到我根据地的庙梁、马蹄沟等村密探，便选择伪警士郑焕青为突破口。郑焕青家住兴隆县乌头牛村，该村是我们的抗日根据地。他家境贫寒，是村里摊钱雇佣去当警察的，在家乡受过抗日救国的教育。因而郑焕青出便衣时明显地表现出是对敌人的应付，有时向群众流露出拥护抗日的心情。他出便衣时总是到马蹄沟村我方办事员戴文选、庙梁村的张殿相家闲聊一通，然后回据点交差。天长日久就无话不说了，通过他掌握了伪花市分驻所的情况。郑焕青是 1941 年 7 月间到花市分驻所当警察的，经过两个多月的考察，戴文选、张殿相便向郑焕青提出："你敢不敢见见八路军？"郑说："我

有啥不敢！我见过的八路军多了。”于是在他俩的联系下，先后和蓟宝三联合县第八区区长铁黎、武装基干队长刘继抗、区干部丁义轩等同志接上了头，尔后经常见面。郑焕青还多次偷敌人据点的子弹给他们，先后摘出子弹4000余发。所长黄立仁发现子弹丢了，曾几次在全体警察会上吼叫有人私通八路，偷子弹给共军，让偷子弹人主动交待，让大家检举、监督，抓住者格杀勿论。

有一次铁黎、刘继抗等同志告诉郑焕青：“你再从警察中找几个可靠的介绍来和我们联系。”郑焕青说：“那就把警察张汉臣介绍给你们吧”。铁区长问：“那行吗？”郑说：“行，他是我妹夫。”从此，伪警长张汉臣便和区干部接上了头并经常提供敌据点情况和其他有关日伪军活动情况，同时抓紧在警察中交朋友、拜把兄弟秘密串联扩大势力，为起义准备力量。经过区干部和郑焕青、张汉臣的频繁接触，在确认无误的情况下，县长和十三团的有关负责人决定与他们接头。有一次郑焕青到了马蹄沟村时，一位很熟的农民和郑说：“八路军十三团来了，你敢不敢见？”郑说：“敢。”于是就和十三团的一位侦察员先见了面，由侦察员带郑到十三团团部，团部设在庙梁村张殿相家。

部队以礼相待，军容整齐地排列道路两旁，显得既隆重又威严，当郑焕青走过排头兵时，蓟宝三联合县县长王少奇和十三团参谋长陈云中等领导人从屋里迎出来和郑焕青亲切握手，进屋后又一一介绍，大家像老朋友一样亲切地唠起家常，使郑焕青的拘谨心情消逝。八路军领导以诚相见，没有讲大道理，没有官腔，只体现交朋友。还有，王县长、参谋长等陪着吃了小米饭炖鸡肉。在边吃边谈中，王少奇县长对郑焕青说：“你们所长叫黄立仁，是马兰峪皇陵圈里的人，他有两个老婆对不对？”郑说：“对。”王县长接着说：“我们俩有过交往，过去都当过教师。”郑说：“既然这样，他那么蛮横，你们咋不整整他呢。”王县长说：“我是想教育教育他，可惜没有人捎信，今天我想叫你给捎封信，怎么样？”这下郑焕青可为难了，他

想这要比往外偷子弹还难，但又觉得这是个重要任务，不能不接受，于是说了声："试试看吧。"

王少奇县长给黄立仁写了封信，大意是教育他要认清形势，作事要留后路，死心塌地与人民为敌终无好下场等。同时还在信封里装了些宣传品。郑焕青觉得关系重大，闹不好会出大乱子，便提出："我们现在已联系 11 个人，如果看情况不好我们就带上一挺机关枪起义出来。"王县长说："不行。咱们要的不是一挺机枪，十几个人，而是分驻所的全部。"郑焕青领会了意图，便欣然返回据点。这天由于出来时间长了，天色已晚，郑焕青觉得回去不好交帐，便故意紧跑，跑得大汗淋漓。一进据点警察们就问："你怎么这时候才回来？碰上八路了吧？"郑气喘吁吁地说："我是摸了阎王爷的鼻子回来的！"说完直奔伪所长办公室。黄立仁见面便问："怎么样，让人家把你弄去了吧？"郑说："是把我抓住了，弄到十三团，我说了不少好话。十三团说，群众都说你这个人还不错，要不然我们就把你种地(活埋)了。告诉你，今后你必须老老实实，不许欺压百姓，不许和八路军作对，不然随时都可以活埋你！就这样，把我放回来了。"黄立仁听完郑焕青的话，沉思了一会，一摆手："你先吃饭去吧。"郑焕青吃完饭，见黄立仁屋里没别人便马上和黄说："所长，我犯法了，八路军县长叫我给你捎一封信来，我不敢不捎。"黄说："什么县长，烧了它！"郑说："我不敢，那县长说你们是莫逆，说你们都教过学……"。黄立仁阴沉着脸说："谁叫你带回来！烧了它！"这时郑焕青心里有了底，他想：万一黄立仁一翻脸，事情就糟了，不如豁出去，来点硬的把他拐带上，看他怎么样。于是就说："王县长说我以后还要给你们所长去信问这件事，如果你不把信捎到，我就拿你种地。我听王县长的意思，你们过去通过信，这次我不敢不捎给你。"这么一诈唬，黄立仁像挨了一闷棍，倒吸了一口冷气，然后像泄了气的皮球似的，有气无力地说："信，你先拿着，回去吧。"究竟黄立仁葫芦里装的什么药，郑焕青心有了底，便决定进一步拐住他。第二天

见黄立仁屋没别人，进屋便问："所长，我今天还出便勤吗？"黄说："不用了。"郑又说："所长，你还是快看看信吧，看完好处理了。搁在我手，万一被人发觉可不得了！"一面说，一面硬把信递过去。黄立仁措手不及，只好急忙接过去迅速地看了一遍，慌忙装进了黄呢子裤兜，然后定了神，拿出了10盒"美人牌"香烟和20元钱递给郑焕青，并说："这件事，事关重大，你可不许往外说啊！"这场投信探路的冒险，就这样结束了。

1941年11月中旬，当郑焕青、张汉臣正在积极策划起义各项准备工作时，突然马蹄沟村伪甲长黄明印被宪兵队抓到了兴隆县城。黄明印虽然经常接受抗日政府的教育，做过些对抗日有益的工作，不属于效忠日军的伪村政权人员，但由于受刑不过，终于向敌人供出了郑焕青、张汉臣和八路军来往的情况，尔后敌人把他放了。黄被释放后立即找到郑焕青，边哭边诉说他被抓及暴露出他和张汉臣的情况，并说："你们赶快想办法，他们很快就会来抓你们。"因为他们都很熟，郑焕青也很理解黄明印的处境和境遇，所以就劝慰他几句，立即分手。郑焕青马上找到张汉臣说明了情况，并约定晚饭后找几个骨干到后山头开紧急会议。会上一致认为必须马上离开据点去投八路军，但人们提出家属怎么办？敌人手中有名簿，每个人的家乡住处等都详细记录在名簿上。敌人抄家怎么办？一旦跑不脱怎么办？要求十三团哪天来？时间短了信送不到，时间长了宪兵队来抓人怎么办等等。经过分析，认为宪兵队在三五天内不可能来抓人，因为宪兵队对刑讯逼出的黄明印的口供不可不信，也不可能都信；就是信，也要通过县警务科等有关部门才能抓人。况且敌人内部矛盾重重，而黄立仁是一个敌人信得过的忠实走狗，且军衔较高，不会轻举妄动。更重要的是黄立仁曾通过郑焕青接受了县长王少奇的信，如果出卖了郑焕青，与他不利。况且这小分驻所也很容易被十三团吃掉。再者，他手下的伪警察中究竟有多少人和八路军有联系，他并不清楚。这些对黄立仁都已经构成威胁，所以

他不会轻易在郑焕青等人身上下手。于是便决定要求十三团在第5天夜间1至3点钟来接应，并把张汉臣的一块怀表对好了时间和鸡毛信一同送给十三团。会议还决定，大家随时准备好，陆续让家属离开据点，一旦被人发觉，带枪就跑，跑不了就拚命。

给十三团送走信后，郑焕青等人的心情更加紧张起来了，22支眼睛随时在警惕地观察着一切动静，郑焕青和张汉臣在周密的策划着全盘的行动计划，任何一个细微末节也不敢疏忽。内线共11人，除张汉臣作总指挥外，其余10人都被张汉臣编在第5天夜1到3点的岗哨上，最重要的是东大门，部队一到保证开门，东大门的岗由郑焕青负责。同时又规定，部队一旦进了大门后立即由内线人员带领分头冲进伪警察的宿舍和办公室，力争一枪不发全部缴械。

终于等到了第5天，警长张汉臣把预先编好的夜间勤务薄交所长黄立仁审查(每天都如此)。黄看后说："张警长，郑焕青每天出便勤，为什么还让他出岗?"张说："因为有病号，人员不够。"黄说："病号也得上岗!"张回去后有意把最重的病号李振富编上了，李振富上气不接下气地哀求张汉臣，说实在上不了岗，张说："不行！上不了也得上!"郑焕青在旁"求情"说："张警长，李振富的病确实很重，让我替他吧。"就这样，夜间1至3点的岗哨都成了自已人。

本来一切都很顺利，可是这天晚上，所长黄立仁、警尉浦洪奎、警尉补贾绍宗和另一伪警长等人打麻将到夜11点多还不散，这可急坏了张汉臣、郑焕青他们。到12点多钟总算散了，眼看该换岗了，估计十三团也该来了。可是黄立仁没有睡觉却又来查铺了。如果他们这几个头目睡不熟，动手就有困难。当查到郑焕青铺时，见郑全副武装地在蒙头睡觉，黄问："这是谁?"郑说："是我。""不是没你的岗么，怎么装束这么整齐?""报告所长，我是替重病号李振富的。"听了郑的回答，黄没有再说什么，回去睡觉了。

这11个人紧张的既嫌时间过得快，怕头目们睡不熟不好行

动，又盼时间快点，免得夜长梦多。1点钟总算全部换了岗，到了2点多钟，外面仍不见有联络的动静，可急坏了！最后决定叫张汉臣立即出去联系，回来后再决定怎么办。当张汉臣刚出大门不远，便见十三团的队伍早已埋伏好久了。当张汉臣问他们为什么不发暗号联系时，他们说，怕情况有变，实际是提高警惕，怕情况有诈呀！

当部队到东大门外时，郑焕青马上开了大门，便按事先安排，有人领路迅速冲进各个房间，各屋几乎同时喊出"不许动"的下令声。当敌人从梦中被惊醒时，他们的枪早已拿到八路军手里，当了俘虏。很快把这些垂头丧气、衣冠不整的俘虏在院里集合起来，这里张汉臣、郑焕青等11人的身份也公开了，接着部队首长讲了话，然后宣布，愿当八路军的跟着走，不愿走的每人发给25元钱回家。结果，留下跟着起义的30人，其余的均各奔他乡了。因为事先有协议，起义抗日的警察由张汉臣负责独立组建队伍。所以当时问张汉臣，黄立仁怎么办？是杀、是留？张汉臣提出交给十三团处理。结果，经十三团教育后放了。黄立仁被释放后，跑到兴隆县城又当了特务队长。解放后被政府镇压。

就这样，伪花市分驻所这颗钉子一枪未发就拔掉了，共缴机枪一挺，步枪60支，子弹20多万发，黄色炸药100多箱，还有雷管和其他军用物资。

随后，由十三团调配70多人，加上这30多名起义人员，共100余人组成"青山部队"，归属十三团领导。对外称"青山部队"，有其独立性，对内为十三团独立营的一个连，连长张汉臣，十三团派来贾国卿任指导员，郑焕青任一排排长。这支抗日队伍在党的领导下，活跃在长城内外，多次打日伪军。日本投降后编入野战军，投入了新的战场。

茅山伪矿警队
伪警察反正经过

刘继抗　刘志岐

1941年，随着日伪"西南国境治安肃正"政策的出笼，"西南国境线"上的重镇兴隆进入了日伪统治的特殊阶段。敌人连续地调整各警察署，增加兵员，各警察讨伐大队频频出动，向抗日根据地进行疯狂地扫荡。整个兴隆县处于"黑云压城"的紧要关头。

忽然一声惊雷，震动了兴隆县，震惊了伪热河省公署，也震惊了伪满洲国皇宫：在共产党、八路军的策动下，兴隆茅山伪矿警队和茅山的警察署100多人举旗反正，加入了八路军的行列。给了嚣张的敌人迎头一棒。当时，日伪报纸曾无可奈何地哀鸣：此举无疑在我铜墙铁壁的"西南国境线"上撕开了一个口子。

一、"出路在何处"？

茅山位于兴隆县西南50里处，就像一个卡子，卡在雁门谷口，扼断兴隆——蓟县公路。茅山警察署是兴隆县日伪警备的重点，这不仅在于其战略地位的重要，而且里面囤积着大量的武器弹药，是敌人进行讨伐的军火供给地之一。

伪警察署的大院里，除驻有以署长关树春为首的三四十名武装警察外，还驻有伪花市金矿的百十来名矿警队员。这个伪矿警队名义上是护矿，而实际上专和八路军作对，经常在兴隆、蓟县、平谷一带讨伐。因此又自称"挺进队"。由4名日本人指挥，为首的是警尉大越定雄。他不仅以屠杀抗日军民为嗜好，而且对矿警队员也视

为草芥，在士兵们的眼中，他是个凶狠的恶魔。以伪班长包文胜、刘志岐为首的一些队员对他的欺压已经达到了难以忍受的程度。有一次，一个伪队员因为服了一天劳役，晚上站岗时睡着了，正巧赶上大越查岗。大越二话没说，把枪拿走。这个队员见枪不见了，怕得要死，找弟兄们出主意。第二天天刚亮，大越集合队伍，要惩处他。众人求饶。大越鬼眼珠一转，想出个主意：让大家两人一对，互相打嘴巴。他在一旁咧着毛茸茸的大嘴呵呵大笑。把每个人都气坏了。班长刘志岐就跟知心的士兵修海轩、段长瑞等人商量要策动"炸营"，想趁机干掉大越。可是大越十分狡猾，反而盯上了学过机炮的刘志岐。

士兵们同大越的矛盾越来越激化，大越像凶煞似的，处处挑衅作对，眼看又要进行"清洗"啦！以前就曾有许多人被扣上"图谋造反"的罪名，"清洗"到承德而有去无回。现在，这条道又摆到刘志岐等人的面前。刘志岐心急如焚，反复思量着对策。他也曾想到八路军，当年在马兰峪当"国兵"时，曾经见到过八路军的传单，上面说得条条是理。可咱是给日本人干事的，八路军真的能饶咱吗？

在凤凰楼，他和包化民又谈起了自己的心事："老包，这儿呆不下去了，我打算走。""往哪儿走？""回辽宁老家，种地、下矿，总有咱兄弟一碗饭吃。"别看刘志岐口气这么硬，其实他也知道，回家做亡国奴，那滋味是不好受的。"你就不能把队伍拉出来，上山？""当土匪？……"刘志岐瞥了一眼，不说话了。这个伪满军事学校训练出来的军人，对此是不屑一顾的。可出路又在何处？刘志岐，这个颇有些行伍气概的五尺汉子，眼下真是没路可走了。

二、"跟着八路军干！"

就在刘志岐等人徘徊彷徨之时，由刘继抗队长率领的我蓟(县)宝(坻)三(河)联合县八区武装基干队(4个排)，奉包森、李子光等领导之命，越过长城，挺进兴隆茅山一带开辟地区。

9月初的一天，蓟县周各庄的村干部逐波同志急匆匆地来到榆庄，找到了刚刚回来探亲的基干队排长周凤山，秘密地向他说些什么。周排长听完后，大步流星地出了村，去找队长刘继抗。

原来，刘志岐自凤凰楼与包化民谈话后，忧心忡忡地回到了茅山矿警队，他原想压压怒气再等一个时期，看看风声。谁知大越又偏偏来找他的麻烦。这天，赤日炎炎，士兵们一个个热得无精打采。可大越一边摇着扇子，一边带着捉弄的口气说矿警们闲得慌，让大伙去院子里除草。这又是在寻衅挑事，大伙谁也不想干。刘志岐就做了主，让大家都歇着。可不知是哪个坏家伙告诉了大越，大越打定主意要收拾刘志岐等人。他们3人边走边骂着大越，这真是“逼上梁山”呀！

在外头闲荡了几天，也没个目标。这天，刘志岐、修海轩住朋友家，段长瑞顺便来到住在周各庄的姐姐家。正好碰到逐波同志。逐波一听，立即给段长瑞做了许多工作，并叫段把刘、修二人找来，他马上去找周排长。周排长立刻向刘继抗队长汇了报。

在周各庄，刘队长、周排长和刘、修、段3人见了面。刘队长向3人讲述了当前的政治、军事形势，晓以民族大义，详细讲解了我党的统战政策，坚决执行三大保证，表示欢迎他们参加八路军。起初，3人还有些犹豫，刘队长和周排长针对刘志岐是东北人，立即叫来一些妇女和孩子，对着刘、修、段三人唱起了《东北流亡曲》，嘈杂却是悲壮的歌声直唱得刘志岐眼中冒出了泪花，只见他一拍大腿，蹭地站起来，喊出一句话：“跟着八路军干！”

三、计定“九·一八”

来到基干队驻地，政委济安（又名占中）带领同志们热烈欢迎刘志岐3人，还发给他们一人一身崭新的军装。亲身体会到了革命队伍里的温暖，刘志岐3人更坚定了决心。

几天以后，刘志岐3人找到了刘队长和周排长，开口就说：“刘

队长，我们参加几天了，大伙待我们不薄，可我们寸功没有，心里着实不安。我们商量了，只要刘队长信得过，让我们回去一趟，我们把茅山的队伍都拉过来。”

面对突如其来的请求，刘继抗半天没有说话，他在想这些话的可靠性和可能性。由于内线的联系，他对茅山敌人内部的矛盾是有所了解的；几天的观察，刘志岐等人也没有破绽。于是他和周排长当即决定，由刘志岐、修海轩回茅山联系起义。为了纪念“九·一八”事变10周年，把起义的时间定于9月18日晚间12点。

刘志岐、修海轩回到茅山，隐蔽在段长瑞的哥哥家，并请段大哥去找包化民联系。

包化民闻讯后，带着心腹刘才，在一个小树林里同刘志岐会面了。包化民全副武装，表情严肃。刘志岐不禁也把手枪顶上了膛。一见面，包化民就大骂刘志岐不够义气，出走也不打个招呼，让他和弟兄们吃苦了。刘志岐说：“我回来找你，就是为了讲义气。我们已经当了八路军，现在回来接你和弟兄们来了”。包化民一听说八路军，立即警惕起来。刘志岐见状掏出手枪，伸手递给了包化民，说：“拿去！我有半句假话，你就用它穿了我”。接着，刘志岐滔滔不绝地把几天来在革命队伍里的所见所闻一古脑儿讲给包化民。两个队伍的鲜明对比，民族大义的强烈感召，使包化民爽快地答应了。最后4人按原计划定好，9月18日晚上里应外合，一同起义。

就在刘志岐、修海轩潜回茅山之后，刘继抗和周凤山找到了政委济安，向他汇报了此事。济安政委沉思良久，一再提醒刘、周二人，此举事关重大，千万注意可靠性。周排长是个鲁汉子，他当即掏出党费，说这是最后一次党费，以此向党表示决心。刘继抗也掏出了自己的党费。济安政委看到他们有如此决心和信心，当即批准了原计划。

一切都在照计划进行。刘志岐、修海轩回来后，9月17日晚上，基干队召开班以上干部会，制定行动方案：全队共4个排，由1

个排在青灰岭警戒兴隆方面的敌人；1 个排在黄崖关警戒回路；周排长的主力排（40 多人，清一色的三八大盖）和另一个排进茅山。另外动员了七八十名群众带上驴驮子，准备搬运弹药。刘志岐画了茅山形势图，并坚决要求打大越，刘队长同意了。最后制定了口令，去时为"成功"，回来为"太平"。

散会后，大家分头去准备。

四、茅山起惊雷

9 月 18 日晚，队伍分两路轻装快行，像出鞘的剑，越黄崖关，穿快活林，过鞑子沟，直插茅山。因为躲开公路，只走山道，尽管战士们走得汗流浃背，快到茅山时，已是比预定时间晚了 2 小时。

周排长、刘志岐和两名侦察员走在最前面。离警察署还有一二里时，迎头碰上了包化民。他手拎匣子枪，斜披子弹袋，正焦急万分地来回踱步。刘队长和队伍上来后，他汇报了据点里的情况：据点里没有大的变化，机枪撞针已被他拆了下来，警察和矿警们都在睡觉。大越和关署长及其他日本人分住在 3 个屋，刘队长立刻布置一下，便分头行动。

包化民先进了西门。门岗王庆祥发现有情况，举枪刚要打。包化民一把把枪按住，压低嗓音说："王庆祥，八路军十三团来接咱们了，快把大门打开！"王庆祥一听，欢欢喜喜地打开了大门。队伍像潮水一样涌进了大院。

刘志岐、修海轩和赵班长直奔大越屋。刘队长、包化民带人直取"挺进队"。

大越听见有动静，喊了一声："谁？"刘志岐喊了一声："报告！"大越说："进来！"修海轩跳进外屋，照里屋连开三枪，把大越打翻在地。赵班长抡起大刀将他砍死。刘志岐点起一把火，给大越来了个火葬。然后 3 人冲出屋外。

这时，关树春和另一个鬼子从梦中惊醒，关跳出窗户就跑，鬼

子还在顽抗，被一个战士一刀结束了性命。

刘志岐直扑电话房，守机的伪警察岳庆达正在向兴隆喊话，说八路军已经进了院子。刘志岐用枪指着他，说：“老岳，八路军接你来了，赶快跟我走！”岳庆达愣了一下，然后乒乒乓乓把总机砸个粉碎，跟着刘志岐冲了出去。

此时，刘继抗、包化民和战士们分别把“挺进队”逼在屋里。包化民气喘吁吁地给他们做工作。片刻，他们也都纷纷同意跟八路军走。刘队长分一部分人去库房取弹药，一部分向东山上顽抗的一班“挺进队”包围。

刘志岐带领几个人解决了另一个鬼子后，直奔警察署屋，8 个警尉补正忙着穿衣服，一看八路军已冲到了眼前，也乖乖答应跟着走。

东山上的一班人还在顽抗，周排长正要组织冲锋，包化民、刘志岐和反正的伪军们指名点姓地向他们喊话。不久，枪声渐息，他们也土崩瓦解了。

警察署长关树春正没命地向兴隆方向跑，恰遇我警戒排，问他口令，他还以为是兴隆来的自己人，连声喊着“我是署长，我是署长，快，八路军进茅山了……”话音还没落，就被我战士击毙了。

茅山村里，战士们打开牢门，放出被拘捕的百姓。随后开始搬运武器弹药。整个战斗前后只用了约半个小时，就全部解决了。

但是，出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问题：战斗结束了，却久久不能撤下来，一是因为武器弹药太多，百十多人一次也只能搬一小部分；更主要的是反正人员的家属乱成了一团，有的刚刚生小孩，有的舍不得杂七杂八的东西，这也找刘队长，那也找包化民、刘志岐，3 个人嗓子都喊哑了。

这时从青灰岭方向传来了激烈的枪炮声，我警戒排和兴隆增援之敌的先头部队打响了。情况十分紧急，刘队长当机立断，一面派人通知警戒排，要不惜任何代价顶住增援之敌；一面动员反正人

员家属舍掉坛坛罐罐，马上撤离。同时下令停止搬运弹药，把剩下的放火烧掉。这样，全体人员立即撤出茅山。

没走多远，只见茅山火光一闪，照亮了半边天，接着一声轰鸣，像一个闷雷，炸得地动山摇。

五．上 盘 山

茅山反正事件惊动了伪热河省公署和伪满洲傀儡皇宫。热河省公署检察厅和伪锦州西南防卫司令部治安法庭均派人前来兴隆调查。同时，敌人调集兴隆、平谷、蓟县的敌人层层包围，疯狂地寻找基干队和反正人员。

刘队长和济安政委率领全体队员一路上守护着反正人员(家属已分散隐蔽到平谷县)，冲破了层层封锁，终于在月底于蓟县洪水庄和十三团会师了。军民召开了联欢大会，包森副司令员在会上讲了话，他分别给基干队和反正人员以很高的评价，鼓励他们团结一心，继续战斗。

会上，百余名反正人员光荣地参加了八路军，编成第二总队，任命包化民为总队长，刘志岐为副总队长，修海轩等人分别任排、班长。改编后，二总队跟着包副司令员精神抖地登上盘山抗日根据地。

(司玉凯整理)

忆抗日烽火中的一位日本友人

王振兴

抗日战争胜利已经50年了，但平泉人民仍记忆着一位日本人——井上先生。

在热河人民抗日斗争极其残酷的年代里，井上先生毅然站在中国人民一边，不仅与中国人民友好相处，而且冒着极大的危险，竭尽全力支援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

一位有正义感的人

日本侵略军为了打通热河与冀东的联系，1938年开始全面整修从承德经平泉至青龙的喜峰口、冷口的公路。日伪决定在平泉和青龙交界的煤岭子瀑河上修一座永久性大桥。这项工程由经营土木工程的"大信洋行"承包，派日本人井上竹口和一名朝鲜人金三监工。井上是工程负责人，"大柜"设在煤岭子村静天丛院内。

井上当时30岁左右，是一位很深沉而有正义感的人。由于他经常见到听到日伪军杀人、放火，对中国人民进行野蛮的法西斯统治，常跟人们说："他们(指日伪军)的杀人放火是作孽，我修桥铺路，要积德"。由于他对工人从不施淫威，并经常到各家去串门，跟当地群众交了不少朋友。如李金廷是伪牌长，井上经常找他帮忙办事，俩人关系很好。后来李金廷成了我地下办事员，井上也知道他秘密给八路军办事，俩人关系更密切了。他和蔼待人，跟村里人都很随便。因他长着两颗大门牙，人们叫他"大牙"，他也毫不介意。至今，这里的人们一提起"大牙"，都说："那是好人"。

井上有一个妻子和一个女儿井上弘子，弘子当时10来岁，住在承德市。后来由于他对中国人民的信任感，每到施工季节就把她

们接到煤岭子来住。

1940年以后，我冀热边特委派青平工作团和游击队开辟这块地区。抗日部队和地方干部经常在这一带活动。1941年秋，青平工作团已在这里建立区级抗日组织，村级也建立了秘密组织。对这种局面，开始时井上不免有些紧张，他就找到李金廷说："你的，那边的认识"。他也学着中国人形容八路军的样子，打了个"八"字手势。"我的安全，你的办法的想"。

李金廷把这个情况向上级作了汇报，上级指示要对井上做好争取工作，并一定要保证他的安全。不久又派军分区侦察股联络员韩瑞祥直接跟他取得联系。李金廷找井上说："你的办好事，安全的那边保证"。并跟他讲了中国人民抗日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两国人民应该友好相处的道理。井上马上表示："你们的抗日，我的同情"。从此，井上多次跟我迁青平四区区长韩绍发，抗联主任韩继云，军分区侦察股干部韩瑞祥等接触。1942年6月一天夜里，井上亲自到大院南沟许德发家，秘密参加一次群众会。会后，跟韩区长又谈了半夜，使他进一步了解了中国人民抗日的正义性，日本侵略中国不会有好结果。1943年夏季的一天，井上拿着报纸上登载的山本五十六的照片，跟李金廷等人说："他的，山本五十六，海军大将，死了死了的，他死了好"。1944年冬，他曾跟人们说："汪精卫在日本死了，你们知道不？他阴谋大大的，没有好下场"。

井上的内弟叫九九宫，在热河西南防卫司令部干事，时常跟井上透露一些日伪军的行动情况，井上回来就通过李金廷向上级报告，我冀东军分区侦察股从中得到不少情报。

两次支持烧桥

煤岭子大桥是这条公路的咽喉，没有桥不仅雨季不能通车，在结冻和化冻季节，冻成冰坎也不能通车。所以，敌人下决心要修成大桥。而井上作为一个工程技术人员，多么希望修好大桥方便人民

啊！可是当他看到日伪军修这座桥的目的，不是便民，而是为了运输日伪军和军用物资，进行“扫荡”，屠杀中国人民。因此，他对修桥又抱消极态度，甚至同情抗日军民把桥破坏掉。这座桥从1939年到1943年共修了4次也没有修成。

1938年开工修水泥桥到1938年夏，尚未竣工被洪水冲垮。1940年2月又修木桥，1941年1月，冀热边地区为配合反“扫荡”进行大破交。游击队和区干部发动当地群众搜集柴草，用李金廷从井上那里要的煤油，夜间把桥给烧了。煤岭子距党坝日本守备队和警察所仅5里路，游击队叫李金廷去报告，日本守备队和警察来了，桥也烧落架了。他们问甲长和群众：

“桥是谁烧的？”

“八路军。”

“多少人？”

“好几百人，东山西山都是人”。

敌人把李金廷，静天丛、陈义、陈荣等4人抓到宽城警察署拷问。因没问出结果来，只好把人放了。派讨伐队在这一带住了些日子，也没发现什么线索走了。过些日子井上回到煤岭子，李金廷跟他说桥被八路军烧了。井上说：“烧了的没关系，我的再修，再跟他们要钱”。1942年又修一座水泥桥，修桥工绝大部分是当地群众。我地下工作人员就发动群众“磨洋工”，不顾质量。井上看到也不管，还没等修完，8月份又被水冲毁了。1943年又修木桥，通车不到3个月，上级决定烧掉这座桥。李金廷事先给井上通了气，他借故回了承德。旧历腊八（1944年1月3日）游击队带着积极分子，把桥点着火以后，一面派李金贵去党坝日本守备队报告，一面发动群众假装救火。日本军和警察来了，桥也烧完了。一看群众忙着救火，还夸奖是“大大的良民”。又问桥是谁烧的，都说是八路军，因为没找到破绽，只好走了。过些天井上回来，李金廷告诉他：“桥又被八路军烧了”。井上哈哈大笑说：“这样烧了大大的好，我的不知道，他

们要再修，我再要钱，要材料”。此后再也没有修。

解救被捕群众

井上先生在这里曾多次解救被捕群众和干部。

1943年，日伪在平泉全面搞“集家并村”，制造“无人区”。小黄木沟离党坝四五里路，这条沟山林较大，我抗日工作人员经常在这一带活动。所以，被日伪列为重点“集家”地区。这里原住着13户人家都被赶进党坝和煤岭子“部落”。可是各家都不愿离开，房子都没拆净，准备回来住。旧历五月初三夜里，驻党坝的日本守备队和警察100多人，包围了小黄木沟，挨家搜查，把刘成举、刘成林、刘成祥、刘成银、张付、吴景章抓住。把房子和柴草、农具等全给烧了，牲畜、猪、羊赶走了。然后又到大黄木沟烧房，又抓住陈山。把被抓住的7人带到党坝日本守备队，捆在大木头上，审讯时扒光衣服，用木扛子打。

家里人一见把人抓进日本守备队，就像进了阎王殿，不死也得扒层皮。大家赶紧找李金廷想办法，李金廷到平泉找到井上。井上回来后，把被捕人的“居住证明书”拿上，他去找日本守备说：“这些人都是修桥的苦力，是良民”，守备队才把人全放了。离休干部刘成举至今提起井上解救他们的事，还充满感激之情，他说：“我们被抓进日本守备队，心想非死即残，可是第4天把我们放了，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回来后才听说是井上给保出来的。我到他家去看望，也买不起什么东西，只说了几句感谢话。可是井上却说：‘没关系，感谢的不要’。井上的妻子对人也很客气。”

1943年6月一天夜里，我中心村主任徐文会和几名村干部到大院村收军鞋，住在张儒家，被坏人告密。日本守备队包围了张儒的院子，往屋里打枪，徐文会当场牺牲，李金廷三处受伤。他拿出井上的证明，说是来要工人的，把他放了，把张儒和郭春荣抓走了。李金廷立即派人到承德找井上，井上回到平泉，找警察署联系。张儒

因伤势过重，已死在监狱，把郭春荣保了出来。据当地群众回忆，从1940年到1943年期间，被井上解救的被捕干部和群众不下20人。

送炸药

从我游击队、武工队在这一带活动以后，多次通过井上给搞药品、胶鞋等物资。1942年，我冀东军工厂急需炸药，侦察组的同志叫李金廷跟井上做工作，井上当时有所顾虑，因为这是要冒生命危险的事。可是，他经过考虑还是毅然答应了。

他说："你的心，我的心一个样，你的知道，我的知道，外人知道的不行"。井一再嘱咐："拿走危险大大的要办法的想"。就这样采取小批量，经常拿的办法。取出的炸药、雷管有时交部队拿走，有时交侦察员带走，有时由地下交通员往关里送。据现在人们回忆起来的，从1942年到1944年共弄走炸药，雷管20多次。仅冀东军区联络科收到地下交通员李景恩送去的黄色炸药就达2800管，雷管1870个，镪水7瓶。一次，部队的同志提出缺炮镜。这种军用物资，井上确实很难弄到，但他还是千方百计想办法。他向上司报告说，需要测量仪器，终于给搞了一台经纬仪。送给了部队。

1944年春，敌人集中了1万人，对承(德)、平(泉)、宁(城)地区进行大"扫荡"，使我游击区遭受很大损失。敌人进行大检举、大搜捕，一些抗日组织已暴露，上级通知村干部暂时找地方隐蔽一下。李金廷跟井上提及此事，井上说："青龙双山子正修桥，你的那边去管帐"，并叫他跟八路军取得了联系。在这里，他多次拿走炸药。秋季，一次军工厂来人说需要大量炸药李金廷跟井上说了以后，俩个人经过商量，井上说："我的承德的干活，这边你的办法想，统统拿走"。这样在一天夜里，部队来人把炸药、雷管、胶鞋全部驮走了。为了迷惑敌人，把李金廷捆上，嘴里塞上毛巾，锁在空屋里。临走时放了几枪。第二天，青龙的宪兵队、警察去了一看，也无可奈

何了。井上回去后，李跟他说了这件事，他笑着说："这样拿走的好，他们没办法"。

掩护侦察员进承德

1943年冬，冀东军分区派侦察股刘仲达到平泉和承德进行战略侦察。他扮成卖小土布的贩子，先到煤岭子与李金廷接上头。他们商量既要保证完成任务，又不能暴露身份。李金廷把井上请到家里，给两人作了介绍，说刘是自己的朋友，是关里人，想倒卖几个小土布，你要多关照。两个人谈了许多，井上向关里八路军抗日的情况，老刘给他谈了日军烧杀抢掠的暴行，八路军领导老百姓抗日的情况以及人民群众为什么坚决抗战到底的一些道理，井上听了点头称是。这时，井上早已明白七八分，他也不再多问。后来，他积极掩护刘仲达到平泉和承德完成了侦察任务。

老刘现在住迁西县龙湾村，至今对那段情况记忆犹新。他回忆说："通过那次谈话，我是干什么的，井上心里是有了数的。

"过两天，李金廷叫我搭上牟国章的汽车，把我送到平泉，就住在大信洋行。当时大信洋行住在转角房子南，路西一所院子里。我每天白天到街上去找人了解情况，弄清了平泉的敌人兵力部署，还有鬼王高飞机场的情况。"

"有一天，我在饭馆吃完饭，刚一出门，碰上一个便衣特务。他盘查我：

'你是哪里人？干什么的？'

'我是关里人，做点小买卖。'

这下特务更怀疑了，又追问：

'你在哪里住？'

'大信洋行。'

特务还是半信半疑，叫我前面走，他在后边跟着，我进屋时井上正用一个小铁桶煮栗子，见我进去就打招呼：

‘刘的，这边来烤烤，我纸烟的有。’说着他递给我一支烟。特务一看赶紧溜走了。”

“过几天，我又到了承德，找到一个老相识叫吴贵廷，县兴通旅馆的经理。我就住在他的旅馆16号房间，吴特别关照我要注意管帐先生，那是日本人派来的。我来承德前，井上已回承德，我就找井上，他想了一下说：“没关系，你的说我的工地干活。”他给我弄了一个“八宏工业”的袖章。

这样，使刘仲达在承德很顺利的完成了侦察任务，按时回军分区作了汇报。对此，刘老曾感慨的说：“我那次能顺利的完成任务，全靠平泉人民的帮助，再就是那位日本朋友井上，确实帮了很大忙”。

井上先生耳闻目睹中国人民前仆后继，浴血奋战，深为感动，对中国人民产生了深厚的感情，他曾经向几位中国朋友表示要留居在中国。但遗憾的是，1945年春，煤岭子有人到承德去找他时，听说他全家已被日军押送回国了。

敌人营垒中的“万警尉”

刘 玉

抗日战争时期，兴隆县倒流水伪警察署有个遐迩闻名的“万警尉”，他就是我党打入敌人内部，草场村共产党员万全同志。时至今日，人们每提起“万警尉”，无不赞叹和敬慕。

1938 年 6 月，冀热边特委在丰润县田家湾子召开了军事会议，决定发动冀东武装起义。7 月初，在党的领导下爆发了震动全国的冀东大暴动。东起山海关，西至潮白河畔，南起渤海边，北到长城外，到处燃起了抗日武装起义的烽火。与此同时，八路军第四纵队攻占了兴隆县城，沉重地打击了日寇，摧毁了伪政权，鼓舞了人民群众的斗志。

当时，兴隆县是伪满洲国兴隆县的“西南国境线”，长城里边是汪精卫的治安军。由于伪满洲军和治安军矛盾重重，两股敌伪军互不得越过长城，我们的小股部队就利用敌人这一矛盾，频繁活动于长城外，而草场村也就成了小块游击根据地。从此，开始了在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活动。日寇严密控制所谓的“国境线”，在距草场村 2 华里的西山上修筑了碉堡，设立了八挂岭警察所。兴隆至马兰峪的公路沿草场村边通过。村东仅 6 华里的小水泉村驻扎着日本守备队。日军、伪军、特务不分昼夜，经常来草场村骚扰，把不足百户的小村搅得乌烟瘴气，民不聊生。

1940 年，在草场村秘密建立了村政权，组织青年报国会、妇救会等群众组织，群众抗战激情越来越高。日寇妄图消灭共产党和八路军，加紧对长城沿线的控制。1942 年 5 月，草场村和其它各村一样，实行“集家并村”，修筑“部落”，拆毁民房，强迫群众住进“部

落”。日寇为强化治安，在“部落”里设置了“部落”长、甲长、牌长、自卫团长等一系列伪村政权组织。并组织起村青年“灭共义勇队”，配备了枪支。警察和特务随时在“部落”里出出进进，监视八路军和人民群众的抗日活动。根据斗争形势的需要，上级党委指示在敌人后方，在集家部落里，深入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团结各阶层一切可以团结的人，打击日寇、汉奸、顽固派，搞两面政权，把伪村政权和武装牢牢地掌握在党的手里，向敌人进行秘密的和公开合法的斗争。

伪甲长和办事员　两面政权一肩担

草场“部落”的伪甲长，就是共产党员、我方办事员（村长）万全同志。他认真执行党的指示，以公开合法的身份同敌人展开了不屈不挠的斗争，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

万全同志，1898 年出生于一个中农家庭，七八岁开始放羊，十几岁就和父亲一起种田，做小买卖，从而担起了养家糊口的重担。

万全同志是个高个子，黑红脸堂，四方脸，浓眉大眼，身材魁伟，性情豪爽，好说好笑，善于联系人，交朋友，好打抱不平。他为人正直，办事爽快，只要是他认准的，多大困难也要干，不达目的决不罢休。他有惊人的胆量，遇事沉着，善于应付，粗中有细。由于多年闯荡，见识广，思想开通。

1933 年至 1934 年间，冀东出现过抗日义勇军，震动了长城内外。尤其是 1938 年冀东 20 多万人的大暴动，使万全同志受到很大启发和鼓舞，心灵深处埋下了革命的种子。从那时起，他接受了共产党、八路军抗日救国宣传，开始千方百计接近八路军，并偷偷地向群众进行抗日宣传。

1940 年，八路军到草场村秘密建立村政权。万全同志对抗日工作很主动、很积极，他恨日寇、汉奸、警察、特务，但恨在心里，笑在脸上，常和他们交“朋友”，用以应付敌人。所以，我党在该村建立村政权时，他当上了村办事员。党组织在 1942 年秘密吸收他人了

党，做为单线领导的党员。

1942 年 5 月，“集家并村”入“部落”后，村里推举万全同志任伪甲长。他知道，当伪甲长，既担风险又挨骂，但为了更好地开展抗日工作，不使老百姓遭殃，经上级党组织同意，他担任了伪甲长。从此，他白天应付敌人，夜里参加抗日活动。为应付敌人，他不顾家庭生活困难，常常变卖财产，尽量不向村里摊派，增加群众负担，深受群众拥护。

他善于利用敌人，任伪甲长后，敌人为镇压抗日活动，曾派一支最凶恶的伪军讨伐大队——刘其队，驻防草场“部落”。群众中流传着：“杀人放火刘其队”。万全同志对这样残暴的敌人不去硬碰，常常夜间拿着酒肉向敌人岗哨去，嘻嘻哈哈打招呼说：“弟兄们，辛苦了，穿穿里皮袄。”对伪军的下级军官也以“交朋友”的形式，笼络他们。伪军们把他看做朋友，称他是好甲长，得到了敌人的信任，掩护了抗日工作的开展。他利用这些“朋友”了解了敌军的许多情况。有时大白天把情报送出去，把我军、政人员所需要的东西送出去。有时我方人员夜间从“部落”围墙的水沟眼进来和万全同志联系，从未被敌人发现过。由于万全同志的多方掩护，这个村的抗日工作从未停止过，也未曾有过任何损失。就这样，草场“部落”成了抗日堡垒村，万全家成了抗日堡垒户，敌人称万全是好甲长，认为草场是倾向“皇军”的“部落”。

制造杀敌假现场　避免一场大灾难

1943 年春天的一个下午，驻在小水泉据点的日本守备队两个日军小头目带一名特务（小水泉人）到八挂岭、草场等村调查八路军家属及八路军活动等情况。因为这一带早已“集家并村”，3 个敌人以为这里是他们的天下，有恃无恐，大摇大摆地进了草场村。突然闯进了八路军家属吴增、杨安、吴连海家，他们扑空了，这 3 家早已转移了。3 个人气极败坏地把乡长、甲长们训了一顿，便要回小

水泉据点去。刚走到“部落”外东北面一个破房框子墙外边，就遭到了八路军的袭击。这是我冀东军分区六区队侦察员张振江、郝卫民等5人，他们正在草场侦察敌情，得知3个敌人进村，料定必回小水泉据点，就设了埋伏。当3个敌人走进包围圈时，一齐开火，1个鬼子和1名特务当场毙命。另1鬼子躲到墙根下，听到墙上有枪声，往上一看，见张振江正在墙头上向外打枪，因有墙帽子互相看不太清楚。当张振江再次伸出手射击时，蹲在墙根下的鬼子用“王八盒子”打了一枪，正打在张右手食指上。张忍疼拉响了一颗手榴弹，顺墙扔了下去，鬼子被炸死了。侦察员们迅速打扫了战场，带上敌人的3支手枪、弹药等战利品转移了。这次伏击，村里谁都不知道，事情发生后，急坏了万全同志，他明白这意味着全村有被血洗的危险，马上找到村支部书记杨顺、吴金等抗日骨干研究对策。万全想起小水泉日本守备队有他一个日本“朋友”过去和他说过：“如果皇军被八路军打死在距某个村3华里之内，就要血洗这个村。”当即决定制造假现场，把死尸弄到3华里以外。支部书记杨顺同志立即动手把3具死尸捆好，吴金、刘海、吴旺发每人扛1个，万全同志先到3华里外找好地方，在离村3里的黑土坑土坎子下面，路旁有段旧房残墙，进行了细致的伪装，又把杨山家一头小猪弄到现场，捅了两刀，把猪血洒在鬼子尸体的枪伤处和地上。为彻底摆脱干系，万全同志又想出嫁祸于敌的办法，把特务的尸体扛到离村较远的南山沟里埋好。这时天色已晚，万全同志急忙跑到八挂岭警察所报告。回来一看，村里人都跑光了，党员、干部们也都跑了。他也想一跑了之，但他想：如果不去小水泉日本守备队报告，全村可能被洗劫；去，又有被杀的危险。经反复考虑，为了党的事业和全村的安危，只好独自一人连夜到小水泉日本守备队去报告。事后，人们说：“只有万全的胆量才敢去，别人谁敢去呀。”万全同志向日本守备队小滨报告说：“2名皇军和1名特务在回来的路上被那个特务勾结的八路军打了埋伏，2名皇军被杀，那个特务投八路军去了。”

小滨和其它日军头目听了暴跳如雷，大骂这个特务的良心"大大的坏了"，万全甲长"大大的好"，"对皇军大大的忠诚"。狡猾的敌人当时没有出动。次日，日本守备队大队人马查看了现场，深信不疑，抬起两具尸体，就回了小水泉据点。以后，日本守备队和各据点敌人在草场附近山上"扫荡"了好几天，未查出任何破绽，就罢休了。一场难免的灾难化险为夷了。

将计就计斗日寇　彻底粉碎敌阴谋

由于敌人在草场一带吃过亏，察觉到这一带有八路军活动，也怀疑到万全等村政人员，只因没有证据，不好治罪。狡猾的敌人多方试探，百般监督，但由于万全机警过人，敌人的阴谋没能得逞。

驻小水泉日本守备队长小滨(外号坏鼻子)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恶魔，他诡计多端，阴险奸诈，为向其主子请功，决心在草场搞出破绽来。1943 年夏季的一个夜晚，趁夜深人静，率日本守备队悄悄地包围了草场"部落"，窥视里面的动静。过了好长时间，不见有动静，就命翻译官喊话说："我们是八路军，李运昌的队伍，快开门。"此时，"部落"围墙上站岗的"灭共义勇队"早发现外面有部队在活动，但不清楚是什么队伍。万全同志和村干部闻讯起来后，一听喊话，就明白是敌人的阴谋。如果是自己的队伍到来，总是有交通员、侦察员先联系，我方人员都是从围墙的几个水沟眼进出，而且都是秘密来往，一般群众都不知道。况且，草场村是连接关外的重要通道，根本不可能在村外大喊大叫。敌人没想到这样恰恰弄巧成拙，暴露了他们的阴谋。

万全同志决定将计就计，教训教训敌人。随即命人敲锣打钟，并且大喊："八路军来了，大家快出来打八路，保卫'部落'。"顿时，全"部落"青壮年纷纷爬上围墙，一边呐喊，一边用石头、土块、木棒向墙外敌人猛砸狠打，墙外的鬼子被砸得鬼哭狼嚎，叫苦连天。小滨立刻让翻译官喊话说："别砸了，我们不是八路，是小水泉的皇

军。”这时，万全同志觉得目的达到，便叫人开了“部落”大门，迎日寇进“部落”。“坏鼻子”召集群众讲话说：“草场‘部落’大大的好，大大的良民，万甲长大大的好。”说完话，脸上露出得意的奸笑，集合队伍，溜回了小水泉据点。

党的需要我就去　抗战不能怕委屈

1943 年秋，六区区委对当时形势进行了全面分析，对敌我力量对比和进一步开展对敌斗争进行了周密的研究。认为：草场一带是我抗日政府沟通关外的重要交通枢纽，又是伪满洲国西南国境线，敌人实行“三光”政策，企图消灭我抗日政权的重要地区。所以，这一带是敌我必争之地。草场村虽是抗日堡垒村，但它周围几个村据点里的敌人却很猖狂，敌人内部情况很难掌握。把我们的同志打入敌人内部，掌握敌人动向，瓦解敌人，保护人民，内外配合打击敌人，成为对敌斗争中极为艰巨又迫切的任务。

万全同志经党组织多次考验，忠实可靠，对敌人勇于斗争，又善于斗争，又是一名单线领导的共产党员，党内外都没有目标，尤其是对几件事情的巧妙处理，取得了日寇的信任，如能打进敌人内部，对抗日极为有利。于是，区委决定做万全同志的思想工作，叫他打入敌人内部，当和万全同志谈了这一决定后，万全很有顾虑：打入敌人内部，稍有不慎就会掉脑袋。在言行上如装得不像敌人，就会暴露自己；若装得很像，不仅万人唾骂，良心上也过不去。就连做伪甲长，不明真相的人背后还骂他汉奸、走狗、亡国奴呢。区委领导反复说明，这是党的工作需要，况且你已具备打入敌人内部的许多有利条件。虽有危险、有委屈，但这是党的事业，是光荣的，共产党员就是要为党的事业不惜牺牲一切。在组织的鼓励下，万全同志向组织表示：“只要是党需要我就去，为了抗战，就不能怕委屈！”

为了进一步取得敌人对万全同志的信任，区委决定将政府在草场保存的一枝“七九”步枪，由万全同志交给敌人。经过周密的研

究部署，由党员杨士林、杨田、吴金等人（他们都是"灭共义勇队"员，手里有敌人发的枪）到天黑以后，到"部落"外的山上打了一阵子枪，然后用烧红的火筷子把万全的头皮连同礼帽烫了眼儿，随后万全同志拿上那支"七九"步枪，连夜跑到八挂岭警察所报告说："八路军要进'部落'，让我们义勇队打跑了，还夺了一枝枪，我差一点被八路军打死。"说完，让伪所长和警察们看头皮和礼帽烫的那个眼儿。同时，杨士林等人在村里向群众宣传："义勇队"和八路军开火了……。第二天，八挂岭警察所和倒流水警察署的警察都来到了草场村，了解事件经过。找义勇队了解的，杨士林、杨田、吴金等人主动介绍如何和八路军开的火，而且如何夺了八路的枪等等。说的活灵活现，和万全介绍的情况一样。找老百姓了解，群众说："只知道昨晚打了好一阵子枪，说是"义勇队"和八路接火了，还夺了八路的枪，把八路打跑了，老百姓吓得不敢出门，详细情况不清楚。"随后，县里又来人调查，也没查出任何破绽，就深信不疑，夸万全能干，了不起。

万全同志和八挂岭警察所韩所长平素有些"交情"，韩认为他夺了八路的枪有功，应给个一官半职的，便推荐他到倒流水警察署。万全当然"求之不得"，向署长常大伦说："我夺了八路的枪，八路早晚得找我的茬，不如让我到警察署来，给我点事干，保险点。"但常大伦未能答应。

不久的一天夜里，小水泉日本守备队"坏鼻子"突然把万全抓去，劈头便说："你的良心的大大的坏了。"万全摸不清头脑，冷静地听着，思索着。最终他明白了，这是敌人的藏诈。因为敌人没能提出任何具体事实，只是毫无根据的乱骂。于是，万全便理直气壮地说："我为了效忠皇军，抢了八路的枪，险些丧命，怎能对皇军不忠呢？只要放我回去，一定更加孝敬您"。"坏鼻子"没再说什么，就放他回来了。万全回家后，变卖家产给"坏鼻子"送了礼才算罢休。

事件发生后，为防止敌人再施伎俩，尽快打入敌人内部，万全

又送礼给常大伦，说："不知哪天，我非被八路活埋不可，不如让我到警察署，真刀真枪和八路干，保险些。"由于万全同志原来就是敌方出了名的模范甲长，又屡建"功劳"，加之礼物开路、韩所长保举，终于在1943年秋后，到倒流水警察署当上了"警尉"。以后，又任八挂岭警察所长，以合法身份作掩护，向敌人展开斗争。从此，组织上通过万全同志，掌握了敌人内部许多情况。

在万全同志任警察所长期间，该区(蓟县、遵化、兴隆联合县六区)区委书记兼区长丁春生同志，经常到八挂岭据点，吃住在这位"万警尉"家里。丁说："既方便、安全、又便于开展工作"。其它县区干部在敌情紧张时，也常去躲避。这对万全同志很危险，可他满不在乎，总是设法保护好我方工作人员。在修建挂兰峪伪警察署时，民工挨打受骂，万全同志去监工时，不许警察打骂民工，他说："民工们怕挨打都不敢来，活谁干？"保护了民工，受到了民工的称赞。

舍身智斗诱顽敌　七十三人脱虎口

万全同志当上伪"警尉"后，在警察面前装扮得耀武扬威，神气十足，警察特务对他几分恭敬，几分惧怕，怕他时常找茬训斥他们。

他每到各"部落"检查时，都要组织学生列队欢迎，还要照本宣科地向学生"训导"几句话，常遭许多不明真相的老百姓的白眼、唾骂。为取得敌人信任，掩护自己的身份，完成党交给的任务，他忍辱负重，默默地工作，不到万不得已是不轻易出来讲话的。关键时刻，他挺身而出，保护党和人民的利益。

1944年农历6月30日夜间，三道河"部落"伪警察分驻所被我蓟遵兴联合县县大队和"灭共义勇队"内外配合袭击了，缴获步枪40支，手枪1支，有13名"灭共义勇队"员携20支步枪参加了抗日游击队。这个"部落"共产党支部是个坚强的集体，"灭共义勇队"的枪支和实权基本上都掌握在共产党员手里。大枪队队长张德江是共产党员，副队长李建国(真名张显武)是党支部宣传委员。这

次袭击的基本方案就是由区委书记丁春生主持，在李建国同志家里召开的支委会上具体研究制定的。这次事件震惊了敌人，农历七月初二，敌人纠集了倒流水、挂兰峪、八挂岭、小水泉等据点的日伪军包围了三道河“部落”，把全“部落”的男女老少集中一起，按户口簿点名，参加游击队的13名“灭共义勇队”员家属，当场成了八路军家属，敌人除对“部落”进行了大搜查外，把13户74口八路军家属抓起来，进行毒打，逼他们交出人和枪。由于没有逼出任何情况，就把这74口人带到倒流水警察署关押起来，日夜刑讯逼供。这74口人，从会说话的孩子，到步履蹒跚的老人，无不惨遭灌凉水、灌煤油、灌辣椒、压杠子、狼狗撕咬、吊打等残酷折磨。但敌人最终没能从他们嘴里掏出需要的东西。相反，敌人越凶残，人们越宁死不屈。无奈，常大伦只得向兴隆警察科电话请示，当众杀害这74口人，借以镇压八路军的抗日活动。农历七月初五下午，这74口人被押回三道河“部落”，将全村男女老少，强行集中到村南头井沿空场开会。会场周围用重兵把守，会场内的一张桌子上架一挺机关枪，冷森森的枪口对准了这些八路军家属。常大伦首先进行一番反共宣传后，宣布：“谁把自己家参加八路军的人找回来，把带走的枪交回来，就给他自由，谁抗拒不交，立即枪毙。”无论他怎样嚎叫，人群依然悄然无声，大家以愤怒的目光鄙视着敌人。敌人终于恼羞成怒，他们先把“灭共大义勇队”队长张德江妻子拉出来问：“你男人哪儿去了？大枪哪去了？”敌人得到的还是以前那句话：“我啥也不知道。”鬼子军官吼叫一声，立刻有几个敌人拥上来，把她拖到南门外枪杀了。就这样，一位普普通通的农家妇女，为了保守秘密，为了抗战的胜利，英勇就义了。在伪警察中有个王所长，平素对老百姓不错，有人说他是我们派进去的，大家都来央求他，有的给他跪着，有的给他磕头，求他讲讲情。他为难地说：“你们别求我了，我也求不了情，他们不信我。”当时，气氛非常紧张，人们无可奈何，只得等死。

敌人杀了张德江妻子之后，马上又拉出大枪队副队长李建国的妻子逼问，得到的回答仍是："不知道。"红了眼的敌人又要将她枪杀。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万全同志跑得大汗淋漓地赶到了。敌人这一举动，开始他并不知道，当他得知这一消息后，便立即赶赴现场。他见此情景，马上凑过来问李建国的妻子："你有几个孩子，是男是女？""就一个女孩。"(其实万全很清楚)，万全马上过来对日本军官说："他只一个女孩，又不能传宗接代，不杀她，她家也等于绝户了。"由于日本人也有这种"女孩不能传宗接代"的习俗，更重要的是很欣赏这位万警尉，便点了点头，使李建国的妻子幸免遇难。紧接着万全同志又对敌人说："留着这些人也许还有用处"。那个日军头目一听，贼眼一转，若有所悟地点了点头，然后与常大伦等商议，将这些八路军家属统统运往东北。万全知道，运往东北无非是：有劳动能力的下煤窑挖煤，青壮年妇女配给敌兵，老弱幼用作细菌战的试验品。万全同志心急如焚，再继续和敌人讲价钱，又恐敌人翻脸；不然，这些人等于还未出火坑。再看看这些人，都用目光望着他，看他是唯一的救星。一种共产党员的责任感，不容他考虑个人安危，拼命也要保护这些抗日家属。他首先对常大伦说："我想如果把八路军逼急了，他们能不报复吗，八路军大部队常在这一带活动，对咱们非常不利，不如放长线钓大鱼，把他们撵到'国外'去(长城以里为满洲国外，三道河村离长城10华里)，虽然那里是满洲国外，可也是日本人的天下，我们布置好，八路军必去探他们的家属，这样便可一网打尽。"这番话还真的打动了常大伦，随后由万全同志帮腔，二人去说服日军头目。由于当时日本人很信任他俩，就同意了他俩的意见。常大伦对这些家属们说："皇军饶你们不死，把你们通通撵到国外"。又送了一顿"人情"，说了一通"中日亲善"一类的鬼话。而后，万全同志暗示这些人说："你们要感谢皇军不杀之恩，马上到关里去，越快越好，否则，皇军饶不了你们。"其实，人们恨不能一步迈到关里去。当夜就收拾好东西，到关里投亲靠友去

了。就这样，在万全同志的舍身救助下，73 个八路军家属得救了。人们深深感激这位“万警尉”，万全的名字深深地印在人们的心底。时至今日，万全同志舍身救命 73 口的事，仍在群众中广为流传。

赤胆忠心为革命　忍辱含冤天绝言

1945 年“八·一五”，日本投降了。9 月份，兴隆县全境解放。在人们欢庆革命胜利声中，万全终于脱掉了一直使他感到耻辱的伪警尉制服，带着胜利的喜悦回到了草场村，为胜利完成党交给的任务而感到高兴。他想，这回可以回到村里，公开地为党工作了。但由于当时党还未公开，群众和政府工作人员对他过去的身世不很了解，只做为没有民愤的伪军人员看待，不处理，就算照顾了，当然更谈不上安排他做什么工作了。

当时党的中心工作是建立村政权，清剿残余的敌特分子，发动群众向那些汉奸、恶霸、伪军政头目、特务、地主进行复仇清算。口号是：“欠债的还债，欠命的还命”。这种复仇清算可以打破区、村界限，很快形成了群众运动。除清算本村对象外，各村互相清算，受压迫的群众要伸冤报仇，缺衣少食的广大群众可以得到现实利益，所以，群众情绪高涨，势不可当。

1946 年春，本区七拨子村四五十名群众来到草场村找万全清算。他们说：“万全当警尉时吃过他们的猪和羊，都没给钱，要他赔偿 15 石(每石 100 斤)玉米。”万全说根本没有这回事，双方僵持不下。当时杨顺同志是草场村党支部书记、农会主任，他相信万全同志不会干这种事情，可对这种群众运动又不能抵制。经双方协商，由草场村农会拿出 4 石玉米才算了结。不过这种村农会运动正值风起云涌之际，村干部和群众怕别的村群众再找万全同志清算，要求把他保护起来。杨顺同志提出：“把万全同志保护性的关押起来。”于是，把万全同志和本村已经在押的富农阎珍、吴廷贵关押在一起了。在一天夜间，看守的民兵和万全同志都睡着了，醒来一看，

阎珍上吊自杀了，吴廷贵逃跑了，万全同志一着急，想去厕所，到院里摔了一跤，当时他想，干脆趁跌倒的机会装病、装哑巴，免得给自己找麻烦。人们都知道万全哑巴了，从此再也没有人找他清算，人们见了他只是同情地向他微笑或点点头就走开。万全同志装哑巴除他爱人外别人都不知道。一年多以后，运动搞完了，形势稳定了，他也就不再装哑巴了。

因为万全同志青年时代做小买卖，赶过驮子，使用过骡子等大牲口，懂得一些牲畜病理和医疗知识，经常给附近各村的牲畜治病，政府在挂兰峪建了个兽医站，他被调去当了兽医。遗憾的是，"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他又被以"日寇汉奸、走狗"等罪名揪斗，忍受着种种屈辱和批斗，于 1973 年不幸含冤去世。

记袁水和十团特务大队的抗日活动

丰宁县党史办

抗日战争时期，在丰宁、滦平、密云、赤城、延庆、隆化等地，活跃着一支自发的农民武装，其头领是袁水。这支队伍杀富济贫，反抗伪满官府，有民族正义感。在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感召下，在党的引导和教育下，袁水领导的这支队伍由自发到自觉，终于走上了抗日救国的道路。在抗日战争最困难的时候，他们在丰、滦、密、隆一带坚持抗日游击战争，有效地牵制了大批敌人，减轻了日伪对平北根据地的压力，为民族解放事业做出了贡献。袁水成为我党在平北地区4个最有影响的统战对象之一。

出身贫苦　不畏强暴

袁水，字福林，化名袁照东，1892年生于丰宁县塔黄旗乡塔前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父亲叫袁喜忠。袁水排行第二，因家境贫寒，他没念过书。10来岁就给人放牲口，十三四岁给地主扛半活，十八九岁后种地主的耪青地，以后又在黑山嘴和古房给地主家扛长活当把头，23岁结婚，有2个女儿。他靠扛活维持生活，直至35岁。

袁水是个纯朴正直的农民。长期受剥削受压迫，铸成了他同情贫苦、不畏强暴、敢做敢为、刚直不阿的性格。有一年，他的叔父袁喜龙在塔沟四月初八庙会上卖席，遇上外号叫"刘三蒿子"的地痞去买席子。他不给当时好花的铜子和银元，偏给不好花的"票子"。袁喜龙不要"票子"，双方争执起来。"刘三蒿子"仗着有钱有势，带

一拨人上来要动手打人。袁水不畏强暴，便召集逛庙会的长工抄起摊上卖的锹镐把围了上来，“刘三蒿子”见势不好，仓惶逃跑。

塔前村农民祖辈都种北京松洛寺的香火地。恶霸地主赵爽，花几百两烟土买下了独家租种松洛寺土地的租佃权。这年秋天，他要强收各佃户的庄稼。大家辛苦一年，眼看到手的庄稼就要被赵爽夺去，都很着急。但因赵爽有钱有势，没人敢惹，没人敢出来跟他说理。当时袁水把佃户召集到一起，说：“大家尽管拉庄稼，赵爽胆敢阻挡，我就用刀子先挑他牛，再挑他人！”这风一传出去，吓得赵爽没敢拉佃户庄稼。以后袁水又放出风去，说：“谁敢霸占松洛寺的地，夺我们的饭碗，我就跟他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拚个你死我活！”恶霸赵爽也怕硬的，没敢继续施弄霸占土地的阴谋，而只是白搭了几百两烟土。但他贼心不死，为保护他村边一片土地不受水冲，他偷着把村后的一道河沟改到村里。村民赵玉池怕水冲房屋，和他打官司，因赵爽给官府送了礼，赵玉池输了官司。袁水见理不公，自告奋勇又出头和赵爽打官司。官府衙门知道袁水在穷人中威望很高，害怕群众起来反对，不得已又重审改判此案，袁水给穷人出了气。他这种不畏强暴、敢做敢为的精神，受到人们称赞。在窄岭一带群众中，他的威望日益升高。1926 年，袁水给古房地主周文来家扛活，家中妻子郭氏患抽筋病无钱医治，他在外扛活又不能照看。秋后，周家让他去岗子沟(滦平县)卖粮食和大烟。袁水想赢点钱给妻子治病，便在当地赌起钱来。结果，把周家的钱输光。周家大怒，过年时还登门拚命要钱，其妻连病带急，不久病死。留下两个女孩，无依无靠。在这家破人亡、走投无路的情况下，袁水把两个女儿托付给哥哥，便集合一些穷哥儿们，于 1927 年春在窄岭西沟小营子拉起“杆子”来。他们 30 来人干了半年，感到拉“杆子”当土匪不是正业，就到黑河川喜峻嵯一带当了保甲。

建联庄会　抗日剿匪

袁水在黑河川一带当4年多保甲，名声不错，人们都称他"袁排长"，还在那续娶了妻子。1932年，他带着妻子回到老家塔前村。当时丰宁县也有地方保甲武装，全县分8个区团，每个区团管辖几个甲，各甲有自卫队。窄岭是第三区团，下辖6个甲。袁水从黑河川回来。被公选为第四甲的自卫队长。

1933年，日军侵占热河，"老汤队"向西撤退，土匪十分猖獗，一天就过十几个"杆子"。他们烧杀抢掠，无恶不做。日寇进承德那天，土匪石老一进攻丰宁县城凤山，放了几把大火，又把丰宁县自卫团的刘副团长打死，将头割去。他们还到塔黄旗附近骚扰，企图越过窄岭，到滦平县境。窄岭区团的保甲为维护地方治安，一起到塔黄旗打土匪。当时保甲们看到土匪很多，吓得都上了西山。袁水一看急了，抱起一挺机枪在河套对着土匪打了几梭子。土匪不知虚实，退到塔沟门一带，没敢前进窄岭。只是临走时烧了塔黄旗，以泄私愤。在这次打土匪中，因为袁水勇敢，枪法好，受到保甲们拥护，又被推选为副区团长。

日军侵占凤山、大阁后，窄岭区团长孙贤、副区团长袁水和三甲甲长兼自卫队长李正一等保甲官，商议决定把三区团保甲改为"抗日联庄会"。各甲集资到古北口一带收买枪支弹药(长城抗战时国民党丢弃些枪支弹药)，用来打土匪和日寇，维护地方治安。当时共买回100多支步枪、10来挺机枪，还有小炮和炮弹等。加上收缴散兵和土匪的枪支，保甲人人有快枪；不当保甲的，家里也有火枪和大抬杆。买枪钱和保甲的工钱都按地亩摊派，天桥甲每亩地摊4块洋钱(银元)。

不久，东北义勇军耿司令(耿继周)率200来人开进滦平虎什哈一带，他主动和窄岭"抗日联庄会"联系，愿联合起来共同抗日。孙贤、袁水等听说这支抗日队伍，纪律严明，不骚扰百姓，就由袁水

带4个弟兄把耿司令带的队伍接到窄岭。耿司令来后，帮助联庄会整顿，建立联络制度，公开打出抗日旗号。各甲之间用“转牌”进行通讯联络，遇有紧急情况就用“鸡毛信”。各甲自卫团员经过训练，都能做到召之即来，来之能战。一次，石老一土匪又到选匠营、偏道子一带骚扰。耿司令和窄岭“抗日联庄会”为维护地方治安，主动出击，与土匪激战于郎栅子刁窝梁上，把土匪头子打死，残匪跑到上黄旗一带。战斗中袁水下额负重伤，鲜血直流。人们把他背下战场，他已人事不省。大家以为他已被打死，就用树枝把他掩盖起来。不久，他又苏醒过来，被抬回家疗养。伤好后，下额就歪歪了。他原先是长方脸，大高个儿，长得威武英俊，这回成了个歪歪嘴，人都称他“老歪歪”。

1934年初，日军在关外站稳了脚，便抽出力量对付窄岭“抗日联庄会”。日军玩弄政治手腕，一面以谈判为名，把区团长孙贤骗到凤山扣押起来，继而送往承德；一面以登记枪支、验枪发子弹为名，收缴枪支，声言有枪如不登记，即以私藏武器论处。当时，袁水正在养伤，耿司令说去北平求援，一去未归。孙贤被扣，李正一孤掌难鸣，结果日寇把联庄会的枪支全部收缴起来。三甲自卫队长李正一识破日寇收枪阴谋，把好枪藏起一部，后被坏人告密，李正一被捕。被保出后，弃家逃往北平，投奔了二十九军宋哲元部。至此，坚持一年多的窄岭“抗日联庄会”，被日寇彻底搞垮。由于“抗日联庄会”抗日剿匪，把日寇侵入窄岭地区的时间推迟了1年左右。

约法三章　举旗抗日

窄岭“抗日联庄会”被解散后，袁水隐居家中开小铺谋生，坚决不给日军办事。当时伪满警察横行霸道，没人敢惹，他们到小铺买东西不给钱，而且还向袁水要金子和枪支弹药，进行讹诈。袁水一看在家呆不下去，就于1938年春带着侄子袁广珍等人到关里密云县走马庄给开稻池的人家当把头。1939年发大水，走马庄稻池全

被水冲，他赤手空拳回到老家塔前，一看家乡也遭受严重的水灾，生活没有着落。于是他又和当地的修占申、许志田、娄玉甫等人由围场往北平贩卖大烟。结果在北平犯了案，被扣押数月。释放后，别人都回了家，袁水因没有路费，就住在齐各庄朋友家。

一天，碰见了窄岭街"广元德"掌柜的李介甫，他对袁水说："你别回去啦，窄岭警察署的马警尉(马明生)要灌你凉水呢！"袁水不敢回家，就在齐各庄寄居。

当时，丰滦交界地带有好几股土匪"杆子"，如三省"杆子"、九江(于九江)、八河(八和尚)、申七点，老商干、四喇嘛、小老雕等。其中三省杆子有70来人，力量较大。"杆子"头叫赵德辉，他因分赃不均，被内部人打死。由郭凌汉当头，郭凌汉霸占民女又被手下人打死。"杆子"里选不出头头。当时"杆子"里文书修占申知道袁水在齐各庄寄居，在大家公推下，他去请袁水出来当各"杆子"总头，但袁水坚决不干。经说和，最后，袁水提了三个条件。他说："要让我干可以，但有三条必须听我的：一是不许奸淫妇女，胡作非为；二是不许祸害老百姓，尤其是家乡的百姓，要杀富济贫；三是不许绑票，要打日本、打据点，抓汉奸、打警察署，砸大满号和兴农社。"各杆子答应了这三个条件。1940年春，袁水便到密云县水石古三道楼子当了三省"杆子"头。此后又吸收申七点、小和子、奎字杆共200多人，统称"水字杆"。

袁水到"杆子"后，坚决按约法三章办事。为了打日本，他亲自到长城一带用大烟和牲畜收买枪支。听说"杆子"里有人抢了窄岭黑山嘴徐世俭的3头骡子，他立即把骡子要回，还给了徐家。

1940年6月9日(农历五月初四)，"水字杆"在喇嘛沟门四道穴抓住大阁伪满洲军派的2个探子。经过审问，得知伪满洲军有200多人马组成的骑兵队和步兵要来四道穴打他们。于是，袁水布置好密探侦察，并让队伍立即转移到石洞子。不久，伪满洲骑、步兵果然来了。一位妇女来报告后，他们连夜选出70多名枪法好、身体

壮的弟兄把敌人包围起来，打死10多个敌人。第二天五月节，天下着小雨，又和敌人后续部队打了一天。以后敌人天天跟踪追击，一直到延庆。在八路军帮助下，“水字杆”把伪满洲军打退。从此，袁水和“水字杆”与八路军建立了密切联系。

受党教育　坚决抗日

1940年六七月间，我冀热察挺进军第十团带着开辟平北的任务，来到平北山区的丰（宁）滦（平）密（云）一带，宣传抗日，打击日伪汉奸，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部队首长发现袁水这支“水字杆”有正义感、有民族气节，与其他土匪不同，就派人和袁水联系，争取他共同抗日。

6月下旬，“水字杆”住在窄岭西沟小营子，我冀热察挺进军十团白乙化部队住在滦平县五道营子，他们相离很近。八路军艰苦朴素，纪律严明，密切联系群众的好作风，给当地群众和“水字杆”留下了深刻印象。当时，十团派侦察员到小营子和袁水联系，让他们投八路军，共同抗日。但是，他们那时对八路军还不知底，几个头头商量说：我们再转游几天，等秋后再投八路军。2个侦察员在那住2天返回。

7月间，平北军分区政治部主任段苏权率十团在滦平五道营子北老米沟活动时，会见了袁水。当时，袁水骑头小毛驴，腰插支驳壳枪，头戴草帽，身穿紫布褂子。他来到老米沟门，是想看看八路军部队情况。段主任热情接见他，和他谈了两三个小时，告诉他要知道自己是中国人，要抗日，要深入敌后活动，别做危害抗日的事。还向他讲了共产党、八路军的抗日主张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鼓励他和八路军合作抗日。最后，段主任还留他吃了顿饭。回去后，袁水跟弟兄们说：“我乍见到八路军，心里很不踏实。可是这次见到段主任，他身上也不带枪，那么大官儿，说话很和气，一点架子也没有，咱们也就放心了。”有一次，十团一营打窄岭警察署，袁水还给

放警戒。

八九月间，挺进军十团团长白乙化带部队在丰宁县大草坪一带活动2个多月，袁水当时也在这一带活动。白团长为了进一步争取他，多次从侧面做工作，派代表跟他谈，还几次请他到团部作客。袁水一开始比较拘谨，后来就很随便了。白团长还派梁排长到袁水队伍里做联络工作。

在八月收大烟季节，"水字杆"与"老商杆"合起来，到围场、大阁砸大满号。袁水带着队伍到南关时被从大阁开来的4汽车日伪军包围。岗哨报告"起灰了(黑话，意思是敌人来了!)"但是，袁水迷信"推八门"。"军师"张凤林"推八门"说没事，袁水就没及时撤走。结果敌人在西山上架起机枪，打死打伤20多人。经过奋力反击，才突围出去。突围中把抢大满号的大烟都扔了，人也跑散了。袁水带着四五十人撤到后营上甸子，经石人沟高营、上方营，转到南大梁奔关里了。以后，敌人对丰滦密一带进行大"扫荡"，袁水带着部分人在关里西驼古和南大梁一带活动，打据点，砸警察分驻所，进行反"扫荡"斗争。

1940年下半年，我军开辟平北抗日根据地的工作进展很快，尤其是我丰滦密地区的抗日斗争更是如火如荼，引起了敌人的极端恐怖和不安。从1940年9月13日起，敌人集结4000多兵力，对我丰滦密根据地进行了惨绝人寰的大"扫荡"，妄图把八路军赶出丰滦密。在对八路军进行残酷"扫荡"的同时，对袁水的"水字杆"也加紧政治诱降。"水字杆"开始分化，以李守和为首的一些小头头，匪习不改，对袁水的纪律约束受不了，对袁水靠近共产党更不满意。于是在部队中散布不满情绪，说共产党的坏话，并和日伪暗中勾结。他们几次探问袁水的口气，见袁水很坚决，又因袁水威望很高，他不跟着走，绝大部分弟兄就拉不走。他们最后使出很恶毒的一招——杀了我军派到"水字杆"工作的梁排长，蓄意逼袁水离开共产党，借以向日伪邀功。袁水得知梁排长被杀后，痛心万分，与李

守和势不两立，李只拉出10来个人投降了日伪。

“水字杆”的分裂和梁排长被杀，使袁水感到对不起共产党，对不起段主任和白团长。于是，他在1941年春派人拿着一封信和全队最好的一支盒子枪，主动去找十团白团长，要求把他们正式改编为八路军。当时白乙化团长已在鹿皮关战斗中牺牲，新任团长王亢立即派一营到丰滦交界地带活动，一边打击敌人，一边找袁水队伍。杀我梁排长、投降日寇的李守和，投降后仍不受信任，在围场被日寇杀掉，这件事更坚定了袁水跟共产党走的决心。

1941年3月间，丰滦密联合县游击大队在密云大峪石老虎沟一带碰见了袁水。十团政治处主任彭烈、丰滦密游击大队长师军和教导员刘力生，热情接待了他，初步谈了收编的事。这时，决定：袁水的队伍编制、活动地区及他本人的职务都不变，队伍番号叫十团独立游击大队，受共产党、八路军领导；斗争重点是打据点、砸大满号和伪兴农合作社；部队不绑票，不抢老百姓东西，不杀老乡的猪、羊，把部队马匹都还给老乡，并发给他们50身八路军军装。从此，袁水队伍正式打出八路军的旗号，坚持在伪满统治区丰宁、滦平一带开辟新区。

一次，袁水派副手（管后勤的）王德瑞去虎什哈大河北找汉奸地主程福顺要手枪。王德瑞在途中路过虎什哈西北沟，便住在家中。因其妻作风不正派，当晚就与姘夫高发荣商量，到虎什哈警察署报告了。第二天一早，100多警察和讨伐队包围了王德瑞住处，王德瑞手使双枪打死2个敌人突围跑出，负伤后把枪砸碎，头撞岩石，壮烈牺牲。袁水带队把高发荣和王德瑞的妻子都给杀了，为王德瑞报了仇。

袁水凭人熟、地熟的优越条件，经常昼伏夜行，砸警察署、打火车站、偷袭敌人据点。1941年4月19日夜，袁水独立游击大队和长城游击队，共同包围了火斗山车站，俘虏路警8人，缴获大枪8支，子弹1箱。7月间，他们配合丰滦密游击游大队打巴克什营警

察署，缴获水压重机枪1挺。

袁水独立游击大队还配合丰滦密联合县十二区干部和长城游击队，深入偏僻山区，召开上层人士会议和基本群众会议，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贯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组织抗日救国会，建立敌后抗日政权，变敌人一面政权为敌我两面政权，发动群众给部队筹粮、筹鞋，踊跃参军，支援抗日。1941年夏秋季节，他们在丰宁县天桥、方营沟和滦平县安纯沟等地，建立了抗日救国会，选出村长、民兵队长、除奸员、宣传员等。在天桥、方营沟成立抗日救国会选干部时，袁水劝勉大家说："可别不当回事呀，给你们的责任不小呢，可得好好干！"抗日救国会成立不久，因坏人告密，即被敌人破坏，部分成员被捕入狱。1941年秋长城游击队在打小白旗警察分驻所时，有些队员受伤，士气低落，部分队员受坏人操纵，在方营沟、八道沟竟持枪叛变。队长张宝仁带着剩下的12个队员回关里，途中遇见了袁水游击大队。袁水听说后，立即赶回方营沟、八道沟。当时正过"立秋"，叛变的褚拐子(褚凤义)等在村里杀猪宰羊，大吃二喝。袁水带队把他们10多个人都抓了起来，夺回了枪支，把带头叛变的拉到村外处决。

接受改编　屡建战功

1941年9月，十团政委吴涛和参谋长才山派侦察参谋李文芳和通讯员刘泽到关外找袁水独立游击大队，准备把他们带到关里整训改编。当时，袁水独立游击大队有六七十人，分2个中队。袁水听说让到关里整编，态度很坚决，马上带队登程，向关里进发。因为途中怕敌人阻击，都是昼伏夜行。当第二天夜间走到离白马关不远的一个村子住下时，以一中队长为首的一些人，害怕八路军纪律严、生活苦，不愿到关里整编，密谋哗变，准备把找他们到关里整编的李文芳和刘泽打死、劫持或打死袁水，把队伍拉走。这事被小通讯员听到，立即报告袁水。当时袁水急了，掏出驳壳枪顶上子弹，拿

上藤子手杖，直奔一中队住处。他进屋大吼一声，命令大家都把枪放在炕上。气愤地说："你们这些没良心的东西，想造反啦！把枪都给我放下。我引你们走上正路，你们想杀我，今天我非先杀了你们不可！"说着就用手杖一阵乱打，大家纷纷跪在地上求饶。最后，把策动哗变的三个首要分子拉到村外处决。李文芳和刘泽劝袁水不要杀，带进关里算了，袁水说："这样的人带给咱们部队的早晚是祸害，李守和杀梁排长的事可把我教训够了！"在途中整顿了一中队，由二中队调去些骨干当干部。这样，袁水带着游击大队顺利到达了赶河厂附近的白岩村(密云县北石片沟鹰翅岭)，把队伍交给了十团。是时，十团团部召开联欢会，并设宴热烈欢迎他们。十团团长王亢讲话，说等到把日本打出中国去，给大家的家里挂光荣牌。二营教导员刘力生还以"改造游杂，武装抗日"为题作诗一首，表示祝贺。他写道："兄弟溯炎黄，并肩抗东洋，一打青纱帐，再登长城墙，三闹平川上，战士气昂昂，熔炉是战场，顽铁炼精钢"。

经冀热察挺进军司令员肖克批准，袁水独立游击大队改编为十团特务大队，袁水为大队长。派去参谋李文芳、教员员王凤珠、一连指导员谭金明、一连副连长刘兆云，侦察员朱兰普、李金刁、王文禄。整编后，发给每人一身灰棉衣，一顶毡帽，还有一些手榴弹。当时，袁水大队已经成为八路军正式部队，要求大家不许绑票，不许到村里杀猪宰羊，大吃大喝。要爱护群众，吃饭给钱或给开条顶公粮。部队给战士每人每天发两角菜金，给队长、连长发点零花钱，改编完了就出关活动。农历八月十五，他们到滦平县马营子把经常向日寇报告我军活动的汉奸王怀抓住枪毙，消灭了敌人的耳目。特务大队出关到伪满统治区丰宁、滦平、隆化一带活动，在敌人后院到处"放火"，闹得敌人昼夜不安，寝食不宁。他们经常把缴获日伪军的服装穿上，戴着钢盔，冒充日伪军，被称为"铁帽子队"。袁水诙谐地说："我们这个铁帽子队，至死不保日本"。所以，尽管敌人严密封锁"扫荡"，他们仍机动灵活地开展游击战争，打击和牵制了大批敌

人，减轻了关内主力部队的压力，对整个平北抗日斗争起了重要作用。

特务大队在关外活动一个时期就拉回关里根据地休整，学军事、学文化、学政治，部队素质不断提高，士气日益旺盛，一扫过去“杆子”的习气。土匪黑话听不见了，完全换成我们部队的一套制度。袁水本人的政治觉悟也提高很快。在此之前，他只认为八路军的宗旨和他的杀富济贫差不多。所以，虽然打着八路军的旗号，可有时仍以绑票的方法筹集粮、饷。一次，他绑了一个汉奸地主走到方营沟。四道沟方九明的妻子问他：“你不说是八路军么，怎么还绑票呢？”袁水说：“八路军也绑票，就是不绑好人。”袁水还曾信奉“家礼教”，不喝酒不抽烟，部队行动前先“推八门”，决定方向，至此也不再信这些了。他说：“咱们是穷人的队伍，共产党的理就是给穷人办事的理”。袁水不识字，但很爱开会，并带头学习、下操、唱歌，纪律严格。由于他处处以身作则，战士都很拥护他。

1942 年 6 月底，袁水特务大队在田庄休整一个来月后又出关了。袁水带 120 多人直奔凤山西北川，到丰隆交界地带活动。走到缸窑村被讨伐队包围。他们边打边撤，到郭家屯老雕窝又跟敌人打一仗。当晚，袁水派人侦察到离驻地 15 华里的黄家窝铺警察分驻所有两个日本人，白天带着警察和团员出去“扫荡”，晚上回来，已是疲劳不堪，便决定夜间乘其不备进行奇袭。他立即挑选 50 名枪法好、年轻力壮的战士采取速战速决方法，先砍断了电话线，摸了炮楼，然后闯进院里，不发一枪俘虏了 2 个日本人、34 名警察和自卫团员，并缴获 30 支步枪、4 支手枪、子弹若干。

打完分驻所又回郭家屯西南沟住下，袁水以为这回武器多了、子弹足了，准备让战士休息一天，乘胜前进打郭家屯警察署。可是，敌人恼羞成怒，纠集了丰滦隆围四县讨伐队和伪满洲军数千人于第二天早饭后，把他们包围起来。袁水面对敌众我寡的情况镇静沉着，指挥队伍整整打了一天，晚上突围转移。突围时队伍不幸离散，

袁水带着30多人由隆化郭家屯撤到丰宁石人沟，在九龙山又和敌人打了一仗，然后撤回关里。这次出关虽然受到些损失，但是端了敌人一个警察分驻所，调动了敌人几个县的兵力，给敌人造成很大恐慌，扩大了我党、我军在伪满统治区的影响。

袁水参加八路军的消息，迅速传到他的家乡——塔前村。甲长赵爽向窄岭警察署报告后，日伪警察到处抓他，并宣扬：谁抓到袁水赏钱若干，同时逼迫袁水家里和亲戚交出袁水。其兄袁泉被厢黄旗警察署抓去好几次，袁水的妻子不敢在家，回到黑河川娘家居住。当时警察、特务三天两头到塔前村袁家折腾，日本的苏翻译、白警尉和警察欧国忠常去抓袁家人。袁水两个姑娘家的老公公和姑爷，也都先后被抓到厢黄旗警察署押半个多月。袁水的两个侄子袁广耀、袁广祥，被逼到关里走马庄一带找袁水没有找到，后被抓到承德狮子沟日本宪兵队押了8个多月，受尽了酷刑。袁水的三侄袁广如在家受气，被敌人折磨的连病带气而死。家破人亡的惨景，不但没有削弱袁水的抗日斗志，反而进一步激发了他对日寇、汉奸的仇恨，斗争更加坚决。

1942年8月，挺进军十团根据中央和平北军分区"精兵简政"的指示，实行精减，取消营的建制，由三三制大团改为6个连的小团。特务大队建制撤销，袁水被调到南碾沟、平北军分区后勤部当管理员。同年冬，被选为丰滦密联合县的代表，参加了晋察冀边区参议会。去开会之前，边区首长还特意让白求恩医院给他做了矫正面容的手术。开会回来，仍在军分区后勤当管理科副科长及招待所所长。袁水这个农民出身的干部，憨厚正直，因而人们都称他"老二哥"。他生活节俭，穿着朴素，做后勤工作连个小箱子都没有，只有一个小包袱，里面包几件旧衣服和鞋子。他不吸烟、不喝酒，平日吃苦在前、享受在后。他常年在外，很少听到他谈论家里老婆孩子的事情，一心干工作。当时军分区在海陀山里，供给十分困难，生活很艰苦。为解决部队供给，他亲自上山烧炭，还经常冒着生命危险，赶

牛羊、运木料，到敌占区换取部队急需的棉布、食盐和药品等。由于成绩突出，他被选为平北地区的模范工作者，于1944年12月10日光荣地出席了平北地区群英大会，受到了平北地委、行署和军分区领导的表扬和奖励。

经受考验 晚节忠贞

1945年1月间，袁水外出采购时，在延庆黑山寨不幸被捕。被定为"国事犯"，押入承德监狱，判无期徒刑。

敌人在延庆黑山寨街上首先抓住了他的小通讯员，进行拷打逼问。袁水暗中看到，不忍小通讯员受苦，便挺身而出，承认自己是八路军，解救了小通讯员。敌人把他抓起吊在大柁上冻了一宿，他在酷刑下拒不谈自己的真实名字和党的机密，并改名叫袁照东，只承认自己是八路军的伙夫，1月8日被押到承德监狱。

在狱中，袁水受尽酷刑，但他坚贞不屈。饿得把棉衣里的棉花套都扯出来吃了。他不甘心让敌人折磨死，同难友孙守立、金善福（丰滦密游击队长）秘密组织"炸狱"。因被"床头"（狱中犯人判刑较轻者，管本室犯人的小头目）告密，被敌人打得死去活来。以后他就装疯，敌人又用铁刷子刷他的脚心，看是否真疯。但他都挺住了，没向敌人屈服。

8月初，苏军到承德的前五六天，日军意识到自己即将倒台，想下毒手处理狱中犯人。看守犯人的日本人小木村，每天在磨战刀，准备把"国事犯"判无期徒刑的犯人都砍了。他还让犯人在监狱后边挖了几个大坑，准备埋犯人。袁水等见到这些在暗中议论，看来怎么也是死，反正不能让敌人顺顺当当地砍死埋在大坑里。正当人们商量怎样对付敌人的时候，苏军进了承德，把狱中3000多犯人解救出来。袁水被人抬出监狱，又换乘大车拉到滦平县兴州。袁水、孙守立、高品生等，沿途遇到警察、满洲军，就让难友们把他们带的武器收缴上来，交给地方八路军。袁水坐车到兴州后，听说滦

平县委秘书纪树明(1941 年袁水打火斗山车站时俘虏的路警,后参加我军)正在兴州,便找到他。纪派人用车把他送到窄岭家中。

袁水到家后,他的续妻已在回黑河川娘家避难时被地雷炸死;两个姑娘出嫁后,一个已死,身旁已无亲人。他全靠本家人伺候,请医吃药。袁水虽然重病在身,仍高兴地向乡亲们讲抗日斗争故事,勉励大家跟着共产党走,建设新中国。原先曾和他一起当保甲的刘德才(窄岭黑山嘴人)去看望他时,袁水嘱咐他说:"老四呀,你不能脚踩两只船,又想投八路军,又想靠国民党。依我看,应投靠共产党、八路军,以后的天下是共产党的"。伪满窄岭警察署长傅守印受县警务科长王兴诗的指令,也带着 4 个人去看望袁水(当时日寇刚投降,敌伪人员还没被接收),目的是看袁水回来是否有活动,另外想拉他给国民党干事。傅守印等在袁水家呆 2 个多小时,可是袁水连眼都没睁,理也没理他们。

袁水在病势危重、昏迷不醒的时候,仍不忘抗日杀敌。在昏迷中他曾喊到:"机枪开槽了!冲啊!"可惜的是,袁水出狱回家不到一个月,这位支持抗战到底的硬汉子在抗日刚刚胜利,还没享受到胜利后的欢笑的时候,便由于刑伤过重,与世长辞。在严酷的考验面前,袁水表现了对革命、对人民的无限忠诚。

花园口决口纪实

王果夫

抗日战争的第二年，1938 年 6 月上旬。为了阻止日本侵略军的西进，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命令三十九军新编第八师在郑州北郊花园口掘开黄河大堤，从而使豫、皖、苏 3 省 44 个县市遭受黄泛之苦达 8 年又 9 个月。灾情惨重，震惊中外。

我当时任国民党第一战区长官部参谋处后方勤务科上校参谋。在决口时，我在花园口现场负责监督决口的施工任务，亲身参与了这次决口事件。

1938 年春，国民党第一战区长官部由豫北获嘉县迁郑州后，即把郑州京汉铁路黄河大桥炸毁，以阻黄河以北的侵华日军南下。到 1938 年夏，日本侵略军攻陷徐州，又进攻开封，并企图继续进攻武汉。当时第一战区长官部所辖的部队不多，只有三十二军商震部、五十三军万福麟部，还有几个师。倘若敌人沿陇海铁路线西进，就会造成很大的威胁。在这种情况下，当时国民党政府军委会竟不顾人民的生命财产，决定在郑州附近花园口掘开黄河大堤，企图以此阻止日寇之西进。

1938 年 6 月间的一天，第一战区长官部参谋长晏勋甫和副参谋长张谞行给我下达命令："命令你率领五十三军万福麟部 1 个步兵团和三十二军商震部工兵营长蒋桂楷的 1 个工兵连，连夜赶到花园口掘开黄河大堤，以阻敌之西进。从明日算起，限 3 天内完成任务。长官部明日迁洛阳，你的施工任务听三十二军军长商震指挥。"

我于当日中午受领任务后，即同五十三军步兵团长（名字记不

清了)和三十三军工兵营长蒋桂楷研究,决定于当日下午冒着倾盆大雨出发,当夜赶到花园口。这一任务我虽然名义上是负责人,但蒋营长是我在河北军事政治学校时的工兵队中校队长,我是炮兵队的学生,尤其他还是个工程专家。因此,我对蒋是很尊重的。商震军长是我在河北军事政治学校时的校长,他是这一工程的指挥,所以我觉得完成这一任务是会很顺利的。

步兵团和工兵连是冒雨徒步出发的,我和蒋营长是乘拉爆破器材的大卡车出发的,一直到深夜才赶到花园口决堤工地。

施工第一天,晨 4 时半我们几个人——步兵团营长和工兵营长现场进行侦察,决定选在黄河向东北方转弯的南岸突出部位为施工地点。工兵连在中间挖一个 2 米宽、2 米高的洞;步兵团在洞的两侧各离洞 25 米远掘开 2 个口:上口 15 米、下口 12 米宽。施工时洞和掘口都要留 1.5 米以上的挡水墙,最后用炸药炸开挡水墙放水。昼夜施工。

这个施工计划,经各部队讨论同意,当日早饭后即开工。这天上午,郑州的专员和县长组织代表团到工地来慰问,并到掘口附近一些村庄发放款,每人发五元逃荒费,动员老百姓限 2 天内一律迁出去。下午,在大堤上即看到老百姓扶老携幼,大车小辆的向西逃难,一直延续到第 3 天上午才逃完。

施工进展很快。经过一昼夜的施工,第 2 天早晨估计土方已完成 2/5 多一点。按这个进度看,在限期内完工是有把握的。

就在这天上午,河南省主席兼三十二军军长商震由郑州到工地来视察,看了施工进度很满意,向连长以上的军官讲了话,并对全体官兵加以鼓励。

到第 3 天下午 3 时半,土方工程全部完成后,当即向商军长报告完工的情况,并接到商军长“立即放水!放水情况,随时报告”的指示。

在接到商震指示后,我们立即用电气发火,同时炸开全部挡水

墙水流很急，不一会就把岸外柳树冲倒了。忽然，洞被塌方堵塞，但由于两个掘口水势极猛，不多久就被冲开约百米宽的一个大口子，滔滔黄水，瞬即泛滥成灾。完成任务后，遂即向商军长报告了放水全部经过。

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程潜为我掘开黄河大堤请奖，后发给我一枚“忠勤勋章”，我一直把它保存了好多年。1949年，我到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华东军政大学教员研究班第三队学习时，把它交给组织了。

（作者为承德市政协常委，曾任国民党三十七集团军总司令部少将参谋。）

忆冀热辽部队挺进东北

李运昌

一、奉命出关　挺进东北

1945年8月8日，苏联政府对日宣战。次日，苏军150万人组成诸兵种合成部队，沿中苏、中蒙、中朝边境3500公里的战线，从东、北、西三面，向日本关东军70万人和伪军30万人发动了进攻。

8月9日，毛主席就苏联对日宣战发表声明，这个声明编入《毛泽东选集》时题为《对日寇的最后一战》，宣布我国抗日大反攻的到来。10日，朱总司令发布第一号命令，令各解放区部队、八路军、新四军、民兵、游击队向日伪举行大反攻，消灭日伪军、收复失地，积极配合苏军作战。11日，又发布第二号命令：令原东北军吕正操所部，由山西绥远现地向察哈尔、热河进发；原东北军张学思所部，由河北、察哈尔现地向热河、辽宁进发；原东北军万毅所部，由山东、河北现地向辽宁进发；现驻河北、热河、辽宁边境之李运昌所部，即日向辽宁、吉林进发。冀热辽区党委、军区接到命令后，于8月13日在丰润县大王庄召开了紧急会议，决定全力以赴坚决执行党中央交给的光荣任务：抽调8个团、1个营、2个支队1.3万余人和4个军分区司令员、4个地委书记兼政委及2500名地方干部挺进东北，并由我负责组成"东进工作委员会"。先由靠近东北、热河的第十四、十五、十六三个军分区部队组成第一梯队，由军区直接组成第二梯队，于8月中下旬分三路迅速进入东北、热河。这次会议还决定成立冀热辽区党委热河分委，由李子光任书记，领导热河党的工作，并成立热河行政公署，领导热河的政府工作。

会议确定冀热辽部队挺进东北、热河的任务是：配合苏联红军作战，消灭东北、热河的日伪武装及日伪汉奸势力；接管敌伪城市，建立人民政权；收缴敌伪武器、资财，扩大部队，为后续部队和干部进入东北开辟通道。西路十四分区和中路十五分区，配合苏军解放热河，东路十六分区和军区第二梯队，配合苏军解放辽宁、吉林。

苏军从 8 月 9 日发动攻势到 8 月底击败日本关东军主力，占领了东北各主要城市和铁路干线。但日军残余武装没有完全投降，广大中、小城市尚未解放，还有许多地方的日军在负隅顽抗。有的直到 9 月间还在抵抗。伪满军还有成团、成旅的武装，不但没有缴械投降，而且继续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在城市的伪满警宪，持枪挂刀为国民党党部及汉奸维持会站岗放哨，压迫人民。

西路军十四军分区第十三团、十六团一部和北进支队 2000 人，由司令员舒行、政委李子光、副政委黄文率领，8 月中旬从冀东平谷出发经兴隆向承德进军。在兴隆县争取了伪满热河军管区西南地区司令黄方刚率伪满国兵 4 个团、7 个讨伐大队和警队共 1 万余人起义，解放了兴隆、承德、滦平，进入承德与苏军会师。8 月 18 日，原在围场活动的北进支队王文所部，与由多伦南下之苏军会师，解放了围场、隆化等县城。

中路十五军分区部队第十一团、十七团 2800 人由司令员赵文进、地委书记宋诚率领，8 月 17 日经喜峰口向热河平泉、凌源、赤峰、朝阳进军。8 月 20 日在平泉与苏军会师，在平泉外围解除了伪满军一个旅的武装，接管了 8 座县城，俘敌伪人员 5000 余人。

东路第十六军分区部队第十二团、十八团、朝鲜支队、临抚昌支队约 4000 人，由曾克林、唐凯率领挺进东北，第一仗就攻打山海关。

二、与苏军会师 配合解放山海关

山海关是华北通往东北的咽喉。抗日战争时期，我冀热辽十六

分区的部队和人民就是在山海关周围进行抗战。日寇经常从这里出发向我根据地进行残酷的烧杀掳掠，使山海关及附近人民遭受了深重的苦难。

我军挺进到山海关时，城内有日伪军2000余人拒不投降，成了我军挺进东北的障碍。要攻克山海关，必须先打下山海关附近的外围据点。十六分区部队先打下了张各庄车站和樊各庄日军据点，又于8月20日打下山海关外围的重要据点海阳镇，28日打下柳江和石门寨煤矿。拔掉了山海关外围据点后，29日部队冒着倾盆大雨由九门口出关，经一夜行军，于30日上午迎着朝霞占领了山海关外的前所车站，解除了该站伪满军400余人的武装，切断了山海关至绥中的敌伪联系。我军经10天作战，扫清了山海关周围的日伪据点，使山海关成为一座孤城。这时，得知苏军从林西、赤峰方向经叶柏寿、凌源等地南下，向山海关方向前进。苏军由一位上校和一位少校营长伊凡诺夫率领约六七十人，带大炮3门，分乘汽车和吉普车，向我前所车站开来。这个消息使大家都很高兴。

在反法西斯战争中，中苏两国军队相隔千山万水，各自在东西两个战场上打击共同敌人，但从未见过面。现在两国军队要会师，这是多鼓舞人心的事情啊！8月30日上午，天气骄阳似火，中苏两支部队会师了。当苏军到来时，我临时抽调司号员组成"军乐队"，奏起"迎宾号"，部队排成四路纵队，呼口号、行军礼，两军领导人热情握手，亲切拥抱。中苏两军格外亲热。"斯大林万岁！""毛泽东万岁！""中苏友谊万岁！""中华民族解放万岁！""乌啦！乌啦"的欢呼声，此起彼伏，响彻群山。

在中苏两支部队会师后，我方向苏军介绍了情况：冀热辽是我八路军抗日根据地，8年来，我们在这里同日伪军进行了艰苦的作战。这次我们奉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的命令挺进东北，配合苏军作战，消灭日伪武装，收复东北失地。目前山海关还有日伪军2000人和日寇伪满驻该城的地方政府人员，没有缴械投降，希望苏军配

合，共同攻打山海关，消灭守城敌人。开始，苏军迟迟不表态，经我再三交涉，才同意配合我军攻打山海关。经中苏双方指挥员研究决定：攻打山海关由我军担任主攻任务，苏军以炮火配合，并决定 8 月 30 日 12 时以中国八路军司令官代表和苏联红军司令官代表的名义向山海关日军发出通牒，限令日伪军于本日下午 2 时，"率部于山海关南火车站无条件向中苏军队投降"。

通牒送出一小时后，日军一名中校带领一个班出城，与中苏代表谈判。苏军提出："限日军及伪军全部下午 2 时在火车站 200 米处集合投降，缴出全部武器。"日军指挥官借口北支派遣军司令官下村定大将奉有蒋介石命令，拒绝向中苏军队投降。苏军代表上尉副连长当即怒火冲天，连连对日军指挥官大骂，苏军战士端着转盘枪，吓得日军回头跑入城内，将城门关闭，敌人也登上城墙垛口，作战斗准备，顿时战斗气氛紧张起来。这时，我军部队已跑步到达山海关外不远的地方。我军指挥员和苏军当即决定攻城，以武力消灭守城敌人。

未攻城前，再次向守城敌军发出最后通牒，但日军守城司令官顽固不化，再一次拒绝投降。30 日下午 5 时，各部队部署就绪后，在统一命令下，由苏军首先向守城敌军开炮袭击。十二团、十八团从南北两翼同时向指定目标发起攻击。敌人也进行顽抗。经一个多小时的战斗，十八团由团长周家美指挥，首先夺取城内的制高点，将红旗插上"天下第一关"的城楼，掩护部队向城内突击。十二团在团长杨树元指挥下，首先夺取火车站，肃清敌人，尔后炸开城门，迅猛向城内敌人突击。守城部分日军见城内外制高点已全部被我控制，形势不利，弃城逃跑。伪军见日军溃逃，无心恋战，纷纷缴枪投降。余下的守城日军，曾妄想组织巷战抵抗，但在我军及苏军的猛烈攻击下，已形不成战斗力。有的缴枪投降，有的被我军击毙，有的则争相逃命。我十二团、十八团及苏军部队对未放下武器的敌人穷追猛打，不给喘息之机。经过三四个小时激战，至黄昏，除一部

分日军预先逃跑外，城内日伪军被我全部消灭。这次战斗共毙、伤、俘日伪军3000余人，缴获枪3000余支，轻重机枪70余挺，各种子弹近100万发及大批日伪军囤积的军用物资。

战略重镇山海关解放，是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和苏联红军共同战斗的结果。两军指战员万分高兴，共庆胜利，再次发出“斯大林乌啦！毛泽东乌啦！”的欢呼声。被奴役的山海关人民更是欣喜若狂。当夜，山海关各条街道张灯结彩、悬挂彩旗、燃放鞭炮、商店开业，欢庆解放。我军攻克山海关的胜利消息，很快在长城内外传开，振奋了根据地军民，并通过电台迅速传遍全国。

我十六军分区部队打开山海关以后，稍事休整和扩充，在曾克林、唐凯率领下，于9月4日乘火车进入锦州与苏军会师。这期间又消灭盘踞锦州地区伪满军两个旅及沿线伪宪警。然后由十八团组成锦州卫戍司令部，接管锦州市，控制了辽西战略要地。

三、进驻沈阳　肃清武装残敌

十六分区司令部接管锦州后，于9月5日率领十二团及朝鲜支队2000人，乘火车迅速进入东北最大城市——沈阳。我军突然出现在沈阳，影响很大，苏军感到意外，对我军来得这么迅速有怀疑。开始，不准我军下车。面对这一情况，曾克林和张化东、刘云鹤带着参谋人员到苏军沈阳司令部交涉。卫戍司令卡夫东见到曾克林就责问：“你们是什么军队？从哪里来？谁叫你们来的？”这意想不到的责问，很不礼貌，但曾克林仍心平气和地向他说：“我们是中国共产党的队伍，毛泽东、朱德领导的八路军，是坚持冀热辽地区抗日的部队，奉延安总部的命令到东北，配合苏军共同作战，解放东北，接管东北的。”卡夫东说：“根据雅尔塔协定和中苏条约，最高统帅部是不会同意你们进沈阳的。”这时曾克林也说：“你们有最高统帅部，我们也有最高统帅部。我们的最高统帅是毛泽东、朱德。我

们是奉他们的命令来沈阳的，要我们离开沈阳，需要有延安总部的命令。”卡夫东很生气，发了一顿脾气，仍不同意我们进驻沈阳，这次交涉无结果。曾克林回到火车上和唐凯研究了情况，大家一致认为，我们有中央二号命令作根据，一定要和苏军据理力争，排除万难也要进驻沈阳。曾克林等人第二次找卡夫东交涉，卡仍坚持不让下车，又无结果而回。直到 3 点，曾克林和唐凯第三次到苏军卫戍司令部。这次他们态度都很强硬。一见卡夫东，唐凯便伸出胳臂指着参加革命后在手臂上刺着的镰刀、斧头和五角星的标志连声说："共产党、毛泽东！共产党、毛泽东！”这时出来一个政治干部叫格拉辛科。此人态度和气，较老练。曾、唐两人向他们说："我们是共产党、毛泽东领导的八路军队伍，是执行朱德总司令的命令到东北配合你们共同作战的。我们在山海关已经和你们共同作战了，在锦州又和你们部队会师。冀热辽是我们的抗日根据地，我们长期在这里坚持抗日，你们不让我们来，让谁来？你们如果不相信，可以打电报问莫斯科。”他们听了这一席话，感到有道理，最后表示同意下车，但要驻距沈阳市 15 公里外的苏家屯去。尽管这样，与苏军三次交涉总算有了结果。

傍晚，部队接到下车的命令，2000 多人迅速集合得整整齐齐。干部、战士身着一身黄军服，战士每人一个钢盔，带着子弹盒，枪都上了刺刀，每连 9 挺机枪，队伍显得威武雄壮。

八路军到达沈阳的消息很快传开，成群结队的工人、学生、市民，纷纷涌上街头欢迎。广场和街道两旁聚满了人群。当部队排成 4 路纵队沿大街唱着“八路军进行曲”，“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歌曲行进时，沿途群众高呼口号："不当亡国奴！”“中华民族解放万岁！”这时，国民党军队一个坏家伙乘机捣乱，甩了一个手榴弹，炸伤了一个老百姓，群众一拥而上，当场将他打死。当人们看到自己的队伍行进在大街时，许多人流下了热泪。人们说："这下子好了，出头的日子到了！”

在队伍行进中，有成千上万的群众和队伍前呼后拥，并肩而行，像举行一次庆祝胜利解放的大游行。苏军有两辆装甲车为前导进行护送。当苏军看到这么多老百姓自发欢迎八路军时，非常震惊。苏军沈阳卫戍司令部马上改变原先态度，派了两名上校，坐着吉普车，前来追赶队伍。在途中拦住说："你们不要去苏家屯了，就住在市区故宫东面的小河沿。"于是，部队又迈着整齐的步伐，高唱着歌曲，走向小河沿驻地。许多群众夹道欢迎，直送到驻地，不愿离去。

9月6日，十六军分区司令部搬进原伪满沈阳市政府大楼，政治部搬进原日本宪兵司令部，部队仍驻小河沿。这样，我军力排万难，总算站住了脚。当天，苏军沈阳卫戍司令部政治副司令格拉辛科，派人来市府大楼找唐凯到苏军司令部会谈，气氛融洽。他们询问了我党我军的一些情况及党员在部队中的比例等等，唐凯一一作了回答。9月7日下午，苏军驻沈阳最高司令部，近卫军坦克第六集团军派来两名上校军官到市府大楼十六军分区司令部，通知曾克林、唐凯说："斯大林，莫洛托夫来了电报，你们确实是毛泽东、共产党的部队，请你们两位将军到司令部去。"

曾克林、唐凯到了苏军司令部。苏军后贝加尔方面军、坦克第六集团军司令克拉夫钦科上将和军事委员图马尼扬中将(即苏军驻沈阳的最高领导人)亲自会见曾克林、唐凯，双方进行了亲切的交谈。当时苏军驻沈阳的各军兵种负责人、军长、军事委员们均在座。

克拉夫钦科说："你们来沈阳，我们没有去车站欢迎你们，很对不起，这主要是中苏条约的限制。"

曾克林说："八年抗战，我们一直坚持在最前线，打击日本侵略者，冀热辽是我军战斗的地方。这次我们出关，与你们部队会师，配合作战，打开山海关的就是我们这支部队。"

唐凯补充说："正因为我们坚持了这个地区的斗争，所以才来

得这么快。”

曾、唐还向苏军讲了延安最高统帅部发表的第一、二号命令的精神。当唐念到为配合苏军有效地消灭日本关东军、伪满军收复东北现驻河北、热河、辽宁边境之李运昌部，即日向辽宁，吉林进发”时，克拉夫钦科、图马尼扬及各军负责人均非常高兴。

克拉夫钦科说：“我们不叫你们将军了，称你们为同志，我们是同志式的谈话。”

接着，对今后我军和苏军就如何配合，肃清各地敌伪武装势力，进一步进行了会谈。会谈后，我军成立了沈阳卫戍司令部、政治部。曾克林任司令，唐凯任政委，并发布安民告示。9 月 30 日，党中央正式下达命令，令进入东北的我军改用“东北人民自治军”番号。苏军也通知驻东北各地的部队，可以在各地自由活动，不受限制。从 9 月 7 日会谈后，苏军对我军的态度有了重大的变化，这对于后来我军继续挺进东北，开创东北的局面，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十六军分区部队进入沈阳后，得到很大发展，并一度接管和看守关东军在苏家屯的军火仓库，取出大批武器弹药，装备了部队。9 月 14 日，十六军分区部队即开赴南满，接管鞍山、辽阳、营口、抚顺、本溪等城市，并消灭了南满的日伪残余势力。我朝鲜支队参加了消灭通化日军 3000 人的战斗。盘踞辽阳的伪满军一个团，在伪满大臣于芷山的儿子于学谦指挥下，拒绝向我军投降。经过激烈战斗，将其全部消灭。从本溪逃入平顶山的日军残余千余人，在我驻本溪部队发出通牒后，仍拒绝投降，被我军第二十一旅及警卫部队围剿歼灭。仍在辽阳奉集堡机场的关东军林木航空大队(有飞机 20 余架)，在我军政治攻势下，向我投降。驻连山关、凤凰城的日军航空大队地勤人员向我投降，伪保安部队 1500 人，经我二十一旅包围，也放下了武器。

我冀热辽部队自 8 月中下旬进人热河、东北，至 11 月底，各部队经过战斗和发出通牒，共解除伪满军 3 个旅、2 个团，60 个县市

的伪满警察大队共约4万人的武装，以及日本关东军残余5000人，并在兴隆争取了伪满热河军管区西南地区司令黄方刚部万余人和青龙县伪讨伐队张金祥部2000人的投诚起义。

9月初，我率领前方指挥部和第二梯队5000人及大批地方干部出关，9月16日进入沈阳。苏军派300人到车站欢迎。

我十六军分区部队进入沈阳后，即与抗联冯仲云取得了联系。9月中旬，在长春的原东北抗联的领导人周保中亲来沈阳与我们建立了联系。与此同时，我军进入沈阳后，东北抗联同志利用广播电台，向全东北人民广播了冀热辽部队已到沈阳的消息，这既鼓舞了东北人民，也大大帮助了我们。关内解放区派到东北的地下工作人员和原在东北潜伏的地下党员，得到消息后，纷纷前来接关系，仅东北工作委员会系统就有10万余人。这些同志向我军提供了大量重要情报，对我军接管东北城市，建立人民政权，收集资财，肃清敌伪残余势力，扩大部队，起了不小作用。

四、东北局成立　多方开展工作

由于东北是重工业区，战略地位十分重要。蒋介石妄图从苏军手中和平接收东北。因此，国民党和我党争夺东北的斗争十分激烈。我们迫切需要了解中央的方针政策，及时得到中央的指示，但当时通讯技术落后，电讯不灵，不能达到目的。

恰好这时，驻长春的苏军总司令马利诺夫斯基元帅，也要与我中央联系。于是，9月14日苏军派代表卫斯别夫上校及翻译谢德明和曾克林一起乘飞机赴延安。在机场，受到杨尚昆、伍修权的迎接，并与彭真见了面。这时，毛主席和周恩来已去重庆和国民党谈判，中央工作由刘少奇主持。当日，少奇同志召开政治局会议，听取了曾克林关于冀热辽部队挺进东北，配合苏军作战及我军在东北工作情况的详细汇报。参加会议的有朱德、任弼时、陈云、彭真、张

闻天、彭德怀、叶剑英等同志。中央领导同志听取汇报时，不时提出问题，曾克林一一作了回答。听了汇报后，中央对冀热辽部队接到命令后，迅速挺进东北后所做的工作，表示满意。

中央听取了曾克林的汇报后，根据当时国内外形势和东北的情况，提出了“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方针，调遣大批主力部队和干部开赴东北，并于 14 日深夜(实际是 15 日凌晨)作出决定，成立以彭真、陈云、程子华、伍修权、林枫为委员，以彭真为书记的东北中央局，立即赴东北开展工作。

9 月 16 日，彭真、陈云、伍修权，叶季壮等，由曾克林陪同，乘飞机赴沈阳。由于天气不好，当天飞机在山海关着陆时出了点故障，叶季壮受了伤。中央领导同志在山海关休息一夜，于 17 日改乘火车前往沈阳。当晚，又在锦州听取了卫戍司令王珩、政委徐志的汇报。

9 月 18 日，东北局的同志平安到达沈阳。陈云在市府大楼向驻军干部讲话说：“你们搞得好，执行中央的命令坚决勇敢，先机占了东北，这对中国革命有很重要的作用，中央向你们慰问”并对今后的工作作了指示。当天晚上，彭真、陈云等住在原张作霖大帅府。19 日，在西楼召开了东北局第一次扩大会议。会议由彭真、陈云主持，伍修权、叶季壮、李运昌，朱其文、曾克林、唐凯、段子俊、刘达、段苏权等 20 余人参加。会上，彭真、陈云传达了中央的决定和战略方针，确定东北局的任务：力争控制全东北，组织部队接管城市，控制交通线，迎接党中央派往东北的大批干部和部队，粉碎国民党抢占东北的计划。并确定东北当局当前任务是立即收缴敌伪武器，加紧剿匪工作，严厉镇压汉奸和敌特分子；安定社会秩序，迅速恢复生产；发动群众，扩大人民武装，准备与国民党打仗；在接管的城市中摧毁伪政权，建立各级民主政府；在农村组织群众开展反奸反霸、减租减息斗争；大力宣传我党的方针政策，肃清国民党的影响。

会议之后，我将中共中央东北局已到沈阳事宜通知沈阳苏军

卫戍司令部，苏军立即报告莫斯科。

东北局到沈阳后，加强了对东北工作的领导，并报请中央，于10月30日批准正式成立东北人民自治军总司令部。林彪任总司令，彭真为政委，罗荣桓为第二政委，陈云、程子华为副政委，吕正操、李运昌、周保中、肖劲光为副司令，肖劲光兼参谋长，伍修权为第二参谋长。从此，东北党政军工作均有了强有力的领导。

根据中央的指示和东北局会议提出的任务，我冀热辽部队从多方面开展了工作。

（一）放手发展武装，迅猛扩大部队。为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部队急切要求扩大。

我冀热辽部队采取以老部队为基础，吸收新兵的方法，以连扩为营、团，团扩为旅。新兵大部分是矿工、工厂工人和有爱国思想的青年学生以及被俘人员和关内被抓到东北的劳工，同时也收编和加委了一部分伪满国兵和警察队。从8月到11月，我冀热辽出关部队迅速发展为12个旅（内有2个炮兵旅）、2个支队、10个独立团，约10万余人。此外，在热河、辽西发展地方武装1万余人。在扩军过程中，由于我们扩充部队的心情过急，对改编的伪军审查不严，对国民党"先八路后中央"的阴谋缺乏警惕，致使后来出现了部分部队叛变事件，牺牲了一些干部。这种情况，我们在东北局的正确领导下，通过整编，及时得到了纠正。

（二）镇压敌伪、汉奸、特务、国民党地下军，消灭政治土匪。当时，苏军只占领大城市和主要铁路线，许多中、小城市尚在敌伪之手，广大农村的敌伪势力还原封未动。残余的伪军宪警，被国民党加委，大部变为国民党地下军，形成政治土匪，到处抢劫民财，破坏财物。这些反动势力，对我威胁很大。根据东北局指示，我进入东北和热河的部队把剿匪作为接管东北的一项重要任务。从9月到11月，我冀热辽部队和已进入东北的兄弟部队互相配合，并在苏军支援下，剿灭了大量土匪。

盘踞在南满鞍山、海城、本溪、辽阳以及山区的股匪，约万余人，由大汉奸郑国庆统领，以千山为中心，散布于千山七岭子、山印子、白石子一带，经常控制南满铁路一段交通，对我威胁很大。11月，由曾克林组织二十一旅，二十三旅，在鞍山保安旅和苏军配合下，数路合围，经3天激战，占领该匪控制地区，毙匪官兵300余人，俘3000余人（内有日军1500人）、缴枪700支、轻重机枪23挺、机关炮3门，手枪50余支、子弹3万发、战马50匹、汽车40余辆。其余匪徒溃逃。

盘踞在抚顺山区的股匪2000余人。9月间，我二十一旅组织部队围歼，将其全部消灭，缴获所有枪支、弹药。

由奉吉路辉南、磐石一带进入长白山区顽抗的伪警察2000余人。11月间，由二十四旅马骥组织围剿。大部消灭，缴枪千余支及一批弹药。

盘踞在辽西阜新、黑山地区的国民党地下军和惯匪崔兴武、于海川、曹老五等几股土匪，约4000余人。9月底，由我驻锦州的二十二旅组织部队围剿，经数日追捕，除一部惯匪逃入内蒙古外，大部被歼灭，缴获枪支3000余支，子弹100万发及大批物资。

盘踞辽北榆林一带的伪警察千余人，在苏军配合下，由黑龙江支队围剿歼灭。

进入热河作战的十四、十五军分区部队，也积极进行了剿匪工作。热河二十五旅副旅长杨思禄、副政委郑维佳率部队剿灭北票、黑城子土匪400余人。二十四旅副旅长陈云中率部队与冀察军区钟辉琨部队配合，剿灭丰宁县大阁土匪5000人。

张苏率三十旅第二次剿灭阜新、彰武土匪千余人。

到1945年11月，辽宁、吉林、热河地区被我剿灭的政治土匪及国民党地下军约2万余人。

（三）摧毁伪政权，建立民主政府。我冀热辽部队前委到沈阳后，立即派李海涛、王化一、刘可天等率部到辽北白城子、齐齐哈尔

和四平街接管城市，发展部队。同时，成立了辽宁行政公署，朱其文任主任；成立沈阳市政府，由白希清、焦若愚任正、副市长；刘云鹤为鞍山市长；张士毅为辽西专员，王木林为通化专员，夏尚志为辽北专员，并建立了40多个市、县政府。进入热河的部队，顺利接管了热河全省地区。9月初即成立热河行政公署，李子光、杨雨民为正副主任，并于11月选举产生了以李运昌为主席，李子光、杨雨民为副主席的热河省人民政府，成立热东、热西、热中、热南、热北5个专员公署和承德、赤峰等20个市、县(旗)政府。

(四)收缴敌伪武器、物资、器材，装备和扩编部队。曾克林部进沈阳后，苏军曾一度将沈阳苏家屯日本关东军军火库交我军看管，我驻沈阳部队及时取出了一批武器装备了部队。以后，我军又在抚顺、本溪、辽阳、安东、锦州等中小城市搞到了一批军火物资，为装备新部队和出关部队创造了条件。

此外，我们还开展了宣传工作。尖兵剧社演出了《合流》、《地狱人间》，唤起和教育东北人民。我们还在锦州、本溪等地利用电台，宣传我党我军的政策，揭露蒋介石的丑恶面目，传播我党我军的声音。

五、整编部队　阻击国民党军的进攻

由于我军已先机控制了东北，国民党经外交途径接管东北的企图已失败。蒋介石决定依靠美帝国主义的直接援助，以武力抢占东北。10月，国民党军由美舰运送，陆续在秦皇岛登陆，开始向我军进攻。

中共中央和东北局识破了敌人的阴谋，及时部署军队以自卫战争阻击国民党的进攻。由于冀东、山海关、辽西、热河是华北通往东北的必经之地，葫芦岛、营口、秦皇岛是敌人登陆之处，战略地位十分重要，中央军委和东北局令我回锦州执行三项任务：(1)整编部队、准备作战，控制山海关和葫芦岛军港；(2)接运部队和干部继

续进入东北；(3)辽西党政军工作受东北局统一领导，听林、彭指挥。我10月由沈阳返回锦州后，立即组织十九旅、二十二旅和冀中的三十一团在山海关、葫芦岛构筑工事，准备还击进犯的国民党军，同时传达军委的命令：责成冀热辽军区副司令詹才芳组织冀东野战军，准备配合山海关和古北口作战。

这时在辽西的冀热辽部队2万余人，除3个老团4000人外，大部分是新兵，急需补充老部队作骨干，提高战斗力，适应作战需要。10月下旬，沙克、黄永胜、文年生带4个老团，共4700余人到达锦州。报经东北局批准，与冀热辽军区在辽西的新部队合编，以老部队为基础重新配备干部。在山海关战斗打响后，抓紧时机进行了合编。

11月，东北人民自治军总司令部为准备与国民党军作战，成立5个前线指挥部。其中，第三前线司令部，负责统一指挥由营口(不含营口)到叶柏寿之线的部队，我兼任司令和政委，黄永胜、文年生、沙克为副司令员，雷竞天为副政委，辛世修为参谋长。

此后，曾克林、唐凯在南满扩大的部队，和冀热辽军区在沈阳、齐齐哈尔、四平等的部队，全部交东北局直接领导，均按东北局指示，分别与山东由肖华带来的老部队进行了合编，增强了骨干，巩固了部队。

10月下旬，国民党军集中先遣部队十三军和五十二军7万人，从秦皇岛登陆(该港由美军防守)，先占我海阳镇。10月25日，开始向我山海关守军发起小规模进攻。此时，我守山海关部队为冀热辽第十九旅2个团和第二十二旅1个团。这一时期，美军飞机经常出动到山海关低空侦察威胁，有时多达数十架，并通牒我军撤离山海关。被我军拒绝后，即派出海军陆战队为国民党军打头阵。10月28日，美军数十人和国民党军官1人，分乘数辆汽车，向我山海关守军挑衅。在十九旅旅长张鹤鸣指挥下，我守军坚决予以痛击，击毁汽车1辆，打死美军1人，缴获吉普车一辆，俘美军4人、国民

党军官1人，其余美军狼狈逃回秦皇岛，3天未敢来犯。

从10月25日至11月25日，冀热辽部队与山东七师在山海关和辽西并肩作战一个月，打击了敌人。虽未保住山海关、锦州等地，但拖延了国民党军进入东北的时间，达到了接运干部、掩护部队进入东北的目的。至12月初，各老区部队及大批干部长途行军，经过冀热辽地区和海路先后到达东北，实现了中央派10万部队、2万干部进入东北的战略计划。这些部队和大批干部的到达，为创建巩固的东北根据地奠定了基础。

敌占锦州后，林彪率主力6万人撤至阜新、黑山、北镇一带，冀热辽部队撤至北票、朝阳、义县一带。12月中旬，按中央和东北局通知，我率热辽纵队返回热河，参加创建冀察热辽根据地。

从延安转战热河

郭洪德

一、奔赴热河

1945年8月,日寇投降的消息传来,延安一片欢腾,大家非常激动,人人兴高采烈。

根据党中央的指示,为加强对东北的领导,号召和动员广大干部到东北去,开辟东北的工作。

当时我正在中央党校四部学习,我妻子李秉同志刚刚从中央党校五部毕业,要求到延安市杨家湾小学校任教。我们听了传达和动员,心情十分激动,积极响应党中央的号召,首批向组织报了名,坚决要求到东北去,到敌后去,到最艰苦的地方去。报名后,中央组织部的同志考虑到我们的大孩子光明才3岁,二孩子光成才1岁,若母子长期分离,困难较大。所以,只批准了我去东北的要求,动员李秉同志留在延安,一面工作一面照看孩子。组织部的同志对李秉同志说:“到东北去,一路十分艰苦,再加上两个孩子需要照看。组织上决定你留下来。”她坚决要求去,向组织恳求说:“艰苦算什么,我从参加革命那天起,就作好了为革命献身的准备,连死都不怕,难道还怕艰苦吗?孩子确实需要照看,我也不愿意母子分离。但是,为了使东北千万个孩子生活得好,使东北人民再不受骨肉分离之苦,暂时离开孩子也是值得的。我想把3岁的大孩子寄放在边区政府托儿所,1岁的二孩子寄放在老乡家。我们去东北后,组织上会照看好孩子的。”经李秉再三恳求,中央组织部终于批准了她首批挺进东北。

1945年9月3日这天，我们集合在延安机场开动员大会，由中央领导和中央党校教育长张秀山同志在会上讲了话。他们讲的主要内容是我们挺进东北、接收东北和开辟东北工作的重大意义，同时也对大家提了些具体要求。开过动员大会后我们就出发了，带队的是张秀山同志。首批挺进东北的大约有一千二三百人，编成1个干部团，团下设3个大队，每个大队分3个中队。中央还派了2个团的部队护送我们。

队伍到张家口时已是深秋了。队伍没进城，在离城20里左右的一个地方住了两天。之后乘一辆拉煤的火车到达古北口。

一出古北口，我们看到的是一片惨景，老百姓缺吃少穿，个个骨瘦如柴，面无血色。不要说孩子穿不上衣服，就连十八九岁的大姑娘都没裤子穿。有的把树皮编成片片围在身上，有的把麻袋片围在身上。见到这种惨景，我们心中十分沉痛，更加仇恨日寇和伪满统治者。同时，也更加坚定了我们努力工作、尽快使人民群众脱离苦难生活的决心。10月下旬，我们到双塔山之后，直奔热河省省会承德市。因苏联红军还驻在承德，他们不让我们从西大街进城。所以，只好经元宝山奔牛圈子沟，最后到市内。住在南营子的一片红砖房子里（现附属医院）。

当时，虽然承德还十分贫困。但是，对我们这些延安来的"土包子"干部却处处感到新奇。自来水不会用，电灯不会使。幸好林肖硖同志小时曾在上海当过学徒，比我们见得多，就成了大家的老师，教同志们使用自来水，开、关电灯。在承德住下休整的日子里，我们听说东北的沈阳、长春、哈尔滨比承德城市大得多，所以大家都希望快点出发，尽快到这些地方开辟工作。可没几天，中央给冀热辽分局打来电报，让干部团留下部分干部开辟热河的工作。当时组织上决定干部团的三个大队各留一个中队。第三大队留下的是我们这个中队。热河省委请留下的同志吃了顿饭，而后分别同我们谈了话。虽然都愿意继续往东北走，但既然组织决定我们留下，我

们仍是老传统，二话没说，坚决服从，便留在了承德。我在抗日期间曾担任过延安市委组织部长，组织决定我任承德市委组织部长。李秉同志抗日期间曾担任延安市妇联副主任，组织决定她任承德市妇联副主任。我们是10月底到职的。那时，市政府的大牌子已经挂出去了。市长是郑旭，史立德同志任副市长，林肖硖同志任宣传部长，王国权同志兼任市委书记，王光远同志任副书记。后来，王国权同志调热东任地委书记，不再兼市委书记了，由田星云同志担任市委书记。市委机关开始设在原日本宪兵队的大楼，后来搬到二仙居旅店，之后又搬到承德旅馆，最后搬到离宫，一直到1946年8月我们从承德撤退为止。

二、开辟承德

1945年10月下旬，市委、市政府各办事机构及各人民团体逐步建立健全起来了，工作逐步走上了正轨。特别是1945年11月中旬，苏联红军撤出承德后，市委的工作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当时，市委除了整顿社会秩序，开展生产自救，解决人民群众生活问题外，还着重抓了以下几项工作：

1、清算斗争。发动群众对汉奸、特务的控诉复仇的清算运动，是当时发动群众的中心环节。通过这一运动，可以发挥群众的积极性，提高群众在社会上、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地位。在城市中发动群众，必须首先发动工人，使工人在清算汉奸、特务的运动中起先锋作用和领导作用。因此，市委把工作的重点放在发动群众开展清算复仇的运动上。为了充分发挥工人阶级的主力军作用，市委首先派出市总工会主席田志周等同志到承德火车站搞清算斗争的试点，发动群众清算斗争了伪站长。在他们取得经验后，市委在全市普遍推广了这个经验，逐步在全市范围内掀起了清算斗争的高潮。在清算斗争中，群众首先把斗争的矛头对准了配给店，用自己身受其害的事实控诉了配给店剥削人民的罪行。一些罪恶较大的配给店经

理被搞得名声狼藉，人民群众出了气。在农村的清算斗争中，还开展了减租减息活动。

随着运动的不断深入，市委因势利导，把群众的注意力从经济斗争逐步引导到政治斗争上来，进一步揭发控诉汉奸、特务、伪满官吏、土豪劣绅，清算他们的罪行。当时，我们发动群众斗争了伪省长、伪协和会长、伪县长、伪区长、义勇奉公队长及一些民愤较大的警察、宪兵、特务等，还处决了一些坏人。清算斗争取得了胜利。

2、组织建设。当时，市委、特别是市委组织部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配备干部和适当调整干部。那时干部来自几个方面，质量较强。日寇投降后，蒋介石妄图夺取抗战胜利果实。为了抢在国民党前面，根据中央指示，冀东区党委、晋察冀边区党委和延安分别向热河派遣了大量干部。特别是冀东，由于离热河近，所以冀东派出的干部来热河较早，这些干部对接收热河、维护热河的社会秩序、开辟热河的工作做出了重大贡献。后来，从晋察冀、延安相继来了大批干部。在干部的使用和安排上，由于冀东来的同志到的早，有的安排为正职，晋察冀和延安来的晚，一些同志虽然资历和水平较高也被安排为副职，有些同志对此有意见。市委根据这种情况，本着有利工作，增强团结的精神，决定对各区、局领导干部进行考核，适当予以调整。对于这项工作，罗瑞卿同志曾有个讲话。他说，先来的是正职，后来的是副职，这是客观条件造成的，要正确对待这个现实。除个别的调整外，一般的就不要变动了。根据这个精神，市委对大多数干部立足于培养、教育，留在现岗位上，在实践中锻炼、提高。另外，市委还吸收一批本地工人和进步的知识分子参加工作。如肖芳、丁振江等。这些人熟悉本地情况，在工作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市委采取了上述措施后，外来干部和本地干部，新干部和老干部，工农干部和知识分子干部之间的团结进一步增强，工作成效越来越明显。

当时，组织部门的另一项主要任务，就是发展党的组织。采取

的方针是积极而慎重地、秘密地个别发展党员。特别是注意从清算斗争运动中涌现出来的积极分子中，从工人、贫下中农、知识分子中把够党员条件的人发展入党，建立党的组织。我们回忆，至1946年8月，从承德撤出前，全市党员队伍已经发展到300多人，多数的街、村、工业部门、学校等都建立了党的基层组织。

那时，组织部门的另一项任务是加强各人民团体的组织建设。不仅市、区建立健全了工会、农会、妇联、青联、人民自卫队（民兵）组织，基层各企事业、各街、村也都相应地健全了这些组织，并发挥了很好的作用。

3、布置撤退。1946年1月，国民党把锦州、山海关、平泉占了。记得当时曾发生这么一件事：平泉县的一个电话员，正在给某领导机关打电话，电话刚接通，只汇报了一句"敌人来了"下面就无声音了。原来是敌人进了屋，电话中断了。从这以后，热河的形势越来越紧张，时常接到有关国民党进攻承德的情报。当时，如果我们集中力量，以武力保承德，承德是完全能保住的。但是，根据中央"诱敌深入，内线作战、不惜放弃一些城市和地区，争取主动。集中优势兵力，选择敌人薄弱或孤立的部分，在运动中予以各个歼灭，消灭敌人有生力量"的作战方针，决定暂时撤出承德。根据中央指示精神，当时市委准备把后方放在围场，冀热辽分局和省委、省政府放在赤峰。所以，市委的一些带孩子的女干部从8月中旬开始往围场撤。彭克、李秉等同志就是先撤到围场的。一些物资也都运往了围场。以后随着形势的变化，除围场外，市委还决定在兴隆设个点。市委、市政府原准备撤到围场，后接上级指示撤到了热南兴隆，市里一些干部也疏散到热南，由热南地委分配了工作。

撤退前，市委层层召开干部会、积极分子会和各界人士会，对党员进行个别谈话，向他们讲中央的决定、宣传撤退的意义。安排撤退时，在群众中进行了广泛的宣传，并向群众公开宣布，这次撤退是暂时的，是主动撤退，我们一定会回来的，以稳定局势、安定人

心。在动员撤退时，我们深入到各界知名人士和知识分子中，动员他们同我们一起撤退，动员一些进步知识分子，面貌“红”的党员和积极分子同我们一起走。对一些面貌不“红”的党员和积极分子，则有计划、有重点地把他们留下来，从事撤退后的地下党的工作。

撤退前，省委为坚持承德市的敌后斗争，决定成立承德工委。黄火青等省委领导同志同市委一起研究了工委领导成员的名单。当时考虑，郭耀臣同志来承德较早，不仅管过民政工作，而且还兼任市教育局局长，在各界知名人士，特别是知识分子中有较高的威望，所以决定他担任工委书记；郑起茂同志工作表现好，有经验，比较老练，来承德担任一区区委书记后，一区的各项工作突出，所以决定他任工委副书记；李洪青同志当时是市公安局一科科长，对公安系统秘密情报人员熟悉，对地下工作有一定经验，所以决定他为工委委员。为了便于开展工作，当时还决定给工委配备一个公保大队，其兵力约 1 个营，武器装备较好。政委是白皓，大队长是龚荣，工委也吸收他俩为成员。研究后，黄火青同志和我在南营子省委大楼找工委成员谈的话。正式成立工委，开始了工作。分局、省委、省政府、市委、市政府于 8 月 24 日前撤出了承德。

1946 年 8 月 24 日，田星云和我一起撤到兴隆，在兴隆大水泉一带打游击。敌人进攻时，由于档案携带不便，为使其不落入敌人手里，市委的一些档案就被烧掉了。

三、承德工委工作

当时全国的形势，发展也很快。蒋介石反动政府处在全国人民的包围中，形势要求我们迅速做好解放承德必要的准备工作。

1947 年七八月份，分局调我和郭耀臣同志到赤峰。当时，黄火青同志是分局副书记兼组织部长，谷云亭同志是组织部干部处处长，他俩同我谈的话，说组织决定调我到承德工委任书记。具体工作由分局城工部副部长李乐光同你们谈。在赤峰，我见到了史立

德、罗成德等同志。八月十五中秋节前后，李乐光同志找我和郭耀臣谈了话。谈话主要内容是：(1)分局决定充实承德工委的领导力量，我为书记，郭耀臣由书记改任副书记，郑起茂、李洪青同志任委员，同时增补部友民为委员，承德工委的隶属关系属冀东区党委直接领导；(2)抽调干部到承德工委去工作，抽调的对象是撤退前由市里分配到热南和热东的那批干部；(3)搞一部分武装，这部分武装由冀东区党委帮助解决，配合工委干部开展工作。李乐光当场把分局写给冀东李楚离同志的一封信交给我，让我找李楚离商量工作和武装问题。后来，我到遵化找到李楚离；(4)想办法同承德市里取得联系，一个是派进去，一个是拉出来，接上老关系，派遣新关系，了解市内国民党党、政、军、警、特的动态，并同冀东区党委城工部的万复直接联系；(5)与当地政府互相配合，协同作战，开展城工工作；(6)利用家属、亲友等争取瓦解敌军工作；(7)保护好承德市的水、电、交通、邮电等公共设施和文物古迹，不受敌人破坏，为解放承德市作准备。

我来承德工委前，工委已从热南调回了一些干部，工作已经初步开展起来了。我来后，调来的干部更多了，如邵世佐、李青山、张苹、齐占文、齐世铭、顾永清等一大批干部都是我们来以后调到工委工作的。工委的人多起来了，我们把这些人分成前后方。后方先是放在兴隆县半壁山的阎杖子，1948 年春节我们就是在阎杖子过的。前方主要活动在鞍匠、车河、柳河、柴河、白河。活动的中心是全宝河西的王庄。部友民同志经常住在王庄，负责工委的电台和秘书工作。工委干部常住在王庄南面的干沟子半山坡的一个姓宋的家里。当时生活条件十分艰苦，但工委总是要尽最大努力把市里来的同志招待好，给他们改善一下生活。为了便于开展工作，我们把工委干部划整为零，分成几批，分头进行活动。当时的主要工作是物色、发展、派遣新关系，与在市内从事地下工作的同志取得联系，了解摸清国民党十三军及国民党党、政、警、特的活动情况。当然，

还要配合当地政府开展些其他工作。

后方住的主要是女干部和后勤人员，如李秉、张瑞婷、吴桂珍，张苹等同志，还有石杏竹、李国良、郝顺兴等同志。李秉在后方主要任务是组织女干部学习，前方有紧急情报时与冀东区党委联系等。石杏竹、李国良等男同志经常从后方往前方运送所需要的一些粮食、物资等给养。这段工作开展得比较活跃，成绩比较明显。

1948年五六月，平泉解放前后，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解放军要在东北境内展开全面反攻。我们把大本营搬到了平泉县，住在平泉老杖子，工委负责同志除郑起茂以外都去了。郑起茂同志带领少数人继续留在承德铁路南坚持工作。这时，李洪青同志离开了工委，调到东北去了。工委的后方也搬到了宁城的八里罕。为配合当地政府工作，李秉同志还当了宁城县民政科副科长。由于平泉和承北县属于热中地委管辖，承德工委原属冀东区党委领导，这对开展工作有很大不便。为解决这个问题，我到宁城的平庄找冀热辽分局请示工委的归属问题。分局副书记黄火青和李乐光等同志听取了我的汇报后，决定承德工委隶属热中地委。为工作方便，同时决定我兼任热中地委城工部长，统一领导热中的城工工作。之后，我到王爷府向热中地委汇报了工作，接上了关系。当时，许多人把承德工委称为城工部，其来由也正是在这里。那时，热中地委书记是王孝慈，副书记兼组织部长是李望准、专员是强晓初。我回来后，工委分别到三沟、六沟、头沟开展工作。工委所属的南山部队也先后来到这里，南山部队副政委齐占文经常在三沟、六沟活动。承德工委来平泉后，继续抓了对市内的派遣工作，市内的同志出来汇报工作的也多了。部队还配合热中分区开展剿匪工作。

1948年六七月，我军准备打承德，把承德围困了，承德工委奉命作入城准备。为接收承德，热中地委还调给工委几十名干部，王成等同志就是这次来的。后来，上级出于新的战略考虑，决定不打承德了，部队奉命撤走。但这次围城对蒋军打击很大，士气越来越

低落，加上蒋军给养不足，所以，常常有士兵和下级军官甚至成群结伙地跑出城向我们投诚。为安置他们，工委搞了个蒋军官兵招待所，专门接待这些投诚的蒋军官兵。

1948年9月，分局办干部训练班，做好解放城市的准备工作。郭耀臣同志带队参加了学习。还未学完，我军打锦州，训练班也就不办了，他们回到了平泉。

为接收承德，工委办了1期训练班，训练班主要内容是组织大家学习进城的《约法八章》及党的城市工作政策。

1948年11月13日，我们进入了承德，住在小溪沟尹锡三的房子里，对承德实行了军管。之后，组建了市委、市政府。我任市委书记，郑起茂同志任市委组织部长，调张立文同志任市长，郭耀臣同志任副市长，穆嘉华同志任市公安局长，姚光同志任副局长，李秉同志任二区区委书记，后兼市妇联主任、市妇委书记。

（作者曾任中共陕西省纪检委副书记等职）

中共中央曾计划“迁都”承德

李海龙　李海健

抗日战争胜利后，党中央为了更好地领导全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夺取全国革命的胜利，曾计划离开延安，迁移到承德，把承德作为党中央所在地。

1945 年 9 月，党中央决定，由中央副秘书长李富春同志先行到承德，为党中央迁移承德做好各方面的准备工作。同时，把中央警备团分为两个团：中央警备团和先行中央警备团。先行中央警备团的兵力主要由两部分组成：一是从中央警备团抽调第二营的第五、六 2 个连和团机关的一部分干部近 300 人；另一是从中央社会部办的培养公安干部的西北公校抽调一个连，这个连 100 多人，都是干部；还配备了一部电台(台长、报务员、机要员、播机员共 6 人都配齐了)。中央军委任命吴烈为团长，西北公校副校长李逸民为团政委，樊学文为供给处主任，带领先行中央警备团随李富春同志到冀热辽地区的承德进行准备工作。

1945 年 10 月 1 日上午，朱总司令、刘少奇、任弼时、陈云、张闻天等中央领导同志和中央社会部的李克农副部长在枣园接见了先行中央警备团的全体同志。朱总司令讲了话：“抽出你们这些同志先行一步，到承德去给中央做安家准备工作，希望你们要发扬不怕疲劳，连续作战的优良作风，抢时间，争速度，克服困难，尽快到达目的地。”

10 月 2 日拂晓，延安宝塔山下，一支整齐的队伍出发了。

吴烈、李逸民率领着先行中央警备团以最快的速度行进，他们经清涧过绥德到达碛口，然后东渡黄河去三交，过临县到达兴县，

并在兴县休整了一日。这一段路由于他们是在老解放区行军，每到一地都受到当地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和热情款待。因此，行进速度比较快。

再往前走，就进入了新解放区。这里的敌情和地形他们都不熟悉，有的县城里还驻有国民党阎锡山的部队，敌人还在主要的道路上设了据点，铁路沿线也设有封锁区，这给部队的行进带来了一定的困难。为了避敌赶路，于是，他们决定放弃走大路，在晋西北的山路上穿行。他们经岢岚、五寨、神池，到达了离同蒲路不远的前寨村附近，隐蔽待机。

为了顺利穿过同蒲路，吴烈和李逸民商量，决定在夜里穿越同蒲路。同时规定凡能发生声响的东西一定要包装好，不能出声，每个人的左臂上要系上白毛巾，做夜间识别的标志。

夜色里，吴烈和李逸民率领着部队，悄悄地神速地出发了。只见一个个小白点首尾相连地向前蠕动着。眼看就要到达同蒲路了，突然传来一个命令："跑步前进！"于是，大家一个跟着一个向前急跑，两条闪着寒光向远方延伸的铁轨，在战士们的脚下很快闪过。

"继续跑步前进！"吴烈又下达了一个命令。

因为在这同蒲路的东面，还有几十里宽的敌战区。于是，战士们又是一阵急行军。拂晓前，进入了山区。

夜晚，吴烈接到了中央发来的急电，命令他们："星夜兼程，以最快的速度赶到承德。"

看完电报后，吴烈对李逸民说："看来情况有变化，我们还要加快行军的速度。"

李逸民说："党中央发电报给我们，可能有新情况，就按你的意见办，抓紧时间，赶往承德。"

于是，他们加快了行军的速度，一个晚上和一个大半天走了160里，于第二天下午到达了广武镇附近，接着翻过一座大山，出雁门关经浑源、阳原县到天镇，然后由天镇坐火车到了张家口。在

这里，他们受到了晋察冀中央局秘书长姚依林同志的热情接待，并给他们补充了给养和物资，还批给了他们一些蒙疆票子（当时这一带都使用这种伪满票子）作路费。接着，他们随罗瑞卿同志乘火车到达怀来休整一日。第二天清晨，他们便由怀来经延庆、四海、汤河口、鞍匠、滦河，顺利到达了承德。

到承德后，吴烈他们才知道党中央让他们"星夜兼程，以最快的速度赶到承德"的原因。原来是蒋介石勾结美帝国主义，利用美国的飞机和军舰正向东北运送军队，妄图占领交通要道和城市，抢占抗战胜利果实。东北形势发生的急剧变化，对我军十分不利，内战随时都有爆发的可能。党中央和毛主席根据这一变化了的情况，果断决定改变原计划，不再迁移承德了。中央还决定，李富春同志到东北西满中央分局任书记。同时电令吴烈，中央警备团就地隶属冀热辽中央分局书记兼司令员、政委程子华同志指挥，将电台和工作人员交给中央分局。

这样，承德非常遗憾地失去了作为中央所在地的机会。

（本文是作者根据吴烈将军的回忆整理出来的，吴烈将军在抗日战争时期，曾任中央警卫教导大队大队长，中央警备团团长、政委兼延安地区卫戍司令员。解放后，一直从事保卫党中央和国家领导人的工作。）

在热东军分区

吴 烈

解放战争时期，我曾在冀热辽军区热东军分区任副司令员半年多时间。这在我生命的长河中虽然是短暂的，然而，在这段时间里所亲身经历的一切，将永远留在我的记忆里。人到暮年，一股强烈的责任感，促使我把这段历史写出来，记下当时的情景。

1945 年 8 月，日本侵略者宣告无条件投降后，党中央曾计划离开延安，迁移到承德，把承德作为党中央所在地。并决定，组成先行中央警备团，任命我为团长，西北公校副校长李逸民为团政委，带领先行中央警备团，随中央副秘书长李富春到冀热辽承德地区，为党中央作安家准备。

1945 年 10 月 2 日拂晓，我们从延安出发，经过一个多月的长途跋涉，冲破敌人封锁，克服种种困难，不怕疲劳，连续行军，于 1945 年 11 人中旬顺利到达了承德。

我们到达承德后，东北形势已发生了急剧变化。蒋介石勾结美帝国主义，正向东北派兵遣将，运送他的反动军队，抢占交通要道。党中央和毛主席根据这一变化了的情况，果断决定改变原定计划，党中央不迁往承德了。中央电令我们团就地隶属冀热辽中央分局书记兼军区司令员、政委程子华指挥。

1945 年 11 月，冀热辽军区任命我为热东军分区副司令员、军分区常委、地委委员，樊学文任军分区副政委，李逸民调到冀热辽军区政治部任宣传部长。

我们中央警备团的其他干部战士，有的干部留在了军区，有的分配到地委、专署和各县县委工作。平泉、凌源、朝阳每县留一个

排，由一部分干部分别带领，负责改编和组建3个县支队。

当时，热东军分区住朝阳县城，司令员是刘兴隆，政委段德彰。我热东军分区的主要任务是：发动群众，筹粮筹款，扩大县支队，清剿残匪，建立地方政权和党的各级组织，开展对敌斗争，利用有利时机打击敌人，配合主力部队作战。

我到了朝阳以后，由于当地土匪猖獗，司令员刘兴隆带领独立团和警卫营的一个连，到朝阳以南羊山一带剿匪去了。朝阳县城兵力只有一个县支队，警卫营的两个连和一个侦察通信连。

蒋介石为保其战略通道北宁线，无视国共双方签订的停战令，以承德为主要目标，于1946年1月调其国民党十三军的四师、五十四师和五十二军的二师、一九五师兵分三路向热河解放区大举进犯。一路由绥中经建昌向凌源，平泉，承德进犯；一路由锦州进犯朝阳、叶柏寿、赤峰；一路由锦州进犯义县、北票。

当我们得知敌人由锦州向朝阳进攻时，敌离我们仅有几十里路了。在我们前面又无其他兄弟部队，只有我们军分区的一个侦察排在朝阳前面侦察警戒。地委、专署和军分区机关及全部物资都在朝阳。朝阳县支队见敌来势凶猛，加之内部有坏人挑拨离间，大部分叛变了。当时情况异常严重，我们的处境非常危险，警卫营的两个连在城里同叛变的朝阳县支队打了一阵。大敌当前，不能久战，我们即决定撤出朝阳城，将机关人员和物资集中到朝阳火车站，准备向叶柏寿方向转移。我们一面派出侦察分队侦察敌人向我进攻的情况，军分区警卫营立即在朝阳火车站构筑工事，作好战斗准备；一面派人准备好了一个火车头，找来司机，挂上几节车厢。当时机车上没有煤烧，只好烧车站上存放的枕木。我组织地委、专署、军分区机关人员和家属孩子300多人和警卫营两个连及侦察通信连上了火车。

这时，敌人凶猛地向朝阳火车站打炮，叛变投敌的朝阳县支队也向我们开枪。敌人的炮弹打到我们火车上，车厢里的棉花、布匹

都烧着了。火车刚向叶柏寿方向开动，机车和车厢就脱钩了，车厢不时向后滑退。我赶紧组织大家往车厢下边塞石头，以防车厢继续向后滑回朝阳车站。我们发现司机是坏人，就立即让侦察科长曾绍东、警卫班长王来音用手枪逼着司机去挂车厢。当时有人对我说："咱们是不是下车边打边走呀？"我说："敌人离我们这么近了，只有把车厢挂上，开着火车向叶柏寿方向走，才能摆脱敌人，现在是不能下车的。如果我们走不了，就和敌人拚一场，在火车上同敌人战斗到底。"

敌人离我们越来越近了，土匪骑兵向我们火车迂回过来，我们600多人的生命安全受到严重威胁。恰在这时，挂上了车厢，火车开动，边走边打。敌人占领了朝阳，我们撤到了朝阳以西的大平房车站。这个火车站较小，有两三间房子，两股火车道，为了加水，火车停了一下。来到这里，已听不到敌人的枪声了，我这才松了一口气。大家的心情非常激动，都说好险呀，要不是有这辆火车，我们很可能撤不出来了。

火车在大平房车站加上水后，当晚开到了叶柏寿。第二天，我们到了凌源。

敌人占领朝阳后，即向凌源进逼。为了阻止敌军进犯，我们组织小部队抓住时机出其不意，破袭朝阳至凌源间铁路。在破路中，我们开始是夜间破路，后来，把破路部队分成若干个小分队，不分昼夜轮流进行。时间不长，我们就把公营子至波罗赤和叶柏寿至凌源之间路段的大部桥梁、隧道炸毁，截断了敌军的运输线。

1946年1月，国民党十三军、九十三军由朝阳进占凌源。我们即由凌源撤到山嘴子、三家子、汤道河、要路沟一带，发动群众，搞土改，剿土匪，筹粮筹款，扩军备战，同敌人开展了游击战争。并于1946年3月间，配合热河主力部队在平泉椁椤树地区，进行了围歼国民党九十四军第五师的战斗，狠狠打击了敌人。

（作者曾任北京卫戍区司令员）

热河工作片断

孙玉林

一、参加地下党

我原籍内蒙古乌兰浩特，幼年随父来到热河滦平，1942 年 5 月到伪满第五军管区三十三团当国兵，不久被调到陆军二十五旅（驻赤峰）无线电台。这个电台的台长是个日本人，此外还有三个技师，只有我和另一名是士兵。1945 年年初，我又被调到军管区通讯队，仍做报务工作。调到电台后，尽管我们搞的是密码通讯，但在没人时，也常常偷听延安电台的广播。从偷听的广播中，我受到很大教育，打心眼里崇敬共产党，佩服八路军，觉得共产党的政治主张正确，说的话、办的事在理，特别是在国难当头之际，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深得人心。觉得共产党、八路军才是国家的希望，真正的抗日英雄。为此，我逐渐地厌恶那为虎作伥，甘当日寇帮凶的满洲军队，总想尽快地扒下那身黄皮，脱离这个肮脏的地方。所以，我调回承德不久，于 1945 年 5 月就退伍来到承德电报局。

我来到电报局后，因我住的单身宿舍与在承德放送局工作的卢敏政住的单身宿舍在一个院子里，所以与卢敏政有了接触。在接触中，我觉得卢敏政性格内向，很有思想，而且知道的东西很多，讲起话来很有条理，看问题有独到之处。为此，我从心眼里佩服他，愿和他交朋友、谈心。接触多了也就熟悉了，信赖了，所以我就经常把我偷听电台得到的消息讲给卢敏政听，他也常常给我些进步书籍看，如鲁迅著作等。鼓励我报效祖国，多为人民做好事。后来，他直截了当地让我谈对共产党的认识。我说，共产党好。同时，我还向

他表达了找党、参加革命的愿望。不久，他来到了我的宿舍，一看屋里没有其他人，就从衣兜里掏出张表。按表的内容，他问我答，由他执笔填写。这张表就类似现在的入党志愿书，不过比现在的入党志愿书简单得多。大约8月中旬，卢敏政又来到我宿舍，约我出来遛达遛达。我们走到旱河沿，一看左右无人，他就严肃地对我说，组织上正式接受你为共产党候补党员，候补期为3个月。希望你遵守党的章程，努力为党工作，为维护党的利益不惜牺牲自己的一切。这次谈话，他还给我布置了四项任务：一是宣传教育团结周围群众；二是了解群众的呼声和动态；三是争取进步青年，动员他们参军参战，反满抗日；四是调查了解汉奸特务的罪行，掌握他们的动态，同时他还规定，我由他单线领导，不和其他同志发生横的联系，让我严格遵守党的秘密工作原则。接受任务后，我曾跑到滦平，动员和我一起当国兵的朋友吴德生及一位姓牛的士兵弃暗投明，但没等工作做成功，日寇就投降了，吴德生等也就与我失去了联系。对于日伪动向，我在人党前后一直密切关注并随时向卢敏政汇报。例如，1945年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的当天，电报局的那位日本人局长就召集职员大会，他站在一个凳子上，很动感情地说，苏联不法开炮，战事紧张，我们就要撤到长春去了。接着他还胡说什么，这个电报局不论到什么时候都是大满洲帝国的。会后，我把这个消息汇报给卢敏政，这恐怕是我们获得日寇即将灭亡的最先消息吧！

1945年8月19日，苏联红军进了承德，承德人民首次获得解放，承德解放最初那段，尽管成立了“八路军临时办事处”，接着冀东派郑旭、林彩等人来承德接收。但我们地下党仍处在地下，没有公开暴露身份，继续秘密从事工作。日寇投降后，我们开过一次支部会。原来，在“三友公司”做职员工作的王锡民竟是我们这个地下党的支部书记，王锡民是1943年受党的派遣来承德开辟工作的。他在承德市首次建了地下党支部，这个支部到日寇投降时，已发展了10来名党员。

郑旭同志来了后，八路军办事处的工作开展得更加活跃了。还枪毙了民愤极大的伪警察傅小个子。我记得，在枪毙傅小个子之前，林彩同志还专门找傅小个子谈过话，并就此事撰文刊在《中苏新报》上。

二、在热河省委

1945年9月中旬，晋察冀派王国权、丁武夫等同志来承德。王国权同志来承德后，王锡民与王国权同志接上了组织关系。从此，地下党转为公开。不久，王锡民同志被任命为承德市二区委书记。10月初，王锡民同志让我到南营子那个小楼报到，说组织上要正式分配我的工作。他还给我写了封介绍信(一个折叠起来的便条)。我到南营子那个小楼前一看，人们出出进进，一派繁忙景象。我来到小楼前，一位警卫战士看了介绍信后，立即进楼通报，不大一会儿，从楼里出来一位30左右岁的女同志，她穿着一身合体的军装，显得潇洒干练。原来她就是省委组织部负责干部工作的常玉林同志。她把我带到办公室，简单地问了我几句后，亲切地对我说，你当会计怎样？我说，这项工作我没干过，不过，组织上让我干，我就试试，尽力干好。我表态之后，常玉林派人请来一位姓崔的同志，让崔同志把我领走。我和老崔来到省委秘书处会计室。这个会计室有两张桌子，老崔和我各用一张。他负总责，就像现在的主管会计，我记流水帐，好似现在的现金出纳。但我们的工作都比主管会计和现金出纳多得多。就拿我来说吧，征粮、验收支前物品，领取和发放生活必须品和办公用品等也都要管。老崔就更忙了，他负责省委机关经费的预决算，计划做出后，还要亲自筹款。

尽管我们的工作很多，忙得我们常常打通宵，但我的心情十分舒畅，我感到这里的人与人是一种崭新的关系，领导与被领导，同志与同志，和睦相处，情同手足。这里没有压迫，没有欺骗，没有勾心斗角、尔虞我诈。我生活在这里，感到浑身温暖。在这里，我也学

到了做人的规范。我在受教育、受鼓励。在学习，在进步。当我给大家发鞋子、被服时，同志们不仅不挑不拣，大点小点都不在乎，而且许多同志一看自己原来的还能用，就主动地把新的退给我。我印象最深的一次是：胡锡奎同志来到我的办公室，我刚要起立，胡锡奎同志就亲切地拍着我的肩让我坐下，而后他对我说，现在经费很紧张，我手里还有 20 元关金券，给你们做经费用吧。我谢绝，让他做零用，他说，我留这么多钱干什么，什么时间用什么时间再领吧。硬是把钱留给我。我拿着这 20 元钱，心里直翻腾，这就是我们的省委书记啊！真是令人感慨万千呀！当时，和我经常打交道的有个管理员叫李振江，他年岁大，是个老八路，但跟我们这些"娃娃"打交道时从不摆架子，什么事都和我们一起商量着办，对我们的意见很尊重。还有位饲养员，资格也很老，因在部队上负伤，转到地方上给省委领导喂马。这个老同志毫无怨言，工作兢兢业业，每天夜里都起来几遍，把马喂得很好，受到大家的好评。省委领导李德仲，职位高、资格老，但他的爱人却始终负责刻钢板。这项工作又苦又累，而且默默无闻，李德仲同志不仅不利用职权为爱人谋个好位子，而且对他爱人的工作要求很严格，李德仲的爱人也始终埋头苦干，平易近人，没有一点夫贵妻荣的影子。

在生活上，尽管省委领导吃小灶，但也没什么特殊好吃的。省委领导常常开会、工作到深夜，甚至忙得通宵达旦，我们都为领导的身体担心。炊事员想把夜餐的水平提高点，多弄点，领导坚决不同意。没办法，炊事员只得照常做些小米粥，弄些咸菜丝给领导当夜餐。1945 年初冬，天气冷了，但因燃料紧张，机关办公室还都没取上暖。分局书记程子华同志在战争中手负过伤，留下残疾，怕着凉，工作人员给他弄个小电炉子放在办公桌上。程政委说，现在电这么紧张，还不如把电节省下来干点别的。

当时，组织上对干部教育抓得很紧。为了教育干部，曾排演了京剧《李闯王》。在这出戏开演前，李德仲同志专门讲了话，告诫我

们，不要走李自成的路，进城后更不要脱离群众。此外，省委还定期组织干部听报告。程子华政委，胡锡奎书记经常为干部作形势报告。省委宣传部柴木同志经常给大家上课，组织干部学习理论。

我到省委工作后，感到这个革命大家庭里，同志们不仅生活上互相关心，而且在政治上互相关怀。1945 年 11 月，我的 3 个月候补期满，支部书记常玉林同志及时召开了支部大会，讨论我的党员转正问题。在讨论会上，常玉林同志详细介绍了我的思想、工作表现，对我提出了殷切的希望。其他党员同志也是语重心长，讲得我心里热乎乎的。

在省委工作那段，给我留下另一个最深的印象是工作讲效率。那时，工作效率高得很，大家说干就干，工作上不扯皮，不互相推诿，不搞文牍主义，没那么多繁琐手续。就拿破铁路这件事来说吧，省委领导韩纯德同志在条子上写了“立即破路，阻止敌人前进”这么几个字，下面就马上行动起来了。

三、热北工作团

1946 年 6 月 26 日，国民党撕毁停战协议，大举向我各个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那时，承德的形势也很紧张，不断有敌机来侦察。热河省委根据中央关于“让开大路，占领两厢”的指示精神，把工作重点放在发动广大农民群众，创建巩固的东北根据地上，号召广大干部“跑出城市，丢掉汽车、脱下皮鞋，换上农民装”到农村去，并决定以党政干部和军政干校的学员为主，组成工作团，分赴热北、热南、热西等几个地委。我和其他同志一样，积极响应省委号召，要求到基层去，到最艰苦的地方去。组织上批准了我的请求，把我分到热北工作团。我们这个热北工作团大约 20 多人，带队的是省委组织部干部科长秦纯一，我在这个工作团仍负责财务后勤工作，管理全团经费。这个工作团的主要任务就是发动群众，反奸除霸，扩军，创建和巩固热北根据地。大约 7 月初，我们一行从承德乘两辆马车

出发，经围场、过赤峰，最后到达热北地委所在地林东。从承德出发时，省委还派了个骑兵排护送我们，所以，我们一路上没什么大的麻烦。当时，热北形势十分复杂，原蒙古族一个大牧主贺子章拉起队伍，手下有不少人，在林东很有势力。这支队伍号称东蒙自治军第四师，贺子章自称师长。此外，这里还有多股土匪，活动也十分猖獗。

我们到林东的第二天晚上，热北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权星垣同志来到工作团住地看望了我们。权政委说，热北很缺干部，地委非常欢迎你们来。当时，秦纯一还特地把我介绍给权政委，说我在承德参加的地下党，搞过地下工作。在那次会见时，权政委给我们讲了热北的形势。他指示我们，要认真执行党的统战政策，正确地处理民族关系。并告诉我们，地委决定，为了避免与何子章发生正面冲突，以便争取他、团结他，把他的队伍改造过来。所以，除奸反霸工作先在汉人居住区开展。根据地委的指示，我们首先在林东附近的二区开展了清算斗争，发动群众斗地主，分土地和牲畜，并在这里建立了党的基层组织，我记得我还发展了一名姓徐的同志入了党。

1946 年冬，林东重新划区时，我正式被派到六区(即小城子区)任财粮。当时，我们这个区的工作开展得十分活跃。汉人居住区的工作开展起来后，势必影响蒙民居住区，所以，在蒙民居住区里，一些年轻的蒙民自动起来斗争了牧主。蒙民居住区的工作开展起来时，贺子章的队伍经过我党的工作，已被改造过来，编为蒙汉联军，权政委兼这支队伍的政委，何子章任司令员，副司令员是那顺双和尔，这个人作战英勇，在热北剿匪中立了不少战功，后被吸收入党。

(王继明整理)

我所知道的热河行署

张一宇

1945 年 8 月 10 日，我随杨雨民等率领的干部队，从驻在阜平的中共中央分局出发，出喜峰口，10 月初来到热河省平泉县。在这里见到了宋诚、王新华等领导。先期来到这里的一些同志先后被分配到热河省内一些地、县工作。如周治国去热东工委，李继昌去赤峰县政府，史奋去热东行署，赵从去承德县，阎存林去平泉农会，许治华去赤峰县等等。我和田惠、郄凤桐、潘文祥、李珍等跟随杨雨民到承德市，参加筹建热河行署的工作。

热河行署设在伪热河省公署旧址，即后来所说的“省府大院”。筹建工作是以抗日根据地过来的老同志为骨干，留用了一批伪政府的工作人员。行署主任李子光，是抗日时期的地委书记，副主任杨雨民，曾任过县委书记、区队政委（黄云）等职务。刘锡三、甘重斗、王奂如、仇友文、阎顾行、叶田等一批老同志，分管民政、财政、教育、实业、公安等工作，还有少数科级以下的干部和公安警卫人员。伪热河省公署的科以下的人员，都被留用下来暂任原职。这就搭起了一个领导机关的架子，准备逐步充实骨干，开展工作。

行署没有秘书长，只设个秘书处，处长人选还未定下来。机关的日常行政事务工作，由我（任秘书）和张健光（管理科长）负责。当时我新入党，没有基层工作经验，张健光虽有基层工作经验，但党的关系尚未恢复。因此，许多行政事务工作，都是在杨雨民同志亲自指挥下进行的。

当时的行署秘书处，除协助行署领导负责内外联系、文书往来、管理敌伪档案和物资备品以外，还着重抓了几百人的生活服务

工作。当时因为我们沿用了供给制的办法，所以对所有人员包括留用人员的吃、穿、住都一律包下来。吃饭要分大、中、小灶。在条件十分困难的情况下，我们努力工作，尽力保证供应。除了吃的，穿的也是个大问题。为解决行署机关全体人员及公安大队冬装问题，行署领导曾派我去锦州联系采购。经过一段工作，冬装刚有个着落。11 月下旬，蒋军突然发起进攻，要占领锦州，我便匆忙地将服装运回承德，基本上完成了任务。

建立热河行署，目的是为了建立热河省级政权，进行初步的组织准备。这时上级党不断从各抗日根据地选派干部来热河，充实了行署机关，党员骨干力量逐步加强，成为团结、教育留用人员，改造旧机关的重要力量。经过一个多月的筹备工作，从省内各地(市)、县推选出人民代表，11 月中旬召开热河省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热河省人民政府委员会。选出李运昌为热河省人民政府主席(当时他正在前线指挥作战，未能出席会议)，李子光，杨雨民为副主席。李六如被任命为省政府秘书长，李冠慈为副秘书长，下设秘书处、民政、财政、实业、教育、公安各厅及省公安大队，任命了一批厅长、副厅长，包括一批支持我们开展抗日斗争的上层人物在内，形成了一个统一战线的行政领导机关，这是冀热辽区选的第一个省级人民政权。

随着热河省人民政府的诞生，热河行署经过一个多月的工作，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遂即宣告撤销。

接收承德

郑　旭

抗日战争后期，我在遵化县任县长。1945年8月15日，抗日战争胜利结束时，冀热辽区党委遵照党中央的指示和八路军延安总部的命令，开始向东北和热河派遣部队和干部，接受日伪投降，接管这些地区，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8月16日，区党委命我带人去承德组建热西办事处，统一领导滦平、隆化、丰宁、围场和承德市的斗争。当时，正赶上连阴天，不断下雨，滦河水上涨得很厉害，不好过河。我决定派林杰、范儒先行，从冀东直奔承德。我带3个人取道平泉，而后进承德。8月下旬我们赶到平泉时，平泉已被苏联红军攻占。苏联红军听说我们是八路军，对我们非常友好，还列队夹道欢迎我们。8月底，林杰、范儒两同志和承德八路军办事处的张建光等带着马匹来平泉，把我们接到了承德。原来，苏联红军已于8月19日占领了承德，并释放了伪满承德监狱的在押人员。8月20日左右，我八路军在押人员出狱后，为安置难友，维护承德社会秩序，经与苏联红军协商，组织起八路军办事处。八路军办事处民主选举李钦超为主任，李佐民为组织委员，张建光为宣传委员，刘权为军事委员。当时还招收了一支300来人的队伍，刘权兼任连长。后来，这支武装编入我解放军正规部队。

我们到承德后，首先向八路军办事处人员传达了区党委的指示，把八路军办事处合并到热西办事处。热西办事处设在南营子兴亚会馆（俗称棺材楼）。由于苏联红军承认并支持八路军办事处，热西办事处对外仍称八路军办事处，挂八路军办事处的牌子。热西办事处成立后，李钦超同志领我见苏联红军驻承德卫戍区司令部的

欧罗硕夫中校。从此，我们开始了公开活动。不久，黄文、李越之同志来承，热西办事处改为热西工委。黄文同志任书记，李越之同志任副书记，我任主任。黄文来时，带了八路军一个连，使苏联红军感到为难。他们以和国民党有外交关系为理由，不同意我们的正常活动，甚至把上街搞宣传的常玉林、张敬宽二位女同志扣在离宫一天。为此，我开始和苏联红军交涉，结果是把南营子、石洞子沟一带划为我八路军活动区，苏联红军从这片撤出。我热西工委除在市内开展一些活动外，重点抓了各县工作，先后向滦平、隆化、丰宁、围场派了县委书记和县长，使这几个县迅速发展了党的组织，建立了人民政权。

当时的苏联红军和我们是友好的，对我们是支持的。我们没衣服穿，一个大尉把他们接收日寇的仓库打开，给我们一些布匹。但他们也限制、干涉我们的行动，使我们的接收工作不能顺利开展。我们来承德前，伪满政权已摇身一变，改为地方维持会，照样发号施令，履行政府职权。群众意见很大。我们来承后，准备接管维持会。苏联红军不同意。最后，为防止维持会继续作恶，我方只得以维持会顾问的名义派王奂如同志到维持会工作。直到苏联红军从承德撤出后，我们才正式接收了伪满政权。还有一天，我们抓了两个特务，根据群众要求，把特务游街示众，苏联红军也向我们提出指责。

大约在 9 月中旬，开始修建苏联红军烈士纪念碑。一天，苏联红军驻承德司令部的一个军官，带着一个翻译来热西办事处找我，用汉语给我念了一下他们用俄文起草的一个文件。主要意思是建纪念碑需要离宫楠木殿的大理石地板；大理石地板起掉后，改为水泥地板，要我签字。当时，我不懂得文物保护，加之从心里感谢苏联红军帮助我们打日寇，所以，马上在文件上签了字。苏联红军把楠木殿大理石地板起下来后，我又从关里找些石匠，动员一些群众帮助苏联红军建纪念碑。苏联红军烈士纪念碑是在 11 月初建好的，

11月7日举行了落成典礼。在落成典礼前，苏联红军承德驻军司令部派人与我协商典礼大会的有关事宜。他们提出双方部队不允许带武器。开会时，我八路军按照协定，都没有带武器，苏联红军却背信带武器参加大会。为此，程子华政委派我向苏联红军提出了抗议。

大约9月下旬，热河省委着手组建热西、热北、热中、热东、热南地委和专员公署以及承德市委、市政府，同时撤销热西工委，还让我到热北当专员。过了一夜又变了，任命我为承德市长。当时，王国权兼任市委书记，王光远同志任市委副书记。市委、市政府办公地点在草市街日本宪兵队(现在市公安局)的院子。10月底，11月初，史立德、郭洪德、林肖硖等同志分别从延安和晋察冀来承德，市委、市政府及所属办事处机构逐步健全和完善起来。

11月15日前，苏联红军驻承德部队根据苏军代表在延安与我方达成的协议，撤出承德。他们从承德撤走前，一名苏联军官带着翻译来到市政府找我，要我在一个有关苏联红军撤出承德问题的俄文文件上签字。我签字后，苏联红军开始撤走。苏联红军撤走时，我们从伪省政府接收了几缸大烟和一部分布匹。

苏联红军撤走后，市委、市政府的工作开始走上正轨。我们领导人民开展了以清算复仇为内容的政治斗争和以解决人民的生活必需、稳定市场为内容的经济斗争。在斗争中逐步建立了党的核心和各级人民政权。这样，共产党、八路军很快在人民群众中扎下了根。

（作者曾任纺织工业部办公厅主任）

回忆承德卫戍区

舒行

1945年8月日寇投降后，我军接收了承德。但我来承德的时间较晚，大约在10月下旬。主要是因为我策动黄方刚的部队起义后，根据协议，合编十四分区和黄方刚的队伍。我忙于合编工作，脱不开身，合编工作结束后，我才开始赴承德市。我来承德前，十四分区副政委黄文带一部分队伍来承德接收，他开始担任热西工委书记，统一指挥承德市及滦平、隆化、丰宁、围场的接收工作。热河省军区成立时，他担任省军区政治部副主任。我进承德后，担任热河省军区参谋长兼承德卫戍司令。省委秘书长、承德市委书记王国权兼任承德卫戍区政委。卫戍区参谋长姓谢。卫戍区下设几个科：作战科科长王兴义；管理科科长××；通讯科科长池龙；还有两个科，陈云辉和潘凤章分别担任这两个科的科长。卫戍区有一个营的部队，这个营是老十三团的特务营，下属四个连，每个连200左右人，全营共七八百人。这个营在抗日战争中以能攻善打而著称，是支过得硬的队伍。营长是胡祥，承德第二次解放后曾任承德军分区副司令员；副营长叫庞云龙，后来省公安厅成立公安队时，被调任为公安队队长。

我任承德卫戍司令初期，经常出面与苏联红军打交道。当时，苏联红军的一个上将就住在承德，他们也成立个承德卫戍区，与我打交道的主要是他们的卫戍司令，较大的事情才找那位上将。那时，苏联红军尽管有些人纪律差，但他们还是同共产党、八路军友好的，对我们是支持的。由于误会，苏联红军曾把咱们在隆化一带活动的部队缴了械。我找到这个卫戍司令，告诉他那部分人是我们

八路军。这个卫戍司令马上通知下属放人。还有许多事情，也都是我们拿出意见，同他们打下招呼就可以了。有些问题，由于外交上的原因，他们不能公开表态，就用默许的方式支持我们。例如，日寇投降时，留下很多武器，这些武器放在库房里。苏联红军看守着库房。我们来承德后，就与看武器库房的苏联红军加强来往，渐渐和他们熟悉了，他们就打开库房，让我们挑武器。军官们知道此事，但也都睁一眼，闭一眼。因此，我们卫戍区所属的那个营很快装备一新。

在同苏联红军打交道时，赵毅敏同志担任翻译。赵毅敏同志是留苏的大学生，不但有文才，而且俄语讲得十分好。那时，我们办事效率是很高的。不论什么事情，赵毅敏我俩一商量，拿出个意见，找苏联红军的那位上将或卫戍司令谈上二三十分钟，问题就定了。之后就以我这个卫戍司令的名义颁发布告，宣布实施。为什么要以卫戍司令的名义发布告呢？主要是由于我们刚从敌人手里接收承德这个地方。这个地方不仅社会秩序乱，而且我们的政权机构也不健全，不得不实行军管。一实行军管，我这个卫戍司令的事就多了，军队事要管，地方上的事也要管，有些事情我一出面就好办了。所以，我经常颁发布告。为方便工作，还给我配备了一辆轿车呢！卫戍区所属的那个营主要任务是：维护承德市的社会治安，打击敌人的破坏和捣乱、肃清伪满的残余分子，再就是警卫省、市党政机关。

苏联红军是1945年11月撤离承德的。撤离前，苏联红军的卫戍司令把我请到离宫他那个司令部里。在共叙友情后，这位司令突然向我提出，让我送给他一件东西作纪念。我说，你看什么好，只要我有，都可以给你。原来这位司令看上了我那架德国照相机。这架照相机比较高级，跟了我几年，我十分珍爱它。他提出来，我只好送给他。他接过我的照相机后，想把他那架日本照相机送给我，我婉言谢绝了。原来我是个业余摄影爱好者，在艰苦的战争年代，这架照相机始终带在我身边。自从把它送给这位卫戍司令之后，我总感

到好像失去了什么似的，从此再不摆弄照相机了。

1946年1月，根据《停战协定》精神，北平成立由国民党、共产党、美国三方（实际是两方，即以共产党为一方，以国民党、美国为另一方）参加的军事调处执行部，并派出若干军事调处执行小组，分赴各冲突地进行调处。承德军调小组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历史条件下产生的。这个军调小组，开始由陈伯钧将军担任我方代表，椤树战斗后，由热河省军区司令员段苏权将军接任。国民党方面的代表是一个姓岳的上校，美方代表是葛瑞夫上校。军调小组成立后，我还抽出不少时间，协助我方代表处理军调小组的事情，特别是段苏权同志担任代表后，由于他的军务繁忙，他不在承德时，军调小组的事情就由我代理。为什么让我参与军调小组的工作呢？提起来也怪有趣的。当时，我这个没进过学校门的人还被许多人当成大知识分子呢！原因是长征过后，我在抗大担任过几年教员，在上课和讲话时可能给抗大学生和部队战士留下一些印象，都以为我是个大学生。其实我的确没有上过学。我学文化是从参加红军后开始的。参军后，打仗比较勇敢，把生死扔在一边，枪一响，我就冲在前头。这样，受伤的机会就多，我先后负过30多次伤，现在我的头上还有4块弹片没取出来。负伤次数多，养伤的时间就多，我就抓住养伤的机会学文化。在老乡家里养伤，我就向老乡学；在医院养伤，我就向医生、护士学；在部队，我就向文书学，向战士学，向一切有文化的人学。所以，我这个没有上过学的人，在长征时就能读书看报了。长征结束后，我被调到抗大担任教员。在任教期间，我的学习机会更多了，我系统地读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毛泽东的书，觉得理论水平和文化水平都有提高。军调小组成立时，我就被相中了。

在军调小组工作，不但要有坚强的党性，坚定的立场，还要有灵活而巧妙的斗争艺术。这样才能有理有利有节地同国民党进行斗争，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机会揭露国民党破坏和平、挑动内战的

阴谋。我记忆最深的是 1946 年 2 月承德军调小组举行的首次记者招待会。这个招待会在省交际处举行，参加招待会的有《冀热辽日报》、新华分社、《冀热辽画报》、《子弟兵报》记者，还有从北平来承德的国民党中央社北平分社的记者和北平《光华日报》的记者等。这次招待会主要是报告军调小组抵承德后的工作情况。在招待会上，国民党代表和美方代表一唱一和，大肆攻击共产党、八路军，妄图把挑起内战的责任强加在我方身上。我方代表陈伯钧少将在招待会上十分幽默地说：执行小组的首要任务是停止冲突，其次是恢复 1 月 13 日 24 时前双方部队原来位置。但很不幸，13 日 24 时后，中共部队处处处于被攻击地位。接着，陈伯钧少将用大量的事实揭露了国民党军队违反协定，蓄意挑起事端，破坏和平的罪恶行径。陈伯钧的讲话弄得国民党和美方代表十分尴尬，记者们纷纷向国民党代表和美方代表提出指责。这次记者招待会，是我们与国民党和美方斗争的第一个回合。这第一个回合就旗开得胜，我军心、民心大振。当然，这次胜利与人民群众对我们的支持是分不开的。在军调小组深入前线，深入实地进行视察时，许多群众为我们提供了有利的证词。有时的调查会与声讨会相似，人民群众纷纷揭露国民党的罪恶，搞得国民党代表和美国代表无所措手足。例如我们到平泉附近调查时，群众异口同声地证明：抗日期间八路军就在这里同日伪军打仗；1 月 13 日前，这里也一直是八路军驻守。可最近，国民党"遭殃军"向这里不断进攻，弄得我们不得安宁。就连在场的地主，迫于人民群众的压力也不得不点头称是。就是这样，我们一直与国民党、美国方面斗争着，直至 1946 年 8 月，我们撤出承德为止。

1946 年 8 月初，热河地区战争形势越来越紧张，火药味越来越浓。我军在杨杖子与敌人打了起来，这个仗打得不太好。这次战斗后，为了加强对前线的指挥，程子华同志找到我说，热南有两个旅，两个分区，你对热南情况熟悉。所以，派你去热南，统一指挥那

里的部队。接到任务后，我立即去热南了。与此同时，承德卫戍区也就撤销了。我是乘一辆大汽车去热南的。不幸的是，在路过盘道梁下边的一条河时，汽车灭火，司机到水里修车，不慎被水冲走。我到热南后，没有找到部队，就拍电报给程子华、肖克，请求指示。肖克给我回电报说，要撤退，组建冀热察军区，决定你到那当参谋长。因此，我离开热南赴任。1947 年成立十一纵队时，我又到十一纵队担任参谋长，两次打隆化都是这支队伍打的。这支队伍为解放热河建立了不朽的功勋。

（王继明整理）

回忆承德第一次解放时市委干部的生活状况

谷云青

1945年8月日寇投降前，我在陕北绥德县吉镇区任区委书记。日寇投降后，我参加了去山东的干部大队，9月从延安出发奔赴山东。可是，当我们刚过黄河不久又接到中央的电令，让我们改赴东北。11月下旬，我们来到承德市。到承德后，这个干部大队解散，部队干部继续向东北进发，我们地方干部留在热河，就地分配工作。我开始被分到承德市二区任区委副书记，半个多月后调市委任秘书主任(办公室主任)。

我调到市委时，市委秘书室的秘书姓崔，文书是程谦让，会计是个姓那的女同志。此外，还有个总务科和警卫排。我去后不久，就发现总务科科长用打假条子等手段贪污。为此，让他停职反省，结果这个人畏罪潜逃。他逃跑后，顾焕民任总务科长。市委警卫排排长姓王。

当时，承德的财政十分紧张，干部的生活非常艰苦。主要原因，一是日寇投降时，趁混乱，市民把日伪仓库抢光了；二是苏联红军撤走时，又带走了大批物资；三是凌源虽有仓库，里面不但存有枪支弹药，而且有布匹、粮食，但由于某种原因未运过来。所以，省、市委，省、市政府成立时，只靠变卖接收的一些大烟土和酱油厂的酱油维持开支。这样，我们市委的开支主要是以大烟为主。我记得，整个市委及6个(后来是7个)区委的经费每月是200两大烟，每月由我到省委找胡锡奎批给领取。这200两大烟，不单单是党的活

动经费，还包括人员的菜金及其他生活费用。这 200 两大烟是满足不了实际需要的，广大干部都节衣缩食，艰苦生活。1945 年冬，市委除几位主要负责同志的办公室里有木炭取暖外，其他办公室都没取上暖。我记得，二区的组织委员曾打电话告诉我，说他们的办公室在大白天温度是零下 20 度。省政府财政厅长王奂如亲自带领机关干部到大街上卖酱油，以便换些钱来，解决政府系统的开支。

干部的伙食，不仅菜金少而且无保障，粮食品种也单调。当时，每个干部每天一斤半粮食，由市政府财经局的赵谦负责解决。粮食的品种按大、中、小灶分别配给，大灶全是粗粮，中灶一半粗粮一半细粮，小灶全是细粮。所谓细粮只不过是小米之类，大米白面是见不到的。粗粮全是高粱米，很多同志吃不习惯，消化不良。那时，吃小灶的人很少，市委这边有田星云、王光远、郭洪德、林肖硖、林平和我，市政府只有郑旭和史立德，各局、区的主要负责人吃中灶，其他干部吃大灶。1946 年春节，为了让大家吃上一顿饺子，我们和省委一起，用省委那辆汽车去张家口拉了一趟白面，拉来后分到各食堂。但由于我们派出的采购人员受骗，拉回的面里有 60%是白玉米面，结果，饺子一下锅就散了，成了一锅面糊糊。这年春节，我们就是用这些面糊糊改善的生活。

在交通工具方面，市委只有几匹马，领导干部外出就骑马。省政府也只不过有辆马车。李子光同志外出时经常是自己赶车自己坐，再加上李子光同志生活十分简朴，戴个毡帽头，许多人都不知道这位车把式原来是省政府第一副主席。市委开始没有马车，田星云同志提出让我也想办法弄辆马车。我发现我们机关前面扔着个破黄包车架子，又弄到了一辆黑卧车壳，里面没有机器，没有座子，外面没有轮子。我们给这个黑卧车壳配了轮胎，又从范郁文那里买了座子，我们把那辆黄包车架子给了一家工厂顶做修理费，让他为这辆黑卧车壳安了车辕子。这样，市委才有了辆马拉卧车。

1946 年初，市委又接到省委指示，根据毛主席去重庆谈判的

"双十协定"的规定,党的经费自筹的原则,要求市委系统自力更生,发展生产,逐渐过渡实行经费自给。不论是人员的生活费用和党的活动经费,省里不再拨给。根据省委这一指示精神,市政府从敌伪房地产中拨给市委4处,支持市委搞企业。市委首先利用1处办起了新华商店。这个商店是贸易货栈性质,没有门面,只有货场,专门批发货物,代卖代买,代储代运等。范郁文任新华商店经理。后来,为了搞好生产,市委又成立了生产科,科长也由范郁文担任。范郁文原是个开汽车的,他自己有辆汽车。所以,我们这个商店一成立,就有一辆汽车,这在当时确是件了不起的事。因为那时,除省委、省政府有汽车,其他机关都没有。为此,许多单位非常眼馋。这个新华商店的资金,开始就是以市委的经费大烟为基础,由新华商店把每月200两大烟土变成钱,市委经费来源就靠新华商店。后来发动机关干部入股,当时,市委干部对我们办此商店十分热心,大家把自己节衣缩食存下的款物都拿出来入了股。这样一来,积少成多,商店的活动资金就多起来了。这个商店办起后,不仅对搞活承德市的经济起了一定作用,而且市委、区委的经费从此有了保障,干部们的生活有了改善。后来,不但小灶、中灶吃上了白面粳米,就连大灶也可经常吃到白面,每天早晨大都能吃到油条了。后来,为发展生产,市委还准备办个酒厂、糕点厂、榨油厂。特别是酒厂,我们经过一段筹备,已经差不多了。可惜的是,由于国民党的进攻,因而没开业。糕点厂、榨油厂还没来得及筹建,我们就转移了。

(继明 整理)

(作者曾任西南交通大学副校长)

回忆承德市第七区的工作

邵友民　柏　里

1946年二三月份，热河省委决定将滦平县双头山（现双塔山，下同。）区划归承德市，与承德市双头山工矿特区合并，组成承德市第七区。这个区南北长约八九十里，东西宽近40里，是承德市最大的市郊区。省委决定公布后，中共承德市很快地为这个区配备了班子。区委书记邵友民、区长柏里，区委副书记兼组委唐全义，区委委员、区公安派出所所长陈毅，区委宣传委员李世萱。

第七区成立后，邵友民同志不再兼任发电厂指导员。区的党政军民，除工会外，主要精力放在贯彻党中央指示，深入农村，广泛地发动群众，开展减租减息、清算复仇运动上。在运动中培养积极分子发展党员，建立健全农村的基层组织。当时，为在全区迅速掀起清算复仇、减租减息的高潮，区里干部除留少数人值班外，其余全部下乡搞运动，在运动中结合部门建设工作。这样一来，只一两个月的时间，清算复仇、减租减息运动普遍开展起来了，多数村庄实行了二五减租。无地和少地农民收回了“挂地”，分了狡猾的地主的“黑地”，撤了“皇租”。当时，双头山地区有大批从清朝遗留下来的皇粮庄头地，这些地是清皇帝赏赐给为其服务的太监或差役，他们用跑马占圈形式掠取的。这些太监和差役的子弟世袭着这些地，世世代代地收租，盘剥农民。取消“皇租”，这是人心所向。我们记得，当时由单塔子至上营子20里内的大部分土地都是“当家”苏裕侯（中营子村人）、兰兆荣、兰光信（燕窝铺村人）的。在清算复仇、减租减息斗争中，这片8个村290户佃农与他们进行说理斗争，苏裕侯、兰兆荣、兰光信被迫低头认罪，答应“4天内退照，永不要租。”

清算复仇、减租减息运动，极大地激发了农民的政治热情和生产积极性，全区不但很快地建立起村政权和农会、妇女会等组织，还组织了十几个生产互相助变工小组。

群众发动起来后，为使运动扎实而健康地发展，我们根据市委指示，对全区清算复仇、减租减息运动进行了复查。在复查中，我们发现有个别村子明减暗不减。其原因是，群众"怕"字当头，怕共产党呆不长，怕得罪人。另一个原因是一些二流子、土匪和其他坏人借清算复仇斗争之机，混入干部队伍。他们掌权后，有的被地主利用，成了地主的代理人，千方百计地维护地主阶级利益。针对这些情况，我们深入群众，做过细的思想工作，进一步消除群众顾虑。同时，我们着手整顿农会组织，整顿基层政权，打击反攻倒算、斗争坏人，为群众平冤报仇。中营子村一个姓张的干部，原来是个抢劫群众财物的土匪。他当干部后，继续欺压群众，霸占群众财产。我们发现后，召开联村的群众大会，清算斗争了他。上营子有个叫李广海的人，绰号"铁嘴钢牙"，是个打官司油子，他以打官司为名，欺压百姓，成为当地一霸，我们发动群众斗争了他。这样一来，群众扬眉吐气了，坏人老实了，运动扎扎实实地向纵深发展了。

在清算复仇、减租减息运动中，我们注意抓了建党工作。区里每个党员干部都参与此项工作，注意边发动群众边培养和发现贫雇农积极分子，不断向他们宣传党章党纲，帮助他们树立起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人生观，适时地把他们发展成党员。我们至今记忆最深的是红旗村的潘有贵，他入了党，当了村农会主任，1946 年夏季，参加市里在离宫召开的一个代表会时，见到清皇帝坐过的"龙椅"，就扬眉吐气地坐了上去，并且高兴地说："我们农民真正当家作主了，连皇帝的龙椅也可以坐坐了。"听说这个同志在我们撤退后，受到了国民党的迫害。

1946 年初夏，为防备国民党的侵犯，保卫承德，保卫家乡，保卫社会秩序，市委决定大力发展人民武装，让我区组建一个公保

队，兵力不少于一个营。我们边搞清算复仇、减租减息运动，边动员青年参军，保卫运动成果。不到一个月时间，我们就把区公保队扩增到 100 多人，邵友民兼大队政委，公安派出所所长陈毅兼队长，副队长是王玉泉，指导员是宋杰。

当时，七区边远地区的社会治安不太好，土匪活动十分猖獗。特别是我们开展清算复仇，减租减息运动时，土匪经常骚扰、破坏运动。最厉害的是惯匪田永芳一伙。田永芳能两手使枪，十分狡诈，并与一些地头蛇串通。这伙人消息灵通，危害极大。1946 年 6 月，我红旗公安派出分所所长张耕田协同区社教干事路文华带 3 个保安队员在小营子村工作。半夜里，田永芳等土匪突然包围了张耕田等人的住房，当场牺牲了一名队员。年轻的路文华同志身负重伤，后因流血过多而牺牲。我们怀着沉痛的心情把路文华和那位队员埋葬在区政府附近的应营子村北，并开了追悼会。派出所户籍员欧文珍脚部负伤送进了医院治疗。这次事件后，区干部下乡不仅个人带枪，而且有武装队员配合，以防止意外。但就是这样，还经常遇到危险。我们记忆最深的是 1946 年 6 月的一天，市委宣传部长林肖硖同志带警卫员来我区中营子村检查工作，区委书记邵友民率通讯员陪同。这天晚上正吃饭时，村干部慌忙跑来报告，说发现土匪向该村方向活动。接到报告后，林肖硖和邵友民认为：敌人不一定发觉我们，在这种情况下，向外转移，可能发生更大危险，不如就地隐蔽为好。所以，林肖硖、邵友民等 4 人，紧闭了房门，由两人轮流向外 望，整整折腾了一夜，幸好没发生意外。事后邵友民同志说："这一夜我始终提心吊胆，林肖硖同志不单是市委领导，而且是我党著名工人运动领袖张浩之子，万一发生意外，我们怎么向党交待呢？"

为了我区社会治安，我们决心集中力量，歼剿田永芳这伙土匪。在市委派出的武装支援下，我区保安队由区长柏里率领，对田永芳一伙进行了追剿，使得田永芳望风而逃。为防止田永芳的骚

扰，随时打击围剿这伙土匪，我们还与滦平、隆化等县的县大队建立了联防围剿制度，从而有力地保障了双头山地区人民群众的安全。不久，滦平县把惯匪头子田永芳从多伦抓回来，在金沟屯召开公审大会，把田永芳枪决了。人心大快，群众拍手叫好。

1946 年 8 月 28 日，由于国民党的大举进犯，我党政军从承德实行战略转移。转移前，我们根据中共冀热辽分局和省、市委指示，要炸毁铁路和发电厂，这无疑等于砸了铁路工人和发电厂工人的饭碗。但工人们反对内战，以大局为重，毫无怨言地执行上级指示，他们将火车机车头开进隧洞里炸掉，堵塞了隧道，这样一来，铁路完全瘫痪了。直至 1948 年 11 月我们第二次解放承德时，国民党都没能把铁路修复通车。炸发电厂的经过是这样的：承德撤退的前一天，肖克司令员给双头山区长柏里下了一道命令，命令中说：柏里区长，今派去一个工兵班，带去几十个地雷和炸药把发电厂炸毁，炸药不足你在矿上再找些。炸电厂前要召开电厂工人大会，给工人们讲清，我们这是作战略转移，现在把电厂炸毁，一两年后我们回来再修新的。愿跟我们走的，可以跟我们走；不愿走的，要到就近山里躲一躲，以避免敌人残害。开完工人大会后，区公保队放好安全警戒，就把发电厂炸毁了，使承德市变成一片漆黑。

撤退前，根据热河省委指示，承德市撤退后，双头山区暂归滦平县领导。这时，邵友民同志已调任市委秘书主任，柏里同志任区委书记、区长。所以，承德撤退时，柏里、唐全义、陈毅等同志带领区干部和区公保队，跟随承德市工委和市公保大队撤离双头山，到红旗附近开展游击活动。但令人痛心和遗憾的是，由于撤离得十分仓促，区委宣传委员李世贵同志因没有来得及到区里集中并一起撤退，结果在通沟被国民党俘去，至今下落不明。每当想起此事，我们都十分悲痛。

撤出承德市双头山后，原打算以红旗村作根据地向承德市开展游击战争。由于情况突变，敌强我弱，我们不得不向外县边战斗

边转移。经过辗转一个多月，我们才找到热西地委，尔后又找到滦平县领导机关。在隆化县大两间房和国民党的一个骑兵团发生遭遇战后，由于连续爬山，区妇联主任马桂月同志双脚被扎得不能行走。我们用担架抬她走，她说什么也不坐担架。经过区委商量和市工委批准后，把她暂时隐蔽山村养伤，以后再来接她。我们到热西后派人来接她，听说她已经被国民党俘去了，以后下落不明。每当想起此事，我们仍然怀念她。

1948 年 5 月，我人民解放军野战兵团围攻承德市时，柏里带领区干部从滦平西部来到双头山区作支前工作。因情况突变，又随野战军撤出双头山。隆化县解放后，柏里、王玉珂带领区干部和区公保队，来到大庙、小三岔口一带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直至承德市第二次解放。

（邵友民：曾任天津铁厂党委副书记）

（柏里：曾任承德市政协副主席等职）

在热河省工作的回忆

王国权

我是1945年“八·一五”日本投降后(当时北平城内日本鬼子尚未交枪,城外铁路沿线还有日寇炮楼),受命由晋察冀北岳区出发,带了一批干部准备同冀东的李子光同志一起去承德组建冀热辽(原冀东)区党委热河分委,负责开展热河的工作。在去承德途中,由于形势变化,胡锡奎、段苏权同志赶了上来,一起向热河省会承德进发。

我们100余人在怀柔县西北红螺寺住了一晚,受到了大庙和尚的亲切接待。第二天中午到了古北口,与已占领东北的苏联红军见了面。苏军对我们很友好,叫了一声同志后就把我身上戴的一支派克钢笔拿去了,意思是作为一件难得的中国同志赠给的纪念品。但他们对我们也不是十分了解和信任的,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和力量还有疑虑,对我们有无能力占领热河和东北还缺乏信心。同时,由于他们与蒋介石政府有协议,因此,对是否把承德交给我们似乎还举棋未定(到承德后这个问题就解决了),但我们还是进了承德。先暂时驻进承德市南营子,那里有一个大楼,我和常玉林同志等就住在大楼里,胡锡奎同志住在楼对面的小楼里,段苏权同志住在一所日式平房里。

一进承德,繁重的工作任务便摆在了我们的面前。当时整个局势对我们很有利,中央提出有了东北和热察两省就有了全中国的激动人心口号,指示要在东北和热河创建巩固的革命根据地。因此,要派遣大批干部和军队到东北去,到热河各地去。承德是进入东北的一个重要门户,我们的第一项工作就是为经热河开赴东北

的干部和军队提供食宿、帮助运送等。在很短时间内，大约有10万左右军队和两万多干部到了东北，这些干部和军队有很多是经承德到东北去的。我们全力以赴，完成了这一重大任务，对我党迅速占领东北起到了很大的作用。那时赵毅敏同志也先期到达承德，直接负责同中央联系。同时，省委又要很快派干部到热河省各地区各县区组成领导班子，任务的确是很繁重的。

1945年10月，经中央批准，成立了冀热辽中央分局和热河省委，程子华任冀热辽中央分局书记兼冀热辽军区第一政委，罗瑞卿任第二政委，肖克任司令员，李运昌任副司令员，胡锡奎、赵毅敏、欧阳钦等都是分局委员。后来黄火青同志来了，任分局副书记兼副政委。热河省委由胡锡奎任书记，谭余保同志任副书记，省委委员有李运昌、段苏权、马载、李子光、李德仲我们几个人。当时，我除了帮助胡锡奎同志做热河省委的工作外，还兼承德市委书记。在承德市首先发动领导了清算复仇、减租减息的斗争，收到了很好的效果。清算复仇这一口号是在发动群众中，群众自己提出的，要对当地伪满时期罪大恶极、甚至对人民有血债的汉奸卖国贼，给予揭发和应有的惩罚。这场斗争是省、市委直接领导的，承德市城市贫民、工人包括铁路工人都参加了这场斗争。斗争轰轰烈烈，一直波及到市郊，后来波及到全省。中央给予了肯定与表扬，并通报了东北各省。

1946年初，由于国民党军队向东北进攻，把我们热东的工作冲跨了。我们的军队和干部大都撤出了热东，撤到青龙县的山沟里去了，国民党的部队一直进占到平泉县。当时正是毛主席和周总理到重庆同蒋介石谈判之际，我们有些干部对国民党存在着一些和平幻想，因之有些仗应该打好的没有打好，以致整个形势很乱。3月下旬至4月初，在承德召开了省委扩干会议，分析了形势，总结了经验，统一了认识，局势开始稳定下来。会议还决定加强各地委的领导，省委决定我到热东，王孝慈到热中，权星垣到热北。会后，

我和丁盛同志带一个旅去恢复热东的局面，肃清那里的土匪，发动群众，创造热东革命根据地。我任热东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丁盛任司令员，韦祖珍任副政委、李波任政治部主任。地委委员还有仇友文、刘南生、周治国、田星云、肖佐汉、林肖硖等同志，丁盛、韦祖珍也参加地委为委员。热东分区当时包括辽西、热东在内，共辖建昌、建东、凌源、朝阳(朝阳曾分朝阳县和羊山县)、喀左旗、凌建(后改为叶柏寿县)、绥中、兴城、锦西、锦义县，总人口220多万(包括敌占区)。在辽西地区设地工委，刘南生同志任书记。成立辽西支队，支队司令孔瑞云，刘南生同志兼政委，吕炳安任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刘江亭同志任副司令员。张士毅同志任辽西专员，信修同志任副专员，张以后兼任热东专署副专员，后将辽西工委并入热东地委。热东专员开始是农康同志，以后是仇友文同志担任。

我们进到热东后，首先对干部进行了整顿，对部队进行了整编，坚定了打游击战争，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的信心，然后分四路打回热东。首先收复了建昌重镇要路沟和建昌、凌源、朝阳、绥中、兴城各县的山区，建立起游击根据地。分区司令部和地委机关就设在要路沟村。这地方背靠青龙县，有比较可靠的后方。地委机关住在要路沟村南一个地主大院里，地主逃跑了，房子很宽绰，生活环境很好。我在热东大约工作了3年，主要进行了剿匪、土改、发动群众，壮大了武装力量，培养了大批干部，建立了地方党的组织，建立了地方政府，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了热东革命根据地，为解放附近城市和配合进行辽沈战役创造了条件。

1948年5月，东北局派黄克诚来任冀热辽分局书记兼政委，程子华专任军区司令员，主要是在前线打仗。那年闹灾荒，群众吃不上饭，饿着肚皮支援前线。冀热辽分局和热河省的干部，每天三顿稀粥，还要节约三两米，支援灾区。黄克诚同志带头不吃小灶，并且由分局作出决定：取消中、小灶和禁吸纸烟，从分局委员做起，任何人(赵毅敏同志患严重胃病除外)不得违犯，终于渡过难关。为配

合我东北主力部队进行辽沈战役，程子华同志指挥先打锦州外围和辽西走廊，打了有名的塔山阻击战，打下了绥中、兴城，这些战斗打的都是比较好的。当时我负责支前工作，大部分时间是随程子华同志行动的。光热东分区就有13.6万多民工、800多干部参战，出动担架2.2万多付，修路3000多里，完成公粮5000多万斤，向第一、二线调运粮食2300多万斤，慰劳猪肉63.8万多斤，苹果1.9万斤，现款400多万元。热东人民为辽沈战役是做出很大贡献的。

打锦州时，我和胡锡奎、史立德同志在城里敌人还未完全消灭的情况下，乘夜就进了锦州。当时城内尚有1万多敌人，国民党从北平和沈阳出动飞机每天24小时轮番轰炸。邓华纵队的司令部设在城南边的老城墙角下，我们在他的司令部停了几个钟头，当晚部队就攻进了老城，消灭了全部敌人。国民党东北"剿总"副司令范汉杰企图化装逃跑，也被我军俘获。

打完锦州后，主力部队全调去打由沈阳出来的敌人廖耀湘兵团，仅留下一两个连，驻在机场，城里只有少数部队在维持秩序。这时，领导人只留我和周家美同志在锦州唱空城计。

打下锦州和辽西走廊后，我和胡锡奎同志奉命组织辽西省委，胡任省委书记(未到职)，我任副书记。同时负责开辟山海关到辽西一带地区工作，配合东北大军进关。后胡锡奎同志调回华北局去了，我在那里负责辽西省委工作。省军区是朱军、周家美同志负责。省政府由罗成德同志任主席、李杰庸任副主席、李东冶任省委社会部长兼公安厅长，锦州市委书记李乐光，市长史立德同志，副书记林肖硖同志。不久，由于热河省缺干部，我们又在热河工作多年，与那里的人民感情很深。所以中央决定，由原辽北省委郭峰、杨易辰、喻屏同志等接替辽西省的工作，我和罗成德、强晓初、李东冶等原在热河工作的同志就调回热河承德了。

热河省第二次解放后，中央决定由李运昌同志任省委书记、主席、省军区司令员兼政委，我和强晓初同志任省委副书记。1949年

10 月，李运昌同志调任中央交通部副部长(党组书记)，我接任省委第一书记兼省军区政委，强晓初同志任第二书记，罗成德同志任省主席，杨雨民同志任副主席，李东冶同志任社会部长兼公安厅长，后任省委秘书长。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罗调任沈阳军区后勤部长，由沈越同志任省长，后沈越同志又调任，我又兼省长。

这时期，我还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和列席进城后第一次中央全会扩大会议。东北地区列席中央全会的还有黑龙江省委书记赵德尊同志。接着，参加了天安门广场举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并有幸登上了天安门城楼，同毛主席、周总理、少奇同志、朱老总等中央领导同志在一起，参加了观礼。

在热河、辽西一带我先后工作了 10 年。刚去时，看到广大人民困苦不堪，特别是热西、热南地区，经过日本帝国主义 13 年的糟踏，真是满目疮痍。大姑娘没有裤子穿，寒冬腊月天全家五六口人盖一床破被子的现象完全是事实，到处是逃荒要饭的人。看到这种情况，我们的干部和军队都把自己的衣服、粮食拿出来给穷苦群众穿用，在人民群众中留下了深刻的影响。到处是面黄饥瘦的大烟鬼，男的女的身上都扎大烟针，人不像人，鬼不像鬼，惨痛至极。土改时有些地主家满缸的大烟土。还有土匪横行，四处骚扰城乡百姓，社会秩序极为混乱。日本帝国主义还曾在赤峰一带制造鼠疫，在解放热河过程中还得同那里的鼠疫作斗争。那时，冀察热辽分局请来了一批苏联专家到赤峰，帮助治疗才算治住了这个病，但还是死了一批人。我们第一次解放承德时，就把消灭土匪作为重要工作。进城不久，国民党军队又曾一度占领承德，我们又转人农村，仍坚持发动群众消灭三害(土匪、大烟、鼠疫)，并积极开展土改工作，较快的改变了热河的破烂不堪、人民无法生活的状况。因此，热河人民对我们党和人民军队有着很深的感情。第二次解放承德时，省委下决心尽快改变热河的落后面貌，要求尽快做到人民群众有饭

吃、有衣穿、有房住，曾提出“三年有吃有穿，五年丰衣足食”的口号。这一要求得到了广大干部群众的热烈拥护，刚刚翻身解放的劳苦群众，焕发出高昂的劳动积极性。经过党组织和广大干部的共同努力，人民较快的基本上解决了温饱问题。土匪被消灭了，鼠疫治住了，鸦片也完全禁绝了。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十分满意，连原来一些对我们抱有怀疑态度的民主人士也心服口服。1950 年，高崇民先生(原东北人民政府副主席)从沈阳到热河视察，我到车站迎接他。高崇民副主席曾任过张学良将军的高参，长期在东北工作，比较了解热河过去的情况，因之，他下车伊始，就问我：“热河一带的土匪还多不多?”我当时回答他说：“高副主席，我可以用这个吉普车把你送到一个偏僻的山沟里住上几夜，保证你不会出事。”他一听，笑了，说：“旧中国，热河一带是土匪的世界，汤玉麟当主席时，土匪还是到处横行。解放时间不长，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土匪很快消灭光了，天下太平了，真了不起”。其实，当时剿匪杀人并不多，除极少数罪大恶极的土匪头子被镇压外，其余的都没杀，不少人在党的政策感召下，走上了弃旧图新的道路，他们的生活也都有了着落。

热河是个多民族地区，朝阳、赤峰、热北等蒙古族人数较多，承德地区满族较集中，还有相当数量的回族。因之，对热河省来说，做好民族工作很重要。我们在各项工作中都较注意贯彻党的民族政策，团结广大少数民族，也培养了一批少数民族的男女干部。特别是培养了一批蒙古族干部，现在不少都在重要的工作岗位上。民族工作做好了，反过来又大大促进了党和政府的其他各项工作的开展。这也是热河地区的一条重要经验。

总之，在热河、辽西一带工作了 10 年，工作是努力的，成绩虽然不大，积累经验也不多，但同同志们，同广大人民共同战斗，生死与共，同甘共苦，结下了深厚情谊，迄今仍想念那里的同志和人民。

（作者曾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外事委员会副主任等职）

承德保卫战

詹才芳　李中权

日本投降后，国民党在美帝国主义支持下，企图在 1946 年 1 月 13 日停战令生效前占领我军事要地热河的承德。

1946 年 1 月 9 日，蒋军分东西两路向承德进犯。西路敌人纠集九十二军、九十四军、河北省三个保安团及日军八百余人，沿平古路直取承德；东路敌人集中五十二军、十三军，沿锦承铁路西进。同时，为策应进犯热河的东西两路敌人，敌九十四军第五师、四十三师之两个团及一部分伪军经冀东取多路北犯。

为了粉碎敌人的猖狂进攻，冀东军区新编各旅来不及进行整训，即接受了战斗任务。我们率领十二、十三、十四旅顶严寒、冒风雪分别向锦承线和冀东地区急进。

出关部队翻山越岭，8 天时间，风雪行军 900 余里，按时到达预定战区。我十二旅立即奉令东进迎击敌人。此时东路敌军 7000 余人从凌源三十家子车站分两路向我逼进，企图迂回到平泉以南包围我军。敌我对进，狭路相逢。1 月 13 日 17 时 50 分，我十七团侦察小组首先与敌人遭遇。我五十六团二连当即投入战斗。十二旅命十七团立即从正面向敌人展开猛烈攻击，命五十六团迅速抢占两翼制高点，命五十团为二梯队，隐蔽待命。我先头十七团七连勇猛顽强，首先抢占有利地形，给正在同时进占该高地的敌人以歼灭性的打击。我五十六团抢占了右翼三家子、左翼一带高山和南部制高点雹神庙。但是，由于部队无遭遇战的准备，缺乏运动战的经验，各团只争先恐后地向前猛打，互相配合较差。二梯队也自动接敌，战场秩序混乱，上下联系受到影响，指挥员无法掌握部队。虽然

十二旅努力扭转，仍不能将部队组织好。敌人则利用我军暴露的弱点，积极增援部队，分割我战斗队形。在此种情况下，十二旅被迫后退调整。敌人则进占了三家子、丁家店、瓦房店，切断了我军与后方的联系。深夜12时，撤到大营子、杨杖子一线的十二旅指战员，毫不气馁，他们冒着刺骨的严寒，于14日凌晨2时，组织力量向进攻的敌人反击。经过两小时的激战，打退了进犯的敌人。同时，我十四旅在平泉县小寺沟东、北两方向顽强阻住了另一路敌人的进攻，打破了蒋介石要在1月13日停战令生效前占领我承德的美梦。

我军经过一昼夜激烈奋战，歼灭敌人1100余名，但也暴露了很多弱点。为了总结经验，发扬军事民主的光荣传统，十二旅组织连以上干部到战地召开了战术检讨会。分析敌人作战特点和行动规律，找出我们的不足，提高了各级指挥员的指挥能力和部队的战斗力。

从西路进攻承德的敌军，被我军区部队十六团、五十三团和兄弟部队顽强阻击在董各庄、大小清水潭、新开岭、兵马营、团山子、香水峪一线。十六团七连在兵马营阻击战中英勇顽强，功绩卓著，被十四军分区授予"英勇阻击连"的光荣称号。

我十三旅两个团、工人纵队及两个县支队在冀东本区丰润以南阻击唐山向我军区腹地进犯的敌人。敌人在猛烈炮火掩护下向我攻击，我部队始终坚守阵地，并出动精悍部队切断敌人的运输线。在敌我力量十分悬殊的情况下，迫敌停止于丰润北之紫草坞、古石城一线，胜利完成任务。至此，敌人第一次进攻承德的阴谋被粉碎。但是，敌人仍野心不死，积极调动兵力，派遣便衣深入我内地收集情报，准备再取承德，以求一逞。

2月27日15时，敌第四师向我五十团阵地大石桥、盆窑沟进攻。入夜，敌又在炮火掩护下大举进攻我马杖子阵地和我六十一团李家梁子、大营子等处阵地。战士们节节抵抗，终因兵力单薄，阵地相继失守。

28日7时，敌以第四师全部兵力分三路向我压来。战斗异常激烈，我五十家子、小寺沟、小骑马沟南山及黑山口相继失守。情况极为紧急，我防线即将破裂，部队因连续作战亦十分疲乏。十四旅党委当即向全体党员发出坚决保卫小寺沟的紧急号召，旅团干部深入部队进行动员并重新组织部队，全旅指战员都投入了战斗。一场短兵相接的战斗充分显示了人民军队敢于压倒一切敌人的英雄气概，十四旅顽强地将两倍于己的敌人阻击在九神庙南山一线，巩固了阵地。

3月1日，十四旅又组织力量向敌人反击，警卫营营长王殿荣同志带领全营像猛虎一般向敌人扑去。全营同志冒着敌人密集的炮火，猛打猛冲，锐不可挡，相继夺回了小寺沟、后店子、马杖子等处阵地，并打退了敌人的攻击。

经过3昼夜的激战，我军共歼敌1300余人。由于十四旅不畏强敌，英勇顽强地保卫了小寺沟阵地，有力配合了兄弟部队在桲椤树川的作战，党中央来电特命嘉奖该部，冀热辽军区给该部以物质奖励。

十二旅于2月中旬再次出关，配合兄弟部队消灭进至桲椤树川的敌人。26日晚，十二旅冒着漫天大雪隐蔽迂回到敌人侧翼，由于敌人在制高点上构筑了很多工事，我部队经一天一夜进攻未得发展。28日，终于突破前沿阵地，并与兄弟部队一起将敌第五师压缩在纵横不足3里的狭窄地域。正当我各部队准备第二次发动攻势，欲全歼该敌的时候，“军事调处执行部承德小组”赶来，命令停战。我军各部队遂奉命撤出战斗。敌人丢下800具尸体，带着30车伤员狼狈逃窜，暂时避免了被全歼的命运。只要当时拖一二天，就可以将其全歼。敌人第二次夺取承德的计划又归失败。

詹才芳：曾任广州军区副司令员等职，中将军衔。

李中权：曾任北京空军副司令员等职，少将军衔。

古北口保卫战

曾　美

1946年1月11日傍晚，我们来到了滦平虎什哈。

我们冀热辽纵队第一旅，原来在察南的永宁堡集结，接到开赴滦平的命令后，部队昨天就出发了，今晚要在这一带宿营。旅长李湘和我为了等纵队首长当面给我们交待任务，在永宁堡多耽搁一天，今天上午才乘纵队司令部的汽车到了这里。在车上，纵队首长告诉我们，国民党军杜聿明部正以五十二军为主力，沿锦(州)承(德)铁路向承德方向疯狂进犯。我纵队主力奉命开到承德以西的滦平集结待命，部队明天就向滦平开进。

晚上，正在熟睡。有人把我和李旅长叫醒说，赵司令员找我们。我一看表，时针正指向1点。

我们急忙走进纵队首长的住屋，司令员赵尔陆同志正对着一张摊开在炕上的军用地图沉思。见我们进屋，便递过一份电报说："这是军区刚才拍来的，你们看看吧！"他的神情和语气都给人一种很生气的感觉。当我们仔细看完了电报以后，才清楚了他生气的原因。李湘同志气乎乎地说："国民党反动派阴谋可真不小！"

怎能不使人气愤呢！在我们党中央的努力下，我党代表和国民党政府代表在1月10日签订了停战协定。同日，双方颁布了停战令；在重庆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也在同一天开幕了。然而，国民党反动派在颁布停战令之后，仍向解放区发动了新的进攻。

赵尔陆司令员燃着一支烟，狠狠地吸了一口，然后用手指着地图上古北口以南的石匣、密云说："国民党九十二军和十六军共4个师，正在这一带集结，企图于1月13日停战令生效之前抢占古

北口。那里,我们只有十四分区的少数部队,显然是寡不敌众。因此,军区要我纵队以主力迅速赶赴古北口,坚决保卫古北口!现在,我们部队离古北口还有 130 里路,你们旅必须在今晚 12 点以前急行军赶到那里。敌人离古北口的距离比我们近,所以,你们首先要用两条腿战胜敌人。2 天的行程要在 1 天内赶到,坚决把敌人阻止在古北口以南,后续部队很快就会赶到。"

我们静听着首长的指示,司令员的话,在深夜里显得格外响亮。寒风不断从窗隙里钻进来,赵司令员把披在身上的大衣拉紧了一下,手指移向古北口继续说:"这是万里长城东部的一个重要关口,平古铁路就从北平直达这里,再通往承德。因此,它就成了冀热两省的咽喉和承德的南大门。如果古北口被敌人占领,承德就受到严重威胁,我华北和东北两大解放区的联系也要被割断。敌人为什么要拼命抢占古北口?我们为什么要坚决保卫古北口,原因就在这里。"

我们当即拍电报给旅司令部,把情况和任务告诉他们,要部队无论如何在今晚 12 点以前赶到古北口。我们的部队离古北口 130 至 150 里路,而且天气严寒,道路崎岖,一天要走完这些路程,确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但是,我们相信只要指战员们明白了这次战斗的重大意义,那么,不管任务多么艰巨,也是能够完成的。

天一亮,我和旅长出发了。黄昏,我和旅长到了古北口。在镇上一家民房里,见到了提前赶来的纵队杨梅生副司令员。他正和十四分区副司令员王智涛同志研究情况。我在中央苏区红军学校时就和王副司令员认识,长征时也常和他一起打前站,自从过了草地,就没见过面了。今天一见,格外亲热。他满面笑容地紧握着我的手说:"真快呀,那时我们还都是毛孩子,现在长成大人了,哈——"他又和李湘同志握手,兴奋地说:"你们来得正好,部队还没到吧?""很快就会赶到的。"

根据王副司令员的介绍,知道敌人的前哨部队中午已和前沿

我军有了小的接触，估计明天一早，敌人就会向古北口进犯。杨副司令员命令我们，部队赶到后，迅速进入阵地，准备迎击进犯的敌人。

接受了任务，我们另找了一处房子，在一盏豆油灯下，开始研究如何部署兵力。旅长在地图上左指右划地捉摸着，屋子里异常寂静，只有铅笔在纸上发出的沙沙声。旅长忽然抬起头来说："政委，你看是不是这样？"他用铅笔指着古北口以南，潮河以西的新开岭说：："这是古北口南面的屏障，敌人一定会拼命夺取它，控制这一带高地，然后顺公路直扑古北口。因此……""敌人的突击方向可能在这里。""对！"他用手在地图上敲了一下，接着说："按今天的行军序列，三团先到，就首先进入新开岭一线阵地，河东地形狭窄，兵力不易展开，但敌人也一定会同时从河东进攻。我的意见把一团调到河东南台一带，独挡一面。二团就作为旅的二梯队，在公路以西郝家台一带集结，随时准备机动。你看怎样？""好，正合我的意见，就这样干吧！"我满心同意地回答。

夜越来越深了，我和旅长站在古北口街上焦急地等待着部队。约摸 11 点钟，从远处传来一片人声、马声，由远而近，打破了夜的沉寂，前卫三团的部队到达了。战士们一瘸一拐地走着。有的帮别人背着背包和枪，有的互相搀扶着。进了镇子以后，就在屋檐下空地上休息了。旅长向战士们说："辛苦了，同志们！""不辛苦！"一个小鬼满带劲地答道。"不会吧，小鬼！"我笑着说。"辛苦嘛，也不能说不辛苦，两头不见太阳赶了 130 多里，我们全班 9 个人没有一个脚上不打泡的！"另一个战士接着说，"可是，我们一知道为什么要走这些路，什么困难也都克服了"。旅长说："敌人不允许我们在这里休息，今天下午敌人已经和我们前沿兄弟部队有了接触，大家还得走上 20 多里，赶快进入阵地！"这一说，130 里急行军的极度疲劳似乎立即从他们身上溜走了，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地嚷起来："那就赶快走吧，还等个啥！""不能让敌人占咱解放区一寸土地，再累

我们也要赶到阵地上去！不能让‘部落’里的同胞再过那牛马不如的生活！”

那还是日寇投降不久的时候，我们从平汉路经延庆、四海等地到古北口去，一出长城进入热河省境，便处处看到日寇强迫人民聚居的“部落”。老百姓站在路旁用惊奇和怀疑的目光看着我们，伸出干瘦的手向我们要东西吃。那么冷的天气，人们还是赤身露体，女人们腰里只围块破布，老头们全身只裹块破羊皮。骨瘦如柴的孩子们，身上冻得青一块紫一块。日伪残酷的统治压榨，使他们一个个蓬头垢面，形容憔悴！我们从解放区来到这里，看到那凄惨的情景，真像万箭穿心！刚从日寇铁蹄下解放出来的人民，是多么向往过好日子啊！然而，丧心病狂的反动派却企图把苦难的枷锁重新套在人民的脖子上！部队这次行军，再过这些地方，旧恨新仇怎能不在指战员的心上翻腾滚动呢！

我们向三团首长交待任务后，部队连饭都没吃，又撑起疲劳的身体，向阵地开去了。

接着，一团、二团也都随到随接受任务，奔赴了指定地点。

在古北口西南的山坡上，设立了旅的指挥所。东方微微发白，各团相继报告：部队已按指定地点进入了阵地，正在紧张地构筑工事，准备战斗。

黎明前的黑暗，仍笼罩着大地。雄伟的长城像一个巨人默默地立在我们身后。此刻，没有枪声，也没有炮声，群山还在沉睡中。显然，这是激战前的暂时平静。在群山的那边，敌人一定打好了如意算盘。但是，他们肯定做梦也不会想到，数千名胸中燃烧着愤怒火焰的人民战士，正紧握手中武器，严阵以待！

天蒙蒙亮，我和旅长到指挥所前的山岗上，举起望远镜，向前望去：从古北口伸长的公路，像一条长蛇，循着起伏的山谷爬向远方。公路两旁，就是三团扼守的阵地——新开岭！寒风刺骨，我们的眉毛、胡子都结了一层冰，成了银白色。阵地上，战士们还在挖工

事，通讯员、炊事员还在往返奔劳。

太阳升到一竿子高的时候，敌人突然向我们阵地前沿和纵深打来零乱的炮弹。不一会，前沿阵地上响起了激烈的轻重机枪声和手榴弹爆炸声。原来，敌人仍以为我们这里只有一两个连的兵力，便大摇大摆、骄气十足地向我军阵地前沿开始攻击。当敌人快上山顶时，三团的勇士们突然一顿迎头痛击，打得敌人乱叫，死伤了一大片。敌人遭到意外打击后，发现我们的主力已到，便集中各种大炮向我猛轰。一团团烟火腾空而起，霎时间吞没了整个前沿阵地，初升的太阳也被遮蔽住了。三团的勇士们一次又一次地击退敌人的疯狂进攻。激烈的战斗已继续了 4 个多小时，到了中午 12 点钟，前沿主峰妈妈山在一阵杂乱的枪声过后，突然有几挺重机枪朝着我们这边打过来。我的心情紧张起来："是不是妈妈山被敌人占去了？"旅长也在担心前面的情况。不一会，三团一个通迅员气喘喘地跑到指挥所来。他头上缠着一条绷带，脸被硝烟熏得乌黑，一边擦着汗，一边向我们报告："我团在妈妈山打退敌人 8 次冲锋，给敌人以重大杀伤后阵地暂时被敌人占领。"旅长皱着两道浓眉沉思了一会，望着通讯员说："告诉你们团长，利用有利地形，坚决阻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争取时间，配合二团反击！"三团的勇士们，逐山逐沟地和敌人反复冲杀，反复争夺。又过了一个多小时，公路两侧的几个高地都被敌人占去了。

正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突然在右前方刚被敌人占领的山头上，响起震人心弦的喊杀声和手榴弹爆炸声——二团向敌人反击了。他们从侧翼迅速、秘密地接近敌人，勇猛地冲上山去。敌人遭到突然袭击，仓惶逃窜，旅指挥所里所有的同志都兴奋地跳起来，个个拍掌叫好。

勇士们继续向各个山头的敌人英勇冲击，当冲到公路以西的最后一个制高点时，遭到了敌人严密火网的拦阻。勇士们前仆后继，连续数次冲锋，然后端着明晃晃的刺刀杀上阵地。我在望远镜

里看到：英雄们在手榴弹爆炸腾起的烟雾中东冲西杀，左拼右刺，刺刀映着太阳的余辉闪闪发光。在英雄们的刺刀面前，没来得及逃跑的敌人，乖乖地举手投降，顽抗者则送了性命！有的战士衣服被敌人的火箭弹打着了，他们带着满身烈火扑向逃敌。……我的心被英雄们的行为激动着，我告诉身边的政治部主任袁佩爵同志："赶快给二团写封鼓励信，就说他们打得好，打得机智，打得勇猛！勉励他们继续发扬这种精神，和敌人战斗到底！"

敌人趁我立足未稳，向我死命反扑。在英雄们顽强打击下，敌人7次反扑都被打垮了。在暮色苍茫中，勇士们跨过公路，像一把锋利的尖刀，插入新开岭东山。敌人像被冲散了的羊群一样东奔西窜。正在向三团阵地进攻的敌人像家里着了火似的扭头就往回跑。三团的勇士们趁势向敌人压过去，敌我短兵相接，枪声、喊杀声搅成一片。敌人嚎叫着乱作一团。混战了一个小时，敌人除一部被歼，一部沿潮河逃跑外，其余退守妈妈山。

据一团报告：潮河以东也激战了一天。敌人拼命想夺取扼守通路的小庙山，无数次的冲锋，都被我们击退，阵地仍然屹立未动。

晚上，我们又派刚赶到战场归我们指挥的二旅四团的一个营，袭击妈妈山。他们秘密地摸上山头，把敌人打得懵头转向，乱作一团。后因山上敌兵力过大，给敌以巨大杀伤后撤了回来。

侦察参谋向我们报告：敌人在右翼香水峪方向频繁的调动。黄昏时，敌人曾向香水峪方向的十四分区友邻部队攻击过。根据情况判断，敌人今天在新开岭碰了钉子以后，很可能移到右翼，先夺取八大楼子，然后攻打古北口。我们连夜调整部署：新开岭阵地仍由三团坚守；二团调到右翼香水峪方向；前面放些小部队，迟滞敌人前进；主力摆在长城脚下，准备固守八大楼子；一团仍在河东，四团作 旅的二梯队。

夜一片漆黑。国民党反动派企图在13日24时停战令生效前抢占古北口的迷梦，被彻底打破了。但是，敌人甘心失败吗？会老

老实实的停战吗？不，我们绝对不能对敌人抱任何幻想，准备还击敌人新的进攻！

14 日拂晓，也就是停战令生效后 5 小时的时候，穷凶极恶的敌人果然从香水峪发起猛烈攻击，并在新开岭作牵制性的佯攻。敌人在炮火掩护下，向我军阵地进行连续轮番进攻。看样子，敌人是一不做二不休的，既然撕下脸皮来进攻，就要把古北口抢占去。我军英勇阻击着，在每一个山头上，都使敌人付出了巨大伤亡。到了中午，敌人虽然占去了几座山头，但是在这半天的战斗中，损兵折将，伤亡惨重。看来已无力再进攻了，便暂时停止攻击，与我军对峙起来。旅长放下望远镜，揉了揉眼睛对我说："我看敌人的本事已经用完了。""这就该看咱们的了。"我们都认为反击的时间已到，便向部队发出了全线反击的信号，并把四团也加上去。勇士们像决了堤的洪水一样，向敌人扑去，敌人一片片倒下去，一座座山头被我们夺回来，我们向敌人步步进逼。

我们正在观察这令人兴奋的场面，突然从南面飞来 4 架美国飞机，低空盘旋，连座舱里的驾驶员都可以看见，从飞机上像片一样地撒下了停战传单。以和平使者自居的美国人，不迟不早偏在这个时候散发停战传单，偏袒何方不是很清楚了吗！侵占了我们那么多阵地，难道就罢休不成？旅长命令战士们，要更加奋勇地杀敌。直到黄昏，我们完全恢复了原来的阵地。我们从缴获的敌人文件中看到，国民党当局于 1 月 7 日向各地发出了"委座子阳电"。内称："各部在停战令未生效前应速抢占战略要点，尤其是热河方面。最好于停战令前占领承德，否则亦必然迅速抢占古北口、建平及凌源为要。"

古北口保卫战的胜利，打破了敌人的美梦，他们得到的只是在军事上、政治上的失败。

（作者曾任河北省军区副司令员）

平泉保卫战

杨俊生

（一）

1946年1月初，正当我们警惕地监视北平敌人，准备打阻击的时候，纵队突然接到军区急电：东线之敌国民党军队第十三、五十二军占领辽西义县地区后，分向朝阳、北票攻击，继续沿锦古铁路西犯，企图抢占平泉县城，尔后西犯承德，令第一纵队迅速奔至平泉，坚决阻敌于平泉以东及东北。

第一纵队遂奉命将古北口防务移交冀东部队，一旅由古北口，三旅由滦平，二旅由遵化等地出发，兼程行军赶往平泉地区。

纵队杨得志司令员、苏振华政委、卢绍武参谋长等先行到达平泉，会见由承德至平泉的军区首长肖克、程子华等领受任务。1月9日，曾思玉副司令员带魏鸣森作战股长和尹先炳旅长、戴润生政委也乘汽车由遵化经喜峰口赶到平泉，共同研究阻敌部署，并派魏鸣森带汽车前往小寺沟车站拉弹药补充各旅。

1月13日午前，第二旅和第一、三旅先后赶来，分别进至五十家子、三十家子、二道河子等地区。杨苏首长估计，敌第十三军先头团将于当日抢占平泉城，我纵队可先敌占领该城北、西、南三侧山头有利地形，突袭、围歼敌先头团于平泉，即率各旅营以上干部及侦察分队一百几十人，前往平泉看地形。

我们登上西北山头，见平泉城被两侧山地环抱，小平房屋与街道沿东西铁路两侧展开，东西长达一二华里，且没有城墙，利于我

依托山地，居高临下突袭进城之敌。为熟悉城内街道地形，在侦察分队警戒下，我们从北口进城，接近火车站时，忽听城东北枪声激烈。警戒哨报告：敌派出先头团翻过东北山梁斜插过来，敌侦察兵入城搜索，与我侦察兵发生遭遇战。敌后续部队开向平泉。

杨司令员立即命令侦察分队掩护纵队营以上干部撤出，一旅进至大同沟，抢占平泉西及西北山地，并前出一个营占领了城西侧几个院落，二旅进占平泉南侧，三旅抢占北面山地，敌先头团与我入城部队在西街上对峙起来。

（二）

黄昏后，在大同沟纵队指挥所，杨苏首长找来各旅旅长、政委商定歼敌部署，决心集中纵队主力于当夜突袭歼灭敌先头团，夺占平泉城。正当部队于当晚12点前向平泉运动的时候，敌十三军入城部队因处于不利地形，怕我夜间袭击，派人送来一封停战书交我前线部队转纵指。这时我纵队又接到军委电报：国共双方已于1946年1月10日签订了“停战协定”，并于当日下午下达了停战令，规定（不含东北）双方军队应在1月13日午夜（12点）就各自位置停止军事行动。纵指向冀热辽军区首长报告了敌人向我致函情况，请示是否攻占平泉，歼敌先头团。晋察冀军区副司令员兼冀热辽军区司令员肖克指示：我们要坚决执行停战令，敌十三军既然致函表示停战，就不能对他们发动攻击，夺占平泉了。如有违令，无论谁，都按党纪处分。

第一纵队奉命停战，入城部队于次日拂晓撤出平泉，迅速扼守城围山地有利地形。杨苏首长命令：一旅位平泉西侧二道河子、七沟一线，从正面与敌人对峙；二旅位平泉南五十家子一线，三旅位洋北三十家子、黄土梁子一线，从左右翼两侧保障一旅正面布防，坚决阻敌于平泉及以东。各旅于指定位置均依托山地构筑阵地工事，扼守交通路口。与敌第十三军对峙的友邻部队为：詹才芳纵队，

位我右翼沿南小寺沟至宽城一线；周仁杰旅，位我左翼沿北叶柏寿至宁城一线。

停战不久，我们就接到通知；现已成立了停战机构，由国方代表张群、共方代表周恩来及美国特使马歇尔参加，组成“军事三人小组会议”，马歇尔任会议主席。同时还组成了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和各地执行小组，我方：冀热辽军区代表肖克，平泉地区前线部队代表杨得志，北平军调部共方代表陈伯钧；一旅参谋长李觉为前线部队代表也参加执行小组谈判。国方代表主要有第十三军军长石觉，美方代表有北平军调部派出的一名美国炮兵上校军官等。

在二道河子七团（现四十六师一三六团）前哨山头阵地东面，有一条西距平泉6华里，通往七团阵地的小路。在小路经过的小河边有一个仅有3户人家的小村，位于敌我双方阵地之间的非军事区，是双方谈判经常接触的地点，战士们称它是“三家子”村。

停战后第二天，我方谈判代表肖克、陈伯钧、杨得志等首长乘一辆靠烧煤发动的旧汽车，与乘美式吉普车前来的敌方代表石觉和美国炮兵上校等，抵达二道河子七团前沿阵地，准备到平泉谈判停战划界问题。我、邓存伦、李觉和七团李程团长、臧先初政委等前去迎接。

李觉把我介绍给美国上校：“这就是我们的旅长。”

那美国上校军官见我不到30岁，很年轻感到惊讶。李觉回答他：“在中国，人民军队中，30来岁的指挥官多的很，还有更高的干部都是参加过长征的老红军。”那美国军官不得不点头称好。

执行小组去谈判，下午结束，陈伯钧随美国上校留平泉，肖克、杨得志首长和李觉回到七团团部。我让李程和臧先初把他们请到团部后院的北屋里歇脚，臧先初又布置炊事员准备饭。当时部队生活正是艰苦时候，什么也搞不到，只炒了一盘土豆丝，焖了一锅小米饭来招待首长。

我们和首长一起吃饭，肖克和杨得志司令员吃得很香，都说：

"官兵一致，同甘共苦，是我们的老传统，这样的饭菜，很好、很好！"

我们向肖副司令员和杨司令员询问谈判结果，他们谈到：敌十三军抢占平泉，是为了控制北宁路，保障平津至沈阳交通干线的安全。同时也是为了进一步进攻冀热辽解放区，以达到其分割东北与华北解放区联系的目的。由于我们部队控制了平泉西、北、南侧山头有利阵地，居高临下压住了敌人，因此石觉总想把平泉周围重要制高点夺过去。在谈判中，无理要求我们从这些山头上撤下去，说若不撤，"是对平泉造成威胁"。美国炮兵上校自称"公正的中间人"，却处处与石觉一唱一合，一个鼻孔出气，很不公道。肖克、杨得志首长义正辞言地驳斥他们的滥言，指出我军先占平泉，主动撤出，是为了避免不必要冲突，已经是很大让步了，表达了共产党寻求和平民主的真实诚意。国民党第十三军不能得寸进尺，步步向西蚕食，石觉的无理要求是完全违背停占协定精神的。我方据理力争，完全压倒了敌人的嚣张气焰，保证了划定双方军事分界线的顺利进行。

此后，我方停战执行小组成员每次由承德来平泉谈判，都要经过一旅七团驻地，在此歇脚。杨司令员多次具体指示我们与敌人开展后发制人，有理、有利、有节的政治与军事斗争，给了我们巨大教育和鼓舞。七团在二道河子一线与敌人对峙，团警卫连和二营阵地距敌人阵地，远者百米，近者不过十几米，双方都在山头阵地前沿拉起了铁丝网，规定谁也不准越过对方铁丝网。各部队积极开展对敌政治宣传教育工作。七团二营营长师仲伟利用春节以给对面山头上一个敌营长送礼为名，进行宣传工作，争取了两名被十三军收编留用的日本人，手举白旗向我投降。

我与敌对峙，不仅是政治斗争，而且是军事斗争，停战后，东面敌人总想扩大势力范围，不断以小股袭击，骚扰我旅前沿阵地，企图夺取我方制高点。我即命令前线部队，站在武装自卫立场上，坚决回击敌人制造事端、武力挑衅行为。2月中旬，敌十三军之第七

师对三旅守备的黄土梁子阵地发起突然袭击,三旅守备部队奋勇抗击,伤亡很大,前沿阵地失守。为此,杨得志司令员教育部队要随时保持高度警惕,歼灭来犯之敌,同时与敌人进行谈判斗争,向石党提出严正警告和抗议,从政治上向社会舆论界揭露国民党假和平、真内战的丑恶嘴脸。

热河省是一个以农牧业为主、经济落后,蒙、满、汉同胞集居的地方,自 1933 年沦陷,在日寇残酷殖民统治压榨下,人民过着配给制的奴隶生活。敌实行并村,将山区分散民户驱赶、囚禁在公路边的"居家部落"内,以日伪人员严密监管,完全丧失人身自由。敌强令广种鸦片,毒烟流行害及妇孺,且粮、盐、布被日寇盘剥奇缺,人民生活贫困,衣不蔽体,身心受到极大损害。抗战胜利,我们于 1946 年初来到这里,过去殖民痕迹到处可见。在部队宿营地村庄内,指战员们见村民一家老少三代赤身裸体,在一个炕上生一盆火取暖,十七八岁的姐妹无衣裤不敢出门,有的人用玉米叶做成前后掩体,有的人看见生人来了,用烂麻布遮挡前身。这景象惨不忍睹。于是部队自觉自愿地将自己衣服除留下一套单装外,其余的纷纷送给乡亲们。

此刻正是数九隆冬,寒流袭来,气温骤然降到零下三十几度。指战员们披风冒雪,不分昼夜地在山上放哨警戒,许多干部战士冻僵昏倒在战斗岗位上,遭受冻伤,甚至被饥寒夺去生命。同志们仍然以苦为荣,毫无怨言。当杨苏首长也身着单衣前来前沿巡视时,听我们介绍部队忍饥受寒、严守阵地的事迹后,都激动地说:"我们不仅是与国民党斗争,而且是与饥饿、严寒斗争,同志们以罕见的勇气战胜天然酷寒的袭击,深受锻炼,发扬了忍耐顽强、自我牺牲,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

我们的部队,就这样在异常困苦的环境中,进行着特殊战斗,在提高军政素质,增强政策策略主动性方面,都经受了新的考验锻炼。

3月上旬，我旅任务移交三旅继续执行。第一纵队除置一部分兵力于平泉一县阻敌外，将主力移至承德附近头沟、六沟、北杖子、五家子、大庙等地区休整，进行整编，整顿战斗序列，以增强战斗力。

休整期间，部队普遍开展了时事政策、拥政爱民，反骄遵纪教育，进一步充实巩固了战斗力。同时，为响应党中央、毛主席关于"减租和生产是保卫解放区的两件大事"的指示号召，抽调了一批优秀干部战士组成工作组，深入头沟、三沟、六沟、七沟及围场县等地，协助地方政府发动群众，组织农协会，建立乡村政权，贯彻执行减租减息、清匪反霸、土地改革（通过查黑地分给农民）等工作。地方政府又解决了部队过冬衣、鞋、帮助我们度过了严寒的冬天。

3月间，蒋介石背信弃义地在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上撕毁停战协定和政协决议，坚持关外大打、关内小打，进攻解放区，无理要求我军退出苏、皖、承德、安东（即丹东）、冀东等地区，欲将我军限制在几个狭小地区内图谋歼灭。4月上旬，关内暂时休战局面又遭破坏。为制止敌人进攻冀热辽，军区决定组织热东战役，第一纵队奉命于8日进抵黑城一线，伏击可能由平泉经黄土梁子北援平庄之敌第十三军一部，以保障友邻部队围歼赤峰以南之平庄和天义县城之敌。后因平泉之敌未出援，第一纵队即进取锦古铁路上的叶柏寿镇及车站，一旅任主攻，与叶柏寿之敌接触。悉敌增加一个师，为避免消耗战，即停止攻击。热东战役告结束。与此同时，平泉之敌十三军为配合东北作战，于4月11日晨，以一个师兵力，在飞机轰炸、炮火掩护下，向平泉以西凤凰岭二旅五团附近军区特务团阵地猛烈攻击竟日，敌遭遇坚决阻击，伤亡惨重而窜回平泉。

5月6日，第一旅进至大名城以东，天义县以西地区休整。至7月上旬，又移至承德东西地区集结，准备执行新任务。

（作者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炮兵司令员，少将军衔）

保卫承德

周仁杰

日本投降，抗战胜利，举国欢腾，人民渴望和平，建设国家。

1945年8月28日，我们在延安机场，怀着亦喜亦忧的心情欢送毛主席赴重庆谈判。9月22日，我们离别了战斗和生活过9年的陕甘宁边区，从革命圣地延安出发，经吴堡渡黄河，进入抗日战争中沟通前后方的战略要冲晋西北解放区，跨过日伪占据的同蒲铁路，来到著名的晋察冀解放区。我们这支由中央党校学员和中央机关干部共120余人组成的队伍，经阜平于10月下旬抵达张家口。晋察冀中央局主要领导同志接见了干部大队，多数干部被留下分配工作。我和少部分同志于11月初到达承德，冀热辽中央分局和军区把我和漆远渥及吴彪同志分配到冀中纵队第一旅。

冀中纵队（黄寿发纵队）是冀中根据地的工农子弟兵，编成五个团和一个独立支队共13000余人，在承德组成第一、第二两个旅。我任一旅旅长，漆远渥为政委，杨力任副参谋长，吴彪任副主任。下辖三个团：六十二团，团长曹志学，政委韩仰山；七十一团，团长白云峰，政委肖泽西；七十三团，团长潘云堤，政委马得骏。全旅6700余人，旅直机关是临时凑成的，工作人员极少。

纵队原是奉命到承德接收武器装备的，因此每个班仅带一二条枪用于站岗放哨，其余武器装备都留在冀中。但到承德后，部队并未得到武器，只令留下待命。冀中纵队，经过抗日战争的考验，对敌斗争勇敢，革命意志坚定，有一定的平原作战经验，但从未离开过自己的家乡。到达热河后，部队思乡情绪严重。我们到任后，首先到各团了解基本情况，初步熟悉了部队。经研究，决定利用部队

待命之机，着手整顿部队，以加强组织建设，进行军政训练，使这支部队从政治上、军事上转入正规。整训时间虽短，也初见成效。但不安于留在热河的思想并未解决。当初出关是满怀热情来接收装备的，如今仍是徒手兵，不能进行正规训练。而那些以少数老骨干扩充而成的新部队，却是全新的日式装备。当时流行的传说是“新部队，新装备，只能看，不能用”。“新兵背新枪，老兵没有枪”。尤其是基层政权尚不健全，群众没有发动起来，加之大批散兵游勇、日伪警察残余、土匪到处在捣乱。群众中所谓“正统”思想很普遍，我军尚未站稳脚跟。部队从富饶的冀中平原来到贫瘠寒冷的热河地区，每天吃存放多年已变质的陈高粱，天气寒冷，服装单薄，各方面供应都很差，生活十分艰苦。

1946 年 4 月下旬，我旅奉命准备接替杨苏纵队正面防御平泉之敌，保障省会承德安全的任务。接到命令后，我率参谋人员前往三沟杨苏纵队司令部，这是我第一次与杨得志、苏振华协同作战。听取情况介绍，接受防御任务后，随即返回旅部，召开会议，传达了任务，研究部队行动计划和接防部署。杨苏纵队自 4 月底逐步撤出阵地东移，我旅同时进至防区。为了尽快熟悉我旅的防区，有事便于协同，进入防区后，我即与各团军事指挥员视察阵地、看地形，检查各团布防位置和了解当面之敌的情况。5 月 5 日前全部接防完毕，杨苏纵队进至天义以西大明城一线整训。

我旅以七十一团接防七沟至凤凰岭一线阵地，与平泉正面之敌十三军对峙；旅部率六十二团位于六沟，防御平泉西南之敌，并与小寺沟以北的热河第二旅取得联系，旅教导队及旅后勤位于三沟。

我旅正面之敌第十三军军部率主力第四师及八十九师（应为一九五师，下同——编者）的一部分于平泉，五十四师位于平泉以北的黄土梁子，八十九师的另一部位于凌源，形成大三角。该军是当时热河敌军主力，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我旅只有两个团编制，员额不足，部队消耗减员也未得到补充，但部队轻武器装备齐全，经过整训士气高昂，担任的防御正面宽达百余华里，前沿阵地距敌仅十几公里；敌我游动巡逻和潜伏哨常常不期而遇，以我们这样一支部队，对付兵力多倍于我、全套美械装备的远征军，敌我力量十分悬殊。作为指挥员，面对此现实，我不能不严肃思考怎样避敌所长，加强我防御的稳定性问题。

我旅政治素质是不错的，近几个月来又有所进步。这是我们战胜敌人唯一的、但却是极重要的基础。进入防御阵地后，我们对部队进行了深入的政治动员，更强调党团员和干部的模范作用。为使大家坚定防守信心，提出在战术上如何扬长避短，学会近战、坚守阵地战和山地攻防战，以抵消敌人火力优势。我们号召结合当前实际学习和运用冀中的地道战和太行山黄烟洞坚守防御战的经验。同时，还大力构筑工事，请示军区发给作业工具、补充器材和弹药，特别是手榴弹。那时还不曾有地雷，我们在接近阵地前沿埋下集束手榴弹和炸药包。为了加强前侧方警戒和游动便衣警戒，在敌人“眼皮底下”设潜伏哨。利用当时的“和谈”，我军侦察员经常化装进出平泉市区。当敌人常对我防区进行破坏，抓走群众、搞得老百姓寝食不安，蓄意制造摩擦时，我们毫不示弱、针锋相对，抓住有利时机，打击敌人，还时常派出小部队对敌防御阵地进行袭扰。敌人有所收敛。敌人进驻平泉已经5个多月了，国民党中央军的所作所为，激起了人民的愤慨，群众所谓“正统”思想开始瓦解，我们借助这个有利条件，通过群众的亲朋好友了解敌情，敌战区的群众不时送出敌人情报，使我预先掌握了敌人进攻凤凰岭的行动，粉碎了敌人的进攻。5月25日拂晓，十三军两个团分别向平泉西的七沟——凤凰岭及西南的二道河子、五十家子等地发起进攻，我军早已严阵以待。

国民党第四师第十团附炮兵，向我七十一团一营凤凰岭阵地进攻，敌首先用炮火轰击，接着敌人沿公路向我冲锋。这时我七十

一团一营隐蔽待敌，当敌进到冲锋距离时，我拉响集束手榴弹和炸药包，机枪，步枪同时猛烈射向进攻之敌；当敌冲到我军设置的障碍时，又拉响第二道集束手榴弹。我步枪机枪的密集火力和手榴弹的成群爆炸，打得敌人无力前进，丢下一批尸体和受伤官兵溃退下去。我军利用短暂的间隙，迅速整理部队，安置伤亡同志，捆绑和安放集束手榴弹，修补被打垮的工事和障碍，准备敌人第二次进攻。

不到两小时，敌又炮击我阵地。这次炮火更加猛烈。阵地上黄土弥漫，石子横飞。一群敌人在烟幕尘土的掩护下，利用炮火向前隐蔽运动，占领我前沿阵地的一个山头。姜兴发营长发现，乘敌立足未稳，发起了反冲锋。在这紧张的时刻，七十一团的二梯队赶到，派出一部兵力配合一营从防御阵地侧翼迂回拦腰截击进攻之敌，夺回了前沿阵地。打退了敌人第二次进攻，敌我双方对峙着。为了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当晚，我七十一团一营利用雷雨天气，以一连为主攻，二连助攻，全歼敌防线边沿的一个特种侦察排 30 余人，(敌排长原为副营长，班长原为连长，成员均为排长)缴获冲锋枪和手枪 30 余支。敌人此次进攻没捞着便宜，共伤亡 200 余人，只得缩回平泉城。

凤凰岭阵地是我防区的一个突出部，距平泉城不到 15 公里，与敌前哨遥遥相对。我旅接防 20 余天，敌人知我换防，就多次进行试探性进攻，这次大规模进攻，也可说是敌进攻承德的一个信号。我们认真总结了这次战斗的经验，教育部队树立敢打必胜的信心。为此，组织了六十二团教导队和七十一团未参战的连以上干部和部分机关干部，实地参观学习，研究“凤凰岭保卫战”的经验。通过此次战斗，我深感防御正面宽大，兵力薄弱。

6 月初，为了适应新的形势，军区令热河独立一旅和和独立二旅合并为冀热辽区第十三旅，旅长周仁杰，政治委员覃国翰，副旅长黄鹄显、陈云中，副政委刘汉(不多久调回军区)参谋长杨力，，政治部主任吴彪。下辖三十七团，团长王振东，政治委员韩仰山；三十

八团，团长刘桐善，政治委员兰文兆；三十九团团长白斌，政治委员肖泽西；总人数近5000。健全了旅团机关，连队兵员基本上充实，战斗力明显加强了。

整编后，我旅防御正面虽然扩大，但全旅上下对完成正面防御任务信心更足了。为此，我们对防御兵力部署略有调整，三十七团位于六沟、三十八团位于承平铁路以北的水泉、屈家沟、杨树沟门、榆树沟门、不含小寺沟；三十九团位于七沟、凤凰岭一线，旅直机关驻三沟。我旅与小寺沟以南的第十四旅以铁路相衔接，主要任务仍为防御平泉之敌第十三军。

自6月至8月中旬，基本上是敌我相持阶段，除小型试探性、侵扰性接触外，处于平静状态，实际是里紧外松，双方都在紧张地备战，处于激战前夜，我旅加紧训练，不断加固工事，准备抗击敌人更大规模的进攻。

1946年8月下旬，国民党撕毁了停战协定，国民党十三军终于向热河首府承德进犯了。

承德及热河是联接关内的战略要冲，我军据守承德及热河，在侧翼对蒋军进攻东北构成很大威胁。因此，蒋介石一直要抢占承德，占领热河。当时我军保卫承德的条件尚不具备，不仅兵力悬殊，群众基础、物质条件等都不足，但并不是无所作为，主要问题是冀热辽受"停战谈判"的"和平"空气影响较深，所以在承德撤出前后，许多人感到不可理解，持置身事外的旁观态度，当时我们连一个担架队都组织不起来。

承德正面的防御任务，由杨苏纵队承担了近4个月，随后由独立一旅后改为十三旅防守，也是4个月，沿铁路线承德南面的防务由独立三旅后改为十四旅担任。杨苏纵队是当时的主力，5月初进到平泉东北的大明城，6月下旬调到承德附近，似有打击进攻承德之敌的意图。但7月该纵队调出热河，保卫张家口去了。因此，守卫承德的部队，仅有正面十三旅和南面的十四旅。冀热辽军区其它

部队则分散于各地：十六旅位于赤峰以南、十七旅活动在建平及其东北地区、十八旅在建昌地区、五旅位于冀热察边沿区，他们的主要任务是：分散剿匪、控制地区、开展游击和建立政权等，当时这些旅建制不齐（两三个团不等），兵员也缺。

蒋军准备进攻承德的是十三军的四师、五十四师、八十九师，据说还从东北抽调七十一军的九十师。第二线兵力有九十三军，古北口方向有华北方面的部队。当时敌我力量悬殊太大。

党中央早在6月21日就电报征询对承德“守与弃”的意见，26日电报则明确指出：做退出承德的准备（当时下面不知此意图）。到8月下旬，军区下达撤出阵地、破坏道路等指示。我们受命后立即行动。为了迷惑敌人，将辎重物资等利用夜间先撤离防区，组织部队和动员群众分段破坏七沟到三沟公路桥梁。部队主力于25日晚开始有计划地撤离阵地，指定一部分战斗部队选择有利地形，交替掩护后移。

8月26日，敌十三军分三路进犯：中路为十三军军部率第四师主力，由平泉沿公路经七沟、六沟、三沟直向承德进攻；右路为五十四师及另一个团和土匪骑兵部队，从黄土梁子、经大庙、头沟、中关掩护其中路迂回承德；左路为八十九师一个团及骑兵，从平泉以南沿铁路经小寺沟、下板城向承德进犯。

为掩护承德党政机关撤退，我军十三旅、十四旅分别由七沟、六沟和郭杖子等地阻击进攻之敌，迟滞敌人行动后，有计划地撤出阵地。在另一方向上，我旅后卫阻击中路进攻之敌，迟滞中路敌军行动。27日，敌中路第四师进占六沟。两旅主力于27日分别后移：十三旅撤到中关地区，十四旅撤到高寺台一线，继续掩护军区机关，直属部队撤退。是日，突然接到军区电报，令十三、十四旅于头沟设伏，歼灭右路之敌。

8月28日晨，热河军区首长和参谋长赶到前中关，临时召开作战会议，研究打击敌五十四师的作战方案。会未开完，我三十九

团前哨即报告听到头沟方向有枪声。接着，侦察部队报告，敌先头部队已过头沟，正向中关前进。

到此，会议未开完，临时作战计划没有实现，也不可能实现，如此大部队作战行动，临时变动非常困难。因此，仍按原部署占领阵地抗击敌人。

十三旅28日中关战斗部署是：三十九团于前中关左前方占领北山根据地；三十八团占领前中关608高地；三十七团及旅指挥所于后中关的东营山地，形成斜前三角。至关重要的是三十八团阵地，正面抵御头沟西进之敌。敌进到头沟后，兵分两路：一路攻击我608高地，另一路沿公路直指高寺台。

军区机关的先头部队，在前中关遭右路之敌侧击；军区机关则与沿公路西进的左路之敌遭遇，迫使军区机关分两路向隆化方向西撤。

28日下午2时左右，军区机关大部分撤出，但公路上仍有许多零散人员，我旅两个团主力仍坚守原阵地。这时敌正向我三十八团608阵地发动猛烈进攻，两架敌机从敌人进攻开始，就不断地沿承德通往隆化的公路反复轮番轰炸扫射，配合地面敌军向我进攻。三十八团顽强抗击，并适时反击，但后来该团节节后移，情况很危急。见此情况，我与覃、杨商量，我亲自去指挥三十八团，旅主力及公路上的机关人员不撤完，三十八团不能撤出战斗。于是，我率作战科长李广林及参谋和通讯人员乘马下山。在公路上遇见副旅长陈云中，了解到三十八团指挥所位置，我们正要越过公路，遭敌机扫射，我和李科长中弹，战马受惊，将我摔到10几米远的高粱地里，当时我已不省人事，陈中云副旅长当即派出一个班护送我向隆化转移。后来，知道敌于黄昏前停止了进攻，我三十八团撤离阵地和军区机关部分人员及辎重向隆化转移。敌于28日占领承德。

（作者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副司令员、中将军衔）

热河军调小组

王振兴　张丽华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集团不顾全国人民渴望和平的强烈愿望，悍然大举向解放区进攻。当其在军事上遭到痛击，感到准备不足，政治上受到全国人民及各民主党派的强烈反对，陷于孤立之时，又施展两面派手法 。一面积极调兵遣将，准备全面内战；一面打出"和谈"的招牌，以便争取时间。我党为了表示和平诚意，揭露国民党内战阴谋，做出许多重大让步，终于在1946年1月5日达成《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的协议》，并决定从1月13日24时生效。为了监督《停战协定》的执行，在北平成立由国方（国民党）、中共和美方参加的军事调处执行部，并向有冲突的地点派出若干军调执行小组。但蒋介石打内战的方针是早已定下的。而且是不会改变的，就在停战令发布的前3天（1月7日），他向的部属下达了作战密令："政治协商会议日内开会，我军应于停战令未下达前，占领有利地点，已下令前进至某地而未达到者，应催促其星夜前进……"而且还强调："行动务希秘密迅速，勿资共方借口"。十二占区司令长官孙连仲向其所部转达蒋介石密令说："停战令10日晚即可下达。各部在停战令未生效前，应速抢占战略要点。尤其是热河方而，最好在停战前占领承德。否则，亦必抢占古北口、建平及凌源为要"。当时，杜聿明正在指挥十三军、五十二军之一九五师向热河进攻，1月10日占领凌源。当日晚，蒋介石亲自给杜密电："停战令即下，于1月13日午夜生效。着令各将领督率所部星夜攻击前进，务于停战令生效前，占领平泉等重要城市"。杜聿明接密电后，立即令十三军（缺八十九师）及五十二军之一九五师和二师一部迅速向平泉进

攻，于1月13日下午4时侵占平泉。另一路侵占叶柏寿等地。至此，在停战令生效前、共侵占了我北宁、锦承、叶赤等铁路线上的绥中、兴城、锦西、义县、阜新、北票、朝阳、凌源、叶柏寿、平泉等10座县城，直接威胁承德和赤峰。这样，就使热河成为当时"内战最主要的方向"了。承德和赤峰又成为争议较大的"热点"。因此，军调执行部在往全国派出的32个执行小组中，先后向热河派出3个执行小组。

1月16日，派出赤峰执行小组(第二执行小组)。国民党代表：谷汉礼上校，后为鄂葆光上校。中共代表：段苏权少将，后为向仲华上校(1946年7月)。美国代表：杜锐孟.德梯乐上校，后为托尔提罗德上校(1946年3月18日)。

1月31日，派出承德执行小组(第十一执行小组)。国民党代表：岳昌瀛上校，后为闵时济上校(1946年8月)

中共代表：陈伯钧少将，后为段苏权少将(1946年7月)、王效天上校(1946年8月)

美国代表：葛瑞夫上校、后为罗斯迈上校(1946年7月)。

4月初，又派出朝阳小组(第二十六执行小组)。国民党代表：马上校。中共代表：李逸民上校。美国代表：汉夫海军上校，后为易里上校(1946年7月至8月)。

军调执行小组的主要任务是：监察停战令执行情况，调处双方有争议事宜，防止发生军事冲突。担负着制止战争，促进和平的使命。而事实远非如此，美蒋代表实际已成了扼制八路军行动、扩大蒋军占领区的工具。执行小组名义是三方，实为两方。美、蒋一方，中共一方。这样，就使军调小组内部充满了极其尖锐、复杂的斗争。

对此，在1月27日《新华社记者驳斥重庆军委发言人谎言》中给予揭露：

"还在协定签定之时，国民党即坚决要求将热河地区置于停战范围之外。停战令公布后，国民党军队仍然不顾该约之存在，继续

向我热河驻军进攻。因此，虽然执行小组已派出前往，但国民党不是去调处，而使谈判毫无结果，就是今天签订协议，明天又把它撕毁，甚至乘机取利，向我袭击。国民党的通讯社和它所谓军委发言人在这方面造的谣言，更是离奇多样，颠倒黑白。其目的无非是混淆听闻，以配合其军事进攻罢了”。

这就是对国民党反动派对“和谈”所持态度的真实写照。所以，当时政局就处在打打谈谈、谈谈打打之中。在军事上，对其有利之时，就大举进攻。当军事上处于不利之时，就举行谈判，以争得喘息之机，作新的进攻准备。下面分别简述三个执行小组的斗争情况。

一．赤峰执行小组

1、国民党妄想在谈判桌上捞到赤峰。

赤峰是在1945年8月17日，我地下工作者王逸伦和宁（城）赤（峰）办事处主任张立文率领的游击队协同苏军解放的。当即建立了民主政府，并组建赤峰警备司令部和保安队。但国民党对赤峰早已垂涎，早在停占协定谈判时，就提出要接收赤峰和多伦问题，被我方代表周恩来坚决拒绝。1月13日前，又未能抢占赤峰，现在竟妄想在谈判桌上获得。

赤峰小组于1946年1月19日抵达赤峰市。在谈判桌上，国民党代表根据东北保安司令长官杜聿明的指令提出：“如果保安队是共产党的，则苏军允许保安队在赤峰就是破坏中苏条约；如果保安队是第三者的，则政府应该接收赤峰。”总之，国民党非接收赤峰不可。我方代表段苏权提出大量事实，据理力驳，说明赤峰是我军配合苏军解放的。况且，1946年1月11日周恩来在政治协商会议上，作有关停止军事冲突商谈情况报告时，针对国民党代表提出接收赤峰、多伦的要求时强调指出：“关于赤峰、多伦的要求，我们无法接受。因为那些地方，中共领导的军队，已在那里接收了，并已驻扎在那里。最后，政府方面撤回了这个要求……”。这一切都说明，

赤峰一直是解放区，不能以任何借口强行霸占。经过斗争，于1月20日达成协议：

"国民党军队停止在太平地，八路军停止在北井、双庙，赤峰由共产党领导的保安队维持治安。"这一协议本来双方都应遵守，但国民党抢占赤峰的野心不死。美方和国民党代表又在赤峰驻军问题上进行纠缠。对此，我方代表段苏权有一段回忆：

"美方代表为了达到撤走保安队的目的，谈判中暗示国民党代表，让其对保安队入城时间提出异议。当国民党代表由于迟钝未加理会后，又暗示国民党代表要求调查苏联红军未撤时城内保安队人数，而因国民党代表头脑简单，又未领会意图。于是，美方代表赤膊上阵，提出上述问题。对此，我们以热中保安队形成历史予以驳斥，使美方无言以对"。他们提出的驻军问题被击败后，仍不死心，又唆使中央社记者造谣说："军调部命令杜聿明进驻赤峰"。妄图迫使我让出赤峰，我方代表立即向北平军调部揭露此事。1946年1月27日，军调部发表声明，否认命令杜聿明进驻赤峰。声明全文如下：

军调部各委员仅此声明，本部并未如中央社记者自锦州所发电讯所云，曾向杜聿明将军发出占领热河重镇赤峰之命令。反之，执行部曾依照停战令命令国共双方将领于1946年1月13日24时起立即停止一切部队行动，且任何一方之部队均不得于赤峰苏军撤退时进行前往接收警卫任务。"为了彻底揭露美蒋的造谣，将此声明公诸于众。在我方代表坚决提议下，于1月30日晚，在美方代表宿舍里举行记者招待会，就驻赤峰保安队问题答新华社记者问：

问：赤峰治安由谁负责？

答：本地保安队赵福兴部。

问：保安队归谁指挥？

答：共产党指挥。小组认为是共产党的武装。

问：保安队何时到城内？

答：1945 年 8 月 17 日保安队即在城内。

中央社记者造谣被揭穿了，华北日报社记者又进行挑拨，发表了执行小组声明不许发表的“消息”，企图诬蔑我保安队“有违停止冲突命令”。其事实真相是：为了维护赤峰治安，我保安队派 200 人到四道井子(原赤峰苏军警禁地)警戒，同时写信通知了小组。后来执行小组说明不需要到此驻防后，部队就全部撤回了。

如果说是“有违停止冲突命令”，那么，为什么又同时书面通知小组呢？更有甚者，1 月 30 日，在美方代表房内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托尔提罗德上校肯定地说：“这是一个误会，”并郑重说明这一段不要发表。华北日报记者这样做的目的不是昭然若揭了吗？

2、建平问题的真相。

一事未平，美蒋代表又节外生枝，提出所谓建平问题。建平是 1945 年 8 月被我军解放的，在平庄建立了建平县政府，成立了县支队。1946 年 1 月 13 日，国民党军五十四师沿叶赤线向北进攻时，路经建平。我地方武装为避其锋芒，暂时撤出。后来，国民党部队又返回来。我部队曾进行抵抗，此后双方部队均未进驻。1 月 27 日，我军为了自卫，派保安部队进驻建平，国民党代表却诬我为不恪守协议。对此，冀热辽军区司令员肖克，于 3 月 2 日对新华社记者发表谈话：“我军 27 日占领建平，虽是 1 月 13 日以后，但是在国民党继续不停之进攻，更直接危及承德的严重情况下占领的，其目的仅仅是自卫。现在如果国民党在平泉停止进攻，我自可以退出建平。但国民党军在 1 月 13 日以后占领的地区亦应完全撤出。”3 月 13 日，杜聿明又来电声称：“在建平附近仍有共军二千人”。事实上，此时我保安队已全部撤出，倒是国民党派去徐某去任县长，妄图“接收”建平。半路上由于群众强烈反对、被截回。国民党颠倒黑白，却诬我不恪守“协议”。为了澄清事实，执行小组赴建平视察，证实停战前，国共双方部队均未进驻建平。3 月 24 日上午 10 时，执

行小组开会，美蒋代表不得不承认："1月20日至28日，建平村民自行管理村政，并无国共双方之驻军。"

3、**前线视察纪实。**

停战令公布后，国民党军屡次违约，向解放区进攻。执行小组到出事地点视察，美蒋代表竟在事实面前进行抵赖狡辨。请看我方代表段苏权少将记述的两件事：

一件是1946年2月中旬，国民党五十四师从天义大举西犯，执行小组去宁城视察。

"当我们乘坐的汽车赶到甸子时，当地群众报告，在甸子南二、三里处的马架子曾发生过战斗。我当即提出小组去该地视察。可美方却以汽油不够为托辞，不同意去马架子。美方这样做的目的就是避开到国民党军有违令行为的地方去。这样，可以不使他们当场出丑，又不让我们抓住把柄。于是，我严正指出，你们不敢去，就等于承认了国民党军在马架子有违令行为的事实。

另一件是位于叶(柏寿)赤(峰)线上的莫里河、古山子等地，是国民党军在停战令生效后侵占的。在我们到那里视察时，不仅看到有国民党驻军，还看到了大量工事。根据以往经验，我怕他们以视而不见赖帐，就当场将工事指给他们看。可是，他们仍然支支吾吾，假装糊涂。回到赤峰，在小组会上，我郑重指出，国民党用铁轨架设碉堡，这是破坏交通，大搞战争准备，是违犯停战协定的行为，应当制止。美方代表听后，虽神色有些紧张，但却回避说"我没注意"。对美方的这种诡辩，我们一方面据理力驳，一方面提出备忘录，使美蒋代表处于被动地位"。

从这些事实可以看出，美蒋代表对谈判是毫无诚意的，他们不是歪曲事实抵赖狡辨，就是节外生枝，制造麻烦，使谈判僵局。对此，我方代表与之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二. 承德执行小组

承德执行小组于1月31日从北平出发,2月1日到达承德。

1、停战令生效后,国民党军仍大规模向解放区进攻。

停战令生效后,国民党军不断违约向热河解放区进攻。执行小组到达承德后,国民党军进攻次数更多,规模更大了。2月12日,新华社发表消息:在冀热辽"国民党军自1月13日至2月1日向我进攻达30余次,占我城镇14座。在此间,我方曾几次派员向驻平泉之十三军军长石觉交涉,要求停止进攻,但石觉置之不理。"

在热东的朝阳、凌源、平泉、建昌等县,不断遭到国民党军有计划的进击。更严重的是,国民党九十四军第五师,向停战令生效前,向冀东之丰润、玉田进攻。1月21日,以开入东北"接收"为名,进至绥中,不去东北,而折向热河。该师行动既未经北平执行部批准,也未通知执行部。因此是违法的。虽经我方代表提出其违约行为,但该师却继续进攻,而且进攻规模不断扩大。2月2日,该师部进驻凌源,并向凌源以南扩大占领区。7日,攻占凌源南之山嘴子。2月11日,竟攻至平泉东南50公里之桲椤树川,而且以后逐日西侵。

中共代表陈伯钧,不断将我军遭受攻击情况向小组报告,提出到当地视察。但美、蒋代表一直采取拖延办法。2月8日下午2时,在承德举行首次记者招待会。国民党代表岳昌瀛发言,一字不提国民党军违约进攻的事,而大谈如何调查恢复交通的事。在我方代表坚决要求下,美、蒋代表才不得不表示同意2月10日到平泉、凌源去调查。

2、平泉下坝高级将领会谈。

平泉县是1945年8月中旬,八路军赵文进、宋诚部及承平宁游击队郝福洪部协同苏军解放的,而且接收了农村敌伪政权。县政府一直在城内工作。1月13日,国民党十三军进攻平泉。当时,在

县城东、西、南都有我部队进行抵抗。在平泉县城东南20多里之广兴店、三家激战1昼夜，县城北10余里之影碑山子也进行了阻击。13日下午4时，国民党军沿锦承铁路线突入县城。晚9时，我詹才芳部又进入县城，双方激战至午夜，停战令生效后，八路军才遵约退出城外，驻于城郊附近，听候执行部合理解决。然而，此事执行部没有合理解决。国民党军第五师在平泉东南椁椤树川又不断西犯。就在执行小组到平泉、凌源、凌南交战地视察期间，敌第五师已侵入平泉境内20多华里，到达金杖子、杨杖子。2月7日，十三军五十四师，又从宁城之天义、八里罕、甸子南下进犯黄土梁子地区。9日，侵占黄土梁子，不断向我军阵地猛攻，势态不断扩大。这样，平泉县南、中、北均遭到国民党进攻。要解决热河问题，必须先解决平泉问题。经过协商，决定在平泉举行高级将领会谈。

在高级将领会谈前，我方曾两次派人去平泉与十三军会商，均遭无理拒绝。1月20日左右，热河省政府派平泉县民政科长王旭昌去平泉。十三军军长不见，副军长舒荣见面后拒绝会谈，并以不保证安全相威胁，将王旭昌武装"护送"出县城。2月11日，我杨苏纵队一旅参谋长李觉、平泉县长贺文涛随同承德三人小组到平泉会谈，石觉又拒之不谈。李觉提出大量事实说明五十四师正向我军猛攻，要求制止国军进攻。"三人小组"才不得不去黄土梁子调处。为了制造舆论，国民党还导演了一出"民意丑剧"，由土匪头子、伪满讨伐队长纪东阁的老婆周凤彩领着二十多个流氓，在会场门外喊口号，我方代表立即提出抗议。

16日，执行小组在平泉，凌源、凌南视察回到平泉。同时，冀热辽军区司令员肖克也到达平泉附近我军驻地。2月18日至19日，在平泉县城西6华里下坝村举行高级将领会谈。除执行小组三方代表外，国民党方面有：十三军军长石觉、秦高参、汪课长。中共方面有：冀热辽军区司令员肖克、赵（毅敏）参议，李觉参谋长。会议由美方代表葛瑞夫上校主持。首先，由肖克司令员提出会谈应解决的

3个重点：

①停止冲突问题。

②双方维持1月13日24日停战令生效前位置问题。

③双方部队遵照命令，实行隔离问题。

然后，由陈伯钧列举了国民党军在停战令生效后向解放区和八路军进攻的事实：①1月下旬，国民党军第五师自绥中、兴城、锦西分路进攻玲珑塔、药王庙、公营子。至2月15日，已攻击到梓椤树川的金杖子、杨杖子。②2月7日国民党军五十四师，从天义出发进攻大名城东西五家。9日，进攻到了平泉的黄土梁子。至11日，执行小组到黄土梁子视察，才停止冲突。

石党对这些事实，不敢做正面回答，而是采取歪曲事实的办法，提出一些所谓共军向国军进攻的事件以混淆视听。他们提出：1月13日至15日，共军连续进攻建昌，16日，七十一团占领大城子；17日，共军进占天义车站；2月2日、3日晚，袭击凌源；在凌南也有共军活动等。对此，肖司令员、陈伯钧均摆出事实给予驳斥。指出：1月13日至15日我军进攻建昌，是因为盘踞在建昌的是土匪子大川，不是国军；17日，我军进攻天义车站，那里是土匪"大明字"。他们危害人民和人民政府，进攻他们是必然的。后来，石党不打自招地承认国军收编了这些土匪。

关于进攻宁城大城子和凌南有我军的问题，我方指出：这些地区，从抗日战争起就有我部队和地方干部与日伪坚持斗争。日本投降后，我地方政府和地方部队也一直在这里工作。国民党军进攻时，他们暂时避开。国军过后，他们又回来，这也是正常。这也说明了并不是八路军进攻了国军，而是国军违约侵占了解放区。关于说我军进攻凌源的事是根本没有的，美方代表貌似"中间人"，实际上一再替国民党代表辩解。葛瑞夫上校急说："如一方占领城市，对方包围时，则城市中为了生存，必然要扩充其范围，打破封锁。我相信在铁路两侧活动是很合理的"。肖克立即给予驳斥："如果说为了恢

复交通，那只应用和平方法解决或只限在有冲突的地区，为什么国军要到那么远的地方(椁椤树、黄土梁子)去进攻呢。”美蒋代表无言以对。

美国代表只好提出讨论：确定1月13日双方位置和隔离问题。石觉提出“沿铁路线共军退出100里，城市退出60里，而且叶柏寿不在内。”肖克断然拒绝，并提出：“沿铁路线我退15里，城市以城市为中心退20里”。美方代表葛上校妄图以第2号命令压人，声言60里以内必须由双方同意，否则需按60里办。可否根据情况按50里呢？肖克将军立即驳斥：“该命令包括两个中心：一个是距离，一个是恢复13号位置，如果只强调一方面，我们在平泉可以一步不退。因为我们是恢复13号位置。”国民党秦高参歪曲事实说：“铁路两侧并无中共军队。”赵毅敏参议说：“我军有主力军、地方军和游击队活动。”肖克司令员也列举事实予以反驳：我们历来有个规矩，县不离县、区不离区。建平、朝阳、凌源县政府、县支队，13日前以至现在一直在那一带活动。还有我二十七旅一直在凌南一带活动，还有一个分区司令部也在这里。在平泉东南20里的三家，詹才芳部队与你们二师打了1天。我三旅于11日早晨在凌源三十家子北与你们打过一仗，以后退到路南。我冀南三旅在黄土梁子、八家、甸子及平泉以北地区，这是执行小组所知道的。”最后，国民党代表不得不承认：“我们不否认中央军到达前有中共军活动”。

在划定13日24时位置时，实际当时国民党军是沿锦承和叶赤铁路线突进，只占了两条铁路的几个点。石觉提出一个扩大了许多地区的位置图。

按照石觉提出的这张蒋军位置图，北至热水、贝子府一线，南至建昌，东至绥中、兴城一线，西至平泉的广大地区都应归国民党占领。肖克立即提出反驳，用事实说明，上述地区均为我军占领、活动。

最后，国民党代表无言以对，故作姿态，说明在某些地方可以

“让步”,以示“诚意”。实际上是此时东北战事展开,他们最怕东线有事,不得不降低一些条件,以取得喘息之机。但背后却准备着更大规模的入侵,我们当然不能上当。

会谈的几个问题,由于国民党代表缺乏诚意,都未达成协议。葛瑞夫上校 21 日回北平向执行部汇报。此后,国民党军以平泉为中心,陈兵 4 个师,形成对承德的威胁。

3、党坝协议初成,即被国民党方撕毁。

下坝会议由于国民党代表缺乏诚意而无结果。会谈后,蒋军又违约连续向我军进攻。2 月 21 日,国民党以 2 万兵力进攻我平泉以西二道河子、红山嘴子和东南方向的松树台。五师仍在椁椤树川继续西犯。23 日拂晓 4 时,又向我黄土梁子阵地猛攻。26 日上半夜又向我挑衅。我忍无可忍,奋起自卫。当南面(椁椤树)激战时,平泉城内国民党十三军四师于 23 日 3 时分两路出击,一路占大榆树、大营子,一路占大石桥、瀑河沿、五十家子。28 日,占领了小寺沟车站。

在我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对入侵椁椤树之敌五师进行了坚决地自卫还击。2 月 27 日凌晨至 3 月 1 日 3 天激战,将五师师部和十三、十四两个团,歼灭大部,残部被包围在郭杖子、王杖子不足三里的狭小地域内。对进攻小寺沟之敌也进行了坚决还击。

在这紧急情况下,3 月 1 日午,执行小组三代表仅带一名翻译员,乘吉普车急驶前线,以制止国民党的违约行为。

3 月 1 日,在平泉之党坝经双方会谈,达成如下临时协定:(一)中共军第二旅撤至大吉口以西;(二)政府军第五师退回平泉原防地,以上均限 24 小时内撤完;(三)占大石桥、五十家子、小寺沟的政府军亦撤回平泉原防地;(四)双方不许调动或冲突,一切待执行小组用会议方式公平解决。并说明此协定不妨害对整个热河问题的协议及恢复 1 月 13 日 24 时前双方位置。

党坝协定后,我军遵照协议规定向指定地点转移,不料在转移

途中，竟遭到国民党军四师和五师的夹击。3 日晚，后甸子国民党军又猛攻我小寺沟。当晚，执行小组召开紧急会议。对国民党军破坏协定深为不满。并认为被夹击中的中共军队如有损失，应由国民党方面负责。同时，国民党军第四师、第五师，均未遵守《党坝协定》之“退回平泉原防地”的规定。四师在占领地带大修工事、碉堡，企图固守违约侵占地区。五师于 3 月 14 日向建昌周围进行疯狂扫荡后，开赴东北、进行更大规模内战。

4、叶柏寿协定、凌南协定的错误。

在承德执行小组，我方代表在执行党坝协定和以后达成的叶柏寿协定、凌南协定，均有错误。对此，冀察热辽中央分局于 1946 年 4 月 6 日在《关于外交谈判工作总结》中(以下简称“总结”)进行了批评和检讨。

2 月 10 日、执行小组去平泉，当时分局的方针是：“坚持首先停止冲突，恢复 1 月 13 日 24 时位置，才能进行其它谈判，不得提让地方”。11 日，在平泉街与石党会谈，石态度高傲，要求我铁路两旁各退百里，平泉西、南、北各撤 60 里。全线要退至热水车站——黄土梁子——小寺沟——界岭口以西。我方代表允从正面退 20 里，未成协议。18、19 两日，举行高级将领会谈，由于国民党无诚意，仍无协议。至 3 月 1 日，蒋军五师在桲椤树将被围歼之际，才急急忙忙举行党坝会谈，达成党坝临时协定。《总结》中指出：“此协定除第三条未限时间外，一般尚无问题。但在执行中不要求首先撤退对方小寺沟之线的部队，反亲自与国方代表(美方代表坚决不去)首先停止我向五师行动，以解五师之围，且不经军区司令部及纵队首长而直接写信给旅级首长，令前线部队撤退，是可能消灭顽军大部而未果的原因之一。”

3 月初，东北战事展开，热河蒋军害怕东线有行动，从热河抽调兵力去东北，急欲小组进行调处。执行小组于 3 月 13 日赴平泉、叶柏寿、建昌一线进行调查。这时分局的方针是：“党坝协定未执行

前不与对方谈判任何新的协定”，且规定主要任务是调查 1 月 13 日 24 时位置。但我方代表未经分局允许，于 3 月 20 日在叶柏寿签订了叶柏寿协定：

“兹决定护送建平县长徐文亮及保安队回到建平，并负责执行全县县政，所有八路军及地方部队均不得有所妨害，并保证建平通朝阳公路安全。若有异议，须先向赤峰小组及承德小组请示，始能遵令行动”。3 月 22 日在凌南(建昌)，又签订凌南协定：“一、凌南(建昌)附近东北保安第四支队(注：国民党收编之土匪于大川部)及地方部队与中共军均于即日在原地停止，不准调动及相互攻击行为。如双方于 3 月 22 日 24 时以后，有一方再行调动部队和攻击时，即以违反协定论处。其责任应由调动或攻击方面负责之。二、凌南至凌源及凌南至绥中之公路，以现在双方位置，不准调动，但须保证双方徒手运输粮秣等，不致遭受另一方面之截击。否则，由截击者负责赔偿之。三、此协定并不妨害恢复 1 月 13 号 24 时以前之双方位置及彻底解决今后凌南全盘问题。”本来梓椤树战役后，一般情况是对我有利的，但这两个协定都有利于国民党，而不利于我们。其主要错误是：①同意把国民党的县长送回建平，并保证其“推行全面县政”，我们“均不得有所妨害”。很明显是保证了国民党在建平的反动组织。②保证凌南至凌源，凌南至绥中，建平至朝阳的交通安全。也是有利于国民党军事调动和后勤运输的。③而且这两处属赤峰小组管辖范围，承德小组实属超越职权范围。④承认于大川匪部为国军，就是承认其合法地位。本来对于匪，我们始终坚持其为土匪。因其关系到建昌属我，还是属国民党。(于匪 1 月 12 日占建昌，五师是 13 号以后进建昌)。

4 月 3 日，冀热辽军区司令员肖克向承德执行小组提交备忘录抗议指出：①他们超越了职权范围。②在党坝协定未彻底执行前，我方不执行这两个协定。

分局指出这些错误是“以让求和”，“外交工作上立场不稳”，而

且还有“违反组织原则”的错误。

三. 朝阳执行小组

3 月，东北战事展开。国民党为了保护北宁路畅通及侧后安全，害怕我军在热东、辽西有所行动，军调部又派出第二十六执行小组(朝阳小组)。

1、叶柏寿、凌南两协定必须终止。

朝阳小组面临的第一个问题是如何对待极不合理的叶柏寿协定和凌南协定。围绕两个协定展开了一场尖锐斗争。美蒋代表对执行两个协定急不可耐，在小组出发前开第一次碰头会时，美国代表汉夫上校就提出：“小组的任务一是监视双方部队不能调动；二是监督执行叶柏寿协定和凌南协定。”我方代表李逸民发言说：“关于那两个协定怎样执行，以后好商量”。汉夫：“有什么好商量的，就是执行。”李说：“不对，这两个协定有错误。”汉夫说：“有什么错误，你们陈代表签了字的”。李说“签字不假，但是在签字之前，陈代表被国民党代表灌醉了，需要以后好好调查一下。面且那两个协定也是超越十一小组职权范围的。”吵不出结果，只好放下了。

小组到朝阳后进行会谈。美蒋代表坚持执行两个协定，我方代表据理力争，强调那两个协定是承德小组超越权限定的，不能算数，必须重新会谈。吵了一天毫无结果。针对国民党怕我在热东有所动作的心理，李代表说：“你们如果一定要我执行，我就回去了，到那时，我杨苏纵队去打朝阳，我就管不了啦。”美方代表无可奈何，只好说：“咱们做个谈话记录，各谈自己意见，报告北平。”从此，两个协定不再提了。

有一次，趁我代表不在，美蒋代表单独去北票了解我军情况，被游击队把司机打死，汉夫受伤。回朝阳后，反诬我阻碍军调小组工作。李逸民回朝阳后，到医院探望汉夫，汉夫提出游击队开枪的问题。李说：“游击队设备太差，没有望远镜，看不清车上的标志”。

并说："按理应三方代表同时活动，我不在，你们不应该到游击区去。"汉夫自知理亏，只好作罢了。

2、国民党又破坏了第二次高级会谈，军调彻底失败了。

7月下旬，李逸民获知，蒋介石密令十三军在两周内攻取承德。当即把这一情况向冀热辽军区汇报，并在小组会上坚决建议去承德，会同承德小组到平泉召开高级将领会谈，要求国民党停止内战。7月21日，朝阳执行小组李逸民上校到承德，带来关于召开热河长官会议的建议。美国和国民党代表对此建议，采取阳奉阴违的态度，表面上不得不同意，实际上反对，并千方百计加以阻挠。在会议地点问题，本应选在中心小组所在地，或双方之间中立地带。可是，美国和国民党代表坚决选在平泉上二道河子，并在那里大造声势，布置其会场。其目的是一旦开不成会，就把责任推到共产党身上。其实，此地在平泉县城西10里处，是双方军事前沿，国民党不仅派出大批谍报队、便衣人员到处乱窜，还在相隔不到3里路的西坝村北侧，放了一个机炮营。机枪、小炮摆在那里示威。为了促成会谈，我方不避风险同意在二道河子。在会议时间上，他们明知承德距平泉路远，交通条件很差、又故意在这个问题上进行刁难。8月15日，未经三方协商，他们自行决定8月16日上午11时召开会议，被我拒绝。8月17日小组会议上，他们又提出在19日上午10时召开会议。我方觉得有困难，提出改为21日。美国和国民党代表坚持不同意。我方又提出19日下午6时到达，美国和国民党代表仍不同意。为了表示和平诚意，我方再次让步。

在参加会议人员问题上，我方提出李运昌参加会谈，对方要求肖克司令员参加，不承认李运昌是热河最高指挥官。我方代表段苏权指出：肖克司令员是晋察冀军区副司令员，不能作为热河最高指挥官，李运昌才是热河最高指挥官。后经北平军调部确定，国民党方面由十三军军长石觉，中共方面由热河省主席李运昌出席会谈。可是，国民党又耍花招，于13日晚突然提出石觉因病不能出席会

谈，派舒荣副军长参加。我方代表段苏权指出："我方为了和平，在会议时间、地点问题上均做了极大的让步。如果此问题不能解决，中共方面不考虑任何问题"。可是，第二天美国和国民党代表不顾我方反对，单方面去二道河子"开会"。

此次会谈，由于国民党阻挠而流产。我方代表于8月21日向军调部提出十七号《备忘录》指出："出席此次会议的我方高级指挥官李运昌将军曾两次亲赴最前线等候开会，费时7日，跋涉六七百里，足证明我方之诚意。不料18日晚，贵代表竟然提出石觉将军因病不能出席，另派舒副军长代表参加，我方严词拒绝。称病不参加会议的石觉将军，次日能参加舞会，岂非怪事。由此，足证明政府方面毫无诚意，而指挥官会议之破裂，应由政府方面完全负责。"

美、蒋代表破坏会谈，并非偶然，而是蒋介石集团做好大规模进攻热河解放区的准备。7月上旬国共双方会谈，国民党提出要中共退出4个地区的无理要求，其中之一就包括"退出热河全境"，当然遭到我方拒绝。从8月初开始，国民党集结了十三军、九十三军及七十一军之九十一师、五十二军之一九五师以及李守信的"热河人民自卫军"和几个保安队。8月21日开始，分数路向承德、赤峰及热西地区大举入侵，承德已经听到隆隆的炮声。执行小组已无法行使职权，"军调"彻底失败了。执行小组被迫于8月27日下午从承德撤出。

军调部驻承小组撤回北平始末

王乃天

边谈边打，做撤出承德准备

1945 年 10 月 10 日，中共代表与国民党政府代表在重庆签订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宣布双方协议必须“坚决避免内战”。另一面，蒋介石却继续调遣大批部队沿几条铁路线向华北、东北疾进。我军均予以沉重的打击。

美国总统杜鲁门，于 12 月 15 日发表对华政策声明，表示赞成中国“召开全国主要政党代表会议，以谋早日解决目前的内战”，派马歇尔来华“调处”内战。

1946 年 1 月 10 日，中共代表与国民党政府代表正式达成停战协定，双方颁发于 13 日午夜生效的停战令。1 月 14 日，为了执行停战令，由中共、国民党政府与美国三方面代表成立的军事调处执行部在北平开始办公。在三委员下，设军调处执行部及设分驻各地的执行小组，做“调处”工作。在此期间，国民党政府又节外生枝，坚持东北不在停战范围之内。在美国特使马歇尔和美国海军帮助下，大量运兵前往东北，扩大东北内战。经中共及全国人民的努力，于 3 月 27 日，国共两党签订东北停战协议。协议字迹未干，3 月 31 日，蒋军即在东北继续向营口、本溪、四平等地大举进攻。5 月 22 日，蒋军进占长春。8 月 10 日，马歇尔及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发表联合声明，袒护国民党政府，并宣称“调处”失败。8 月 15 日，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简称“军调部”）的中共委员叶剑英同志、美国委员罗伯逊从南京返回北平，（国民党方面委员郑介民已在北平）。

在这样形势下，国民党驻热河平泉的石觉十三军，正积极向承德进犯。当时，军调部驻承德的第十一小组，我方代表是段苏权同志。

8月初，中共冀热辽分局书记程子华同志找我（当时我是热河省委联络部长）谈话，说分局决定将段苏权同志调出承德执行小组，让他去指挥作战，派我去接替他的工作。先去当他的助手，以便了解情况。他还嘱咐我，在今后工作中，要及时向分局请示报告，分局决定不了的，还要向上级请示才能办。因为政治斗争复杂多变，讨论问题时，要多思考，不要轻易表态。我报告子华同志，在执行小组工作期间，临时改名王效天，他同意，并口头上授予我"上校"军衔。

我协助段苏权同志工作不到半个月，8月中旬他调出小组，我接替他担任中共代表。此后，小组发生什么情况，我便立即向分局汇报、请示。经常听汇报的分局领导，除子华同志外，还有黄火青、赵毅敏、欧阳钦等同志。我得到分局的及时指示，才在复杂的政治斗争中完成了任务。

撤 出 承 德

从8月19日开始，我军在承德群众的配合下，破坏了市郊的铁路、桥梁和车站，美方代表罗斯迈上校和蒋方代表闵时济上校一再向我方提出口头抗议。我方根据分局指示精神，仅作口头应付。26日上午，罗斯迈去北平"治病"，乘飞机回承德，在机场稍停即要乘飞机返北平。当晚9时，我方要求召开紧急小组会议，声明承德机场已被破坏，不能使用。罗斯迈要求到机场去调查，我方予以拒绝。继尔闵时济以承德不安全为理由，要求小组乘汽车先撤到平泉，然后再改乘飞机撤回北平。我方严正指出：承德受国军严重威胁，战事一触即发，留此正好进行"调处"，不能擅离职守。

8月27日7时半，承德警备司令员扬梅生 派一科长带着一个

班，持公函到交际处，强令美蒋两方立即停止使用电台。于是美蒋代表在紧急小组会议上，向我方提出严重抗议，我方不予理睬，警备人员迅速将美蒋电台拆下。三方代表争吵不休，8时半才用早餐。饭后，警备司令部又派人来，命令执行小组于当日16时前撤出承德。美蒋两方则要求留在承德"调处"，我方指出，双方战火无情，为了小组安全，一定撤出，否则，我方无法保证小组安全。美蒋人员抗议尽管抗议，事到临头，还是乖乖地随着部队撤离了承德。

执行小组连同交际处人员分乘两辆卡车，三方代表乘吉普车于16时前离开承德赴隆化。沿途军车运输频繁，小组车辆行驶比较顺利。到隆化时，天尚未黑，小组的食宿均在小学校里，警卫森严，美蒋人员一律不准外出。

遭蒋机空袭

28日早饭后，罗斯迈强行外出，被我警卫阻拦，他向驻隆化指挥员钟辉琨提出抗议书，被我警卫干部扔在一边，置之不理。就在这天，我军按计划撤出承德，承德被蒋军占领。

29日，美蒋两方一再想摸清我方意图，很想弄清把他们带到何处去，唯恐把他们当人质。我方一再声明：无论到那里，都是为了他们的安全。但他们仍放心不下。

30日上午8时半，小组从隆化出发向围场转移。下午，我一再向罗斯迈讲，蒋军飞机近日连续轰炸和平居民，小组的防空安全，实在无法保证。罗斯迈频频答复："绝对不会！"说这话不过2小时，即15点55分，小组车辆行至四合水附近（北距围场40华里，南距承德240华里），忽遭2两架美式蒋机扫射20分钟。小组前头的卡车所载的三方物品，均被炸成碎片，化为乌有；4名交际处工作人员，炸成肉泥，四溅在公路上和高粱地里；美方报务员赫根中士，毛发被烧光，遍体鳞伤，译员沈浦及聂特敦，伤势较重，译员冯文举伤势较轻；蒋方译电员李正富中士，肚破肠流，伤势最重。我建议在

现场召集紧急小组会议。会上，我首先质问罗斯迈："我说防空安全无保证，你一再说'绝对不会'，结果如何？"他瞠目无言答对，只好将脖子向后一仰，两掌向外一张，摇摇头，表示没办法。闵时济吓得面色发青，一言不发，呆若木鸡。接着，我让翻译刘占元，把目睹的惨状一一记录下来，写明地点、时间，由三方代表草签备忘。随后，小组和交际处人员都集中在一辆卡车上，三方代表仍乘吉普车继续前进。走不多远，蒋方译电员李正富因流血过多，死在车上。停车约一小时，把他掩埋在公路边。天傍晚，抵围场。小组和交际处人员都住在小学校里，伤员便到医院治疗。该地驻军警卫比隆化还严。

31日上午，小组开会，三方重新审查草签的记录，略加修改，中英文一式四份，由三方代表正式签字。小组三方各留一份，准备送交各自的代表处，另一份上报北平军调部。

9月1日，小组和交际处在围场休息。

吉普车与牛车同行

9月2日，围场形势又趋紧张，有些小股地主武装四出骚扰。交际处从承德借用的2辆卡车只剩1辆，又被原单位抽回军运，吉普车是小组唯一的交通工具。为按分局指示向西转移，那只好就地征用一辆牛车，拉伤员和剩余东西，三方代表还可坐吉普，小组和交际处其余工作人员只好步行。总共人数还不到一个排，美方的少爷兵、蒋方的老爷兵，穿大皮鞋走山沟小路，歪歪扭扭，五步一站，十步一停，唉声叹气，不断叫苦；我方的干部、战士走在后面，说说笑笑，满不在乎。这样一个混合排，走了2天才到柳树庙。据老乡讲，此地距多伦尚有140华里。

在草原上奔驰

交际处长王再天同志，看见美蒋人员这样狼狈不堪，难以再继续前进，便带着几名战士去多伦求援，我们其他人员留在柳树庙待命。

王再天同志到多伦后，立即给晋察冀军区打电话，将承德小组的处境报告了司令部。所以新华社张家口9月4日电，报道了美式蒋机轰炸和平使者——承德小组的情况，最后称："此间各界闻讯，莫不愤慨"。

承德小组在柳树庙停留了4天(9月4日至7日)。8日，军区派来2辆卡车，把小组和交际处人员接到多伦，并派代表到多伦迎接。美蒋人员到此时，才笑逐颜开，一再向军区代表和王再天同志表示感谢。

9日早饭后，小组和交际处人员从多伦赴张北。2辆卡车、1辆吉普车在辽阔无垠的大草原上奔驰，时而看到马、牛、羊成群和一两个蒙古包，时而看到黄羊结队奔逃，使人大有进入野生动物园之感。三方人员在车上有说有笑，前几天那种沉闷的气氛一扫而光。下午抵张北，柴书林专员设宴招待，我们饱吃了一顿美好的晚餐。

10日早饭后，我们从张北出发，10时抵张家口。军区又派参谋长曾勇泉和政治部主任蔡树藩到郊外迎接，我们住宿于解放饭店。

这时，晋察冀边区委员会民政厅长柯庆施、边委会驻会议员阎立宣、张家口市市长杨春圃以及边区工农妇青各团体代表10余人，闻讯赶来，携带不少慰问品，对小组全体人员进行慰问。美方代表罗斯迈代表执行小组对各界的慰问恭致谢忱。12日，边区各界代表同小组人员共进午餐。

13时许，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派专机到张家口，机组到解放饭店进餐、休息。16时许，边区各界代表到机场送行。17时许，小组一行14人安全抵达北平西郊机场。三方代表处派人来接。我方

代表处派王昭把我们接到东华门翠明庄招待所住下。

中秋节之夜

9月10日，正逢中秋佳节。

我们到翠明庄稍休息一会，接中共代表处通知，让我同翻译刘占元到叶公馆参加会餐，我俩乘车前往。一进客厅，叶剑英同志走上前来，紧紧握住我的手说："你们小组被炸的消息传来后，听说伤亡很重，这里还准备给你们开追悼会呢！"他让我们坐下后，接着说："你们今天到北平，正赶上中秋节，在这里和到北平的各小组代表一块聚餐。"我扼要地汇报了撤离承德后的情况，他讲："你们除了三方代表共同签署的报告外，还要准备一个招待中外记者的发言提纲，交代表处办公室看一下。在招待记者后，你的任务就算完成了。你们在北平玩两天就回去。张家口情况也很紧张，不宜久留。"

18时半左右，来北平的各小组代表到齐，在叶公馆的席棚下，摆上几桌酒席。我们仿佛在自己家里一样，有的饮酒行令，有的谈笑风生。叶剑英同志频频举杯劝酒，我们仿佛不是处在"虎穴"之中。

20时许，中共代表处和各地小组来北平人员在翠明庄礼堂开会。叶剑英同志讲："今天我们在北平过中秋节，感谢翠明庄的朋友们对我们的关照；我们对先生们迫不得已做的一些事情，表示谅解；对代表处同志们的艰苦工作，给予表扬。"然后他话锋一转，义正严辞地指出："撕毁停战协议，破坏政协决议的不是我们，只是国民党政府中的一小撮。他们在东北进占我四平、长春等地，又占我承德，现在又准备进攻张家口，这都是在美国的大力支持下干的。今天是中秋佳节，我们理应家庭团聚，可是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内战，迫使多少父母妻子离散，驱使多少青壮年到前线当炮灰。我们共产党态度很明确，他们发动内战，我们坚决反对，他们一定要

打，我们奉陪到底。”在一片掌声中，团聚会结束。

在皎洁的月夜中，我反复地回味着叶委员言简意赅的讲话，那真是：手中无寸铁，胸中却有雄兵百万。当蒋介石全面发动内战之际，我们在北平过中秋节，“共看明月应垂泪，一夜乡心处处同。”

一 场 舌 战

驻承德第十一小组，于 9 月 11 日 16 时在军调部（地址即现在的首都医院）丁楼 224 号房间接见中外记者。届时，三方代表由三方新闻处处长在场照料。首先由美方代表罗斯迈宣读承德小组三方代表签署的报告，然后三方代表分别答复记者的询问。

据《世界日报》记者报道：“美方代表罗斯迈，白发苍苍，极为兴奋，口述情况，谈笑风生；政府代表闵时济，满面风尘，侃侃叙述经过；中共方面代表王效天，着粗布军服，沉着答问，综合报告。美方及政府方面，大致相同，共方报告则有出入。”

当记者询问小组撤离承德的情况时，罗斯迈称：“本小组均系被迫撤离该地，我多次抗议，均属无效。”闵时济称：“撤离该地时，我拒绝接受，共方竟欲开枪射击。美方代表主张小组仍留该地，亦遭拒绝。我则以共方如承认逮捕，即可离承德前往。小组人员遂在被捕情形下离开承德。”当记者询问承德破坏的情况时，罗斯迈称：“承德机场为共方彻底破坏，我要求前往一观，竟遭拒绝。”闵时济称：“承德市郊的铁路、桥梁、车站亦被破坏。”当记者询问小组被飞机射击原因时，罗斯迈称：“小组卡车被炸时，因车上有共军 15 人，携有手枪、步枪、手榴弹等。”闵时济称：“隆化赴围场的公路，为共方最重要的补给线，军车、部队来往频繁，小组遭飞机的袭击，乃意料中事。且当日飞机射击时，试作警告射击多次，意在使车上人员散开，毁其车辆，是为无意伤害人员之证。在出发前，我曾提议在车上设一标志，共方未照办。”

在美蒋两代表讲完后，我据理驳斥：首先要弄清是非界限，是

我军向国军进攻，还是国军向我解放区进犯？事实胜于雄辩，国军进犯解放区，并已占领承德，美方不但不加以制止，反而从空中到地面，武装国军，助纣为虐。当国军进占承德时，我方为了小组的安全，不能不采取保护性措施，促使小组安全撤离，完全是必要的。今天能安全撤回北平，这不是有力的证明吗？美方代表说是被迫，政府代表甚至说竟欲开枪射击，可是你们在多伦、张家口，对我方保证你们的安全一再表示感谢，一转眼，竟把善意当恶意，我方对此深表遗憾。其次，你们攻击我方破坏铁路、桥梁、车站、机场，请查其原因，如国军不进犯承德，我方绝不会采取这样的军事措施！你们不反躬自责，还倒打一耙，真是岂有此理。最后，应着重指出，国军使用美式飞机射击小组车辆，三方人员有伤有亡，这是铁的事实，即使能说善辩的闵上校、貌似公允的罗斯迈上校，也不能不在报告上签字。总之，政府方面撕毁了停战协议，破坏了政协决议，美方宣布"调处"失败，你们'双簧'演得很好，战争的责任应由你们承担。

三方代表招待记者后，曾合摄一影。然后我们一边向记者致谢，一边向美蒋代表挥手告别。

次日，中共代表处派王昭、张天民二同志陪我们到北海公园玩了一上午。第3天，军调部派专机送我们回张家口。从此，军调部第十一小组也就结束了历史赋予的使命。

（作者曾任中国民航总局顾问等职）

我们还要回来的

——承德撤退记

华　山

热河首府承德解放了1年零9天后，由于自卫战争长远明智的要求，人民又忍痛暂时将她放弃了。为了将来夺回她而现在放弃她，这种眼前的难受和对来自胜利的信念的感情，是每个承德市民所无法忘怀的，也是别人所难以体验的。在这些紧张的日子里，人们时刻所萦绕着的一个念头，即是尽可能使蒋介石侵犯者进入城来一无所获，增加它不义作战的困难。靠着铁路的机工把火车头开进山洞内，炸倒在隧道里，让起重机也无法把它搬走。随后把家属安置到车上，打发他们先走了。没日没夜的破坏着桥梁和路轨，组织成精干的破路队。“咱们什么时候不回来，那它就什么时候都不能通车，他白天修起，咱晚上把它掀掉。”市区的铁路枕木一个下午叫市民拆光了。抢着破路的有农民、商人、外乡人。农民指着铁路说：“这些年咱们的粮食尽叫你搬光了；‘二满洲’（人们这样称呼蒋军）来叫他们自己用肩膀扛！”外乡人说：“拼上3年不回家；和平不了，回家一样要受‘二满洲’的气。”

就在铁路工人连续3天破坏车站八孔大铁桥，武烈河畔民兵成天演习、地雷轰鸣震天塌地的时候，米价由三千八落到了三千六一斗。老百姓把边币留起，以便万一弃守以后可以返回乡下买到粮食。他们坚信承德被占领以后，也会和平泉、凌源、朝阳一样。给他们粮食的不是美国卡车和支离破碎的铁路线，而是离城不远的解放区农村。商人拿着边币说：“承德暂时丢了，我到张家口或边区别

的地方去，有了边币到处可以赚钱；国民党'二满洲'一来，不说买卖不好做，光'二日本'美国货就把咱们买卖淹死了。"由于人民争着用银洋买边币，金子都脱不出手了。

(1946年)8月12日，承德市4万农民的代表在离宫解放剧场开了5天农民代表大会。代表们在楠木殿上昂着头说："老百姓当了皇上，共产党万古鼎昌！恶霸汉奸盼老蒋给他撑墙柱，要抢走咱们清算回来的土地，想得好！满洲国那阵子咱没敢动谁一根毛，也没见他饶过咱一把租子。'二满洲'来了还不是一个样？他盼老蒋来拔脑袋，我也把它斗翻了。"他们在会上津津有味的商量怎样配火药、造地雷，算计村里有几支土枪，有几支快枪，合算成立乡村自卫队。代表会闭幕第二天，就有代表领上成千的农民扛着铁锹到市郊破铁路去了。

到了20号，平泉蒋军开始进攻，承德的疏散在沉着的按照计划进行。机器房里没有机器，货站里没有货物，各机关留下的都是拿着武器的青壮年。电灯照常亮着，市场热闹如故，报纸照样发行，广播电台沉着地播送预定节目。"反动派，坚决打他不留情"这是在热河创造的歌曲，在晚上播送几遍。胜利剧场连演10天的"自卫队杀贼"场场满座。——承德，这时分外显得刚毅，在紧张肃穆的工作中，迎接战斗。26日晚上，发电厂停止送电。一个曾在群众运动中被清算的当地人找到最后一批撤退的机关干部说："我们从来没有见过不要钱的官，你们共产党胜利也干，失败也干，一天不成功，你们总是干到底。我过去走错了路，相信你们还是要回来的。那时候我们再剖心相见。"一个当地的中学教员沉痛的的对人说："共产党在时我衷心说新民主主义好，明天国民党来了，强迫我说法西斯主义好，要是学生问我：到底那个主义好？那我怎样回答他们呢？"他终于抛弃了多年的城市生活，毅然随学校走了。那些女教员，到25日还下了走不走的决心，可是电灯熄灭的晚上，却抛下家庭，追上撤退的队伍。"我们已经走错了路，再不能一错再错了！"以前被

称为“四朝元老”在满清、在民国、在“满洲国”都做过事情的人，再不愿在“二满州”做“五朝元老”，他们把家庭安置在大车里，冒着飞机的扫射前进，走向广大农村的道路。第一完小一个十三岁的学生对我说：“我家也要搬啦，到乡下姥姥家去。”像发现了什么机密似的，他歪着脑袋笑着说：“我知道这是你们八路军的计，你们丢这个城，丢那个城，把国民党的兵分成这里一小团团，那里一小团团，然后一个个把它消灭，就都收回来了。我留在城里叫国民党打死，看不见你们回来，那我不干。”这个稚气的想法多么朴素而准确！几千个承德人——工人、技师、学生、店员、旧职员带上自己的书籍、工具一起走向生疏的农村。28 日，战争从几方面逼近市郊。火车站打响了，离宫隔河的棒槌山打响了。下午 3 点钟，市郊农民的自卫队、区小队，这些才得到土地的农民毫不犹豫地丢下庄稼和土地，跟随战斗部队移往外线。“跟着共产党走，跟着共产党回！”坚决转战了 8 年的野战纵队老战士摸着身上几处伤痕对我说道：“咱们吃饭吃饱，做事做了，虽说抗日有功，保不住和平总是对不起老姓，但我相信我们一定还要回来的！”承德有着这样的人民和这样的军队，最后终是要胜利的。人们不会忘记 8 月 28 日这一天，因为这是战斗开始的日子。

（华山：原《冀热辽日报》记者）

在承德工作的日子里

郭耀臣

我是 1945 年 8 月日本投降后，9 月到达承德的。我在这里整整战斗和工作了 28 个年头。离开承德后，承德的山，承德的水，承德的人民，始终深刻地印在我的脑海里。特别是在 3 年解放战争中，我同承德广大群众同生死、共患难的那艰苦卓绝的斗争，永远铭刻在我的心里，经常浮现在眼前。

战 略 转 移

1946 年 6 月底，内战全面爆发。尽管于 6 月 7 日，东北再次达成休战，但从根本上来说，已不再有可能通过谈判形式来解决东北问题。此时，国民党在东北的兵力增至 15 个军 51 万人，夺取了工业最发达、人口占全东北 53%的南满地区，控制了东北绝大多数城市和主要铁路干线，在力量上占了明显的优势。在我后方，最广大的农民群众还未真正发动起来，基层政权主要不在我党手中。土匪横行，经济破坏，我党我军在东北面临着极为严重的困难。这样的形势，使建设以农村为中心的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迫切性、重要性突出出来。

1946 年 7 月东北局在哈尔滨召开了扩大会议。会议着重解决东北工作重心问题，第一次明确提出以创建根据地为第一位的工作，而以发动农民群众作为创建根据地的主要内容。会议尖锐地批判了党内迷恋大城市，轻视农村的错误思想，号召广大干部"走出城市，丢掉汽车，脱下皮鞋，换上农民服装，不分文武，不分男女，不分资格，一切可能下乡的干部统统到农村去"。会议还提出，我军作

战目的是保卫根据地,保卫解放区,不在于城市、要地的一时得失。根据这次会议精神和整个东北战局的发展,党决定暂时放弃承德市,到农村去,用战争和发动广大农民群众的办法改变敌我力量对比,最后战胜敌人。

在我们从承德战略撤退前,党和政府做了大量的思想政治工作和各项撤退前准备工作。为在战略撤退后,开展和领导承德市的地下工作,省委决定组成承德工委。这个工委由我任书记,郑起茂同志任副书记,李宏青、白皓、龚荣为工委委员。市委为工委配备了10多名地方干部和一个公保大队。这个公保大队辖3个连,约300来人,龚荣、白皓分别任大队长和政委。公保大队的主要任务是以武装斗争协助工委开展工作。此外,留在市郊坚持斗争的五区、六区干部和区小队也归工委直接领导。承德工委的主要任务是坚持和领导承德市地下党的工作。具体任务是开展敌工工作;搜集各种情报;适时地在郊区开展游击战争,为我党重新接收承德作好准备。当时,面对国民党的疯狂进攻,省委曾提出个口号是:"区不离区、县不离县"的坚持斗争,开展工作。省委撤往围场,让工委把活动基地定在距承德80里左右的市郊——红旗。

承德工委及所属的公保大队是1946年8月26日下午从承德撤出,奔往红旗的。我们撤出承德后,局势发生了急剧的变化。8月28日,国民党占领了承德,并在承德周围驻上了重兵之后,农村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我们当时对国民党占领承德后的形势估计不足。许多事情出乎我们的预料。刚刚建立起的农村基层政权倾刻瓦解,地主反攻倒算,重新夺取政权。一些区小队在坏人的操纵迫使下纷纷叛变,土匪猖狂活动,承德和承德四周陷入一片混乱之中。我们到红旗的第二天拂晓,即遭敌人袭击。战斗过后,工委召开了紧急会议。会上,大家分析了敌情和红旗一带的形势:隆化、滦平相继被敌人占领,红旗四面受敌,群众基础又很差,把红旗作为工委活动基地显然是不行的。要更好地完成党交给工委的任务,就

必须暂时撤离红旗，保住工委的力量，靠近热西分区，观察形势，再选择有利地点，适时地开展承德的地下工作。会上决定向热西地委所在地郭家屯转移。我们到郭家屯后，那里的形势更严重，分区特务连叛变了，地委、分区只有一个排的兵力，被 200 多名土匪包围着，地委、分区处境十分困难。我们到后，首先打散了这伙土匪。后来，根据热西地区斗争的需要和分局的指示，工委把公保大队交给了热西地委。随后工委去围场，向热河省委书记黄火青同志汇报了我们从承德撤出后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黄火青同志提出让工委随省委一起向北转移。我和起茂同志研究后提出，承德留下很多同志，如工委向北转移，离承德就更远，不利于开展工作，我们还是回到前方去，逐渐接近承德。黄火青同志听了十分高兴，充满感情地说，别人都想向北走，你们却要求上前方，真是好同志。黄火青同意工委暂回郭家屯，同分区一起活动，并答应另派一支部队配合工委的工作。在围场，我们碰见了戴毅、封梅等同志。他们在我们撤退时，因区小队叛变，叛徒杀害区小队长时，把他们惊醒，他们几个人实行自卫后集合转移到围场。我们回郭家屯时，省委让戴毅、封梅等随我们一起活动，并增补戴毅为工委委员。回郭家屯后，工委配合热西地委开展工作。不久，因遭敌人突然袭击，工委与地委、分区在转移过程中走散，工委同志转到了多伦。在多伦住了 3 天，在那开了会，研究了工委下步工作。会上，有人提出，用我们随身携带的经费——大烟买几匹马，而后去经棚找分局。我和起茂、李宏青同志不同意这种意见，坚持向南，到丰宁黑河川找热西工委，再向承德方向靠近。会后，工委返热西找地委。在黑河川找到了地委组织部长杨春华同志，经与杨春华同志研究，确定工委暂时在黑河川开展工作。1947 年初，戴毅、雷克被地委分配到滦平县任区长，封梅去武工队。当时，地委也派起茂同志任围场县委组织部长。我向地委领导同志提出意见，这样就把工委拆散了，就无法再开展承德的工作。据此，我要求把已分配的起茂、雷克同志又要回工委。起茂

同志回来不久，让他带李宏青、谭景春等人去热南。1947年5月，我也来到了热南鹰手营子、寿王坟一带。工委到热南后，认为这里条件较好，距承德近，利于开展工作，就在承德县柳河、全宝河、白河一带开始了对承德市内的工作。1947年8月，分局和冀察热辽军区打算收复承德。为适应形势的要求，充实加强了工委的领导力量，派原承德市委组织部长郭洪德回工委任书记，我改任副书记，起茂同志改任委员。郭洪德同志来了后，工委又陆续调进一批干部，并组建了自己的武装——南山部队。工委的同志分了若干小组，深入到前方，物色对象，向承德派入。同时，通过各方面接待由承德出来的人，搜集承德的军事、政治情报。这时的工委工作更主动，更加活跃起来了。1948年5月，工委兵分两路：一路由起茂同志带领，继续留在承南，活动在大营子、梆子沟、夹马石一带；一路由郭洪德和我带领到平泉县老杖子，活动在承德县三沟、六沟、头沟一带。在那里，我们迎来了承德市的第二次解放。

地 下 工 作

领导承德市的地下工作是承德工委的基本任务。1947年5月，工委来到热南后，也就迅速开展了这项工作。

从承德撤退前，为了坚持敌后工作，各系统都选择安排了一些同志留在承德市内，利用各种条件，从事党的地下工作。仅市内一、四两个区就部署了地下小组15个，由42名党员组成，还安排了单线党员关系26人，群众关系人22名。此外，省委社会部、冀察热辽军区保卫部和公安系统留下的特工人员3名，间接关系人34名。撤退时，这些地下关系也分别由各系统交给了工委。但由于工委撤出承德后，局势发生了出人预料的变化，转战热西达半年之久，撤退时在红旗和大庙设立的两个秘密联络点基本报废，工委与这些地下关系失掉了联系。对他们的个人情况、工作情况以及对承德市的敌情、社情、民情都不了解，这给工委领导承德市的地下工作造

成了很大困难。根据这个情况，工委来到热南后，很快确立了以“派遣为主，恢复为辅”的工作方针，把主要精力首先放在派遣上。当时，我们认为，只有通过派遣工作把基本的力量打入承德市，建立起据点，掌握了情况，才有可能逐渐恢复原来在承德的地下关系。在恢复地下关系时，我们采取了先打通一般关系，后接通基本关系的工作原则。

在派遣时，工委与当地政府一起物色、挑选派遣对象，所以这项工作进展得很顺利。仅在热南，工委先后向市内派遣了基本关系人 13 名，一般关系人 3 名，利用关系人 2 名。他们是鹰手营子王成贵、白河川的毛国峰、孙兴、鞍匠的潘树芬、宋连科，柴河川的赵德玉，上窝铺的张庆奎，夹马石的谭月等。后来，工委一部分同志来到平泉老杖子、承德县三沟、六沟，在那里又物色和派遣了一批关系人。我们派遣的那些关系人，程度不同的起了作用。不仅使我们摸到了承德市的敌情、社情的一般情况，而且很快恢复了一批地下关系。我记得，我们最先恢复的关系是姜宪青和焦尔栋，相继恢复的关系还有康成、崔福录、王俊生、崔福全、范振华、王福增、赵巨、王子廉等。此外，通过派遣人员的努力工作和工委的审核，又发展了一些新的关系人。例如：潘树芬、宋连科、张庆奎等人发展的新关系人就不少。据当时统计，工委直接发展和由派遣人员发展的新关系，仅在国民党机关、军队、司法警务、文化等部门就有 16 人，其中基本关系人 4 名，一般关系人 7 名，利用关系人 5 名。这些新关系人中，有国民党县政府传达长赵连印，国民党承德法院录事曹祥，还有一个国民党中统承南工作站的谍报队员，他们都起了很大作用。例如，发展了赵连印后，我们很快地得到了国民党承德县党政警特机关人员名单、国民党县政府文件、布告和国民党保安队活动的情报。

在积极派遣，稳妥地恢复原来关系，发展新关系的同时，工委还利用卖炭人和其他商贩搜集情况。这样一来，我们及时掌握了市

内各阶层的动向和国民党军警宪特的较大行动。例如：教育界的动向，原来党员和积极分子的政治表现，国民党十三军及其杂牌军的兵力部署、武器装备，军统、中统及地方警察、特务组织机构等情况，我们都能掌握，就连蒋介石来承德的情报我们也及时得到。工委为向上级反映情况，还编印了《承德军事动态》，先后出了几期，给上级机关提供了一批资料，起到了较好的作用。

1948 年春，在参加冀东区党委城工会议期间，万复同志告诉我，冀东区党委正筹建情报处，准备在承德设个情报站。我说，这是件好事，我们欢迎，你派干部来吧。万复同志说，你兼任站长吧，以后再给你派电台来怎样？我把万复的意见转达给郭洪德、郑起茂后，他们也同意。就这样，我兼任了承德情报站站长。后来，万复同志从冀东情报处给我派了部电台和两名译电员。这个情报站只存在了 3 个左右月，后来由于情况变化，就撤了，这两名译电员回了冀东。

1948 年秋，在我军逼近承德的关键时刻，已打入特务内部并担任了中统承北工作站书记的省委社会部留下的党的地下工作者金涛同志和冀热辽军区留下的关系人张志林同志，冒着生命危险，到平泉县与工委接头，向工委详细汇报了他们的工作，并带出了一张国民党十三军兵力部防、工事设施分布图及中统内部的情报。金涛同志是有计划留在承德的一位地下工作者，他打入敌人内部，并发展了 10 多名地下关系人，并争取和领导了由进步学生刘朝江等人主办的《火炬》壁报。这个《火炬》壁报在承德影响很大，发挥了较好的作用。原关系人程谦礼也曾主动从承德来到平泉向工委汇报情况；王福增同志不仅自己出来送情报，而且动员其爱人也往返承德、平泉之间，送情报、散发传单等。

在白色恐怖下，我们开展地下工作，也付出了一定的代价。新发展的地下关系人赵连印同志在 1948 年夏季不幸被国民党抓捕，牺牲在水泉沟万人坑。工委干部董哲、未义二同志先后在与关系人

接头时被敌人包围，经过激战，最后壮烈牺牲。这些同志在承德的地下工作中都作出了重大贡献，为承德市的第二次解放流尽了最后一滴血，值得我们永远怀念。

第二次接收承德

第二次从国民党手里把承德接收过来，是承德工委的历史使命和最终目的。工委的情报工作、敌工工作、武装斗争等都是围绕和实现这一目标而进行的。

1947 年夏季，就整个东北形势来说，我党经过两年多的顽强斗争，克服了重重困难，基本上建成了巩固的东北根据地，改变了敌强我弱的被动局面。同年冬季，我东北人民解放军发起了强大的冬季攻势。特别是 1948 年 5 月，我冀察热辽解放军发动了热河战役，收复围场县，攻克隆化县城，对驻承国民党军队影响很大。6 月 7 日，中央向东北我军发出了关于"即用三个月至四个月时间攻克长春，并争取歼灭援敌，待秋收后再攻承德"的指示后，工委认为，我军第二次接收承德已为期不远了。所以，围绕第二次接收承德，进行了紧张而细致的准备工作。

为在承德重新回到人民手中后，能立即组建起各级党委和政府，迅速担起领导全市人民医治战争创伤，建设新承德的重担，我们首先从干部问题入手，在扩大干部队伍的同时，努力提高干部素质。工委来到热南不久，经请示冀东区党委同意，工委先后从热南调回原承德市的干部，使工委干部队伍很快由十几人扩大到 80 多人。1948 年夏，分局派穆嘉华、姚光等同志到工委，又从冀察热辽联合大学抽调部分学生来承德工委。我记得，他们当中有王成、陈文通、石光英、兰启文、王金佩、杜敏等人。此外，工委还就地取材，从当地青年学生、优秀工人、翻身农民中选拔了一些干部。为了使这些干部尽快地胜任工作，我们在提高干部素质上下功夫，举办了干部培训班。在培训班中，组织他们学习当前形势、党的城市政策

以及进城的《约法八章》、《安民告示》等。参加培训的干部结业后，我们根据他们每个人的特长，分配他们的工作，并在实际工作中帮助指导，使他们在实践中尽快地增长才干、提高本领。

此外，为提高干部素质，我们还分批地选派一部分干部参加分局举办的培训班。我记得，1948 年 10 月初，我曾带十几名干部参加分局举办的城市干部培训班。我们到分局后，锦州战役打响了，我们奉命去锦州，俟锦州打下后，参加了接收这座城市的工作。10 月 14 日，我解放军在扫清锦州外围后，向守敌发起了总攻。15 日，我们进入锦州城。我们进城时，锦州战斗尚未结束，我军正在解决飞机场的敌人。敌机仍在锦州城上空盘旋，不时地对城市进行轰炸。街道上，敌军的尸体一堆堆，一片片。我们进城的第二天，敌飞机场被我攻下，枪炮声逐渐平息。我们进城时，锦州市委书记李乐光，市长史立德也率干部进了城。史立德同志让我带着这十几人接收民政局这摊。我们大约在锦州工作了 10 多天后，接到分局电报，我又奉命带这十几名同志返回平泉老杖子。在这 10 多天中，我们从实践中学习了接收城市的工作，受到了锻炼。

为了较完整地把承德市从敌人手中接收过来，防止和减少敌人在撤退时的破坏，我们采取了一些相应的措施。例如，通过派遣或在市内散发宣传品等形式，向敌人提出警告；向我地下工作者部署保护城市任务等。我们曾指示金涛想方设法，搞清国民党撤退后特务在承德的潜伏情况；指示在国民党司法、警务部门的地下关系设法保护和转移敌人档案；让出来汇报工作的程谦礼捎信给市图书馆的工作人员，要求他们采取措施保护图书、资料；指示企业里的地下关系组织工人开展护厂、护路、护矿活动等。我们采取的这些措施，收到了相应的效果。我们第二次进承德不久，很快地挖出了潜伏在市内的国民党特务；较完整地接收了法院和部分派出所的档案以及图书馆的图书资料。我们第二次进城时，尽管国民党十三军在撤退前对离宫和外八庙破坏的很严重，但这些古建筑基本

上保存下来了。

1948年11月12日傍晚，我在头沟接到国民党十三军从承德出逃的消息后，立即带人奔赴承德。13日拂晓，我们进了市区。紧接着，郭洪德同志带人从三沟方向进入市区；郑起茂同志带人从夹马石一带进入市区。在我们进来之前，齐占文、王国珍同志带市公保大队已于12日夜晚进城。他们进城后，立即对承德市实行军事管制。我们进承时，发现承德市区秩序井然，市民们带着张张笑脸迎接我们。有的拉着我们的手问这问那；有的向我们哭诉国民党反动派对他们的迫害；有的拍着手高兴地说："天又亮了，我们又解放了。"

我们进城后，立即搭起市委、市政府的架子。工委书记郭洪德任市委书记，我任副市长，起茂同志任市委组织部长，分局调张立文同志任市长。张立文同志在承德工作有二三个月时间，就随军南下，我接任了市长的工作。

（王继明整理）

（作者曾任中共承德地委副书记、中共河北省顾委常委等职）

忆 往 录

郑起茂

(一)

1945 年 8 月,日寇投降后,我奉命由晋察冀四分区平山县带领 40 多名干部奔赴热河,被任命为中共承德市一区区委书记。

1946 年 6 月 26 日,蒋介石悍然撕毁停战协定和政协决议,大举进犯中原解放区,从此发动了向解放区的全面进攻。这年 8 月,国民党十三军及其它杂牌部队数万之众向我热河解放区进犯。党中央根据"诱敌深入,内线作战,不惜放弃一些城市和地区,争取主动,集中优势兵力,选择敌人薄弱或孤立的部分,在运动中予以各个歼灭,消灭敌人有生力量,壮大自己的力量"的一贯原则,决定我党政军暂时撤离承德市。接到撤退的指示后,分局、省、市各级领导立即深入群众,传达党的决定,宣传我战略转移的伟大意义;动员各界进步人士和积极分子同我们一起撤退;对全市党员、干部进行形势教育,使他们认清形势,坚定敌必败我必胜的信心;研究挑选暂留对象,布置撤离后的承德市的地下工作。

8 月中旬的一个晚上,热河省委书记黄火青、市委组织部长郭洪德派人把我和市社会局长郭耀臣同志召集到省委。对我们说,党政机关要马上撤退,省委决定你们留下,组成中国共产党承德工委,在市郊坚持承德市的敌后工作。郭耀臣同志任工委书记,我任工委副书记。委员有龚荣、白皓。

承德工委组建后,冀热辽分局、省、市党政机关从 8 月 24 起,

分南北两路撤离承德市。

回忆当时情况，我们的信心是很足的，但对热河这个新区、我军撤离承德后形势变化，缺乏足够估计，会出现什么新的情况，思想准备不足。我们估计，一年或者一年多些我们就会收复承德的。所以，不论是对党员，还是对人民群众我们都是这样宣传。由于我们的宣传，人民群众的情绪稳定，没有恐慌。省、市领导机关撤退时，许多群众夹道欢送，握手告别。8 月 26 日，国民党十三军由平泉以 2 个师的兵力向承德压来。因为我们对撤离后形势的变化估计不足，所以把承德工委活动地点选择在城西百十里路的红旗。由于红旗离承德较近，立脚较困难，所以后来又转到隆化、围场一带。

8 月 26 日下午，我们承德工委的干部以及给我们运送物资的七八十辆大车都集中在离宫广场上。工委书记郭耀臣同志给大家作动员，他讲的主要内容是承德工委的任务及这次行动路线。下午 3 点整，我们带领工委的干部及运送物资的大车从离宫出发，顺西大街经广仁岭直奔中营子。与此同时，公保大队由白皓、龚荣动员后，从狮子沟出发，沿另一条路奔向中营子。五区、六区的干部也分别撤离。这天晚上，工委和部队在中营子汇合宿营。住下后，我派赵友（高庙村人，随我撤出的党员）同志趁夜返市内侦察情况。赵回来讲市内平静。8 月 27 日，我们派人带领七八十辆大车顺大路奔红旗，工委随部队从中营子出发沿山路奔小三岔口。当晚住在小三岔口后，双塔山区一名干部从单塔子村赶来给我们送信，说双塔山发现敌人的谍报队。我即派崔锦章（水泉沟村党员，随我撤出）去侦察。结果，崔有去无回。为防意外情况发生，当晚我们率队奔向红旗。由于我们过去一直工作在市内，对那里的山路不熟，盲目地从小三岔口东沟往前走，结果越走山越高。白皓同志说，坏了，我们走错了路，这样越走离红旗越远。为此，我们又从东沟奔西沟，直到夜里 12 点多钟，部队才赶到红旗。我们赶到红旗时，这七八十辆大车早已把物资给我们送到。我们原计划在这活动一个时期，谁知第二

天拂晓，山上的岗哨发现了敌人。接到报告时，部队正在吃饭，我们几个负责人一商量，决定趁敌人没赶到前，拉上一个连到红旗南山，把敌人压住，打他个措手不及。这个连在白皓、龚荣同志带领下，刚爬上山顶，敌人也赶到山下。一声令下，部队马上开火，霎时，敌人乱了套，溃退而散。敌人因闹不清我们的力量，所以没有再次组织进攻。为防止敌人报复，我们就带了些物资向隆化郭家屯转移，准备在那开展敌后工作。离开红旗时，虽然我们尽量多带些物资，但因人力有限，大部分物资留在了红旗。后来，这些留下的物资都被敌人抢走了。

在奔郭家屯途中，部队与敌人打了场遭遇战。8 月 30 日早晨，天气就很阴，而且乌云越来越低。为了赶路，我们连中午饭也没顾得上吃。下午两三点钟，走到两间房附近，群众告诉我们，北边来了国民党一个团，住在前边的大营子。没走多远，尖兵班受到前面持枪叛变的民兵阻挡。说是国军让他们在这站岗，任何人不让过。战士们怎么同他们解释都不行。软的不吃就来硬的，我们决定把二连拉上，鸣枪警告。一打枪，这几个“民兵”马上跑了。为了防范敌人，部队马上抢占了两间房北山头。在抢山途中，天已下开了大雨，山路很滑，有的战士不断跌跤，弄得满身泥。有的丢了鞋，划破了脚，但大家毫无怨言，奋勇爬山。部队到山上后，敌人循枪声已赶到山下的河套。人数还真不少，步兵里面还夹着骑兵。敌人发现了我们，就开始攻山。我军马上还击，战斗打得很激烈。政委白皓同志的帽子也让敌人的子弹打飞了，但他临危不惧，十分镇定的指挥战斗。为了保证工委的安全，他派出部分兵力掩护工委过山。我们过山后，雨越下越大，枪声也越来越激烈。一会，枪声停止了，白皓、龚荣带着队伍赶来了。原来是敌人一看河套涨了水，急忙退走了。这次战斗，敌人损失不小，我们也牺牲了几名战士。白皓同志的警卫员就是在这次战斗中牺牲的。一些新兵没经过战争考验，在战斗中跑了不少。部队赶上我们后，工委开了个小会，具体分析了形势，总结

了经验，大家又继续前进。由于午饭没来得及吃，又打了一仗，挨了雨淋，大家都十分疲劳。但为防敌人追击，我们咬着牙，全速前进。一直走出二十几里后，看没什么危险了才宿营吃饭。为了预防感冒，饭后又给每人喝了一点大烟水。

8 月 31 日，我们赶到了郭家屯。热西地委书记谢明、军分区司令员钟辉正在郭家屯。郭耀臣、李宏青我们几个一商量，决定先找地委。谢明、钟辉见到我们，那种高兴劲简直没法形容。他们说，这真是雪中送炭，我们地委没兵了，当了光杆司令，你们来的正好，咱们就在一起活动吧！我们也同意，就与热西地委一起开展活动。在这当中，热西地委给省委书记黄火青等同志拍了一封电报。大意是说，地委没兵了，请把工委的部队划归地委，如工委单独活动时再由省委另行派兵。当时省委在围场，同意了地委意见，并让工委前往围场汇报情况，研究下一步的工作。郭耀臣、李宏青我们几人立即动身直奔围场。到后，黄火青、史立德同志同我们谈的话，为我们联系了住处。汇报完工作后，省委决定给工委一个加强营，让我们先回热西地委，部队赶到后，再率部队到敌人力量薄弱的隆化、滦平、丰宁三县交接处开展活动。回到郭家屯后，工委一边等部队，一边帮助地委做些工作。当时，由于形势变化，土匪四起，经常出现地主、土匪杀害我区村干部事件，他们还通过内线，策动区小队叛变。有的区小队集体叛变后竟杀害了我区委书记、区长、区武委会主任。剿匪、镇压恶霸地主、平叛是当时地委的一项重要工作。为及时审判处理这些土匪、地主、叛乱分子，根据地委意见，工委的同志组成临时热西公安处，专门审讯、处理这些坏家伙。突然，一天晚上，军分区司令部接到省委电报，说隆化的敌人已出动，要奔袭郭家屯。接到电报后，地委、专署机关干部、家属、部队及工委的同志共几百人，连夜转移。走到一个叫杨树下的村子后，我们在该村吃午饭。正吃饭时，敌人赶来了。战斗打响后，部队掩护着机关撤退。在撤退时，由于工委、专署与地委、分区、部队吃饭的地点不在一

起，没能集中，只好单独撤退。谢明率队从北沟撤走了。工委、专署的同志奔向西边一条沟，结果又走错了路，走出十几里路后，一问老乡，才知道错了。原来我们走的这条路是奔多伦的。没办法，只好到多伦。

赶到多伦市后，我打电话给多伦市委。正巧，接电话的是郝崇相，他也是关里平山县人，我在平山当区委书记时，他当副书记。听说我们来，他马上跑来了，对我们说，你们不能往北去林西了，傅作义的骑兵从张北插到了多伦北边了，我们还准备南下呢。天有不测风云，我们去林西的路堵死了，没办法，只好南撤了。但是，时节已是初冬，我们这些人还都穿着单衣，去不了林西，要经过沙漠，马匹又不够用。正在考虑去向，听说有个供给部，带着几十辆往张家口拉被服的大车驻在多伦市。我和封梅抱着试试看的心理找到这个供给部。一搭话，这个供给部的负责人也是平山口音，原来我们也是老乡。我向他说明来意，同时告诉他北边不能去了。这个同志对我们很支持，让我给打了收条，发给工委、专署的同志每人一套棉衣。第二天，我们坐上供给部的大车南下，通过平安堡、沽源、赤城到达丰宁的龙门所。在龙门所碰见咱们的部队，一打听，丰宁县委在黑河套，杨春华带领的地委工作组也在那。我们就赶到黑河套，向杨春华同志汇报了工委的情况及谢明他们的情况。

见到杨春华同志后，工委暂时住在了黑河套的炭窑沟村，配合地委工作组开展活动。这时，平西地委书记赵振中来了。他说，热河省委同他打过招呼，决定打破原来的区划，实行片片统一领导，这片由他负责。之后，大约在 1946 年底，他把这片里的围场、丰宁、滦平等几个县的干部集中在千家店（延庆县内）开了个大会。工委参加会的有郭耀臣、李宏青和我，还有谭景春。戴毅那时在滦平县，也参加了这个会。这个会很重要，对扭转这个地区的形势起了重要作用。在会上，大家共同总结了经验教训，分析了当前形势，整顿了思想，决定各县由县委书记、县长挂帅，组成武工队，分头下去开展

工作。会后,因工委在这地方没“地盘”,所以还是配合地委开展工作。地委曾派我到围场县委担任组织部长。当时县委书记是王克东。在一天晚上,我赶到围场县委驻地,向克东同志报到。没想到第二天地委又派人把我找回来。原来是我走后,郭耀臣同志找到地委提意见,说我了解承德情况较多,是活材料,不能离开工委。所以,地委又把我调回工委。

回来后,工委就到汤河口、长哨营这片,与地委一起活动。这片是个“特区”,是八路军的根据地。十几年来,不论是日本鬼子,还是国民党,都没能使这片人民屈服,军队和老百姓真是水乳交融,关系极好。但是,工委的同志觉得,工委的工作对象应当是承德市,不能长期活动在这个远离承德市的“特区”。不如到热南看一看,如果可能,工委就去热南。地委同意工委的意见,决定由我、李宏青、谭景春以及警卫员李汝林先去热南探情况。我们是 1947 年 2、3 月去的,走时,杨春华同志还以热西地委的名义给兴隆县委开了封介绍信,并派密云县支队的一个排护送。我们连夜过白河,并穿过密云石匣敌人据点,然后直奔雾灵山下花园、大沟村。原来我们准备顺盘道梁到兴隆,老百姓说不行,盘道梁有敌人巡逻,得绕道走,我们请了个老乡带路。这两天,正巧下大雪,路上的雪有一尺厚。从早晨起我们就不停脚地走,到中午才到梁半腰,午后到了莲花池,又由莲花池到红梅寺。这天,就住在了红梅寺。住下后,我们向老乡打听,他们说兴隆行,那里八路军多,民兵也很活跃。听到这消息,我们几个人都十分高兴。第二天,我们赶到兴隆县,找到了县委书记李鉴铭、县长王佐民。他们对我们十分热情,欢迎工委来热南,特别是王佐民和贸易局的吴子英同志给我们很大帮助。因为我们来时,带的是大烟和伪钞,这些东西在热南无法流通,他们就给我们换成边区票。之后,县委把我们的情况汇报给冀东区党委。冀东区党委说热河省委向他们打过招呼,决定由冀东区党委代管承德工委,具体由区党委社会部领导,有事直接同李毅夫部长联系。大约

4 月初，郭耀臣派人把热西情况通报给我，我也把热南距承德近，群众基础好，往承德卖木炭、柴草的多，并有巩固的后方等情况通报给他，请工委到热南来。1947 年 5 月，郭耀臣带领工委的其他人来到了热南。

（二）

工委对承德市的工作，是到热南后才逐步开展起来的。

郭耀臣等同志来热南前后，工委开始住在鹰手营子镇。营子区委书记董惠民、派出所所长王振祥帮我们物色六七名派遣对象并开始了工作。当时，承德县委住在寿王坟，为了与承德县委配合开展工作，同时考虑到敌人经常到兴隆"扫荡"，营子是必经之地，不利于工作。所以，后来工委搬到寿王坟。承德县委书记徐步宽、县长孙亚光、县城工部长赵尚武对我们很热情，给了我们很大支持，主动向工委介绍情况。我们经常活动在车河川、柳河川及柴河、白河一带。车河区委书记顾要生、区长齐世铭给了我们很大支持，帮助工委物色派遣对象。为进一步开展工作，工委后来又迁到接近敌占区的大梆子沟、全宝河一带活动。

在 1947 年秋末，郭耀臣、李宏育和我参加了冀东区党委召开的土地会议。会后，为了更好地开展工作，我们向区党委提出了把在热南工作的原承德市的干部全部调归工委的建议，区党委同意。我和郭耀臣找区党委的裴仰山同志，裴仰山对我们热情支持并交给我们在冀东工作的干部名单，让我们从中拉出原在承德工作的干部名单。当时，我把原在承德工作过的干部选出来，拉出大约几十人的名单交给他。后来，区党委把这些同志调给了工委。为加强工委领导力量，分局调原市委组织部长郭洪德同志任工委书记，郭耀臣同志改任副书记，我改任委员，当时任委员的还有雷克、李宏育、戴毅、邵友民。

来到热南后，我们首先抓的就是物色向承德市派遣的对象，搞

好派遣，与市内关系取得联系，搜集情报。物色派遣对象的主要方法是会同当地县委、区委进行的，有的是我们通过接触群众，从中发现的，有的是我们制订条件，请区委帮助物色的。我们最先物色并派遣的对象是鹰手营子的王成贵。这个人是个老砖瓦工，本质好，觉悟高，人也机灵。1947 年夏，我们派他以商贩身份来往于承德，让他与市内党员姜宪清、焦尔栋取得联系。王进承后找到了姜宪清、焦尔栋，向他们转达了工委的问候。他们十分感动，把王成贵当成了亲人，热情接待，把他们掌握的情况介绍给王成贵。那时，王成贵、姜宪清、焦尔栋，几个人都认不了几个字。所以，传递情报全凭口头。口头传递情报，也有它的优点，那就是敌人搜查时，不容易暴露。后来，发现一些重要情况，焦尔栋以挑担贩鱼为名从承德跑到寿王坟等地为我们送情报。那时，焦尔栋只他们老俩口，没孩子，生活也很困难。他每次送情报时，我们都给他买好鱼，让他担回卖掉以补贴生活。

在白河川，我们还派遣了毛国峰、孙兴。在鞍匠，刘百川给我们物色了潘树芬、宋连科。这几个人都是党员，有文化，有头脑，还有一定从事地下工作的经验。工委把他们派人市内，他们在粮市附近开了个养心店，以此为掩护从事地下工作。在工作中，他们又在市内发展了几个关系，为工委提供了不少情报，成绩比较出色。在柴河川，发展了赵德玉，这个人是一只胳臂，工人出身，对党很忠诚，工作兢兢业业，不辞劳苦，有时跑到双塔山电厂搞情报。在兴隆上窝铺，还有个张庆奎，这是个利用关系。当时，张在村里因男女作风问题很不得人心，但他常去承德，又和砖瓦窑伪大乡长认识，有去承德的便利条件，所以派他去承了解一般情况。在承德他又发展了两个关系，其中一个叫赵连印。这个人原是我方村干部，又是党员，因受地主迫害逃往承德，在国民党县政府当传达长。他给我们提供了不少情报，县政府的布告、文件，我们几乎都有，提供者就是赵连印。他还给我们提供了承德县党政机关警特机关人名单，为革命作

出了可贵的贡献，可惜1948年春被敌人抓捕，后杀害。与赵联系的地下交通陆君也同时被捕。在夹马石，我们还发展了一个叫谭月的，也经常到承德为我们搜集情报。在大梆子沟一带，我们还发展了几个卖炭的，他们用炭驮子来回传递情报，向承德散发宣传品。李清山同志在承德法院发展一个叫曹祥的，是个录事，他为我们提供了有关法院、警察局的一些情况。工委其他人员还发展了一些关系，如邸盛昌通过关系从国民党承南站（谍报队）拉出一个谍报队员，由工委干部杨广志领来，在梆子沟向我汇报了该站的全部人员名单及活动情况、国民党十三军布防等。此人吸大烟，临走时我给他2两大烟，后因其在市内卖大烟被捕。还有一些关系，因单线联系，我就不知道了。

通过派遣，工委逐步与市内的党员、撤退时留下的关系取上了联系。撤退时，工委布置了地下小组15个，其中党员42名；个别党员关系26人；群众团体布置的关系22人；公安系统布置下的直接关系8人，间接关系34人，另布置内线3人。这些地下关系虽然有的暴露后逃离承德，如高庙村赵玉（党员），1947年秋逃出承德到热南找到我，提供了不少敌人在承德活动情况；有的被敌人捕后杀害，如粮市街街长高明；有的动摇叛变，南营子的一个党员叫邱其元，叛变后使数名党员被捕。但多数与工委联系上了。所以，我们得到的情报比较多，而且多数是较准确的，如国民党十三军的兵力部署及大的变化；国民党承德情报站（即谍报队）活动情况；地主武装"难民同乡会"（群众叫"花子队"）等情况我们都能基本掌握。我们留下的关系，表现好，贡献大的还有王俊生，他是私营大美照相馆的经理。还有姜宪清、焦尔栋、康成、崔福录、崔福全、范振华、王福增等。王福增是个党员，不但他几次出去同我们接头、送情报，他的老伴也跟他一起为我们带宣传品，散发宣传品。还有粮市北山非党人士王子廉也给我们反映了一些敌人活动情况。当然，还有一些，只是我记不清了。

贯彻冀东土地会议精神，进行土改，是我们协助县委搞的工作之一。1947年11月10日至12月12日，冀东区党委在遵化堡子店召开了冀东土地会议。全区县团级以上干部300余人参加了这次会议，工委参加会的有郭洪德、郭耀臣、李宏青和我。会上传达了中央土地会议精神，总结检查了冀东土改工作，开展了"三查"整风，部署了全区"平分"、"整党"运动。会后，工委在车河西沟贯彻了这次会议精神。承德县委还把柳河川划归工委，由工委直接领导这里的土改工作。我们在柳河川这个地方，认真贯彻了《土地法大纲》和冀东区党委、冀东行署、冀东军区发布的"联合命令"以及冀东区新农会发表的《告农民书》等3个文件。在贯彻三个文件中，我们着重纠正"左"。过去，这个地区的土改工作搞得比较"左"，有的地方出现了"斗了地主斗富农，斗了富农斗中农"的情况，造成了严重的后果。有的地方由于党群关系、干部关系比较紧张，就踢开党员，抛开村干部，搞什么"扎根串连重新组织队伍"，甚至出现不斗地主斗党员、斗干部的严重情况。这些"左"的倾向不纠正，就无法贯彻三个文件。为此，工委决心纠正这种倾向。我们根据冀东区党委的部署，首先在基层党组织中进行整党（当时党还未公开），重点解决某些党员在作风上脱离群众，遇事不同群众商量和组织纪律性差等问题。主要方法是启发党员的觉悟，开展正确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用总结的形式查阶级、查思想、查作风。通过整党，改变了某些党组织的成份不纯和作风不正的问题，密切了党同人民群众的关系，恢复了党内的民主生活，提高了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在整党的同时，工委会同区干部深入各村，与群众同吃同住，跟群众交心谈心，或召开三五人的小型座谈会，了解他们的出身、成份，从中发现苦大仇深的贫雇农作为"根子"，并引导他们诉苦，提高他们的阶级觉悟。再通过这些骨干直接或间接串联，逐步扩大积极分子队伍，形成一支强有力的农民大军。

在土改运动中，各村以党员、积极分子为骨干成立平分委员

会。平分委会员根据农户土地占有的多少及经营方式，划分地主、富农、中农、贫农等不同的阶级成份。之后，没收地主土地，征收富农多余土地，按照"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的原则平分土地。凡从事农业者，不分出身成分、男女老幼，一视同仁都分给土地房屋。在浮财的分配上，采取自报公议的方法，通过比穷、比苦、比生活、比光景，按等级分配。这样，多少年没吃少穿、受尽压迫剥削的农民分得了土地、房屋和其他各种物资。他们满意的说："千年铁树开了花，多年的土地回了老家。"

土改中，一些地主、富农和不法分子跑到承德，组织了什么"难民同乡会"。这个反动组织，十分仇视共产党，坚持与人民为敌，极受国民党的赏识。再加上这些人都是本乡本土，对人情、地理熟悉，所以危害极大。国民党利用这伙人，还给他们发了些枪和衣服，让他们带领国民党部队下乡讨伐，屠杀我区村干部和积极分子，抢农民的胜利果实。例如柳河大营子地主程兆刚，带领"花子队"(老百姓对"难民同乡会"的俗称)枪杀了我工委干部未义(承德第二次解放后，程兆刚这个家伙混到了狮子沟供销社，后被我政府处决)。面对凶恶的敌人，刚刚分得胜利果实的人民提出保卫家乡，保卫胜利果实的口号，许多有志青年踊跃参军。很快，承德、兴隆两县就组织起一个承兴团。这支部队活跃在家乡，为保卫家乡作出了很大贡献。

为了打击"花子队"的骚扰，并为接收承德作准备，经冀东区党委同意，工委自己扩军搞武装。这支部队的番号叫南山部队，队长叫蔺俊璠，后来是王国珍，副队长是齐世铭，政委由工委负责同志兼，副政委是齐占文。1948 年春，我们这支队伍已扩大到 2 个连，约 350 人。人多了，力量大了，为了更好地开展对承德市的工作，郭洪德、郭耀臣等同志带一个连到铁路北的三沟、六沟活动，我留下一个连继续活动在路南的柳河、夹马石沟、大营子、全宝河一带。对情报工作，也有个分工。我们以搜集军情为主，兼之党、特情报。他

们以搜集党、特情报为主，兼之军情。我们在路南除搜集情报外，还经常配合李鉴铭的承兴团开展活动。郭耀臣他们经常配合承北县委（因三沟、六沟属承北县）和袁书文（解放后任承德军分区司令员）那个团开展活动。后来，由于三沟、六沟形势复杂，土匪很多，郭耀臣给我来信，让我派兵支持。我让齐世铭把留下的这个连全部带到路北，与郭洪德、郭耀臣一起活动。

1948 年 5 月 24 日，工委奉命作入承准备。接到指示后，我们首先解决干部问题。当时，干部奇缺。为此，我们举办了干部训练班，吸收一些进步青年知识分子，优秀工人和其他积极分子参加。一面组织他们学习，一面对他们考查。学习的主要内容是当前形势，党的城市政策和进城的《约法八章》及“安民告示”等。训练后，把这些人分到工委下属的文教、工商、社情、敌情等四个组里进行工作。后来，随着形势的发展，工委又于 6 月 15 日成立了平泉组；16 日成立了三沟组；20 日成立了头沟组；7 月 20 日又成立了六沟组。与此同时，路南分别组织了柴河组，柳河组，全宝河组，留在热南的工委干部分别参加到各组。我们培训的这些干部，在接管承德后，大都担任了基层干部和公安人员，起到了骨干作用。

在做好接管承德准备工作的同时，我们还加速了瓦解敌军的工作。当时，驻承德市的国民党十三军，在我冀察热辽大军夏季攻势以后，已成了孤立之敌。所以，守城蒋军士气低落，士兵不断逃亡；下级军官无守城信心，也在各自寻找出路。但是，部分军官和士兵对我军的宽大政策不甚了解，特别是平泉等县被我军收复前，一些地主、土匪和其他反动分子逃到承德市，对我党我军极尽造谣诽谤之能事，致使一些军官和士兵对我党我军的政策产生误解。当时，工委在路南和路北对国民党军队采取了强大的政治攻势，通过多种渠道，利用多种形式宣传我党的政治主张和政策，动员蒋军官兵弃暗投明。为了保证弃暗投明的蒋军官兵的安全，工委于 1948 年 7 月 26 日在三沟、六沟、头沟及路南柳河和营子镇、寿王坟分别

设立了“蒋军接待所”，专门接待投城的蒋军官兵。对这些投城的蒋军官兵，我们根据他们的本人意见，愿回家的发给路费和通行证；愿意参加革命工作的，由接待所集中转送冀东区党委集训，然后由政府统一分配工作。

1948 年 11 月 12 日，驻承国民党十三军军长石觉乘飞机仓惶逃跑，其部下也随即逃往北京，经古北口时被我军歼灭一部，残敌逃到北京。我们接收了承德市。之后，组建了市委、市政府，承德工委完成了历史使命。

（三）

承德工委来到热南后，曾发生过几起较大事件：

1、佟副排长等同志为掩护群众壮烈牺牲。1948 年 2 月，排长未义、副徘长佟显文（该人原是郭洪德同志警卫员），带来三十几名新入伍的战士，配合承南县四区的同志在全宝河川开展工作，同时为工委扩军。2 月 14 日晚，宿营在全宝河西山坡的王庄。第二天早晨，佟排长正带领战士出操，教战士练拼刺。突然王庄北山、南山及东面响起了枪声，同时有几颗炮弹落在训练场附近。部队与王庄群众上西梁向大营子方向转移，当部队转移到桲椤树东沟时，部队发现王庄西边梁上跑过来一群被敌人驱赶的群众。为了掩护群众转移，部队占领了南山，开枪截击追赶群众的敌人。数百名敌人立刻向我部队包围，机枪、步枪、小炮一齐射向我部队阵地。未排长、佟排长率部队边打边向南撤，准备翻南山向狮子沟方向转移。当部队撤到大鞍山（又称西大尖）时，眼看敌人赶了上来，在飞机的轰炸配合下，向我发起了冲锋。为保证部队安全转移，决定副排长佟显文带领三班的同志顶住敌人，未义同 一班、二班转移。一班、二班的同志在当地参军的战士修福久带领下，从大鞍山西侧绕下山。一班、二班转移后，佟排长等同志转移已经来不及了，只能边打边往大鞍山主峰上撤。撤到主峰后，再无退路，因为主峰南面是百丈深

渊。佟排长等同志战斗到弹尽之后，砸了武器，跳了砬子。这样，佟排长和三班战士韩景存、齐凤喜等几名同志全部壮烈牺牲，韩景存、齐凤喜等几名牺牲的战士都是柳河川贫下中农子弟，其中有的是大梆子沟的。

2、未义同志牺牲。未义，中共党员，河北省博野县人，日本投降后来热河工作。1947年，承德工委来热南后调来工委工作。曾任工委所属部队排长，后来从事情报工作。他常随我在承德县的柴河、白河、柳河一带活动，主要任务是掌握承德市内敌人军政情况，与市内地下工作人员联系。

1948年4、5月间，我带未义及通讯员纪军在承德县柳河川大梆子沟门一带活动。一天早饭后，我约一位地下工作人员在大梆子沟门接头谈工作；未义同志约一名从承德刚回来的地下工作人员在大梆子沟西边的李店子接洽工作。早饭后，我俩分头找关系人谈话。约上午10点钟左右，我突然听到西边响起了枪声。一打听，群众说敌人在梁西抢粮。上梁一看，李店子北梁敌人不少，约12点钟左右，敌人撤走了。我带纪军赶到李店子，发现未义同志已经被敌人枪杀在村南一块空地上。

后来，据该村民兵中队长及其家属讲，敌人包围该村时，先进村的3个敌人占了村南山头，控制了制高点。当时，未义同志正在民兵中队长家等候我地下工作人员。当群众告诉未义村边发现敌人后，未义同志马上转移，刚冲出村西口，想奔村南过山，结果被埋伏在一个坟头后面的敌人发现。敌人开枪射击，未义臂部、头部中弹，英勇牺牲。

3、董哲同志牺牲。董哲同志是抗日时期参加革命的老同志，中共党员，也是河北冀中人。1945年承德市第一次解放时，曾担任过三区(或四区)派出所长。1947年承德工委来热南后，被分配到工委工作。

1947年底或1948年初，承德工委常驻承德县大梆子沟一带。

因贯彻冀东区党委土地会议精神，工委的同志集中在大梆子沟开会，董哲同志在大梆子沟接待承德来的地下工作人员。一天早晨，敌人突然包围了梆子沟。当时，董哲同志正在屋内看报，狡猾的敌人摸进董哲住屋一连就是几枪。董哲一跃而起，冲出屋，边打边往西山坡退。当他退到西山坡的一棵大梨树旁时，南山、北山和坡下敌人的机枪同时向他扫射。他大腿中弹，咬牙爬到一块大石头旁，以石头为掩体，向敌人还击。但终因寡不敌众，最后腹部连中数弹而牺牲。

4、赵连印同志牺牲。赵连印是承德县柴河川赵家庄人。抗日时期曾任八路军秘密联络员。1945 年承德解放后，是承德县鞍匠区孟家庄村干部，1946 年人党。国民党占领承德后，因坏人反攻倒算，妄图加害于赵，赵被迫出走承德市。1947 年初，经人介绍到国民党承德县政府当伙夫、传达，后任传达长。

1947 年冬，经工委批准，张庆奎发展赵连印为我地下关系后，我亲自给赵写一密信，交代任务，并派人送去经费。从此，赵不断为我们提供国民党承德县党政警特的有关情报，不断送出国民党承德县政府文件、布告等，为革命作出了重要贡献。1948 年 5 月，赵连印在国民党的一次大搜查中暴露，他趁混乱躲到暗沟里，隐蔽了两天。后因饥饿，晚上到厨房找饭吃，被伙夫王凤岐、金怀坤等告密被捕。赵被捕后坚贞不屈，被国民党十三军枪杀在水泉沟万人坑。

（王继明整理）

（作者曾任中共承德市委书记、中共河北省顾委委员等职。）

战斗在敌营

金 涛

一. 受命潜伏

日寇投降前,1942年到1944年,我曾和中共地下党员卢敏政同在承德伪满税捐局工作,又同在一个宿舍里住。他为人正直,酷爱进步文学,民族感强烈,常教我看些进步书籍。因而,我受他的影响较大,思想比较开化,对日伪的残暴统治极为不满;对共产党、八路军主张抗日救国有所认识。1945年8月19日,承德第一次解放不久,我便走上革命道路,到热河省政府财政厅税务科参加工作。当时,省财政厅厅长是阎顾行,副厅长是王奂如,税务科长是任景瑞。后因粮秣科工作需要,我被借调至粮秣科工作。粮秣科科长是黄文荣。

我参加革命工作后,激情满怀,有一股使不完的劲头。本职工作,我认真去干。机关组织的业余活动,我积极参加。那时,承德文艺活动搞得很好,承德文联在南营子小学成立了艺术夜校,有文学和音乐两个班。我参加了音乐班。由安波、李劫夫、沙莱等同志讲课。文学班有徐懋庸、方纪讲课,我也常去听课。不久,承德市文联组织星海合唱团搞业余文艺活动,演出《黄河大合唱》和《白毛女》,我既提供个人乐器,又操琴伴奏。在冀热辽分局办的《冀热辽日报》上,还发表过我写的《祝贺白毛女演出成功,希望白毛女下乡》的小稿件。这项活动有声有色,教育和团结了一大批青年投身革命,深受领导的称赞。后来省委决定:为了配合农村发动群众,让白毛女歌剧下乡。承德胜利剧社李劫夫、安波同志曾与省政府联系调

我到剧社工作。后因时局变化和工作需要没能实现。1946年6月，安波同志在《冀热辽日报》上曾发表过一篇叫《良好的开端》的文章。这篇文章主要是总结党领导下的承德群众文艺工作的开展情况。在这篇文章中，安波同志把我作为一个典型例子，对我进行了表扬，使我受到了很大鼓舞和教育。1946年6月，我在财政厅二科做管理仓库的工作时，被党组织吸收到党的队伍中来了。由于当时机关党的组织还没有公开，谁是党员也只有党员知道，党员入党也是秘密的。我的入党介绍人是我的科长王石煤和股长贾钦江。同我谈话的是陈鹤轩。我入党时，组织上准备交给我些特殊任务。所以，我的入党比别人更加秘密，一般党员也不知道。与此同时，财政厅的党组织把我介绍给省委社会部。省委社会部负责领导我工作的是万子清（万复）同志。他交给我的任务就是在完成财政厅的本职工作的同时，做些秘密保卫工作。财政厅里只有秘书科长陈鹤轩同志了解我这方面的情况。

1946年6月26日，蒋介石悍然撕毁停战协议书，大举向我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此后，我们省政府就进入战争状态。白天工作，晚上整装待命，随时准备撤退。到了7月，我和财政厅庶务股长贾钦江同志根据财政厅领导决定，第一批撤出承德，携带大批物资向兴隆转移。由于天不作美，在我们的转移途中下起了瓢泼大雨，把我们携带的物资都淋得湿透了，直到鹰手营子，天才放晴。所以，我们在鹰手营子呆了两天，晾晒物资，之后就奔向兴隆县城。

到兴隆县城不久，贾钦江同志对我说，可能省委社会部找你，厅里让你马上回去。贾钦江说完后，我想可能有紧急任务需要我去办。所以，我二话没说，次日早骑上马就回承德了。那时，省财政厅的陈鹤轩、王石煤等同志都已撤走。厅里的工作由董源润和陈耕野同志负责。另外还有一位陕北来的老同志专门做党务工作。我回承德后，首先找到这位陕北来的老同志，他让我到省教育厅找仇友文副厅长。仇厅长又让我找省委社会部的徐晃同志。徐晃同志直

截了当地对我说，万子清同志已经撤走了，他走前有个交待，让我直接领导你的工作。经过研究，组织上决定你不撤走，继续留在承德，从事地下工作。徐晃同志还说，这个任务是十分艰巨的。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在这种非常情况下能从事这项工作是十分光荣的，组织上相信你能出色地完成这个任务。徐晃同志和我谈话时，我的心情十分激动，党能把这个艰巨而光荣的任务交给我，充分说明党对我的信任，能否无条件地接受并出色地完成这个任务，是组织对我的严峻考验。我决心接受组织的考验，争取较好地完成这个任务。之后，我向徐晃同志提出两个问题：一个是我的预备期问题。因为我入党刚刚两个来月，按党章规定我的预备期是一年，我留下来，不知什么时候才能与党组织取得联系，我什么时候才能转正，成为一名正式党员。这个问题，使我不能不有所考虑。我提出这个问题后，徐晃同志说，待研究后答复。在最后一次接头时，他通知我说，你的党员转正问题，组织上已与省政府党组织进行了研究，认为今后无法及时研究你的转正问题，决定从即日起，就批准你为正式党员。我提的另外一个问题是，我过去的面貌太红了，加上这次撤往兴隆，财政厅和省政府内凡是熟人都知我是铁了心当八路。为了顺利地完成任务，安全地潜伏下来，我请组织帮助我改变过去的面貌。徐晃同志说，这个问题组织上已有安排，你也要注意自己的言行，搞好配合。

同徐晃同志谈话后，我又到财政厅上班。我一上班，许多人都感到惊奇，因为我是公开撤走的，早已向家里和同志们告别过，怎么又突然回来了？为了消除大家的疑团，厅领导召开全厅干部大会，指名道姓地把我大批一通。说我平时说得好，关键时候是草包，撤出后，害怕艰苦，革命意志动摇了，偷偷地跑了出来。我在会上装出破罐子破摔的样子，对批评不以为然。会后，我上班三天打鱼两天晒网，迟到早退，不好好干。在班上，我散布不满言论，说落后话。为此，厅里又专门开了我的批判会，我索性不上班了，在旱河沿摆

了个小摊子作小买卖去了。这样一来，我原来的面貌"变"了。过去，大家都认为我是积极分子，特别是在我愉快地撤离承德后，都说我是铁心跟共产党，铁心跟八路军。现在，在人们眼里，我是个叛徒，许多同志对我冷眼相看。特别是我们粮秣科的黄科长和他的老伴魏浩，过去我们都十分要好，经常一起下乡征粮。这时，他们老俩口对我也嗤之以鼻，见了我就远远地躲开，连话都不屑跟我说。相反，一些反动分子、落后分子却同我套起近乎来了。

1946 年 8 月 20 日左右，省、市党政机关开始陆续撤退。撤退前夕，徐晃同志又与我在粮市北山的一个天主教堂里接头。接头时，徐晃同志向我详细介绍了敌情，特别是详细介绍了国民党、政、军、警、宪、特的组织状况，将要同敌人打交道的一些手段和必须注意的事项。在翠桥附近小山坡上我们最后一次接头时，他对我说，我们就要撤出承德了，没什么重大事情，在我撤退前就不再接头了。今后，你就要离开组织，孤军作战，同凶恶的敌人打交道了，你可能会遇到许多意想不到的情况。遇到这些情况，你要冷静，要牢记住自己是一个共产党员，记住这一点，你就知道该怎么办，不该怎么办。徐晃同志还说，由于形势变化很快，今后你在市里做何工作，如何开展工作，组织上无法拿出具体意见，但希望你能千方百计，不失时机的打入到敌人内部，如能打入党、政、军、警、特的机关内部，搞到重要情报更好。在敌营中，你担任的职务越高越好。他还嘱咐我说，发展组织和关系人时要慎重。除获得敌人重大紧急情报外，一般不要擅自找组织，到时候组织上会派人与你联系的。接着，徐晃同志与我规定了联络暗号。临分别时，徐晃同志满怀深情的握着我的手说，战争总是要付出代价的。今后，如果我不在了，你要记住王范同志。徐晃同志和我接完头不久，就随省委撤离了承德。

二. 打 入 敌 营

我党机关撤离承德后，国民党就占领了承德。不久，我害了伤寒病。我的病稍好一点，我爱人又传染了伤寒病。我当时因无事可干，就弄了点破烂，在旱河沿摆摊作买卖。由于我个人喜爱音乐，晚上没事时，常在家拉二胡、弹琴。这样，我家里就招来一些音乐爱好者。他们和我一起拉二胡、弹琴，一起海阔天空地谈天。这里边有个叫杨文熹的，他拉京胡在承德很有名气，承德第一次解放后他参加了工作，在省政府上班。他曾参加过史立德、王奂如等人演出的京剧《甲申三百年祭》的伴奏，我们过去就有些来往。有一天，杨文熹对我说，最近，国民党想成立一个建国剧团。这个剧团隶属国民党热河省党部。党部的宣传科长王兴华兼剧团团长，副团长是过去京剧团唱黑头的王恩波。现在已经有几个人了，这些人也大多是承德有名的京剧"票友"。唱青衣的是两个男的：一个是魏长山，另一个是郑晓天；唱老生的姓刘；唱花脸的姓崔。他还说，他已经参加了，并动员我参加。我想，这个剧团既然隶属国民党热河省党部，那么就容易接近国民党省党部的要员。以后，还很可能趁机打入省党部里。这正是我所希望的，因此我欣然同意。就这样，我经杨文熹的介绍，来到了建国剧团的音乐组。这个组除杨文熹外，还有关静平和我介绍去的一个叫周启哲的。与我同时到剧团的还有西大街的一个姓王的麻子。这个人会变魔术，他在剧团专门表演魔术。他表演时，我为他配声响。这个剧团的演职员没有工资，收入主要是靠演出费。演出费的分配既按人又按股。所以，我们都在剧团里入了股，一个股大约5000法币，约一袋面钱。我入的是一个股。

剧团组建后，在省党部礼堂演过几场，演的都是些旧京剧。在大佟沟口，我们演过一次京剧和魔术。1947年1月份，春节临近，这个剧团要去外地演出。这时我爱人的伤寒病刚好，她很想家，再三让我送她回家过春节。我也愿意趁这机会减轻我的家庭负担，有

利于开展工作。所以，我向剧团请了假，带着我爱人回我的老家——东北黑山县了。由于我是独子，所以回家以后，我的老母亲再也不肯放我回承德了。她说，现在兵荒马乱，你走我不放心。说实话，我也真舍不得我这位老母亲。但我想到自己是一个共产党员，肩上有党组织交给的任务，我也就在家呆不住了。我对母亲说，我在承德还有东西，我收拾一下东西就回来。听了这话，我的老母亲才同意我走。我是在元宵节前后告别了亲人返回承德的。回到承德后，这个建国剧团散了摊，我入的股钱也无处去找了。

我的同学周启哲的姑父在流水沟开了一所医院。1947 年 3、4 月份，一个偶然机会，我在这所医院里见到了王效谦。王效谦是朝阳人，伪满时在承德税捐局与我是同事。国民党占领承德后，来省党部当主任委员叫王致云的也是个朝阳人。为了拉关系，王效谦改名叫王致恭，从而攀上了当家子，认这个主任委员为叔伯哥哥。王效谦见到我后，他看我无事可作，就说，我开了个文化服务社，挂了个热河省党部服务社的牌子，省党部宣传科王科长也入了股。由于咱有根子，服务社的买卖十分兴隆。我那里还缺个会计，如果你愿意，就请你屈尊到服务社当会计吧。省党部这几个字吸引着我，所以我应邀来到了这个文化服务社当了会计。

我到服务社一二个月后，有一次我遇见了罗继和来买东西。罗继和在承德第一次解放期间，曾在安波、李劫夫办的承德艺术夜校学习过。后来艺术夜校改为星海合唱团，他也参加了这个合唱团，并担任男高音独唱角色。我们有过往来。再加上罗继和与卢敏政关系不错，我与卢敏政的关系也不错，所以与罗继和也就有了更进一层的关系。这次碰见，我和罗继和都很高兴。他告诉我，现在国民党热河团管区正组织一个兵役宣传队，我参加了。你在音乐方面比我还强，在这窝着干啥，干脆也到这个宣传队去吧。我一打听，原来团管区就是相当于团一级国民党招募新兵的机构。相当于师一级的叫师管区。这个机构与地方政府的兵役科不同，它是专门负责

验收和训练新兵的。热河团管区下设三个大队，大队属于营的建制。这个兵役宣传队也属于营的建制。队长由团管区宣传科科长饶恕中校兼任。团管区司令是杨守德。这个人是国民党的一个上校，参谋主任叫蔡松山，是个中校。了解上述情况后，我想，当上宣传队员，穿上军装，也就打入了国民党军队里，这比在省党部服务社更有利于开展工作。所以，我以喜爱音乐为由，请罗继和给予介绍。这样，我经罗继和介绍，来到了这个宣传队的音乐组。这个组的组长就是罗继和。从此，我不但穿上了国民党的军装，而且被正式授了衔，当上了"官"。团管区司令杨守德在《日日命令》上颁布了"任命毛粒民为兵役宣传准尉队员，准戴少尉衔"的命令。

来到兵役宣传队后，我正式开始了地下工作。在此期间，我首先发展了罗继和。他开始是少尉组长，准戴中尉衔。后来，他当了宣传队的副队长，授衔中尉，准戴上尉衔，但仍拿的是少尉的钱。发展他的大体经过是这样的：由于我们的关系密切，就经常在一起聊天。我俩都是卢敏政的好朋友，在谈天中总离不开卢敏政这个内容。每当提起卢敏政，他总是滔滔不绝，表现的非常羡慕。有一次，在火神庙大街的饭馆里，边吃边谈。他说，人家卢敏政多好，跟八路军走了。咱穿这身虎皮，老百姓都不拿正眼看咱。我什么时候能像卢敏政那样到解放区去就好了。我就接过他的话头，悄悄地试探性的问：如果有机会，你愿意去吗？当八路军可不是好玩的，弄不好要掉脑袋呀。他对这些话的反映总是这样一句话：当了八路军，就是掉了脑袋也值得，总比这人不人鬼不鬼的强。后来，我看条件成熟了，就对他摊牌说，我就是共产党的地下工作人员，如果你真想为八路军做些事，那咱们就一起干。罗继和听了我的话既惊奇又高兴。他说，只要是给共产党、八路军办事，我听你的，你咋说我就咋干。罗继和之后，经罗继和介绍，我又发展了苏家忠。当时，苏家忠正在承德市南营子小学教书。过去，这个人也在星海合唱团呆过。盼八路军，一心想当八路军。所以，我就发展了他，主要让他在小学

教员和学生中多做些工作。

发展了苏家忠之后，我又与冀热辽保卫部的地下工作人员张志林取得了联系。在我到兵役宣传队不久，张志林和他妹妹张桂枝经人介绍，也参加了兵役宣传队。张志林来到宣传队后，对我很注意，常常向别人侧面了解我的情况。罗继和把这个问题向我反映后，我就让罗继和、苏家忠了解他的情况，注意他的言行。我了解到，这个人在伪满时期曾在承德扶轮小学(铁路子弟学校)当教员。承德第一次解放后，他在我冀热辽军区后勤部办的一个合作社参加了工作。撤退时，没随部队走。国民党占领承德后，他当过几天侦稽队。因此，我对他十分戒备。但后来，我没有发现他有不利于我的行动，才逐步解除了戒心。1947 年中秋节前夕，在一次闲谈中，张志林谈到他妹张桂枝时对我说，第一次解放时，桂枝已和胜利剧社一个姓俞的订了婚，姓俞的撤走了，桂枝还一直等着他。听了这话，感到奇怪，哥哥是侦稽队，妹妹等个八路军，兄妹俩关系又很好，真是让人难理解。

中秋节那天，因为我的家属不在承德，张志林请我到他家过节。我们边吃边谈，说到有关第一次承德解放时的情景，谈得很投机。最后，让我住在他家。当晚谈到深夜，他突然语气十分严肃地对我说。老毛，我有件事想告诉你。可是，我告诉了你，就等于把脑袋交给你了。我思想上仍有所警惕，所以用十分诚恳的语气引导他进一步谈这方面的情况，但又不能说出自己的身份。我说，老张，咱们相处不是一天了，难道你还信不着我吗？张志林接着说，我是冀热辽军区保卫部范化民科长留下的八路军地下工作人员，并叙述了他留下的每个阶段的情节。我一看他是想动员我参加，就没等他说完，马上接过他的话头说，我毛粒民一向讲义气，绝不出卖朋友。不过，这话你可不要乱说，否则会惹出祸来的。中秋节过后，我把张志林说的那些话通报给罗继和、苏家忠 。我们决定继续对他进行考查。后来，张志林又找我，说他在承德还发展了几个人，其中有二

仙居西边开烧饼铺的女中学生吴惠珍。她哥叫吴清源。我对吴清源这个人比较熟悉，早在日伪时期，我和卢敏政经常到他家吃包伙。对这个姑娘也有所了解，觉得这个孩子不错。张志林还告诉我，说他还发展了张占鳌和孟昭伦。孟昭伦在地政局工作。听了张志林的这些话后，我没表示任何意见，后来又让罗继和、苏家忠了解张占鳌、孟昭伦的情况。罗继和他们了解完后告诉我，说这两个人都很好，是正派人。这样，我对张志林逐渐相信了，准备在适当时把事情挑明。过几天后，张志林又对我说这些，我就趁机问他，那你们都干了些啥？听了我的问话，张志林苦闷地说，啥工作也没干，不知道咋干，又找不到组织，我心里急死了。经过甄别，可以认定他是我方的地下工作人员。于是，我亮明了身份，说我是省委社会部留下来的。当时，我还留了一手，没有告诉他，我发展了罗继和、苏家忠。张志林一听我是省委社会部留下的，十分高兴。他马上说，这下可好了，老毛，今后我就归你领导。从此，我和张志林就一起进行活动了。

同张志林取得联系后，我紧接着发展了方训诗。当时，方训诗在国民党承德税务稽征所工作。在伪满时，也在税捐局。承德第一次解放时，他也在热河省政府财政厅粮秣科工作，我们又是同事。据我了解，他在粮秣科工作很认真。撤退时，他跟着走了。但到隆化时，他与财政厅的人走散了，因一时找不到组织就回承德了。由于他对共产党、八路军有很深的感情，念念不忘找八路军，有重新争取他为我党工作的思想基础，所以我发展了他。后来，国民党承德法院招录事，我让他报考，结果被录取。这个人被发展后，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比如，他参加过散发传单的工作，后来还做过一些联络工作。

此外，我还发展了关宗武。关宗武当时是承德中学的学生，早在伪满时，他曾在地政局当仆役。承德第一次解放时，在热河省财政厅当事务员。因为他也喜欢音乐，在省机关举行的业余文化活动

中，他是积极分子。那时，我们就有些接触。之后，他由省政府财政厅调到税务局。因为他年龄小，表现又积极，所以，税务局的朱局长很喜欢他，撤退时想把他带走。但是，他祖母死活不让走，所以没走成。国民党占领承德后，他到中学读书去了。在学校里，他比较有威望，又进步，所以我发展了他，让他着重做学生工作。

1947 年底，因我在兵役宣传队开展工作引起了一些人的注意，我就离开了宣传队。1948 年 3 月，为了打开新的局面，我经热河团管区参谋主任蔡松山的介绍，随国民党新任平泉县县长岳宗飞到平泉，在平泉县政府里担任庶务股长。1948 年 4 月，由于在平泉无法开展对承德市的工作，我又辞职回到承德。回承德后，没事干，我就弄点大五幅布在街上作买卖。接着，我又和张志林的父亲一起开了个小吃铺，卖些馄饨、饺子、烧饼、酱肉、薰鸡蛋等。在作买卖过程中，我结识并发展了我的一个同乡，他叫武凤声。伪满时，武凤声在我的同学杨征琪家开的一个成衣铺里当裁缝。由于我常上杨征琪家里去，所以同武凤声认识了。武凤声在第一次解放时，在军区被服厂当工人，生活比较困难，我经常接济他。后来，经过一段观察，发现他有投奔解放区的愿望，我便发展了他。我发展他的主要目的是想让他当交通员同组织取得联系。这年 6 月的一天，我正在小铺里经营买卖。武凤声来了，他兴奋地对我说，胡雪心（又叫胡兆林）要搞个中统局承北工作站，咱到他那弄个证件，将来到解放区去时就方便了。武凤声反映的情况也使我的精神为之一振，这确是千载难逢的机会。“中统”是个特务组织，打进特务组织可以搞到更多的情报，而且便于潜伏。我马上召集张志林、苏家忠等人一起研究这个问题。我们都同意充分利用这个机会，打进“中统”里去。过后，我首先找到胡雪心的同父异母哥哥胡瑞征，因为我和胡瑞征是伪满承德税捐局的同事，平时有些来往。当我找到胡瑞征时，一说明来意，胡瑞征为人一向老实正直，所以他极力反对。他说，这可不是好人干的事。但由于我以混个饭碗为理由，再三请他帮忙，他

才答应与其弟胡雪心说说。胡瑞征与胡雪心一说，胡雪心即表示同意。之后，我在胡瑞征家与胡雪心见了面。我根据胡雪心好占便宜的特点，给他带来不少礼物。见面后，胡雪心对我说，丑话先说头，干咱这个的，没工资，用钱要自己想办法。要枪的话，也得自己花钱买。我说，行。就这样，我就在这年6月正式来到了承北站。这个站的全称是"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员通讯局（原称统计局）承德室承北工作站"，站长是胡雪心。我去后，胡雪心对我说：我们这些人是大老粗，你是个文化人，就给我们当书记（秘书）吧。因此，我是这个站的书记。这个站下设一个情报组和一个突击队。情报组的人常常是化妆成商人、教员等，神出鬼没地窃取我解放区的情报，突击队则是以武装形式搞情报。这个工作站的特务持的是"突击证"。这个证件是个火柴盒大小的布片，上面横印着"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员通讯局承德室"，下面竖印着"突击证"三个字。这个证件很机密，在国民党内部也不公开。这个工作站的特务也不是每人一个证件。只有几个，由站里统一保管，谁出去谁用。特务们持这个证件时，往往是把这个证件卷成小卷，缝在衣服里。我在这个群魔乱舞的工作站，一直工作到承德市第二次解放，大约有半年时间。在这期间，我了解到，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员通讯局还设个热河省室，主任叫于拯元，承德室的情报科长叫钱继忠，承德室除管一个承北工作站外，还管一个承南工作站，站长叫隋益民。

三、争取《火炬》壁报

1947年3、4月分，在承德二仙居桥北的一家商店墙上，突然出现一期名为《火炬》的壁报。这块壁报有4张纸大小，报头是一幅水彩画，画面上有个青年擎着把火炬。壁报上的文章大都是揭露国民党统治下的承德教育界黑暗的，指名道姓的抨击了承德师范和承德中学的训导主任以及伪热河省教育厅长。壁报还配有发刊词及编后话。在壁报的发刊词里提出了"不偏不倚，遵守中立"的办刊

宗旨。《火炬》壁报这样事物的出现，这还是承德有史以来的第一次，它像在阴沉的天空中突然炸响的一声巨雷，轰开了承德市沉闷的政治空气。为此，《火炬》壁报特别引起人们的关注。许多教师、职员、学生、市民以及国民党军队的士兵，纷纷来到二仙居，围观壁报。他们边看边议论，拍手称赞的有之；指责谩骂，视为异端的也有之。我作为一个中国共产党的地下工作人员，对这块壁报的反应更敏感。我觉得，这块壁报的办报宗旨虽然是不偏不倚，保持中立，但文章的具体内容则完全是抨击国民党的黑暗统治，这无疑是进步的。所以，我十分关注这块壁报。不久，这块壁报又出了个“纪念鲁迅专刊”，详细介绍了鲁迅先生的生平，介绍了鲁迅先生部分名著的内容。特别是这年 6 月教师节过后，《火炬》壁报又出了期“教师节专刊”。这期专刊，不仅文章辛辣，讽刺性强，而且还配有一幅引人注目的漫画。这幅画画着一个小学教员，擎着一只破饭碗，作要饭姿态，口里喊着：“我们要吃饭”。这幅画确实活龙活现地反映了当时教师特别是小学教师的贫困生活。当时，国民党统治下的承德，小学教员没有工资，无固定收入。其生活的主要来源要靠向学生要米，要得多就分得多，要得少就分得少。由于市民极端贫困，许多学生拿不出来，因而教师也就分不到多少米，所以常常吃不饱。实际上这张画上的形象，也是当时广大劳动人民的缩影。这期专刊反映了教师的真实生活，在教育界反映极为强烈。许多教师停了课，跑来看壁报。

“教师节专刊”的发表，极大地吸引了我，我觉得《火炬》壁报总的倾向是进步的，这一点可以肯定无疑。所以，我决心搞清这块壁报出刊的背景及组成人员，以便不失时机地开展工作。当时，我正在团管区兵役宣传队，而且已发展了罗继和和苏家忠为我的关系人。由于苏家忠是小学教员，对教育界比较熟悉，所以我把了解《火炬》壁报的任务交给了他。几天后，苏家忠向我汇报说，《火炬》壁报是由承德师范和承德中学的几个学生自发搞起来的，其政治背景

就是不满国民党的统治和受北平学潮的影响，自发起来抨击社会。国民党之所以没有公开干预，主要是这块壁报亮的是不偏不倚，保持中立的宗旨。文章的主要内容是揭露教育界，没有直接抨击国民党的党、政、军。所以，国民党不愿撕去“民主”的伪装。这块壁报的发起人是刘朝江和周伯镛。刘朝江是承德师范的学生。这个学生很有才华，也很正直。在承德第一次解放时，他在学校就很积极。《火炬》壁报那些抨击国民党的辛辣文章大多出自他的手。周伯镛是承德中学学生。他的父亲是承德市最大烧锅“源盛合”的老板，家庭生活富裕，《火炬》壁报的经费主要靠这个人提供。他对国民党的统治不满，但对共产党也无好感。他在这块壁报上发表了一些所谓中立文章。当时，周伯镛已离开了承德去北平读书去了，整个《火炬》由刘朝江负责。为《火炬》壁报画报头和插图的是小学教师王信。这个人很有才华，是个有正义感的热血青年。根据苏家忠的介绍，我决定以交朋友的面貌接触刘朝江。

我同刘朝江第一次接触，是从承德第一次解放时流行的一支歌子谈起的。这支歌叫《日日夜夜盼解放》，歌词分三段，其中的一段是这样的：“十三年亡国苦难当，盼望亲人来解放，左盼右盼盼不见，好像孩子离了娘；好狠心哪！中央国民党，丢掉了东北方，一跑再跑去的远，留下老百姓遭灾殃”。刘朝江十分喜欢这支歌，提起来赞不绝口。承德第一次解放时。这支歌子发表在承德文联主办的《吼声》刊物上。歌词作者是施维民，曲子是我谱的。刘朝江一听我是这支歌曲的作者，真有点相见恨晚的劲头，表现得十分高兴。接着，我们把话题转到《火炬》壁报上。我说，这块壁报办得不错，我愿助微薄之力。刘朝江听了后更加高兴。此后，我对《火炬》不断地给予经济上的支援。由于我在国民党的团管区兵役宣传队，有机会接触北平民盟等办的一些刊物，那上面经常刊登着一些反映北平学潮的文章，我就把这些刊物偷偷地推荐给刘朝江，用这些刊物引导他，教育他。

在和刘朝江的接触中，我发现这个人虽然正直、进步，但因受当时社会的影响，有点自命清高，“君子不党”、“不偏不倚”的思想很严重。他对共产党有好感，但由于正统观念作怪，所以觉得只有国民党才能代表国家，国民党政府才是合法政府。因此，在接触中，我下力气纠正他的这些错误观念，逐步向他渗透革命道理，宣传共产党的主张，不断提高他的思想认识。进行这些工作时，我没有暴露自己的政治身份，完全是以朋友的身份，以探讨的方式进行的。刘朝江在和我的接触中，对我十分尊重。他总认为，我比他看问题全面，我的办法比他的高明。所以啥事都愿和我磨叨，请我出主意，拿办法，特别是有关《火炬》报的事，他事事对我讲。比如，他盲目地把三青团承德团部的工作人员盛玉文吸收为《火炬》壁报的成员。主要经过就是盛玉文极力称赞和同情《火炬》，提出参加办《火炬》的要求，刘朝江就认为盛玉文不错，向盛玉文暴露了自己办报的身份，并吸收盛玉文为成员。我听了后，除 对刘朝江提出劝告外，还和他一起分析了盛玉文参加办《火炬》壁报的动机。我认为，第一，可能是盛玉文思想进步，真心实意地拥护《火炬》；第二，也可能是为了争取和影响《火炬》，把《火炬》变为三青团的御用工具；第三，可能是为了搞清《火炬》的底儿，而后一网打尽。所以，我让刘朝江提高警惕，相机而动。盛玉文参加办《火炬》之后，曾写过灰色文章，由于刘朝江思想有准备，所以进行了必要的抵制。办《火炬》的成员之一白松岩，以《火炬》壁报的宗旨是“保持中立”为由，主张在骂国民党的同时，也指责共产党。刘朝江和我谈了白松岩的主张后，我给他出了不少主意，指导刘朝江巧妙地抵制了白松岩的错误主张。在实践中，刘朝江对我更加信赖。后来，凡是《火炬》上准备刊用的文章，他都事前请我审定。这样，《火炬》就逐渐成为我们领导和严格控制下的一个刊物了。为此 ，我也向刘朝江公开了身份，正式发展刘朝江为关系人，鼓励他为共产党、八路军多做些工作。《火炬》的战斗性也越来越强了。

1947年秋，承德出现了一场竞选伪国大代表的闹戏。国民党十三军军长石觉的老婆张复权，为了当伪国大代表，竟出动大批马车和汽车，派人挨家挨户地拉选票。他们公开喊，选举张复权的上车，并规定，凡上车的人都必须选举张复权。为了揭露国民党的假民主，真专制和他们内部的勾心斗角，我和刘朝江商量，决定办期《嘲竞选专刊》。在这期《火炬》专中刊出的文章全部是揭露石觉的老婆张复权的。在壁报两侧还写了一幅"快选张复权，坐车不花钱"的讽刺对联。这期专刊大大地触动了石觉，他彻底撕掉了"言论自由"的伪装，不但派人撕了壁报，而且还把刘朝江等人抓到国民党十三军军部。后来，因没有真凭实据，怕引起学潮，才不得不将刘朝江等人放了出来。

刘朝江被放回来后，我们考虑，《火炬》壁报目标太大，已引起了敌人的注意，国民党特务不时地活动在壁报附近，再这样搞下去，必会遭到毁灭性的打击。为适应新情况，决定改《火炬》壁报为油印《火炬》。油印《火炬》有八开纸大小，每期印三十几份、门八十份不等，散发在二仙居、南营子大街，有时被我们巧妙地压在商店的柜台上，秘密地塞进国民党党政机关的门缝里。直到1948年8月，我找到承德工委负责人郭耀臣，向他汇报工作时，郭耀臣同志指示我，为了长期潜伏，回去不要搞《火炬》了，这项工作我们党另有人去搞。这样，《火炬》就停刊了。

《火炬》从诞生到停刊，共一年多时间。在这段时间里，《火炬》逐步拨正方向，趋向成熟，终于成为我们的一个专门揭露敌人、抨击黑暗的喉舌，起到了鼓舞群众，教育群众，团结群众，打击敌人的作用，深受人民群众的欢迎。在承德人民心目中，《火炬》占有一定位置，赞扬《火炬》是自己的刊物，说出了他们想说的话。

四．刻印散发传单

1948年5、6月间，我军缩小了对承德的包围　承德处于紧张

混乱状态。国民党十三军把兵力集中承德地区，做出了死守承德的势态。为了配合我军的行动，我们抓住这个有利时机，开展了刻印散发揭露敌人，教育群众，鼓舞群众传单的活动。在佟山二坡四号，我住一间半房子。这是一个外院，只住我一个人。当时中、小学校已停课。刘朝江经过一段锻炼，思想上接近成熟，我也想进一步培养锻炼他，我叫他搬到我那儿住，并和他商量了刻写、散发传单的问题。他毫不犹豫地答应了，立即把刻写印刷工具带到了这里。

我们住在一条炕上，每当夜里，我们起来，由我出题，确定中心，刘朝江拟稿，我修改后，由他刻印。刻印过程很简单：把刻写成的腊纸，铺在白纸上，他带上手套，用棉花蘸油墨，往腊纸上一行一行地抹出字来。别看这是一个偏僻地区的小屋，也别看印刷工具如此简单，但在国民党严密控制、充满白色恐怖的条件下，这里却闪烁着革命的火花。在敌人"誓死保卫大热河"的吼声中，这里却响起了革命的惊雷。

在几次刻写印刷传单的内容上，据现在能回忆起来的有当地群众流传的语言"打八路，骂八路，八路走了想八路；想中央，盼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我们把这些生动形象的语言，当作口号，刻写在传单上。第一期的传单内容，宣传了当时的战争形势。指出国民党的败局已定，国民党挣扎顽抗也挽救不了失败的命运，号召人们用各种方法同敌人斗争，使承德早日获得提前解放。以后每期传单的内容，有的是揭露国民党抓丁拉夫修工事，号召人们不去充当国民党打内战的炮灰；有的是抗议国民党镇压群众；有的是号召人们消极怠工；有的是提醒人们警惕国民党进行破坏活动，号召人们注意保护国家财产，有功者奖等等。

夜里把几十张传单印刷出来后，次日我组织方训诗、关宗武、张志林等同志，在同一时间，从不同地方散发出去。这些小传单，引起了敌人极大的注意，使敌人更加惶恐，曾在《长城日报》上发出消息说，本市发现共产党活动，叫知情者检举，隐匿不报的惩治，并部

署特务、军警查稽。在这几天夜里，我们不断听到狗的狂吠，由远而近。我们预感到可能要被搜查，预先做了准备。在一个漆黑的午夜，突然，我们的街门被踹开了，几名身背长短枪支的军警和便衣，一窝蜂似地闯进了我们的屋内。面对这种情况，我和刘朝江都很镇静。经过一阵搜查，除了刘朝江的学习课本外，在床底下搜查出一把美式步枪刺刀和在我的一本书里发现一张有线报话机图。敌人洋洋得意了。"这是什么?"一个穿便衣的人边看边问。我坦然地回答："这是我在中学学物理时做的图。"愚蠢无知的搜查者，看了半天也看不懂，只好把这张图交给了我。我最担心的是，在南墙上一幅风景画的后面，隐藏着两张清理时遗留下的内容不同的传单。搜查者只要稍微用手敲动一下，传单就会暴露出来，那将会出现另外一种情况。敌人这次搜查一无所获。这是因我们事先做了准备。头天晚上，我们已经把钢板、铁笔、腊纸、油墨等刻写印刷工具，都转移到里院的一个防空洞里，一部小报话机藏到一间破房子里。敌人虽然对我们有怀疑，从搜查中妄图获得证据，但这一些都落空了。

在这里住，我的工作得到了张志林一家的帮助和支持。这一家人都很好，张志林是我们的工作人员，他当然有意识地帮助我。他的妹妹张桂枝后来也知道我的身份，但她对共产党有好感。我的小报话机隐藏的地方就是她指点的场所。特别是他们老太太，后期知道我是共产党的地下工作人员，明确表示："你放心。"她在生活上、工作上象老母亲一样关怀我、帮助我，这些使我永远不能忘却。

五．找组织，送情报

1948 年 6 月，我到中统承北工作站不久，由于国民党十三军第四师的部队与承北闹了些矛盾，该师出动部队把承北工作站抄了。这样，承北工作站在承德北边的双峰寺呆不住了，被迫转移到承德南面的阎营子一带。到阎营子不久，胡雪心就派王功去头沟。王功是情报组的情报员，这个人一只眼有毛病，既斜又有疤，真是

眼斜心不正。这个家伙心狠手黑坏得很，是胡雪心的得力爪牙。

往头沟派情报员不是常有的事，因头沟小学的一个校长就是情报员，他长期潜伏在那里，一般的情报都能得到。这次往头沟派人，特别是派这个王功，这就说明头沟可能有事情，或是国民党军队要往头沟方向行动。因为徐晃同志临走时告诉我，如果发现敌人往解放区派遣等重大情况，让我直接出来找组织。所以，我准备了一张"突击证"，决定以去解放区搞情报为由，到解放区找组织，向组织报告王功去头沟等情况。当时，苏家忠也离开了兵役宣传队在闲着，我决定让他与我同去。武凤声一心想去解放区，我准备利用这个机会把武凤声送到解放区去。我和苏家忠、武凤声按约定，悄悄地在棒锤山下汇合，之后翻山奔向六沟。当天晚上，我们三人宿在解放区与国民党统治区交界的一个梁下，第二天早晨我们就准备过梁东去。这时，一个老乡对我们说，往前就有八路军了。我压住内心的喜悦，故意不以为然地说，我们作买卖的人，怕八路军个啥。说着我们便加快了脚步，恨不得一步就迈到"家"。我们三人刚一下梁，就被八路军战士喊住。我对战士说，我们是市里来的，有些事要找省委。这个战士十分警惕地把我们"送"到一个指导员那里。这个指导员派人把我们"领"到承德工委谭景春那里。谭景春又把我介绍给承德工委副书记郭耀臣。郭耀臣对我们进行了审查，分别听了我们三个人的汇报。第二天，郭耀臣同志与社会部联系后，证实了我的身份，对我们十分热情。在他们勒紧裤腰带的情况下，给我们做了炒鸡蛋吃，又和我整整谈了一天。在谈话中，我详细汇报了我这一年多的工作，耀臣同志听得很仔细。最后他对我说，承德的解放已为期不远了，为了配合我军解放承德，你要尽快搞清国民党军队在承德的兵力部署，最好画个图。我说，我有个关系人叫孟昭伦，他是国民党地政局管测绘的，我已经让他把保险柜里的承德市地图偷出来复制了一份，这份地图现在藏佟山我的住所。耀臣极为高兴，他连声说，这很好，好极了，你就把敌人的工事、兵力标在

这张图上，标好后派人送来。耀臣同志接着对我说，秋收快要到了，敌人要准备抢粮，你们如果要发现这方面的情报要尽快的送出来。他还指示我说，我已和徐晃取得了联系，组织上决定让你作长期潜伏的打算。如果可能，你最好把张志林从兵役宣传队拉出来，让他也到承北工作站去，以便配合你的工作。耀臣同志还说，关于《火炬》报，你不要再介入，这不利于隐蔽。关于这方面的工作，党会派其他人去做的。你发展的那个刘朝江，如果可靠，在敌人撤退时，可让他与敌人一起撤，趁机打入敌人内部，长期潜伏下去。耀臣同志说完后，交给我一张共产党的布告，以便让我在胡雪心面前交差。

我从六沟回到阎营子后，把布告交给了胡雪心。胡雪心不但对我没产生怀疑，而且十分高兴，表扬我能干。我趁机向他推荐了张志林。张志林来的也很巧，正赶上情报组长黄秀峰另有任用，情报组长的位子空了出来，张志林被委个情报组长。之后，我又以回市照看一下买卖为由，找到刘朝江，向他传达了耀臣同志的指示，停了《火炬》报。刘朝江当月就与流亡的学生一起，乘飞机去了北平，在北平他搞了一个"承德在京同学会"，进一步秘密地为党进行工作。

刘朝江走后，我与张志林一起以搞情报为名，在承德市内四处活动，摸清国民党在承德的兵力部署，把什么地方驻多少兵，修了什么样的工事，配备了什么样的武器等，详细地标在孟昭伦复制的那张地图上。1948 年旧历八月初，国民党十三军第四师的兵力大量集结在承北，八十九师及一些地方团队也向承北集结。我和张志林估计敌人可能要从承北向平泉方向采取行动。当时，平泉已被我解放，掌握在我们手里。所以，我们决定立即把这一情况连同地图送出去。

决定后，我让张志林把地图藏好，带上"突击证"，奔向平泉。他走前，我们商定第 10 天见面。如果不能准时见面，就是遇到意外情况，再由我出城，继续把情报送往平泉。张志林走了 10 天后，没有

回来和我接头，我断定发生了意外。因此，就带上手枪和“突击证”，翻过棒锤山，经三沟、六沟奔向了平泉。我从平泉县城南门进城后，碰见一队巡逻的解放军战士，我拦住他们说，我是从承德来的，要找省委汇报情况。战士把我领到承德工委书记郭洪德那里。当时，我和郭洪德不相识，我提出要找耀臣和徐晃。正在谈话时，卢敏政同志进屋来了，这样就证实了我的身份。当时因郭洪德有急事，他听了我汇报的大概情况后，让我把具体情况向李征夫说一说。李征夫一见面就说张志林已经来了，东西收到了，你回去吧。我说，不对，我没见到张志林。在回去前，我要见见耀臣和徐晃，否则我不能回去。

第二天，李征夫把我领到分局社会部的李岚（当时叫张侃）、宗海峰那里。李岚同志见到我说，老毛，你来的正好，张志林回去了，我已让张志林捎话给你，请你马上来一趟，详细谈谈。不曾想，张志林病了，回去晚了，他到承德时你已经来了，这有张志林托人给你捎来的条子。我接过条子一看，原来是张志林问我还回不回承德，如果不回去，把“突击证”给他捎回去。条子的落名是“去非”。这是临来前，我给张志林起的代号。看到这个条子，我放心了。之后，我向李岚详细汇报了我的工作和承德市内的国民党党、政、军、警、宪、特情况。我谈时，李岚还不时地提问，并详细做了记录。接着，李岚又拿出张志林送来的地图，让我对照地图详细介绍敌人的兵力部署。最后，李岚同志说，咱们在绥中打了大胜仗，解放了义县。咱们的任务与前段有变化，组织上决定，在国民党撤退时，你不要走，尽量争取到“潜伏”任务，摸清国民党在承德的潜伏情况，以便一网打尽。你也要通知刘朝江，让他也不要随国民党撤走，尽量摸些国民党在北平的潜伏情况。

李岚和耀臣布置的任务正相反，一个是长期潜伏，随国民党撤；一个是不让撤，想办法留下来。听了李岚同志的布置后，我感到工作上出现了 180 度的大转弯。因为，接到耀臣布置的任务后，我

就不断向胡雪心吹走的风，胡雪心已答应我随国民党一起撤了。现在又不让我撤了，怎么同胡雪心说呢？

我从平泉回来后，见到胡雪心。就说，最近我的买卖不错，发了点财，给他送点银元。胡雪心很高兴，他就买好地对我说，承德很危险了，咱们就要离开了，你要作好准备。接着他说，承德室的报务员崔坤可能要带电台潜伏在承德，此外还要留些人。和胡雪心见面后，我就找到张志林商量对策。我们决定，争取承担潜伏任务是上策，争取不到，就在撤退途中跑回来。1948 年 11 月初，胡雪心找到我，交给我两支大枪。对我说，撤退前，咱就不联系了。撤退时，咱分开走，你把这两支大枪背上，咱到北平再见。听了胡雪心的话，我十分高兴，因为他没有让我同他一起撤，而是让各走个的。这样有利于摆脱他，按照组织要求执行我们的任务，这正是我求之不得的。胡雪心大约在 11 月 10 日离开承德去的北平。

胡雪心同我谈话后，我和张志林按李岚的布置，立即投入了紧张的工作，千方百计地摸敌人潜伏情况。按组织上指示，在我兵临城下，敌人大势已去的情况下，我们有条件争取过来的人，就千方百计地争取过来。兵役宣传队的吴清源与二仙居附近的军统中的一个特务认识。我就对吴清源晓以大义，讲明利害，把他争取了过来，让他摸清军统的潜伏情况。张志林认识国民党陕西营区公所的一个管户籍档案的人，我们把这个人争取过来后，在 11 月 12 日下午，趁国民党撤退的慌乱之机，把这个区的档案偷偷地运到陕西营二坡 4 号张志林的家里。此外，我们还通过关系人了解到国民党在撤退前藏枪的地点。11 月 13 日，李岚他们进承德后，根据这个情报，起出一大堆枪。从李岚那回来后，我给刘朝江写了信，让他回承德一次。刘朝江回来后，我向他传达了李岚的指示。后来，刘朝江和他发展的两个关系人按李岚的指示留在北平。在我到天津后，我写信给刘朝江，让他与北京公安局内七分局局长李超接关系。从此，刘朝江和他发展的两个关系人就转到北京公安局内七分局工

作了。

1948年12月，我奉命到冀察热辽社会部长城训练班二大队，与李岚等同志一起南下接收天津。从此，离开了我十分留恋的承德。

回想我在两年多的地下工作中，由于党事先有周密的布置，取得联系后又得到及时指导，紧紧依靠党的领导和大家的努力，做了一些工作。但是，在同党没取得联系前的一段，还是走了一些弯路的。

（王继明整理）

（作者曾任天津市公安局副处长等职）

在南山部队的日日夜夜

齐占文

1948年春，我人民解放军在解放军总部提出的“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伟大号召鼓舞下，在向国民党举行的大反攻中，各线作战都有重大进展。部队的攻坚能力大为提高，连克了石家庄、运城、四平、洛阳、宝鸡、临汾等敌军重点设防的城市，东北近99%的地区已经解放。承德市重新回到人民的怀抱已经为期不远了。为加快收复承德的各项准备工作，冀察热辽分局除决定把原来在承德工作过的干部调回承德工委外，还决定让工委组建起一支精干的武装部队。

当时，我在冀东14分区警卫四团任政委。一次，我到冀东区党委开会。在会上碰见了承德工委书记郭洪德、副书记郭耀臣。他们告诉我，原来在承德工作过的老同志回来了不少，并要求我也回来。我表示听从组织安排。会后，郭洪德找到冀东区党委，往回要我。区党委同意并通知了14分区，调我回承德工委。我来承德工委报到的时间，大约是1948年5月初，地点在车河。报到时，郭洪德对我说，你从部队来，我们正缺军事干部，你去组建市大队吧。那时，承德工委只有一个排的武装，大约30几个人，由田星华带领。我去后，上级又从承德县大队给拨过来2个连。县大队长王国珍也随部队调了过来。这样，市大队就正式组建起来了，组建地点在车河。工委书记郭洪德兼市大队政委，我任副政委，王国珍任大队长。大队下设2个连。市大队组建后，即随工委书记郭洪德等人一起由车河到承德东部开展活动，经常活动的地方是平泉老杖子，承德县的二沟、三沟、六沟、墩台等。为保守军事秘密，方便工作，市大队公

开番号叫我"南山部队"。

1948年8月，我"南山部队"在三沟、六沟一带配合人民解放军独立六师活动。独立六师师长是韩梅村。8月中旬的一天，韩梅村率部队从三沟出发奔上谷，而后准备往承德方向运动。国民党军误认为独立六师已走，因而出动了一个团的兵力向三沟进攻。我和王国珍率部队迎敌。由于敌人来势凶猛，气焰十分嚣张。因此战斗打得十分激烈。在敌我力量悬殊情况下，为避免较大伤亡，我"南山部队"边打边撤到三沟南山上。我们撤到南山后，敌人又向我们发动了几次进攻。但都没能攻下。这时，天渐渐黑了，敌人也就退回三沟。我"南山部队"撤到南山时，我们一面迎敌；一面派出通讯员给独立六师送信。韩梅村接到情况后同我们约定：当天午夜，我"南山部队"从南山上往下攻，独立六师绕到敌人背后，从承德方向过来包剿敌人。午夜，我"南山部队"按预定计划向三沟发动了进攻。当我们摸进三沟时，发现敌人已往二沟方向撤走了。不一会儿，撤退的敌人与我独立六师相遇，遭到迎头痛击。战斗过后，独立六师的同志告诉我们，这一团人马，只有敌团长带一个连逃走，其余都被歼灭。妄图趁机拣便宜的敌人吃了大亏。所以，他们很长一段时间不敢出来活动了。

1948年10月初，韩梅村率独立六师到山海关一带作战．接替独立六师在三沟一带活动的是独立二师。从此，我"南山部队"又配合独立二师作战。独立六师走后，国民党十三军又不断向三沟方向发动了进攻，企图占领三沟一带。为了打击敌人，独立二师与我"南山部队"约定：独立二师埋伏在三沟东山和二道河子的南山上，由南山部队主动迎敌，把敌人诱到独立二师的伏击圈。我和王国珍率南山部队在三沟西面与敌人接上火后，边打边退。当我们退到二道河子时，敌人已进入独立二师的伏击圈。顿时，独立二师分别从三沟东山向北，二道河子南山向南，冲向敌群。我"南山部队"立即回过头来，从正面顶住敌人。敌人三面受打击，赶紧调过头来逃跑。但

结果还是被我们吃掉了1个连的兵力。这次战斗,我们还俘虏了七八十名敌人。对这些俘虏,我们分别进行了教育。教育后,对愿意回家的,我们发给他们路费;愿意参加革命的,我们把他们留在了"南山部队。"

在战斗空隙,我"南山部队"集中主要精力,开展对承德市的工作,了解和掌握市内敌人情况和社会动态,物色和向市内派遣关系。我们物色的关系人大多是商贩、艺人和国民党军官家属等。派遣前,我们对派遣人员进行短期训练,让他们较系统地掌握我党的政策,学习一些开展敌工工作的方法。这些人派进后,大部分起到了程度不同的作用。例如,平泉有个姓胡的地主,他的姑爷是国民党十三军的一个连长。这个连长曾两次被我军俘虏,表示回去后要宣传解放军的宽大政策,为解放军提供情报,但没啥行动。我们做好这位姓胡的地主的工作后,派他进城做他姑爷的工作。后来,这个姓胡的地主虽没能动员好他的姑爷,率领本连士兵出来向解放军投诚,但却为我们收集了许多有关国民党十三军的情报。他还在国民党士兵中宣传解放军的优待俘虏的政策,揭露国民党的谣言,起到了动摇国民党士兵的军心,进而瓦解敌人的作用。

1948年11月,我"南山部队"逐渐靠近承德,来到仓子一带活动,密切注视着城内国民党十三军的动向。11月12日中午,国民党十三军撤离了承德。下午三四点钟,我们获得了情报后,一面派人把情况报告给工委,一面整理部队向承德市进发。当夜11点钟左右,我"南山部队"通过大石庙的水泉进入市区后,马上担负起维护承德市的社会治安的任务。后来,独立二师等兄弟部队进城后,对承德实行了军管,我"南山部队"分工负责南营子大街的社会治安。市委、市政府正式组建后,承德市结束了军管。我"南山部队"改编为市公安大队。我被调到电业局,后到市委组织部。从此,离开了这支可爱的部队。

(作者曾任中共承德市委组织部部长等职。)

热南战役

王世俭

1948年，是我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敌人被迫由战略进攻转为战略防御的一年。这一年，我人民解放军在全国各个战场上，发动了向国民党军队的全面大反攻。

敌人为挽救其在东北、华北战场上的危局，梦想"固守承德"，占领冀东，实现"东北、华北联防"。我军则针锋相对，为掩护东北主力休整，牵制敌人北调，消灭敌人于冀热辽，扩大解放区，从而卡紧东北与华北的咽喉——热河、冀东地区，造成对东北敌人"关起门来打狗"的态势，决定使用大兵团作战，由华北和冀察热辽野战军联合开展夏季攻势。因为主要战场在热南，所以当时也称"热南战役"。

战役开始前，各有关县、区组织了战争勤务委员会(战委会)，在各村组织了担架队、运输队，规定了动员号令，集合方式，行军秩序。老人、妇女儿童则组织拥军支前小组，为我军砍柴、做饭、烧茶、温洗脚水、侍候伤病员、分发慰劳品。

进入3月，平谷、蓟县、遵化、玉田、顺义、宝坻、香河、滦西等县的上万名民工，就奉命往战役大后方兴隆县运送粮食和饲草，储存于公路两旁的村镇。共备粮食3000万斤，饲草280万斤，食油10万斤，盐12万斤。野战医院(医大四分校，承德医专的前身)设在杨树湾到遵化县马兰峪之间的村庄里。此外，还在六道河、前苇塘、兴隆镇、半壁山、北区、北双洞设立了兵站。到4月底，一切准备就绪。

国民党傅作义部在古北口、承德、滦平三个方向的国民党十三军、九十二军、九十四军、独九十五师、新三十一师、四十二师、四十

三旅、独一旅、暂编六十师及担任守备之非正规军14万多人，他们白天四出抢粮、抓丁、驱赶老百姓修工事，晚上飞机扔照明弹、监视我军民行动，并狂轰滥炸，致使我和平居民妻离子散，无家可归。

热南战役，我冀察热辽人民解放军由杨得志、罗瑞卿、程子华指挥。四月底，我军进入热河和冀东参战的部队有：华北二兵团、三纵队、四纵队、冀察热辽十一纵队、独四师、独五师、独六师、独七师、四旅以及冀东各军分区独立团和县大队，共15万人。整个战役从5月初开始，到7月初结束，共进行2个月，分两个阶段进行。

第一阶段：采取“扫除外围、孤立承德”的打法。5月8日，我冀察热辽十一纵队之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师经过在朝阳3个月整训后，从宁城出发，急行军到三沟、六沟之间，截击由平泉回窜承德之敌十三军2个团。16日，攻击承德东象鼻子山，歼敌282人，随后会同军区炮兵团于18日包围隆化。与此同时，置独六师于高寺台、中关、烧锅营一线，以待机阻击可能由承德北援之敌。经6天战前准备，5月25日晨4时20分，我军对隆化之敌发起总攻，至26日晨3时，经23个小时激战，全歼守敌十三军八十九师二六五团一、二2个营及师属工兵连和保安队，共1690人。缴获各种炮36门、轻重机枪66挺、长短枪530支、各种炮弹3000发、地雷和手榴弹5472个。我军也付出代价，战斗英雄董存瑞，三十一师副师长李荣顺光荣牺牲。

5月26日，平泉守敌十三军八十九师二六七团2个营，弃城向承德逃窜，在上板城与下板城之间被我军堵击，歼敌406名，我同时收复平泉和下板城。27日，驻鞍匠之敌十三军八十九师二六六团一个营和700多保安队、地主武装，闻隆化失守，惊慌失措，于凌晨1时弃城东逃，我冀东独立五师、热河骑兵一旅和滦平县大队于张百湾截击敌人，歼敌529人，随即收复滦平县城。是日，丰宁守敌伪热河保安总队2000人南逃，被我全歼。

6月20日，冀察热辽人民解放军发表战报：承德外围攻势完

成，打下5城，歼敌7000人，热河全境除承德外，都已收复。至此，战役第一个阶段胜利结束。

第二阶段：战场南移，对古北口和滦东之敌，采取“牵着鼻子打”的战法。

隆化失守以后，敌人估计我军一是挥师东征，攻打承德孤城；二是全军南下会师古北口。因此，挖空心思，企图固守承德和古北口之准备。古北口方向，除原九十二军外，又调来九十四军、独立九十五师、新编第三军的三十一师。但敌人的这一估计完全错了。

我华北二兵团在杨得志、罗瑞卿率领下，转入冀东、热南作战后。于5月29日令三纵队从兴隆北双洞、六道河出发，牵制平古路西线之敌于密云、石匣、古北口一线。令四纵队和四旅从兴隆半壁山、遵化马兰峪一线迅速东进。6月14日攻克丰润县榛子镇，歼敌7000人，并近逼唐山市。

此刻，敌以为我主力全在东线，遂急从平古路调8个师向东增援，妄图在东线寻机与我决战，进而从东西两面向我夹击，彻底破坏冀东根据地，打通华北与东北的通道。敌人这8个师东调以后，西线虚弱，我乘机以三纵全部和隐蔽待命的独四师、独五师、独七师向西线之敌发动大举进攻。十九日，克石匣、小营，包围古北口，歼敌1800人，缴获汽车30辆，枪支弹药和军用物资一部。

西线这一攻势，出乎敌人意料。迫使出援之敌，除九十二军留在东线外，其余急返平古路，这样又造成滦东空虚。于是，我四纵于23日包围昌黎县城及其附近之敌。25日，程子华令十一纵队进喜峰口，飞速直插昌黎县。两个纵队于29日攻克昌黎县，全歼守敌6500多人。接着，解放了绥中和兴城。

我华北兵团和冀察热辽野战军并肩战斗，牵着敌人鼻子，打得敌人疲惫不堪，晕头转向。下属骂长官无能，长官骂下属饭桶，怨声载道，一片混乱。昌黎失落后，敌人急了眼，来个两路增援东线：从西线新调九十八军2个师、第八军2个旅、独立九十五师，于29日

到达滦县；东线四旅、暂编六十师开到北戴河以西。这时，我军已神速地分别转入辽西和华北作战，使东西援敌自己撞了头。至此，热南战役结束。

在战役进行的整个过程中，热河和冀东人民修道路、抬担架、运粮草、做饭、让房、送水、热情慰劳人民子弟兵，表现了空前的积极性。华北野战军进入兴隆后，六道河区公所，六道河兵站让出全部房屋，自己迁到正南沟西坡子农户五间房办公。最高峰时，战役大后方兴隆县曾驻军10万多人。群众为了战士们休息好多杀敌，自己甘心睡在外边。安营寨村一对新婚夫妇，还把洞房让给战士们住；战士们不住，新婚夫妇也不住，洞房空了一夜。

当时，兴隆县组建担架团，有担架1200多副，4767人；组成运输队，出动大牲畜2089头。有1万多名男女为军队担任向导、后方战勤、照顾伤兵、总计折合战勤工52万多个。还支援部队粮食50多万斤、饲料90多万斤，蔬菜100多万斤，肥猪300多口。解放军说："进兴隆就像到家了！"设在兴隆县杨树湾以南到马兰峪的野战医院，八品叶梁以西负责西线，以东负责东线伤病员的治疗。这个医院在战役期间，治好1800多名伤病员，使其重返前线。国民党傅作义部曾出动飞机跟踪轰炸这所医院，但由于当地群众协助掩护，医护人员和伤病员无一损失。

整个战役共毙伤和俘虏敌人约2.4万人，缴获各种炮91门，轻、重机枪666挺，长、短枪约1.8万支，掷弹筒118个，炮弹1.2万发，枪弹213万发，电台21部，汽车65辆。收复隆化、滦平、丰宁、平泉、延庆、丰润、昌黎、绥中、兴城等9座县城。迫使敌人从承德、热南广大地区龟缩到北平、天津、唐山、承德、密云等地，打破了敌人实现"东北、华北联防"的美梦。同时，切断了东北敌人的退路，也为我东北大军在辽沈战役后入关作战，提前扫清了障碍。

国民党县长张郁文击毙记

朱呈云

1947年12月中旬，兴隆县境内降了一场鹅毛大雪，足有半尺多厚，整个山河大地顿时变成一片银色世界。雪后，北风袭来，滴水成冰。可是，就在这雪后的12月24日，国民党兴隆县党部书记兼县长张郁文，在自卫大队长刘茂廷、国民党十三军第四师十团及谍报队1000余人的保镖下，从承德开拔，步行200多华里，侵占了兴隆县城东50里的重镇鹰手营子。张郁文与刘茂廷扬言：要在兴隆这块土地上长期呆下去，挂上牌子，修好衙门，使国民党兴隆县政府由过去流动变为有个固定之地。

张郁文、刘茂廷，何许人也？张郁文，又名张化行，河北省束鹿县人。1941年，经河北省国民党冀东督导员陈崇新介绍，加入了国民党。随后到日伪兴隆协和会担任会长，充当汉奸，潜伏下来。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张郁文认为时机已到，便同在兴隆的其他国民党要员一起，穿梭般地去北京与其主子联系，阻止在兴隆驻防的满洲军队投奔共产党，妄图拖延时间等待国民党派兵接管，抢吞革命的胜利果实。当兴隆伪军西南防卫司令黄方刚于8月31日宣布率队起义，接受共产党改编以后，当地人民欢欣鼓舞，张郁文却如丧考妣，逃到北平。1946年9月中旬，兴隆有1200多人，其中大部是地主富农，跟随国民党五十三军逃往密云县内，张郁文闻讯从北平赶到密云。在密云县城成立国民党兴隆县政府，张郁文出任县党部书记。1947年夏，县长刘亚忱（热河省主席刘多荃之侄）辞职调出，张郁文在密云担任了国民党兴隆县流亡政府的县长。

刘茂廷，兴隆县西道沟村人，反动地主。日伪统治时期，充当伪

甲长，又是万国道德会的忠实信徒，依靠日伪权势，为非作歹，欺压百姓。日本投降后，刘茂廷视时局已变，贼心不死，乘机纠集少数日伪特务、土豪恶霸、兵痞警察，在上窝铺村秘密组织武装。刘茂廷担任自卫队长，有队员十七八人。于是他们四出活动，得到伪满警察一些武器，还偷袭我地方区政府，搜捕民兵枪枝，不断吸收兴隆逃亡人员入伙。到1945年底，公然把队伍扩大百人左右。随后，他与在密云的兴隆县流亡政府接上关系，并用女儿与国民党十三军一个军官勾搭，得到一批武器弹药。1946年冬，队伍发展到200余人，多是兴隆、承德等县的一些反动地富、地痞流氓。经常到承德县西部、兴隆县北部、滦平县南部进行骚扰，抢劫粮米，杀害农村干部，成为三县边境最大的一股反动匪患。

由于国民党军队和刘茂廷自卫部队进犯兴隆，倒行逆施，反攻倒算，进行阶级报复，不得人心。广大贫苦人民对其恨之入骨，纷纷找到部队请求尽快消灭这伙土匪。当时兴隆县驻扎承兴团，群众称之为“翻身团”。这支部队是在土地改革运动中，新组建的一个团。当时一个区组成一个连，叫“翻身连”。这些青壮年身体素质好，阶级觉悟高，除输送给主力部队外，兴隆和承德两个县的新兵留下6个连，组成翻身团。对外叫承兴团。团、营、连干部都是在抗日战争年代，富有作战经验、有勇有谋的人担任。这次国民党军队和刘茂廷自卫队从兴隆县城撤退后，承兴团在团长郭子忠率领很快从南部洒河、横河沿岸村庄，步行100多华里，于1月18日凌晨进入县城东侧。团部驻在小河南，二连在荞麦岭警戒，大部在小东区、北区、大河南等地休整待命。这支以土改后翻身农民为主体的部队，经过近一个月“忆苦三查”为内容的新式整军运动，阶级觉悟空前高涨。当指战员听到当地贫苦农民控诉国民党军队和刘茂廷自卫队杀人放火、抢劫财物，进行阶级报复时，纷纷写请战书，要求为被敌人杀害的父老兄妹报仇，保卫土地改革，保卫胜利果实。

中午时分，侦察员从克梨木疾步跑回团部，向团首长紧急报告

说："现已探明刘茂廷自卫队和国民党军有50多人，由鹰手营子西进，翻过平安堡山梁，正在马家庄抢粮食，其中有的骑马，听传言还要进犯县城呢！"

团长郭子忠认真听取侦察员的报告，并展开了军用地图，观看马家庄的地理位置。这里距离鹰手营子20多华里，西隔山梁是红梅寺，直通县城，但交通闭塞；北隔山梁是雾灵山前的荒地沟，深山老峪；东隔山梁是平安堡，虽有小路，但大部队行军不便；唯有南面穿过神仙胡同是水泉甸子，这里虽不隔山，但中间峡谷，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郭子忠看到这里，心中暗喜，认为是歼敌的机会。联想到前几天敌人进犯县城反攻倒算，杀人抢掠，搞阶级报复的事实，指战员们请战的激昂情绪。他命令二连连长王举带领战士火速进到水泉甸子村，由神仙胡同插进去。急行军10里，打击抢粮之敌。同时，命令二营营长赵刚田，带领一个连翻过大河南村北山梁，阻止敌人西进红梅寺，防止窜扰兴隆县城。

兵贵神速。二连连长王举率队迅猛进到水泉甸子村，踏雪穿过神仙胡同，隐蔽在一个山根下。观察到敌人在克梨木川的白毛甸子西山有一排放哨，马家庄东山也有一个排放哨，敌人正在疯狂地抢劫民家财物。王举见此情况，认为敌兵力多，直插进去，左右无援，歼敌困难较大，便一面派人火速返回团部请求增兵，一面隐蔽，做好战斗准备。

郭子忠团长接到前线的敌情报告，了解到敌人不是50多人，而是几百人。除副团长杨林、副政委董连寿、王德高原地留守外，亲自率领承兴团大部集结水泉甸子村。命令一营长李少青带领一个连，从水泉甸子攀登西山雪地，翻过大烟筒梁，进入白毛甸子，解决西山哨，直插马家庄，接应二连。郭子忠同教导员邵贵良一起，带领一个连攀登神仙胡同东山高地，支援从神仙胡同正面进攻。这样，再次进行战斗部署，于下午3点钟战斗打响了。

国民党兴隆县党部书记兼县长张郁文、自卫大队长刘茂廷、敌

十三军副营长兼谍报队上尉主任周益信等，正在马家庄邓玉岚家喝水。猛然听到神仙胡同东山发出“砰、砰”的枪声。这时候，自卫队员王松跑来报告说：“解放军占山头了，咱们快退吧！”刘茂廷听后满不在乎，哼的一声说：“碰到几个土八路有什么大惊小怪的，他们一杆枪没有，不用怕。”假装镇静，继续饮水品茶。可是周益信却不放心，急忙溜出了屋，跑到后山的一个东坡临时掩体内，命令六0炮手向我神仙胡同东山开炮。结果炮位距离定的不准，炮弹在半山腰雪地上爆炸，根本未伤我军的一根毫毛。

敌人只顾向我军山头反击，却没想到我承兴团战士近在咫尺，埋伏在眼前。这时，我二连二排长刘福成从神仙胡同口霍地跳起来，率领战士攻下马家庄东山制高点，敌人溃退至村内。一、三排从侧方迂回到马家庄后山。同时，一营长李少青从大烟筒山朝白毛甸子西山袭来，敌人不堪一击，溃逃而去。

刘茂廷在屋里听到枪越来越密，越打越近，再也坐不稳屁股了。他慌忙从邓玉岚家杰飞跑出来，窜到后山东坡隐蔽处与周益信一起指挥六〇炮手作战。顷刻间，县长张郁文也溜出屋，吓得战栗成一团，奔往后山躲藏起来。

此刻，团长郭子忠、营教导员邵贵良带队伍已占领神仙胡同东山北头的边山子、包头山制高点，命令战士用机枪把敌人的火力压住，掩护马家庄附近的我军战士向敌逼近。二排五班副孙连珍飞步冲向马家庄后山，见到一个穿黄呢子大衣的官长，正在掩体内指手划脚部署作战。孙连珍端起前些天刚缴获的冲锋枪，对准敌官长“哒、哒，哒”就是一梭子，这个官长应声倒地，中弹身亡。正当孙连珍换子弹，准备继续冲锋时，却被敌乱枪击中，身负重伤。此时，二连连长王举见战友倒下，一面令战士将孙连珍抢回急救，一面指挥战士们奋勇前进，冲向马家庄后山。战士贾有石见敌军官指挥六〇炮手向我炮击，忙用掷弹筒装上炮弹，定好距离，“轰”的一声，在敌六〇炮座旁开花，敌指挥官当场丧命。这时，敌人见死去指挥官，胆

颤心寒，无心恋战。为保全自己活命，抛下官长尸体，窜入一条狭窄的沟洼，翻过山梁，向荒地沟方向狼狈逃窜。

敌人一部溃逃后，我军乘胜追击，继续作战。一营长李少青、连长孔祥东、指导员毛德厚，率队从白毛甸子冲至马家庄西侧。这时，发现一个身体肥胖、留大背头，身着便服的官长，由几个人护着，穿过隐蔽的山区小路，逃避正面山头火力，妄图溜走。一排长山林遇此岂能放过，对准目标，“砰、砰”几枪，把其打死在西道旁。敌军见丢了主帅，丧魂落魄，拼命向东冲击，翻过山梁。余部向鹰手营子逃窜。我承兴团指战员，经过不足半个小时的紧张战斗，击毙敌军17人，俘敌16人，打伤敌军60多人，缴获六〇炮1门，还有不少枪支弹药，打了一个漂亮仗。

短兵相接，战斗激烈，当时不知被击毙者是谁。战斗结束后，我军打扫战场时，从穿黄呢子大衣的尸体腰兜里发现个小本本，里面贴有照片，证件上写着兴隆县自卫大队长刘茂廷的名字。同时，在指挥炮手的军官尸体兜里搜出证件，标有国民党十三军四师上尉副营长兼谍报主任周益信的字样。之后，又从俘虏口中得知被击毙人员中，那个身体肥胖、留大背头的是县长张郁文。指战员和当地贫苦农民闻听打死了县长，奔走相告，拍手称快。同时，人们听见把作恶多端、反攻倒算、搞阶级报复的刘茂廷也除掉了，更是欣喜若狂。有个战士兴奋地说：“原来流传着：‘刘茂廷、瞎胡闹，拿着女人换枪炮，烧杀抢劫坏透顶，有朝一日挨报销’。这个可耻的下场，今天可报应了。”

朱德骑兵师

赵克勋

解放战争时期的朱德骑兵师，是中共冀热辽中央分局、冀热辽军区，为了祝贺朱德总司令诞辰 60 周年，下令组建以总司令名字命名的一支骑兵部队。

1946 年夏季，蒋介石公开撕毁国共双方停战协定，大举进攻我解放区，冀察热辽地区的形势也紧张起来了。为了打败蒋介石的进攻，建立巩固的农村根据地，进一步夺取全国胜利，8 月下旬，我冀热辽军区所属部队胜利完成了战略转移任务。冀热辽中央分局党政机关和热河省委也相继从围场县转移到林西、林东等地，为迎接全国性大反攻做战斗准备。

11 月 30 日这天，驻林西县部队及党政军各界召开大会，庆祝朱总司令 60 寿辰。会上，冀热辽军区司令员程子华发布命令，决定从热中、热西、热北军分区各抽调一个骑兵团，组成冀热辽军区朱德骑兵旅(师)。命令要求全党、全军要努力建设一支政治巩固、战斗加强的骑兵部队，为中国的解放事业做出贡献。

各地委、军分区积极响应中央分局的号召，认真落实指示，拿出了自己所属最好的部队、枪支和马匹。到 1946 年底，朱德骑兵师下属 3 个团已基本编制就绪。热中骑兵团编为朱德骑兵师第一团；热西骑兵师团为第二团；热北骑兵团为第三团。

当时，各团下属只有 4 个连队，四五百人不等。

此时，整个部队处于战略转移后的暂时休整中，林东会议正在召开。因此，师的领导干部均未到职，师部机关各工作部门亦未配备齐全。林东会议之后，各团分赴前线执行新的任务：一团在桥头、

初头郎——赤峰地区打游击，开辟工作，收复失地；二团先期从经棚出发，护送热西地委和县政府重返热西开辟工作。返回后，在乌丹(今翁牛特旗)休整数日，12 月 27 日随同赤西县、围北县政府返回大庙、新拨一带打游击，配合两县政府开辟赤西、围北根据地；三团仍留热北地区，在林西、林东、天山、大板各旗县、执行剿匪任务。

这期间，各骑兵团统归第二十二军分区领导。各团之间只在统一指挥的战役上，偶尔有过二三次协同动作。1947 年春在白岔、大碾子两地合围白金辉匪部，就是分区统一部署的。此外很少一起活动。各团分散活动约有 8 个多月时间，这时各团的人员、马匹、部队建制都有了显著增加，武器、装备也相应得到了改善。各团都成立了机炮连。按照马匹毛色统一调整了各连马匹，形成了各连队马匹颜色同一化。

各团分散活动时期，部队经常主动出击、作战机会较多，指战员的军事素质和作战能力，在实战中得到了锻炼提高。战士们打起仗来生龙活虎，打出了铁骑的军威。朱德骑兵旅的威名远震，使热河境内敌人闻风丧胆，乡亲们称赞朱德骑兵师是仁义之师，是热河人民的子弟兵。

1947 年 9 月，朱德骑兵师下属的 3 个团在赤西县大庙一带集结。师的领导干部已正式到任。从第二十二军分区和热北军分区抽调的司政供卫各部门的领导和师直机关工作人员也已随同到达。至此，朱德骑兵师领导机关的各级业务部门已日趋完善，隶属关系从第二十二军分区划出，由冀热辽军区统一调度指挥。

当时到任的朱德骑兵师主要领导有：

师长，何能彬；

政委，谢志群(十一月因病调出)、林茂源；

副师长，卜云龙(兼师参谋长)；

政治部主任，刘克。

部队经过短时间的纪律教育，补充了装备，发放了马刀。10 月

初从集结地向东北前线进发。10 月中旬，部队抵达朝阳地区待命，配合九纵队、十一纵队攻打朝阳。23 日晨，朝阳县城解放之后，朱德骑兵师奉命向义县前进。

11 月 2 日，骑兵师在义县的九官、台门、李家沟一线，与敌人增援部队九十二军侯镜如所部遭遇。发现敌人之后，我骑兵部队抓住战机向敌人猛冲过去，战士们策马挥刀直闯敌人阵地。刹那间，敌人炮火中断，枪声稀疏，敌军惶恐万状，乱撞乱跑。我铁骑健儿在敌群中往来冲杀，迫使敌军很快放下武器，交枪投降了。

这次遭遇战，我骑兵部队大获全胜，俘虏敌人 1000 多名，除敌军长侯镜如乘车逃跑外，其余步兵、炮兵几乎被我全部俘虏。缴获各种车辆 80 余台。其中野炮、榴弹炮、运载重型武器的车辆就有二三十台之多。步枪和轻型武器弃满河滩、道旁，军用物资不计其数。

这是朱德骑兵师出师东北战场的第一仗。胜利使指战员们受到鼓舞，很多战士议论："蒋家军并不比老牌土匪更高明。"更加坚定了战士们的必胜信心。这次战斗之后，各团调换了一批枪支，用敌人的武器武装了自己。很多战士用上了美式三〇步枪或美式冲锋枪。各连配发六挺轻机枪，各团机炮连一律换发重机枪、迫击炮，战士们高兴极了。

朝阳县城解放后。我九纵、十一纵仍在朝阳寺山中与敌军激战。为防止敌人增兵，11 月 3 日夜，朱德骑兵师包围了义县城。守敌见我军兵临城下，早已惶惶不可终日。是日黄昏以后，敌一七四师在师长于大川带领下悄然出城意欲逃往锦州。午夜，我骑兵二团、三团绕路疾行拦截敌军。4 日上午 10 时左右，在义锦公路的余积屯一带发现了敌人。部署在山头敌军的机枪、步枪齐向我骑兵部队猛烈射击。

余积屯地处丘陵，山势虽不甚高，但敌人居高临下，对我十分不利。这时，我军处在狭长的平川地带，骑兵目标大，多停留一分钟就会带来巨大伤亡。"枪声就是命令"，部队立即疏散，战士拔刀在

手，冲杀声震撼山谷，2 个骑兵团疏散开，像破堤的洪水直向敌群冲去，时打乱了敌人的部署。这时，尖兵排长马春雨，毫不犹豫地带领全排，迎着哒哒的枪声飞马上山，向着正在射击的敌人冲击。山头上敌人部署了一个排的兵力，见我骑兵迎着枪声直冲上山，早已慌了手脚，顾不得继续抵抗，扛起机枪拔腿就跑。马春雨飞马赶到，夺过敌人肩上的机枪，山头上的敌人乖乖地当了俘虏。我平川地带的大队人马，发扬了骑兵猛打猛冲的“传统战术”，使敌人再无还手之力，仅用 90 分钟时间就把敌军第一七四师彻底打垮了。战斗打响之后，敌师长于大川见势不妙，提前乘汽车逃跑了，而他全师的官兵以及下属军官的太太、小姐们全部做了我军的俘虏。

1948 年冬，朱德骑兵师在林西县训练了 3 个月。同年 4 月 2 日，部队从林西出发，取道围场参加解放多伦战役。4 月 6 日，骑兵师进入围场县境。部队疏散在十六分地、银窝沟、大碾子、边墙山等地佯装剿匪，实则就地待命。21 日这天，部队经过围场县城向多伦运动时，受到围场各界人民的热烈欢送。县城南北大街两侧，到处张贴着“热烈欢送铁骑军上前线杀敌！”“打倒傅作义，解放察哈尔！”和“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等标语口号。男女老幼各界人民手执小旗，聚集道旁，热烈欢送我骑兵部队从城区通过。

4 月 23 日拂晓，我骑兵师各团分别占领了多伦外围东菜园子、西大仓，与敌军守城部队展开激烈战斗。10 时起，敌骑兵部队在城楼敌人掩护下，从南门冲出，欲夺取我南山阵地。双方都有伤亡，终于被我连连打退。14 时，我师与独立步兵五师协同向县城发起总攻。不久，守敌企图用无辜百姓的生命掩护突围，先从北门推出几百名老乡。随后，敌人的骑兵、步兵齐出，直冲我军阵地，意在打开通道，掩护城中敌人出逃。我骑兵一、三团以猛烈炮火压制敌人，迫使敌军退回城去。只有几百名敌人骑兵掉头向东，被我二、三团乘马拦截追杀，夹击在城东开阔地带。一场混战之后，敌骑兵死伤大半。纵马逃出者所剩不多。当晚，多伦县城宣告解放。守敌保

安第十、十七2个团全部被歼。敌人出逃的骑兵是惯匪白金辉的部队，该敌多伦一战损失惨重，被我骑兵夹击，砍死砍伤大半。战斗中，击毙了敌第四纵队长兼城防司令颜景卿、十团团长关绍祥等1614人；俘敌1500多人。缴获机枪10挺、迫击炮2门、长短枪855支。

为打击多伦流窜之敌，巩固多伦战斗胜利成果，我骑兵师不顾疲劳，4月24日凌晨离开多伦向沽源疾行，尾追逃窜之敌。从多伦县境到太河湾途中，一路清剿了几股国民党散兵和武装土匪。4月30日部队到达二十四号村。这一带敌伪残余势力和土匪十分猖獗，在我部队到达之前，曾袭击我友军部队的一个连，打死随军支前的围场县担架队员10余人。这时，冀热辽军区传来了振奋人心的消息：党中央4月30日发布了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提出了"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号召，指战员听了倍受鼓舞，纷纷表示，坚决响应党中央的号召，为解放全中国做出自己的贡献。为迎接新的战斗任务，我军奉命于5月4日开赴丰宁县七道河地区。部队在这里做了短期休整，召开民主会，自下而上的检查、总结了多伦战斗的经验、教训。

不久，丰宁敌军暂编七师与我友军作战后逃向老千山地区。我骑兵师闻讯后，连夜疾行前往追击。次日晨7时左右，发现敌军正向老千山上运动。老千山，山高立陡只能徒步追击。指战员们不顾疲劳和干渴，奋力追击。经过6个多小时战斗，终于全歼了敌人。战斗结束之后，我师即向隆化方向靠拢，在隆化县杨树沟一带集结待命。6月14日，部队指战员换发了夏季服装，补充了部分军马装具，秘密神速地从隆化经喜峰口进关，到河北省冀东地区往来游击。为了迷惑敌人，不被发觉我军意图，骑兵师逐步向西推进，8月18日突袭并解放了丰润县城。此后，便在遵化、宝坻、蓟县一带，与唐山、天津、北平之敌往来周旋。

9月上旬，骑兵师突然从宝坻县回兵，到北宁线以北的松汀庄

一带隐蔽驻扎。准备配合东北战场攻打锦州。此间，经常派出小部队和侦察员在北宁线上侦察敌军活动情况。几次派部队和民工一起乘黑夜切断滦县至鞍山间的铁路，拆毁桥梁，阻止敌人增兵东北。9 月 30 日后，敌华北十七兵团司令侯镜如指挥他下属林伟俦六十二军和九十二军黄翔的二十一师，几次增兵东北，均因铁路受阻而未成功。

10 月 13 日上午，敌六十二军、九十二军一个师以交警总队为前导，企图修复铁路，强行通过，增兵锦州。我朱德骑兵师在滦县县大队配合下在雷庄、毛三庄、威峰山顽强阻击，与敌军展开激烈争夺。在毛三庄，我二团三连、二连与超过我军 13 倍的敌人抗衡，阵地几易其手，反复争夺一直坚持到夜幕降临。敌人强修铁路的企图始终未能得逞。战斗持续 38 小时，直至 15 日人夜以后，锦州宣告解放，我师撤出阵地。

这次阻击敌人，是朱德骑兵师历史上付出代价最大，持续战斗时间最长，与敌军争夺最激烈的一次战功卓著的战斗。当时，骑兵师和滦县县大队只有 3000 余人参战，而敌人兵力却超过了我军总兵力的 13 倍。敌我兵力对比，反映了战斗该是何等激烈！我师不仅阻截了敌人的增援，赢得了时间，而且也给敌人以沉重的打击。部队向毛三庄运动中，迫使敌人 1 个团全部放下武器，做了我们的俘虏。打进毛三庄之后，又缴获野炮、榴弹炮各 1 门。但这次战斗中，我骑兵部队和滦县大队也付出了很大的代价，除了负伤的指战员之外，还有 32 名烈士长眠在滦县的威峰山下。人民没有忘记他们，烈士们的英灵将像威峰山一样永世长存！

为了配合辽沈战役，骑兵师于 1948 年 6 月秘密进关，目的是切断北宁路，阻止华北敌人增兵锦州。骑兵师经过周密部署和顽强战斗，终于将敌人阻止在威峰山下，没有达到其增兵锦州的目的。为此，骑兵师受到了前线总指挥部的通令嘉奖。骑兵师在东北全境解放，大军进关之后，也和兄弟部队一起参加了平津战役。北平和

平解放后，光荣地参加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北平入城式，受到了各界人民的热烈欢迎。1949 年 6 月 3 日，骑兵师又以剿匪闻名而奉命南下，到中南地区消灭国民党残敌。

1950 年 2 月 24 日，骑兵师从河南省漯河等地区挥师北上。不久，传来消息，朱德总司令将在北京南苑机场亲自检阅朱德骑兵师（后改为骑兵第五师）全体指战员。指战员们听了部队要迎接军事统帅朱总司令检阅的消息，心情都无比振奋。很多战士凌晨就起床刷洗马匹，收拾行装，准备迎接检阅。

4 月 2 日破晓，部队从良乡出发，以正常行军速度经过长辛店、卢沟桥、丰台向南苑机场进发。仲春的京郊，早已是麦苗覆盖大地、百鸟上下翻飞的景象。指战员们回忆一年前从京郊挥师南下，今日凯旋归来又在京郊接受朱总司令的检阅，心中是何等畅快！战士们边走边唱着："跨上马，背着枪，我们是人民的武装，为着劳苦大众的解放，驰马草原奔向战场……"真是一路行军一路歌，很快进入南苑机场。

1950 年 4 月 2 日 11 时左右，朱总司令和他的随行人员乘车到南苑。在机场休息室，朱德总司令与骑兵师团以上干部一一握手问候："同志们好！你们辛苦了！"一声问候，问得干部们心里暖烘烘的。大家齐声回答："总司令辛苦！"这时，师长卜云龙同志向总司令报告了部队情况，请总司令检阅部队。各团领导干部返回队列，朱总司令在师长、政委们的陪同下，漫步走出休息大厅。

机场上，各团按顺序组成方队，"八一"军旗在队列前面迎风招展，指战员们精神百倍地静候那庄严时刻的到来。盛大阅兵式开始了，朱总司令在卜师长陪同下，缓步向部队走来。师参谋长黄道充跑步迎上前去报告："请总司令检阅部队"。这时，全师指战员在统一号令下庄重地向总司令致以军人的敬礼。总司令以稳健的步伐，在队列前迈步检阅："同志们好！"指战员们齐声回答："朱总司令好！"

检阅完毕以后，卜师长请总司令做指示。朱总司令走到事先准备的桌前，向我师全体指战员作了重要讲话。朱总司令说："骑兵师的同志们参与了打垮国民党匪帮，夺取全国胜利的人民解放战争，对国家有很大的功劳；现在又奉调回东北去驻防和生产，为国家和人民建立起广大的用机器耕种的国家农场，同时建立起大马场，使我们的骑兵部队将来有很好的马匹，这是建设新中国的光荣任务之一。"朱总司令还勉励全师指战员："不要因胜利而骄傲，要随时准备为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而斗争，并要为建设我们新的现代化的陆、海、空军和骑兵、炮兵、坦克部队，为建设我们的新中国而努力！"朱总司令的话音刚落，指战员报以热烈的掌声。在"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人民解放军万岁！"口号声中，朱总司令的车队缓缓地从队列前面驶过……。

朱德骑兵师组建于热北，改编于辽西。解放战争时期，这个师驰骋祖国大地，指战员始终保持高昂的战斗意志，参与了东北、华北、中南战场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主要战役，做出了应有贡献。全国解放后，又挥师北上，在梨树县(今孤家子国营农场)垦荒，培植水稻喜获丰收。美帝发动侵朝战争后，骑兵师改编为步兵一六六师，军马调入中国人民志愿军炮兵部队，指战员相继入朝参战，又投入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战争。

（作者曾在朱德骑兵师任团政委、师政治部主任和师副政委等职。）

（王星舟整理）

两次攻打隆化城

周仁杰

1947 年是我军在全国战场扭转战局的一年。为配合东北野战军主力的夏季攻势，为打开热河地区的新局面，我冀察热辽军区部队和地方武装，在军区司令员兼政委程子华同志领导下，向驻守锦承线上之敌十三军出击。这次作战行动有力地配合了东北战场历时 50 天的夏季攻势作战，完成了预定的作战计划。

冀察热辽军区发动这次热河夏季战役，是立足于打运动战，以围城打援为目的。为什么要打隆化城呢？目的有二：一是调动、吸引承德敌人来援，力求在运动中歼灭其有生力量；二是攻围场歼敌 1 个营之后，认为隆化也是 1 营（实际上是两个营，还有保安队），比较容易打。当时我军 4 个旅，都缺少火炮，没有炸药，只有轻武器，敌碉堡群工事坚固；苔山之敌居高临下，我军不具备打攻坚战的条件。领导人有点头脑发热，准备不足，毫无把握，导致轻举妄动，打了个消耗战。战前确定以围城打援、夜间战斗为主。我们独立第十七旅，于 5 月 18 日 5 时从隆化东南两侧发起进攻，当夜占领了隆化东山，并由城南突入城区。攻进城区后，承德守敌仍按兵不动，我只好继续攻打隆化、苔山，遭敌猛烈炮火阻击。经反复强攻，历时 11 个昼夜，进展缓慢，无法突破，敌我伤亡惨重，苔山之敌缺粮断水，靠空投接济和夜间到河边汲水，被我军不断杀伤。我军指战员英勇顽强，以步枪、机枪、刺刀与敌人激战，但伤亡已达 2500 人，形成僵持局面，终于 5 月 30 日被迫撤出战斗。

此次战斗，我军第五、十三、十六、十八旅由分散活动到集中作战，经过 20 余天连续行军，于 5 月 20 日到达隆化县城附近集结备

战，敌情未察准确（战前了解敌1个营，实为2个营加保安队2000余人），即仓促投入攻坚战斗。敌驻守隆化中学和苔山之2个营未遭我严重打击，2天战斗仅俘保安队500余人。在火力方面敌强我弱，敌使用迫击炮，六〇炮、曲射炮，连续杀伤我有生力量，仅十七旅伤亡即达千余人，严重削弱了我军攻击力。

从主观方面看，各旅之间各自为战，没有组织协同配合，缺乏互相密切支援；没有攻坚实战经验，采取了“车轮战法”，“添油战术”，逐次增加攻城兵力。所以打了个消耗战，付出了很大的代价，超过了敌伤亡人数的几倍。特别是缺乏统一的坚强的组织指挥，对敌战斗力估计不足。叫黄永胜指挥，他不负责任，骄傲自大，不尊重程子华同志，抱着消极态度，等待打击敌人援兵，这是他的一厢情愿。

第一次打隆化在作战指导原则上，应当是佯攻、包围隆化，围困苔山守敌，迫使它缺粮缺水，不攻自乱。采取强攻硬打，必然要打消耗战，伤亡较大。第一次打隆化虽未攻下县城，但也给敌人以空前打击，震憾了敌人防御承德的信心，迫使敌人收缩了阵地，扩大了我军控制地区，有利于开展我政权建设和对敌政治瓦解。另一方面，战斗失利也使我军得到了经验教训，使各级指挥员更深刻认识到“不打无准备、无把握之仗”的重要性。

第二次打隆化，情况就不同了。我军在1947年秋季攻势、冬季攻势作战中，取得了很大的胜利，迫使敌军由所谓“全面防御”改为“机动防御”的作战方针，遭我军连续打击后，完全丧失了战争的主动权。1948年2月，我热河之独立第一、二、三师组建为东北野战军第十一纵队。在朝阳地区进行了二、三个月的整训，开展了以攻坚战为主的练兵活动。4月末，为扩大冀察热辽解放区，同时配合华北野战军作战和钳制冀东、热河敌人北调，以掩护东北野战军主力部队休整，遂发动了热河地区夏季战役。此时，我第八、第九纵队已离开热西、冀东地区，进人热东、辽西战场。敌十三军部率四师驻

守承德市；第八十九师师部率二六六团与独立团驻守滦平、古北口一线；第二六五团（缺1个营）驻守隆化；第二六七团及二六五团1个营驻守平泉；热河保安第三总队驻守丰宁；互为犄角之势，拱卫承德市。

我十一纵队各师于5月8日从宁城城南出发，急行军180里到达平泉黄七梁子，抓住战机在二沟堵击敌人，没打好。接着又于5月16日进攻象鼻子山，一场攻坚战歼敌282人。随后在5月18日迅速包围隆化县城，组织实施攻坚作战准备。在此期间，我们用了五六天时间，勘察了地形，侦察了敌情，进行了步、炮协同演练，挖了交通沟，修筑了炮阵地、指挥所，完成了敌前近距离坑道作业，准备了大量炸药，配备了军区炮兵旅（山炮21门、野炮、榴弹炮7门）。部队经过战斗动员，士气高涨，决心打好这一仗！

敌八十九师第二六五团（缺第三营）及师属工兵一个连、炮兵连、保安队共1000余人，分布于苔山和隆化中学。敌用2年左右时间构筑了40多个半永久性的碉堡群和多层配置的副防御工事，比第一次打隆化时有所加强。敌十三军军长石觉在承德狂妄地吹嘘："共军如能打下隆化，我就把承德送给他们"。敌团长汤池也大言不惭地叫嚣："隆化城坚不可摧，固若金汤"！

这次战斗不仅周密地做好攻坚准备，而且还做了打援的准备。以3个师攻坚，并且独立第六师部署于承德附近警戒，待机阻击承德来援之敌。

5月25日4时20分，我纵队发起总攻，第三十一师附军区炮兵旅，担任攻取苔山任务。第三十三师一部附三十二师炮兵营（山炮四门）由城东进攻，并协同第三十二师聚歼隆化中学之守敌。另以第三十二师2个团为纵队预备队。

我三十一师4个连兵力，于夜间抵近苔山，隐蔽运动抵近敌阵地前沿。当发起进攻时，迅速突破了敌前沿阵地。在火力掩护下，经半个多小时的激战，占领了苔山七九六制高点，控制了苔山，夺

取了优势。

我三十三师从东向南仅以 15 分钟的突击，一举突破了敌前沿阵地，迅速插入城区，实施纵深战斗。

我三十二师从隆化城区东北方向突破，经 20 多分钟战斗，攻克敌三个碉堡群，迫使敌人收缩至隆化中学校院内固守顽抗。

当日我军视战斗进展情况，适时调整了兵力部署，于 15 时发起第二次总攻击。第九十六团向学校东北角攻击遭敌顽抗，其"桥型碉堡"发射了猛烈火力进行阻击，我进攻中的第六连，被敌火力压制无法前进，伤亡接连增多。该连六班长董存瑞挺身而出，奋勇冲向碉堡下，舍身炸毁敌堡，壮烈牺牲。我九十六团与九十四团胜利会师，全歼中学内的残敌。

敌团长汤池见大势已去，率残部龟缩到苔山南半部龙头山嘴 4 个碉堡群内顽抗。入夜突围南逃时，被我三十三师九十九团歼俘大部，仅汤池等 20 余人漏网。隆化战斗一举歼敌二六五团(缺三营)1900 余人。

我第三十一师九十一团向苔山进攻时，副师长李荣顺同志(老红军)不幸牺牲。

第二次攻打隆化县城，我军贯彻执行了毛泽东同志的军事思想。集中了 10 倍于敌的优势兵力，进行了充分的准备，真正做到不打无准备、无把握之仗，认真吸取了第一次打隆化失利的教训，炮火支援居绝对优势，步、炮协同，士气高昂，思想统一，在一昼夜内即全歼守敌。

人民群众的积极支援也比第一次打隆化组织得好，伤员有担架队救护(第一次没有担架队，部队自己抬伤员)。

隆化解放后，滦平之敌仓惶撤回承德，我纵队于 5 月 28 日奉命南进。准备在承德，滦平之间协同华北野战军歼灭由平古路可能增援承德之敌。后来敌情变化，我纵队取消打援任务，转移至平泉以南集结待命，6 月 17 日，经喜峰口进关作战。

隆化战斗期间，当地人民群众生活很艰苦，没粮食吃树皮，衣不遮体披块羊皮。我在隆化附近负过伤，养过伤，人民群众却给了我很好的照顾，我们不能忘记隆化人民支援前线的重要贡献。1949年，我纵队进关参加平津战役以至于南下进军期间，每师配属了100多辆骡马大车，随军运输物资、弹药南下至长江边，直到我军渡江后才返回东北家乡。没有人民群众的支援，军队作战的后勤补给、伤员救护是很困难的。这在今后的现代条件下作战，也是极为重要的保证。

（周仁杰：中顾委委员、原海军副司令员）

（王彦整理）

转战冀察热辽的独立十三旅

黄鹄显

在解放战争时期，当敌人疯狂地向我冀察热辽根据地进攻，形势极为严重的情况下，独立十三旅全体指战员，在旅长黄鹄显、政委陈仁麒率领下，以及当地党、政、地方武装和广大人民群众积极支援下，转战冀察热辽地区，打了一系列成功的歼灭战，打出军威，打击了敌人，对巩固、扩大根据地作出了突出贡献，多次受到军区通令嘉奖，并荣获“常胜劲旅”荣誉称号。

1946年6月26日，蒋介石公然撕毁“停战协定”，在向我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的同时，从关内调来九十三军，先后接替了十三军占领的义县、北票、朝阳、叶柏寿一线，进而准备进占赤峰、承德。8月中旬，集中其精锐十三军主力，在冀东方面的七十一军一个师的配合下，大举进犯承德。我冀热辽军区遵照党中央关于“让开大路，占领两厢”以及“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不以保守或夺取城市及地方为主要目标，”的指示，在给予进犯之敌杀伤后，主动撤出承德等城市。

我军驻热河地区的部队为保卫热河解放区，对敌人的疯狂进攻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抗击。但是，部队减员很大，又得不到及时补充。为适应斗争的形势，9月中旬冀热辽军区命令，将十三旅和十四旅合编为热河省军区独立第十三旅。

旅长：黄鹄显；政委：陈仁麒

副政委：刘汉；参谋长：刘禄长

副参谋长：赵兰洲；政治部主任：雷永通

副主任：钟池；后勤部长：韩宗冰

卫生部长：杨衍宗；供给部副政委：刘琏

下辖三十七、三十八、三十九3个步兵团，共约5000余人。

整编后，独立十三旅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针对部队存在的乡土观念，悲观情绪，以及纪律松弛等情况，进行了政治思想教育。同时，开展了群众练兵运动，加强了战术、技术训练。通过思想教育和军事练兵，巩固了部队，提高了战斗力。从1946年9月开始，独立十三旅在军区段苏权司令员、刘道生政委的直接指挥下，在兄弟部队的密切配合和广大人民的支持下，转战于热河、察哈尔、河北三个省，按照毛主席"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战略指导方针，运用灵活的战术，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打了一系列胜仗。

攻克宁城 首战告捷

王爷府整编后，部队经过短期休整，士气旺盛，求战心切，纷纷上书首长，决心痛歼敌军。这时，我冀热辽军区指挥机关自围场北移林西地区。此时，敌九十三军正以钳形之势进犯赤峰，其主力沿赤（峰）叶（柏寿）线北进。敌为了保障其侧翼安全，以九十三军暂编十八师第三团，于9月13日进占宁城。该敌系滇军，装备优良，战斗力强，到热河后，又未受过打击，十分嚣张。

冀热辽军区为了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阻滞敌人的猖狂进攻，掩护军区机关安全转移，决定由热河省军区段苏权司令员指挥，率领独立十三旅三十七团、三十九团和十七旅四十九团围歼宁城之敌。独立十三旅政委陈仁麒率三十八团掩护军区机关转移。

宁城位于乃林站西南，距赤峰120里，为赤峰重要屏障。敌九十三军暂十八师第三团及地主武装1000余人，进占宁城后，抓丁拉夫，昼夜构筑工事，修筑城墙，筑有大小碉堡百余个，工事异常坚固，敌团部设在刘家大院，防御甚严。

遵循毛泽东同志关于"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指示，段苏权司令员召集参战部队的主要领导干部，认真分析了敌我情况，察看了地形，决心以独立十三旅三十七、三十九团和十七旅四

十九团并肩由城北向西南突破。三十七团在左为主攻，首先夺取城中心十字路大碉堡，尔后消灭前街东西两侧守敌；三十九团在中，担任助攻，同三十七团并肩攻击，首先消灭中间炮楼之敌，尔后向刘家大院敌团部攻击；四十九团在右，首先突破正面敌之防御，尔后配合三十九团从西北侧围歼敌团部；宁城县大队在城南佯攻牵制敌人。参战部队于23日黄昏前，秘密进入出击地域，完成了对宁城守敌的包围。

9月23日黄昏后，战斗打响，顷刻间硝烟迷漫，杀声阵阵，震撼了整个宁城。21时，总攻开始，担任助攻的三十九团副团长白斌率一营向敌猛攻。敌人凭借坚固工事拼死顽抗。我因地形不熟，连续4次进攻均未攻克，伤亡较大，攻击暂停。副团长白斌组织连以上干部详细察看地形，研究和分析了敌我情况，对战斗又作了部署。24日21时，参谋长丁龙潜率二营从侧翼发起攻击，主任吴更生率五连担任突击任务。在火力掩护下，他们用铡刀砍断敌人铁丝网后，仅用半小时，即突破敌人两道防线，像一把尖刀直插入腰部，把敌防御切成东西两节，使其首尾不能相顾。接着四、五、六连迅速跟进。敌人凭借围墙，负隅顽抗，我采取挖墙过院逐段跃进的办法，与敌人逐院地争夺。25日拂晓前，敌北城外的大部阵地被我攻克。7时，锦州守敌派2架战斗机前来助战，当对我低空扫射时，被我三十七团用轻武器击落一架，另一架见势不妙，仓惶而逃。13时，一营投入战斗，向南攻击，经过2小时激战，城北的大部分敌人被歼，残部从小北门狼狈逃入城内。副团长白斌率一营乘胜追击，顺势突入城内，直捣敌团部刘家大院。与此同时，担任主攻的三十七团亦采用挖墙过院逐段跃进的办法，向城中心逼近。当攻至第一个十字路口时，突然枪声大作，大碉堡射出无数火焰，封锁住四面通路。几次爆破均未成功，造成了很大伤亡。在这关键时刻，一营二连战士、共产党员郭瑞阁，携起爆破筒，在机枪班长马福顺的掩护下，冒着敌人密集的火力，机智灵活地向敌堡冲击。守敌发现后，疯

狂地向郭瑞阁集中扫射。当接近碉堡时，一颗子弹击了他，当即倒在地上，鲜血染红了衣服。郭瑞阁看到碉堡内继续喷出凶恶的火焰，不知又有多少战友被夺去宝贵的生命。这时，他心中只有一个念头，炸毁碉堡，为战友报仇！他找准时机，拖着负伤的身体，毅然爬到碉堡下将敌堡炸毁。一个排的敌人鬼哭狼嚎，血肉横飞。核心碉堡炸毁后，部队继续向纵深发展，在西面担任助攻的十七旅四十九团，也积极行动，同三十九团并肩从西侧发起进攻。至此，守敌第三团及地主武装大部歼灭，当残部向天义方向溃逃时，又被我打援部队歼灭。25 日 16 时 30 分，战斗胜利结束，宁城又回到了人民手中。战斗中，我三十七团参谋长蔚彰负伤，一营副营长乔廷贵、副教导员刘桂兴光荣牺牲。

宁城一战，共毙俘敌副团长以下 1000 余人，缴获敌火箭筒 7 具、迫击炮 16 门、轻重机枪 24 挺、步枪 134 支、电台 3 部、骡马 38 匹，击落敌战斗机 1 架，生俘驾驶员 1 人。独立十三旅三十九团一、二营受热河军区嘉奖，三十七团二连郭瑞阁荣获“爆破英雄”称号。

独立十三旅首战告捷，开创了冀热辽军区解放战争以来歼敌 1 个团的先例，打击了敌人向我热中、热北根据地大举进攻的反动气焰，坚定了部队和群众战胜美械装备的国民党军队的信心，同时也取得了协同作战和攻坚战的经验。新华社就宁城战斗发表了评论，指出：宁城战斗堪称“转入敌后作战的范例”。

撒围隆化城，激战铁匠营

围场战斗结束后，“前指”决定乘胜南下，攻打隆化。隆化守敌系国民党十三军四师第十团（第三营在围场被歼）和一个保安队、一个山炮连约 2000 余人。“前指”决心以十七旅为主攻，十三、十六旅负责打援，十八旅进至黄土梁子待命，1947 年 5 月 20 日 2 时，主攻部队发起攻击。为配合隆化战斗，独立十三旅向承德北象鼻子山、头沟之敌主动发起攻击。

象鼻子山驻有敌十三军新编八十九师二六一团二营五连 120

余人，头沟驻有敌骑兵三个中队130余人。独立十三旅决心以三十八团配属三十七团一个营攻打象鼻子山，以三十七团两个营攻打头沟，三十九团担任承德方向的警戒。

21日20时，三十八团和三十七团一个营发起攻击。三十八团一营和三营七连为主攻，经过2个小时战斗，歼灭敌大部，残敌逃窜。攻打头沟的三十七团两个营，19时到达头沟，一经接触，敌即逃往承德。此战共歼敌89人，缴马步枪40余支、六〇炮2门。

6月2日，为阻击赤峰之敌弃城南撤，"前指"命令各部队从隆化撤围，东去堵敌。6月5日，赤峰之敌南逃，我独立十三旅和十七旅跟踪追击，进逼朝阳。21日，十七旅扫清朝阳外围。24日晨，我独立十三旅进至朝阳以西外围。此时，敌九十三军暂十八师一个团，暂二十师、暂二十二师各一个营，军直特务团一部及交警两个队由义县来援，企图解朝阳之围。24日20时，敌援兵先头部队已过能家，独立十三旅遂改变决心先打援兵。"前指"令我独立十三旅三十七团从西南监视敌人行动，控制朝阳南山，旅主力进至八里营子、铁匠营子准备打援。铁匠营子东山和金沟车站相连，朝阳至北票公路贯穿其间，是援敌必经之路。6月25日6时，敌先头部队一个营向金沟车站我正面友军猛扑。独立十三旅三十八团二连、三十九团八连刚刚占领铁匠营子东山阻击阵地，见敌扑来，即以猛烈火力向其侧背射击，敌人慌忙撤退。尔后，敌人在炮火掩护下，向我三十八团二连二排阵地猛攻。我沉着应战，待敌接近前沿时，排长杜景春率领四班发起反击，一阵手榴弹炸得敌人抱头鼠窜。随后敌人整营整连的组织反复冲击10余次，每次都被我打得尸横遍野。三十八团二连陈国洪只身冲入敌群，毙敌6人，缴获轻机枪1挺、步枪2支，胜利返回阵地，当场立功。三十九团八连仅以两个排的兵力与20倍于我的敌人展开激战，打得英勇顽强，敌人丢下120具尸体绕道南逃。与此同时，我三十八团五连，远离团主力向敌纵深突击。五班战士计海棠，迂回到敌人后面，打得敌人惊慌失措，打乱

了敌人的部署，最后光荣牺牲。战后，二连、八连荣获冀察热辽中央分局与军区奖给的"防御模范"锦旗一面，五连五班被命名为"计海棠班"。

攻打北票 荣获"常胜劲旅"

朝阳之战，终因敌之增援奏效，我军遂改变决心，转兵东向，进行了胜利的北票之战。

北票系东北著名的煤城之一，是东北敌军重要的煤矿资源。用现代化美械装备的国民党军队把煤炭看得与粮食同等重要。因此，敌九十三军盛家兴特派该军暂十八师参谋主任戴传霖率两个步兵营、一个山炮连、两个保安团、一个矿警队，共 2000 余人，重兵把守。自 1946 年 1 月盘踞后，经一年半之久，敌人利用北票的工业资材，构筑了坚固的工事。有外壕一道，鹿砦一层，铁丝网三层，电网二层，并埋设地雷，防御甚严，易守难攻。

冀察热辽军区决定以独立十三旅、十七旅攻城，十六旅、十八旅置于金岭寺以北打援。十七旅配属炮兵营战防连攻打冠山发电所。独立十三旅配属军区炮兵营山炮连，首先攻夺北票的主要屏障——南山，以三十七、三十八团担任主攻，三十九团集结骆驼营子车站附近，为旅预备队。

1947 年 6 月 29 日凌晨战斗打响，十七旅首先发起攻击。12 时，独立十三旅投入战斗，三十七团、三十八团同时对南山阵地发起猛攻。经过 14 小时的激战，将敌外围 10 余座碉堡全部摧毁，30 日拂晓，三十七团攻破敌旗公署和 3 个大型碉堡，俘敌 100 余人，缴获战马 50 匹。上午，三十九团投入战斗，协同三十八团攻克敌南山碉堡 9 座。10 时 40 分，三十九团对南山核心据点发起总攻。参谋长蔚彰、政治处主任王南芳身先士卒，亲率突击营冲锋在前，但因敌人工事坚固，地势开阔，且在白天，便于敌人发挥火力的优势，我伤亡较大。突击营第一次受挫，旅确定重新组织战斗，黄昏后再次发起攻击。三十九团经过周密组织，利用夜暗，对敌发起猛烈攻

击，全体指战员以高度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前仆后继，用大刀、手榴弹摧毁了敌人的鹿砦、电网、水泥泥碉堡，突破了敌防御线。突击营的同志个个英勇顽强，不怕牺牲，他们只有一个念头：誓死消灭敌人，为战友报仇。三十八团一连在实施爆破时，连续上去4个组都全部伤亡。同志们看到牺牲的战友，更激起了对敌人的仇恨。四班一个战士脱去军衣，紧紧握住战友的手发誓："我坚决炸毁碉堡，给班长报仇！"他时而跃进，时而卧倒，机智地接近敌堡，胜利地完成了任务。三连的祁登荣，在砍电网时，头、臂、腰三处负伤，血流不止，站不起来，他高喊着："打掉我的肉，打不掉我的决心！"毅然把20多斤重的铡刀拖在背上，爬到铁丝网前，为战友们开辟了胜利的通路。在三十九团、三十八团战士们猛烈攻击下，敌人死伤惨重，只好弃城投降。此战歼敌1个营和1个山炮连，俘敌副团长以下400余人。

6月30日下午，正当南山、冠山激战的关键时刻，突然，从金岭寺方向传来激烈的枪炮声，锦义之敌3个团前来增援。我十八旅以顽强的精神，抗住了敌人的猛烈冲击，阻敌于金岭寺以北高地，保障了我攻城部队对北票的进攻。金岭寺与北票相距仅30里路，激烈的枪炮声清晰可辨。守敌听到后，就像抓到一颗救命草，更加顽固，拼命抵抗。经过长期锻炼的我军战士，也越战越勇。30日20时，十三旅对北票城内之敌发起了总攻。三十七团七连一排猛冲上去，用铡刀砍断五道铁丝网，打开了缺口。独立十三旅发扬猛打猛冲的精神，50分钟即突入城内。巷战中，我三十九团副排长崔清波孤胆作战，一人冲入敌堡，迫敌17人放下武器，缴重机枪1挺，冲锋枪、步枪各2支。该团某班班长张福吕两次爆破成功，俘敌100余人，缴获各种枪支21支，在解放北票的战斗中，立下了战功。三十八团六连班长于乐福带领全班大胆迂回，攻下1大碉堡，缴获迫击炮1门、重机枪1挺，全班却无一伤亡。在我军的四面攻击下，敌参谋主任戴传霖率残部于7月1日3时被迫投降。此战共歼敌

881名,缴获步枪264支、冲锋枪16支、轻重机枪26挺、各种火炮12门、电台2部、单机13部、马50匹、子弹数万发。战斗中,我三十九团政治处主任王南芳、一营营长姜兴发牺牲,参谋长蔚彰负伤。独立十三旅荣获冀察热辽军区及热河省政府授予的"攻坚模范"、"常胜劲旅"奖旗,三十九团一连获军区授予"攻坚模范连"的光荣称号,三十九团九连一班荣立特等功一次。

北票之战,胜利地结束了持续2个月的夏季攻势,给热河之敌以严重的打击,使敌丧失了8000多人的有生力量,损失了大量的辎重武器。我军攻克了赤峰、围场、宁城、建平、凌源、叶柏寿、北票等七个城市,扩大了解放区,控制了锦承中段近400里的铁路,使热中、热东、热西、热辽等分区连成一片,彻底改变了热河的敌我斗争形势,拖住了九十三军的东调,完成了配合东北作战的任务,为以后大兵团打运动战、攻坚战取得了宝贵经验。

1947年8月1日,独立十三旅奉命改编为东北野战军第八纵队第22师,继续配合东北作战。

(董殿稳整理)

(作者曾任志愿军坦克兵师长、中国人民解放军装甲兵学院院长等职,少将军衔)

土地改革在热西

高思文

热西地区，系指原热河省西部地区，其基本区原为承德、丰宁、滦平、隆化、围场5县，1946年8月，承德县划出，基本区缩小。40余年前，热西地区进行了为时达3年之久的土地改革运动。本次土改经历了风风雨雨、曲曲折折。运动过后，热西的富者"九沟十八岭，平地二百顷"，而贫者"死了连块埋的地都没有"，即所谓"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的严重的土地问题得以解决，社会关系得到调整。当年的土改，曾牵动热西数以几十万计的各阶层人的心。

一、土改前热西的土地状况及土地关系

热西，是原热河省土地高度集中的地区之一。在这里，占人口10%左右的地主、富农，占据着全部土地的60～70%。翻开史料，有关这方面情况的记载，不乏其有。

中共热河省委曾根据1938年(伪康德5年)日本人对围场县的土地状况所作的调查，列出详表。由表中所显示内容可见，围场全县土地的74%强集中于地主、富农之手。另据资料，该县的大土地所有者有占地"九沟十八岭，平地二百顷"的蓝旗卡伦张玉昆；有"占好地十八顷八"的新拨孙九；有"占好地数十顷，一条沟居民百余户，全是其佃户"的边墙山"张四皇上"张允恭等数人。

滦平、隆化、丰宁各县的土地集中状况基本同于围场。

热西开垦的历史始于清初，到土改时历经300余年。开垦的历史短暂，何以致土地如此集中？地主以其长者10代、短者1代的年龄，又如何垄断了如此之多的土地呢？究其原因主要有四：

（一）**"挂地"**。清政府统治时代，热西有许多封建主攫取和清政府"恩赐"的"皇粮庄头地"（又有"跑马占圈地"、"鹰手地"、"胭脂地"等）。1916 年（民国 5 年），热河特别区成立了清理旗地官产处，推行所谓"旗地变民"政策，对上述各种名目的土地实行"挂领"。乘"挂地"之机，一些狡诈刁钻的地主勾结官府，采取"隐瞒地亩"、"偷梁换柱"等手段，挂地夺照，从而成为合法的大土地所有者。

（二）租息劳役剥削沉重，使地主"巧取"去部分农民的土地。热西租佃制下的租息甚高，普遍的是"一米三谷"（即春借 1 斗小米，秋还 3 斗谷子，农民称之为"亏身利"），又有"钱三至五分利，粮五至八分利"等数种。租额量高者达 80%，甚至 100%及其以上。有的地方亩产粮食丰收年不过 1 斗，农民却要交租 7 升或更多。如此，欠收年所收的粮食尚不够交租用。于是，农民不得不"允许"地主"巧取"去土地。又有高利贷以及名目繁多的，诸如官工、官草等劳役地租的剥削，迫使农民难以附着土地，不得以转去服劳役或流亡，仅有的土地也让地主"巧取"了去。

（三）伪满时期，地主、官吏依仗权势强行夺占了大量土地。本时期，一些地主充任了伪协合会会长、村长、警察局长等，成为伪政权的工作要员。于是，他们凭借权势，霸地夺产，成为大土地所有者。

（四）苛捐杂税助纣为虐，使地主兼并了部分农民的土地。一些地主长期掌握着政权，他们居高临下，对农民派捐索税，更有的隐瞒地亩，转嫁税赋，使得农民不胜重负之下，连一点土地也"拱手""让"出，或成为流民或沦落为"匪"。

适应土地高度集中的状况，热西的土地关系主要表现在土地的租佃形式上。这里的土地租佃形式主要有"死租"（即无论年景好坏，均要交定额地租，大烟地等好地还要"押租"）、"耪青"（有"内耪青"、"外耪青"、"耪大青"各种）、"挂地"、"稻田故人"等几种。

综上所述，热西的地主阶级垄断着大量的土地，他们利用这些

土地，通过租佃形式剥削、压榨着热西的广大的农民。这就是土改前热西的土地状况及土地关系。

二、热西土地问题的提出及土地改革的实施

如前所述，热西的地主阶级利用垄断着的土地，通过租佃形式剥削、压榨着农民，农民在失去赖以生存的土地之后，过着流亡迁徙、啼饥号寒的悲惨日子。许多资料表明，这里的农民祖祖辈辈都渴望着能有自己的土地，渴望着改变自己的生活境况。“给我几亩地，即使一亩地也罢”（围场县佃户语）；“我们几辈子都没有见过红契大照了。”……表达了他们的简单而迫切的土地要求。

热西的土地改革运动正是在土地问题日益尖锐提出的情况下逐渐展开的。统观整个运动，其大体经历了 5 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自 1945 年 12 月贯彻冀热辽中央分局、热河省委《关于热河发动群众的指示》，至 1946 年 5 月贯彻中共中央《关于清算减租及土地问题的指示》（即《五．四指示》）。这是土改的酝酿时期。

这个时期经历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反奸清算、减租减息阶段。时间是 1945 年 12 月至 1946 年 4 月。

1945 年 11 月 25 日，冀热辽中央分局、热河省委联合发出《关于热河发动群众的指示》，指出：“为了迅速把热河建设成为长期坚持的革命根据地，并能及时动员与组织广大人民积极参加自卫战争，彻底击退国民党反动派的进攻，保持人民的胜利果实，克服困难，争取和平民主团结方针的实现，其重要关键，就在于发动群众。控诉复仇，回头自新的清算运动，是目前发动群众的中心环节。”“在控诉复仇，回头自新的运动告一段落后，即以减租减息为发动群众的中心环节……”。分局和省委的指示发表后，各地土改运动的帷幕正式拉开。12 月 14 日，热西地委做出《地委为执行分局与

省委〈关于热河发动群众的指示〉之决议》。《决议》检讨了前段热西的发动群众工作，明确了此后发动群众的方针、目的及开展清算复仇斗争的步骤等问题。《决议》传达到各县、区后，各地的清算复仇运动在学习承德县经验的基础上迅速开展起来，并在全省居于领先地位。

清算复仇运动，具体分两步进行：

第一步是清算复仇。在这一步斗争中，各地相继开展了以"控诉复仇，回头自新"形式为主的清算斗争。在斗争中，热西全区共清算地主、恶霸、伪官吏等 657 人，这些人被依据不同情况做了坦白、赔偿、判刑、枪毙、没收财产、剥夺公权等形式的处理。

又据 1946 年 3 月 30 日的统计，在清算复仇斗争中，热西、热中和承德市 2 区 1 市总共斗争 689 起，有 335468 人参加。获得果实：粮 804707 石，钱 12546399 元，地 1915 亩，盐 9200 斤，羊 785 只，猪 13 口，马 24 匹，面粉 2390 斤，棉花 1529 斤，布 10 匹，油 4818 斤，火柴 12 箱零 300 包，柴 4500 斤。

第二步是减租清算。这一步斗争以清算土地、清算敌伪压迫为主。清算的方法主要是退租退息，挂地归农。清算斗争中，各地主要清算了官工，即向地主清算在伪满时期迫使农民为其代服劳役，如修"部落"、铁路、飞机场、工事等所用的工，令其偿还粮食、土地或其它实物。

减租清算斗争从 1946 年 2 月底热河省委发出"减租增资"的指示后开始，大体进行了 1 个月时间。

据 1946 年 3 月 30 日统计，在减租清算斗争中，热西、热中两区共斗争 1103 起，有 23110 人参加。获得果实：粮 5140.24 石，米 340.69 石，地 272 亩。热西全区又进行"挂地"斗争 6 起，农民"挂领"土地 7180.8 亩。热西、热中两区进行增资斗争 18 起，有 1930 人参加。获得果实：粮 30.68 石，工人增资 1 至 3 斗；进行反摊派斗争 46 起，有 10600 人参加，捕获奸细 30 余人；进行除奸斗争 1 起，

有 1700 人参加，获粮 246 石。

第二阶段是初步分散土地阶段。时间是 1946 年 4 月至 5 月。

1946 年 4 月 1 日，热河省委书记胡锡奎在省委扩大会议上作总结报告时，提出了土地要“从高度集中走到适当分散”的方针，热西地区很快接受并贯彻了这一方针。在减租减息，反奸清算斗争的基础上，更鲜明地进行了实现“耕者有其田”的斗争。

至中央《五.四指示》下达前夕，仅承德、隆化、滦平、围场 4 县即分散土地 106584.6 亩。

第二个时期，自 1946 年 5 月贯彻中央《五四指示》至 8 月国民党军队大举进攻热西解放区。这是通过清算形式平分土地时期。

这个时期也经历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通过清算形式，继续分散土地阶段。时间是 1946 年 5 月至 6 月。

1946 年 5 月下旬，中央《五・四指示》传达到热西后，热西地委针对热西的实际情况，制定了重点斗争大地主，不放过中小地主，实行平分土地的斗争方针。同时，为贯彻这一方针，分别组建了地、县两级土改工作团或工作组分赴各县、区，指导进行土改。

5 月底，热西地委与所属各县委的负责同志在热河省委召开的土改工作会议上汇报了工作，进一步研究、讨论了《五・四指示》。6 月 6 日，省委发出《关于贯彻中央土地问题指示的指示》(即省委《六・六指示》)，肯定了热西的一些做法。在该指示和中央《五・四指示》的指引下，热西的分散土地运动迅速开展起来，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据 1946 年 6 月下旬统计，承德、滦平、隆化、围场 4 县农民分得土地 223681 亩。其中，承德县 3 万亩、滦平县 23681 亩、隆化县 2 万亩、围场县 15 万亩。

第二阶段是进一步平分土地阶段。时间是 1946 年 7 月至 8 月。

1946 年 6 月底，热河省委对热西的土改工作做了初步检查，地委向省委汇报了在前段土改中各阶层的态度，检查了前段运动中右的束缚群众手脚和“左”的“包办代替”等错误。总结、检查过后，热西的土地改革运动沿着发扬成绩，纠正错误，弥补不足的轨道继续进行。

至 1946 年 8 月，热西的“以解决土地问题为中心，进行解放区建设的各种必要的工作”均取得了一定的成绩。[①]在平分土地方面，全区分散土地 60 万亩；在党和干部队伍建设方面，全区共发展党员 1 万名、提拔了相当一批干部；在武装建设方面，全区共扩兵 5500 余人；在基层政权建设方面，全区对 1090 个村级政权中的 782 个进行了改造，经过改造的村政权多数由翻了身的农民掌握。

1946 年 8 月底，国民党军队大举进攻热西地区，热西的土改运动遂转入第三个时期。

第三个时期，自 1946 年 8 月国民党军队大举进攻热西，至 1947 年 11 月贯彻全国土地会议精神。这是地主反攻、土改受挫和进行“护地还粮”、反“报复”斗争时期。这个时期也经历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地主反攻、土改受挫阶段。时间是 1946 年 8 月至 12 月底。

1946 年 8 月底国民党军队攻占热西后，利用公开收编土匪，组建反动地主武装，清乡、登记户口，实行乡保制度，逼迫我干部家属，强令他们拉干部回家等手段，扩大反动势力，控制、镇压群众。[②]。在这种情况下，地主阶级中最反动的一部分——大地主，公然叫喊起“兵不关饷，匪不开抢，专打八路，消灭穷党，抓住干部就听响”，“反对分地”、“反对清算”等挑衅性口号，[③]并明目张胆地组织反动武装，有恃无恐地杀害我区、村干部，进行反攻倒算，另有一部分中小地主，他们依仗国民党反动派的势力夺粮、夺财产。基本群众方面，原来的积极分子或被杀或逃亡；另有少数人则向地主投降或叛变为匪；一般群众则表现出动摇，有的甚至向地主陪罪还东

西。[③]

这个阶段的热西被白色恐怖的乌云所笼罩，前一个时期那种热烈的土改局面被取代。据史料记载，敌人进攻，地主的反攻倒算使得热西 90%的地区遭受破坏，县、区武装约减员 40%。一时间，县支队叛变、区小队叛变的消息不绝于耳；许多区、村农会组织，区、村政权被摧毁；大批干部遭杀害；又有一些革命意志薄弱的干部或投敌或逃跑，致使干部数字锐减，革命势力大大减弱。

第二阶段是进行"护地还粮"、反"报复"斗争，继续土改阶段。时间是 1946 年 12 月热西地委发表《目前热西的形势及我们的任务》，至 1947 年 11 月贯彻全国土地会议精神。

1946 年 12 月 20 日，热西地委在丰宁黑河川召开了常委会议，会后形成了《目前热西的形势及我们的任务》文件。该文件在具体分析热西当时的形势之后，指出："热西党与军队当前的总任务是巩固现有基地，恢复广大乡村"，为完成这一总任务，"必须进行如下工作：(一)加强军事斗争与军事工作……；(二)继续贯彻土地改革、开展护地还粮运动……"[⑤]12 月下旬，地委在西万口召开扩大会议，传达贯彻了该文件，统一了干部的思想。不久，地委又发表《集中力量，为积极恢复地区告热西全体同志书》，发出了全面动员令。此后，在冀热察区党委、冀热察军区的领导、支持及独十三旅的协助下，热西的党与军队迅速收复一些地区，势力发展到隆化郭家屯附近，给敌人以很大的震慑，敌再次发起反攻，收复的地区再度失陷。1947 年 4 月中旬，在独十三旅和独五旅的配合下，热西党与军队重新收复热西。收复失地以后，在各级党委的领导与组织下，各地重新发动群众，继续贯彻《五四指示》，开展反对地主反攻倒算的斗争，进行土改。在反"报复"斗争中，热西的农民又开展了"搜山"运动，当时的《冀热察日报》曾具体报道热西农民的"搜山"运动，并表扬开展"搜山"运动较好的区、村："……搜山中，西滦平县一区古椅沟村，大阁县八区田家营村、斜坡道村、红石岩村、城关区

各村、西布街、邓家棚子村等成绩显著。……据7月半月就以上各村的统计，即捕获地主10余名，逃散隐藏之蒋军2人，收缴轻机枪1挺、步枪20支，子弹千余发，羊400余只，其它浮财一部。"[8]

. 至1947年底，热西的形势已基本好转，群众又被发动、组织起来，土改部分进行。同时，武装建设工作又得以开展。截至6月，全区武装力量即已有3460人，此时更有发展，仅分区独立团即扩编至3个营，约有2000人。

第四个时期，自1947年11月贯彻全国土地会议精神，实施《中国土地法大纲》，至1948年底热西全境解放。这是"风暴土改"时期。

这个时期同样经历了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召开土地会议，贯彻全国土地会议精神，搬"石头"，开贫雇农代表大会，找正根，进行"风暴式"土改阶段。时间大体是1947年12月至1948年5月。

1947年7月至9月，全国土地会议召开。10月10日，中共中央公布《中国土地法大纲》。10月底，冀热察区党委在琉璃庙召开会议，传达全国土地会议精神，学习、讨论《中国土地法大纲》。11月至翌年1月，热西地委分别在半截塔、大阁召开土地会议，贯彻全国土地会议精神，进行"三查"(即查阶级、查思想、查作风)、"三整"(即整顿组织、整顿思想、整顿作风)，反右倾，搬"石头"，并总结、部署工作。

半截塔、大阁土地会议，对照全国土地会议精神，揭摆了前几期土改中存在的问题：(一)地主武装没有被打垮；(二)对地主、富农的斗争不彻底；(三)根扎得不正；(四)干部作风上存有官僚主义、强迫命令等问题。会议经过"三查"、"三整"，对1470名干部(其中党员952名)进行了批评，对其中的495人做了不同形式的处理，有的被搬了"石头"。

半截塔、大阁土地会议还总结了收复区土改的几点经验，即搜

山剿匪与土改相结合；建立人民法庭，镇压反动地主、恶霸；突破地主圈套；搞大发动，等等。

土地会议结束后，热西地委立即重新组织土改工作团分赴大阁和丰滦隆围三角地区与各县工作团(组)一起，组织、发动群众，进行土改。不久，在热西地区即出现了轰轰烈烈暴风骤雨般的土地改革局面。

大阁县的土地改革运动是在地委工作团的直接指导下进行的，因而其无论是在召开贫雇农代表大会，找正根方面，还是在整个“作战”的部署方面都创造了一些经验。当时的地委机关刊物《新作风》曾相继刊载《大阁县城关区贫雇农代表大会四天的初步经验》、《挖浮财的几点经验》等文章，将这里创造的经验介绍给全区。

隆化县的本期土改从 1948 年 1 月 15 日开始，到 4 月底大体结束。在 3 个半月时间里，全县 45 个行政村进行了土改，在各区、村的土改中，分了大量的浮财，打击了 18%的户，又杀了 89 人。

围场县(围北地区除外)本期土改一开始，便按照“大发动”的方针，采取全面展开的办法进行。土地会议后，县工作团分赴各区协助村干部深入各村，直接和贫雇农见面，从中挑选劳苦正派的贫雇农召开代表大会，又经学习、讨论《土地法》与《告贫农书》和诉苦，提出“二次斗争”的口号，尔后，实施搜捕地主，挖浮财，平分土地。群众很快即扣押了 2000 名地主、富农，并挖了他们的浮财。仅七区那林沟一个村，在 1 月贫雇农代表大会之后即扣押 32 户地、富(另有 7 户漏网未扣押)，并将这 39 户地、富，连同斗错的 19 户富裕中农、中农的浮财挖出。在挖浮财的同时，这个村又以抽补的办法平分了土地，调整了土地关系，满足了贫雇农的土地要求。

丰滦、滦河等县(联合县)也在地委的统一部署下，进行了土改。经过实施土改，调整了土地关系，满足了贫雇农的土地要求，从而使他们加深了对共产党的认识，增进了对党的感情。在攻打隆化的战斗中，滦河县组织了三四百人的担架队支前，贫雇农以实际行

动表达了他们获得土地后对党的感激之情。

在“风暴式”土改中，出现了种种偏向，这些偏向主要是：(一)普遍出现侵犯中农利益，打击面大的现象；(二)对逃亡户执行了错误的分地、分财产政策，以致逃亡户问题严重；(三)对地主、富农的斗争不策略，未严格区分地主与富农，甚至执行了“老牛赶山”的政策；(四)出现了普遍的抓捕、打人及杀人的现象；(五)对烟民等采取了排挤、打击等过“左”的政策，等等。这种种偏向，妨碍了土改中团结百分之九十方针的贯彻落实，因而纠偏问题被日益迫切地提了出来。

第二阶段是纠正偏向，转变作风，大力发展生产，支援前线阶段。时间大体是1948年5月至同年年底。

为纠正土改中的侵犯中农利益，打击面过大的偏向，解决逃亡户问题，在本期第一阶段的土改中，热西地委就发出了有关指示。1948年3月25日，地委发出了关于《坚决纠正冷淡中农，坚持联合中农》的指示。3月26日，又发出《关于争取逃亡户还乡的指示》。这些指示在当时也曾在部分县、区得到贯彻执行，但土改中的偏向是普遍的、严重的，纠偏工作的全面进行是刻不容缓的。为全面进行纠偏，地委于5月8日又发出《关于端正政策，纠正偏向的指示》。该指示阐述了偏向的严重性和纠偏工作的重要性及其关键、政策、原则、目的、方式等。

在地委的领导与指导下，热西各县的纠偏工作普遍并颇有成效地开展起来。以隆化县的纠偏工作为例：

该县的纠偏工作在县委的统一领导下首先在三区进行。原分了中农财产的，纠偏中规定：粮食秋后还，牲畜种地后还，土地则立即退还。这样的纠偏实施后，受到中农的普遍欢迎。一些逃亡户也回乡生产，仅三、四区便有近百户回乡。同时，县委决定：杀人要经县委批准，不可乱捕乱杀。对于乱打人的现象，县委也采取了相应的禁止措施。

纠偏以后，热西绝大多数农民的政治热情和生产热情有所提高，随之而来的是生产的逐步恢复和发展，大力支援前线局面的出现。与之相反的情况则是敌人的土崩瓦解。

1948年6月，《群众日报》报道了围场县各地翻身农民很快完成支前任务的消息。消息说："围场一区翻身农民自上级布置支前工作后，知道是要剿匪窝子隆化、承德了，于是抱着快除坏根的高度热情战胜了饥饿，在5天内全区32个村即完成了割毛草25万斤、割柴80万斤的支前任务，并发动了支前募捐，献出鸡蛋8027个、猪3口、面15斤，慰劳前线受伤的战士。"

9月，《群众日报》又报道了热西土匪瓦解及逃亡地主回乡生产的情况：1948年5月至8月，隆化、滦平、大阁、丰宁县瓦解土匪3736人，缴获步枪1588支、手枪49支、轻机枪3挺、小炮1门、六〇炮1门。逃亡地主回乡生产的有4423户、12281人。

本期土改中，在热西地区又一次出现了参军参战的热潮。仅围场县在1948年5月至7月的3个月中就有4000余人参军(在整个解放战争中，该县参军人数达1.3万人)；隆化县参军1980人；滦平县1949年9月至11月参军350人。

辽沈、平津战役前后，热西各县又派出了浩大的支前队伍，贡献了大量的支战物资。据不完全统计，围场县曾派出2个担架团，共1600人，650副担架；隆化县曾派出支前民工581人，担架271副，车辆150辆，牲畜驮子3135个，又贡献粮食410万斤、军鞋3124双；滦平县曾贡献粮食299.2万斤、军鞋9541双；丰宁县，仅石人沟村在1948年8月至10月间即派出1个担架连、250人，36副担架。

第五个时期，自1948年底热西全境解放至1949年4月。这是新区土改时期。

早在1948年2月，热西地委即在《新区工作专刊》上摘要公布了《中央关于新地区土地改革工作要点》。《要点》成为热西新区土

改的纲领性、指导性文件。

根据《要点》精神，热西新区土改分两个阶段进行：

第一阶段是打击地主、中立富农阶段。这一阶段又分打击大地主和打击其他地主两个步骤。

第二阶段是平分土地阶段。

1949年4月1日，热河省委在《关于一九四九年三月五日前工作情况及今后工作方针、任务给东北局的报告》中总结了包括原热西多数县在内的新区土改情况。《报告》说："新区共5个县（隆化、滦平、平泉、丰宁、承德县）、35个区、1221个行政村，不彻底的397村，未改的203村。在此次土改中，各县委一般的都掌握了依靠贫农，团结中农，消灭封建制度的原则，划分阶级也较慎重细致。在整个土改区，打击面平均是7%到8%（个别村有10%的）。工作进行上一般是根据干部力量有重点的逐渐铺开，建立请示与报告制度，发现偏差及时讨论、纠正，并注意结合了挖匪根、挖坏根与建党等工作。如隆化20余名土匪在土改中投降；滦平一个区挖出84名曾当过土匪与土匪有联系的坏分子。平泉、隆化、丰宁、承德四县共培养提拔干部340名，隆化一县即发展了党员432名，建立42个支部，使党在农村中初步地扎下了根。土改工作一开始，领导上即提出，土改就是为了生产，将分得的果实用到生产上去，准备春耕，因此使土改与组织生产紧密结合起来。"

新区土改，"由于部分同志尚存在平均主义的思想残余，因此也发生过'左'的偏向，如丰宁县有的村按户动员中农的粮食，有的村规定，中农土地凡超过平均数一或两倍者即抽出平分。隆化县有一个区，650户中农65户土地被分出，有的中农只多8分地也抽了，有11户中农被抽出16亩地。丰宁县有的区重点放在挖浮上，为追浮有34名干部打过人，因而使4名小地主、1名富农自杀了，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也有些同志怕'左'、怕犯错误、怕违犯政策，因而束缚了群众，使群众束手束脚无斗争的和平接收。……还

有的对应没收的地主土地，先给地主留下一份好地，再拿出平分，对富农财产处理，则听其自便。”

新区土地改革至 1949 年 4 月转入总结经验，进入春耕阶段，随即宣告结束。

至此，热西地区历时达 3 年之久的土地改革运动基本完成。

热西地区的土地改革，在当时的条件下产生了巨大的历史作用，具体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废除了封建制度，使广大贫苦农民在政治上、经济上获得了解放，人民民主政权得到巩固，党的组织得以发展壮大，从而为全区的彻底解放及革命的最后胜利奠定了政治基础。

第二、解放了生产力，促进了生产的恢复和发展，从而为全区的彻底解放及革命战争的胜利创造了条件。

土改前，热西的贫苦农民与地主有着很强的人身依附关系，受着地主的租佃制剥削。他们要扩大生产力，却经不起封建地主阶级的高租高息高赋剥削，他们中甚至有相当一部分人，在封建地主阶级的残酷剥削下走投无路，不由得铤而走险，上山为匪，从而由最活跃的生产力一变而为打家劫舍、蹂躏民生、摧残生产力的破坏者。土改后，原依附于地主的农民独自分得了土地，他们的生活开始有了着落，因而生产积极性空前提高，使得农业生产逐步恢复和发展起来。生产的恢复和发展，直接的后果是改善了农民的生活，同时也为革命战争开拓了广阔的物质源泉。

第三、支援了革命战争。翻身农民为各级地方和野战部队提供了大量的兵员，为各个战场动员了广大的支前大军，又贡献了数目巨大的支前物资。

热西地区的土地改革取得了很大成绩，产生了上述历史作用，主要取决于下列因素：

第一、冀热辽中央分局并热河省委、冀热察区党委有关文献、文件及热河省委、冀热察区党委的指导（尤其是热河省委对前两期

土改的指导)作用。

第二、热河省、冀热察区乃至整个冀察热辽区军事斗争的逐步胜利鼓舞了群众，使他们逐步消除了"正统"观念、"变天"思想，增强了斗争勇气。

第三、在土地改革运动进行中，热西地委在省委、区党委的领导和指导下，及时总结了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并适时制定了有关方针，发布了有关指示。

第四，全党同志的努力和农民的迅速觉醒。

热西地区土地改革的成绩应予充分肯定，其历史作用不可抹煞，然而其历史局限性也是客观存在，其局限性主要表现在5个方面：

第一、对本区实现"耕者有其田"的迫切性初期认识不足，致使平分土地的斗争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对农民的心理了解得不够充分，因而在前几期土改中没能抓紧做好"发照"、"兑契"工作，以及早肯定农民的地权，致使农民在较长时间内心存疑虑。

第二、对热西社会的复杂性认识不足。热西的人民面临着国民党反动派及其所利用的土匪、特务、封建势力和伪满残余势力三位一体的敌人，反动势力猖獗，民情落后，农民有浓厚的"正统"观念、"变天"思想。因对这些特点认识不足，因而使得在前期土改发动群众，进行分散土地的斗争中，有些流于面上的工作，发动群众不够普遍，工作不够扎实，并有"包办代替"等问题出现。结果，在国民党军队大举进攻、地主反攻时，村政权及农会组织大都瓦解，基本群众的相当一部分脱离了我们，另有一部分犹豫彷徨。

第三、对必须掌握一支强有力的武装，以保障土改的顺利进行认识不足。在初期建立县、区武装时有"招兵买马"的现象，忽略了严格政审工作，把一些地主的狗腿子、伪警察、伪国兵、特务招进了队伍，甚至还让他们当了县、区武装的班、排干部。结果，这些人在国民党军队大举进攻、地主反攻倒算时，成了叛变投敌的策动、组

织者，直接瓦解了我们的武装，使我武装、干部损失惨重。

第四、在“风暴”土改初期犯了“左”的错误，出现了乱打乱杀人的偏向，又出现了严重侵犯中农、工商业者利益的现象。这种偏向曾使逃亡户增加，生产力遭受破坏，又曾使中农同贫农的团结乃至土改的顺利进行受到影响。

第五、在土改期间的整党中，在“唯成份论”思想指导下，搞了“风暴式”的审判斗争，搬“石头”搬了很多干部，其中不无伤害，曾影响到部分干部的革命热情。

热西地区土地改革的历史局限性是在所难免的，运动中有些教训也是惨痛的，并且是应该汲取的。

注释：

① 参见热河省委研究室《热河土地改革运动情况》。

②④ 热西《几位领导同志的汇报》。

③ 热河省委《关于检查与深入热河土改问题》。

⑤ 热西地委《目前热西形势及我们的任务》。

⑥ 1947 年 7 月，《冀热察日报》(《热西反“报复”斗争中，农民发动搜山运动》)。

血染的丰碑

——大营子村土改纪实

于 凤

大营子位于县城西北部35华里的白尹沟里。1945年“八·一五”侵华日军投降后，这里的劳动人民得解放。1946年8月20日，隆化被国民党十二军八十九师二六五团占领，大营子成为当地土匪——自卫队的出没区。1947年全国土地会议后，冀热察区党委为了打通东北到华北的最近通道，由热西地委组织了以地委宣传部长罗天同志为团长的土改工作团分赴到国民党统治的丰(宁)滦(平)隆(化)三角地带开辟工作。1947年腊月，隆化武工队正、副指导员程超杰、吴绍光，队长马奔率领着队员王鹿平、田林、王华、程宝太、杨廷杰、王九亭、尹树宗、孔祥臣、赵广珍等人到白尹沟里的大营子、北窝铺、老爷庙等村开展土改工作。在大营子村工作的马奔、尹树宗、孔祥臣及几个帮翻的贫雇农仅用7天时间就摸清了富户的清算对象，建立了以雇农黄景全为主任的贫农会和以铁匠张国武为队长的农民武装小组。腊月二十五(公历3月4日)，贫农会清算了大营子地主武世昌，石门沟地主迟瑞，东庙沟富农王国喜及其他地富王发、郭军、郭显廷等，并将富农王国喜的妻子，地主武世昌等人抓获送往后方——郭家屯。清算两天，把清出的几十石粮食拉回大营子，清出的衣物等浮财分给了无衣少被的贫苦农民。

正当贫农会打算再用3天把粮食和土地分配完，过个胜利年的时候，东庙沟被清算富农王国喜偷偷跑到匪队驻地——苏木营，找到在家是三东家、在村当保长、在匪队里当班长的张春和，并让

张一起找到匪队长曹喜珍，诉说“我家去八路军了，把我老婆抓走了，粮食、衣服、毡子都给清算光了，日子没法过了”等等，并让匪队长给他报仇。匪队长听后，就去少府头道营子一带联络了其他匪队，商定了偷袭计划。

腊月二十七日凌晨，王国喜、张春和领着张显耀、李凤、赵珍、卢绍广、韩振廷、肖玉祥、王富、蔡和、曹喜珍等九股匪队近千人占领了白尹沟的沟沟岔岔，封锁了各个山口要道，包围了大营子、北窝铺、老爷庙3个村。拂晓，3颗信号弹腾空升起，枪声齐鸣，震天动地。枪响过后，端枪的匪徒，挨户搜查，企图一网打尽武工队和农会组织，并扬言活捉马奔、程超杰等人。由于武工队已接到自卫队今晚要上来的可靠情报，早已与农会组织的多数成员撤离村庄进山了，武工队的同志没有受任何损失。

匪徒扑空了，匪首怒不可遏，指使匪徒抢掠民财和清算出的胜利果实。据不完全统计，抢走群众羊300多只，牛10多头，拉走清算的粮食33石，大烟35两及大量布匹、衣物等，使广大群众受到重大损失，生活更加困难。

掠夺没有满足匪首的私欲，屠杀露出刽子手的本性。从老爷庙、北窝铺掠夺回来，匪徒们带着狰狞的微笑，集中到大营子村，对被捕的十多名农会干部和参加清算的群众进行了严刑酷打和血腥的屠杀。

农民武装小组长武世有在村留守值勤时，被曹喜珍匪队围村截住后抓获。在行凶逼供时，张春和说：“这小子就是武委会队长，拉走王发粮食的就是他，穿着棉袄解事吗？把棉袄给我扒了，往死里打。”押解的匪徒刚把武世有的衣服扒掉，站在身边的赵珍匪队小鬼冯德全端着马四四枪，一刺刀刺进武世有的胳膊，随后往回一拉，一条子肉带了下来，并逼问：“都谁是干部？”武世有威武不屈地说：“别人都不是干部，就我一个。”匪首曹喜珍看到武世有至死不咬他人，便问张春和：“他到底是干什么的？”张说：“他是清算主

任。"曹又问："你看怎么办？"张说："把他崩了吧！"说完将武世有拉到南胡同口枪杀了，死时年仅 33 岁。

武傻子是武世有的弟弟，是个 17 岁的羊官。在清算张春和的富农侄子张国安时，武装小组的谈世奎在草垛里翻出张国安当中央军时穿的一件黄大氅。腊月二十七匪队抓人，富农的护院孙贵在村对点时，误将武傻子当成谈世奎抓住，惨死在匪徒枪口下。

赵万福，贫农会成员，清算组组长，是王国喜领着曹喜珍、赵珍两个匪队包围大营子时，指名要抓的村干部之一。当匪徒们从西南沟将躲避的赵万福抓回大营子时，王国喜亲自对点审问："区小队在哪？"赵谎说："在北窝铺"。王国喜领着匪徒押着赵万福去北窝铺抓人，结果扑了空。返回大营子时，王国喜恼羞成怒，向赵万福要清算的土地合同。赵万福说"没有"。赵珍匪队的小鬼判官冯德全、卜延年就打他。王国喜看到合同要不到手，连喊带嚎地吼道："赵万福，你不给我合同，我老婆叫你们抓去了，我家也不能过了，马乡长（指马云朋）你跟曹队长说说，把赵万福枪毙了吧！"匪首曹喜珍在马、王的要求下，派匪徒将赵万福拉到房常宽的大院子里枪杀了，死时年仅 18 岁。

张信，清算组成员，50 岁。匪队包围大营子时，他穿着个清算来的棉袍。匪徒误认为他是有钱的富户，让他帮着往沟外赶抢来的羊，走到石门沟门时，被西庙沟清算的池老耗（池景旺）发现，池老耗告密到匪首的亲戚李凤那里，李凤命令匪徒将张信抓回大营枪杀在范振旺门前。

张国武，农民武装小组组长。其妻在匪队夜袭时被抓。张国武听到消息后，回来找他爱人，走到石门沟时被张春和发现，将张国武骗至小东沟家中，掠去大枪 1 支，子弹 90 发，韩振廷匪队撤退时，张春和让匪徒将张国武踢死在自家门前。

疯狂的掠夺，血腥的屠杀还嫌不够，临走时匪徒们还带走了清算组长赵顺和农会主任黄景全。

赵顺，23 岁。在清算王国喜时，曾将窝藏东西的护院孙喜贵捆绑，清算完，虽将孙贵放了，但孙怀恨在心，当赵顺在大营子被赵珍匪队抓住后，孙贵当面对质并要求赵匪枪毙他。但赵顺说自己哥哥也在你们赵队当兵，叫赵永。匪徒将他押回蓝旗，当赵顺见到赵永求保时，赵永不保，匪徒逼降，赵顺不服，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匪徒割去他的双耳，于腊月二十九，将他枪杀在蓝旗龙头崖子下。

黄景全，农会主任，53 岁。惨案前，他已安全转移到旧屯狍子沟躲避。匪队洗劫时，黄对家里不放心，回来探消息走到方家沟时，被卢绍广匪队发现追捕，带回蓝旗交给赵珍匪队，匪徒怕他逃跑，用刺刀穿透两边肩胛缝，又用铅丝将索子骨拴住，拧在屋地躺柜的铁鼻上，行刑逼供，一无所招，匪徒用子弹夹刮他的肋骨，用烧红的烙铁烙他前胸后背，用刀拉他，往他的肉上撒盐面，往鼻子眼灌凉水等等，刑罚用尽，至死不认，最后，匪徒于次年阴历二月初三铡死在少府东大庙的大榆树下。黄景全死后，匪队不准家属领尸，被野狗吃了。

7 名农会干部和无辜的贫雇农群众被害后，土改工作受到严重摧残，群众情绪低落，群众生活特别是被害家属生活十分困难。黄景全的妻子领着四个孩子无处存身，被迫迁到官宝沟的一个土窝洞去住。但生活仍无法维持下去，把小女儿送了人，年仅 12 岁的大儿子去坝外给人当小工放牲口。最后，生活还是过不下去，其妻领着 2 个孩子改嫁，好端端的一家人就这样被拆散了。

匪队的白色恐怖给革命带来暂时损失，但土改工作队经常从柳树堆回到大营帮助群众坚持对敌斗争。1948 年 5 月 25 日，隆化解放后，逞凶一时的土匪被各个击溃，匪首相继被击毙或被镇压，勾匪反把的地主富农也得到应有的惩罚。主犯王国喜、张春和分别在 1951 年 10 月份被镇压，盯案对质的地富相继病故或畏罪自杀。

死难的同志，英灵常在。人们为了纪念他们，在村东的广慈寺旁立碑树传，流芳千古。

柴胡栏子战斗经过详报

李中权

1947年春，中共中央东北局根据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号召整个东北所属的地区，迅速壮大主力，广泛发动群众，粉碎蒋介石的进攻。中共中央冀察热辽分局在热北林西发出指示，决定召开冀察热辽党代表会议，讨论如何执行东北局指示。冀东区党委、冀东军区根据分局指示组成了参加党代会议的代表团。代表团由以下单位派员参加：冀东区党委、冀东军区、冀东区行署、所属各地委、专署、军分区。具体成员有：

代表团团长：

冀东区党委组织部长苏林燕

代表团副团长：

冀东军区政治部主任李中权

团员有：

冀东区行署财政厅长王克如

十二地委民运部长陈东

十三专署副专员田润芝

十三地委宣传部长张仕祥

十四地委组织部长李寿山

十四军分区政治部主任艾平

十五地委宣传部长冀光

十五专署专员张兆仁

十五军分区副政委王平民

十二军分区政治部副主任胡里光

我们大致是1947年4月初旬从冀东迁西县出发，走的路线是兴隆县——承德（敌占区）东，过的铁路桥——围场（敌占区）东——乌丹县城——林西县城。行程时间10余天，到达冀察热辽中央分局。会议进行了1个月结束。先是各军区汇报（冀东军区、热河军区、冀察军区），然后是中央分局书记程子华同志作形势与任务的报告，军区政委黄火青同志作部队政治工作报告；此外还有军事、财政、土改等问题的报告。会议着重讨论了形势问题，发动群众土改问题，壮大主力问题，会议大致是5月中旬结束。程子华司令员在会议结束前就赴前线指挥作战了，解放了围场等县城，歼灭了国民党军数千。我们冀东代表团本来带了一个战斗力很强的警卫排，护送我们到了林西。开会中，冀察热辽军区发给我们冀东军区1万发子弹，因冀东军区即将执行打昌黎战役，配合东北军区作战，急需1万发子弹。军区决定由我们所带来的警卫排负责送回冀东军区。

我们计划于会议结束时回冀东。这时冀察热辽中央分局、冀察热辽军区决定，要热河军区派部队护送冀东代表团回冀东。热河军区派了一个骑兵连（连长王庆虎），负责带队的是骑兵连的上级、团政治处主任牟力根。回来路线，大致按原来去的路线走的。5月20日黄昏时到达赤峰县的柴胡栏子。它的地理位置是：东距赤峰90华里，位于初头朗西20华里；西距大庙60华里，距老府90华里，距围场200左右华里。宿营后虽有警戒部署，但主要考虑了赤峰的敌人。因为当时赤峰还有国民党九十三军万余人，并经常外出骚扰，而西边的围场方向已被我军解放，因而就根本没有考虑到西南方面还有敌人，所以宿营时就分开居住。我们开会干部，包括随员和我带的一个警卫班。住在柴胡栏子。因为村子太小，骑兵连再住就住不下，所以把骑兵连60左右人放在距柴胡栏子东5里的彩凤营子，他们的任务是警戒赤峰方面的敌情。这是经过我们开会的主要干部苏林燕、王平民、艾平等同志共同研究，认为这样部署对，

并由苏林燕同志最后决定，还规定了万一发现敌情时的处置方案。

5月21日拂晓，还不到5点钟，天还没大亮，我起床很早。在查岗哨时，发现西边200多米处。有好多背枪溜马的人，其后面和西南方向山岗上，还陆续不断的有人向坝上走来，而且都是骑兵。这时敌人还没发现村里有我们，我们也不知道他们是敌人还是我们人。于是，我们就主动问："你们哪部分的？"对方不答话，接着就向我们开了枪。我们总以为从西、南方向来的队伍不会是敌人。于是又问："你们是哪部分的？不要误会！我们是冀东开会的。"敌人这时答话说："你们是八路军，我们是九路军……"于是，敌人就向村子展开进攻，而且毫无顾忌的向我们包围过来。

我们的干部和我带的警卫班，在敌人一打枪，就各就各位，坚决抵抗。特别是警卫班的同志打得很顽强（班长李长山同志后来壮烈牺牲了），并派人去找骑兵连来援救。敌人的机枪、步枪直向我们村打来，大致从早5点开始战斗到上午8点左右，其间有的同志骑着马突了出去。我看四周山上都站有敌人，敌人已进村200多人，我判定当时的情况是严重的，于是命令代表团人员赶快烧毁文件、电码等机密材料，并要同志们死守，坚决抵抗。但是我们干部带的武器均是手枪，只警卫班的十余支大枪。敌人进村逐屋压缩，十二军分区政治部副主任胡里光同志当即牺牲。最后我和苏林燕同志都集中到一个房间里进行抵抗，其他别的没有突围和突围不成的同志也都压缩到我们住的房间里来了。我问同志们："你们怎么都挤到这里来了？"他们说："不行了，敌人太多，抵抗不住了。"这时，敌人在我们的房子上、墙外边掏洞，其用意思想往里扔手榴弹。敌人正在外喊叫什么捉活的，什么交枪不杀。但幸好我们的房门和窗户被我们火力控制着，敌人还不敢接近。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我说："要么我们都通通壮烈牺牲在这里，要么就冲出去，我们决不能当俘虏。"我问同志们究竟怎么办？大家同意往外冲。我们就一涌而出，敌人的火力很密集地向我们射来。当冲出门外数十步时，我左

手中弹；而又跑去200米时，左肺又中弹，顿时吐血不止。但幸好腿部未中弹，我还能继续跑。苏林燕、王平民同志刚冲出来不远即中弹牺牲。我们一群冲出来沿着小沟、小坡跑，敌人骑兵追赶不易。幸好敌人进村，大部分去抢我们的好马以及其他物资去了，只出来6个骑兵追赶我们并向我们射击。我命令回击，于是我们几只驳壳枪向敌人打去，顿时打得敌人掉转马头就跑。我们趁这个机会猛向东跑，到我们骑兵连住的地方。

警卫员给我找一头没鞍的毛驴，跑到了东南面一个小山岗上。我要警卫员把驴头掉向柴胡栏子村，我要看看。这里距柴胡拦子已有十几华里了，我看那村内还人马成群，并没放火。这时敌人还没向我们追来，我们又走了一会儿，忽然发现东南方向上远处有很多骑兵向这里开来。我这时由于流血过多，处于不能支持的状态，加之口渴得要命，我要一警卫员火速去探听，要是敌人就鸣枪报告，要是自已人就叫快来；叫另一警卫员搞点水喝。不一会，探听情况的警卫员飞跑回来报告："是自己人！"后来知道，他们是热北骑兵团，在约10里以东听到枪声赶来的。跑在前面的是团首长，他连马都没来得及下告诉我说："打你们的那股敌人现在向这里追来，我们马上去迎击，后边马上有人来给你上药。他连说连带队走，不一会儿果然与追来之敌接火。骑兵团的同志给我上了药，找了担架，送到热中军分区医院抢救治疗。十几天后吐血停止了，又坐担架回冀东军区医院动手术治疗。一个月后基本痊愈，组织第九纵队出关。热北军分区增援部队有1个骑兵连和4个步连，还有赤西县大队的3个连，共七八百人与国民党军和土匪战斗，由赤西县大队政委田夫同志指挥。事后，由吴烈同志(热北军分区司令员)和田夫同志回柴胡栏子作的处理工作。在屋外牺牲的20人，屋内自杀的2人，其中代表团成员5人，其他人员17名(卫生科崔科长，通讯员4名，警卫班战士9名，职务不清的2名，林西带路老乡1名。被俘去3人，2名译电员，1名战士，后都逃回。

我们代表团成员在战斗中都表现很勇敢，很机智。我们共同冲出包围的有艾平同志，还冲出警卫员、秘书10余人。张仕祥、李寿山和张兆仁，他们藏在村内幸免于难。牺牲的同志有王克如、冀光（他们是在屋子里自杀的，敌人并未发现他们。他2人自杀后的枪支都没被拿走，门还关着，由此可见，他假如不自杀是不会有问题的）。中敌人枪弹牺牲有苏林燕、王平民、胡里光3同志以及警卫班的大部分同志。

这次战斗，冀察热辽分局和冀察热辽军区有个报告（也就是对这次战斗的结论）。报告指出，对冀东代表团的护送考虑不周到，先把代表团的警卫排叫护送子弹走了。分局决定要热河军区只派部队护送，而结果热河军区派了一个毫无战斗力的骑兵连护送，战斗一打响，他们骑兵连就拉走了。报告表扬了冀东代表团顽强不屈的战斗精神，对牺牲的烈士表示哀悼。程子华同志还亲自慰问了我们受伤的同志。作为我们自已，当时对敌情考虑不周，只顾赤峰方面之敌，没料到西南方向还有敌情。打我们的这股敌人究竟是从哪里来的?这股敌人原来住在围场，是热北著名的以陶汉选、任方武，徐连明、白金辉、于秀成等人为首的几股土匪，加上国民党热河保安队严万海等人，还有国民党十三军谍报队长张振山，加在一起有1000左右人。他们在我军解放围场时未受到歼灭而漏网了，想去赤峰投靠国民党九十三军，经过柴胡栏子，无意中遇到我们。这也是我们所没料想到的意外情况。假如知道这一情况，虽然时已黄昏，我们决不会宿营在柴胡栏子的。经过这次战斗，我和其他同志一样，所带的一切都丢的光光的，电码、文件烧毁了，马匹、衣服等被敌人抢走了，只有警卫员郑荣带的几十块金条没丢失，回冀东后交公家了。以上就是柴胡栏子战斗经过。

柴胡栏子突围的回忆

白广义

我经过大大小小的战斗，回忆起来，最被动、最失利的是柴胡栏子突围的那一次。距今已40年了，但回忆起来心情仍是很沉重的。

1947年春，中央冀察热辽中央分局在林西召开党代表会议。冀东区党委、冀东行署、冀东军区及所属各地委、专署和军分区组成冀东代表团，参加了会议。这次会议开了一个多月，于5月中旬结束。冀东代表团由河北迁安出发，有一个步兵排护送，安全到达林西。会后返回时，有一个骑兵连护送。返回途中，5月20日晚住宿赤西县(今赤峰市郊区)柴胡栏子村，21日拂晓遭国民党匪徒包围。在这次突围中损失很大，伤亡惨重。

那天太阳刚落山，我们就来到预定的宿营地柴胡栏子村。这是个山沟子小屯，约有20多户人家，都是热北特有的那种土房和土墙。我们以首长为主的这70多人就住在这个屯子。因为屯子小住不开，护送我们的骑兵连住在东屯彩凤营子，相距5华里，以防赤峰方向之敌。

张专员(十五专署专员张兆仁)和苏部长(冀东区委组织部长苏林燕)在一个屋子。两位首长随带的警卫员是我们5个人，临时编一个组，由苏部长警卫员田永存同志负责，晚上轮流站岗、喂马。

晚饭后，张专员把我们几个警卫员召集到一起开会。他强调说："这里是山沟，敌情不明，我们又住在屯子的是西头，护送部队又另住一个屯子去了，要特别提高警惕，随时作好战斗准备，马不能离鞍。"苏部长插话："张专员说的你们要注意，千万不能马虎；但

你们也要轮流抓点时间休息，明天还要起早行军。"他说着就脱下外衣、盖上被子睡了。这一夜，我们几个人有的放哨、有的铡草喂马和投鞍备马，下半夜又烧火做饭，都没有睡。张专员也是屋里屋外、院里院外地走来走去，时而到外边看放哨的同志，时而看看马，亲自督促我们备马、做饭，几次向我们强调要随时准备应付战斗。

约下半夜3点左右，饭做好了。张专员洗完了脸，也把苏部长叫了起来。苏部长边穿衣服边说："你们辛苦了，我睡得很好，老张又是一宿没睡吧。"张专员说："睡不着，等过了敌占区以后再放心地睡吧。"苏部长说："有我们这几个小伙子，还有护送部队，就是有敌情，也没有什么问题。我们小田是能干的，跟我3年多了，本来决定让他下连队去当副连长，因为我来开会他不放心，又跟我来了。"张专员说："我们这些小伙子都很精干，但今天护送部队没和我们在一起，一旦有敌情，只靠我们这几支手枪，是使人不放心的。"正说话间，田永存同志从外边面色紧张地走进来说："首长，屯外有跑动的马蹄声，可能有敌情。"听这话后，苏部长和张专员也都到外边听了阵，他们也确实听到了屯外跑动的马蹄声。张专员说："我们可能被包围了。"苏部长也说："有可能。"然后，苏部长和张专员回到屋里简单研究一下，又把田永存同志我们两个叫到屋里。张专员对我们说："被包围的可能性很大，你们两个和小刘留在西屯口，苏部长我们到李主任(冀东军区政治部主任李中权)那去，小李和小董跟我们去。"苏部长说："你们留在屯西头，半小时内如果敌人要进屯，你们就阻击一阵，半小时后你们也撤往李主任住处，和我们一起听从统一指挥。"说完，李云清、小董牵着他们的马，他们4个人、4匹马往李主任住处走去。田永存、小刘我们3个人也提枪牵马走出院子，来到西屯口一堵土墙旁隐蔽，注视着屯外的敌情。约半小时后，天已放亮，只见屯西地里敌人时隐时现，后山上敌人开始向屯子里打枪。田永存同志说："看样子屯西的敌人是准备阻击的，他们暂时不能从这里进攻了，按首长的部署，我们也往李主任的院子

撤。”于是我们3个人牵着马，沿着北墙根往屯里走，田永存同志走在最前面。我们刚走不远，又遇着3名同志从一个院子牵着马走出来，其中一名是胡部长警卫员小赵，另一名是张部长警卫员小马，还有穿便衣的约有40多岁的老同志，他们也是要往李主任住处去。这样，我们一行6个人、8匹马(有两2匹驮行李的马)往东走。当我们来到距屯子东头不远的李主任住的大院时，大门已经堵死了，没办法进去。我们正在院子东墙外踌躇时，院子里李主任的一位警卫员说：“首长告诉你们不能再进院了，要马上突出去找护送部队来增援。”田永存回答说：“请转告首长，我们坚决完成任务。”接着他对我们说：“我们要马上突出去，需要研究一下怎么个突法。”穿便衣老同志说：“这里不是久站之地，我们应当先找个比较隐蔽的地方研究一下。”大家都同意老同志的意见。田永存同志走在前面，我们转移到靠近屯东头的一个有土墙的院子里，从这里可以看到屯东面的地势。田永存和穿便衣的老同志趴院墙往东看了一阵说：“我们只有往东突。东面出屯就是开阔地，一点隐蔽也没有，也看不到敌人。现在敌人正从南北两面向村子里打枪，估计东西两面也不会没有敌人。”老同志又说：“从屯口到开阔地的东头拐弯处约有半里多远，敌人很可能埋伏在那里。”田永存同志说：“听枪声，南北两面敌人攻击的主要目标是屯子里我们住人的几个大院，还没有注意到我们几个人，我们东突也许是个机会。前面的情况不明，只好硬闯了。”大家都同意田永存同志的意见。田永存同志又说：“大家同意，马上就东突。在开阔地这一段骑马闯。为了分散敌人火力，要拉开一定距离；前面遇到敌人阻击时，要注意我的手势。”稍停一下，他又说：“我们这样硬突，可能有伤亡，谁突出去谁就尽快找护送部队，谁倒下谁算革命到底。”边说着就从院子里出来上马向东突击。田永存同志和穿便衣老同志冲在最前面。这时，我们的马似乎非常理解主人的心情和处境，跑得比其他任何时候都卖力。我们出屯跑出不远，北山坡上的敌人就向我们开枪，子弹

从我们身前脑后突突飞着。敌人边打边喊着："抓住他们……"我们不理这些，一直顺道向东突去。当我们突到开阔地东头距拐弯处不足百米时，迎头的敌人也向我们开枪，并高喊："交枪不杀！"我们仍然不理他们，继续前进。当我们前面两名同志距敌人二三十米时，敌人喊："冲上去，抓活的……"。随着喊声，土坎下站起二三十个敌人向我们围来。小田和穿便衣老同志都翻身下马，卧倒在地，向敌群前连续投掷了 3 枚手榴弹，敌人全趴下了；随后田永存同志又扳鞍上马，带领我们乘手榴弹的烟尘和敌人的慌乱向东突去。而穿便衣老同志仍卧地向敌人射击掩护我们。当我们闯过敌群时，敌酋仍喊着："冲上去！冲上去！抓住他们！"趴在地上的敌人又要起来时，田永存在马上边前进边向敌人又投出 2 枚没拉火的手榴弹，我们几只二十响手枪也向敌人射击着，怕死的匪徒们趴在地上不敢起来。当敌人发现榴弹没拉火，我们已经闯出去拐过山弯了，一鼓劲跑了三四里远才勒住马。这时我们只有 5 人了；那位穿便衣的老同志为了掩护我们没跑出来，牺牲了。大家下马稍沉默一阵，田永存同志说："要化悲痛为力量，继续战斗。"大家都紧了紧马肚带，上马去东屯找护送部队。老百姓告诉说，部队听到枪声后都上北山了。我们朝北山方向去，连续翻了几个岗子，才找到了护送部队。

这个骑兵连的领导，除连长、指导员外，还有一名麻子脸的牟主任。他是个什么主任，我不知道，听说话口气他在连领导之上。我们见到他们后，急促地汇报了我们突围的情况和目的，传达了首长的命令，要求他们营救首长。连长说："我们不认识你们，也不能执行你们的命令。"田永存同志说："就算你们不认识我们，首长被包围了这是事实，你们也应当营救吧。"连长说："我们现在对情况还不明，不能盲目出击。"田永存说："你们的任务是护送首长，现在首长被围，你们却站在这高山观阵，你们是要负后果责任的！"这时那位麻脸牟主任说："你们不要发脾气么，现在情况不明，我们不能盲目去送死。"看样子再对他说什么也没用了。

我们拚死突围出来找这个骑兵连，结果落一肚子气。天已近中午，听着激烈的枪声，我们几个人心急如焚，恨不得马能飞，立即飞回首长身边去战斗。刘永春同志说："既然对他们没有什么指望，我们还呆在这里干啥，我们打回去吧！"很少说话的小赵同志也说："对，我们应当马上打回去，如果里边正在突围，我们从敌人后边打他个突如其来，也许起到大作用。"几个人的心情都是一样的。他们这样一说，大家都同意再打回去，宁可拼死，也不能丢了首长还活着。

田永存同志说："我同意打回去。"简单商量一下。决定顺老路回去。田永存同志仍走在最前面。

当我们催马返回距柴胡栏子屯约有1里多路时，看到有2名同志各背着一名负伤的同志迎面走来。他们向我们招手喊："同志，你们是冀东的吗？"我们立即下马迎上去，上前一看，认出他们背的伤员是十二分区的张寿先部长和他的警卫员小刘。我们几个人上前扶着，把2名负伤同志轻轻放在地下。那2位同志用衣襟擦把头上的汗说："遇到你们就好了，把这两位同志交给你们，我们就放心了。你们可以去东屯找担架，东屯已去部队作接待伤员的准备。"我们问他们是那个部分的，他们说是赤西县支队的，他们连还在追击敌人，他们要马上追赶部队去。我们向他们道谢，互相一一握手告别。他们又向张部长敬礼，问："首长，我们可以走吗？张部长艰难地点头，表示同意，并说："谢谢你们，谢谢部队首长！"两位同志说："祝首长早日康复！"后就走了。

两位同志走后，我们从马上拿下行李给张部长和小刘同志铺上，让他们先躺下休息。刘永春和小赵骑马去东屯找担架，小田、小马我们3人在这里照顾伤员。

张部长是左胸负伤，已经用急救包包扎上了。他还很清醒，能和我们说话。小刘是左肩、右腿和小腹3处负伤，最重的是小腹，他已昏迷了。

张部长躺下后，问我们怎么到这里来的。我们向他简要地汇报了突围和找到骑兵连的情况，以及我们又要打回去的打算。张部长说："你们很勇敢，但你们没有必要再打回去了，敌人已被我们部队打跑了，现在的枪声是我们部队追击敌人。"他说话很吃力，我们不好意思再多问。他稍停一会又说："我很理解你们的心情，你们都急着听到自己首长的情况。我们的同志大部分在增援部队到达以前就突围了，也有的坚持到增援部队来解围。听送我们的那两名同志说，我们伤亡也不少，更具体的情况我不知道，没法告诉你们，等一会我们到东屯时可能听到的多些，也许首长在那里等着我们。"听这话，我们都哭了。

我们在这里等两个左右小时，小赵领着 4 个人抬着 2 付担架回来，小刘留在东屯安排住房。我们把伤员抬上担架，回到东屯，把伤员送到刘永春同志已经安排好的住处。

我们刚把伤员安排好，刘永春同志就把我叫到院子里告诉我："方才我去连部那里，看到张专员在那。"我高兴地问："真的？"他说："真的。我已告诉他说你来了，你快去看看吧。"听这话，我高兴地连下话没说，就往小刘指的屋子去了。我敲门报告进屋，见张专员坐在炕上，拿着笔和小本子在写什么。我敬礼后，他把笔和本子放下说："你也来了，好啊！快坐下。"我坐在条凳上，张专员好像是多久没见面似的看着我。我急切地问："李云清呢？"张专员摘下眼镜，用手帕擦擦眼镜说："下落不明。"我问："他什么时候与您分开的？"专员说："他一直和我们在一起的。他很勇敢，从院子里往外突时他还在掩护。我突出去后被部队营救，以后再没见到他，他可能……"他不往下说了。这时我再也控制不住感情，低头抽泣着。我又问："苏部长呢？"他说："苏部长、胡里光部长都牺牲了。听说王克儒部长也牺牲了；李主任也负伤了，警卫员牺牲了好几个。整个情况还不详细，仅现在知道的，我们这次损失太大了。"这时我更抽泣不止，几乎哭出声来。专员说："不要哭么，革命战士不能哭。"他说

不让我哭，实际他边说边擦眼泪。沉默一会儿他又说："我们活着的同志还有许多工作要做。"李主任方才对我说："今后让我带队，当前我们要在部队同志帮助下，把我们活着的同志收拢到一起，注意做好他们的思想工作，尤其要做好牺牲了首长的警卫员的思想工作。我们还要照顾伤员，尤其是重伤员。临近没有我们的医院，还要走几天才能送伤员入院。我们要努力照顾，尽量减少牺牲。"正说着，田永存和刘永春同志在外边敲门叫我。他们说，苏部长情况不明，要回到柴胡栏子去看看。我说让他们和张专员说一声再走才对。于是他们都进屋，田永存同志向专员说："首长，苏部长情况不明，我想去看看。"张专员说："你们坐下，我把我知道的情况告诉你们后，我们再走吧。"他们坐下后，张专员说："苏部长牺牲了……。"专员的话音未落，小刘、小田已泣不成声。过一会，专员又说："你们都是好同志，离开首长是执行首长命令，你们勇敢地完成了任务。首长牺牲了，这是我们党、我们革命事业的很大损失，我们都很悲痛。但我们活着的同志要化悲痛为力量，振作起来，为革命继续战斗。"小田抽泣着说："我们没有完成任务，没脸再活着回冀东！"专员说："不，你们认真地执行首长命令，勇敢地完成战斗任务，你们离开首长的具体情况我都知道。首长的牺牲不是你们的失职，这笔账要向敌人算。"专员又向他们说了不少安慰鼓励的话后，让他们去柴胡栏子看苏部长的遗体去了。

当天下午，在当地部队的帮助下，突围出来的陆续来到东屯的有 30 多人，其中负伤的有大半，需要用担架抬着的重伤员有 5 人，没有伤或稍有轻伤基本上不影响行军的只有 10 多人。晚饭后，在部队同志的帮助下，把来到这里的同志，除重伤员外，都召集到一起开会。在会上，张专员对同志们进行了安慰、鼓励。他要求同志们振作起来，化悲痛为力量，继续战斗，为死难者报仇。我们还要继续行军，同志们要团结互助，要照顾好伤员，特别要照顾好重伤员，尽可能减少牺牲。他动员同志们，把仅剩下的十多匹马，让给伤员

同志骑，能步行的要步行几天。这以后，同志们的情绪稍有稳定。

当天晚上，清理战场。掩埋遗体去的部队领导同志、当地政府的同志和我们随同去的同志一起，向张专员等同志汇报。我们这次牺牲了 20 多名同志，其中，团以上领导干部 7 人。现在我回忆起姓名的有苏林燕部长，王克儒厅长，胡里光副主任、陈部长；还有两名地区级领导同志，我想不起姓名了。对这些烈士的遗体，用新布缠身后就埋葬了。

第二天上午出发前，我们又一次清点了人数，重新分配了马匹。没有负伤的同志把马都让给了伤员或老弱同志。我带出 2 匹马，1 匹留给张专员，另 1 匹让给了十二专署田专员了。留给张专员的，他不肯骑，坚持要让给伤员。但让来让去谁也不骑，最后只好还是张专员骑了这匹马。从这天起，护送我们的部队是步兵。张专员说，送我们的骑兵连被调回二十二军分区了。后来听说这个骑兵连，因为没有完成护送任务，排以上干部都受了处分，还有的说连长、指导员都经过区首长批准枪毙了。

突围后的第一天行军，走了约有四五十里路，晚上宿营一个叫"牛角沟"的屯子。晚饭后，我同专员一起看望重伤员。当我们去看张寿先部长警卫员小刘时，他这时能认人了。他眼看着我，用微弱的声音叫出我的名字，并问张部长怎样。我告诉他说张部长很好，伤势不算太重。他说："他没问题就好；我可能不行了，你多操心照顾他，只要他能安全回去，我就……"说着，他把头一歪就不能再说话了。他脸上带着完成任务的安详表情，停止了呼吸。

又走了 3 天，我们才来到一个小镇。这里有我们部队和医院，重伤员都在这里入院治疗。我们在这里休息 3 天。当地部队给我们补充了马匹、给养等，并由这个部队派骑兵送我们安全回冀东。

上述这些是我亲眼见到的。听同志们说，在突围时有不少壮烈的战斗场面。在我记忆中烙印最深的有：

李主任（李中权）突围时，有 10 多名警卫员英勇战死。据说保

卫干事老秦，在把子弹打光、身上多处受伤后，又拾起敌人的马刀与敌人拚杀，壮烈牺牲。正因为这些警卫员的英勇战斗，才保护了李主任的脱险。

田专员（十三专署副专员田润芝）和他的2名警卫员，也是没出他们住的院子就被敌人围住了。田专员已50多岁了，年老体弱。他的警卫员只准他趴在炕沿下，不让他参战。两名警卫员老裴和小刘都是很有战斗经验的同志。战斗一开始，他们就边对付敌人边拆炕坯堵门窗。他们只有3支手枪（其中2支二十响快慢机）和5枚手榴弹，坚持到最后，敌人多次进攻都没进去。正在攻击紧张时，田专员再也坐不住了，他拿枪要对外射击。裴应胜正忙着对付外边的敌人，没工夫劝阻，急得飞起一脚把田专员手中的枪踢掉，田专员的右手被踢伤；警卫员小刘又把田专员推到原地坐下。当增援部队打跑敌人时，他们3个人只是有些轻伤，都被营救脱险。

这次被包围，虽然我们的同志都是英勇善战的，但敌我力量相差悬殊。据说敌人有400多人，而我们只有几十人。在武器方面，敌人是步枪、机枪都有，而我们都是短枪。有护送部队不但没有起作用，反而因为等靠他们失掉战机。这次战斗，我们的损失是很大的。据说，在我们冀东抗战8年、解放战争3年，像这样一次伤亡团以上干部之多还是少有的。

在柴胡栏子牺牲的烈士永垂不朽！

回忆袭击柴胡栏子

贾 琢

1947年春，八路军解放了围场县城——锥子山。这时，盘踞在附近乡下的保安队、当地土匪纷纷逃窜。

那时，我正在围场城北50华里的棋盘山一带活动，在于福中队里当土匪。这个中队有十五六个人。另两个中队是贾松方中队和吕长荣中队，也各有十几个人。3个中队总共40多人，统归匪首陶汉选指挥，称陶团。与此同时，棋盘山一带还有几股自称"保安团"的土匪：人数最多的是白金辉队，有700来人，称白团；由伪警察和地主武装混合组织起来的任方武队，50来人，称任团；徐连明队100多人，称徐团；还有国民党十三军谍报队的20多人。这几股土匪，大约有900多人，他们眼见锥子山解放了，怕八路军尾追上来，经过领头的相互串通，同意合股，公推白金辉为总指挥，任方武为副总指挥，决定先奔坝外，再向喇嘛庙逃窜。

旧历四月初的一天，我们从棋盘山开拔，晚间到了新拨沟里的桦树沟。在这里又碰上了一股土匪，为首的姓于，大约有120多人，他们打算去赤峰，投奔国民党九十三军。这样，任方武又变了卦，经与各领头的联系，又决定不去坝外，同于队一起，转向赤峰。为统一行动，听说领头的又开个会。还是公推白金辉为总指挥，陶汉选、任方武、徐连明为副总指挥。传下话来说：去赤峰得绕着走，若是遇上八路，一打就伤人；还说明天得早走，不走初头郎，顺大庙上边绕。

次日一早，我们团是从新拨下面的旧拨起程，一直到大庙上边的奈苏沟吃晚饭。队伍顺序是白团、任团走在前面，我们陶团走在最后。饭后喂喂马，又接着走，听说总指挥已派十几匹快马在前头

探听，一有八路就跑回来送信。走了大半夜，我们走到柴胡栏子上边，听说白总指挥接到尖兵的报告了，说柴胡栏子可能有 20 多人的区小队，没有重武器。有的头目认为这 20 多人不在话下。于是决定 3 路进攻：白团打北面，陶团打西南面，其余打正面。

天刚一放亮，我们团还没到柴胡栏子，就听到前面枪响了。这是因为队伍进行的顺序是白、于、任等团在前，我们陶团在后，所以后队没到，前队就打上了。据说队伍一进营子就搜，发现营子西头刘万昌、李凤廷两个大院确有八路军时，就集中攻打这两个大院。听到枪响之后不久，就看白金辉骑着马迎过来了，喊叫着紧往前赶。

太阳快冒红了，我们团才赶到柴胡栏子，枪还在响着。任方武跟我们队长于福说：你们队在营子西头把着；营子东头有白金辉他们把着，一个也跑不了。我们中队长于福，就指派我、徐贵、贾振方和周大头牵马，他带着 10 来个人向大院后墙方向冲去。陶团的另两个中队上了村北山岗。这时大院的前面有人往里打枪；房上也有人往正房里打枪；也有人从后墙往院里扔手榴弹；有的人还从后墙爬进院里去了。太阳一竿子来高，营子里的枪声才停下来。我们中队的贾耀廷被于永林拖了过来，是攻打正门时大腿上挂了花，我们就给他包扎起来，放在一边躺着。我们几个“马桩子”（看马的），正盘算着进营子里去看看。于永林说这下子可闹大了，前院碾道那儿就打死好几十！我就把马交给了周大头看着，从北墙后绕到南面刘家大院的大门口。我没进院，只看到院子里乱哄哄，人挺多，看到大门口的碾道上躺着几个打死的八路军，有人喊“八路军来了！”我惦记着马，拔腿往回跑。于福骂着说：你们往哪跑？怕死也不行，岗哨还没撤回来呢！这时枪声越来越近了，紧了。有人看到八路军骑兵从南面上来了，白金辉队也退下来了，我们也就跑了。我赶紧回到村北山岗上，把挂了花的贾耀廷扶上了马，当天就跑到围场县的四道川，把贾耀廷放在这个沟脑的张焕家了。过了不几天，我们又转

移到王国柱家。这时我们一是呆不住了，二是听说共产党有宽大政策，于是通过张焕转求于德旺、岳凤春，把我们要交出枪、马投降的意思报告给八路军。最后，这个中队只剩下我们6个人（另有贾振方、董和、于永林、徐贵和周大头），被八路军骑兵第三团收缴了枪、马，又送到棋盘山教育了几天。到1947年旧历五月十几，给我们开了宽大证，我从此回家务农。

凌源起义回忆

韩梅村

正当蒋介石反动派发动反人民的国内战争的第二个年头，战略上解放军处于防御，而蒋军正大举进攻，不可一世的时候，我作为国民党高级将领，第一个主动率部起义，这在当时看来，似乎是不可思议的。

然而人们的行动是受思想支配的，而思想来源于社会生活的实践。因此，有必要先简略地谈谈我的经历和思想演变，再谈我是怎样率部起义的。

(一)

1901 年，即清王朝屈服于“八国联军”，签订卖国的“辛丑条约”的这一年，我出生于湖南华容县东山一个下中农的家庭。7 岁进私塾，不满 12 岁，父亲病故，弟、妹小，因而失学。15 岁到一个叫塔市的小镇中药店做学徒，后当店员。这时，帝国主义对我国的压迫、剥削十分严重，特别是经济侵略深入农村。而国内南北军阀又连年混战，塔市小镇被军阀抢劫一空，放火烧毁了三分之一的房屋。我怀着一股爱国热情，到湖南陆军唐生智旅当兵。不久，参加了赵恒惕兴兵攻打王占元的所谓“援鄂之役”。之后，我认识到南军并不比北军好，军阀的军队谈不上是在“保国卫民”。要国家富强、人民安居乐业，个人必须参加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军阀革命行列，才会有出路。

1925 年 2 月，我到广东进黄埔军校学兵连当班长，3 月加入国

民党。当时军校政治部主任是周恩来同志，我多次听过他讲话，使我这个穷孩子出身的班长初步懂得了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道理。同年冬，我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三师七团四连排长。军党代表是周恩来同志，师党代表鲁易，团党代表蒋先云，我又有幸得到这些共产党人的教育和帮助，加深了我对当时革命形势的认识。

1926 年 3 月，所谓"中山舰事件"，第一军各级党代表和政工人员被逼走了。有些连、排长不明真相，大放厥词说："作政治工作的都是中共党员，他们在第一军争权夺利，挑拨离间，企图搞垮国民党，他们上台实行工农专政"。我听到这些言论很不以为然，我认为中共党人的学识能力、个人品德，并不亚于同级的国民党员。特别是工作勤奋，打仗勇敢，在消灭广东反革命军队的历次战斗中，伤亡军官多半是中共党员，我们第七团党代表蒋先云就是在第二次东征打惠州负重伤的。他练兵不辞劳苦，操场、野外只看到他而看不到团长。但当时我这些看法，只能隐藏在心里。

在进军北伐时，第七团改为第一师第一团，我任这个团的连长。此后，一直在国民党所谓的嫡系军队中任营长、团附、师教育大队长，旅、师参谋主任，团、旅长，师参谋长等职。其间参加过蒋冯阎中原大混战；在团附任内，参加过长城古北口抗战；在团、旅长任内，参加过保定漕河、河南漳河、台儿庄、武汉、湘北等抗日战争。在十多年内，我深切感到蒋介石消极对外，积极反共、反人民的罪行，只会使我们多难的祖国陷于灭亡境地。尤其是蒋军内部，贪污腐化，互相倾轧，有爱国心、有正义感者很难立足。就在所谓"保卫大武汉"时，华容同乡有个包泽英，送给我几本进步书刊。他是抗战开始时被国民党释放的政治犯，早期中共党员。我在蒋军节节败退正感到抗战前途渺茫时，偷偷地学习了毛主席的《论持久战》，看到了光明，心里踏实了。联想起远在 1928 年，我在南京中央军校军官团学习时，华容同乡中的一些中共党员，把我作为国民党左派与我接触过，如朱辟安、方之中等同志。在先后交谈中，他们对当时的政治

局势有精辟的见解，对中国革命前途充满着信心。这时我才清楚认识，要取得抗战胜利，挽救祖国的危亡，只能是善于组织、团结、教育广大群众与日寇作持久战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也只有这样善于组织、团结、教育广大人民群众才有力量。从此，党一直关怀着我，我也一直在党的教育和影响下趋向进步。在武汉沦陷、广州弃守以后，国民党消极抗战，积极反共，反人民的狼子野心越来越被全国人民看清了，也越来越不得人心了。

（二）

1941 年 10 月，我在一九五师少将参谋长任职内，托病请假到桂林养病。国民党第九集团军总司令关麟征为了笼络我，给我在总部安排了一个少将高参名义的空头衔，坐领薪金不上班。我有机会又阅读了更多的进步书刊。次年，党派肖漪萍同志与我接触，他是我的大孩子的老师。在与他两次谈话中，我感到他思想进步，对抗战前途估计正确。接着有个华容同乡杨明清，住在我家。他原是湖南第一师范的学生，国民党烧长沙，他回到华容做宣传抗日工作。华容县警察局长徐长达说他是“过激分子”，要抓他，他逃到湘北前线找到我。那时，我任一九五师五六六旅旅长，安排他任连队文化教员。他经常在旅部办的《吼声》油印小报写文章，思想活跃，表现进步。1939 年，湖南第一师范迁宁乡复课，我资助他完成了学业。华容沦陷后，他又到桂林找到了我。通过肖漪萍与一个铁道部门办的小学的教导主任邓钧洪的关系，介绍他到这个小学任教员。邓钧洪是中共党员，是杨明清在湖南第一师范的同学，杨曾把我在湘北前线所作所为告诉过邓。不久，邓到桂林公共体育场旁边“平民书店”当经理，实际上这家书店是中共桂林地下织组的联络点。邓钧洪通过杨明清，经常交给我一些秘密文件阅读，其中有周恩来同志由重庆回延安向党中央的报告。我的大孩子也告诉我说，他的老师经常在开会时安排他站岗放哨。因此，我意识到了党和一些进步的

知识分子都在做我的工作，热情引导我走向光明。

1944年夏，长沙沦陷，衡阳动乱，桂林开始疏散人口。邓钧洪回湖南，肖漪萍、杨明清去贵阳。我因小儿子将要出生，爱人不便行动，也错估计桂林不会很快沦陷，未动。不久，湘桂边境黄沙河失守，我只好在9月12日随着近10万难民向广西西南山区逃难。一家8口，历尽艰苦，行李丢失，出生不久的孩子几乎丢掉，更加深了我对蒋军腐败无能的愤恨。1945年5月初，我逃难到贵阳，某报社的副总编辑，进步人士王淮冰给我安排了住所。他是我在湘北抗战时的熟人，他见我如此穷困，即电告成都军分校主任关麟征和昆明防守司令杜聿明。当时关、杜都回电欢迎我去工作，并给我寄了旅费。恰好这时肖漪萍也在贵阳。我在逃难中写了近2万字的材料揭露蒋军黑暗内幕，给王淮冰、肖漪萍看后，他们从革命的长远利益考虑，不主张我发表。肖并且要我还是选择去昆明，伺机另作良图。我于5月中旬到昆明，杜聿明委派我任他的司令长官部少将高参兼直属部队指挥官。并要我编写《抗战经验》，作为训练部队的参考。这时杨明清在昆明中法大学文学院读书。有一天，他约了中共党员刘乐扬同志和我见面，刘的公开身份是给昆明《扫荡报》撰写社论的，他的妻子易淑娟，当时在昆明城外某中学教书，也很进步。刘对我谈了当时国内外形势，分析很中肯，对我大有启发。又有一天，杨明清带我到西南联大参观民主墙报，那真是洋洋大观，许多精辟的见解，醒人耳目的评论，增长了我不少知识，思想觉悟更进一步提高。后来我才知道，这是党在关怀我，指引我走向光明。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认为"外患已了，内忧正深"。大印"剿匪手本"，准备大打内战。他命令杜聿明赶走龙云，把西南掌握到自己手中。随即委派杜为东北保安司令长官，任命关麟征为昆明警备司令。本来昆明民主空气较浓厚，民主人士较多，中共地下党员也不少，蒋介石想一网打尽。在赶龙云时，我把这一消息告诉了杨明清，要他从速通知刘乐扬和易淑娟。据说这次昆明党的地下组织损失

很小。

杜聿明于10月间到秦皇岛，在上海的十三军（军长石觉）和在越南的五十二军（军长赵公武），同时由美国运输舰运送到秦皇岛，作为杜出关“接收”东北的主要力量，因为这两个军杜都较熟悉。11月初，杜命令留在昆明的机关、家属、通信兵团、特务团、装甲兵团等直属部队数千人，由一个装备十轮卡的汽车团分批运到广西南宁，转送到越南海防。我乘着一辆吉普车带着杨明清到海防，在鸿基港口登上美国运输舰，于12月初到葫芦岛，再乘火车到锦州。当时，我是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少将高参兼直属部队指挥官，杨明清任指挥部的上尉书记。

1946年元旦晚上，杜聿明打电话找我去谈话。他说十三军把阜新的八路军赶走了，那里是属热河省管辖的煤矿区，有近20万人口，有上万日本人，问我愿不愿意去接收这个市当市长。当时我想，老守在这个高级衙门里是难找到出路的（五十二军曾要我去当军参谋长我没有同意），可是当市长搞行政工作没经验，杜也许是看到我太穷，要我去当“劫收大员”（当时人们称接收是“劫收”）发一笔财。我考虑以后对他说，明天早晨我再报告你。

我回到指挥部和杨明清一交谈，他极力主张我去。他说我们去不是为了发财，而是接近群众的大好机会；至于怕无得力的人帮助你，我可写信到湖南去找人，邓钧洪、肖漪萍都和我有联系。这是“心照不宣”的话。于是我立即打电话告诉杜，同意到阜新。第二天上午，杜给我写了一封介绍信，要我去见住在锦州的热河省主席刘多荃，并约好元月3日派车送我到阜新。我保举了杨明清任主任秘书。

我们一到阜新，首先进行旧公务人员的登记选录，把机关牌子树起来开始办公。并采取了一些措施，如修理遭到破坏的公共房屋，筹备中、小学开学，培训教员，向长官部要了100支步枪，成立了一个警察中队。没有经费就变卖敌伪遗留下来的暂时不用的东

西。把一辆小轿车修好卖给煤矿,我同杨明清每人一台自行车,有空就去采访民情。在第一次发薪水时,我只拿了我应得的市长薪水,掌管财务的旧科长李振林,说他侍奉了不少上司,没遇到这样奇怪的市长。就这样,我看到阜新人民眼里露出了喜悦的光彩。3月下旬到4月初,先后分批遣送了近万名日本人回国。5月,我的妻子张剑云由南方带着孩子们到阜新,多难的家庭又团聚了。杨明清早已向在湖南工作的肖滃萍发了邀请信,要肖通知邓钧洪一同来阜新。邓于6月初从湖南带着党的温暖到阜新。这时湖南省委也向延安汇报了这件事。由于种种原因,过了很长时间,东北局冀察热辽分局书记程子华同志才知道这件事。这时市县合并,我任县长,杨明清任主任秘书,邓钧洪任政法秘书。从此,我们在党的领导下,有了明确的工作方向。前任阜新县长张天权,在统治阜新5个多月内干尽了坏事,民怨鼎沸,老百姓向东北行辕、热河省政府,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喊冤叫屈,上级没有别的办法,就只好将市县合并。在我和他办交接手续时,他交的是一个比什么都烂的烂摊子。我问来监交的省民政厅李厅长应怎么接?他说,他交什么你接什么。张县长在这里胡闹,刘主席早已知道,因为张是十三军军长石觉介绍来的,十三军正保卫着热河,不便得罪他。这就是国民党统治区的"军政关系"。

县市合并后,县参议会正、副议长王涵三、贾玉昆,县党部书记长江济等人暗中散布流言蜚语,说我在市长任内不坐小汽车,吃高粱米饭,修破房子办学校,设救济院,办托儿所等等,都是八路军那一套。明的则向我要津贴,要增加办公费,要安插不必要的公务人员。有名的蒙奸李守信、土匪头子崔兴武、索华忱,住在阜新招兵买马,要这要那。阜新人民对他们极为痛恨,纷纷要我作主。但他们是熊式辉、杜聿明委派的,我利用他们之间的矛盾,取得杜聿明的同意,先后扣押了崔兴武、索华忱,吓跑了李守信。阜新人民无不拍手称快。县监狱关满了所谓"中共嫌疑分子",由政法秘书邓钧洪清

理，先后释放 20 多人，其中有个叫崔灿的穷苦知识分子，自认必死监牢，被释放后又安排他任小学教员。他写了一首旧诗："灾祸从天降我身，横遭诬陷进牢门。若非明镜韩县宰（救星是中国共产党）、苦海冤仇那得伸。"其实他应该感谢共产党。

阜新四乡原有区公所，每个区都有保安分队。我们撤销了区公所，把保安队集中到县城训练，让八路军游击队更好活动。这样，土豪劣绅拼命反对，但我们坚决顶住。当时国民党在各县抓壮丁，农村鸡犬不宁。我向杜聿明建议，由我在阜新组编一个分支队，免去征兵，他同意了，要我到沈阳面谈。谈的结果是把原来在凌源县城的三支队（司令刘清霖因不听指挥）七、八、九三个团 3000 多人缩编七、八两个团，由我在阜新组编第九团，我兼司令，刘清霖任副司令，并将七、八两团由凌源开到阜新集中整训。他的用意是想把这些无训练、无纪律的地主武装编成正式军队，为他效命。但他的愿望一直没实现。我接受这个任务后，把原在阜新以赵序武为首的所谓"大刀队"和几股地主武装共约 1000 多人编成第九团，赵序武任团长。另派原在一九五师当过炮兵连长的涂怀忠任中校团附，当过步兵连长的王茂恩任第三营营长去掌握这个部队。接着刘清霖到阜新见我，他说七、八两团的官兵，都是凌源人，都不愿离开凌源，他无法带到阜新，他本人也要求离开部队到朝阳养病。我无权作出答复，只好再去沈阳见杜聿明。这时杜正在患病，也因二十五师刚在辽东覆灭，他在这个师当过旅长、副师长，对这个师有感情，有点心痛，在家养病不会客。他听说我到了沈阳，即通知我到他家谈话。他一见我就说："二十五师的覆灭，是雨东（关麟征）、耀明（张耀明）任人唯亲的结果。"意思是说李正谊、段培德无能，不应让他们当师长、副师长。我说："说起这个师的人事，一言难尽，你在抗战前离开了这个师，以后的情况可能不清楚。李正谊自恃是关、张的亲信同乡，很骄傲。在保定漕河抗战时当营长，不听他的团长覃异之的指挥，随着另一个营长徐克让（也是关、张的亲信同乡）放弃阵地，向

后溃退。覃团长愤而拔枪自杀，幸为左右抢救，受伤未死。当时我在这个师当团长，防守在覃团右翼阵地上，所以很清楚。这样的营长，几年后居然当上了师长。至于段培德、刘世懋（前任师长）等人，也不是因抗战有功而升官，只因为他们都是关、张的亲信老乡”。

这次杜聿明和我谈话的结果，三支队在凌源的第八团拨给五十二军，由我在阜新以县保安大队为基础另成立第八团。同意第七团仍驻凌源，刘清霖离部队养病。同时由长官部赵家骧参谋长介绍他的老同学卢广作任支队参谋长，刘某任第八团团长，阜新县军事科长钟良兼中校团附。由于我们把地主武装集中到县城整训，八路军、游击队更活跃，地主豪绅纷纷逃到县城，他们向县党部、县参议会哭诉，要求我放他们的武装回去打八路，我没理睬。于是，县党部、县参议会以“民意代表”向熊式辉、杜聿明、刘多荃告状，说我“政治主张乖谬”，“不打八路军”等等。同年冬，八路军、游击队活动到了离县城多里的王爷府、红帽子等地。我同邓钧洪、杨明清商量，认为长期把武装集中到县城不动，我们又没有和游击队联系，而且反动势力又到处告状，恐会引起麻烦，必须带部队出去一趟，以塞蜂口。这次带队出去，原意由邓钧洪进入解放区与我热东党组织取上联系，但未成功。支队有一个连还受了损失，我只好令部队撤回。第三天下大雪，老邓以无产阶级的坚强意志，不畏严寒，化装进入解放区。在紫都台找到了十七旅，会见了旅政委谢镗忠和政治部主任李质两个同志，说明了他自己的身份和我的思想打算。谢、李将信将疑，提出要我亲笔向党组织写信，提供东北国民党的军事机密。同时要一些三支队和县政府的空白公函。邓同意照办。这天安排邓住在招待所。八路军是优待俘虏的。事有凑巧，前几天被俘的三支队排长皮广俊也住在招待所。皮问邓：“你从哪里来，来这里干什么？”邓说：“我是商人，从北票煤矿来这里做生意的。”邓回县城，立即把这件事告诉我。没料到第二天皮也回来了，并立即向我报告，说他在八路军招待所见到一个戴眼镜说一口湖南话的商人，

好像在县政府见过，要我查一查，此人很可能是八路军的探子。我说，你很机警、忠诚，你不要对任何人讲，我马上查。皮出去后，我立即找邓和杨明清商量如何处理这件事。杨主张杀皮以灭口，邓和我认为不必要，因为皮是军事科长钟良的四川同乡，是钟介绍他当排长的。再找他谈一次，说邓是我派出去做反间工作的，教育他不能向任何人讲，这是军事机密，泄露军事秘密要杀头。这件事就这样处理了。过了几天，邓钧洪同志如约再去紫都台，回来时带了些宣传品，还有密件。我路上遇着三支队巡逻兵，邓恐怕他们搜身，即拿出身份证，并命令他们派几个骑兵护送到我家。好在巡逻兵是三支队的，否则也会出问题，因为阜新驻有云南部队一个团。经过几次严峻考验，同时延安方面已通知程子华同志，热东党组织派了两个干部到阜新县城，住下来与邓钧洪同志联系，也和我见了面谈过话。

1947 年，湖南地下党省委取得延安方面的同意，又派了周太暄、陶涛两同志来阜新帮助我做起义工作。我们准备在我十七旅和辽西部队帮助下除掉驻在海州的九十三军一个团，即在阜新起义。但到了 3 月初，杜聿明为了先拿下辽东临江一带解放区，再挥兵北渡松花江，进攻哈尔滨。把驻在热河平泉、凌源一带的八十九师调辽东作战，令我带八、九两团由阜新移驻凌源，归云南某部队兵团司令官卢浚泉指挥。这样，我们只好取消原计划。3 月中旬，我和周太暄、陶涛两同志带着八、九两个团从阜新乘火车到凌源，留杨明清代理县长，邓钧洪任县中学校长，继续与热东党组织联系。

(三)

我到凌源后，国内形势起了变化。蒋介石疯狂地打内战，分两路进攻解放区。一路攻山东，一路犯陕北。延安被胡宗南部侵占，东北也很繁忙。我这个支队号称 3 个团，实际只有 3000 人，移动时又逃散不少，第九团团长赵序武假称有病不见我。上级令我把部队

分驻于从叶柏寿(现建平县城)到平泉约200华里的铁路线上。凌源县城驻着支队司令部和一个警卫排、第七团团部及其所属一个营,八团团部及所属一个连、九团的王茂恩营。这时,周太暄同志已去热中解放区联系。热中驻有我十六旅,旅长张德发、政委黄志勇。他们派了一位科长戴平同志(现任外交部礼宾司副司长)来凌源,我把他当作客人住在我家。我以城防司令名义制作了出入证,因而他和带来的人出人警戒线较方便。

这里有两件事谈一下也很有意思:一是在我离开阜新前不久,热河省政府介绍一个叫刘去非的人要我安排他当县政府秘书。他带来一部无线电台,有时不经过我,他私自收发电报。他一到阜新就和县党部、县参议会秘密交往,对三支队挑拨离间。有些官兵不愿去凌源而逃避,九团团长赵序武就是接收了他的示意;第二件是我到达凌源的第二天,看到天津的报刊登着国民党中央社发出消息说,韩某带着两个团离开阜新投降了八路军。我见报后啼笑皆非,即打电话请示省主席刘多荃先生怎么办,他立即打电报要报社"更正"。现在刘多荃先生住在北平,他看到我这个回忆,也许会发笑。

凌源县城在锦州到承德的铁路线上,南北靠山,东西两面是小平川。西去平泉县城90里,驻有十三军的一个团,东南60里和东北天义各有九十三军一个团。我在凌源指挥的部队除三支队全部外,还有县保安大队约300人。根据各方面情况,要把部队拉到解放区,没有八路军的帮助是困难的。特别是三支队官兵成份复杂,人们所谓"正统"思想浓厚,而当时形势对我们起义也不利。我们又不能够向部队进行阶级教育,即使依靠我而当上中、下级军官的,也不能向他们公开。当时凌源城内有九十三军一个弹药仓库,城外火车站粮食堆成山,是凌源县长、公安局长、县银行经理等合伙从农民手中巧取豪夺来的,他们要运到锦州出卖获暴利。我以城防司令名义坚决制止运走。他们先是请客送礼,说好话,最后抬出省主

席打电话找我说情。我始终不松口，理由是城防部队要吃饭。这时邓钧洪同志也从阜新到凌源，我们研究要在起义时把弹药和粮食运进解放区。

4月中旬，戴平同志回热中向党组织汇报了情况。在转报分局首长后，回凌源告诉我们说，党要我们尽可能在凌源呆下去，到最有利时行动。至于派部队支援和运走物资，军区正在准备。接着国民党八十九师在辽东被歼，石觉奉命重组八十九师，风闻三支队有拨出去的可能。我们恐“夜长梦多”，又由戴平同志再回热中，向党建议立即支援我们行动。戴平同志于4月27日回凌源，传达了程子华同志的指示，要我们在4月30日夜晚发动，5月1日起义，支援我们的是十六旅5个营。

5月1日，是世界劳动人民的节日，首长选择这个日子要我们宣布起义，这是有深远意义的。我立即下令以点名发响为名，把铁路线上的部队集中2个营到凌源车站，限4月30日上午到达。29日，我同戴平同志到城外察看地形，并布置通信联络等工作。30日黄昏前，十六旅部队接近凌源城，并事先已派有便衣队进了城。十六旅以两个营破坏东西两面铁路和阻止敌人“增援”，以1个营监视车站，不让刚集中的三支队2个营逃散，以1个营从西门进城。我立即命令守西门的部队撤到支队司令部门前集合待命。当时，国民党住在朝阳的卢司令官打电话问我能否守住县城，要不要派部队来支援？我说城防坚固，没问题，不必派部队来凌源。

原来计划在起义发动时，派一个连抓县长、公安局长等一些坏蛋，由于这个连长逃跑了，未实现。好在十六旅进城快，还是抓了一些，其中有公安局长。

5月1日凌晨，由解放区来的大车近百辆，把粮食和弹药全部运走了。十六旅旅长张德发和曹副政委也到了我家和我见了面。至此，我们公开宣布起义成功，在司令部门前集合部队讲了话。大意是说我这次起义是有计划、有组织地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的。

我对国民党蒋介石封建法西斯的统治，早已深恶痛绝，他们腐败无能、与民为敌，已经不可救药。现在我已经走向人民的行列，也希望三支队的官兵同我一起走上这光明大道，为人民立功。

当天中午，起义部队离开凌源县城，向西北方面八里罕解放区移动。到达后，我通电全国，历诉蒋介石反动统治的罪恶和我所以起义的道理。几天后，八里罕附近的人民群众开大会欢迎起义官兵，并送来许多慰劳品，这对起义官兵是个很大的鼓舞。在这个大会上，宣布了军区首长命名起义部队为热河民主救国军独立第一旅，我为旅长。特别使我感奋的是，7 月 15 日，经党中央批准，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得到了新生。

（作者曾担任冀察热辽军区独立第六师师长等职，后来转入地方工作。）

忆我和杜聿明的交往

韩梅村

我和杜聿明从1929年在国民党南京军校第一次见面，到1980年10月在北京他的住所共进午餐后永别，计51年的历史。回忆起来，朋友、知己上级，转变成两军对垒、浴血厮杀，后来又以朋友、知己面结束。

这51年的交往、断绝、敌对、交往，很耐人回昧。下面把我和他的接触情况写出来，作为我们之间难以忘却的纪念。

第一次见面和交往

1929年，杜聿明任国民党南京军校第七期相当于连的中校中队长，我是军校军官研究班相当于排的少校区队长。我们虽有时在一起开会，但不熟悉。

1930年春，国民党教导第二师成立，军校教育长张治中兼任师长，各级军官都是从军校调任。杜聿明任该师第二旅第六团一营中校营长，我任第一旅二团机枪连少校连长。

1931年五六月间，两广反蒋。那时，教导第二师已改为第四师，师长徐庭瑶。杜聿明已升任该师十二旅二十四团上校团长，我任该师特务团第一营少校营长。四师奉命由浙江开往武汉，准备经湖南打广西。我们从上海乘船，杜聿明团的船上可增加一个营，我营奉命与杜团同乘一船。杜聿明工作细致，日夜巡查乘船官兵的军风纪。他发觉我营比较好，和我谈话时表扬了我。通过这次乘船，他对我有了初步了解，我对他有了初步认识。他喜欢我对全营工作有条不紊，我敬佩他工作认真、了解下情。

我和杜聿明相互信任和赏识，是在清剿河南著匪崔邦杰。崔邦杰曾经为河南省主席兼开封绥署主任刘峙收编，继而又编散了他的部队，调任他为绥署少将参议。他匪性不改，施计杀害了刘峙的参谋长彭启彪，又逃往豫西南重操旧业。这时崔邦杰又聚集近2000人，流窜于豫南沈丘、项城一带，他向老百姓要枪、要马、要银、绑票勒款。刘峙令杜聿明旅就近清剿。

杜聿明对反复无常的惯匪，深恶痛绝。加上另一原因，这是1931年夏秋之间的故事：那时，第四师奉命开河北援助张学良打石友三。在河北南部大名城，围住了附合石友三的山东著匪刘桂棠（外号刘黑七）。徐庭瑶指挥第四师（约两万人）及收编不久的河南著匪崔邦杰部约3000人。而困守大名城的刘桂棠只有3000多人，但拒不缴枪投降。结果，崔邦杰串通刘桂棠，从他堵截的南门放走了刘桂棠的全部。当时，正在大名城东门外几个村庄休息的杜聿明团，深夜突然受到刘桂棠部队袭击，损失不小。

杜聿明记起了过去吃过崔邦杰的亏，旧仇新恨，他奉命清剿崔匪，当然是积极行动，恨不得生擒崔邦杰。但崔是惯匪，很有一套对付清剿的办法，杜部捕捉了10余天，没有效果。当时正值初春，一日天降大雪，豫南平原雪厚3寸以上，杜聿明终于找到了崔匪人马足迹。他率部赶了大半天，真是“人困马乏”，却仍未追上。他召集各团团长和旅参谋主任研究情况，再定行止。一四五团团长戴安澜是追匪的先头指挥者，他认为“部队太疲劳，应停下来休息、搞饭吃，好在有足迹，明天再追。”旅参谋主任曾谦也同意戴的意见。杜聿明问我，我当时是后卫团，我说：“崔匪也要吃饭、睡觉，我们今天辛苦一点儿继续追，可能追上。不然明天雪化，或者刮大风掩埋了足迹，就不好追了。”杜聿明同意了我的意见，并命令我团由后卫变成前锋，让戴团吃完饭后跟进。我奉命后，随即令全团忍饥快步行军，终于在当天黄昏前追上了。原来，崔匪正在一个叫李母子庄的大村吃饭，准备住宿。我团当即展开四面包围，尽管匪徒组织敢死

队突围，但在密集的火力封锁下，绝少逃脱。不到 2 小时，全部解决。计打死百余人，生俘 1000 多人，内有“肉票”妇女 10 多人。清查结果，没有崔邦杰。两个土匪头子宋天祥、杨小猴在突围时被击毙。

事后，刘峙电令嘉奖杜聿明，并向蒋介石为杜报功。杜聿明拍着我的肩膀说：“真正该奖的是你，我得了个名儿”。

杜旅集中到蚌埠整训。“长城抗战”开始，杜旅奉命于 3 月初到达河北通县，随即参加了“古北口抗日”之战。当时二十五师师长关麟征负轻伤，到北平住医院。杜聿明升任副师长，代理师长职务，在南天门协同十七军（军长徐庭瑶）之第二师、八十三师抗击日本侵略军作战近 50 天，这次他是有功的。

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签订后，关麟征师驻北平，杜聿明向关师长推荐我主办师教育大队，轮训全师现役班、排长。杜经常来到大队指导我工作。

1934 年秋，杜聿明去庐山“受训”。他回部队后，主办了一个“北平市大学生寒假军训班”。1935 年春，他又主办了一个“北平市中学生集训总队”（约 2000 名中学生），这两次我都作为他的助手，和他生活、工作在一起，对他的思想深处略有认识。他极力宣传蒋介石制定的“攘外必先安内”，大讲“四维八德”，他对这些“道理”讲得条理分明，确实下过一番功夫。他是总负责人，抓学生思想教育，我负责军事训练，而他由于讲得用心尽力，经常侵占计划规定由我主持的军训时间。

后来回想他这一段生活和言行，我认为是因他刚从庐山蒋介石身边“受训”归来的缘故。

1936 年夏，我由旅参谋主任，升任师参谋主任，又和副师长杜聿明在一起工作了。他同师长关麟征在闲时，常讲封建迷信故事，有时还玩弄几个铜钱卜卦。一天，我顶撞了他们几句，想不到杜竟指着我的鼻子笑着说：“韩主任的鼻子有点向左歪”。我当时不是中

共党员，因而内心坦然，只以一笑回答之。

当时，我发觉杜聿明的内心有矛盾，他一方面喜爱讲封建迷信故事，可是另方面他又喜爱科学。比如师里武器装备，山野炮，轻、重机枪，无线电收发报机等等他能拆了装，装了拆，很熟练。他还学会了开汽车，这些都为徐庭瑶所器重，下层军官所敬。

1937 年春，徐庭瑶在南京组建机械化部队，电邀杜聿明去当他的助手。从此，我和杜暂时分手了。杜在南京初任装甲兵团少将团长，“七·七”事变后升任师长。1938 年，升任第五军军长。

第一次分手后的交往

杜聿明离开二十五师后，国共两党开始联合抗日，我在二十五师任团长、师参谋长。武汉会战开始时，任一九五师五六六旅旅长。我旅驻湘北时，杜聿明派了两位参谋来我旅，搜集我在华北、台儿庄、武汉等抗日战争中的经验教训。有位参谋告诉我说：“这是杜军长要搜集抗战战例，作为第五军训练部队时的参考”。其实，他在 1939 年指挥第五军在广西昆仑关抗战打过大胜仗，还打死了日本侵略军团长中村正雄。他的抗战经验，比我丰富。这说明他为人谦虚、好学。

这时的杜聿明，已是国民党军队中的高级将领，但他从不贪污腐化。他在五军军长任内，竭力节省开支，节余下来的经费办军需工厂，吸收军人家属做工；创办军人子弟学校；他对比他大两岁的妻子曹秀清很爱护，他从来不嫖；他对子女的教育也很严格，毫无少爷、小姐的习气。1940 年夏，我在一九五师任少将师参谋长，部队由湘北开往广西，这时杜的五军军部驻广西全州。我到全州看望他，他和他的夫人曹秀清请我到他家吃午饭。在谈到子女教育问题时，他要我把两个大的孩子送到五军子弟学校读书，我同意了。1941 年，我家由湖南移住桂林，才把两个孩子接回去。据孩子们讲，杜军长的儿女对他们很亲爱，经常在生活和学习上给以帮助。

1941 年冬，杜聿明带着“远征军”到缅甸。在这次远征抗日战争中，也为中华民族立下了功劳。这时，我认识到蒋介石、关麟征等人抗战无诚意，辞去了一九五师师参谋长的职务，到桂林养病。关麟征为了笼络我，给我在他的集团军总部安排了一个少将高参的虚名。杜聿明知道后，电邀我到他那里工作，我婉言谢绝了。

1942 年杜聿明因公到桂林，特意到我家看望我。他说：“现在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美、英、苏等国都参战了，正在大力支援我们，我国抗战前景好得很，最后胜利大有希望。你这样消极是很不应该的”。我以有病为借口，又婉言谢绝了。1944 年秋，日本侵略军进犯广西，桂林无法住下去！我于 9 月中旬，携着幼儿，我爱人张剑云还抱着刚出生两个月的小孩，随桂林几万人“逃难”！10 月间，逃到广西宜山山区一个老同事的家乡——九渡。接着九渡沦陷，又逃到下坳，行李衣物丢光！

1945 年 5 月初，我逃难到贵阳。杜聿明知道后，电邀我去昆明，那时他是昆明防守司令长官，并给我寄来足够的路费。我于 5 月中旬到昆明，杜聿明委派我任昆明防守司令长官部少将高参兼直属部队指挥官，并让他的后勤负责人蒋瑞清给我置了全家的行李、衣物。

第二次交往与分离

自 1933 年到 1945 年这 12 年间，我深深地感到杜聿明是我的知己上级。他不仅是对我无微不至的关照，而且是“爱才若渴”对所有下层都是“任人唯贤”。

日本侵略军投降后，云南王——龙云的主力部队大部分由卢汉率领去越南受降。蒋介石乘机密令杜聿明以武力迫使龙云离开昆明，去重庆任军事委员会参议院上将院长。有一天，杜聿明从重庆乘飞机回部，到我办公室要我指导教育作战处布置沙盘教育，准备召集驻昆明附近的师以上陆、空军军官会议，假想围攻昆明城。

我当时莫明其妙。几天后，杜实施了赶走龙云的计划，为蒋介石夺得了云南地盘。事后，蒋介石为了顾全已到重庆的龙云面子，假惺惺地申斥杜聿明做得过份，下令免去杜的昆明防守司令长官职务。没有多久，又委派杜聿明为"东北保安司令长官"。

杜聿明率领部分参谋和后勤人员先到秦皇岛。蒋介石令在上海受降的十三军(军长石觉)、在越南受降的五十二军(军长赵公武)乘美舰到秦皇岛，由杜指挥出关到东北接收苏联红军的移交。并为了加强军力，又先后派了几个军交杜指挥。

杜聿明在临行前，召开了司令部处长以上军务会议，决定：司令部及直属部队各单位、家属等由汽车团分批运送到广西南宁，而后再转运到越南海防和鸿基港口，乘美舰去东北。家属留南宁，令我负责带领直属部队作好准备，待令行动。

我于 11 月底率领司令部和直属部队在葫芦岛登陆，乘火车到锦州。这时，杜聿明已随五十二军首先到了锦州。

这里我还回忆起一件事。在杜聿明起程去秦皇岛的当天，我对他说："根据昨天的情报会上，知道八路军林彪已率领 10 万人出关，在东北的苏联红军有可能交防给八路军。如果是这样，我们去东北，就会有麻烦。他说："有协定，苏联不会这样干。当然，我们也要准备打仗"。他又说："出关的八路军，是小米加步枪，而且有不少是徒手。现在东北冷天到了，听说八路军没有棉大衣、棉鞋。如果真的打仗，他们也不堪一击"。他讲这些话时，似乎很有把握接收东北，神情很愉快。

我到锦州后，立即向杜聿明汇报沿途乘车、乘船情况。踏进他的办公室，见到他正在写日记。我说："司令长官工作这样忙，还有时间写日记?"他放下笔，和我亲切地握手说："写日记，是老头子(蒋介石)交给我的任务之一，年终时，还要派人送给他看。"从这件事来看，可见蒋介石对杜聿明的控制很严格。

1946 年元旦，国民党十三军八十九师(师长万全仁)进占了热

河省属阜新市。这里是日伪统治时的大煤矿区，有20多万人口，有近2万日本人。杜聿明保举我任阜新市市长，当接收大员。这时，我已与中共湖南地下党组织有联系，因而我到阜新后，是挂着国民党接收大员的牌子，做的是共产党的工作。

由于苏联红军撤退时，把阜新发电厂和煤矿设备搬走了，既无电，煤矿也无法生产。在矿区工人走散，日本人遣送回国后，市区人口猛减，只好在同年6月，市、县合并，撤销市的机构，我继任县长。杜聿明又委派我组建东北保安第三支队，我兼支队司令。当地的地头蛇——豪绅、地主、土匪头子以及县参议会，国民党县党部等见我在阜新作的工作与他们的利益有矛盾，如我撤销区公所、集中地主武装到县城；试行"二五减租"；办救济院、托儿所；释放被关押的所谓"中共嫌疑分子"等等。他们纷纷向杜聿明告我的状，说我有小汽车不坐，骑着自行车到处跑，吃小米、高粱米饭，生活上全像八路军；说我"政治主张乖谬，不打八路军，把保安队集中到县城保护自己"等等。杜聿明认为我的生活简朴，这是多年的习惯，是"事业心强"。但他对我释放被前任县长关押的人员和不打八路军，可能有怀疑。在组建三支队第八团时，我保举阜新县军事科长钟良（四川人，原国民党一九五师中校参谋）任团长；杜聿明不同意，他派了一个刘某任团长；接着我又保举钟良为支队参谋长，杜又不同意，他委派卢广作任支队上校参谋长，我知道卢是监视我的。随后，他派来20多个下级军官到我支队三个团任职，其中肯定有国民党特务分子。

这时，从湖南来的中共地下党员邓钧洪同志，正与阜新地区的我党地下工作者联系，准备在阜新搞两面政权，然后举行军事起义。后来，也得到了刘昆，黄永德同志的有力帮助。因而，杜聿明始终没有发现我要起义的真凭实据。

1947年初，中共地下党湖南省委负责人周里同志，又派来中共党员周太暄、陶涛到阜新，帮助我们作起义工作。同年3月，杜聿

明认为我在阜新不利于“人和”，所以他把驻在凌源、平泉附近的八十九师调往辽东作战，令我率八、九两团（七团已在凌源）去凌源守城和维护锦州至承德的铁路交通。我离开阜新时，县长职务由秘书主任杨明清代理。阜新地头蛇仍不放过我，竟向北平、天津报纸投稿，说我带着两个团投降了八路军。杜聿明见报后，摇头大笑，因为我是执行他的命令去凌源的。

1947 年 5 月 1 日，是国际劳动节，我终于在我党的地下工作者的帮助下，在热河党组织，以及我党在热河地区的十六旅部队的支援下，率部起义成功了。这是杜聿明没有想到的。从这时起，我与杜“分道扬镳”了。

我起义后不久，给杜聿明写了一封长信，大意是说：“我在国民党军队中工作，你是我的知己上级，按照旧的道德观，‘士为知己所死’，我应当终生追随你。但是，现在你忠于蒋介石，而蒋是劳动人民的死敌，也就是说你与人民是对立的。我不背叛你，就要背叛人民，在真理面前，我选择了前者。你对我个人的照顾、帮助，我不会忘记。但我要忠告你，现在国共两党的战争，国民党蒋介石虽有装备精良的几百万大军，想在 3 个月或半年里消灭小米加步枪的八路军，这只能是妄想。因为得民心者昌，失民心者亡。你在东北指挥的国军，在 1 年又 5 个月内，不是已被八路军消灭了 4 个整师（二十五师、八十九师、一九五师、云南部队一个师），还有其他几个师的各一部分吗？然而，你消灭了多少八路军呢？国民党军队的高级将领，多数是贪污腐化又无能，打仗怕死，像你这样清廉、精明能干的实在太少。我早在抗日战争中，就认识到蒋介石领导的国军绝不会有好下场。我希望你悬崖勒马，及早回头，那时我们见面，会有说不尽的喜悦。我国劳动人民也会欢迎你，而你的英明也会流芳百世。为蒋家王朝效力，替蒋介石卖命，只能是遗臭万年。”

我起义进到解放区后，我湖南老家有人给杜聿明写信，询问我在东北的下落。杜回信说我在热河凌源与八路军作战，被八路军俘

虏了。其实，当时蒋管区的天津、北平报纸已经刊登了“韩梅村率部投敌”、“韩梅村确已降共”。解放区的报纸也刊登了我反蒋通电和反蒋文章。新华社还发布了我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消息和新闻记者访问我的特写。但这些都被蒋区封锁了。

1947 年冬，杜聿明在东北指挥的军队已达 30 万人(八个军及 10 多个机械化团)。我军也由 10 万发展到 30 多万，并由战略防御发展到战略进攻。杜聿明此时精神颓丧，身体又多病，不能支持东北局面。他只好向蒋介石要求派人接替。蒋介石同意他到南京就医，派参谋总长陈诚到东北接替，并由战略上的重点进攻改为缩短战线，重点防御。但陈诚也在东北招架不住，蒋介石又派卫立煌接替。

1948 年秋，蒋介石批准杜聿明去美国治病，顺便送他的大女儿杜致礼去美国留学。船票都订好了，但是杜又临时改变，留在上海养病。蒋介石当了国民党政府总统后，又滥发钞票，导致通货大膨胀，物价又大涨，人民生活更加痛苦！这时东北战局更加剧烈，国民党 30 多万大军损失近半，蒋家王朝已面临覆灭。杜聿明病情稍好，又自告奋勇地出院，带病投入东北辽沈战役，拼命保护蒋家王朝。他以“东北剿匪副总司令兼冀热辽边区司令官”的名义，亲率阙汉骞等 3 个军到葫芦岛登陆，企图支援困守锦州的范汉杰。在他刚到葫芦岛时，锦州已为我军攻陷，范汉杰被生俘，他又指挥反攻。这时我任东北民主联军冀热辽军区独立第六师师长，任务是占领锦西县西南的砬子山。一方面是破坏山海关至锦州的铁路交通，另方面是向锦西、葫芦岛之敌严密警戒。这是我率部起义后又和杜聿明在战场上兵戎相见。

根据当时的情报，我清楚地知道杜聿明就在我对面。我当年的知己上级指挥着阙汉骞军以二个师向砬子山猛攻。当然，杜聿明也应该清楚，守砬子山的指挥官是他当年的亲信。

战斗十分激烈，也十分残酷。阙军两个师至少伤亡 2000 人，我

师伤亡也近1000人。我十六团还进行了反击，团政委刘云辉同志负了重伤，还牺牲了一个营长。

辽沈战役结束，东北境内的“国军”除五十二军之一部从营口乘军舰逃窜，其余没有起义的部队全被消灭。杜聿明也只好从葫芦岛逃到北平。后来我听说，他在北平时正逢下雨，杜聿明也十分伤感地说：“东北的失败，天都在流眼泪。”

同年冬，杜聿明又当上了徐州“剿匪”副总司令。淮海战役中，总司令刘峙离开了总部，杜聿明全权代理刘的职务。由于他坚决反共、反人民，被公布为战犯之一。

淮海战役结束，杜聿明被俘。从此，他开始了漫长的改造生活。

杜聿明被特赦后的交往

从杜聿明的职务、罪恶、顽固态度看，改造的时间很短，1959年，他被特赦了。

党和政府组织被特赦人员学习、参观。1964年春夏之间，他同回国不久的夫人曹秀清，还有其他原国民党的高级军官和伪满军政人员（其中有溥仪）来南昌观光，住在江西宾馆。省委统战部负责同志打电话找我说：“杜聿明下车提出要求，想见你。”当时我感慨万分。说心里话，无论他被俘、特赦、观光的消息，我都十分注意。不过我率部起义2个半月后，经上级批准，已成为一名中共党员。当时面对杜聿明前来观光，我受“左”的思想影响，唯恐怀旧之情爆发。他特赦后，我们一直没有书信及会面的来往，尽管我暗暗有些想法，也常常压下去。所以，我在电话中问：“组织上有什么意见？”省委统战部负责同志答：“同意会面。”

我到江西宾馆，分别了17年的朋友总算见面了。一见面，他就说：“雪庵（我的别名）兄，你真有先见之明，我是悔之晚矣！”我紧紧握住他的手，说：“爱国不分先后，你现在已走上爱国之路，祝福你工作、学习愉快，健康长寿。”

坐下之后，我们开始叙旧。我问："我到解放区后，曾给你写了一封信，不知收到否？"他摇头说没收到。我把那封信的大意讲了一遍。他说："你那时写信劝我回头，我会置之一笑。蒋家王朝快要崩溃的淮海战役中，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给我写信，劝我回头，要我起义，我都没有回头，我那时被鬼迷了心窍啊！"说时他心情十分沉痛。

他又问我："你早就是共产党吧？"我说："不是！在抗日战争时离开五十二军后，才认识了几个共产党人。随你到东北，以至到阜新任市长、县长、三支队司令，都没有加入中共组织。如果你那时认为我是共产党员，或是我在给共产党工作，你是否会杀掉我或把我关押起来？"他回答得很坦率："这就难说了。那时如果发现有真凭实据，我不杀你，蒋介石也不会饶恕你。"我们都笑了。

在谈话中，他又想起曾经说过我的鼻子向"左"歪。我们还谈了他和关麟征爱讲封建迷信故事。他还谈到一件事，他说："1935 年春，关麟征枪毙赵永善营长时，认为你也是中共地下党员，要关押你。当时你正在帮助我办学生军训，我不同意，主张派人调查，后来查无实据"。我说："谢谢你救了我"。

谈到东北时想起，当过五十二军军长梁恺的事，他的夫人曹秀清插话说："梁恺于 1949 年在湖南随陈明仁叛变后不久逃到香港，接着到了台湾，现在台湾定居。"杜聿明用手指头推他的夫人，急着纠正说："陈明仁在湖南是起义，不是叛变。"我当时笑着说："杜夫人从美国回来不久，她不熟悉新中国的口语，不能见怪。"我又问他们的生活、工作、旅游、观光等等有无困难，要不要我帮忙？他说："上级组织对我们的衣食住行安排得很周到，工作、学习的比例恰到好处，对我们的关心、照顾都十分好。"他说："这次到南方参观，也是一次很好的学习，不过国家花了不少钱，内心有点不安。"

他十分赞赏共产党真有办法。他说："我参观了不少地方，旧中国的污泥，已一扫而光"。他深有感触地说："过去许多小国都欺负

我们，而国内军阀又连年混战，闹的民不聊生。现在我们国家站起来了，内乱也绝迹了。我多年的戎马生活，说良心话，不是为了升官发财，而是想救国救民。但我走错了路，成了国家、民族的罪人！现在我只有争取在有生之年，多做点有益于国、有益于民的工作，其中包括台湾回归祖国的工作。"在谈到他此时的心情时，他说："心情很愉快，只是我们的几个儿女有的在美国，多数在台湾。只有我们老两口在一起生活，感到有点孤独。"在近两个小时的谈话中，我觉得他完全变了，不是过去在东北那样体弱多病，沉默寡言，而是面色红润，高谈阔论，内心充满喜悦的神情。

我至今感到十分遗憾的是：他离开南昌去湖南观光时，我没去车站送行。因为他们这个观光团，我认识的有好几位，当时怕自找麻烦。以后十多年我没去北京看望他，也没和他通过一次信。

1980 年 10 月，我去北京小住，特意到全国政协去问清了杜聿明委员的住址。我同老伴张剑云同志到崇文门外杜的住所去看望他们老两口。一见面，他们夫妇对我们十分亲热，因为剑云同志很早就和杜夫人曹秀清相识。他们住在一栋高楼上，有四屋一厅，室内布置很讲究，家具很整洁。我们在谈话中曾谈到当年关麟征在古北口负伤的事，在谈到关喜爱重用陕西老乡时，杜说："关麟征重用陕西老乡，但他却不欢迎我这个陕北佬"。因为他遭受过关的排挤。

在谈话中，我看到他客厅墙壁上贴有"医嘱：来客请不多说话"。我们坐了一小时就要告辞，他们老两口却十分热情挽留，并叫保姆上街买了许多菜，其中有一串活螃蟹。我们吃过午饭后才走。

没想到，我曾经敬佩的老上司，经过分离、敌对，又两次交往，这次竟然这样匆匆又简单的永别了！

对卫立煌的片断回忆

姚国光

1946年5月，我任国民党东北军运指挥所军委一阶服务员(上尉)，在参谋室主抓稽查参谋工作。一个偶然的机会，经该所少将指挥官牛月村引见，我认识了卫立煌。

1948年，我除随卫立煌到铁岭、新民两地视察外，还参加了他亲自领导的“铁甲列车督导小组”和“葫芦岛飞机场工程处”的工作，使我有机会知道一些关于他的情况。

铁甲列车装修和被歼

为确保沈阳、山海关铁路沿线畅通无阻，陈诚任东北行辕主任时，就召集东北军运指挥所指挥官牛月村，铁甲列车第三大队长徐××、行辕作战、交通两处长，九十兵工厂厂长、东北机车车辆厂厂长研究，在原铁甲列车第三大队的四列铁甲车的基础上，加紧赶修一列新型的、杀伤能力强的铁甲列车。1948年卫立煌到任后，对此颇为欣赏，在东北军运指挥所召集一次上述人员参加的会议，决定设铁甲列车督导小组主抓装修工作，限于1948年7月交付使用。经过多方努力，这列新的铁甲列车终于在1948年7月中旬装修完毕。7月末，由卫立煌检阅试车、试炮演习，地点在沈阳东旧站的山沟里。我也参加了这次演习。试车、试炮结果，性能良好。卫立煌对新设计的机枪射击孔改为轴承90度射击面的创造，倍加赞赏，在演习结束后与大家合影留念。8月中旬，东北军运指挥所接到卫立煌的命令，决定新修的一列铁甲列车进关。一是检验长途运输性能，更主要的是借机请功索款。

8月中旬的一天，一列铁甲列车由沈阳发车了。孰料途经大虎

山车站，就被埋伏在那里的人民解放军围歼。前后铁轨被拆，真是欲进不能，欲退无路。在解放军猛烈炮火攻击下，铁甲车上子弹被打着了，火光冲天，死伤惨重，跑下车的官兵乖乖地做了俘虏。

卫立煌得悉后，暴跳如雷，电话通知牛月村严查泄密者。几经调查也未找到，一直是个谜。1955 年“肃反”时，我才解开这个难解之谜。原来是东北军运指挥所上尉译电员李星，他是共产党派进东北军运指挥所的地下党员。一电双发，岂有不失密之理。

葫芦岛飞机场的两位“乘客”

葫芦岛飞机场修建工程是陈诚任东北行辕主任时决定的。为了保密，命名为锦州铁路管理局葫芦岛飞机场工程处，并指派孙源楷任该处处长，除调用大批铁路工程人员外，就地又招用了近数千名民工，组成 4 个作业区，轮番作业，日夜赶修，工程进展较快。卫立煌到任后，对此更加重视。为了加速工程进度，于 8 月末决定调牛月村任锦州铁路管理局长。其实，调牛任局长是虚，监修飞机场是实。牛是军人出身，和工程人员没有裙带关系，工程处人人畏惧。飞机场跑道工程终于在 10 月上旬基本竣工。这时，塔山战役进入激战阶段，沈阳、锦州即将解放，沈山铁路已全部中断。飞机场全部工程人员已迁到工程车上办公、食宿。因员工家属均在锦州，交通中断信息难通，个个忧心忡忡。当时都盼着快点解放，好与家人团聚。

10 月 23 日午后，国民党五十四军在工程车周围和通往港口的道路上，布满了大批哨兵，戒备森严。傍晚，才知道是卫立煌到了葫芦岛。当此沈阳战事紧急之时，卫立煌亲临葫芦岛是何用意，多不理解。24 日清晨，飞机场上忽然降一架小型飞机，有人说是试验跑道的，大家都信以为真。谁也没有料到，这架飞机载着两位“乘客”，一是卫立煌，一是孙源楷。就在沈阳解放的前 7 天，飞往关内去了。卫立煌出任东北“剿总”仅 8 个月。

（作者系民革承德市委秘书长）

戎马生涯举义旗

李丙东

一、投笔从戎　奔赴抗战前线

1937年夏，我在河南省扶沟县吕潭镇吉鸿昌将军创办的中山中学毕业后，到河南开封报考省立第一高中。当时，抗战的烽火正向全国蔓延。日本帝国主义的飞机，不时窜入开封上空，撒传单、投炸弹。城里的居民不论白天夜间，常常在防空警报器的吼叫声中，向城外逃奔。市民们惶惶不可终日，工厂不能正常生产，商店不能正常营业，学校也酝酿着迁往豫西山区。在这国难当头，民族危亡之际，中华男儿，当何抉择？我遵循学校老师"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教导，毅然投笔从戎，于当年12月考入原属西北军建制的二十六路军干部训练所(以下简称干训所)，踏上了抗日的征途。

1938年9月，我在湖北省安陆县干训所毕业后，被分配到国民党三十军三十一师连队里任下级军官。在抗战期间，随部队在河南、湖北两省境内，同日寇作战。

1938年10月，武汉保卫战失败后，我随军撤至老河口、邓县一带整训。1939年开赴荥阳、汜水以北，担任黄河防务。旋赴唐河、新野，阻击来犯南阳之敌。1940年至1942年间，先后参加了桐柏山战役和襄阳、樊城、钟祥、宜城等地的战斗。1943年夏，由河南新野开赴湖北宜昌三斗坪以东地区，担任长江石牌要塞前哨阵地的防务，同盘踞宜昌南岸鸡冠山的日军相对峙，先后同敌人大小战斗10余次。在那战火纷飞、物资条件极端艰苦的岁月里，我曾立下了这样的誓言："宁死不当亡国奴，不打败日寇不还乡。"

二、与人民为敌　被俘蒙受优待

1945年8月，听到日本帝国主义无条件投降的消息后，犹如春雷贯耳，举国上下，万民欢腾。全军放假3天，杀猪宰羊、举杯痛饮，尽情欢唱，庆贺胜利。当时，军队中的同僚挚友们一致认为：抗战胜利了，将要复员还乡同亲人团聚了；饥寒交迫，流离失所的沦陷区同胞，将要重返家园同亲人共享太平生活了；饱受战火摧残的祖国，也将休养生息走向繁荣富强的康庄大道了。但是，严酷的历史事实，使人大失所望。

1945年9月，三十军奉命由湖北宜昌开赴北平（北京当时叫北平）受降。10月间进抵郑州附近时，据说，由于河北境内平汉沿线均系解放区。如何去北平？当时，北平绥靖主任孙连仲主张，部队乘火车沿陇海路到连云港，再乘轮船到塘沽，然后开往北平。但那时蒋介石的嫡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胡宗南，则执意让部队沿平汉线北上，在解放区的冀南、冀中打开一条走廊。

1945年11月间，当部队向漳河以北进抵磁县以东地区时，受到解放军的分割围歼，全军损兵折将万余人，其余突围撤至汲县、淇县一带整编，一直到1946年6月。此期间，由国民党、共产党和美国三方组成的当地军事调处小组在新乡进行和平谈判。当时，同我在一起的中、下级军官，对和谈均十分关注，时常不约而同地进行议论、猜测和争辩。大多数军官认为：抗战8年，个人吃尽了苦头，同胞付出了巨大牺牲，国家遭受了严重损失。但是，抗战是为了国家的独立和民族的生存，付出再大的代价，也在所不惜。而现在如果再进行中国人打中国人的内战，只会给中华民族造成更加深重的灾难。因而，殷切地期望和平早日实现。但是一些政工人员如雷振川、吴洁安等人透露说，上级政工会议上讲，现在同共产党的谈判是一个策略问题，停战是不可能的。同时，根据当时谈谈打打、打打停停和边谈边打的实际情况，对和平能否实现，仍是半信半

疑。

1946年6月，和谈终于破裂了。7月，三十军奉命由驻地乘火车经郑州、洛阳，开往潼关截击南渡黄河向伏牛山方向转移的解放军。正式揭开了三十军反共、反人民战争的序幕。

1946年秋至1948年秋，三十军先后参加了晋南中条山和晋中浮山、临汾等地的战斗。后由临汾空运西安，又参加了陇东战役和铜川、澄城等地的战斗。

1948年8月，三十军又奉命派遣一个加强师（二十七师全部和军部一部），由副军长黄樵松率领空运太原，加上已由临汾退到太源的三十师一个团共1万人，支援危在旦夕的阎锡山。当时，我在二十七师八十团一营任少校副营长。

1948年9月29日，我奉命率领步兵三连和迫击炮、重机枪各一个排，接替阎锡山部队防守的东山小窑头阵地，上级下了死守的命令，不成功便成仁，后退者杀无赦。在我接替防务的途中，亲眼看见打着黄色缎子旗，上面绣着“督战队”三个大黑字的督战队。原来，这个阵地是太原东线前沿阵地的突出部，居高临下。据说前二天曾为解放军所攻占，昨夜由阎锡山的部队刚夺回不久。阵地距解放军的前沿阵地仅有四五百米。接防后，不断有零星炮弹打来。形势非常紧张。

当日下午4时许，解放军以三倍以上的兵力，在炮火掩护下，分东、南、北三路向小窑头阵发起反攻。激战不到一小时，阵地即被突破，双方在阵地上展开了白刃战。营指挥所四周，响起“缴枪不杀”的喊声。当时，我一是慑于军令，二是长期受国民党欺骗宣传怕解放军捉住活埋，曾举起手枪顶住头部太阳穴，企图一死了之。但是又想家有老母妻子，无依无靠，如果冲杀出去，或有一条生路。随即率领营指挥所人员，冲出指挥所。但尚未跳出堑壕，一颗手榴弹落在身前爆炸，左大腿根部受伤，不能行动。解放军立即逼近高喊：“缴枪不杀”！当时，我灵机一动，将手枪扔出壕外，或死或活，听天

由命吧。只听战士急问："你是个什么官？"我照实直言："副营长。"战士立即连呼："班长！把他们的营长捉住了！"料想不到，当他的班长跑来后，竟安慰我说："不要怕，我们优待俘虏。"随即让战士将我架出壕外，又叫来一副担架，将我抬着，匆匆下山。顿时，阎锡山的炮弹，疯狂地向阵地打来，担架的前后左右都落下炮弹，担架员们也随着炮弹的爆炸声，时而卧倒，时而前进，直至深夜，将我抬到解放军第七纵队司令部的一个窑洞里住下。当夜，思绪万千，未能安眠。

次日一早，来了一位像是首长的人，安详地询问我的伤势、姓名、籍贯、经历和职务，并自我介绍说："我叫晋夫（别人称他参谋长），河南洛阳人，也曾在开封省立第一高中上过学。"既是同乡，又是同学，所以越说越近乎。后来，他又问我太原的情况，三十军的兵力、部署、士气、伤亡情况和各团长的姓名等。我都一一如实地讲了，他很满意。最后他说："你先到寿阳华北机动总院疗伤，今后有机会再去看你。"并让警卫员取来一条飞马牌香烟送我。从此，我原来的恐惧心理，一变而为感激和崇敬的心情。没想到一个同人民为敌的人，被俘后，立即受到了优待。

以后，我才知道，晋夫同志就在我们相会不久的 11 月间，曾做为解放军太原前线指挥部的代表，化装潜入太原，同三十军副军长黄樵松共同协商与策划起义大计。在预定起义行动的前几个小时，因被三十军二十七师师长戴炳南向阎锡山告密而失败被捕，后同黄樵松一起用飞机押送南京，遭受残杀。现在想起晋夫同志来仍引起我对他的深切怀念和敬抑。

三、伤愈出院　被送太谷处理

华北机动总院寿阳分院郭家村医院，设在一个三进瓦房大院里，院内青砖铺地，平整而清洁。院方把我安置在后院西屋里，同解放军伤员共同睡在一个热炕上，同他们享受一样的待遇。一日三

餐，早饭是小米粥炒豆芽菜，中晚饭是馒头花卷，豆腐猪肉熬白菜，并经常调剂改善。每月还发给1元边区票，买些牙膏牙粉等日用品。医护人员，人人穿着一身灰色土布棉衣，不论白天夜间，伤员吃药、打针、拉屎撒尿，均不怕脏累，精心护理，但他们吃的却是小米干饭白菜汤，从不吃伤员的细粮细菜。每一病房里，还从伤员中推选一名宣传员，每天向伤员读报，宣传时事政策。

日复一日，我逐渐同伤员们熟悉起来，他们都称我"李营长"，夜间睡不着觉的时候，他们让我给他们讲故事，我也好奇地同他们拉家常。在同他们的接触中，使我了解到他们的情况，懂得了许多革命道理。他们有翻身求解放的强烈要求，他们不是被抓当兵的，而是披红戴花、敲锣打鼓、自愿参军的。他们具有团结友爱的深厚感情，他们有自觉的革命纪律，他们有艰苦奋斗、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我看到好几位伤没有全好的战士，要求出院上前线，天天同医生泡蘑菇。

10月中旬，医生根据我的伤情，决定手术取出弹片。手术室设在东屋正间，四周和顶部围着白布幔帐。手术台是由3张方桌拼对而成的，上面铺着一条缴获的美制花漆布，旁边放着一个红腾腾的木炭大火盆。手术是由一位苏联顾问亲自操作的。这也可能是对我的特殊照顾吧。当时，麻醉药品不多，绷带都是用白土布制成，第一次用后，洗涤和笼屉蒸煮消毒后再用，如此，反复多次。

手术开始了，手术台围满了白衣战士，只听刀剪声咔吱咔吱地作响，我拿出关羽刮骨疗毒的精神，咬紧牙关，握紧拳头，竭力配合医生手术。大约半个多小时，手术顺利地完成了。为了固定上体和左下肢，促使伤口早日愈合，由左膝盖往上，一直到腹部，打上了一个整体的石膏绷带。这样一直而部朝天，竖身直躺了近4个星期。此期间，用药、拉屎撒尿，均由一位年轻的矮身材的女护士料理。她整天不厌不烦地，忠诚地执行着党的优待俘虏的政策，这是多么难能可贵的高尚品德呀！

12月底，伤口全部愈合了。经过短期锻炼，就能丢掉双拐，独立地行动了。这时，总院决定，派人将我送往太谷十八兵团办事处，听候处理。我一听"处理"二字，心中又嘀咕起来：处理是不是活埋？不会吧？既然要活埋，又何必给我治伤。难道治伤是一回事，处理又是一回事吗？咳！不管怎样，三十六计，走为上策。我在步行去榆次的途中，这样的盘算着。

当时，太原的飞机，不时来解放区轰炸扫射。解放区同蒲线上的小火车，只能夜间行驶。听说，火车已通到灵石了。当火车快到太谷站时，我乘押送我的两名战士不大注意的时候，偷偷地钻到座位下边，妄图溜之大吉。

太谷车站到了，战士连声呼叫："李营长！下车啦！"我摒住气纹丝不动，妄图侥幸过关。忽然同我坐在一起的老乡说："同志！这个座位下边躺着一个人，是不是他呀？"我一听，糟了，便急中生智地假装睡觉初醒之势，一边打呵欠，一边问到站了吗？就这样，我们一同下车住下，第二天一早到达了目的地。

到了十八兵团太谷办事处，我才知道这里都是被俘军官，有从太原外围作战被俘的，也有刚从济南被俘来的。办事处负责人给我讲，党的政策是愿留则留，愿去则去，去者发给路费。这时，我恍然大悟，啊！"处理"原来是这样。由于我的母亲和妻子都随军留守西安，思家心切，所以要求马上放我回家。负责人说："西安距此遥远，如现在就走，途中正赶上过年，派饭雇脚，都不方便。"劝我春节过后再走。既然如此，我只得焦急地盼望着春节的早日来临。

四、重返榆次　故旧忠言相告

1949年1月中旬的一天下午，我正在同一个屋子里的被俘军官商议着南下回家的路线，突然办事处来人通知，让我带上行李，立即到办公室去。我简直高兴极了，同屋的人都为我祝贺："老李提前放啦！""老李！祝你一路平安"。我匆匆忙忙地整好小包袱，同来

人一起来到办公室。只见办公桌旁坐着两位负责人，旁边站着一位身佩驳壳枪和子弹袋的战士，心中不由地扑咚扑咚地跳起来。我想：这难道真的要“处理”我吗？

进屋站稳了脚，负责人和颜悦色地向我说：“李丙东，兵团司令部来人，让你到榆次走一趟。”

“回榆次？不是答应我过了年就放我回家吗？”

“你到兵团，可能问你一下太原的情况，然后再回来。”当时，我实在一步也不想往北走，因为越走离家越远哪。但是，现在也不能由自己的便啊。我又恳切地请求说：“首长！问过情况回来，可一定让我回家呀！”

“一定！一定。”负责人爽快地说。“老李，就这样办吧！这位警卫员同志是来接你的，天不早啦！现在就跟他一路走吧。”

我同警卫员走到太谷火车站，警卫员说：“火车半夜才能到呢，咱们到戏院看戏去吧。”

“看戏?！咱们能进去吗？”

“能！戏班是我们警卫营的。”天哪！我这时哪有心思去欣赏那音乐优美、唱腔动人的晋剧啊！

到了露天戏院，警卫员给我搬来一条长板凳，我俩坐在后排正中央。不大一会，他又给我买来了一大碗煎凉粉，说啥也让我吃。我边吃边想，到底去榆次是好事还是坏事呢？去了之后，是否还能回家？

戏散了，火车也快到了，冬夜的寒风，一阵阵地刮来。这位警卫员同志竟主动热情地脱下自己的棉大衣给我披上，我再辞不允，心中一股热流，对这位警卫员产生了无限地敬仰和友情。

到榆次下车后，警卫员将我领进警卫班住处，悄悄地让我睡进刚去换岗的一位战士的热被窝里。两旁躺满了鼾睡的战士。我在被窝里翻来覆去，不能入睡，每一次换岗，我都清清楚楚。心想，是凶是吉，单等天亮，即可揭晓。黎明时分，我真的睡熟了，梦中忽然

听见有人呼叫“李丙东在哪?李丙东在哪”的声音,当我惊醒跃身坐起来的时候,两只大手,有力地按着我的肩膀,又将我推进被窝说:“快躺下！快躺下好好休息休息。”说罢,这人就转身而去了。

当时,天已经大亮了。战士们都在围着脸盆洗脸,我止不住地问道:“同志,刚才来的那位是个什么人?”

战士回答:“杜高参,杜参谋长。”我心想,啊!杜高参,他怎么会认识我呢。随之,我也起床洗脸。

半小时过后,杜高参又来了。一进门就大嗓门说:“李丙东,你起来啦！你认识我吗?”

我上下打量了一番,这人中等身材,黑红的脸盘,宽大的肩膀,穿着一身灰色棉军服,腿上打着绑带,脚上穿着一双黑布棉鞋,面孔含笑而严谨,我说:“我看着面熟,姓名记不清了。”

“我是杜绍先哪!”杜绍先？我仍沉思地想。

“杜绍先就是杜老师呀!”

“啊!杜教育长,我记得,我记得,你在三八年干训所时,曾登台演过京剧呢。那时,我们学员都不叫你教育长,都称你杜老师是不是?”

“对了！对了！还是年轻人记性好哇!”

“这回我可遇见老长官了,可该让我回家了。”

“回家？好说,好说,走吧！到我的住处去吧!”

杜高参单独住在一家老乡的西屋里,靠墙有一个小火炕。进屋尚未坐稳,他高兴地说:“高树勋司令员到总院找你两趟也没找着,前些日子听总院说,你到太谷办事处去了。所以,今天才把你请来,咱们师生,好好聊聊。现在咱们去吃早饭罢。”

饭桌设在兵团敌工部部长刘玉衡住的外间,杜高参均一一做了介绍,刘部长上前握手说:“欢迎！欢迎!”。从这天起,我就同他们一齐吃小灶,并同杜高参睡在一个炕上。他开始给我进行了真诚而耐心的政治思想工作。

开始，他询问我自1938年干训所毕业后的经历。由抗日战争到太原被俘，由个人的情况到三十军的情况。他也主动地向我介绍了他的经历，是怎样离开二十六军的，是如何跟高树勋一块起义的，共产党对起义人员的政策和自己起义后的感受等等。俩人一见如故，又说又笑，毫不见外。

后来，他问我今后的打算。我说："抗战抗了8年，早就想回老家了。现在打内战，实在并非所愿。我想，今后国民党我是不干了，但是，共产党我也不干，还是回家为民，当个安分守己的老百姓。"

"当谁的老百姓?！不当共产党的老百姓，就当国民党的老百姓，第三条路是没有的，当前的国家局势，不介人也得介入。过去，稀里糊涂，还差一点送了小命，死了也是人民的罪人。现在，应该清醒了，应该选择自己的正确道路，为时还不晚嘛。我的意见，你还是回太原去，劝劝咱们的老同事、老同学让他们悔过自新。一是尽到友谊之情，二是为人民立功赎罪，前途还是无量的。"

"回太原?！我不去。太原是死城一座，我现在既然出来了，决不愿回去死在太原。"

杜高参看我思想不开窍，就同我一起学习《目前形势与我们的任务》、《将革命进行到底》等文章，还领我到榆次展览馆，参观解放战争发展形势图。这样白天讲，夜间躺在炕上也讲。从孙中山推翻清朝，讲到北伐战争；从5次"围剿"，讲到抗日战争；从和平谈判，讲到解放战争；从全国讲到华北、讲到太原。一句话，全国一定会解放，只有全国解放了，才有人民的幸福，才有家庭的幸福。忠言谆谆，真理昭昭，仁至义尽，大义难却，我确实有点动摇了。我问道：我回太原能做些什么工作呢?

"工作有的是，并且很艰巨。要看势行事，量力而为。如能策动全军起义，当然更好。如果不行，一个团、一个营、一个连、一个排、一个班都可以。不能策动起义，能说服他们最后解放太原时，不要进行顽强抵抗也行啊！"

"回太原要通过封锁线的地雷区,不被地雷炸死,也可能过去后被阎锡山的清训队杀死呀!"

"这不要紧,通过封锁线前,我们前线先派人拆除地雷。回去的地点,我们选在三十军的防地就行了,他阎锡山是不会向三十军要人的。"

当时我想,回家既然无望,回太原凶多吉少,反正自己已是九死一生的人了。同时想了又想,三十军的营、团长,大部分是我的同学或老上级,估计他们也不会把我怎样。为了不负杜高参的期望,经过半月之久的思考,才下了回太原的决心。

五.送返太原　劝降师长仵德厚

1949年春节前夕,我从榆次出发了,临行前一天的夜晚,当我睡下后,杜高参将他写给三十军军长和团长的4封策动起义的信件,让警卫员缝在我的棉裤腿里。次日早晨,敌工部刘玉衡部长,还给我准备了丰盛的便宴饯行。他说:"回去告诉三十军军长戴炳南,我们总攻太原的日子不长了,还是早下决心为好,到时候如果仍不投降,我们就坚决消灭,从严惩处。"我连声应"是"。

吃过早饭,敌工部给我备了一匹白马,派了一名警卫员,护送我到了太原前线第七纵队司令部,住在随高树勋起义的陈春荣军长的住处。陈军长的爱人还包了饺子,共度除夕。次日,会见了侦察科长李毅同志,商议通过封锁线的时间和准备工作。

当时,太原前线,两军对峙,双方都在开展政治攻势。据说,解放军经常同对方哨兵对话,在送递传单的同时,还给他们送些馒头、鸡蛋、熟肉和红枣等食品,双方很少接火。

1949年2月1日,解放军前沿防地排除了通道上的地雷。午夜时分,我由7纵队派出的侦察排护送至两军阵地中间。我站在结了冻的雪地上大声喊道:"喂!不要打枪!我是八十团李副营长逃回来啦!"停一会又喊。三声之后,只听见对方应声问道:"你是八十

团的吗？”

“是的，一点也不错，我是偷跑回来的。”

“好！你站那甭动，前面有地雷，我领你过来。”我隐隐约约地看见有两个士兵走过来，一位士兵低声而短促地说：“转过身去！”尔后，用毛巾围住了我的双眼，并从上到下搜身后，拉着我的手，小心翼翼地引进前哨碉堡里。解下头下毛巾，让我坐下。我说：“这回可到家啦！你们是哪个团？连长是谁？”他们都一一做了回答。这时，我才知道这是三十军二十七师七十九团的防地，连长是我的老部下张乃谦。他们立即打电话报告了连长。约半个小时，连长来到哨所，我们相互寒暄了几句，一同到了团指挥所。

该团团长孟宪斌和副团长吕锡爵，是我在干训所时的区队长和区队副。见我回来，头一句话就说：“丙东！你的追悼会都已开过了，料想不到咱们今天又见面啦，庆幸！庆幸！”接着又问：“你在那看见杜老师没有？”

“就是他放我回来的，他还给你们写了信呢！”

“信在哪？”

“在我棉裤腿里缝里呢。”孟团长立即让他的传令兵到军需处给我取来一套新棉衣换上。然后，用剪刀拆开换下来的棉裤，取出信件。团长和副团长俩人，警惕地靠在蜡烛旁展阅。然后说：“杜老师年前还来阵地上喊话呢，他怎么样？他在那自由吗”？

“他在那很自由，很好，解放军都称他杜高参，天天吃小灶，身体很健壮，满面红光。”我接着问道：“老队长，您说我该怎么办？可不能把我送到阎锡山的清训队去呀！”

“阎锡山还管着咱们？睡吧，等天亮了送你到师部去。”

在团指挥所用过早饭，他们备了一匹日本大红马，派人带着加了封的全部信件，送我到了师司令部。在师部见了师长仵德厚，他什么话也没有说，信也没有拆看，就派人把我和信一同转送太原城里军司令部。

到军部，首先会见了办公厅处长马效援。他拿着加封的信件去上房军长戴炳南的办公室。片刻，军长从办公室走出来，我立即迎上前去。只见戴炳南穿着一身黄呢子军服，戴着一副白手套，威严地慢声静气地问："你的伤好透了吗？"

"好了！走远道还不行。"

"是杜绍先让你回来的吗？"(杜原是戴的上级)

"是的。"

"他都说些什么？"

我当时毫无准备地如实回答："他让我给军长带好。他说解放军总攻的开始时间不长了，请军长明智，既往不咎。他还说不投降就消灭。"

军长似笑非笑地说："哼！看谁消灭谁！"接着问："你打算怎样？"

"我想回西安看看年迈的老母亲。"

"好吧，你先到军部医院休养休养，将来有机会再谈吧！"随后回过头来让马效援处长给我准备一套行李，拿 20 块银洋。回太原的"两关"就这样平安地过来了。

马处长用汽车送我到医院，安置好后告诉我："丙东，军长让你写一篇文章，登报声明一下，以清白你的身份。"一听这话，我心中又起了千重疑虑。文章怎么写呢？说共产党好吧，是要杀头的；说共产党不好吧，今后解放了太原，又怎样向杜高参交待呢？但是，不写又是不行的。随后，写了一篇"被俘见闻记"，以李旭庵的笔名，在《山西民国日报》上刊登了。其主要的内容是：解放军医院缺医少药，伤员痛苦万状，就《新华日报》1949 年元旦发表的《将革命进行到底》的社论，说是共产党对和谈没有诚意等等。

稿件交给马处长不久的一天，马处长派车到医院让我立即乘车赶赴太原西沟机场，飞回西安。顿时，心中的一切忧虑，烟消云散。但是，当汽车将到机场的途中，得知飞机降落时，由于解放军炮

击机场，驾驶员惊慌失措，飞机连人一同撞在机场一座建筑物上坠毁，我只好高兴而来，败兴而去。

自从我到医院后，同事、同学们都前来探望。我将被俘后的真实感受和看法向他们讲了，他们对太原的前途也是悲观失望，但谈到前副军长黄樵松起义未成而惨遭杀害的先例，他们都不寒而栗。也有的同事告诫我谈话要特别谨慎。

1949 年 2 月下旬，我奉命到了二十七师司令部任副官主任。4 月中旬，解放军相继解放了太原北郊和东郊各据点，二十七师退到太原城里，担任城墙东、北两面的防务。师部设在小北门里边天主教堂内，师指挥所设在天主教堂主楼的地下室。

4 月 20 日，国共和谈全面破裂。4 月 22 日，解放军向太原发起总攻。4 月 23 日下午，军部办公厅马效援处长乘装甲车来到二十七师师部，并拉来半布袋银洋，让分给各团，奖赏官兵，妄图鼓励士气，负隅顽抗。我随即转告商副官将款卸下，分发各团。尔后领马处长到师长休息室。马仵俩人谈约半小时，马即匆匆辞去。

马处长走后，我走进师长休息室，见师长眼圈湿润，闷闷不乐。便向师长说："师长怎么啦？马处长来此何事？"仵沉思一会说："现在灯油也快熬干了。让我接这个班，我不干。"说着又滴下了眼泪。这时，政治处处长王寅初进来了，室内的空气沉闷寂静。经过交谈，才知道昨天下午戴军长巡视东城墙时，被炮弹片击毙，军长的传令兵受伤。太原防守司令王靖国想让仵德厚升任三十军副军长。此外，解放军太原前线指挥部已发出最后通牒：限 3 天派出代表进行和谈。当时，我认为这是个大好时机，直率地向仵德厚师长说："看来，太原难保。师长要同意和谈，我愿意代表师长前往。"说后半晌，仵师长叹了一声，不言不语。这时，王寅初处长给我使个眼色，一同辞去。走到大厅，王寅初向我说："丙东，咱们相处十来年了，你办事太幼稚了，你这样冒失太危险了！实话告诉你，自你到师部后，你各处的来信，都经过我们检查，今后可要注意呀！"我点头致谢。当日

黄昏至深夜，解放军的零星炮火，断续地向城里各处试射。重机枪的曳光弹也不时地穿越天主教堂的房顶。

4 月 24 日拂晓，解放军的总攻开始了。隆隆的炮声和机关枪声，混成一片，师指挥所的前后左右都响起了炮弹的爆炸声。师指挥所里，师长、师参谋长、作战科长和我，围在电话机旁，目视灯光。师长看一看手表说："再过半小时，天就大亮了。城攻不破，今天就过去了。"话音刚落，一发炮弹落在指挥所门口。当时，我心急如焚。心想如自己不被打死，解放后见了杜高参如何说话！现在顾不得许多了，爱怎的就怎的吧！我诚恳的向师长忠谏："师长，现在我们应该为三十军的将士着想了，还是让少死一些弟兄吧！现在的唯一办法是全师停止抵抗，我愿豁出性命出城同解放军联系。这样做，保证师长的生命安全。"说完之后，师长沉思了一会，抬头向师参谋长道："(唐)冠甲意见如何？"唐当时沉默不语，我见此时此情，便斩钉截铁地说："师长，就这样办吧！"随即拿起话筒，要防守东城墙的孟宪斌团长。不料，4 条线路均被炮火打断。继而同守北城墙的王键民团长接通了电话。我说："师长命令，停止抵抗，速令全团举起白旗原地待命"。并立即派人去孟宪斌团送递书面命令。之后，亲自告诉警卫连长说："我现在出城同解放军联系，告诉警卫士兵，见解放军过来不准开枪。"安排完毕后，即率领传令兵王怀古等 2 人，手持白旗，沿城墙内侧，向东奔去。这时，机关枪子弹的呼啸声，不断掠头而过。当将行至小北门时，同解放军突击队尖兵相遇。我说明身份和来意后，即同突击部队的团王团长接上了头，并领着他们，径直奔向天主教堂师部。到达师部后，将师长等人一一向王团长做了介绍。王团长让师长马上在天主教堂院内集结部队待命，并留下一位参谋协助。

8 时左右，太原全城解放了，一声枪炮也听不见了。那时的心情是多么舒坦而愉快啊！

9 时左右，解放军参谋让二十七师集结的部队，前往城外北营

房。当我们列队经过北城门时，只见解放军部队，在军乐队的演奏中，浩浩荡荡地开进城内。

10时左右，杜高参乘汽车来到三十军的集合地——北营房。我迎上前去，将师、团长们向杜高参做了介绍。随同杜高参来的同志，一一进行了拍照后返回城里。

三十军投诚和被俘的官兵，在太原郊区住一宿，军官都集中起来，开往阳泉教导团学习。

5月上旬，杜高参又专程来到阳泉教导团，让我推荐师、团营长共12人，我为组长，乘卡车返回太原城里十八兵团敌工部住地。这时，我才将回太原的情况，详细地向杜高参和刘玉衡部长作了汇报。杜高参严肃地问我："你在《山西国民日报》上写了篇什么文章!"我说是不得已而为之。杜批评我说："什么时候也不能丧失立场啊!"刘玉衡部长接过来说："老李还是不简单啊！最后还是给人民立了大功嘛！今后会更好地工作呢!"杜又问我："你知道军长戴炳南的下落吗?"我肯定地回答："他4月22日巡视东城墙时，被解放军的炮弹打死了，他的警卫员也受了伤。"杜说："不对!戴炳南没有死，你知道他的警卫员住在哪个医院吗?"我答："不知道"杜让我给师长仵德厚做做工作，问他知道不，并说："他在太原最后表现还不错的嘛，只要他能供出戴的下落，解放军是不会亏待他的。"

我向仵德厚传达了杜高参的话，仵说："丙东，你还不清楚吗?那天马效援处长到师部，就是那样说的。事到如今，我还有什么顾虑的呢?"后来杜亲自同仵交谈，情况也是如此。

一天上午，敌工部出动了两部汽车，一大一小。小车上还拉着一位胳膊用绷带布系在脖上的人，穿着一身国民党的军服，无疑他就是戴炳南的警卫员了。另辆卡车上载满了全副武装的战士，汽车一直开到太原钟楼街阴阳巷戴炳南的小老婆潘德荣的姐姐家门口。战士们跳下汽车，门口设岗，冲进院内。杜高参和戴炳南的警卫员等人，随即进入上房中间。杜高参让戴的警卫员叫喊说："戴军

长，出来吧！杜高参来了！”喊了两遍之后，戴炳南就从中堂围着桌裙的桌下钻了出来。当他尚未站起来的时候，旁边一声叫喊：“不要动！”立即拍下了这张不光彩的照片。这时，只见戴炳南的面色苍白，蓬头散发，十分狼狈。

戴炳南站起身来叫了声“杜参谋长！”旁边又有人喊道：“举起手来！”经过搜身之后，将戴炳南腰带取下，原来上边缝藏着一些小金砖。

杜高参声严厉地问：“戴炳南！你藏起来都谁知道？”戴脱口说出仵德厚、马效援等六七个人的姓名。尔后给戴带上了手铐，押上了汽车。

后来，听杜高参说，戴在太原召开的4万人的群众公审大会上，被正法，受到了人民的惩罚。

六．进军西安　二次回到三十军

1949年6初，我等11人以随营教导队的名义，在杜高参亲自率领下，随解放军十八兵团敌工部从太原向西安进军。

我们这一班人，过去行军，人人有坐骑。到了驻地，又有勤务兵照料食宿。真是衣来伸手，饭来张口。但是，在这次长途跋涉中，人人都受到了锻炼和教育。

杜高参已是50多岁的人了，但他老当益壮，在解放军里养成了一套好作风。一路上同我们一起步行了1000余里。他本来有一匹白马，自己从来不骑，天天总是让这个骑，让那个骑，但我们怎能骑呢？所以，这匹白马一路上就成为我们共用的驮子了。到了宿营地，前站人员给我们分配了房子后，杜高参虽有警卫员，但他总是主动地帮助搭炕扫地，打洗脸、洗脚水。每日出发之前，总是问问警卫员借群众的东西还了没有，落下什么东西没有。所以，我们也都争着去干这干那，相互体贴，相互帮助。久而久之，也就改变了过去那套官僚作风了。

在行军途中，杜高参同我们都进行了反复深入地交谈。每一个人的家庭情况、思想动态、脾气秉性等他都摸得很清楚。他常常见景生情地说几句风趣话逗人，使人丝毫不感到见外。但是，在途中休整学习时，他又很严肃认真，有人迟到，不扯题，思想不集中等，就毫不客气地批评。我们先后学习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八条二十四款》等，思想认识都有所提高。

沿途使我们感触最深的是军民关系。从太原到黄河边，所经过的主要城镇或要道路口，群众都用松柏枝搭起了牌坊并设立了茶水站。有的还组织了秧歌队，敲锣打鼓欢迎解放军进军大西北，醒目的彩旗和大字标语鼓舞着每一个战士的斗志。每到宿营地，群众以各种形式表达热爱子弟兵的深厚感情。帮助烧水、煮饭、缝衣洗衣，送军鞋和慰问品等。军民之间的鱼水关系同国民党军队与老百姓的关系相比，真是天壤之别。

6 月底，到达了西安，住在城里菊林中学。不几天，我同苏廷珩、胡廷祯 3 人第一批接受了去新补充的国民党三十军策动起义的任务。临行前，杜高参再三嘱咐，并送给一些经费，还在我上衣左前襟下角处，缝上了盖有十八兵团敌工部公戳的一块白布，以备通过我方之用。

几乎没费多大周折，我们当晚就进入了国民党统治区。不论军人或群众问我们时，我们就直说是三十军的军官，从太原跑回来的。

到了宝鸡市区的大路口，看见了挂着一块黑字大牌子，上边写着：三十军军官收容所宝鸡办事处，我们都高兴起来。走进收容所，原来这里的负责人是原廿七师师部第四科科长，我的老同事王济美（河南省项城人）。他是在太原解放前夕，化装成老百姓逃回来的，现任三十军副官处中校处长。晚上，我们攀谈了很久，得知太原解放后，到阳泉教导团学习的三十军军官大多数都放回来了。王处长对国民党的局势表现悲观，对解放军的实力表示信服。

第二天，王处长以"黄鱼"的形式，给我们介绍了一辆美制军用卡车，越过了秦岭，到达汉中。到三十军军部报到后，我们3人就一同去四川昭化三十军家属留守处探望亲属去了。

在昭化住约20多天。此其间，三十军已进驻四川绵阳、德阳一带，军部住在德阳孝泉镇。8月3日，我先他们二人到达德阳廿七师师部所在地，单独住在一家中药店的后院。次日，我在师直单位看望了几位老同学。他们说："丙东，现在你的风声很大，从太原回来的军官，将你在太原所做的事，都告诉了军长鲁崇义。听说军长很生气，你要特别小心才好。"有的说，军长是咱们干训所的副所长，他对咱们同学都很爱护，咱们都是他栽培成长起来的，顶多训斥一顿了事。其说不一。

第3天下午，同学何沛然告诉我说："丙东，你赶快离开这里潜逃吧！我听说廿七师师长欧耐浓正派便衣队到处打听你的下落，当不住要抓你呀！"

潜逃，我往哪里逃？跑了和尚跑不了庙，我的家属都在这里。况且，我这次回来是干什么的呢？我反复思考后，决定：决不在此坐等他们来抓我，干脆我找上门去，豁上这半斤八两啦。

我到了师部，通过传话，走进了师长的住处。只见他半躺半坐在一个躺椅上，他的老婆在一旁走动着。

"报告师长，我叫李丙东，听说你找我？"这时，师长板着面孔，斜瞪着双眼，严厉而简短地说："鲁军长让我抓你！"随即喊来传令兵，让他把我送到警卫连去，并告诉警卫连毛连长："明天把他押送军部！"

师警卫连连长毛琦是干训所的第二期毕业的学员，所以到警卫连后，没有受到折磨，晚上还给我包了饺子吃。但公事公办，第2天他给我雇了一辆黄包车，派了2名全副武装的战士，押送我到距德阳40华里的孝泉镇军司令部。

下午2时许，到了孝泉镇东街，恰巧遇见军部副官处处长王济

美(他在宝鸡完成收容任务后返回军部的)。我立即下车,同王处长握手。王问:“这两个战士是干什么的?”我说:“是押送我来的。”王随手从衣袋里掏出日记本,写了一个收到条,撕下交给战士说:“好吧,人收到了,你们去副官处用饭吧!”随后王就让我到路北他的住宅。我说明情况后,王非常关心,为了明日安全地会见军长,他立即通知几位知心的同学,请他们共同商量拯救办法。天近黄昏,工兵团副团长苗久茂、辎重团副团长李国华、还有军长侍卫室队长杨振宇,都先后从驻地赶来。商议后,各自离去。当晚,我就宿在王济美处长的家中。

8日上午8时,同学们相继到达军长侍卫室。杨振宇队长先领他们隐藏在军长会客室北山墙角下,告他们待军长进入会客厅后,都移到会客厅门窗两侧,视听动静。而后,将我领进会客室,然后去请军长。

军长走进会客室,我心情紧张地向军长敬礼后,直立一旁。军长也没有入座,抬手指着会客厅的茶几问我说:“这是什么?”我不懂是什么意思,随答:“是茶几。”军长加重语气说:“我问这是什么样的?”

我答:“是方的”。他随后又指着圆桌问道:“这是什么样的?”

我立即会意地答:“是圆的。”

军长斯文而庄重地说:“不依规矩不能成方圆,不要吃共产党两天饭,就说共产党好!”接着又问:“你见了杜绍先吗?”

我答:“就是他让我回来的,他还让我代问军长好。”

“你认为这个人怎么样?”

“我认为他很讲情义,他对三十军的老同事很关心。”

“我问你,你知道演关云长的为什么眉头上画个曲连弯吗?”

“不知道”。

“不知道!那是变节的标记,是千古磨不掉的羞事!”

“我听人说气节是有阶级性的?”

“你中了共产党的毒啦！听说你在太原搞了不少名堂，可耻！”

我看他生气了，有些害怕，接着说：“我在太原的事，向军长认错。”

“应当很好地认错，明天给我写一份悔过书来！”

我连声应：“是！”

“你们这些年轻人，什么事也不懂，今后不准你到处随便乱说！”

“是，军长，一定不随便乱说。”

“好，你先在副官处呆着吧！”

“是。”

军长转身走出会客室，向院里办公室走去。我慢慢出来后，同学们笑容满面，弯腰轻脚，鼓着不响的掌迎上前来，拉着我的手，一同跑回侍卫室，又安慰了一番。

次日，我亲自到军长办公室，递交了一张悔过书。军长接过悔过书，一声未吭，一眼未瞧，刷刷地撕个粉碎，随手扔进字纸篓内。我见此情，连忙向军长敬了礼，急速退出。

由解放区第二次返回部队的经过，就这样戏剧性地过来了。

七. 大势所趋　廿七师光荣起义

我在军部副官处，没有实职性工作，以少校附员的名义，按月领薪。这期间，同处长王济美终日在一起，成了最要好的朋友。无事时也经常到军直机关和军直单位看看老同事、老同学。还不断同房东教师李茂林等接触谈心。

11月间，三十军奉命以廿七师进驻广水，担任陕、渝边界战略要点剑门关的防务，其余由军长鲁崇义率领开赴成都新津一带。我同王济美处长，均留在孝泉镇三十军留守处，留守处由养病的副师长王寅初和师参谋长周××负责。我又同他们加强了接触。通过接触，在建立私人关系的基础上，一方面交换对时局的看法，乘机

宣传党的政策。

是年 12 月，解放军进军西南的号角吹响了，由贺龙率领的一支解放大军，突破剑门关天险之后，一路势如破竹，直插绵阳。12 月 20 日，国民党第七兵团司令部退驻孝泉镇。留守处人员惶恐不安：是逃往附近山区，继续同解放军周旋；还是毅然起义，走自新之路，是我们私下谈论的大事。携家带眷，逃往山区，补给作战，前途不堪设想；全国革命胜利的形势已定，弃暗投明，于国、于民、于自己都有好处。经与王济美处长等人共同做工作，说服了留守处负责人，并计划以军部军士队为主力，占领孝泉镇各主要道口，出其不意，消灭第七兵团司令部，宣布起义。不料，正在筹划中，21 日二十七师相继退到孝泉镇附近，师部也驻在孝泉镇。因而，只好放弃原来计划，由王济美、王寅初、周××、还有同我一起由西安返回来的苏廷珩等人，又说服了二十七师师长欧耐浓，决定起义。

12 月 22 日，我同苏廷珩头戴礼帽，身穿长袍，以商人的打扮，携起义文件，步行去德阳前线，同解放军联系。

中午时分，我俩到达刚解放不久的德阳县城。走进北大街，只见 2 人一伍的战士，前后相隔百米左右，威风凛凛地在街上巡逻维持治安。我俩选了其中的一伍，上前亮明身份，说明来意之后，这伍战士立即领我俩到了前敌指挥部。料想不到，这就是十八兵团前线指挥部。敌工部刘玉衡部长和杜高参都在这里。我们相会后，汇报了情况，递交了起义文件，他们很是满意，让饭馆给我们做了一桌子饭菜，招待我们。

饭后，敌工部决定让杜高参随同我俩一道去孝泉镇师部，商议起义后的具体事宜。刘玉衡部长再三嘱咐我们要确保杜高参的安全。

下午 4 时许，杜高参也换上了便衣，共乘一辆刚缴获不久的中卡吉普，向孝泉镇疾驶。当汽车行驶约 20 华里时，猛然一声巨响，司机立即减速刹车停下。当时，我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杜高参怒

视着我问道："怎么回事？"急速下车看去，原来是汽车右后轮胎放了炮。杜高参严肃地命令司机说："限你半小时把备胎换好！"我们也立即插手帮助。

轮胎很快换上了，我们继续前进。在离孝泉镇不足10多里的地方，又见对面来了一队士兵，就地卧倒举枪，喝令汽车停下。我立即下车大声说："弟兄们，我是三十军副官处的副官主任，化装到前面侦察敌情去了。你们是干什么的？"一位连长站起来回答："我们是到前面村子放哨的。""啊！你们去吧，前面没有什么情况。"杜高参还让告诉连长，待一会儿汽车返回来时不要阻拦。连长应声"是"。

汽车到了孝泉镇东头竹林附近，我们下了车，杜高参让汽车返回德阳。

我们到了孝泉镇村口，师长欧耐浓、副师长王寅初和处长王济美等早在村口等候迎接，一同前往师长住处。

师长住在一个二进大院的后院东屋。杜高参休息用饭后，同师长等人交谈。我同师参谋长和王处长又检查与加强了警卫岗哨。院内门门设岗，院墙外围部署了武装便衣。当时孝泉镇各色人物云集，情况复杂，我也成为重点保护人物，外出行动，均有武装便衣随从。师长欧耐浓对我再也不像刚到德阳时那样，盛气凌人了，见我进屋又是斟茶，又是点烟。真是彼一时此一时也。

22日午夜，国民党第七兵团司令部副官处处长（名字忘记了）求见杜高参。原来此人是石家庄解放时被俘放回来做策动工作的。他说战区司令胡宗南，曾为剑门关失守一事来电责难七兵团司令裴昌会，说什么成都保卫战不能按计划实施，要裴负责任。还有其他原因，裴已决心起义。今天，他曾去德阳前线指挥部，让副官处处长同杜高参联系。向杜高参汇报后，当夜引进裴昌会同杜高参会面。杜高参告诉裴开动兵团全部电台，同所属各军联系，让他们就地集结待命。

杜高参在孝泉安置好各端要事后，即返回德阳。敌工部又派来一位杨科长，负责起义部队同解放军司令部之间的联系。我当时到各团做些安定军心的工作。后来听说，贺龙元帅会见裴昌会司令员时，风趣地说："咱们是老战友了。"关于这点，裴昌会同志该更是记忆犹新了。

八、结束语

我的这段亲身经历，说明了我青年时代，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我所走过的曲折成长的道路。从爱国思想和民族意识出发，参加了伟大的抗日战争，这一阶段从主导方面来说是无可非议的。但是，日本投降后，在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的欺骗宣传下，参与了反共、反人民的罪恶战争是后悔莫及的。在太原被俘受到党的宽大优待后，立场和思想的转变，还是缓慢的。最后所以能够为人民做了点滴贡献，是由于党的政策的英明，是党对我帮助教育的结果。同时，全国胜利的革命形势，对我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再者，第二次策动工作，也是与其他同志如王济美、苏廷珩等人共同努力才获得的。但是，有一条必须肯定：这就是起义这条路，是走对了。起义后，党对我在政治、思想、工作和生活各方面，都给以极大关怀和照顾。没有 1949 年的起义，就没有今日的幸福生活。

这篇史料，如能对读者有些启发的话，这就是我记述这篇事件的宗旨所在。

最后，还必须说明的是，这篇史料，因为相隔时间较长，有些具体时间和人物姓名都记不清了，也有的是听到的事。特别是文中涉及到一些同志，如鲁崇义先生，当我返回军部时所说的话，读者是可以理解的。我想鲁先生也一定能够谅解。可赞的是，鲁先生当时并没有将我杀害，还给了我生活出路，并且后来也在成都举起了义旗，共同走向了光明大道。

（作者系民革承德市委主委，于 1998 年病逝。）

我率队起义投诚的经过

尹永成

我原是国民党承德县警察第三中队指导员。1948年秋，在共产党政策的感召下，我率队起义，投奔了共产党，受到了解放区政府和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

这还得从我投靠国民党说起。我家住承德县岗子乡(过去为两家乡)东沟村，本是一个普通的农民。伪满时期，我被征为国兵，抗战胜利后，我回到了家乡。当时，我家负了很多的债，最沉重的是以10亩地为抵押，向大地主付国庆借款5000元。八路军来到两家乡后，开展减租减息。废除封建债务时，我父亲用边区钱去还付国庆的债，但付嫌边区钱毛，不要。第二天，我父亲找在我村工作的八路军崔主任述说此事。崔主任听了之后说："这笔债务应该废除，钱不还他了"。我父亲说："地照还在他手里押着呢?"崔主任将付国庆找来说："限你3天把地照交出来"。但3天后我父亲去拿地照，狡猾的地主付国庆却造了一张假的。我父无奈去找崔主任，崔主任气愤地把付国庆找来，训斥一顿，我家才要回了真地照，付国庆因此与我家结了仇。不久，当土改正在进行的时候，八路军开走了，国民党军队开始了对解放区的进攻。这时两家乡来了国民党的乡长，正乡长是大地主鄢玉山，副乡长是岳坤，开始了建乡和清乡。地主也闻风而起，向穷人反攻倒算。一天，岳坤拿着黑名单，把我找去训斥一顿说："你们靠八路军撑腰，用边区钱还帐这不行，限你3天把地照交给付国庆，不然小心你们的脑袋。"在这大难临头之际，我只好到承德找门路。第二天，在承德草市街遇见了我当国兵时的司务长刘汝波。刘汝波是县长的大红人，我把我家的事向他一说，他说："不

要紧，别害怕，只要你给国民党出点力，保你没事”。他把我领到国民党县政府军事科，给我开了介绍信，把我介绍到县警察独立分队充任了分队副，在高寺台西沟一带活动。就这样，我投靠了国民党。

我当了警察独立分队副以后，仍怕家里受害。于是我向队长孟庆科建议，两家乡是个好地方，扩大队伍有条件。孟接受了我的建议，便把队伍带到了两家乡。以后，因为两家乡长鄢玉山常呆在承德不回来，1947 年，又经过刘汝波的保举，我当了两家乡长。当时，整个头沟区都变成了游击区。为适应形势，国民党承德县政府将头沟、五家（现属三家）高寺台、两家等乡的自卫队合并一起，改为承德县警察大队第三中队，分为 3 个分队，80 多人。从振朋为队长，我为指导员。后来，从振朋逃往北平去了，三中队便由我一个人负责。

我虽然投靠了国民党，但我看不惯国民党的行为。当时，国民党为了补充兵源，接济粮草，到处抓兵抢粮。一天，我到山湾子去，遇见一个姓郝的老人，他家仅有的两升荞麦种被当兵的给抢去了，逼得这位老人上了吊。还有一次，我看到一中队到两家、四全地、东沟、岗子一带抓了不少青壮年，用绳子绑着，三个一串五个一串地在队伍中间赶着走，后面跟着不少老百姓，哭声不止。面对此情此景，我无可奈何，只是心酸地落泪。那时，像这样的事情到处都有，真是数不胜数。

1948 年夏季，我回到家乡，许多老乡围着我，这个说："八路军真好，他们住在咱们这，见到老百姓没吃的，他们就喝稀粥，省下粮食救济老百姓”。那个说："八路军还挨家挨户地给我们捞地”。我到家一看，我们家的地也让八路军给捞出来了，这使我很受感动。心里想，八路军为国为民真是名不虚传。我开始悔恨自己当时不该投靠国民党。这时，在我们中队当文书的大哥尹永瑞暗地向我说："国民党政策越来越不得人心，共产党真心为国为民，老百姓都拥护，我们不如弃暗投明”。我的老师尹永恕（共产党员）也写信给我，

摆事实，讲道理，教育我起义，投奔共产党。听了哥哥的指点和老师的教诲，我的心里矛盾起来，国民党黑暗，我恨不能摆脱，但对共产党的政策不托底，怕投了以后受害，所以总是犹豫不决。为了探听共产党的虚实，我决定派我大哥尹永瑞冒险先跟共产党接触一次看看。

大约阴历七月的一天，我大哥从我们中队驻地的甸子混过几道哨卡来到东沟村，找到了共产党两家区委书记秦财，向他说明了我们打算起义投诚的想法。秦书记听了表示欢迎，并讲了共产党对国民党起义投诚人员"既往不咎"的政策。还给开了一封信，大意是：尹永成、尹永瑞等起义投诚，各部队遇见不得虐待，要把他们送到两家区政府来。说完后，秦书记还在尹传荣家招待我大哥一顿饭。当日下晚，我大哥离开了东沟村。为了有把握，我大哥又到过去的好友、共产党两家区武装干部孙起家打听情况，结果与秦书记说的一样。然后，我大哥才回到我们的驻地甸子。

我大哥回来以后，立即向我汇报了与共产党接触的情况。我听了以后，彻底地打消了顾虑，下定了起义投诚的决心。接着，我们就开始做队员的工作。采取滚雪球的办法，先易后难，先找对共产党印象好的进行说服，培养骨干，然后再利用这些骨干去说服别人。据我所知，我的第一分队长张斌，在第一次解放时，曾给共产党当过村长，他也是和我一样，在八路军撤走以后，国民党来了，被迫参加国民党自卫队的。他在我们中队影响又比较大，所以，我首先就作张斌的工作。我对他说，现在八路军已包围锦州，锦州是东北通向华北的桥梁，也是大门，锦州很快就会被攻破。拿我们来说，队长从振朋和不少国民党大小官员，都吓得逃到北平去了，却把我们丢在这里替他们卖命，胜利了他们回来当官，败了我们就会落得有家难奔，有国难投。"张斌听了连连点头。我问他："你看咱们现在应该怎么办？"他说："指导员，我们听你的，你说咋办都行"。我说："咱们投奔共产党去。"他说："我也有此心，就怕共产党不容"。我说我已

经和他们联系好了，共产党对待俘虏还优待呢。咱们主动投过去，他们肯定不会错待咱们的，他说："我跟着你"。我说："你回去暗中做队员的工作，打消他们的顾虑，对不愿意的要警惕。"通过一段时间的工作，大多数队员都愿意，只有少数几个人反对。于是，我们就派人对持反对意见的进行暗中监视。

当时，我们驻在甸子村，在我们驻地西南面的西坎驻着大队部，东南面的东坎驻着国民党十三军骑兵旅的旅部，东北面的山湾子驻着尹相臣的二中队，东北面的南观音堂驻着国民党十三军骑兵旅的一部，我们正好处在敌人的包围之中。另外，在通往解放区必经之路的关隘象鼻山还有国民党十三军骑兵旅一部驻守。形势对我们十分不利。为了不被敌人发现，我们把起义时间定在旧历八月底没有月亮的夜里。同时还打算到大队部多搞些武器和弹药做为给共产党的礼品。

起义时间初步定下来以后，为了安全起见，我又派我大哥尹永瑞于旧历八月上旬的一天，再一次找共产党联络。在李家营见到区长李恒星和书记秦财，向他们汇报了我们的起义计划，并请求他们派八路军接应我们。他们答应了，说将派一部分八路军在头沟一带活动，随时准备接应你们，希望你们尽快行动，以防意外。

旧历八月十六晚上，我正在与我大哥尹永瑞和分队长张斌商量有关起义的事。突然，一个叫孟广成的班长，慌张地跑进来报告说："马奎武和阎芳偷跑出去到大队告密去了"。我一听急了，便决定立即起义，于是向空中鸣了 3 枪，全队紧急集合。先派队员那玉喜提前出发，想尽一切办法和秦书记联系上，让他们派部队接应我们。然后，我向队员们说："大部分弟兄都愿意跟着我投奔共产党，走向光明的前程，现在时候到了，我决定马上行动，我已和中共两家区委书记联系好了，绝对保证大家的安全，不愿意的，也不勉强，何去何从自己选择，我不多说了。"当时没有来得及点名，就命令孟广成带领一个班，头前开路，顺着武列河河套往上摸，不到必要时

不准打枪，天亮时到李家营集齐，张斌带所有队员随我断后。实际上河套没有路，若走正路的话，得从我们的驻地甸子通过南观音堂再过武烈河上岸。但是，由于南观音堂和山湾子有国民党十三军的骑兵旅和伊相臣的二中队卡着，我们只能绕河套。我们从河套里悄悄地通过了南观音堂，又通过了象鼻山国民党十三军骑兵旅的岗哨。当我们走到棺材涧梁的时候，大队长张楷珍带着一中队追了过来，但胡乱放了一阵枪就缩回去了。当夜我们住在龙凤洞山上，这里地势险要，骑兵上不来，比较好守。第二天早晨，在我们起义出发前被我派去联系的那玉喜返到龙凤洞对我说："秦财书记他们在李家营迎接"。于是，我们就向李家营出发。在李家营见到了秦财书记及其他迎接我们的人，可是没见孟广成带的那部分人到达。原来这些人因夜间道路不熟，从二块地搭梁奔曹家沟了，在曹家沟被县支队接收。等到了两家后，队员们才相继会到一起，经过最后清点，参加这次起义的人数共 42 名（在我们起义以前，有一个分队被调到大队部去了），大枪 36 支，手枪 1 支、冲锋枪 1 挺、弹药 3000 余发。当晚，秦财书记用大米饭和豆腐招待了我们，同时让两家业余剧团连夜把我们起义投诚的事排成戏，戏名叫"光荣投诚"。第二天就请我们看了这出戏。然后，又派人把我们送到承德县政府所在地三道沟门乱石窖村参加学习。王玉锋县长亲自主持召开了一个欢迎会，并讲了话，对我们弃暗投明表示欢迎。县政府还特意宰了 3 只绵羊款待我们。在这里，县公安局黄应元局长给我们讲了当前的形势和共产党"既往不咎"的政策，学习了一些解放区的报纸。共学习 3 天，然后由公安局给开了起义证，让我们回家安心参加生产，并通知各村妥善地安排了我们的生活。

（尹贵忠整理）

热河行政区变化简况

高思文

“热河”之称始于清代。雍正元年(1723年),清政府设热河厅。雍正二年(1724年),设热河总管。乾隆三年(1738年),改设热河副都统。嘉庆十五年(1810年),设热河都统,都统驻承德府,兼辖内蒙古昭乌达盟及卓索图盟,府治所在今承德市。

至中华民国年间,民国3年(1914年)1月,设热河特别区,区治所在今承德市。所辖区域东至今辽宁松岭山东麓、阜新市及内蒙古开鲁县一带,西抵今内蒙古大兴安岭南段,南起今河北古北口、五指山、喜峰口和都山,北括内蒙古克什克腾旗、巴林左旗、巴林右旗、阿鲁科尔沁旗和扎鲁特旗。[1]1928年9月,始建热河省,所辖区域为热河道和承德、丰宁、滦平、隆化、围场、平泉、赤峰、朝阳、凌源、绥东、阜新、建平、林西、经棚、开鲁等15县及鲁北、林东、天山3设置局。[2]热河省省会为今承德市。

1933年3月,日本侵略军侵占热河后,热河省沦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成为伪满洲国所辖省份之一。伪热河省省会亦为今承德市。其所辖区域初为承德、丰宁、隆化、围场、青龙、兴隆、平泉、赤峰、宁城、全宁、朝阳、凌源、凌南、绥东、建平、林西、林东、经棚、开鲁、鲁北、天山、大板等23县,[3]后为承德、丰宁、滦平、隆化、围场、青龙、兴隆等7县和吐默特右旗(朝阳)、吐默特中旗(北票)、喀喇沁左旗(建昌)、喀喇沁中旗(平泉、宁城)、喀喇沁右旗、敖汉旗(新惠)、翁牛特左旗(乌丹、全宁)、翁牛特右旗等8旗,共15县、旗。

1938年7月至1945年8月间，冀东区（曾为冀东区、晋察冀边区第十三地区、冀热边特别区和冀热辽区）、冀察区（曾为冀热察区、北岳区）中共党组织及其所领导的八路军在开展抗日斗争，创建和扩大敌后抗日根据地过程中，在热河境内及其边缘区相继组建了兴（隆）滦（平）丰（宁）、承（德）兴（隆）平（泉）、滦（平）昌（平）怀（柔）顺（义）、迁（安）遵（化）兴（隆）、平（谷）密（云）兴（隆）、丰（宁）滦（平）密（云）、迁（安）青（龙）平（泉）、承（德）滦（平）兴（隆）、临（榆）抚（宁）凌（源）青（龙）绥（中）、承（德）平（泉）宁（城）、凌（源）青（龙）绥（中）、承（德）青（龙）遵（化）、蓟（县）遵（化）兴（隆）、承（德）兴（隆）密（云）、迁（安）遵（化）青（龙）、青（龙）平（泉）、承（德）兴（隆）、迁（安）卢（龙）青（龙）、抚（宁）青（龙）、宁（城）赤（峰）、凌（源）绥（中）兴（城）、朝（阳）建（平）新（惠）、朝（阳）锦（西）义（县）联合县和青龙、丰宁（西）县等23个联合县和2个县。[4]

1945年，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冀热辽军区所辖各部队为扩大解放区，对日伪展开了攻势。从6月起，开始进军热河。8月8日，苏联对日本宣战。10日，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发出大反攻命令。据此，冀热辽军区部队三路进军热河及辽宁，与苏联红军配合，于8月中旬到9月上旬先后收复热河省省会承德及赤峰、围场、隆化、滦平、丰宁、平泉、凌源、朝阳、建昌、建平、乌丹、北票、阜新、林西、经棚、宁城、青龙、兴隆、翁敖等县、旗。至此，热河全境第一次解放。

1945年9月20日，根据中共晋察冀中央局的决定，中共冀热辽区委员会热河分委员会、冀热辽区热河行政公署及热河军区在承德建立。10月14日，热河省（民主）政府宣告成立。11月9日，中共热河省委员会正式成立。11月13日，热河省各界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热河省政府。中共热河省委、热河省政府、热河军区分别在中共晋察冀中央局冀热辽分局、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后设冀热辽办事处）、冀热辽军区领导下开展工作。至此，中国共产党领

导下的热河省正式有建制。热河省省会为今承德市。

热河省始辖热西、热东、热中专区和承德市。1945 年 12 月，增设热北专区。1946 年 1 月，辽西专区划入热河省。2 月，辽西专区建制撤销，另建热辽专区。6 月，设立热南专区。至 1946 年 6 月，热河省下辖 6 专区、1 市。

1946 年 6 月，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全面内战，国民党军队在已攻占热河解放区热东、热中、热辽地区部分重点城镇的情况下，又发起了对热河解放区的全面进攻，进而分割了热河解放区。7 月，为适应新的战争形势，热河省分成两部分，一部分仍为热河省。此时的热河省以承德市为中心，下辖热西、热南 2 专区和承德市；另以赤峰为中心，自热河省划出热中、热辽 2 专区及由热北专区改建的昭乌达盟，建立热辽区。热河省和热辽区同归冀热辽区辖属。热河省省会仍是承德市；热辽区党、政、军机关驻今赤峰市。

1946 年 8 月下旬，国民党军队攻占承德市，中共冀热辽中央分局、热河省委、热河军区机关从承德市撤往热中赤峰、热北林西；热河省政府机关撤往热南兴隆。10 月 9 日，为适应战争环境，精简机构，充实下层和部队，经中共晋察冀中央局和中共中央批准，中共热河省委、中共热辽区委合并于中共冀热辽中央分局。至此，中共热辽区委和热辽行政公署及热辽军区撤销。与此同时，保留中共热河省委名义，省委机关由冀热辽分局机关兼；省委领导权由分局兼行；恢复原热河省政府建制，以其统一领导热河各地各级政权组织；撤销热河军区，其指挥权交由冀热辽军区行使，另按纵队编制，组建热辽野战司令部，以其专司指挥热河 3 个野战旅。

热河省党、政、军机构经历不同形式的变化、热辽区行政建制撤销后，热河省行政建制不变，下辖区域始有热西、热南、热东、热中、热辽 5 专区和昭乌达盟。1946 年 12 月 20 日，根据冀热辽中央分局的决定，热西专区划归冀热察区管辖；热南专区划归冀东区管辖。12 月 22 日，在乌丹设立二十二专区。至翌年 11 月 11 日，撤销

该专区建制。至此，热河省境内共设有热东、热中、热辽 3 个专区和昭乌达盟。

在热河省先后辖属的各专区(盟、市)中，热西专区，于 1945 年 11 月在隆化正式设立。1946 年 5 月，按序排列为晋察冀边区第十六专区。1946 年 12 月，划出热河省，至 1948 年 12 月 20 日正式撤销建制。

热西专区始辖承德、丰宁(东)、东滦平、西滦平、隆化、围场 6 县。1946 年 4 月，东、西滦平县合并为滦平县。6 月，丰宁(西)县划入，并与丰宁(东)县合并为丰宁县。同月，承德县划出。12 月，隆化县分设为隆化(西)、隆(化)东县，隆东县划出。1947 年 1 月，丰宁县分设为丰宁、大阁县；同月，围场县分设为围场、围(场)北县，围北县划出。4 月，滦平县再次分设为东滦平县和西滦平县，至 11 月第二次合并。11 月，围北县撤销，围场县恢复原建制。1948 年 3 月，丰宁、滦平县合并组成丰滦联合县，5 月，撤销联合县建制，恢复丰宁、滦平县原建制。11 月，丰宁、大阁县又合并为丰宁县。至 1948 年 12 月，热西专区设有丰宁、滦平、隆化、围场 4 县。

热南专区，1946 年 6 月在宽城设立。6 月，组建热南地委、军分区。8 月 20 日，热南专署组署办公。同年 12 月 20 日，划归冀东区管辖，翌年冬撤销。热南专区设立时，按序排列为晋察冀边区第十七专区，划属冀东区后，称冀东区第十七专区。

热南(十七)专区始辖承德、平泉、青龙、青(龙)西、兴隆 5 县。1946 年 12 月，承德县分设为承(德)南县、承(德)北县，承北县划出。1947 年 2 月，平泉县分设为平泉(南)县和平(泉)北县，平北县划出。同年 7 月，青西县与平泉(南)县合并组成青(龙西)平(泉南)县。冀东区决定撤销十七专区建制后，所辖各县分别划归冀东区第十二、十五专区管辖。

热东专区，1945 年 9 月在朝阳设立。1946 年 5 月，按序排列为晋察冀边区第十八专区。热东专区始终归热河省辖属。

热东专区的下属县始有朝阳、凌源、建昌3县，另与辽西专区交叉管理北票、阜新、绥中、兴城、锦西、锦县、义县等7县。1945年12月，正式划入北票、阜新2县。翌年2月，该2县又划出。4月，绥中、兴城、锦西、锦县、义县5县划入，另增辖平泉县，设立朝(阳)锦(西)义(县)联合县。5月，增设建(昌)东县。7月，锦县、义县合并组成锦(县)义(县)联合县。8月，平泉县划出。10月，增设凌(源)建(建昌、建平)联合县。1947年5月，设立喀喇沁左旗。6月，撤销朝阳县，改设朝(阳)南县。7月，增设叶柏寿县和锦州市。8月，撤销朝锦义联合县，另设朝阳中心县；同月，撤销凌建联合县。1948年4月，朝南县改称羊山县。7月，锦义联合县建制撤销，恢复锦县、义县原建制。10月，撤销锦州市。11月，义县划出。至1948年12月，热东专区下辖羊山、凌源、建昌、叶柏寿、绥中、兴城、锦西、锦县8县和喀喇沁左旗。

热中专区，1945年9月在赤峰设立。1946年5月，按序排列为晋察冀边区第十九专区。1946年7月至10月，划归热辽区管辖。1946年10月，回归热河省。

热中专区始辖赤峰市、平泉、建平、建(平)西、新惠县和翁牛特左旗。1946年3月，增设新(惠)东县。4月，增设宁城县。5月，新惠、新东2县划出。9月，增设建(平)中县、乌丹县。同月，建平县划出。10月，撤销赤峰市。12月，增设建(平)赤(峰)县、增辖承(德)北、隆(化)东县。同月，赤峰、赤(峰)西、乌丹3县划出。1947年2月，增辖平(泉)北县。6月，平北县改为平(泉)凌县。同月，重设赤峰市。11月，撤销建中县；同月，承北、隆东县合并组成承(德北)隆(化东)联合县，又设喀喇沁右旗·建西县联合旗县。同月，撤销赤峰市，划入赤峰、赤西、乌丹县和翁(牛特左)敖(汉)联合旗。1948年5月，撤销平凌县，重设平泉县；同月，撤销承隆联合县。10月，重设赤峰市；11月，撤销赤西县。至1948年12月，热中专区下辖赤峰市和赤峰、平泉、宁城、乌丹县及喀喇沁右旗·建西县联合旗

县、翁敖联合旗。

热北专区，1945 年 12 月于林西设立。1946 年 5 月，按序排列为晋察冀边区第二十专区。1946 年 6 月，撤销专区建制，另在林东建立昭乌达盟。1946 年 7 月至 10 月，昭盟划归热辽区辖属。1946 年 10 月，回归热河省。

热北专区下辖林东、林西、开鲁县和巴林右、阿鲁科尔沁、扎鲁特旗；昭乌达盟辖属县旗始与热北专区同，1947 年春，开鲁县、扎鲁特旗划出；9 月，撤销经棚县，另设克什克腾旗。12 月，林东县改为巴林左旗。至 1948 年 12 月，昭盟下辖林西县和克什克腾、巴林左、巴林右、阿鲁科尔沁旗。

辽西专区，设立于 1945 年 9 月，1946 年 1 月划入热河省，至 2 月撤销建制。

辽西专区划属热河省时，下辖绥中、兴城、锦西、锦县、义县、北票等县。撤销建制后，所辖绥中、兴城、锦西、锦县、义县于 4 月划入热中专区；北票县改由热辽专区管辖。

热辽专区，1946 年 2 月于敖汉旗设立。5 月，按序排列为晋察冀边区第二十一专区。7 月至 10 月划归热辽区辖属。10 月后，回归热河省。

热辽专区始辖朝阳（北）、北票县，1946 年 5 月，划入新惠、新（惠）东 2 县；10 月，划入建平县。1947 年 3 月，增设北（票）阜（新）义（县）联合县。1948 年 3 月，新东县并入新惠县；11 月，划入义县。至 1948 年 12 月，热辽专区下辖朝阳、北票、义县 3 县和北阜义联合县。

二十二专区，1946 年 12 月 22 日于乌丹设立。设立时，按序排列为晋察冀边区第二十二专区。1947 年 11 月 11 日，撤销建制。

二十二专区设立时，由热中专区划入赤峰、赤（峰）西、乌丹 3 县；1947 年 1 月，从热西专区划入自围场县分设出的围（场）北县；4 月，设翁（牛特左）敖（汉）联合旗。

二十二专区撤销建制后，所辖赤峰、赤西、乌丹3县回归热中专区；围北县撤销建制，所辖区域回归围场；翁敖联合旗划入热中专区。

承德市，1945年10月设立，为热河省省会，由热河省直辖。始设时，下辖6个区，1946年3月，增至7个区。

1946年8月国民党军队攻占承德市后，冀热辽区及热河省党、政、军机关撤出承德市。与此同时，承德市党、政、军机构撤销，另组建党政合一的中共承德工作委员会。承德工委始由热西地委代管，1947年4月，改由中共冀东区委代管。1948年4月，又改由中共热中地委代管。同年11月，承德工委撤销。

1948年11月12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冀察热辽军区部队解放热河省省会承德市，热河全境第二次解放。12月26日，经中共中央和中共中央东北局批准，取消中共中央东北局冀察热辽分局和东北行政委员会冀察热辽办事处，重建中共热河省委员会，调整充实热河省政府领导机构。同月，取消冀察热辽军区，保留热河军区番号。翌年1月，重新组建热河军区机关。自此，热河省不仅有建制，省级党、政、军领导机构也得以恢复、健全。

1948年12月，在热河省党、政、军领导机构健全的同时，热河省下辖区域有所调整：原辖热东、热中、热辽专区建制于30日宣布撤销，只保留昭乌达盟。原属热东专区的凌源、建昌、叶柏寿县，喀喇沁左旗和原属热中专区的赤峰市，赤峰、宁城、乌丹县，喀喇沁右旗·建西县，翁敖联合旗及原属热辽专区的建平、新惠县等12县、市、旗、联合旗县，联合旗改由热河省直辖；原属热东专区的羊山、绥中、兴城、锦西、锦县和原属热辽专区的朝阳、北票、义县、北阜义联合县及新设锦州市等8县、1联合县、1市划归辽西省辖属。

1949年1月8日，冀热察区直辖的丰宁、滦平、隆化、围场4县回归热河省。3月8日，冀东区所属的青龙、青平、兴隆3县回归热河省；3月15日，新惠县改为敖汉旗；3月20日，喀喇沁右旗·

建西县改为喀喇沁旗，翁敖联合旗改为翁牛特旗。5月20日，昭乌达盟建制撤销，所辖林西县和巴林左、巴林右、克什克腾、阿鲁科尔沁旗划出热河省。5月21日，辽西省属的朝阳、羊山、北票3县回归热河省。6月18日，羊山、叶柏寿、青平3县建制撤销。至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热河省直辖承德市、赤峰市和丰宁、滦平、隆化、围场、承德、青龙、兴隆、平泉、凌源、建昌、赤峰、宁城、乌丹、朝阳、北票、建平县及喀喇沁左旗、喀喇沁、敖汉、翁牛特旗等2市、16县、4旗。

1952年5月，赤峰市建制撤销。1954年4月，翁牛特旗改为翁牛特蒙古族自治旗。至1955年12月，热河省直辖1市、16县、3旗、1自治旗，共21市、县、旗、自治旗。

1955年12月，根据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的决议，热河省建制撤销，热河省党、政、军各系统组织相继结束工作。热河省建制撤销后，原属各市、县、旗、自治旗中，承德市划归河北省管辖；丰宁、滦平、隆化、围场、承德、平泉、青龙、兴隆等8县划归河北省承德专区管辖；朝阳、凌源、建昌、建平、北票县和喀喇沁左旗等6县、旗划归辽宁省锦州专区管辖；赤峰、宁城、乌丹县和敖汉、喀喇沁旗，翁牛特蒙古族自治旗等8县、旗、自治旗划归内蒙古自治区昭乌达盟管辖。

注释：

① 《辞海》1979年版(下)，第3586页。

② 王逸如《热河志略》。

③ 1933年《热河全图》。

④ 详见高思文主编《中国共产党热河省组织史资料》，1992年内部出版，第55～101页。

国民党在热河的统治机构

(1946年8月29日—1948年11月12日)

马熙群

1945年8月,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之后,在重庆成立的国民党热河省政府,以刘多荃为首的"接收大员",首先到达北平,然后随国民党十三军由葫芦岛登陆,到达锦县,又进入朝阳。1946年9月22日由朝阳移入承德。这个政府在承德仅仅维持了2年2个月14天,便随着国民党政府的灭亡而灭亡了。为了使人们不忘记这段历史,现根据有关资料整理出《国民党在热河的统治机构》。

一.国民党热河省政府机构

国民党热河省政府始建于1928年,由奉系军阀原热河都统汤玉麟任第一任主席。1933年日本帝国主义侵占热河时,汤置热河数百万人民于水火而不顾,自己竟挟巨财逃之夭夭,热河省政府也随之消亡。1940年5月3日,国民政府建热河临时省政府,省主席为缪澄鎏。1941年2月,刘多荃接任省主席。国民党南京政府移至重庆之后,于1945年9月恢复热河省建制,10月8日进行一次改组,由东北军将领刘多荃出任热河省主席。刘是辽宁凤城人,52岁,保定军校炮科卒业。曾任张学良卫队团长,"九·一八"事变后任东北军一〇五师师长。后投靠国民党,扩编为四十九军,刘任军长。抗战时期,因四十九军连吃败仗,军长由王铁汉接任,刘只好去做流亡重庆的热河省主席的闲职。刘多荃占据热河之后,极力推行国民党的反动政策,对百姓极尽剥削搜刮之能事,热河人民说他不

亚于汤二虎(热河黑暗统治的代表汤玉麟),流传着“刘多荃不全——缺德”的歇后语。1948年2月18日,热河省政府主席改为范汉杰。4个月后,又由孙渡接任,直到同年11月国民党热河省政府彻底垮台。

国民党热河省政府的下设机构有:

1.秘书处,秘书长高清岳。下设秘书室,第一科,第二科,法制室,编译室,视察室,会计室,人事室等科室。共计152人。

2.民政厅,厅长谭文彬、李守廉。下设秘书室,第一、二、三、四、五、六、七科,会计室,视察室,设计委员室。共计171人。

3.财政厅,厅长谷守瀛。下设秘书室,第一、二、三、四、五科,会计室。共计203人。

4.建设厅,厅长毛韶清。下设秘书处,第一、二、三、四、五科,会计室,技术室。共计149人。

5.教育厅,厅长刘廉克。下设秘书室,第一、二、三、四科,会计室,督导室。共计126人。

6.会计处,会计长孙殿文。下设专员室,第一、二、三科,共计81人。

7.统计处,统计长俞寿荣。下设一、二、三科。共计35人。

8.卫生处,处长徐化民。下设秘书室,第一、二科,会计室,技术室。共计83人。

9.地政局,局长王长玺。下设秘书室,第一、二、三科,会计室,测量队。共计60人。

10.训练团,团长由蒋介石兼任,团主任先后由刘多荃、范汉杰、孙渡担任,教育长先后由李守廉、葛宴春、武尚权担任。该团于1946年5月1日正式设在朝阳县东门里旧中学校内,于朝阳训练两期,1946年9月3日迁到承德,团址设在小佟沟回民完小楼上。团部共有16人,下设教务处,10人;训导处45人;总务处53人;军训队21人;讲师51人;检导员49人。该团的主要任务是培训各

县、乡政府中骨干分子，并从中发展国民党员、三青团员和培养特务爪牙，充实国民党的政权机构，加强保甲组织，进行户口管理和建乡等工作。建团以来，前后共办9期。除省训团之外，承德、围场、阜新、朝阳、凌源、赤峰、滦平、平泉、建平、宋城、隆化等县也于1947年2月之后，先后成立了县训所，为国民党培养大批的乡政干部。

二．热河的国民党与三青团

1. 国民党热河党部

1924年，在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孙中山在广州召开了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后，热河早期中共党员陈镜湖、杜真生等人，根据中共北京区委的指示，在热河首府承德开始筹建国民党热河党部。1924年3月，党部于南营子三条胡同上口的一个大院内正式成立。这时党部的负责人大都是中共党员，她领导承德学、商各界在反帝、反封建的运动中起到了先导与核心的作用，在人民的心目中享有很高的威望。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背叛大革命之后，中共热河党的组织遭到了极大的破坏，以国民党热河党部的名义组织起来的学运、农运及兵运等各项革命活动在卷土重来的奉系军阀镇压下也不得不转入地下。之后，由于热河大批共产党负责人被捕，国民党热河党部也随之消失。

1930年，由南京国民党中央直接插手，在热河地区第二次组建国民党热河党部，谭文彬任常务委员会书记长（谭为热河省建平县人，曾受训于南京党政训练班，结识陈果夫，得委以重任）。委员有：汤玉麟、李允箸、盖允恭、于明洲、海玉衡。下设机构有：

(1)书记室，书记为谭文彬、海玉衡；

(2)组织科，主任为卢文炳、张渭浜；

(3)训练科，主任为崔广森；

(4)宣传科，主任为王致云。

当时，登记入党的多是各机关的职员、各校的校长、教员。1931年6月在承德文庙大成殿举行了全体教员的入党仪式。由于是集体入党，很多人是被拉入国民党的，因此，除专职人员外，大多数人对国民党不甚了解，参加活动也是一般地敷衍。1933年春，日本进占承德之后，谭文彬等人退至北平，组成了“热河难民救济委员会”，热河国民党党部也随之消声匿迹，第二次解体。

1946年国民党攻占热河之后，又一次组建起热河省党部，由王致云任党部主任，李荫国、王树霖、邱象峰、赵秉琪为委员，下设总务、组织、宣传三科。

1947年，国民党热河党部的人员有所变化，主任委员为谭文彬，执行委员为王树霖、赵自齐、王致云、王兴国、李荫国、赵炳琪、邱象峰、崔公睿（一说委员为毛韶清、王致云、李荫国、葛宴春、李守廉），下设秘书长、总务科、组织科、宣传科。当时办理党员登记手续的国民党员有七八百人。

1948年1月，国民党同三青团合并之后，国民党热河党部增设副主任委员，由毛韶清担任。之后，执行委员崔公睿因犯事被押，赵自齐、赵炳琪、王兴国、王树霖、谭文彬、李荫国等相继赴南京未归。因此，在5月解放军围攻承德时，国民党热河省党部的工作即行停顿，组长以上的人均赴北平。8月间，李荫国、霍守正等人曾返回承德，想恢复工作。可不到两个月，便随着热河的全境解放，也不得不逃之夭夭了。

2. 三民主义青年团热河支团部

三民主义青年团热河支团部于1946年2月在朝阳成立，同年秋由朝阳迁往承德。团部设在广兴路《群众报社》原址。热河支团部设主任1人，书记1人，下设总务、组训、宣传、通讯4个组。

支团部主任毛春圃，又名毛韶清，内蒙赤峰人，曾去法国留学，任热河省政府建设厅厅长，兼热河支团部主任。

支团部书记赵自奇，绥东人，国大代表，任热河支团部书记兼

热河省党部执行委员。

第一组（负责总务），组长刘绍增，下有干事、录事、雇员 7 人。

第二组（负责组训），组长孙考友，下有干事、录事 3 人。

第三组（负责宣传），组长冯熙林，下有干事、雇员 2 人。

第四组（负责视导、通讯），组长陈浩、洪涛，下有干事、录事 3 人。

另外设有服务队，队长由冯熙林兼任，下有 10 余人，专门从事谍报、侦察等工作。

三民主义青年团热河支团部建立之后，下属组织逐步完善。他们先后建立起：

(1)支团部直属分队；

(2)热河省政府分队

(3)热河省训团分队；

(4)热河省防空司令部分队；

(5)热河省保安队分队；

(6)热河省会警察局分队；

(7)承德铁路区队；

(8)承德中学分团部；

(9)承德师范分团部；

(10)承德女中分团部；

(11)热河临中分团部；

(12)承德县分团部；

(13)绥东县分团部；

(14)建平县分团部；

(15)丰宁县分团部；

(16)滦平县分团部；

(17)围场县分团部；

(18)隆化县分团部；

(19)平泉县分团部；

(20)新惠县分团部；

(21)林东分团部；

(22)林西分团部；

(23)朝阳分团部；

(24)赤峰分团部；

(25)凌源分团部；

(26)经棚分团部；

(27)阜新分团部；

(28)开鲁分团部；

(29)凌南分团部；

三民主义青年团热河支团部存在时间虽短，发展却极为迅速，仅承德市3个中等学校，就建立起20个区队，63个区分队，发展团员达1124人。他们所发展的团员不仅仅局限于教育界，而波及到全省各个阶层。这些团员的主要活动是监视进步人士，破坏学生运动，为国民党特务提供共产党的地下工作情报，替国民党军队筹粮、站岗、放哨，代国民党政府机关清查户口，利用各县逃亡的学生潜入解放区，进行各种破坏活动。1948年1月，党团合并时，与国民党热河党部合署办公。数月后，随着国民党热河党部的垮台，三民主义青年团热河支团部也随之垮台。

三．热河境内的特务组织

热河地区国民党的特务组织分为“军统”和“中统”两大系统。

1.“军统”系统。

所谓“军统”乃为“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之简称，是蒋介石专门化的职业特务机关，也是国民党维持其法西斯统治的重要工具。1945年“八一五”光复之后，统计局局长戴笠派马汉三为北平办事处处长，令其负责布置华北地区的特务组织。同时，戴

笠又派文强为东北区区长，负责东北地区特务组织的活动。因热河省正处于华北与东北之间，当时没有明确的归属，所以马汉三和文强都纷纷向热河派遣特务，互相争夺地盘，因此造成了热河地区特务组织错综复杂的局面。1946 年 3 月 17 日，军统特务头子戴笠摔死之后，军统局改组成为国防部保密局，由国防部第二厅厅长郑介民兼任局长，原军统局主任秘书任副局长，后任局长。另有，交通警察总局，局长吉章简、副局长马志超；内政部警察总署，署长唐纵等众多特务组织。因各个特务组织的秘密核心部分是国防部保密局，所以热河地区的秘密特务工作主要归特务头子毛人凤直接领导。当然，在下面的站、组中，一奴侍二主的情况也是有的。

国防部保密局在热河省境内曾进行特务活动的几个较大的组织有：保密局热河站、热察特别通讯站、承德警备司令督察处（该处是公开机关掩护下的秘密特务组织）、热察绥边区特别技术组、冀察热辽特别组等。现分阶段分系统将热河地区的各个军统特务组织情况概述如下：

（1）"军统"特务在热河地区的初期活动

"八一五"日本投降之后，"军统"特务头子土里曾派伪满汉奸索化忱，以热河先遣军的名义在密云一带活动，并一度进入热西滦平县境内，收集满洲军和土匪武装，不久便溃散了。1946 年 5 月间，索又窜入朝阳、叶柏寿等地，大肆骚扰，危害人民，收集我军情报，聚集匪队数百人，但活动时间不长，于 1947 年被国民党十三军给收编了。

（2）国防部保密局在热河境内的特务组织

保密局在热河境内设有：热河站，热察特别通讯站，归东北区管的十三军警察组、热河特别组、热河先遣军；由热河站派生出来的热察绥边区特别技术组，由内蒙古渗透到热河的"新建会"，以及后期由保密局直接组织的冀察热辽特别组等等。

①保密局热河站

1945年下半年至1946年的上半年，由于热河省的省会承德在共产党的掌握之中，国民党仅占据热东重镇朝阳，所以“军统”北平办事处处长马汉三于1945年12月间派龙超到朝阳一带活动，并于1946年5月建立了朝阳组，龙超为组长。龙超辽阳人，毕业于东北讲武堂，1939年便参加了“军统”组织，是戴笠的得力干将。

1946年10月，王匡一奉南京保密局的命令来到承德开始筹建热河站，王为站长，宋佩堂为副站长。不久，龙超由朝阳率常英琦、王芸生、赵力民等3人来到承德，更加强了热河站的力量。1947年1月，热河站进行改组，龙超为站长，张百伶为副站长。

由于热河距北平较近，热河站与北平有密切的联系，可热河站的业务又受东北督导室监督、指导，而重要情报及人事等仍由南京保密局直接领导。热河站的活动是以“热河省政府统计室”的名义作为掩护的，即所谓“以公开掩护秘密，以秘密控制公开”。

热河站建立之后，于1946年至1947年初，先后设立了承德、凌源、隆化、开鲁、围场、朝阳、赤峰、阜新、滦平、古北口等10个组。此外，尚有热察流动组和两个直属突击组，现分述如下：

a. 承德组：1947年元月，龙超介绍李治安为承德组组长，下有组员多人。他们经常利用汽车工会来搞情报，一直活动到国民党退出承德。李后来又被指定为承德潜伏组组长，在承德进行潜伏活动。

b. 凌源组：1947年2月成立，组长鲁云霖，上尉，设有电台。鲁利用跑买卖的关系收集情报，先后以电台通报10余次。该组下设一个突击组，曾招收地方伙会30余人，在凌源、平泉之间窜扰，到1948年8月间解散。

c. 围场组：1947年3月兴安站站长冯贤年(即冯兰亭)在承德活动时，吸收刘辅民并派往围场一带活动，同年6月冯去四平，将关系介绍到热河站。1947年11月，热河站建立围场组，刘为少校组长，地址在隆化，经常到围场一带活动。刘为隆化县的地主，与围

场、赤峰等县的区长、劣绅等关系密切，所以该组织活动十分积极，曾经下设两个突击组：

(a)围场突击组：约30余人，全是隆化当地的伙会、土匪，于1947年9月间在隆化北部被解放军歼灭。到1948年6月，该组织又重新建立，40余人，同年8月被撤消。

(b)隆东突击组：40余人，在隆化东部流窜，于1948年8月撤消。

d. 朝阳组：最初是龙超奉马汉三之命于1946年5月组建的，龙到承德之后，卢重光(即卢完平)任组长。朝阳被我解放之后，热河站又派王芝生为组长，在锦州、朝阳之间的半截塔一带活动。

e. 赤峰组：1947年2月建立，组长金道丰。赤峰解放时，金逃走。1947年12月，热河站又派刘天经建组并委以组长。刘系天主教徒，他主要是利用天主教的关系进行活动。

f. 阜新组：原系开鲁组，后改为阜新组。该组的三任组长分别是：文多、杨克中、戴觉民。

保密局热河站除自身从事情报活动之外，还建立了“新建会”及“农工介绍所”等外围组织。1947年9月，兴安站将热察绥边区特别技术组热河小组移交给保密局热河站，12月又将索伦一组划归热河站领导。这样，热河站兵强马壮，“成绩”显赫，热河站长龙超也倍受上级的赏识。所以，1947年12月，龙超被提拔，委以保密局专员的身份负责热察绥工作，热河站站长的职务交给了承德警备司令部警察处处长许政兼任，副站长为苏永明。这时，由于解放军的反攻，热河境内的特工组织大部分退至承德，而无法开展活动。此时，保密局热河站又将原来的组织进行了调整，改为阜新、朝阳、赤峰等流动组。到1948年7月，热河省会承德解放前夕，龙超、许政等又积极筹建承德潜伏组和突击组，李治安为潜伏组组长，杨国栋为突击组组长。承德解放之后，保密局热河站撤至北京。承德组史靖清、直属通讯员祖兴权留守站内，负责管理站内事物，与各通

讯员来往、联络。北平和平解放之后，站部人员遣散，许政等重要人员逃往南方，其它人员则隐匿下来，热河站的特务组织至此解体。

②热察特别通讯站

国民党国防部保密局于1947年7月14日派李英为热察特别通讯站站长，并负责筹建站、组。热察特别通讯站直属于保密局领导，其主要任务是搞内、外蒙古的政治、经济、文化、党务（指共产党）及解放军的各种动态之情报；其次是弄清中共在蒋管区的地下工作人员以及策反共产党的军政人员哗变，同时以武装游击方式在解放区的边沿地带利用空隙伸入进来进行破坏，搜集情报等活动，即所谓集情报、侦防、策反、行动、游击等工作于一体。

热察特别通讯站站长李英，系热河大阁人，曾任伪皇协军第一路军司令、国民党冀察战区挺进军第一路总指挥、国民党先遣军司令等职。他于1932年便参加了军统，在1947年9月1日，李英向保密局报告热察特别通讯站成立。该站内勤机构设在北平地安门，由副站长康亚夫负责；站电台设在北平西四，由中校支台长左荫棠负责。另外，下设若干活动小组。

a. 开鲁组：1948年3月建立，组长吕承乾，少校，曾为国民党滦平县自卫团团长、第五纵队支队长。副组长黄文杰，上尉，下设电台及通讯员若干人。该电台于1948年5月抵石匣镇时，正值解放军解放该地，电台及全部人员均被解放军所获，自此开鲁组再没设电台。该组活动地区多在丰宁、滦平两县境内，未能推进开鲁。1948年8月6日开鲁组与热察特别通讯站同时撤消。站的工作结束后，开鲁组组长吕承乾到傅作义国民党十六军内任职。

b. 林西组：1947年8月成立，组长阎清琦，中校，下属少校、上尉通讯员3人。该组设电台一部，常在紧靠热河的多伦一带活动，未能向前推进。1948年4月22日多伦解放时，该组的人员及电台全被解放军截获，从此林西组未再建立。

c. 察北组：1948年4月30日建立，组长景番远，少校，曾任伪

满警察及伪满驻察冀侦谍班长。副组长尚锐，上尉，曾当伪满县警察分署长。该组带电台一部，多在察北宝昌一带活动。8月6日与热察特别通讯站同时撤消，电台被收回。

d. 乌珠穆沁组：该组于1948年6月呈报建立，组长孙靖宇，少校。7月中旬批回"暂缓成立"故没有什么活动。

e. 游击组。1948年5月1日建立起3个游击组：

(a)平兴游击组：组长系原开鲁组副组长黄文杰。该组建于平泉，约30人，全是平泉、宁城两县的地主武装，在平泉地区搞武装突击活动。

(b)滦西游击组：组长解筱珊，成员约20余人，由国民党滦平县自卫队抽调组成，活动于滦平西部。

(c)察北游击组：组长林文清，组员多系察东宝昌之游散武装，约20人，活动于宝昌境内。

上面3个游击组活动的时间都不太长，便被上报撤销了。

1948年7月间，毛人凤来北平检查特务站的工作时，因发现有些地区的特工人员暴露了身份，便下令将这些特务组织撤消，由此热察特别通讯站于8月6日结束了工作，站内的一切档案、电报密本及武器等物，由康亚夫、李海峰、宋介夫等3人移交北平站。

③"军统"东北区的特务组织在热河的活动

东北区区长文强，为了争夺热河的地盘，多次硬派特务前来热河地区活动。先后有：十三军警察组、热河特别组、热河先遣军等特务组织，可都活动不久，便被撤消了。后来的承德警备司令部的督察处活动的时间还是较长的，其作用也很大。现分述如下：

a. 十三军警察组：1946年2月，东北区区长文强以东北保安司令部警察处的名义，派范传才为国民党十三军警察组组长。范自锦州随石觉部队侵入朝阳、叶柏寿、平泉等地后，在这些地区从事特工活动。后来，因为范与石觉有意见分歧，东北区又调李石泉来热河接替范职。当时组员十几个人，后因改组而自灭。

b. 热河特别组：1946 年 5 月，东北区区长文强派王匡一为热河特别组组长来热河活动。王以国民党热河省政府调查统计室的名义做掩护搞特务活动，并进驻朝阳。后因"军统"改组，东北区撤销，王匡一才来到热河省会承德筹建热河站（见前面所述）。

c. 承德警备司令部督察处：1946 年 6 月，文强自沈阳派设的，第一任处长崔公浚，热河平泉人，几个月之后由许政接职，许是 1946 年 10 月由文强自沈阳直接派来的。第三任处长仝再启，第四任欧阳彬。督察处的副处长第一任李贺民，第二任朱剑秋，第三任仝再启。督察长第一任鲁东藩，第二任马成，第三任李作楷。该处下设两个科及督察室，此外还有东区、西区、南区、东大桥、古北口等 5 个检查站。因为当时十三军军长石觉是承德警备区司令，所以警备区司令部的督察处表面上是归石觉领导，而实际上是归保密局直接领导。到 1948 年解放军解放承德前夕，该处溃退北平，其组织解体。

④热察绥边区特别技术组：1947 年冬，张凌云匪部受保密局热河站龙超指示，率领一连人（骑兵 300 多人）流窜至多伦，成立"龙超部队"，在热河附近的多伦一带进行骚扰。1947 年 12 月，龙超退出保密局热河站站长的职务，并被委以"保密局专员"，负责热察绥的工作。这时，龙超呈请保密局毛人凤批准，将"龙超部队"改名为"热察绥边区人民义勇军剿匪总队"，并在队内设"热察绥特别技术组"，张凌云为总队长兼组长，李经天、田义先后为副组长。该组下设滂江、赤峰、多伦、开鲁、锡盟 5 个小组。龙超为热察绥边区督导，张凌云所统骑兵到后来达到 1000 余人，其领导直属于南京保密局。张主要是对外，带领部队，而组内的主要工作由副组长去作。该组活动于察东地区，由于该部对察东地带的群众扰害太甚，被控告，保密局曾派龙超前往调查，并在 1948 年冬由保密局下令撤销该组，其骑兵拨归国民党察哈尔省主席张家峰指挥。

⑤保密局内蒙古特务组织对热河的渗透

1947 年 3 月间，保密局派冯贤年(即冯兰亭)为兴安站站长，主要任务是搞内蒙古的情报。因为冯是热河人，他先到承德，企图利用热河省的社会关系进行特工活动。他在承组织了“国防部二厅特别技术组”(简称“特技组”)，以“中国新社会事业建设协会(简称“新建会”)热河省分会”为掩饰，吸收青红帮人员入会，从事特务活动。“新建会”的总会设在上海，由谷正纲、杨虎分别任正、副会长，目的是拉拢青红帮，拥护蒋介石当总统。“新建会热河省分会”的书记长为“特技组”组长王振民。后因冯贤年与龙超发生了意见冲突，保密局于 1947 年 6 月令兴安站移往四平，冯立即前往，留下部分特务交与热河站。

⑥冀察热辽特别组

该组于 1948 年 5 月间成立，由保密局直接委派徐宗尧为组长。该组常驻北平。后因保密局任徐为北平站站长，冀察热辽特别组于同年 11 月撤销。

(3)国民党国防部第二厅在承德的活动

国防部的特务组织除保密局之外，还有国民党北平行辕第二处和国民党华北“剿总”第二处。现分述如下：

①国民党北平行辕第二处承德谍报组。

该组建于 1946 年 11 月，系华北行辕参谋处第一任谍报组长傅敬平领导。当时，十三军军长石觉已进驻热河省会承德，石为桂系，傅来承时携带行辕主任李宗仁(桂系首领)上将及参谋长王鸿留等人的信件，找到石觉，协助十三军搞军事情报。傅在承德横行一时，到 1947 年 2 月，该组并到行辕第二处，处长为少将张家铨，自此该组才归保密局系统。

划归二处之后，傅调任北平组组长，而承德谍报组第二任中校组长为杜思忠。1947 年 4 月，杜思忠携电台一部来到承德，初期设承德谍报组于市内酒仙庙院内，之后移至佟山胡同 4 号。该组除此之外，尚有少校参谋 1 人，上尉参谋 3 人，电台长 1 人，报务组长 1

人，摇机兵4人，勤务兵1人。外设承德小组、隆化小组、平泉小组、丰宁小组、滦平小组、古北口小组、头沟小组、三沟小组、六沟小组。各个小组的成员全部是利用日伪汉奸、特务、地痞、流氓。其活动手段多系化装成商人，潜入共产党解放区，刺探军事、政治、经济情报。后来，组长杜思忠因与十三军有磨擦及贪污问题，被调回北平。第三任组长仍由第一任组长傅敬平接任，傅由中校升为上校，直到1948年春因贪污被撤职查办。第四任组长宋俊辉。到1948年6月，因北平行辕撤销，承德谍报组归并"剿总"，宋及大部组员调回二处或到其它组织中，仅留上尉组员王兆祥、中尉组员陈杰划归"剿总"承德组。

②国民党华北"剿总"第二处承德谍报组

华北"剿总"二处，隶属于国防部二厅领导。该处除处长史弘外，很少有保密局人员。"剿总"二处承德组原定为"剿总"二处谍报第八组，所以又叫"承德八组"。1948年3月，二处处长史弘派中校高校升为承德谍报组组长，一起来到承德的有少尉组员朱秀彬。该组织设在粮市街94号，安电台一部。全组发展组员10名，下设古北口、围场、平泉3个小组，使用、利用人员30余名。

1948年7月间，热河省会承德被解放军包围，高校升又组织突击队20余人，由徐其光任队长，其队员均系逃亡地主、地痞、流氓，在承德附近收集解放军的情报。1948年9月，高因擅自组织突击队被撤职查办，二处命突击队解散，又派中校组长马骥良来承德负责。1948年11月，蒋军由承德溃退的前一周，华北"剿总"二处处长史弘命马骥良布置潜伏，朱秀彬物色其挚友王淮汉租赁中山路(原名)46号，计划开设小商店以掩置电台，正在待批经费时，国民党十三军开始总退却，朱与潜伏电台长田世昌将电台掩藏之后撤出承德到北平。朱、田二人在"剿总"二处领到4600元潜伏费之后，复返承德，到石匣附近朱潜逃，田抵承德后架设电台与北平联系，始终未能通报，不几日傅作义起义，承德市内的潜伏人员及电

台均被人民政府公安部门破获。

“剿总”二处承德谍报组后期的下设组织有：

a. 平泉小组：组长刘舜卿，于1948年4月建立，曾发展特工人员多人，平泉解放之后，刘逃到承德。

b. 滦平小组：组长封延年，下面运用的特务分子10余人。

c. 隆化小组：只有两个运用人员。

d. 古北口小组：组长李大钊(原名刘海涛)，曾为突击队长，后任上尉组长。

马骥良来承德负责之后，突击队及平泉，滦平、隆化小组均被撤销，只留古北口小组继续工作。在承德解放时，承德组所有人员均逃到古北口。之后，随着热河全境的解放，国民党国防部第二厅在热河的全部特务组织被摧垮，残存下来的潜伏人员也一个个被缉拿归案。

2.“中统”系统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中央统计局于1946年1月在北平成立了华北办事处，负责人是中统局副局长郭紫峻。在布置华北的工作时，因热河地区尚未被国民党占领，谁也不愿意去(国民党在日本投降之后，把热河划归华北管辖)。当时，驻北平的河北电台台长俞拯元与郭紫峻早就认识，当他听说热河无人时，便自告奋勇，愿意前往。于是，华北办事处委俞以重任去建立热河调统室。俞的伯父俞铸人与国民党热河省主席刘多荃有过僚属关系，俞请刘帮忙，刘表示同意，在1946年国民党进占朝阳不久的4月1日，俞拯元便成立了热河的中统机构，名为热河省政府调查统计室，隶属于秘书处，经费也由省政府开支。统计室下设总务、情报、组训、行动等4科，并设有电台一部。同时，在凌源、凌南、阜新、朝阳、平泉、建平(叶柏寿)等地建立了特务据点。

1946年9月，该室先后分批随国民党的军队进驻承德。1947年1月，为了扩大活动范围，热河调统室竭力发展组织，扩展势力。

这时，华北办事处又派调一部分人员来热河，调统室将原来的4个科改为书记室、组训科、情报科，并大量发展特务。他们先后建立了热北分区和承德、滦平、隆化、围场、绥东、开鲁、天山(设在开鲁)、赤峰等8个据点。

1947年春季攻势开始后，热河地区的开鲁、绥东、围场、赤峰、凌源、凌南、建平、朝阳等县先后解放，当地的特务组织也随之消失。由于地区缩小，组织瓦解，热河调统室于1947年9月将热北分区撤销，新建立起热东分区，设在阜新，负责收集热东解放区的情报。与此同时，将凌源的据点改设平泉，将朝阳的据点改设锦州，并组织了3个突击组，分布在承南、承北等地活动。

1947年4月，中统局改名为"党员通讯局"，各地办事处改为"直属通讯处"，热河调统室改为"热河区"(可热河直至1948年1月党团合并后才按新改组执行的)，各据点改为"工作站"，调查员改为"通讯员"。热河省党部设有党纲通讯组，俞拯元任组长，省政府内设有统计处二科，也是为其效力的。1948年夏季，承德周围各县大部分解放，各地特务组织土崩瓦解，剩下的组织只有承德分区(稍后建立的)、热东分区(设在锦州)和滦平据点。因外围力量薄弱，热河区将承北、承南突击组扩大，连同滦平据点改为承北、承南、滦平3个工作站，在承德市周围以武装突击等形式搞情报或进行袭扰破坏活动。

1948年11月4日承德解放前夕，"热河区"的特务组织奉南京的命令，撤至密云，于11月底又到通州，拟建立密云、古北口工作站，并打算派人潜回热河，后因局势变化太快均未实现。"热河区"的人员到北平后，都参加了华北办事处的工作。在北平和平解放前夕，俞拯元与解放军地下工作人员取得了联系。在有安全保证的条件下，决心悔过自新，将"热河区"的组织人员登记造册交出，唯有档案文件、密码等在北平收藏时，均被焚烧。

四．热河境内国民党的兵力

自从 1946 年 8 月国民党进占热河后，于省内长期驻扎的国民党正规部队是十三军，军长石觉，字为开，广西桂林人，黄埔军校第三期炮科毕业生，当时 40 多岁，中将军衔，是个独断专行的独裁者。少将副军长舒荣，云南人，当时 50 多岁，黄埔军校第三期毕业生，因胆小怕事，行动迟缓、沉默寡言，外号"老太婆"。他的日常工作只是监修工事。参谋长倪敬佩，安徽人，当时 40 多岁。他名为参谋长，实际顶个副官或顾问。另外，军部尚有个高级参议，名叫龙贤关，少将军衔。十三军的下属机关及部队有：

1. 军直机关，番号 2093。其中包括：

(1)参谋处，处长倪敬佩，下设两个科及管理情报的资料室。

(2)副官处，处长唐南薰(前)、岳昌瀛(后，又名岳万仲)。岳当时 30 岁左右，四川人，曾为军调部承德小组国方代表，是中校阶级挂少将牌子。

(3)秘书处，处长李天熟。

(4)政治部，主任林卧薪，广西人，黄埔第三期学生。

(5)政工队。

(6)军法处，处长张德祥。

(7)军械处，处长吴键。

(8)军需处，处长何树山。

(9)军医处，处长杨大鹏。

(10)电务处。

(11)兽医处，处长贺鹏。

(12)新闻处，原处长林卧薪调走后，由副处长梁亘英负责。

2. 军部直属部队：

(1)特务团(番号 2025)，团长崔中洲。该团由原特务营改编。

(2)工兵营，营长戚阳。曾在南营子开办一个"攻坚社"，出版

《攻坚》月刊。该营4个连，每连100人左右。

(3)榴弹炮营，营长王允凯。4个连，每连50人左右，有榴弹炮12门。

(4)独立团。

(5)骑兵团。

(6)汽车连。

(7)通讯营，营长何绥。3个连，每连150人左右，有电台3部。

(8)人力输送团。

(9)兽力输送营，3个连，共有骆驼七八十峰，大车若干辆。

(10)谍报队，队长芋俊信。

3. 第四师：

师长雒振留，江苏人，当时40多岁。副师长顾孝全。下属有司令部、参谋处、副官处、军需室、军医处、兽医处、军官处、人民服务队、独立团、工兵营、输送营、山炮连、通讯连以及第十团、第十一团、第十二团。

4. 第八十九师，师长方宅仁(前)、潘如涵(后)。政治部主任陶七君。国民党八十九师于解放战争期间，曾在东北战场上全军覆灭，后由原东北保安第六支队改编为八十九师。该师师部先后驻在热河的平泉、滦平。其机构有：司令部、参谋处、汽车队、电报室、通讯连、政治部、政工处、炮兵营、工兵营、战炮连、卫生队、独立营、谍报队以及第二六五团、二六六团、二六七团。

5. 第五十四师，师长史松泉，副师长宋邦伟。其机构有司令部、军需处、谍报队，第六团，第四十九团，第一六〇团。该师在热河驻扎时间不长，便被杜聿明调到佳木斯去了。

6. 第六十三师，师长欧孝全，副师长唐南薰。该师系五十四师调往东北之后，由各部队中抽调部分骨干，又收编一些新兵而组建的。其机构有司令部、副官处、参谋处、电务室、谍报队、野战医院、特务连、工兵营、输送营、第一团、第二团、第三团。

7.第二九九师是由地方团队新组建的，师长巫钊锋。机构有：司令部，第八九五团（由军部特务团改编）、第八九六团（由保安第五团改编）、第八九七团。

8.第二九七师也是由地方团队新组建的。机构有：司令部、政工室、工兵营、输送营、第八八九团、第八九O团、第八九一团。

国民党占领热河期间，省内的武装力量除正规军外，尚有省保安团，其司令官由国民党十三军军长石觉兼任，司令部内设3个处：参谋处、保卫处、经理处，下辖5个团：

保安一团，团长岳宗瀛，原平泉县县长；副团长赵振华，原凌源县自卫队长。该团的组建过程是：原十三军一团千余人驻守丰宁县，在1947年5月战役中被解放军歼灭，仅剩1个排。另外，张其昌匪队被解放军击散后，其残余500余人于7月开回热河。这两部分合编，组成了保安一团。

保安二团，团长滕运昌。该团原为围场"滕团"自卫队，400余人，因纪律太坏又不服从调动，1946年秋在雹神庙被国民党十三军一部包围，击毙10余人，强收马匹，强行受训，在1947年的四五月间改编为保安二团。

保安三团，团长田丰年，副团长张玉波、王希武。该团八九百人，原系朝阳凌源自卫队，1946年改编为保安三团。1947年五月战役受创后补充300余人，尚不足千人。新兵占1/3，多是承德人，老兵为朝阳、凌源人。在1947年8月16—17日，解放军热西部队攻打新滦平时，保安三团损失惨重，一营长被俘，其残部退到滦河附近驻守。

保安四团，团长翟光，副团长朱良周。全团700—1000人，由平泉、凌源、隆化等地的自卫队、壮丁队、还乡团等组成的杂牌队。1947年5—6月在庄头营子改编成保安四团。五月战役之后，抽出两个营补充到八十九师的二六五团和二六七团。

保安五团，团长吴震，副团长文凯荆。兵源来于承德周围，1947

年春编成。

原保安一、三、五团称纵队，增编至5个团之后，从夏季攻势开始，各保安团合称"新一师"，有战斗力的兵员总计有3200来人，新兵3/4以上，装备尚不齐全。较强的三团被摧垮之后，已无硬旅，士气低落，在解放军的强大攻势下，逃亡甚多。

五．其它机构或团体

1.国民党热河省临时参议会

1946年，国民党南京政府召开的"国民代表大会"上，所制定的"宪法"中规定，各省要建立所谓的民主机构。由此，热河省国民党的上层人士便积极地筹建临时参议会。参议会这个所谓的民主机构，实际并非民主，就参议员而言，并不是民主选出的，而是由当权者选定。就是在参议会的《会刊》中，也不打自招地写道："热河省临时参议会于三十六年(1947)四月，奉国民政府选定王致云、胡之焕、兰铁铮、阎奉璋、李荫国、巩廷栋、谭文彬、于守仁、何梅志、张瑞生、马真吾、搭拉巴、王辉中、王澍霖、刘中平、金自铭、艾克让、朱惠南、刘连城、黄原卿等20人为参议员，并以王致云为参议长，胡之焕为副议长，赵自齐、张九如、宋履谦、张书翰、姚海曙、林业芸、刘竣山、孙杰、张颐、王藩等10人为候补参议员。"事实上，在6月30日所举行的成立大会上，除参议员马真吾、谭文彬提出请辞，而由赵自齐、张九如替补外，其它人均按原定安排，毫无变化。由此可见，热河临时参议会只不过是国民党政府装璜"民主"门面的工具。参议会成立之后，由秘书长及总务、议事、会计3个组负责具体工作。当时，热河地区战火纷飞，国民党虽已进驻承德，可根本没有站稳脚跟，就连他们自己也供认："热境共匪，攻城略地，滋扰实多。围场、赤峰、建平、宁城前后陷落，隆化、丰宁、凌源、平泉先后被围，惊恐之气氛，弥漫于省垣。"由此可见，南京政府之所以在热河让临时参议会草草出台，其目的不外乎借此安定民心，但也是徒劳的。

2. **公法机关**

国民党热河省会警察局于1946年9月成立，局长震权。不久，由范炯接任。6个月之后由文淮贤接替，直至1948年11月承德解放。警察局下设秘书室、会计室、警察室、总务科、行政科、司法科、消防队、侦察队、保安队、警犬班、修理班、防护团等直属单位。另外，下属第一、二、三、四分局，分局下设分驻所3—4个不等。

国民党热河高等法院长由朱焕彬担任，其下属有庭长、首席检查官、推事、书记官若干人。此外，法院下设总务科、文牍科、人事科、监狱科、统计科、会计室、刑事科、民事科等科室。

3. **民间团体**

(1)妇运会：国民党热河省妇女运动委员会主任委员由罗蕴卿担任，副主任委员王竹琪、刘惠欣，理事：孙立、李世华、吴荣之、宋淑华、李玉芳、梁质樊。下设总务、宣传、会计、交际、庶务5个股。每股设股长1人，干事2人。

(2)建国剧团，团长王星华，副团长王敬波，下设总务、剧务、宣传3组，有演员16人。

(3)革新剧团，团长艾公樊，社长邓先鱼，演员18人。

除此之处，在热河省会承德尚有《长城日报》社，社长刘仲平；省立师范学校，校长曹庆；省立中学，校长王永全；省立女中，校长何梅志；还有《火炬》壁报社、《革新》杂志社、国剧研究社等机构。另外，国民党还曾在承德出版过《热河省政府公报》、《热河高等法院公报》、《热血》、《攻坚》等刊物。

热河历代职官年表

（1703—1955）

邓一民

在热河这个地方，明末清初时期还没有统一的地方行政建制。当时，承德、平泉、赤峰归诺音卫管辖，朝阳归泰宁卫管辖。康熙四十二年（1703 年），在热河西岸建避暑山庄。为了加强对这一地区的管理，开始设立热河总管，有总管衙门，既管理热河行宫事务，又是地方军政长官。但总管衙门只是中央派出机构，还不是正式的地方行政建制。

避暑山庄建立后，皇帝经常来此避暑或到围场狩猎，人口逐渐增多，城市规模逐渐扩大。康熙五十二年（1713 年）开始筑城，热河也开始成为这一地区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所以，热河的正式地方行政建制也就应运而生了。

以“热河”命名的正式地方行政建制始于雍正元年（1723 年），当时称热河厅，治所在今承德市区，辖区相当于现在的承德市区和承德县。后来，陆续设置了八沟厅、四旗厅等 6 厅，统称热河 7 厅。

热河的地方行政建制确立后，又经过了许多变化。雍正十一年（1733 年）改为承德州，乾隆七年（1742 年）又改为热河厅，乾隆四十三年（1778 年）改置承德府。1911 年辛亥革命后改称热河特别区，和绥远、察哈尔一起统称热察绥三特别区。1928 年改建热河省，辖区至今辽宁松岭山东麓、阜新市及内蒙古开鲁县一带，西抵今内蒙古大兴安岭南段，南起今河北古北口、五指山、喜峰口和都

山,北包括今内蒙古赤峰市。1955年底撤销省的建制,将原热河省管辖的承德、赤峰、朝阳地区分别划归河北省、内蒙古自治区和辽宁省管辖。至此,以热河为名称的地方行政建制就终结了。

一、清朝时期

(1703—1911)

(一)热河总管

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设热河总管。总管是管理专门行政事务的行政长官,清代内务府设内务府总管大臣,掌管宫廷事务,其属官有行宫总管,专管热河行宫事务,但在乾隆三年(1738年)以前,热河总管还兼管热河行政、军事事务,实际上是热河地区的最高军政长官。乾隆三年(1738年)改设副都统,热河总管就专管行宫事务了。在军事上,则以驻防八旗官兵隶于副都统,以内务府三旗汉军官兵隶于总管。兼管热河行政、军事事务的热河总管11任,专管行宫事务的热河总管有83任,共94任。

赫奕,满洲正黄旗人,康熙四十二年任,尚书衔。

孙扎齐,满洲镶红旗人,《热河志》载康熙四十二年任,都统衔。

佛保,满洲正黄旗人,《热河志》载康熙四十二年任,郎中衔。

赫奕,满洲正黄旗人,雍正元年复任。.

关保,满洲正红旗人,雍正二年任。

顾彦,满洲镶黄旗人,雍正四年任。

花色,满洲正红旗人,雍正八年任。

巴什,满洲镶黄旗人,雍正九年任。

马尔图,满洲正红旗人,雍正九年任。

塞克图,满洲正白旗人,雍正十一年任。

巴图,满洲正白旗人,乾隆元年任。

(以下专管热河行宫事务的总管、副总管83人从略)

(二)热河副都统

乾隆三年(1738年),增设热河副都统。副都统是清代八旗组织中左梅勒章京、右梅勒章京的汉译名,职掌一旗的户口、生产、教养和训练等。清王朝统一全国后,在各省建制驻防八旗,根据该地区的重要程度和八旗兵的多少,分别设制将军、都统为长官。又在若干地方设副都统,统管驻防八旗官兵,兼管地方旗民事务。热河副都统即属于此一类。热河自乾隆三年增设副都统,至嘉庆十五年(1810年)升为都统,先后共有33任副都统。

那苏泰,满洲正蓝旗人,乾隆三年任。

达尔当阿,满洲镶黄旗人,乾隆五年任。

马尔拜,满洲正白旗人,乾隆九年任。

索拜,满洲镶黄旗人,乾隆十年任。

巴尔品,满洲正黄旗人,乾隆十一年任。

那兰保,蒙古正蓝旗人,乾隆十二年任。

马尔泰,满洲正黄旗人,乾隆十二年任。

满福,满洲镶黄旗人,乾隆十三年任。

海常,满洲镶黄旗人,乾隆十三年任。

李侍尧,汉军正蓝旗人,乾隆十七年任。

明安,满洲镶黄旗人,乾隆二十年任。

福当阿,满洲正蓝旗人,乾隆二十一年任。

额尔登额,满洲正黄旗人,乾隆二十六年任。

呼什图,满洲正黄旗人,乾隆三十年任。

新柱,满洲镶黄旗人,乾隆三十二年任。

玛昌,满洲正黄旗人,乾隆三十二年署任。

三全,满洲正红旗人,乾隆三十四年任。

多乃,满洲正蓝旗人,乾隆四十年任。

恒秀,满洲正白旗人,宗室,乾隆四十三年任。

恒瑞,满洲正白旗,乾隆四十七年任。

恒善保,满洲正黄旗人,宗室,乾隆五十一年任。

富昌，满洲正白旗人，乾隆五十三年任。

保成，满洲镶黄旗人，乾隆五十六年任。

那奇泰，满洲正蓝旗人，乾隆六十年任。

德勒克扎布，蒙古正白旗人，嘉庆元年任，五年正月免，二月仍留任，十月降。

那奇泰，满洲正黄旗人，嘉庆五年正月任，二月调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

庆杰，满洲镶白旗人，宗室，嘉庆五年十月任。

明兴，满洲正黄旗人，嘉庆八年署任。

黄文敏，汉军镶黄旗人，嘉庆八年署任。

孟住，满洲正白旗人，嘉庆九年署任。

佛棱保，满洲正白旗人，嘉庆十二年署任。

福长安，满洲镶黄旗人，嘉庆十二年四月任，嘉庆十四年二月解任。

毓秀，汉军镶黄旗人，嘉庆十四年三月任，十五年六月调密云副都统。

(三)热河都统

都统是满洲八旗"固山额真"的汉译名，是八旗组织中每旗的最高长官。清代还在各省建制驻防八旗，设将军或都统为长官。一般将军与都统不并置，凡设将军处其下为副都统。设都统的地区，都统即为该地区最高军政长官。热河在嘉庆十五年(1810年)由副都统升格为都统，到宣统三年(1911年)共有都统(包括署任)82任。

积拉堪，宗室，满洲镶蓝旗人，嘉庆十五年六月任，八月调杭州将军，二十二年卒。

毓秀，汉军镶黄旗人，嘉庆十五年八月任，十八年八月调杭州将军，二十三年卒。

高杞，嘉庆十八年八月任，十九年二月调乌鲁木齐都统。

和宁,蒙古镶黄旗人,嘉庆十九年二月任,闰二月调礼部尚书。

高宁,嘉庆十九年闰二月任,二十年五月解。

和宁,蒙古镶黄旗人,嘉庆二十年五月再任,二十一年七月调工部尚书。

庆祥,蒙古正白旗人,嘉庆二十一年七月任,二十二年四月调乌鲁木齐将军,十一月降伊黎参赞大臣。

庆溥,满洲镶黄旗人,嘉庆二十二年四月任。

熙昌,蒙古正蓝旗人,嘉庆二十二年署任。

伊冲阿,宗室,满洲正蓝旗人,嘉庆二十二年十一月任,二十三年九月调察哈尔都统。

松宁,嘉庆三十三年九月任,十一月调黑龙江将军。

伊冲阿,宗室,满洲正蓝旗人,嘉庆二十三年再任,二十四年五月解。

诚安,满洲正白旗人,嘉庆二十四年五月任,二十五年十一月调左都御史。

松筠,蒙古正蓝旗人,嘉庆二十五年十一月任,道光元年五月调兵部尚书。

庆惠,蒙古正白旗人,道光元年五月任,二年五月授任乌什办事大臣。

廉善,满洲正黄旗人,道光二年五月任,七月休。

成德,满洲正黄旗人,道光二年七月任,十二月卒。

庆保,满洲镶黄旗人,道光二年十二月任,四年十二月调乌里雅苏台将军。

那清安,满洲正白旗人,道光四年十二月任(一说道光五年任)。

明山,道光六年五月任,是月调刑部尚书。

庆惠,蒙古正白旗人,道光六年五月再任,十一月卒。

升寅,满洲镶黄旗人,道光六年十一月任,七年七月病解。

那清安，满洲正白旗人，道光七年七月再任，是月调。

英和，满洲正白旗人，道光七年七月任，八年正月出差，七月调宁夏将军。

升寅，满洲镶黄旗人，道光八年七月再任，八月调宁夏将军。

成格，满洲正黄旗人，道光八年八月任，九年十一月调乌鲁木齐将军。

裕恩，宗室，满洲正蓝旗人，道光九年十一月任，十一年八月病解。

保昌，满洲正蓝旗人，道光十一年八月任，十三年四月调吉林将军。

苏成额，满洲正红旗人，道光十三年四月任。

贵庆，道光十三年九月任。

武忠额，满洲正白旗人，道光十三年十一月任，八月调乌里雅苏台将军。

嵩溥，满洲正蓝旗人，道光十四年八月任，十七年调福州将军。

耆英，满洲正蓝旗人，道光十七年三月任，十八年闰四月调盛京将军。

惠吉，满洲镶黄旗人，道光十八年四月任，十九年三月调乌鲁木齐都统。

恩铭（原名恩宁），满洲正红旗人，道光十九年三月任，二十年正月病解。

阿勒清阿，满洲正黄旗人，道光二十年正月任，二月调刑部尚书。

纳尔经额，道光二十年二月任。

班松额，满洲正黄旗人，道光二十年六月任，二十一年八月病解。

桂轮，蒙古正白旗人，道光二十一年八月任，二十三年调乌里雅苏台将军。

琦善，道光二十三年三月任，四月解。
萨英阿，满洲镶黄旗人，道光二十三年四月任，二十四年七月署绥远城将军，二十五年调伊黎将军。
桂良，满洲镶黄旗人，道光二十五年十一月任。
惠丰，满洲镶黄旗人，道光二十八年二月任，二十九年二月调礼部尚书。
毓书，满洲正黄旗人，道光二十九年六月任，是月调乌鲁木齐都统。
明训，蒙古正黄旗人，文进士，道光二十九年七月任。
庚福，蒙古镶蓝旗人，道光二十九年十一月任。
惟勒，宗室，满洲镶黄旗人，道光三十年八月任，咸丰元年病解。
庚福，蒙古镶黄旗人，咸丰元年四月再任，三年二月调成都将军。
华山太(一作花山太)，咸丰三年二月任，三月调。
毓书，满洲正黄旗人，咸丰三年三月任，五年五月病解。
柏　，蒙古正蓝旗人，咸丰五年五月任，十二月调户部尚书。
英隆，满洲镶黄旗人，咸丰五年十二月任。
常清，满洲镶蓝旗人，咸丰八年五月任，十年二月调乌鲁木齐都统。
春佑，满洲正红旗人，咸丰十年二月任。
瑞麟，满洲正蓝旗人，同治元年七月署任，十月实授，二年五月授广州将军。
瑞庆，满洲正白旗人，同治二年五月任，七年十二月病解。
庆春，满洲正黄旗人，同治七年十二月任(未到任)。
魁龄，满洲正红旗人，同治七年十二月署任。
库克吉泰，蒙古正黄旗人，同治八年九月任，十二年四月卒。
松瑞，同治十一年任。

瑞联，宗室，满洲正蓝旗人，同治十二年四月任，光绪二年十月调察哈尔都统。

延煦，满洲正蓝旗人，光绪二年十月任，五年五月病解。

崇绮，满洲镶黄旗人，状元，光绪五年五月任，七年闰七月调盛京将军。

额勒和布，满洲镶黄旗人，翻译生员，光绪七年闰七月任，九年七月调理藩院尚书。

恩福，光绪九年二月任，九月卒。

继格，满洲镶黄旗人，光绪九年九月任，十年四月调广州将军。

谦禧，满洲正红旗人，光绪十年四月任，十六年五月卒。

德福，光绪十六年五月任(未到任)。

恩良，光绪十六年五月署任。

奎斌，光绪十七年十一月任，十九年六月卒。

廷雍，光绪十七年十一月署理。

庆裕，光绪十九年六月任，二十年八月调福州将军。

崇礼，光绪二十年八月任，八月病解。

寿荫，光绪二十年八月任，二十四年七月调广州将军。

色楞额，光绪二十四年七月任，二十八年四月召。

锡良，光绪二十八年四月命(松寿七月署)。

松寿，光绪二十九年三月任。

廷杰，满洲正白旗人，光绪二年进士。光绪三十一年十一月任，宣统元年八月调法部尚书，二年十二月卒。

诚勋，宣统元年八月任(绍昌署任)，三年二月调广州将军(未赴任)。

溥颐，宣统三年二月任，九月调京。

锡良，宣统三年九月任，十二月病解。

昆源，蒙古镶蓝旗人，宣统三年十二月任，辛亥革命后署任。

(四)热河兵备道道台

清乾隆时始专设分守、分巡道，多兼兵备衔，辖府、州，成为地方省和府州之间的高级行政长官。乾隆五年(1740年)始设热河兵备道，当时辖热河、八沟、四旗3厅，后来又陆续分设了塔子沟、喀喇河屯、乌兰哈达、三座塔4厅，共7厅。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设承德府。热河兵备道仍辖承德府并所属1州5县，还兼辖武备。自乾隆五年(1740年)，到光绪十年(1884年)，共有热河道道台70任。

陶用中，江苏金匮人，乾隆五年任。

八十，满洲正白旗人，乾隆七年任。

富勒赫，满洲镶红旗人，乾隆十年任。

安宁，满洲正黄旗人，乾隆十五年任。

明德，满洲镶黄旗人，乾隆十七年任。

富勒浑，满洲镶黄旗人，乾隆十七年任。

常亮，满洲镶黄旗人，乾隆二十年任。

良乡，满洲正白旗人，乾隆二十二年任。

富贵，满洲镶黄旗人，乾隆二十四年任。

撰义，满洲镶黄旗人，乾隆二十九年任。

增福，满洲镶黄旗人，乾隆三十一年任。

明山保，蒙古镶红旗人，乾隆三十四年任。

伊桑阿，满洲镶黄旗人，乾隆四十六年任。

当保，满洲镶白旗人，乾隆四十七年任。

托伦，满洲镶红旗人，乾隆五十年任。

富尼善，满洲镶红旗人，乾隆五十一年任。

托伦，满洲镶红旗人，乾隆五十二年再任。

贡楚克扎布，蒙古镶白旗人，乾隆五十四年任。

全保，蒙古镶红旗人，乾隆五十五年任。

台斐音，蒙古镶黄旗人，乾隆六十年任。

庆章，满洲镶黄人，嘉庆三年任。

图明阿,满洲正白旗人,嘉庆七年任。
阿永,满洲正蓝旗人,嘉庆八年任。
奇明,满洲正白旗人,嘉庆九年任。
吉隆阿,蒙古镶白旗人,嘉庆十年任。
高杞,满洲镶黄旗人,嘉庆十五年任。
明山,满洲镶黄旗人,嘉庆十六年任。
常溎,满洲镶白旗人,嘉庆二十年任
阿霖,满洲正红旗人,嘉庆二十年任。
齐哈纳,满洲镶蓝旗人,嘉庆二十三年任。
锦明,满洲正黄旗人,嘉庆二十四年任。
玉彰,满洲正黄旗人,嘉庆二十四年任。
常德,满洲正红旗人,道光元年任。
嵩龄,满洲镶黄旗人,道光元年任。
多容安,蒙古正黄旗人,道光四年任。
嵩英,蒙古正红旗人,道光七年任。
绰勒恭额,蒙古镶红旗人,道光七年任。
海忠,满洲正红旗人,道光十年任。
霍隆阿,满洲正黄旗人,道光十三年任。
吉年,满洲镶蓝旗人,道光十六年任。
丰林,满洲正白旗人,道光十六年任。
锡麟,满洲正黄旗人,道光十九年任。
松林,蒙古正黄旗人,道光十九年任。
毓科,满洲正蓝旗人,进士,道光二十年任。
觉罗桂成,满洲正蓝旗人,道光二十二年任。
吉珩,满洲正蓝旗人,道光二十四年任。
成山,满洲正蓝旗人,道光二十四年任。
图壁,满洲镶白旗人,道光二十七年任。
觉罗德龄,满洲正红旗人,道光二十九年任。

定保，满洲正白旗人，道光二十九年任。
崇祥，满洲镶红旗人，咸丰二年任。
裕恒，满洲正红旗人，咸丰二年任。
觉罗钟秀，满洲镶黄旗人，咸丰年五年任。
赛音博勒格图，蒙古正蓝旗人，咸丰五年任。
觉罗钟秀，满洲镶黄旗人，咸丰九年再任。
福厚，满洲正白旗人，咸丰九年任。
灵杰，宗室，满洲正蓝旗人，同治元年任。
微良，满洲正蓝旗人，同治元年任。
德林，满洲镶白旗人，同治四年任。
耆昆，满洲镶红旗人，同治五年任。
裕长，满洲正白旗人，同治六年任。
耆昆，满洲镶红旗人，同治七年再任。
奎训，满洲镶蓝旗人，同治七年任。
灵杰，宗室，满洲正蓝旗人，同治十年再任。
穆特布，满洲镶白旗人，同治十年任。
微良，满洲正蓝旗人，监生，同治十二年再任。
英谦，满洲镶红旗人，光绪元年任。
贵成，蒙古正白旗人，进士，光绪三年任。
富华，满洲正白旗人，光绪九年任。
衡峻，蒙古正红旗人，光绪十年任。
（光绪十年后至民国前尚缺，望知者补上）。

（五）热河理事同知

雍正元年设热河厅后，任命理事同知1名，掌管旗民事务。十一年改为承德州，以知州专理民务，以同知专理旗务，遇有旗民交关之事则彼此会同办理。乾隆七年（1742年）又改设热河厅，裁撤知州一职，同知移驻州署，仍统理旗民事务，为热河厅的行政长官。此外，热河地区还设有八沟厅（平泉，雍正十年设），四旗厅（丰宁，

雍正十三年设)，塔子沟厅(建昌，乾隆四年设)，喀喇阿屯厅(滦平，乾隆七年设)，乌兰哈达厅(赤峰，乾隆三十九年由八沟厅分设)，三座塔厅(朝阳，乾隆三十九年由塔子沟厅分设)，并分别任命理事同知(平泉)或理事通判为厅的行政长官。

据《热河志》记载，热河理事同知共有 17 任，到乾隆四十三年(1778 年)，就改热河理事同知为承德府知府了。

葛森，满洲正白旗人，雍正二年任。

洪同，满洲正黄旗人，雍正五年任。

明亮，满洲正黄旗人，雍正六年任。

陈肇魁，福建顺昌人，雍正七年任。

瞻泰，满洲镶黄旗人，雍正十年任。

八十，满洲正白旗人，雍正十一年任。

齐格，满洲镶黄旗人，雍正十三年任。

硕岱，满洲镶红旗人，乾隆元年任。

同德，满洲正黄旗人，乾隆七年任。

常泰，满洲正白旗人，乾隆九年任。

德克精额，满洲正红旗人，乾隆十四年任。

三音布，满洲镶黄旗人，乾隆二十一年任。

明山保，蒙古镶红旗人，乾隆二十三年任。

福顺，满洲镶黄旗人，乾隆三十五年任。

明兴，满洲镶黄旗人，乾隆三十七年任。

穆靖安，满洲镶黄旗人，乾隆四十一年任。

伊桑阿，满洲镶黄旗人，乾隆四十二年任。

(六)承德府知府

宋代时，命朝臣出外为府的长官，称为“知某府事”，简称知府，后成为定制。一府辖数州县，知府为最高行政长官，清代相沿不改。乾隆四十三年(1778 年)由承德厅改设承德府，同时，也将喀喇河屯厅改为滦平县，四旗厅改为丰宁县，八沟厅改为平泉州，塔子沟

厅改为建昌县，乌兰哈达厅改为赤峰县，三座塔厅改为朝阳县，承德府共辖 1 州 5 县，到光绪九年(1883 年)共有 48 任知府。

伊桑阿，满洲镶黄旗人，乾隆四十三年任。

当保，满洲镶白旗人，乾隆四十四年任。

清格，满洲镶蓝旗人，乾隆四十七年任。

托伦，满洲镶红旗人，乾隆四十八年任。

庆章，满洲镶黄旗人，乾隆五十年任。

贡楚克扎布，蒙古镶白旗人，乾隆五十二年任。

明昆，蒙古镶黄旗人，乾隆五十三年任。

庆章，乾隆五十五年再任。

台斐音，蒙古正黄旗人，乾隆五十六年任。

庆章，乾隆五十七年三任。

图明阿，满洲正白旗人，嘉庆三年任。

景璋，满洲镶黄旗人，嘉庆七年任。

敷森布，满洲镶黄旗人，嘉庆七年任。

景安，满洲镶红旗人，嘉庆九年任。

喜步昌阿，满洲镶红旗人，嘉庆九年任。

世永，满洲正红旗人，嘉庆十六年任。

嵩龄，满洲镶黄旗人，嘉庆十八年任。

钟禄(钟禄及钟禄后至嘉庆二十五年任职情况不详)。

特通安，满洲正黄旗人，道光元年任。

富尔锦，满洲正黄旗人，道光二年任。

额尔经额，满洲镶黄旗人，道光五年任。

海忠，满洲正红旗人，道光六年任。

苏成额，满洲镶黄旗人，道光七年任。

吉年，满洲镶蓝旗人，道光十四年任。

丰林，满洲正白旗人，道光十七年五月任。

锡麟，满洲正黄旗人，道光十七年六月任。

图壁,满洲镶白旗人,道光二十年八月任。

毓科,满洲正蓝旗人,道光二十一年十一月任。

桂成,满洲正蓝旗人,道光二十二年二月任。

宝麟,满洲正蓝旗人,道光二十二年四月任。

吉珩,满洲镶蓝旗人,道光二十三年六月任。

德龄,满洲正红旗人,道光二十六年任。

炳纲,满洲镶蓝旗人,道光三十年任。

定保,满正白旗人,咸丰元年九月任。

崇祥,满洲镶红旗人,咸丰元年十一月任。

金龄,满洲镶蓝旗人,咸丰四年任。

钟秀,满洲镶黄旗人,咸丰五年任。

景兰,满洲镶蓝旗人,咸丰九年四月任。

钟秀,咸丰九年五月回任。

灵杰,满洲正蓝旗人,咸丰九年十二月任。

钟秀,同治二年七月三任。

承庆,满洲镶黄旗人,同治四年九月任。

耆昆,满洲镶黄旗人,同治五年任。

灵杰,光绪八年再任。

征奎,满洲正蓝旗人,同治十年任。

国钧,满洲正红旗人,监生,同治十二年任。

裕长,满洲正白旗人,光绪四年任。

嵩林,满洲镶黄旗人,荫生,光绪九年任。(嵩林后至宣统三年任职情况不详)

二.民国时期

(1912—1933)

辛亥革命初,仍沿清时旧制,民国三年(1914 年)一月始设热河特别区,仍以热河都统为最高军政长官,直到 1933 年热河沦陷。

(一)热河都统

熊希龄,湖南凤凰人,进士,1912年4月6日任,1913年1月19日始到职[①](熊未到职期间由昆源署理),7月31日免,后任国务总理。1969年5月31日在香港病逝。

姜桂题,安徽亳州人,1913年8月1日任(未到任前由舒和均任护理都统),1921年9月10日免。1922年1月17日病逝。

汲金纯,辽宁海城人,1921年9月10日任,1922年5月29日免。

王怀庆,河北宁晋人,1922年5月29日任热察绥巡阅使兼热河都统,1924年7月1日免,1954年病逝于天津。

米振标,陕西清涧人,1921年以热河副都统衔任前敌司令,1922年以热河军务帮办代行都统职权,1924年7月1日署,同年12月11日免。

阚朝玺,辽宁盘山人,1924年12月11日任,1925年12月4日免。东北沦陷后曾任伪满中央银行监事、副总裁、总裁等职。

宋哲元,山东乐陵人,1925年12月4日任,1926年4月5日退张家口,1940年4月5日病逝于四川绵阳。

汤玉麟,辽宁阜新人,1926年4月5日署任,1927年8月18日任,1928年12月任热河省主席,1931年3月3日退出承德,1937年5月病逝于天津。

①**政务(民政)厅长**(1921年12月设)

李心曾,辽宁海城人,1921年12月18日任。

汤铭彝,1922年8月16日任。

陆长肩,1923年11月1日任。

孙文汉,1924年8月4日任。

尹寿松,1925年2月11日任。

屠义源,1926年2月24日任。

牛 兰,1927年9月8日任。

张翼廷,河北承德人,1928年4月3日任。

邴克庄,辽宁盘山人,1928年12月31日任。

张秉彝,辽宁朝阳人,1931年3月7日任,1933年3月去职。

②财政厅长

刘凤镳,1918年任。

谭椒馨,1919年1月27日任。

白承颐,1921年1月22日任。

栾骏声,1921年10月25日任。

王世荣,1922年7月14日任。

陈赓虞,1924年10月4日署。

高宝忠,1925年2月10日署。

李象臣,1926年3月16日署。

姜承业,1928年3月29日任。

汤佑辅,1932年4月6日任。1933年3月去职。

③教育厅长

郑庆余,1927年9月17日始任。

张翼廷,1929年6月12日任。1933年3月免职。

④实业(建设)厅长

张秉彝,1927年9月24日始任。

梁国栋,1928年12月31日任。

李树春,河北清苑人,1929年8月任建设厅长,1930年4月免,1931年5月再任。

⑤全区警务处长兼警察厅长

冯梦云,1916年10月4日任。

王文藻,1922年2月8日任。

李传勋,1923年8月14日任。

邱钟岳，1925年2月16日任。

刘子诚，1926年3月14日署任。

应大钿，1927年9月8日任。

张贵良，辽宁营口人，1931年任警务处长廉省会公安局长，1933年3月去职。

⑥北京政府外交部特派热河交涉员兼商埠局局长

张翼廷，1918年任。

张秉彝，1922年4月19日任。

刘明源，1925年2月16日署任。

王守德，1926年2月4日任。

裴子晏，1927年9月13日任(何时裁撤不详)。

(二)热河道尹

王乃斌，原清末热河道台，1911年署理。

戚朝卿，1914年7月8日任。

刘景沂，1922年8月16日任。

范庆煦，1926年2月24日任。

梁国栋，1927年9月8日署理，1928年1月19日任。1928年8月裁撤。

(三)赤峰镇守使

陈光远，河北武清人，1913年7月21日始任，1914年5月21日裁撤。1939年8月6日病逝于天津。

(四)林西(赤林)镇守使

米振标，1913年7月21日始任。

张殿如，1922年6月2日任，同年8月31日改名赤林镇守使。1924年9月17日改名赤开护军使，同年11月18日裁撤。

(五)朝阳镇守使

殷　贵，天津人，1916年7月4日始任。

龚汉治，1923年8月28日任，1928年8月
裁撤。

（六）开绥镇守使

张连同，1924年9月17日始任，1928年8月裁撤。

注释：

①《熊希龄集》载1912年12月22日任，次年2月下旬到职。

三·抗日战争时期

（1933—1945）

1933年2月末3月初，日伪军10万多人，击破国民党政府军的微弱抵抗，仅10天时间就占领全热河，并成立了伪满洲国热河省政权，直到1945年8月日本投降。在此期间，共产党、八路军领导人民群众进行了艰苦顽强的抗日斗争，建立了抗日民主政权。于是，在热河出现了日伪政权和抗日政权并存的局面。

（一）伪满政权组织职官

伪热河省政权成立于1933年(大同2年)3月，当时伪满洲国曾任汤玉麟为参议府副议长兼热河省长，但汤未到任。真正的伪政权是自日军占领热河全境后开始的。

1. **第五军管区（热河警备区）司令官。**

张海鹏，辽宁盖平人，1933年2月任伪满进犯热河前敌总司令，同年5月3日任热河警备区司令兼热河省长。张在旧辽洮军的基础上，积极组织第五军管区。1934年7月第五军管区成立，辖热河、锦州两警备区，张海鹏任司令官，1935年1月调任伪侍从兼武官长。

王静修，河北承德县人，1935年1月任，1937年调任第一军管区司令官。

邢士廉，辽宁沈阳人，1937年6月由陆军训练处长调任，1939

年调任第四军管区司令官。

应振复，辽宁辽阳人，1939 年 5 月由宪兵司令官调任，1942 年调任第四军管区司令官。

吕　衡，辽宁台安人，1941 年 2 月由第一军管区参谋长调任，1942 年调任第三军管区司令官。

吴元敏，湖北荆县人，1942 年 9 月由第四军管区司令官调任。

赫慕侠，辽宁凤城人，1943 年 8 月 20 日由第七军管区司令官调任，1945 年苏联红军进攻承德时被俘。

日军高级（主任）顾问　关原方，1934 年 7 月任。

小原真一

江岛虎之助。

根东，苏军进攻承德时被俘。

参谋长　李盛堂，1934 年 7 月任。

卢静远，1935 年年 1 月任。

刘卜忱，1937 年 6 月任。

吴国贵，1939 年 5 月任。

戴　元，1941 年 2 月任。

林保治（日），1942 年 9 月任。

栾　彪，1943 年 8 月任。

2. 热河省长

张海鹏，1933 年 5 月 3 日任。

刘梦庚，河北抚宁人，1934 年 12 月 1 日由哈尔滨工业大学校长调任。

金名世，辽宁新宾人，1937 年 7 月 1 日由三江省长调任。

王允卿，辽宁海城人，1940 年 5 月 21 日由总务厅参事官调任，1941 年 1 月 6 日调总务厅次长。

张联文，1941 年 1 月 16 日由总务厅参事官调任，1942 年 7 月 18 日调任禁烟总局局长。

马冠标，北京人，1942年7月18日由总务厅参事官调任，
1943年9月13日调任建国大学教授。

姜全我，辽宁金县人，1943年9月13日由通化省长调任，
1945年患脑溢血卒。

孙柏芳，1945年5月12日由三江省长调任，日伪投降后被人民政府处决。

3.**热河省次长**

连修(日)，1937年7月1日由首都警察副总监始任。

三重野胜(日)，1938年9月28日由鞍山市长调任。

田边秀雄(日)，1940年10月8日由铁道警护大队长调任。

渡边兰治(日)，1941年10月11日由锦州省警务厅长调任。

岸谷隆一郎(日)，1943年由总务厅地方处长调任，日伪投降后，连同其夫人和两个女儿举家自杀身死。

秘书长

曾　恪，1933年5月27日任，1934年12月1日裁撤。

总务厅长

中野琥逸(日)，1933年5月3日任，1935年调任吉林省总务厅长。

原　武，1935年2月29日任，1937年7月1日调任驻日本大使馆参事官。后裁撤总务厅，设次长。

民政(民生)厅长

张翼廷，1933年5月27日任，12月1日卒。

恩　麟，1933年11月29日兼任，1934年9月7日署任，12月1日任。

高乃济，1937年7月1日任。1938年1月1日改为民生厅，高乃任厅长。

林钧宝，1940年5月21日任。

庞凤书，1942年12月4日任。

孙仁轩,1943年4月1日任。
李葆华,1944年2月1日任,解放后被人民政府处决。
警务厅长
庭川辰雄(日),1933年5月3日代。
小林义信(日),1934年4月16日任。
山田一隆(日),1935年7月29日任。
中野四郎(日),1937年7月1日任。
村井矢之助(日),1938年12月10日任。
薄井友治(日),1939年11月24日任。
宇野音治(日),1940年9月17日任。
武藤喜一郎(日),1942年12月4日任。
皆川富之亟(日),1943年9月13日任。
高比虎之助(日),1944年12月28日任。
教育厅长
申振先,1933年5月27日任。
高乃济,1937年7月1日兼。1938年裁撤。
实业厅长
恩　麟,1933年5月27日任。
邵　麟,1934年9月7日署任,12月1日任。
张子炳,1936年6月20日任。
魏象贤,1940年8月27日任。
鲁　绮,1942年3月14日任。
承德警察厅长
胡承禄,1935年10月1日始任。
陈景启,1936年12月28日任。
王达善,1940年8月21日任,11月1日该机构裁撤。
烟政厅长
王绍先,1940年5月21日始任,1942年1月15日裁撤。

地政局局长

及川三男(日),1939年4月6日设地政局5月23日任副局长(局长缺)。

田边秀实(日),1940年4月8日兼局长。

渡边兰治(日),1940年10月11日兼。1943年3月31日裁撤。

朝阳办事处处长

关庆麟,1933年5月27日任,1934年5月11日裁。

赤峰办事处处长

杨裕文,1933年5月27日任,1934年5月11日裁。

(二)抗日政权组织职官

1938年6月,八路军第四纵队(宋时轮、邓华)挺进冀察热边,掀起了有22个县20多万民众参加的抗日武装大暴动,并且成立了冀(河北)察(察哈尔)热(河)宁(辽宁)军区和冀察热宁行政委员会,还成立了若干个县政府(办事处)。从此,热河有了抗日政权组织,一直到抗战胜利。

1. 共产党组织领导干部

热河地区早在1925年3月就建立了共产党组织热河工作委员会,负责人是陈镜湖。1928年4月改为中共内蒙特支,韩麟符任书记,1929年2月改建为中共内蒙特委,郑丕烈(后叛变)、李铁然陈镜湖先后任书记。其他还有热河临时县委、热河特支等,但到1933年3月日本进攻热河后,这些党组织都遭破坏而失败了,没有保存下来。后来的热河党组织是由冀东发展过来的。

冀热边共产党组织领导干部

①冀热边特委书记

王平陆,河北迁安人,1935年8月任。

李运昌,河北乐亭人,1937年7月任。

胡锡奎,湖北孝感人,1938年5月任。

②冀东地委书记

周文彬,朝鲜新义州人,1939年1月任,1944年10月16日牺牲。

李楚离,1939年7月任冀东分委书记,1942年2月任晋察冀第十三地委(冀热边)书记。

李运昌,1943年7月任冀热边特委书记。

③冀热辽区党委书记

李运昌,1945年1月任。

张明远,甘肃岷县人,1945年8月任。

常务委员　李运昌,1945年1月任。
　　　　　李楚离,1945年1月任。
　　　　　苏林燕,1945年1月任。
　　　　　詹才芳,1945年1月任。
　　　　　李中权,1945年1月任。
　　　　　张明远,1945年2月任。

秘书主任　王志群,1945年1月任。
　　　　　彭　莱,1945年2月任。

组织部长　苏林燕,1945年1月任。

宣传部长　李楚离,1945年1月兼。

社会部长　朱其文,1945年1月兼。

敌工部长　李中权,1945年1月兼。

城工部长　王大中,1945年1月任。

热察边共产党组织领导干部

王　伍,1940年1月任平北工委书记。

苏　梅,1940年3月任平北地委书记,1942年2月任第十二(平北)地委书记。

段苏权,湖南茶陵人,1942年7月任第十二(平北)地委书记,1943年2月兼平北地分委书记,1945年1月任晋察冀第

十二地委(平北)书记。

2. 抗日政权组织职官

①冀察热宁边区行政委员会主任

刘绍襄,1938年8月任,10月裁撤。

②冀热边抗日政权组织职官

丁振军,1939年12月任冀东办事处主任。

焦若愚,1940年7月任晋察冀第十三(冀热边)专署专员。

李运昌,1943年7月1日任冀热边行署主任。

张明远,1945年2月任冀热辽行署主任。

秘书主任　章云龙,1945年1月任。

　　　　　胡　光,1945年7月任。

民政科长　高敬之,1945年10月任。

民教科长　胡　光,1945年7月兼。

财政科长　杨玉森,1945年1月代。

　　　　　王克如,1945年8月任。

实业科长　胡云初,1945年1月任。

公安科长　钟子云,1945年1月任。

③热察边抗日政权组织职官

张致祥,1940年1月任冀热察区平北办事处主任,1940年7月任晋察冀边区第十四(平北)行政督察专员公署专员。

刘介愚,河北安平人,1941年7月任第十四(平北)专署专员。

张孟旭,1944年9月30日任冀察区第十二(平北)专署专员。

3. 抗日军事组织职官

①冀察热宁军区职官

宋时轮,湖南醴陵人,1938年8月任司令员。

邓　华,湖南郴县人,1938年8月任政委。

高志远,河北滦县人,1938年8月任副司令员。

李运昌,河北乐亭人,1938年8月任副司令员。

洪麟阁，河北遵化人，1938 年 8 月任副司令员。

李钟奇，辽宁建平人，1938 年 8 月任参谋长。

伍晋南，1938 年 8 月任政治部主任。

②冀热边军事组织职官

王平陆，河北迁安人，1937 年任华北抗日联军冀东（冀热边）游击第一支队司令员。

史　贞，1937 年任华北抗日联军冀东（冀热边）第一游击队政委。

李运昌，河北乐亭人，1939 年 9 月任冀热察挺进军第十三支队司令员，1940 年 7 月任冀东军分区司令员，1943 年 7 月任晋察冀军区第十三（冀热边）军分区司令员兼政委，1945 年 1 月任扩大后的冀热辽军区司令员兼政委。

李楚离，1939 年 9 月任冀热察挺进军第十三支队政委，1940 年 7 月任冀东军分区政委，1943 年 7 月任晋察冀军区第十三军（冀热边）分区副政委，1945 年 1 月任扩大后的冀热辽军区副政委。

包　森，陕西蒲城人，1939 年 9 月任冀热察挺进军第十三（冀热边）支队副司令员，1940 年 7 月任改称后的冀东军分区副司令员，1941 年 4 月 27 日牺牲。

张明远，甘肃岷县人，1945 年 8 月任冀热辽军区政委。

詹才芳，湖北红安人，1945 年 1 月任冀热辽军区副司令员、后任代司令员。

曾克林，江西兴国人，1939 年 9 月任冀热察挺进军第十三支队参谋长，1940 年 7 月任改称后的冀东军分区参谋长。

刘诚光，湖北红安人，1939 年 9 月任冀热察挺进军第十三支队政治部主任，1940 年 7 月任冀东军分区政治部主任，1942 年 4 月牺牲。

彭寿生，江西信丰人，1943 年 7 月任第十三军分区参谋长，

1945年1月任扩大后的冀热辽军区参谋长。

李中权，1947年7月任第十三军分区政治部主任，1945年1月任扩大后的冀热辽军区政治部主任。

③热察边军事组织职官

程世才，湖南大悟人，1940年5月任平北军分区司令员。

覃国翰，广西都安人，1941年8月任平北军分区司令员，1942年2月任第十二(平北)军分区司令员，1944年9月任平北支队司令员。

詹大南，安徽金寨人，1944年10月任平北支队司令员，1945年1月任第十二军分区司令员。

段苏权，湖南茶陵人，1940年6月任平北军分区政治部主任，1942年1月任第十二(平北)军分区政委，1944年9月任平北支队政委，1945年1月任第十二(平北)军分区政委。

杨春圃，河北任丘人，1942年2月任平北军分区政治部主任，后任第十二(平北)军分区政治部主任。

钟辉琨，江西宁都人，1945年9月任第十二(平北)军分区代司令员，11月任司令员。

陆　平，1945年9月任第十二(平北)军分区政委。

四.解放战争时期

(1945—1949)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冀热辽部队迅速出击，收复热河全省和东北大部地区。平北部队也迅速出击，解放热西地区，并前出到张北，参加了收复张家口的作战。共产党和八路军在收复地区建立了政权组织。与此同时，国民党军队也于1945年10月在秦皇岛登陆，向热河及东北发动全面进攻，所到之处也建立了政权组织。因此，在热河第二次出现了两种政权并存的局面。

(一)人民政权组织职官

1. 共产党组织

(1)中共冀热辽(冀察热辽)中央分局

程子华,山西解县人,1945 年 11 月 9 日任书记。

黄克诚,湖南永兴人,1948 年 5 月 2 日任书记。

黄火青,湖北枣阳人,1945 年 11 月任副书记。

秘书长　欧阳钦, 1945 年 11 月任。

组织部长　黄火青,1945 年 11 月兼。

　　　　　吴　德, 1945 年 12 月任。

宣传部长　赵毅敏,1945 年 11 月任。

社会部长　胡锡奎,1945 年 11 月任。

统战部长　李乐光,1945 年 11 月任。

城工部长　欧阳钦,1948 年 5 月兼。

(2)中共冀热辽区委热河分委

胡锡奎,湖北孝感人,1945 年 9 月任书记。

李子光,天津蓟县人,1945 年 9 月任副书记。

王国权,河南巩县人,1945 年 9 月任副书记。

(3)中共热河省委员会

胡锡奎,湖北孝感人,1945 年 11 月任书记。

黄火青,湖北枣阳人,1946 年 7 月任书记。

谭余宝,湖南茶陵人,1945 年 11 月任副书记。

委员:　胡锡奎,1945 年 11 月任。

　　　黄火青,1946 年 7 月任。

　　　李运昌,1945 年 11 月任。

　　　段苏权,1945 年 11 月任。

　　　谭余宝,1945 年 11 月任。

　　　李子光,1945 年 11 月任。

　　　王国权,1945 年 11 月任。

李德仲，1945年11月任。
马　载，1945年11月任。
李六如，1945年11月任。
王逸群，1945年11月任。
王孝慈，1946年4月任。
韩纯德，1946年4月任。
王逸伦，1946年4月任。
秘书长　李德仲，1945年11月任。
韩纯德，1946年4月任。
组织部长　马　载，1945年11月任。
宣传部长　李德仲，1945年11月兼。
王逸群，1946年4月任。
民运部长　王国权，1945年11月任。
社会部长　谭余宝，1945年11月兼。

(4)中共热辽区委员会

1946年6月在赤峰成立，1946年10月合并于热河省委。
胡锡奎，1946年6月兼任书记。
李德仲，1946年6月任副书记。
委员：　胡锡奎，1946年6月任。
杨雨民，1946年6月任。
黄永胜，1946年6月任。
李德仲，1946年6月任。
阎达开，1946年6月任(未到职)。
王逸伦，1946年6月任。
乌兰夫，1946年6月任。
杨得志，1946年6月任。
苏振华，1946年6月任。

(5)中共冀热察区委员会

段苏权，湖南茶陵人，1946 年 10 月任书记。
刘道生，湖南茶陵人，1947 年 1 月任书记。
牛树才，河北曲阳人，1946 年 10 月任副书记，1948 年初任书记。
马天水，河北唐县人，1947 年 11 月任副书记。
秘书长　刘书亭，1946 年 10 月兼，1948 年初任。
组织部长　牛树才，1946 年 10 月兼。
宣传部长　孙敬文，1946 年 10 月任。
社会部长　杨春圃，1946 年 10 月兼。
城工部长　王子玉，1946 年 10 月任。

2. 政权组织职官

(1)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冀热辽办事处——东北行政委员会冀察热辽办事处

1946 年 6 月，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设立冀热辽办事处，1947 年 11 月改称东北行政委员会冀察热辽办事处，先后辖热河省政府和冀东、冀热察、热辽行政公署，1949 年 1 月 10 日撤销。

李运昌，1946 年 6 月兼主任。
高自立，江西萍乡人，1947 年 11 月任副主任。

(2)热河行政公署——热河省民主政府

李子光，天津蓟县人，1945 年 9 月任主任，后改称主席。
杨雨民，内蒙古自治区赤峰人，1945 年 9 月任副主任，后改称副主席。

(3)热河省政府(热河省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

李运昌，1945 年 11 月任主席。
李子光，1945 年 11 月任副主席。
杨雨民，1945 年 11 月任副主席。
罗成德，陕西延安人，1947 年 12 月任副主席。
委员：　李运昌，1945 年 11 月任。

李子光，1945 年 11 月任。
杨雨民，1945 年 11 月任。
叶　田，1945 年 11 月任。
阎顾行，1945 年 11 月任。
庞松坡，1945 年 11 月任。
金起铣（蒙古族），1945 年 11 月任。
杨润田（蒙古族），1945 年 11 月任。
鄂其尔旺保（蒙古族），1945 年 11 月任。
韩祐庵，1945 年 11 月任。
王干一，1945 年 11 月任。
宋履谦，1945 年 11 月任。
张振久，1945 年 11 月任。
刘凤阁（回族），1945 年 11 月任。
甘重斗，1945 年 11 月任。

候补委员　胡汝策（女），1945 年 11 月任。
张月波，1945 年 11 月任。

秘书长　李六如，1945 年 11 月任。
刘锡三，1946 年初任。
荆　杰，1946 年任。
阎顾行，1947 年 5 月任。

民政厅长　刘锡三，1945 年 11 月任。
宋履谦，1946 年 6 月任，未到职。
罗成德，1947 年 3 月任。
杨雨民，1947 年 12 月兼。

公安厅长　叶　田，1945 年 10 月任。
王　范，1948 年 10 月任。

实业厅长　阎顾行，1945 年 11 月任。
韩祐庵，1946 年 7 月任。

教育厅长　仇友文,1945年11月任。

庞松坡,1946年3月任。1947年3月7日撤职。

韩祐庵,1947年3月任。

王新华,1947年5月任。

财政厅长　王奂如,1945年11月任。

阎顾行,1946年7月兼。

张令彬,1947年3月任。

王奂如,1948年4月任。

工商厅长　阎顾行,1947年3月7日任。

建设厅长　阎顾行,1947年4月26日兼。

农林厅长　杨润田,1947年3月7日任。

(4)**热辽行政公署**

杨雨民,1946年6月任主任。

刘锡三,1946年6月任秘书长。

刘锡三,1946年6月任民政厅长。

王新华,1946年6月任教育厅长。

罗成德,1946年6月任财政厅长。

杨润田,1946年6月任农林厅长。

王　范,1946年6月任公安总局局长。

(5)**冀热察行政公署**

杨春圃,河北任丘人,1946年11月任主任。

张孟旭,河北安平人,1946年11月任副主任,1948年10月任主任。

秘书长　权哲民,1946年11月任。

民政厅长　权哲民,1946年11月兼任,1948年5月兼任民教厅长。

财政厅长　贾庭三,1946年11月任。

教育厅长　史唯三,1946年11月任,1948年5月与民政厅合

并为民教厅。

实业厅长　尚子锦，1946年11月任。

公安局长　夏　印，1946年11月任。

3. 军事组织职官

(1)冀热辽军区——冀察热辽军区

肖　克，湖南嘉禾人，1945年10月任司令员。

程子华，山西解县(今运城)人，1945年11月9日任第一政委，1946年8月任司令员，1947年4月代理司令员兼政委。

黄克诚，湖南永兴人，1947年11月兼政委。

罗瑞卿，四川南充人，1945年11月任第二政委，1946年7月兼政治部主任，1946年8月调晋察冀。

李运昌，河北乐亭人，1945年11月任副司令员。

陈奇涵，江西兴国人，1946年5月任副司令员，1947年4月免。

黄永胜，湖北咸宁人，1946年7月任副司令员，1947年4月免。

黄火青，湖北枣阳人，1946年7月任副政委。

参谋长　李聚奎，1945年11月任。
　　　　彭寿生，1947年2月任。
　　　　黄志勇，1948年3月任。

政治部主任　罗瑞卿，1946年7月兼。
　　　　　　刘随春，1946年8月任。
　　　　　　黄欧东，1947年2月任。
　　　　　　黄火青，1947年4月兼。
　　　　　　刘道生，1948年3月任。

(2)热河军区

段苏权，湖南茶陵人，1945年9月任，1946年10月热河军区

合并于冀热辽军，同年12月调任冀热察军区。
胡锡奎，1945年9月兼政委。
黄火青，1946年7月兼政委。
韩　伟，1945年10月任副司令员。
杨梅生，1946年10月任副司令员。
李子光，1945年9月兼副政委。
舒　行，1945年12月任参谋长。
谢　明，1945年9月任政治部主任。
苏启胜，1945年12月任政治部主任。
汤　池，1945年12月任供给部长。
李资平，1945年9月任卫生部长。

(3)热辽军区

黄永胜，1946年6月任司令员，1946年10月合并于冀热辽军区。
胡锡奎，1946年6月兼任政委。
文年生，1946年6月任副司令员。
朱涤新，1946年6月任副政委。
邱会作，1946年6月任政治部主任。
朱　军，1946年6月任参谋长。

(4)冀热察军区

曾思玉，江西信丰人，1946年10月任司令员。
段苏权，1946年10月任政委，1947年1月任司令员，1947年秋任司令员兼政委。
詹大南，1948年初任代司令员。
刘道生，1947年1月任政委。
牛树才，1946年10月任副政委，1948年初任政委。
参谋长　舒　行，1946年10月任。
　　　　李讯山，1948年3月任。

政治部主任　苏启胜，1946 年 10 月兼。

(二)国民党政权组织职官

1. 国民党热河省党部

王致云，河北平泉人，1945 年被任命为热河省党部委员兼书记长，后改任热河省党部主任委员，1949 年去台湾。

谭文彬，辽宁建平人，1947 年任省党部主任。

委员　李荫国，1946 年 1 月任。

王澍霖，1946 年 1 月任。

邱象峰，1946 年 1 月任。

赵炳琪，1946 年 1 月任。

赵自齐，1947 年任。

王兴国，1947 年任。

崔公睿，1947 年任。

毛韶青，1947 年任。

李守廉，1947 年任。

2. 热河省政府

缪澄鎏，辽宁开原人，1940 年 5 月 3 日任省政府委员兼主席。

刘多荃，辽宁凤城人，1941 年 12 月 9 日任省政府委员兼主席。

范汉杰，广东大埔人，1948 年 2 月 18 日任省政府委员兼主席，未到任前由于国桢代理。

孙　渡，云南陆良人，1948 年 6 月 22 日任省政府委员兼主席。

委员　谭文彬，1945 年 10 月 2 日—1948 年 5 月 19 日。

谷宗瀛，1945 年 10 月 2 日—1948 年 4 月 24 日。

刘廉克，1945 年 10 月 2 日任。

毛韶青，1945 年 10 月 2 日任。

高鹏云，1945 年 10 月 2 日—1946 年 9 月 9 日。

王恒升,1945 年 10 月 2 日—1947 年 9 月 3 日。

冀朝鼎,1945 年 10 月 2 日—1948 年 4 月 24 日。

李守廉,1945 年 10 月 2 日—1948 年 2 月 18 日。

洪　声,1945 年 10 月 2 日—1948 年 4 月 24 日。

武尚权,1945 年 10 月 2 日任。

成蓬一,1946 年 9 月 9 日—1948 年 3 月 24 日。

高清岳,1947 年 9 月 3 日—1948 年 4 月 24 日。

于国桢,1948 年 2 月 18 日—1948 年 10 月 28 日。

张守谦,1948 年 3 月 24 日任。

沈祖同,1948 年 4 月 24 日—1948 年 10 月 28 日。

沈遵晦,1948 年 4 月 24 日—1948 年 10 月 28 日。

石　觉,1948 年 10 月 28 日任。

李培国,1948 年 10 月 28 日任。

孙　明,1948 年 10 月 28 日任。

主任秘书　满　声,1941 年 6 月 21 日署,1942 年 7 月 8 日任。

林勇达,1948 年 10 月 18 日任。

秘书长　莫松恒,1946 年 1 月署。

高清岳,1947 年 1 月署,11 月任,1948 年 4 月 22 日免。

民政厅长　谭文彬,1945 年 10 月 2 日任。

李守廉,1947 年 1 月 23 日任。

于国桢,1948 年 2 月 18 日任。

李守廉,1948 年 10 月 28 日任。

财政厅长　谷宗瀛,1945 年 10 月 2 日任。

沈祖同,1948 年 4 月 24 日任。

建设厅长　毛韶青,1945 年 10 月 2 日任。

教育厅长　刘廉克,1945 年 10 月 2 日任。

3. **热河省临时参议会**

议　长　王致云，1947 年 4 月任。

副议长　胡之焕，1947 年 4 月任。

秘书长　赵炳琪，1947 年 4 月任。

　　　　孙　明，1947 年 9 月任。

参议员　王致云　胡之焕　兰铁铮　阎奉璋　李荫国

　　　　巩廷栋　谭文彬　于守仁　何梅志　张瑞生

　　　　马真吾　搭拉巴　王辉中　王澍霖　刘中平

　　　　金白铭　艾克让　朱惠南　刘连城　黄原卿

候补参议员　赵自齐　张九如　宋履谦　张书翰　姚海曙

　　　　　　林兰萱　刘峻山　孙　杰　张　颐　王　藩

4. **热河出席全国历届国会议员**

艾羲命，1913 年 12 月 15 日任政治会议议员。

高锡恩，1918 年 8 月 12 日任安福国会参议员。

李东莱，1918 年 8 月 12 日任安福国会众议员。

邓述禹，1918 年 8 月 12 日任安福国会众议员。

张其密，1918 年 8 月 12 日任安福国会众议员。

谭文彬，第一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1938 年 6 月 21 日公布），第二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1940 年 12 月 23 日公布），第三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1942 年 7 月 27 日公布），第四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1945 年 4 月 23 日公布）。

毛韶青，第三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1942 年 7 月 27 日公布）。

王维新，第四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1945 年 4 月 23 日公布）。

制宪国民大会热河代表（1946 年 11 月 15 日—12 月 15 日）：

王致云　成蓬一　李培国　王维新　张瑞生

王澍霖　赵炳琪　卢凤阁　杨宗培　何梅志

行宪国民大会热河省代表（1948 年 3 月 29 日—5 月 1 日）：

王致云　王兴国　张儒甲　赵荫亭　李培国　王锐刚
谭文彬　王耀中　阎奉璋　孙　明　马真君　马汉桢
高　志　孙　杰　庞英轩　朱子衡　王文鼎　张　颐
钱叙斋　张瑞生　王星华　崔震权　果　珍　张馥权
刘蕙馨

5.军事组织职官

(1)第十三军—承德警备司令部

军长兼警备司令　石觉，广西桂林人。
副军长　舒荣，云南人。
参谋长　全英
参谋处长　倪敬佩
副官处长　唐南薰　岳昌瀛(后)
秘书处长　李天熟
军法处长　张德祥
军械处长　吴　键
军需处长　何植山
军医处长　杨大鹏
新闻处长　林卧薪　梁亘英(后)
兽医处长　贺　鹏
第四师师长　雒振韶　郑邦杰(后)
第五十四师师长　史松泉
第六十三师师长　雒振韶
第八十九师师长　万宅仁　潘如涵(后)
第一百五十五师师长　杨　奇
第二百九十九师师长　巫剑峰

(2)热河省保安团

由石觉兼司令官。
第一团团长　岳宗瀛

第二团团长　滕运昌

第三团团长　田丰年

第四团团长　翟　光

第五团团长　吴　震

(3)**主要特务组织**

国防部保密局热河站站长龙超。

国防部保密局热察特别通讯站站长李英。

承德警备司令部督察处,表面上归石觉领导,实际上归保密局直接领导。第一任处长崔公浚,第二任处长许政,第三任处长同再启。

热河省政府调查统计室(中统)主任俞拯元。

五.解放初期

(1948—1955)

1948 年 11 月 12 日人民解放军收复承德,热河全省解放。12 月 26 日经中共中央和东北局批准,撤销冀察热辽中央分局、冀察热辽办事处和冀察热辽军区,将冀东、冀热察两区划归华北局领导,在原热河地区分别成立热河省、辽西省,仍归东北局领导。从此,热河省又有了统一的党政军领导机关,到 1955 年 12 月 30 日撤销省的建制。

(一)中共热河省委员会(重建)

李运昌　河北乐亭人,1948 年 12 月任书记,1949 年 9 月调政务院交通部。

王国权　河南巩县人,1949 年 5 月由辽西省调任第一副书记,同年 11 月任第一书记,1955 年 8 月调中央。

李东冶　山西平陆人,1955 年 8 月代书记。

马　载　河南安阳人,1948 年 12 月任副书记,1949 年 5 月调。

强晓初　陕西人，1949年9月任第二副书记，11月任第二书记，1952年10月调。
沈　越　吉林人，1952年10月任第二书记，1954年8月调。
肖佐汉　陕西延安人，1952年10月任副书记。
秘书长　王国权，1949年5月兼。
李东冶，1949年6月任。
王克东，1952年10月任。
办公厅(室)厅长　张树德，1949年3月任。
尚　持，1950年7月兼。
汪上汉，1951年10月任。
郝　达，1952年7月任。
组织部长　强晓初，1949年9月兼。
肖佐汉，1949年11月任。
郭洪德，1952年11月任。
宣传部长　李子光，1948年12月任。
王国权，1949年7月兼。
佟　森，1950年10月任。
社会部长　李东冶，1949年5月任。
统战部长　李东冶，1950年5月兼。
杨雨民，1950年冬兼。
工业部长　陈　光，1952年10月任。
商业部长　孙亚光，1952年10月任。
农村部长　尚　持1953年4月任。
纪(监)委书记　强晓初，1950年1月兼。
肖佐汉，1950年10月兼。
妇女委员会书记　常玉林，1949年7月任。
张敬宽，1949年12月任。

(二)热河省政府—热河省人民政府—热河省人民委员会

李运昌,1948年12月兼主席。

罗成德,1949年5月任主席。

沈　越,1952年10月24日任主席。

王国权,1955年1月任省长。

阎顾行,辽宁阜新人,1948年12月任第一副主席,1949年5月任副主席,1950年8月调。

杨雨民,1948年12月任第二副主席,1949年5月任副主席,1955年1月任副省长。

张正德,安徽寿县人,1952年10月任副主席,1955年1月任副省长。

秘书长　阎顾行,1948年12月26日兼。
　　王克东,1951年9月任。
　　张正德,1952年10月24日兼。
　　师小帆,1954年1月17日任。

办公厅主任　王克东,1950年11月5日兼。
　　高　翔,1952年11月21日任。
　　柏　里,1952年12月24日任(未到职)。
　　鲁　飚,1955年1月19日任。

民政厅长　杨雨民,1948年12月兼。
　　张正德,1950年5月任。
　　杨润田,1952年10月24日任。
　　常玉林,1953年10月任。

公安厅长　王延年,1948年12月任。
　　李东冶,1949年7月兼。
　　王延年,1950年8月再任。

财政厅长　王奂如,1948年12月任。

刘吟庆，1950年6月任。

工商厅长　赵济民，1949年2月任，4月机构撤。1950年10月18日工业厅、商业厅、劳动局合并为工商厅，再任厅长，1952年9月再撤。

商业厅长　赵济民，1949年5月任，1952年9月再任。

王志一，1953年1月任。

工业厅长　何英武，1949年7月代，1950年5月任。

郭耀臣，1952年6月任。

建设厅长　（缺职）1949年2月5日撤。

农（林）业厅长　刘　潜，1949年2月任。

张　宾，1952年10月任。

教育厅长　周　刚，1949年2月任。

杨趾麟，1952年10月任。

牛平甫　1955年1月19日任。

卫生厅厅长　徐鸿图，1949年7月任。

人事厅长　郭洪德，1951年3月兼。

王鹏程，1954年6月任。

交通厅长　于　谦，1949年10月任。

马　信，1950年7月任。

刘佐斌，1952年1月4日任。

粮食厅（局）长　刘吟庆，1949年10月任。

王毓峰，1953年1月任。

许岚清，1955年1月19日任。

司法厅长　张　瑞，1955年1月19日任。

监察委主任　肖佐汉，1950年8月24日任。

樊　平，1952年10月24日任。

监察厅长　樊　平，1955年1月19日任。

人民法院院长　张　侃，1948年12月任。

(高级人民法院） 张　瑞,1949年2月任。1952年任高级人民法院院长。

检　察　署　长　王延年,1950年5月20日兼。

(人民检察院院长)　任幼人,1954年2月6日任。

郭洪德,1955年1月任。

政法委主任　王延年,1953年任。

文教委主任　杨雨民,1953年5月兼。

徐鸿图,1954年任。

鲁　森,1955年1月19日任。

体委主任　杨雨民,1952年兼。

张正德,1953年兼。

王家善,1955年1月任。

民委主任　尔登尼,1954年任。

杨雨民,1955年1月兼。

计委主任　杨雨民,1950年8月兼。

王国权,1950年10月兼。

马　信,1955年1月19日任。

财委主任　沈　越,1952年10月24日兼。

马　信,1955年1月任。

(三)热河军区—热河省军事部—热河军区

李运昌,河北乐亭人,1948年12月任司令员兼政委。

欧阳家祥,江西吉安人,1949年2月9日任副司令员。

舒　行,江西吉安人,1948年12月任副司令员。

王国权,河南巩县人,1949年4月27日兼副政委,1953年2月兼政委。

强晓初,陕西人,1949年4月27日兼副政委,1949年12月免。

李荆璞，黑龙江宁安人，1950年11月任军事部长，1953年1月任司令员。

黄明政，广西凤山人，1949年12月任军事部副部长。1953年2月任副政委。

赵承金，辽宁海城人，1954年9月任司令员。

张天恕，湖北红安人，1954年9月任第一副司令员。

王家善，广西人，1954年9月任第二副司令员。

参谋长徐乃斌，1949年2月9日任。

王家善，1951年11月任。

张天恕，1954年9月16日兼。

政治部主任　孙文彩，1949年2月9日任。

王炳芝　1953年2月任。